華夏知青文集選

第二輯《知青思考》

众说知青

华夏知青网

离开东茹村后，我回去过两次。一次是在县城当售货员的时候，另一次是调回北京之后。两次回村相隔近十年，感受却十分相似。

一

1971年5月，县安置办公室第一次大批抽调知识青年。在五台县插队的300多名北京知青，约有100人先后被抽调到县百货公司、土产公司、副食品公司、城关供销社、银行、书店、公安局等单位，也有个别人在县政府当了干部。我在综合商店当了一名售货员。

综合商店是县城里新盖起的二层楼房。店新职工也新，售货员大部分是刚从部队下来的复转军人和北京知识青年，也有从基层供销社选调的优秀售货员，在县城商业系统十分引人注目。记得那天我提着行李走进楼上女宿舍，看到屋内整洁漂亮的床单，干净清爽的毛巾，想起昨晚相伴入眠的破屋、土炕、煤油灯，一时竟有些不知所措，心中感慨万千。

半城半乡的县城生活给我一种复归的感觉：电灯、自来水、手摇电话机、黑白电视机，还有烟气腾腾的电影院、出售刀削面和炒米粉的小餐馆、大而硬的饼干，都和都市生活那样接近。很快我习惯了一名县城售货员的生活。每天早晨踏着吱吱作响的木垫板走进栏柜（柜台），舞动鸡毛掸拂去玻璃上的灰尘，然后坐在木登上等候顾客到来。大约十点钟，四乡农民涌入城里，买这买那热闹到十二点钟。午后顾客逐渐稀少，我们去进货或聊天、看书，有时甚至在售货厅内打羽毛球玩。十分清闲自在。

县城的售货员没有休息日，从大年初一直干到腊月三十。过年过节有加班费。初时每月十九元工资，可已有了纪律约束，不能像在村里收了秋就惦记着回北京，直住到来年开春。奇怪的是那时倒也不十分想家，有两个春节我都是在商店里过的，挺新鲜也挺热闹。或许是冬季来临时潜藏心底的与亲人团聚的愿望便浮现出来，一个腊月天，我和好朋友建军商量，既然回不了北京，那就回村看看吧。

山里的腊月天风如刀割。我们搭乘一辆进山拉焦炭的卡车，建军外衣单薄，我便自告奋勇爬进车厢。司机和助手从驾驶室中将他们厚厚的皮大衣扔给我，我披上一个盖一个。卡车行驶三十里路到达村头时，我的手还是冻得解不开大衣的扣

子。

进村后第一个念头，就是到油坊去暖和暖和。

爬上卵石堆砌的漫坡，我们走进大队部。东厢那间小耳房曾是我、建军、春兰三个女知青的宿舍。如今我和建军调到县城工作，春兰到广东上了大学，人去屋空，歪歪斜斜的木门静静地关闭，一把铁锁高悬在门楣之上。大队部白天没人办公，我们俩径直奔向后院，推开了油坊油腻腻的木门。

熟悉的热气和油香引我们进屋。“谁啦？”有人问。“阎大伯！”我和建军叫着，话音未落，只见阎大伯已拖着踢踏的步子从榨油的架子后面绕出来。他那黄而瘦的脸上绽开笑容，惊喜地说：“嗨呀，娃娃们回来了！”阎大伯的帮手老谢也搓着手问：“来了稀客了，咋想着回来啦？”

我们解释着未能回来的原因。阎大伯拿起扫帚将炕席扫干净，残破的炕席被油尘熏染得改变了颜色，发着暗淡的光。老谢爽爽地问：“吃甚吧？”我们答：“随便。”阎大伯想了想，决定吃莜面闷鱼儿。他知道我们在村里时最喜欢吃他做的闷鱼儿。

尚未温饱、不善言辞的乡亲就这样开始了对我们的欢迎。烧水、和面、洗土豆，不让我们插一下手。阎大伯是我们十三个知识青年到东茹村后结识的第一位村里人。刚进村时知青集体住小学校内，阎大伯给我们做饭吃。农村日常生活必须的烧炕、做饭、挑水都是阎大伯教会的。后来我们分散到九个小队劳动，建军、春兰和我搬进大队部院内的小耳房，阎大伯在后院榨油，仍旧常来常往。晚上收了工，吃罢饭，我们常相约到阎大伯家串门聊天，大伯家的炕总是烧得热乎乎的，有时还有些炒豆子、炒麻籽吃。阎大娘几次说要认我们做干女儿，

阎大伯是榨油好手。逢秋冬两季，各小队依次将打下的胡麻、黄芥送到油坊，阎大伯和老谢便为每个小队榨油。毛驴在屋东头拉着石磨转呵转，老谢在靠门口的大铁锅旁翻炒麻籽，一根直径近米数的粗大木杠横贯全屋，阎大伯咳着、喘着在西头榨油的架子后面忙伙，削瘦的脸上淌着汗。那些年，东茹村大部分人吃不饱饭。我们北京知青一年五百多斤毛粮的定量，按说够吃了，可大伙不操心，不算计，结果也吃不好。有时甚至连续几天只有高粱米粥，没盐没菜，大铁锅沿被染成了高粱红。在这种情况下，油坊在我们心里就独具魅力。

阎大伯榨时油时各小队多多少少要送一点细粮来，莜麦面、粘谷子、有时还有点白面。数量虽然不多，但这些粮食加上油坊里有油有酱，就算得上得天独厚了。阎大伯做顿好饭，总不忘让老谢到前院喊我们。我记得吃过黄米面炸糕、油

饼、煮嫩玉米、莜面窝窝、莜面闷鱼儿。大队干部有时通达过来，也一起吃。吃的时候都是关上门，悄悄的。一怕来人多，二也因为大多是蹭饭的，总觉得有些不妥。

我最喜欢吃莜面闷鱼儿。将莜面用热水和好搓成柳叶状，放在胡麻酱炒过的土豆块上闷熟。土豆被油炒得金黄发亮，莜面鱼儿软滑劲道，吃过一碗还想第二碗。怎奈僧多粥少往往不能尽兴。

此时我们重坐油坊炕上，看阎大伯再现他的手艺。饭熟了，阎大伯取出几只粗瓷碗，从竹竿上拉下一块手巾，认真地擦拭。那手巾本是块豆包布，被油污染黑不见原色。我们迟疑了一下不约而同地说："不用擦了……"可阎大伯执意认真擦过，然后取出筷子，抹一抹，分给我们。

我没有想到这碗莜面鱼儿留给我的却是关于一块毛巾的印象。一时弄不明白这块油腻的黑乎乎的手巾为何如此刺激我。当年习以为常的日子又真实地呈现在我面前，告诉我过去的时光里不仅有飘香的莜面鱼儿。记忆中经久不散的香味淡去了，飘走了。当阎大伯将热乎乎的莜面鱼儿端上来时，我已失去了初来时的兴奋。吃一口，再不见昨日的满口溢香。

这是我吃过的最后的一碗莜面闷鱼儿。那以后我再没走进这间油坊。三十里距离和三年时间改变了我，我吃惊环境改变后我感情和心境的变化，为此内疚又无可奈何。

又一年，听说阎大伯患了肝炎。我曾陪他去县医院看病，眼看一位大夫对他冷淡而草率仍旧无能为力。当我和建军再次回村探望他时，阎大伯只能趴在窗边向我们告别。几年后我调离五台县城，走时匆忙没有回村向大伯大娘作别。又过了三年我调回北京，一位同学来到我家告诉我说阎大伯去世了。他儿子给我捎了小米来。

东茹村的乡亲称自己是"受苦人"，下地干活儿他们叫"受"或"受苦"，能干的人被称为"苦大"。我想这是他们对自己生活的认识和感受。同我们相比，他们的日子苦得多，难得多。可他们却用同情温暖我们，拿出仅有的最好的东西与我们分享。当阎大娘盘坐炕头端详我们时，嘴里总念叨着："哎，娃娃们可怜呢，从北京来到这地方。"他们默默地生，默默地去，山外没人知道他们。如今，大伯大娘都已故去，他们留下两儿两女和一群孙儿。还留给我一份永存心头的记忆，是关于莜面闷鱼儿的。

二

1977年我从五台县调往河北琢县，1979年夏天回到北京。当年同一火车离开北京的知青们，十几年中靠着十八般武艺

各显神通陆续返回了出发地。

昔日熟悉的城市生活，在我眼里不再完美无缺。生活和岁月改变了我，我只能用新的标准来评判周围的人和事。离开北京的十一年里，我在北方的山区种过地，当过售货员，在河北平原的农机厂学过铣床，同最普通的劳动者们朝夕相处，和一些人成为朋友。我不敢称自己是他们中的一员，但不能否认在潜移默化之中接受了他们对生活的许多看法，习惯了他们评判人和事的眼光。这些都是城市学校里没有教给我的。离京时我还是不谙世事的中学生，回来已近不惑之年，逐渐成熟而且独立了。审视新的自己，观照新的环境，我觉得我可以应付生活。

五年匆匆而过。改革开放后的农村发生了巨大变化。这变化又牵动了我那根思乡的神经。我又想起太行山里那个小村子，想起当年一起干活儿的朋友。不知道闺女们结婚没有？小伙子们娶下什么样的媳妇？他们的日子好过了吗？

1984年秋天，乘到山西出差之便，我转道重返五台县。在县城，谢绝了商店里同事的挽留，同省妇联宣传部老钟同志一起，直奔东茹村。

听说地分到户了。我不由想起大队小队的干部们，他们已经改了称谓吧。记得我们插队刚到九队时，生灵当队长，人挺和气，喜欢唱山西梆子。银梅告诉我，生灵三十岁还没娶上媳妇，开会喜欢挨着闺女们坐。接着明堂当队长，明堂高个子，帽子上总捌着颗五角星，他刚娶亲，小俩口感情十分好。再后来换了绿林，绿林年长些，有两个娃。他读过不少古书，喜欢“讲古话”，也好说怪话。平时干活儿骂起人很凶，但没骂过我们，对我们“敬而远之。”

有一次打场，打麦子，用机器脱粒。绿林让我和建军把成捆的麦子从垛上掀下来，送到输送带旁打散，供两位老汉往输送带上放。绿林和另外两位老汉在机器的另一面扬场。秋日头毒，半天干下来口干舌燥，脖子里围了手巾仍感觉麦刺扎得难过。中午吃饭时建军发起烧来，双颊红红的。我只好一个人去了场院。

机器飞快地转动，我吃力地跑来跑去搬动麦捆，不一会儿累得满头大汗。轰轰的打麦机似乎还在催促“快点、快点”。无奈只好连拖带拉。快收工时，绿林才发现场上只我一人在运麦捆。他爬上麦垛，用木叉帮我将麦子掀下来，我总算松了口气。

没有想到这一件小事改变了绿林对我们的看法。他开始关照我们，似乎要弥补自己的疏忽。割谷子茬口留得高了他视而不见，休息时甚至和我们搭两句话。在我患急性肝炎痊愈后回村干活儿时，他还嘱建军锄地时慢一点，留在后面陪陪我，免得一下干得猛了。说实话，我不是干活儿好手，在知青里无论体力还是能力均属下乘。村里人却不因此看轻我，他

们着重的是态度，即你是否真正尽了力。

我与老钟刚进村，在街头意外遇到秀鸾。秀弯曾和我一起干活儿，她生得眉清目秀，唇红齿白，若在城市，或许去唱歌跳舞搞文艺了。秀鸾的母亲早逝，父亲是小队的记工员。我们在村里时，记工员给秀鸾娶了个后妈，后妈带来她最小的儿子，这儿子就成了秀弯的丈夫。村里人说这叫亲上加亲。

秀鸾温和善良，说话慢声细语，颇有戏曲道白的韵味。你夸她两句，她便脸一红，说“羞刹了。”没想到就是这个刘秀鸾，如今站在街上摆起卖小百货的摊子。见到我，秀鸾惊喜地说，她怎么也没估计到我能回来，真是“好刹了。”我与老钟就坐在她的货摊旁聊了起来。秀鸾已经结婚，第一个孩子早夭，又生下两个女儿。丈夫江风到石家庄进货去了，那里的日用品比较便宜。秀鸾告诉我，当年一起下地的闺女们全都出嫁了，连年龄较小的一个也有了四个娃，真让我大吃一惊。看来计划生育在这里敌不过人情面子。

我们谈起江风。江风刚进村时一副迷迷糊糊的样子，看他挑着水桶晃晃悠悠没精打彩的模样，不像个好后生。不想几年中长成高高大大的小伙子，还学得一手木匠活计。独生女儿能有美满婚姻，秀鸾的母亲地下有知亦可瞑目了。

我们在街头站着，宝山拉着一车粪经过，“呀！”他笑着站住了。虽然已经娶妻生子，宝山依旧当年模样。队里一块儿下地的后生中间，宝山与我和建军最知己。宝山家穷，整日穿得破旧，脸也像没洗过似的。平日年龄相仿的后生摔跤玩耍，打睹干仗，宝山都算一个。有一回在山上干活儿，不知谁带了两个馒头当午饭。在粗粮都吃不饱的年月这两个馒头有多么大的诱惑力啊！带馒头的人说：谁躺着头悬空吃下一个馒头，另一个他奉送。第一个响应的又是宝山。他真的把馒头吃了下去。

宝山大大咧咧无忧无虑，却有一副热心肠。我们有事求他帮忙，他总是满口答应，从不打马虎。在地里干活儿偶尔从我们身旁经过，总要使个眼色，悄声说：“慢些干。”

我问宝山如今分田到户，日子好过了吧？他诡秘地回答：“你还不清楚，咱受苦人哪会儿也是受。”问他有几个娃？他表情豁然开朗，笑眯眯地回答有两个儿子。长得都很“发节”（结实）。

天色将晚，公社妇联主任请我们去公社食堂吃饭，还买了几瓶啤酒，说城里人喜欢喝这个。饭后，她邀我和老钟到村妇联主任家坐坐。妇联主任住在第六小队。我们三人走出公社大院，绕过卫生院的高墙，顺路进了六队。几个老汉蹲在墙根吸烟，我离村已有十几年，又不是同一小队，所以都不认识。一位老汉同妇联主任打个招呼，“吃啦？”“嗯哪。”另

一个问："好像是咱村里在过的知识青年？""嗅。"我们边走边应，"调回来啦？"有人问。主任笑了："回来瞧瞧。"

老汉无意间的问话，让我心头一颤。昏昏夜幂中，走在熟悉的坑洼不平的石路上，身边是村里的乡亲，我恍惚有一种真的调回来的感觉，揪心的恐惧袭上心来。似乎这一句无意的问话将会决定我的命运。整个晚上我被不安的心情笼罩了。在妇联主任家里说了些什么一点不记得。第二天，我果断地打消了多住几天的念头，到临村采访之后，便与老钟返回县城。

从县城到太原直到北京，我弄不明白我究竟担心什么？是担心调动工作时劳心费力的疲惫，还是惧怕重返土屋、土炕、梯田、沟地、水井、煤油灯的生活？我曾怀着深深的眷恋，记挂着劳动生活了三年的村子，将乡亲们山一样厚重，土一般温暖的亲情珍藏心中，而当我一旦有机会离开它时，又走得那么义无返顾。

我只是东茹村的一个过客。而且永远不愿再过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不愿再次坐在山坡的梯田上看每天一次的长途汽车经过村子向山外开去，带走我的无望和失落。最近，听秀鸾的亲戚讲秀鸾已不再做生意，回到家里带她的三个孩子，喂了猪，养了鸡，日子过得不错。江风随工程队去了太原，还干他的木匠活儿。五台县的工程队在太原颇有名气，不少男人都出去做工了。大山再不能锁住青年人对新生活的向往，对文明富裕生活的追求。将来有一天，江风和伙伴们挣钱回家，还会把城市的各种信息以及生活方式、生活节奏带回去，给山村的生活新的冲击。

当年千百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其实对双方都是一次巨大的冲击。若干年后，我们之间的差距会逐渐缩小，不论变化朝向何方，冲击的影响都不容否认。那一段生活对我个人而言有得亦有失。我失去了求学求知的宝贵时光，学到了书本上没有的人生经验。正如有些感觉离开了特定环境便难再现，有些生活的体验是需要付出代价的。城市生活的压力和人与人间的隔膜只能使我倍加珍视山里人自然流露、不索回报的真实情感，它会温暖我的一生，在我心中永存一方净土。

（苏小环，1967届初中毕业生，1968年去山西农村插队，1979年回北京，现在英文《中国妇女》杂志社任编辑。）

华夏知青网不是赢利性的网站，所刊载作品只作网友交流之用
引用时请注明作者和出处，有版权问题请与版主联系
华夏知青网：http://www.hxzq.net/
华夏知青网络工作室

【记忆碎片】：

眼泪

1973年9月1日，付晓东、尹晓平和王家宁、阎学丽两对北京知青，在草原上举行了婚礼。

2013年9月1日，应邀参加我当年插队的公社的邻公社白音呼布公社吉林宝力格大队北京知青的聚会。这天，也是付晓东、尹晓平夫妇和王家宁、阎学丽夫妇结婚40年的纪念日。40年前，两对知青曾经在乌珠穆沁草原上共同举办了婚礼。当时，我曾骑马走近百里（50公里）去参加了他们两对新人的婚礼。

9月1日的聚会中，付晓东无意中提到吉林宝力格大队知青张鹤斌的“萨日”马。年逾6旬的老张，竟然像孩子一样地哭了起来。晓东说，这匹马陪伴鹤斌在草原上度过了11年。

这一幕，多少有些出乎我的意外，也使我深受感动。

我理解鹤斌兄对马的感情。离开草原以后，我无数次地在梦中与自己心爱的马相会。

9月1日，在付晓东、尹晓平和王家宁、阎学丽的婚礼上，两位新郎都喝醉了，都醉得一塌糊涂，都醉得嚎啕大哭。引起大哭的原因是复杂的。当时，谁也没有想到后来的局势变化，结婚意味着将永远留在异乡。虽然这是两对新人做出的选择，这种选择也是非常艰难的。40年后，付晓东在自己的博客中写道：“记得那一天，我也喝酒喝得酩酊大醉，表现为伤心痛哭，我心里很清楚，我在为远在北京的父母而泣。”记忆碎片78当年与我在草原上共同生活多年的牧民和知青们，没有见过我流泪。我那时时而会对别人说：“我的眼泪在幼儿园中就流完了”。我4岁时父亲被关进监狱，14岁时，父亲才在被关押10年后被“免于起诉、宽大释放”，之后，戴着“反革命”的帽子参加劳动，接受“监督改造”。妈妈一人在屈辱中将我们兄弟姐妹4人抚养成人。父亲1955年被抓时，子女中最小的我4岁，最大的哥哥9岁。我人生最早的记忆，就是整天陪着妈妈哭，有时候是与哥哥姐姐们一起陪着妈妈哭。

在草原上，多次与死神擦肩而过，多次陷于“叫天天不应、呼地地不灵”的困境。既曾遭遇过肉体的磨难，也曾遭遇过心理的委屈。但是，我从未在人前落泪。没有想到，随着年龄的增长，自己竟然变得更容易激动，感情变得更脆弱。

1998年夏天，我与曾经在同一大队下乡的知青邵乔海一道回草原。她曾经住在钦达门阿爸家放羊、下夜。她1972年离开草原，是我们队北京知青中离开较早的一位。1998年，她的蒙语已经生疏，当我陪她去看望钦达门阿爸时，我为她当翻译。

当时，钦达门阿爸还健在，但他的老伴已经去世。

在钦达门家里，钦说："见到乌兰其力格（邵乔海的蒙古名字，意思是"红军"）回来，真高兴"。

乔海说："我回来得太晚了，阿尕（钦的老伴）在的时候，就该回来"。

我在为乔海翻译这句话时，怎么也控制不住，失态落泪。结果，引得全屋的人，包括钦达门阿爸，包括钦达门阿爸的儿女们，都哭成一片。

相关图片欣赏请移步作者博客：

http://blog.163.com/xiexq_1951@126/blog/static/16165854320139215325219/

海宽文集：http://www.hxzq.net/showcorpus.asp?id=10

华夏知青网不是赢利性的网站，所刊载作品只作网友交流之用
引用时请注明作者和出处，有版权问题请与版主联系
华夏知青网：http://www.hxzq.net/
华夏知青网络工作室

我的知青岁月

徐进昌 来源：公众号“文明与本能”

锡林郭勒日报

毛泽东亲笔题写报名
中共锡林郭勒盟委员会机关报

2021年11月
3
星期三
总13410号
今日8版

锡林郭勒日报

我的知青岁月
徐进昌

徐进昌

在知青岁月，我由两位牧民党员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两位牧民都是乌珠穆沁草原阿尔山宝力格大队深受敬重的人。奥托斯楞是经营良种畜的能手；劳布僧是大队长，是个有威望的带头人。

1967年的冬天，白雪皑皑，冰封千里。莽莽苍苍的乌珠穆沁草原，迎来了一支城里的学生队伍。学生们接受再教育，插队作牧民，带来了一股浓浓的青春活力和蓬勃的气息。

当得知知青车队到来，牧民马队奔驰而来迎接。大队原本安排知青们住在大队部，等春暖花开再安排放牧。但学生们决心早下去放牧，早接受锻炼。牧民们既担心又高兴，各个组带包的牧民，冒着风雪把知青接到自己的浩特，在自己的蒙古包旁就近为知青扎起了蒙古包。

大队已经为知青准备好了行头，给知青作了全套武装。皮袄、皮裤、皮帽子、毡靴达，人人一匹骏马。白茫皮袄成了百里牧场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谢小庆按：徐进昌同志的这篇回忆刊登于2021年11月3日出版的《锡林郭勒日报》的第3版。徐进昌是1967年11月与我一道插队落户到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东乌珠穆沁旗额仁高比公社的知青。我们不在一个大队，我在额仁高比大队，他在阿尔山宝力格大队。

在知青岁月，我由两位牧民党员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两位牧民都是大队深受尊重的人。奥托斯楞是经营良种畜的能手。劳布僧是大队长，是个有威望的带头人。

1967年的冬天，白雪皑皑，冰封千里。莽莽苍苍的乌珠穆沁草原，迎来了一支城里的学生队伍。接受再教育，

插队作牧民，带来了一股浓浓的青春活力和蓬勃的气息。

当知青车队到来，牧民马队就奔驰迎接而来。大队原本安排知青们住在大队部，等春暖花开再安排放牧。学生们决心早下去放牧，早接受锻炼。牧民既担心又高兴，各个组带包的牧民，冒着风雪把知青接到自己的浩特，在自己的蒙古包就近为知青扎起了蒙古包。

大队已经为知青准备好了行头，对知青作了全幅武装。皮袄、皮裤、皮帽子、毡嘎达，人人一匹乘马。白茬皮袄成了百里牧地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跨上马背是学当牧民的第一道考题。许多知青都有着摔下马的经历。生龙活虎的马背，不会让人没有几分胆怯。这第一道关一段时间以后总算闯了过去，庆幸我们队也没有一个被摔伤的。

一个夏季的晚上，我骑着马，挎着一匹马，带着铁锨，去井边饮马。附近传来马群的嘶鸣，我牵着的马兴奋起来，挣扎着向前奔驰，铁锨碰到骑马，骑马也狂奔起来。不知怎样摔下马来，也不知马都跑到哪里。摔晕了。第二天，牧民找来我的马。马鞍子想必也摔坏了。牧民一声不响，为我打理一切。心里好不温暖！牧人的心胸比草原还大，牧人的心地比金子还亮。

我插队的阿拉山宝力格大队三十几户人家，一百多平方公里的草地，二万多只牛羊，二、三百匹马，日子过的还算不错。每个组五六户人家，经营着三群羊，两群牛。牲畜是集体的，大家放牧劳动记工分，互助合作，其乐融融。

大队党支部有六个党员，是阿拉山宝力格草原的一面旗帜。书记帕嘎和劳布僧是一文一武的搭配，成为牧民群众的主心骨。1971年我光荣入党，成为大队团支部书记和大队领导班子成员。帕嘎、劳布僧是大队的带头人。

在阿拉山宝力格，没有年轻人喝酒，更没有游手好闲的。党员们带头，关心两户困难一些的牧户，牧民人人勤奋自力，民风淳厚。数年来从没有出现牧民打架的，群众把打人视为恶行。因为喝酒伤害过人，所以多年来一律禁止青少年喝酒，整个队也少见喝酒的。这真是个难以置信的事。草地上的牧马人居然会是不喝酒的！所以，我们队的知青跟着牧民，学习牧民，也没有一个打架的，喝酒的，个个都是生产上的骨干。

在牧民的培养下，呵护下，知青们们学习蒙古语，学习蒙古包生活，学习放羊，放马，成为放牧的能手，成为马背上的骄子。与牧民朝夕相处，在草原学会放牧，摔跤，走敖特尔，作毛毡，驯生马，走“阿音”，在牧民的熏陶下，成为展翅草原的雄鹰。

这片草原曾经深遭受土匪的祸患。梅毒病也曾肆虐。牧民的生产、生活都曾苦不堪言。出生的孩子也多有夭折。家中有孩子都可以称得上是幸运。1947年得解放，有了党的领导。奴隶得解放。各个蒙古包都插着五星红旗，户户牧民家都挂着毛主席像。

大队年年都有发展，牧民生活不断提高。每年年终分红，一个工可以分到一元七、八，生活无忧，信心满满。

后来，城里机关单位到队里招工，都没有知青想离开。有的为了完成招工任务要走，还会痛苦流涕，伤心牧民没有留住自己。许多知青都有牧民给起的名字，兄弟姐妹一般，和牧民早成了一家人。

知青包开始都跟随牧民的包，接受指导。那木和阿爸就是三组知青的带包人。奥托斯楞阿嬢是三组的党员。后来，知青为了强化锻炼，进一步与牧民拉近，有的住进了牧民家里。我们三组的知青包是与那木和阿爸一个浩特。我们这个组，还有嘎拉曾、巴代阿佳、通嘎额吉、朝格加布四家。

奥托斯楞阿嬢是大队的种公畜饲养户，一个群牵动着大队的二十个群和全队畜牧的长远发展。草原上条件有限，养好种公畜，着实难！担子重，责任大，共产党员走在前。种公畜由奥托斯楞阿嬢经营，是大家最放心的。一群种羊，一匹洋马，总是远离大部队，独处单养，享受精心照料。犹如蛟龙般的洋马，油光发亮，傲立草原，让人赞不绝口。

种公畜和良种的培育是大队前行的方向，作为共产党员的奥托斯楞承担着草原畜牧发展的希望。她默默无闻地坚持着，难有成果的一年又一年。

有觉悟的人经得起各种挑战，耐得住寂寞，经得起孤单，担得起重托。乌珠穆沁品种在优化，引进品种在前行。小洋马的诞生很是亮眼。

奥托斯楞阿嬢住进边境地区的时候，我在阿嬢家放羊。那年，遭遇罕见的暴风雪。阿尔山宝力格草原上百里雪地，断绝了行人。马匹都已经无能为力，只有骆驼勉强可以闯关。大灾面前，奥托斯楞红颜不让须眉，她驾着车，我们一起闯过了茫茫雪海，筹集了必须生产生活用品。好个牧人的刚毅果断闯关精神，让人叹服！

在生活上阿嬢细致周到。秋天里，她收集短茬羊皮熏制，商量本组的巴代阿佳给我缝制了熏制的德勒。还特别讲究，指着几个针眼说，这是没缝好的。非常善意，惴惴的告知，这活没有做绝！阿尔山宝力格的牧人，蒙古族游牧者，有着草原一样的情怀，一句话可以温暖半年的冰雪严寒！

奥托斯楞额吉98岁走了。她95岁的时候亲朋好友为她贺寿。老人家把四万多元钱捐送给乌里亚斯太镇的环卫工人。胸怀共产党人的志向，彰显了阿尔山宝力格草原人的高风亮节。作为在阿尔山宝力格生活八年的知青，作为在知青岁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牧人，衷心地对那片草地，对那里的牧民，说一声谢谢！

徐进昌回到草原看望奥托色楞额吉

和奥托斯楞额吉的交情，永难忘记。后来，我到旗里和盟里工作，也几次回大队看望。在我有了孙子的时候，额吉已经八十多岁高龄，仍然惦记着给孩子缝制了件蒙古袍送来。情意深深扎了下根。

在中国共产党建党一百周年之际，我已有了五十年党龄。记忆草原上的牧民党员，深深地感到是一份难得的精神财富。不忘初心，共产党人的信仰在草地扎根成长，镰刀锤头的旗帜永远鲜亮！

2021、6、5

徐进昌（左）与谢小庆（2017年2月）

****

文明，带来进步，带来更好的生活，也带来对自由的压抑，带来对天性和本能的束缚。科技进步为自由的文明提供了可能。我们仍需思考：构建怎样的文明可在维系共存生活的同时使人获得最大的自由？在追求文明的同时如何追求身心的舒展？如何避免对本能的不必要压抑？怎样成为文明社会中的自由人？

本公众号二维码中间的头像是弗洛伊德。弗洛伊德晚年的主要观点是：文明的进步带来对人的本能的压抑，对自由的束缚，也因此带来了更多的焦虑，更多的抑郁，更多的精神心理疾患。今天，公共场所不能抽烟，公路上不允许飙车……这些对自由的限制是文明生活所必须。但是，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非婚勿生…这些也是必要的吗？

本公众号试图探讨两个互相关联的问题：

1、构建一个什么样的文明？

2、选择一种什么样的人生？

让我们共同探讨吧。请长按或扫一扫下面的二维码关注本公众号：

海宽文集：http://www.hxzq.net/showcorpus.asp?id=10

华夏知青网不是赢利性的网站，所刊载作品只作网友交流之用
引用时请注明作者和出处，有版权问题请与版主联系
华夏知青网：http://www.hxzq.net/

知青文化的历史与现状

知青，这个名词，是对具有特殊历史文化内涵一代人的称谓，它凝聚着与共和国命运一同沉浮的这一代人的坎坷经历和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

知青文化是特指知青这一代人，在他们的知青时代和后知青时代以文学(包括回忆录)、美术、音乐，多学科的理论研究等各种表现形式的文化创作与文化活动，以反映他们的生命历程与诉求的文化产品与文化现象。

自从在1950年代中期，中国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开始，有了知青群体，就有了知青文化，虽然对每一个知青来说，上山下乡的经历只有那么几年，整个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早在1980年代已经结束，但是知青文化一直在发展延伸，成为当代中国特殊的文化现象。

知青文化的发展历史可以划分为以下五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知青文化的发轫期即知青时代的知青文化。

从1958年到1966年文革爆发以前，为了解决城镇人口的增长与粮食供应，劳动就业的矛盾，政府有计划地动员大中城市的知青去农村插队，去边疆支边，在这几年共计有129万知青上山下乡。为了配合知青上山下乡，作家们创作了一批以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为基调的小说如《边疆晓歌》，《军队的女儿》，长诗《在西去列车的窗口》，电影《青山恋》，歌曲《军垦战歌》等，它们的作者并不是知青，但是这些作品对当时和日后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起到了宣传和推波助澜的作用。

1966年以后，文革高潮中出现的红卫兵诗歌，可以视为以后知青诗歌滥觞。1968年12月22日，伟大领袖毛泽东大手一挥，一夜之间，将几百万老三届变成知青，他们别无选择，上山下乡。一直到1980年全国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结束，在长达12年时间里，全国各地上山下乡的知青达到1700万，这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青年移民运动。在长达22年的知青时代，知青文化表现为主流文化和非主流文化两种截然不同的形式。

所谓主流知青文化是指在文革期间，在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指导下，与体制的主流意识形

态保持一致的，由知青们创作的文学、美术、音乐作品，如以上海知青金训华的事迹为题材的小说《征途》，歌曲集《战地新歌》中的反映知青战天斗地的歌曲，知青画家们创作的知青题材的油画，版画、国画作品。如北大荒知青油画与版画创作，他们日后成为中国美术界的精英。与此同时，全国各地的知青们成为各地农村，农场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的骨干，对这些地区的文化教育事业做出巨大贡献。当年文艺宣传队表演的歌舞，在很多年之后，成为他们在后知青时代怀旧，蓦然回首苦涩青春的载体。

这一时期，非主流的知青文化则是指与主流意识形态不吻合，甚至唱反调的知青文学作品，大多数以口头或手抄本形式流传的知青诗歌、小说与知青原创歌曲，如南京知青任毅创作的《南京知青之歌》(作者为此曾经被判处死刑，后改为10年徒刑)各地知青创作的怀念故乡的歌曲，北京知青郭路生写的《相信未来》、《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以北京知青为主体得“白洋淀派”的诗歌创作，湖南知青张扬写的小说《第二次握手》等。这些作品主要表达知青们凄婉的思乡情绪和青春失落的感伤。当时，在封建文化专制主义环境，文化沙漠状态下，这些充满真诚，怀疑，反思色彩，抒发青春苦闷，向往未来的作品，在知青中广为流传，影响很大，成为他们宝贵的精神食粮。这些呈“地下”状态的知青文化作品及其环境形成以后知青文化的沃土，培育了日后一大批知青文化的精英。这是非常有趣的“种豆得瓜”文化现象。

值得研究的，在漫长的知青时代，这两种绝然不同的知青文化表现形式长期共存。

第二个阶段(1980---1990年)知青文学的崛起。

十年浩劫后，知青文学成为新时期伤痕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群星灿烂”的知青作家群，以饱蘸血泪的笔墨控诉了极左路线对知青一代的摧残，，批判了作为文革伴生物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非理性。这一时期的知青文学代表作品，有叶辛的《蹉跎岁月》，梁晓声的《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今夜有暴风雪》等激扬着理想主义与英雄主义的力作，也有老鬼的《血色黄昏》，以撼人的真实，唱了一首理想主义的挽歌。既有史铁生《我遥远的清平湾》，描绘了在那贫困的年代一幅忧伤的西北农村风俗画，也有钟阿城的《棋王》、《树王》以平淡的叙述将知青的苦难淡化。知青作家们的鼎力创作展示了知青文化的强大生命力，为日后波及全国各地的知青文化热奠定了基础。

第三阶段(1990—1998年)知青文化热的升温，走向辉煌。

1990年初，以北京知青在军博举办的“魂系黑土地---北大荒知青岁月回顾展“为标志，知青文化热在全国各地多升温，并且形成高潮。为什么知青文化热会在1990年代升温?自1979年全国知青大返城后，遍体鳞伤的知青们回到故乡，他们在返城后短短几年里，匆匆完成在人生应该分几个阶段完成的就业、升学、成家立业，生孩子。他

们沉入社会的底层，去重新找回生活的位置，去适应社会。经过十多年的磨合，他们反思这一代人的命运与共和国的命运一同沉浮的历史，必然会从心底发出”青春无悔“的深情呼唤!这是走出苦难，迎接新生活的旷达，宽容的人生态度。它表达了在纷至沓来的巨大社会变革面前，怀着强烈失落感和时间错位感的知青们，克服了颓废与迷惘，在心理与行为方式上作调整，投入改革开放的大潮，体现了他们勇于拼搏，自强不息的知青精神。向时代和社会证明”我们是优秀的“。他们超越个人命运和历史的局限性，以一种向前看的目光，去创造新生活。

1990年代出现的知青文化热表现为以下几个特点;一是表现形式的多样性;各地的知青文化热，以知青岁月回顾展为主要平台，以大量的图片，实物和文字资料向公众介绍他们曾经的知青时代的苦和乐。基调是;青春无悔。如北京、天津，广州、武汉、沈阳、重庆、成都、厦门、杭州、哈尔滨、西安等大城市都先后举办过这类展览，参观者主要是知青，还有许多年轻人，产生较大的社会反响。但是，当年输出知青人数达113万的上海，却是一片寂然。

二是地区性的知青回忆录大量出版，林林总总达数十种，基本上是知青们对知青时代的集体回忆，基调是苦难与风流，一代人曾经同有的酸甜苦辣。如北京赴北大荒知青出版了《北大荒风云录》，北京赴内蒙古知青出版了《草原启示录》，赴延安知青出版了《回首黄土地》，赴山西知青出版了《老插话当年》。重庆知青出版了《红土热血》，成都知青出版了《青春无悔》和《知青档案》，武汉知青出版了《我们曾经年轻》、《沧桑人生》等等。这些不同地区的知青回忆录，以大量资料，比较全面地反映了知青上山下乡形象化的史实，为今后研究中国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历史文化提供了比较详实的资料。

三是各地知青纷纷成立知青艺术团，这些知青艺术团演出的节目大多数是当年红卫兵宣传队和农村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演出的内容，具有了浓厚的怀旧的色彩。同时，作为一种民间的演出，这些保留了左的痕迹的内容，也是为了与体制的意识形态保持一致，使现代人看了产生一种“雾里看花“的困惑。实际上其中有不得已的无奈。

四是在一些城市出现了以知青为招牌的商业性的企业和产业，如知青酒店，知青酒，知青茶，知青商标的商品，都试图以知青群体为消费者来进行商业运作，获得较大的发展。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些知青产业企业大多数关门。因为市场经济的运作是以全体消费者为对象的，这种以一个庞大的社会群体为对象，以怀旧情绪为切入点的商业运作，注定是“此路不通”的。

五是一大批具有深度的知青文学作品的问世，有力地推动这一时期知青文化热的升温。进入1990年代的知青作家们，在创作上更加成熟，无论是在选材上，小说的结构安排上，人物形象的塑造，对社会和时代的批评力度更加深刻犀利。如叶辛的《孽债》，以1979年云南知青大返城为背景，描写了在15年后，被遗留在云南的知青子女来上海，寻找他们父母的经历。展示了两代人的悲剧。好不容易结痂的伤疤又被捅破，昨天的梦靥又来困扰他们已经平静的生活，这是令人难堪的现实。小说形象地揭示作为权力生命的文革已经消亡，但是，作为社会生命和文化生命

的文革依旧活着。梁晓声的小说《雪城》、《年轮》以全视角的场景，犀利地揭示大返城后的知青们在时代的大变革面前，他们的困惑与无奈，他们又一次不屈的抗争。使广大读者对这个在磨难在成长起来的群体肃然起敬，他们是好样的!邓贤的《中国知青梦》以1979年云南十万知青大罢工，绝食，请愿为主线，终于胜利大返城，反映了中国知青史最悲壮的一页，令无数读者读罢放声痛哭!郭小东的《中国知青部落》三部曲写出站在世纪末交接点上的老知青们，在社会的转轨期，面临的困惑与选择。根据这些作品改编的电影和电视剧深受广大观众欢迎。它们将这一时期的知青文化热推向高潮。同时第一部知青诗歌集《中国知青诗抄》出版。

六是开始出现从理论上研究中国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著作，除了官方出版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始末》和《知青上山下乡大事记》，虽然，其真实性被人怀疑，其权威性并不被知青们认可，但是它们代表了体制的立场。这时期，最具有权威性的知青史研究成果是中国社科院定宜庄，刘小萌的《中国知青史》(上下两卷)，他们是内蒙古知青，是研究清史的专家。他们填补了中国知青史研究的空白。同一时期，上海社科院的金大陆出版了国内第一部以知青群体为对象的社会学著作《时运与命运》。这是首部采用现代统计方法，对知青中的老三届群体的生存状态作系统的社会调查与分析研究，也是第一部获得国家社科立项的课题。这些理论著作的问世标志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已经作为科学研究的对象。启开了理论研究的序幕。这是非常可喜的现象。

第四个阶段(1998----2008年)知青文化从辉煌走向低谷时期

知青文化热在1998年，纪念中国知青上山下乡30周年达到高潮，在这一年全国各地出版的知青文学与纪实作品不下50多部，但是其中大多数作品缺少反思精神，仍然沉浸在昨天的知青一代人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的“自恋”中。从而引发关于知青文化价值观争论。如“青春无悔”与“青春有悔”之争，“丑陋的老三届”之争。最具代表性的是张抗抗的文章《无法抚慰的岁月》的观点;“我们这一代人经历的苦难已经被我们反复地倾诉与宣泄，我们这一代人内心的伤痛与愤懑，已激起世人的关注，我们对历史和社会的质问已一次一次公诸于世，然而到了二十世纪末，我们能不能低头回首，审视一下我们自身?”，她认为知青这一代应该有自我反省意识。

与此同时，还出现另一种现象，一些出生在1960年代的并没有知青经历的作家也涉足知青文学。如刘醒龙的《大树还小》，李耳的《鬼子进村》，韩东的《下放地》等。他们的作品多半从农民的视角和隔代人的眼光来写知青，将那场浩劫写成农民是受害者，批判知青独揽了话语霸权。对此，有人叫好，认为这些局外人为知青文学融进了新意。但是在广大知青中，却认为这是对知青一代人的亵渎。

从1998年后，曾经辉煌的知青文化走向低谷。那些一度活跃在文坛上的“群星灿烂”的知青作家们，沉寂了，很少听到他们的声音。在书市和书摊是很少看到近几年出版的知青文学作品。一度非常热闹的知青艺术团演出也偃旗息鼓了。为什么知青文化走向冷落?我认为原因是多方面的，当然，对知青文化活动的种种限制是一个众所周知

的主要原因;首先，与这一时期的社会转型有关。从199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社会大踏步地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整个文化事业受到冲击，文学创作处于社会的边缘化。由于受到商品经济的冲击，全社会出现浮躁的心态，整个文化事业日趋功利化，具有反思色彩的严肃文学创作不再成为全社会关注的中心，作为反映一代人生命历程的知青文学和知青文化，在这种社会大环境的变迁中被边缘化是理所当然的。不少以“为一代人立言”的知青作家，受世风影响，开始热衷于商业化的时尚文化创作，有些知青作家对如何深化知青文学创作陷入痛苦的思索，如果按以前的老路子写下去，惨白乏力，吃力不讨好。一些责任感比较强的作家意识到，知青文学必须走出自恋，只有将知青题材放在文革和社会转型两大背景下审视，更要有一种自我批评精神，知青文学和知青文化才能够突围。

更重要的是知青文化的冷落与这一时期知青一代人的生存状态有关;在中国社会的转型期，知青们面临着社会角色的分层与分流;第一次是从1970年代末到1980年代中期，的“隐性分流”，一大批通过接受高等教育，进入社会的精英层，第二次是1990年代中期开始的“显性分流”;知青中的大多数成为社会转型的成本的承担者，他们又一次“为国分忧”，在国企改革中下岗，被迅速边缘化，成为贫困群体。新陈代谢是无情的社会发展客观规律，是不可抗拒的，这是市场经济运作的结果，而非市场经济的过错。面对如此沉重的社会现实，如何引导知青一代人走出心理上的失落，启发他们以一种阳光心态，直面人生的新的挑战，这一使命历史地落到新世纪的知青文化走向与发展上。

在这个长达10年的知青文化冷落期，知青文学创作也出现几部精品;如邓贤的《天堂之门》作者描写了一群从《中国知青梦》里走出来的老知青，以前所未有的激情与冲动投入市场经济大潮，从而上演了一幕幕生死恩怨，大起大落的波澜，写出这个群体在商品大潮中的必然分化。具有强烈的反思意义。

在这一冷落时期，令人可喜的是“另类知青文学”创作的兴起，虽然作品不多，但是却具有代表性。它们是对传统知青文学的颠覆与反叛。它们或在形式上标新立异，或在内容上巧取一隅，或者在思想上特立独行，或以最本真的面貌出现，这类作品反而比虚构的的文本更加具有思想深度，其塑造的人物更具典型性。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获得2001年上海长篇小说一等奖的，北京女知青潘婧创作的《抒情年代》，它刻画了一群在白洋淀插队的北京知青的理想抱负与现实冲突的故事。这是一个先前知青文学中从未出现的一个群体，他们是知青中的一群“精神贵族”，有意识地与农民保持距离。在普遍的精神贫困中保持着独立与自由。由此出发，以后他们成为诗人，顽主和社会栋梁。天津女知青作家李晶写的《沉雪》描写北大荒女知青中的“同性恋”，反映了知青们在肉体和精神上的双重苦闷，是对人性的强烈呼唤。天津知青作家牛百诚的《最后一个知青》，是一部具有震撼力的知青小说，描写一个有意识地要脱离知青群体，要求融入农民群体的与众不同的知青，在一次次理性与野性的冲突后，由于文化背景的差异，他还是被农民群体拒绝了，他痛苦地徘徊在两者之间，成为一个特定时代的“多余的人”。

由岳建一主编的《中国知青情爱录》，《中国知青民间档案文本》和刘小萌的《中国知青口述史》也在这期间

问世，他们是治学严谨的学者，本着还历史本真的责任感与使命感，试图搭建一个中国知青历史文化研究的平台。但是，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而归于寂然。

令人欣喜的是，在1990年代处于寂然的上海知青们。在2000年，由《上海知青网》的创办，2002年《上海知青》杂志的创刊，使上海知青文化的发展有了空间，孕育了后来居上的上海知青文化的兴起，由于信息的传播，对2008年开始的全国知青文化热的再度升温是有力的推动。

第五阶段(2008年以后)全国各地知青文化热再度升温

新世纪之交最初几年，全国各地的知青文化虽然比较清冷，但是，由于网络时代的到来，信息的传播更加迅捷。在短短的几年里，各地出现了近百家知青网站，与此同时，在各地，各种民间性质的知青联谊会自发地诞生，为知青群体的沟通交流，联系友情有了一个空间。在一些大中城市，知青文化热出现反弹现象。如当年曾经输出113万知青的大上海，以下乡地区的团营连，县、公社而聚合的知青联谊活动开始活跃起来，并且与接收地区的第二故乡建立联系。而在重庆，哈尔滨，厦门等地，知青文化活动始终没有停止过，甚至与政府保持一种良好的互动。

与此同时，在各地，由于老知青群体在国企改革后，大多数人下岗，生活状况每况日下。他们面临着，退休、养老。医疗、住房等棘手问题，因此出现了知青维权活动。经过较长时间的磨合，大多数知青相信政府“为民执政”，按照法律程序诉求，妥善解决实际困难。

2008年是知青上山下乡40周年，许多人估计，在全国各地知青们将举行纪念活动。当时，许多人认为纪念知青上山下乡40周年的活动，是即将整体退出中国社会舞台的知青一代人的最后的谢幕。当时，从2008年开始至今，全国各地的知青文化活动不仅没有降温，反而越来越红火，出现再度升温的可喜现象!这是令人始料不及的。为什么知青文化在2008年后会再度升温?其主要原因是;知青这一代人大多数已经到了退休的年龄，即将成为老年化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这一代人对中国社会产生的影响并没有消失。在今天的中国，知青这个庞大的社会群体的凝聚力是令人难以想象的(另一个社会群体是海归派)。由于这么多年来，关于知青的话题还不能够畅所欲言，他们还有许多诉求需要表达。我们对国家发展所作出的贡献，我们的价值追求，我们自己不说，谁为我们说?所以我们不能放弃话语权，我们这一代人的声音还不能消失!同时，作为大多数已经进入老龄化的知青们，应该以一种阳光心态来谱写我们黄昏岁月的履历，做到“老有所养，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老有所为”，而一代人共同经历，共同命运为凝聚力的知青文化活动，为我们构建了一个理想的空间和舞台。

从2008年开始，全国各地的知青文化再度升温有以下几个特征;首先是，参与的广泛性，成为各地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由于各地知青联谊会的有效组织，知青网站，杂志的传播沟通，各地知青积极参加各种形式的知青

文化活动，既有当年下乡的团营连，县、公社小范围的联谊活动，也有跨地区的知青文化活动，参与这些活动的知青的人数大大超过1990年代第一个知青文化热。如厦门知青从1980年代后几年开始，每年都有不同主题的知青文化活动，还于2001,2009年先后两次举办全国性的知青文化周活动，他们以“红土地----蓝海洋”为主题，先后几次组织当年在闽西插队的数千厦门知青回访闽西的第二故乡，到闽西捐建“希望小学”，慰问一直留在闽西的厦门知青。他们的知青文化活动与政府保持着良好的互动，成为构建和谐厦门的不可或缺力量。宁波知青于2004年，2009年两次组织一千多知青乘火车专列返回北大荒的第二故乡。2008年9月，昆明与重庆知青组成旅游专列从昆明出发，经重庆、西安、大寨，北京、北戴河，壮游祖国大好河山，向社会展示知青们意气风发的精神面貌。

重庆知青文化活动非常活跃，有5个知青联谊会;即重庆知青公会，重庆支边知青联谊会，重庆知青联谊会(它联系着重庆周边区县的知青)，文革前下乡的重庆老知青联谊会，重庆女知青联谊会。它们之间的活动有分有合，参与的人数几乎涵盖了所有的重庆知青，今年4月，他们还组织400多知青重返云南第二故乡，受到云南农垦系统员工的热情接待。其中，重庆知青公会在每一个区都有分会，拥有自己的活动中心，网站，杂志。重庆市的大足县有4千多知青，大多数文化水平不高，知青联谊会的几位会长都具有奉献精神，他们深入底层的知青中了解他们的困难，积极地向政府有关部门反映，妥善解决了这些贫困知青的“老有所养”问题。他们开展的知青文化活动深受市民们的欢迎。

第二.活动形式的多层次性，呈现多元化的特点。现在，各地的知青文化活动最经常最活跃的是大众化的知青文化活动。就是在各地的知青联谊会不定期组织的知青联谊活动，吃饭喝酒，唱歌跳舞，在一起旅游，虽然没有多少文化内涵，但是它营造了一种浓厚的知青文化氛围。已经退出工作岗位的知青们还不能完全融入城市的社区文化，而知青文化活动使得有过共同人生经历的知青们形成一致的人生感悟和价值观念。才有了共同语言，精神上的相互慰藉。

具有丰富文化内涵的知青文化活动，如各地组建的知青艺术团，多年来活跃在当地的群众文化舞台上，其中不乏佼佼者，如湖南知青艺术团多次出国演出，他们在维也纳金色大厅演出获得一等奖，去美国和东南亚国家巡回演出，为国家为我们知青争光。北京的阳光健身艺术团，北京的牧人合唱团，天津的金钟合唱团等都是非常优秀的知青艺术团。

特别值得肯定的是，厦门知青的高文化内涵的活动，厦门知青在谢春池和他的团队的努力下，20多年来策划了一系列高水准的知青文化活动，不仅有前面提到的富有创意的文化交流活动;他们为了提高已经进入老年的知青们的自身文化素质，创办了知青文学沙龙，诗歌沙龙，美术沙龙、摄影沙龙，登山俱乐部、游泳俱乐部，定期开展活动。请知青出身的专家学者为知青们讲课，辅导他们写作，并且出版“厦门知青文库”和多达20多册的知青习作集

《凤凰花文丛》。他们不定期举办“知青美术与摄影作品展”，真正使知青们“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老有所为”。2009年12月底，他们还举办《中国知青诗歌论坛》，《纪念知青之歌诞生40周年》，邀请各地知青参加，使他们分享了精神领域探索的盛宴。厦门知青的文化活动还延伸到与红十字会的合作，组织知青们去做义工，以人道主义的情怀去关爱社会的弱者。今年，厦门知青还访问了金门岛的文化部门，进行海峡两岸的文化交流。厦门知青的文化活动在全国可谓“一枝独秀”，令人敬佩。

第三，当年接受地区政府的主动而积极的支持有力地推动知青文化的升温。

知青上山下乡已经成为历史，知青们上山下乡的经历大多数不超过10年，40年过去了，已经进入老年的知青们，还不时地回望那块他们为之付出汗水与血泪的土地，惦念着在困难的环境下，曾经在一起战天斗地，曾经给予他们温暖的父老乡亲。

随着时间的积淀，知青们当年上山下乡的接受地区的政府和父老乡亲，蓦然回首，深深感受到，知青们对当地经济与社会发展所作出的巨大贡献将载入史册。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认为新疆的发展变化，首先要归功于当年支边的上海、天津、武汉、浙江等地的20多万知青，他们把先进的城市文化和生活方式带到新疆，他们的青春和热血洒在边疆，将戈壁沙漠改造成为绿洲。延安的老百姓说，陕北贫穷落后，近百年来，对这块贫瘠的土地贡献最大的人是;当年的“”闹红“(红军在延安建立革命根据地)和文革期间3万北京知青娃下延安。云南的西双版纳现在已经成为旅游胜地，当地老百姓说，对云南发展作出贡献最大的是十万来自上海、重庆、成都，北京，昆明的知青，他们开发建设了橡胶林，才有了今天西双版纳的快速发展，我们永远忘不了他们!西双版纳的东风农场2008年建立了农垦博物馆和知青纪念碑，2004年还在”龙泉公墓“中建立”知青公墓“，将在农场去世的78位知青安葬在这里。在北大荒垦区许多城市都建立了知青纪念碑，高度评价来自全国各地的知青对北大荒和黑龙江省发展的巨大贡献，省农垦局在佳木斯建立知青安养院，收养了100多位患精神病的老知青，体现了人道主义的关怀。2008年8月，黑河的中国知青博物馆落成，黑河市政府邀请来自全国各地近2千知青参加了开馆典礼。这些地区的政府和团场对每一批回访第二故乡的知青都给予热情接待。2010年在上海举办的世博会期间，这些省的省馆开馆都邀请了数百位当年的上海知青作为贵宾参加，以肯定知青为当地经济与社会发展作出的巨大贡献。

从2008----2010年，山西昔阳县政府连续三年举办“回望大寨，情系农村“的主题活动，每次邀请近百位知青参加。知青们上山下乡是正逢全国”农业学大寨“时期，大寨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激励着知青们的顽强拼搏，很感谢大寨人没有忘记我们知青，感谢大寨人对知青一代的高度评价。

第四，知青上山下乡多学科理论研究有了突破。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中国知青上山下乡的多学科理论研究一直是一个弱点。主要是理论界还没有将知青上山下乡作为社会科学研究的对象，一直没有形成一个多学科研究的团队，研究的力量没有整合，理论研讨活动一直没

有开展。这种状况在2008年有了突破。2008年12月20—21日，由上海社科院，复旦大学，上海青年运动史研究会，上海知青网发起在上海召开了“2008,上海知青学术研讨会”。来自海内外近80位知青学者与会，这是40年来在中国召开的影响力最大的关于中国知青上山下乡的多学科理论研讨会。在短短的两天时间里，与会者畅所欲言，分别从政治学、历史学、社会学、文学的角度深入研讨了中国知青上山下乡运动产生的复杂原因，它对中国社会发展产生的深层次的影响，后知青时代知青的生活状况，知青文化与知青文学的发展走向等。一批80后的硕士，博士生参加了研讨会，这是可喜的知青历史文化研究后继有人的现象。这次研讨会整合了国内外中国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理论研究的力量，形成一个多学科的研究团队，与会者从研究的战略目标，区域性的合作研究，研究资源的共享，研究方法的认同形成共识。这次研讨会将有利地推动各地知青问题的理论研究，。这次研讨会促成上海社科出版社出版了《中国知青上山下乡研究文集》(上中下三册)，这部文集具有中国知青上山下乡多学科研究的里程碑的意义。经过长期的努力，2011年3月27日经官方批准的“上海知青历史文化研究会“成立。为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理论研究有了一个理想的平台。上海地区有志于知青历史文化研究的学者们正在对知青档案资料的搜集整理，进行系统的研究。并且具有”学院派“的研究风格。

2010年9月，经过在新疆的上海知青张志尧的以年多的努力，在新疆天业集团，农八师的支持下，《知青与边疆建设座谈会》在石河子市隆重召开。来自全国各地近百位知青闻人，学者与会，对40多年来知青上山下乡对边疆建设的巨大贡献作了全面评价，这次座谈会使来自各地的知青学者对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理论研究有了一个比较广泛的交流。有共识，也有不同见解。充满民主气氛。

可以预言，随着知青文化活动的广泛开展，各地的知青问题的理论研究将启动。现在，经过努力，上海，沈阳、镇江已经成立知青历史文化研究会，许多省市也在积极筹备成立知青历史文化研究会，相信在今后几年里，各地会出现一批知青文化理论研究的成果。

第五，各地知青文化活动的发展呈现不平衡性。

由于各地文化环境的不同，各地知青文化的发展呈现明显的不平衡性，一般来说，在生产建设兵团和国营农场知青较多的地区，知青文化活动比较活跃，并且成规模化。这是因为，生产建设兵团和农场的准军事化组织，使的知青们形成一种团队精神，虽然上山下乡的年代已经成为遥远的过去，但是，知青间这种团队精神形成的凝聚力依旧存在，使的知青文化活动能够充满朝气与活力。而各地的分散插队知青，就缺乏这种团队精神，难以形成凝聚力，不容易组织成规模，有声势的知青文化活动。当然，一个地区的知青文化活动，与组织者的个人影响力，乐于为知青奉献的不计得失的牺牲精神及个人的人格魅力是分不开的。

六，知青出版物日益增多，但是，有思想深度，批判力度的作品较少。

在2008年后兴起的知青文化热中，各地的知青出版物很多，知青回忆录在1990年代，是以知青们的集体记忆为主，以“青春无悔“为基调，现在，以个人口述和个人记忆为主。其主题有了比较深刻的反思，不再是倾诉个人的苦难，而是冷静地将上山下乡运动置于文化大革命的背景下，加以客观地叙述，还历史以本真，更具史料价值。知青们比较趋同一致的观点是，上山下乡已经过去40多年了。如果再倒苦水，已经毫无意义，现在，我们应该有自省意识，在历史的大潮流中，反思我们曾经也有过失与不足。现在最重要的是，必须理直气壮地总结，知青上山下乡对中国社会发展所作出的不可磨灭的巨大贡献，这一代人曾经两次别无选择地乘担了国家的灾难，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做出的牺牲与奉献。

自2008年以来，知青文学创作陷入低谷，知青作家们没有创作出像1990年代出现那么多杰出的的优秀作品，令人失望。知青时代和后知青时代的生活素材，这一代人的人生经历，他们的情感，他们的思想，为中国当代文学提供了极其丰富的资源，我们期望知青作家们和没有知青经历的年轻一辈的作家们能够创作出反映这一代人生命历程的横空出世的知青文学作品来。

2015-04-13

刘晓航文集：http://www.hxzq.net/showcorpus.asp?id=50

华夏知青网不是赢利性的网站，所刊载作品只作网友交流之用
引用时请注明作者和出处，有版权问题请与版主联系
华夏知青网：http://www.hxzq.net/
华夏知青网络工作室

复盘，对知青运动的重新思考

作者：王健　　来源：王健说一句

哈耶克说过：“面对经济方面的窘境被迫在两难中抉择，的确是十分苦涩的境遇。但是这从来不意味着，我们应该顺势让别人来替我们做出这些决定，更不意味着，我们应该让别人来100%决定我们人生的方向。”

当华美的树叶全部落尽，生命的脉络才清晰可见。

——聂鲁达

电影《天浴》中，成都知青文秀为了获得病退回城的理由，万般无奈之下，竟然请求牧民老金帮忙用枪射断自己的腿骨，始终疼惜着文秀的老金迟疑中端起了沉重的枪：

一声撕心裂肺的枪响，文秀倒在了即将来临的春天前夕，这是那场巨大历史运动中的一个切片，它戏剧性地暗示了一个完整十年的轮回：

1968年12月22日

《人民日报》首次发表毛泽东的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随后，大约1600万知青参与的上山下乡运动高潮就此拉开大幕。（本文样本暂不包含1950年代开启的回乡和支边运动）

人民日报

毛主席语录

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会宁县部分城镇居民纷纷奔赴农业生产第一线，到农村安家落户，他们说：

“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市里吃闲饭

1978年12月22日

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时代，上山下乡运动徐徐落下帷幕。

人民日报

RENMIN RIBAO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
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通过）

在这几乎掐着秒表的整整十年中，上山下乡运动如火如荼而又如泣如诉。

所谓青春无悔，对于个体自己，可以堕甑不顾，但对群体而言，则必需揽辔澄清。

为什么这场“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扎根一辈子”的鲜红运动竟那么仓促地嘎然而止？

为何始如潮涌，却终如决堤？

“据统计，仅1979年云南的8万余名知青几乎走完，仅剩2000余人”。(《党史资料通讯》1987年第4期)笔者下放的江西省进贤县钟陵公社，120名上海知青全部离开一个不剩。

全国范围内，绝大多数知青都扛着行囊彻底告别了原下放地，中国20世纪六七十年代轰轰烈烈的知青运动终于落得个“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如果我们承认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就得承认，以“扎根”为目的检验，上山下乡运动在整体上的确是流产了。

为什么上山下乡运动会流产和终结？

一、“怪蛇腹中的猪”——文革次生灾害的承受者

中国知青的主体是以高中66届开始的近14届青年，这正好是二战结束后，特别是1949年之后生育高峰期人群。

差不多同时，作为二战结束后生育冲动的产物，美国从1946年~1964年一共出生了7800万人。他们被戏称为“怪蛇腹中的猪”：当他们出生时，整个美国简直就是一个大产房，当他们到了入学年龄，校舍成了问题，当他们毕业时，就业成了问题。随着猪一天天长大，蛇也难受、猪也难熬。

面对这样的历史窘境，为什么美国政府没有对这群人发起向中西部拓荒的上山下乡运动？

归根结底不是美国总统聪明，而是因为政府没有能力超越国会跨过市场的红线、是因为扯皮的预算制度阻遏了任何雄心勃勃的乌托邦实验、是因为美国文化养育不出东方克里斯玛型的一唿万应的政治巨人、更是因为自由散漫的美国老百姓不肯授权总统任意支配他们的生活。

下图是中国生育高峰的一个切片：

1949年：1275万
1950年：1419万
1951年：1349万
1952年：1622万
1953年：1637万
1954年：2232万

（二战结束后，世界范围内婴儿潮，中国第一波婴儿潮）

仅仅六年就新增了9500万，毫无疑问，这代人同样具备了“蛇腹猪”的共性，从文革、到下乡、到下岗.....他们同样制造和承包了无数社会阵痛。

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是：如果没有文革，城市青年上山下乡也可能会细水长流的延续，但绝难产生席卷全国的知青运动。

也许，正因为文革对经济的摧毁性破坏所导致的空前就业困境、正因为文革使大学招生中断和教育全面萎缩导致的就业蓄水池功能丧失、正因为文革中红卫兵的派性斗争导致高层对权力的隐忧、（1968年7月28日凌晨，毛泽东接见五大红卫兵领袖时说：“就是我派工宣队去压制你们的，谁要是再顽抗，我就派部队围歼。”《中国现代史》1997年11期）正因为文革的政治动员和阶级斗争思维导致的群体盲思、正因为文革中形成的最高领袖与亿万民

众极度的垂直响应模式，终于使知青运动——这一人类历史最罕见的迁徙得以摧枯拉朽地展开。

可见，从某种意义而言，知青运动无论在千军万马的形式还是意识形态内容上，都是文革的自然延伸，客观上是文革的直接派生物。如果文革是被《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彻底否定的一场浩劫，那么，知青运动就是被千百万知青用脚否定的一场文革次生灾害。

知青运动结束的根本原因，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逻辑否定了文革“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逻辑，春回大地的中国，凌冽中透出了一丝温暖。

当年毛泽东一句话，1600万知青下乡了，今天邓小平一句话，娃子们回家了。

温情又一次回到了人们的生活中。

二、意识形态动员的内在悖论

统观文革十年，毛泽东直接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指示只有两条：1、“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2、回复福建李庆霖信，对知青生活困难“容当统筹解决”。可见，最高统帅公开对知青运动的总定义是“再教育”。

人民日报

毛主席最新指示

“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市里吃闲饭！”

编者按：甘肃省会宁县城镇的一些长期脱离劳动的居民，包括一批知识青年，纷纷奔赴社会主义的农村，在那里安家落户，这是一种值得大力提倡的新风尚。他们说，“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市里吃闲饭！”这话说得很对！

毛主席最近又一次教导我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希望广大知识青年和脱离劳动的城镇居民，热烈响应毛主席这个伟大号召，到农业生产的第一线去！

但是，打开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豁然映入眼帘的通栏标题却是：“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编者按还特别提到了“到农村安家落户”，这显然与右上角“接受再教育”的最新、最高指示存在着极其微妙的错位。

这种错位透露了一丝毋庸置疑的历史悖论：动员的政治属性与就业的经济本质并没有达到严丝合缝的自洽。

换句话说，知青上山下乡的意识形态动员无法覆盖解决城市就业的动机。

这无意间预设的动员与动机的矛盾豁口，仿佛暗示了梁晓声的那句话：

“大返城实乃必然，在兵团史的第一页便埋下了这样的伏笔。”

1.再教育与扎根并不具有完美的统一性

动员的核心理由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这似应具有不同于就业的政治上的神圣性和意识形态的纯净性，但为什么在实际操作中，所有接受再教育的城市青年无一例外必须迁出户口？思想教育与迁离户口，两者缺乏内在的逻辑说服力。

显然，接受再教育属于政治和意识形态范畴，在农村安家落户属于社会经济范畴，理论与实践的混乱造成了动员口号与具体操作上的悖反。

2.动员中的摊派大大减损了意识形态的纯洁性

很多知青家庭有一个难解的疑惑：既然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是培养接班人的百年大计，很多人甚至血书前行，但为什么越到后期，动员逐渐被有条件的摊派取代？比如辽宁知青办规定：按中发【1973】30号文件，“有一个以上子女在农村，又无子女就业的，不动员下乡；已有三个子女下乡的，应届毕业的子女允许留城.....”。全国各城市大同小异。

既然是神圣的事业，又为什么要摊派？这种谈条件的方式大大减损甚至亵渎了意识形态动员的纯洁性。

3.部分知青开后门回城动摇了意识形态的坚定性

1971年以后，特别是林彪事件后，大批干部官复原职，知青政策有所松动，升学、招干、招工等开始出现，其中一部分有家庭背景的知青率先脱离农村，这些曾经站在队伍最前面的坚定扎根派的出离，极大地动摇了曾经抱有意识形态初衷的人们，在他们内心深处，政治动员口号的神圣性逐渐风吹云散，意识形态动员的魅力开始溃不成军。

说得好好的扎根一辈子，有的人走了，有的人留下了。

可是，扎根一辈子的宣传依然在铺天盖地的进行：

这世间的一切所谓真相，只不过是在积累一个巨大的谎言。

——鲍勃·迪伦

4.1970年代中后期知青的乌托邦幻觉开始崩解

平心而论，即便在最困苦的时候，知青的生活依然算不上悲惨，否则，身边的农民怎么算？

知青真正的悲情源自失去户口的背井离乡，源自别的知青相继离去后的孤独和凄凉，源自枯坐床头一眼望不到边的绝望。

到了后期，知青点里每调走一个知青，波澜不惊的生活日常，都会掀起悄无声息的滔天巨浪。

回归故乡——对知青而言，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渴望？

午夜的收音机里还在播放着那富有磁性的声音；“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但躺在床上聆听的人内心却一片狼藉，纯真的意识形态响应早已荡然无存。所有的激情“都付与苍烟落照，只剩下：几许疏钟，半江渔火，两行秋雁，一枕清霜”。

三、无可选择的被迫性

1.沉重的兴高采烈

实事求是地说，历时十年，千百万青年上山下乡的确不存在法律意义上的强迫，更不存在暴力意义上的逼迫。但在实际的政治动员过程中，很多被动员者及其家庭，存在着事实上的被迫。

史铁生有一段真切的现场描述：

“1968年末，工宣队来到我们学校作动员，上台就是一句：“谁要捣乱，我们拿他有办法”，台下立刻安静了。接下来一句：“你们报名去，我们不一定叫你去，不报名的呢，我们非叫你去不可”，台下的唿吸声差不多没有了。”（史铁生《相逢何必曾相识》）

时过境迁，今天的80后、90后已经很难体会那种令人窒息的现场气氛，甚至70后、60后都难以设身处地感受到当年的政治高压，史铁生描述的只是一片树叶，实际上在整个秋寒萧杀的四人帮宣传氛围中，即便是远处隆隆的锣鼓声，也暗示着一种滚滚而来的迫近。

街头的标语和喜报、广播的狂轰滥炸、邻家孩子的血书，不由自主地会让逃避者产生孤立于洪流的恐惧，这种对群体偏离的恐惧会让人被迫做出选择。当萨特说“不选择也是一种选择”时，选择已经成为宿命。

是的，虽然知青们都是自愿报名、自己去注销户口，虽然有人在火车启动的一刹那还荡漾着真诚的笑脸，但依旧难掩被迫的性质，这才是这片土地敲锣打鼓后面的本质。

午夜扪心，都清楚这是一种无可逃遁、不敢“躺平”的宿命。

2.被迫总以被迫还

上山下乡的被迫性，在68、69两届毕业生中表现得淋漓尽致，作为生育高峰的峰值，对应这两届学生的动员采取了手术刀式的一刀切，这种界面清晰的“一片红”、一锅端，显然是四人帮挟文革之威的杰作，但恰恰是这种顶峰之作，再次验证了那句逆反之言：“被迫的第一天，就埋藏了日后逼迫的种子”。

数年之后，云南知青的行动尽管是一种跪着造反，但同样具有明显的逼迫性质。

然而这次，十一届三中全会刚刚结束一个星期，改革的春风已经开始把理性和温情还给了这片曾经苦涩的大地，发自内心的笑脸再次回到了千家万户的饭桌上。

最最令人感怀的是：由于政治动员与“被迫”让位给了人民的自由选择，四十年来，数亿农民自由地向城市的伟大迁徙，完成了世界进化史一个独特、稳定的奇观。

上山下乡运动的几个反思：

一、人才断层

正因为大学教育和高考制度的断崖式崩塌，全民刻苦学习的内在动力被瓦解，与美国“怪蛇腹中的猪”相比，中国知青一代科学文化素养的均线大幅度暴跌，其结果无可逃遁。

1.美国诺奖与中国院士峰谷对比

由于美国采取了大学扩招等措施，既延缓了就业压力，又培养了人才。美国战后在诺贝尔奖获得者数量上持续发力，特别到了生育高峰“蛇腹猪”这一代，美国诺奖获得者在全球范围内再次加速领先，扣除这代人数量等因素，美国婴儿潮一代获奖人数表现出了持续而稳定的爆发力：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就诺贝尔奖而言，如果以出成果到获奖平均18年计算，则美国婴儿潮一代中获得诺奖的数量在未来还将大幅增加。

由于我国诺贝尔奖人数太少，失去了比较意义。所以仅从院士年龄分布来看中国知青一代占比情况：

到2017年12月，知青一代的年龄分布基本为60岁到70岁之间，恰恰这个年龄段是我国院士分布的最低谷，其中失学最严重的老三届加69届，在院士人数中只占可怜的4%，令人痛心的是，这代人恰恰是生育峰值群体，真是残酷而令人唏嘘。

2.育才关键期中断的历史代价

如果不是因为失学十年，按人口比例，中国知青群体理应培养出几十个朱棣文（台湾1948年出生）他们当中出现光辉灿烂的巨星理当是同样概率，只可惜，如余秋雨所说：“文革中断了许多东西，但最令人伤心、最斫及民族元气的是对当时还是青少年的老三届，在他们将成才而未成才、将定型而未定型的当口，突然被拔离学习过程。”

最残酷的是，即便到了粉碎四人帮之后高考恢复的美好季节，千百万被残酷拔离的青葱秧苗，已经完全失去了补秧机会，毕竟千百年来农人们都知道季节对秧苗的意义：“错过一个时间就是错过一个季节，错过一个季节，就可能错过一生的美丽绽放”。（《先者生存：优势富集效应》复旦大学出版社84页）

更加残酷的是，那些生活失意、中年下岗的知青们，眼看着极少数意气风发的新三届大学生成才，更会捶胸顿足地痛悔文革“读书无用论”的戕害，从而产生强烈的补偿心理，过度要求自己80后的孩子奋发读书，这就大大增加了80后在残酷竞争中的压力，从而形成文革次生灾害后的延申灾害；等到80后长大，又再次把这种矫枉过正的补偿心里传导到知青的孙辈，进一步造成全社会在教育上恐怖的“军备竞赛”，从而酿成文革的叠生灾害。

历史最狠的报复，就是在矫枉过正中不断轮回，在“内卷”和“躺平”中反复碾压。

3.创造互联网的一代与下岗的一代

本文绝非专注峰顶的院士数量，而是想以此把目光延伸到冰山的水下部分，那巨大的知青群体，由于关键期的残酷错过，知青一代作为整体承担了成本，下岗、早退的比例远远大于社会平均。

就更高的意义而言，反刍这段历史，不应仅仅从一部分受害者的角度，甚至不能仅仅从知青群体角度，而应该站在更高视角，观察其对人类文明和科技进步的得失错漏。

是的，当知青们还在“偏僻的异乡”彷徨，美国“垮掉的一代”却在大路上自由地吟唱；当知青们还沉浸在回城的向往，美国“嬉皮士一代”却逃离家乡恣意地疯狂。

两个迥然不同的文化现场，打造了两拨年轻人不同的模样和下场，很多年后，当我们知青群体还在担忧即将来临的下岗，可是，“在山的那边海的那边”有人却在日夜兼程地推出伟大的互联网。

乔布斯与比尔·盖茨都是1955年出生，他们幸运地躲过了上山下乡，他们的身后是7800万自由自在的蓝精灵，他们没有被迫去开垦中西部的荒野，而是在最饥渴的年份开发了人类心灵，在最富有创造力的年份，那些猪们冲出了狭窄的“蛇腹”，带领全世界走进了广阔无边的互联网。

这正应了西方1960年代青年运动的精神领袖马尔库塞的说法：“解决生活问题，改造社会的最重要路径和工具，就是想象力本身，”，不是用笨拙的锄头，而是“让想象力夺权，去发明一个原创性昂然的全新世界”。

二、方向逆反

知青上山下乡扎根农村一辈子，之所以无疾而终，最根本的原因是违拗了历史总方向。近代以来，人类分工的历史是劳动力逐渐从农业中分离出来的历史，分离的速度与文明进化的速度成正比，到上个世纪80年代，被大刀阔斧分离的美国的农业劳动力只占总人口的2%。

而我国知青运动掀起狂涛巨澜的70年代，中国竟敢在农民已经达到80%的前提下，大张旗鼓地号令重返躬耕畎田的时代。

（要知道：从1950到1980年30年间，全世界城市人口的比重已经从28.4%提高到了41.3%，其中发展中国家由16.2%提高到30.5%。《当代中国人口》第296页）

恰在这最具有转折意义的30年，我们走上了一条与世界分工和进化旗帜鲜明的相反之路，1968年开始的十年，我们更是倒退着勐踩了油门。真应了那句话：

“我们盯着后视镜看现在，倒退着奔向未来”

——麦克卢汉

三、病退之殇

客观地说，让近800万知青全面回城，也许是整个国际共运史最具人性色彩的伟大修正，如果说平反昭雪主要是对上层“走资派”的解放，那么，允许病退回城就是对底层知青最具人道主义温情的拨乱反正。

只是因为回城的病退政策没有根据形势的巨大变化、没有考虑知青身体的基本状况而适时做出根本调整。终于引导全国数百万知青被迫上演了一场难以启齿的病退荒诞剧。

文秀病退自残的惨剧意外地暗示了一个更大的社会性悲剧——大面积造假和说谎。

1.对一些知青而言，是最后的创深痛巨

1978年春国务院批转公安部《关于处理户口迁移的规定通知》明显放宽了病退的条件，各地闻风而动，如天津市知青办和公安局向全国各省发出了关于天津知青的商洽病退简化手续函，提出今后无需公安机关签发准迁证，只凭市知青办的病退、困退通知即可回城。（《甘肃省志。农垦志》第122页）

结果4月1日一天内，远在哈尔滨香坊区插队的天津知青体检了182人，除4人外，全部“拟病退回城”。一个月后，在哈尔滨郊区插队的天津知青3300人几乎全部填写了病退检查登记表，等待身体检查。（黑龙江省知青办《情况反映》第一期，1978年5月20日）

病退狂澜在全国迅速掀起，手法之多、伤残之奇，令人泪目。

某知青为了假冒胃溃疡，活生生吞下一块铅，医生在X光机屏幕看到胃竟然烂掉4/5！大惊失色，忙叫几位医生会诊，铅影依旧赫然在目。惊奇之下，医生悄悄问青年：“你告诉我，你究竟吃了什么？说实话，我给你开诊断。”青年惨然一笑，解开牙缝里的线头，拽出一串鲜血淋漓的铅块。在场医生难过得留下了眼泪。说道：“假如线一断，你就没命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中国知青史》第726页）

笔者当年与千百万知青一样也曾在病退现场，对各种病退招数有着侵肌入骨的真凭实感。

2.对政府而言，维护了意识形态的完美性

大规模病退之所以能在全国范围推广，一方面体现了政策在新时期的特有温度，另一方面，病退这一关卡的设定又具有了奇妙的“程序正义性”。因为如果不经过这一特定程序，就让所有的知青卷起铺盖无条件回城，政府似乎就要承担出尔反尔的历史责任。

于是，底层的病退作假获得了上层心照不宣的默许，在体制上终于达成了被迫欺骗和甘愿受骗的完美默契。

更重要的是，在那特殊的当口，投鼠忌器的同时，又维护了意识形态动员的永远正确，于是，病退这一程序的设定既解决了问题，又杜绝了问题，意识形态动员的无瑕终于在幻觉中得以保全。

3.对民族而言，合法作假成为诚信崩决的滥觞

谁都知道，对一个20多岁的年轻人来说，你叫他到哪儿找出大病来？

但是，数百万家庭参与、全社会同情、人类第一次公开的、几乎合法的、集体性的弄虚作假却实实在在地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展开了。

病退，这一轻飘飘的政策背后，不仅是知青沉甸甸的付出，更是在这场令人同情的欺骗和有组织的说谎中，额外支付了社会诚信的代价。

可见，当政治轻而易举地逾越了社会的伦理底线，当短期的策略再次凌驾于长期形成的诚实契约之上，随之而来的，则是整个社会道德底线的溃退。

难忘的知青岁月早已远去，亲历者们已渐进老眼昏花的古稀，但这段历史无论对国家还是个人都是一笔珍贵的财富。

对国家而言：

在非战争的情况下，市场的力量也许比任何从天而降的外部动员具有更加持久的伟力，这就是我们看到的，连续四十年数亿农民伟大的东征，刷新了人类最宏伟的迁徙。顺应它，就会受到大自然的奖赏。

任何时候，再高不可攀的意识形态动员都不能忽视自然人性的异常复杂性，任何试图一劳永逸地通过运动改造人性的慌张决定，都是对自然力量的蔑视，1978年崩溃式的大回城，就是一种无可挽回的大自然的报复。

对个人而言：

永远相信，一切坚固的东西都会烟消云散。笔者当年曾经悲痛地认定自己真的会在江西进贤李家生产队终了一生，谁又会料到四人帮会被粉碎？我又做过什么主动贡献？

还是哈耶克说得好：

“面对经济方面的窘境被迫在两难中抉择，的确是十分苦涩的境遇。但是这从来不意味着，我们应该顺势让别人来替我们做出这些决定，更不意味着，我们应该让别人来100%决定我们人生的方向。”

你学过的每一样东西，你遭受的每一次苦难，都会在你一生中的某个时候派上用场。

——佩内洛普?菲兹杰拉德《离岸》

1968年，知青们乘船来到北大荒新建的知青点。翁乃强摄

华夏知青网不是赢利性的网站，所刊载作品只作网友交流之用
引用时请注明作者和出处，有版权问题请与版主联系
华夏知青网：http://www.hxzq.net/
华夏知青网络工作室

也谈“知青”话题

作者：吴诗剑

公众号粤海知青网

央视《知青》电视剧播出后，网络和各种媒体上正反话题很多。其实，这是一种好现象。网络时代更能彰显“百家争鸣”的文艺方针，言论自由也体现了时代的包容性。就一些热议的话题，我们又该怎么理解那段历史呢？

1、“是金子哪儿不会发光？是块钢哪会没有用？”诘问容易，回答难，哪怕百万人来回答。因为金子是恒定物，亿万年后才发现都会发光，这不假；人呢，错过了黄金年华就错过了一辈子，难道真的会有转世来生再让你发光？别被卖了还替他人数钱。那不过是官僚主义愚民、骗人的鬼话而已。你相信？有几个人信？反正我不信！就拿“钢”来说，是块钢肯定有用，可别忘了还有一句：“好钢用在刀刃上”。不对吗？人都有追求梦想的权利，扩大化和非自愿化，一下子让那么多人失去追求梦想的权利，再怎么都不允许文过饰非。

2、至于也还有人说“留有‘美好印象’的”，“人生没有如果...假若还有，我宁愿还去以前的农场果园。”这，我相信，但那是一种普遍存乎于人皆有之的怀旧情结而已。否则当初那么多知青为什么都想回城，想招工、招干、参军入伍？为达到曲线就业挖空心思想法子，把人都会想成疯子。真正心甘情愿永久性留在清苦的农村又有几个？恐怕寥若星辰吧！假如现在逼你放弃现有的“高薪”或“官员”的优越工作，或叫你别求学、求职而去上山下乡学非所用，你乐意吗？别看现在城里好多人都挺喜欢下乡“爬山”搞“农家乐”，那是真正的喜欢农村生活吗？不，那是去休闲、度假、散心的。让城里人和公职人员去长期干农活，有人会愿意吗？

3、当然，我也强烈反对那种“上山下乡运动，有百害而无一益”的绝对观点——“牢骚太盛防肠断”。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那些一味的动不动就以“城里人”自居者，也别把自己看得比农民就高出一等。那时所谓的“知识青年”很多也不过就初中生而已，也不要太自命清高，当时的农村孩子也有不少具备那学历的。农民的儿子能干农活，“城里娃”、“干部崽”就不能干吗？难道他（她）们的血统要高贵些，农民子女天生就只该是干苦力？把人分等级，就是践踏人权，是一种反人类的犯罪！吃点苦就哭天喊地的，这样的逻辑公平吗？何况还有“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公愤古训。

相较于现在的所谓“大学生村官”，其初衷也是新时代知识分子就业难的一种缓冲方式，同时又延伸其内涵。事实上，绝大部分都是挂名村里却在乡镇上班，又哪能贴近农村、贴近农民？好多挂了年把“村官”竟然连基本的农业常识都不懂，根本无法满足农业生产和农村社会发展的需要。大好的磨砺和锻炼的机会，有许多“现代知青”并没有好好珍惜，“空挂’现象，这又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

“知青，”是一部感叹史，但并非全是一场不堪回首的悲剧。历史总是在摸索和探索中前进的，需要总结和累积才会少走甚或避免不必要的弯路，促使人类社会步入良性发展的进程。知识青年下乡运动，有利有弊：利，戒除了部分人骄奢淫逸的思想；弊，阻碍了人才的成长及人才的储备。我认为，最大的不公平就是国家让一帮，不，是一个时代的青少年无辜的埋单，失去了上学深造的机会，荒废了本不该荒废的青春时光。

诚然，后来从知青中也走出了在某些领域的好多领军人物，那得另当别论，个别现象不能代表普遍真理。他们走过那段历史，但不能就说是那些年必然培养而成的因果关系。然而，无论如何，“知青”们在国家百废待兴，环境条件恶劣的情况下，克难攻坚勇于奋斗的精神都是最值得后人歌颂的！

作者：吴诗剑，苗族，湖南省湘西州花垣县文联

华夏知青网不是赢利性的网站，所刊载作品只作网友交流之用
引用时请注明作者和出处，有版权问题请与版主联系
华夏知青网：http://www.hxzq.net/
华夏知青网络工作室

69届，被“边缘”了？

转载自公众号：老知青家园

作者：王世成

写在前面：2021年，是69届初中生离校52周年。为什么是离校而不是毕业呢？一是因为当时闹文革，学校基本不上课，学生没有学业课业，所以就谈不到毕业；二是由于没有业可以学，所以就没法儿发毕业证。故称之为离校。

这批人虽然实打实地是小学生文化，但也稀里糊涂地被称为知青，据说当年全国上山下乡的知青有一千六七百万，那么69届的起码是200多万人。69届这批人，如今大都奔七了，与“老三届”的风生水起，形成鲜明对照的，是69届的销声匿迹、鸦雀无声。

50多年了，只见过一部王安忆写的小说《69届初中生》。二三百万人的人生际遇，二三百万人的生命历程，应该有所展现，应该有所记录，因为他们也是差不多与共和国同龄的一批人。

一、六九届简介

六九届顾名思义，就是1969年离开中学的那批人。这一届既不同于之前的“老三届”，也不同于之后的70届。69届的学生一般出生于53年、52年，少数54年出生的。69届的学生是1960年上小学，1966年小学毕业进入初中，1969年离开中学。

有的文章说，上山下乡的知青有6届学生，即高中三届，初中三届（分别是66、67、68届的高中、初中各三届）这明显的是把69届给忽略了。这种状况既是69届客观存在的一种反映，也是69届社会地位的尴尬写照。

不管怎样，69届毕竟曾经是几百万人的生命经历，也是打在69届人心灵上的青春烙印，当69届人在生命的晚秋，回望当年，便禁不住感慨万千。

二、六九届的特点

特点之一：边缘化。

多年来，一说起文革，一说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人们只知“老三届”仿佛“老三届”就是知青的代名词。“老三届”成了被耽误了的一代人，成了青春无悔的主人公，成了蹉跎岁月的主体。其实，躲在“老三届”身后的六九届，才是被文革祸害最厉害的一批人，也是自始至终都被边缘化的一拨人。

文革中的被边缘化。1966年应该上初一，正赶上文革来了。从文革一开始，就没有69届什么事儿，破四旧、大串联、红卫兵、斗老师、打派仗，都没他们什么事儿，只能当吃瓜群众，69届在老三届眼里就是一帮小屁孩儿，“小六九”是人们当时以至一直沿袭到今天的习以为常的称唿。

上山下乡中被边缘化。六九届虽然只是小学毕业，但也算知青，需响应号召上山下乡。由于年龄偏小，他们好多人是随着哥哥姐姐一起走的。到了农村以后，由于身单力薄，在劳动中他们也就相当于农村的“半拉子”。由于文化水平和社会历练的局限，他们的组织能力、口头表达能力、文字表达能力和待人处事的社会经验等，都不能与“老三届”相提并论，所以在当知青时，他们也没有什么主流话语权，属于“听喝”的大多数。

返城后被边缘化。返城时他们大多比较晚，返城后他们工作相对比较差，企改时，下岗失业人员中，他们的比例最高，恢复高考后，他们考上大学的寥若晨星。由于对干部任用有“四化”要求，而他们的知识化和专业化，是两大硬伤，所以干部队伍中69届的身影更如凤毛麟角。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无论是文革中，还是当知青时，以至于回城后，六九届都好像是被时代遗忘的角落，默默地游走在历史的边缘。

特点之二：碎片化。

与＂老三届”相比，由于没经过文革造反的历练，在口才、文笔、宣传组织等方面的能力欠缺，69届群体缺少那种一唿百应的高光灵魂人物，他们从整体上缺乏凝聚力，形不成一个整体，常常是各自为战或三五成群的散碎存在。无论是在文革停课期间，还是上山下乡阶段抑或回城之后，他们都显得那样形单影只。与“老三届”动辄纪念上山下乡多少周年，某某文艺汇演，某某研讨会、座谈会、纪念会、某某聚会等活动的风声水起相对应的，是69届的默默无闻，风流云散。他们仿佛是一件精美而巨大瓷器上崩落的开片，散落一地；又仿佛错过末期列车的乘客，被遗落在一座座人生的驿站。

前些年，曾经想召集69届的同学集会，但费尽心思，八方联络，终因年久失联，缺三丢四而作罢。69届的这种缺乏凝聚力、抱不成团的状况，与他们的成长经历有关。从1966年到1969年，三年的初中生活，他们坐在教室上课的时间，远远少于散逛于社会的时间，一个班的同学接触很少，甚至有的男女生相互之间连名字都不知道。不像＂老三届＂，一个班的同学，文革前就早已混熟，文革中又都参加了不同的战斗队，上山下乡大致都是一派的组团下乡，那种联系和了解，那种亲如兄弟姐妹的感情，是69届大体没有经历过，也就没有体验和感受的。

69届的这种松散型的群体结构和基本上各自为战的特点，在返城之后的岁月里，在与自己切身利益攸关的时刻，愈发显示出它的短板效应。比如，不管是在岗位确定、职务晋升，还是职称评定方面，还是在调资、福利待遇等方面，69届除了资历条件的限制外，缺少人脉和渠道，没有群体利益的代言人，因而没有话语权也是制约的因素。

看一看前些年，从上到下，从中央到地方，各行各业，各条战线的决策者，“老三届”全线飘红，而69届的能跻身领导岗位的则如沙里淘金般难觅踪影。

69届是生活在时代夹缝中的一群人。比上不足，在知识积累、人生阅历、生存能力等方面相形见绌；比下不如，在历史环境、人生际遇、生命运气等方面又命途多舛。用我的一位69届同学的话说，不在二五眼以上，也不在二五眼以下，正好在二五眼上。

69届是生活在历史阴影中的一群人。以往一说文革耽误了的一代人，大都众口一词“老三届”，确实，“老三届”也不容易，尤其是66届老高三，马上就要高考了忽然梦碎，让人耿耿于怀。但是，69届和老三届比起来，更是千古奇冤。明明是六年级小学生，却也被扣“知青”小帽儿；明明是一帮小屁孩儿，却也要跟成年人一样摸爬滚打，明明是“半拉子”、小童工也过早地被扔进了社会的深坑。由于年幼，他们无知懵懂；由于文化少，他们思想夹生；由于社会混乱，他们三观混沌不清；由于生活的磨练，他们仍保持着善良的初心。历史天空上一片巨大的乌云，在他们的心灵上，留下的阴影，从年少将伴随着他们的终生。

特点之三：草根化。

我一个69届同学，是从小到大的发小，1969年上山下乡，在乡下干了5年，选调回城进了一家企业，前些年企业改制下岗失业，老婆嫌他没本事，带着孩子离他而去，工作没了，家也散了，让他的精神垮了。他每日里借酒消愁，一天三顿地醉生梦死，终于把身体也造垮了，患上了肝癌，而且是晚期。有一次我去医院看他，只见原来身高1米80，体重170多斤的汉子，经过癌症的折磨和放化疗，只剩下70多斤，让人不禁潸然泪下，没多久就带着不甘和遗憾离开了这个世界。这个同学的经历，虽然是个例，但除了阴阳两隔这一点之外，69届的大多数人和这个同学大同小异。

由于文化只是小学六年级毕业，在后来凡是与考试有关的比拼中，69届人都明显处于下风。先天的不足，仿佛决定了69届人的宿命，他们大都在底层，从事着简单劳动。这让我想起了一件事。有一次，我在徒步健走时，旅游鞋开胶了，我就拿到街上去修。在一条街道的路口边上，找到了一个修鞋摊位，我坐在小马扎上，边等边与修鞋师傅聊着，不一会儿，鞋修好了，我问道多少钱？修鞋师傅忽然叫着我的名字，说你不认识我了？说着摘掉了压得很低的棒球帽，只见一张晒得黑红的脸庞上，眼角额头刀刻般的皱纹，但那表情那笑容，还是让我细一端详认出来

了，是我69届的一个同学。在随后的攀谈中，我也知道了他这些年的经历。1969年上山下乡，调回城进了二轻系统的一家大集体企业，前些年厂子破产，工人回家自谋职业，他先后干过蹬板的、守夜打更的、在早市摆地摊等，最后稳定在修鞋这一行。他说没办法啊，上有老，下有小，老婆也下岗了，在一家公司当保洁员，也是69届的。我注视着他那双长满厚厚老茧的双手，和那张写满沧桑的脸庞，仿佛看见69届的兄弟姐妹们，用自己的汗水和双手，夯筑着这个社会的基石。

最基层干着平凡的工作，大都是平民草根，但他们脚踏实地，达观知远，高楼大厦平地起，亿兆数字基是一。69届的绝大多数，虽然都默默无闻，但，不怨天尤人，不感叹命运，为家人，为社会做着力所能及的贡献，他们就像那铺满大地的小草，虽普通却有顽强的生命力。

三、69届的评价

虽然时代和历史造成了69届的不幸，虽然命运对69届有些不公，但69届这个群体，仍然将自己的青春和汗水，汇进民族复兴的洪流，书写着属于69届人的春秋。

1、拼搏进取。这是69届人整体的精神风貌。我有个69届同学，1977年恢复高考时，考上了大学，消息传开，很多人莫名其妙，一个连初中都没念过，小学六年级水平的人，居然考上了大学？但了解他的人知道，多年来他每天坚持学习，持之以恒的努力。这正是69届人拼搏进取的写照。虽然开始踏入社会时底子薄、年龄小、身体弱，但69届人初生牛犊不怕虎，有股子拼劲儿、闯劲儿，有股子不服输的劲头儿。

2、默默奉献。我有个69届同学，从事志愿者服务活动将近30年，参与过几千小时的志愿者活动，曾义务献血几十次，并签订了自愿捐赠器官的协议等。69届人几十年来，都在各自的岗位上，默默无闻地奉献着自己的心血和汗水，为国家尽着一份力。

3、责任担当。69届人虽然深受文革之害，但他们对家庭、对社会、对国家的责任担当却丝毫未减。

4、低调隐忍。69届人深知，满招损，谦受益。多年来不论是在媒体眼中，还是在公众视野，69届都是知名度有限的存在。他们甘心情愿地做映衬红花的绿叶，隐没在聚光灯的阴影之下，演好时代大剧中的路人甲。他们知道，主角固然风光，但缺了配角也不是一部好戏。

69届是历史上的客观存在，是一批人的青春记忆，也是69届人共同的生命年轮……

谨以此文献给69届的兄弟姐妹！

农民后人看知青：青春朝气不乏小资情趣

原创 王力坚　　公众号〝新三届〞

学者简历:王力坚，原籍广西博白，现为新加坡籍。“文革”中有多年知青经历。新加坡国立大学博士，任教于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逾10年，现为台湾中央大学中文系暨历史研究所特聘教授。曾任中央大学中文系系主任、元智大学中语系兼任教授，以及加拿大温哥华英属哥伦比亚大学、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与广西大学访问教授。

原题

农民后人看知青

作者：王力坚

2012年，王力坚教授在厦门大学讲述知青文学

一. 由话语权的质疑切入

毋庸置疑，知识青年（简称“知青”）是上山下乡运动的主角，以致人们在谈论、讨论上山下乡运动时，往往只是聚焦于知青，而有意无意忽略了上山下乡运动中其他（主动或被动的）参与者与涉及者，如乡村农民、基层干部、带队干部、知青家人等。

十多年前，老三届知青，着名学者徐友渔已从历史评价的角度提出严厉批评：“广大农民明明也是上山下乡运动波及到的一方，这场声势浩大的迁徙运动无疑也涉及到了他们的基本利益，但从来没有文章从农民的角度作出评价和检讨。”（《知青经验和下乡运动——个体经验与集体意识的对话》）

文学批评家王彬彬更从历史呈现的角度提出话语权的质疑：“所谓‘知青运动’，是城市青年与农民共同完成的。因此，当年的农民对‘知青运动’和‘知青生活’也有一份发言权。但迄今为止，并没有农民的声音。只听见‘知青’在单方面地说个不休，他们说着当年的自己，也说着当年的农村和农民。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这表现了‘知青’的话语霸权。”（《岂好辩哉：一个乡下人对“知青”的记忆》）

历史评价须立足于历史呈现，没有历史呈现，历史评价只能是无的放矢。因此，王彬彬质疑的意义似乎比徐友渔更见其根本性与重要性。虽然王彬彬将农民话语权的失落完全归咎于知青，甚至不无偏颇地推导出一个所谓“知青话语霸权”的结论，但提出农民不受重视，强调知青与农民的互动关系，提倡农民的话语权，这些都不失为相当有建设性的见识。

广而论之，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可视为一项社会系统工程，知青固然是运动的主角，拥有毋庸置疑的话语权。然而，跟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有关的各类人，如前所述的乡村农民、基层干部、带队干部、知青家人等，也都应该行使其话语权，发表他们对知青及上山下乡运动的看法，参与讨论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话题。这些人虽然不是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主角，但是，他们的发言，显然可以使对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考察与解读，更为全面、完整，也因此可得到更接近客观公允的认知与评价。

十多年过去了，虽然也有论者关注到知青上山下乡运动与农民／农村的关系，如法国汉学家潘鸣啸在其专着《失落的一代：中国的上山下乡运动（1968-1980）》第九章“物质困难及精神困顿”中，也从“难以适应农村生活条件”、“难以融入农村社会”、“群组的社会身份及认同问题”等方面，剖析了知青与农村错综复杂的关系及其社会、历史与文化背景。

然而遗憾的是，当年曾亲历上山下乡运动的“其他人的声音”仍然十分微弱，对这些“其他人的声音”进行学术探讨的文章与论着更为少见。有鉴于此，笔者特撰此文，以期做一些聊胜于无的“补白”工作。希望通过知青之外的“他人眼光”，回望当年上山下乡的知青；通过知青之外的民间叙述，重构知青上山下乡的历史。限于篇幅，本文集中谈农民后人对知青的看法。

二. 城市文明的传播者

就笔者所接触到的各种有关上山下乡运动的数据看来，尚未见有全面系统反映乡村农民声音的论着，所见者多为散见于各类报刊杂志的记忆追述，而且明显地突出了三个特点：其一，几乎皆为第一人称的自述；其二，作者基本上年龄小于知青，因此可称为农家子女；其三，关乎知青的评价，褒多于贬。

这类记忆追述大多是着眼于知青们的正面表现，尤其是作为城市文明传播者的表现，诸如：

你们这些城里娃的到来让我高兴地不得了，我们一起演节目，一起说普通话，一起劳动，从此乡间的文化生活不再单调……。对于那一段与知青一起走过的青葱岁月，已然成了我们那一代人最深的记忆。（陈爱美《时代回眸，那一段我和知青一起走过的青葱岁月》）

上世纪70年代初，我还是个刚满10岁的小学生……生产队来了个外号叫“杜老五”的知青哥哥，他就是杜泽陵。因为他是个文化人，很快就当上生产队的记分员。那时队里常常开会，这时就由他读报纸和语录，他还领着团员们办墙报和专栏，进行文艺演出等，很快使小山村活跃起来。（庞国翔《永远的知青哥哥》）

李洪芝和曾振森经常在这里给黎胞们读读报纸，教导黎胞们读书认字……经过一段日子的朝夕相处，知青和黎胞的关系亲密起来了。从知青脸上，黎胞读到了他们愉快的心情；在知青心里，黎胞窥探到两颗真诚的根正悄悄往这片土地扎下……（黄宏能《芝姨》）

这些来自都市的学生们就给偏远、落后、困境中的农村带来了一股无处不在的新奇。他们的装束，他们说话的声音，甚至走路的姿势，都使我们觉得奇特，别致。在大田里做活，在村街上走路，我们也总是能够觉出他们的优秀来。自然而然地，我们将他们确定为自己的精神向导。……在他们的身边，在先进文化的引领下，我们渐渐长大了。（栾承舟《与知青相处的年月》）

这种城市文明的传播与影响是多方面的，有的是刻意而为（包括输出、教育与接受、模仿），有的则是潜移默化的。如张凤起最喜欢跟知青赵红军待在一块，用他的话说，是“和知青在一起沾沾文化气儿”（佚名《我与知青的不解情缘》）。

陈爱美回忆从知青那里看到自己深爱的文艺杂志，“我几乎到了如痴的境界，捧着书如获至宝爱不释手”（陈爱美《时代回眸，那一段我和知青一起走过的青葱岁月》）；胡海棠模仿知青的生活方式，从学会刷牙开始，进而“拼命用功读书”，最终“考上外面的学校”而离开乡村（胡海棠《学会刷牙》）。

有时候，农家青年只是纯粹非功利性地受到知青形貌气质的感染：“男的轩昂，女的漂亮……他们的美和率真

深深地影响了我们。”（栾承舟《与知青相处的年月》）“有一个白净漂亮的女青年一手提箕，一手提耙，哼着小调，不时出现在乡间小道和屋前屋后，这一幕，我至今都记得。我曾对女儿说起这件事，她说我尽说谎话。”（李学友《与知青在一起的日子》）

“（上海女知青）疑是下凡的七仙女，在月光下吹口琴或在倒映着彩虹的河畔洗头发，哦，真是人间罕见的无边春色良辰美景。……她们是宁愿不吃也不愿放弃饮食中的审美；比如，她们会用圩埂下的凤仙花汁染指甲，用燃过的火柴枝子描眉毛，用火钳子烫出头发上的波浪，用装满滚开水的铝口杯烫平衣服上每一条皱褶。……我们那时那么小，完全不懂三围之类的美女标准，只是本能地被一个个纤秀、优雅、聪慧、感性的优雅气质所吸引……”（黑白《上海美人》）

这些来自农家子女的追忆，印证了专家学者的论述：“大批风风火火的知青涌来，深入到穷乡僻壤，给封闭落后的农村带来了与祖祖辈辈陈陈相因的传统生活方式迥然不同的思想文化，新鲜的气息——从刷牙、洗澡、洗衣服到半导体、良种核桃——多多少少现代化的信息。宜川百姓流传一种说法，几十年来，两起事件对宜川世风民心震动甚大且深，一是抗战时期阎锡山一度将山西省政府迁至宜川县，百姓由此得知世上的风风雨雨；另一个就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给各村送来了‘北京的学生娃’。”（印红标《当今延安地区北京知青的处境》）

这些农家出身的作者，大多年龄小于知青，他们几乎无一例外地在当年知青的感染下，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启蒙，开拓了视野，激发了理想，提升了文化，增进了才学，最终改变了自己的命运。然而，年龄与文化的“劣势”，也致使这些农家子女往往以一种仰慕的口吻与角度追述他们对知青的印象与感受（从今天看多少是有点理想化的想象），上引诸例的字里行间便可见这种表现，有的还用更为直接且鲜明的方式表达：

当年，你们怀着理想，怀着梦，来到北大荒，为我们家乡的发展建设做过多少贡献，我们说不清，可是，你们却像星星之火，用你们的理想、精神，也用你们的知识、热情，点燃了我生命中的希望之火……你们培养、影响过的一代青年人正在为北大荒的发展贡献着自己的力量……而我，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梦，到外面的世界看了个遍，才知道外面的世界很精彩，也很无奈。（赵秀兰《祝福大哥大姐》）

知青弟妹的回忆文章也佐证了知青与农民之间既有矛盾冲突却也不无良好互动的关系：

我哥和我熟知的人一起分散在各个生产队的知青点，加入了并不真心欢迎的农村集体所有制按劳分配的大群体。自私的和狡滑的农民挑剔着城里的青年，善良和同情也帮助了我哥这群知青，总之他们还是为枯燥的农村生活带来了活力，他们组织的文体活动带动了许多农村青年参与，并且将我家所有的连环画和图书带入了农村，吸引了更多的农村小孩。（较劲的土老冒《“成都”知青哥哥》）

我们没有理由怀疑这些追忆的真实性，我们没有理由质疑这些农家子女确实受到知青正面形象的积极影响。但

是我们也有理由相信，还有不少受到知青（及上山下乡运动）负面形象消极影响，甚至曾遭受知青有意无意不平等对待乃至欺凌的农家子女至今仍然沉默失语。

固然，农家子女的记忆追述文章也有对知青负面表现的反映，诸如：

知青们第一天下田干活见着那满地满野的麦苗直发愣，有的还嚷，这农村怎么的种那么多的韭菜，一眼望不到边。（袁浩《我记忆中的乡村》）

他们互相之间也有矛盾，也为一些鸡毛蒜皮打打闹闹；有时也为了出工、恋爱、生活、回城等琐事，不时闹出一些花边新闻，成为邻里四村茶余饭后的谈资。……偶尔，他们也像村中青年一样，会在某一个月黑风高之夜到村中或外村偷鸡摸狗，然后，悄悄撬开伙房的门，将猎物洗剥干净煮上；然后，再悄悄敲开小卖部的门买几瓶白酒，慷慨高歌、大快朵颐直至月上柳梢。（栾承舟《与知青相处的年月》）

城市乡村的日子紧巴，精神生活凄惶。知青们苦中作乐，不时就会弄出一些事情来。一次，知青点厨房里少了几斤花生油，知青们互相猜疑，后来竟私自查起房来。还别说，油在一个知青的床下找到了。这个知青也是一个刚烈之人，一气之下仰药自尽，留下一个难解的谜团困惑着所有的人。（栾承舟《与知青相处的年月》）

但这类负面反映，基本上是出自善意，有时候还着意为知青们解套："大家喜欢他们，也反感他们，不理解他们。他们离开自己的家，远离父母，生活的寂寞，精神的空虚，对前途的绝望，构成这个群体独特的心灵世界。他们的心，同整个村子的色调是一致的，灰暗而沉闷。"（栾承舟《与知青相处的年月》）知青口馋好吃，善找野食，是由于"在那个动荡、饥荒的年代，生存是主要的，何况他才从城头来。"（宋明《我记忆中的知青们》）

1993年，歌手李春波创作演唱了《村里有个姑娘叫小芳》，红极一时。该歌诉说知青与农村姑娘相恋而又不得不分手的伤感故事，感动了不少人，却也受到不少网民的批评甚至是攻击，认为是"始乱又终弃的故事"，"（小芳）年轻单纯不谙世事被人利用被人玩弄"，"流氓知青玩弄了村姑"。

然而，农家子女的记忆追述文章，不少涉及了类似的故事，却有不一样的叙述：

我们的校外辅导员是知青队的小郭，她长得漂亮，身材也苗条，我的小叔说她的气质和脸形很像"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刘胡兰，要我传个小纸条，被祖父喝住："真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李学友《与知青在一起的日子》）

里面有一个人称"秀才"的娃子，不仅人长得好，而且很守规矩。他白天干活，晚上向农户问长问短，用小本本记录下来。他说话客气，举止文明，真像个秀才。社员们都很喜欢他。情窦初开的我，慢慢向他走近了。那时我刚从中学毕业回家务农，按当时的说法叫做回乡知青。……我终于明白了，他爱的是那本书，那份送书的情，不是我这个人。（阿芳口述，柯云整理《我与知青》）

我的哥哥和来村下乡的青年是一年高中毕业的，年龄相仿。他特能干，毕业后就担任了生产队队长。为此他和下乡青年们“玩”得特别好，也正因为如此，我家成了下乡青年的“点”……其中一位女青年，父亲是国家一个部级干部。在相处中，她看上了哥哥，以至于发展成恋爱关系。后来，哥哥被保送上了师范学院，很多费用都是她帮助的。但最后两人没走到一起，原因是女青年回城工作后，考虑到传统观念和户口等问题，觉得人言可畏，还是忍痛分手了。（刘玉广《那段历史，大家都忘不了》）

这些故事的男女主角，或者是落花有意，流水无心；或者是发乎情，（主动或被动）止乎理。这种结局是颇为契合现实情形的。且不说文化差异、门第之见等传统规范制约（所谓“止于理”），就从现实生存情境考虑，知青也是尽量（有意或无意）避免与农家子女发生恋情，因为一旦发生此类恋情甚至结婚，必定极大影响其离开农村的机会。毕竟，绝大部分知青是不愿意扎根农村一辈子的，于是理性抑制了感性（“止于理”的另一表现）。

那么，有没有“始乱终弃”的负面例子呢，肯定是有的，但笔者所看到的文章却未见这样的负面表现。或许这是文章作者有选择性的记忆、撰写策略所致。甚至有的本是很负面的事例，在作者笔下（或者说是当事人们宽宏大量的化解），却也得到出人意外的“大团圆”结局：

一个在该村窑厂干活的女知青，一个多么漂亮的仙女啊，竟然鬼使神差地爱上了村中一个有妇之夫。开始，他见她纤弱，出于一种与生俱来的关怀， 对她呵护有加。一来二去，竟擦出了火花。一次，两人在大沽河畔的砖林里休息，一时间情不自禁，年已不惑的他与二八年华的她完全沉浸在一种柔曼的缱绻之中，完全没有注意近处有一双盯了他们好久的眼睛。傍晚时分，公安局的警车呜呜叫着一路开进了村庄。她坚称是自己主动，跟他没有丝毫关系。但是，他仍以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罪名被判刑六年。自那时起，满怀歉疚的她便经常上门与他的妻子做伴，教他的儿子做作业，直到回城的那一天。两个善良的女人，用一腔真情和宽容谱写了一曲理解万岁。（栾承舟《与知青相处的年月》）

这种有选择性的记忆及撰写策略，或许是基于文章作者（农家子女）跟知青之间相交相知相惜且悠久深厚的情谊：

我曾与当年的知青同用一个厨房共卧一条土炕。 / 我也曾与他们一起劳动一起开会一起演唱。 / 我知道他们劳动后的疲乏和酸苦， / 一声“真累呀”也能体现出他们软弱中的坚强。 / 他们不孤高视我如知心朋友， / 她们很淳朴亲切地唿唤叔伯婶娘。 / 我常闻他们饭锅里散发的煳味， / 我常笑他们有趣的方言异腔…… / 我和他们的故事很多很多， / 都在我的记忆里深藏…… / 我知道他们是一群可爱的青年， / 他们虽然有时叫苦喊累有时偷鸡摸狗有时斗殴打仗。 / 但他们有激情有豪情有斗志有理想， / 即使离开了第二故乡也不忘与我们的友情和交往……（张永贤《我与知青》）

出身于城镇户口家庭的王彬彬，曾以“一个乡下人”的名义，对知青进行了颇为严厉而彻底的抨击。（《岂好辩哉：一个乡下人对“知青”的记忆》）王彬彬之所以能如此高姿态的直言不讳，很大程度是没有前述作者那种“跟知青之间相交相知相惜且悠久深厚”的历史情感负担。

无独有偶，知青的同龄人，既没当过知青，也没当过农民的专业一级作家刘醒龙在其中篇小说《大树还小》中，也对知青进行颇为全面无情的批判，其小说所突出渲染的中心情节就是女知青与农民的恋情悲剧；同样是文学创作，1960年代出身的农民作家魏留勤，在其短篇小说《我们队里的知青》中，虽然也以农家小孩的角度，反映知青与农民的诸多矛盾，但也更反映知青对老农二爷由了解而尊敬，以及二爷等农民对知青的关心与爱护，农家子弟对离去知青的怀念之情。

由此看来，与知青的情感联系，似乎成了一个历史负担。无之，则可秉笔直书；有之，则会扬善隐恶。孰对孰错，却又难以一言断之。其实，无论基于何种立场，绝然二元对立的认知固然失之轻率，一味扬善隐恶的举措也不免失之偏颇。

三. 知青老师的影响

知青在农村对城市文明、文化的传播，在现实生活中最为具体的体现，便是作为乡村教师教育农家子女。而多年之后，不时有受过知青老师教育的农家子女以学生身份发言感恩。前引的李学友《与知青在一起的日子》，便在文中陈述了对启蒙老师知青小郭的感激之情。专文表达怀念与感恩者亦不时可见，如孙秀明、黄豆、花瑶花、朔星都不约而同写了相同题目的回忆文章《知青老师》，另外还有龚德明的《有歌声与笛声相伴》、王江的《怀念有知青的日子》、许苍竹的《音乐课》、吴昕孺的《师恩如海》、吉霞的《照亮我心头的第一缕阳光》、曹先强的《边寨知青女老师》等。

这些文章的作者，都是当年作为乡村老师的知青所教过的农家小孩。跟前文介绍的农家子女比较，“学生”的身份与视角，使这些作者与知青老师有更为密切的互动关系，观察、体会也更为细腻，情感也更为复杂却也深厚。

虽然说知识青年所拥有的“知识”并不算丰富，但跟农民比较，确实也可称是“文化人”“知识人”了。而在农村，最能发挥知青的文化知识的工作，莫过于到乡村学校教导农家子女读书写字。其实，对知青而言，跟到田地干农活相比较，在学校教书委实是一桩难得的“美差”。

花瑶花在《知青老师》中，颇有点“童言无忌”地道出此中实情：“他们虽然识文断字，肚子里灌满墨水，却搞不清稗和麦，分不清草和荠，不知道鸭晚间下蛋鸡白天抱窝……最重的活儿队长不忍心要他们做，最脏的活儿他们不能做，最麻烦的活儿他们又不会做。他们是一群农民伯伯们惯着的孩子。他们当中最优惠的待遇，便是放下锄头到学校做代课老师。”

因此，各地农村都有不少知青充当了当地乡村学校的老师："我出生长大在北大荒。从我上学的那时起，我的周围就有很多很多的男女知青，尤其是在学校的课堂上，站在讲台上的基本是清一色的知青老师。"（王江《怀念有知青的日子》）"念小学和初中的时候，教我的有很多是知青老师……他们来自各地，有本县城的，有铜陵的，有合肥的，更远的来自上海。"（孙秀明《知青老师》）　乡村学校教学环境差，条件简陋，知青老师不得不一专多能，因地制宜。而知青老师的教学往往能不拘一格，甚至有意无意突破当时文化专制的清规戒律，将"封资修"的知识传授给学生：

你手把手教我们"a、o、e"／一加一还有音乐和图画／我做对了你就打个小小的钩／错了你就打个大大的叉／你说地球是圆的美国在我们脚下／我很想用铁锹挖一挖／看看你说的是真是假……／哦，知青老师／多年以后／我数不清从你那学了多少文化／但我知道／我说的不是东北土语，是普通话……（黄豆《知青老师》）

徐老师带大家到野地采集树枝，选一拃长、两头带小枝杈的留下，做成"琴板"，用扎头发的橡皮筋扎住两端枝杈，权当"琴弦"，这样一来，每个人都拥有一把简易"琵琶"，徐老师课余教我们基本功，什么勾轮、满轮、凤点头、摇指等等。每人拿根树杈往大腿上一斜戳，二郎腿一跷，活像真的。橡皮筋发出的声音闷闷的，"邦邦邦"，像弹棉花，震得人虎口发痒。木棍琴好虽好，声音不好听。徐老师说，最好听的声音在心里。（花瑶花《知青老师》）

徐老师会弹好多曲子，信手弹弹，都是好听的。边弹边解释：这曲叫《昭君出塞》，这曲叫《大浪淘沙》，这曲叫《春江花月夜》，顺带还把故事讲给我们听。又听音乐，又听故事，真是世界上最美的事。我们还被要求闭上眼睛听，再回答听到什么。有一次徐老师在琴弦上乱拨一气，又轮指弹了个调调，一个女同学回答说，我看到眼前有点点星星，又有好多大大小小的珠子落下来，撒了一地。徐老师听了很高兴，连声说"来事来事"。（花瑶花《知青老师》）

我们曾围坐在一位知青老师的周围，听他讲过"一条项链的故事"，还有"几个矮人和一位美丽公主的故事"。后来过了多少年以后，我才知道那是莫泊桑小说《项链》和安徒生童话《白雪公主》的主要故事情节。（王江《怀念有知青的日子》）

这些知青老师在科学文化知识的教育方面，确实使在乡村学校就学的农家子女很有收获，为他们日后的发展奠定了较好的基础，尤其是那些后来通过升学途径离开农村到城市发展的农家子女，对此深有感触，亦心存感激：

岁月流逝，冲刷掉了无数记忆，但却冲不走这些知青老师留在我心里的印痕。我感激他们，感激他们带给我们知识，给予我们关爱，带领我们走出贫穷的山村。（孙秀明《知青老师》）

哦，知青老师／你是否记得／拖鼻涕的我和那些顽皮的娃娃／我们却永远忘不了你浅浅的酒窝小小的虎牙。

（黄豆《知青老师》）

怎么能忘记，就是在那间低矮的教室里，在那张裂着宽缝的黑板面前，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知青老师让我们早就知道了外面的世界更精彩。知青老师们用不很多的知识，就浇灌和滋润了我们荒芜干涸的心田，让我们一颗颗愚顽蒙昧的心头，从此燃起了向往和追求文明的火苗，扬起了梦想和渴望能够飞翔的翅膀。……我总想告诉你们，有一个北大荒已经不是孩子的第二代北大荒人，怀念着知青，怀念着知青在北大荒的那段日子。（王江《怀念有知青的日子》）

然而，知青老师对农家子女影响最深的，当是他们作为城里人所体现的城市文明的方方面面。上述文章的作者，都对知青老师的言行举止样貌风度，以及日常教学与生活中的细节印象深刻：

知青给农村注入了新的血液，也带来了生机。他们穿着干净，谈吐文雅，性格开朗，又识文断字。他们穿皮鞋戴手表，早上用牙膏刷牙，晚上还得温水漱口。男生用皮带系裤，女生用黑绸子扎头发。（花瑶花《知青老师》）

那些平时难得听到的歌曲，从年轻漂亮的女知青口中唱出来，真是太动听了！我学得特别认真，唱得格外卖劲。（龚德明《有歌声与笛声相伴》）

教我们舞蹈的是一位身材苗条、文静清秀的女知青，据说她是北京舞蹈学院附中的学生。记得有一次，她把我们招唿到女知青宿舍里排练，在房间里我嗅到一种我从没闻过但特别好闻的气味。多少年过去了，这味道一直萦绕在我的记忆里，后来，我知道那是一种香皂味和雪花膏味混合在一起的馨香。（王江《怀念有知青的日子》）

徐老师是个二十来岁的小伙子，身材很高大，皮肤白皙，胸膛饱满，目光清澈。眼睛有些凹陷，鼻子自然挺出来，头发带点儿自来卷儿，颇有些欧化。徐老师穿件白衬衫，绿军裤，衬衣裤缝整理得一丝不苟。用现在时髦儿的话说，就是酷。（花瑶花《知青老师》）

尤老师不温不火，总是笑眯眯的。课间，有社员来讨教识字的，有姑娘和小媳妇来问毛衣花样编织方法的，她都一一解答。村里人都喜欢她。（孙秀明《知青老师》）

李老师圆圆脸，一对酒窝深陷，两根长辫子，拖到屁股梢儿，发梢儿用黑绸子扎成蝴蝶结。最好听的是她的声音，蹦而脆，似一折就断。李老师爱唱歌，是知青小百灵。（花瑶花《知青老师》）

知青老师／你们是走入荒野的女神／那软软的上海话／那朗朗的北京话／那干净那漂亮／叫荒野一下子沸腾起来。（朔星《知青老师》）

上述知青老师的行为与形象，很是“小资”情趣，在文革时代绝对归于被批判范畴，但却受到农家子女的如此认同、欣赏与推崇。这可说是城市文明润物细无声的征服，无关政治也无关风月，无须宣扬更无须强制，却在农家

子女幼小的心灵烙下了深刻的印记，也掀起了躁动的波澜：

她的绿军裤显然改过，裤腿没那么肥，裤腰也没那么皱。把臀包得圆圆的，大腿部分笔直，小腿肚顶出来，形成一个弧线，上身灰色毛衣胸部还嵌着波浪线。脖子上对襟扎着花手帕，若隐若显。瞧着特不一样。我们不知道这就是美，只是心里处处想学她，学她说话，学她走路，学她抿嘴笑，甚至学她咳嗽。（花瑶花《知青老师》）

听你读小说童心安然入梦 / 跟你画线描荒野花开醉人 / 你把最好的营养 / 给了发育不良的我们 / 每天清晨你领着我们跑步 / 我们学着你的样子 / 见老人称唿“您” / 擦喷香的“牡丹”保护干裂的皮肤……（朔星《知青老师》）

这是生活的教育，文明的熏陶，美的启蒙，爱的感化。知青老师自己未必清醒地意识到这一点（知青老师自己所写的回忆文章以及记者的有关报导，都几乎没有这方面的记述），但农家子女所得到的潜移默化感染，却是受益终身的。可见，知青老师对于农家子女来说，不仅是传播文化知识，还在文明及生活方式方面深深影响了后者，这也是当地老师所未能起到的作用。这些农家子女对知青老师的感念，应是融注着对知青老师这种生活方式及品性气质的认同。

在笔者看到的有关文章中，农家子女的笔下绝无仅有出现了一位“反面人物”的知青老师，那是一位靠出卖同伴而取得代课老师资格的女知青。这位女知青固然受到作者的贬斥，但却无损知青老师整体形象在作者心目中的良好印象。因为，该女知青的出卖行为，不仅让学生们受到善恶是非的教育，还致使学生们更加推崇及爱戴被出卖的知青老师：“我们越发想念徐老师了。徐老师犯了这样大的‘事情’，被退回到生产队挑大粪。放学大家就去找徐老师，帮他捡麦穗，割蒿草。徐老师用他那双颀长的，覆盖着半透明指盖的手干最脏最累的农活儿，嘴里还能哼出调调来，他真是心里有音乐。”（花瑶花《知青老师》） 当然，文化思想背景与生活习惯的差异，也使农家子女与知青老师之间产生情感的隔阂，随着时间的推移，虽然文化思想与生活习惯的差异未必能消除，但情感的隔阂还是得以较大程度的化解。有的农家子女就着文记述，当年他们对知青老师如何从不喜欢、作弄、顶撞，逐渐转化为理解、接受、喜欢，乃至推崇，在文中表达了他们的愧疚与感恩之情，并表示“永远珍藏学生对老师的那份深深感激浓浓想念.”（吉霞《照亮我心头的第一缕阳光》）

http://hxzq.net/showcorpus.asp?id=19 老例文集

华夏知青网不是赢利性的网站，所刊载作品只作网友交流之用
引用时请注明作者和出处，有版权问题请与版主联系
华夏知青网：http://www.hxzq.net/
华夏知青网络工作室

梁晓声：以后不再写知青

刘颖 粤海知青网

提起知青剧，恐怕没有人能写得过梁晓声。从《今夜有暴风雪》、《雪城》、《年轮》，再到眼下正在央视热播的《知青》，梁晓声用手里的笔真实勾勒出那个特殊年代里的特殊人群的特殊人生。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梁晓声说，时隔多年，再度出手创作《知青》的原因有二：一是“看不惯现在一些人将知青戏写成年轻人在风景优美的村庄谈恋爱，这种‘傻浪漫’式的创作让我很恼火”，二是“被一位认真的责编的敬业所感动”。但梁晓声同时也表示，“以后可能不会再写知青了。”

“作为一名知青。我更关注他们后来的命运”

电视剧《知青》全景式地再现了“知青”这一特殊群体充满理想又坚韧不拔的青葱岁月，描绘了那个特殊年代千百万知识青年的生存状态，表达了对“残酷青春”的敬意。在长达10年的故事跨度里，交织着赵天亮、周萍、赵曙光、冯晓兰等人为代表的知青群体的悲欢离合，同样也记录着他们友情、爱情和共同相处的美好时光。

谈到为何时隔多年，再度将焦点集中在了“知青”身上时，梁晓声这样说道：“作为一个返城知青，我不可能不关注我的那些知青伙伴以及他们返城后的命运。这种关注引起我创作的冲动，应该说这种写作过程不可避免地加入了很多感情的成分。知青文学记录了中国特殊时代特殊群体的特殊心路，知青们在很小的时候就离家千里，到他们完全陌生的广阔天地里，有精神迁徙的意义，这个过程正是他们成长的过程，非常容易让人想起今天的打工仔与打工妹，只不过方向与路线是相反的，后者是到城市里来，前者是到农村去。”

梁晓声坦言，如果不是遇到了一位敬业的责编，自己也许已经封笔知青剧了。“那位责编给我打电话让我写写知青，我说半个月后你再打电话来。结果半个月后他果真再打过来，从那时起我才认真起来了。”

“知青剧是要有一点悲壮色彩的”

在谈到之前一些知青剧时，梁晓声明显有些恼火。“现在有一些知青电视剧给别人的理解造成了很大的误区，觉得他们这一代人下乡，然后谈一点恋爱，当过红卫兵，整个这一代人好像就是二百五的感觉，是吗?这种‘傻浪漫’让我很生气。我要告诉观众的其实是，这一代人不是二百五，他们是对国家太重要的一代人。而事实也是这样，这一代人最可贵的是在那样的十年中，自身又是知青，个人命运未知数，但是大家更关心的是国家命运。所以，知青剧里必须有劳动。我们都是从劳动中获得人格成长的。”

梁晓人认为，知青剧都要有一点悲壮的色彩。“因为那本身就是一个悲壮的年代。拍《知青》我们原本想把知青群体做一个全景式的展现，但由于篇幅所限，我们没有把云南、贵州、新疆的知青写进去，还有很多情节因为长度问题剪掉了，不剪就会超过60集，剪了我又很心疼。我们将现在的创作范围比喻成圆，有人会去把半径拉长，去试着拉宽面积。我希望做这样的人，而不是别人把半径拉长后，我去享受既得成果。”

“真正的知青究竟什么样”

梁晓声之所以对知青如此了解，是因为他本身就是一名返城知青。在《知青》中，他试图通过细致的描述，将一群真实的知青形象展现在观众面前。

那么当年，作为知青的梁晓声又是个什么样呢?“我在黑河待了七年多，像我这样的人，麦收时痛苦得想逃离建设兵团。北京一个400多人的知青队伍，死了的就有20多个，这些都是真实发生的历史。从这段经历中，我获得最大的收益就是不怕艰苦。以后一生也不怕艰苦，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友情，这个友情你看到今天都是老头老太太了，互相还有很深的友情，黑龙江知青我们有联谊会，经常谁家里有困难就资助谁、帮助谁。”

此外，通过《知青》，梁晓声也试图向观众解释清这样一件事，为什么一个无书可读的时代，一个在上学的年龄集体被取缔了学习机会的时代，恰恰产生了共和国最无怨无悔的一代人?那是因为“他们曾和最任劳任怨养活中国的农民们同舟共济、抱团取暖过”。

声明：文章内容以及图片搜集自网络，如涉及作品内容、版权和其它问题，请及时与本号联系，我们将在第一时间删除内容。文章只提供参考并不构成任何投资及应用建议。

中国知青婚姻

来源：《中国知青史·初澜/大潮》

作者：刘小萌

"文革"后期，越来越多的知识青年遇到了婚姻问题。上山下乡的特殊场合，使这个问题有别于一般意义上的社会婚姻，而成为运动中纠结着诸多矛盾的一个焦点问题。剖析这个问题，有助于加深对运动性质和一代青年悲剧性命运的了解。下面从知青的婚姻政策、知青婚姻率、知青婚姻类型、已婚知青的窘境四个方面展开讨论。

上山下乡运动的指导者是把倡导晚婚摆在一个很重要位置的，尽管这种做法不利于知青在农村的稳定。

知青下乡以后或迟或早都会遇到婚姻问题，而这个问题能否得到妥善解决又直接关系到上山下乡运动本身的命运，因此无足奇怪，当该问题刚刚显露头角时便受到了决策者的关注，并及时制定了相应的对策。

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是运动的高潮期，新闻媒介为了给这场运动大造声势，不厌其烦地宣传在农村"扎根一辈子"的思想。虽然，使下乡知识青年"扎根"在农村的有效手段莫过于鼓励他们在农村结婚，安家落户，但有关部门却把提倡晚婚作为知青工作的一个重点。1969年6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的评论员文章《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中强调，对于下乡的男、女知识青年，都要提倡晚婚。翌年3月在北京召开的延安地区插队青年工作座谈会，以及同年4月国家计委军代表提出的《关于进一步做好知识青年下乡工作的报告》中重申了这项政策。

与此同时，报纸广播积极宣扬下乡青年"带头移风易俗，为革命坚持晚婚"的事迹。1970年5月14日《人民日报》报道了贫下中农积极教育插队知识青年，正确处理婚姻问题，劝导他们实行晚婚的消息。在这则消息中，是否坚持晚婚，被耸人听闻地提高到"阶级斗争"的高度加以认识，而一些地方出现的早婚苗头则被斥责为"阶级敌人"破坏知识青年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一股"妖风"。不久，就有河南省延津县小店公社的13名知识青年致书《人民日报》，认为实行晚婚决不单纯是生活小事，而关系到能不能更好地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彻底改造世界观的大问题，进而向全国的知识青年倡议：带头移风易俗，为革命坚持实行晚婚。1971年1月30日《人民日报》在"为革命大

力提倡晚婚"的醒目标题下，刊登了这封书信，在全国范围内产生了一定影响。从信中可以得知：有些地方的插队知青，在下乡两三年后已开始考虑自己的"终身大事"；有的家长也不失时宜地为儿女的婚事操心。

从政府决策及其宣传喉舌的角度来考察，可以确信，在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的若干年里，上山下乡运动的指导者是把倡导晚婚摆在一个很重要位置的，尽管这种做法不利于知青在农村的稳定。那么，作为其决策的背景又是什么呢?要而言之，起码有三点：

第一，下乡知青尚未大批进入合适婚龄，"文革"中率先下乡的"老三届"(即66届、67届、68届)初、高中毕业生，1968年时的年龄在16-21岁之间。1950年颁布的婚姻法所规定的法定婚龄为：男不得早于20周岁，女不得早于18周岁(直到1980年才做了修改，比原定婚龄男女各提高了2岁)，然而法定婚龄只是法律允许结婚的最低年龄，并不意味着青年到了这个年龄就一定结婚。何况国家从70年代初起加大了宣传晚婚的力度，晚婚受到鼓励，晚婚的年龄划定在：城市青年为女25岁，男28岁；农村青年为女23岁，男25岁，即比法定婚龄高出5-8岁。既然提倡晚婚的出发点是试图限制人口的急剧膨胀，也就难怪会将晚婚年龄视作理想的婚龄。按照适用于农村青年的标准，知青中年龄最大的66届高中毕业生中的女性应在1970年达到晚婚的年龄。步其后尘，每年都会有一批青年加入到适龄者的队伍。而在头几年里，真正感到婚姻问题迫在眉睫的仍是为数较少的"老三届"女高中毕业生。因此，在决策者看来，婚姻问题尚未凸显为上山下乡运动中的一个棘手问题。

第二，政府希望通过知识青年的表率作用，在农村开风气之先，移风易俗，切实推进晚婚和计划生育政策。"文化大革命"的爆发，一度使中国的人口增长失去控制，酿成1949年建国以来又一次人口出生高潮期。进入70年代，全国形势趋于安定，计划生育作为国务院日常工作中的一项当务之急又被提了出来。1971年国务院批转了卫生部、商业部、燃化部《关于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报告》，提出：要加强对这项工作的领导，深入开展宣传教育，把晚婚和计划生育变成城乡广大群众的自觉行动，力争在"四五"期间城市人口自然增长率降到10‰左右，农村降到15‰以内。1973年，国务院成立了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同年，在周恩来主持的全国计划工作会议上，第一次把人口增长指标纳入了国民经济计划。这些步骤都预示着：推进晚婚和计划生育，已成为举国上下涉及千家万户的一项旷日持久的群众性活动。

这项活动遇到的巨大阻力主要来自封闭落后的农村。千百年来，"多子多福"、"人财两旺"、"重男轻女"、"养儿防老"等传统小农经济的生育观在广大农民中保持着根深蒂固的影响力；农村中落后而繁重的手工劳动方式，以及农民年老后依靠子女养赡的古老生活方式，为传统生育观的绵延存续，提供了适宜的土壤。要在较短时间内扭转这种局面，仅凭农民自身的力量显然是难以胜任的。方兴未艾的上山下乡运动，将成千上万的城镇知识青年播撒到全国村村寨寨，这使国家的领导人有理由相信，在推进农村的计划生育工作中，找到了一支可以信赖的骨干力量。

1973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员接见参加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的全体代表时，周恩来明确指

出："计划生育，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分不开。城镇青年下去以后，要做模范。"他还特别夸奖女知青代表徐敏光是晚婚的"模范"。徐17岁时还乡务农，此时已经28岁，还没有结婚。周恩来指出：

晚婚，计划生育，下乡青年提倡，造成风气，更有力量。每年100多万人到农村去，到处讲，这是最好的推广。《中央政治局同志接见参加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和总后党委常委扩大会议的同志时的讲话》，1973年8月6日。

下乡知青既被赋予此项光荣任务，当然要身体力行。因此，在各种场合积极鼓励知青晚婚，是顺理成章的。

第三，为了缓解知青住房困难，也只能提倡晚婚。下乡知青要结婚成家，必须解决住房问题。但每名知青下乡时，国家拨给的安置经费中，用于建房的不过一百余元。由于拨给经费不足，农村社队又不愿或者无力额外贴补，以致许多青年下乡后没有房子住。他们或者"打游击"，居无定址；或者租农民房住，得过且过；栖身破庙、牲口棚的事也时有所闻。在这种情况下考虑结婚成家，无异于眺望海市蜃楼。

1973年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上，主持者在周恩来的指示下特意邀请了老知青典型邢燕子、侯隽到会，向她们征求意见。在讨论到"一个知识青年在农村扎根落户究竟要花多少钱"的问题时，她们发表看法说：一般情况，知识青年下乡三年就可以生活自给。但是，一到结婚年龄，就又有困难了。在知青小组集体里凑合能过，从集体户出来，要另外安家，盖房子，买家具，需要不少钱。她们还根据当地情况算了一笔账，一个下乡青年，建房一间要用400元(材料按国家价格，用工由队里摊派，不管饭)；小农具、生活用具、家庭副业铺底约70元；伙食补助第一年大约100元；第二年大约三四十元；到结婚安家时，补助几十元；再加上书报、医药费等，每人约需700元左右《邢燕子、侯隽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和有关农业生产的一些意见》，1973年7月……邢、侯的估计似乎乐观了些，对一大批被安置到贫困地区插队的知识青年来说，下乡三年乃至更长的时间，并不足以改变他们窘迫的处境；何况多数知青始终也没领略过一个人一间屋的喜悦。即便如此，她们的估计有助于说明，下乡青年在头几年里是不具备成家立业的物质条件的。

也就是在这次会议上，周恩来专门谈到知青"晚婚"与房子的关系。他说：要提倡晚婚。刚下去，不到20岁，下去后头七八年，十来年，可以不发生住房的问题。以后他可以自给了，有了积累，再给点补助，到结婚时就可以另盖房子了《中央政治局同志接见参加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和总后党委常委扩大会议的同志时的讲话》……周恩来显然了解知青住房问题的普遍性和严重程度，所以才会提出解决结婚住房，只能依靠知青自力更生，用七八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去一点一滴地积累。在这种形势下，知青的晚婚应是势在必行。当时的新闻媒介，一个劲地鼓励知青在农村"扎根落户"，同时却又不遗余力地倡导"坚持晚婚"，知青普遍缺乏安家的物质条件，是一个必须考虑到的经济因素。

不过，国家所制定的知青婚姻政策在受到上述因素制约的同时，还受到了多变的政治风云的牵制。这种牵制，

很快使政策偏离了既定的轨道。尽管在1973年8月全国知识青年工作会议上，有关人士还在积极提倡"晚婚"，但第二年年初，新闻媒介对知青婚姻基调却发生了显着转变。转变的开端是由白启娴投诉报纸引起的一场风波。白启娴原是河北师范大学的毕业生，1968年被下放到河北省沧县阎庄公社相国庄大队"插队落户"。1972年与同队一小学文化水平的农民仓促成婚，婚后生活平淡已极。她努力适应由大学生向农妇的角色转变，烧火做饭、喂鸡饲鸭、操持家务、侍奉公婆、生儿育女，构成了日常生活的主要内容。丈夫虽为人厚道，但不乏根深蒂固的夫权观念，无故挨丈夫的打很快成了她的家常便饭。他们之间本来缺乏感情基础，草率成婚，加之在文化程度、生活习惯上的鸿沟，她的婚后生活毫无美满可言丛聪：《"红"牌坊——白启娴婚姻问题调查追记》，《中国妇女》，1987年第8期……她的婚姻受到父亲的反对，也不断遇到周围人们的冷嘲热讽。

1973年底，在一次口角中，与白启娴同在公社执教的一名教师将这起婚姻说成是个"丑(闻)"。白在盛怒之下连写几封信寄给各家报社。信中称，"有人说嫁个农民没出息，依我看，那种贪图个人享受，看不起嫁庄稼汉的人最可卑"；"有人说，落在农村没前途，我坚信在广阔的农村奋斗终生大有作为，前途无量"。为了驳斥各种非议，她不惜美化自己并不如意的婚事，将偶然凑合的婚姻说成是"决心扎根农村干一辈子革命"的自觉举动。白启娴的信适逢其时，当时以江青为首的极左派领导人竭力推波助澜的"批林、批孔"运动刚刚拉开帷幕，正需要造就白启娴这样的"反潮流"典型。

1974年1月27日《河北日报》以《敢于同旧传统观念彻底决裂》为通栏大标题，发表了她的来信和《编者按》。《编者按》吹嘘她的信是"一篇生动的批林、批孔和进行路线教育的好教材"，并"希望涌现出更多的敢于与地主资产阶级的旧思想、旧传统观念决裂，敢于反潮流的人物，这对于反修、防修，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有其深远意义的"。不久，《人民日报》全文转载了她的事迹。

随着白启娴名声的鹊起，全国各地竞相树立自己的"白启娴"式人物。意味深长的是这些人物为清一色女性，而且大多是在下乡头一两年就嫁给当地农民的。当初的舆论压力可想而知。但物换星移，昨是今非，曾几何时，本来招致非议的人生抉择却成了赢得种种美誉桂冠的政治资本。以这种戏剧性变化为枢纽，宣传喉舌关于知青婚姻政策的重心迅速由倡导晚婚转向鼓励知青在农村结婚。这一重心的转移，主要是与极左派领导人大张旗鼓地将女知青嫁农民的现象加以政治化，并任意夸大曲解的做法唿吸相应的。同时应看到，大批"老三届"青年陆续步入婚龄毕竟成为事实，这对婚姻政策的调整也会产生直接影响。

作为婚姻政策调整的一个明显迹象，1974年11月23日《人民日报》刊载了辽宁省海城县《热情关怀已婚下乡知识青年的成长》的调查报告。与当时充斥报端的有关白启娴一类"与旧传统观念彻底决裂"的典型人物事迹的报道相比，这份调查报告的基调平实得多，只是说：下乡知识青年在农村结婚，安家落户，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的一个成果。这份报告很可能是在知青主管部门主持下完成的，所以比较关注解决已婚青年的实际困难，较少空洞干瘪

的政治说教。《人民日报》发表的《编者按》强调了"随着有些下乡知识青年年龄的增长，需要引导他们正确地对待和解决婚姻问题"的重要性。同时指出：鼓励下乡知识青年带头实行晚婚，对改变早婚这种旧的风俗习惯，是个有力的推动。在青年们结婚以后，要教育他们认真搞好计划生育。虽然这篇指导性文章仍兼顾到实行晚婚的必要性，但从1974年起，知青婚姻政策的重心显然转向了鼓励青年在农村结婚。

1976年上半年，是极左派活动最猖獗的时候，也是知青工作受其影响最严重的一段时间，国务院知青办对地方部门提出："邓小平搞拔根，你们就是搞扎根，这就是对着干。"青年在农村"扎根"必须解决婚姻家庭问题，换言之，解决了婚姻家庭问题也就迈出了"扎根"的关键一步。至此，一个本来属于个人私生活范畴的问题被居心叵测地与"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的政治目标紧紧联系在一起，极左思潮披靡所至，知识青年在农村成家立业的举动得到更积极的支持和大力宣传。

综上所述，"文革"期间知青婚姻政策是有明显变化的，前期政策以提倡晚婚为中心，主要是基于国家经济建设、推进计划生育的需要，以及下乡知识青年普遍生活状况的考虑，应该说还是比较务实的；后期政策转向积极鼓励青年在农村结婚，与其说是为了适应大批青年步入婚龄的现实需要，不如说是受到极左派领导人政治行为有力牵制的结果。从1974年的"批林、批孔"运动，1975年的学习"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理论的运动，到1976年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与极左派领导人对国家政治生活变本加厉的干预如影随形的，是知青婚姻的高度政治化，知青在农村结婚成家被不失时宜地贴上"与旧传统观念彻底决裂"、"坚决限制'资产阶级法权'"、"与邓小平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对着干"等蛊惑人心的政治标签，至于这种鼓动会给知青带来怎样的后果显然无人问津。

然而，婚姻政策的转变是一回事，贯彻实施的成效则是另一回事。这是因为，后者不仅取决于决策者的努力，而且在更大程度上取决于知识青年本身的意愿。

大批适龄青年未能完婚已成为带有普遍性的社会问题，而且这个问题在70年代末达到极其尖锐的程度。

下乡青年对待婚姻的态度，除了受到政府行为的影响外，还受着诸如生存条件、家庭背景、文化程度、年龄大小、价值取向等因素的左右。就绝大多数知青而言，在下乡的头几年，恋爱婚姻还没有提上日程表。"文革"前的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成功地塑造了这代青年人清教徒式的恋爱婚姻观。一种风靡的观念是：优先考虑个人问题与革命的大目标是格格不入的。许多青年憧憬的是为解放全人类、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事业奋斗献身，认为沉湎于个人的卿卿我我，意味着失去献身的资格、禁欲主义的幽灵肆无忌惮地在青年中间游荡。不少人认为：男女之爱是肮脏的，只有同志和战友的革命情谊才是可宝贵的。对于过早恋爱的知青，大家往往嗤之以鼻。在这种气氛的挤压下，坠入情网的知青往往会产生负疚感，自惭形秽，甚至产生离群索居的念头。于是，紧闭初开的情窦，将求爱者一口回绝者有之；将热情的情书交给领导者有之；将隐秘的情爱之火熄灭在革命祭坛前者亦有之。

生产建设兵团政治环境也助长了禁欲主义的弥漫。在最初几年，知青谈恋爱属于不可越雷池一步的禁区。舆论认为，知青到兵团的任务是"屯垦戍边，反修防修"，谈情说爱被看成"资产阶级的思想"。极左思潮笼罩下的兵团，将"男女大防"奉为金科玉律，任何"越轨"行为常受到惩办。有的连队自定土政策；掌灯后男女青年接触，必须有"领导"陪同；有的干部专门稽查男女知青幽会，私拆情书，并拿到大会上宣读，作为"阶级斗争的反映"《北大荒风云录》，中国青年出版社1990年版，第133、195页；《红土热血》，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81页。，或者扣上"侮辱妇女"的罪名。对人权的公然践踏，时常激化矛盾。有的青年不堪其辱，逃出境外，成为罪不可赦的"叛国犯"，甚至万念俱灰，走上绝路《北大荒风云录》，中国青年出版社1990年版，第10-12、181-183页……

相形之下，农村插队青年所处的环境则宽松得多。农村的社队组织缺乏高度集中统一的行政干预机制，况且农村早恋早婚的习俗源远流长，农民对渐染此俗的知青不但不以为异，有的反因后者能入乡随俗增添了几分亲近感。于是，知青中第一批结婚者在受到知青群体冷落之余，通常能从当地淳朴敦厚的农民中寻找到慰藉。数年过后，下乡知青的生活态度变得越来越实际，对个人的终身大事虽或处理谨慎，对他人的婚姻已颇能宽容和理解。与此同时，官方政策由提倡晚婚转为积极支持青年结婚。甚至在生产建设兵团，各级领导的态度也明显转变，率先结婚的青年受到表彰，被树为"扎根"的典型《北大荒风云录》，中国青年出版社1990年版，第3页；《辉煌的青春梦》，湖南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第267页……此举旨在遏止知青中迅速蔓延的思乡情绪和通过各种关系调离农村转回城市的风气。但不管怎么说，知青已婚人数确在逐年增长。1974年末，全国已婚知青有48万人；1975年增至614万人；1976年为726万人；1977年达到创记录的861万人，占全部在乡知青的10％。在这以后，随着运动迅速退潮，在乡知青大举返城，已婚青年的人数逐年递减(其间起落的态势详见本书附录表10)。

进一步对插队知青和兵团(农场)知青两个群体考察，前者的已婚率要低于后者：1975年末，在乡插队知青的已婚率为79％，国营农场为87％；到1977年末，在乡插队知青的已婚率为82％，国营农场知青的已婚率为173％(详见附录表10)。若就安置插队知青和农场知青最多的省份之一黑龙江省的统计资料看，两者已婚率差距更为悬殊：1975年末，该省在乡插队知青的已婚率为29％，国营农场知青为91％；到1977年末，在乡插队知青的已婚率为38％，而国营农场知青的已婚率为227％李德滨、石方：《黑龙江移民概要》，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05页……

造成上述差距的原因之一：插队青年的生活条件通常比较艰苦，生活水平差，自给率低，经济收入极不稳定；国营农场的知青收入不高但有保障，居住也比较集中。原因之二：插队知青流动性较大，每年都有大批应届毕业生下乡插队，同时又有一部分在乡青年上调工矿企业，势必会降低知青的平均年龄和已婚率；而国营农场的知青队伍则比较稳定，多数是"老三届"学生，年龄偏大，已婚率自然偏高。新疆、宁夏、甘肃三省国营农场的情况尤为特殊：1977年，知青已婚率分别高达631％、571％、559％国务院知青办编：《全国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统计资

料》，第51页……究其原因，三省国营农场安置的绝大部分是"文革"以前的老知青。

尽管存在着一些复杂情况，从全局来看，大批适龄青年未能完婚已成为带有普遍性的社会问题，而且这个问题在70年代末达到极其尖锐的程度。关于这方面问题，留待后面再说。这里所要强调的是：虽然国家从1974年起积极鼓励知识青年在农村结婚，并且苦心孤诣地培植了一批"扎根"典型，实际上收效不大。换言之，鼓励知识青年在农村安家落户的政策，以及与之交相辉映的大张旗鼓的宣传远不能说是成功的。

女知青嫁农民，本来是知青多种婚姻中的一种形式，然而在连婚姻也被高度政治化的"文革"年代里，唯独这种形式被舆论工具赋予了重要的社会意义。

"文化大革命"的政治背景和到农村安家落户的独特形式注定知青婚姻关系的缔结无法依循生活的常规。

知识青年的婚姻大致分为三种类型：

双知青类型(夫妇双方均为知青)，

知青与农民类型，

知青与国家职工(军人)类型。

这三种类型各占知青婚姻的多大比例，没有全国性的统计，只能借助以下三份局部性资料对插队青年的婚姻类型进行一个粗浅的了解：

第一，1980年吉林省的统计，已婚青年中，与农民结婚的占749％；知青之间结婚的占21％；与城镇职工结婚的占41％《吉林省劳动志》，1992年铅印本，第85页……

第二，1978年河北省保定地区的统计，已婚青年中，与农民结婚的占755％；知青之间结婚的占152％；与职工结婚的占94％河北省保定地区知青办：《已婚知青住房情况》，1978年……

第三，1976年吉林省怀德县的统计：在已婚青年中，与农民结婚的占748％，知青之间结婚的占179％；与职工结婚的占73％吉林省知青办：《怀德县知青基本情况统计》，1976年……

以上三份统计资料在时间上不尽一致，统计单位分别为省、地、县，不具有可比性，其价值在于：从不同层面反映了三种类型在知青婚姻中所占的主从地位，即知青与农民结婚是主导性婚姻类型，其次是双知青类型，最后是知青与职工类型直至公社、大队一级基层组织，司空见惯的同样是这种现象。如《南方日报》1975年7月10日载：三水县乐平公社海州大队，26名已婚知青中，与农民结婚的16人(615％)，双知青结婚的6人(236％)，同外地城镇

青年结婚的4人(154%)……这种排列，应该反映了全国插队知青婚姻类型的基本状况。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在城市郊区插队青年中间，婚姻类型的关系略有不同。1976年有关部门对长春市郊区五社两镇的调查表明：已婚知青中，知青与农民结婚的占51%；知青间通婚的占24%；知青与城镇职工结婚的占25%吉林省知青办：《关于已婚知识青年问题的调查报告》，1976年……在这份个案中，与农民结婚的类型要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此缩彼盈，与城镇职工结婚的类型则相应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毗邻城市的地理条件，使知识青年(主要是女知识青年)较易于缔结与城市职工的婚姻，是不言而喻的事实。不过，纵使在这类密迩城市的地区，知青与农民的婚姻仍为主导类型。这或者有助于说明，知识青年下乡后，由城市户口转为农业户口，同时也就失去了城市市民享受的一应生活补贴和福利。在城市人眼里，他们是"新型农民"，深浚的城乡差别、工农差别的壕沟，增加了缔结婚姻的难度。

生产建设兵团(国营农场)知青的择偶环境与插队知青差别明显。生产建设兵团一般地处边疆，区域开阔。兵团的连队自成一方天地，与别的连队相隔有一定距离，有的甚至独自一隅，四周皆是无边的原野。一个连队实际上形成了一个相对封闭的择偶范畴张持坚：《甜蜜和苦涩的融汇》，《文汇报》，1994年11月7日……聚集在这一方天地的知青通常来自天南海北的各个城市。虽然操着南腔北调，毕竟命运相同，旨趣相投，朝夕相处，感情日笃。自然而然，双知青结婚便成为兵团中的主导性婚姻类型。

在三种婚姻类型中，知青与知青共结连理一般具有较为坚实的感情基础。知青间的恋爱萌生于艰苦的岁月，动荡的年代，或基于寻求心理上的慰藉，减轻生活中的沉重压力；或缘于同病相怜的命运。同甘共苦的经历是一个最起码也最重要的前提。"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更何况是相濡以沫的男女知青。共同的文化背景，共同的遭遇，共同的语言，使两颗年轻的心灵相互碰撞，迸发出爱情的火花。从道理上讲，这一类型的婚姻应是知青中最为理想的结合形式，但农村艰窘的生活却给这种"理想的婚姻"蒙上浓重的阴影。许多知青婚后只有菲薄的收入，经济上无以自立。若再生儿育女，对捉襟见肘的生活无异于雪上加霜。一首知青歌曲唱道："人家的丈夫，当官拿数数(四川方言：钱)；知妹(四川对女知青的简称)的丈夫，年终要倒补。""人家的丈夫，都有楼房住，知妹的丈夫，光呀嘛光屁股!"用艺术的夸张，强烈的对比，活衬出男女知青婚后生活的艰辛。

知青与城市职工(包括军人)的婚姻多数具有几个共同特点：知青一方为清一色女性；婚姻由父母包办或亲友撮合，缺乏感情基础；夫妻分居城乡，从一开始就成为"牛郎织女"。农村生活与城市生活的强烈反差，促使一些女知青及其家长将择偶的目光投向城市，使这种婚姻具有了为返城准备条件的明确目的。上海女知青郭慧是家中的独生女，1968年高中毕业后到吉林省延吉县插队。母亲希望她调到离家较近的地方，托人从老家江苏海安县给她介绍了一位中学教师为对象郭慧拒绝了母亲的安排，执意与一青年农民恋爱结婚，被树为本省知青典型。见《吉林日报》，1974年12月21日……上海女知青夏美珍，在贵州绥阳县插队。她的父亲想方设法为她在老家宁波市附近镇海

县的一个农具厂找好工作，并替她在宁波市物色了一个对象，认为这样做可以使她回到城市，而且距离上海较近《南方日报》，1975年7月10日……一些女知青，家中无权无势，返城无路，眼看着同伴一个接一个地远走高飞，只得把自己的命运压在与城市职工订婚上。虽然国家有关政策不允许农村户口的妻子和子女迁入男方所在的城市，但这种结合毕竟为女知青提供了长期探亲，与城市建立稳定关系的保障；女方还可从丈夫的工资中获利。尤为重要是，国家政策在限制农村人口流入城市的同时，为城乡两地长期分居夫妇的团聚仍留有一些活口，这使在农村的女方或迟或早能返归梦牵魂绕的城市。

缺少爱情基础，通常是这类婚姻的致命伤。女知识青年牺牲了自己的爱情和应有的尊严，换取一张进城的门票。有的女知青为了返城，违心地与城市下来的招工人员达成协约：与后者建立恋爱关系，条件是后者利用手中的招工指标，在短期内将她调回城市李育麟：《酒》，《知青档案》，四川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566页……然而举凡"降格"寻找下乡知青为妻的城镇职工，以在城里择偶难者为多。难点所在，或因相貌丑陋，或因工作不理想，或因家境贫寒，或因身体残疾。发生过这样一件悲喜剧：某女知青经"月老"牵头，嫁给了城里一工伤致残的工人。厂方经多方努力，将她的户口、粮食关系办回了城市。厂方成全了这桩婚事，又卸去了对致残者长年照顾的责任；男方以残缺之躯，终圆"洞房花烛"之梦；女方则实现了返城的夙愿。有关三方各有所得，皆大欢喜。但唯一缺少的恰恰是作为婚姻基础的爱情《风潮荡落（1955-1979）——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史》，海天出版社1993年版，第252页……在特殊的社会条件下，婚姻的本质受到最粗暴的蹂躏，它不再是伊甸园中青年男女纯真爱情的升华，却蜕变为赤裸裸的利益交换的手段，由此埋下数不清的苦果。

某上海女知青相貌俊俏，插队落户时在当地被称为"一枝花"。父母爱女心切，为她在城里找了个工人当对象。她在返城无路的背景下与之完婚。男方文化低，个子矮而胖，绰号"小皮球"。婚后不久，"一枝花"就想离婚，但男方积极为她的调动奔走，复经父母劝说，婚姻得以维持。等回到上海，有了孩子，两人真正共同生活在一起，女方感到与丈夫实在没有感情，又提出离婚。男方认为经过百般努力，家庭终归破裂，活着没有意思，坚持离婚时儿子判归自己，否则与儿子一起去死。女方自酌年龄不轻，也不肯放弃孩子，双方相持不下，孩子夹在中间备受痛苦《一天的奇迹》，《中国妇女》，1991年12期……这都是无感情婚姻所酿成的苦果，不得不由三个人来吞咽分享。类似这样的悲剧，在当年是不少的。

知识青年与农民的结合在全部婚姻中涉及面最广，酿成的苦果也最多。这种婚姻类型又包括男知青娶女农民，女知青嫁男农民两种形式。一些资料显示，女知青嫁给农民的人数明显超过了男知青娶女农民的人数参考河北省保定地区知青办：《已婚知青住房情况》，该地区与农民结婚的2042名知青中，属男知青与女农民结婚的有658人(占322％)，属女知青与男农民结婚的有1384人(678％)。另据黑龙江省知青办《上山下乡简报》1979年第1期：嗯兰县与农民结婚的290名知青中，属男知青与女农民结婚的有98人(338％)，属女知青与男农民结婚的有192人(662％)……因此，考察女知青嫁农民的现象，应作为透视知识青年婚姻问题的一个重点。

女知青嫁农民，本来是知青多种婚姻中的一种形式，然而在连婚姻也被高度政治化的"文革"年代里，唯独这种形式被舆论工具赋予了重要的社会意义。这种举动被吹捧为"扎根农村"、"彻底决裂旧传统观念"、"敢于反潮流"的具体表现，缩小"三大差别"的"实际行动"。如果穷原竟委的话，这种做法在50年代末已见端倪。1957年，天津市女7中高中毕业生王培珍到河北省静海县团泊洼赵连庄农业社当了农民，两年后与当地青年农民恋爱结婚。她的举动受到种种非议，有的人嘲讽她是"傻子"。对于这种压力，她毫不介意，并在日记中表示：心甘情愿做一个对人民有利、对国家有利的"大傻子"《知识青年的革命道路——奋战在农业战线上的知识青年》，中国青年出版社1964年版……王培珍显然认为自己的婚事具有重大政治意义，这种精神支柱使她面对舆论的压力处之泰然。70年代对白启娴事迹大张旗鼓的报道，在更大程度上使女知青嫁农民一时成为时髦。白启娴扬名后，地位陡然变化，先由地委书记介绍入了党，继而被增补为第四届全国人大代表，擢为河北省知青办副主任，地区文教办副主任，公社党委副书记。在很短的时间内，她收到了全国各地两三千封热情洋溢的来信，各行各业的人们表示了对她的鼓励、支持，许多知识青年决心以她为榜样像"文革"中昙花一现的许多英雄、典范一样，白启娴的归宿是可悲的。"文革"结束后，她的事迹失去了宣传价值，诸多官职被免去，调到沧州师范专科学校教务处任副主任。1982年11月煤气中毒致死，年仅39岁……

与此同时，一批白启娴式的女知青在各地脱颖而出。湖北树立了"敢于破除旧传统观念"的喻利华。喻是武汉市知青，1969年12月到洪湖县插队落户，与贫农青年相爱，面对人前背后的闲话与嘲笑，据说她从毛主席《青年运动的方向》中汲取了与农民结合的精神力量，并勇敢地迈出了与贫农结婚的一步《湖北日报》，1974年2月11日……辽宁则宣传了"决裂旧观念，青春献人民"的刘秀兰。刘于沈阳市第9中学高中毕业后到苏家屯区插队，1969年与一农民结婚。从年龄上推测，她结婚时至多不过22岁，在知青中当属早婚之列《沈阳日报》，1974年3月19日……浙江推出了徐春娟。她是金华市3中的68届毕业生，下乡后推荐上大学不去，决心扎根农村，最后嫁给了农民《浙江日报》，1974年3月19日……湖南表彰了张国清。张是1963年高中毕业后下乡插队的老知青，四年后与一贫农结婚，随即发展入党。"文革"中擢升省妇联副主任《人民日报》，1974年3月20日……一时间风云际会的这类典型还有杭州女知青缪惠敏，青岛女知青李春梅、王金华，上海女知青郭惠、万宁林等等，不一而足《浙江日报》，1974年5月6日；《青岛日报》，1974年3月17日；《吉林日报》，1974年12月21日；《解放日报》，1975年1月27日……

关于与农民结婚的理由，当时的舆论工具杜撰出种种冠冕堂皇的说法来。白启娴认为"这对于缩小三大差别、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反修、防修，都具有很重要的意义"。徐春娟把它提到"走什么道路"的政治高度来认识，认为；找个什么样的对象，不单单是个恋爱婚姻问题，而是关系到自己走什么道路的问题，如果把家安在城里，将来三天两头往城里跑，就会动摇扎根农村的决心。还有的女知青着重强调了毛泽东关于知识青年应与农民"相结合"思想的指导意义。当年风行全中国的毛泽东语录："尽管他们(指农民)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知识

分子都干净″，成为一些女知青嫁给农民的理论依据作为当时最时兴的理论，最初是由白启娴在那封着名的申诉信中加以征引的，以后便辗转传布，参见《沈阳日报》1974年3月19日刘秀兰的文章《谈谈我为什么和农民结婚》……毋庸讳言，女知青嫁农民的举动之所以被一再夸大、拔高、渲染，首先是与″文革″期间对知识分子的歧视、丑化、贬低乃至打击的做法联系在一起的。上述说教的共同特点，是用某种政治上的需要给这类婚姻镀上一个夺目的光环，换言之，结婚只是为了完成某种政治目的，而恰恰应该当作婚姻主弦的爱情反而被略而不提。

尽管宣传调门一再拔高，知识青年们却几乎无不知晓：″结了婚要一辈子当农民″，″也别想再选调了″《南方日报》，1975年7月10日；《人民日报》，1975年1月28日……与农民结合，意味着将终生厮守脚下那一方土地，意味着完全割断与城市生活藕断丝连的联系，一切关于前途的憧憬，以及对招工、招生、返城的企盼也将随之化为齑粉。既然如此，为什么仍有为数不少的女知青走上了这条前景并不光明的道路呢?确乎有少数知青(如上举知青典型)，她们与农民的结合不是被动的，除了真心实意地把这视为革命的″洗礼″外，也不排除彼此感情契合的因素。不管怎么说，农民的本质是淳朴、善良的，对于处在困境中的下乡知青，许多农民给予过各种形式的宝贵帮助。有的知青在极端沮丧之余，从农村青年的热情关心帮助中体察到世间温情，进而产生爱慕之情，是很自然的关于这方面的报道可参考毛弟：《苦涩的恋情》，《辉煌的青春梦》，湖南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塔琳：《她依恋阿拉坦合力》；周兴国：《他说，他不是鹰，是风筝》，《草原启示录》，中国工人出版社1991年版

但就多数知青来说，她们走上这条道路是出自被动的选择。究其原因，首先是女知青难堪农村艰苦劳作的重负。着名影星刘晓庆当年曾在贫困的四川宣汉县当过知青，她回忆说：

我每天在幻想与破灭之间挣扎，我第一次渴望着″爱情″：如果有这么一个小伙子，他能够每天来帮助我挖地，只要坚持八个月，我就一定嫁给他。《我的路》，《文汇月刊》，1983年6期。

刘晓庆企盼的小伙子终究没有出现，现在来看未尝不是一件幸事，但当年确有不少女知青，正是在这种心态下走上了一条陌生的人生道路。男知青有强健的体格，较强的群体意识，与艰苦环境抗争的能力，在这些方面，女知青都逊色一筹。一些地方知青集体户的破裂直接强化了女知青的困境，处在孤立无援的境地，更需要别人的爱抚、友情、关心、帮助。尤其是当下乡初的热情冷却，幻想破灭，她们很容易为农村青年的慷慨帮助所打动，成为婚姻的俘虏许惠英：《18岁的幻灭》；林小仲：《″女俘″》，《草原启示录》，中国工人出版社1991年版……农村女孩子出嫁早，长期在地里与男劳力一样干活的往往就剩下一帮女知青，当她们结婚后，起码免去了农田的沉重劳作。用农民的朴素语言来表达：″过门当了媳妇，用不着沉锤大镢地下坡干活了，安安稳稳地在家过日子。″《青岛日报》，1974年4月17日。这算是付出沉重代价后的一点补偿。

促使女知青走上这条道路的另一个原因是″血统论″的压力。最早一批与农民结婚的女青年，很多是对前途丧失信心的所谓″黑五类″(地、富、反、坏、右分子)和″走资派″的子女。不少知识青年因家庭出身问题受到百般歧

视。"出身不由己，配偶可选择"，在广阔天地里，他们毅然选择贫农子女为配偶，以期改换门庭文质：《和农民结婚的知青们》，《传记文学》，1991年1期……

"文革"十年间，封建的"血统论"不仅在城市中跋扈恣肆，同样扫荡于乡间。农村物质生活的贫困、文化教育的落后，社会环境的闭塞，以及千百年小农经济基础酿造出的等级意识和狭隘、愚黯的社会心理，都为"血统论"的飞扬提供了适宜的条件。"文化大革命"初，在湖南道县、北京平谷县农村发生的对"五类分子"的大屠杀，殃及子孙，乃至襁褓中的婴孩，便是这种劣根性发作时最令人触目惊心的一幕。在几十年里，农村的阶级成分始终具有世袭的性质：贫农的子女就是贫农，地富的子女就是地富，清浊分明，不容混淆。与此同时，农村又是一个父权观念牢不可破的社会，社会关系一向依男性血胤扩展延伸，并为判断每个人出身的高低贵贱提供了基本的依据。在家庭成分依男性家长而定的传统面前，没有哪个贫农家女儿会傻到嫁给地富家的儿子，因为这会玷污自己的清白，甚至沦为政治上的贱民，但地富家的女儿却可攀援贫下中农的儿子，这种结合通常不会有损后者的良好成分，却能使前者的社会地位大为改观。无论如何，她的子女将继承丈夫的好成分，她的出身耻辱也会因此而淡化。明乎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家庭出身有"污点"的女知青在选调无望的情况下要与农民结婚，并且无一例外地要选择贫下中农家庭的青年了。

一些地方蔓延的对下乡女青年进行诱婚、逼婚的风气，也促使她们沦为畸形婚姻的俘虏。"文革"中的上山下乡运动，是在"接受再教育"的口号下大张旗鼓进行的。"接受再教育"，就应该与贫下中农"相结合"，也就是要和农民结婚，一些农村基层干部和青年就是这样发挥他们的理解力的。丘引《圣妓》(下放知青的感情悲剧)一文中回忆：1968年9月10日，北京某中学30个18岁的女学生在内蒙古乌兰察布盟一个村子落户。4个月后，旗委书记参加一个女知青与当地农民的婚礼时，热情地宣布：知青与农民结合，表明了知青听毛主席的话，扎根农村的决心，旗委支持这一新生事物。半年后，这30个北京姑娘中有10人嫁给了农民。

有些偏远地区的农村基层干部，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也有他们实用主义的解释。内蒙古哲盟("文革"中划归吉林省)科左中旗西伯花公社的大队干部，当得知北京知青来到时便兴高采烈地奔走相告说："毛主席给我们送大姑娘来了，知道我们这个地方缺姑娘的苦处，没有毛主席送来的大姑娘，我们就结不了婚。"说着说着就喊起"毛主席万岁"来了。像这样愚昧无知的干部当然是极少数，与此相比，对女知青进行逼婚的问题要严重得多，普遍得多。哲盟巨流河公社兴隆地大队集体户的9名北京女知青，在队长的诱逼下，两年时间就有8名结婚出户。奈曼旗东明大队某女知青因拒婚被逼得没饭吃，一度跑回家去，归队后照样不给口粮，最后只好与人同居。开鲁县大榆树公社某大队党支部书记利用职权诱逼了3名女知青在当地结婚，其中一个给自己做了儿媳妇。以上事件是1971年北京市革委会下乡知识青年工作学习团走访哲盟北京下乡知青点时了解到的吉林省知青办：《关于北京市委来我省检查北京知青》……在全国同类事件中无异于九牛二毛。上山下乡运动初期，大批知青下到农村社队后没有房住，只好分散插住到农户家中，也助长了诱婚、逼婚的现象。1970年5月12日中发26号文件及1973年中发30号文件这两个有关知

青政策的纲领性文件中均强调了严禁对女青年诱婚、逼婚，恰恰说明这种现象屡禁不止，且带有普遍性。

农村青年通常认为娶知青是很合算的。"文革"时期的广大乡村，传统的婚姻习俗照旧流行，男方娶妻要付出一大笔彩礼，还要举办婚礼筵席。陕北农民娶妻少说要花千八百元，二三百斤粮食；山西一些地方娶妻用斤称，身体越重彩礼越多，双眼皮的体重一斤合20元，一个媳妇的彩礼(实即买卖婚姻的身价)需一两千元，这对日工值仅几角几分的农民来说，不啻是个天文数字。娶女知青则无须付彩礼《青岛日报》，1974年3月17日；《浙江日报》，1974年5月6日；《辽宁日报》，1974年11月10日……不仅节省了一大笔开支，还可因娶到城市的姑娘而炫耀乡里，难怪会被乡邻们视作"好福气"《回首黄土地》，沈阳出版社1992年版，第66页

对于女知青嫁农民这种现象应如何估价？这究竟是历史的进步还是倒退？答案一目了然，本来无须多费笔墨，但是有鉴于直到今天仍有人为其大唱赞歌杜鸿林着：《风潮荡落（1955-1979）——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史》（海天出版社1993年版）指出："诸如白启娴这样的婚姻选择其社会价值是应予肯定的。""这少数人是知青大军中的勇敢者。"并反问说："当今，又有多少城市知识青年敢于同贫困落后地区的农民结婚，在那儿成家立业呢?"(第199页)作者在列举了若干与农民结婚并一直生活美满的例子后又指出："这样的美好婚姻多不胜收，不管时代怎样变幻，都应将赞歌献给她(他)"，因为她(他)们在缩小工农差别、城乡差别方面做出了贡献(第210页)。，在这里做一个简短的评论就显得必要了。

笔者认为，女知青嫁农民，作为"文革"的特殊背景和上山下乡运动具体场合下出现的畸形婚姻，从整体来看，无疑是不值得肯定的。

首先，这种婚姻始终笼罩在"左"的理论之下。女知青嫁农民曾被吹嘘为是"与传统观念彻底决裂"、"扎根农村干革命"、"缩小三大差别"、甚至与邓小平的所谓"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对着干"的具体行动。事实上，在成千上万白启娴们的婚姻中，得到阐扬的是极左理论的教条，酿成的却往往是女知青终生的懊悔。

其次，这种婚姻的缔结多数缺乏感情基础，或者是为了实现某个政治目的，或者是迫于外界的某种压力，因坎坷经历或特殊背景，女知青与农民逐渐产生恋情并结婚的只是少数。婚姻双方在文化水平、生活习惯、价值观念、家庭背景、兴趣爱好、社会经历等方面的差距却是很明显的。那么，主要是一种什么动机促使女知青超越这重重障碍的呢?人们不会忘记80年代中叶闻名全国的"遇罗锦离婚案"。无论遇罗锦后来的行为怎样，她的婚姻悲剧毕竟是一个历史的影子。她在谈到嫁给第一个丈夫(是位农民)的动机时说：虽然自己是"右派"的女儿，"现行反革命"(指遇罗克，《出身论》的作者，1968年被杀害，"文革"后平反)的妹妹，可还得活着。活下去毕竟是人生的第一欲望。同遇罗锦一样，许多女知青做出这种婚姻选择时，实际上只是为了"活着"，为了在困难环境下继续生存下去。在这种动机驱使下，得到的只能是婚姻的躯壳，失去的却是它的真谛。

在人类社会里，婚姻从不仅仅是涉及男女双方的私事，而是一种社会性行为，因此，始终要受到特定时代和具

体社会条件的制约。在封建专制主义的淫威下，弱肉强食的法则横行，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常遭风雨摧凌的厄运，这种摧凌，与对个性的压抑，对人权的践踏是相辅而相成的。青年人的婚姻自由被不可抗的外力压缩到很小的程度。

恩格斯说过，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人们的恋爱在许多情况下受到了限制。婚姻成了买卖或金钱的交易。女子不能自主地寻觅知音。她们经常不得不压抑自己爱的激情。所以，解放人的爱就成了革命的事业。他在指出这种历史前景时写道：

因此，结婚的充分自由，只有在消灭了资本主义生产和它所造成的财产关系，从而把今日对选择配偶还有巨大影响的一切派生的经济考虑消除之后，才能普遍实现。到那时候，除了相互的爱慕以外，就再也不会有别的动机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95页。

在这里，恩格斯正确指出了婚姻自由与社会发展间千丝万缕的联系，指出了理想的婚姻就是除了男女双方的情爱外不应再掺杂有其他动机，而实现这一理想的基本前提则是人们在社会关系上的平等。他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又曾精辟指出："只有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才是合乎道德的。"人们不禁要问：在女知青与农民的婚姻中，以爱情为基础的究竟有多少？当女知青在各种非感情因素的作用下做出抉择时，是否合乎道德?显然，毫无爱情的婚姻终究是不道德的，只是造成这种不道德的责任不应简单归咎于知青或者他们的农民配偶。这种反常现象毕竟是"文化大革命"特殊背景下的产物。

70年代末，面临知青"返城风"的勐烈冲击，这类婚姻鲜有完好如初者，多数以破裂告终，正应了"覆巢之下安有完卵"的古话。

一旦知青在农村安家落户，各种新的困难便接踵而至。有些困难是他们所共有的，有些则因人而异。

首当其冲的问题，在农村结婚的青年经常受到来自各方面的歧视。不少农村干部把插队知青看成是生产队的"包袱"，当知青在农村结婚成家后，往往顺势将他们划出"知识青年"的圈外。有的农村干部认为，招工去不了、升学没人要、过筛子剩下一些没出息的人，才在农村结婚。"没出息"、"傻瓜"是习见的说法。由于城乡之间、工农之间无所不在的巨大差别，由于千百年来"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一类观念深入人心，很多农民对自己的处境产生自怨自艾的心理，进而对那些落入到他们群体中的知识青年也轻视、看不起，甚至认为这些人是："把根子扎到石头缝里了"吉林省知青办：《关于已婚知识青年问题的调查报告》……在人多地少的农村，知青的"扎根"使村民的户籍上永久地增添了额外人口，更不是一件受欢迎的事情。

与农民结婚的知青还受到特殊的压力。几乎所有的父母对子女违背自己的意愿在农村"扎根"都不会淡然处之，断绝经济资助，以中断家庭关系相要挟，将子女长期扣留在家中，是常见的压力手段《青岛日报》，1974年3月17日；《沈阳日报》，1974年3月19日；《吉林日报》，1974年12月21日；《解放日报》，1975年1月27日……已婚青年回城探亲，有时也遭到来自亲友、邻居、老同学们的冷嘲热讽，甚至连他们的孩子也受到歧视。在各种有形无形的压力下，许多已婚青年觉得"低人一等"。

虽然报纸上关于已婚知青在农村"大有作为"的报道连篇累牍，实际状况却大谬不然。辽宁省海城县到1974年已接受了48万知青，其中有些人在农村安了家，-位已婚知青曾给县委反映说：队里干部把已婚青年不再当下乡知识青年看待，青年点的理论学习、政治活动等都不叫参加，生产和生活上也不大过问了；有的队干部认为，下乡知青结婚以后，人离开了青年点，就不用管了《人民日报》，1974年11月23日……长春市郊区的7个社(或镇)、40个大队中，除1个社(镇)、6个大队对已婚知青做了一些工作外，其余6个社(镇)、34个大队，基本上处于"不管"状态。1976年调查时发现：在559名已婚青年中，竟有310人不参加学习；在117名团员中，有12名脱团；结婚前有35人被选进领导班子，婚后留在班子里的只剩26人吉林省知青办：《关于已婚知识青年问题的调查报告》……已婚知青工作处在基本上无人过问的状态。

然而，若与生活中遇到的各种难题相比，已婚知青在政治上受到歧视，待遇上受到冷落就显得无足轻重了。对于已婚知青的疾苦，一些地方的基层领导往往听之任之，使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虽然中央的知青主管部门一再要求各地抓紧知青住房尤其是已婚知青住房的建设，成果却很难令人满意。据1976年底的统计，在全国插队知青中，没有建房的有95万人。已婚青年住房困难更大。江苏、安徽、四川、吉林四省调查表明，已婚的22万知识青年里，没有建房的达10万人之多省、市、自治区知青办负责人座谈会《简报》(1)1977年12月21日……

在已婚知青中，由于婚姻类型不同，住房困难程度也有轻重缓急，大体分为三种情况：第一种，知识青年与知识青年结婚的，双方无积蓄，住房困难最大；第二种，男知青与当地女青年结婚的，困难要比上者小一些；第三种，女知青与当地男青年结婚的，住房困难通常更小，但有些与女知青结婚的农村青年，是弟兄多、找对象困难的户，婚后一分家往往没有房子住。

1978年5月河北省保定地区知青办上报的《已婚知青住房情况》(数字截止于1977年底)，为了解上山下乡运动以来农村插队已婚知青住房紧张的程度提供了有益的参考。报告称：全区已婚知青共计2685人，2501户(按双知青结婚的为一户，与农民、职工等人员结婚的为一户计算)，住房4663间。其中：

自建房499户1215间知青点建房5户12间知青旧房137户227间租房57户96间借房1165户1164间祖业房638户1399间上述资料表明，该地区1222户(占总数的489％)借房、租房的已婚知青都属于无房户。按照该地区知青办估计，要达到国家规定的标准尚需建房的有1888户4828间，包括新建房1351户3622间，扩建323户503间，改建

房197户590间。为此除动用现存建房费946万元，尚差89万元。各地情况大同小异。

国家财政显然没有能力完全负担为知青建房的庞大开支。为此各地根据实际情况，分别采取了一些对策。吉林省制定了"依靠个人积累、家庭资助、社队扶持、国家给予适当补助"的原则。就是说，解决已婚知识青年住房问题，首先要靠知识青年本人积蓄和家庭资助，国家不能采取全包下来的办法。对于个人有积蓄或家庭有资助能力的，社队出人力、运力予以扶持；对于个人无积蓄、家庭也无资助能力的，除社队扶持外，国家补助建房基本材料费(木材款)吉林省知青办：《关于解决下乡知识青年结婚住房困难问题的报告》……

辽宁省海城县《热情关怀已婚下乡知识青年的成长》的经验指出：已婚下乡知识青年，特别是男女双方都是知识青年，生活上最迫切要解决的是住房问题。该经验主张采取两个办法：1将已经空闲的青年点房子腾出，优先分配给已婚知识青年居住；2根据"自筹、群帮、公助"的原则，有计划地组织已婚下乡知识青年建房。尔后，各地又陆续推出一些内容大同小异的经验《安徽日报》，1977年6月16日；《新华日报》，1975年8月30日……

问题的关键，还是"群帮、公助"的原则难以落实。所谓"群帮"，即要求知青所在大队、生产队无偿地提供人力、物力、运力，属于"平调"、"摊派"性质，农民们对此态度消极是合乎情理的。普普通通的已婚知青，没有"知青样板"一类的招牌，若想得到"公助"，由县知青部门提供建房资助，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决定这种资助的，有时并不是申请者困难的程度，而是与有关部门干部私交的深浅，人情的厚薄。因此，真正落到实处的通常只有"自筹"。"自筹"的来源有两个，一个是知青自己的多年积累，一个是父母的资助。但各地已婚知青生活上多数不能自理拿素称富庶的"天府之国"四川省来说，1978年已婚知青达47万余人，生活普遍困难，约337万余人接受困难补助。参见四川省知青办《情况反映》1978年第25期，转引自《光荣与梦想——中国知青二十五年史》，成都出版社1992年版，第363页。，再指望他们"自筹"盖房资金又谈何容易?其结果，所谓"自筹"不过是被迫东挪西借、剜肉补疮，成为经济上的沉重负担。

吉林省知青部门《关于已婚知识青年问题的调查报告》称，长春市郊五社两镇490多户已婚知青中，由于盖房、买房等原因，有231户欠债。欠债总额5万余元，最多的一户达1千余元。一份关于黑龙江省嗯兰县解决已婚下乡青年困难的简报提到：该县已婚知青多因盖房欠债。长岭公社已婚知青14人，共欠债5千余元，少者欠150元，多者达2千余元黑龙江省知青办：《上山下乡简报》1979年1期……以上只是类似反映中比较典型的两个例子。因建房、修房举债的，以双知青户为多。他们既乏知青集体户的支持，又因没有当地亲族关系的维系，得不到农民的热情帮助。他们虽然经过农村劳动锻炼，但与农村青年比，无论在体力、农活技术上都不免逊色。在经营家庭副业、自留地、菜园等方面，更不能与后者相提并论。所以，在生活中用度有裕者少，入不敷出者多。

在已婚青年中，女性占大多数，一般而言，她们付出的代价最沉重，命运也最值得同情。为了塑造这一类女青年光彩夺目的形象，宣传喉舌在不同的年代树立过邢燕子、侯隽、张国清、白启娴等等女知青的典范。但这类样板

的宣传意义远远大于实际的社会意义，关于她们结婚后如何如何有"作为"的报道，与其说是数十万已婚女知青生活的缩影，毋宁说是对后者普遍的"无所作为"的一种嘲弄。对于成千上万普通女知青而言，在农村结婚，并不会成为一条可资炫耀的政治资本，不过是彻头彻尾农民化的开始。在农村青年眼里，娶女知青除了不必付出大笔彩礼外，与当地人的婚姻并没有大的差别。婚后的女知青"入乡随俗"，通常不会在家庭里享受到优于农妇的"特权"。承担家务、孝敬公婆、服侍男人、生儿育女，是她们天经地义的义务参见白描：《苍凉青春》，工人出版社1988年版，书中如实记述了五名与农民结婚的北京女知青的经历……此外，还要种自留地，养猪、喂鸡，从事家庭副业，"起早贪黑地干"《人民日报》，1975年12月23日……这种处境曾令大多数未婚知青望而生畏，也是他们矢志不在农村"扎根"的原因所在。1973年，一位平日表现积极的先进女知青在谈到"扎根"问题时就开诚布公地说：

在农村结婚，抱孩子，围锅台，有啥意思，贡献太小了。去年走了一个女生去结婚，生了一个孩子，啥劳动也不能干，家庭还不和……我们也生她的气，恨她太窝囊了，谁叫她去结婚的。一想到这些，有些女生就闷着，也有的顶烦；一天天过去，咋办?再过几年，不扎根也得扎根，反正就那样"混"吧。说真的，扎根问题，很多人都没有解决。国务院知青办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学习调查组：《一个下乡女青年谈扎根思想》，1973年5月。

这位女知青的想法是很有代表性的。她们不愿在农村结婚，终生去扮演农妇的角色，然而她们的力量毕竟太单弱了，似乎无力改变这种命运，只能无可奈何地眼瞅着那个日子一天天临近。

为了打消这些青年的顾虑，着名知青典型侯隽写过一篇文章《坚持乡村就是胜利——和下乡女知青谈谈扎根农村的问题》，发表在1974年4月17日《吉林日报》上。她在文章中大发宏论称：

在社会主义的历史条件下，还存在着"三大差别"，这差别，要靠我们去缩小，要靠我们去消灭。要都想离开农村，共产主义咋实现呢?说因为不愿当一名农村家庭妇女，而不愿在农村干一辈子，其根源不在于不愿当农村家庭妇女，而根本问题是有没有在农村扎根一辈子的思想，有没有彻底决裂旧观念、坚决走与工农相结合道路的决心。

按照她的夸夸其谈，每一位女知识青年都应该心甘情愿地成为"农村家庭妇女"，因为这是"彻底决裂旧观念"的具体表现，缩小"三大差别"的实际行动，而且关系到共产主义能否实现的大目标。事实上，单凭这种将婚姻政治化的说教是无法掩饰问题的真相的，因此也就无助于打消女知青们的疑虑。农村妇女与城市妇女在家庭生活乃至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的显着差距，是城乡差别、工农差别的一个侧面。它深深植根于现实社会中不同的经济、文化基础上。这种差别，只有在大力发展农村的经济建设、文化建设，变革其落后社会关系和陈旧传统观念的过程中，才可能逐步弥合，而绝不是借着一些力量单弱的城市女子与青年农民的结合所能缩小的。大量事实证明：女知青成为农村家庭妇女后，不但没有在改变当地落后面貌方面有所作为，反而为"大有作为"之类的宣传付出了青春和爱情的沉重代价。

70年代末，面临知青"返城风"的勐烈冲击，这类婚姻鲜有完好如初者，多数以破裂告终，正应了"覆巢之下安

有完卵"的古话。

作者：刘小萌

本文原载于《中国知青史·初澜/大潮》

当代中国出版社2009年1月出版 转自：老知青家园

华夏知青网不是赢利性的网站，所刊载作品只作网友交流之用
引用时请注明作者和出处，有版权问题请与版主联系
华夏知青网：http://www.hxzq.net/
华夏知青网络工作室

草原上的阅读与启蒙——追忆与补记

【作者授权田小野微信公众号“熊窝”发表】

2017年北京的初冬，几位年过古稀的内蒙草原知青在一家餐馆小聚，商谈当年草原生活的追忆和史料整理。说起来是50年前的事了，但似觉得不是“物是人非”而是“人是物非”。因为不论发生了多少变化，每个人心中都存着那段时光的记忆。

十年文革是中国现代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我们未能逃脱这场灾难，但有幸于68年后远离政治中心，在内蒙牧区茫茫草原上和淳朴的牧民一起生活。对于我们这些从小在大城市长大的知青，生活是艰苦的，但是真实的。生活在常态中，思想也突然失去惯性，坚定的信念和执著的追求如浮云般渐渐散去，滋生起来的是疑惑和对疑惑的求解。新的认知发生于对从未质疑过的“公理”的质疑。我当年看了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朵夫》，书中有一句话使我“顿悟”：“人的一生从幼儿时代就被灌输了各种谎言，成长后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呕吐，把那些谎言统统呕吐出来”。当然，呕吐没那么简单、痛快，每次“顿悟”后又会陷入新的迷茫，这是一个痛苦、漫长的过程，与旧我断裂、新我诞生的生死之变，走出黑暗的启蒙之旅。

启蒙发端于黑暗压抑中幻想的破灭，起步于阅读，贯穿于诘问、思考和交流。在草原上我曾给朋友写过两封信，信中真实地记录了这一过程的片断。第一封是1968年刚到草原，和“插友”彻夜讨论读书，涉及思想、哲学、历史、文学诸多领域，虽然都不太着调，但每个人都充满了对知识的渴望。我把这个讨论写成书信传递给北京的同学、朋友和家人，引起了极大的反响。第二封信是我1972年离开草原后写给仍在草原上的李三友，信中讲述了我的觉醒，对毛神化的破除，我在信中说：“毛的思想体系，我要以《实践论》为起点重新审视”。第一封信未能保存下来，第二封信是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中为了生存烧掉了。50年后的今天，可以回忆起当年觉醒的状态，但语言和文字再也找不回来了。

回到当年的阅读，其实能找到的书不多。记得去草原前到董志雄同学家，他父亲是翻译《战争与和平》的大文学家董秋斯，当时已过世，想借几本书。志雄说我父亲读过的书多有眉批，我们家规定不外借，不过我们是老同学，只要保证还，可以借。我们看了董老的书屋，翻了几本，书上确有他读书时留下的眉批，在大师手稿面前，我

们都失去了勇气，一本也不敢借。前面提到《约翰·克里斯朵夫》，那本书是我找李立群阿姨借的，李阿姨是高岗的夫人，当时在北图工作，北图一般只能去阅读，不外借。李阿姨和父母熟，常到我家，我就斗胆要她帮我借出来，她一开始拒绝，后来可能被我感动了，就答应下来。我在草原看完后，回北京时就还给了她。阅读中能理解的也很有限，但出于对知识和人文精神的饥渴，读的很投入，也不乏启迪和获取对现实的批判力。

我们这一代的成长过程是从美好的理想主义，一步步走入宗教式意识形态的封闭世界，走出乌托邦或解构乌托邦其实是一个回归常识和普世价值的过程，常识为普世价值提供了经验的来源并赋予它正当性。这里说的常识不是自然科学的范畴，是社会学范畴，即社会普遍认同的价值判断和行为准则。我们长期被灌输的意识形态则以阶级属性重新定义真、善、美，以替代常识。

当时想的问题是我们所处的现实是不是马克思理论构建的产物？记得刘进、大平建议读马恩经典，探究老祖宗的思想真谛，检验和回答现实中的困惑和质疑。后来军代表说为什么不读毛选，而要读马的书，试图阻止我们的探索，但我们还是断断续续地读了一些马恩经典。接下来的问题是是否有和马克思主义不同的历史观或社会学范式，在去草原前和在内蒙读过《托洛斯基传》，讲述了他的“不断革命论”及对斯大林的批判；德热拉斯的《新阶级》，论述了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异化、变质的某种必然性；罗斯托的《工业成长的阶段——非共产党人宣言》，他同马克思一样，也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互作用为方法论，但得出与马不同的划分社会形态的标准，在他的体系中，以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制度仍处于工业化未完成的阶段，而西方国家已进入高消费的社会阶段，两者对民众的福利和自由有较大差距。后来才知道与马并列的社会学范式是马克思·韦伯提出的。相关的书籍还有一些，书名和作者记不住了，比如有一本是美国驻苏记者写的，提出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并未真正废除私有制，只是从占用变为控制，揭示了这种制度的深层问题。

长期的阶级斗争教育，掩盖和压抑了对人性、对人文精神的认识，这个认识的重新发现首先是通过文学精典的阅读开始的。屠格涅夫的《父与子》描述了变动社会中两代人深厚情感和不同道路选择的交织与碰撞，我由此想到我和父辈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勃朗特的《简爱》写出了爱情的力量，这是我从未想到过的，使我震撼。契科夫书中小人物在权力面前的尴尬，托尔斯泰和雨果书中大时代中人的命运，苏联解冻文学对黑暗的揭示都直抵人性的善恶。

还读了一些现代文学作品，如《带星星的火车票》（瓦西里·阿克肖诺夫），我们习惯了俄罗斯作家为代表的现实主义作品的叙事方式，而这些现代文学作品完全是另一种语言风格和叙事结构，读下来焕然一新。这表明范式，包括其它领域，不是唯一的、一成不变的，是不同时代的特征。

找到文学精典的根和主脉，如荷马、但丁、歌德和莎士比亚及加缪等的后现代作品，是后来的事了。

在草原上又重读了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多是在放羊时，席地坐在阳光下的草地上读的，旁边是静静的

羊群，和书中的情景有感应，读的很细。放下书，想的问题是葛利高利这个英雄人物是为谁而战？他的人生目标是什么？我们经历过的红卫兵时代是不是也要回答这个问题呢？

这只是当年草原生活中一点零碎的阅读回忆和补记，它为我以后的人生道路选择，最终走出乌托邦埋下了种子。

毛姆说大部分文学作品给读者带来的是感性层面的愉悦，人生意义的启迪是潜移默化的。为了得到真谛而去读，其实很功利，会失去对美的感觉。草原上的阅读是非常时代的现象。可悲的是这个时代太漫长了。希望我们的子孙能在一个正常社会环境中回归阅读的常态，从中感受愉悦。

熊窝文集：http://www.hxzq.net/showcorpus.asp?id=258

华夏知青网不是赢利性的网站，所刊载作品只作网友交流之用
引用时请注明作者和出处，有版权问题请与版主联系
华夏知青网：http://www.hxzq.net/
华夏知青网络工作室

北大光华周黎安教授最新论文被顶级期刊AER正式接受

原创 周黎安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

?近日，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应用经济学系教授周黎安与合作者所着论文Arrival of Young Talent: The Send-Down Movement and Rural Education in China被American Economic Review（《美国经济评论》）正式接受。论文基于大量的微观数据实证考察了中国“上山下乡”运动期间知识青年对农村儿童受教育程度的影响，通过研究知青对农村教育状况的改变，探寻中国农村人力资本的大规模积累及其对后续经济增长的长期影响。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于1911年由美国经济学会创刊发行，被誉为美国最重要、影响最大的经济理论期刊，也是世界公认的最具有学术声望的顶级期刊之一。

周黎安教授在学术领域建树颇丰，他在国内外一流经济学和管理学期刊发表论文已达60余篇，曾经获得中国高校人文社科学者单篇论文引用率排名第一的称号。“因学术，而思想，因思想，而光华”，周黎安教授此次的论文发表，也是光华管理学院一直坚持以通行的学术规范和科学理性的研究方法，做具有国际水准的中国学问的一个缩影。

01

研究概述：

关注知青对农村儿童受教育程度的影响

从1968年开始，至七十年代末，大约有一千六百万城市知识青年响应国家号召到农村插队，这就是着名的“上山下乡”运动。知识青年到了全国各地的农村，大部分是偏僻落后地区，主要是参与农业劳动，接受思想的锻炼和再教育，但也有相当一部分知青因为知识的比较优势而“意外地”做了民办老师，给当时接近2.5亿的农村小孩带来了潜在的教育机会。区别于已有文献侧重考察“上山下乡”运动对知青自身的影响，周黎安教授的合作论文试图估算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城市青年对接受地农村教育状况的影响。

从实证分析的策略上看，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提供了一个理想的估计因果效应的准自然实验。首先，知识青

年上山下乡是由中央政府发动，个人无法选择目的地，因而具有相当的外生性；其次，那段时期户籍制度比较严格，人口跨地区自由流动非常困难，因此不存在农村教育适龄人口内生地选择接受教育的地区；最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是短期的，知青从七十年代末期开始陆续离开，为估计知青的“教育溢出”提供了一个明确的时间窗口。

周黎安教授及其合作者从超过3000本县志收集了知青接受数据，同时结合多轮人口普查数据，在此基础上进行了细致严谨的实证分析。实证结果显示，知青的到来显着提升了农村儿童受教育年限，尤其提升了初中入学率。该效应在女孩和欠发达地区更强，这表明知青的到来不仅提高农村整体的教育水平，而且还有助于降低教育的不平等水平。当知青大规模“返城”之后，上述效应就迅速下降，但从未消失，这说明“知青效应”具有一定的持续性。论文还进一步发现，受到知青教育影响的农村小孩在未来更可能上高中，结婚年龄更晚，生育小孩的数量更少，也更可能从事技能密集型的职业。这些证据说明，知青带给农村的不仅仅是人力资本的“数量”，也包括“质量”的提升。

周黎安教授的合作论文不仅第一次系统估计了中国“上山下乡”运动——也是人类历史上罕见的一次人力资本的空间流动——对广大农村教育普及的影响，而且也有助于理解其长期的经济社会影响。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乡镇企业“异军突起”，2001年“入世”之后中国成为“世界工厂”，这背后的一个关键性因素是来自农村且具有中等技能的劳动力，而他们当中大部分受惠于知青的“教育溢出”。

02

思想光华：

用顶尖学者的科学思维向世界讲述中国故事

周黎安教授多年来致力于政治经济学、产业组织、经济转型与发展等领域的研究。他在国内外一流经济学和管理学期刊发表论文60余篇，在官员晋升激励与行为、政府治理等方面进行了开创性研究，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了广泛影响。中国高校人文社科学者TOP600被引论文排行榜（2006-2018）中，他位列首位。

用顶尖学者的科学思维，基于科学的研究范式和方法，向世界讲述中国故事，这是周黎安教授一直践行的，也是光华管理学院学者们的学术坚持。

光华在35年的发展过程中，已形成了“以学术为本”的价值取向。近些年来，在国际、国内顶级期刊上发表的论文，从量到质均位居亚洲学府前列。在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American Economic Review、Journal of Finance、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Management Science、Marketing Science等国际最顶级的学术期刊上，光华学者的名字频频出现，影响比肩国际一流商学院；在国内两大顶级经济学期刊《经济研究》、《管理世

界》上的发表数量与质量，光华也保持领先地位。

而好的学术，好的研究，好的理论，不仅仅表现在顶级学术期刊上发表的论文数量和质量，更反映在扎根中国、研究真问题的“有用性”上。

周黎安教授的研究也十分注重服务社会需求。比如，“光华思想力”课题组承接的国家发改委关于“十四五”规划前期研究课题之一《完善要素市场化配置的实施路径和重大举措》，就由周黎安教授牵头撰写。课题组系统梳理和分析劳动力、土地、资本、技术、数据五个要素的市场化配置机制的实施路径和重大改革举措，引起国家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

“除了理论层面的研究，今后我还会做更多的实践调研，以学者的视角讲好中国故事。这样一来更能丰富理论价值，也更具实践指导意义，体现光华思想力。”周黎安教授表示，他也期待更多的年轻学者加入到用科学理性的方法研究中国问题的队伍中来。

周黎安，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应用经济学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本科/研究生项目主任，北京大学工商管理研究所所长，北京大学“十佳教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他于北京大学获得经济学学士、硕士学位，于斯坦福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研究领域主要涉及政治经济学、产业组织、经济转型与发展。在国内外一流经济学和管理学期刊发表论文60余篇，2017年出版专着《转型中的地方政府：官员激励与治理（第二版）》。在官员晋升激励与行为、政府治理等方面进行了开创性研究，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了广泛影响。

华夏知青网不是赢利性的网站，所刊载作品只作网友交流之用
引用时请注明作者和出处，有版权问题请与版主联系
华夏知青网：http://www.hxzq.net/
华夏知青网络工作室

一个延安地区县委书记对知青的回忆

来源： 新浪博客　　作者：郑闽江

北京知青为延安地区的建设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近三万北京知青到延安插队，使延安文化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北京知青带来了不同于当地的言论，思想，做法，像一股强劲的春风，把中国首善之地北京的文化思想，风俗习惯迅速传播到陕北的每一块土地。

雷增寿是1972年12月从陕西省委组织部调到陕北延川县委的。当时的省委书记李瑞山说，陕北基层缺干部。于是，在富裕的关中地区生活和成长，在省城西安工作的雷增寿就服从组织的需要到延川县委担任副书记。那时的延川县很小很穷，五分钟就从城东走到城西，窑洞顶上的大片荒草在寒风中摇曳，全县只有一个显得很寒酸的小饭店，没有大城市常见的公共汽车，县委只有一辆小车。五个县常委兼职各种工作，雷增寿是省委派下来的专职副书记。

当时的县委书记是申昜，与申昜搭班子让雷增寿学到了许多东西。他十分好学，18岁入党，大荔师范提前毕业进入大荔县委组织部工作，60年调到县委研究室，跟着县委书记下乡调研，写了一本有价值的调查报告，被调入省委组织部，有了更大的锻炼平台。他为省委许多重要的会议写简报，代表省委到基层做调研，20多岁的雷增寿能吃苦也能干，经过多年的努力，他熟悉了机关工作和党委工作，能在基层扎下去与群众同甘共苦，受到了群众的拥护。由于熟悉情况，他的写的材料内容翔实，观点鲜明，论据充分，实事求是，得到当时省委组织部副部长习仲凯的赞赏，将其材料常常通报全省。派这样一个成熟的干部到延川，会用一股子拼命精神和踏实的作风完成各项任务的。

县委副书记分管行政，知青和妇联工作。那时到延川插队的北京知青已经经过了3年多的锻炼，在老书记申昜的领导之下，他们不仅习惯了在延川的生活，还出现了一批出类拔萃的先进人物。申昜是工农干部，朴实，踏实，深入群众，平易近人。他特别关心这一批从北京到延川插队的知识青年，他理解北京知青，支持他们对当地的建设各种想法。老书记常说，这批孩子远离父母，从优越的首都北京到条件艰苦的陕北插队，肯定会有许多困难和矛盾，我们要多了解他们，多倾听他们内心的想法，支持他们的正确做法，让他们在艰苦的环境中健康地成长。

一. 县委支持下的赤脚医生先进典型

申易书记领导下的延川县知青工作抓的有声有色，那里出现了一批有代表性的北京知青，孙立哲是全省最著名的北京知青，丁爱笛是第二号人物。雷增寿上任不久带孙立哲和丁爱笛两人参加省上召开的知青会议，两人都做了发言。从延川到西安，除了开会之外，县上还希望给这两个先进典型更多的一些支持，就问孙立哲，你还需要什么?孙立哲当时是全国著名的赤脚医生，通过自学已经掌握了四门外语，他在农村一边行医，一边继续自学。孙立哲说，他希望得到一些医学专业的外文书籍。于是，雷增寿就让他自己在西安南大街的外文书店选择了他所需要的专业外语书籍，县政府知青办为这600多元的书籍付了款。这事一笔巨大的开支，当时县委副书记只有行政22级，每月工资58元，而孙立哲一次购买的专业书相当于县委副书记10个多月的工资，但是为了孙立哲的成长，知青办给予了应有的支持。

孙立哲用针灸治好了老乡的病，成了远在延川贫瘠山庄的“神医”。老乡们纷纷找孙立哲看病，他自学医学，掏钱买药给老乡治病，有求必应，使当时缺医少药的农民得到了及时的治疗。北京知青在农村做赤脚医生，想方设法解决农民看病难的问题，得到县委，县政府的支持，中央的肯定。他所在的延川县关庄公社的关家庄建立了一个远近闻名的窑洞合作医疗社，北京支援了知青办的这个农村医疗单位，当地财政帮助他们不断地完善各种医疗设备，从北京来的知青不断加入其中;很快就把关家庄合作医疗社建设得很有规模。那是一个比县医院小，比地段医院大的乡间小型医院，成为了当时农村医疗体系的模范单位，前来求医的农民翻山越岭，数不胜数。

对于这样自学成才的赤脚医生是否合乎规范，当时也有很多质疑。延川地属延安地区，延安地区是当年毛主席领导的革命圣地，党中央在此工作生活了13年，不仅培养了大量的革命干部，而且形成了一些特殊的人文景观。共产党的宗旨，共产党的传统和理念深深扎根在人民心间。只要对人民有好处，就会得到党和政府的大力支持。对待前所未有的新生事物，县委领导一贯的原则是实事求是，书记申易不断地给县委各常委介绍孙立哲的事迹，让他们了解赤脚医生的工作情况。孙立哲走遍山乡为老乡送医送药的事迹感动了县委常委，他和他的医疗组在永平公社做手术时常委们都到了场。看到孙立哲认真周到地为老乡治病，看到他的手术和治疗效果，县委常委们都心服口服。经过专家的鉴定，县委认为他的手术仅次于县医院的水平。

前排右五起是县委副书记雷增寿、全国著名的外科专家黄家驷和赤脚医生孙立哲等人在关家庄大队合作医疗站前的合影(靳之林 摄)

孙立哲的事迹轰动全国。全国著名的外科专家黄家驷也率队到关家庄合作医疗社考察孙立哲的外科手术，在手术过程中，由于电力不足，他亲自为孙立哲打手电，经过他的考察和鉴定，他认为孙立哲的手术水平已经达到外科住院医的水平。在关家庄的日子里，这位著名的外科专家不但和年仅22岁的孙立哲成了忘年交，而且邀请他参加黄家驷主编的《外科学》中担任编委。

在延川的岁月里，孙立哲用无私的精神服务于农民：看小病从来不要钱，从不外推上门求医的病人，他尽所有的力量努力救治患者的行医态度得到县委充分肯定，大力支持。对于这样自学成才的北京知青，很多医生不服气，他们毕业于正规的医学院，有严格训练过的技术，他们看不起土

窑洞里成长起来的“土医生”。县委说，他们的确技术不错，但他们只待在城市大医院里不下来，广大农民看病的问题得不到解决。山高路远，救治不及时，许多患者死在送医院的山路上。孙立哲送医送药，为老乡们竭尽全力，在偏远山区第一次建立了比较正规的医疗单位，由于这批致力于乡村医疗建设的北京知青存在，解决了农民看病的大问题。

县委对孙立哲的支持，是对北京知青为陕北农民服务的肯定，弘扬了北京知青的“以知识服务于广大农民的志向”，通过这个典型，极大地推动了全县的农村医疗事业的迅速发展，提高了知青社会服务意识的自觉性，在北京知青里形成了良好的风气。

二．陕北老乡说：“第二次中央红军到陕北”

北京知青为延安地区的建设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近三万北京知青到延安插队，使延安文化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北京知青带来了不同于当地的言论，思想，做法，像一股强劲的春风，把中国首善之地北京的文化思想，风俗习惯迅速传播到陕北的每一块土地。而作为红色圣地的延安，曾是党中央，毛泽东等老一代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群体生活战斗了13年的故乡，在这里曾产生过推动中国巨变的伟大力量，当年的每一次重要活动都给延安留下了深刻的影响。尤其是当年作为红色首都的延安有过许多外事交往和各种思想的交流，中外名人的不断造访和中共领导的一贯思想作风，这些丰富的场景极大地拓展了延安人民的视野和接受新生事物的能力。在中共中央迁都北京之后，延安一直保持着和北京有如血脉般的多种联系。对于北京知青来说，生活艰苦和劳动锻炼是必然的，但是从他们的成长来说，这个曾经的红都给了他们展翅高飞的广阔天地，诞生红色理想的故土又给了他们信心和力量，而延川县党委和政府，北京知青办是他们成长最好的阳光雨露。“延安窑洞里有马克思主义”(毛泽东)，这与北京似曾相识的政治环境，使刚到陕北的北京知青有了某种亲切和熟悉感。相比较而言，延安比西安更能接受北京知青，以及他们与生俱来的创造性和文化的新鲜感。

这个直接受到周恩来总理关怀的北京知青插队运动，被陕北老乡称为“第二次中央红军到陕北。”

三 ． 慧眼识英才

延川县党委和政府领导是党的路线教育成长起来的一批有才有德的干部，他们常年深入基层，与农民群众打成一片;他们会做陕北的各种农活，出的力抵得上农村一个壮劳力。他们随身带着粮票和钱，走到哪里干活干到哪里，吃派饭吃到哪里，粮票和钱付到哪里。这批干部有着识人的慧眼，看到北京知青身上的种种特点和优点：来自首都的学生们穿着朴素，举止大方随意，具有较高的文化修养，眼界开阔，思想大胆，敢想敢干。干部们认为，北京娃很不容易，他们远离父母，从条件优越生活富裕的首都来到穷乡僻壤的陕北，需要克服很多困难。北京知青身上洋溢着的青春，激情，理想和奋斗的精神又深深打动了县委各级领导，他们常常到知青点看望这些年轻人，帮助他们解决困难，日长月久与北京知青建立了情同父子的关系，县委领导和知青们相互尊重又相互学习。老书记申昜，副书记雷增寿，县常委高惠民等常与知青促膝谈心，交流思想。他们说我们向知青学了不少知识，也进一步了解了知青。对于知青的大胆超俗的言论和思想，他们不扣帽子，不抓辫子，充分信任他们，并给他们展示能力的机会和平台。

高中毕业的蔡玉珠性格泼辣，作风大胆，踏实肯干，曾担任过马家河公社党委书记。由于她出色的才能和突出表现，被提拔为县委常委，省妇联兼职常委。蔡玉珠以行动带动了知青尤其是女知青的工作，在天寒地冻的陕北，她赤脚下到泥地里苦干实干，她的拼命精神为大家做出了表率。虽然蔡玉珠不是当地人，但她善于做群众工作，很得群众好评。

北京知青是一个思想先进，工作刻苦努力，且有相当文化水准的群体，他们中被提拔的妇女干部多，青年干部多。对于这些青年干部，延川县委认为，北京知青想法大胆，敢于付诸行动，大大突破了当地干部的局限性。要想让延川有个大的改变，就要充分相信他们，给北京知青以实现自己理想和抱负的机会。延川县地处山区，电力极其不足。要解决用电难的问题，必须因地制宜，利用当地资源发电。经过反复寻找和比较，他们发现延川条件和四川很相似，解决山区照明做饭的电源的成功经验应该是四川。县委决定组织全县的大队书记去四川取经，谁来带队，是个问题。因为这次取经不仅是一次全县的组织活动，更是一次向四川学习，回来后在全县推广的科技活动。带队的人需要有组织能力，协调能力，还要有相当的科学知识。经过在全县的莅选，老书记申昜指名由年青的梁家河大队书记习近平担任这个县级学习团的领队，县革委会副主任(相当于副县长)李洪仁协助习近平管理县学习团的生活诸事，县委干部为知青干部的工作保驾护航，延川县又开了全国风气之先。

在文安驿公社梁家河大队12个插队的北京知青中，习近平的年龄最小，当年他带了四大箱书来到山乡。年纪小，志气可不小，每天下地劳动，锄地送粪，习近平挑起两个100多斤重的篓子，爬山上坡，走得飞快。他酷爱读书，劳动之余手不释卷，在插队时期读了大量的书籍，思考了许多问题。踏实肯干，又有文化知识的习近平于1974年1月入党，不久就担任了大队党支部书记。申昜认为学习用沼气发电，是个有科技含量的技术，当地干部的水平不如北京知青，习近平虽然年青，但干活不惜力，工作有办法，有较高的文化水平(通过自修)和实践能力，能带领全县完成学习任务。

从四川回来，习近平带领梁家河大队打了三个坝，两口大井。在陕北农村，尤其是山乡，打坝是最重要的一件事。习近平带领老乡在每个山沟里筑起一道大坝，挡住洪水，防止水土流失，也保住了庄稼。梁家河大队的沼气池是延川县的第一个沼气池，发出来的电解决了大队做饭和照明的问题。像这样的沼气池，习近平带领老乡，共建了42个。

习近平在梁家河大队呆了近7年的时间，是12个北京知青中在延川工作时间最长的一个。在这段插队生活中，习近平真正了解的社会，了解了百姓，了解了知识和实践的结合，亲身体会到人民群众改天换地的力量。后来他那些实事求是的想法都是在陕北的土地上生根发芽的。

1975年，由于优异表现和突出贡献，习近平被农民群众推荐上大学。那时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还在审查中。主管大学招生的雷增寿给习仲勋所在的洛阳拖拉机厂发政审调查函，得到的回复是“习仲勋的问题影响不影响习近平上大学，由你们定。”雷增寿认为，习仲勋是西北地区最早参加的共产党人，为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无论发生了什么事情也改变不了人民对他的感情。父亲的审查不该连累儿子，习近平的表现延川人有目共睹，他插队的表现，入党后的能力，在全县大队书记中是出类拔萃的，因为父亲的审查上不了大学，这不公平。于是，雷增寿一锤定音：“同意他上学。” 1975年8月，在当地老乡的推荐和县委的支持下，习近平带着两箱子书，离开梁家河，进入清华大学学习。

四 . 陕北文化建设的摇篮

善识人才，器重人才，提拔人才是当时延川县委和县政府的特点。这个特点的形成，雷增寿

认为这是因为毛主席在延安，党中央在延安的原因。北京知青之所以受到延安农民的欢迎，关注;为延安人民做贡献，与延安人民结下了鱼水情也和主席在延安13年有关。与关中农民相比，雷增寿认为，延安农民的思想更开放一些。当年毛主席及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非常亲民，就生活在群众中间，延安人常常在路上看见毛主席及中央领导人和老乡随意聊天，问寒问暖。雷增寿自豪地说，毛主席很熟悉延川，延川人民也很熟悉主席。当年转战陕北的时候，胡宗南的军队住在延川城里，毛主席住在延川农村，和普通军人穿一样的衣服，和和蔼可亲的工作干部一模一样。他曾住过八个地方，人民都知道，但胡宗南不会知道，毛主席在延川很安全。人民和共产党的干部很亲，有很多老乡是毛主席的私人朋友。路上遇到小车开过，农民敢拦车告状说事情，那时的延安，官民平等是渗透在骨子里的。毛主席有多少外国朋友，延安人民就见识过多少外部的世界。是毛主席和党中央提高了延安人民的政治素质和文化修养，延安人民见过大世面。

北京知青是响应毛主席号召下来的，从毛主席身边来的人，延安人民感到特别亲，对他们特别好。在延川，有许多老干部的后代，曾经的延安人的后代插队：他们其中有蒋南翔的女儿，邓小平的女儿，刘少奇的侄女，习仲勋的儿子等等，还有许多中央部级干部的孩子。

党中央在延安的13年，曾培养了很多陕北干部，形成了延安与北京的特殊人际关系。70年代北京知青在延安的插队，第二次把首都的风气带到了陕北。那些红色后代的家属到延安探亲，周恩

来总理对北京知青的关照，是北京与延安思想文化的大交流。在延川插队的还有一批国家级文化精英的后代：他们大多来自精英荟萃的海淀区，以清华大学子弟为代表。与老干部后代的共同特点是爱读书，肯钻研，作风大胆，思路开阔，与拘谨胆怯的关中学生大不相同。雷增寿说，可以预见，这些知青都是非凡的，他们在延安的作为势必极大地促进当地智力的开发，文化的开发，政治的开发，思想的开发，他们将会让未来的延安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

对这样的年轻人，雷增寿担任县委书记之后，像老书记申易一样，继续和县委的同志给他们大力的支持和扶植。当年返乡青年路遥上学的问题，是他的未婚妻北京知青林达直接向县委反映的。路遥是个初中毕业生，喜欢读书，曾有许多创作发表在县委油印的小册子《山花》上。在毛主席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影响下，延川的文艺气氛一直很浓。延川曾是著名作家杜鹏程学习和创作的地方，《保卫延安》等优秀作品就产生在这里，陕西省作协主席李若冰和夫人贺抒玉都曾生活工作在这里。所以县委始终对文学青年很关注。

北京知青林达反映的路遥，雷增寿很熟悉。路遥爱写作，曾借调到县委宣传科工作。雷增寿带他参加批林批孔大会时，路遥带了一包袱皮的书，会上会下专注读书，非常好学。雷增寿觉得他将来有可能是柳青式的人物。1974年路遥参加了大学考试，平均成绩70多分，分数远远超过了一般水平。但是由于文革中的派系斗争，使路遥在政审方面出了问题，没有大学敢收他。林达找到县

委，希望雷书记主持公道，给予帮助。雷增寿想了一想，要路遥报考延安大学。他亲自带着路遥找到延安大学中文系系主任申配畅介绍了路遥的情况，并把路遥在文革的表现向延安大学主管招生的杨主任做了说明。杨主任说，县委书记亲自来说明政审情况，没问题，这个学生我们收下了。

路遥在大学读书时刻苦用功，在创作下狠下功夫，上学期间就被省作协调用。他在宝鸡乡下体验生活，创作出有一定影响的作品《惊心动魄的一幕》，之后没有再回延大。雷增寿和路遥的关系非常好，他说这是一个人才，要放到有利于他发展的地方去，不要保守。路遥接着创作出轰动全国的作品《人生》，留在了省作协工作。为了让路遥有个安定的家庭生活，雷增寿专门找到团省委商量，将林达从延安调到了西安工作，为路遥解决了两地分居问题。林达后来上了省电大，调到西影厂文学部工作，发展得很好。

陕北的土地养育了路遥，陕北的雨露滋润了路遥。尽管路遥已经调到了省城西安的省作协工作，他还是念念不忘陕北。在创作《平凡的世界》的时候，路遥一直住在陕北，他下铜川煤矿体验生活，回到故乡构思作品。他常常躺在延川农村的大地上，仰望着无边的蓝天白云，感受着来自故土的力量，他说这里会给他无尽的创作源泉。《平凡的世界》获得了茅盾文学奖一等奖的第一名，给路遥带来了空前的名誉，也给他的健康带来了极大的损伤。生病期间，路遥一直住在陕北，住在延安，直到病重也不肯离开。直到省委向县委下了命令，说路遥不仅属于陕北，也属于陕西省，更属于全国。延安是他的家乡，但不是最好的医疗环境，对于这样一个做出了重大贡献的作家，陕西省一定要给他最好的治疗。在省委的直接关怀下，路遥从延安转院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军医大。此时，重病在身的路遥衰弱得再也不能回延川，回到生他养他的故乡，直到他病逝。

辞世的路遥又回到了母校延安大学。他永远躺在故乡的大地上，这里有他的雕像和纪念墓碑，和他永远说不完的故事。

关于北京知青的故事和那个激情岁月的年代，也永远留在了县委书记雷增寿的记忆中。

注：文中插图是近年延川人民在县河畔修建的北京知青石刻画廊之中的几幅作品。

华夏知青网不是赢利性的网站，所刊载作品只作网友交流之用
引用时请注明作者和出处，有版权问题请与版主联系
华夏知青网：http://www.hxzq.net/
华夏知青网络工作室

我的"延川老乡"——关于北京知青的回忆

来源:延川县知青协会

作者：厚夫

2011年8月初,我有幸在桥儿沟鲁艺旧址前,为正在延安干部学院学习的"全国高校主要领导延安培训班"学员们讲授了一堂《鲁艺与延安文艺的繁荣与发展》的现场教学课.这个班有两位曾在延安插过队的北京知青:一位是北京师范大学校长钟秉林教授;一位是浙江大学校长杨卫院士.钟秉林校长当年在延长县插队;而杨卫校长则在我的家乡延川县插队.在此之前,我虽一直没有见过大名鼎鼎的杨卫院士,但这毫不影响我对他的了解.我少年时代,曾在家乡的县级文艺小报《山花》上读过他的诗歌,他当年是位文艺青年.

正是基于这样的原因,我与杨卫校长的交谈在现场教学课之前就很顺畅地展开了.杨卫旁边的西安交通大学校长郑南宁院士,似乎奇怪我的普通话,他问我:"你也是北京知青?"未等我开口,杨校长就说:"他是我的延川老乡!""延川老乡?"郑校长更加疑惑了.我赶紧解释:"杨校长当年在延川插队,我是延川人,我们这就成老乡了!……"我的话把郑校长逗笑了,我和杨校长也会心地笑了.

是啊,"延川老乡"这个朴素得不能再朴素的词语,在我和杨卫心里却有更深层次的含义,包括信任和理解.而能用"延川老乡"这个词把我们这两位未曾见过面的人的情感紧紧焊接在一起的,则是那场让众多北京青年与这块土地发生联系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

一

"文革"期间,先后有二万八千名北京知青来到当时的延安地区插队,其中的大部分人是1969年2月初来到延安地区的各个县农村的.有资料记载,我的家乡延川县当时接纳了两千多名北京知青,全部来自海淀区,这其中的很大一部分还是清华大学附中的学生.这些知青里包括现任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同志,已故著名作家史铁生先生,著名作家陶正先生,浙江大学校长杨卫院士,美国某文图公司总裁孙立哲先生,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吴美华女士,著名画家邢仪女士,等等.我的老家禹居公社禹居大队梁家沟生产队,这个当时只有二十户人家的单一姓氏的小山村,呼啦一下子来了十九位北京知青,他们对这个小山村的文化影响可想而知.我现在仍能清晰地记得他们的名字:录志宏、赵红梅、李万英、任颖光……

我生于1960年代中期,北京知青来到梁家沟村时,我的年纪还小,尚不能清楚地记得他们到来时的情景,但经常听爷爷像讲"古朝"一样讲述(微博)他们的新鲜事.爷爷抽着旱烟锅,不紧不慢地说:"文革开始了,这群北京娃娃们没有事情干,天安门城楼上的毛主席他老人家发话了,这些娃娃们盛在北京城里会无事生非的,干脆送到延安农村去锻炼锻炼,给他们这些生驴驹们套个笼头,压压身子,调教他们哩……"爷爷好像稳坐朝堂的决策者一样,能把事情说得有根有据,有板有眼.最高领袖当年是否有这样的决策考虑,这一切已无从知晓了.然而,当我在中学语文课本上学到孟子言:"故天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困乏其身,行弗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时,我更加坚定了北京知青到来延安农村就是压担子的一道工序的想法.现在看来,我当年众多幼稚的想法今天终于成为现实.这批脚踩过泥土的、曾接过地气的北京知青,今天已经真正成为中国的栋梁.远的不说,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的好几位曾拥有知青生活经历.

我仍能清晰地记得爷爷当年讲"古朝"时的情景.爷爷说:"这些知青像星星一样从天上撒下来,撒到咱这些山沟里的.他们来时,用面包喂狗、饼干喂驴,把韭菜当麦苗哩!……""面包喂狗,饼干喂驴?"孩子们生怕听错了,反问一遍."是面包喂狗,饼干喂驴!"爷爷在此肯定地说."噢!……"我们发出惊讶的笑声.我们这小山村里的孩子怎也不相信这事是真的,因为我们这群孩子中的大部分甚至连面包与饼干都没见过、都分不开,而从爷爷的讲述中那应该是世界上最好吃的一种东西了.至于把韭菜当麦苗,这更让农村孩子们好笑,稍有农村生活常识的人是不会犯这种低级错误的.在孩子们惊讶与感慨之后,爷爷又说:"这些娃娃们原来什么也不会,可只用了半年功夫,锄镰老镢样样会使,成了好受苦人了!咱山沟里条件不好,这些娃娃们可受了罪了!……"我那时候怎也想不明白,北京知青到山沟里来就是受罪?那么,我们这些像土疙瘩林里刨出来的洋芋蛋蛋们,就不叫受罪?……这些幼稚的问题在当时幼小的脑际盘旋了很长时间,但又终于没有问出口.

长大后,我对北京知青的历史颇感兴趣,在阅读资料时才了解到当时的北京知青并不像爷爷所说的像天上的星星一样撒落下来的,而是辗转来到家乡的.1969年2月初,也就是农历的1969年春节前夕,这些北京知青乘着西去的列车,一路向西.到西安后,乘火车到煤城铜川;再从铜川乘汽车到延安.到延安后,地区按照指标先分到各县.到各县后,县里再次分配到各公社的各村庄.这样,北京知青像下阶梯一样,由北京到省城,由省城到县城,再由县城分配到各村,大概花费一个星期的时间.我也当面问过北京知青"面包喂狗,饼干喂驴"的事情,他们说那是个别现象,面包发霉了,就顺手扔给狗吃了,村里人就传出去了,说知青糟蹋东西哩.哈哈,原来是这么一回事情!

据资料介绍,当时延川的知青是各村队长们赶着毛驴车从县城接回村里的.我的家乡禹居大队梁家沟村,虽说在公社的所在地,属于自然条件相对较好的那种村子,但当时尚一不通公路,二不通电,人们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与北京城简直是天上与地下之别.那十九位从北京天上降落到偏僻落后的小山村的知青,首先要过"生活关"的考验.

我听母亲说,这群知青来的时候快要过年了,生产队专门配了个人给他们做饭.过年时,村里把这些知青分派到各家过年,我家也分到一人.过了年,开了春,知青们就自己起灶炉做饭了.头一年,知青们吃公家发下的粮,他们往往前半个月管饱吃,后半个月饿肚子,没有调剂观念,也不会节省着过日子.母亲说,这群知青爱看书,每天晚上都点着煤油灯看书,第二天早上出工时就爬不起来了……事实上,我能想来母亲所讲述的知青们当年的狼狈样.一群十七八岁的中学生(甚至还有更小的知青),他们在京城的家里娇生惯养,可谓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生活无虞.可就在一夜之间,他们落到延安地区的沟沟洼洼,虽说他们还满怀战天斗地的激情,但面对每天具体而繁琐的日常生活时,自然就是手足无措的.

二

陕北方言,把"干活"说成"受苦",把农村人叫做"受苦人".古代社会中,陕北人李元昊、李自成等揭竿而起的重要原因,就是不想忍受受苦的生活.但在轰轰烈烈之后,又是千百年不变的沉寂惯性.现代社会的刘志丹、谢子长等,替穷人们打天下,也为的是让穷苦人过上好日子.当上个世纪那场改朝换代的革命高潮推向北京城之后,新中国顺理成章地成立了.可是原先在革命风暴中心位置的延安农村,却在改变农民生存问题上没有得到实质性的进步.

"文革"时期的延川乃至整个陕北,受苦是农村人的基本生存方式.北京知青插队延安的初期,延安广大农村仍然是"毛驴驮水,牛耕地;煤油点灯,粗布衣",甚至连饭都吃不饱.交通不便,电力不通,所谓现代化的设施可能就是村里的有线广播,而"楼上楼下,电灯电话"仍旧是农村人遥遥无期的奢望与梦想.即使在北京知青来延安插队几年后的1973年,当时的延安地区仍很贫穷.那时,已经身患癌症的周恩来总理陪同外宾访问延安,听说延安农村有许多人吃不饱时,老人家流泪了.他说:"我这个总理没当好,延安人民生活还很苦……"他给延安地区领导提出"三年变面貌,五年粮食翻一番"的要求后,不顾病痛的身体,坚持与延安同志一一碰杯.后来,延安地区在总理的亲切关怀下,兴建起如钢厂、卷烟厂、毛纺厂、丝绸厂、造纸厂、化肥厂等一批现代化的工业企业,对改变延安面貌起了重要作用.当然,这是后话.甚至到1978年,延安地区的情况仍不容乐观.新华社记者冯森龄顶住"左"的错误的干扰,冒着风险,采写了一组《延安调查》的内参,如实反映延安地区贫困状况,引起中央的高度重视,这才有中央一系列解决陕北贫困问题的政策.我曾在2009年接受《中国财富》杂志记者采访时,表达过"延安人应该给他立座碑"的观点.当然,这更是后话.

我在这里有必要对延安农村当时严酷的生存环境作一番陈述.先说住的问题吧.当时的延安农村,居住条件差的问题尤为突出.插队到延安的北京知青,与到黑龙江、内蒙古、云南的兵团知青的最大不同,在于这两万八千名知青是撒到延安农村的,有的村子四、五人,有的村子十多人,像我的老家梁家沟属于较多的,有十九位.这些知青接触到中国最贫穷地区的真实情况,而不像兵团知青那样始终是一个相对封闭的整体,与百姓没有更深切的接触.这些知青在北京城里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而到了延安农村住的是在黄土崖上挖出的窑洞,俨然成了"山顶洞人".土窑

洞里既没有木板床,更谈不上席梦思,只有一盘小土炕,多人挤到一起,卫生条件自然无法保障.在陕北农村,人们除了每年夏天在村前小河洗上有数的几次澡之外,一年四季再也洗不到澡.农村人又没有换洗衣服,这样虱子、跳蚤这些穷人的寄生虫就尾随而至.我小时候,经常与小伙伴们比赛捉虱子,对虱子大开杀戒,全面围剿,但往往是几天的消停,因为虱子的繁殖太快了.虱子多了也就不痒了,那时的农村人,谁身上没有两只虱虱?还有跳蚤,这个能跳出四十倍身高的小昆虫,咬起人来很疼,它在陕北叫"虼蚤".这种小昆虫既善吸血液,也善跳跃,极为机智,人要捕获是很困难的事.夏天的时候,一只跳蚤往往折腾得人一晚上睡不好觉.这些小小的昆虫,陕北农村人尚很难对付,更不要说细皮嫩肉的北京知青了.北京知青来到农村后,不服水土也表现在对于虱子与虼蚤的抵抗能力差.这些机警的小昆虫们,嗅到与陕北农村人不同的人体气味后,往往能准确地捕捉目标,群起而攻,饕餮大餐,洋洋得意.现任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同志,当年曾在距我的家乡禹居村六七公里左右的文安驿公社梁家河大队插队.他在2005年任浙江省省委书记时,曾接受过延安电视台《我是延安人》栏目记者的采访.他说他当年在延川农村插队,是过了"五关"的历练——即跳蚤关、饮食关、生活关、劳动关、思想关.他对跳蚤尤其记忆犹新,"当时跳蚤搞得我们痛不欲生.我皮肤过敏,跳蚤一咬就起水泡,水泡破了就是脓包,全身长疮啊,这种情况下怎么办呢?严重到我们把六六粉撒到床单上睡觉,否则治不住跳蚤.三年以后没事了,硬扛过来……"在当时的陕北,虱子和跳蚤几乎是家家无法驱除的寄生虫,知青们也是一样.久而久之,他们也就慢慢地也适应这种"虱子多了不痒"的生活.

再说吃的问题吧.农民要打一粒粮食,必须经过"春种、夏耕.秋收、冬贮"的过程,真可谓"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啊!粮食打下了,要磨成面才能做成食品.我的家乡那时是条件相对较好的生产队,磨面尚且需要用牲口来推磨,这也是农村妇女们必备的功课.每天天蒙蒙亮就开始把驴拴在磨道里推磨,常常能推到半后晌.推磨是个技术活,妇女们把面磨成不同的等级,供家庭在不同的时节食用."头道面"是最好的面,有韧劲,也有面香,一般是招待重要客人或逢年过节才吃;"二道面"相对成色差些,也只能隔三差五才能吃上一顿,解解口馋;"三道面"是黑面,是平常的面食,就这也掺玉米面或高粱面才能食用.麸子是喂牲口的好饲料,当然在困难的时候也要食用.母亲说,知青们开始不会推磨,只能央求村里妇女们换工推磨;妇女们也乐意干这活,也可以赚一些麦麸.再后来,他们就自己推磨了.面推好了,距做成馍还有一个过程,也需要几项条件:一是要发酵,面发酵了,要打碱,才能蒸馍.不然,不是碱大就是碱小.碱大了是黄的,馍发苦;碱小了,馍是硬的,发酸.二是要烧火做饭.当时农村人烧不起石炭,只烧柴禾,而光山秃岭的农村砍柴也很困难.勤快的男人们往往跑上十里八里路,砍一担柴.硬柴火旺,做饭也快;绒柴火弱,锅很长时间开不了;湿柴更麻烦,一早上烟熏火燎的做不熟一顿饭.某种意味上,柴火的好坏是对男人们勤快程度的检验.生产队里,男人们早上要出工,到山上干活;妇女们在家里做饭.太阳照到窗棂上时,送饭人要敲钟送饭.这时,各家各户把准备好的早饭送到指定地点.有些人家因为柴火不争气或者其他原因,没有在规定时间内送到饭,送饭人也不等.一顿早饭,往往能看出谁家婆姨麻利、谁家婆姨周正.母亲说,这些知青们当时受了罪,经常有时候连饭也做不熟,她那时也经常帮女知青们做饭.

吃在当时的延安农村,绝对是妇女们潜心钻研的一门学问.陕北农村有民谚:"肥正月,瘦二月,半死不活的三四月."三四月是陕北农村人最难熬的月份.那时,头一年打下的粮食吃完了,种子刚刚撒到地里,还看不到一点希望.我的老家梁家沟村的条件相对好一些,穷人家搭点糠叶还能勉强涉险过关.但对绥德、米脂一带地皮薄、人口多的村庄而言,三四月里的光景太难过了,许多人家只好走南路讨饭.我小时候,曾见到过成群结队的讨饭人群.等到了五六月份,情况就开始好转,榆钱能吃,槐花也能吃,能救命的东西多了.再到七八月份,瓜果梨枣上来了,一年里最能敞开肚皮的日子也来到了.这样的日子,知青们也同样不例外.我曾看过习近平同志的一个讲话,说他们那时吃饭没有油水,把胡萝卜和洋芋切好,倒进锅里一块煮.有一天晚上,他觉得自己做那顿饭特别香.打开锅一看,原来是黑灯瞎火打水时,打上来一条蛇和一只癞蛤蟆,把蛇和癞蛤蟆煮到锅里了,所以这个汤特别香.民以食为天,吃是人生存和发展的头等大事.想必这顿味道特别的晚饭,深深地嵌在习近平同志的脑海里.我还看过延川著名知青丁爱笛接受记者采访时的资料,丁爱笛说他曾一连吃过三个月的辣椒面伴饭.他说能吃三个月辣椒面伴饭,还会有什么克服不了的困难?看来,知青们了解民生,哀民生之多艰,是从吃与住开始的啊!

再说说干农活的问题.在陕北农村,农民除了春节期间短暂的狂欢"闹红火"之外,其余的时间基本上是土地的奴隶.农活严格恪守二十四节气,每年开春土地解冻后,受苦人忙着整地、送粪,收拾土地.芒种前后,要把一年的秋庄稼安安付到位.耽误农时,是一件十分危险的事情.谷雨过后,青苗破土而出,紧接着就要间苗、锄草了.苗稠了,间距小,庄稼秋天的籽种挂不实;苗太稀了,浪费土地,成本太高.苗的行距、株距,全靠受苦人的眼力来判断.好的受苦人,一锄过去,留哪株锄哪株清清楚楚.下罢雨后,还要追肥,促进庄稼生长.受苦人最担心的是春旱,滴雨不下,种子难入土;即使入了土,也很难发芽拔苗.每到这个时候,受苦人就心急如焚,眼巴巴地望着老天,祈求龙王爷能下场透雨,保佑世间万物.初夏时节,麦子熟了.受苦人又投入麦收新战场,争分夺秒地在龙王口里夺食.因为这时的雨说来就来.受苦人稍有差池,夏粮就要成为泡影了.麦收过后,接着是打场,是晾晒,是入仓,程序不容闪失.稍容抽袋烟,紧接着就要翻麦地,预备明年的夏粮了.当然,秋庄稼也不容忽视,该锄二遍的锄二遍,该施肥的就施肥.白露时节,冬小麦就要安付妥帖,再抽出身子来收秋庄稼.秋庄稼虽说不像小麦是龙王口夺食那样紧张,但也必须抓紧时间收割完毕.红薯、萝卜和大白菜,该入窖的要入窖;玉米、高粱该捋穗的要捋穗.到霜降过后,寒风起来,受苦人要把地里的秋庄稼收拾干净.冬天不种庄稼,但也不能闲着,这是砍柴、送粪、打坝淤地的好时光.只有到腊月里年关近了,受苦人才能有几天短暂的放松时间.在年复一年的轮回里,这些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知青们,也要和农民们一样地干活,在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日子里煎熬,而不是每天都有"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的诗意.

我后来想,北京知青来到延安农村之前,绝没有想到他们心中的"中国革命圣地"的延安农村,在建国二十多年后,竟还是如此赤贫如洗.他们当初是满怀激情地奔赴陕北农村,在广阔的天地里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可这种连基本生存问题都没有解决的延安农村,就是摆在这群从天而降的知青们面前的真实情况.某种意义上,这也让中国当年在以农补工、以农促城的城乡二元对立的城市环境中长大的知识青年们,亲眼目睹了中国的另一面,认识了中国社

会的复杂性.对此,这些心怀远大革命理想、以拯救天下劳苦大众为己任的北京知青们,怎能无动于衷呢?事实上,他们也的确以其柔弱的肩膀扛起了远大的理想,并进行最初的人生实践.

当然,经过几十年的建设,现在延安乃至陕北地区农村的条件好多了.路通了,电来了,经济富裕了,许多地方的新农村也建成了,已经完全不是当年的旧模样!我想,北京知青看到这些令人欣喜的变化,自然是无比激动的,因为这种变化的后面,还有他们所付出的一份努力!……

三

前些年,我见到一位曾在富县插队的北京知青.他以赞叹的口气说延川知青厉害:一是他们的学习成绩普遍好;二是他们大都是清华附中学生,普遍有一种帮助贫下中农改山移水、改变落后面貌的理想与抱负.这位知青对延川知青的总体评价准确不准确,我说不清,但我在少年时代就深刻地感受到北京知青文化的影响.

我1971年上禹居小学,那时学校里有好几位北京知青当老师呢!我上小学的第一课是"毛主席万岁!"我们问知青老师,"毛主席是不是住在天安门上,到北京能不能见到毛主席?"老师说:"毛主席住在中南海.""那毛主席怎就住在海里呢?""中南海不是海,是个地方名,就在天安门旁边.""噢,毛主席住在天安门旁边……"那时,我们已经改口,喊自己的"大"叫"爸"、"妈"叫"妈妈"了.我们故意偷偷溜在父母的身后,猛地大喊一声:"爸爸"、"妈妈",惊得父母直打颤.他们回过神来责备:"吓死我了!"伸出手要打时,我们早一溜烟跑了.那时,村里孩子们可以用普通话字正腔圆地朗读一些小短文,得到父母的表扬.

我的记忆中,当时延川全县范围内出名的知青有好多,其中孙立哲、丁爱笛、习近平和陶正最为有名.

孙立哲是在关庄公社插队的清华附中学生,他自学成才,敢在擀面的案板上做阑尾切除手术、妇女子宫大出血手术,他的事迹很快在县里传颂开来,他是延川百姓家喻户晓的"救命菩萨".据说当时的卫生部不相信一个赤脚医生有做过三千例手术的神奇事迹,专门派中国医学科学院院长黄家驷教授实地考察.黄教授考察了一个月后,得出了孙立哲的医术相当于一个从正规医学院毕业并有三年临床经验的专科医生的结论.这样,孙立哲名声大震,《人民日报》专门报道过他的事迹,当时的中小学课本上也登他的事迹.1974年,风靡延川的《延川十唱》的中第一唱就唱的是孙立哲:"一唱孙立哲,赤脚好医生,天天出诊在山村,土窑洞里治大病.孙立哲对病人,热情负责任,手术大病根能除,一心为人民."我少年时代曾见过孙立哲一面.那时,他已经出名,乘着一辆草绿色的救护车到处巡诊.他来到梁家沟村,给村里一个叫"寻吃"的人家的小女孩看病.村里大人、小孩听说孙立哲到村后,竟把寻吃家的院子围得水泄不通.我记得孙立哲当时二十多岁的样子,个头不高,寸头,剑眉,有一双炯炯有神的大眼睛.文革结束后,我听说他挨整了.再后来听说他到美国读医学博士学位去了,因身体过敏的原因弃医从商,成为美国一家图文公司的总裁.他当年与著名作家史铁生在一个村子插队,他后来还把史铁生接到美国住了一年.后来,我还看到过一则报道,说孙立哲发誓要给延安捐一座现代化医院.捐一座现代化医院的资金量太大了,这可能要花费他一生的积累,但他的这种精神非常值

得感谢,说明他心里还装着延安.我前两年在凤凰卫视上看到他回村时记者同步拍摄的画面,他回到村里时,关家庄人像过年一样,秧歌队在村口迎接他,还杀猪宰羊,用狂欢的形式欢迎归来的亲人.看到这组镜头时,我的眼睛湿润了.孙立哲,延川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你!

丁爱笛是《延川十唱》中的第二唱人物,外号叫"丁牛",意思很有牛劲.歌词这样唱到:"二唱丁爱笛,张家河插红旗,扎根农村志不移,紧跟毛主席.革命接班人,敢于反潮流,顶逆风、战恶浪,革命路上大步走."丁爱笛也是清华附中学生,他曾在张家河村插队时,主动请缨担任生产队长、大队党支部书记.他带领全村百姓没日没夜地苦干巧干,打坝造田,栽种果树,发展副业,仅过了几年功夫就使村子初具新农村规模,他与同村的女青年结婚,立志扎根农村成为全省知识青年的先进典型.生产承包责任制后,他眼看着自己创造的成果一夜之间毁坏,含愤考取上海的一所大学,离开了他深爱着的黄土地.前几年,我在延安电视台《我是延安人》节目中看到他.节目中说他大学毕业后下海经商,多次被骗,甚至是血本无归,但屡败屡战,又重新打拼,成为一家知名的民营公司的总裁.他虽年近花甲,但精神矍铄,神采奕奕.他说,有在延川插队时吃过的苦垫底,这辈子没有迈不过的槛!好一个丁爱笛,依然是当年的"丁牛"样!

习近平当时虽没有写进《延川十唱》,但同样也很有名,他当时在文安驿公社梁家河大队插队.梁家河村在文安驿镇对面的小山沟里,距镇子二三公里的样子,而文安驿与禹居虽说是两个公社,也不到四五公里的距离.当时,这两个公社只有一个文安驿集市,我们这群小孩每逢集市,总要走到文安驿集上溜达一遭.习近平在梁家河村插了七年队,乡亲们没有因为他是的"黑帮"子女而歧视,相反给他入了党,选举他担任大队党支部书记,让他放手工作.他在担任村大队党支部书记期间,带领全村群众打坝造田,大办沼气,还建成了陕西省第一个沼气化农村."沼气"可是个好东西,既可以做饭,也可积肥,还卫生与环保,真可谓"一气"几得,在干旱少雨缺少肥料的陕北农村确实有推广价值.我记得大概是三四年级的时候,县里发文件,让全县人学习文安驿公社梁家河村大办沼气的经验,我也参加过挖沼气池的义务劳动.现在回过头来想,在当时的情况下,建沼气村无疑是一场深刻的农村革命:一是能彻底解决农村人的烧火做饭问题,解放生产力;二是有效解决农村的肥料短缺问题;三是因建沼气池能引起农村的"厕所革命"和公共卫生革命.当时,陕北农村人的厕所叫"茅厕",蛆虫乱爬,是公共环境最差的一个场所.一到夏天,绿头苍蝇嗡嗡乱飞,让人恶心不已.可惜我当时的年纪尚小,觉悟不高.如果我当年能有今天这样的认识,我会十分卖力地挖沼气池.习近平同志是1975年被乡亲们推荐到清华大学上大学的,这样他离开了插队七年的梁家河村.2005年,时任浙江省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在接受延安电视台《我是延安人》栏目记者采访时说:他在离开梁家河的那天早晨醒来,发现全村的男女老少都站在院子里为他送行.他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了,痛痛快快地哭了一鼻子.是的,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动情时.我看见接受采访的习近平同志的眼圈有些泛红,他控制住了自己的回忆情绪.但我却对着银屏落泪了,一个懂得尊重历史与感恩大地的人,他会走得更远的,我心里默默地祝福!

陶正,也是当时有名的北京知青,他是以清华大学高中毕业生的身份来延川关庄公社鸭巷村插队.他来插队时,专门从北京带了台油印机,痴情于文学,发誓要拯救全世界受苦受难的穷人.1972年,他与谷溪、路遥、闻频、军

民等人,创办了文革时期具有"泥土气息"的县级文艺小报《山花》.《山花》的创刊,开创了延川文艺的"山花时代".从此,以路遥、谷溪、闻频、陶正、荆竹、海波等人为核心的"山花作家群"登上中国当代文坛.新时期以来,"山花作家群"越来越壮大,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就有十余名之多,这在陕西乃至西北地区都是个奇迹!陶正当时最有名的诗歌,是与高红十合作的长诗《理想之歌》,我上小学时曾学过,记得开头是:"蓝天,白云……"1974年,陶正被推荐为工农兵学员,到北大中文系上学去了.再后来,他成为北京市一名专业作家.新时期以来,他以陕北农村生活为题材创作的多部中短篇小说,先后多次荣获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优秀短篇小说奖,在文坛刮起过"陶正旋风".

除此以外,陶海粟、吴美华、蔡玉珠等人也很有名,我在小时候就经常听说他们的事迹.相反,在关庄公社关家庄村当饲养员的史铁生当时却默默无闻.据说史铁生那时候的主要工作是喂牲口,副业是给村里当画匠,画家俱.他本身有先天性的腰椎裂柱病,村里人给他安排了相对轻松的农活.谁也不曾想到,他在拦牛时遭遇了一场瓢泼大雨.大雨浇透了他,让他发烧感冒,引起腰椎裂柱病发作,才酿成后来终日以轮椅为伴的大患.他回到京城后,为了不自杀,开始文学创作.他把目光投向当年插队的小山村,并在那时找到了温馨而美好的记忆.他对我的影响是1983年发表的短篇小说《我的遥远的清平湾》获奖以后,我知道延川走出的作家中不仅有路遥、陶正、谷溪、闻频、荆竹,也有史铁生.史铁生这篇用散文化的抒情笔法所创作的小说对我影响很大:原来陕北农村平淡无奇的生活,经过作者的深思过滤后,赋予了抒情的诗性.这篇小说教给我如何发现生活中的美,并如何加以提炼与抒发的技巧.史铁生2010年12月31日凌晨病逝后,我用最快的速度写出两篇悼念散文,表达一位深受他文学影响的延川晚辈的怀念之情.其中,《他到地坛那里去了》刊于上海的《文学报》上;《我与史铁生的惟一一次通信》刊到《延安文学》上了.在延安插过队的北京知青成为作家的很多,如高红十、梅绍静、叶延滨、陈行之等,他们的作品也不同程度地对我产生过影响.

四

1970年代中期,北京知青已经渗透到十多万人口的延川县的各个领域.那时,许多知青已经开始参军、招工、上学,纷纷离开了延川县.而留在延川的知青们,也当民办教师、公社专干、文化馆专干、宣传部干事等等.当然,北京知青与当地青年通婚的现象也不在少数,有当地小伙娶北京姑娘的,也有延川姑娘嫁北京小伙的.当时的文学青年、后来成为著名作家的路遥先生,他的爱人就是曾在关庄公社插队的"清华才女"林达.

我们梁家沟村的知青潮退却后,给村里留下三眼公窑.其中的一眼公窑架囤里,竟放着大堆铺满灰尘的知识青年用书.我和伙伴们把这些书全部偷回家,这些书籍也成为我少年时代认知外面世界的重要窗口.它们的名字我大都还能记得:《美帝国主义侵华史》《我们的朋友遍天下》《各国概况》《世界地理》《世界历史》等等.我后来嗜书如命的习惯,均是少年时代培养起来的.当然,我们这批1960年出生的延川农村孩子,受到北京知青的文化影响是多方面的,我们从小开始学说普通话,从小就开始刷牙、讲卫生,均是受到他们的影响.我1990年代曾在《北京青年报》

和《陕西日报》上写过《听"洋话"的日子》和《偷书》两篇小文,深情地回忆了这种润物无声的文化影响.直到今天,我在延安大街上行走,只要是看到操着纯正普通话的知青们,总会投去敬重的目光.我对1958年下放到陕北子洲县、新时期后成为著名诗评家的北大中文系高材生沈泽宜老师动情地说:"您来陕北,是您人生的不幸,但却是陕北人的大幸!"是的,这句话同样也能套用在北京知青那里.不管是什么原因,两万八千名北京知青曾在延安走了一遭,有些人甚至把生命也献给陕北,至今仍有三百多名北京知青留在延安工作.从历史的角度而言,北京知青对延安的文化影响是深远的,也是长远的,有可能超越上世纪三四十年代陕甘宁边区时文化人对陕北的影响.

2011年10月份,我赴京办事,见到北京师范大学技术教育学院博士生导师衷克定教授.他当年也是一位北京知青,曾到延安县临镇公社的一个只有六户人家的小山村插队,在那里待了六七年.本来应是我请他吃饭,但他却提前预定了一桌丰盛的饭菜,并告知我说,必须给他在京请客的面子,因为是家乡的人来了.我只得作罢.喝了几口酒后,他动情地说:"我的青春就在那个小山村里,我晚上做梦能经常梦到那个村子.1991年后,我有能力回到村子里看看,每过两三年,我总要一个人背着行囊回村子里,看看乡亲们.前不久,我回到村子时,乡亲们杀了一只羊款待我.我和乡亲们喝着酒,吃着羊肉,拉了一晚上话……"说着说着,他的眼圈有些湿润,话语有些哽咽:"我这次回到北京后,突然有个想法,我想立个遗嘱,让家人在我死后,把我的骨灰匀出一部分葬在村子里.我这辈子无法和这个小村子分开了……"他还说,他返京后把这个奇怪的想法告诉同村插队的战友,他们也十分响应这个提议.此时此刻,我能充分感受到衷教授的心情.从延安走出来的北京知青,他们的生命已融注进了这块土地的密码,他们的生命已经和这块黄土地融为一体了!

衷教授还讲到他国庆节期间回到延安时的趣闻.他一人漫无目的地在延安街头闲逛时,却听见前面传来熟悉的北京口音,他定睛一看,原来是北京师范大学某学院的教授.他们彼此之间都认识,衷教授和他对视了半天,互相喊到"老插",又相互捶胸顿足.他们在一所学校同事几十年了,互不知道相互的身份,想不到今天是以这样的方式增进了友谊.这位教授当年在延安县的贯屯公社插队,他也是领着一大帮同学回村看看的.于是,衷教授又跟着他们的队伍走了一回贯屯村.衷教授讲完这个故事后问我:"你说奇怪不奇怪,缘分往往就在那回眸之间!"是的,这正是不解的延安情所牵的手啊!

回到延安后,我专门索要了一套延安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辑的北京知青资料集《回首青春》,并用挂号方式寄给衷教授.这套资料的附录中收录了当时到延安插队的两万八千名北京知青的名字以及插队的县区,是一份十分珍贵的资料.

我在翻阅这份资料时,突然意识到这两万八千名北京知青,每个人都是一部生动与鲜活的历史.我眼前矗立起一座历史的大墙,上面镌刻着他们的名字,熠熠生辉,一直到永远!……

华夏知青网不是赢利性的网站，所刊载作品只作网友交流之用

定宜庄：知青集体编写回忆录的特点和发展过程

定宜庄 近现代史研究动态 2018-10-31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到70年代末结束，持续了20余年，影响到1955年至1975年上山下乡的几乎每一个人和他们的家庭，给这代人的人生烙上了无法磨灭的印记。从知青运动结束迄今，又是将近40年，知青一代行将从历史舞台上逐渐退出，在这样的历史时刻，回过头来看这场运动，分析其成败得失，考察它在当时社会经济以及历史进程发挥的作用，尤其是考量它对这代人的人生造成的影响，应该比以前各个时期更完整、更清晰。而对于每个人来说，知青这个身份对于自己究竟意味着什么，在漫长的几十年人生中，这段并不太长的日子究竟占据了什么样的位置，对于日后自己的人生经历究竟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也正到了该总结的时候。

一、知青集体回忆录的编撰和特点

官方对知青运动的宣传，从运动伊始就没有停止过，与此同时，知青自己也始终在各种正式和非正式的出版物中，以文学作品(包括小说、诗歌和各种小品文)、影视媒介、宣传展览等各种形式，顽强不懈地发出自己的声音，在改革开放后的20世纪90年代初，还因此掀起一股不大不小的浪潮，并且持续至今。在这些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的作品中，有一类为数甚众而且独树一帜，那就是知青集体撰写的回忆录[注]。之所以将这类作品单独挑出来，是因为不同于文学书写和史学书写，它是知青的民间书写中分量最重也最引人注目的一部分。

知青集体回忆录这种由集体写作、以自己真实经历为内容的形式，再好不过地体现了知青行为的共同特征。

特征之一——一代人的“集体性”。一般的回忆录往往由个人撰写，但知青们早就习惯于“群众运动”，习惯于“抱团”，连回忆录也要集体撰写，这种情况恰恰反映出这代人的行为特征。有知青说：“这代人与其他人有个明显不同，其他人是‘个体’，而这代人是‘集体’。”这个说法可谓一语中的。这代人所谓的“集体主义精神”，既出于当时的宣传和教育，也与上山下乡的

特殊境遇有直接关系。他们有过共同的经历，遭遇过共同的挫折，产生过共同的情感，又在经过几十年磨砺后，对那段生活留下共同的，也就是集体的记忆。知青中颇有人以此自诩，将其誉为值得赞美的“团队精神”。近年来，虽然很多人逐渐意识到所谓“集体主义”对个人的压抑，但这种精神已然成为一代人的终身烙印。

特征之二——小群体的多样性。“集体”并非意味着“划一”，集体回忆录反而是最能够体现知青多样性的一种编写形式。一方面，它最充分地展现了知青中各种小群体的多样性。城市知青上山下乡，大多数都是集体结队前往，人员的构成具有某些共性。除了客观条件的限制之外，知青的组合也多少有些自由度，譬如“文化大革命”时同一派的同学会集体报名前往某地，同校、同班或一个家庭的兄弟姐妹乃至邻居好友也会选择同一个插队地区，等等。下乡之后多年同命运共患难的磨砺，又使他们对那段生活拥有了共同的回忆。而回城之后，尽管经历不同、地位各异，但凡是还能够集聚在一起撰写回忆录的，往往多年来并未完全中断联系，互相间的影响也使他们对当年经历的反思多少具有某种共性。另一方面，知青来自不同的城镇，北京与上海不同，南方与北方也不同，大城市与中小城镇更不同。知青去往的地区更是千差万别，仅以北京知青来说，有内蒙古的草原，有新疆的军马场，还有延安、山西等地的农村和山区。从知青的处境看，到国营农场、生产建设兵团与到农村集体插队之间的差距尤其巨大。知青集体撰写的回忆录往往能够集中反映某个群体的特点，以及与其他群体的差异。总之，不同群体的知青对自己生活的反省与思考，可以为人们留下一代人反思这段历史时参差不齐的蹒跚足迹，会使人们对知青这段历史的认识更丰满、更多样，这是以个人为主所写的回忆录及其他形式作品难以充分展现的，也是研究知青史最需要了解的内容。

特征之三——个体感受的差异性。绝大多数的集体回忆录是不会将虚构作品收纳其中的。从原则上说，这种回忆录是若干个人自传的合集。它最大的好处是能够把去往某个地区(一个县、一个兵团或一个农场等等)的一群知青的共同经历，通过每个撰写者个人的角度和感受，相对全面和完整地呈现出来。回忆录的撰写者尽管出自同一个学校，落户到同一个地区，生活在同一种环境中，但也会因为出身、年龄、性别以及个性的不同，对同一段经历有着差异甚大的体验和表达，这应该是集体回忆录中最有意义和趣味的内容。或者也可以说，通过集体回忆来表现特定地区、特定群体的故事，集体回忆可算是一种最便利、最充分的形式。

当然，集体回忆录也有其特定的缺陷和问题，主要问题往往出在主编身上。当集体回忆录设立主编，而主编又较为强势的时候，每每会要求所有来稿都遵照他的意旨，符合他的理念，甚至要突出所谓的“集体”和“统一”。还有的编委会，会人为地给来稿设立一个“底线”。这样的集体回忆录，真实性和多样性便都打了折扣。这也是如今大量涌现的知青集体编写回忆录水平参

差不齐的原因之一。

二、最初的涌现

据考，在有案可稽的以集体回忆录形式出现的作品中，北京知青编写的几部图书最受人关注，其中最早的一部是石肖岩主编的《北大荒风云录》(中国青年出版社，1990年)，辑录了将近200篇北京赴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知青所写的文章，形式多样，有报告文学、特写、回忆录、日记、书信等，以能反映和折射兵团生活和那个时代的一个侧面为宗旨。随后出版的，是由北京赴内蒙古牧区的知青集体撰写的《草原启示录》(中国工人出版社，1991年)，以编委会名义出版，未具主编姓名。还有一部，即王子冀主编的《回首黄土地——北京知青延安插队纪实》(沈阳出版社，1992年)。与此同时，在北京之外，有重庆到云南支边的知青编写的《红土热血——云南支边生活实录》(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成都知青编写的《青春无悔——成都知青赴滇支边二十周年纪念活动资料汇编》(1991年)以及四川插队知青的回忆录《知青档案——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纪实(1962—1979)》(四川文艺出版社，1992年)等等[注]，其中尤以《青春无悔》的书名最为醒目，甚至一度成为公认的“主流话语”而为众多知青广为认同。

已经有人提出疑问，即为什么在下乡、返城的20年之后，才有这样的集体回忆录突然涌现，这确实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这里有知青们人到中年之后开始萌生怀旧意识，在历经求学求职、成家立业等奋斗之后生活和事业基本稳定下来等诸多因素，同时也与其中部分人尤其是“老三届”此时的人生诉求紧密相关，当他们认为自己经历过各种艰难困苦，终于到了该登上历史舞台大显身手的时候，知青经历便成为他们最拿得出手的资本。“青春无悔”就是在这样的时候、恰逢其时地喊出来的。在知青最初出版的几部集体回忆录中，即可看出这种或隐或显的踌躇满志之迹。

不过，有着这种诉求的人，在知青中毕竟还是少数，就在以上列举的几部书中，四川、云南知青的调子就与北京知青颇为不同。随着参与集体编写回忆录活动的知青群体越来越多，回忆录的书写在体例、立场和观念上越来越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不同地区、不同群体知青之间的差距也越来越明显。其中，金大陆编《苦难与风流——“老三届”人的道路》(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就是具有自己的思考，并且发出了不同声音的一例。这不仅表现在该书撰稿者主要为上海知青，有着与北京知青不同的风格，还表现在作为史学家的编者更重视文章的史料价值，并且明确表示“除了在文字上作修改外，十分尊重原文的旨意”[注]。在该书收集的100余篇文章中，不少都对“青春无悔”的口号提出了质疑和批评。

无论回忆录所呈现的思想、观念如何，可以肯定的是，知青们终于寻找到了一种最适合集聚在一起并且发出自己声音的方式。这种做法广为各地知青所认同，一旦面世，便一发而不可收。其后几年，北京到延安、山西等地，以及全国各地赴兵团、农村插队的知青撰写的集体回忆录不断涌现，其势恰如雨后春笋，恕不一一。

进入21世纪之后的最初几年，这样的集体回忆录虽然还不时可见，但数量始终不多，似乎陷入某种低谷之中。唯一值得注意的是，众多原来处于“边缘”位置的知青群体开始越来越多地加入这场活动，遂使这种集体回忆所涉范围越来越广，参与的群体越来越复杂多样，所述内容也因之而越来越丰富了。

这里所谓的“边缘”群体，指的是不属于“老三届”的众多知青。“老三届”系指1966年、1967年、1968年在校的中学毕业生，按照当时的政策，他们被要求一律上山下乡，所以在某种意义上，“老三届”与知青可以等同来看。自从知青开始登上历史舞台展现自己，“老三届”就一直占据着主角位置，而那些“文化大革命”前就已经下乡的以及“老三届”之后陆续下乡的中学生们，却往往被视为“边缘”而受到忽略。重庆老知青编写的《魂系大巴山：重庆1964、1965老知青回忆录》(邓鹏主编，内部发行，2005年)尽管出版时间较晚，却使“文化大革命”前下乡的知青群体重新回到人们的视野中。这部回忆录后来重新命名，分为正编和续编两部，正编为《无声的群落——大巴山老知青回忆录(1964—1965)》(重庆出版社，2006年)，续编为《无声的群落(续)——“文革”前上山下乡老知青回忆录》(上、下卷，重庆出版社，2009年)。其中续编极具规模，集结了1964年和1965年从北京、上海、重庆、沈阳、武汉、成都、长沙、杭州、西安等地下乡的知青撰写的回忆文章。编撰者称，这是全国第一部也是唯一一部“文化大革命”前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全国性回忆录，其意义和成绩不可低估；而在笔者看来，它最大的意义在于呼吁与激励诸多“无声群落”站出来发出自己的声音。

三、近年的高潮

作为一种写作的体裁和方式，更作为一种集体性的活动，知青集体撰写回忆录在最近几年达到高潮，而且还在持续之中，参与人数之多、出版物数量之巨，甚至可以用“群众运动”来形容，因为在动员形式和产生的作用上，都可以看到当年“群众运动”的影子，当然影响面仅限于知青，远不能与当年同日而语了。近年来这种活动之所以突然在数量上急剧增加且参与者众多，主要是因为知青特别是其中的“老三届”都来到了一个特定的年龄段，那就是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都已年过六旬，到了退休年龄，有大量余暇，同时身体精力尚佳，“余热”需要找到发挥

之处。他们中有责任感的一些人更是深切地意识到，这是能够发出自己声音的最后一次机会，从而有一种急迫感；更多的人则愿意通过撰写集体回忆录的活动而相聚在一起，共同回忆往日时光，以此作为增进感情、填补空虚的晚年生活的最好方式。而在晚年回首往事时，将上山下乡视为一生中最值得记忆的经历，既是这代人的共同特征，也是这代人将编写回忆录作为一项集体活动，共同地热心参与进来的思想基础。

最近几年知青集体编写回忆录高潮的出现，虽然是此前这项活动的延续，但新完成的回忆录也具有与以往作品不尽相同的特征。

首先，也是最突出的，就是撰稿“单位”的细化。这里所说的“单位”，指的或是某个县、某个乡(公社)甚至小到某个大队(村)，或是某个当年的生产建设兵团的团、营甚至连，有些村子接收的知青不过十几人或二十余人，但也会集体编撰一部回忆录。这种明显的越来越“小”的趋势，与此前知青回忆录对“单位”宏大的追求，形成了鲜明对比。以前文提到的几部最初出版的集体回忆录为例，《草原启示录》是到内蒙古锡林郭勒盟牧区的北京“老三届”知青撰写的回忆文章合集，而当年到这里插队的知青人数多达数千名；《北大荒风云录》所涉范围更为广泛；稍后出版的《无声的群落》则力图将“文化大革命”前下乡插队的全国知青都包括在内，为读者呈现一幅全景，须知这部分知青在知青总数中占比虽小，其人数却也曾多达130万名。

小有小的长处。单位愈小，参与者愈众，作品也便愈多元。知青群体本来就是由各种不同出身、不同社会背景、不同族群构成的，各种群体之间也不可避免地存在诸多差异，单位太大，尽管也都由个人的叙事组成，但特定地域、特定人群的不同却难以凸显，这也是早期一些知青集体编写的回忆录难免失之空泛的一个原因。再者，单位越小，越便于众人广泛加入，回忆录的群众性也就越强。最早集体编写回忆录时，往往由某知青群体中几个最有名气的作家、学者或成功人士牵头，组成编委会，然后向众知青征稿，参加者虽系自愿，但也多是有写作能力者。但当撰写单位由某个乡、某个村的数十人组成时，就很难做到这一点了。这就使更多的普通知青，包括那些几十年不提笔写作的人，也有了发出自己声音的机会。

其次，以往的知青集体编写回忆录往往都由正规出版社编辑出版，本文所举的几部都是如此，这就必须在主题、体例、文字诸方面符合正式的出版要求。但近年来的回忆录绝大多数却都属于自费的非正式出版物，自行出书，自行编印，也自行销售，由于读者面小，往往也无须考虑发行问题。这样编写出来的回忆录，好处是可以大体保持原貌，而且不必顾虑数量的限制。“一花引来万花开”，一处知青组织书写，各处知青纷纷效仿，到目前为止，这股热潮仍在持续之中。

再次，少数集体回忆录写得非常认真，参与者不再停留在对自己经历的感怀和叙述上，而

是将知青的个人回忆与所在公社、大队的社史、队史(村史)结合起来，更何况很多知青当年就有作社会调查的积累。这种做法不仅为知青们的经历提供了重要背景，也为后人了解这一时期中国社会生存状态和文化冲突提供了一手资料，是知青集体回忆录中重要的、有价值的内容。当然，这样做的还只是少数，大多数知青并未意识到这一点。

不得不说的是，近年来知青集体编写回忆录虽然为数可观，但水平参差不齐，由于主题、内容分散，影响力大的著作不多，一般性的作品占据多数。这些作品大多是对自己真实经历的质朴记叙，生发的多是个人感慨，鲜有对这场运动深入的批判与反思。但从研究者的角度看，这些民间书写却是了解知青一代人目前生活状态、精神状态和认知水平的最好史料之一。毋庸讳言，从整体上看，这些作品所反映出来的这代人对知青经历的体验和反思，还没有超越十多年前出版的那些回忆录的水平。这是知青一代目前状况的一个真实反映，也是任何一项活动演化成一场“群众运动”时的必然结果。当然，要求所有知青都要对往事进行反思，这对他们而言既做不到，也不公平，在他们都已进入晚年的时候尤其如此。

作者简介：定宜庄，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来源：《中共党史研究》2018年第9期。

注：本平台所转载文章，仅供学术交流使用，作者（版权所有人）如果不希望被转载，请联系后台删除。

华夏知青网不是赢利性的网站，所刊载作品只作网友交流之用
引用时请注明作者和出处，有版权问题请与版主联系
华夏知青网：http://www.hxzq.net/
华夏知青网络工作室

69届之我观

作者：庄天佑

69届在教育史上是一个史无前例的特殊群体。“就近入学”、“一片红”是69届的年代概括，无课程设置、无教材、无正常的教学秩序、无毕业证书是69届的时代烙印。

69届与“老三届”有同有异，同是上山下乡的劳动大军，同为知识青年的运动群体，同中有异，异在在校时间最短、教育质量最差、知识层次最低，异在“老三届”被作为专有名词载入知青运动史册，“69届”却一次次被人忽略，异在老三届“四个面向”，最低还有参军机会，69届“一片红”走向农村、走向边疆，更为悲壮。

许多人读不懂69届，即使69届人对自身也不甚明了。中学毕业分配（上山下乡）时间前后长达7个月，分布江西、安徽、云南和黑龙江等省，插队、农场、兵团知青生活迥异。部分知青10年后返城，部分“盲流”在沪，余者等待60岁“告老还乡”。

69届多难多异多棱多面，一言难尽。

（一）“届”和“年”的异位

按69届的正常定位应是指1966年小学毕业，当年升入中学，学习3年后1969年初中毕业的学生。

而69届实际情况是：1966年小学毕业后，在社会上动荡1年以上，直至1967年下半年按“就近入学”原则进入中学（有的区县甚至于1968年下半年才进中学），1970年初开始全部上山下乡一片红，在校延续“分配”时间长达半年以上，“余部”转入街道继续“分配”。

69届偏遭文革又生逢上山下乡运动，因而届和年严重错位，实际的届（年）应为70届（年）。69届其后的原70届被延为71年毕业，71届被延为72年毕业，最后“顺其自然”71届被更正成72届，中间消失1届，届史上因此没有71届初中生一说。

（二）“学”和“业”的异位

1966年5月7日，毛泽东作出“五.七”指示，其中对学生的指示：“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

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66年小学毕业69年中学毕业的69届适逢按最新最高指示指导“学业”，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实际上是“兼学”为主，“学文”从无贯彻。

69届在整个中学期间没有发过一本书，没有摸过一本课本，更枉伦数理化。学工、学农、学军，批判资产阶级一样不少，学制缩短了，校长（作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的代表）靠边了，这是所谓的教育革命，无所学，也无所业，69届正宗小学毕业，初中却连肄业也算不上。文革结束后，各地方由所在系统对文革期间“毕业”的学生统一进行了文化补习和考试，我是在化工部星火化工厂才取得“初中毕业”证书，距离69届上次“毕业”时间过去整整10年，异地异时、似工非学滑天下之大稽。更离奇的是，一些“工农兵大学生”是在大学毕业以后，回头再补习取得高中毕业文凭。教学史上有“倒背如流”的学生，“倒挂学历”算是时代独创。

（三）“识”和“知”的异位

69届进中学适逢“五.七”最高指示发表，“毕业”前夕又正逢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最新指示。最新最高指示从头至尾主宰了69届的命运。

后一条最高指示的全文：“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

按上述最高指示执行，69届并不能算初中毕业，更不够冠之“知识青年”的头衔，但是，生逢其时，上海的“城里人”把69届统统送到农村去了，而且是“一片红”，即“全面地彻底地不折不扣地贯彻了最高指示，该送的送了，达不到条件的创造条件也要送，敲锣打鼓动员上山下乡”，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可谓壮举。

从此历史留下了“69届一片红”桓古之奇；69届也顶着“知识青年”的桂冠，开始了自己的人生，痛苦着“知识青年”的痛苦，“幸福”着“知识青年”的“幸福”。

“知识青年”这个词，按字面的解释应是：接受过正规教育，掌握一定的科学文化知识的青年。其实，同为“知识青年”，从知识受面上讲，“老三届”是不屑与69届为伍的。因为知识太贫乏，诸如“老狼（娘）：我上吊（调）了”之类的笑话，应该不会出自老三届。

生无学，师之“惰”；师不教，谁之过？

（四）“教”和“育”的异位

相较而言，“老三届”更有思想。《知青之歌》作者、南京68届高中知青任毅曾经在插队的草房旁贴过这样一副“对联”，上联：“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下联：“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绝妙的是，上下联

的这二段话均出自毛泽东在不同时间、场合说过的话。

城市知识青年去农村接受被教育者的“再教育”，究竟意义何在？！

（五）“补”和“助”的异位

大凡知青，对于中发〔1973〕21号文《中共中央转发李庆霖来信和毛主席的复信》一定记忆犹新，那是1973年的平地一声雷：“李庆霖：寄上300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荣当统筹解决。毛泽东4月6日”1973年，我已上调进厂，知青“无米之炊”景况已与我无涉，但是插兄插妹们的窘迫时有耳闻。无论知青抑或知青家长都感激李庆霖，他们的感激是因为李庆霖说出了大家想说而无处可诉的心里话。没有知青抑或知青家长仰望也能得到“300元聊补无米之炊”，而是对毛泽东“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充满希望。

可惜，受当时文革大环境形势影响，所有对知青的帮助仅在“补”而无“助”，在高涨的左的势力的控制下，对上山下乡中存在的问题，知识青年迫切的求助，无机关能“统筹”，无人敢“解决”，连李庆霖本人也被逼入“旁门左道”，从一个正常向上反映知青现况的知青家长，转化成“反潮流”的英雄，南辕北辙了。

知青刚下乡时，被特别强调不准恋爱不准结婚，违者以“阶级斗争新动向”、“破坏上山下乡运动”论处。数年后，又大力提倡“结婚扎根”并大树典型。但无论“上调”进厂，“推荐”上学，“病退”返城，均有“未婚”这项先决条件。

政策游离间，一时多少“孽债”！

（六）“返”和“退”的异位

1979年，69届上山下乡进入了第9个年头，地处云贵高原的云南知青掀起了知青返城之风，国务院召开的长达42天的知青会议的最后结果使这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实际上等于结束。

这场上山下乡运动，来有踪去无影，至始至终没有连贯的战略部署和配套政策，只留下四个不满意，即知青本人不满意，家长不满意，农民不满意，国家也不满意，匆匆划上句号。知青返城是大势所趋众望所归。《孽债》电视剧中知青们在场部门前抢盖图章的画面形象表现了知青当时的心态，急切地在病退回城的证明上盖上大印，极其害怕像闹剧一样的上山下乡及其后续政策有变、多变。

实际上，知青当时并不是像老干部那样是平反改错返回原城市原工作岗位的，大多数知青是借口身有疾患搞假证明“病退”回去的，返和退一字之差，命运和结果大相径庭。

回城的知青二手空空一无所有，因为无技能，只能在街道工厂里弄生产组“屈就”，因为住房紧张，只能在小阁楼中“窝居”。这一部分知青多少年后才慢慢地融入这既熟悉而又形同陌路的大都市。

如果四人帮早一天倒台，如果文革早一天结束，如果知青早一天返城，如果知青返城后能回原校进行“文化补课知识回炉”，绝大多数69届知青的命运将会极大改观，但是，现实没有如果只有结果。

（七）“工”和“农”的异位

1985年，原劳动人事部下发关于《解决原下乡知识青年插队期间工龄计算问题的通知》，通知规定：“凡在“文革”期间由国家统一组织下乡插队的知识青年，在他们到城镇参加工作以后，其在农村参加劳动的时间，可以与参加工作后的时间合并计算为连续工龄。他们参加工作的时间，从下乡插队之日算起。”从此后彻底解决了插队知青在工龄上的后顾之忧。

这一条政策对原兵团农场垦殖场的知青无影响，因为他们本来就是拿国家工资，工龄顺理成章。差别只有兵团战士或农场职工的身份之争。

这一条政策出台，体现了对（国家统一组织下乡插队）知青的照顾，同时也开创了“农民”工龄的先河。我注意到，近来干部任命的公示中，有的1953年出生的干部（相当于69届），参加工作时间为1969年，更早的为1968年。15岁参加工作，相当于“红小鬼”，也算是上山下乡运动中的滑稽产物。

（八）“子”和“父”的异位

1989年，上海市允许在外省区工作的原上海城镇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子女来沪就读入户(沪劳访发(89)第24号文)。这是在农村的知青返城10年后，另一项惠及外省区工作的原上海知青的政策。

政府的初衷大约是想通过扶持子代来偿还对知青父代的欠债，但今非昔比，一切都在改变，逼仄的家庭住房条件，二代人之间的疏隔，生活习惯上的差异，使原本的好事反而衍生种种家庭纠纷。知青后代回城，如同知青当年下乡一样，生活关，人际关，环境关同样要过，颠东颠西一时无所适从，一样备尝艰辛。

子女入沪藉后，他们的父母后来遭受企业减员增效、机关事业单位末位淘汰等等改革大潮的冲击，部分知青从原工作地内退，下岗，协保，买断后，考虑到子女教育，考虑到家庭团聚，考虑到照顾白发高堂，考虑到解决温饱重新就业，梦想叶落归根把户口迁回上海，却遇到了重重阻力。

当年上山下乡从上海迁出，返回时需按照“投子入籍”办理，男不到60岁、女不到55岁不予入籍。有段时期还要等上3年疑似“考察期”、“家庭内部的公示期”。

君不见“老娘舅”节目里，子女或家属不同意，知青本人的户口就是迁不回来，当然，这只是个别，但特别寒心，极其异位。

（九）“失”和“加”的异位

知青子女入沪藉后，参加当年上海市中考或高考的，在考试成绩总分上予以加分照顾，中考可加12分；高考可加8分，二者居其一，因为加分主要针对地区教材差异，已在上海就读无此优惠。

想想实在搞笑，因父辈上山下乡中断了学业，由子女获考试加分补偿，是不是异位？如果加分直接加在知青头上，比如参加77年高考，比如参加自学考试，比如参加招工招干，比如参加竞争上岗，比如……只要实事求是地照顾加分一次，很多知青特别是69届知青的命运将会改观。

……

69届是从古到今从中到外，世界上自开办中学以来整体上在校学习时间最短教育质量最差的一届初中学生，69届是在上山下乡中被集体运动的“知识青年”，69届知青身上反映出多种社会矛盾，即69届现象，也就不足为奇。虽“贵为”知青，享受到一些知青政策，但均无法改变69届整体弱势的客观命运。从上山下乡时的非工、非农、非军、非学的无所适从的强烈的失落感，一直到改革开放后的今天，内退、协保、买断，时代的失落感依然强烈存在。

那部分早期融入上海的69届人尚且“深感69届群体人生道路的坎坷和艰辛，深知由于自己人生底色上的沧桑烙印与先天不足，与后辈起跑线虽同而底子大不同。”深忧“我们前有海归和高学历强者阻截，后有年轻的追兵（60后大学生）追逼，旁有国企职工先发优势的制衡。”而户籍还在外地的69届知青，更感到前景茫然，失业了你就是无业游民，离开现户籍你就是“盲流”，打工后你仍然是“外来务工者”。即使回沪，面对高企的房价，双规制的养保医保，兄弟姐妹间的现实利益关系，永远也读不懂的大都市现象，能觉得是真正回家了吗？！

知青永远是遭受“历史嘲弄”的一代青年的共同称呼；69届永远是“大革文化命”的一届学生的代名词。

如今69届即将步入花甲，知青老矣尚能饭否？

我们期待，期待国家知青政策更加人性化，特别照顾69届弱势群体，期待老知青们焕发青春，积极参与充分利用网络、论坛、报刊杂志，宣传知青文化，积极挖掘充分享受有关知青的文化艺术、纪念馆所、返乡旅游项目，壮大知青文化，期待“后知青时代”的到来，一齐努力多方位呈现知青光明的一面。

来源：老兵读史转载自微信公众号：上海老底子

曾经的知青，现在都是60岁以上的人了，经过40多年生命过程的沉淀，回首青春时期的经历，现在更多的是冷静和理智。怎样解读青春经历？解放日报对600位知青进行访谈的调查:穿越磨难蹉跎 我们与共和国同命运。

解放日报对600位知青进行访谈的调查

文章来源：解放日报2013.6.1
作者：佚名

调查说明

一部电影《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让70后、80后刮起一股“怀旧潮”。如果说电影中的纵酒放歌是对上世纪90年代大学生活的怀念，那么最近在全国巡回举办的《与共和国共命运》知青展则是50后、60后对那段知青岁月的致敬。那些曾经见证过 “上山下乡”的人们，又是怎样解读那个生命中至关重要的青春经历的呢?

中国社会学会方法研究会、上海知识青年历史文化研究会和上海神州市场调查公司在知青展馆内外对当年的600位知青进行了问卷调查。解放日报社会调查中心根据统计数据，结合本调查中心获得的文案进行研究分析，形成了本份调查报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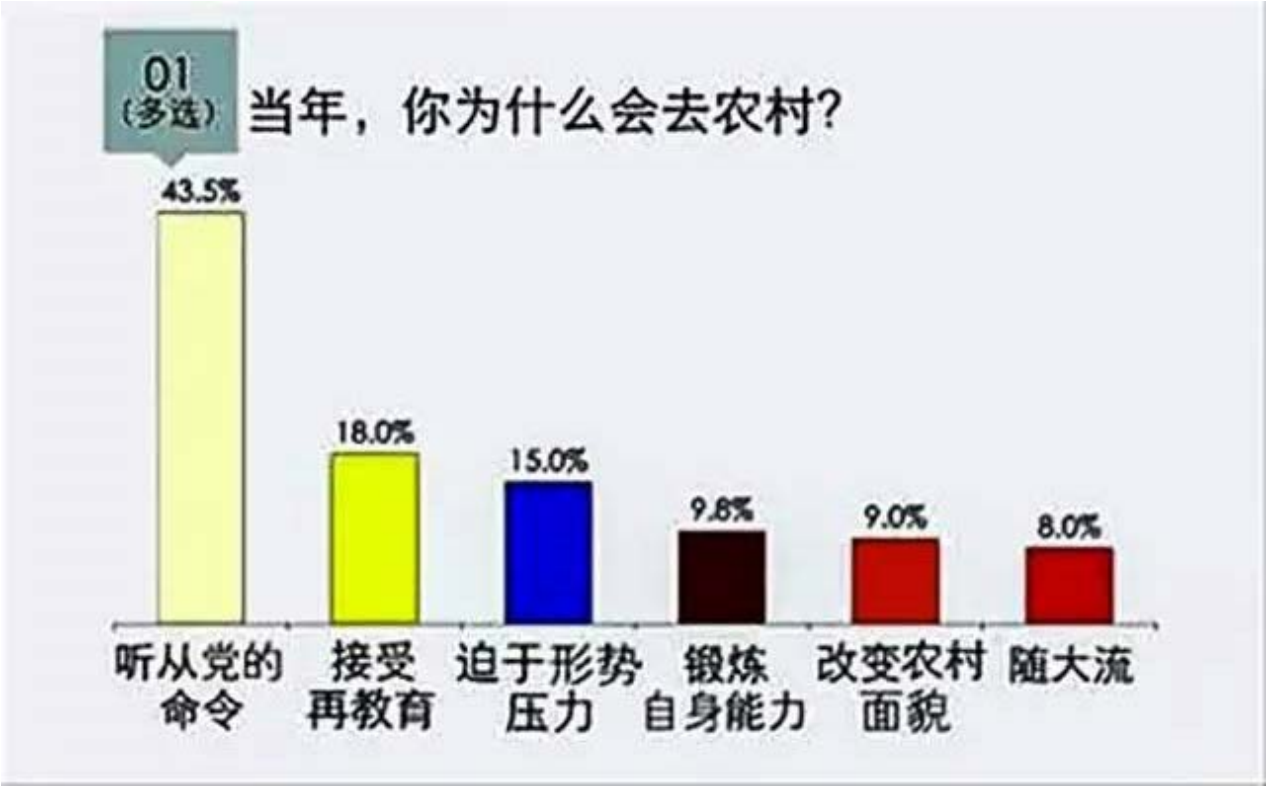
此次调查采用配额抽样方法，运用问卷面访方式进行，由复旦、同济、财大、上外等上海高校部分学生实施。在被访调查对象中，男性占60.5%，女性占39.5%，59岁以下占13.1%、60-63岁占55.2%、64-67岁占24.3%，68岁以上占7.4%。当年上山下乡地点在东北、内蒙古、云贵占49.5%；安徽、江西占21.4%；上海、浙江占12.6%；其他省市的占16.5%。当年上山下乡的类型中，插队的占40.5%，集体插队或国营农场的占24.7%，生产建设民团占31.7%，其他占3.1%。

青春风华，激扬还是幼稚

有一位作家曾这样说：“青春是用来追忆的，当你怀揣它时，它一文不值，只有将它耗尽后，再回头看，一切才有意义。”

曾经的知青，现在大都是60岁以上的人了，经过40多年生命过程的沉淀，回首青春时期的经历，现在更多的是冷静和理智。知青去农村，上世纪50年代起被倡导，60年代而展开。对当时的知青来说，他们到农村去，是为了消灭“三大差别”，带有积极的理想主义色彩，邢燕子、侯隽、董加耕等一大批优秀青年，便是他们的典型代表。到了1968年，则是城市里初中、高中以及中专、技校的毕业生，随着“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最高指示，毫不例外奔向广阔天地，当时的说法叫“一片红”。

调查表明，不管是早期的下乡，还是以后的“一片红”，大部分年轻人是比较自觉的。有43.5%受访者表示，去农村是听从党的指示；有18%的受访者表示，是自觉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有15%的受访者表示，是迫于环境和形势的压力。以后依次为，希望在农村锻炼自己的能力，改变农村的面貌和随大流。（见表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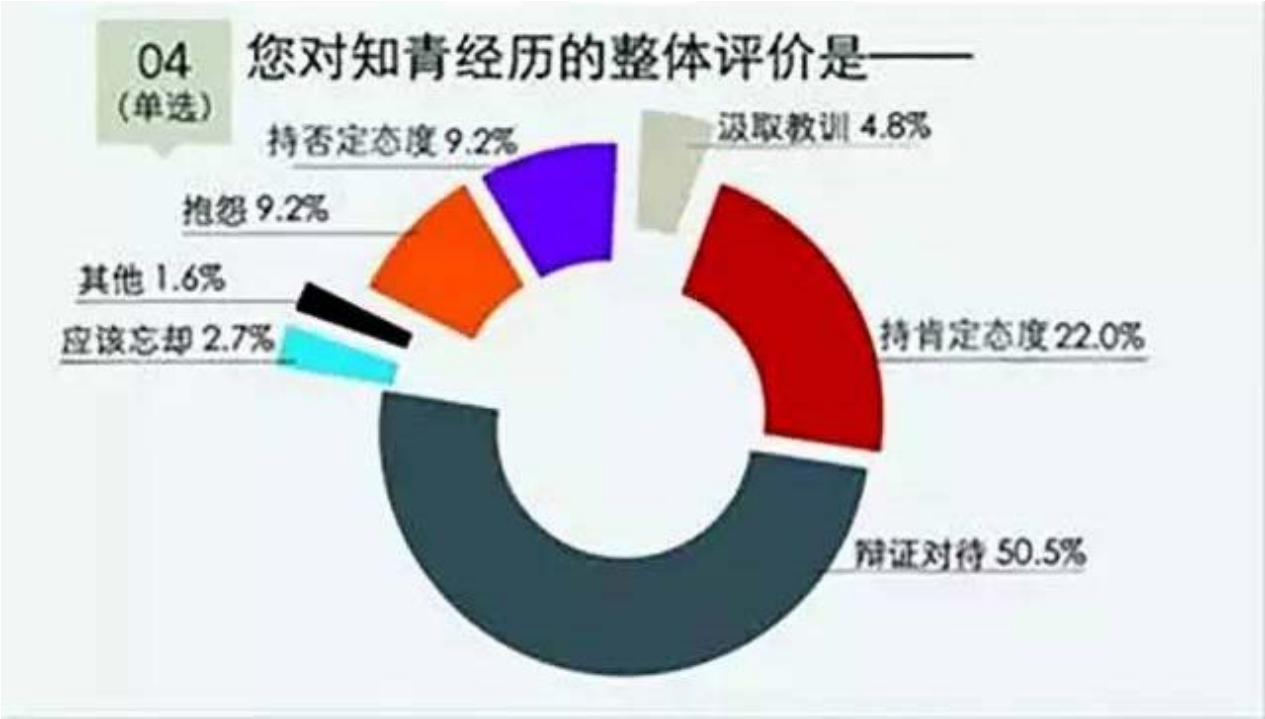
上山下乡，砥砺还是磨难

20岁不到的青年人，凭着一腔热情，来到农村。青山绿水，偶尔居住，是一种享受。但是，当经年累月生活在这里的时候，那些艰难是难以想象的。北国严冬的冰封千里，南国的湿热百虫，让城市的青年极度困苦。即使在上海崇明农场，知青田先生也是感慨良多："不说农忙时候的抢收抢种了。就说冬天吧，传统是冬闲。但是，农场冬天要修水利，疏浚河道。天寒地冻，上千人沿河排开，一批人下到河里，用铁锹一锹一锹挖泥，一批人用竹簸箕把泥从河床挑到河堤，从日出干到日落。这样的劳作要持续1个多月。"不过，田先生还是有些骄傲："那时候，农场的河道，绝不会淤塞，河堤则像石头砌的一样齐整。"

极端困苦的生活，极度原始的劳作，极其可怜的收获也使知青反思。知青卜大华于1968年去陕北插队，他后来回忆说："到了陕北，我第一次发现，中国还有这么落后、贫穷的地方！那些曾为革命洒过鲜血的老红军、老农民，仍在吃糠咽菜，看到这些，我流下眼泪！这是我用自己的头脑思索后得出的结论。"从这层意义上说：知青的艰苦岁月也是思想解放的萌芽。在本次调查中，有75%的受访者认为知青经历让自己接触到了人民大众，更深刻地了解到了国家的现状。

艰苦的生活让更多人思考。在本次调查中，当问及对知青经历的整体看法时，有50.5%的受

访者选择了“辩证对待”；有22%的受访者认为这段经历值得肯定；有9.2%的受访者抱怨知青生活；同样有9.2%的受访者认为自己的知青经历应该否定。以后依次为，应该汲取相关教训，应该忘却这段痛苦的经历。（见表4）



进入新时期，知青们花费了更多的努力追赶时代步伐。他们中的不少人已经取得了令人敬佩的成就，成长为社会的中坚。知青经历磨炼了他们的意志，让他们走出青年时代的狂热，走向成熟和理智。在本次调查中，认同知青经历“丰富了人生经历，加深了对生活的思考”的占了81.8%；认为知青经历对自己事业有所帮助的占了88.1%。

回城之际，兴奋还是叹息

1973年，知青在农村的情况开始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毛泽东主席当时对一封知青家长的信作出批示：“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1978年10月，云南景洪农场教师、上海知青丁惠民等人给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写了一封公开信，希望在中央帮助下返城。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知青回城从云南开始，当时任农林部副部长、农垦总局局长的赵凡，受中央派遣到云南调查国营农场的知青问题，当时他的另一个身份是国务院知青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赵凡到昆明后，连夜到农垦局了解情况，然后和各层级的同志开会，成立解决知青问题的领导小组。经过调查研究，赵凡和时任云南省委书记的安平生给中央打电报：在自愿的情况下，愿意留在农场的欢迎，好好搞建设。不愿意留下来的都走，分四批两年完成。

自此，波澜壮阔的知青上山下乡潮，转化为知青回城潮。1980年，中央书记处决定从这一年暑假起，应届毕业生不再上山下乡，上山下乡运动就此终结。

但是，一部分知青回城之后不久，发现名为“知识青年”的他们，并没有多少可用的知识。著名作家张贤亮说，这些知青离开家庭，荒废学业，到农村滚了一身泥，再回到城里的时候一无所有。

而在本次调查中，对“知青经历给您一生带来什么遗憾”这一问题，有49.3%的受访者认为，知青经历带来的最大遗憾是失去了正常读书学习的机会；有17.3%的受访者认为，背井离乡失去亲人关爱和家庭温暖；17.3%的受访者认为，失去了正常的青春体验。以后依次为过分劳作损害健康，特殊经历损伤心灵等。（见表2）

知识青年的学历按照今天标准来看并不算“高”，他们大多只接受了初中或高中教育就离开了学校，在随后的十年中荒疏了学业。上海知青叶辛提到：“我们这代人中出现了知青作家群，出了几个全国有名的知青作家，但是在我们这代人中几乎没有出优秀的化学家、物理学家、医学家……自然科学的很多东西必须要循序渐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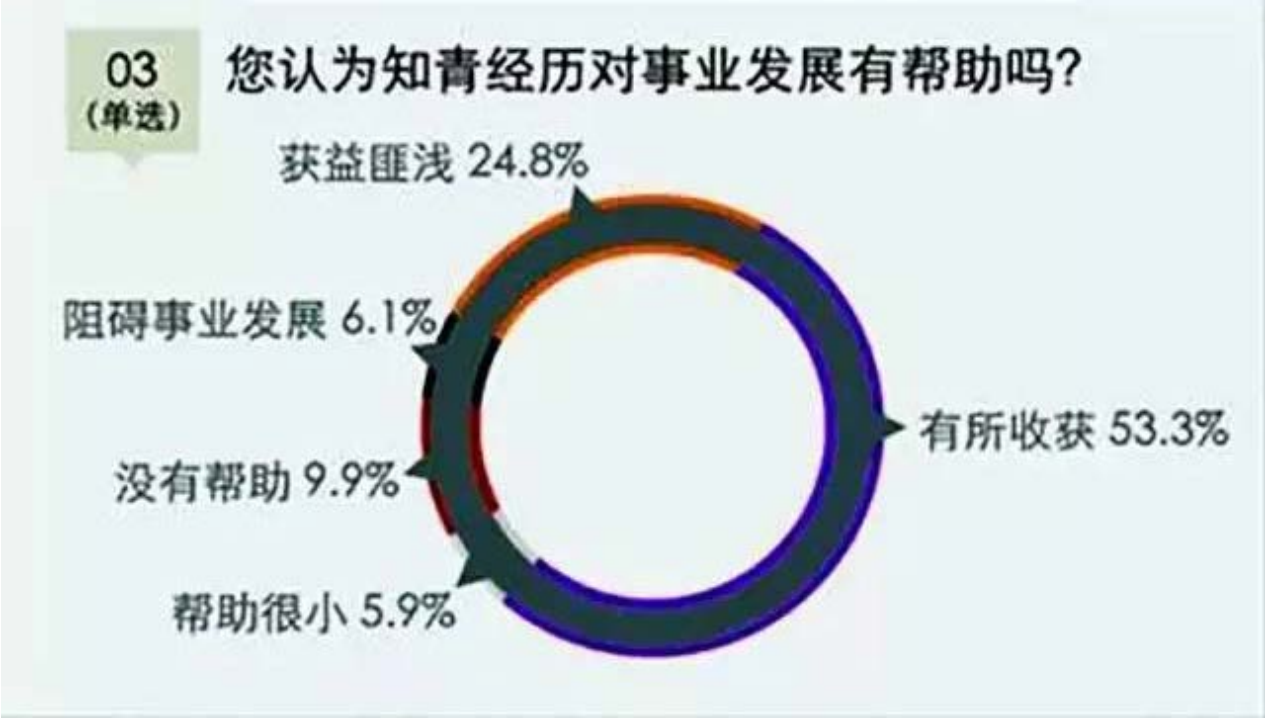
国家个人，命运与否相连

1700万知青从中国的大城市、中型城市涌进广阔的农村，场面可谓波澜壮阔，这是一段令

个人和国家都难忘的岁月，它掀动了整个社会，触及了无数家庭，但这一代人的命运，始终和国家的命运紧紧相连。

受访者范先生异常平静：“首先，知青上山下乡，不能脱离特定的历史背景，尤其是计划经济的背景来看待知青上山下乡的问题。其次，‘文革’前的知青上山下乡是国家劳动力调配工作的重要一环。旨在为无法在城市升学就业的青年开辟新的就业道路。最后发展为‘一片红’，具有明显的延续性。无论是主动要求去的，还是被动下乡的。都是当时的形势使然。大约2000万知青在这样的形势下去了农村这个广阔天地。”

在被问及您认为知青经历对自己事业发展是否有帮助时，有24.8%和53.3%的受访者回答获益匪浅和有所收获，有5.9%和9.9%的受访者回答帮助很小或没有帮助，只有6.1%的受访者认为自己的知青经历阻碍事业发展。（见表3）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场运动，对这一代人正确地认识自己，正确地认识历史发展的内在规律，正确地认识这个伟大的民族和国家的未来，都有很大的帮助；同时，对于广大中国农村而言，大批知青的到来，缩小了城乡“三大差别”。在此后近20年内，知青们成为了乡村民办教师、“赤脚医生”、农业技术人员等，是农村发展的带头人。他们的到来不仅增加了农业劳动力，也在短时间内向原本封闭落后的农村传播了先进的知识与思想观念，为后来政府执行农村政策起到了重要的启蒙和铺垫作用。而且，这种社会支援方式与平衡发展的观念，使广大城市青年对中国乡村产生了深厚的情感联系。在本次调查中，有70.2%的受访对象认为，上山下乡的地点是自己的“第二故乡”。

受访者顾女士说："我们这一代人，一起下乡，一起回城，都和国家的形势紧密相连。和任何一个时代的人一样，我们中有的人，经过磨难，事业有成。有的人成了政治家，有的成了企业家，有的成了教授专家。不过，大多数人是普通市民。我现在退休了，退休工资不高。由于过去读书少，个人发展机会也不多。而我的孩子就不一样了，事业有成，我也感觉不错。"

上海知青叶辛说道："回忆这段难忘的岁月，对我个人来说，第一，在上山下乡的日子里，我思考了我们这一代知青的命运……第二，插队生活教会我用农民的眼光看待都市、省城、上海，这是我人生经历中最大的一笔财富。正是在这些日子里，我思考了上山下乡知青这一代人的命运，了解到中国农民的生活是怎样的……我觉得这段经历非常珍贵，影响了我的世界观、价值观。第三，因为经历过上山下乡，我由衷地感觉到，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人开始聪明起来，灵活起来，选择了一条比较正确的道路……所以我觉得这30年是中华民族，或者说是我经历的60年中最好的30年。"

转载自微信公众号：兵团战友

华夏知青网不是赢利性的网站，所刊载作品只作网友交流之用
引用时请注明作者和出处，有版权问题请与版主联系
华夏知青网：http://www.hxzq.net/
华夏知青网络工作室

记我们的三十年——听谢小庆教授讲故事

李俊天

（北京市飞行者航空科普促进中心）

三十年，小的时候经常听大人们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一晃我已过而立之年。

都说三十年很长，长到科技发展、人类进步、岁月更迭、时代变迁。谢教授回忆他自己的三十年，让我憧憬三十年后的我们。或许也像谢教授一样，站在舞台上，分享他刚刚经历的三十年，就仿佛是昨天。历史在别人耳边，是个故事，但是在亲历者身上，却饱含着岁月的沧桑。

谢教授说，最好的教育不是“经师”，而是“人师”，而人师为何好？因为人师在教育中讲的是故事，好的故事胜过十万个大道理。

人总是会对号入座，因为总是会有比如，或许，假设，如果，这个主人公是我，而这一切最多体现在大多数普通人看待自己的命运中。

这或许是个很好能印证自己的过程，我们如果总是告诉别人，我们吃过多少盐，而不告诉吃盐的时候是咸是甜？那么吃了再多的盐，在别人眼里也无济于事。

谢教授讲到吕玉兰和总理的对话，声音哽咽，泪流满面。似乎我可以体会到他的心情，也仿佛因为我知道一些那个时代的故事，所以我会有体会。

虽然，时代在进步，科技变得发达。但是从古到今，历史的道理是相通的，如今，是我？还是谁？还能去做一个吕玉兰？那个名字似乎，在百年后，不会有多少人再记得。

曾经我也问我自己，我们做通航，到底是要改变自己？还是要改变别人？到底是要为赚钱？还是为了名垂青史？或许我今天在谢教授的故事下，我明白了，青春只有一次，而我能做的只有青春无悔。去干一件轰轰烈烈的事，不在乎结果是什么，不在乎未来会怎么样？只要不忘初心，那就加油干！

前三十年，我们在学习，在生活。

后三十年，我们也在学习，但我们更应该去与社会共同进步，陪伴和传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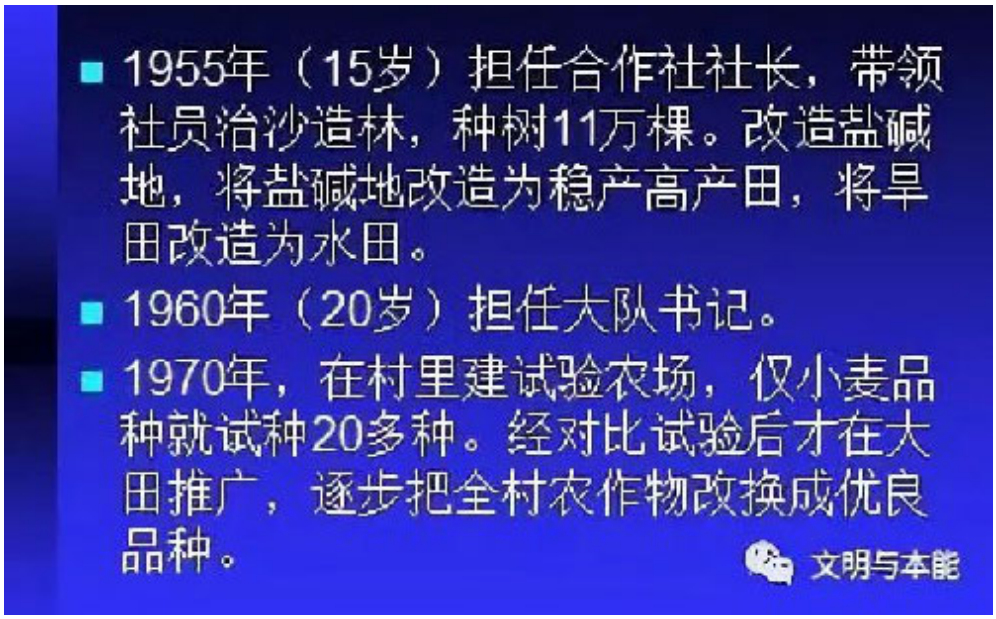
或许也会有一天，我也会出现在讲台上，讲述自己三十年的故事。或许我也会声泪俱下，不是伤心，而是感动。用我们的心血谱写自己的历史，讲述自己如何用小小的科普，推动中国航空产业的发展。

青春只有一次，

就让我们青春无悔。

2019年4月27日

谢小庆老师讲座PPT中的几页：



1972年11月23日深夜12点，周总理在北京饭店接见刚刚出访归来的中国青年代表团成员。事后，玉兰在笔记本上详细追记了这次接见的详情。

当吕玉兰汇报到她所在东留善固村当年粮食亩产达到800斤、皮棉亩产达到100斤时，总理说："不错，过了长江。全县也上500斤了吧？"吕回答说："全县亩产只有260斤，其中44个大队是学大寨先进单位，粮食产量上了'纲要'（达到亩产400斤）。"

在详细询问了吕玉兰在担任县委书记之后参加劳动的情况和读书学习的情况之后，周总理说："你到县上工作，要争取临西县3年实现东留善固化。"

谈话进行了1小时20分钟。由于已是凌晨1点多，时间已太晚，尽管总理似乎还有话没有讲完，还是结束了谈话。

文明与本能

第二天，24日，刚吃过早饭，邓颖超同志亲自给吕玉兰打来电话，说总理还没有跟她谈完，委托邓颖超同志继续与吕玉兰谈。上午10点钟，邓颖超派车把吕玉兰接到了中南海西花厅，详细地向她询问了东留善固村和临西县的基本情况，同吕玉兰一起具体研究了临西县实现东留善固化需要的时间和措施。从上午10点到下午1点，谈话进行了3个小时。

文明与本能

当天晚上，在一项外事活动中吕玉兰再次见到周总理。周总理再次嘱咐吕玉兰要争取临西县3年实现东留善固化。

当总理到各桌祝酒来到玉兰面前时，同她碰杯，说："玉兰，3年！"

吕玉兰说："3年。"

总理又说："3年，要东留善固化。"

吕玉兰使劲地点了点头，泪水夺眶而出。

其后的3年，从1972年到1975年，"为3年实现东留善固化而奋斗"成为20万临西人民共同的心声。一场"学大寨"、"学东留善固"、建设新临西的热潮在临西大地上滚动。

文明与本能

- 1973年 东留善固大队亩产超千斤，每年向国家交粮是邻近大队的几十倍。
- 1973年后 受周总理委托，将本村的高产经验向整个临西县推广，带动全县产量快速增加。

文明与本能

吕玉兰没有辜负周总理的嘱托，为临西的建设呕心沥血。临西人民也没有忘记吕玉兰。

我浏览网上2016年以来临西人民纪念和学习吕玉兰的文章，深受感动，也多少出乎我的意料。至今，吕玉兰艰苦奋斗建设家乡的精神，仍然在激励和鼓舞着临西人民去创造更美好的生活。

文明与本能

当年吕玉兰带领"姑娘队"种下的治沙树林。

（谢小庆2014年10月15日摄）

文明与本能

作者简介

马小冈，男，1948年生人，曾在中直育英小学校（现在的北京育英学校）、北航附中（老三届）、中国人民大学（1978级）就读。下过乡，扛过枪，进过厂，经过商。当过杂志社总编，音像出版社社长，文化中心秘书长，经济研究员，民企总经理，国企董事长。中南海下海干部第一人（1984.10）

我们这一代人，可能永远离不开“知青”话题了。

前些时日，因在北京“鸟巢”举办《与共和国同命运》知青展，知青是否青春无悔的纷争重新浮起；同时，对一代知青风霜雪雨的经历，某些人夹枪带棒地非议早已构成网络暴力的组成部分。我的大学同班有近60%的知青，我的中学同学则90%是知青，如此对知青肆无忌惮地攻击，殊不知会在他们心中产生怎样的反弹？

许多知青喜欢引用司马迁《报任安书》中的一段话：“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氐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这段话似乎暗合了某些知青唱颂的“青春无悔”。由此一些知青认定，因为逆境催人发愤，所以应该无悔。

历史上因为身处逆境而成名者不计其数，当他们回首往事时有权感慨甚或自豪。身受宫刑的司马迁无悔吗？是的，他似乎说了无悔：“虽万被戮，岂有悔哉？然此可为智者道，难为俗人言也！”即司马迁所言之无悔，并非常人能够理解。因为司马迁之无悔是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草创未就，适会此祸，惜其不成，是以就极刑而无愠色。仆诚以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可见他之所以无悔于偷安苟活，是因为他忍辱负重将全部身心放在了撰写《史记》上了。

但是司马迁真的无悔吗？非也。他在《报任安书》中感慨“诟莫大于宫刑”，并就此悲伤地说：“仆以口语遇遭此祸，重为乡党戮笑，污辱先人，亦何面目复上父母之丘墓乎？虽累百世，垢弥甚耳！是以肠一日而九回，居则

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所如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足见司马迁痛悔到了极点。

但是无论如何，汉武帝的残忍“成就”了司马迁的伟业。可司马迁就应该为此感恩于汉武帝吗？他应该向世人唱诵生命无怨无悔吗？难道历史可以这样轻松书写吗？

公元135年，古罗马大军把犹太人逐出巴勒斯坦家园，受尽磨难的犹太民族从来不会哼唱无怨之歌。恰恰相反，从被逐出故土的那一天起，虽经1800多年的漂泊生涯，犹太人从来就没有忘记过重返自己的家园。

也许遗忘是人类的天性。今天居然有知青对那段蹉跎岁月以受虐癖的心态呻吟着——青春无悔。悲夫！许多主张看上去光鲜堂皇，但倘若那种主张成立，沿着那种思路走下去的结果是什么？莫去自寻烦恼？抑或是“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其实许多看起来繁芜的历史灾难，背后都隐藏着一个清晰的本质：无论是从人类进步的必然趋势还是人口流动的历史规律来讲，“上山下乡”都是逆潮流而动。而鼓吹“青春无悔”者是主客体的错位，是把知青政策的放逐意图与知青群体的愤发图存混为一谈。如果知青的蹉跎命运可以做“无悔”唱颂，终将导致对那个荒诞政策的粉饰或掩盖。

我绝不认同倒错的讴歌。因为那种荒诞毁掉了整整一代人的青春甚至生命。1700万城市青少年被扫地出门啊！在此之前的世界文明史上，何曾发生过如此无情地将中小学生从城市驱离的行径？公元1590年，神圣罗马帝国的奥地利萨尔茨堡大主教下令驱逐城中所有的新教徒，而这些家庭中不足15岁的孩子则要留在城里，交由天主教家庭领养，数万家庭从此被强行拆散，此一驱逐新教徒的行径成为萨尔茨堡永远的伤痛。

三百余年后，中国无数不足15岁的孩子被冠以“知青”的标签从全国各地的城市中被逐出，他们与父母天各一方，骨肉别离。更为悲哀的是，那种拆散和驱离竟然是在一种史无前例的大潮流挟裹下，由家长们“自愿”押解自己的孩子走向一片被称之为“可以大有作为”的陌生山乡，而那些惶惶然如丧家之犬的青少年们当时只有哭泣的权利。这就是文革造就的知青。他们的青春怎么能够用无怨无悔来抚慰？

北京站，即将赴内蒙莫力达瓦插队的北京知青，右1李冀安，中间者杨小勤，左1江辽东。

然而，当今天已成社会边缘的知青逐渐老去，一些人竟然指戳他们近乎苍凉的背影说，比起农民的日子，你们知青算什么苦难？这种非议在网络语境下居然调门颇高，对此我侧目无语，皆因对话不在一个层级上。

我曾经问过众多第一代进城的白领，如果今天以一种你们完全承受不起的高压手段逼迫你们敲锣打鼓“欢送”自己的子女离开城市，把他们发配到举目无亲的“广阔天地”落户开荒，去接受农民的再教育，你们欣欣然否？回答皆愤愤然。

呜呼！当苦难可能降临到自己头上时，他们才会有切身体会。指戳知青者永远都搞不明白，知青的苦难并非筋骨劳作，而是心灵摧残。倘若尔等仍以小农心态去比照世界，则永远走不出偏狭的心地。

回望知青蹉跎之途，他们确实“与共和国同命运”，但是知青的中坚分子——那些“老三届”里有相当多的人却成为无权无势的弃儿，他们该向谁去讨回被夺走的年华？生命是不能够任意蹂躏的，如果这种对人性的摧残可以淡忘可以粉饰的话，那么天下所有的荒诞都可以赦免。

也许有人辩解说：“上山下乡是为了解决知青就业”，但是笔者不以为然。如果“就业”的理由成立，就无法解释包括小学生、初中生在内的未成年人被逼迫上山下乡的事实，无法解释早已就业的机关干部和知识分子被遣散到五七干校的事实，无法解释科研院所和大专院校被迫关闭的事实，更无法解释自“一五计划”以后走工业化道路的国策。

只有认错，才能自强。上山下乡政策的实质，是以乱政收拾残局，是农耕意识与浪漫异想杂交的奇葩，此与文革的发动一脉相承。史无前例的上山下乡运动是不折不扣的倒行逆施，发动这场运动的本意就是“思想改造”，是强迫用体力劳动的办法修理所谓的资产阶级思想——“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是上山下乡政策的总注脚。

然而很不幸，上山下乡运动的结果与始作俑者的意愿相悖，它劳民伤财积怨甚深，最终以失败收场。尽管它蹂躏了整整一代人的肉体和身心，却造就了“知青一代”的发愤与坚韧。如果说存在一种知青精神的话，笔者认为可以用司马迁的那句“发愤之所为作”来概括，但这恰恰不是上山下乡政策的初衷，大可不必用矫情的“青春无悔”来消遣一代人的苦难与辉煌。

谨以此文泣告我的中学同班好友李冀安同学

注：李冀安，男，1948年生，老三届人（北航附中67届高二），1968年赴内蒙莫力达瓦插队。返城后生活无着落，虽经老同学合力救助，但终因贫病交加于2010年病故，时年62岁。其父李呈瑞，原68军政委，转任海军航空兵政委，1955年受衔少将，文革中含恨去世。

转自微信公众号“新三届”

华夏知青网不是赢利性的网站，所刊载作品只作网友交流之用
引用时请注明作者和出处，有版权问题请与版主联系
华夏知青网：http://www.hxzq.net/
华夏知青网络工作室

泪洒何处咒此生——忆老友甘铁生

七月十七号，友人从北京传来消息，五十五年前，一九六三年相识、相交的清华附中老友甘铁生，于十八点五十二分离开了这个世界。

人有悲欢离合……但是天人一别，对生者却是撕心裂肺，哀恸逾恒，让你痛到麻木；和你关系密切的亲友让你再次深切地体会到离别对于生命的意味——我们再也不可能相逢、相聚，一起面对人生、人世间的各类问题，面对各类美景，各类困苦……。一切的一切，从今后只有在梦中！

1

我和甘铁生在清华附中不是一个年级的，他比我高一级。六三年我上初三的时候，他考入我们学校的高中。就在那年秋天我认识了他。

考进清华附中的每一个人都觉得自己是国家的栋梁，未来将会创造出一番事业，一番如同教科书上记载的那些名人那样的贡献，或是科技发明，或是隽永的文学、艺术创作。但是，就在那个年代——六十年代初期，学校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未来对于每一个孩子来说，首要的是必须追随一贯正确的共产党，做共产党指定的革命事业的“革命接班人”。为此，大约从六二年开始，铺天盖地而来的是革命教育。

那时的革命教育使得学校大力推动朗诵背诵革命诗歌。而我就在这浓烈的革命诗歌的气息中认识了甘铁生。

那年，他所在的高一第一次在我们学校举办了诗歌朗诵比赛。我从初二开始，就一直大量摘抄、背诵贺敬之、郭小川等人写的各类革命诗歌，所以当然特意去了他们比赛的现场聆听观看。甘铁生参赛朗诵的是“雪松”。到如今我还清晰地记得那天晚上，站在台上的甘铁生的神气、声音。他精瘦的、充满棱角的脸上，两只眼睛木雕一样地浑圆突出，说它有神，它却没有光泽，说它没神，它却让你感到，它在空中穿过不受任何东西的干扰，也不和任何东西交往。既好像“是”却又好像“不是”性格使它如此。没有人能够说清楚究竟是什么导致它如此。

这个感觉大约贯穿了我一生对甘铁生的迷惑，看来有性格，却又没有性格的光彩，看来没性格及才华，却又有

如此的傲然不群。那个年代把握不住这一切的我们这些少年，最后只有把“机会主义”这个词送给他，和他联系在一起，叫他“甘机”，而甘机这个绰号伴随了他一生。这个绰号竟然如此广袤，因为它听来竟然还有“干鸡”的意味。所以一经叫开就再也没有人去细究这两个字的意味，甘机实实在在地成了他的符号。

我相信，凡是他的朋友听到甘机，就立即会想到那个嘻嘻哈哈，没心没肺的甘铁生，这个甘机，很多时候甚至让人感到在社会的巨大的起伏中他有些没情没义、寡廉鲜耻。可你无法说清那是他的错，还是社会的扭曲，是他对社会的报复，亦或不得不如此。

六三年初冬的甘铁生，双眼的眼光凝结在空中，字，没有标点符号般地一个一个地喷吐出来。因为我抄写过这首诗，所以没想到会有人以这种方式朗诵它，于是这词句及声音就更深刻地记忆在了我的脑海中，至今还能够复述出不少：

“沿着边疆的小路，复员队伍走上了山岗，朋友啊，你看山峰又高又陡，你背着行李已难行走，为何还背着这盆雪松，你说这盆雪松吗？

它不是普通的一株雪松……”我清楚地记得，那次朗诵会的另外一个极具特色的朗诵声音。我的乒乓球队的队友——张开显。他和甘铁生是一个班的，那天他朗诵的是张万舒的“黄山松”。开始两句：

“好！黄山松，我大声为你叫好，谁有你挺得硬，扎得稳，站得高；……”他竟然在静场几乎半分钟后，突然从脑后拔起来一声由低走高的“好嗷……”的长腔。然后水银泻地般地洒出来九个字，“黄山松，我大声为你”，紧接着又是一个拖长的“好”。随后犹如机关枪一般地喷射出“谁有你挺得硬、扎得稳、站得高。”……

如此不寻常的朗诵……虽然当晚的竞赛甘铁生和张开显没有得奖，可这两个城里考来的学生也让大家开了眼。而甘铁生也用他那独特的朗诵声音和腔调，致使我不仅从那时就认识了他，而且那晚他的朗诵，诗句的韵律，甘铁生的在台上的表情永远地留在了我的记忆深处，我甚至在朗诵会后就能够惟妙惟肖地模仿出甘铁生的朗诵，让听到的人叫绝。这个模仿也伴随我到今天。但是我却没想到的是，那首诗的所谓审美口味，竟然如此深切地融化到了甘铁生的血液深处。这个本来不是共产党血统的甘铁生，一生的文字及情绪特点，竟然永远地被禁锢在那类诗词中，那个共产党真理部锻造的文学传统中。此后的一生，无论甘铁生在政治上持什么观点，无论他是痛恨还是无可奈何地跻身于共产党社会中，无论他是在民间文学、地下文学阶段，还是在官方的刊物中，他的语言和精神其实都散发着那首“雪松”的气息，那个共产党的文化及时代的气息。这是让我听到甘铁生辞世的消息后，我的悲痛充满纠结的原因。那道带有毒刺的绳索，终生捆绑在甘铁生的灵魂上，混合在血液中在他的全身游荡。它让我悲痛欲绝，却哭不出声来，让我空对星空，却不知哭向何处！

实在说，甘铁生在清华附中不是一位才华出众的学生，而是挣扎在跟随者的队伍里。可是就我的了解，和我们这些人不同，他其实一直志在文字及人文学科，而不是理工。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文化大革命的开始，对他来说似乎是个解脱，在同辈的同学中，他在文化革命中的声誉及活跃程度远过于前三年正常的上学时期。

清华附中的文化大革命是从一九六六年的四月开始的，那时候伴随姚文元对于海瑞罢官的批判，伴随林彪推出的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及无产阶级专政，以一小部分干部子弟为主的学生对于已经极左的校领导提出更极左的要求及批判。所以我们这些平民子弟自然就走到了一起。

一九六七年一月底，戚本禹代表中央文革到清华附中井冈山兵团来。现在想那是因为清华大学蒯大富的女友刘刚所致，她是我们学校高六五六的学生，因为和老蒯的关系，也因为出身好，是我们这派的挂名头头。而这就让我们这派也沾上了中央文革的边。

那是大约十点多的样子，戚本禹和王力来到了我们的宿舍楼。一楼有一个里外间的办公室，在那里我们附中井冈山的主要人员，还有临时召唤来的一零一中的造反派组织，以任功伟为头的毛泽东主义红卫兵。那是我第一次在如此近的距离见到“中央首长”，我的几乎可称为小老乡的戚本禹。对于我这个孩子来说，他那时年轻，只有三十六岁，可说是仪表堂堂。他和王力一起来的，可听他讲话，看他的神气，王力倒似乎是他的助手。所以我那时很有几年真的是很佩服戚本禹。

那晚，最出风头的是任功伟，因为在挤满了人的两间加起来也就四十平方米左右的空间中，居然只有他能够有条不紊的侃侃而谈，并且在谈话中提到了联动们提出的我们这代人二十年后的对抗问题。我疑心这看来很有远见的考虑也打动了戚本禹。为此，从那晚开始，我们清华附中的造反派就和一零一的有了紧密的联系。而这个联系我也想不起来为何从开始就是由我来参与运作的，或许可能是我和师大女附中的史保嘉在那时认识，而由她通向了一零一中，以及城里的很多学校的人。而史保嘉是我在大学的范希安那里认识的，范希安是我们学校六二级的，六五年考入大学。由于他曾经也在学校乒乓球队，所以我们很熟悉。他妹妹范希芸跟我一班，哥哥范希明是我校六零级学生，六三年考入清华大学，一家子清华附中，一家子清华大学，是清华附中的标杆性的学生。文革开始后，他负责大学井冈山的中学部，我经常到他们那里去拿各种材料，为此也认识了徐一飞，以及师大女附中的史保嘉、潘青萍和戎雪兰。

就在六七年初的那一段，我逐渐认识了越来越多的城里学校造反派的人，尤其是在四月三号中央文革讲话后，在中学出现了四三、四四派后。因为那一段时间，很多学校的四三派的负责人甚至处于被隔离审查，被整肃状态。究竟为何清华附中井冈山的对外联系，竟然几乎都是通过我，现在回忆大约就是因为大学范希安负责的中学文革办公室。通过他们，我认识了很多中学各派的人。

甘铁生在文革中的活动跨越出清华附中，我想应该是通过我，至少是和一零一中的联系。现在回忆，我认为最早是女一中高三的一位认识我的女孩子，到清华附中找我，我不在，甘铁生接待了她。后来他们自己有了直接的联系，我那时疑心甘铁生对她产生了好感。

六七年夏季，由于各地武斗加剧，出去串联的人重新又多起来，学校里无事，于是大家开始读书、讨论，消磨时间。大学造反派的头头蒯大富的好友北航的韩爱晶也在和地院的朱成昭对峙中开始越来越多地考虑未来问题，他在中央文革的所谓接见中谈过几次，受到江青们的重视。如是，韩爱晶甚至为此和我们这些孩子，中学造反派座谈过几次，部分是为了了解老红卫兵们的思想动况，从而了解中央的动态，部分也是交流思想。这个交流的对象自然包括最早提出这个问题的任功伟。因此，这个考虑未来，以及开始读书倾向，在我们这群无学可上的孩子中开始蔓延发酵。

我记得到六七年春天开始，我们这个经常来往的四三派群体除了师大女附中、一零一中的外，已经包括五中的何玉舟、八中的华友群，三十五中的常汝奇、郝仁，六中的李丰、女八中的周虹、外院附中的杨志栓、二十八中的王宇、侯英等。我由于在附中找不到其他人可以和我结伴参与这个交往，于是找到甘铁生，他对此很有兴趣，也就此走出了校门。由于任功伟那时候可说是核心人物，所以甘铁生也从此和一零一中的联系开始密切起来。

六八年四月，四三派一周年的时候，我们觉得所谓党内斗争更加激烈，于是我和甘铁生，以及其他同学一起讨论总结起草了一篇中学运动的七十一个为什么？那个时代流行的是，谁能够抢在党内斗争的风头上发表些东西，未来受到中央的肯定，谁就能够及时扩大个人及组织的影响。为此我们的这个讨论稿连夜由甘铁生总结出来，并且大家一起抄写成多份大字报。就在那个周末，甘铁生和我，以及三四个别的同学，蹬着平板社，拉着几桶浆糊和写好的大字报、大标语进城，一夜间在东西单，东西四等几个主要地方贴出“中学运动的七十一个为什么”，以及相当数量的大标语。第二天清晨六七点钟才返回清华附中。在回程的路上，有同学蹬着平板车几乎就睡着了。甘铁生和我则都属于那类精力充沛的，永远不知疲倦的人，我们一路开玩笑让大家免于睡着。

那篇“七十一个为什么”，不谈内容，单就影响来说，应该说是甘铁生第一次在社会上产生相当影响的文字。还不仅如此，这篇文字可以说是甘铁生六六年参与文化大革命以后，我想他自己也会觉得的是最重要的一篇文字。在我看来，从那时起他就已经可以被称为那几年的文革中，一个派别中最重要的写手了。就我对他的了解，他也是希望得到这个承认。

3

六八年春天后，学校中的派斗更加激烈，甚至开始了武斗。当然我们也就更加闲散。已经两年没有课堂学习，

大家都开始考虑未来以及自学。当然对于未来的考虑及自学都离不开社会现实，离不开派斗。最早考虑这些的是最早被排斥出运动的，早期充满野心地到处进攻，迫害“阶级敌人”的老红卫兵。因为出乎他们所料的是，竟然只有四个月，到六六年十月他们就被打到舞台下面、出局了。所以从中学到大学，考虑未来的那时只有他们，而且也只有他们有那个所谓的底气来考虑未来。出身不好的人那时考虑的只是如何避免直接的、眼前的迫害。而后来，六七年下半年开始考虑的所谓未来两派人的对立问题，其实也是被迫做出的反应。因为对于平民子弟来说，他们不仅有受迫害的经历及记忆，而且潜意识地意识到自己不是“亲儿子”，没有本钱和那些占有血统优势的人对抗。尽管如此，他们当然也不会甘愿束手就范。

对于未来的考虑，到六八年春天已经开始成为时髦题目。记得有一次到师大女附中去，朋友告诉我地下室的大会议室中，老红卫兵，干部子弟郑中伟正在主持举行一场关于未来的两派的讨论会，来晚的人只能够拥挤在会议室门外。在这样一种形势下，四三派的活跃分子六八年夏季也从专注于派斗转向了思想交流。

那年夏天，可以说以一零一中的任功伟及其组织中的核心人物，如包国路，即后来的作家柯云路等人为主，开始组织周末娱乐性的聚会，聚会的地点在颐和园、香山，以及城里的各个公园等公共场所。现在想来这大约就是当年北京中学生沙龙的前身。

我和任功伟的性格先天不合，我不喜欢那样的说话气质和表现的人，此外坦率说，大约受了上学时的潜意识的影响，我不大看得起一零一中，乃至四中的学生，认为一零一的太假正经，四中的则太市井气；一零一中的学生被彻底地装在了盒子中，四中的则是在市井胡同中。前者造就的是牢牢地被栓死在社会中的部件，后者的校风则造就了一批混迹于社会的高手。为此报考高中的时候，我和班里五六个相好的同学报考志愿中填写的都是第一志愿清华附中，第二志愿四中，第三是一零一中，很有些疏狂宣示的意思。这个看法一直存在到后来的潜意识中。北京的中学，当时我只看重师大女附中。

在这样一种情况下，甘铁生和任功伟的交往已经开始比我更为紧密。那年夏天，任功伟通过甘铁生邀请了清华附中高六五六的陈丽萍，高六五五的陈淮子，初一的张欣、张力思等参加他们的不定期的聚会。这几个人，除了陈丽萍我交往不多外，后面三个人都和我交往很多，尤其是陈淮子，是当时和我经常谈论未来，所谓有相同抱负的好朋友。我现在已经不能够清楚地回忆起当时是什么心理极为轻视他们这个活动：是完全不看好任功伟及一零一中的所谓有为青年们，还是对于自己的朋友被自己看不起的圈子吸引感到被冷落了，亦或只是不经意的调侃？总之是“无心插柳柳成荫”。在我和我的同班好友，也是高中及文革时的室友高嘉琳闲聊的时候，随手从那时正在批判三十年代的“二流堂”的文章中拈来，戏称任功伟组织的这些人的团体为“二流社”——意思是他们的谈论及品味还不入流。而这个标签也就真的一直贴在了他们这个群体，以及他们那年夏天的活动上。三十多年后，甘铁生耿耿于怀地在文字中提到，我刻薄地给了他们这个绰号：

“真有意思！今日接史保嘉一电话，说美国来一朋友，欲与当年的参与‘二流社’的人聚一聚，聊聊当年的情景。嗨，看来还是有人对这些陈芝麻烂谷子感兴趣！我不免有点像打了吗啡一般来了精神。”提起所谓的“二流社”，我至今也不明白它究竟是怎么回事儿。我只记得，当年跟仲维光（即绰号“洋人”的朋友）聊天时，聊到当年的各种沙龙，我大言不惭地对我接触的这帮朋友推崇了一番，洋人，这个个性尖刻的傢伙，略有贬斥地嘲讽道：“哼，二流社！”似乎从此，二流社的名字就不胫而走。如今，很多人在考证那个风云际会的年月时，竟将它抬到如此高的境界，真是有点出乎我的意外！”（引自网路上的甘铁生回忆）

甘铁生的记忆有误，在这个回忆中他甚至把后来很多六九年后的读书经历放到了六八年。对比于他的回忆，当年外院附中的魏光奇的回忆就准确多了。魏光奇回忆道：

“1968年，北京中学生中陆续出现了一些以读书和探讨政治社会问题为纽带的群体，也可以叫沙龙吧。我介入的一个群体被称为‘二流社’，我至今不知道它典出何处。这是一个以‘四三派’学生为主体的松散群体，101中的任功伟可以算是它的核心，包国路（柯云路）也参加过它的活动，但他与任功伟等人不和。除101中的学生外，经常参加‘二流社’活动的还有35中的郝仁、孙康、常汝奇，清华附中的甘铁生，8中的华友群，四中的范文辉、师大女附中的李宝强等。此外师大女附中的戎雪兰、史宝嘉、孔令姚、夏柳燕等人也参加过‘二流社’的活动。‘二流社’的活动方式是聚会讨论各种问题。我记得在北海、紫竹院、中山公园都聚过，还去昌平的沟崖和十三陵水库搞过一次郊游。一去三天，自带粮食油盐，拾柴做饭。白天爬山游泳，晚上架起篝火，三两成群，说笑唱歌，探讨问题，非常快乐。“二流社”探讨的多是当时的政治问题，如“新二月逆流”、“工宣队”进驻清华、毛泽东与五大学生领袖谈话等等，但有时也讨论理论问题。任功伟等部分活跃者曾搞过一个分工，计划大家分别进行各个理论领域的研究，我和同学杨志拴分工研究经济。不久大家都去插队了，这个计划没有落实。……”这段经历，我本来想以后在写回忆录的时候记述，但是没想到现在老甘竟然如此匆匆地去了。老甘在清华附中学生时代的经历虽然似乎不很辉煌，但是如果回忆思索这个二流社的出现，他却实实在在地是清华附中老三届学生中的先知先觉者之一。他对于清华附中的学生走出校门，关心更多的未来及思想文化等大问题，在从六八年起到七十年代中期那一段时间，不仅在清华附中而且在北京市的老三届学生中的影响及地位，都是相当独特的。在文学及思想的追求方面，虽然清华附中七十年代中期后出了很多共产党社会的著名作家，如陶正、史铁生、张承志们，他们也都比甘铁生有名，然而我必须要说的是，甘铁生远比这些人觉悟在前、追求在前，远比他们在思想和艺术领域中涉及的问题及范围要广。无论后来他走出去多远或多深。他，不过只是因为思想及出身都不正统而在那个社会无法发达起来。因为他所有的思想及感觉，虽然现在看来谈不上深刻，但是真的是也足以让他无法能够进入那个变态的社会，找到和那个社会的文化及政治发生共振的位置了。

虽然如此，这个问题的另外一面也是我现在必须要说的，甘铁生的悲剧在于，他居然终生没有走出二流社的思想氛围，这个二流社和那篇“雪松”一样，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无意中送给他们的绰号，我以为是真切的。在历

史和文化思想的历史潮流中，我们那代人，包括这个团体，是货真价实的“二流社”。要冲破这个“浊流”、“涡流”，需要勇气，需要清醒的头脑，需要敏锐的感觉与才能，即否定自己、反叛及新的认识论、方法论的启蒙和重建！

4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初，甘铁生插队到山西太谷县，六九年四月我插队到吉林洮安县。但是我们走到这一步都是和六八年夏天后的思想及活动有关。而我和甘铁生之所以终生有着剪不断的联系，思想上我们彼此相信与对方永远有着根本相通的地方，这淡如水的“君子之交”更因为清华附中的经历、文化大革命中的经历。

六八年夏天开始，我们那代人走向了上山下乡的高潮。大家开始离开学校，走向社会，走向另外一种生活。从去内蒙和东北兵团开始，第一批大规模的几乎可说涉及所有人的插队是去陕西。由于那是过去的所谓红色根据地，所以我们学校的老红卫兵中的大多数人去了那里。也正因为如此，平民子弟大都不愿意跟他们在一起，不愿再看他们的脸色。而集体选择了第二批去山西太谷。可以说我们这一派的学生大多数都去了太谷，包括我的同班同学及甘铁生。我那时虽然因为独子及烈属而没有被分配去插队，但是因为一腔热血，信奉年轻时要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已经决心离家去插几年队，只不过不甘被学校随意分配到哪儿，而是想要自己寻找一个较好的、适宜自己发展的插队地方。为此，在他们离开北京的时候，我决定跟着到山西看看，而混在了他们的专列上一起到了太谷。我在太谷县呆了三天，虽然那里有几百个我们学校的学生，分散在不同的公社、大队。但是我只去了甘铁生所在的大队，窑子头公社杨庄大队大坪甕小队。因为那个时候我已经想要离开清华附中这个环境。八年的清华园的生活让我感到，清华园的土地和空气培育出来的是能干的工程师式的人才，是好工具，而这就使得清华园的人缺乏思想及眼界，缺乏贯穿古今、人生的气质。因此，从六八年秋天，我已经自觉地有计划地要离开这个群体。而这个群体中和我还有着类似冲动，有着交流的就是甘铁生所在的集体户——窑子头公社杨庄大队大坪甕小队的知青点的人。这是插队在太谷的几十个清华附中学生的知青点中唯一一个有意识地不按照党的上山下乡精神继续生活的青年点。这个点的陈淮子、郑光召（即作家郑义）、甘铁生，都希望除了所谓改造思想的锻炼外，在精神和文化思想领域有更大的发展。

我跟随他们到达太谷县城，又搭车进入太行山深处的大坪甕。那是我第一次见到山西的县城及农村，因此印象极为深刻。县城不大，虽然有不少砖房及院落，但是只有很少的柏油马路，到处都是土路。过去只有在照片、图画和电影中看到的太行山，如今像无边的森林连绵屹立在眼前，汽车在山峰之间的谷地徘徊、逶迤行驰在从太行深处夺路而来的涧水的上下左右，凌厉地刺向山林深处。而大坪甕小队就在太行深处，在只有崎岖的山路才可以到达的半山腰。它的正下方是哗哗的涧水，山村不过一二十户人家。一切的一切对我新奇极了。因为我第一次到一个县城，第一次到农村，第一次进入太行山，第一次经历漆黑的，除了天上的星星，只有些许煤油灯火的自然。第一次

在寂静中只有大自然的风声，山涧的水声，间或的鸟兽声。它让我感到，一个新的、陌生的，不可测的未来生活开始了。我在大坪住了两夜然后就返回了县城，继续向晋南旅行。

第二次到大坪是四年后的七三年夏天。那时，经过了四年的摸索，和我那一代人，那些跟着命运走的中学生不同，我们那个群体都已经基本上走入了自己为自己设计的生活及思想的道路，寻找到自己生活的拍节。虽然这道路是苦是涩、是美是丑、还是变态，领略此中三昧还是几十年之后的事情。

七三年七月，我已经离开吉林洮安县转回北京将近一年，有了女朋友，为此决定利用夏天到山西走一圈。我和女友还学文及三十五中初中毕业的孙康及女友周秋君结伴从北京出发，搭返回山西的运货卡车先到了还学文插队的大同县，然后还学文留在村里，争取被推荐上大学。我和孙康、周秋君则去浑源县，北岳恒山及悬空寺，然后由浑源县出发经平型关去五台山，再从五台山到太原，然后过榆次到太谷，再次造访了大坪甕。

我们在大坪甕住了几天。记得那几个晚上，郑义、甘铁生、孙康、周秋君和我，在漆黑的屋子中，喝酒闲聊，屋外是漆黑的深夜背景下的影影绰绰水墨画般的太行山，山谷中夜间的涧水分外喧哗、充满生机。我们海阔天空地议论，依然充满憧憬，不知道正在消磨的是人生最宝贵的青春岁月。其实那时我们已经走过了不同的人生的十字路口了。我和孙康都已经转回到了北京，周秋君正在办理病退。老郑在为他的女友奔忙上大学的事情。只有老甘，似乎还看不到转变的可能，也没有女友。但是二十多岁的我们，并没有想到很复杂的人生，顾及到更多的悲欢离合。所以套用当时流行的术语说，那时可谓是“狗欢喜的年代”。在大坪甕我混了三天，然后和老郑一起下山。这一次到太谷我还去了西吾，那是我在清华附中的另外一位挚友所在的青年点。然后在那里我和在白卷英雄张铁生冲击下，白白参加了考试的还学文会合，去了华山和吕梁山。

现在回想起第二次到大坪甕，那时我真的是不知道，那个岁月是一代人的悲哀，因为那是人生最宝贵的年代，最宝贵的四年，我们居然在环顾对比左右同辈及社会的时候，充满豪气与骄傲，以为自己充分地利用了青春岁月，超越同代人，已经走了很远。而那一年其实是老甘最困惑的一年，由于有了工农兵推荐上大学，有了抽调工作及回城，人生的不平等再次展开，他未来的不定数也再次展开。

5

就写作来说，从六八年年底到七三年夏天，那五年其实是老甘最突飞猛进的年代。他的最大的优点就是锲而不舍地写作，不管外界说什么。他似乎是一个写作机器，从写大字报开始，到写大作文，写革命抒情诗，写插队的故事，写粉中带黄的青春爱情故事。这也就是说，几乎从六八年二流社开始，他就没有停止过写作。我相信，在我们那群中学生中当时没有人比他在码字上更勤奋；我更认为，老甘通顺的文字，小说简练的结构是在勤奋中、生生地

硬写出来的。

谈到对老甘的文字的评价，我从来不掩藏我的看法和评价。所以老甘如何看待我对他的创作的评价，我也心知肚明。他一定也是用“尖刻”二字。我以为，三十年后他说出“这个个性尖刻的傢伙”不是偶然的。或许从插队的时候，当然也可能如他说的，从六八年时我对于二流社的评价的时候，他就得出了对我的评价：“尖刻”。最初，我对他的直言不讳的评价是，老甘，你还没走出革命青年的氛围，说到底还是人民文学上登载的那一类文学，也就是说老甘还没有在精神上有我们那样的“放肆”的反叛——从政治到个人思想及情欲。

最近这些年，偶尔认真、仔细地思索老甘如何，以及为何如此的时候，我才想到，他的出身和境遇，早就让他明白，他没有任何反叛的资本，也没有能够出格到让人们放到聚光灯下来看的资本。任何与社会稍微异质的行为都会为他引来杀身大祸，生死危机。所以老甘其实是有意地缩在一个坚硬的思想及感情的硬壳之中，绝对不让别人感到和想到他的锋芒及存在。久而久之，从十几岁开始的保护技能事实上就萎缩了老甘的感觉及思想。假作真来真亦假。老甘的人生被他的出身，被社会，被残酷的专制定格在某个地方，被变异了。就像时下转基因的西红柿，不再具有多汁植物稍碰就会出水，乃至腐烂的本能，而是具有了扔到地上都会砸一个坑的坚硬外皮和内质。但是这类植物，失去了本来的味道，缺失了作为生物的植物及人的很多特质。

然而，变异归变异，老甘毕竟是我们那批四三派平民子弟群体中的一员，毕竟在我们那个崇尚反叛的群体中滚过，六十年代末期后我们形成的小环境对他也有很大的影响。所以老甘就是没吃过猪肉也见过猪跑，更何况他是清华附中的学生。六三年的清华附中高中入学成绩在北京市可是最高的。所以七二年开始，老甘决心要给我们一个下马威，展示他也有写那些个让社会感到难受的作品的能力。为此，在七二年到七三年的冬天，老甘推出了一个中篇小说，“第四次慰问”。而这也确实成为我们当时那批参与过文革的中学生、乃至大学生中最具影响力的手抄本小说了。

我至今清楚地记得七三年二月左右，孙康联系一零一中的黄以平及其他一些人，在中关村的王一平（？）家，又是一个里外间的套间屋子中为甘机举行了朗诵会。我记得，王一平的父亲是王玖兴，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的翻译者。他家的人都下放了，所以两间屋子中只有床和桌子等少许家具。我们大约有二三十人拥挤在屋子里。早来的就盘腿坐在床上，也有坐在地上的，后来的就挤在门口。甘铁生朗诵自己的作品，大约朗诵了两个多小时。听完大家一起谈看法。在这部中篇小说中，甘铁生几乎把那几年我们这个群体中的那些骇世惊俗的行为都罗列到了小说中，把当时社会的黑暗赤裸裸地抖落出来。正统的人听了感到震惊，因为这个写法和事实，竟然和社会现实，人民文学几十年来的调子和气氛如此不一样，这不一样让人强烈地感到它的乖戾。这个乖戾，据老甘说，在有文革中毕业的大学生参加另外一次朗诵会中，不少大学生听了几分钟后，自我保护的本能立即发作，赶紧悄悄地走了，以免沾染上硫磺气，招来警察调查。然而老甘笔下的这一切，对我们这些人却是太熟悉了，且久闻而不觉得有味，只是感到还不过瘾。为此，在讨论中我坦率地对老甘说，所有的人物及细节都有出处，但是你却没让它们有机地融合到一

起，而只是把我们经历的一切缝了起来。此外这个缝制后的展现还缺乏美感。它说明，还需要提高艺术的驾驭能力，还需要更地道的写作能力。

我那时还什么都没有写过，所以我的看法，我想老甘绝对不会服气。

那次朗诵会后，我再也没有看过他的“第四次慰问”的文字稿。据他说，他从来不传给别人，后来销毁了。所以现在只能凭借回忆来谈。就我回想当初的印象，我以为，八十年代初期的那些所谓伤痕文学其实都没有超过老甘的“第四次慰问”。大约也正因为这篇文字对社会是有杀伤力的，所以老甘再也没有拿出过原文，他可能也不希望让人们仔细去看，从而充分看到原文所具有的揭露性，反叛性，以及野性。而就这些特点来说，七六年后，那些含着真理部的奶头儿，带着真理部的奶味儿的伤痕文学、知青文学，和他七三年的这部作品相比，绝对是不可同日而语。因为这篇《第四次慰问》可以说是重现了民间的很多真实气氛，并且有意识地在摈弃党的文学传统，反叛出当时的社会。

就七三年初时的甘铁生的眼界、经历，思维能力、写作能力，无论在当时还是后来，他其实都远过于后来成名的，我们学校的比他低一级的高二的张承志以及二龙路学校初中的王小波等人。如果从那时，他就有意识地发展下去，我认为，到他七十二岁驾鹤西去的时候，他留下来的文字就会完全是另外一幅画图了。可惜那从六十年代初期就渗入到他的基因的自我控制，自我消遣限制了他一生。而这其实就是奥威尔在《一九八四》中说的真理部灌注给社会及后代的，被称为“止罪”的思想基因。我感到，甘铁生明白，这肯定会造成他死却不能够瞑目的痛苦，所以他后半生的岁月宁肯采取不去看这些，他希望能够合眼而去。而正是为此，作为旁观者、朋友的我，又能够说什么呢？所以后来我和他的交往只是默默地观察他，祝福他而已。

这就是人生，老甘和我经历的那一生一代的人生！

6

我和甘铁生的交谊在六八年年底插队后的那些年，不但没有中断而且联系更多，尤其是开始那几年每年冬天回北京探亲的时候。因为他住在电报大楼后面的北安里六号，我住在西单商场后的背阴胡同，从我家到他家不到一公里，中间只有两条东西向的街，太仆寺街和李阁老胡同，因此很多传阅的图书不是从我这儿到他那儿，就是从他那儿到我这儿。

我清楚地记得，第一次听说海森堡的测不准原理就是甘铁生特别告诉我的。那时书很少，只要是书，不是党的知识分子主持撰写的书，我们看到就会拼命地阅读、传递、交流，力图从中汲取到那个社会所没有的知识。甘铁生，这位文学爱好者得到了一本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五九年翻译出版的《计划时代》，作者是美国的劳文，谈的是经

济问题，但是他不但拼命地去阅读了，而且特别注意到该书谈到思想和方法的变化的时候提到的海森堡的测不准原理对当代人的思想及认识的影响。我还记得，那天我到他家去玩的时候，他拿出《计划时代》对我说，这本书很值得你读读，你听说过测不准原理吗，你要好好看看这个注释。那个注释当时就让我觉得好像发现一扇通向你所不知道地带的窗户，我如获至宝拿回那本书，逐字逐句地把那个注解抄写下来，反复看。这个注释让我对现代物理学和人的认识的关系更感到奇妙。它和在那前后我得到的一些科学哲学书籍以及那时所了解到的一知半解的术语、概念一起，让我感到，一个人如果不掌握物理和数学，就一定要明白自己进入思想研究领域谈问题，是有极大的缺失及遗憾的。因为人类的智力所达到的领域中甚至可说是最重要的一块，他并不知道。为此，我决心一定要把理论物理学完，彻底掌握了认识论和方法论问题后，再来谈思想问题。而这就使我从七零年开始，从阅读哲学等文史书籍有计划地转向外语和数学物理的自学。从而这本《计划时代》，甘铁生的建议，以及那条注释，成为此后我一生思想发展路上永远不会忘掉的插曲。

我从甘铁生那里还拿到过不少在我们那批人中传阅的其它的书，但是都没有这本书给我留下的印象深刻。这本书和我从保嘉那里拿到的《被背叛的革命》、从潘青萍那里知道并且借到的《凯旋门》、《麦田守望者》、《在路上》、《带星星的火车票》，从孙康那里借到的《人?岁月?生活》一样，成为我青少年时代知识和精神追求中的无法忘却的一页。

除了图书，在人事来往上，我也开始得益于甘铁生，由于他比我更多、且更规律地回到北京，更由于他从七零年开始就不断有作品拿出来传阅，尤其是《第四次慰问》写出后，他在当时北京的那群正处于无所适从的文革期间的大学和中学毕业生中声名鹊起。三教九流的各派人士都去找他。就我所知，老红卫兵的如徐浩渊，当时有名的拍婆子及以情色写法而著名的景山学校的毕汝諧，以及老一代的翻译家傅惟慈，后来的朦胧派诗人多多等都间或去他家，和他有书籍或文字的交往。我记得，好像具有收集手抄本爱好的赵一凡也去过他那儿。自然他非常小心，而没有轻易传出手稿，而这才使他平安活到八十年代。

我依稀记得在他家，和毕汝諧的几面之交。第一面，甘铁生对毕汝諧说：你要认识清华附中的漂亮女孩，就要找他了，他是我们学校的有名的“洋人”。不想第二次在他那里再见到毕汝諧的时候，毕汝諧一看到我，就缠上了我，说：我打听了，你是清华附中有名的风月老手，千万别小气，一定要帮我介绍几个朋友。这让我哭笑不得，也是我人生中遭遇到的又一幕尴尬境地。

这些个往事说明甘铁生七十年代在北京，是一道实实在在的风景。一道比那些沿着真理部的阶梯，在真理部的园地上成名成家的人更为靓丽、丰富多彩的风景。

一九七六年之后，坚硬的极权主义的国家机器为了生存，再次把一些螺丝放松，重新为一些人，一些能够顺从这个制度的人提供了一定的空间。大多数人立即因应，努力在这个一时稍微放松一点的机器上寻求空隙，发展自己，亦或掩藏自己，匆忙从空隙中逃离。甘铁生自然也是如此。他抓住那个时机不但在半地下的文学刊物上发表文字，而且也努力在官方刊物上发表。

在这一点上我和甘铁生，以及我清华附中的很多朋友们不同，起于一九六九年的反叛和七十年代的追求经历，已经让我深切地明白，在这个制度的机器上没有我的位置，甚至在这个社会也没有我的位置，所以我没有用我的思想和精神去适应那个社会，去寻找位置。这也是我八八年决定出国，出国后又立即决定，在能够发声的时候就发声的原因，也是我一路走来，就是进了科学院也依然除了思想和知识的追求，谁的账都不买的原因。而这也是我在最近三十年和甘铁生，保持了君子之交，来往不多的原因。因为他在那个社会已经有了一个似是而非的位置，部分肉体是另外一个世界的人。

一九九四年、九五年、九六年，我三次回国探亲，此后九七年我被吊销了护照，而无法回国。那三次回国我都和甘铁生如当年插队前后一样，吃吃喝喝、嘻嘻哈哈、无所不谈。

九四年我们一起去白洋淀参加回忆插队时情况的座谈会，九五年他给我介绍文坛动况，并说自己写出了一部超越昆德拉的书，我对此并不认真。因为无论我如何评价昆德拉，我知道昆德拉那些作家是有传统的作家，和我们这两代彻底地由真理部培养起来的，基因已经癌变了的作家、知识人不同，那是一种你可以评价、可以认真讨论的文字及文学。可这两代大陆所谓文人，如果没有意识到自己的精神及知识结构的癌变，没有从根本上一招一式地重新演练，那所谓的文学基本上都是东拉西扯。但是尽管如此，我不认为甘铁生比王朔差，更不会不如张承志。相反，单从我前述甘铁生在六十年代末期以及七十年代的经历就说明，他和张承志们不可同日而语，因为他身上不是彻头彻尾的极权主义真理部的子宫中带来的气息。虽然他在那个社会似乎也找到了位置，可他是庶出，不是在共产党的子宫中坐胎的文人。

在我看来，虽然八十年代甘铁生在那个社会中找到了位置，让他甘心在缝隙中发展生存的同时，但是也让他停滞下来。他为他的生存付出了代价。二〇〇〇年他出版了《1966前夜》（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并且立即送给了我一本。但是这本四十万字、五百二十页的长篇记事小说，这个甘铁生亲身经历的历史故事，他却没有写出特色和深度，让人感到这个题材非他莫属。在我看来，这本书甚至远远没有达到一九七三年他所写的《第四次慰问》的深度和广度，看不到任何他所特有的渲染气氛的笔力。时过四分之一个世纪，甘铁生的笔，他的脑力的激荡，似乎没进反退！这真的让我不解、困惑。因为我知道他不是一个没有能力的人，至少他看到的、了解到的、感觉到的，他都能够把它们各自清楚地描述出来、缝补起来，款款地重新讲述出来。可是这一次，时过二十五年，和《第四次慰问》不同，如此精彩的一个题材，他却呈现出如此一本没有灵魂，没有色彩，没有让社会产生有感并且关注的

书。

如此一个好的题材，如此一个精彩的经历，为何得到如此的结果？

仔细思索，突然我发现这本书的封底推介它的文字似乎非常说明问题。出版社在扉页上说甘铁生这本《1966前夜》是：

“第一部有实力挑战《青春之歌》；第一部以“文革”前夜青年人行为状态为描写对象；第一部以可考证性新闻体为写作方法的长篇小说。

故事从焦灼的65年夏季开始……”这个评介肯定是得到甘铁生首肯的。但是在我看来，这样的评价介绍就根本的审美、思想及历史，以及文化问题的认识来说，究竟是褒扬还是贬义是很值得思索的。

我认为，这样的评价根本就是置这篇小说于死地。因为《青春之歌》根本不是小说，而是宣传手册。那是按照真理部要求，编好了革命程序生产出来的所谓小说的范本。这部政治领先、贯穿一切的作品可说是二十世纪极权主义社会中的所谓“文学”代表作，是开启假大空年代的典型的意识形态化的文艺宣传物。

甘铁生的这部《1966前夜》出版于二〇〇〇年五月，甘铁生是可以要求出版社不要这么写的。无疑，他认为如此评价是他的光彩，至少可以增加销路。至于其余那几句评述，都可说是不伦不类只有那个社会才会有的说法。如果倒退三十年，七十年代初期的甘铁生，我相信，如果你说他的作品堪比《青春之歌》，他一定认为你是在骂他。所以显而易见，在新世纪到来时，在那个社会暂且找到了自己位置的甘铁生，无论审美趣味，还是对自己写作能力的期待与追求上，都有些麻木，甚至可说是大大地退步了。

一个甘铁生这样的人，在艰苦的七十年代初期，节节进步，当社会有了所谓改革开放的时候，却反而步步萎缩，这究竟是为什么？甘铁生的案例不是个案，事实上，它让我们看到，七十年代末期后，所谓改革开放年代，无论就问题的提出，对过去的质疑，反省，对于未来的追求，那类所谓思想解放运动都没有任何新的东西，都可说是一种继续萎缩。它甚至根本无法和五十年代苏联的解冻文学相比。

如是而已，否则不可能在二〇〇〇年的时候，还在一个揭示文化大革命发生的小说上，用导致文革发生的《青春之歌》做标杆。

我和甘铁生有着近半个世纪的交往，我非常了解他的不足，但是也更非常了解他的特长。这本《1966前夜》让我心疼。如果他发挥了写作《第四次慰问》的勇气，以及文字上的努力，那么这本书将至少会如《第四次慰问》那样，在社会上产生广泛持续的影响。但是现在它的影响居然甚至不如《青春之歌》，因为《青春之歌》是真理部的“特产”，而他的却只是民间“土产”。而之所以如此，我以为还有另外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八十年代、九十年代，这二十年甚至不如以前，因为就是这个民间土产公司的氛围也被彻底地败坏污染了。没了这个氛围，没了朋

友圈、知识圈的甘铁生，如何能够维持住土特产的特质。而这就让人们可以看到，那些个在六十年代、七十年代被头上吊着的剑所恐吓住了的灵魂，在八十、九十年代得到的生存中，精神、思想及生活被置入的是软性腐蚀剂的消融。在极权主义社会，没有平安及自由发展，有的只是用利刀还是软刀子对灵魂的凌迟。

甘铁生本来能够创作一篇谁也绕不过他去的《1966前夜》，可是由于它挑战的不再是那个黑暗的年代，那一段历史，而是想攀比《青春之歌》，——他居然在三十年后把自己放在了和《青春之歌》等同而论，甚至承认它高于自己的位置的那个党文化的场地之上，这如何能够不让他的作品失败！

8

在甘铁生的七十二年生涯中，他经历了起起伏伏，成功与不成功。在我看来，以他的能力，他是能够取得更大的成功的，但是他始终没有找到自己站立的根基，始终在漂移、游荡。尽管他始终给人的印象是嘻嘻哈哈，非常随和，可我知道，他是一个孤魂，一个一生找不到归属感的孤独者，在家乡问题上、在精神上、在社会中的位置上，以及在其从事的文学上，都是如此。

他不清楚，或者不愿意清楚文学在他生命中的地位，生命在他的文学中的地位。也不愿意完全正面面对文学在他生活的这个时代的状况，以及社会地位，它和此前的文学，和别的社会及国家的文学的区别。即如他被称为台籍作家，却既不被台湾人认同，他自己也从不会想有任何台籍作家的特色。可是在这模糊中，他又知道文化的广瀚，生命的深邃，岂是一个台湾，或者某一个制度所能够容下的，即如他挂在《台湾之声》那里，只是为了生存。他挂在那个社会那里，也只是为了活着。

老甘活着的时候，不希望听到我说出这一切，所以他认为我“尖刻”。我想，很多时候他也可能如当年的任功伟那样，不愿意我在场。可我知道，那是因为很多问题他自己也是意识到的，他不过是认为，说出来痛苦，无补于事，何苦如此，何必为之，何须搅乱能够苟且安然的睡梦？然而，于我的活法，我认为人生对自己的不诚实，失去的是根本的东西。而我们就是去努力能够看到也不是很不容易的事情。因为在我看来，由于我们这代人从小被真理部蒙蔽及癌变，甚至就是有勇气我们也不一定能感觉到真实的东西，敢于公开讲出来，更何况如果我们采取自欺欺人的方法，自得其乐了。

饮鸩又岂能够止渴？每个人的生命只有一次，到头来不甘心的，后悔的还不是我们自己。所以我实实在在地是因为尊重他的才能及生命，认为他能够更上一层楼才如此。他在七十年代初期写作《第四次慰问》的时候所显示出来的能力也证明，他确实有建筑高楼的本领和底气。

大约四年前，我得知他得了肾盂癌，所以每次与国内朋友联系我都会询问他的健康情况如何，希望他能够恢

复。二〇一五年，可能是因为重病，感到生命无常，所以他在访谈中谈到他的家世，这才使我较为详细地知道他的出身，证实我以前的感觉。

他出身道地的书香世家。我由于经常去他家，所以不仅和他的母亲熟识，也认识他的姐姐和兄弟。就是在那个年代，万人一律的蓝制服年代，他母亲的气质，走在街巷中，也一眼就能够让人看出独具一格、气韵不凡。她拥有的还不仅是修养，而且身材、相貌非常漂亮，套用现代人的话说，见了他的母亲，你就会明白“梦中情人”四字意味着什么。而这其实意味着的就是在那个年月，你真的不知道她带着四个孩子是如何活下来的。她和她的孩子能够平安活下来，没有发生更大的灾难，甚至就可称是一个奇迹。

读了甘铁生的访谈后，我才清楚他母亲及他的兄弟姐妹的教养及气质来自何方。甘铁生的老爷甘云鹏是晚清进士，后留学日本，民国后几次当选过国会议员。他母亲是燕京大学音乐系毕业，这一切都注定了他家的家风。但是甘铁生一五年重病后的回忆，却依然是不温不火，不浮不躁，丝毫没有这些年司空见惯的那种市井喧闹，小地方、小家子气的叫卖。那种动辄就称自己出身名门，母亲是如何标致美丽，明明是出自哪儿都考不上的中学，却称自己来自名校，如何家学渊源，根本是自爆无知。“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这些人大约就是因为不知道中国文化传统是什么，有家教的哪里有如此说话的。读了甘铁生的访谈，你能够体会到，何为京城中的底气，何为经过了急风险浪后尚存的大家“气脉”。

记得七二年夏天，他去白洋淀的时候，可能因为久未和家里通信，他母亲到背阴胡同我家找我询问。我听到在街门口她和我母亲对答。她未开言就笑的几乎说不出话来，对我母亲说：我是甘铁生的妈妈，真对不起，我不知道您孩子的名字，只知道他外号叫洋人，我想问问，他知道甘铁生的情况吗？他好多天没有来信了，不知在哪儿，怎么样？

甘铁生在哪儿，怎么样？……

四十六年前她母亲询问的音容犹在，……可现在传来甘铁生走了！转瞬间，这一切都彻底地随风而去了。想到此，我不由得泪流不止。这五十五年的老友，他的音容，他的抱负，他留在空中的笑声，永远地存在于我的生命中、记忆中，不会褪色、更不可能磨灭。这大约才是甘铁生生命留下来的最重要的东西。

甘铁生的生命最过人的特点是，他的性格始终是鲜明的、有力度的。他会给每一个认识他的人，每一个领域中的朋友都留下极有特色的印象。正因为此，我觉得他的悲剧在于，他生在了一个他所不认同的社会，在一个不接受他的制度中生活，却要寻找位置，这如何不是悲剧，不会夭寿。

我和他的区别在于，在这个社会中，我拼命向外寻求我的空间，可他的一生，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削足适履”！

他曾经是我们那群人中最强健的，可他居然走的最早，我不知道七十二岁的他，是被什么如此早地夺去了生命？或许有比肉体的“削足适履”更为痛苦的精神和生命的“削足适履”，那导致的是更根本的生命和生活的改变。

他没有死于苦难，却早逝于似乎的安乐。我绝不相信他走的甘心……，因为他有一个不安的灵魂！他一定会如我一样地看到，这个纷杂的世界，他身前身后这两代人的糟糕情况，还有更多的事情在等待他，可是他竟然走了。甘铁生实实在在地是不该七十二岁辞世啊！

泪洒何处咒此生？……

他所被抛入的时代和社会，他所不认同的生活，竟然让他来也艰难，去，却如此匆匆……！

2018、8、13 德国 埃森

华夏知青网不是赢利性的网站，所刊载作品只作网友交流之用
引用时请注明作者和出处，有版权问题请与版主联系
华夏知青网：http://www.hxzq.net/
华夏知青网络工作室

评价知青上山下乡要客观真实（修定稿）

（本文系2014年中国知青文化博鳌高峰论坛论文，已获数万人关注，见仁见智，现再次重发，纪念2018年“文革”中知青上山下乡五十周年，向有过知青经历的伙伴们致敬！）

岁月的消失容易淹没人们的记忆，历史的长河难以把握客观、真实的评价。在新中国的历史上，"文革"中1700万知青上山下乡，留下了传奇的经历和悲壮的历史。我无意对这场运动做全方位的回顾和综述，只是做为亲历者谈几点众所周知的述评。

一、历史定位

中共中央1981年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历史已经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发生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文革"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的社会进步，"文革"中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是"文革"的一部分，纵然有当时的政治背景和经济原因，但究其根本也是违背社会进步和绝大多数知青择业意愿。"文革"中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无社会进步可言，它与"文革"一样，也给知青和知青家庭带来了重创。

从1966年至1976年十年间，全国有1700多万城镇中学生上山下乡，他们或在农村插队落户，或在兵团军垦拓荒，或在草原牧马放羊，或在农场植树耕田。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既未成年，也未毕业，更无法继续应有的读书深造，无端成为一场政治风暴的受害者。在阶级斗争年代，许多知青背负着父辈在政治运动中的冤屈，他们被打上异己的烙印，当兵、进厂矿、选送大学，均与他们无缘。在这种特殊严酷的政治背景下，既便同在上山下乡之中的知青们命运也是千差万别。回顾当年，上山下乡时千军万马一条路，就业返城时却是八仙过海各显其能。不是表现好，就能返城，而是所谓出身好，有关系才能捷足先登。下乡时场景大致相同，返城的路却是因人而异，对多数知青来说返城回家的路充满辛酸和苦难，否则就不会出现云南知青爆发的大规模要求返城的请愿静坐。当年知青们"我要回家"的诉求都难以实现，那有什么公平、公正可言。

有的人将这个时期知青上山下乡定位为有计划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美其名曰："青年运动方向"，且不说阶级斗争年月产生的政治词汇，大都被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拨乱反正"所纠正，在新世纪的中国，这些遗弃提法让

人们困惑，疑似他们还生活在"文革"之中。当年知青大都健在，就有人戏说歪曲历史。上山下乡的中的很多人是被划为异己和受"文革"迫害家庭的子女和普通劳动者的子女，而当年也有些人不需要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君不见一位二十几岁的年轻人走出大学校门直接坐到省军级的位置，"文革"中被称为"东北太上皇"，而知青当中的绝大多数当年想入伍当兵都是不可能实现的奢望。在当年，不愿意上山下乡的中学生，会被学校和街道强制动员下乡，而另一部分人则根本不需要走这条路，或者即便下乡，时间也很短，他们也就成为当然的接班人。即便当今有过知青经历的成功人士，当年也因受父母被迫害的株连而上山下乡，与其说是锻炼，不如说是落难。值得称道的是，他们在逆境中百折不挠，积极进取。我们肯定在逆境中积极奋进，却不能歌颂人为制造的苦难。如果连这么清楚的史实都去黑白混淆，不过是"文革"思维死灰复燃。当然，如果是那些持否定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议，否定中国三十年改革开放成就，拥戴"文革"和"以阶级斗争为纲年代"的人士，我们也见怪不怪另当别论。

"文革"造成的政治灾难和突出的社会矛盾，将知青上山下乡推向极致，这时的中学生上山下乡已不是"文革"前少数知青个人理想和职业的选择，变成强制性的国家就业政策。"文革"造成国人严重分裂，派系林立濒临内战状态，被利用的中学生首当其冲，上山下乡的分散驱离方式也成为了政治稳定的需要。"文革"将国民经济推向崩溃边缘，丧失了城镇安排大批学生就业的可能，无法就业的城镇学生的沉重负担又一次转移给农村、农民。"文革"摧毁了教育事业，使中学生无大学可上，这都是"文革"中知青上山下乡的政治和经济原因的历史原貌。

二、青春奉献

"文革"中上山下乡的知青一代，大都是新中国创立后的第一代儿女，他们成长过程中大都受到英雄主义的熏陶，既造就了"文革"时期的盲从冲动，也成就了他们肩负的历史责任感。

在逆境和曲折当中，在不公平和磨难当中，1700万知青中的多数人用青春为国家和民族做出了可歌可泣的奉献。他们在荒原戈壁、热带雨林、农村边疆，在苦难中铸就辉煌，他们屯垦拓荒，辛勤耕作，修桥筑路，教书育人，传播知识，推广农业科技、传播农机知识、抢险救灾，医疗济困，改变贫困落后面貌，曾经造福一方。现在许多当地干部，都曾是当年知青老师们的学生。知青们将城市文明和文化带入农村的功绩将载入历史。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内蒙古自治区主席布赫，曾为大型知青纪念文集《草原启示录》题辞："草原上的人民永远记住这一代青年。"这是对曾经上山下乡的知青们最好的褒奖。

历史的、辩证的评论"文革"中的知青上山下乡，才能还原客观真实的历史。任何以偏盖全的结论，或依据个人当今政治立场点评历史都站不住脚。大时代与个人命运紧密相关，信仰纠葛产生社会多元，这本不是坏事，但曲解"文革"中知青上山下乡历史，从片面或绝对的立场视角出发，这是某些知青历史讨论者的评判逻辑。孤立、静止看待问题的形而上学认识论令人堪忧。抛弃大多数知青的意愿和破坏家庭、人性的本能，泛政治化的谈论历史事件

是无知的悲哀。"文革"思维回潮，让我们意识到国家民主法制建立何等重要。

绝大多数知青上山下乡的青春岁月，都与当地的各族人民结下了深厚的情谊，留下了刻苦铭心的难忘记忆。许多人至今都会魂牵梦绕当年上山下乡的地方，思念在我们这一代人人生最困难时，为我们遮风挡雨的第二故乡，感恩善待庇护我们的父老乡亲。这也是知青们返城后，多年来，也在不同岗位上尽其所能回报曾经上山下乡地方的原因。我们在否定"文革"中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同时，而对于将青春岁月留在社会最底层，在那里了解到社会的真实和人民的需要的知青们却充满敬意，"知青上山下乡运动"与"知青"的历史作用既有相互关联，而却有重要内涵差别。

三、曲折历练

人生的道路都充满曲折和艰难，无论是当年的知青一代，还是现时生活中被家庭宠爱的孩子们都会经历到。

"文革"中上山下乡的知青无法摆脱政治上的歧视，很多人实际上成为"接受再教育"和改造的对象，"接受再教育"成为到农村去的知青们的专利，因此，对上山下乡的知青来说，人的尊严和价值都大打折扣。1700万知青中，有的人为上山下乡付出了青春和生命，那些为一场无关大局的草原荒火，为落水的木材和羊群献出生命的知青伙伴；那些不堪艰辛劳累的重负，过早嫁人的女知青们；那些因成家或在当地招工迟迟未能返城的知青们；那些因伤痛或无缘求学深造知青们；那些返城后无专长又过早下岗的知青们，都为此付出沉重代价，他们曾是返城后，企业转型下岗的主力军。

我有过下乡去东北呼伦贝尔九年知青岁月，那里1968年前属内蒙古，1969年后划归黑龙江。我档案袋里曾有"文革"中父母单位军代表装进的许多莫须有的不实之言，所以我只能只在那里沉重的修理地球。九年插队当中我当过三年生产队长，将那里建成远近有名的富裕队，1976年我领导的生产队，每天的分值三元多钱，一年一个劳动力分1000多元，集体实力大增，而且只靠种地产粮。凭努力1976年3月我在农村入党。1977年7月我以困退为由返回北京，临行前，全村老小将我送到村口。我们的"青年点"曾是黑龙江省的先进知青典型，事迹在《黑龙江日报上》刊载，二十多人中，有五人先后担任大队书记和生产队长。我无意在这自我表扬，象我们这样的知青在全国也为数不少。我想说即便在艰难困苦和遭受不公正待遇时，有时也事在人为。即便不上山下乡，也不是所有的人就会人生一帆风顺，即便从小就养尊处优留学英美，个人不努力也未必能够成才。而曾在苦难中收获历练成大器者却不乏其人。史铁生不上山下乡写不出《我的遥远的清平湾》、梁晓声不上山下乡写不出《今夜有暴风雪》、叶辛不上山下乡写不出《蹉跎岁月》。反之，曹雪芹没有上山下乡也能写出了《红楼梦》，罗贯中没有上山下乡也能写出了《三国演义》。由此可见上山下乡锤炼铸就了一批人，但是不上山下乡也会造就人才。

将上山下乡解释为培养革命接班人，或青年运动方向的必由之路，说这种话的人自己恐怕都不信，否则，为什么不动员自己子女重走上山下乡路。一般规律来说，困难挫折会成就积极向上的人，一帆风顺碌碌无为者也不少

见，大浪淘沙因人而异。将社会精英成功归于知青经历，过于牵强，但也不无关系。将弱势群体困难归于知青经历，事在人为，也并非必然。因此，将个人命运简单与"文革"中知青上山下乡相联系未必客观，这里也没有必然的因果逻辑关系。

四、求实包容

将真实的"文革"中知青上山下乡的历史告诉后人是我们这些亲历者的责任。当我们彻底否定"文革"的时候，发生在那个时代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也应当被否定。但否定那场运动同时，不应该否定1700万知青们在特殊年代为国家和民族做出的青春奉献。如同我们否定晚清王朝丧权辱国，却要肯定两广总督林则徐虎门销烟的爱国壮举。如同我们批评北洋水师全军覆没，却要肯定邓世昌等爱国军人血染海疆。南非种族主义的黑牢关押过不屈的民权斗士曼德拉，当我们在赞美这位黑人总统时，是否也要赞美囚禁他多年的专制监狱？而这个逻辑调换位置也是一样，不能因为知青们在上山下乡中感天动地的事迹，就推理说那场错误的运动是正确的，反之也是一样。当我们否定"文革"中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时，也要积极肯定知青在上山下乡中青春奉献的历史功绩，感谢当地干部群众对知青的关怀爱护。片面或绝对的结论，简单的肯定或否定，不仅对知青们的历史不公平，也是对帮助过知青的当地干部、群众不公平。

知青上山下乡遍布祖国大江南北，地域不同、经历不同、知青素质不同、受教育不同、政治环境不同、必然有许多的差异。应该尊重知青们对各自上山下乡的不同感受，在"青春无悔"和"青春有悔"这个前提虚假的争论辩题中，不应该用简单"肯定"或"否定"强加于人，"无悔"自有青春血色浪漫的光荣历程，"有悔"自有青春不堪回首的往事。多元社会何必强求，多些包容，我们这一代人尤其要抛弃非黑即白的阶级斗争认识论。笔者认为："文革"中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违背历史进步和人的主观意愿，必须彻底否定。而"文革"中1700万知青上山下乡，他们用青春和热血为国家民族做出的奉献必须充分肯定。

有关"文革"中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评价，邓小平同志在1978年谈到"文革"中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时，曾经说过："国家花了三百多个亿，买了三个不满意：知青不满意，家长不满意，农民也不满意。"邓小平以他言简意赅的"三个不满意"对那场运动做出了历史评价。这既是党和国家领导人全局性的结论，也是当年下乡的知青们的主流认识，这才是以人为本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客观真实的评价。

"老三届"与"文革"中各届中学毕业生上山下乡人数达1700多万，这在人类历史上是空前绝后的，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历经苦难，他们是"文革"中最早觉醒的一代，他们在反思与拼搏中成为社会的中坚，中国知青一代出类拔萃之辈群星璀璨，他们承前启后推动了中国改革大潮，为将中国建设成一个初步现代国家做出了重要贡献。这是"文革"中上山下乡的知青一代对祖国和历史最好的回报。

1700万知青"文革"中上山下乡已过去四十余年，有的人在知青岁月中走出苦难，铸造辉煌，有的人在知青岁月中增长见识，厚积薄发，有的人在知青岁月中获得磨练，知足常乐。知青岁月仅是我们人生中一小部分，即便我插了九年队，也只是我事业经历的五分之一，坦率的说，虽然当年历尽艰辛，付出辛劳，我还是很怀念留住我青春的难忘知青岁月，怀念草莽关东的黑土地风情，怀念蓝色的蒙古高原美丽博大，怀念那里纯朴的人民和善待我们的基层干部。

作者简介：

林小仲，新中国同龄人，中共党员，1968年在东北呼伦贝尔盟插队近十年，在团中央机关工作十年，在中央国企所属企业任董事总经理十余年，在北京民企任总经理又是十年。

联系方式：

邮箱：linxiaozhong2008@126.com

博客：梦随风万里http://blog.sina.com.cn/u/3019365407

林小仲文集：http://www.hxzq.net/showcorpus.asp?id=63

华夏知青网不是赢利性的网站，所刊载作品只作网友交流之用
引用时请注明作者和出处，有版权问题请与版主联系
华夏知青网：http://www.hxzq.net/
华夏知青网络工作室

如此解读知青上山下乡的错误令人费解

6月19日我在《上海知青网》的微信公众号里看到一篇《各方面专家对知青运动的认识和分析》文章。这篇长达1万2千字的文章对于如何看待知青上山下乡提出了看法，并且对于上山下乡的历史进行了解读。我又在百度上搜索了一下，原文是《智库层析知青上山下乡历史》。

作为智库，刊发了这样解读知青上山下乡的文章，令人不解。暂不说对于这段历史如何看待，就说在文中30个“第一”、“最”的故事讲述上存在着不少错误。有些错误简直令人啼笑皆非。我真的很怀疑这样的“智库”是真的还是假的?

1、为何把“知青”这个词戴到了毛岸英头上?

(原文)中国最早的知青是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知青这个词汇出现的历史几乎与20世纪一样漫长，但其作为今天概念中的形象，最早起源于延安的四十年代。现代史中一个不凡的人物毛泽东指出了“知识分子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的理论，并首先付诸实践，将从莫斯科留学回国的大儿子毛岸英送到农村去，拜一个农民来老爷为师。成为中国第一个接受农民再教育的知识青年。

(批注)知青，这两个字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在这里时间被朝前推移了二三十年。作者无非是想说明毛泽东是多么英明伟大，早就指出了这条“光辉道路”，而且身体力行。但是你也不能这样不顾事实的瞎吹捧啊。如果用知识分子一词还说得过去，套用几十年以后出现的知青一词，想说明什么呢?只能说明你对于历史的无知。

2、最早的知青歌曲竟然用这首曲谱填写而成?

(原文)中国最早的知青歌曲是知青们用《大海航行靠舵手》曲谱填词形成的。

(批注)是哪一首歌曲用这首《大海航行靠舵手》的曲谱填词形成的，作者没有任何讲述。知青在什么时间，填写了哪些词，反映了什么，为什么要选用这首曲谱等等，都不得而知。

作为一份智库的报告，怎么话说到一半就戈然而止了，这样的智库报告究竟想告诉人们什么?

3、中国最早到国营农场落户的知青群体，为何在时间上提早了7年?

(原文)早在1961年，北京有55名学生获得了周恩来总理的批示，在云南西双版纳地区的国营农场落户，当地人称为“北京55”。

(批注)我摘录刘晓航教授撰写的《我们要回家》一书里的记载：“北京五十五”是以李镇江为代表的北京中学生，共计55人，平均年龄不到17岁。“北京五十五”最早的发起者是东城区25中、65中等学校的红卫兵，以高中生为主，不少人的父母亲都是高级干部，他们中一些人都在东城区红代会担任了一定的职务。1967年11月下旬的一天，在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工贸口的代表时，由林力口述，张进辉补充，张春荣执笔，在黄军包里找到的一张从练习本上扯下的纸，写下了决定他们命运的报告《首都中学生赴滇申请报告》。

在总理离开座位走出了会议厅时，他们立刻迎上去面对总理那疲惫而亲切的面孔，紧张的心情不能放松下来。林力向总理自我介绍说：“我们是中学红卫兵，我们希望到南方去支边，开垦我国第二个橡胶基地……”总理看着他们，亲切地问：“你们没有复课闹革命吗?”

“总理，我们都是毕业生，要不是搞文化大革命，我们都已经毕业了。”

“那好，你们的报告我再详细看看。”总理把他们的报告揣进上衣口袋走了。

第二天上午，东城区红代会的电话机响了，一直守在电话机边等消息的王树理、苏北海、何龙江争抢着拿起话筒。电话是北京市革委会打来的，让他们到市革委会接待办公室去一趟。

一个中年女同志微笑着接待了他们，然后拿出一大张纸——正是他们昨日在人民大会堂呈送给总理的报告。报告上方是总理的笔迹:“富春、秋里同志可考虑他们的这个要求，请与北京市革委会联系一下，周恩来.”旁边还有李富春副总理的批示：“是否与云南取得联系。”

按照李富春副总理的指示，北京市革委会立即与云南省联系，云南省很快来了人，带来意见。第一，欢迎北京青年去云南参加边疆建设;第二，为了安全。不宜去红河州的河口，建议去西双版纳;第三，人员最好不要多，50人左右为宜。消息已经传开，要去的人越来越多。李镇江、伍穗平等人5人组成的领导小组，从志愿报告者中进行挑选，最后选定了55人，他们大多是东城区几所中学的66届、67届高中毕业生。根据云南省革委会农林小组为他们安排的行程，“北京五十五”于1968年2月8日启程，在2月21日到达位于景洪县大勐龙的东风农场。

这段历史怎么会提前到了1961年?

4、为什么要玩弄知青上山下乡的情感?

(原文)中国最高领导人毛泽东发表最高指示，向知识青年发出了号召。真正有组织、大规模地把大批城镇青年送到农村去，则是在文革后期，毛泽东决定给红卫兵运动刹车的时候。在知识青年自发奔赴农村的形势下，颇会研究群众心态并能加以掌握的毛泽东主席终于在1968年12月22日发出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

毛主席一声号令，势如破竹，在那个寒冷的冬夜，全国几乎所有的高音喇叭都响起来了，几乎作有的大中学生都受到了鼓舞。城乡沸腾起来，成千上万的红卫兵纷纷走上街头游行，欢呼毛主席最高指示发表。许多中学生热泪盈眶，连夜写出决心书，向毛主席党中央宣誓，坚决响应毛主席号召。一时间京津沪渝及各大中城市的火车站、汽车站、码头内挤满了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和送行的亲朋好友。锣鼓喧天，口号不断，慷慨激昂，气势如海闹潮。绝没有后来文艺作品中所描写的悲悲切切，惨不忍睹的场面。

(批注)这里有两个错误。其一，毛泽东发表这个指示是1968年12月。那时绝非是文革“后期”。一个常识性的错误。其二，知青大规模的上山下乡没有“后来文艺作品中所描写的悲悲切切，惨不忍睹的场面。”所有经历过上山下乡的人都知道，这种“悲悲切切，惨不忍睹的场面。”到处存在。

吴道平先生的那篇《我们没有自愿——“上山下乡”运动四十周年祭》(南方报网)里有一段精彩的讲述：“今天，有人或许会说，当时你们不也曾经向党表忠心，要到农村去战天斗地、改造自己吗?不也曾经发誓要把壮丽的青春献给祖国的农村，立志做革命大业的接班人吗?是，当初是有一些人这么做了。那是由于他们太年轻，对现状缺乏了解，对统治者无条件的信任，确实想过到农村去干一番事业。记得北京还有人到天安门去宣誓，决心去延安插队，走老革命的路，等等。但是，我相信怀有那种浪漫豪情的人只是少数，而且他们是在真实信息被封锁的情况下做出的错误判断，是受到了愚弄。”

除此之外，我们都经历了当火车汽笛一声长鸣后站台上那突如其来的一片哭声。父母送子女，兄弟送姐妹，同学送朋友，离别的那一刻对于所有上山下乡的人都不会忘记。即使你是自愿的，在那一刻都不会是“口号不断，慷慨激昂”的。人之常情啊，除非你是没有一点人性的爬行动物!

5、写贵州知青生活的电视剧怎么成了中国第一部描写北大荒知青的电视剧?

(原文)《蹉跎岁月》是第一部描写京津沪大城市知青在北大荒囤垦戍边生活的电视剧，同名主题歌也在全国引起轰动，在有知青经历的一代人中引起沧桑的回忆。

(批注)知青作家写的长篇小说《蹉跎岁月》，描写了一群上海知青于70年代到贵州偏远山区插队落户的故事，

以柯碧舟和杜见春的命运遭际为主线，以柯碧舟与杜见春、邵玉蓉之间的感情纠葛为基本情节，记录了一代知识青年所度过的那段令人难以忘怀的“蹉跎岁月”，展示了他们所走过的那条虽曲折坎坷、但奋进向前的道路。

在这里被曲解为是写北大荒知青的，真的无法理解如此低级的错误!

6、云南知青大返城怎么提前了一年?

(原文)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农村人口大返城，惊动了中央政府。

1977年，中国历史上出现了第一次农村人口大返城，是由云南省农垦系统的四川与北京藉的知青掀起的。他们打着“还我青春”的大旗由西双版纳市至昆明，又从昆明闹到北京，终于惊动了中央政府。中央根据当时“拨乱反正”的政策，各地知青们被允许回到故乡城市。

(批注)这里讲的是云南知青大返城的事件。这段文字里错误百出!

第一，时间错误。云南知青大返城事件发生在1978年秋天。上海知青丁惠民写了一封给邓小平的公开信，由此引发了5万知青的罢工和北上请愿。作者说是1977年，不知出处何在?

第二，口号错误。云南知青当时喊出的口号是：我们要回家!口号目标明确，团结凝聚了5万知青齐心协力实现了回城的愿望。

第三，发起人错误。当时留在云南各个农场人数较多的是上海、重庆、成都知青。北京和昆明的知青只是极少数还留在农场。发起这场大返城风潮的主要是上海和重庆、成都的知青。

这段历史在刘晓航教授撰写的《我们要回家》一书里有着详细的记载。作为智库的作者们难道连这样基本的事实都不知道?

7、知青在国家和军队岗位上的最高职务是这些人?

(原文)中国知青回城后在国家和军队领导岗位上的最高职务者。知青进入各级领导岗位的不在少数，大多以处一级为多。曾轰动一时的“北大荒知青回顾展”上有人做过调查，北大荒知青中担任职务最高的“荒友”为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的副局长，现任国家环保总局局长的解振华等。目前是前国家主席刘少奇之子刘源，现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任副政委，军衔为中将。

(批注)这是在睁着眼睛说瞎话了。怎么会看不到目前中国最高领导人(常委)中有知青经历的那几位?

8、为何前后矛盾?

(原文)知识青年回城风。进入70年代以后，开始允许知识青年以招工、考试、病退、顶职、独生子女、身边无人、工农兵学员等各种各样名目繁多的名义逐步返回城市。到70年代后期，出现了大规模的抗争，知青们通过请愿、罢工、卧轨、甚至绝食等方式的抗争强烈要求回城，其中以西双版纳的抗争最为出名。1978年10月，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决定停止上山下乡运动并妥善安置知青的回城和就业问题。

(批注)前面在云南知青大返城问题上是1977年还是1978年上存在明显的错误。这里又一次讲到了这个事件。一个明显的错误是对于1978年10月全国知青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的解读，作者回避了一个事实。就在这次会议上做作出了一个决定，遭到了还在农场的云南知青的愤慨和反对。

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一书“农场知青集体上访、罢工、请愿”一节里是这样说的——

“早在1978年全国知青工作会议之前，个别农场已经出现之前罢工、请愿事件，但多数地区的农场知青还是稳定的。中共中央在批转全国知青工作会议文件中指出：‘要鼓励和支持他们安心农场工作，为办好农场贡献自己的力量。’‘今后一般不办理病退、困退，如果家庭和本人确有特殊困难，可以通过组织商调。’这样做，原是想稳住200多万农场知青，减轻城市就业压力。不想文件下达后，事与愿违，更加引起了农场知青的不安。许多知青后悔当初不该来农场。他们说，到农村插队，还可以通过招工回城，而招工与农场知青无缘，现在连病退、困退的路子都堵死了，回城更无希望了。有人编成顺口溜说：‘插队插队，越插越对;插场插场，越插越长;改变现状，只有上访。’于是罢工、请愿之风在各地兴起。”

杜洪林的《风潮荡落---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史》认为：“(知青工作会议)堵绝了相当一大批知青返城的路。……像这样的忽然‘解冻’忽然‘冻结’的情形已经反复过多次。……1978年底至1979年上半年，是知青们为返城而做出种种过激举动的最集中的时期。”

这是事实!

9、尊重历史，不曲解历史是讨论知青上山下乡问题的基础。

(原文)近些年来，在对知青历史的评价研究中，存在三种较为普遍的片面认识：一是以片断的经历来评判全部历史;二是以个人的感受来评说整个过程;三是以现在的认识来评论过去的历史。这些思想倾向有很大一部分出自于

一些曾有过上山下乡经历且现在仍对知青问题表示关切的人之口。

历史的、辩证的评论“文革”中的知青上山下乡，才能还原客观真实的历史。任何以偏盖全的结论，或依据个人当今政治立场点评历史都是站不住脚的。大时代与个人命运紧密相关，信仰纠葛产生社会多元，这本不是坏事，但曲解知青上山下乡历史，从片面或绝对的立场视角出发，这是某些知青历史讨论者的评判逻辑。孤立、静止的看待问题的形而上学认识论令人堪忧。

(批注)智库的作者们讲了这番话，没错!问题是自己做的如何?谁在“曲解知青上山下乡历史，从片面或绝对的立场视角出发，这是某些知青历史讨论者的评判逻辑。”

上述这些明显历史常识错误，难道不会带来片面、“孤立、静止的看待问题的形而上学认识论令人堪忧。”

连这些基本的历史事实都搞不清楚，是不是有点愧对“智库”两个字?

智库提到的三种片面的看法，认为原因主要是：“这些思想倾向有很大一部分出自于一些曾有过上山下乡经历且现在仍对知青问题表示关切的人之口。”

那么，是不是说这些人该闭嘴了?只有没有上山下乡经历的人，并且对知青问题不关切的人讲述的历史和看法才会得出准确的结论呢?例如，智库!

我看到这篇文章的开始有一个引言——

“智库首席专家杨志刚引言：不久前，智库应邀出席《中国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历史与回忆国际研讨会》，此次会议由香港中文大学梁保全香港历史及人文研究中心、法国现代中国研究中心、清华大学中法中心、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香港知青协会等主办。国内外学者五十余人出席会议，会议就中国知青运动的原因和历程等问题展开研讨。”

专家啊，学者啊，权威啊!是不是能够得出令知青们信服的结论呢?未必!

例如：“与会专家认为，在有些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文字所展示的知青生活画卷中，充斥着冲动与愚昧，野蛮与浑沌，悲怆与血泪，禁欲与纵欲，其间，充溢着浓重的悲观主义意味。无论撰文者的主观愿望如何，实际上，那些关于知青生活消极阴暗面描写、论述和渲染，已被个别用心良苦的人作为社会主义‘黑暗’、党及其领袖‘没干好事’的例证，同时亦影响着知青以及他们的后来人对我们社会、我们党和政府的正确认识和评价。”

那么，这些“冲动与愚昧，野蛮与浑沌，悲怆与血泪，禁欲与纵欲”在长达十多年之久的上山下乡运动里是不是存在?如果说存在，为什么不许说呢?即使是个别的现象，它也是一个客观的存在。叙述了这些就会“被个别用心良苦的人作为社会主义‘黑暗’、党及其领袖‘没干好事’的例证，同时亦影响着知青以及他们的后来人对我们社

会、我们党和政府的正确认识和评价。”？

这种戴大帽子的说法令人憎恶!

对于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确实存在着不同看法。究竟如何看，关键是要尊重历史的事实!假如连起码的事实都不顾，不讲真话，最终留给后人的是一段被曲解的历史。在貌似公正的面孔下，以一顶顶大帽子来阻止亲历者讲真话，最终一定是适得其反。

在仔细研读了智库的这篇报告以后，我发现作者在编写这样的报告过程中是很不严肃的。例如，在讲述“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知青大返城被镇压”的时候，怎么会用“第一人称”的讲述。“我的朋友大头也受了处分，当然他并没有认真吸取教训，他常常对我述说那段激动人心的逃亡日子。当时并没有人意识到这场失败的知青大逃亡只不过是一次历史预演，真正有声有色的回城大戏当在几年后隆重开幕。”

这样的问题在讲述李庆霖这个人物的时候也是如此。

我在怀疑，这是一份严肃的智库报告吗?难道是东拼西凑起来糊弄我们的报告?这样的智库会不会是鱼龙混杂之类的东西呢?

2015-06-28

一份沉甸甸的思考

——读《阿姆斯特丹兄弟对谈》

读《知青·上海》杂志今年第三期论坛栏目里刊登的冯桐的一篇文章《阿姆斯特丹兄弟对谈》。

编辑在卷首语《天凉好秋》一文里是这样介绍的：这篇文章写成于十年前，曾经都是知青冯桐、冯棠兄弟这样的思考角度，在回顾知青史的文章中并不多见。特别是冯棠的那句话：“我们和我们的上一代人一起用我们的苦难挡住了自辛亥革命以来的革命潮流”，在一定层面上来说简直就是经典。正是这些拒绝遗忘的人们，用沉默冷峻独立的姿态与这个健忘的喧哗的虚幻甚至荒诞的世界静静地对峙着。让我们记住这炯炯的目光和沉默的对峙。

顺着编辑的思路，我打开了这篇文章——

第一、站在世界历史的全景上思考：

兄弟俩在十年前，因为弟弟结束在法国普罗旺斯大学的访问后回中国去。在阿姆斯特丹换乘飞机短暂的数小时里有了这番交谈。

弟弟冯棠作为专门从事法国历史文化教学的学者，选中了法国南部的普罗旺斯。为何？因为那里曾经是历史上十字军东征的出发地，由此引出了兄弟俩关于少年十字军的话题。又因为都是曾经上山下乡的知青，所以在机场转机时候简短的谈话里，引出了这些思考的话语。

他们共同认为：有关知青上山下乡历史的研究，是一个中国问题，也需要从世界历史的角度来研究！

这个角度的思考令我有些豁然开朗之感！

怎样给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在历史上定位？在众多的争论中恰恰是很少用研究历史的方法去研究历史问题。

冯棠认为：发生在中国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与世界历史上的少年十字军有五点相似：第一，都是在专制制度下由全能组织发动的；第二，发动对象是青少年；第三，为建立理想天国（宗教或意识形态）；第四，始乱终弃，草草收场；第五，结局悲惨。

把历史上的儿童十字军与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发生在中国的几千万学生的上山下乡运动对照对比起来，使我们惊讶地发现有着许多相似之处。

1212年在教皇和封建主的哄骗下，三万名儿童组成了一支十字军，历史称之为儿童十字军。他们从法国马赛启程渡海，准备完成大人们未竟的事业。最终，这些孩子不是在风暴中葬身大海，就是被船主给贩卖到埃及。在德国儿童也是受骗参军。大部份儿童因饥饿和疾病死在途中，其他则流浪乞讨。最不幸的几千个儿童被拐卖。

有关这段历史的记载不多，史学家们的解释也各有不同。但是作为曾经发生过的这些历史事实是客观存在的。在兄弟俩的阿姆斯特丹机场的对话里所讲到的五点分析，给了我们许多启示。例如，为什么对象都是青少年？为什么会有如此的盲从？为什么最终的结局都是以悲惨收场？从历史到今天，惊人的重现不得不让我们思考许多问题！只是简简单单地讲述发生在中国现代历史的大规模的上山下乡运动，不从制度层面和社会层面等诸多因素里去挖掘隐藏在深处的原因，或许在某种“气候”成熟之际，上千万人被愚弄后，还激情满怀地去“革命”、去“造反”。为何我们这代人在当时那么相信一句最高指示，那么迷信红彤彤的语录，那么崇拜救星和“太阳”呢？事实上，在今天的这代人中间还有极少数人依旧沉浸迷失之中呢？

昔日十字军的悲剧已经成为历史的一个教训。在被封闭了的社会里，我们曾经年幼无知地重蹈覆辙了一番。所以冯氏兄弟俩的对话里引出的这个思考值得我们好好想一想。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对于曾经发生的上山下乡运动的思考会有更加理性和准确。

第二、站在中国近代历史的近景上的思考：

冯棠指出：我们这一代人和我们的上一代人一起用我们经历的苦难把中国自辛亥以来的革命潮流挡住了，给中国社会和社会意识回到理性提供了一个百年未有之机会。这个贡献，是中国千百万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包括那些把年轻的生命留在那个年代的知识青年，共同做出的，是一份集体贡献。

何谓辛亥以来的革命潮流？

冯棠进一步指出：革命潮流是指从1910年开始的一个接着一个的革命，到文革达到了顶峰。还记得，文革号称是“触及每个人灵魂”的革命，“斗私批修”，还要既“反帝（反美）”，又“反修（反苏）”，还要反对各国反动派，很像慈禧太后庚子年向十一国“开战”。中国处于空前孤立，十分危险的境地。自辛亥革命开始，一次比一次革命的要求更高，规模更大，从1901年到1966年66年间除去八年抗日战争，58年间中国都在革命中。中国政治生活就像一个大石球在革命坡道上滚，越滚越快，不知要滚到什么时候，滚到哪里去。

看看当年我们曾经经历的上山下乡运动，我们同样会惊讶地发现，这个大石球终于在上山下乡运动被终止的那一刻停息下来了。那时的中国终于长长地喘了一口气，但是已经是满目疮痍了，“国民经历已经到了奔溃的边缘”了。大石球为什么会停息下来了？在思考这些问题的时候，兄弟俩认为：我们这代人把大石球滚动的坡道撤了。“这一点，恐怕连上山下乡运动的发动者也没想到”。

那么我们在大石球的坡道上究竟做了些什么呢？这恰恰是我们在研究上山下乡运动的时候忽视的，或者说是有些人刻意隐去的问题。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的知青大返城是撤去坡道的终结之举。在此之前，“当年上山下乡知青已经不是那么驯服，很多人开始思考，开始反叛。作为整体，则是消极怠工。”正是有了这些撤去坡道的举动，才会使大石球无法在肆无忌惮的滚动了。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这代人既是迷茫者，更是觉醒者。

把上山下乡运动放在近代中国的历史上考量，从1910年的辛亥革命以后的种种运动中去找寻根源，对于我们理清为什么会发生上山下乡运动，为何这代人曾经有“愚忠盲信”，为什么在这代人中间还会沉迷于昔日“激情岁月”等等问题，有很好的启示。

我们曾经在撤去大石球的坡道中起过作用。这个作用我们先前也许认识不够。那么，冯氏兄弟俩的这番对话足以引起我们的思考。在这份沉甸甸的思考里，一定不会有那些为上山下乡运动的歌功颂德，一定不会有今日一些人在自导自演的“知青精神”的缺失。因为，在这样所谓的“知青精神”里，恰恰是没有撤去大石球的坡道的种种表述的。

感谢《知青·上海》的编辑们为我们奉献了这份精神大餐。多说一句，这样的好文章不是所有的知青旗号的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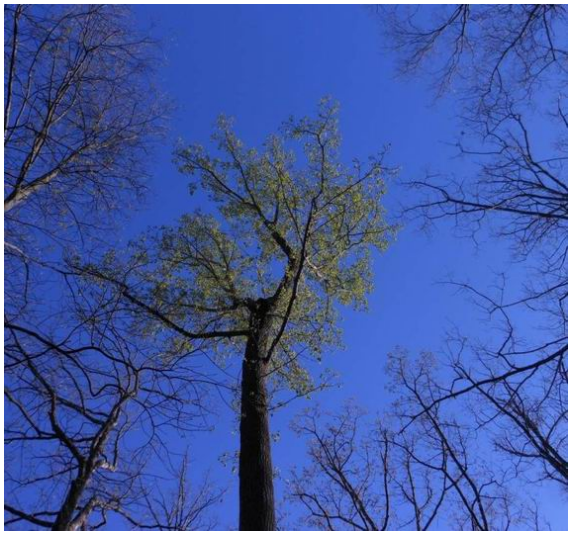
物里能够看到的。因为充满了“官气”，一定是四平八稳的；充满了“流气”，一定是胡说八道的，充满了“左气”，一定是为苦难歌颂的。只有具有正气和接地气的，才会给人精神上的愉悦！

所以，在今天国庆假期里，我要对《知青·上海》的所有编辑们敬个礼！

2016-10-02

余 杰文集：http://www.hxzq.net/showcorpus.asp?id=213

华夏知青网不是赢利性的网站，所刊载作品只作网友交流之用
引用时请注明作者和出处，有版权问题请与版主联系
华夏知青网：http://www.hxzq.net/
华夏知青网络工作室



招工——命运的潜规则

我有一位同事，也曾当过知青。“批林批孔”那年被推荐上大学，所谓工农兵学员。她说，下乡后没有几年，与公社书记的儿子认识了，大致也算“恋爱”吧，书记知道了很高兴，赞扬儿子有本事，到处宣扬，不少公社干部知道，看见我便笑脸相迎；后来大学来招生，书记儿子被“推荐”走了，这小子，进学校不到一个学期，来信和我“绝交”，我伤心了好几天，主要嫌丢人，也不敢吭声，只有好好劳动；第二年，大学又来招生，公社干部不知道书记儿子已经和我“绝交”，催着赶着把我“推荐”进了大学。

她说，阴差阳错也是一种命，一种你躲不开的宿命。

我曾与研究中国知青和上山下乡运动的法国学者潘鸣啸教授做对话节目。他在节目中说，上山下乡这条路，不是知青们自己的选择，而是别人的政治运动之路，所以，踏上这条路的知青们，是无法掌握自己命运的。

“知青走得是别人的路”。——确实如此。在知青年代，有时候机会的十字路口就摆在你面前，“选择”微笑着向你招手，但你还是无法选择。因为那机会和选择都是别人的，不是给你的。

强同学是我中学同学。1968年夏天毕业分配时，他没有分去下乡，而是留校上高中。好歹凑了一年学历，到了1969年底，遵照毛主席“再教育”的指示，强同学这批高中生便被“毕业”，送到市郊知青农场去了。

知青在农场按军队编制，分成连排班；有连长、指导员，战士一律睡大铺，吃大锅饭，集体出工，在黄河滩上开荒，种水稻。知青们有革命理想，心中总装着非洲受苦受难的黑人兄弟姐妹，燃烧着世界革命之火。当然，闲暇之余，也爱议论“回城”之事，憧憬着由“贫下中农”转变为“无产阶级”的光荣道路：在工厂上班，住集体宿舍，月底领工资，周六洗澡，星期天看电影。大家便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专拣脏活、累活干，夜里打着手电筒在被窝里写“红色日记”，在墙上贴决心书，晚上找指导员谈思想，争取在机会到来时，自己能被挑选上。

到了1972年12月初，忽然有消息传到农场。消息说，市计委批的当年招工指标月底作废；市内各单位正准备突击招工。

强同学说，当时，这个消息还不知真假，我听说后就找人打听，问谁都一副迷茫模样，摇头不知道。我们连的知青头天晚上还在一起议论回城，做着城市生活的梦，再没有想到现实到来时却是那么突然。

第二天一早，强同学就听见本连指导员在外面拼命吹哨子。他出门一看，原先早上出工集合的操场上，茫茫一片薄雾，一个人没有。原来，招工的消息传开，全连同学连夜回家找关系，找后门，连假都顾不上请了。指导员是公社派来的干部，哪里知道这中间的事情。他声嘶力竭喊叫着，念几条毛主席语录，又宣布几条土政策，没有用，最后缩着脖子来了三五个人。昨天早上出工时还举着红旗，唱着“战天斗地学大寨”，今天却冷冷清清，只有几条狗跟着叫。

一夜之间，离开农场的同学们又回来了。为什么回来？谁也不说，四周静悄悄的。每个人都坐在自己的铺位上，有人抓紧准备材料；有几个人已经开始整理行李、物品了。谁都知道这是招工，眼巴巴盼着的回城就要开始了，这也是托关系，走后门的结果。此时，同学们心里牢记的只有爸爸妈妈的教导：谁都不要相信，遇人多个心眼，说话留有余地，问什么都不知道，只摇头就行。后来，有人总结说，那时看似走向目的地，其实，谁也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知青们原本平静的心被彻底打乱。原先朝夕相伴的好友，现在突然变得鬼鬼祟祟，做事遮遮掩掩，似乎见不得人。农场失去了往日的欢乐，失去了往日的生气。

强同学说，也就在这时，那些三年前走向广阔天地的学生，才真正迈出走向社会的第一步，迈出由学生转为成人的第一步。

其实，这时候最忙最操心最担惊受怕的还是家长们。从1968年开始的上山下乡运动，到1972年，各种事件、弊端、案件层出不穷，农村的真实面貌已经被反映到城市，上山下乡是条什么路？人人心知肚明。所有的知青家长，莫不为自己孩子担忧。一旦他们知道了招工消息，马上放下手头的工作，到处奔波，找关系，托熟人。不管白天黑夜，无休无倦。

又是一夜醒来，市内各工厂、商店、饭店的劳资干部，蜂拥而至，挤到市郊知青农场突击招工。那几天，从市内到郊区各知青农场的公路上，奔跑着各种车辆，川流不息，走马灯一般。这是家长们显身手的时候，轿车、吉普、大客车、大卡车、大公共都出动了，连夜到农场拉学生。

强同学属于家里毫无办法那种，只能听天由命，悲哀的看着别人。一天夜里，他被一阵轻轻的抽泣声搅醒。起身看时，通铺的尽头，一位同学掩着被头在哭。强同学爬过去好言相劝，还念了墙上贴着“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等几条豪言壮语。那哭泣者抹着泪说，我也不是怕当农民，我就不明白，原先说干得好了就可以回城，我就好好劳动，每天晚上打着手电写红色日记，指导员都看见了，还表扬我，怎么这时候都不管用了……说完他又哭。另有几个同学也披着被子围过来，大家都劝他。有人说，也不知道这算不公平呢？还是领导骗我们？也有人笑言，塞翁失马，安知非福。——聊当自慰罢了。

又有一次，已经半夜了，连队指导员敲窗户叫起强同学等人，说旁边一个宿舍有几个人不见了，赶快去找，怕出大事。强同学几个人连忙拿着手电筒寻找。四处墙角旮旯，涵洞土坡，寻常男女幽会处都找遍，就是不见人影。直到后半夜，才在场部后面的粪堆旁，发现几个醉倒在地的人，躺在粪土里，嘴里吐着白沫子，都已经冻僵了。强同学他们赶紧将几个醉鬼搬进宿舍，捅旺了火，又每人剥脱干净，盖了几床被子，捂了好一阵，几个人才醒过来。醒来便“爹啊！娘啊！”哭喊着，闹了半宿。强同学他们几个鼻酸，围着看，没有说话。

强同学说，我比较懦弱，连喝酒都不敢，更不敢哭爹叫娘了。

一天上午，指导员叫来强同学，帮忙带一个招工干部到公社去办手续。

强同学带那人到了公社，找到办手续的地方，在一间小屋子里，只有一个人在办理手续。只见来人川流不息，熙熙攘攘，像赶庙会。这里是最后一道手续，那人在几张填写好的表格最后一张盖章，签名，就算办妥了。

强同学他们挤进去，盖章的是个中年人，面前一摞子表，他不断的翻动，签字，盖章，其他人站在一旁，满脸都是焦急，有人站在桌子上、椅子上。屋里人虽然多，吵吵嚷嚷，但是谁先谁后，人人心里明白，所以也没有争抢，耐心排队而已。轮到强同学带来的招工干部，盖章的人翻看表格，说，少了一个章，回去补吧。那人好不沮丧，又无奈，只好交代强同学等着，他回去补办。等最后盖完所有的章，已经第二天凌晨三点了。

还有的农场，开大会宣布招工名单，一共招多少人，男生多少，女生多少，明明白白。看似公平，其实后门、关系早已走到，实招人员全在幕后商定；国营工厂，车钳铣刨镗好工种，早已名花有主；少数几个积极分子虽榜上有名，不过陪太子读书而已，进厂也是做勤杂工。

真应了那句话，天有不测风云。又说是否极泰来，看似花团锦簇，谁知乐极生悲。忽然一天，市政府宣布招工指标作废，全部招工无效。已经到了工厂的学生们又被退工。

一场闹剧收场，落幕时好不凄凉。当那些头一天回城的同学们，又提着行李回到农场。强同学他们三五个留守人员站在农场大门口，举着小旗欢迎战友归队。把墙上“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标语又描红一遍。当晚，强同学提议，连里买了酒，熬了大锅菜，全连同学聚餐。一些女生端着碗，喝得醉醺醺，又相互搭着肩头，嚎啕大哭；男生则端着空空的酒碗，对着夜空嗥叫。哭声和叫喊声，在黄河滩上空飘荡……

那段苦辣酸甜的日子，不管是进到城里还是身在城外，同学们饱尝世态炎凉，受尽命运的捉弄。现实教育了每一个人。原来，上山下乡真正有出路的，并不是那些劳动模范、重活累活抢着干的人，也不是那些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而是那些有好爹好娘，家里有办法，有熟人，有关系的人。——这也是社会的本来面貌。那些华丽的词藻，不过一张纸糊的外衣罢了。

强同学说，这次招工的黑色记忆，一辈子也忘不了。是命运在捉弄人吗？也不是，宿命而已。

2017-03-07

“知青春晚”何时休！

1、涉及“知青”的话越来越难说

春节过完上班的时候，看见好友王宗仁发出的一篇文章《丁酉元日对话》。这篇写于1月30日的文章是四天后才见天日的。网易上发文已经很难了。“网易”，同音字“妄议”啊！据好友告知是采取了一些技术措施，文章才得以刊出的。

悲哀啊。如今写写文章都变得这样难，你还会相信愿意倾听批评意见的许诺吗？

王宗仁的文章很短，全文就是讲了一个有关“知青春晚”的话题——

1月28日是农历春节，大年初一。一个微信群里，一如既往的互致问候过后出现了这样的场面。

Z ： (转发了“2017年中国知青春节联欢晚会”)Z：这个知青春晚我放在口袋里，一边做事一边听，听了快2个小时还没听完，除了感慨还是感慨W：我对那个“知青春晚”极其反感、恶心。“神采奕奕”身着红·卫兵装束就表明，那是在怀念青春的幌子下粉饰、掩盖罪恶。

Z：其实这与政治观念无关，这些人怀念仅仅是青春而已，我也如此。

W：能够这样怀念青春吗？照此办理，当年“大·日·本·皇军”“纳·粹·党·卫·军”（原文是拼音：“da ri ben huang jun”“na cui dang wei jun”）的年轻战士到了老年也可以理直气壮地登台亮相了。

Z：对文·革的评判大家心知肚明，不在于文艺上的回味。

W：我们当年就是在各种文艺形式的潜移默化之下坠入深渊的。如果现在用“高水平”的文艺形式向“后来人”显示对“青春的怀念”，其效果就不会再次出现潜移默化？

Z：这是确实的，年轻人看了会对我们当时的情况产生曲解和误导，以为我们那时期有多么快乐和幸福，所以只给我们自己看看，不给小辈看W：互联网是无边界的，一旦发到互联网上就是向全球公开的。

Z：是的W：不给小辈看，只是一厢情愿。

对话至此戛然而止，先扬后抑发人深思。

……。

王宗仁的文章到此结束。给我的感觉，如今讲“知青”的话也很难说了。

2、真正是知青的歌不唱了

大过年的本该开开心心的，冒出一个“知青春晚”，有点不伦不类。与去年一样，我在手机上看了几分钟就“拜拜”了。

记得去年也有这样一台冠以“知青”名号的晚会。开场的那个“东方红”的乐曲仿佛回到了以前的那个年代。我也是一看就与其“拜拜”了。

今年又来了。在微信上居然有人把这台“知青”晚会堪比央视的春晚。真的够闹腾的，有点不要脸的感觉。网上传出的署名沈乔生的一篇文章《一个知青的声音》，写得好！他的发问值得我们好好想想：“近半个世纪过去了，难道我们的思想认识水平还停留在那个专政的年代，没有丝毫进步，甚至还倒退吗？”实际上就是在折腾。

看了这台晚会组织者们的文字宣传材料，自报家门是：“《大海航行靠舵手》的主旋律歌声中手捧红书跳起了忠字舞，唱出了对领袖的无限热爱和忠诚。”我吓了一跳。红宝书、忠字舞，靠舵手。他究竟要让我们想起什么，赞美什么，纪念什么，要回到哪里去？

我想起了巴金老人的《随想录》中一篇《“样板戏”》一文中的开场白：

“好些年不听‘样板戏’，我好像也忘记了它们。可是春节期间意外地听见人清唱‘样板戏’，不止一段两段，我有一种毛骨悚然的感觉。我接连做了几天的噩梦，这种梦在某一个时期我非常熟悉，它同‘样板戏’似乎有密切的关系。对我来说这两者是连在一起的。我怕噩梦，因此我也怕‘样板戏’。现在我才知道‘样板戏’在我心上烙下的火印是抹不掉的。从烙印上产生了一个一个的噩梦。”在林林总总的打着“知青春晚”中，我发现难见那首《我们这一辈》，基本没有听到那首作者差一点被枪毙的《知青之歌》。

我们这一辈词曲、演唱：王佑贵我们这一辈和共和国同年岁有父母老小有兄弟姐妹我们这一辈和共和国同年岁上山练过腿下乡练过背我们这一辈学会了忍耐理解了后悔酸甜苦辣酿的酒不知喝了多少杯嗨哟我们这一辈和共和国同年岁熬尽了苦心交足了学费我们这一辈真正地尝到了做人的滋味真正地尝到了做人的滋味人生无悔……。

在今年1月21日上海知识青年历史文化研究会举办的迎春联欢会上，原云南东风农场的上海知青邵国良和潘沪生上台演唱起这首歌。当时，没有伴奏，只是清唱。悲怆、激愤的旋律中那每一句的歌词深深地打动了我们的心

灵。

每一次我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感觉到有过上山下乡经历的人才能够听得懂的歌。唱这首歌无需专业，只要真情。这样的歌才是真正应该在有“知青”符号的晚会上的主旋律。

在那个年代里流传在下乡知青口中类似这样的歌不少，那些都是在苦难年代里真情流露的歌。我们设想一下，在那个浩劫年代里，对着大山荒林唱“靠舵手”的歌，你会吗？可惜的是，真正流传于知青们心中的歌，很难被一个所谓的“正能量”的符号接受！

3、打着“知青”旗号的晚会何时休

我在去年的时候说过这样的话，自我感觉今天似乎依旧有效：

“知青”能够搞一个晚会，那么工人呢？农民呢？解放军叔叔呢？就说工人吧，还有不同产业的、行业的，各个不同年代的，都搞晚会？不可能吧！知青，已经是过去的事情了。还在打着这个旗号干事的人，除了无私奉献以外，是不是还有其他什么目的呢？你懂得！

讲白了，这两个字在当权者的眼中是与“维稳”相联系的。怎么可能在公开的媒体上让你们这些不稳定的因素抛头露面呢！

就是一场演出。请了几个很久不露面的“大牌”演员说说唱唱，打出了“知青春晚”，还是首届呢。结果早就可想而知了。除非电视台的掌管者不想再吃这碗饭了，才会让“知青”两个字露露脸。换了我也照样会执行上峰的指令，不许出现“知青”两个字。为啥，还不明白吗！（《春节晚会以后》博客《滴水湖畔》·2016年2月10日）

明年会不会还有打着“知青”旗号的春晚呢？难说。大千世界无奇不有，总有人爱折腾的。在折腾中获取一种自慰：无悔啊，难忘啊，上山下乡就是好啊，得到了锻炼啊！等等。

还有多年养成的习惯，不懂脑筋，只会按照“最高指示”，依葫芦画瓢。先是“初心”，是不是明年搞一个“撸起袖子”为名的联欢会呢？这种懒汉式的做法，既安全省事，又能够“与时俱进”，并且时髦呢。

符合“知青”这个名号的春晚啊，晚会啊，旅游啊，聚会啊等，应该说是兔子的尾巴长不了了。自然规律，再过十年，这代人都奔向八十了，还唱还跳？

春节的时候，朋友在微信里问我怎么看待这台打着“知青”旗号的“春晚”。我回答说，懒得说三道四了。为啥？

一是在当下的环境下，唱红之风越演越烈，向“左”转、起步走的号令已经使一些沉寂了多年的泥沙泛起、妖风四吹。这样的“知青春晚”的出现不足为奇。只要看看最近发生的一些列稀奇古怪的“左”转，啥都明白了。

二是在曾经当过知青的这个群体中，也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

你爱唱不唱的，我爱听不听的，各有各的自由。只是那些为类似丑陋的东西捧场的言和行，请千万不要忘记：人在做、天在看。不要让我们的子孙们在若干年后指着我们的脊梁骨说：这些都是为苦难唱赞歌的人！

三是也来个讲究民主吧。应该允许此类东西存在，也应该允许我提出不同看法。可惜的是，如今的语境有点“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味道了。连一点点反对的声音都不允许，不知什么叫做“自信”了。

懒得说了，又说了这些多余的话。

2017-02-06

致渐渐老去的我们

我们，曾经有过知青经历的一代人。

知青，从城市到农村边疆的学生，应该涵盖从上个世纪50年代开始去上山下乡的所有人。

在自愿与不自愿的交织中，完成了人类历史上罕见的上千万人大迁移。同样，在自愿与不自愿的交织里，在上山下乡运动谢幕的那一刻，每个人都作出了自己的抉择：回城或者留下。改变人生的一刻实际上是从出发时就注定了。

如今，都老了。上有已过七十的老人，下有六十过半的一群人。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大地上，这是特殊的一代人。如今，老了，都老了。要不了五年、十年以后，声音会渐渐微弱下去，一直到消失为止。

这是自然规律！

这代人老了，事情还真的不少啊——

1、争夺“蛋糕”：

我们这块“蛋糕”好像臭豆腐，闻闻臭，吃起来还有点味道的。我们这批人现在都退休了，是闲在家里无所事事的一些人。于是那些商家们敏锐地发现了其中的商机：旅游。打着各种旗号的组织纷纷把目光焦距到了曾经的知

青身上。也有本来就是知青的人打起了联谊会之类的旗号，抛出诱人的旅游计划。还有把那些早就人烟稀少的景点包装一下，打扮成“知青文化家园”之类的“品牌”，以此来吸引曾经的知青们的眼球。少数农家乐也跟着凑热闹，为了拉拢我们这些“客户”。基本都是以价廉物美为诱饵，仿佛我们都是为了贪这些便宜的一伙人。

为此我专门做了一些小调查，问问周边的知青朋友们：你会去吗？答案是各不相同的。其中，经济基础是最为主要的因素。但是大多数的回答是，不会去！理由很简单，现在要出去旅游，市场上有那么多可供选择的产品。打着“知青”旗号的旅游产品只是一种噱头而已。如今谁还会羡慕这两个字呢？有朋友还反问我：你这次去东欧三国是参加了打着知青旗号的旅游团？我说，不是。

我能够理解那些想抢夺曾经的知青们的这个“蛋糕”。市场经济嘛，愿者上钩。再仔细想想，如今那些以这个旗号为主的活动，参与者似乎都是老面孔了。对于上海而言，当年有100多万知青上山下乡的，如今还有多少人在热衷于此类活动呢？包括其他一些有“知青”元素的各种活动一样，还是少数人的参与。我曾经向一起上山下乡的同学们介绍一些上海地区的知青活动以及网站等等。大多数人感到莫名其妙的，根本不了解的。所以讲，这个“蛋糕”是兔子的尾巴长不了的。切分这块“蛋糕”，小心做亏本的生意！

二、漠不关心：

最近关注的是每周三在市府某机关大楼前，曾经的知青请愿事件。这是部分上海以外地区的知青，户口迁回了上海，人也回到了自己的故乡。但是以现行的政策规定，他们的养老金以及医保关系还在外地。由于地区的差别，他们现在只有微薄的退休收入。千把元钱无法在这个国际大都市里有尊严的体面生活下去。于是他们提出的诉求很简单：希望与上海的养老医保接轨，能够活下去啊！他们约定在每周三一起到主管部门前，顶着烈日，举着牌子，穿着印有诉求的汗衫，喊着口号。我没有到现场去看过，只是听朋友们的讲述和网上看到的画面。

我很理解和同情这些头发花白的老人们。

但并不表示我赞同这样上街的诉求（理解他们的无奈）。

我想，假如当年我也与他们一样没有趁着大返城的浪潮回到上海呢，一样的结局！再想想，当年动员和强迫我们上山下乡的时候，讲的何等天花乱坠的，结果又是如何呢？因为有着上山下乡相同的经历，命运对于他们简直就是不公啊！他们付出了自己青春年华，付出了子子孙孙，付出了生命的全部啊。如今老了，回到了朝思暮想的故乡了，在艰难地在度过每一天啊！

你会以这是历史遗留问题为挡箭牌不肖一顾；你会以这是很复杂的体制机制问题为搪塞敷衍；你会以影响稳定大局甚至可以动用警力加以扼杀；你甚至可以用“扰乱社会治安”（嫖娼）为由抓几个为首分子给予镇压等等。但

是，只要有了良心良知以后，只要是真正想到“为人民服务”以后，也许你不会这样做！

由此我还想到了各种旗号的知青联谊会、研究会、协会（许多是自封的），你们关注了多少呢？平时都会口口声声地高喊：天下知青是一家。现在家人有难了，我们都无动于衷吗？作为知青的各类“组织”的头头脑脑们此刻都在干嘛呢？也许是生怕惹上了遭遇麻烦吧。在这个时候，你们能不能站出来呢？至少可以帮助政府做点工作；至少可以静下心来，听听这些诉求者的意见；至少可以组织专人把他们的诉求撰写成书面报告、提出解决问题的建议和设想上交政府有关部门等等。这也许要比那些热衷于所谓的空洞无实的“理论”研究、油头粉面的“辩证法”讲解、莫名其妙的展现“笑容”，更加对得起“知青”两个字！

希望那些“知青精神”的发明者们，也去面对着这些在苦苦诉求的人讲解一下！在这些想体面和尊严地活着的老人面前，虚无缥缈和杜撰出来的精神，显得何等可伶可悲！

当一个人、一个群体连温饱都很难维持的时候，哪来什么精神！

三、自娱自乐：

我们都老了，很快就要步入生命的终点！好几次去参加同伴们的追悼会的时候，我在感叹我们这代人的悲壮和悲哀。许多时候，朋友们都会自我安慰一番，趁着走得动的时候，多走走，多看看，多娱乐。这是真话。所以我看到了在“知青”旗号下的各种活动，聚会，只是越来越少了。

还是一种自娱自乐，只是少数人的自娱自乐。

一次我在小区里的棋牌室门口遇到了一位老同学，当年他曾经去了江西插队落户。我们谈起了话题自然是知青、上山下乡。我问了一个问题：你上网吗，有微信吗？他告诉我，老了，不会玩。

还有一次，我与自己曾经的工作搭档，后来他担任了上海一家大型国企的党委书记（曾经去崇明的知青）。我告诉他网上一些有关知青的话题，他说：退了，不想再看这些知青的事情了。再说，自己现在不玩微信不上网，少管闲事了。

在一场知青朋友的聚会时，不少朋友说，你写了不少关于知青上山下乡的文章，我们看了。但是更多的朋友告诉我，不知道。因为不上网，不会玩微信。还有人劝我，别瞎操心了，说多了，小心被盯上了。

所以，我在写这些文字的时候，感到一丝丝悲哀。

我们都老了，在退出历史舞台的时候，显得是那样无可奈何、手足无措。一群很快就会被遗忘的一代人啊，可悲的是自己还在高唱着自我赞扬的颂歌。例如，我们是共和国伟大的一代人；现在进入了知青时代（指国家领导人

有知青履历）；我们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一代人；我们有着伟大的知青精神等等。在这样的“自娱自乐”中昏昏然，洋洋得意，自以为是，不知所然了。

我们都老了，少些折腾吧。那些名不副实的所谓“全国”知青会议和活动还有多少人在关注，也是“自娱自乐”而已。那些林林总总的“知青”组织，只不过是占地为王的“山头”罢了。那些以组织知青活动为敛财手段的活动，蒙骗了多少至今还天真烂漫的老人。那些众多的知青杂志书刊还有多少人在认真阅读呢？就像一位80后的青年对我说过的这番话：

你们的那段过去了，不要自以为是了。文革，上山下乡，值得炫耀吗？既然不许讲，你们该歇歇了。老了，唯一要做的是安度晚年。假如你们还要折腾的话，不如留下一些你们真实的故事，留下值得我们汲取的教训！

我们能够做到吗！？

这是最近在一次知青朋友的聚会时的三言两语。朋友们建议我在博客上讲出来。我整理了一下，权当完成朋友们交给的任务。

2016-07-28

余 杰文集：http://www.hxzq.net/showcorpus.asp?id=213

华夏知青网不是赢利性的网站，所刊载作品只作网友交流之用
引用时请注明作者和出处，有版权问题请与版主联系
华夏知青网：http://www.hxzq.net/
华夏知青网络工作室

试析一份知青调查报告

最近看到有网文推介一份关于知青的调查报告。来源是2013年06月01日解放日报第六版“社会调查”版，网址为 http://newspaper.jfdaily.com/jfrb/html/2013-06/01/content_1035193.htm ，题目是“本报对600位知青进行访谈调查　穿越磨难蹉跎 我们与共和国同命运”。据介绍，去年（2013年）4月黑龙江黑河市在上海举办《与共和国共命运》知青巡回展，中国社会学会方法研究会、上海知识青年历史文化研究会和上海神州市场调查公司在知青展馆内外对当年的600位知青进行了问卷调查，解放日报社会调查中心根据统计数据，结合该调查中心获得的文案进行研究分析，形成了调查报告。

虽然此事已经过去一年有余，但仍有人以此为据做文章，使我对那份《调查报告》产生了兴趣。

【一】关于“基本数据”——那些答卷说明啥

《调查报告》一开始有关于那次问卷调查中600位当年知青的一组“基本数据”——

男性占60.5%，女性占39.5%，

59岁以下占13.1%、60-63岁占55.2%、64-67岁占24.3%，68岁以上占7.4%。

当年上山下乡地点在东北、内蒙古、云贵占49.5%；安徽、江西占21.4%；上海、浙江占12.6%；其他省市的占16.5%。

当年上山下乡的类型中，插队的占40.5%，集体插队或国营农场的占24.7%，生产建设兵团占31.7%，其他占3.1%。

细细品读上述数据，有以下感受。

（一）关于性别

受访者中男女之比为六比四，与当年下乡时“五五开”的情况是明显不吻合的。它对调查得到的数据及其分析

有什么影响，值得注意。

（二）关于年龄

根据《调查报告》和上海地方志的数据（上海劳动志 >> 第一编劳动就业 >> 第五章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第一节　宣传动员），我得到如下表格。

表1：

受访者中年龄分布

届别

下乡人数

届别分布

A

59岁以下

13.1%

70届及以后的中学生，生于1955年及以后

43万人

33.9%

B

60-63岁

55.2%

老三届初中生及69届中学生，生于1951～1954年

68万人

53.5%

C

64-67岁

24.3%

老三届高中生，生于1947～1950年

D

68岁以上

7.4%

文革前的中学毕业生，生于1946年及以前

16万人

12.6%

来自《调查报告》

笔者推断

来自《劳动志》

笔者推算

根据《劳动志》的数据，上海在文革前下乡人数16万，文革期间是111万，总计127万人。

由年龄分布的四个数字，推断出他们中学毕业的届别，进而发现，年龄段的划分是合理的，与当年上山下乡政策的变化是吻合的：

D类是文革以前动员下乡的，相当一部分是在六十年代上半叶到新疆兵团的（近10万人）；

B和C类是1968～1970年“一片红”强制性下乡的，但是，需要指出在12-21指示发表之前老三届中的66、67届并不是不是一片红，是“四个面向”，其中有一些自愿者；（附注：目前看到的资料几乎没有把老三届高中生、初中生分开来说事的，所以那样两个年龄组的数据分列似无太大的作用）

A类是1970年以后的“四个面向”，属于“对号入座”。

对比上述表格中两列百分比数据，可以发现，老三届及69届的下乡人数占下乡总数的五成多（53.5%），但是在受访人数中占到八成（B ＋ C ＝ 55.2% ＋ 24.3% ＝ 79.5%）！

看来，那样的巡展参观活动中，老三届及69届是“主力军”。也许这和他们当年的经历有关——强制性的一片红、跨省下乡、“圈养方式”这三者的叠加，产生了明显的凝聚效应，并且仍在发生作用。如今诸多“知青”活动中，高举着写有当年兵团中师团营连番号旗帜的特别多。与D类中不时有发生群体性事件形成鲜明对照。

（三）关于当年下乡的地点

根据《调查报告》和上海地方志的数据（上海劳动志 >> 第一编劳动就业 >> 第五章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第一节　宣传动员），我得到如下表格。

表2：

由于《劳动志》的数据中文革之前的统计分类与文革期间不一样，所以上述表格中是对文革期间的数据进行了整理，与《调查报告》的数据进行对比时需要注意这个差异。《调查报告》中对下乡地点的划分，似乎以路途远近为标准的，但是不甚合理。

“远途”——下乡在东北、内蒙古、云贵，人数26.4万，在111万中不到四分之一（23.7%），但在受访的600人中竟达到半数（49.5%）。这可能和他们之中“圈养”比例高有关——26万人中有72.1%是兵团或农场。如果把那600人除去其中文革前下乡的数量，那么这个比例肯定超过百分之五十。

“中程”——下乡在安徽、江西，人数26.8万，在111万中为24.1%，在受访的600人中是21.4%，这两个百分比相当接近。

“就近”——把下乡在浙江上海归为一类，不知是处于何种考虑。可能是因为下乡到浙江的都是“投亲插队”，而且人数很少，所以把它与下乡在上海郊区放在一起了。其实，在严格的户籍制度下，是不是沪籍是很重要的。

“其他”——估计是文革前去新疆等地的。《劳动志》的资料显示，除了新疆以外，还有江西、安徽、湖北、浙江、上海市郊。

因此，我觉得《调查报告》可以把浙江（实际上文革期间还有到江苏的）等地与江西安徽归集为一类，而上海郊县应当单列。当年下乡在上海郊县的“圈养”比例高，再加之下乡地点离家近、下放时间相对短，与“远途”“中程”跨省下乡的在感受上有明显的不同。

（四）当年下乡的类型

《调查报告》中分为四种类型：插队、集体插队或国营农场、生产建设兵团、其他。这是不常见的分类法。通常只有两大类：插队，兵团或农场；其区分标准就在于是挣工分还是拿工资。

按《劳动志》的数据，文革期间上海111.3万下乡知青，插队为51.4万，占46.2%；兵团、农场为53.8万，

占59.5%。相比之下，在受访的600人中，插队为40.5%，这两对数字大体接近。需要关注的是，对“插队”的定义究竟是什么。

（五）我的想法

以上四组数据，涉及性别、年龄、下乡地点、下乡类型，但是缺少了一个十分重要的内容——下乡的时间，即下乡以后务农持续的时间，因为上山下乡“接受再教育”并不是一次有统一“教学大纲”的活动，短则一两年，长则十余年，甚至更长，这绝对是影响到各人对上山下乡的感受与评价的重要因素。缺少这方面的数据是很令人遗憾的。

从上述分析与比较中可以得出一个结论，那600人无法代表当年的127万上海知青，充其量只是代表了那个巡回展的参观者。至于有多少参观者，就笔者目力所及觉得，虽然有很多关于巡回展的宣传造势网文，但对实际情况没有见到定量的报道，在http://xinzq2013.blog.163.com/blog/static/2149150912013388271483 2/ 看到这么一句语焉不详的话，“吸引了数万知青和上海市民、青年学生参观”，究竟是多少，不得而知。所以那600人也只是代表了“数万人”，与127万之众有数量级的差距。

网中人文集：http://www.hxzq.net/showcorpus.asp?id=162

华夏知青网不是赢利性的网站，所刊载作品只作网友交流之用
引用时请注明作者和出处，有版权问题请与版主联系
华夏知青网：http://www.hxzq.net/
华夏知青网络工作室

从集体记忆到个人自述：40年来知青回忆录的演变

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引述毛泽东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随即在全国开展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此后到1978年，有近2000万知青上山下乡，接受“很有必要”的“贫下中农再教育”。48年过去，看人们如何回忆和叙述这段历史。

“知青”这个名词是对具有特殊历史文化内涵的一代人的称谓，它凝聚了这代人坎坷的人生经历和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他们是共和国的长子，他们的人生经历伴随着共和国大半个世纪的风风雨雨，他们的命运与共和国的命运一同沉浮。他们是中国社会发展演变的亲历者与见证人。

当年，在国家面临的困境时，他们别无选择响应伟大领袖的号召；上山下乡，他们充满青春气息的个体生命像蒲公英的花絮，在时代劲风的吹拂下，漫天飞舞。他们的足迹遍布广袤的田野，边疆，荒漠、山寨、水乡、林莽。他们将辉煌的青春梦遗落在黑土地、黄土地、红土地。在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劳作中，脱胎换骨，摸爬滚打。在社会最底层难以想象的贫困和落后中，他们了解了中国的农民，国情，从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的激情中清醒过来，开始反思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和命运。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国家发生翻天覆地的巨变，百废待兴；已到人生而立之年的知青一代人，满脸沧桑，以无限期待的焦灼目光，手挽手站在时代大拐点的地平线上；我们往何处去？这时党和国家领导人，面临由于十年文革浩劫造成的经济与文化的废墟，正在积极考虑，如何从积重难返中解决文革遗留的一连串的社会问题，统筹解决涉及千家万户的知青上山下乡，1978年——1979年初，发生的云南知青提出的“我们要回家”的请愿上访，促成中央高层做出：“让娃娃们都回来”的决断。百万知青大返城，像雪崩一样冲溃了长达25年的知青上山下乡长堤。许多返城知青几乎是一切从零开始，在已经陌生的故土，他们匆匆忙忙在比较短促的时间里完成人生要分几个阶段完成的事；成家立业，求学就业，生儿育女。接踵而来的改革开放的时代大潮裹挟着他们，在新的生活中寻找自己新的位置。

在知青大返城后的第一个十年，知青这代人的话语表达，并没有频频出现在社会的媒体空间里，绝大多数知青此时正为生存而努力，他们还没有心情，也没有做好表达倾诉的准备。但是，这不意味着他们的沉默失声。因为，文革后，异军突起的知青文学振聋发聩，成为新时期伤痕文学的主要组成部分。“群星灿烂”的知青作家们以充满血泪的笔墨控诉了极左路线对知青一代的迫害，批判了作为文革的伴生物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非理性。这一时期的

知青文学；曾经以《蹉跎岁月》奠定中国知青文学基石的上海知青作家叶辛，在90年代初，从贵州回到故乡上海，在巨大的时空反差前，他收集了一系列素材并且将它们典型化——当年云南知青大返城，一些知青知青为了返城仓促地与当地配偶离婚，将子女遗留在南疆。在时隔15年后，这些孩子结伴来大上海寻找父母，写成小说《孽债》。小说以大上海林立的高楼大夏，拥挤狭窄的里弄，美丽而蛮荒的西双版纳的坝子，竹楼为不同的场景，叙述了五个家庭两代人的悲剧；好不容易结痂的伤口又被捅破，昨天的恶梦又来困扰这一代人已经平静的生活，而且使两代人心头再度流出脓血。这是非常令人无奈的现实生活。从而令人反思；“作为权力生命的文革已经死了，作为社会生命和文化生命的“文革”依旧活着”，形象地说明知青这代人不仅是时代的债权人，他们中的有些人也参与灾难的制造，也是债务人。这部小说是对文革的深刻批判，显示了作家在思想和艺术上的成熟。

这一时期的知青文学既有梁晓声的《今夜有暴风雪》、《雪城》、《年轮》等激扬着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的力作；也有老鬼的《血色黄昏》，以惊人的真实，唱了一曲“热血更凉，世界更冷”理想主义的挽歌。既有史铁生《我遥远的清平湾》，描绘了知青眼中的陕北黄土高原忧伤的风俗画；郭小东的《中国知青部落》三部曲写出已经站在世纪交接点的知青们在时代转轨点面临的困惑与选择。还有钟阿城《棋王》、《树王》、《孩子王》以平淡的叙述，将知青的苦难淡化，最终走向参禅悟道，淡泊清冷。这一时期的知青文学以愤怒的控诉，幻灭的感伤，知青们的呐喊和抗争，构成这一时期知青文学的共同精神内涵。

知青文学热催生了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知青文化热的形成。

知青作家们创作的知青文学作品，他们在作品中反映的知青年代难忘经历，塑造的一个个个性不同，血肉饱满的知青形象，他们在作品中宣泄的对时代与社会的批判，在广大知青中引起强烈的共鸣，根据小说改编的电视连续剧《蹉跎岁月》、《孽债》、《今夜有暴风雪》等在全国各地电视节目的黄金时段上映，创造了空前的收视率。《孽债》在上海上映时，晚上八点开播，万人空巷，家家户户都在看《孽债》，该剧主题歌《在美丽的西双版纳》揪人心肠，撩起多少曾经有知青子女的千家万户的伤心往事。

从1990年开始，知青文化热在全国各地引起巨大的连锁反应。首先是北京知青在军事博物馆举办了“魂系黑土地----北大荒知青回顾展”，据悉，在半个月时间里，来自全国各地的20多万北大荒知青来此参观。在展厅里有几株从北大荒运来的白桦树，落叶萧萧，象征着知青们不寻常的青葱岁月。接着在天津、成都、重庆、广州、南京、武汉、西安、昆明的知青们纷纷举办知青岁月回顾展。各地知青岁月回顾展促成各地先后出版了一大批知青回忆录，将第一波的知青文化热推向高潮。首先是北京、天津知青编写了北大荒知青回忆录；《北大荒风云录》、《北大荒人名录》。知青作家梁晓声在《北大荒风云录》首发式上讲话；“只有穿过历史的思想才能面对现实，在心灵的阳光下任何艰辛，困难，忧愁，恐惧都可以用宽容的心境包容，而沉淀下来的，是对祖国。对民族，对人民永远的责任。”他的讲话表达了广大的知青这一代人已经超越个人命运与时代的局限性，以深邃的目光去反思知青经历

与整个民族的历史。

较早出版的北京知青回忆录有《北大荒风云录》，《草原启示录》（内蒙古知青回忆录）、《回首黄土地》（陕北知青回忆录）、《老插话当年》（山西知青回忆录），《青春方程式；北京55个女知青的自述》。这几部不同接受地区的知青回忆录以集体记忆的形式向读者展示他们在哪个特定的时间，不同的地域的农村底层社会的酸甜苦辣，在绝然不同的文化背景的冲突中，知青和农民，知青和知青，知青和社会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这是后人了解这一时期中国社会生存状态和文化冲突的一手资料。他们不求文学价值，不溢美，不隐恶。重在写实，抒发真实的感情。把往日生活的原生态和个体的内心深处爱与恨袒露出来，实际上是一部初为狂热，继为彷徨，终为觉醒的知青心史。

成都知青推出一套《知青岁月书系》，其中《青春无悔》是集中反映成都去云南的兵团知青的经历；《知青档案》和《命运列车》是反映去各地农村插队的知青人生经历。重庆知青在1992年出版了《红土热血》和《热血冷泪》均为重庆去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知青的抗争。他们的集体回忆，记录了当年去云南的42000多四川知青的的激情，困惑与幻灭，他们不屈的抗争与呐喊！实际是一代人的青春档案。

武汉知青出版了第一本武汉知青回忆录《我们曾经年轻》，封面大红色，黑越越的荒原上是一棵不倒的树，树上上方是一只张开的手掌，掌心有一双眼睛，这是一位武汉知青画家的前卫的版画作品，手掌和眼睛都是从毛泽东画像上截取的，隐喻了知青这代人与毛泽东的无法割舍的联系；毛主席挥手我前进！

上海有120多万知青，此时只出版了三本知青回忆录；金大陆主编的《苦难与风流》、《老知青写真》和季永贵主编的《东方十日谈》。旅居美国的上海女知青周励写的《曼哈顿的中国女人》，这是一本引起争议的书；她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叙述文革期间大上海一月革命的风暴和去北大荒农场上山下乡，在暴风雪中的小木屋的人生况味和毫无希望的爱情悲剧，多角度地反映那些从土插队到洋插队知青们人生抗争的波折。

南京知青任毅出版了他的回忆录《生死悲歌》，叙述了他在1969年因为创作了一首抒发知青们怀念故乡和亲人的歌曲----《南京知青之歌》，这首歌很快在全国各地知青中传唱而被专政，身陷牢狱十年的苦难经历，控诉了在那些没有民主与法制的年代，人的尊严被践踏的黑暗。同一时期，南京知青先后出版了《嵌入大地的青春》（到江苏各地农村插队知青回忆录）和南京去新疆阿瓦提的知青回忆录《这里曾是胡杨林》，南京去内蒙古插队知青回忆录《难忘的鄂尔多斯》。

福建的厦门知青谢春池主编了厦门知青回忆录《告诉后代》，福州知青出版了回忆录《永远的脚印》，文革前去江永插队的湖南长沙知青回忆录《我们一起走过》。湖南知青作家韩少功在主编《海南纪实》时，为纪念知青上山下乡20周年参加向全国知青征稿，该刊停刊后，他从推积如山的来稿中，选编了一本《辉煌的青春梦》，首次向外披露中国知青参加缅甸共产党游击战和发生在1978年---1979年的云南版纳知青大返城的内幕。

在90年代知青的集体回忆中，最让人落泪的作品是陕西作家白描采访写成的《陕北；北京知青情爱录》，他写的是知青中命运最悲惨的那些和当地农民结婚的，再也不能返城的北京女知青。她们曾经给贫穷落后的黄土地带来现代文明，但是，特定的社会与地域环境酿成畸形的婚姻。她们忍受着因文化反差带来的冲突与歧视，被死死地禁锢在落后的小山村和小生产农耕樊篱中，吞咽着苦果。但是，她们以母亲般的胸怀接受了这残酷的现实，并为维护自己的尊严作了不屈的抗争。

这时期最震撼人心的知青群体回忆录是著名作家，成都赴云南知青邓贤写的纪实体的报告文学《中国知青梦》。他以1978年五万云南知青大罢工，大绝食，北上请愿，大返城为主线，讲述了一个又一个沉默在昨天属于整整一代人的往事，发出一声更迭一声的呐喊！那是一千多万中国知青作过的恶梦。海内外的老知青们都是流泪读完它，有的读者甚至放声痛哭！作家以恢弘的历史气度，史诗般的笔墨感动了老作家王蒙，他评价说；“这里有残酷的真实，青春的魅力和危险，理性的破灭和执着。”这是来自澜沧江畔的悲壮的中国知青之歌！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国内的出版环境还比较宽松，绝大多数知青回忆录都是由国内的出版社出版发行的，在全国各地的书店和书报摊上都可以买到各种知青文学作品和知青回忆录等纪实类书刊。其中许多作品成为畅销书，甚至一版再版。这是一种非常可喜的文化现象。这一时期，各地的知青回忆录基本是一种集体记忆，很少见到知青个体的回忆录，也没有多少在海外出版的。体现了知青历史上惯有的集体主义精神。

九十年代的知青回忆录最明显的特点是；它们的主题基本上是“青春无悔”。它与体制的主旋律保持着高度的一致。当时还没有多少人提出对文革期间的知青上山下乡应该彻底否定。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大多数知青认为“每一代人对自己的青春都有自己独特的诠释方式”，知青这个称谓，今天成了有几份苦涩，几份自豪的名词。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初到70年代末的中国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它的产生，发展直至消亡有其极为复杂的政治，经济，文化原因与历史背景。它波及到城市成千上万个家庭，它延误了一代人的青春，也磨练造就了一代人，这是一只奇特的“种豆得瓜”的历史反刍现象。经过20多年历史与文化的积淀这一代人，反思这段个人命运伴随共和国命运沉浮的历史，必然会从心底发出“青春无悔”的深情呼唤，倾述对那个失去的春天的追怀。虽然时隔仅仅几年，在90年代末，在广大知青，特别是老三届知青对“青春无悔”这个命题提出质疑，甚至予以彻底的否定，因此而产生的是“青春无悔”还是“青春有悔”激烈争论，唇枪舌剑，各执一词，一直到今天，这种争论仍然没有停止。但是，在九十年代的时代背景下，知青们提出“青春无悔”的口号，是有它的合理性的；知青大返城后，各地知青又回到他们的故土，回到青年时代的原点，在纷至沓来的巨大社会变革面前，怀着强烈失落感和时间错位的知青们，克服了迷惘与颓唐，在行为方式和心理状态上作调整，投入改革开放的社会实践，发扬了在农村和社会底层久经磨练的知青们特别能够吃苦，特别能战斗的拼搏精神，经过十多年的磨合，他们不仅重新找到在生活的位置，而且成为各行各业的中坚力量。“青春无悔”，这是一代人走出苦难，迎接新时代的旷达乐观的人生态度。以他们崭新的

精神状态和业绩向时代和社会证明“我们是优秀的”。这些以集体记忆为主流的知青回忆录，展示了他们充满艰辛苦涩的知青岁月，绝不仅仅属于这一代人；它所显示的思想光芒，性格力量，将带着无数青春的挫折和骄傲，构成当代中国奇异，悲壮的一页，为后世留下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九十年代以集体记忆为主流的知青回忆录不能仅仅归纳为是一种怀旧，其实质反映了知青这代人要求对历史和自身价值重新认识的文化心态。从昨天的中国知青梦中走出来的这一代人，不论是社会精英，还是仍然生活在社会底层的草根知青；在中国社会结构已经发生变化的当下，由于那段共同经历所经受的洗礼，使他们发出“青春无悔”的呼唤，表达了已经成熟的一代人强烈要求社会参与的呐喊！跨世纪的交替已经历史地将他们推到唱主角的时代大舞台前。

九十年代的第一波知青文化热，从1998年后到2007年，从辉煌走向低谷，无论是知青文学创作还是知青回忆录的出版都出现空前的冷清。曾经一度活跃在中国文坛的“群星灿烂”的知青作家们，在1998年后，难见到他们有力度的作品的问世，各种形式的知青出版物包括知青题材的影视剧也少见。这种大起大落，也是一种值得深思的文化现象。笔者认为造成这十年知青文化退潮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与知青这一代人所处的生存状态有关；与共和国命运同沉浮的知青这一代人，新世纪对他们来说，困惑与失落远远多于快乐。如果说30多年前，他们是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今天却成为下午四五点钟的夕阳了，感受到的是生命的惆怅与沉重。30多年前，他们是文革的牺牲品，上山下乡，别无选择，为国分忧。1979年后知青大返城，他们花了差不多十多年时间的努力奋斗，重新找到生活的位置。人到中年好不容易安顿下来，恰恰又遭遇中国社会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他们又一次面临社会角色的“分层分流”（其中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是“隐形分层”，一部分知青通过接受各种形式的高等教育，改变身份成为社会的白领阶层。90年代中期的国企改革，是显性分流，大批知青作为国企职工下岗失业）经济体制的转型的各种机制和利益的碰撞，使这一庞大的群体又一次别无选择，再一次为国分忧，下岗离岗，成为社会转型成本的主体，再一次成为社会发展的牺牲品。新陈代谢是无情的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是不可抗拒的。这是市场经济运作的必然结果，却不是市场经济的过错。在社会转型的嬗变中，他们在体力，精力，能力，观念上都呈现明显的不足，很快被挤压到社会的边缘，心理上陷入被社会抛弃的苍凉。对未来不再有奢望，当下生活的脚步又不能停下。他们依旧为生存而奋斗。与眼前的生存问题相比较，对文化的需求毕竟是奢侈的，他们根本有时间和心绪来回顾往事，这并非是他们对文化的漠然与拒绝。所以这一时期知青回忆录的出版稀少。

第二与中国文化生态的改变有关。从九十年代开始，处于社会转型嬗变中的文学，由于受到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全社会浮躁心态的影响，整个文化事业日趋功利化，具有时代反思色彩的严肃文学不再是社会的关注中心，而日趋社会的边缘受到冷落。在这种社会文化生态的大环境中，知青文化的边缘化被冷落在预料之中。这一时期虽然也有一批知青文学作品与知青回忆录问世，但是其中的平庸者居多，令人失望。不少作品缺少历史的反思精神，仍

然沉陷在昨天的苦难与光荣的“自恋”状态。从而引发了一场关于知青文化价值观的争论。最具有代表性的是1998年张抗抗的《无法抚慰的岁月》的观点；“我们这一代人曾经经历的苦难，已被我们反复地倾述与宣泄，我们这一代人内心的伤痛和愤懑，已激起世人的广泛关注；我们这代人对于历史和社会的质问，已一次次公诸于众；然而临近20世纪末，我们是不是能够低头回首，审视我们自身，也对我们自己说几句真话？”。另一位作家谢永的观点更为坦诚；“我们已经讲了不少青春无悔的故事，如果每一个人的过错都可以归罪于时代的话，那我们这个世界就没有什么罪人了”，他认为知青也是那场灾难的参与者，要是没有个人的反省，对一个民族的进步是有害的。如何走出“自恋”情结，使知青文化突围，成为有识之士的关注焦点。中央戏剧学院杨健教授说；“这一代人的生命实践，思想历程，被归纳到一个又一个思想主体中，暴露了知青一代人独立意志的缺失，知青群体的集体主义的光辉掩盖了个人精神的苍白，在群体实质上已经不存在的的情况下，许多人仍然被束缚在集体幻想与陈旧的思想方式中”。新世纪的知青文化必须走出陈旧的思维的束缚，进行深度的理性反思，去寻找现代价值立场，从这种只有情绪，没有力量的自恋中突围，才能找到新的发展空间。

2008年是知青上山下乡40周年，这时大多数知青已经到了退休的年龄。在九十年代的国企改革中，许多知青早已经下岗，离岗，沦为社会的弱势群体。虽然，他们中的许多人仍然在为生存奔波，但是绝大多数人不再为衣食所忧。在“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人生深秋，暮然回首，许多往事，无论是风雨载途的知青岁月，还是辛辛苦苦的后知青时代的年年月月，都挥之不去。他们有了强烈的表达和倾述的欲望，现在他们有的是闲暇时间。同时，走过大半个世纪的这一代人，现在他们有平静的心绪来回顾并评说自己已经走过的路。这是对一代人价值追求的认定，不仅是告慰已经离去的人，也为后世留下一份可信的档案，因为这是由一个个体组合成的一代人的历史。当下的社会文化生态环境的严峻性催生了这个庞大的群体“有话要说”的强烈愿望；从2002年后，知青成为一个敏感的话题，知青题材书籍的出版受到种种限制。2012年6月，在银川举办的全国第二十二届图书博览会上，知青出版物寥寥无几，参加博览会的全国近千家出版社，只有青岛出版社的梁晓声的小说《知青》和武汉大学出版社推出的“中国知青文库丛书”，有关部门干预不能用“中国知青”冠名，所有书的封面不能出现“知青”字样，虽然这些书都是在上个世纪80-----90年代出版的畅销书。该出版社无奈只能将丛书名称改为“黑土地之歌”，“黄土地之歌”、“红土地之歌”。许多出版社都婉拒知青题材的书稿，特别是纪实体的知青回忆录。2000年元月在北京建成的人类第三个千禧年的中华世纪坛落成，在空阔的地面上，用铜条镶嵌着2000多年来，在中国大地上曾经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包括在2000多年前的商代，两个小国之间发生的一次战争。但是，对文革的表述只有一条，对发生在20世纪60----70年代的，1700多万知青的上山下乡运动-----整整一代人的人口迁徙，一字未提。在当代中国产生如此重大影响的知青上山下乡的历史被可怕地空白化了，这绝不是简单的遗忘，而是对严峻的历史的有选择的遗忘！这是一种赤裸裸的历史虚无主义！这是讳疾忌医的文化专制的表现！

从2008年至今全国各地问世的知青回忆录的准确数字是根本无法统计的，只能是一个模糊的估计数；近万种。

这一时期的知青回忆录的总体特征有两点；一是集体记忆少了，大多数是个人自述；二是其中大多数是非正式出版物。由于体制对知青题材特别是纪实类出版的严格控制，几乎成为禁区，所以作者只能设法到港澳台或者欧美国家去出版，出版后书刊又大多数倒流回国内，因为绝大多数读者在国内。这类书在各地的新华书店和书摊上是不准出售的，所以基本上只能送人。更多的作者选择我不要任何书号，也不需要你审批，我们自己找一个印刷厂印出来，同样图文并茂，装帧精美，分送给知青和其他关注知青群体的读者。写作并印刷一本回忆录花费了作者很多精力，也花费了不少钱，但是作者和其亲友们非常高兴；这一本本散发油墨香味的书辑录了自己的历史，一代人的历史，还将传给后人，我完成了一种使命与责任，我心安理得了。国内许多图书馆非常重视这类来自民间的非正式出版物，纷纷收藏。如国家图书馆的中文资料室在2008年发文，告知国家图书馆对这类非正式出版物收藏的重视，因为它们的史料价值更具有真实性与可信度。

2008年后问世的以个人自述为主流的知青回忆录，在内容和表达形式上具有以下几个鲜明的特点；

叙事的宏大背景，深刻的反思精神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刘小萌在1998年出版了他与定宜庄合作的《中国知青史》，这是一部以详实史料和统计资料来综述中国知青历史的权威性著作。极具学术价值。从那以后，他一直打算写一部类似“落潮”的续篇，来反映知青大返城后的曲折经历。知青大返城后，知青们实现了社会角色的转换，融入社会各阶层。进入90年代中期，社会转型，国企改革，大批知青作为改革成本的主体被边缘化。使得“知青”问题重新突出。他决定采用个人口述的方式来写。在差不多三年时间里，他采访了各种不同类型的知青近百人，然后从中精选出几个不同的典型；第一类是当年知青的典型，包括当时被树立为“反潮流英雄”以后被批判的几位知青。他们都是不同时期媒体宣传过的的知青样板。尽管他们在起点上有某种天然的联系，但是，他们以后的经历大相径庭。他们身上当年的光环早已经褪去，但是作为推动当年上山下乡运动的历史人物，他们的身世沉浮，依旧令人关注。

第二类对象是知青中被誉为“民间英雄”的知青领袖，他们是在文革即将结束时风起云涌的知青大返城风暴中脱颖而出的人物，如1978年发起云南版纳知青大返城的领袖人物，1980年发起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阿克苏知青返程请愿的几位上海知青。这些来自民间的知青，在历史的关键时刻振臂一呼，高举“我们要回家”的旗帜，以“不回家，毋宁死”的勇气和胆识，掀起雪崩似的知青大返城狂潮，为终结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画上句号。一旦大潮退去，他们又回到民间，归于平凡，隐入当代社会的边缘。

第三类对象是一些默默无闻的草根知青，他们的经历与大多数知青一样；下乡，返城，下岗，再次创业或者再就业。但是，他们的经历有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在他们的曲折坎坷，奋起拼搏中，实际上浓缩了整整一代人的人生体验。

刘小萌所采访的这三类完全不同类型的知青，家庭出身，文化背景，人生遭际，政治观念各不相同，他们对知青上山下乡的感受和评价都带有鲜明的个人色彩，，因此他们的每一个人的口述都极具个性。刘小萌终于完成了《中国知青口述史》，他对这三种不同类型的知青人物的描述，也采取了完全不同的视角和切入点；对知青典型，一般以围绕上山下乡的介绍讲述自己的经历，以突出日后他们成为榜样的动因与社会环境。对来自民间的知青领袖，则以重大的历史事件的发生的动因以及参与策划与参与的过程着专题性叙述。对那些普通知青，多半以采访他们从童年时代的家庭遭遇到青年时代的生活挫折以及现在的生活状况为主线来叙述。

刘小萌的《中国知青口述史》给知青历史和知青文化的研究开拓了新的视野和空间。这种非虚构的纪实写作，以宏大的时代背景，从文革的风云变幻，上山下乡运动的曲折，大返城的波澜壮阔，将知青的个体与群体置身于重大历史事件中的沉浮中更具有浓厚的时代感。这种叙事方式更接近民众，接近现实，，更使读者感受到时代脉搏的跳动。这种口述的叙事方式，使来自民间的长期被压制的话语权有了一方表达的空间，使普通民众参与到对历史的表述中，虽然他们“人微言轻”，但是，他们是历史的参与者，见证者，也是历史的评判者，这是一中更真实，更富有血性的声音。

武汉作家刘晓航在文革期间曾经在皖南农村插队七年，他参加了文革后恢复的高考，成为1977级大学生。80年代初，他第一次读到上海知青作家叶辛的《蹉跎岁月》潸然泪下，从此萌生了要为知青一代人立言。1996年参与出版第一部武汉知青回忆录《我们曾经年轻》。1989年，他读到《海南纪实》刊出的张力莆写的《1978，西双版纳八万知青返城风潮》一文，这是第一次向外界披露1978----1979年云南知青大返城的真相。紧接着，九十年代兴起的知青文化热中，各地出版的知青回忆录和知青题材的小说，报告文学中陆续反映这段终结知青上山下乡的历史事件。但是，令人感到缺憾的是，没有一部全景式多视角反映云南版纳知青发起大返城运动的书，给人一种语焉不详，断章不全的感觉。这也难怪，当年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的十万知青是由北京、上海、四川，昆明四地知青组成的，需要有人来整合这段历史。于是，他开始去收集云南知青的历史资料，在几年时间里，他深入到重庆、成都、上海、北京等地采访了近百位云南知青，他们都是这历史一事件的亲历者，特别是发起版纳知青返城北上请愿团的群体。作家的真诚感动了他们，不仅接受了他的采访，还毫无保留地向他提供了保存20多年的珍贵资料（三份请愿书的底稿和油印件、简报，北上日记，工作笔记，500多张照片及实物），他在2002年6月还成功地采访到当年作为国务院调查组组长，国家农林不副部长，农垦总局局长赵凡及调查组其他成员。对这些亲历者的采访，他们的口述是最有说服力的资料。

刘晓航在获得这么多丰富的第一手资料后，将自己关在屋子里奋笔疾书，在6个月时间里，他沉浸在沉重，愤怒，悲伤中，泪水经常模糊了他的双眼，终于在2002年三伏天火炉城武汉39度的高温中完成《我们要回家》，这部53万字的纪实作品。这本书的前半部在云南从古到今屯垦历史的大背景下，文革期间组建的云南生产建设兵团对

其接受的10万知青的安置教育的基本情况，以及来自北京、上海、四川、昆明的知青在兵团时期的真实境遇，1974年兵团撤销，恢复国营农场体制后，在时代大环境的影响下，云南垦区知青中发生的微妙变化。这本书的后半部，从第十一章开始，切入景洪一团知青为主的版纳知青发起的“我们要回家”返城请愿运动，基本是以当事人的口述为主，并以当时公开的官方的资料，披露在1977年后，党和国家领导层为拨乱反正，妥善处理知青问题，开启中国改革开放之门的决策与举措。书稿在2002年6月就送到北京一家大出版社，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书稿“胎死腹中”一直迟迟不能出版。最后在万般无奈，由知青出资在香港出版，该书一问世，立刻成为枪手书，成为云南知青的珍藏。这本书被国内外的学者评价为是知青文学的标杆性的优秀作品。

这本书出版已经过去多年了，作者深感当初写作这本书时，由于条件的限制，采访还不够深入，比如对第一批北上请愿的知青群体和成都知青，对当时留在版纳坚持罢工的知青的采访不到位，难免出现“以讹传讹”的不实和错误。近十年来官方披露的知青档案资料渐多，特别是2014年中央电视台播放的《邓小平在历史的转折点》，第一次披露了中央高层领导对解决云南知青闹返城的态度，邓小平说出掷地有声的一句话；“让娃娃们都回来吧”，基本给这一历史事件定性。近几年，云南兵团知青的集体与个体的回忆录越来越多，他们以亲历者的身份回顾了更多的事情的真相，为日后国内出版环境的宽松，作者修订这本书创造了条件。

2015年6月，济南知青游济荃主编的《昌马归建纪实》出版，这是一本非常有价值的自述体的知青回忆。1969年，兰州军区为了修建祁连山下的昌马水库，从农建十一师抽调了一个营的知青1000多人到甘肃省水利工程团，由兵团改为地方编制，工资与生活条件有了明显改善，人人高兴。但是不到半年，国内外的局势发生很大变化，兰州军区决定将这1000多人归建农十一师，遭到知青们的强烈反对，认为这是不符合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当时的兰州军区领导将知青们的反对意见视为违抗军令的反革命的政治事件来处理。审查关押近百名知青与转业军人，将14名知青和转业军人判处5到20年徒刑，然后将1000多知青打散安置在原农建十一师各农场，造成许多知青家破人亡。这个案子是文革特殊时期一个典型的违反民主与法制的事件。1976年文革结束，这个案子的被判处徒刑的知青开始纷纷上访。当时正值文革的拨乱反正时期，甘肃省政府和地方司法部门很快撤销当年的判决，为他们恢复名誉，补发工资，使这些蒙受冤屈的人回到社会的正常生活。40多年后，已经进入花甲之年的当事人们，决定将这段不堪回首的往事梳理出来，编成一本厚重的知青回忆录，以告诉后世，希望这类悲剧不要重演。这本书的写法较特别，书的前半部，是对昌马事件始末的总体回顾，后半部是主要亲历者的自述，叙述自己当年在事件中的经历和被处分后悲惨的遭遇，以及文革后上访的艰难历程，他们每一个人对这一事件的深刻反思，包括一些人，对自己在无奈中投井下石的不光彩行为的忏悔。全书的结构和叙述语言，有一点像司马迁的《史记》的风格；将编年体与纪传体的结合，这与主编是一位历史系的教授有关。

<u>完全不同的叙事与评价立场</u>

2008年以后问世的知青回忆录，不同作者的叙事角度与对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评价的立场是完全不同的。当然这与作者们上山下乡的经历的不同密切相关。这一时期的知青回忆录，无论是集体的记忆还是个体的自述，对知青运动的评价各执一词，是九十年代的“青春无悔”还是“青春有悔”争论的继续；很多人感怀知青岁月磨练造就了自己，为以后的人生道路奠定了基石。认为这场上山下乡运动是毛泽东革命路线的伟大战略，是国家发展的既定方针，是人生最美好的回忆。更多的人是对上山下乡不持是非褒贬的态度，而是以客观的叙述来表达自己的观点和倾向。

文革期间去山西雁北地区山阴县康庄插队的北京知青赵杰兵自述体回忆录《康庄往事》是读者评价较高的知青回忆录，他是1979年初，作为过国务院调查组组长，国家农林部副部长赵凡的儿子，他去山阴县插队正是他父亲作为“黑帮分子“被关押，他成为一名”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康庄的老百姓没有歧视他，他和农民打成一片，将自己的文化知识运用到这个盐碱地，缺水的落后乡村的改天换地的劳作中。乡亲们很快认可他，推选他当大队革委会副主任，成为贫下中农的主心骨。以后他非常幸运地被推荐去北京大学上学，毕业后，他选择回到山阴县和康庄，继续带领贫下中农学大寨，一直到1978年后，中央落实政策，他被调到中央纪委工作。但是，他仍然一直和康庄的农民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一直到他退休后还和当年在康庄的几位知青出资为缺水的康庄设计打了一口深井，终于解决了农民终于能够喝上甜水的愿望。赵杰兵是中国知青中为数不多的，一辈子将自己与农民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的知青，他是真正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带领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知青。同时在他的书里不乏对作为小生产者的农民的因袭已久的缺点，感觉到如何引领农民从精神上的解放与提高。所以他的自述充满了改造农村与农民的新思维和正能量，是一本不可多得的知青回忆录。

镇江知青回忆录《我们的知青生活》中，石耘写的自述《我耕耘，我快乐》以充满激情的文字自述了1969年3月到黄海边的江苏生产建设兵团三师十七团三十三连插场，在这里上山下乡整整十年，变换过不同的各种岗位，甚至在1971年9月到1972年11月被作为“5.16分子”的嫌疑被押回镇江关押一年多，但是她从没有为自己的选择后悔。读者从她的自述里感受到的是一位不怕苦，不怕累的女知青的忠诚；对共产党的忠诚，对人民的忠诚，对自己追求的事业的忠诚，她终结自己十年的知青岁月说；“回首一生，风雨中没有悲观，顺境中不曾骄逸，逆水行进中没有沉沦。前行中始终保持一份自励和勤奋。显示一份坚韧自信与包容。”湖州知青许瑞林的自述《难以的知青岁月》，他以一种平淡冷静的心态，来叙述自己长达十五年知青生活，与大多数知青的回忆录不一样的是，他不是将自己作为一个被时代抛弃在社会底层的流放者来倾述自己的苦难，以及自己如何与命运抗争。他作为文革前湖州市第一批去农村插队的城镇青年，他是响应伟大领袖号召高高兴兴地到农村插队落户的，他没有想到这一去会回来，他是以一种虔诚的的心态去当社会主义新农民的。他一去就是十五年，他的青葱岁月是在南埠农村度过的，在那里有他留下的汗水，有他的友谊和爱情，也有他含着泪水的欢笑！他在南埠成为一个走四方的木匠，今天是杭嘉湖平原一位成功的企业家。

苏州知青顾鉴明的《十五岁的知青——下乡后的那些岁月》是一本与众不同的知青回忆录，他到农场当知青还不到十五岁，还是一个天真的不懂事的孩子，这么小的年纪就开始人生的摸爬滚打，他几乎是在农场长大的，在知青大哥哥大姐姐的喔护下长大的，在他的自述里没有多少苦难的倾述，更多的是他在不同的时间，与一个又一个女知青的爱情故事，有的是朦胧的，有的是山盟海誓的，因为他是一个讨人喜欢的阳光少年，这让我们想起著名作家何其芳的一首诗《我为少男少女歌唱》，几年后他的知青岁月结束了，在返城的知青队伍里他已经是一个成熟的男子汉，知青岁月磨练了他。

2013年6月，湖南长沙文革前去湘南江永的知青出版了他们的回忆录《异乡故乡——长沙知青在江永》，这部70万字的知青回忆录真实地记录了文革前5000多长沙知青下放江永的真实生态，这些知青大部分是出身不好的知青，许多人学习成绩优秀，由于家庭出身问题，被当时的“阶级路线“拒之高中，大学门外，他们不甘心做无业的社会青年，为了和反动家庭划清界限，上山下乡，去艰苦的湖南与广西交界的江永农村插队，脱胎换骨，做社会主义的新农民，经历了许多磨难。特别是在文革期间，在道县和江永等地发生了惨绝人寰的”贫下中农法庭“杀害黑五类分子及其子女亲属的事件，长沙知青有多人被活活打死，从而发生3000长沙知青大逃亡，他们辗转几百里在解放军的保护下逃回长沙。这本书出版时出版社坚持要将这些负面内容删除。该书的主编在序言里这样“自我解嘲“；”对历史的记忆的理解，阐述又必然带有某种思想立场，难免包含偏见。但是，只要每一个人都有表达历史记忆的权利并且实现了充分表达，“片面”就会在互补中走向全面，“偏见“就会在对话中逐渐消解，达成共识。”2009年12月美国海波因特大学历史系教授邓鹏主编的《无声的群落——中国文革前老知青回忆录》重庆出版社出版。这套两本的知青回忆录，主要收录了文革前去大巴山插队的重庆老知青的自述，邓鹏就是一位因为家庭出身不好连高中都考不上的重庆社会青年。这是一个无声的群落，因为他们在“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年代里，他们是身上打上”黑五类“烙印的不可接的“贱民“，大巴山的父老乡亲以广阔的心怀接纳了他们。但是极左时代的社会环境，使他们的接受再教育磨难重重，其中包括文革期间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对他们的伤害。因此他们对知青岁月的回顾只能是对黑暗和苦难的控诉，声声血泪，知青的上山下乡对这个群体来说只是一场灾难。虽然文革后许多人走出大巴山，新时代赋予的机遇和他们自己的不断努力，他们中一些人成为社会的精英。但是他们对大巴山区所有的回忆仍然是不寒而栗。邓鹏参加了2008年12月在上海社科院和复旦大学举行的”2008，上海知青学术研讨会“，他乘飞机近20个小时赶到复旦大学的会场，是最后一个发言的学者，第二天他又辛苦地飞回美国。他说；“我是代表一个群体来这里发言——一个无声的群落“。他在会上宣读的论文就是；”文革前上山下乡运动与毛氏乌托邦“。他认为文革前的上山下乡较之文革期间的上山下乡有更强烈的理想主义色彩，这一时期的城市青年下乡虽然在很大程度上是革命暴力，尤其是阶级斗争和政治歧视的牺牲品，却富有一种浪漫主义的蒙昧。实际上它是毛泽东领导的一场农民革命包含的空想主义的组成部分。

对于各种不同叙事和评价立场的知青回忆录，我们读不要排斥，应该以一种包容的心态去看待这种差异性。赵

杰兵在他的后记中说；“我们不要用自己的经历去否定别人的经历，也不要用自己的感受去否定别人的感受。以这样的心态面对知青生活多样化的现实，才是尊重历史，才有助于我们全面客观地认识那段逝去的岁月。”

兵团知青的自述成为知青回忆录的主体

2008年后问世的知青回忆录数字无法准确统计，但是在数千种回忆录中，各地生产建设兵团知青的自述占据了主体部分。其中以黑龙江省的兵团知青最多，因为在文革时期，黑龙江省是接受各地知青人数最多的一个省，不仅是本省的还有北京、上海、天津、浙江等地的知青一共70多万人，包括四川泸州还有1000多知青去黑龙江的孙吴等地上山下乡。广袤，肥沃的黑土地敞开胸怀接纳来自全国各地的充满理想的热血青年。他们唤醒了这块沉睡千年的处女地，这批年轻的拓荒者将文明和先进的城市文化带到黑土地，躁动起青春的激情，创造了东北平原三千里江山空前未有的繁荣。至今黑龙江的父老乡亲们年年不忘各地知青给黑土地带来的发展变迁。现在，黑龙江省是建有知青博物馆最多的一个省，北大荒造就了一大批知青作家，画家，学者，他们许多人成为中国文坛的领军人物。70多万来自全国各地的知青在黑土地上整整耕耘了十年，他们来时才十六七岁，1979年大返城，如潮水般拥挤在南下回城的火车上的知青们，一个个都是满脸沧桑，他们回到生活的原点，重新创业，他们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中坚力量，他们是共和国宝贵的财富！

自1991年开始，黑龙江兵团的知青就出版了知青回忆录，第一本就是《北大荒风云录》，接着各个师团的知青，还有不同动员地区的知青先后出版了群体性的回忆录。2008年后，许许多多黑龙江的兵团知青的各人自述体回忆录如雨后春笋般问世，叙述他们在黑土地各自不同的知青经历，怀念那些艰苦而充满向上张力的年年月月，他们落在那里的血汗，泪水，甚至是鲜血与生命。他们的友谊和爱情，他们的烦恼和痛苦，辛酸和委屈，他们的希望和抗争。一些知青的自述甚至没有回避在那个特殊历史条件下，在知青中曾经发生的人性扭曲，灵魂卑污的阴暗面，那些至今令人伤痛的知青的非正常死亡与恶性案件。原黑龙江省作家协会主席贾宏图采访了近100位知青写作了知青自述的集子《我们的故事》，这是近百位兵团知青的的人生经历与他们灵魂的呼唤，读之令人潸然泪下。上海知青方国平多次重返黑龙江调查当年发生在上海知青中的非正常死亡，寻找他们的墓地，在上海知青历史文化研究会的支持下先后出版了《寻找亡灵》和《生命记忆》，以告慰离去多年的知青战友的在天之灵和他们的亲人。上海知青张刚主编的《北疆知青第一村》汇集了1969年去黑龙江畔爱辉外三道沟村60多位上海知青和当地村民的自述，书中一个个动人的故事，一段段真挚的话语，都体现了每个人的生命中深入骨髓的情怀，仿佛又回到那火热的年代，那是永不逝去的青春岁月。北京女知青子蕴是北京贝满女中毕业的才女，为了照顾弟弟，选择去北大荒兵团的32团上山下乡，她的自述《我曾经的名字叫知青》是在台湾出版的，她多位现在已经是著名学者的兵团战友欣然为她写序，她以诗人般的情怀抒写了文革期间家庭的际遇和北京的社会环境，知青们在社会动乱中的友谊和爱情，他们的明天是混沌的，没有选择的权利，她以另一种眼光来审视知青时代。她的文学艺术的天赋使她在一个偶然的际遇中

成为知青中的笔杆和文艺宣传队的骨干，以后为了爱情远去大杨树。她在那里整整十年，以后以“病退”名义带着儿子返回北京，一无所有，打零工，在街道上卖大山楂，在药店站柜台，锲而不舍的性格使她终于找到自己喜欢的职业。她的自述叙事的烂漫风格和语言的清新流畅，明显受到俄罗斯文学的人道主义悲悯情怀的影响。

在文革前和文革期间先后有20多万知青涌入新疆支边，除了有计划地组织动员来的上海，天津、浙江等地的知青外，还有大量自行“蛮流”来的各地知青。四川作家杨牧写的自述《天狼星下》就是一部“蛮流”人群在新疆的心路历程。当年去新疆的支边青年大多数已经重返他们的故乡，早已开始新的生活，但是，曾经充满苦难与奋斗足迹的第二故乡------新疆，融入使他们梦牵魂萦。自2008年后，不同动员地区的新疆知青们纷纷撰写回忆录，如上海知青写的《戈壁深处的呐喊》、《大时代的记忆》、《塔里木的上海知青》，《苦恋三部曲》；天津知青的《那梦牵魂萦的地方》，武汉知青的《西眺烟云》、《青春的选择》等。

云南十万知青来自北京、上海、四川、昆明，他们在1978年发起大返城运动，是中国知青史上最悲壮的一页。云南是我国生物多样性的基因库，也是多民族文化的摇篮，自古以来，云南的屯垦历史悠久，自然环境优越，但是这里闭塞的交通和兵团落后的管理方式，使它根本不具备接受十万知青的条件，所以这十年在云南兵团知青中发生许多非正常死亡和恶性案件，在社会上造成极坏的影响。所以云南兵团知青自述中对苦难与抗争的倾述，远远多于对知青岁月的赞美。2008年前后，云南兵团知青出版了一系列的自述体回忆录；成都知青的《飓风席卷过热带雨林》真实生动地再现了1979年元月中旬，在临沧的孟定以成都知青为主体的罢工请愿绝食向国务院调查组下跪，促成知青返城加快了进程。当年云南知青中发生了太多不堪回首的痛心疾首的事情，所以他们的自述与北大荒知青的自述有很大的不同。东风农场（即一师二团）和橄榄坝农场（即一师四团）是出版知青回忆录追多的两个知青农场。如东风农场北京知青的《八千子弟》，上海知青的《勐龙记忆》、《一位上海知青的274封家书》等，1978年10月橄榄坝农场女知青瞿林先之死是酿成云南知青返城运动的导火索之一，当时这里知青的情绪像一堆干柴。所以知青回忆录多达十余本，如上海知青的《回首是绿》，重庆知青的《那红那绿那八年》，《雨林中的路》等。《雨林中的路》的作者姚林义只有小学文化程度，在2014年整整一个夏天里，他将自己关在一间屋子里，每一天烧5盒香烟，终于完成他多年的心愿，将自己参与的1978年底至1979年初，橄榄坝一部分知青以过激的方式促成提前以集体退职返城的往事写出来，他的内心平静了。东风农场的上海知青余杰是一位热爱阅读，勤于观察，冷静思考的人。近几年，他将自己的云南兵团知青的经历和思考，写成八册回忆录，有对南疆知青岁月往事的回顾，有对1978年云南知青大返城动因与影响的辨析，有云南兵团知青的后知青时代的生存状况的调查分析。逻辑缜密，论据确实，充满思辨的色彩，他的这些叙议结合的文章有16篇被共识网采用。点击者无数。

鲜为外界知晓的甘肃省生产建设兵团十一师的知青，他们的经历的曲折超乎许多人的想象，2010年，文革前去甘肃农建十一师的天津知青编写了《祁连山下》，披露了当时的因缺少粮食造成的大饥荒，发生在文革期间的农建十一师的武斗，知青参与其中，有的被杀，有的成为罪犯。现在定居在山东济宁的天津知青邱静波的自述《兵团岁

月》客观叙述自己在甘肃农建十一师的22年屯垦戍边曲折的经历，向读者展示在哪个特殊的年代一代知青的理想，信念和坚忍不拔的奋斗历程。叙述在“大漠孤烟直”的背景下，他们的蹒跚脚印，揭示人性的善恶美丑。扬州知青王家林在黄海边的兵团农场上山下乡十年，在2008年，他写成的自述《兵团岁月四十年记》中，他敏锐地将他所在的连队十年中所发生的事链接到江苏以及全国知青状况的宏大空间去比较，剖析它们之间微观的和宏观的微妙联系，以洞察知青运动发展的走向与趋势，使他很早就形成民间思想家的超前的目光与深邃的批判意识，难能可贵现在定居香港的广州知青张穗强现在是一位成果丰硕的文化学者，文革期间，他去海南岛的加鍤农村上山下乡七个年头，在这块红土地上，他经历了南疆垦荒的磨练，感受到人生岁月的艰辛，在那里，他面对过无数的彷徨与打击，铭刻下对国家民族的思考和反省。40多年来，无论他经历过什么，他都将知青岁月赋予他的精神财富，不断挑战和超越自己。2013年他出版了自述《走出胶林》，他用文字唤起这段沧桑岁月展示自己走过的风雨拼搏路程，告诉人们，唯有不断的奋斗，才能够跟上时代的步伐，命运才能掌握在自己手中。

宁夏银川的孙永宝出身在一个多子女家庭，家中只有母亲带着几个兄弟姐妹，父亲是历史反革命，在遥远的南方农场劳改。他是为了找一个饭碗，减少母亲的负担去六盘山黄卯岭林场上山下乡，他是一位只有初小文化程度的16岁知青。是黄卯岭林场的知青大哥哥大姐姐的关爱，使他长大成熟，以后成为一名林业警察。大返城后，他自学成才，将自己难忘的知青经历写成自述《峥嵘岁月》，他的自述像外界披露了长期为外界不知道的宁夏文革的社会环境与文化生态。特别是鲜为人知的；1958年，上海市政府将近2000人的数百个家庭动员移民到刚刚建市的银川，这些家庭有一个共同点；他们的男主人都是被专政的劳改犯正在服刑，每一个家庭只有母亲和孩子，这些母亲拖儿带女几乎是被强制性地移民到银川，成为这个西北城市的另类“上海村”，这些家庭所经历过的苦难是令人难以想象的。他的自述还详细地介绍了他经历过的宁夏文革时期的动乱年代，银川本土并没有多少知青，但是，在文革前的1964—1965年，宁夏接受了近万名北京知青和数千杭州知青。北京知青和杭州知青左右了宁夏文革时期的局势，形成两大派，在塞外江南演绎了一场政治较量，发起武斗。所以孙永宝的自述是外界了解文革时期宁夏社会状况的非常有说服力的佐证。

插队知青自述体回忆录形式的多样化

在全国1700万知青中，分散插队的知青占大多数，由于他们上山下乡的时间段和插队地区的自然环境和社会文化环境的巨大差异，所以他们的知青经历是完全不同的，他们对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评价也是完全不同的。20132年3月在珠海的里埃维拉社区举行了由内蒙古知青刘欣主编的《我们的后知青时代》的首发式全国各地200余位知青与会，这本50多万字知青个体自述的汇编，它与以往知青回忆录不同的是，该书收录的是，一代知青在结束知青生活回城后以个体的形态面对变幻莫测的社会经历的方方面面。作家叶幸评价说；“本书叙述的是一

代知青返城后的人生经历。他们踏上返城之路的艰辛，他们重新面对都市时的困惑与挣扎，；他们以高龄考生的面貌拼搏走进大学；他们在新的人生追求中寻求自己的归宿和展开新的追求；他们经商，当个体户，他们中的一些人，随着国门的洞开去“洋插队。他们在各自的人生旅途中寻找到自己的方位和坐标，生活和事业展现出光焰时，他们没有忘记曾经有过的上山下乡的经历，他们以各种力所能及的方式反哺曾经插队的农村与农场，他们把此视为心结和责任”这生动地表现已经进入人生深秋的一代人虽然各自的知青经历和后知青经历也不同，他们对国家人们的爱和忠诚是不变的，这是他们共同的价值追求。使读者们都能够感受到时代脉搏的跃动。

武汉女知青高双桂的知青经历比较特殊，她在下乡后不久，由于她特别能够吃苦，由于她的文化修养而形成的能力，就被选拔为新洲县一个公社的党委副书记。从1972年到1982年，她在这个岗位上整整干了十年，其中经历了人民公社时期“农业学大寨”的高潮和文革结束后农村生产责任制的推行。难能可贵的是她完整地保存着十几本人民公社时期的日记，工作笔记，手稿和调查报告等一大批原始资料。2011年，高双桂在她现在工作的江汉大学的支持下正式出版了《一位公社女书记1972到1982的日记》，当代著名历史学家武汉大学的冯天瑜教授为其题词“时代的剪影”。高双桂十年，3600多天的日记，反映了普通人“也有记录国家重大政治事件的习惯”。她是一位具有时代特征的典型的知青代表，她的日记折射出一代人在那个特定时期的观念，思想与激情；日记截取的时代是文革的后半期和改革开放的前期，它反映了两个时代的摩擦，交汇与演变。这是一个极其典型，特殊的时期。虽然这个时期有大量的文献资料可供我们研究。但是，在这个历史演变过程中，农民的思想如何发生变化，基层干部的观念是如何在困惑中转变，集体生产与联产承包两种生产模式是如何更替的。所有这些具体的，微观的的素材在日后是及其难寻的，这位女知青干部的日记，作为原始的资料，纪录了每一个细节，记录着亲历者的喜怒哀乐，这是一种历史的缩影，高双桂的十年日记的出版是对这一时期的农村经济史，政治史，社会史研究宝贵借鉴。

插队知青的个体自述个性化，内容千差万别，但是在叙述形式上也具有同一性，如北京知青林小仲和安育中都是文革前北京师范学院附中1966级高中毕业生，林小仲先后去北大荒和内蒙古草原插队九年，1978年返城后又经历了当工人，团中央的干部，以后又下海经商，成为商界的文化精英；安育中到山西黄河边的夏县插队，以后也经历了当工人，国家干部的的人生道路。题目都具有诗人气质，林小仲的自述《梦随风万里》和安育中的自述《我的知青部落》在内容和表达形式上，甚至字里行间透露的烂漫激情都是那么相似，这并非巧合，而是较为相似的经历和思想倾向，烂漫情怀，文学艺术的修养底蕴使然。

在这一时期，插队知青个体的自述汇编成集形成一种一个文化圈的空间也不乏可见。如《流逝的记忆》是武汉三中老三届知青的个体自述的汇编，而《耳顺平天下》则是南京十中（原金陵中学）在洪泽湖畔泗洪县插队的老三届的回忆录。

近期知青回忆录的大量出版问世，无论是正式出版物还是非正式出版物，是一个值得肯定的文化现象。作为千千万万个知青上山下乡历史的当事人和亲历者，将这段难忘而复杂的历史记录下来，传播后世不仅是一种不可推卸

的责任，而且是一种神圣的使命。因为世间所有的事物，金钱，名利，物质都将在岁月的风尘中化为灰烬，只有文字可以保存下来，传播于后世。

一个选择遗忘的民族，一个没有清晰历史脉络的民族，是没有多少希望和前途的。我们作为这段历史亲历者，见证者，必须用自己真实的记录，写出铁与血一般的证言，这不仅一个人，一个庞大群体的历史，也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记忆！

刘晓航文集：http://www.hxzq.net/showcorpus.asp?id=50

华夏知青网不是赢利性的网站，所刊载作品只作网友交流之用
引用时请注明作者和出处，有版权问题请与版主联系
华夏知青网：http://www.hxzq.net/
华夏知青网络工作室

像马晓力那样生活

5月2日，一场名为“在希望的田野上”“社会主义经典歌曲大型交响演唱会”在人民大会堂上演，号称人数最多的“五十六朵花”美少女组合，用现代表演方式演唱了《社会主义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等多首红歌，《大海航行靠舵手》唱响在人民大会堂，在一片文革歌曲中，幕布中打出了“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等文革时期口号。

说好的纪念文革五十周年哪去了？说好的浩劫哪去了？分明是怀念伟大舵手毛泽东，为文革招魂。一时间，删贴有恃无恐，反思文革有分量的文章不能发表，只要敢说五一六，博客微信一删了之，人们揣摩是不是风向变了，有身份有地位有话语权有表达能力的人瞬间被秒杀。

5月5日，原劳动部长、全国政协副主席马文瑞之女马晓力写给中央办公厅主任栗战书的一封公开信在网上流传，马晓力在信中称此项活动是“文革文化再现”，“他们以这种形式纪念文革发动50周年，完全不顾党的政治纪律。其演出内容中充斥着文革镜头，大有文革再现之感，其中竟然出现干扰党的外交路线的巨大横标作大背景。这必将影响到国内外对我国未来走势的判断，也势必对党心、民心产生极大影响和误导！”这封公开信在诸多社交媒体流传，引爆舆论场。

偌大的中国，参与过文化大革命，受迫害者与害人者都在，五十年了文革几近敏感词，不见真相，迎来的却是一波又一波怀念，面对极左思潮，所有人都在揣测圣上旨意，支持马晓力的文章一面世立即被删除，一些大网站却数天如一日，攻击漫骂马晓力的博文豁然摆在首页。

难怪陈丹青教授出口不逊，饿死了几千万，这样一个如食物和狗屎一看就明的人，你分不清，你还是人吗。（大意）在马晓力的坚持下，中国歌剧舞剧院在官网发表公开声明，称“与我院的合作方虚构”“中央宣传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教育办公室”，提供虚假材料，骗取我院信任。”同日，作为批准单位的北京市西城区文化委员会也发表声明，承认演唱会申请方违规，虚构，再后来，权威媒体半夜鸡叫羞羞答答，发表了一篇不要再犯文革错误的官样文章，定性为浩劫意即大灾大难的文革，不知不觉间降调为错误。马晓力以一已之力揭穿了为文革歌功颂德的阴谋，一场为文革及始作蛹者招魂的闹剧不欢而散。

伟大舵手死了以后，濒临崩溃的中国经济一日千里，地富反坏右摘了帽，知识分子不再是下九流，恢复了高

考，文革中被杀的人平了反，接受再教育的下乡知青返回了城市，五七干校解散，身陷囹圄的老干部重新戴上了乌沙帽，从没吃过饱饭的农民都吃饱了肚子。

忽一日，大连数万人高举毛主席像，高唱《大海航行靠舵手》，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热热闹闹轰轰烈烈，网上反映却不强烈，好似大家在说：东北宝宝们苦呀，过去是沃野千里工业重地，工人阶级大本营，文革中都有机会戴戴红箍，参加个红卫兵、造反队、保皇党、宣传队，怎么着也是领导阶级，参军入党一马当先，找对象先得问你什么出身，那时节工人阶级风光无限天下无两，伟大领袖一死，你们把人家老婆抓起来不说，改革开放，工厂倒闭，下岗失业，东北成了贫穷落后大本营，一下岗工人晚上用自行车驮着自己风韵犹存的老婆到酒巴卖笑，有多少东北美女沦落为坐台小姐，还是毛主席好呀，那时我们工人多风光，虽然穷点，可大家都穷，现在你看看，我们打倒的那些干部哪家没发财，家里的钱用吨数，孩子弄到国外，豪车豪房，我们就要发扬穷棒子精神，再来一次文革，毛主席万岁！

21岁的大学生魏则西之死引发舆论对百度搜索竞价排名、武警北京总队第二医院及莆田系医疗机构的质疑与声讨。一切事物归根到底总有根源，网上说：十五年前，中国和美国两个搜索公司几乎同时起步。十五年后，一个在研究量子计算机的可行性和自动驾驶，并研发了阿尔法狗这样的超级人工智能。另一个则在开发研究卖广告，贩假药，玩流量，送快餐。它们的名字一个叫谷歌，一个叫百度，一个挑战人类智力的上限，一个挑战人类道德的下限。

五一前夕一段多名戴头盔的男子手持木棍、警棍，反复殴打妇女和儿童的视频，骇人听闻、人神共怒。海口市秀英区主管区长引咎辞职，相关人员免职问责，最后结果却传来政府在严历追查录像上传人员。雷洋的事情就不要说了，会有好的结果，但不要奢望真相。

易中天教授说你们为什么揪住文革不放，并发誓要重修中华民族史，以易教授的才华当仁不让，您要费多少笔墨，多少张纸，逐一记下文革中被整死的爱国知识分子、有成就的艺术家、功勋显赫的将军、贵为接班人的高官、数不清的地富反坏右民族精英抗日英雄，何止是文革，你纵有司马迁的胆，易中天爷爷，怕您一不小心走在嫖娼的路上……

国内国外，港台大陆，无论发生什么事，网上都盛传“马晓力的评论”，马晓力俨然成为了一个符号，一面旗帜，一面坚持真理、呼唤真相、呼吁民主法制的旗帜。看看这段：“台海问题目前如此敏感是中国的问题，会影响到世界政治格局，保持现状是最符合两岸利益的……其实，造成民进党上台的不是别人，正是大陆体制内的极左势力！这些人的破坏力比台独要大的多，因为他们造成的危害已不仅仅是台湾和3000万人口，而是整个中国与华人的兴亡……大陆已被他们毁坏殆尽，还想进行两岸同胞相残！什么年代了，做梦去吧！”这番言论，条理清楚，泾渭分明，让多少政治家理论家汗颜。再看看那些动不动就要向台湾发射导弹的爱国者们，退休在家，整天盼着退休费

多长点，自己的命运还没掌握呢，偏要掌握台湾同胞的命运。

我不喜欢某某红二代红三代的称谓，什么红呀黑的，无一不是当年出身论的流毒，人生而平等，享有一样的公民权，只有中国竟敢堂而皇之地称什么红二代官二代，好像世袭是共产党的体制创新。

唱唱歌跳跳舞，怡弄子孙，颐养天年，有钱喝茅台，没钱喝二锅头，马晓力带领草原恋合唱团唱到了国外，多次获奖，可谓玩到了极致，年逾花甲的“知青”怎么玩都不为过，怕就怕半生受苦，半生糊涂，当惯了奴才永远站不起来。马晓力就是马晓力，一名在草原插过队的老知青，或曰“知青的良心”。

2016-05-24

冷明文集：http://www.hxzq.net/showcorpus.asp?id=92

华夏知青网不是赢利性的网站，所刊载作品只作网友交流之用
引用时请注明作者和出处，有版权问题请与版主联系
华夏知青网：http://www.hxzq.net/
华夏知青网络工作室

贾平凹阎连科太没道理！

贾平凹说：“在大多数人的概念中，知青指那些原本住在城里，有着还算富裕的日子，突然敲锣打鼓地来到乡下当农民的那些孩子；我的家却原本在乡下，不是来当农民，而是本来就是……我读过许多知青小说，那些城里的孩子离开了亲情、离开了舒适，到乡下去受许许多多的苦难，应该诅咒，应该倾诉，而且也曾让我悲伤落泪，但我读罢了又常常想：他们不应该到乡下来，我们就该生在乡下吗？一样的瓷片，有的贴在了灶台上有的贴在了厕所里，将灶台上的拿着贴往厕所，灶台上的呼天抢地，哪里又能听到厕所里的啜泣呢？”——贾平凹《我是农民》（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06年），页56。

阎连科说：“‘知青文学’把下乡视为下狱。把一切苦难，多都直接、简单地归为某块土地和那土地上的一些愚昧。说心里话，和农民永远无法理解城市、无法理解知青下乡是一代人和一个民族的灾难一样，知青们和曾经是知青的作家们、诗人们、教授们，其实也都根本无法真正理解他们曾经在那土地上生活了几年、或更长一些时间的那土地上活过来的千百年的人们。”“我没有听到见到过，知青们在我家乡那块土地上‘受苦受难’的事情。但我知道，那段记忆，已经成为了他们共有的苦难；成为他们的一段欢乐的历史回忆。”——阎连科《我与父辈》（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页26。

我说：我一直很尊重贾、阎，但他们这些抱怨太没道理！难道农民比知青苦，知青即使有苦（或感觉苦）也不能诉说了？事实上，知青文学亦反映了农村农民的苦楚与困境，反映了知青与农民之间的同甘共苦的情谊。更何况，知青文学的批判锋芒，并非针对农民、农村，而是针对造成农民与知青共同苦难的制度之恶，政治之恶。贾、阎们要杜绝知青的诉说，难道是要为制度之恶政治之恶背书吗？

2016-02-21

附旧文：

知青与农民

——跟王彬彬聊聊

看了虫哥转贴王彬彬的《岂好辩哉：一个乡下人对“知青”的记忆》，很有感触，也很有些想法，似有不吐不快之感，随意记下，权当跟彬彬、也跟知青伙伴们交换个意见吧。

彬彬强调知青与农民的互动关系，这是十分正确的；彬彬也强调“农民对‘知青’的感受、认识，‘知青’给农村带来了什么，也应该是构成这一历史运动的一部分”，并且建议“让他们(指农民)谈谈对‘知青’的感受、认识，让他们谈谈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看法，那谈得肯定与‘知青’们大不一样”，这也无疑是十分有价值有意义的认识。以往人们对知青运动的认识、理解、讨论，确实无不是从“知青”角度出发而忽视了“农民”的角度。如果今后能从“农民”角度加以探讨，当是很有意义的事情。就实际操作而言，知青运动(包括知青历史与文学)的研究人员，当更多注意发动当年的农民(及其后人)，以文字或口头(录音)的形式，记录下他们对知青、知青运动的看法与认识。而当年知青回返旧地(包括农村、农场、林场等)，也不仅仅是“重游”、“回味”，也应跟当地人(尤其是当年的老乡)交流，若能将彼此间的看法意见记录下来，便就是宝贵的一手资料了。

然而，读彬彬大作，令我隐隐不安的是，文中流露的那一种强烈的跟知青对立的情绪(其实，前些时在华知网也出现过类似现象)。彬彬说：“站在城市这一面，人们可以说，这场运动的实质是三千万城市人被迫‘下放’到农村——实际上，人们也一直是这样概括这场运动的。但站在农村这一面，却不得不说，这场运动的实质，是农村被迫接受三千万非亲非故、素不相识的城市人。”彬彬所说的两个“被迫”都没错，但彬彬似乎将二者对立起来了。在文中，更是处处显示知青与农民的紧张对立现象，虽然彬彬说“有些‘知青’与农村人建立了很和善的关系，但也有人成了农村人的欺凌者，成了地方上的一霸，令当地人望而生畏”，但文中所列举众多的例子，皆是“揭露”知青戏弄、欺凌农民的情形。若不知情者读了，还真以为知青与农民的关系就是“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呢！事实是怎样的呢？首先，就从“被迫”(这里只是就一般而言，并不排除当时现实中有“自愿”“积极”的表现)层面看，知青与农民都是这一运动的受害者。当年，我们向老乡们抱怨被迫下乡的无奈时，老乡们也就向我们抱怨我们下来“摊薄”了他们的口粮，真有点同病相怜一根藤结两个苦瓜的感觉。但也正是这个“被迫”的基础，使知青与农民的关系总有点不那么和谐，再加上其他个人的因素(品质、修养、情绪、性格等)，知青与农民之间的冲突便时有发生了。我们那里就曾经发生知青集体携带刀棍，蹬自行车冲到邻省墟场寻找欺负女知青的当地人“报仇”的事件。虽然因找不着犯案人而不了了之，但知青那股凶狠劲，确实令当地人紧张了好一阵。而俺老例本人，也曾参与偷杀老乡的鸡两只、瓜菜花生甘蔗若干(在此再次道歉)。然而，难道这些就代表知青的整体表现与形象了吗？事实上我们跟当地农民的关系大体还是和谐的，相互之间关心帮助的事例不胜枚举，就是离开农村后，相互的联系也并没有完全断绝，我就跟我的房东保持相当长时间的信件往来，我读研究生时，他还托人带一大麻袋的花生及沙虫等海味到广州给我。此类事情在网上网下众多的知青回忆文章中比比皆是。可见，不能因为知青中有丑恶的人与事就决然否定知青整体，同理，农民中也确实出现过对知青“不好”的人与事，但我们能因此认为农民就是知青的“天敌”而决然否定农民整体吗？所谓“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罪”就是由于知青确实受了害之后才出

台的法令，其本意当是保护知青的人身安全，至于在实施过程中成为知青与农民之间的“鸿沟”，我想恐怕不是普遍的现象，而且，也不宜因此简单否定这一法令，就好像我们提倡人人平等，但并不妨碍要制定保护妇女与儿童法令一样，毕竟知青在当时社会还是属於弱势群体(即使跟农民相比较——尤其是在数量上)。

至于彬彬“知青话语霸权”的说法，我也实在难以苟同。我不想用什么“归谬”法来作学理探讨，只想就事论事来聊聊。不论是否乐意，我们也不得不承认以下事实：一，虽然不能否定知青与农民的互动关系，但知青无疑是这一运动的主体或主角，他们(无论是整体还是个体)是全程、全身心地投入参与这一运动的，而农民(尤其是个体)则多少有些游离状态，因此，知青对这一运动的回顾、探讨的关注与参与的热诚态度，是不可能出现在农民身上的。二，农民不拥有“话语权”，除了缺乏知青那种“主角意识”外，还确实有文化程度相对低下的原因，而相反，知青的文化程度普遍较高(跟农民比较)，这也是他们能拥有“话语权”的一个外在因素。这里我们并没有(也没必要有)歧视、埋怨农民的意思，只是表明一个事实。三，知青在使用他们的“话语权”之际，并没有将之“垄断”、“独霸”，因此，确实不能无端冠一“霸”字而称之为“知青话语霸权”。换个角度说，如果农民不行使其“话语权”，难道知青也应该噤声不语，以示“平等”吗？

虽然我们当年上山下乡大都出于被迫、无奈，而我们也因此遭受了难以言喻的苦难，我们跟农民之间也曾发生过不愉快的事情，但是，我们无疑也因此有机会对农村与农民有较切身的了解、并与农村与农民结下了颇为深挚的情感关系，由老知青“草原恋合唱团”的活动、海宽“反哺计划”的推行便可见一斑。话说回来，我们欢迎农民老乡参与对知青运动的回顾与讨论，不同的视角肯定有不同的观感，但二者并非是(也不应该是)相互对立相互排斥的，而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

随便聊聊，不知彬彬以为然否？

附文：

岂好辩哉：一个乡下人对“知青”的记忆

作者：王彬彬

所谓“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是把三千万城市青年变成农民的运动，是让三千万城市青年与农民“相结合”的运动。站在城市这一面，人们可以说，这场运动的实质是三千万城市人被迫“下放”到农村——实际上，人们也一直是这样概括这场运动的。但站在农村这一面，却不得不说，这场运动的实质，是农村被迫接受三千万非亲非故、素不相识的城市人。“知青”的身份是与农民紧紧连在一起的，或者说，是农村赋予了原本是城市青年的三千万人以“知青”的身份。“知青”身份的确立和延续，“知青”活动的开始和展开，都是在农村这“广阔天

地”间进行的，都是在与农民的接触中实现的。完全可以说，如果没有当年的农民，也就没有当年的“知青”；如果没有当年的农村，也就没有当年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知青”对农民的感受、认识，农村给“知青”带来了什么，固然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重要内涵。但农民对“知青”的感受、认识，“知青”给农村带来了什么，也应该是构成这一历史运动的一部分。

有一本书，收录了一百个“知青”对当年乡村生活的回忆。一百个人的回忆当然不能说就能反映三千万“知青”乡村生活的全貌。但即使能让三千万当年的“知青”每人都将自己乡村生活的经历写出来，就能展示这一历史运动的全貌么如果找一千个当年的农民，让他们谈谈对“知青”的感受、认识，让他们谈谈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看法，那谈得肯定与“知青”们大不一样。而农民的看法，难道不也有充分的资格成为对这一历史运动的回顾和总结如果有人肯下一番功夫，采访一定数量的对“知青”有切身体会的农民，请他们谈谈对“知青”的印象，再整理成书，与“知青”的回忆形成对照，那至少是一件不无趣味的事。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开始时，我是一个刚上小学的乡村孩子。在此后的十年里，我与“知青”有过深切的接触。对于“知青”的“上山下乡”，我有我作为一个乡下人的看法，当然，我更有我作为一个乡下人的记忆。

移民，是人类史上的一种常见现象。在中国历史上，也有过多次不同方式的移民运动。移民运动，通常会对移民和移居地双方都产生影响。移民会给移居地带来别样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从而会程度不同地使移居地原有居民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发生改变。当然，移民更可能调整自己以适应移居地固有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有专门研究中国移民史的学者，我想请教他们：发生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三千万城市青年的“上山下乡”，是否也可视作一种特殊的移民运动以后的人在写中国移民史时，是否也可将这场运动作为其中的一章

如果将“知青”作为一种移民，那可以说，他们对农村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的影响是几乎谈不上的。按常理，“知青”从城里来，应该多多少少地给农村带来些“城市文明”，多多少少地向农村人展示一点城市人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并引起农村人的仿效和追随。但这种情形并没有发生。这原因不难理解。首先，从理论上说，“知青”是以一种受教育者的身份来到农村的。他们来到农村，就是为了用汗水把自身原有的一切——从生活习惯到思想观念——都清洗掉。他们的目的是要“与贫下中农打成一片”而不是要引导贫下中农向自身看齐。再说，那个年代的城市，也并没有多少“城市文明”可让他们带下乡去。

不过，“知青”还是给农村带来过一些东西，其中最值得一提的，便是农民的一项新的可能罪名：“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罪”。当时农村里，就连我这样的孩子都知道，“下放学生”是受国家法律特殊保护的，与他们发生冲突，弄不好，就会犯法，就会被认为是“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而被公安局抓去。究竟与“下放学生”发生怎样一种性质和程度的冲突，才算是犯法，没有明文规定，农村人心里也不清楚，那最稳妥的办法，便是避免与他们发生任何冲突。一方面说是要让“知青”与贫下中农打成一片，成为合格的农民；一方面又在法律上赋予“知

青”以特权，从法律上在“知青”与农民之间掘开了一条鸿沟。为保证“知青”的“上山下乡”能够顺利进行，这样做当然有必要。但这也就等于同时宣告诸如“接受再教育”、“打成一片”一类口号不过是谎言。在法律上给予“知青”特别的保护，是为了避免“知青”受当地人欺侮。但我不得不说，这种对“知青”的特别保护，却不可避免地把当地人置于被欺侮的境地。

将“知青”一概而论，当然很不合理。我知道，“知青”相互之间的差别，有时大到除了同是“知青”外，再无共同之处的程度。有些“知青”与农村人建立了很和善的关系，但也有人成了农村人的欺凌者，成了地方上的一霸，令当地人望而生畏。

当然，这只是很粗略的区分。也有些“知青”，平时并不怎样坏，但偶尔也会有无赖之举。有几个我认识的“知青”，并非属于那种调皮捣蛋者之列，但有一次，却把人家一头猪的尾巴给割掉了。那家离他们住处很近。是因为这猪老往他们屋边跑，拉屎撒尿令他们厌恶，还是纯粹因无聊而寻开心，我不知道。反正是把那头我多次见过的大黑猪的尾巴给割了。那家主妇鼓起勇气，来找他们讲理。他们却矢口否认，并且气势凶狠。那家人知道是有冤无处申，也就作罢了。但“知青”们却不甘罢休。第二天，他们四个人一齐闯进了那户人家，要讨个说法。那天下雨，他们都穿着胶靴。在人家的饭桌四面坐下后，便把满是泥污的双脚搭到桌上，一边喷云吐雾，一边骂骂咧咧。那家夫妇只得低三下四地赔礼道歉，好话说了一箩筐，他们才在留下满桌满地的泥污后离去。

在乡村，“知青”是一个特殊的阶层。他们的衣着打扮，行为举止，让人一望即知。他们常在外面游荡，有时三五成群，有时则独自一人。我那时是遇上他们，便尽量避开，即使狭路相逢，不得不迎面走过，也总尽可能地往路边靠，以免碰着了他们，招来打骂。——他们中有的人，确实是无缘无故就要打人骂人的。我刚上高中的那一年，有一次与一个同学在学校附近的小吃店正商量着合伙买点什么解解馋，这时进来了一个独自游荡的“下放学生”。那时天尚冷，他却穿得很单薄，头上是长得吓人的头发，脚下却是一双拖鞋。这模样在当时的乡村是很怪异的，就是在“下放学生”中，也不多见。我的那个同学禁不住多看了他几眼，他便勃然大怒：“他妈的，看什么看！”一边骂着，一边便跨前一步，当胸一掌，把那个同学推出老远。我赶紧拉着那同学，逃之大吉。

在上高中期间，还有几件与“知青”有关的事，令我终生难忘。一天晚上，三个“知青”在女生宿舍的窗前不肯离去。女生把门窗关紧，他们却不停地打门敲窗，嘴里也不干不净。与女生宿舍一墙之隔，住着一对教师夫妇。先是女老师忍耐不住，开门出来，请他们走开，他们马上放弃对女生的骚扰，把矛头对准那女老师，不停地骂她是“骚货”。男老师便也被逼了出来。这时，全校的学生都拥了过来，数百人将他们三人围在中间。那女老师原本就是火爆脾气，这一刻，也置“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罪名于不顾了，对群情激奋的学生下达了“打”的命令。但那男老师却冷静得多，他厉声喝住了跃跃欲试的同学，那口气比对“知青”说话时要严厉得多。那三个“知青”一边继续对着女老师骂“骚货”，一边冲着黑压压的一片学生喊道：“来呀，你们上呀！”骂了许久，他们也许觉得再闹下去也无多大趣味了，便显出要撤退的姿态，那男老师连忙喝令同学们让开一条道，任他们扬长

而去。我记得，望着他们的背影，我当时有一种想哭的感觉。但现在想来，那男老师无疑是对的。倘若真的动起手来，后果不堪设想。

我现在想，那三个“知青”那天晚上肯定感到很愉快很充实。一场以少胜多的吵架令寡淡的日子有了些味道，晚上一定睡了个好觉。我知道，“知青”的寻衅闹事，欺侮当地人，一般来说，并不意味着他们本性有多么坏。他们太无聊了，需要找点乐趣；他们也太郁闷了，需要有所宣泄。而既然农村人是那样好欺侮，既然国家实际上是赋予了他们欺侮农村人的权力，那欺侮农村人便成了自然的取乐和发泄的方式。当地的农民就不用说了，就是当地的国家干部，对他们也是宁躲勿惹的。从人数对比上来说，他们与当地人之间简直不成比例。但数量对比在这里毫无意义，就像狼与羊之间的数量对比没有意义一样。

一九七七年，大学招考制度恢复，“知青”也纷纷报考。我们学校为了保证几个成绩好的学生能静心学习，在公社的收花点(国家设立的棉花收购点)借了几间空屋，让这几个学生自带凉床，住在里面。那年，最后一场考完，学校也就放假。有个住在收花点的同学去搬他的凉床，却见屋里挤满了也刚从考场出来的“知青”，有几个坐在凉床上，有几个站着，正在兴高采烈地谈论着考试的情形，独有一人站在门边，脸色惨白，双眼充血。那个同学请坐在凉床上的“知青”起来，说天快黑了，他要回家，凉床是他带来的，他要带回去。但那几个人就像没听见一样，继续着他们的谈论。这时，那站在门边的人却冲过来，一耳光抽在那同学脸上，令他耳朵一阵轰鸣。本不关他的事，他却来动手，一定是考得极糟，满腔怨恨正无处发泄，正好那同学来搬凉床，可算是撞到枪口上了。而那几个高谈阔论的“知青”，对门边的一幕，对那很响亮的耳光，都视若无睹，听若未闻，——对于他们来说，这是太寻常的事情。那个同学那天终于未能把凉床搬走，带着脸上的五条血痕和火烧火辣的感觉回了家。第二天，为了搬凉床，又来回走了十几里地。

在“知青”中，有人原本在城里便是打架好手，以凶悍暴戾著称。他们的这种名声也很快便在乡下传开。他们总是随身带着匕首、三角刀一类凶器的。别的“知青”都怕他们，当地人就更不用说了，都视他们为魔王。这类魔王动辄拔刀伤人，成为地方上的一害。他们天不怕，地不怕，但却怕当地的一个人——派出所所长。这位所长对“知青”一般的打人骂人，寻衅闹事，并不去管，也管不了，但对那几个有名的魔王，有时却并不手软。他敢把他们抓起来，难以绳之以法，他便以恶抗恶。据说，他曾把有的人吊起来用皮带抽。那些年，这位所长以敢于教训“知青”而闻名，而为人称道、敬佩。连“知青”都敢打，想想看，这需要多大的胆量!那时，在我的心目中，他简直是一个英雄。这位所长，我前几年回家时还见过，已退出公安战线。我至今对他仍怀有一份敬意，尽管我现在想，他当时一定是得到了上头的默许。“知青”为祸太烈，总得有所制约。教训那几个魔王，自然也有杀鸡给猴看的用意。

去年，当当年的“知青”们争先恐后地回忆自己的“知青生活”，以纪念“上山下乡运动”三十周年时，我写

过一篇题为《“知青”的话语霸权》的短文，意思是说，当年的“知青运动”，是城市青年与农民“相结合”的运动。没有农民，也就无所谓“知青”；没有“山”和“乡”，也就无所谓“上”和“下”。是农村和农民赋予城市青年以“知青”的称号的。所谓“知青运动”，是城市青年与农民共同完成的。因此，当年的农民对“知青运动”和“知青生活”也有一份发言权。但迄今为止，并没有农民的声音。只听见“知青”在单方面地说个不休，他们说着当年的自己，也说着当年的农村和农民。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这表现了“知青”的话语霸权。

文章发表后，引起一些议论。一九九八年第十期的《今日名流》上，武汉的一批“知青”出身的作家、学者对这篇短文进行了批驳。他们对“话语霸权”的说法深为不满。有几个人强调，所谓“话语霸权”，是以强制性手段剥夺对方的话语权力，而“知青”并没有对农民这样做。至于农民天生没有话语能力，那只能怪他们自己。因为农民无能力发言而说“知青”拥有“话语霸权”，在他们看来，是很不妥当的。要回答他们，只需以眼前的事为例。最近一个时期，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对南联盟狂轰滥炸，还把中国的使馆也给炸了。中国人怒火满腔，一致声讨美国的“霸权”，——按照武汉那几位作家、学者的逻辑，这里的“霸权”，显然也是用得不当的。

又有几个人对我进行了“归谬”。一位“一级作家”说：“王彬彬提出‘知青话语霸权’，有一个逻辑悖论。用归谬法推论的话，对知青运动农民有一半话语权，那么像知青的老师、父母、亲人，像知青干部、知青运动的决策者等等和知青运动有关系的人，都有话语权，可他们也没有说话，是否也认定知青垄断了他们的话语权显然，所谓‘话语霸权’是荒谬的。知青有自说自话的权力。”“知青”同农民的关系，与“知青”同老师、父母等其他人的关系之不同，一定意义上正如丈夫同妻子的关系与丈夫同老师、父母等其他人的关系之不同一样。“知青运动”是“相结合”的运动。谁与谁“相结合”城市青年与农民!城市青年是住到了农民的家里和村里的。正是在“相结合”的过程中，“知青”的身份才得以确立，也才有所谓的“知青生活”——这“逻辑”真像一加一等于二一样简单。

又有一位“专业作家”说：“按王彬彬的逻辑，我也作了个归谬：当年‘右派’下放北大荒，后来只有‘右派’写文章，不见农民说话，这是否就是‘右派话语霸权’当年的‘胡风分子’也在写文章，但整他们的材料的人都不做声，这是否也是‘胡风话语霸权’”这就更是胡乱比附了。将“右派”的“下放”与“知青”的“上山下乡”混为一谈，在当年说不定要掉脑袋的。没有农民，照样有“右派”；而没有农民，从理论上说，便不可能有“知青”。当然，二者的差别远不只这一点。对一个比我年长许多的人说这种道理，我真感到难为情。至于连“胡风分子”也扯上，更让人哭笑不得。不过有一点应该强调：所谓“整他们的材料的人都不做声”，并不是事实。

又有一位“学者”说：“王彬彬所谓的‘话语霸权’，本身就是一种虚构。他这样有意唱反调，我觉得像‘骂派批评’一样，不是一种严谨的学风。”这年头，好像谁都有资格以“学理”和“学风”来责人似的。

武汉的那批作家、学者对我的批驳，让我为他们脑子的不清楚而悲哀不已。

（《书屋》一九九九年第五期）

老例文集：http://www.hxzq.net/showcorpus.asp?id=19

华夏知青网不是赢利性的网站，所刊载作品只作网友交流之用
引用时请注明作者和出处，有版权问题请与版主联系
华夏知青网：http://www.hxzq.net/
华夏知青网络工作室

习惯的知青

习惯这东西了不得，考查历史我得出个结论：能克服习惯的人才能成伟人。前几天滴水湖畔兄发一篇短文，谈某些老知青至今还喜欢“折腾”，引起我的感慨。我们知青，都是一九四九年后出生，四九以后的三十年，是中国大折腾的三十年。折腾什么呢？根本讲是折腾人。只消查一下共和国大事记，就发现几乎是一张折腾清单，年年小折腾，两三年大折腾。若想了解折腾的具体状况，不妨读些过来人的日记书信回忆录，例如《吴宓日记》。吴宓这位建国前即名震学界的硕儒，建国后几十年学术上毫无建树，几乎天天在应付折腾，成了名符其实的运动员，到最后，竟然颇能出口成章地应付折腾所需了。

知青们正在读书的黄金年纪，幸运赶上折腾的文化大革命，一度竟荣膺折腾先锋。到底是热血青年，一鼓作气将孔夫子推倒，将国家主席打翻，将“牛鬼蛇神”斗垮。这些事迹现在虽上不得台面，但我所见今日已垂垂老矣的不少知青，还常常面有得色地讲述这些壮举。显然，这些英雄们血尚未冷，只要有东风，便会依然像京剧《大保国》里杨波鼓动须发皓然的定国公徐延昭说的：您老人家可以“倚老卖老撤撤疯”啊。当年伟大领袖向知青们承诺说咱国家要“过七八年再来一次”地折腾，而每次总要个几年，也就是说折腾这种事是长江后浪推前浪，并无间歇的，哪怕是折腾得民不聊生也在所不惜，因为“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也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嘛。所以知青们经过文革早已习惯于折腾，且领袖的承诺等于告诉知青前途无量，大有作为。可后来领袖去世，国人实在受不住折腾，停了。对此，一些人自然不习惯，好比孩子，你答应隔几天给他一块糖吃，后来不给了，他就不舒服，所以还是要想办法折腾。

滴水湖畔总结这些知青是“想折腾，能折腾，会折腾”，真是再恰当不过；他又说这些知青折腾再三，“就是没有想想自己是怎样口是心非地回城了，没有按照伟大领袖的指示，坚持好好在农村干革命。”更是一针见血。因为知青现在折腾，好比毛笔字爱好者，别看废寝忘食迷恋，但真让他丢弃钢笔，只用毛笔写字，他是不愿意的。知青们现在折腾只是唱红歌演出、搞歪曲历史的知青博物馆、穿旧衣服下乡体验生活、搞纪念领袖征文或赛诗会之类，仿佛晚清遗老，洋洋大观矣。可真让他们过文革的生活，自己带着孩子下乡扎根，他们才不干呢。

折腾，源于这些人的思想还停留在文革，这不出人意料。值得一提的是，许多自称或被赞为反对极左的知青，思维也很不堪。表现是以极左思想和手段批判极左，这亦是习惯使然，无非是绕一圈回到原点。近日见若水兄转发一文，批判鲁迅，作者是位八零后。这孩子不懂历史，亦不懂治学，信口雌黄倒不奇怪。奇怪的是一位老知青在后

面发评论，言之凿凿地说鲁迅睡“凉被”是为了节制性欲，以免性欲勃发没控制住与包办夫人做爱；又说读书人都认为鲁迅的文章“语文太差”。若是学术探讨，各种观点均无不可，但评论历史和历史人物，要的是证据，否则连街头扯老婆舌的大叔大妈都不如，可怜我们名为“知识”青年，其实还不如这种大叔大妈呀。例如前者，我不知这位知青有何依据说鲁迅睡的是“凉”被窝。绍兴都昌坊口、北京西三条胡同、上海山阴路三处鲁迅故居均完好存在，原物原样摆在那里，无非是一张床（北京西三条故居是床板）上面铺着棉被，这是南方人的经典睡具，至今大部中国人也是如此。你说它凉？也可能，因为棉被和木床不是太阳，并不会发热。可我问过南方人，人家倒并未感觉“凉”。那怎么才能算是“热”被窝呢？除少数北方农村现在睡火炕外，直到如今我们各位睡的还是这种“凉”被窝，难道都在为计划生育而控制性欲？我不知这位知青睡的是什么被窝，如何保持性欲，大概是用了电褥子也未可知。我参观过毛泽东北京故居，那张他自己睡的大床，硬硬的上面一床薄被，再就是很多书，这样说来，他老人家睡“凉”被窝，也是为了控制性欲？说实话，北方人睡热炕，南方人睡床，我却并未发现北方人比南方人性欲强。

再说后者，这位知青说鲁迅的文章语文太差。这又奇了，语文太差的浩浩二十卷文章能流传到今天？他又没说是哪些读书人认为鲁迅的文章语文太差，我想那一定是著名的读书人罢。可我读了许多民国大家和当今天名家评论鲁迅的文章，他们有不少人反对鲁迅，例如陈源、梁实秋等，却未见有说他语文差的，我不知这位知青依据何来？

其实我知道我说这些都是假作天真的废话，因为很显然这位知青的话是醉翁之意，他颇代表了一些人的思想，即反对鲁迅。为什么反对呢？因为文革曾拿鲁迅当枪使，助了“折腾”大力。可鲁迅那时已死，谁拿他当什么，他有什么办法呢？就好比当年与苏联论战，我们拿马克思的话来声讨苏联，苏联也拿马克思的话批判我们，这与马克思何干？所以，这种知青的本质还是折腾，他们其实根本不懂鲁迅，也未读过几本鲁迅。他们的逻辑是：凡是文革赞成的就是极左的，我们就应当批判；凡是文革反对的就是正确的，我们就应当支持。显然这是习惯了当年毛主席教导“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应当拥护；凡是敌人支持的，我们就应当反对”的结果。表面看，他们在批判极左，其实是相反，因为他们用的是极左的方式，根源在于思想不知不觉还在极左。好比一个人抓流氓，却也用流氓的手法，结果成了两个流氓打架。这种类乎于原始或奴隶社会的“同态复仇”式思维和方法，实在是对改革开放的反动。

说实话，我对老知青们（包括我本人）颇为失望，觉得折腾的基因永不会消除，别说企望他们反思自己文革的言行，就是企望他们不折腾也是难的。我唯愿他们少折腾、少荼毒后人。好在他们都老弱不堪了，正所谓“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你看，这句文革时常用来批“右”的名句，用来批“左”不亦可乎？

2015-09-04

歷史與文學：知青理想主義縱橫談

（摘自王力堅（老例）《轉眼一甲子：由大陸知青到台灣教授》）

2014年12月17日，本書作者王力堅（下文稱「王」）邀請孔捷生[1]（下文稱「孔」）與朱嘉明[2]（下文稱「朱」）到台灣國立中央大學中文系，進行題為「歷史與文學：知青理想主義縱橫談」的演講。本書作者與中央大學中文系博士生林廣一同學根據演講內容整理成本文。本文經過有關對談者審定，內文小標題為本書作者所加。

一，關於知青上山下鄉運動的定義及時代背景

孔：知青，作為大規模的上山下鄉運動，是1968年開始，一直到七十年代末才最後中止，有好幾千萬的青年被這個時代的狂流所裹纏。它對中國後來的歷史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當代中國可以跟它相比的事件，大概就是九零年代起的民工潮——即所謂農民工進城，大概幾億人口大規模的社會人口遷徙。但是，二者又有很大的不同。因為農民工這一代，沒什麼話語權。他們的人生、遭遇，不太能夠被表達出來。至少這一代農民工，話語權是比較貧乏的。知青可不一樣。比起後來的農民工，知青較有知識，他們的感覺比較敏銳、細膩，只要那個時代稍微解凍那麼幾公分，就可以說「給一點陽光就燦爛」。所以，到了文革末期，社會發生很多大的事件，已有很多知青的影子。譬如天安門四五運動，跟回城知青很有關係，他們拿所謂反動詩歌、文章在天安門廣場上張貼，引起很大的政治風波。知青作為一個群體，在這個事件中表達他們的心聲，在整個社會上引起很大的反響。文革結束以後的傷痕文學作家，很多都有上山下鄉經歷。

知青上山下鄉運動，本身是要解決社會問題迫不得已而推行的。因為到了1968年，文革已經停課鬧革命三年了，無論從高等院校，到初中、高中，已經積壓了幾屆的畢業生，他們要到什麼地方去呢？如何安排他們工作，或者如何走上社會呢？這對當時的中國政府也是一個難題。很多知青是有紅衛兵經歷的，就是很熱衷投入文化大革命的造反啊，破四舊啊，或批鬥他們的老師啊；即便不是很熱衷這些的部分學生，即所謂逍遙派，由於三年沒有課上，對於他們的青春期來講，也是充滿了焦慮和躁動。

在當時文革大背景下，不管從毛的立場來講，或者從整個文革官僚體制受到很大摧殘來講，紅衛兵這股社會力量、這個社會群體，都有很多不安定的因素，所以，把他們遣散是必須的。到這個時候，積壓了幾屆的畢業生這個

社會問題就很突出了。於是就有了毛的所謂「最高指示」：「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很有必要。」毛把這個社會問題政治化了。其實是為了把這個群體解散到社會各個角落。可是，當時城市裏並沒有那麼多工作機會、崗位來安置他們，只好用這個方法。毛用了一個很堂皇的政治化的口號。

朱：我同意捷生的想法。首先，我們需要對知青運動有所定義：它是发生在1968年至1978年期間，以「老三屆」為主體的，全國範圍的「上山下鄉」運動。

進而，很有必要認識知青運动的規模。所以，要從數字談起，談數字是經濟學家的特性。文革時期的中國人口八億，以當時人口比例來算，農業人口是百分之七十，七八五十六，就有五點六億的農村人口。那城市人口呢，充其量是兩億多一點。扣除大約五千萬的老人和兒童，具有工作能力的城市人口不過一點五億左右，而各種形式上山下鄉的人是三千到四千萬，那是巨大的數字，佔當時城市人口的五分之一，佔當時城市有工作能力人口的四分之一。幾乎每一個家庭至少有一到兩個孩子下鄉，幾乎涉及城市的所有家庭。然後，再講地理分佈。知青分佈的區域，涵括中國幾乎所有的城市、省，還有農村，當然最大規模的是一些邊疆地區。知青的人口規模和地理分佈是值得研究的。

雖然中國的知青運動人數大，時間長，地理分佈廣。但是，討論知青運動的歷史特徵，需要超越中國當時的視野，需要將這一運動的歷史空間「拉大」。「拉大」包括兩個含義：將中國文革的紅衛兵運動及知青運動與同時間在發達國家的學生運動作比較，尋找反差及其原因和後果；將中國文革的紅衛兵運動及知青運動置於大歷史之中，且以世界作為參照系。

這樣，很容易發現中國知青運動至少有這樣的特徵：第一，是政府組織和推動的運動。政府的重要動機是解決數千萬中學畢業生的就業壓力，避免由此產生的政治後果。第二，知青運動終結了千萬知青接受初、高中和大學基础教育，學習专业知識和追求科學進步的權利。在文化革命期間，支持知青「上山下鄉」的重要根據是「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也就是說，你們過去所受的教育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給的，現在給你一個「再教育」的機會，這就是所謂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知青運動歷史證明，「再教育」的效果是非常有限，甚至失敗。絕大多數經歷過「再教育」的知青們，在重新回到城市之後，沒有文化基礎和一技之長，上學和就業困難。到了一九九零年代上半期，他們成為最早「下崗」的成員。如果沒有文化革命，「老三屆」整體得到比較系統的現代知识和技能教育，整體命運會大相徑庭，就會有较多的人生選擇機會。第三，它是時空逆轉運動。首先，從空間上说它是反城市化的。在1960年代，世界的潮流之一是城市化、農民走向城市、城市的規模不斷擴大。當然，在西方國家，也存在所謂的「反城市化」現象，城市人由於生活的擠壓，遷移到農村或郊區，把生活品質移到農村，並非否定城市化運動。知青運動則是把城市的青年學生趕到農村，當時的口號叫：「我們也有兩隻手，不在城裏吃閒飯」。好像城裏人在城裏只能吃閑飯，他們的兩隻手只能到農村去才有價值。其次，從時間上说是時光倒流。讓知识青年离开現代化主流，退回到一直停留在中世紀的人民公社，或者是農奴身份，退回到落後和艱辛。今天看來，知青運動的本質

是對歷史潮流和大趨勢的反動。後來絕大多數知識青年得以返城，就是回歸歷史潮流。

知青運動已經過去了四十年左右。如何評價這一制度的歷史代價，始終沒有定論。核心問題是以數千萬人為基數的「老三屆」主體，年齡集中在15-20岁，本應該繼續讀書學習，但是，他們先是捲入文化革命，接著「上山下鄉」，长達十餘年之久。對他們來說，这是歷史性的犧牲，對國家而言，是巨大的人力資源浪費。

人們常說：「老三屆那代人是獨一無二的。」這是一個很深刻的問題。我同意。我在這裏想強調「老三屆」的幾個「獨一無二」之處：

首先，老師的不同。「老三屆」的老師都是所謂舊中國過來的老師。我是1958年9月1日上的小學。我的第一個老師姓袁，是位女老師，當時應該是四五十歲，她應該在所謂的舊中國、民國時期已經教了二十多年的書。還有一位教語文的金老師，是溥儀的弟弟，他活了很久，最近才去世。也就是說，「老三屆」的老師的主體都不是共產黨培養的，而是從「舊」中國轉變過來給「新」中國工作的，他們或者是在民國時期已經從事教育的老師，或者是在民國時期讀書，在新中國開始參加教育工作。所以，毛澤東是不信任他們的，稱呼他們「資產階級知識份子」。文化革命初期，毛澤東提出「資產階級知識份子統治我們學校的現象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這也是紅衛兵運動的重要背景之一。到了今天，中國大陸學生的老師已經純粹是共產黨教育出來的第二、第三、甚至第四代老師。

其次，家長的不同。「老三屆」的家長，不論從事任何職業，都是從民國走出來的。他們曾經接受過所謂「舊社會」的價值觀，不同程度保留著「舊社會」烙印。如今的學生家長，至少是「生在新中國，長在紅旗下」，自然有很大的差異。

再次，社會氛圍的不同。以我個人為例，我是在北京景山前街旁邊一個胡同成長的。那条胡同裏有魯迅夫人許廣平，有中華牌鉛筆廠董事長、有共產黨將軍、有畫家、有城市貧民、甚至還有清朝的宮女和太監。這樣多樣化的環境，在今天是難以想像的。當然，所謂的「大院文化」與此非常不同。相對單純和簡單的多。在那裏，最大的差別是官大官小，重要的關係是領導和被領導。可以說，「胡同」是社會，「大院」是單位。

還有，文化資源的不同。在1959年到1962年之間的北京，一度出現過某些電影与西方同步。例如，我知道赫魯曉夫，知道紐約，都是因為電影。一部是《赫魯曉夫訪問紐約》，一部是《一個國王在紐約》，從中我還知道了赫魯曉夫、卓別林、紐約摩天大樓。還有一部電影《柏林情話》，講的是因為東柏林和西柏林之間築起一道牆，分割了東柏林的和西柏林的一對男女青年的愛情，對我這個十歲小孩的影響至深。我提及這些，無非是讓後人知道，文化革命之前的北京，並不是真正的文化沙漠，存在著各種文化和思想資源。

不了解上述所說的三個「不同」，很難認識「老三屆」。如同每一代人，都與父輩一代不可分離一樣，「老三屆」不是孤立的一代，他們的家長、老師、左鄰右舍幾乎都有著所謂「舊社會」的記憶和生活經驗。從1949年一直

到文化革命開始的1966年，共產黨執政不過是十七年，毛澤東稱之為「資產階級黑線統治的十七年」。中國還沒有完成今天常說的社會轉型。毛澤東即使通過文化革命，也沒有實現他所希望的轉型。為什麼？因為社會的主體，包括共產黨的主體，並不是經由共產黨培養和教育出來的「新人」。因此，那時的中國將家庭出身置於難以想像的重要地位。進入二十一世紀之後，伴隨共產黨政權的延續，有著所謂「舊社會」記憶和生活經驗的幾代人生命的消亡，今天中國人口主體已經完全成長於共產黨意識形態、教育制度和文化制度，與「老三屆」這代人是不可同日而語。此時此刻，唯有「老三屆」還傳承者對中國二十世紀上半期的某種記憶的基因。現在講多元性的根源，主要來自外部，例如網路的貢獻；在「老三屆」成長的時代，雖然表面上沒有多元性，「輿論一律」，但是，人心中還有歷史繁衍出來的多元的根。

紅衛兵和「老三屆」不是一個概念。紅衛兵來自「老三屆」，但是，僅僅是「老三屆」中的很小部分，他們的家長基本參與了共產黨政權的建立，這樣的家長在人口中的比重很低。不能把紅衛兵運動等同於知青運動，前者是主動實踐毛澤東的文化革命意圖，而後者是被迫服從毛澤東驅逐青年學生於城市的意圖。

值得提及的是，從1977年恢復高考到1989年，「老三屆」的精英曾經有過近十年的合作。之後，發生了分流和分裂。為什麼最終會出現分流和分裂，從根本上說，還是思想不同，思想資源和思想演變的差別。經過1990年代，特別是過去十餘年，「老三屆」不論思想傾向、社會地位、財富差別已經固化。例如，他們中有達官顯貴，也有家徒四壁，還有唱紅歌跳「廣場舞」的。這種差別勢必影響了之後的兩代人。

我剛剛翻閱了王力堅老師這本書（案：指《回眸青春：中國知青文學》）的references。我發現，研究知青的熱潮是1990年代，現在好像慢慢在衰退。衰退原因值得思考。似乎與知青研究的主體迅速老化和思想迅速陳舊有關。但是，根本原因在於知青運動所涉及的不是小歷史，是大歷史，所涉及的學科，不是單一的，而是多方面的。

聽到這裏有同學願意做知青研究，我是相當高興的，並不因為我當過知青，主要因為「老三屆」為主體的知青正在老去，他們自己無法徹底超越自己，需要沒有知青經歷的新鮮血液參與知青研究。隨著歷史推延，知青研究的價值會迅速被深刻化和被放大？還是會逐漸的縮小和泯滅？現在還很難說。但是，可以肯定的是，知青歷史的意義，現在被估計得還過於簡單。

還有，如何看待和估計知青文學？知青文學在文學史上重要，是理解知青歷史的重要路徑。當然，知青文學存在不同形態。我是欣賞和傾向孔捷生他們代表的那類知青文學。因為，孔捷生他們寫了知青的人心、人性、痛苦、迷茫、對現實的扭曲抗爭，反應了知青歷史的悲劇本質。我是反對「青春無悔」那類知青文學。堅決反對！怎麼會「青春無悔」啊？這麼一個時空逆轉的運動使那麼多人在讀書的年代不能讀書，到了老年依然處於愚昧狀態，這是悲劇的悲劇。為什麼孔捷生他們這樣的作家可以解釋了這代人的獨特性？因為他們從頭到尾拒絕文學的媚俗。

古今中外，在社會的文化運動中獲得發言權的，不一定代表社會主體，甚至主流。因為，社會的大多數沒有能

力將他們的的主張和願望，他們的心境，用語言文字表達出來。感謝孔捷生們，他們的文學表達了希望表達而沒有能力表達的多數知青的心聲。雖然，任何語言和文學是非常蒼白和無力的，都不足以顯現知青運動的群體和個體。還是請捷生講。

二，困境與誤區：知青理想主義剖析

孔：好，回到文學這個領域來講。我也不謙虛，〈在小河那邊〉是我的成名作。我寫這小說的時候是二十五歲，那是1978年寫的。小說寫出來，編輯部討論了好久，最後才發表。因為對他們來講，覺得衝擊太大了、太激烈了，所以一直拖到1979年1月號的《作品》才登載發表。二十五歲寫這篇小說，可是我十五歲就下鄉當知青了。至少是經過了十年，前一半時間在農村歷練，和後面一段的沉澱，才寫出這麼一篇小說。這就叫「十年磨一劍」。怎麼去看待知青或知青文學？從本質來講，整個知青群體都是憤怒青年，不過跟現在的「憤青」差別非常大，現在的「憤青」標榜愛國，宣稱「愛國不需要理由」。我們那個時代的憤青呢？是對現實充滿質疑，憎恨現實。當時要我們愛黨、崇拜領袖。在那個年代的價值觀中，愛國可能還在第三、第四位，無論如何，還是有愛國這一條。但是，那年代的憤怒青年有一個共同的質問，就是——你要我們愛這個黨、崇拜一個領袖，和擁護這個什麼什麼。你給我一個理由，我找不到這樣的理由。當時是太需要理由了——叫我們怎麼愛？我們找不到這個理由，所以才產生了這一群憤青。

到文革結束，文學剛剛解凍。在所有的中國的意識型態領域裏頭，文學，尤其是小說，是一個突破的先鋒。傷痕文學是一個先鋒，後來的星星畫派、先鋒戲劇，和張藝謀、陳凱歌他們的電影，我指的是他們早期的電影。當時他們的《黃土地》啊，《一個和八個》啊，差不多也是在後文革的先鋒文藝裏頭起到很大作用的，都是值得敬佩的。但我想說的是——文學，尤其是小說，是走在最前面的。

知青文學有好幾個發展階段，像我寫的〈在小河那邊〉，一開始是把目光聚焦在個人的苦難，我們知青自己的苦難。後來，就開始把目光延伸到農民的苦難。再往後，有進一步的反思，就是我們會把視野放得更廣闊，看到整個社會的苦難，並嘗試尋找這些苦難的根源。所以知青文學一步一步地往前推進和深化。比如我後來寫的〈南方的岸〉和〈大林莽〉，就嘗試把目光從知青個人或知青群體的經歷和苦難，往深處延伸而發掘，甚至企圖超越這個時代，嘗試把目光放得更遠。

知青文學後來有了一些分流，比如像鍾阿城這樣的轉向文化尋根。鍾阿城〈棋王〉這個小說，看起來好像不是在講知青，而是有一個文化含義上的發掘和提煉，還有如王小波等。後來的知青文學就出現了很大的偏差，這種偏差，也可以說是這個時代所需要，致使發生這樣的轉折。我們都知道——習近平、李克強、王岐山、李源潮，他們都是知青。既然他們掌握了國家最高權力、坐牢固這個位置，當然不希望知青文學構成對社會制度的質疑。我們知

道，所謂「七不講」裏頭，有一個「黨的歷史錯誤不能講」。知青運動，也是一個錯誤啊，他們當然不希望你們講。

朱老師剛才提到「青春無悔」的這個說法。就在這種時候、這個聲音越來越高揚，這個說法成為回顧知青運動的主流，這是很可怕的，也是很荒誕的。從文學和美學上面來看，有一種叫「苦難崇拜」。就是有人經歷過了種種苦難以後，再回顧當初的苦難，會產生一種美感，甚至產生一種崇拜。雖然說悲劇本身就是一種美學，比如說「羅密歐和茱麗葉」，也是昇華到很高層次的一種悲劇美。但並不能說我們就會因此產生對悲劇的崇拜，希望多經歷悲劇，或者視悲劇為我們生命中最寶貴的東西。現在的知青文學裏面就有這個問題了——將苦難崇拜和悲劇美上升為無怨無悔。譬如「我們的青春多麼充實」，「我們知青對共和國作出什麼奉獻」，諸如此類宏大的話語。這個現象，都是主流意識形態、官方意識形態所制約、引導而產生的。剛才朱老師也說到，後來知青文學的發展是有點陷入困境。我覺得這是一種墮落、一種精神上的墮落，就是把知青文學，還有知青群體、運動，往無怨無悔這個方向引導，這是一種墮落。

有一位老知青在美國的大學任教，他主持和撰寫、以及組織張羅了一個大型組歌，後來擴展為一個大型歌舞表演，叫《歲月甘泉》。結果，被不少的老知青，像我跟朱老師這樣的，就認為這是紅歌的翻版。這個《歲月甘泉》對知青運動充滿了歌頌讚美、苦難崇拜。這種話語，在相當一部份知青心裏產了共鳴。我覺得這才是悲劇所在。只要你是一個有智商的、有思想的、有智慧的、有分析能力的人，都不會去談這種無怨無悔，甚至還要苦難崇拜。這種想法，對我來講是不能接受的。

王：《歲月甘泉》一出來我也很驚訝。開始我是覺得很不可思議，甚至帶有點憤怒。過後我覺得——剛才孔老師也是這種想法——知青裏頭確實有這種人，有這種思想，有這種感情在，我們不能夠完全無視。但是，為什麼過去那麼久了，這樣的激情還在？這是不是年輕時候的理想主義的一種存留、或者回眸、或者緬懷？畢竟經歷過這麼多風風雨雨，為什麼還出現這種情形？那麼，拉開一點距離——從歷史也好、政治也好——來看的話，這樣一種理想主義大概很難簡單地否定它。至於如何去分析它、討論它，就很有意思了。我甚至覺得，可能我們是局中人，還不一定能說得那麼清楚。所以我一再強調並希望你們（指在座的同學）從後來人、局外人的角度，去探討這樣一種現象。這種現象是歷史的，但又是現代的，延續到今天。

知青與紅衛兵，雖然是不同的類型，可能性質上也不太一樣，但是在理想主義這方面，我覺得有一脈相承的東西。另外，還有一個現象很有意思。談論文革的起因，有一個簡單的說法——毛澤東的因素是很重要的。就是認為毛造反，是天才；但毛治國，是蠢才。所以他揚長避短，搞文革。當然這是比較簡單化的說法。這個說法，在大陸好像聽得比較多，在海外聽到比較多的反而是，認為毛是要堅持他的繼續革命理論，是從理想主義出發，於是知青上山下鄉就被認為是要培養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接班人；認為從這個主觀願望出發，毛用他的理想主義來搞鬥爭；

所以，在文革中的造反，都是帶有理想主義激情的，從紅衛兵到知青，都會有這麼一種理想主義激情，可以說是大氛圍下的一個承傳。

孔：每個人對自己的青春有懷念、追想，這是很正常的。即便是你的青春時候所在這個地方很貧困、也經歷了一些苦難，但是對你來講，青春總是珍貴的。所以，這個懷念、追想都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呢，不能夠把青春時候的苦難，尤其是所有整個社會的苦難全加以美化。

昨天到阿里山，看到滿山的森林，聯想起我年輕時候到海南島的情景，覺得很親切，這就是很典型的青春懷想。因為我最值得懷念的青春歲月，就在海南島雲山深處，在深山老林裏頭度過的。所以我看見大山、看見鬱鬱蔥蔥的森林，就很親切。我們的青春歲月，就在那裏墾荒，主要工作就是砍伐森林，把那些幾百年、上千年的熱帶雨林的珍貴木材，砍下來以後，過了幾個月就放火燒荒，把它燒成灰燼，因為沒有能力拉出去。燒掉以後就挖成樹坑，把橡膠樹苗種下去。

我的小說〈大林莽〉，講的就是這樣一段歷史。我們現在回過頭去看，假如當時種下去的橡膠很有效益，那麼對我們的青春、精神、心血多少是一種補償。甚至對我們毀滅掉的、讓我們那麼痛心毀滅掉的熱帶雨林森林，算是一種補償。結果呢？由於現在參加世貿，中國的橡膠根本就沒有任何競爭力，跟東南亞的橡膠沒法比，人家的橡膠質量好、價格又便宜，可以說，我們這代人在海南島的付出，扔在這個所謂橡膠事業上，完全是白費。在這種情況下，你再去懷想這個青春，講「歲月甘泉」，把當年的苦難變成甘泉，這種歌頌還有什麼意義呢？無論是從現實的經濟效益來講、還是從政治方面來講，我都完全不能接受。

朱：我沒有看過這個《歲月甘泉》。今天參加這個座談，中心議題還是要回答怎樣看待所謂的知青理想主義，或者知青和理想主義關係。

回答這個問題，要從真實的歷史出發。我想強調的就是：絕大多數知青並非是懷著理想主義的願望走向農村邊疆的。今天不論下面有多少知青，我都會請他們捫心自問：「你那時候是滿懷激情、因為理想主義上山下鄉的？」如果大家想到那個場景，沒有多少人會給予肯定的回答。因為，絕大多數知青是被迫的，是別無選擇的。在「上山下鄉」中，除了「老三屆」，還有為數可觀的1969和1970屆初中畢業生，他們多數不過十六歲，其中還有很多十五歲，還是孩子，卻要離鄉背井，與父母天各一方。

不要認為知青「上山下鄉」的歲月真的是一個洋溢著理想主義的時代。完全不是。那個時候，文化革命熱潮已經衰退，進入「清理階級隊伍階段」，「老三屆」們前途無望，無所事事，等待分配。「上山下鄉」是沒有選擇的選擇。不走，就是街道的壓力也是受不了的。

知青歲月從頭到尾充滿的是艱辛、掙扎、無奈，甚至絕望，是在沒有溫飽保障情況下從事超強度的體力勞

動。1973年，福建莆田上林公社一位叫李慶霖的小學教員，給毛澤東寫了長達2000多字的信，陳述了下鄉知青生活上的困難境遇和上山下鄉運動中的一些陰暗面，並寫道給毛澤東寫信的原因：呼天天不應，叫地地不靈，所以告御狀。毛澤東給李慶霖寄上三百元，並在覆信中承認：「全國此類事甚多，容當統籌解決上」。可見，知青運動和「上山下鄉」問題的嚴重性，已經到了何等地步。

在「上山下鄉」的歲月，女知識青年遭受更多的苦難。文化革命時期有一個罪名，重則可判處死刑，就是「迫害女知識青年罪」。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有兩個團級現役軍人黃硯田和李耀東，都是抗日戰爭中參加革命，最後落實的姦污、猥褻女知青多達數十人。1973年國務院、中央軍委發出104號文件，通告全國：「判處死刑，立即執行」。我看過一幅很震撼的畫：一個女知青，從支部書記的房裏走出來，手裏拿著一張工农兵學員錄取通知書，上面盖著鮮紅的公章，她的臉上沒有喜悅，只有傷痛和迷茫。經歷過知青年代的人都知道，這個女知青究竟付出了什麼代價。

到後來，越來越多的知青為了返城付出更大的代價。從初夜權開始，一直到編假藥方、吃假藥，讓自己真的變成殘疾。

當時，我所在的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處於中蘇東北邊境。那時準備與「蘇修社會帝國主義」打仗，如果戰爭爆發，知青就是血肉之軀的第一道防衛線，為正規軍爭取緩衝時間，這才是我們真正定位的歷史任務。

在幾千萬知青中間，有沒有所謂的理想主義？有，但是絕非主流。對絕大多數的知青來講，這是一個時代的不幸。如果有機會請廣大知青公投，贊同「上山下鄉」是理想主義的比例，一定小的不得了！將知青和理想主義掛鉤，劃等號，是通過誇大理想主義歪曲歷史。

所以，我今天並不想一般地討論理想主義。我要說的是文化革命中發生，並延續到反美學的的那個理想主義。這個理想主義並非是真正的理想主義。包含三個要素。第一，愚昧主義。愚昧一定是反對智慧的。與愚昧連繫的是反智、反智主義。第二，非理性。近代中國始終伴隨的是非理性，只是五四以後的非理性被理論化，這種情況在知青運動中繼續。第三，激進主義。體現在從生產活動到毫無休止的政治運動。第四，反美學的。青春是美的。但是，「上山下鄉」歲月的青春的美受到太多的侮辱和損害。多少知青為了愛情權利付出從名譽到生命的代價。如果說，理想主義常常伴生著浪漫主義。但是，知青時代的浪漫主義，沒有美學的支撐。是一種變形的浪漫，一種變態的浪漫。

問題是，為什麼會形成將知青運動和理想主義捆綁在一起的現象？依我所見，主要因為：廣大知青，並不擁有討論知青運動和「上山下鄉」的話語權，這個話語權已經被少數人控制和意識形態化。官方意識形態需要通過所謂理想主義解說知青運動和「上山下鄉」。知青在走向中老年的過程中，會改變記憶，心理上傾向模糊甚至忘記苦難，美化青春歲月，容易接受和想像虛幻的理想主義。

在歷史每一次的轉折中，悲劇的主體因為喪失話語權之後，而被掌有話語權的人代表悲劇的主體來說話，並被冠以悲劇主體的名義來做出結論，這段歷史到今天都沒有被改變。中國的知青問題需要被討論，但沒有這麼簡單，因為進入到了知青統治中國的時代。

孔：朱教授是北大荒的四師，我是海南島的六師。我是生產建設兵團六師十五團，在五指山深處，海南島最中部。海南島有一句話叫：「一窮二白。」最窮的就是白沙和瓊州，這就是所謂「一窮二白」，我們就在這個地方。我跟朱老師是冰火兩重天，因為他那裏是零下四十幾度，我這裏是零上五十幾度！那時候就感到很奇怪，男知青是又黑又瘦，女知青就虛胖。我也不知道是什麼原因。北大荒雖然很冷，但有很長的農閒期。基本上，除了要出什麼任務以外，沒什麼很重的農活。我們那裏就不同了，人間地獄！我們一年四季都得幹活、都是很重的活，都是墾荒。所以，這也是苦難的一種。

朱：捷生讲海南岛，我谈的是黑龙江。中國有八個字描寫痛苦：一個是「水深火熱」啊，還有一个「飢寒交迫」，把知青時代的南方和北方都cover（覆蓋）了。

孔：我換個話題，談談剛才朱老師講到的關於知青悲劇性的問題。依我所知，有關知青的諸多問題，並不是那些真正的老知青的想法，甚至也不是用常識去討論知青運動的評論家的想法，而是時代的局限，迫使他們這樣做的。我舉一個例子：在中國大陸任何想紀念反右多少週年、紀念文革多少週年，都是禁止的、不可能的。不過，紀念知青運動多少週年，好像犯忌的程度會輕一點。這樣想的話就錯了、絕對錯了。2008年，就是知青大規模上山下鄉運動的四十週年，很多地方都想搞紀念活動，尤其兵團知青集中的地方。比如黑龍江、內蒙、雲南、廣東、海南島這些知青去得多的「墾荒戍邊」的集結地都想搞紀念活動，全部被禁止。禁止的理由呢，就是說跟京奧——北京奧運會有衝突。當年下鄉主要發生在十一月、十二月，跟八月的京奧有什麼過節？反正不許，但只有一個案例是例外，就我剛剛跟王老師說到的這個《歲月甘泉》。這個大型歌舞是例外，是廣東搞成的。為什麼呢？我們也認識這個作者，他當年是我們海南島兵團的。他說，這個過程，他實際上想多抒發一點對知青悲劇性的控訴，絕對通不過，最後就弄成這個樣子，基本上就變成歌頌性的。頂多讓你抒發一點點對母親的思念，好像裏面有一兩首這樣的歌詞。至於對苦難的描述，絕對不允許，結果出來就成現在這個樣子。聽了這個來龍去脈的過程以後，你就發現——它實際上是被官方意識形態的需求所限定的，讓它變成這個樣子的。只有成為了這個樣子，它才能讓你通過。否則一切都免談，這就是冷酷的現實。

朱：在回憶知青運動時候，我不會使用「甘泉」這樣的字眼，更願意使用「苦難」的概念。

盧梭說：世界上有兩種苦難：第一種是在苦難中承認苦難，並告訴後人那曾經是苦難，這種苦難需要被記載。第二種是經歷了苦難，當時就不讓承認，以後明白了是苦難還不敢說是苦難。不僅如此，還要把苦難作另外一種解

讀，把苦難說成是美好。第一種苦難和第二種苦難的不同是，前者承認人類充滿苦難，很多苦難不可避免的，但是，為了減少相同苦難的重複，需要有歷史記憶；後者則是拒絕承認苦難和掩蓋苦難，讓人們不去尋找苦難的原因。顯然，第二種苦難是需要被批判的，因為這種苦難包含對遭受苦難的主體的再摧殘，甚至企圖改變苦難主體的真實記憶，剝奪苦難主體記憶的自由權利，對歷史產生的負面影響很大。

近年來，人們在討論知青主題時，拒絕承認知青的苦難，甚至把苦難說成是美好，進行變態的美化，似乎成為一種時尚。為什麼會這樣？其主要原因是為了從根本上回避造成知青苦難的原因。如果拒絕承認知青運動背後的苦難，不僅是扭曲歷史，而且是對苦難的一種繼續。

比知青苦難更深層的問題是知青苦難的本質在哪里？在於知青被納入所謂的「革命集體」，所有人的個性被以革命和集體的名義扼殺。知青的最大悲哀就是在於他們失去個性、人性扭曲、喪失主動享有自由和人性解放的意願。

1970年4月，一場森林大火在北大荒完達山麓蔓延開來，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第39團數千知青緊急出動撲滅山火。共有26名男女知青獻出寶貴生命，基本年齡是17、18歲，其中多數是女生。所有人下鄉時間不到一年。 這些知青正是青春，為什麼會犧牲？是無辜的犧牲。據說，當時剛剛有的漂亮和易乾燥的化纖衣服，這些犧牲的女知青就是穿著這樣的衣服救火的。她們那裡知道化纖衣服易燃？那時的口號是：「明知山有火，偏向火山行」。所有的知青都被納入了沒有個人選擇的地步。我去過那無言的墳場，悲從心來。

在黑龍江兵團，我自己有過對刻骨銘心的經歷。1971年，我得了一個叫「出血熱」的病，死亡率高達99%。我是在昏迷了多少天之後才醒過來。醒來之後，我問自己，假定沒有搶救過來和醒過來，最遺憾的是什么？我的回答是：母親會何等悲傷。還有，我都沒談過戀愛呢。那個時刻，任何革命口號在我心中蕩然無存。我第一次從個體的角度看到生命的價值，我本身的意義。

人性的泯滅和個人主義的抑制，是那個時代悲劇的根源所在。如今，在這代人沒有平台和話語权，不能充分表達真實知青運動和「上山下鄉」歷史的情況下，少數人不僅淡化甚至美化知青運動和「上山下鄉」的苦難，甚至對已經扭曲的歷史再次歪曲，進而格式化。這實在是太悲哀的事情！經過掩蓋和誤導的知青歷史，會讓他們的子女認為他們的父母、祖輩們曾經有過青春無悔的歲月。

中國需要建立一個知青墓碑，紀念在「上山下鄉」運動中失去的青春生命，祭奠一代人的青春苦難。毫無疑義，知青問題本身是二十世紀中國一個特別大的人道主義課題。

我想借此機會講我在台灣的一個經歷。兩年前，我去過一個叫龜山的地方，在桃園附近，在一個村子裏看到了一個共產黨員在1951年重陽節被槍斃前寫的絕命書原件，中心內容是說很快不久於人世，對不起父母，並希望幾個

侄兒努力學習。這份絕命書感人至深。我在想，那麼多北京官方代表團來台，沒有人會祭拜和追思這些為了共產主義而奮鬥犧牲的台灣先烈，他們主要都是年輕人。也是時代悲劇。

孔：知青中有兩種理想主義。一種就是以梁曉聲為代表的理想主義；那麼另外一種呢？就從我的一篇小說〈大林莽〉開始說起吧。這個〈大林莽〉小說創作的衝動，來源於我們當年在海南島有個事故的通報。就是我們第五師，要進熱帶雨林，勘探下一個營地，要開墾荒地，把那邊的森林都砍光、燒掉，種橡膠。派進去了一個先遣隊，結果迷了路，在森林裏頭走來走去走不出來。最後，從山的另外一邊走出來，都是奄奄一息了。因為山裏有瘧疾啊，被森林裏的一種長白翅膀的東西咬了，咬了以後會患森林腦膜炎，會產生幻覺和高燒。出來的時候呢，死了一個，其他都是……像廣東話講的「只剩半條人命」。有一個女的瘋了，大概就是在山裏頭受了很多折磨、被蟲子咬了以後就產生幻覺了。

就是這個事故通報引起，我就想寫這麼一篇故事。我就寫這麼一個班的男女兵團知青進去熱帶雨林，帶著武器。結果進去以後呢，也是經歷了迷路、幻聽、幻視、飢餓、衣衫襤褸，最後一班男女就一個一個犧牲。兩個有思想衝突的男女，在最後關頭，也產生了像朱老師剛才提到「這樣就要死了，我連談戀愛都沒談過」的想法。結果他們就完成了這個人生的啟蒙。到最後，只有這個女的走出去了，走出去的時候已經是神智不清了。為了紀念死在深山老林的戰友們，最後僅存活下來的這個女的，就每年回來按死掉的人數種幾棵樹，向死去的人致意。

這就是〈大林莽〉故事的梗概。這裏表達的是另外一種理想主義。它固然有悲劇美，但它不是讚美歌頌、或美化悲劇。而是提出更高的問題，就是如何天人合一的問題。為什麼我們要去砍這個熱帶雨林？它是存在幾千年、上萬年，為什麼為了我們一點人類的索求，去把它毀滅？這樣做有什麼意義？從這個角度來講，我有我的理想主義。這個理想主義就是我們避開那個時代的迷狂和精神上的錯亂，找到人和大自然和諧的這麼一個契合點。這是我的理想主義，跟梁曉聲、《歲月甘泉》的理想主義完全是兩回事。所以，我們談到理想主義的時候，恐怕要在這兩種情結之間有一個分野。

三，知青的歷史局限性

王：我看過這樣一個分析、或者這樣一個解釋，就是說知青這代人有過那麼坎坷的經歷，受過那麼多苦，他們就特別珍惜在當下如何去思考、去堅持、去發掘發揮等等。這樣的表現，其實就是帶有某種理想主義的表徵，或者說是對理想的一種堅持、執著、思考等等。

在八十年代早期，人們已經關注到你们「改革四君子」。當時還有一个說法：「翁永曦的腦子，黃江南的嘴，朱嘉明的文章，王岐山的腿」。後人解释這個說法的意思是，你们前三位比較務虛，帶有比較多的理想主義，而王岐山愿意跑腿，是比較務實的，是個實幹家。我還看到一個分析說，所謂「王岐山的腿」，是说王岐山能有所堅

持、有所執著，追求的是一種以思辨的哲學精神為支撐的理想主義。所以，王岐山的理想主義被定位為「一種豐滿而謹慎的理想主義」。引伸到王岐山現在擔任中紀委書記，專門去審查貪官，這個工作其實是很危險的，但是他「明知山有虎，偏往虎山行」，就是在继续執著那份理想主義。

我看到一些資料有這麼一種論述。這其實是有些大而化之，認為所謂「知青治國」，他們這一代跟先前不太一樣了，他們既有實幹的經驗和底層的經驗，又帶有某種理想主義的堅持。我想知道同是「改革四君子」之一的朱老師，你怎麼去看這樣一種現象以及論述？

朱：中國老話，「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我多年堅持一個原則，在任何場合不談論所謂「改革四君子」。人各有志，每一個都走不同的路。我珍惜歷史形成的友情。

還是來談知青問題。 在過去的近半個世紀中，知青一代如同歷史上的每一代，早已經完成了分化為不同的群體和階層。知青不過是這代人在歷史某個階段的符號。中國確實進入了「知青治國」的歷史時期。我認為，還不僅是「知青治國」，還有「知青治校」、「知青治公司」等等。總之，知青已經成為中國「senior」的主體，他們對國家、對家庭、對政治和經濟，對思想和文化，都承擔著歷史責任。所以，我這裡想提出這樣一個觀點：在承認知青的歷史苦難、人生犧牲和社會貢獻的同時，需要反省知青整體的歷史局限性。這種反省對於知青一代的菁英尤其重要。在知青一代中，成為菁英比例非常之低，菁英中可以繼續發揮影響的就更少了，這是個人命運和中國制度使然。

知青一代的最共同背景是，經歷了毛澤東時代的文化革命和「上山下鄉」。其局限性包括：

第一，沒有接受良好的系統教育。因為文化革命，知青一代人，即「老三屆」，再加上1969、1970屆，甚至在後幾屆初高中畢業生，沒有按時完成系統教育，知識體系殘缺。即使後來讀大學，甚至獲得博士學位，也不足以彌補。在一個知識革命、創新革命和信息爆炸的時代，這種局限性會被放大。

第二， 文化革命和紅衛兵的影響。中國官方是否定文化革命和紅衛兵運動的。但是，因為文化革命沒有得到比較深入和持久的批判和反思，其影響至今存在。紅衛兵創造了一種文化，對知青一代是深入骨髓的。前幾年，重慶「唱紅歌」，遍布全國的「廣場舞」，都有著紅衛兵文化的痕跡。

第三，「現代」和「傳統」的糾結。知青一代是在共產黨的「愛國主義」中長大，對現代化有著不可動搖的執著。但是，只要追求現代化，就要接受經濟改革和經濟開放理念，就需要與西方國家打交道，就要面對西方經濟和政治制度和價值觀。於是，需要通過中國自身的「傳統」強化自信和自尊。在這個過程中，如何看待西方民主制度的演變、市場經濟的進步，以及西方價值觀的多元趨勢，是極大的挑戰。在今天世界，每一個人其實都有自己的民族國家，每一個人都應該愛自己的國家和自己傳統，僅僅這樣是不夠的，還必須有全球和人類視角。例如，「現代

化」不再是每個國家的孤立問題，與之相聯繫的「環境」問題就是超越主權的，是全球和人類問題。如何看待人類共同價值和制度的基本選擇，是需要嚴肅探討的。值得提及的是，在知青一代中不少人重新講孔老夫子，講新儒學，但也沒講出什麼新的東西，就在那邊繞來繞去。如像捷生說，知青一代的絕大部分人沒有走出來。

知青一代，經歷了翻天覆地的四、五十年，從衛星上天、人類登月到電腦和網路時代來臨，從韓戰、越戰、冷戰到全球化，從文化革命到改革開放。今後，知青一代還會看到更多的歷史變局。今年是2014年，可以肯定地說，再過個五年、六年、七年、八年，中國和世界會變得很不一樣。所以知青這代人的最大挑戰是如何跳躍出自己的時空限制。

為此，要承認存在保守和守舊傾向，要面向未來，要學習，向年輕人學習、向時代學習、向世界學習。同時，還要承認，知青一代應該退出和準備退出歷史舞台。錢理群說的：「我們的時代結束了」。我認為，知青時代已经或正在結束。今天是大多數五十年代人需要坦然接受歷史的淘汰，為後人當鋪路石。歷史不可以是爺爺統治孫子。

四，良心選擇VS毛式語言

同學問（下文稱「問」）：朱老師，請問知青運動對與您年紀差不多的這一代人在六四的那種表現或者是說反應，有沒有產生過一些影響？另外，您如何看待六四時期那一幫年輕的學生，他們的行為或表現？

朱：你所提出的六四時期那一幫年輕學生，或者說天安門廣場那代人，其實都是六零後，基本上是1966年前後出生的。幾個主要學生領袖都是1966年出生，屬馬，今年都是本命年。當然也有67、68年的，也可能有一些是65年的，一些博士生可能是六零年代初期的。

六零後和五零後差別很大，彼此相差十年至十五年。六零後主體對文化革命記憶主要集中在七零年代，那時的文化革命已經不是初始的文化革命。六零後基本沒有機會成為紅衛兵，只當過「紅小兵」，他們是在《我愛北京天安門》歌聲和《閃閃的紅星》電影中長大，最多參加過「批林批孔」。在文化大革命時期，「紅小兵」是小學和中學，主要是小學的群眾性學生組織，代替從前的中國少年先鋒隊。他們參加了「停課鬧革命」，甚至批鬥教師等活動。由於「紅小兵」年齡所限，對社會的衝擊遠比「紅衛兵」為小。這代人分化的很早，他們中間有過一個叫黃帥的，在文革後期，是「敢於造反」的「紅小兵」典型。「紅小兵」一代是「改革開放」的受益者，有讀書和高考的機會。他們這代人沒有經歷大規模的「上山下鄉」，沒有受過「老三屆」的苦難，自然也沒有經過苦難的磨煉。簡言之，這代人是幸運群體，卻缺乏對中國國情的深刻認知。

然而，正是「紅小兵」一代的佼佼者，即六零後的大學生或者研究生他們主導了1989年的「民主運動」，改變了中國歷史，包括很多五零後，包括我自己命運的軌跡。如今，中國在進入「紅小兵」「治國」的時代，「紅小

兵」已經悄然進入。這是人們始料不及的。

中國長期存在一個悲哀的事情，代與代之間是斷裂的。父輩從來不把真實的歷史和社會體驗告訴下一代；上一代人對歷史積累的東西，不能夠傳承到下一代。文化革命開始時候，家人說：「別參加文化大革命」，「小心五七年反右」。但是，我們對「五七年反右」知之甚少。天安門廣場的一代同樣做了獨立選擇，父兄的影響實在有限。這中間固然有主觀的、客觀的複雜原因，但是，最重要的後果之一又是歷史的斷裂。二十多年過去，六零後早已為人父母，現在的年輕人對他們發起和參與的運動普遍瞭解有限。歷史斷裂，下一代不能以上一代的經驗教訓作為出發點，會造成社會資源浪費，歷史倒退，實為悲哀。

我今天不會也沒有能力評價1989年那場對中國有著重大和持續影響的運動。我只想說：天安門廣場的這些年輕人對與不對、錯與不錯，其實都是次要的。重要的他們是年輕人，他們的生命需要保護。就這麼簡單。

至於我自己，不想說太多，只是說：我的選擇並非那麼理性、複雜和深刻，最終是良心的選擇。在人生的重大選擇時刻，良心是人心的bottom。人生或遲或早，終究需要面對良心。既然做了這個選擇，就要接受因為這個選擇的一切後果，無怨無悔。

孔：回到理想主義話題。其實理想主義沒有什麼很高深、很玄妙的東西，它有一個最基本的判斷，就是關於人的價值、人的生命和最基本的人道主義。所謂知青的理想主義，只要跟這個最基本的判斷對接的話，才稱得上是理想主義。朱老師剛剛不願意回答的那個「改革四君子」的問題，我大略說一下。為什麼改革四君子以後只有一個王岐山進入了權力中心，其他三個人都被邊緣化了，甚至朱老師在黑名單裏頭呢？因為其他三個人都不認同六四屠殺，其中朱老師做出決裂的選擇。這就是他們的理想主義的操守，是他們的底線。像我，在89學運時期，我晝夜守在天安門廣場，就是在六四那夜決定——我要跟這個屠殺學生、平民的政權決裂。這是我的選擇，我覺得這符合我的理想主義，我的理想主義就是要對人的價值與生命，必須符合人道主義。

王：我很認同兩位老師所說的。我先從後來的一個現象說起。大概在九十年代末，我開始進入網路，進入一些知青網站。我發現這些知青網站，不管哪裏的知青網站——主要都是大陸的，他們的觀點或認知都一樣的，都是反對六四屠殺的，而且說話都是很大膽。有的網友就是因此丟掉工作、職位、身分，都毫不在乎。你說他為什麼呢？其實不會有太多非常深刻的思考，只是很簡單的、甚至帶有點衝動性的行為，認為作為人理應如此。或許，這就是體現了你要說所謂的知青的理想主義，在那樣一個時候，自然會有這麼一種體現。

就我個人來說，89學運時期我在深圳。其實一開始，我是不參與的。我捲入運動的過程很簡單：就是打了通宵麻將，頭暈腦脹的要睡覺。這時，兩位年輕老師跑來告訴我，說我們系的一個年輕老師到市政府去靜坐了；那時候本來學校學生撤了，他自己反倒去了。於是，學生就轟動了，就跟去了。我當時有點帶著江湖義氣的想，要救這個老師，我們都應該去，要不學校就要處罰他啊。在那之後，就真有點義無反顧了。我覺得我對得起作為人的一個堅

持。所以一直到後來，六四過後都要寫檢查、寫個人鑑定，我一概不寫，有點豁出去了。那你說，我有什麼崇高理想啊？什麼崇高思考啊？都沒有。所以，回歸到剛才所談的知青理想主義現象來說，我覺得可能是殘留在潛意識的理想主義起作用。這種理想又跟那種被意識形態綁架的理想不同。這理想是要從個人的良心出發的思考。

問：我想請教朱老師，就是您剛才提到毛澤東影響，主要來自其話語體系，那是不是屬於大批判的那種話語工具？還有所謂的紅衛兵的文化影響，可不可以麻煩朱老師為我們進一步說說？

朱：紅衛兵文化，說到底，就是毛澤東所創造的話語、邏輯和思想。在今天的中國大陸，沒有多少人提及毛澤東思想，也不再倡導學習毛澤東著作，但是，毛澤東的話語和思維邏輯，依然處於主流和主導地位。例如，泛政治化是毛澤東的思想遺產，也是典型的紅衛兵文化。

孫玫[3]（下文稱「孫」）：這個問題我也是有些想法。毛的話語，在文化大革命大紅大紫，已經達到極端，但是在極端之前呢，他不是這樣的。據我的觀察，毛的語言有他的魅力。什麼魅力呢？就是明白易懂，草根也能聽懂，直接白話，國民黨沒有。我之前看過一個材料，但不知道真假，就是胡適覺得毛澤東白話文寫得漂亮。他說話你覺得很俚俗，但是老百姓聽得懂，這就是共產黨能把宣傳做得很成功的重要原因。還有形象，因為毛是教師出身，長沙一師的，對不對？我背一段，你們都很熟悉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的話：「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做文章，不是繡花繪畫，不能那樣雅緻，那樣從容不迫，文質彬彬，那樣溫良恭儉讓。」這是排比啊，然後說革命是什麼？「革命是暴動，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暴烈行動」。他這個氣勢很大，而且一聽就懂。什麼「溫良恭儉讓」，這個中國文化都有的東西，大家都懂他說甚麼。他這個東西有很大的煽動性，你在那個意識形態裏就覺得「沒錯，他講得都對的」！那是一個革命的年代，革命是一個暴烈的年代，不矯枉不能過正，是很符合那些激進人的意識型態。他也把很多古的、今的、俚的、俗的融到他的語言中去了。

還有一個很重要就是，《毛澤東選集》的話，是經過嚴格的編輯的，當年呂叔湘這樣的語言學家都參加過編輯工作。毛很懂，他生前，《毛澤東選集》只出了四卷。為什麼？那是打江山的時候為止，1949年以後他一直不出，五卷是他身後出的。因為他自己知道，1949年以後出了很多問題。他要給歷史留下一個經得起時間考驗的東西。當時中學裏教這些馬列、毛澤東思想的時候，國文教師就覺得毛澤東的文章好教，馬克思、列寧的不好教。

另外，毛那一套經過所謂的語言標準化，現在拿來跟原來的文獻對照就不一樣了，因為他改動過。《紀念白求恩》大家都知道的，可是我看過1949年11月《人民日報》上的原文，不一樣的，是《學習白求恩》。他做了很多這樣的修改。我們不去細說了。然後，再加上他大規模的推動，文革的時候，我們不叫「買毛主席著作」，叫「敬請」。那時候全中國沒人有稿費，就毛澤東他有稿費。大批量、大規模印刷，每個人都在學習，這反過來影響了中國人思維方式和語言習慣，所以這個影響是非常深廣的。

朱： 毛澤東代表的共產黨話語系統是個大課題。從五四的白話文運動開始，國民黨和共產黨各自形成了自己的話語系統。國民黨與共產黨話語系統的差別是：國民黨的書面語言和講話語言是分離的，這在蔣介石身上尤其明顯。國民黨的話語系統從來沒有真正「平民化」。至今，國民黨的文宣語言也沒有實現與台灣本土文化的融合。共產黨不同，在其早期就實現了書面和講話語言的統一，以及「平民化」。毛澤東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就是範例。之後，毛澤東的話語系統，包括用主語、動詞、副詞的方式，逐漸成為了共產黨話語系統的主流。毛澤東基本上窮盡了自中國有文字以來好的詞句。可能還沒人做這這方面的統計學研究。這套話語系統還有一些特色。例如，這使用動詞時偏向「提手旁」用字很普遍：搞、打、批。還不夠，還要加個「犬」字旁，文化革命中用的最多的一個字是「狠」。

在這套話語系統的背後，則是共產黨「邏輯系統」。有的學者指出，中國有兩個邏輯：一個是「邏輯」，一個是「中國邏輯」，共產黨的「邏輯系統」与「中國邏輯」有高度的重合率。在中國，進入官僚體系和獲得權力都需要學會這套語系。這就可以理解，為什麼在這個系統裏，秀才、秘書能夠獲得權力，因為他們有精確表達主體思想的文字能力，所以在權力機構上就容易得到更多機會。這個話語系統有自我穩定機制，且慣性非常強，強到很難再建立另外一個更好的話語系統。簡體字加速和固化了這個系統。至少，近年來因為網路，一種新的話語體系正在萌芽。

知青一代無疑是在毛澤東的話語系統中長大的，難以避免與之相連的「邏輯系統」，或者是「思維定式」。這個局限性的後果不可低估。毛澤東的話語系統對台灣也有影響。台北市長柯文哲市長也用「毛語錄」勉勵他的團隊[4]。你看這影響多大？

王：我要補充一點，語言表述跟現實實踐不能等同視之。中國前幾年有一本書，叫做《歷史的回聲》，剛出版不久就被禁了。為什麼被禁呢？因為那本書裏頭刊登的文章都是在宣傳民主、自由、反對獨裁，所以在中國被禁了。這被禁得很荒謬，因為裏頭的文章都是誰寫的？中共中央、毛澤東、新華社。什麼時候寫的？一九四五年左右。這套話語系統多漂亮、道德高度多高啊，沒有任何能超越的了。但是在現在是不能出版的、成為了禁書。所以，這種語言表述跟現實實踐之間，可能要衡量一下。

孫：關於毛澤東的語言邏輯，我再舉兩個例子，毛澤東是和那「中國邏輯」有關係的。毛澤東那個文化大革命造反到底是怎麼回事啊？他說：「馬克思主義的道理千頭萬緒，歸根結底，就是一句話：『造反有理』。」「造反」是老百姓的話，從小孩到大人都會說：「幹什麼？你造反了？」這中國人都會說的話。「造反」在中國什麼意思啊？是否定詞，但是毛把它改成正面意思。不過，馬克思那麼複雜的東西，就歸結成一個東西——「造反」。這裏頭當然就有簡單化和片面性了。他還有一條，他說：「共產黨的哲學就是鬥爭的哲學。」這是他對馬克思主義階級鬥爭學說的一個通俗的概括，這還不太難理解。但是他又說：「八億人口不鬥行嗎？」這就說不通了。這「鬥爭」和八億人口有什麼邏輯關係？不過，他這話在當時強調革命激進的階級鬥爭整個話語裏，就否定不了。毛的話

語裏有大量的二元對立。像是「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們就要擁護，凡是敵人擁護的我們就要反對」，這是荒謬的。因為我們知道，世界上的東西並不是這樣二元對立，但是二元對立非常符合當時的鬥爭哲學。

孔：他的特點，就是他的毛文體啊，那個特點就是，取締了大部分的空間，也取締了你們的思考空間。他基本上是強烈的肯定式和悖逆式。你進入這個話語系統，就只能按照這個話語系統的邏輯去運轉、去思維和行動。典型如薄熙來，就是紅衛兵的語言，毛的文體。他的途徑模式就完全符合毛的邏輯。你現在再去看習近平，也充滿了大量的毛文體、毛式語言，他的思維和行為模式也很多的毛化的痕跡。

朱：我在這裏要提王朔這個人，他有一個貢獻，那就是把毛澤東話語體系中的「痞子」成分放大了，這也是一種顛覆。不過，我並不喜歡他的作品。特別是廣為流傳的《陽光燦爛的日子》，因為，太多不是真實的歷史。

孫：什麼人會超越這套話語系統？有這樣一些人，他們生長在中國大陸，離開那個話語系統之後，到西方留學，回過頭來看，有可能超越。但是，如果一直在裏頭，處於長期封閉狀態，就不可能超越，就像拔著頭髮要離開地球一樣不可能。所以，要走出去，再回過頭來反省，因為有參照系。

朱：每代人都有自己的責任、貢獻和局限性。每代人需要從學習上代人的話語系統開始，最終思想方式都受制約於這個話語系統。即使有限超越，也是困难的。到西方留學，掌握其他語言，確實有所幫助，但不等於就可以超越。我主張認真讀西方經典，這有助於改變思維模式，進而嵌入新的話語系統。知青一代正在迅速老去，形成老年人心態。

與中國西漢漢武帝前後，在羅馬共和國晚期有一個大哲學家、大政治家、大律師、大雄辯家，一個共和國自由主義精神的忠誠辯護者。他在62歲時候撰寫了《論老年》，這是迄今為止的關於老年人問題的最早和最重要的專著。此外，他還寫了《論責任》、和《論友誼》。這在歷史上被稱為西塞羅的《三論》。這一年，他還撰寫了《論神性》《論命運》《論名聲》《論題篇》。第二年西塞羅被其政敵殺害。

走向晚年的中國知青一代，需要有點西塞羅精神，越到晚年越要有信念。

知青一代，「老三屆」要完全與捷生所說的毛文體和毛式語言分離，幾乎不可能。問題是，自己要對此有自覺認識。但是，我終究是樂觀的。因為，所以話語系統最終會發生演變的。

我引用一段我們曾經倒背如流的毛澤東一段話：「一些階級勝利了，一些階級失敗了，這就是歷史，這就是幾千年的文明史」。不得不承認，毛澤東的這段語言乾淨和有節奏。我在這段話的基礎上改動：「一代人出生，一代人死亡，這就是歷史、幾千年的文明史」。我想表達的是，一般來說，只要經過兩代人、最多三代人死亡，歷史一定大為改變。等到整個知青一代退出歷史舞台，進而消失，八零後、九零後，甚至零零後主導中國，中國一定會不

一樣，一定會變好的。這個是我真實的想法。

[1] 孔捷生，老三届知青，1978年以短篇小說《姻緣》初登文壇，又相繼發表了《因為有了她》等短篇小說，上述兩小说分別獲得1978年和1979年度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1979年初發表的描寫海南知青遭遇的短篇小說《在小河那邊》，成為傷痕文學最有代表性的作品之一；日后又相繼發表了《南方的岸》、《普通女工》、《大林莽》等中篇小說，其中《普通女工》榮獲第二屆（1981～1982年度）全國優秀中篇小說獎；曾任廣東省文聯委員、中國作協廣東分會副主席；1989年參與民主運動，6月後流亡美國至今；近年著有《血路1989》、《龍舟與劍》、《易大旗文集》等。

[2] 朱嘉明，老三届知青，1978年考上中國社科院工業經濟研究所後，在完成碩士和博士學位的同時，參與創建國務院技術經濟研究中心，擔任河南省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副主任，中國國際信託投資公司國際問題研究所副所長，中國西部研究中心、北京青年經濟學會、中國改革開放基金會負責人，暨《中青年經濟論壇》主編，為趙紫陽時代「改革四君子」之一（其他三位是翁永曦、王岐山、黃江南）；1989年6月後，流亡海外，1995年獲MIT的MBA, 在多個國家有過創業經歷，2000年以後，先後擔任聯合國工業發展組織的經濟學家，任教於維也納大學，台灣大學客座教授；著有《國民經濟結構學淺說》、《現實與選擇》、《論非均衡增長》、《從自由到壟斷：中國貨幣經濟兩千年》、《中國改革的歧路》等。

[3] 孫玫，文革期間曾隨父母下放，1978年春考進南京大學中文系，畢業後考入中國藝術研究院戲曲系，獲碩士學位後任職於中國藝術研究院，1990年赴美留學，1995年獲夏威夷大學戲劇系博士學位，先後任教於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與紐西蘭威靈頓維多利亞大學亞歐語言文化學院，現為台灣國立中央大學中文系教授，學術專著有《中國戲曲跨文化研究》、《中國戲曲跨文化再研究》、《徜徉於劇場與書齋：古今中外戲劇論集》等。

[4] 毛澤東在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提出：「務必使同志們繼續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艱苦奮鬥的作風。」柯文哲在競選台北市長期間，在競選團隊群組發佈「兩個務必」簡訊，一度引發社會熱議。

孔捷生文集：http://www.hxzq.net/showcorpus.asp?id=220

老例文集：http://www.hxzq.net/showcorpus.asp?id=19

华夏知青网不是赢利性的网站，所刊载作品只作网友交流之用

远逝的是宝贵的生命

“肖去年死在延吉”，久违了的旧日同事在长途电话中告诉了我这样一个既在意料之中，又是我最不愿意听到的消息，这几天只要一静下来我就会想起肖那张白皙而又不失俊美的脸，我的心就格外沉重-------肖死于谎言。

前几年，笔者在看完电视连续剧《孽债》之后，突然有了一种写作的冲动，这或许是肖在冥冥之中给我的托付？我在《蛇口消息报》上发表了一篇《另一种“孽债”》的文章。文章讲的是自己亲历过的一件旧事：七一年，在我的工作的东北边疆一工厂里，一个上调市民兵指挥部的机会落到了一位斯文、木讷、善良的上海知青肖的身上。正在他满心喜悦等待通知时，同室的同乡摔烂他的半导体说他偷听敌台——在那个年代这种罪名是可是判刑蹲监的。在这种打击下，这个一向谨小慎微的小青年疯了，被家人接回了故乡，那年他才十九岁。这二十多年来，白发老母为照料这个疯儿哭瞎了双眼，长兄也因唯一的疯弟的拖累婚姻破裂，前几年身患癌症去世，姐姐已退休难以顾及，而边疆的工厂因效益差早已停发了少得不能再少的基本生活费，也付不起他在上海精神病医院的医疗费，万般无奈亲属将他弄回了他最不愿意回的边疆，将这个包袱推给了工厂，工厂又扔给了当地的精神病院。一个无钱无亲人关爱的远乡的精神病患者又能得到多少关顾呢？不到一年，也就是我的文章发表不久，他就死去了。同事讲肖死时全身没有一块干净处，口中没有一颗好牙，已苍老得像六七十岁的老人，实际上他才四十四岁啊！

就这样一个原本鲜活的生命却因几句谎言开始了长达二十五年牢狱般的精神病生活，年纪轻轻就失去了宝贵的生命；就这样一个原本完整和睦的家族，却因同乡的嫉妒导致亲人因精神病的折腾四分五裂，人去家亡。这不由使我想起哲人的一句话：“谎言能断送一个人的性命，或摧残两个人的生命”。

近些年来，街上流行“老三届”，流行“知青情结”，不仅反映“老三届”、“知青”生活的书籍、影视走俏，《黑土地的回忆》这种展览爆棚，诸如“老插酒家”、“白桦林餐厅”类的饮食业也都火爆，一切有关此类可以煽情的内容都被火辣辣地煽了起来，一些“文革”初期为创造“红彤彤”的社会主义江山，为实现英雄主义理想客观上扮演打家劫舍角色，给校长戴高帽，向师长挥皮鞭的“红卫兵”却因此类忆旧活动的煽情摇身一变，似乎又成了纯洁的羔羊，弄出一副痛苦、痛悲、痛心、痛恨的模样来诅咒那个时代，以此来招徕怀旧的朋友排遣心中半是自负半是不平的心情。这些原本无可非议，也是可以理解的，毕竟受了时代的愚弄。关键是从那个荒谬而又苦难的年代走来的老三届、知青们是否个个都是那么清白，那么苦难重重？是否所有的罪恶都是外部强加进来的。想当年，当知青们怀着狂热的激情时，有相当一部分善钻营熟谙中国基层社会运作机制的年轻人，为了尽量抓住眼前所

能抓住的一切，为此他们不择手段，懂得怎么进攻，如何退却，想尽办法弄通关节，使自己捞到那极有限的返城、升官、入学的机会，不惜自相残杀。我一直认为行贿、受贿，开后门的风气就是那时从农村刮到城市，从边疆吹到全国的。

面对肖的死，面对我们还需完善的法制社会，我不仅想起了自己在《另一种“孽债”》中讲过的话：“我们在抱怨那个时代的种种不公时，有否反省过自己呢？对那个时代的痛苦自己有否有意无意起过推波助澜的作用呢？我们仅仅说是那个时代逼的，是自己生存的需要就心安理得了吗？我们不能回避自身应该勇敢承担的道义和法律的责任，回避对自己欠健全欠高尚的人格的反思”，只有这样才能减少人间悲剧的发生。

保尔说过：“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人只有一次”。尊重、爱惜他人的生命是一个人最起码的道德水准，而“在一切道德品质中，善良的本性在世界是最需要的。”（英国罗素）虽然肖的事发生在二十多年前，但是回头看一下我们的周围，那种以嫉妒之心，以对工作不负责任的态度，以谎言、诬告断送他人的前程，践踏别人的生命的事仍常有发生。这不能不使人发出对善良的本性的呼唤：无论遇到什么样的风雨，为人善心不可丢，善言不可废，善行不可止，与人为善这一做人的原则，应该贯穿人生的始终。维护和倡导善良，珍惜他人的名誉和生命，也是给生命本质的一个基本定位。

（写于1997·5）

华夏知青网不是赢利性的网站，所刊载作品只作网友交流之用
引用时请注明作者和出处，有版权问题请与版主联系
华夏知青网：http://www.hxzq.net/
华夏知青网络工作室

我参观了《与共和国同命运》知青巡展

11月28日下午，我去中国地质博物馆参观了黑龙江省黑河市举办的《与共和国同命运》知青全国巡展。展览分两个馆，五个部分。正如新华社11月21日发的消息所说，“展览通过真人真事的介绍，再现了在艰苦的条件下无私奉献、用火热青春书写壮丽人生的知青群体”，“一幅幅图片再现了在那个火红的年代，知青们勇敢、坚韧、自强不息的奉献精神”。据光明网11月20日报道，此次巡展只是“摘取了知青馆展陈精华。”

人类历史长河中空前绝后的上山下乡运动终于进入博物馆了，若算总帐，当然是得不偿失，其灾难性后果实在难以估算。硬要说收获的话，那就是历史促成了这一代人的觉醒。

可是这个展览只“讲述了知青一代人讲责任、讲奉献的光辉历史，再现了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丝毫没有提到知青运动的负面、以“胜利大逃亡”结束及其反思。在“浴火凤凰”部分，依次展示了为抢救电杆牺牲的金训华、抢救羊羔献身的张勇、为扑灭草原大火的69位英灵和黄山茶林被洪水冲走的11位烈士等等的事迹图片和文字，却只字未提相关的责任和教训。感谢主办方，坦陈北大荒为救火而牺牲的女知青张梅岭，事后马上被追认为中共党员，可是一同牺牲的李晓华却因出身不好，直至1983年才被追认为烈士。在展示的“大规模上山下乡阶段”优秀知青中，周秉建和周秉和首当其冲，“知青的贡献”“赤脚医生”板块里，却没有作出过巨大贡献、深受贫下中农欢迎和爱戴、享誉中外、被周总理关注并表扬因而在知青赤脚医生里绝对是No.1的孙立哲，是因为粉碎四人帮后他被审查过吗？

1973年毛主席给李庆霖的复信在该展览中不见踪影，我以为这是上山下乡运动中最重大的事件之一，毛在那封信里未再提“大有作为”和“再教育”，而只说吃饭问题：“寄上300元，聊补无米之炊。国内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在毛那里，上山下乡起于大有作为，终于生计问题了。

展览中最使我感动的是“终生不了情”部分，该部分展示了知青与农民结下的深厚情谊。当年，我们知青不同于干部下放、工作队下乡、记者采访和作家体验生活，我们的生存方式和生活状态已与贫下中农无异，我们学会了从底层农民的角度观察世界、判断是非，与农民置身同一地位面对共同的利弊得失和进退取舍。尽管因为农村封闭落后、生产力极度低下、空间极其狭小，也因为价值取向的不同和实际利益的纷争，我们中的一些人和农民发生过这样那样的冲突和碰撞，但在更深的层面上，知青是和广大农民血肉相连的，因而我们有着始终难以割舍的对底层的深切关注和对农民的深厚情怀，这些年知青绵绵不绝的探访第二故乡潮，就是其体现。有人反感我们知青经常提

到的“知青情结”，其实知青情结除了指几十年来形成的存在于我们知青间的精神暗合与相通外，就是我们共同的对曾收留过逆境中的我们、为我们作出过牺牲的朴实的农民的关注与情怀了。

在当年我们插队知青的小环境里，我们几乎不受组织行政的控制，无需接受强制性洗脑，思想和言论的自由度都高于其他国民。我们以落魄的境遇、玩世不恭的心态往来于城乡之间，以黑色幽默调侃官方宣传、传播社会真实、启动思想自由。我们是当时的社会政治条件下最不安分、最希望打破现存秩序的群体。正是这道特别的风景，为我国后来的改革开放在广阔的社会层面涂抹了底色。

回城就业后，我们中的大多数以曾经沧海的底气在单位里成了中坚和骨干，其实这包含了正反两个方面：正面的是知青经历铸就了我们坚毅不拔的性格和吃苦耐劳的精神；负面的则是我们有时做起事来，难免运用我们曾在夹缝中艰难生活而积攒起来的“生存智慧”，不问道德、不守规矩、没有底线，这最致命也最令人反感，是我们时时刻刻都应特别应该注意改正和防范的。

一个小小的展览不可能涵盖众多深层的东西，我们也绝不应对这样的展览求全责备，这正是我在犹豫再三之后才写这篇博文的原因。但当组织有关知青运动的活动时，我们难道不该守住“基本否定”的底线？而我们知青难道不应该义不容辞地担当起揭示上山下乡的历史真相，防止悲剧重演的责任，让我们的民族远离野蛮和愚昧？

至于展厅正中显要位置展示了巨幅的曾是知青的政要习、李、王、张的内容，我就不做评价了。据悉，“展览期间，将于12月22日、12月26日相继在中国地质博物馆报告厅举办纪念中国知青上山下乡45周年学术报告会和纪念毛泽东主席诞辰120周年报告会暨《与共和国同命运》全国巡展北京展闭幕式”，我因已定好回程机票，将无缘参加。

2013-11-30

唐燕文集：http://www.hxzq.net/showcorpus.asp?id=247

华夏知青网不是赢利性的网站，所刊载作品只作网友交流之用
引用时请注明作者和出处，有版权问题请与版主联系
华夏知青网：http://www.hxzq.net/
华夏知青网络工作室

叫一声知青，真的很沉重！

一、认清自我，赶紧自拔

知青是什么？这两个字将在时间的推移中逐渐成为词典里的一个老名词，一定会渐渐地被人们遗忘！包括由这两个字引申出来的上山下乡四个字。

如今在一些茶楼饭馆里喝酒聊天的老人们依旧是激情昂扬，甚至还会拳脚相交的一定是曾经的知青；在一些不太知名的舞台上穿着绿军装、跳着“忠字舞”、高喊“青春无悔”的一定是当年的知青；在夜间的大街小巷旁大妈们跳着广场舞的人群中部分是曾经的知青；棋牌室里通宵达旦战斗的人群里有着相当比例的人曾经有着知青的经历；农家乐里喝的醉醺醺的人继续趴在麻将桌上的还是知青……。

当然，也有在书屋里沉思、反思的知青，有自办论坛回忆与谈论上山下乡历史的知青，还有写书出书忙的不亦乐乎的知青等等。也有个别的知青在博客、微博里大谈上山下乡的“伟大意义”、“时代意义”以及丰功伟绩等等。

法国学者潘鸣啸写了一本书《失落的一代》。很快就有知青出来指责：我们怎么是失落的一代呢？我们是为共和国挑起重担的一代，不许贬低我们！更有甚者认为：“那些否定上山下乡的人，尽管论调有所不同，但其根本原因，一是不懂历史，二是怕苦怕累，世界观有问题。”（《浅论上山下乡的时代意义》网易博客·北风）

那么，知青究竟是什么呢？发生在“文革”期间的上山下乡究竟是怎么回事情？看看我们这代人的经历大致可以略知一二：

成长阶段，我们朦朦胧胧地被教导着阶级斗争的存在，新社会的红旗下不是天下太平。有了饿肚子的经历，还是被教育这是暂时的，社会主义是伟大。没有多久，一场罕见的“革命”彻底改变了我们的人生。

青春时期，我们充当了“革命”的马前卒、急先锋。不能读书，大扫“四旧”；学习语录，揪斗老师；戴上袖章，造反有理；无法无天，不可一世；打砸抢烧，践踏人权……。很短命的疯狂，被一句“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所结束。没有了使用的价值，剩下的就是如何被发配了。

就业期间，从城市被驱赶到了遥远的边疆和偏远的乡村。在“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这个新名词下，我们人

生的轨迹中有了整整十年的乡村生活。一场浩劫，国不将国、民不聊生，领袖们已奄奄一息，窥视者虎视眈眈，争权夺利的硝烟下谁还会顾及到我们这些远离城市的苦难孩子啊。

成年阶段，我们终于靠自身的奋起中和有良知的领导人的默许下，灰头土脸地回到了已经陌生的城市。迎接我们的是冷漠的眼光加上狭小的居室，甚至是无居无室。需要成家立业，需要孝敬父母，需要安居乐业，但是我们走过了一条常人无法理解的艰难之路。有所谓的成功者，更多的是沦为城市里的弱势群体。这就是我们这些人的结局！

对于这一代人的自我认识是时候了！不能清楚地认识到自身的位置，整天在沾沾自喜、自得其乐，今天纪念这个、明天歌颂那个，被人卖了还在为他数钱，这是最为可悲的。就像白桦老师说的：“中国人开始在泥淖中拔自己的麻木的腿脚了，虽然拔得很辛苦！”（白桦：《八十年一梦》2011年10月24日在香港城市大学的演讲）

在无法真正认识自己的时候，就会出现许许多多令人咋舌的奇闻。特别是已经到了晚年的知青们，还是有一些人昏昏沉沉地活着。自以为是，自鸣得意，自我唯大，结果一定是自欺欺人！如此怎么不沉重啊！

二、先天缺钙、难以自拔

有一位知青朋友在我的博客里留言说道：个别的知青鼓吹阶级理论、斗争学说更加肆无忌惮。真的是“有病的知识老年”啊，当年的“知青”，如今的“痴老”！

从1966年“文革”开始，我们这代人被剥夺了读书学习的权利。文化的缺失可以在后天弥补，但是幼小的心灵里埋下了一种仇恨的种子是极其可怕的。恰恰我们轮上了！

“文革”前我们在学校里接受的教育更为严峻——

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等着我们去解放。支援朝鲜人民、支援越南人民、支援古巴人民、支援阿尔巴尼亚人民、还有亚非拉许多国家呢。在支援中，我们将失去锁链，得到了全人类的解放。何等的气概啊！

帝、修、反亡我之心不死，蒋介石随时准备反攻大陆。那些周边的国家，如日本、南朝鲜、菲律宾、泰国、印度等等跟着美国在我们国家周围形成包围圈，企图让我们回到旧社会。美国的u2型飞机老是来侵犯大陆，台湾已经成为美国第七舰队的港湾，趁着我们遭遇自然灾害，派遣了不少特务来大陆搞破坏等等。

隐藏在国内的阶级敌人人还在心不死，一有时机就会出来搞破坏等等。一切热爱党、热爱毛主席的孩子们一定要提高警惕，保卫红色江山千秋万代永不变色。

一颗捍卫伟大领袖的火种在不断被点燃，一种对于阶级敌人的仇恨种子到了要爆发的时刻。

这时，伟大领袖一挥手，“文化大革命”爆发了。

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把这种对于敌人的恨提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可以随心所欲地跑到陌生人家里去抄家；在路边可以随意用剪刀把一些人小裤腿剪掉；可以让那些穿了漂亮皮鞋的人勒令起脱下鞋子；对于老师以及那些“当权派”们揪斗……对被斗的人罚跪、搞喷气式、抄家、戴高帽子、挂牌子。一句话：恨！

但是恨什么呢？

理由很简单，这些都是“四旧”，这些人都企图走修正主义的道路，这些人都是反对毛主席的。

恨的之风很快夹杂着大规模的武斗。棍棒、长矛、藤帽直至步枪机关枪加上迫击炮。

在阶级斗争的疾风暴雨中成长的。骨子里残留着那个时代的烙印，时不时地就会在合适的条件、适宜的温度、适当的环境里得到爆发。这不是危言耸听啊。看看当年那个红卫兵薄熙来就可以知道这样的可能确实存在。

斗争的种子换来的是什么呢？对于领袖的愚忠，缺失了自我的思维。自己没有了脑子，就会帮着出卖自己的人数钱。

先天种下的这种仇恨的种子、阶级斗争的种子培育出一种敌对思维，随时会冒出它的果实。可悲的是在曾经当过知青的人中间，依旧在散发着“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理念，在重复着当年的陈词滥调的基础上挥舞着棍子：如“否定上山下乡的人，尽管论调有所不同，但其根本原因，一是不懂历史，二是怕苦怕累，世界观有问题。他们总是过多地考虑个人得失，而不是党和国家的利益放在首位，这种狭隘的思想阻碍了他们正确分析判断问题。要解决此问题，我建议他们补上一课，多看看毛泽东《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等著作，大有必要！”（《浅论上山下乡的时代意义》）

《中国知青史·大潮》的作者刘小萌教授发表在《共识网》上的那篇《不要美化“上山下乡”》一文（2014年3月26日），旗帜鲜明地对于上山下乡作出了否定的结论，在这些人眼里是不是“一是不懂历史，二是怕苦怕累，世界观有问题。”呢？

刊登于《中共党史研究》2013年9期上的郑谦教授写的《“文化大革命”中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五题》（《共识网》2013年11月7日转载）一文中指出：“如同‘文化大革命’一样，上山下乡的意义正在于它的不成功，这使它成为改革的催化剂。”按照那些不许否定的观点，这些客观公正的论述会不会也是不懂历史和世界观的问题呢？

再早，张化教授写的《试论“文化大革命”中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一文明确指出：“‘文化大革命’中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给我国历史带来了影响深远的不幸后果。”这样的结论难道也是不懂历史、甚至是别有用心了？

诸如《中国知青史》、《失落的一代》等大量的关于知青上山下乡研究的书刊的作者们是不是都存在“狭隘的思想”？是不是都要“补上一课，多看看毛泽东《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等著作，大有必要！”？

刘小萌教授在《不要赞美上山下乡》一文的这段话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这些人真实的一面：“在至于那些为文革正名、为上山下乡运动正名的文革受益者们，包括当年知青中的个别风云人物，我也想在这里说上几句：如果文革的那套没有结束，就是全国人民遭殃之时，也就是他们的利益被进一步放大之际。他们的利益所系，他们的人生价值，都是与文化大革命、与毛左联系在一起的。这也是他们迄今仍对毛感恩戴德的原因之一。……我想对他们说的是，人生留给你的时间已经越来越少了，如果想得到宽恕的话，最好抓住最后的机会给历史一个交代，至少不要再去唱什么高调，不要再去蛊惑年轻的一代，如果这样下去，就叫错上加错了。”

沉重吗？真的很沉重！说出这些荒唐的话语的人是知青啊，是经历过“文革”期间上山下乡的一些人。面对着至今还活在那个年代的老知青们，我为你们惋惜啊！醒醒吧！

三、走火入魔、忘记苦难

在这些人眼里，谁要是对当年的上山下乡说声不，那简直是一个天大的问题了：“他们也许否定上山下乡是假，否定我们现有的社会制度才是他们的根本目的。”

上纲上线到了如此高的地步是常人很难理解的。这样的口吻在“文革”期间姚文元之类的文章里常常会看见。

那么，上山下乡究竟是什么呢？知青是什么呢？

在这些人的眼里：“在上世纪那个特殊年代，有许多知青要求上山下乡，这是他们认真学习毛泽东思想，学习雷锋等英雄人物，树立正确的人生观的结果，因为农村比城市艰苦，这是不争的事实。要求到农村去，就意味要吃苦，没有一种精神准备，肯定是不会去的。”（《浅论上山下乡的时代意义》）

果真是这样吗？刘小萌教授希望“至少不要再去唱什么高调，不要再去蛊惑年轻的一代”，看来不是空穴来风的。那时是许多知青要求上山下乡吗？是学习毛泽东思想和雷锋的结果吗？

知青，全称叫知识青年。就是“文革”期间毕业的或者没有毕业的、属于城市户口的初、高中毕业生，被下放到农村与边疆的学生。

“知青”还应该包括“文革”前下放的、支边的、到农垦的知青，例如去新疆的知青。都是在1949年建国以后

从城市到农村去的学生。

1968年12月21日毛泽东发出了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收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的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的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

毛泽东的指示改变了整整一代城市青年和数千万城市家庭的命运，造成了中国近代历史上的一个个令人酸楚的名词：知青和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等等。

那时，所有的学生别无选择，只有上山下乡。就像别无选择地参加"文革"一样，这就是当年中国人的现状！

"革命"终于来到自己头上了。两年前还是趾高气扬地揪斗"地富反坏右"、"叛徒、特务、走资派"的红卫兵们，此时此刻终于感受到了被抛弃的苦楚。

上山下乡，别无选择——

第一，往哪里逃？那时全国都在动员上山下乡。不光是北京、上海、广州这样的大城市，就连遥远的新疆、西藏的小城市里也在搞上山下乡。这是伟大领袖的"最高指示"，谁敢违抗？！那时绝对不像现在这样可以自由流动的。你要离开城市，有没有全国粮票？吃饭要粮票的，各地有各地的粮票。你没有粮票跑到外地不是去饿死吗。再说，那时住旅馆都要介绍信的，你一个学生摸样的人跑到陌生的地方必定是一个可疑对象。没有任何介绍信，你睡到哪里去？冻死！户籍、粮食一管住，全国所有的人都被牢牢地限制在一个固定的区域，只许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这就是自1949年以来计划经济的一大功绩，也是执政者曾经引以为自豪的"社会主义"。那时正处在"文革"期间，任何地方的人都是被唤起的革命警惕性人们，阶级斗争的弦绷得紧紧的。你往哪里跑？只好在城里等待命运的安排。

第二，不去不行！那时上山下乡有这样几种情况。一是自觉自愿的，高喊口喊紧跟的是少数。为了表现决心，写血书的也有。十年后，这些积极分子也随着大返城的浪潮回城了，没能坚持下去，一句话：假的！二是无可奈何随大流的，这是大多数。没有办法不去，只好在去的地点上进行选择。首选是上海近郊的农场，只是少数，其次是外地的军垦、农场，生活有保障嘛，剩下的只能到外地农村插队落户了。三是坚决不去的，是少数。怎么办？学校的工宣队和那些老师们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办学习班。一大帮子人跑到你家里，读毛主席语录。弄的你吃不了饭睡不着觉。门口还组织人敲锣打鼓的，吵得你不得安宁。什么时候肯迁户口上山下乡了，学习班就胜利结束了，毛泽东思想取得了又一次伟大胜利了。还有更绝的，孩子不肯上山下乡，就派人到父母的单位里去。有"把柄"的就揪斗，说是破坏上山下乡，没有问题的就教育，轻则扣罚工资，重则可以加上破坏罪名。这样一来，看你还敢不敢对抗。这一套似乎今天还有效，例如动拆迁，你当钉子户，就跑你单位上去"闹"，搞的你灰头土脸的，只好乖乖地

就范。唉，真是一脉相承啊！

第三，被迫就范。就像今天一样，老百姓嘴上说的与心里想的不是一回事情。面对高压而来的最高指示，只能坚决拥护。不然就会被当做破坏上山下乡的“反革命”抓起来，专你的政！谁说不明白上山下乡以后将来是怎么回事情。还能不能回来呢？到底去多少年呢？还会不会有读书的机会呢？这样的就范为以后爆发的知青大返城埋下了“种子”。很简单的道理：种豆得豆，种瓜得瓜！

《共识网》在2012年11月22日和23日刊登的乔海燕一文《我绝不承认知青经历是财富》，是乔海燕与潘鸣啸（《失落的一代》作者，法国人）的对话。在讲到上山下乡时有这样一段对话——

乔海燕：反正我不是自愿的，这是肯定的，我绝对不是自愿下乡的。尽管现在有人说青春无悔也好，说苦难期财富也好，说什么都行，但是如果让我再选择的话，我绝对不会选择知青这条路的。因为我有我的理想，我有我的追求，我可以用我的知识，我可以用我其它的能力为这个国家作出贡献，但没必要下乡去干活，养猪养牛。下乡受的苦不是你们所能想象的。用这个办法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不是一条正常的路，一个国家正常的路应该是给青年一条大家都知道是什么样的路。

潘鸣啸：我完全同意，从我的调查来讲，我觉得大部分人是不自愿的。可是有一段时期，在1967年、1968年有一部分是自愿的，但那是因为他们对红卫兵运动失望了，已经走投无路了，看不到什么未来了。所以他们听到毛主席说要工农兵相结合，到农村，他们就要表达自己革命的理想，所以下了乡。可是那个时候也有一部分是半自愿的，为了这个理想自愿下乡的知青是有的，可是是少数，也只是很短的时期，大部分青年知道农村的情况是怎么样了之后就没有真正自愿的了。

这个对话值得看看。

专政——严格控制的户籍制度，配套的口粮、副食品、布票等。所有人的一切被控制了，你无路可走，只能乖乖地顺从。这就是我们曾经经历的毛泽东时代！好在这个时代结束了，一去不复返了！

可惜啊，发出否定上山下乡就是否定现行的制度的话，就是当年上山下乡的一位知青。

当年的一切你难道都忘记了？

四、赞美苦难、卑劣可耻

现在有些人经常挂在嘴边的是：苦难是财富。在他们眼里，我们这代人当年的上山下乡是苦的，但是增长了才干、懂得了珍惜、了解了中国等等。照此逻辑：上山下乡（包括“文革”）是正确的。更有甚者还例举了这样的例

子："其实我认为吃点苦并不全是坏事，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变为好事。我听人说，当初上海66届下乡时，因为不是'一片红'，有不少人是留在上海工作的，现几十年过去了，回过头来看，发现留在上海的人没一个上大学，反而下乡的人都上了大学。目前的情况是，下过乡人的境况相对要比留在城里的好，这说明什么？"（《浅论上山下乡的时代意义》）

真的是不懂历史的无知啊！1977年恢复高考以后，在城市工厂工作的青年中有不少人考上了大学。我不知道讲这些话的人的这个依据从何而来？留在上海工作的66届学生，包括老三届城市工作的人中间，在恢复高考以后进入大学的不少。作者连这样的事实都看不见，举出这样的例子来证明自己的观点，滑稽又可笑。还有就是什么境况好与坏的标准是什么？大千世界，人们生活的好坏，"境况"是由各种因素决定的。绝非什么下不下乡过的是一个因素。看看绝大多数下乡的知青，在回城以后面对新的生活那种无奈吧。就业，因为没有一技之长只能从事那些工作？下岗，还是因为"文革"期间被剥夺了读书的权利，没有文化跟不上飞速发展的形势，在网络时代成为落伍者。弱势群体里有着多少无奈的知青啊！所以，这个下过乡的现在"境况"要比没有下过乡的人好的结论，只是作者的主管臆造！既然如此，为什么不让你的子女再度下乡，这样今后的境况会好。如此一条康庄大道，不去继续走下去太可惜了。

考上大学，今日生活过的很好。尽管这些都是假话，但是他们的理由是："说明艰苦能激发一种斗志，一种上进心。"

什么是艰苦，尤其是在文革期间的上山下乡的所谓"艰苦"究竟是什么？

一九七二年，安徽某县首次由贫下中农推荐上大学，全县数万知青展开大规模竞争，最终有七十余人获得这天大的幸运。在进行上学前体检时，妇科检查的医生惊讶地发现，七名女知青没有一名是处女，而且几乎全都不是陈腐性裂痕。

当年上山下乡的时候，知青们遭遇的苦难。女知青们是以肉体为代价换得一张离开农村的通行证的。从一九六九年到一九八零年，全国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包括所谓回乡知青）达数千万之众，其中有一半是女知青。在这上千万女知青中，遭受色狼奸污的其实无法统计。在1973年6月全国知青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召开前，国务院知青办曾对各地知青状况进行了摸底调查。根据24个省、市、区的不完全统计，1969年至1973年5月，全国共发生迫害知青案件2.3万余起。其中，奸污女知青案件约占70%以上。

看看有知青上山下乡的地方：辽宁省1968年至1973年，共发生摧残和奸污女知青案件3400多起。四川省3296起。河北省，仅1972年迫害知青案件就126起，其中奸污案119起,占94%。黑龙江兵团发生奸污女知青事件365起；内蒙古兵团被奸污的女知青达299人，罪犯中有现役干部209人。云南兵团奸污女知青事件139起；广州兵团奸污女知青事件193起，其中涉案师级干部2人，团级干部38人。云南生产建设兵团赴上海汇报团汇报材料中提

到：据不完全统计，上海女知青被奸污96人。

在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第十六团共二百余名现役军人，先后判刑及处份的三十余人。也就是说有15%的官员好这一口！

知青作家刘晓航撰写的《我们要回家》一书，在讲到云南知青忍无可忍“揭竿而起”的时候，用了大量的篇幅讲述了女知青被蹂躏的事实。揭露出来的奸污女知青的手段之恶劣，也令人发指。被奸污的女知青身心受到严重伤害，有的留下妇女病，有的终身不育，有的成了精神病，有的成了性冷淡……所有被奸污过的女知青心灵上都会有一块永远无法痊愈的伤痕。

请问，这样的苦难能够激发起人的上进心吗？

1973年7月4日，新华社《国内动态》第241号刊登了一篇题为《关于云南生产建设兵团摧残迫害知识青年的情况反映》：云南生产建设兵团四师十八团对有缺点错误的知青，采取捆绑吊打手段进行迫害。据1972年4月统计，该团被捆绑吊打的知青达99人，许多人被多次吊打，捆绑吊打的手段有29种之多。绑捆吊打知识青年在我所在的云南军垦的不少连队已成家常便饭。一些营和团部动不动就重刑折磨犯了点小错误的知识青年，几乎每个连队都开过知识青年的批判大会，进行人身侮辱。

难道都忘记了？难道这样的上山下乡能够“激发一种斗志，一种上进心。”

除了对于这样论调的个别知青感到悲哀以外，剩下的要对讲这样话的人说一声：你无耻！因为你在歌颂苦难！

五、失落一代，浩劫造成

为了维持这种谬论的“正确性”，居然连起码的历史事实都不顾到了说谎话的地步——“那种认为因为上山下乡耽误了个人的学业，听起来有点道理，但无事实根据，只是一种主观意想。”（《浅论上山下乡的时代意义》）

错了，不是上山下乡！是“文革”，难道忘记了1966年夏天的停课？

知青作家张抗抗在《知青们，别再说什么“青春无悔”了》一文中的一段话：“不要再用‘知识青年’这样自欺欺人的词语了吧？能不能平心静气地抚心自问：我们这一代中的大多数人，可曾真正拥有过文化和知识？如果我们敢于正视自己，我们应当承认，老三届这代人中高中生的比重只占很少的一部分，大都是初中文化程度，而文革前的初中教材，过分强调意识形态的灌输，在知识结构上具有极大的缺陷。我们知识沉淀最‘厚’、烙印最深的那部分，并非人类优秀的经典文化，而是‘阶级斗争’、‘知识无用’、‘革命的螺丝钉’等教条主义，是红宝书的语录，是样板戏的歌词，是大串联中抄写的大批文章。有人说这一代人是喝‘狼奶’长大的，其实还应加上泡饭和

咸菜——蛋白质含量太低。我们的大部分知识，都是在‘文革’结束后，依靠顽强的自学，支离破碎地拼凑起来的。所以也可以说，这是严重贫血的一代人。不要再仅仅说我们这一代人是‘文革’的牺牲品，是政治的殉葬物。”

“我们被耽误了！”这是“文革”后我们回首走过的路发出的一声叹息、一声无奈的自嘲。

历史明明白白地记载着：1966年开始的“文革”，正在学校里的所有学生都被告知不要读书了，都要关心国家大事，参加文化大革命了。这是一个在没有战争情况下，全国的学生可以不读书，甚至不许读书的国家，我们是在创造了“世界奇迹”。

在“文革”结束以后，人们发出这样的感叹，一代人被毁掉了。毁了什么呢？因为没有经过系统的学习，这代人里很难出现科学家。在国家恢复秩序以后，人才出现了一个断层啊！

不是我们这些人不要读书啊，是那个时候不许读书啊。无法无天地剥夺了我们读书的权利，谁为此道过歉？！没有！如同一阵风一般，吹过了去了，完了，结束了！剩下的就是你们自己去舔舔心灵的伤口吧。

就是在这样的悲剧面前，为了转嫁危机，为了掩饰浩劫带来的国穷，将我们这些“负担”统统驱赶到了农村边疆。我们是在无法读书、无法好好读书、无法真正读书的环境里被荒废了几年以后，迎来了上山下乡的洪流。当这股被称之为“接受再教育”的运动开始以后，除了少数在那个年代被所谓的“革命”激发起来的人是自愿去接受再教育以外，我们基本上都不是自愿地离开了父母和兄弟姐妹，走向一个遥远、陌生的地方。这是“在广阔天地炼一颗红心”，是“改造世界观”的必由之路。那时就是在这样的宣传鼓动下，形成了人类历史极其罕见的大迁移。

“文革”期间的上山下乡运动是把国家发展最宝贵的人才资源退回到农村边疆原始劳作，造成了国家人才接续严重断捻。如今，你们时不时会嘲笑我们这些老头老太，没有文化、不懂外语、看不懂电脑。这个原因很大程度上是国家造成的。假如没有“文革”，国家不会动乱，人民不会遭殃的，知青这一代不会“淌17世纪大汗，抡18世纪大镐，修19世纪土路”

裴毅然先生发表的一篇文章《落在历史凹陷处的“知青”一代》（刊登于2013年11月21日《共识网》）就是讲了这些事情。他说——

“60年代长身体的时候没吃的，赶上大饥荒；70年代要读书的时候，上山下乡，没书读了；到了80年代，可以读书了，又过了年龄。……民间还有一条顺口溜：毛泽东叫我们下乡，邓小平叫我们下海，江泽民叫我们下岗。‘4050部队’的活生生体现。也许说得不太完全，但基本概括了我们这一代大多数知青的命运——净走在历史的凹陷处。”

现在说我们是失落的一代，一点也没有言过其实。

可惜啊，个别的知青忘记了。是不是1966年开始的浩劫时他还在读书？没有荒废？这样的记忆真叫人心痛啊！

六、无知无识、谎言连篇

先天缺钙以后还自以为是。对于上山下乡没有一点反思，相反地还在歌颂。歌颂什么呢？说上山下乡具有时代意义，是缩小城乡差别的伟大举措。

文革期间的上山下乡为什么会发生的？这个特殊时期对于我们这代人意味着什么？按照作者的逻辑推理：实现共产主义必须要消灭城乡差别，消灭这种差别一定要有人去农村传播城市的先进理念和文化。所以，知青上山下乡是很有必要的，正确的，必须的！照作者的逻辑：文革期间的上山下乡不是因为一场浩劫以后无法安排三届学生的就业问题而无奈地采取的措施，而是一场缩小城乡差别的运动。如果是这样，文革的上山下乡没错，文革就根本不是一场浩劫了？1600万人被迁移是完全正确的？

为此，这些论调的发明者举例说知青到农村的时候，农民们不懂洗脸、刷牙、穿衣。是知青们来到农村带来的先进文明，农民才从愚昧中得以解放。由此证明知青上山下乡是正确的。知青成为“救世主”了。可惜的是在我们大返城离开农村的时候，农村的愚昧落后的现状改变了多少呢？要说农村真正的改变还是在改革开放以后才发生的。这是不争的事实！在肚子都填不饱的年代，让穷困的农民养成城里人一样的生活习惯，简直是天大的笑话。为何不去追究造成解放十七年后依旧落后的原因呢？一大二公、大饥荒等等，难道都忘记了吗？知青到农村带去的仅仅只是一种先进文化的“启蒙”。这样的“启蒙”是无法根本改变农村落后的面貌的。真正实现城乡间的差距缩小，唯有改革！今天在中国农村发生的变化说明了这一点。只有对于历史知识的无知导致了有这样的奇谈怪论。

难道忘记了知青上山下乡给整个国家带来的国家不满意、农民不满意、知青不满意、家长不满意的事实？这才是真正的不懂历史、回避历史。上山下乡既然有如此的时代意义，你回城干啥呢？你已经用“脚”回到了城市的实际行动告诉了我们，既然知青上山下乡有缩小城乡差距的功能，你为何不坚持下去呢？如今个别的老知青大讲上山下乡是正确的，必要的，但是在实际行动上自己早就拔腿离开了农村。口是心非啊！真的很虚伪！

稍懂一些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全国农村自三中全会以后的大变化是从农村大承包开始的时候，正是知青大返城的高潮。都走了，留下的寥寥无几。这就是知青们留给历史的真实。是1978年三中全会对于未来道路开创之举，思想的解放带来的新的春天之感；有着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种种举措带来的变革欣喜，包括89年的风云突起；有着九十年代全民“闷声大发财”的经济变革体验，开始了下岗回家的痛苦磨练；有着新世纪和谐社会建设、经济跨越发展的期盼，也目睹了腐败丛生、民怨沸腾的局面。

我们经历了苦难，不忘苦难是一回事情，不赞美苦难是个态度问题，追根寻源则是我们亲历者的责任。如果对于自己曾经经历的往事，都说不上因为与所以，你不是在稀里糊涂地活着？

清醒地认识自己、认识社会是清醒地活着的前提啊！

很可惜，我们这代人中间有着相当一部分的人，至今到老了还没有醒悟，还是不愿意认真反思。还是在“装睡”。这些人认为“以知青问题为突破口，恶意攻击我们现有的社会制度的别有用心者不是没有！”。法国人潘鸣啸写了一本书《失落的一代》，他承认没有很好看过此书就对“失落”二字表示反对。甚至引申到了这是西方势力“亡我之心不死”的高度来进行抨击。

所以，知青啊，叫一声真的很沉重。集中的表现就是对于自己曾经遭遇的苦难忘记了！对于为什么会造成如此苦难不去追根寻源了！乐得安享其成地活着，是很悲哀的一件事情。“文革”的重演就会有重新再演的土壤。这些都绝非危言耸听啊！

“这段历史在人类社会史上都是沉重的，对它的无知，将来会承担代价。”《中国知青史》的作者刘小萌曾不无担心地说。

刘小萌教授曾到台湾东吴大学担任客座教授，在教授大四学生《中国现代史》课程的时候，他惊讶地发现，对于知青上山下乡，台湾学生比大陆学生要了解更多。

“知青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中的一个大事件，参与者保守数字是1700万，不用说社会普通大众。即使这1700万人中，真正了解和认识这段历史的有多少？台湾的、海外的人们对这段历史更了解，但我们当事人的后代反而隔膜，这是非常可怕的。”刘小萌说。

七、老了，绝不贱卖灵魂！

知青这代人除了极少数的幸运儿。绝大多数命运坎坷。在改革开放之前，我们都在上山下乡，与红土地、黑土地、黄土地打交道。除了付出你的体力，剩下的就是迷茫地活着。回城以后就是改革开放前期，那是个讲文凭的年代，我们缺乏优势。我算是幸运的，考上了大学，取得了一份好工作的“入场券”。大多数的知青朋友没有这样幸运了。十年前读的书早就在“广阔天地”里消耗殆尽了，那什么去再读书呢。那时刚回到城里，遇到的住房、就业、成家等等问题，还有多少人能够从容地去课堂里安安心心地读书呢？当社会进入到市场经济讲竞争拼搏时候，年龄和家庭负担，让我们力不从心。下岗失业、再就业，干着社会上被人瞧不起的工作，为了养家糊口，为了活下去！在苦苦熬着等待退休。因为微薄的退休金要比干活时的收入还要多啊。

确实有极少数的人成为“成功人士”了。你们可以说，现在的国家领导人中间有不少是当过知青的，各级官员中也不少。但是，这是极少数。这里既有自身的努力，更多的是机遇。对于我们这代人来说，不是你努力了就可以成功的。那时，国家行为不允许你再读书了，只许你去与泥巴打交道了，你就是有天大的本事也是无法改变这一切的。人的成长，外部的环境和条件是必不可少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整整十年的浩劫葬送了一代人，使国家在人才上呈现了一个断层啊。

我们这代人开始淡出了人们的视野。但是依旧在用另一种方式顽强地表现自己，不甘寂寞。如今，大家结伴旅游，喜欢到农家乐去玩玩。有了相对空闲的时间和经济实力，乘着还走得动结伴旅游有上升的趋势。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都有知青们的踪迹。较为突出的是知青结伴前往曾经插队或农场的地方旅游。这样的活动既有旅游的成分，更多的是对于往事的回味。我在一份关于知青活动的调查问卷里是这样总结的——

联欢会：唱歌跳舞诗朗诵，自娱自乐自安慰。

聚会：吃吃喝喝老一套，天南地北瞎吹吹。

旅游：三五成群自助游，大江南北留踪迹。

度假村：场地住宿有保障，麻将扑克战通宵。

知青专列：故地重游叙旧情，费时费力难组织。

读书会：阳春白雪难召集，老人读书难聚集。

网站、博客：现在能够联系知青群体的是靠着网站，还有一些群体博客，但存在阅读人群的局限性。

结论：不乐观。未来知青活动的主要内容是多样化，形式是小型化。随着时间的推移将会渐渐自生自灭。

这些看法对不对呢？至少说明了一个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曾经的知青们会自生自灭的。这个群体不是一个社会的阶层（阶级），只是一种符号、一个象征、一个时代的记忆。

就像有的朋友喜欢说，天下知青是一家。我看未必。以我曾经在的云南东风农场将近八千名上海知青来说，这几年里演绎了许多闹剧。有的甚至在知青聚会的时候发展到了互殴的地步，连110都出动了。还有的因为意见不同，在网上相互攻击、谩骂。这个渐渐消失的群体里到了如今还是是非不断、争执不断、恩怨不断，骨子里还是存留着一些固有的劣根性。这代人从“文革”的硝烟里走来，那些唯我独革的潜意识根深蒂固。极个别人当年泯灭良知助纣为虐，踩着别人的肩膀混上一官半职，而今依旧权力欲望浓厚，扮演着“老大”嘴脸不遗余力。“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道理，到了什么时候都一样的。已经快要退出历史舞台的人了，还是如此不消停啊。

在电视剧《知青》上演的时候，有人问了我一个问题：那时真的是这样吗？问得好啊！这个电视连续剧《知青》里遭到许多反对意见，集中的一点就是假的成分太多。知青在剧中成为浪漫、激情的化身，完全没有当年的苦难以及对青春的摧残。

这是一种灵魂的贱卖！

近十多年来，随着网络技术的兴起，各种知青网站、博客纷纷亮相。到了今天，存活的不多。在这些新传媒里，读到不少一知青的回忆或叙事。给我总的感觉是遗忘很多，难以苟同！不少都是“好了伤疤忘了痛”的讲述啊。如把当年的上山下乡歌颂为实现“革命理想”，把哭哭啼啼的离别场面写成了“火热的场面”，大唱“青春无悔”、“青春梦想”的赞歌等等。遗忘啊，只是几十年的功夫就会遗忘，如此下去真的没救了。所以，梁晓声的《知青》一剧是有社会基础的，代表了一部分得了遗忘症的人的看法。其实，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知青上山下乡是如此浪漫，为啥会发生集体下跪、北上请愿，喊出“我们要回家”的口号呢？你无悔了，浪漫了，干嘛要回城呢？有人甚至指出，让这些高唱“无悔”的人把自己的子子孙孙送到农村去，也来个接受“再教育”，你看他干不干！

曾经与一位知青网站的朋友聊过。为什么在知青的网站里，不敢刊登涉及的知青、上山下乡、文革等词都被视为“敏感”的文章呢。管理者不希望你们再多谈这些“陈年”往事，希望以“正能量”为指导，多发表一些歌颂性质的文章。这就是造成如今知青话题里只许讲好话，不许讲坏话的格局。甚至连一些曾经的极个别知青都在干一些“偷鸡摸狗”的小把戏，专门监视你们写的东西。从文章到来访者的留言，稍有不合意就会给你送上一顶“反党反社会主义”帽子。轻者，对你摆出一副领导样子来教育；重者，下令断开网站链接。他就不想想，这些事情该谁管？是不是吃饱了撑的？除了断开链接，还有什么惩罚手段呢？总不会有个开除“知青”队伍的选项？这些所谓的成功者得意于自己的“劫后辉煌”，全不在意这种个人在那个年代的成功是以千百万同代人的牺牲为代价的。

想当年，我们生活在农场的时候，遥远的边疆既隔断了我们对于国家、世界大事的了解。这样的环境里也造就了我们的小环境。天下大事一问三不知，就可以不接受强制性洗脑。以玩世不恭的心态调侃官方宣传，“谣传”社会底层的真实，“天马行空，独来独往”无拘无束地享受思想自由的快乐。但是没有料到的是，都快奔七十的时候，居然还会有人煞有其事地谈起了上山下乡的时代意义，来教育你警惕有人利用上山下乡的话题攻击现行的制度等等。这些都让我再次感觉到“天下知青是一家”这句话的不完整，甚至可以说有点虚伪了。

所以，我现在对于如今有些知青网站、博客只是浏览一下。有的一看标题就明白了在胡说一些什么东西。对于那些躲在幕后施射冷箭的，不屑一顾！！少数所谓“劫后辉煌者”的人，试图把握“主流话语”，掩饰整整一代人的苦难，并把它全都化为乌有，全都白白浪费，那些自鸣得意的“成功者”，实际是在拍卖苦难。

我至今还记得有这样一句话：“为了免除下一代的苦难，我愿把牢底坐穿！”。那么到了今天呢，也许要变成

是：为了不让下一代重复我们的苦难，我愿讲到喉干舌燥，留下真话！

因此，我现在对于那些打着红色旗号的知青活动一概不感兴趣，对于那些为苦难制造者涂脂抹粉、百般辩解、洗涮罪恶、无耻献媚的展览会一概不去。不写无痛无痒的文字，绝对不会为了不顾事实、利令智昏地歪曲知青上山下乡的历史，置千百万“知青”曾有过的悲惨遭遇、被践踏的青春、无数家庭的悲欢离合于不顾。

巴金先生一句讲真话，一直记在我的心里。巴老一个提议，建立文革博物馆，是一声带血的呐喊啊！为何做不到呢？都明白，也都不明白。

米兰?昆德拉在《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中的一段名言，深刻揭示了人类道德堕落的基本根源之一就是遗忘：这样，“对希特勒的仇恨终于淡薄消解，这暴露了一个世界道德上深刻的堕落。这个世界赖以立足的基本点，是回归的不存在。因为在这个世界里，一切都预先被原谅了，一切皆可笑地被允许了。”

当我们选择性地开始“集体遗忘”的时候，真是一场新的悲剧诞生之时。

绝非危言耸听！

到了今天为“文革”叫好的人依旧存在，为“文革”期间的上山下乡唱着赞歌的人不少。套用毛泽东时代一句话：人还在，心不死，那些“文革”期间的既得利益者就是如此。我曾经遇到过一些人，总是在喋喋不休地哭诉自己不得志，被人遗忘。在分析原因的时候，竟然会得出还是毛泽东时代好的结论。为啥呢？据说那时“平等”，讲究出身，工农子弟吃香等等。失落的这些人以自身的所谓条件哀叹命运的不佳，还是想回到过去。但是只要你让这些人回忆一下那个年代的票证、排队购物的艰难、确实少穿的困境，他们还会说什么呢？

不想被人遗忘，不愿被时代抛弃，还是要靠自己。所以，到了今天，我都是有所选择了。对于那些违背道德、昧着灵心的假话，不说！对于那些无原则的歌功颂德，不去追根寻源的叙述历史，不说！为此，宁可选择沉默！

唉，叫一声知青啊，实在是太沉重啊！

2015-05-08

余 杰文集：http://www.hxzq.net/showcorpus.asp?id=213

华夏知青网不是赢利性的网站，所刊载作品只作网友交流之用
引用时请注明作者和出处，有版权问题请与版主联系
华夏知青网：http://www.hxzq.net/

“知青大返城”的率先行动为什么偏偏是云南知青

博主按：

中国知青史上，影响和改变知青历史命运的有“两封信”和“一件大事”。

第一封信:当年的福建省莆田县城郊公社下林小学教师李庆霖上书毛泽东主席，直谏下乡知青们的艰难困苦，哭诉他们“无米之炊”的困境。这封信促成党中央和国务院对知青政策及时作了调整，改变了当时千百万知青的命运。这使他一举成名，但同时也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第二封信:知青肖芸致“各位领导”的信。信中“要求中央在制定知青政策时，把下放知青的农龄算作工龄。”胡耀邦总书记对知青待遇作了重要批示，国家有关部门着手调查解决知青工龄问题。使得二千万知青下乡时间作为工龄计算。

“一件大事”是指1978年底，由云南知青发起地大绝食、大罢工风暴，最后迫使国家终结了长达10年的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最为荒唐、最大规模人口迁徙的“城市青少年”上山下乡运动，这个十年是指文革的68年算起，要是加上50年代，那就有二十几年了。我这里用“城市青少年”而不用“知青”，是因为这一部分群体中，很大一部分只是初中或小学毕业十四、五岁的少年，甚至还有一部分是“文盲知青”（见老河口市上山下乡知青专辑），这一部分人根本够不上知识青年。

现在回头来看，问题的根本说穿了是当时政府无法解决城市青少年的就业和上学问题。极少量的企业容量有限，又禁止干“资本主义”个体。加上中学极少，1966年光化县只有三、四所初中，大概只有百分之二十的小学毕业生能上初中。一直到文革，保康县、谷城县、光化县三个县只有一所高中，每年收四个班，一百六十个学生，就是说光化县每年只有不到一百个初中毕业生能上高中，这些青少年只有赋闲在家。怎么办？只有城市青少年上山下乡这条道，美其名曰“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上山下乡是反修，防修的必由之路“，实际上把政府应当承担的就业和办学责任转嫁给了农民。这场荒唐的运动最终以悲剧的形式画上句号，至今还留有大量后遗症（比如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有近三百个知青患有精神分裂症），回城后由于住房问题和无法就业还有少数知青自杀（见知青梅先回忆文章）。

（本文根据有关文章编辑而成。）

30年前知青大返城的肇始内幕

本文的“云南知青”，限于云南生产建设兵团。他们总计约10万人，在全国1700多万知青中，所占比例不足百分之一，但他们的影响却大大超出云南：其一是思想文化领域，从这片红土地上走出来的有王小波、钟阿城、陈凯歌、邓贤、冯学敏、晓剑等，他们当中的作品影响深远；其二是1978年底，由云南知青发轫的大返城风暴，最后终结了长达10年的中国知青运动，从而引发全国上千万知青像潮水般涌回城市。

知青返城风暴为何没有肇始于更穷困的农村插队知青，没有肇始于汇聚了30万之众的北大荒知青，也没有肇始于得风气之先的广东知青，更没有肇始于禀性刚烈的新疆知青，却肇始于山川阻隔、民风淳朴的西南边陲，并迅速波及全国。历史，为什么偏偏选择了云南知青？

云南知青的基本构成

据《云南省志?农垦志》载：1968年，云南农垦系统开始接收知识青年；1970年3月1日，云南生产建设兵团成立，下辖4个师，32个团，分布于西双版纳、德宏、临沧和红河地区的荒蛮丛林，兵团先后接收知青10.4万人，其中北京8385人，上海4.76万人，成都1.67万人，重庆2.44万人，昆明7038人。不难看出，云南兵团的知青主体，主要来自外省市。

1968年12月22日，毛泽东发表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最高指示，从此拉开上山下乡大幕。最先抵达兵团的是北京知青，他们年龄差距很大,从高六六届到初六八届。由于“文革”前他们接受过良好教育，有文化功底，政治敏锐，思维活跃，加上家庭背景等原因，在知青大返城之前，八千多名北京知青中的大部分都离开了兵团，包括陈凯歌和王小波。

上海知青多为六九届初中生，重庆知青和成都知青年龄最小，但生性耿直，敢作敢为，特别是重庆知青，他们少年时就见识了全国最大规模的武斗，有一种天不怕地不怕的好斗性格。

云南知青的基本待遇：口粮40斤，工资28元，房自盖，菜自种。他们的任务是砍伐森林，种植橡胶，但是当文化迥异的各地青年汇聚到边疆，经碰撞、摩擦、浸润、融汇，逐渐形成云南知青的个性特征：思想活跃、敢说敢做。

“被强奸不敢作声”的女知青与“走后门”回家的干部子弟对于这些年纪轻轻，以前从未有过独立生活经历的城市知识青年们来说，长期背井离乡，思想上被禁锢，生理上遭受苦痛，精神上经历压抑，这一切还产生了种种心理问题。女知青“被奸污而又不敢作声”就是一个突出例证。由于干部权力过大，生产兵团中干部强奸女知青的案

件时有发生，仅云南一地据官方统计就有数百起。甚至还发生了干部奸污十几名知青的极为恶性的情况。而这些知识女青年们在遭受侵犯后，几乎无一人敢于挺身而出，与罪犯的暴行斗争。甚至在干部被调查后，这些女知青仍然矢口否认，拒绝作证。她们宁愿用沉默的外壳把自己内心的创伤和被践踏的人格紧紧包裹起来，永不为人所知，而不愿意因此受到更大的伤害。

血泪的控诉“姑娘的命运”与部分干部强奸女知青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有些干部家庭借助身份背景，把子女领去参军上大学，几乎每一个有“知青”成员的家庭都在利用各种社会关系把自己的孩子调离农村。国家计委一副主任子女，走后门参军回北京，不通过下面就把户口转走，下面根本顶不住。但对大部分知青来说，“走后门”是不可能的。

长期的痛苦，让大部分知青都厌倦了在农村的生活，他们想回家，尤其在“文革”结束，新时期来临之后，更想回家。

两封信和一个女知青之死

当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推行10年后，暴露的问题亦越来越严重：上千万知青在人多地少的农村与农民争工分、争口粮；他们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却失去了接受学校教育的权利；在招工、招生、参军、入党、提干等问题上，后门风盛行，以至1978年2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先念在谈到知青工作时说：“现在社会上对知青问题议论很多。四个不满意是我讲的：知青不满意，社队不满意，家长不满意，国家不满意。”3月，重新工作不久的邓小平与胡乔木、邓力群谈话时指出：“现在搞的上山下乡，不是个长期办法，农民不欢迎嘛！城市人下去实际上形成同农民抢饭吃的局面。我们第一步应该做到城市青年不下乡，然后再解决从农村吸收人的问题。” 中央高层的信息，怎么会传到遥远的云南边疆呢？“当时知青并不知道中央有什么动向，这一切，是从一封信开始的。”1978年10月，一封《给邓小平副总理的公开联名信》，在西双版纳知青中悄悄流传，作者是景洪农场十分场(原云南兵团一师一团十营)学校的教师、上海知青丁惠民。信中列举了知青生活的困苦，反映知青运动造成的“三不安心”问题，认为局面已经“严重影响社会安定团结”，希望中央领导能够重视，丁惠民说：“这封信还隐约表达了回城的愿望”。其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即将召开，知青作为“文革”遗留物，虽到了该解决的时候，但有关部门一时还顾不上、也拿不稳，“但全国都在拨乱反正，为什么对关系千百万家庭稳定的知青问题，却讳莫如深呢？” 第一封信捺上300多个知青指印，寄往国务院。国务院按常规批转云南省处理，自然没有了下文。知青们没有气馁，又写了第二封信，发起者仍是丁惠民。在第二封信中，明确提出了回城要求。到12月初，联名信的签名超过万人，以它为媒介，在西双版纳6万知青中，一个以回城为目标的群体正在形成，丁惠民与重庆知青刘先国、上海知青胡建国组成了三人核心小组。

1978年底，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知青们似乎看到了希望。但是，会议的结果却令知青们非常失望。这次会议决定：一、在今后若干年内，还要继续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二、……继续在国营农场安置知识青年；三、……要支持和鼓励知识青年扎根农村、志在边疆的志向和行动。会后发布的《知青工作四十条意见》明确指出："今后边疆农场(包括各建设兵团)的知青一律按国营企业职工对待，不再列入国家政策的照顾范围。"这就意味着，云南支边知青必须在农场待一辈子！他们的最后希望彻底破灭。会议的消息在报上一公布，立刻在知青中引起了轩然大波，长期积压的矛盾像火山一样爆发了。

恰恰此时，上海女知青瞿玲仙之死，引发轩然大波。瞿是西双版纳橄榄坝农场七分场知青，因怀孕难产，在农场卫生所大出血身亡。这一非正常死亡事件，在农场并非最严重的，却因死得其时，引发数千人抬尸游行，一百多部拖拉机包围了草菅人命的场部医院。示威的知青向西双版纳的首府景洪涌去，沿途农场知青不断加入抗议队伍。

12月8日，在西双版纳首府景洪，"云南各农场知青联席会议"召开。这次会议的代表共120多人，代表们的入场证很特别，全是知青的签名，每个代表至少要持有100人以上签名才能入内。会议目的是：商讨"北上请愿"事宜。丁惠民被推举为总指挥，组建北上筹备组。会后，知青们发布《北上宣言》，决定15日那天派代表进京。

10日，北上代表团尚未组建好，第二届全国知青工作会议在京闭幕的消息传来，该会议决定次年(1979年)再派遣80万知青下乡，更重要的是，"会议还决定不再承认兵团知青的身份，而把我们作为一般农场职工对待"。

丁惠民感到前所未有的压力。这消息也让知青代表产生了重大分歧，一批人要求立即北上，但丁惠民认为时机不成熟。最后通过筹备组表决，丁惠民的主张被否定，43名代表先行北上。

1978年12月16日首批请愿团在景洪宣誓出发，徒步踏上北上征程　　通关，昆洛公路上的一个重要隘口。首批请愿团跋涉400余公里刚到此地歇息。随团携带的4000余元经费，瞬间神秘被窃，使得已经是疲惫不堪的队伍，顿时陷入无钱无粮的绝境。加之过往车辆均接到云南有关方面通知，拒载北上知青，首批请愿团滞留通关动弹不得。

为不负北上重望，请愿团员被迫阻断昆洛公路，向过往司机、群众宣传北上精神，最后一支受感动的解放军车队，主动搭载请愿团员驶向昆明。

<u>多次与云南省委、农垦当局对话，争取同意北上</u>

首批请愿团与云南省委和农垦当局几天的对话、谈判是激烈而又尖锐，一方主张严禁进京就地解决问题，承偌改善农场知青待遇。一方仍然坚持北上向中央反映问题，知青要回家。双方观点南辕北辙，对话谈判常常是两方大拍桌子不欢而散。首批请愿团清楚地认识到：知青要回家必须找中央，与云南方面无谓的纠缠只能是坐失良机。在昆明几天的募捐已经筹集了少量进京经费，时不待我立即强行北上。

1978年12月22日晚10：30分，首批请愿团打着红旗列队前往昆明站。当请愿团以23快手表和证件作抵押购票时，得到车站方面明确回答：“就是有钱也不会卖票给你们”。请愿团无奈之下，强行冲站登上发往北京的62次列车，当局立即停发62次列车，并将情况迅速报往中央。

62次列车的停发，立刻引起了大量旅客的不满和社会对知青的同情。更有不少过往昆明的知青前来车站声援，一时昆明站人山人海局面混乱。国务院有关领导的指示这时反馈云南：“如实在不行，请愿知青可派数名代表进京反映情况”。为配合国务院工作，请愿团主动撤离车站，与云南省委就进京人数问题艰难地谈判。虽然请愿团作出大幅度让步，但云南省委仍坚持不准进京上访。双方僵持不下，谈判破裂。

1978年12月24日晚10：00时，首批请愿团再次打着红旗强闯昆明站，遭到了有组织的暴力袭击。由于事前有纪律要求，先遣队员保持着极大的克制。但闻讯赶来的各农场途经昆明的知青和过往旅客震怒了，为了保护请愿团员，双方扭打起来。不断有人受伤，现场一片混乱。

为了表示对暴力袭击的严重抗议和避免继续有人受伤，请愿团员愤而抬上受伤团员卧上了铁轨，进行卧轨绝食。西南大动脉瞬间瘫痪，数万旅客滞留车站。

消息传开，举国哗然、朝野震惊。国家农林部部长兼国家农垦总局局长赵凡临危受命，率领国务院工作组紧急飞往云南。

次日，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签发“三点紧急通知”：“一、铁路是国民经济大动脉，不允许任何个人和组织随意拦截；二、殴打民警和铁路工作人员是违法行为，如果再发生类似事件，政府将依法严肃处理；三、在昆明的农场知青要尽快返回农场，在当地党委的领导下，搞好抓革命促生产。

昆明站大批军警开赴实施戒严、清场，疏散旅客，高音喇叭不断广播国务院通知，对卧轨知青进行反复劝诫警告。并不断传达国务院：“实在不行，可派数名代表来京反映情况”的指示。在云南省委领导和已经抵昆的国务院工作组亲临卧轨现场的劝导下，首批请愿团见同意代表进京的目的达到，为不继续恶化事态，饥寒交迫的请愿团员们才抬着受伤的队员，含泪撤离卧轨24小时的现场。

<u>艰难北上与仓促离京</u>

1978年冬天的形势空前紧张！这种过火的局面是丁惠民最不愿意看到的。当第一批北上代表在昆明火车站闹僵时，第二批代表紧急暗渡陈仓。发着高烧的丁惠民被知青们抬过了澜沧江，“我是准备死在路上了”。50名代表经过艰难辗转，终于从昆明城边一个叫读书铺的偏僻小站上车，绕道成都北上。途中，24名代表因喝酒、赌烟，被丁

开除，就地下车，返回各自的城市去为代表团募捐。

12月27日，剩下的26名代表到达北京，国家农垦总局接待了他们，又冷又累的知青们换上了簇新的军大衣，得到了医疗、食物和住宿，但他们最大的愿望是“要见邓副主席”，并提出如果邓副主席太忙，也可由其他国家领导人接见。知青们给“国家领导人”下的定义是，“必须是政治局委员和副总理以上”，并认为，“邓副主席是最实事求是的人”。

1979年1月6日，历经坎坷的首批请愿团最后十一名代表，终于抵达北京　　1979年1月8日，北京飘起鹅毛大雪，首批请愿团打着红旗列队来到天安门广场，十一名队员默跪在雪地中，每人身上都挂了一个字牌，组成了“我们要见华主席邓副主席”的十一个大字。从上午到下午，在凛冽的寒风中犹如一座座悲壮的冰雕。引起无数首都群众、外宾的围观拍照，不少人失声痛哭。

在北京街头刷标语　　1979年1月1日，国家农垦总局发出1号文件，承认知青请愿代表团性质合法，同时强调应该复工。1月10日，代表们终于得到国家领导人接见。接见者是新任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王震，被接见的代表限定为10人。

丁惠民说，1月10日上午的那次接见，气氛不很融洽。面对那位以军垦驻屯闻名的老将军，“我们不能再像与自治州、省调查团的‘谈判’时那样针锋相对。”丁记得王副总理是在时任民政部部长程子华的陪同下，接见代表团的。老将军一身藏青色中山装，风纪扣紧扣，银发整齐往后梳，拄一根拐杖。大家鼓掌后，本以为能听到几句亲切的问候，没想他表情严峻，突然将拐杖往上一扬，又咚咚地在地上狠狠杵，接着就是排炮般的严厉训斥，“不是批评，是训斥”，代表们大气不敢出，“完全被老将军的威严震住了。他训斥我们丢掉了军垦的光荣传统，现在全国都在抓纲治国，你们却闹事，对得起国家吗？……”代表们全懵了，没人敢提返城的事。接见完后，“大家都觉得该说的话竟没说出来，有的代表急得哭了！”　　王震副总理显然也意识到了知青们的不痛快。出于灵活的领导艺术，他派人邀请全体代表当晚看电影。与白天的接见不同，王副总理没在会议室坐等，而是站在电影院门口迎接。丁惠民坐在王副总理身边，放映的是刚刚翻译完成、并准备送南疆前线的《巴顿将军》，电影结束后，王副总理首先打破沉默，说西双版纳是个好地方嘛，要热爱她；中央并没忘记那里，恰恰相反，要建设好那里，邓副主席说了，不久就要大规模投入资金，资金不够，外汇也可以动用嘛！

这时知青中有人抱怨结婚难。王副总理风趣地说，晚一点有什么不好，我们当年打仗，在你们这个年龄，哪里顾得上结婚嘛！我可以给邓(颖超)大姐说说，让她张罗从山东江浙调一些漂亮姑娘到西双版纳，到时候让你们走，你们可能还舍不得走哟！

听说丁惠民有病，王副总理立刻叫医生给他检查身体，还开了一堆药品。

暖流正在形成，气氛应该是不错的，但一位姓刘的重庆知青莽撞的冲动言行，打断了一切。当时，王副总理见大家脸上有了笑容，又说了些安慰和鼓励的话，让代表们回去安心工作，中央会对大家提出的要求认真考虑的，他特别说："你们的信我已经转达给了华主席、邓副主席和叶帅了。"说着，老将军转身欲走，这位姓刘的重庆知青忽然从后排站起身，大声吼道："王震，你不准走！你还没回答我们的实际问题！"说罢就往前排冲，当即被警卫反扭住双手。王副总理也愣住了，估计多少年来，除了毛泽东、周恩来等曾对他直呼其名外，哪轮得上一个愣头青对他这样叫？他毕竟是军人出身，火气也大。只见他把手中的拐杖恨恨地往地下一杵，用湖南话大声骂了那愣小子。(骂话的大意是：你是个捣蛋鬼，你才吃了几天干饭，就不知天高地厚了？等等)场面一下僵住了。双方最终不欢而散。离开电影院，丁惠民决定，全体代表立刻返回西双版纳，其沮丧可想而知，而此时全云南垦区知青要求返城的罢工运动也给北京以巨大的鼓舞和配合，首批请愿团最后到京的十一名团员（重庆七名上海四名），在北京一直坚持到版纳知青开始办理户口的喜讯传来。

绝食事件使返城洪水一泄不可收

西双版纳知青的大规模行动，迅速引起中央的高度重视。就在知青代表北上的同时，中央即派出以国家农林部部长兼农垦总局局长赵凡为首的调查组南下。同时，地方政府也开始正视知青的要求。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当时西双版纳已完全陷入瘫痪，生产停止，一些农场领导甚至被知青扣为人质；在十万知青的背后，是他们在全国各地焦急等待的父母和亲人，还有全国上千万知青的关注；当时又正要面临对越自卫反击战，种种因素促使政府应当尽快按"人民内部矛盾"来解决知青问题。

但出人意料的是，在中央调查组到达的同时，景洪农场发起了大罢工，很快罢工浪潮席卷所有农场。在临沧耿马勐定农场，发生了更为激烈的绝食事件。中央调查组抵达知青最多的孟定农场，他们下车伊始，就被眼前的情景惊呆了，大约一千名知青黑压压地跪在场部公路上，齐声呼喊："我们要回家！"此情此景，连调查组的几位女成员也流下了眼泪。

当时，中央调查组进入勐定调查，成都知青们以绝食来表达回城的决心，几百人水米不进静坐三天。当调查组组长、国家农林部部长兼国家农垦总局局长赵凡接见绝食代表时，一位知青竟割开自己的手腕，喷溅的鲜血震惊全场。赵凡是1937年参军的老八路，作风务实，他亲眼目睹了知青们艰难的生存现状，当几百名知青跪在他面前放声大哭时，他也流下热泪，并大声说，"孩子们，都起来！你们的情况，我一定如实向中央汇报！你们的苦我都知道，我也是知青的父亲，也有三个孩子正在插队啊！"

《中国知青梦》作者邓贤则对另一场大规模见面做了如下描绘：

罢工指挥部成员之一吴向东困难地站起来，理了理衣襟，大踏步朝主席台走去。"北京来的首长同志们，我亲

爱的知青战友们，兄弟们，姐妹们--我，吴向东，六九年下乡的北京知青，今天站在这个讲台上，当着我的故乡北京来的首长和亲人说几句公道话。……在我的发言即将结束之际，为了捍卫一个真正的知识青年，一个有血有肉的大写的人的尊严，也为了拒绝刚才那个由政府强加给我的'农场青年职工'的不真实的身分，我决定以最后的方式来表达我的抗议。"他从容不迫地转过身来，从裤兜里掏出一把锋利的匕首，毫不费力地切开自己手腕的动脉血管。

一股指头粗细的血柱有如喷泉般喷涌而出，溅了四周人们一身。等人们清醒过来，那个勇敢的殉道者已经面带微笑跌倒在地。男青年的自绝行为无疑点燃人们压抑已久的反抗怒火，要不是知青纠察队及时维持秩序，失去理智的知青们一定会把露天会场那个不结实的土戏台踏成平地。

赵凡早已老泪纵横。作为党和国家高级干部，身负特殊使命的调查团长，他绝对没有想到，他坚持的知青政策对广大知青伤害是那样深，那样致命，他几乎产生一种类似刽子手那样的负罪感。你口口声声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么实践标准在那里呢？难道不在知青本身而在于政策吗？理智的堤坝开始崩溃，良心和正义感渐渐占了上风。

一个女知青慢慢站起来。这个来自天府之国的成都姑娘，脸庞消瘦，面色黝黑。她的曾经无比白皙的皮肤早已被亚热带烈日无情地灼焦，她的曾经无比健康朝气蓬勃的年轻身体如今被心脏病时时折磨着，她走路的姿势看上去似乎有些歪歪倒倒，这是由于长年累月繁重劳动致使她的右肩比左肩明显倾斜的缘故。

她终于气喘吁吁地登上土台。她突然双膝发软，扑通一声跪下来，抱住首长的脚放声大哭。"伯伯，好伯伯，救救可怜的女儿！……"撕心裂肺的哀鸣，如闪电，如雷鸣，撕裂长空大地。如羊羔，如鸡雏，如一切死之将至的弱小动物。一时间，三万多名被称作"祖国未来"的知识青年齐刷刷朝主席台跪下来，跪在中国古老而苍凉的红土地上。石破天惊，哭声恸地。历史在这里定格。

赵凡大恸。他泪流满面，不能自己。台上台下哭成一片。面对这个把他当父亲的女知青，面对台下三万多长跪不起的人群，他感到自己僵硬的双肩已经承受不住这泰山压顶般的历史责任。他扶起痛不欲生的女知青动情地说，"请相信我，会把你们的事情办好的。我决定，现在就通过电话向党中央请示，反映你们的回城愿望和要求。"

<u>实事求是的赵凡部长与孟定知青对话</u>

在赵凡的协调和敦促下，一月中旬，四川、上海、北京和云南有关部门在昆明联席召开“三省四方”会议，各省市对知青回城均表示认可。1月15日，时任云南省委书记的安平生发表《15条讲话》，其中一条是“知青不愿留下的，都可以回去”。也就在这一天，丁惠民在返滇途中解散了筹备组，并向王副总理致电，就知青的过激行为向国家道歉，新华社、人民日报报道了这一消息。

安平生的讲话和接踵而至的国务院“六条”开启了大闸，返城洪水一泄不可收。西双版纳各农场知青无不争先恐后回城。很多知青记得，“短短几天，整个农场走空了，连队静得可怕！大家丢下武器，抛弃农具，有人还把农具架起来烧掉。很多人搭乘为对越自卫反击战运送物资的返程军车回昆明，由于拥挤过度，发生了好几起翻车事故；也有人拖儿带女，不顾一切地搭车北上”。知青们在慌乱中告别了边疆，直至回到昆明，才松了一口气，“就像在做梦，所有人都挤到昆明东站邮电所给家里发电报，告知平安，告知我们回家了！”　　10年天涯游子，终于踏上归乡之路。

中央仓促改变了决策，仅仅三个月之内，云南十万知青人去楼空。黑龙江、内蒙古、海南岛农垦和全国众多知青农场也随即跟进，上千万知青返回城市，历时10年的知青运动就此终结，“知识青年”遂成为历史名词。原来国家计委制定的１９７９年度的八十万知青下放计划，也被放弃了。回首当年，全国知青命运的改变，的确与云南知青的不屈不挠的抗争是分不开的。

云南知青问题在全国的率先解决，也使全国各农场知青回归原籍城市有了参照模式。同时也促使中央、国务院加快了全国知青工作拨乱反正的步伐。数以百万计的知识青年从农村返回到了城市。

然而，也并非所有地方都同样顺利。新疆知青请愿时同样举行了几十次罢工，甚至绝食，但一直得不到政府方面的让步，最终失败。

<u>至今仍说不清的谢幕词</u>

回到本文前述的提问：历史，为什么偏偏选择了云南知青？难道，他们真是外来的种子，一不小心掉进云南雨水丰沛的野地，没受多少作践反倒长成了气候么？

当然不是。应该说，去云南的知青心理震荡要大于其他地方。当知青们从北京、上海、成都、重庆来到西南边疆的深山老林，其心理落差，不仅是几千公里的路途，它包涵了整个中国社会文明史的全部进程，其跨度涵盖当时中国最先进的京、沪等大城市，一下子迈进历史教科书中才有的刀耕火种之地，它对人的心灵的震撼，若非亲历则无法感知，这也促使云南知青对中国社会底层的认识和思索更为深刻。1973年7月，中央关于惩治吊打知青和强奸女知青的文件，都是针对云南兵团的，其时云南兵团共发生捆绑吊打知青1034起，受害知青1894人，其中2人被打死；调戏奸污女知青的干部286人，受害女知青430人。后经中央批准，枪毙了数名违法乱纪干部，才控制了局面。所有这一切，无疑促成了云南知青心智的成熟。

其次，云南兵团隶属昆明军区建制，其前身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二野四兵团陈赓之旅。这是一支诞生于大别山红军时代的英雄部队，历经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从山西转战千里，解放云南。该部有大批官兵于1950年代就地转

业，创建边疆国营农场，许多老干部保持着优良传统，与知青们朝夕相处，血肉与共，其果敢精神传承于广大知青，铸就了云南知青敢于抗争的个性。再有，与北大荒和其他插队知青不同，云南知青的劳作成果不是春华秋实的稻菽，而是橡胶树，种下去，能活六七十年！遂成为他们生活的见证与情感维系的纽带。

其三，云南地域特殊，与越南、缅甸接壤，斯时东南亚大地烽火连天，知青中的一些血性青年，自愿出境追随缅共等武装组织，艰苦卓绝地转战在深山老林，其传奇故事一直流传于云南知青中，成为格瓦拉式的英雄话题，潜移默化地影响了云南知青的精神特质。当上山下乡的大潮将他们抛掷到边疆后，他们无法回避，只能用身体去体验大的苦难和大的欢乐，流大滴的汗、喝大口的酒、掉大滴的泪，一旦梦碎，他们便以另一种方式选择命运。

更重要的是，当时文革形成的政治高压正在消解，政治清明正在恢复，中央对大返城的定调符合民心，这才使云南知青的行为没有被扣上一顶政治帽子。

如今大返城快30年了，但每年仍有成百上千已知天命的云南知青，携带子女重返遥远的边疆，他们凭记忆寻找着自己当初种下的橡胶树，抚摸着，流着泪。他们说并非想再去捡拾逝去的青春，而是为了对岁月永久的纪念。他们年轻的子女，能够理解父辈当年的爱恋、苦痛和久留心底的诉说吗？

应该说，上山下乡是一个复杂的历史过程，云南知青作为其中一个群体，不经意间，留下了一篇至今仍然说不清的谢幕词，惟能诠释的，是他们把握了命运的走向，并以此载入历史经验与教训的备忘录。

上山下乡：青春果然无悔？

90年代，成都举行了一次以“青春无悔”为题的知青聚会。“无悔”者感到知青经历使自己磨练了意志、加速了成长、更以一种无法替代的方式，深切了解了自己安身立命的国家，从而奠定了整整一代人心智和意志的成熟，这些人中，很多人还积极反哺当年插队所在地。然而，也是在这次聚会上，“青春无悔”的横幅被不同意见者扯下：“无悔？你们无悔你们就回去！”对于悔者来说，上山下乡是时代对整整一代人的深重折磨，这是巨大的牺牲，这是命运的不公。他们不接受“无悔”的说法：无悔那为何要回城?既然回城，又为什么标榜“无悔”？

不从个人的角度，而从社会的角度来讲，“无悔”也是不可能的，在这场所谓知青的拓荒运动中，很大程度上是对环境的破坏，“越开荒越荒”。对于云南来说，如果不发生这场运动，就不会砍去那么多原始森林。而知青们种上的橡胶树，由于成本远远高于开放后从马来西亚进口的橡胶，这些橡胶树已经无人理睬而百分之九十以上已经死亡，知青的十年心血和汗水化为乌有……

综合《南方周末》张卫中国西部知青网天之歌等文图

论知青逃港潮

二、

偷渡，是人民对一种僵化的社会制度的义无返顾的否定和扬弃，是对西方民主制度的出自本能认同和追求。

开放，是执政党对自身制度的检讨和部分否定，是对西方社会制度的部分认同和学习吸收。

七十年代前期的老三届人知青偷渡潮只是前后持续三十多年的百万广东人民大偷渡历史中的一个片段。正是人民前赴后继用生命抗争，才最终迫使执政党内的有识之士作出让步，顺应时代潮流，打开国门，使文革浩劫中被折腾得奄奄一息，一穷二白，民不聊生的国家重新焕发生机。

逃港知青从来不是英雄，他们只是社会底层的“卑贱者”，他们的行为哪怕再勇敢，动机也只是追求个人幸福。他们和刘文学、向秀丽、焦裕禄、雷锋、郭凤莲、欧阳海、金训华、李双双、江水英……这些和知青同时代被宣传树立起来的不食人间烟火的英雄典型有天壤之别。

逃港知青从来不是英雄，他们只是一些平平凡凡的老百姓，他们哪怕观念再超前，也远远达不到林昭、遇罗克、杨曦光、顾准……等思想者的深度和高度，何况他们的动机也只是追求个人幸福。

但他们前赴后继“扑网”“蹈海”，不惜生命追求个人自由的坚强意志，正是我们这个长期被主义奴化，渐行委顿的民族最缺少的精神资源。他们自己不会意识到，当他们不愿屈从苟生，力图把握自己命运之时，他们已经成为历史的先行者。他们冲开重重深锁的国门只是想改变自己，结果改革开放的历史大潮由这缝隙而起，汹涌澎拜，势不可挡，中国因此而改变。

……

五八年建立的农村人民公社是中国特色“美丽新世界”雏形，六六年开始的“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推而广之把整个中国“公社化”，就是要打造“史无前例”的“红彤彤”的“美丽新世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只是“美丽新世界”实验中的一环。我们现在还有许多老知青对那段历史情不断，理还乱，对当年的理想主义深深怀念，依旧陷在“美丽新世界”的迷思中不能自拔。南中国偷渡潮中的知青大部分不是红五类，不是学生干部，不是党团积极分子……红色历史对他们几乎不着一字，因为他们是异类，是走“邪路”的人，和现在热播的电

视剧《知青》里面极力塑造的那位胸怀大志带领老百姓走“共同富裕”道路的陕北知青赵某，是“两股道上跑的车，走的不是一条路”，他们只是上山下乡运动中的逃兵……但是，但是只有他们，才是真正的清醒者！

“血沃中原肥劲草，寒凝大地发春华”。

三十多年前老三届人中的一批精英曾不惜生命前赴后继勇敢追求的那个真实的“美丽新世界”——民主自由的世界，才真正代表了中国人民的幸福未来！

——摘自作者《知青逃港潮——培英老三届调查》，2013年2月15日《记忆》93期（第五稿）

二、

……转发推荐昨天出版的最新一期北京《记忆》杂志。这份国内很有分量同时也是“被”限量发行（主要面向学术机构）的历史刊物，在中国第一次（增刊专辑）披露文革中知青偷渡潮的真相。

李建中《从“督卒”到“起锚”》把偷渡潮形成的脉络交代得非常清晰。感佩一位44年出生的湖南知青作家（身居深圳），能够对广东的这段历史研究得如此透彻。

黄东汉《起锚》七篇回忆文章，由当事人讲述自己和身边朋友当年惊心动魄的偷渡故事，其中渗透了自身的人生感悟，它的历史价值是任何其他人不可以替代的。

本期还登载了我的论文《知青偷渡潮___广州培英中学老三届调查》及十一篇口述历史调查附录。

在这里，首先真诚感谢近年来毫无保留帮助我完成这些口述历史记录的阿邬、成哥、大侠、晓萍、任中、虾哥、恒芝、海狼、赖棉、津仔、江琰、左派、水果冰、野猫、胡佬、大叔、阿婆、玲仪、超哥、惠芝、慧人、天籁、温爷、野猫、荣琦、家其、黄宝……抱歉因为仓促交稿，事先未来得及请您审阅，如果文字记录中和您的表述个别地方有出入，请您多包涵，并向我指出，以便今后再找机会改正。

我的论文有点拖沓，对这段历史的叙述介绍也不像两位老学长那么到位，也许还可一读的是文章最后的一点点思考。如何给偷渡者的一个客观的历史定位？其实这里还包含了我个人的忏悔、反省、感悟和觉醒。许多朋友读过我16年前发表的第一篇纪实文学《海狼》，我做历史的动力，首先来源于对自身的批判。偷渡者从来不是什么英雄，但你们比我勇敢，也曾比我清醒，更比我们都伟大——因为你们敢于追求做人最基本的东西，就是自由、独立和尊严。在无意之中，你们其实已经改写了历史，你们是当代中国历史变革的先行者！而我们，那一言难尽的青春岁月，为了“结束洋胶进口的时代”“打击帝修反，解放全人类”，我们最大的贡献就是把海南岛最后幸存的原始

森林砍伐殆尽。我们曾自以为在创造历史，实际我们是在涂鸦一个荒诞的神话。然后今天，今天我们中许多人还高唱“青春无悔”……

也感谢《记忆》主编吴迪和编辑小戴，承蒙你们的厚爱，贵刊继去春刊登载了我《追踪遇罗克之死》一文，这次又给不才我腾出宝贵的版面，让俺这历史蚁工，能够将觅衔到的历史碎片安放在一个再合适不过的蚁窝。所有曾把你的故事付托给我的朋友，还有那些被历史的黑洞无声无息吞没的弄潮儿，现在可以安心了，你们当年的生命付出，将在历史的长河中得到永恒……

——录自2013年2月16日给朋友的电邮

三、

……认识您真的很高兴，有的人终身朋友，在精神上却不一定能有多少交流。有的人素昧平生，一面之交，却能交浅言深。读您是从《大逃港》开始的，作为体制内的一员，您选择了一条漫长的荆棘之路，我理解您动力只有一个，就是人的良知。

从我自己成长可知，从懂事之日，就有太多的似是而非的“大道理”，年复一年，无所不在，像“填鸭”似地灌输给我。狼奶基本成分就是所谓爱国主义和理想主义。只要在世界观形成时期处在严密新闻封锁的环境，单方面被强势的宣传控制，将来你哪怕摆脱了，走出高墙，你的精神很可能依然被禁锢在过去（如廖冰兄漫画）。这就是我们大多数同代人的现状，同代人的悲哀——很可能也包括今上。

张穗强的文章很有代表性，表面上看来有些事实是存在的，例如人文地域因素等，他提到如何给逃港知青一个准确客观的定位，也不无意义。但他的基本立场是：这段历史只是红旗下的一段阴影，前进中的政策失误。30年成绩是主要的，把一些为个人利益逃港的人抬高吹捧实际上是给国家抹黑。一句话，就是社会主义制度不容否定！

我和张有相同的海南兵团知青背景，因此也太清楚这些“成功人士”的思维模式，国内的北方兵团知青大作家梁晓声写了一个《知青》，出了国的海南兵团知青哥伦比亚硕士苏玮也搞出一个《岁月甘泉》。这些高学历见多识广的聪明人尚且无法走出历史的罗生门，其他人就可想而知了。

对历史的反思起点不应该是理论，而是良知，是基本的价值判断。如果无视土改、镇反、反右、大跃进、大饥荒、大浩劫……，空谈国家民族理想献身，最后的导向就是法西斯。那天在会上我说：我们不仅是知青一代，也是红卫兵一代，也是打老师一代。文革前的教育那么“成功”——艰苦朴素，吃苦耐劳，用功学习，人人争学雷锋做好事……我们千五人的中学每学期都是零犯罪率，怎么文革来了，一夜之间人人都可以变成野兽？我长期以来一直

百思不解。（2012/01/13）

……

汪伦整篇文章写得不错，但我不太赞同他简单否定张穗强关于广东珠三角知青比全国大多数地区知青生活条件优越的观点，毕竟是鱼米乡，四季温和，交通方便，温饱不愁等，都是北方等地不可比拟的。至于劳动艰苦，政治压力大，没有前途等，和“生活条件”是不同范畴的问题。我的论文就肯定珠三角知青生活整体而言相对比其他地方好，尽管如此，还有这么多人偷渡，根本原因是在当时的制度下知青普遍觉得留在农村没有前途，对面的香港制度更适合自己的生存发展。撇开政治而言，“水往低处流，人向高处走”这是很正常的选择。不走的知青当然各有各的原因，但最为重要的还是逃港有很大风险，要冒生命危险，如果去了这一条，开放边界，自由选择，当时不跑清光才怪。

……

承认大逃港有人文地理背景，只可能发生在广东。逃港者普遍是为了改善个人处境，向往追求自由幸福生活，并无变革社会的伟大理想抱负。他们绝大部分都是原来老实守法的老百姓（下层无业市民、工人、农民、学生和知青等），不排除也混杂各种其他成分，包括刑事犯罪分子。

承认大逃港和当年港英当局的政策有关联。历史上港英当局对逃港者的接纳政策宽严变化直接影响逃港人数的升降。例如62年的即捕即解（加上中方强化边防等配合），“六二大逃亡”迅速退潮；74年11月开始实行（逃港者只要未进入市区一律）反解之后，加上国内知青回城政策开始实施，知青偷渡潮迅速退潮（注：其他市民、农民的偷渡并没有停止，直到八十年代前期还形成一次高潮）；承认大逃港和当年中方的特殊政策有关。在普遍人心向港，法不阿众的情况下，也顾及海外国际影响，中央以及广东地方领导基本是将偷渡逃港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多半情况下是走堵截、拘留和遣返释放的路子，而非轻易用枪击、判刑和劳改监禁等铁腕手段镇压，这也客观条件上让逃港失败（生还）者再次、多次偷渡成为可能。

——笔者不但承认张穗强先生提到的一些事实，甚至还加以补充，希望上述三个“承认”，能够回答为什么会产生持续将近三十年，百万人大逃港的“震撼事件”的原因。

按照张先生的逻辑推理——“非法探亲”+港英人道+中方宽容，承认这三点，这就是原因。说白了，就是各有各的难处，这只是一个因缘巧合的“局部事件”而已，逃港者可以理解，可以同情，但无冤可伸，无反可平，拔高成英雄更是“耸人听闻”。说透了，就是没有谁应该为长达近三十年，百万人民逃往香港，无数人曝尸荒野，葬身鱼腹的历史悲剧负责！

笔者无法苟同这貌似公允的荒谬论断。在此也不打算展开长篇大论，因为事实非常清楚：

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低效率造成普遍的物质匮乏，人民在生活水平低下，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才会持续发生大逃亡。

也是因为长期以来政治挂帅，以阶级斗争立国，把人分为三六九等，制造出大量的“政治贱民”，在前途无望的情况下，社会底层才成为逃亡潮的主体。

还因为专制体制对人身自由的束缚控制，对人精神的奴役禁锢，本身就是和人的天性相抵触。人们一旦突破资讯封锁（广东人更了解香港社会的实情），知道真相，就有可能不顾一切奋勇追求个人幸福。追求天赋人权——这正是绝大多数偷渡者的精神原动力。

邓小平先生能成为一代伟人的不凡之处，在于他能够在文革后党内左倾势力还很强大的情况下，以惊人的魄力一举扭转乾坤，领导执政党果断抛弃“计划经济”和“阶级斗争”的经济政治路线，通过改革开放，学习西方，使国家实现经济腾飞，人民生活水平大大提高，社会的自由度也有了相应改善，持续数十年的逃港潮在八十年代中期以后很快就消失于无形。

毋容置疑，大逃港是执政党的错误路线造成的。逃港潮的终结，也主要是因为执政党敢于改正自己的错误。不好就是不好，好就是好，刻意隐瞒或歪曲历史，一味鼓吹伟光正，反而是害党误国。如果我们不能正视历史，当年大逃港的历史悲剧还会重演！

……

谁都知道搞经济特区，改革开放试点由广东而起，广东当时最大的问题是和香港、海外相比经济长期落后，人民见异思迁，逃港成风。问题汇报到邓大人，一句话：“這是我們的政策有問題，不是部隊管得了的”，真是石破天惊！在执政党的历史上，曾有谁这样勇于承认错误的？坦承人民逃港是内部原因，而不是像历来那样推“西方敌对势力”的破坏；强调继续用专政机器封堵的办法行不通，言下之意就是要找出一个办法提高人民生活，让老百姓自动放弃逃港。《大逃港》一书准确把握了记录了历史转折的瞬间，点出“大逃港逼出改革开放”的直接因果关系，何错之有？

——录自2013年2月6日覆陈秉安先生的电邮

四、

卢梭说过：人类是生而自由的，但无往而不在枷锁之中。

因为适者才能生存，人们便常常不得不扭曲自己，所以人生往往是平庸的，甚至是庸俗的。人生难得有亮点。发财升官成名可以是成功，但不是亮点，那亮点是什么？亮点就是挺直自己，挣脱枷锁，哪怕一生中只有一次，哪怕最终失败了，也值了！

追求自由，就是超越平庸，就是追求真实的人生。

当年的极权制度下，我和大多数“接受再教育”的知青一样，真诚地努力改造自己，“争取表现”，偶们实际上是在自觉不自觉地泯灭自己的个性，精神上自残，以求适应制度，从而获得个人的前途发展。后来我的同代人都明白是上当了，但他们大多数都不愿不敢也没有能力正视、反思，因为早已经适应了、习惯了，麻木了。专制制度就是建立在精神奴役之上的。直到今天。

当年的知青偷渡者最大的亮点，就是这种追求，虽九死而不回的追求。

留在内地的知青，现在不少人生活水平和海外当年那些偷渡者已不相上下，甚至超越。于是有的人居高临下评说：何必当初！

世俗的眼光总是以成败论英雄，须知麻雀飞得再高还是麻雀，鹰隼坠地还是鹰隼。铜墙铁壁的旧制度是谁去动摇破坏的？难道靠雷锋？靠陈永贵？靠江水英？靠李双双？靠赵曙光？靠……？

遇罗克、林昭、李九莲、杨曦光、顾准、张志新……无疑是舍生取义的真英雄，因为他们“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牺牲小我以成全大我。

还有一些被视为落后分子的卑贱者，在“农业学大寨”的高潮中他们悄悄分田包干，暗中开荒种自留地；在“割私有制尾巴”“打击投机倒把”的萧杀口号下，他们冒险贩运倒卖；在被视为国策的轰轰烈烈的“上山下乡运动”中，他们有的曾成立组织，写大字报批判这场运动，有的上访绝食抗议，有的冒死蹈海逃亡……尽管他们不是新制度的缔造者，但他们却是旧制度的掘墓人，他们以追求小我开始，结果却成就了国家民族的大我。

自由生存权，是天赋人权。反抗社会制度的不公不义，敢于追求自身的合理权利的“个人主义者”，远比那些“大公无私”的时代楷模来得真实。捍卫自己的人权，实际上同时也是在捍卫他人的人权。只有当民权（人权）在和国家权、资本权三方博弈中壮大，得到保障，不会被轻易侵蚀，社会才能健康稳定向前发展。

——录自2013年2月18日给ＫＡＴ的电邮

阿陀文集：http://hxzq.hk22.zgsj.net/showcorpus.asp?id=210

老知青聚会还要唱“样板戏”吗？

近日，一友发我一邮件，是转帖一篇“令人深思”的文章，讲“样板戏”的前世今生，主旨是严厉批评“样板戏”公演之事，认为是“文革”未能彻底肃清的严重后果。“样板戏”公演有为“文革”张目之嫌。

呵，呵。很玄。乍一看，快要冒出冷汗了。但想一想，又不敢盲从此文观点。首先我想到老知青聚会，几乎无不唱上几曲，包括“样板戏”在内的“红歌”，一定是首选。这不仅仅是“玩一下青春年少时的那些想法”，还是一种人生价值观的宣示。这群人曾经共理想同命运，青春期的主流意识，早已植根于脑海深处，一旦唤醒集体记忆，势必不顾当下个人各异的思想状况生活习惯，而直奔趋同的内容。

再一想，一方面是到处可见的老年群众自发的广场、聚会歌咏“样板戏”或“红歌”；另一方面，有很多文化精英批评甚至批判包括“样板戏”与“红歌”的“文革”余韵，显然是当下社会意识存在裂层。两者的区分，千万不要用政治性语言区定性。我认为归结为个人的经历与感受所致为好。

相同的事情是，很多老知青谈“青春无悔”的说法，也颇受人质疑。犯的着吗？老知青谈“无悔”，是坚持自己青春期的价值观，并不虚假，对社会无害而有益。用得着某些精英挖苦否认吗？其实，老知青的更高价值还在于人生“无愧”。

社会有裂层，古今中外一致的。怎样处理？五花八门，怎么评价，只能远看，再过五十年看“文革”、看“老毛”，将更有趣。（我以为到那时，直接受害者或受益者都过世了，会忽略某一些，更突出某一些。届时，“红歌”与“老毛”，一定不会沉淀。）

我也想到：老知青坚持青春期的“无悔”与晚年回顾人生的“无愧”，两者结合起来，将是一代老知青传世的历史形象。

想了这么多，那就下次聚会时，再“玩一下青春年少时的那些想法”吧！唱一唱，何妨？

2015-01-07

告别“知青时代”———致老知青们

早晨起床之后，推开窗户，看到晴天才有的朝霞，想到现在是岁尾时刻，即将迎来新的一年，不免有一些小的激动。

旧的岁月终将要过去，新的岁月有些希望，还会有一些未知，知青退休一族在享受安逸与快意的同时，总有一些迷茫。特别是心思重的“族友”几乎每一天都会产生对往日的回想，检点自己在哪一些事情上是否有一些缺失？或者推想人生过程中的若干个“可能”。于是心思不减反而加重，加速脸皮纤维的叠连。殊不知往事休矣，徒念无益！这也不是知青退休一族特有的现象，大凡老年人缺乏自我调控能力，一定会给自己寻找一些不必要的烦恼，就是“自虐”或“苦忆”。

我们则要自勉与互励：一定要跳出老人“苦忆”的定律。怎样才能做到呢？关键是要把握住老年人自有的健康的价值理念。我略作思考，归纳出几条：

第一条，多向前看，明确今后的第一要务是什么。过去的岁月不可逆转，有值得回味、有助于晚年作甜蜜回忆的不妨记录下来（立体式的、文字图像录音皆可），自我欣赏、请人欣赏或传世皆可；有不如意的、甚或难堪的，大可忽略不计。向前看，则是要聚焦今后的目标，把关注自己与关注老伴作为第一要务，若有余力则去关注晚辈。

第二条，关注自己要不断调整方式方法，做事与思维都要灵活机动。说关注自己，不是要把自己与世隔绝，独来独往，恰恰相反，应当是有利于自己和老伴的事多做，不利之事不做或少做。视不同状况而论，身体状况好、天气好的、心情好的的时候，多出门走走，多与同类人多交流；想方设法创设一些新项目或坚持一些好项目，有利于身体健康包括心理健康。

第三条，对晚辈的关注要力所能及与适度，（包括物质上的照顾帮助付出与思想上的教育引导）；切忌超出能力范围或无节制地“添砖加瓦”。

第四条，不给自己或老伴提“奋斗目标”。该退休与休养了，就要讲究修养，做凡人之事，不要自我加压，套责任加负担。谈凡人的晚年贡献，就是少生病，少吃药，多做有理有益之事，不做伤神添乱之事，不与能人伟人比肩靠拢。

以上各条想出来之后，告诸“族人”，除了请教之外，还是想与“族人”一同走向2015年，在心理上告别“知青时代”。

2015-01-03

一位农民工朋友谈“知青精神”

我有一位朋友，建筑业里小有名气的一个头。按照他的谦虚的自嘲：民工。这位自嘲的民工头可是一位大学本科毕业的新时代的“民工”，今年快四十岁了。

国庆节后，他非要拉着我喝上一壶。喝着喝着不知怎么扯到我们当年上山下乡的事情上了。

乘着酒兴，我告诉他可别小看我们这些当年的知青啊，我们上山下乡的时候，你还穿开裆裤呢。

我们聊到了最近被炒得厉害的“知青精神”。我告诉他有人总结为6条：爱国为民的责任意识、自主自强的自立意志、艰苦奋斗的顽强作风、团结协作的团队风格、探索实践的务实态度、无私牺牲的奉献精神。

他喝了一大口酒说：扯蛋，你说的那个6条放在我们民工身上还差不多。

于是我把这位朋友的精彩“论述”一一记录在案，值得深思了——

这些发明伟大精神的人脑子出毛病了。这些“精神”嘛放在我们这些民工兄弟们身上还差不多，可以说基本一致。只是你们知青是从城市跑到了农村，去接受再教育。我们民工则是从农村来到城市，为伟大的改革开放事业做出新的贡献。不信我一条一条分析给你听，你们那个“知青精神”真是“放之四海而皆准”啦。呵呵，时髦的话就是具有“普世价值”啦。

其一：爱国为民的责任意识。民工们进城绝对具有这样可贵的精神。爱国，舍弃了农村的田园，抛妻离子来到城市，为国分忧啊。为啥呢?在农村里吃不饱穿不暖呀。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你们知青前脚离开农村，我们这些农民兄弟们后脚紧跟着你们的脚步来到城市。我们农民也是在担当嘛，不给国家添麻烦，到城里来自食其力养家糊口。这种意识叫做什么?责任!这可要比当年你们知青被强迫下到农村与农民争土地、争口粮强多了。如果你们那时有什么责任呢?为国分忧?你那时就知道自己有这样伟大的胸怀了，这纯属瞎扯。那时你们是没有办法，只好不读书，只好上山下乡，是被迫的。我们呢，是主动的，为了活下去，活得更好才跑到城里的。要不是三中全会以后政策好，我们可能一辈子过着脸朝黄土背朝天的日子了。

其二、自主自强的自立意志。你们知青当年下乡至少还有什么补助。到黑龙江去还可以发上几件衣服，凭着上山下乡证明可以换取一些生活必需品来讲。去农村国家会专门送你们去，到了农村总归有人会安排你们吃住吧。我

们呢，进城啥也没有的。一没有人会给我们安排住房，二没有人会发给我们补助或者是工资，三没有人会出钱送我们进城的。我们全凭着自己的一双手，干着你们城里人不愿意干的活来活下去的。城市，不相信眼泪的。能够生存下去站稳脚跟的就待下去，否者只好回到祖祖辈辈生活的农村去。哪像你们知青，一“造反”就回城了，还要政府像大爷一般给你们一个个安排好工作。这也叫自主自强?现在讲起自己有这样的精神，比比我们，脸红吗?

其三，艰苦奋斗的顽强作风。你们那个时候到农村是够苦的，我们的长辈们已经世世代代在农村苦了一辈子。我听老人们讲起苦日子的时候，都会讲到三年自然灾害的事情，饿死人的，还有吃人的，那才叫苦啊!那时灾难啊!如今在城里的建筑工地上头戴安全帽的基本是我们民工，清扫马路上的基本是我们民工，菜场里摆摊的、做早点的、走街串巷当保姆的都是我们进城的民工。到了春节你试试，我们都要回家了，整个城市差一点要瘫痪了。不像你们知青下乡的时候，肩不能挑手不能提，国家还要补贴你们的。现在还来了一个什么具有顽强作风的，比一下就可以知道什么叫做艰苦奋斗的顽强作风了。想想你们当年一个个为了招工、参军、上大学的时候相互出卖;一个个猴急般地想方设法离开农村。看看你们在大返城的时候那个争先恐后的逃离，怎么还有如此伟大的作风?

其四、团结协作的团队风格。这话听起来有点别扭，就是你们这些文人们挖空心思编出来的。其实就是一句话，团结。看看我们进城的民工们，那才叫团结呢。一个家乡出来的人，你帮我我帮你。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啊!久而久之，安徽帮、苏北帮、苏南帮、温州帮、宁波帮等等一个个“帮”自然形成了。大家守望相助，有福同享、有难同担，这才叫做“团队风格”呢。靠着大家互帮扶助我们才在城市里有了立足之地。哪像你们知青啊，当年都是一个城市里跑出来的，相互打架斗殴的还少吗?为了入党提干相互告密的还少吗?老一辈的人告诉我们，那时你们知青来了以后，斗咱们农村里的人狠呢。什么割资本主义尾巴啊，什么批判小生产农民意识啊等等。这些事情你们干的少吗?也难怪你们，谁叫你们是在“文革”中长大的呢。好的没有学到，阶级斗争的本领学会了，专吃自己人。还有就是为了显示自己是革命的，是紧跟伟大领袖的。真的是害人害己啊!不要忘记啊，不要自说自话说自己很团结。有，但是不多!说穿了，那时为了活着，做出一些错事傻事，能够理解，都不易啊!但是不要自我吹嘘。

其五、探索实践的务实态度。探索实践，四个字怎么念起来怎么别扭。探索就探索，实践就实践，不知是啥意思。只是说务实还像话。与你们知青一比，民工才叫务实呢!对于我们来讲务实就是实打实的挣钱，没有钱能在城里混下去?所以我们对于苦脏累的活，只要能挣钱的就干!你们知青那时探索啥?到农村就是老人家讲的接受再教育嘛，还要你们去探索?你们一定还记得，那时在农村的时候，咱们农民都很实在的，种地吃饭过日子。偷偷摸摸地搞个自留地也是为了生活的好一些嘛。这就是务实。就这点务实的东西还要遭到批判呢。对了，那时你们知青写写批判稿，喊喊口号还能够挣工分呢。这也叫务实?我看不要讲什么探索了，务实还差不多。咱们民工是最务实的一个群体!其六、无私牺牲的奉献精神。这就是在讲笑话了。这个世界上哪有什么无私的东西?你们这些曾经的知青有，那简直是太伟大了。这个无私的后面文章叫做奉献，那么你们奉献了什么呢?青春?由此推论下去就是“青春无悔”了。不错，你们到了农村以后确确实实做过许多对于老百姓的好事。当年在农村里学校的老师大部分是知青，

还有医生、开拖拉机的、搞发电站的等等，这些我们都不会忘记的。如果因为这些就大讲自己具有奉献精神，是不是有点言过其实啊。我看许多知青，包括现在还留在农村的老知青们，都不会炫耀这些的。他们用脚踏实地、勤勤恳恳的努力工作赢得老百姓的信任。再说我们民工呢，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至今为这个国家奉献了多少?我们自吹过了吗?你们这代人中间就是有极个别的人喜欢这一口，生怕人家忘记了自己的丰功伟绩。任何一个群体对于国家和社会有多大贡献、多大作用不是靠自己自说自话的，人民会给予准确的评定的。你看看现在的官方媒体里哪里有什么知青精神的提法，没有!为啥?你们自己要好好反思一下呀!

2015-10-26

知青啊，不要捂着伤口唱赞歌

他是我的博客好友，一名1969年3月17日从上海出发，到贵州独山县基长公社插队8年的上海知青。他是在被荒废了18年以后考上了大学，成为一名教师。他从贵州到了安徽，在离开上海28年以后终于回到了自己的故乡。

他叫黄志涛!在网上，我与志涛早就相识了。在我的博客里许多文章后面都留下了志涛精彩的点评。在我们的邮箱里有着志涛会定期将他的文章发给我阅读交流。我深感志涛是一个很有自己想法的人。无论是当今的天下大事，还是那些昔日的往事，在他的笔端都有着属于他自我的表述。黄志涛的博客起名叫“涛声”，一点也不错：涛声依旧啊!从2011年开博以来的在五百多篇的文章里，能够看到一位老知青、老教师的真诚、幽默、智慧、深刻。

我还是想说说黄志涛关于知青上山下乡的那些文章。

一、“这场运动，实在是荒唐无比的。”我们这些经历了“文革”期间上山下乡的知青，对于这场运动一直有着不同的看法。一直到今天还在争论不休的。那么，究竟如何看待这些呢?其实，有着正义感的知青们早就对于“无悔”之说嗤之以鼻。我早在2011年3月9日就看到黄志涛的文章《“上山下乡”运动意味着什么?》。志涛指出了这个发生在“文革”期间的上山下乡运动有着两个原因——

第一是形势所逼。那场浩劫导致的破坏是彻底而全面的，国家经济陷于崩溃的边缘，根本不可能为青年提供如此之多的就业岗位。而且，把那么多年轻人放在城里是不安定因素。不如把他们送上山，赶下乡，分散开来，在“广阔天地”里吃一点苦，挫掉一些锐气，借此可以安定几年，再想办法处理。

第二是始作俑者是农民出身，他坚信要培养接班人，就一定要让他们在各方面经受考验。把青年送到农村，边疆等最基层的地方去锻炼，只有这样才能防止他们变修，从而培养出合格的接班人。……只可惜这1700多万青年就此成为试验品，其中不少成了牺牲品。

我不能说志涛两点分析已经很完整，但至少说到了这场不得人心运动对于国家和民族摧残以及对于整整一代人的毁灭。

所以，志涛的结论很明确："究竟知青从'上山下乡'运动中得到了什么?各人有不同的体会。要统一起来是根本不可能的。爱怎么想就怎么想吧!但是千万不要还是死抱着什么'青春无悔'那种口号来骗人了。因为大家心里都明白，这场运动，实在是荒唐无比的。"旗帜鲜明!我非常赞赏志涛的观点!如果对于这样一场运动没有这样的基本认识，许多问题何从谈起呢?到了我们行将老去的时候，我们的后代问：为什么会有知青精神?我们回答：这是诞生于"文革"浩劫中上山下乡的时候。那么他们会问：照此说来，是不是说"文革"是不可以否定的?我们回答：不是一回事情。如此狡辩，怎么对得起后人!?所以，我与志涛的观点一致：这场运动，实在是荒唐无比的!在这样的浩劫中诞生什么知青精神，简直就是在为那场运动唱赞歌啊!二、捂着伤口唱赞歌，我可怜你、鄙视你，警惕你的不良动机!由此，我想到了最近以来有关知青上山下乡话题中那些极不负责的言论。从发明"知青精神"为一个总的源头，变着法在为那场浩劫唱赞歌。用志涛的话来讲就是捂着伤口唱赞歌!我特别赞赏志涛在2011年底写的那篇《流血的伤疤》一文。他指出，"如今上了一点岁数的人，都经历了严酷的风风雨雨的考验，身体和心灵都有各种各样、大小不同的伤疤。许多人的伤疤至今依然在流血;有些人的伤疤即使已经结痂，但是非常脆弱，经不起哪怕是最轻的触碰。别人不经意的一句话，就可能使得伤口迸裂，鲜血汹涌而出，让人痛不欲生。"志涛认为，我们这些知青的伤疤是实实在在存在的，不可否认。所以，志涛义愤填膺地斥责：

如果你是捂着自己的伤口唱赞歌，我可怜你，为你难过!如果你是捂着别人的伤口唱赞歌，我鄙视你，还要警惕你的不良动机!志涛说：因为幸福生活不是靠谁恩赐的，而是我们自己争取的，不是吗?说的好极了!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道理是我们这代人用血和泪的洗礼以后才真正明白的!从崇拜、迷信"大救星"开始，到"9·13"以后的大规模的觉醒，一直到"实践是检验真理"。渐渐地我们明白了，原来就唱过的那首《国际歌》早就说了，从来就没有救世主!于是就有了知青的大返城，于是就有了我们这代人逃离农村的举动，于是就有了上山下乡的被终止!但是生活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它是不相信眼泪的。回城，就业，下岗，退休等等。当一代人走完这段路以后，该怎样去面对昨天的故事呢?志涛啊，你讲的太好了——捂着伤口唱赞歌，我可怜你、鄙视你，警惕你的不良动机!三、不愿否定"上山下乡"，实质上是不愿意否定自己!为何会出现这样捂着伤口唱赞歌的现象呢?是健忘?是无知?是故意?我一直在思考这些问题。一些人不愿意你再谈及"文革"，不愿意你再去讲上山下乡的不是，不许你们"揭伤疤"并美其名曰要"正能量"了。

志涛在《知青研究学究竟研究什么?》一文里回答了这个问题："我们处在一个不喜欢，或者是害怕检讨历史的时代。不喜欢也罢了，这研究还隐藏着各种危险，非常容易不小心触及敏感的问题，引发各种麻烦。"这次聚会的时候，志涛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在这篇文章里也有讲述："最近，我接受了一次访谈。找我的是一位在国外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中国人，他准备的博士论文题目就是关于'知青研究'的。""访谈持续了大约两个小时之久，还

要录音，做笔记。提出的问题很多，我是有问必答，谈话是非常坦率的。据说他已经访谈了各地许多的知青，在他回到国外前告诉我说，我是所以访谈对象中最具有批判性的一个。对这样的评价我感到惊讶和悲哀。在访谈进行到三分之二时，下一位访谈对象(当然也是一位知青)来了，就坐在旁边听我们的谈话。等到结束时，我向他表示抱歉，让他久等了。他却直截了当地告诉我：‘你的看法我不能苟同。’我说：‘这很正常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观点。’但我心里的确感到难过。为什么还要有人唱赞歌呢?我不禁想象，要是由他们这样的人来研究知青，写出书来，那么离开事实真相有多远，真是难以估计的。”第一，从这段讲述中可以得知，志涛是在讲真话!第二，那个持不同意见的知青就是那位连《失落的一代》一书看都没有看过就下结论是“坏书”的人。我曾经与其交锋过两次。现在不少朋友劝我，你再与这样的人纠缠下去，你也会成为一个神经病的。

是啊，在曾经的知青当中确实有这样的“神经病”、“留级胚”之类的人物。所以志涛明确指出五点：

1、知青是个筐，什么人都可以往里装。从高官到底层百姓，各行各业，都可以曾经是知青。因此，知青并不是一类人!把知青当作一类人来分析，本身就错了。

2、所谓“青春无悔”是根本不存在的。因为是“一片红”，大家都没有选择，既然没有选择，何来“有悔”还是“无悔”?3、不愿意否定“上山下乡”运动，实质上是不愿意否定自己。处于读书年龄的年轻人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还要说剥夺得好，对自己和对国家都有好处，还有比这个更荒唐的么?说自己被锻炼得更坚强了，那么为什么不继续留在那里锻炼呢?为什么要采用各种手段离开农村，甚至那么多年也不愿意再回到那里去呢?唱高调还唱得不够么?可以歇一歇啦!4、我们每一个知青都需要反省自己。在文革当中，在上山下乡运动中，大家或多或少都犯过一些愚蠢的错误。这是一句许多人最不愿意听到的意见。很多人有强烈的健忘症，总是尽力把那些不光彩的东西全忘掉，或者竭力掩盖起来。这样的人往往有另一个特征，那就是有非常大胆的吹嘘的本领，无可以吹出有，小可以吹出大来。

5、知青研究领域应该无禁区。这样才能公平，全面，科学地来进行探讨。所幸的是，如今绝大部分知青依然健在。要是大家再等下去，等到知青都死了，或者老得稀里糊涂了，那时候，研究出什么成果，也不会有比较权威的评论了。于是，恐怕离开真相就更远了。因此，现在正是知青研究的大好时光。

这五点讲的多好啊，值得我们这些曾经的知青们好好读读。尤其是那些发明所谓的“知青精神”的人好好思量一下。这不是一个普普通通知青真诚的呼喊，更是一种对于那段历史负责的一种态度啊!研究什么?现在还要不要研究?谁来研究?讲真话还是假话?等等。今天再读志涛的这些文章，我感到在这些普普通通的知青里有着许许多多这样在讲真话的朋友。

我引以为自豪!四、反省，以防再犯，彻底摧毁可以生长“毒苗”的土壤就像我在解读陈震祥的文章的时候讲

到的，我的这些朋友都有一个坦荡的心胸。他们在反思中能够分析自己、否定自己，才有了如此的胸怀。因此他们才会对于造成一代人被不幸的原因进行冷静的思考。

我特别欣赏志涛那篇文章《让文革真正成为历史的关键一步》。志涛讲到了他的一位同学的故事。

文革时期，他所在的班级里有一位同学打了班主任几个耳光，打得老师几乎站立不住。文革结束以后，这位同学从农场返回上海后亲自登门拜访曾经被他殴打过的班主任，当面向他诚恳道歉，承认自己的错误。这个道歉感动了这位曾经的圣约翰大学毕业生，他说：自己干的坏事，就应该道歉。道歉后他顿时觉得无比轻松，终于良心得到了安宁。

志涛在讲述这件事情的时候很坦然，我感叹他的这段文字。他说——

“其实我也有需要道歉的事情。我当然没有参与批斗，但是我写了大字报，使用了恶毒的语言，无中生有的手段(那时的大字报都是那样的，不如此不能吸引眼球，不算革命到底。)，加上我的毛笔字在班上是一流水平，凡是抄写大字报，也都是我的任务。天知道我笔下流出的‘毒箭’，伤害了多少人?我不应该去当面道歉吗?可我没去，没有机会了。因为等到我返回上海，我的班主任已经走了。同学聚会时，大家说班主任那时最喜欢我，可我对他做了什么?一想到这件事，心里非常愧疚!同时，我也很为那位同学的果敢举动感动!”志涛是好样的!对于这个道歉，不是所有人都能够做到的，尤其是那些在浩劫年代里曾经做错事情的人。其实，我们每一个经历了那个年代的人，还有多少人在这样反思自己呢?从上到下，“一直伟大”、“一贯正确”“永远光荣”的雾霾至今还阴魂不散啊!这就是当今我们一些人得了健忘症的根源!志涛在问：“我们的现状是，究竟有几人敢于站出来认错?‘朗读者’这本书我读了，很震撼!在纳粹时期，无知的人可以做出大恶之事，但遗憾的是，无知不能成为为自己辩护的理由!就像法庭上时常出现的嫌犯的自我辩解‘我不懂法’那样，既令人恶心，又逃脱不了罪责!”志涛说的好啊——“清醒认识到错误，以防再犯，从而彻底摧毁可以生长‘毒苗’的土壤。对此，还有什么可怀疑的吗?”五、不要再让我们这些亲身经历一切的人来接受谎言的洗脑可能吗?这需要时间。估计不会太久吧。

我之所以喜欢志涛的文章，因为感觉到他的那些文字没有矫揉造作无病呻吟!对于知青上山下乡这个问题句句都是在讲真话啊!一部电视剧《知青》遭到了许多有着知青经历的人的批评。志涛在他的《知青三定律》一文中指出：“上山下乡运动是彻底失败的。否则为什么几乎所有知青都返城了呢?即使是下乡铁杆扎根派，不是也离开了吗?甚至还跑得比谁都快!下乡时表决心，写血书;结果到了返城的时候，还是写血书，表决心。当然，很可能这不是同一批人所为。但是，知青基本都返城了，这难道不是事实吗?要是我见到哪个‘青春无悔’的家伙，我一定要告诉他：请他回到‘无悔’的地方去，我来欢送!不过，也许我不敢。因为我明白，和这样的人讲道理，耐心再好也难，怕是要从头启蒙。所以还是不惹他们最好，由他们去‘无悔’好了，也算是给自己失败的青春拼命留一点安慰吧?”先前有所谓的“无悔”与“有悔”之争，如今又发明了一个伟大的“知青精神”。在一部分人的眼

里，“文革”不对，“文革”期间的上山下乡不对。但是在这个年代里，我们知青为国担当、勇于奉献、吃苦耐劳等等。这个知青精神是“具有传递社会经验的世界价值。”“成为激励我们自己和后人的精神源动力。”在《何为知青精神?》一文里，志涛斥责这种极不负责的说法——何为知青精神?知青精神既不属于某种个性化的精神世界，更不属于先进文化培育出来的精神空间，而是一代人扭曲的精神轨迹的代表。这代人自幼在封闭的环境下接受彻底洗脑、在中国特定的“革命运动”背景下土生土长。他们在应该受教育的年龄被剥夺了学习权利，以至于他们当中的很多人至今仍然是无知无识的一群人，称呼他们为知青，简直是极大的讽刺!是啊，应该醒醒了!有朋友告诉我，现在继续讲什么知青精神，是一种变相的“无悔”论。

是不是呢?不管怎么说，我们总不应该为那个苦难唱颂歌吧!这就是我今天介绍志涛的这些文章的原因。

黄志涛，就像他用“涛声”来为自己的博客起名一样，涛声依旧!依旧在耕耘着，从天下大事到曾经的上山下乡。在他那里，你能够读到一种真话啊!真话，一种有力量的话!

2015-10-09

余 杰文集：http://www.hxzq.net/showcorpus.asp?id=213

华夏知青网不是赢利性的网站，所刊载作品只作网友交流之用
引用时请注明作者和出处，有版权问题请与版主联系
华夏知青网：http://www.hxzq.net/
华夏知青网络工作室

我说知青与再教育

在网上看见凤凰网的一篇文章，http://news.ifeng.com/a/20140813/41563189_1.shtml 厉以宁谈知青：那时候人人想这日子何时到头，2014年08月13日，来源：光明日报。遂追踪到光明日报，该报的8月12日第七版“书评”http://epaper.gmw.cn/gmrb/html/2014-08/12/nbs.D110000gmrb_07.htm 是一个专页“从北京到延安，青春的梦想与回忆——《北京知青与延安丛书》笔谈”，据此通栏大标题就不难得知其中的主旋律了。该版打头的文章就是厉先生的文章，题为“青春早逝乡土情深”。上述标题与凤凰网页的标题显然不是同一风格。此外，凤凰网页上还配发了在光明日报版面上没有的九幅知青要求回家的经典历史照片。看来二者的编辑思路不尽相同。

厉先生在文革中的1969年作为北京大学教职员工被下放到江西南昌县鄱阳湖边的鲤鱼洲农场，时年39岁，大学毕业已经14年。他说，到鲤鱼洲“隔了两年，我们回到北京。知青下乡继续来了。我的女儿北大附中毕业后，分配到北京昌平区马池口公社西坨大队插队劳动。我的侄女，有的到北京南口插队，有的到北京温泉插队。她们全都有过这段经历。”这样的说法似乎无可厚非，但是他这样的经历未必就能够说得清那段历史。他自己是“干部编制”（拿工资的，俗称“吃皇粮”），下放江西也只有两年，肯定没有插队的亲身体验；他的女儿侄女虽然插队，但都是在北京郊区，所以也不会有跨省下乡的感受。所以，“她们全都有过这段经历”都是不全面的，并不能涵盖全部。因而，在评论上山下乡运动时，难免以偏概全。

果不其然，随之而来的说法就离谱了。厉先生说“他们下乡插队或进入各个生产建设兵团时，都记住了一句话：“农村是一个广阔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这句话后来被概括为八个字：“广阔天地，大有作为。”这曾经激励过无数青年报效祖国的宏愿与梦想。”也许厉先生是“30后”的缘故吧，对五十年代中期提出的“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印象深刻，可是，他忽视了一个重要的历史事实——1968年年底开始出现的上山下乡运动，并不是像文革之前立足于“广阔天地大有作为”，而是根植于著名的1968-12-21“最新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前者在五十年代中期到六十年代上半叶基本上是出于就业等经济因素，后者则是突出了政治因素，由于文革政局混乱经济停滞，计划经济体制下不可避免的就业难题进一步加剧，在政治统帅一切的大前提下，提出“再教育”口号，把上山下乡变成一种强制性行为，从而掩饰经济真相与根本目的。无视这一点，是对那段历史真相的罔顾乃至亵渎。

厉先生接着说——组织“知青”下乡，一举三得：一是大大缓解了社会就业状况，因为到农村插队落户，或者

到生产建设兵团劳动，都等于就业了；二是当时的农村确实需要年轻的劳动者，每一个村增加几十名知识青年参加劳动，是可以安排的；特别是山区，增加一批年轻的劳动者，可以垦荒、修路、植树造林，有的是活，不愁安排不了；三是对于这一批年轻人来说，这也是懂得中国国情的一次再教育机会。

这里对上山下乡运动归纳了三大作用。现今对“缓解社会就业”一说不大有异议；但要说当年农村“确实需要年轻的劳动者”就难以服众了，因为那只是局部现象，而且重要的是那样的“投入”究竟“产出”如何，应当有经济学的评定，需要确凿的数据，不能不顾事实地想当然；至于最后一个作用就更加令人质疑了，“对于这一批年轻人来说，这也是懂得中国国情的一次再教育机会”云云，仿佛又回到了四十六年前的九月份，正是那时候“再教育”的口号开始响彻大地。

当年是怎样解释“再教育”的呢？1968年9月12日，署名为“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评论员”的文章见诸报端，题为《关于知识分子再教育问题》。现在从《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一书中得知，那篇文章是经过毛泽东审阅修改的。文章对刚刚出台的“再教育”如是说——

为什么叫再教育？因为过去接受的是资产阶级的教育，现在接受的是无产阶级再一次的教育，这是一层意思。还有一层意思：过去是在中国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路线毒害下，受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教育，现在则是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由工农兵给他们以再教育。世界观的改造是根本的改造。用无产阶级世界观教育知识分子，使他们改变过去从资产阶级教育中接受的资产阶级思想，这就是再教育的内容。同工农兵结合，为工农兵服务，则是再教育的根本途径。

那场持续十多年的“再教育”，已经被实践证明是错误的，上山下乡运动也已经寿终正寝三十多年，居然还在为上山下乡运动和再教育理论评功摆好，实在匪夷所思。

也正因为有了上述对“再教育”的充分肯定，所以随后的几段就越发离谱了，把上山下乡运动中的千百万知青说成是心安理得地融入社会，而且被塑造成为新人！

厉先生说，在经过“再教育”以后，“知青”才从心里开始融入当地社会。下乡“知青”们渐渐地像变了一个人似的，同当地的农民越来越亲，越来越把这里当成自己的家。他们和当地的农民，其中有老人，有中年人，还有年轻人，逐步打成一片，他们真正融入了当地社会。他们在山间地头同农民们一起叙述家常，一起谈论把穷山沟改造成新农村的畅想。问他们：“还想不想家呢？”回答是：“没有时间想，只想到眼前的农村要变化，不变不行，哪有闲工夫去想家呢？”问他们：“有什么打算？”回答是：“加把劲，把穷山沟改造好，这就是我们现在的愿望。”按照这样的说法，又该如何解释1978年底开始的“大回城”呢？不能忘记的是，那场“大回城”在八十年代初就被“知青”借用一部电影的名字称为“胜利大逃亡”。

厉先生还称——说上山下乡的几年是自己一生中最有意义的几年，这句话一点也不假。这是“知青”们的心里话。他们变了，他们不再像刚来时那样娇气、那样文弱，那样自视甚高，那样不合群。他们融入了当地社会。有些“知青”当上了村干部、乡干部，有些“知青”被调去办社队企业了，有些“知青”经过培训成为赤脚医生，还有些“知青”做了小学或初中教师，辛勤地教课，批改学生作业。他们像变了一个人似的。这就是环境的力量。环境在无声无息地改变一个人，重新塑造一个人。

按照这样的说法，当年的“知青”俨然已经成为一代新人了！因此就不难得到推论，那样的“再教育”是很有必要的，大有成效的。

即使厉先生以经济学研究者的目光，看到了“知青”大回城对就业政策、发展私营企业等经济改革的推动作用，但是，没有从历史、社会等广阔角度上看到上山下乡政策这种倒行逆施对国家发展、民族进步的巨大破坏作用，进而把那场上山下乡运动的“理论基础”——“再教育”置于推崇备至的位置，实在是对历史的歪曲，对后人的误导。

多年来对上山下乡运动争论不休，只有彻底否定“再教育”，才能正确评价上山下乡运动。这就好比只有否定了“两个估计”，才会有“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只有否定了“两个凡是”才会有思想大解放。

网中人文集：http://www.hxzq.net/showcorpus.asp?id=162

华夏知青网不是赢利性的网站，所刊载作品只作网友交流之用
引用时请注明作者和出处，有版权问题请与版主联系
华夏知青网：http://www.hxzq.net/
华夏知青网络工作室

岂容青史尽成灰

——读《告别知青》有感

前两天，我看了胡发云先生的博文《告别知青》后发了个评论，知青博友“网中人”对我的评论发表了意见，我又就此做了个较长的回复，可是第二天该回复却不见踪影了。我不曾给那个回复留底，又不甘心就这么莫名其妙的任它消失，便索性写了如下这篇博文。

为了让网友们看得更清楚，我把胡先生的文章贴在前，我的文章放在后：

胡发云：《告别知青》

按：赴欧前夕，《今晚报》约稿，我给了这篇十一年前的旧文。此文除了当年在《华夏知青》、《老三届》等知青网站上贴出，从未公开发表。我知道，“知青”这两个字对许多人来说，意味着什么。我不忍撕下这块温柔面纱，让人看到背后的冷硬与残酷。今天大家终于看见，同为知青，有的是压迫者，有的是受难者的现实。媒体做了一些删节，去掉了一些敏感文字，现将完整稿发在这里。

发表稿网址：http://news.163.com/14/0717/14/A1C5CQOM00014AED.html

知青——这样一个极左年代留下来的，给数千万青少年及其家庭带来不幸、痛苦与灾难的巨大怪胎，一个无数青少年日夜渴望摆脱，甚至不惜割舍一切以死相拼的社会身份，一段让无数人刻骨铭心不忍回目，身心受到巨大摧残的生活经历，后来是如何成为一个让人怀念，让人动情的温馨词儿的呢？

其实，知青从来就不是一个有共同理念，共同利益的共同体。它只是纪元意义上的一代人，甚至只是这一代人中的很大的一部分而已。这个社会有多复杂，它也同样有多复杂，这个社会有多少利益冲突，它的内部也有多少利益冲突。只要看看“知青”的前史——文革前及文革中的中学生——他们各自的背景，思想，社会地位与社会利益就可以知道了。他们当中有的是左派学生干部，有的是背着沉重家庭包袱的黑五类，有的是可以拿皮鞭抽人的，有的只有认罪的份；他们有的造过另一部分同学父母的反，有的后来又翻过身来将对方打成各种另类，有的锦衣玉

食，小车接送，有的小小年纪就去卖冰棍拖板车……再来看看“知青”后史——有的通过自己的努力，进入主流社会，有的倚仗家族背景，掌握各种权利，有的下岗，沦落社会最低层，有的下海，摸爬滚打或招摇撞骗之后成为高尚人士，有的成为有各种职称头衔的国家精英，有的永远停留在小学毕业的学历上，有的已经香车华屋，有的一日三餐无着，而那些早已做了高官巨贾的知青，向来是不会将自己当成天下知青的一员的，他们中的许多人，除非做秀需要，从来不会张扬自己的知青身份，一个国企或私企的老板，如何会与他手下打工的老知青“天下一家”？……至于真正做知青的那一段岁月，这个群体中也是五颜六色的，有提干的，进厂的，“推荐”上大学的，也有在人走屋空的山乡苦苦等待，等待返城与家人团聚，也有终于将一把年轻的白骨扔在异乡了的。相互间的倾轧，构陷，龃龉，打斗也是家常便饭，特别是面临一些利益冲突的时候。而这些，在还没有来得及清理反思的时候，就被日后的时代变动掩盖，直到另一个温情怀旧的时代到来。

在一篇文章中我曾说过，当年的红军长征演化成后来的《万水千山》、《长征组歌》之后，它就不是原来的长征了。那种非人的物质性苦难，已经再生产为精神性、甚至是意识形态的新产品。对于当事人，可以把它当作肉体苦难淡忘之后的心理抚慰，也可以当作后来政治身份的一块标记。对于后来人，它只是一种审美化了的浪漫情怀，是一些壮美的画面和动听的旋律。

对“知青”的回顾与怀念，在某种程度上和上面的例子是同质的。当年的肉体之苦，转化成战天斗地的英雄主义豪情。当年的心灵之苦，成为个人磨砺的精神财富，当年的单纯，热情，成为今天世风日下尔虞我诈的比照。当年的温情，更是成为青春岁月中永远闪烁的星光，返照着今天日益或落寞或喧嚣的内心……

“知青”这个多少人多少年来唯恐甩之不脱的社会身份，在七十年代后期终于从中国社会舞台上逐步淡出，其后很多年间，除了一些知青作家将它作为文学素材，大多数原知青早已忙着奔向眼花缭乱或百废待兴的新生活。知青生活往事，只是偶尔成为个人的一丝怀想，而没有发酵成社会生活中的一只大酒缸。这就是为什么许多老同学老插友最后的见面都间隔了十数年甚至数十年。

“知青”这个词重新在社会上活跃起来，始于九十年代初期，九十年代中后期达到高潮。注意这样的一个时代背景：8/9风波中止了一场长达十年的全民参与的社会改革，沉寂数年后，邓公南巡，开始了单腿的全面走向市场经济的变革。在这场大震荡中，立足未稳的广大原知青，由于年龄，学历，知识结构，思想观念，家庭拖累，及政策上的种种局限，大批的、迅速地滑落为弱势阶层。年轻时代的宏大理想，插队期间的革命豪情及返城之后跟上时代步伐的艰苦努力，很快变为虚幻。他们中的许多人，已经再没有力量与这个巨大的变革较量。种种的社会不公，让其中有些人回过头去，怀念那个艰难贫困但比较平等的年代，怀念那个年代里多少还保留着纯洁，热情，豪迈，坚韧的道德情操。由于迅速的边缘化，这些过惯了社会集体生活的老知青，渴望寻求社会认同。另有一部分努力改变了自己命运的成功人士，从另一种心理需求出发，与前一部分人汇合，形成了长达数年的知青文化热潮。

但是，在这数年的知青文化热潮和知青社会交往中，由于种种主观和客观的局限，存在着很大的空洞与断裂——那就是没有认真清理与思考这一代人在中国社会政治生活中的种种问题，特别是文革中的问题，只将主题限定于相对单纯的插队时期，失去了对自己一代人在中国当代史上地位、作用、失误的重新认识。也失去了一个反思与提升的机会。这既是十多年来意识形态管制使然，也是这一代人自身局限使然。直到今天他们中的一些人还希望用往日的浪漫主义情怀，来温暖自己苍凉的心。还残留着旧时代虚幻但是已经无力的理念，如乌托邦式的社会平等，义和团式的反智主义，以及对于阶级斗争时代的隐隐怀念并从这样的立场出发反对今日的种种腐败与堕落。即失去了旧的政治历史资源，又无法吸纳当代世界文明主流的思想理念，即被传统政治力量所抛弃，又不为当今的利益集团所青睐，这一切，已经明确显示出原来知青一代正在集体从历史舞台退场。

所以我说了，“知青”这个词儿，如今只承担着一点脆弱的道德情怀，它更多只是一种心灵抚慰剂，一处无所寄托的灵魂的避难所。在这次的论争中，一些意见依持的也常常是这种道德情怀，或对社会发展中必须建立的社会差序的本能的反应。实际上，一个在这样虚拟的民主训练中，持守强硬立场的人，在现实生活中，可能恰恰是一个逆来顺受，一切认命的人，这就是一个真正的悲剧。

如果不给这个词再次注入新的内容新的生机，那么它最后的作用，只能用于我们这一代人的临终关怀院。那时，让我们为那些即将离世的老知青们唱一首知青喜爱的老歌，讲一些插队落户的忧伤又温暖的故事。让离去的人，在一种温暖梦幻中，告别这个梦魂萦绕的名字。

我们所有经历过上山下乡的人，只有通过我们每一个个体的重新确认，才能让这一代人共有的这个历史名称，以另外一种方式，另外一种形象，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历史上站立起来，让别人说，这些人原来当过知青。而不是相反，在这样一个历史大词下面，数千万人却消失了，只剩下那个旁人与后人都不再感兴趣的两个汉字，进入很久之后的辞典。

写下这些，我终于把我数年来想说的话说了出来，这是非常艰难的。十多年来，我曾为这样一个词付出过许多，但是我现在必须向它告别，为了我自己的思考，也为了不再在这个大词下逃避历史的真实，逃避我们当下面临的窘境，逃避未来的拷问与追究。

2003年8月31日

唐燕：岂容青史尽成灰----读《告别知青》有感

我赞同胡先生十一年前对当时知青状态的大部分分析，并欣赏他的这个观点:“对‘知青’的回顾与怀念，在某种程度上与当年的红军长征演化成后来的《万水千山》、《长征组歌》之后，它就不是原来的长征了是同质

的。”“知青文化热潮和知青社会交往中，由于种种主观和客观的局限，存在着很大的空洞与断裂”，应该“给知青这个词再次注入新的内容新的生机”。

但毕竟此文是十一年前写的，已稍显过时。胡先生早在十一年前就在该文中指出：知青的种种状态“已经明确显示出原来知青一代正在集体从历史舞台退场。”这点我不能认同，请问胡先生，自您写这篇文章以后的十一年里“知青一代正在集体从历史舞台退场”了吗？如果您的答案是肯定的，请拿出“明确显示出”的事实。

事实上，虽然上山下乡运动早已成为历史，现在知青中的绝大多数也都已退休，但多年来，正因为知青一直是个不可回避的历史文化现象，所以知青这代人对中国社会产生的影响远没有消失，今天乃至十一年前知青这个群体及其生机从未曾划上句号，胡先生说的知青的“后史”也并没有结束。

十一年后的今天知青的现状是：

1、中国知青研究在国内外继续蓬勃开展，尽管的确部分存在着胡先生说的“没有认真清理与思考这一代人在中国社会政治生活中的种种问题，特别是文革中的问题，只将主题限定于相对单纯的插队时期，失去了对自己一代人在中国当代史上地位、作用、失误的重新认识。也失去了一个反思与提升的机会”，但毕竟有国内外一大批知青学者，如刘晓航、定宜庄、刘小萌、米鹤都等以及如美国的托马斯伯恩斯坦、法国的潘鸣啸仍在坚持正确的学术方向，进行着大量的收集史料、认真深入卓有成效的研究。

2、仍有一些知青在各自的岗位上发挥作用，尽管他们基本上都没有“张扬自己的知青身份”（媒体和个别人对曾是知青的高层领导有过宣扬）；3、尤其是很多已经退休的知青没有放弃自己的历史责任和神圣话语权，正以积极的心态主要在网上回忆、反思、书写着自己的过去和现在，正努力突破某些知青话题禁区，表达着自己所思所想。虽然他们大都是第一次写作，但因是把自己最刻骨铭心的、经过数十年筛选与咀嚼的体验写了出来，所以最真切。有人统计，知青是当今写回忆的最大群体，知青的回忆性写作已成潮流。这些写作不仅在于数量，更在于以草根的形式和力量，补充、修正、完善着上山下乡运动这页当代史的重要篇章，并逐步推翻某些权威的论断，使少数专家把持的知青史学和知青文学走出象牙塔，从而焕发出勃勃生机。其中尽管水平参差不齐，有胡先生指出的种种不足，但在我本人极其有限的视野里，就不乏佼佼者，这里仅举几例：

就在今天，有知青网友向我推荐了重庆知青海若的系列博文《我去当农民》。这六篇博文极其生动有趣地描述了他回老家当农民的曲折经历，网友六六评论道：“看的我乐死了——你别嫌俺不厚道啊，你是俺听说过的、当农民当的最费劲的一个人——比人家知青鼓捣回城都费劲！”海若的博文另一特点是知青的参与度极高，仅该博文后的一条有关农村如厕的评论，竟引来后面85条之多的跟帖。

尽管如此，海若的博文或许不符合胡先生期待的“以另外一种方式，另外一种形象，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历史

上站立起来”的标准，那么请博友们一定去看看曾在内蒙草原插队多年的北京知青冷明的博文《一出永不上演的知青戏》何其精彩深刻！

冷明说：“网上文章、知青博客就是一部知青史，许多知青的故事在我脑海里串起来就是一部极好的知青戏。”他在该博文里写了一出名为《知青1968》的戏，请允许我多占一点篇幅只引用其中的一段：

“草原上大雾迷漫，十几名穿着蒙古袍的北京男女知青牵着马围着一个小小的坟头。（故事取自：草原恋网站，一名在东乌旗插队的北京男知青骑马摔死了。）知青王二赤身裸体地躺在草地上，小和尚支楞着朝向天空，上不了学，娶不上媳妇的男知青不自量力地想女人。（取自：王小波的《黄金时代》）北京男知青被打成反革命，一个人在荒山野岭上的蒙古包里，长期见不到一个女人，夜里只能手淫，聊以自慰。（取自：老鬼的《血色黄昏》）漂亮的北京女知青右派的女儿展赤，万不得已钻进丑八怪一样与自己的爹年龄一样大干爹的被窝。（取自：拙作《为了你走遍草原》）兵团男战士手淫，被领导抓起来批斗，一命呜呼。（详见我的博文《走上高高的宝力格汗山》）兵团战士夜里翻地，被拖拉机压死；女知青战士掉进冰冷的井里。（取自：兵团五师43、44团发生的真事）指导员政委连长团长书记主任强奸女知青。（这样的事情比比皆是。）一名多才多艺的上海女知青被连长奸杀后埋进沼泽，几十年后才破案。（取自一名知青的博客。）锡盟的草原烈火烧过来了；东北平原的荒火烧过来了；云南一条大江的水突然漫过了一帮知青的腰身；汹涌的海浪扑天盖地；几条十几条几十条年轻的生命转瞬间飞灰烟灭。”冷明还写有一部80万字的荣获中国作协一等奖的长篇小说《为了你走遍草原》。书中描写了在乌珠穆沁草原生活了20多年的北京知青、反革命“狗崽子”钟伟明贫穷、孤独、失恋、寂寞、没有资格上大学、参军、入团入党、不能回城，理想泯灭、对美好爱情的憧憬破灭、多次徘徊在死亡边缘的惨况。读后足以让我们再一次得出这个结论:文革是一场空前绝后的大灾难,是一场人类的浩劫,是中华民族永远的耻辱。

北京知青子蕴的《我曾经的名字叫知青》是一本优秀的长篇自传文学。该书回忆了她童真童趣，少年时的无忧无虑，别样的青春年华，刻骨铭心的、纯真的友谊，父母婚姻中的遗憾，特别是讲述了她所在的东北兵团女知青们两次集体恸哭的无助与懦弱，同时又在坚强中磨练了在恶劣环境中生存的能力，以及男青年抢吃抢烧偷狗时表现出来的动物般的本能等等的一个个故事。从而展现了中国现代史的一个侧面，体现了那个时代的特征，这正是这本书能在台湾一版再版的原因。

子蕴说：“希望通过我的回忆,唤起同代人心灵的反响,让年青人了解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同诞生一同成长的一代人的坎坷经历,从一个侧面了解祖国曾经的苦难,共同努力:让这一切永不再发生!”她在本书的《前言》里说：“切莫因生命的平凡而放弃神圣的记忆权利，惟千千万万朴实的生命记忆，才能融铸成不可涂改的历史真实。生命的价值在于珍惜记忆，我们以真实的记忆将历史变得美丽。”由香港知青出版社和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先后出版的受到海内外众多学者极大赞誉的更的的的长篇小说《鱼挂到臭，猫叫到瘦》非同凡响。知青因为日夜企盼不知何时降临的上调，绝望地等待着“容当统筹解决”的兑现，而不敢接受爱情和婚姻，于是“鱼挂到臭、猫叫到

瘦”。青春飞逝，他们在等待中熬白了少年头，在目睹和经历了男女同学的生离死别以后，终于义无反顾地男欢女爱，酣畅淋漓地开始了“摸亲家母”的情爱生涯。

“该书解构了以往伤痕、反思文学中所有的政治意义，还原为最真实最常态最平凡的知青生活本身。在这种真实的生活形态里，包含着更为深刻的悲剧意味。它超越了以往知青文学的意识形态话语，超越了以往对知青生活的痛苦咀嚼和回味，以所谓永恒的情爱主题展示了那个特定年代里，即便在最恶劣的环境下，人性的光辉也能照亮年轻人的生活。”现在，知青中还有少数如老鬼，正致力于知青题材的长篇写作，如果说老鬼的影响巨大的力作《血色黄昏》是在十一年前出的首版，那么我们有理由对他的新作充满期待。

而上海知青滴水湖则写了《功罪》《苦难》《感受》《消失》四部数十万字的系列政论性鸿篇博文，他那些经过深刻反思后的文字绝不是胡先生所说的“希望用往日的浪漫主义情怀，来温暖自己苍凉的心。还残留着旧时代虚幻但是已经无力的理念，如乌托邦式的社会平等，义和团式的反智主义，以及对于阶级斗争时代的隐隐怀念并从这样的立场出发反对今日的种种腐败与堕落。即失去了旧的政治历史资源，又无法吸纳当代世界文明主流的思想理念，即被传统政治力量所抛弃，又不为当今的利益集团所青睐。”在如今知青问题上仍缺少深入研究的必要条件，因而理论界不及史学界，理论界和史学界又不及文学界的现状下，滴水湖在知青问题上的理论探索就更加难能可贵。

巧的是，他也和胡先生一样用了“消失”这个字眼，不同的是，胡先生担心的是“在这样一个（知青）历史大词下面，数千万人却消失了，只剩下那个旁人与后人都不再感兴趣的两个汉字，进入很久之后的辞典。”而滴水湖则是“我终于发现，上山下乡的消失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在潜意识里它还在延续。”“有知青在那个年代的觉醒和反抗；有决策者既要维系统治的合法性需要的支持，又有为了达到某种目的所采取的静悄悄的否定；有推进改革开放所必须的赢得人心的需要，也有国内外局势压力的妥协。”上山下乡“作为一个运动是在制度上、措施上渐渐消失了，但在人民的心里永远难以磨灭。”另外，去年在内蒙草原生活了45年的北京知青陈丽霞去世后，在知青小熊“熊窝”的博客里知青们展开了一场对陈丽霞的严肃而热烈的讨论，在这场讨论中，我们没有给陈丽霞贴政治标签，而是指出“她给我们的是超越政治的人生启迪，超出了知青话题的范畴”，因此远远超出了胡先生担心的“知青这个词”“只能用于我们这一代人的临终关怀院。”“让离去的人，在一种温暖梦幻中，告别这个梦魂萦绕的名字。”如今中国社会越来越多元化，早已不是文革时“一个思想、一个统一意志”的时代，胡先生“为了我自己的思考，也为了不再在这个大词下逃避历史的真实，逃避我们当下面临的窘境，逃避未来的拷问与追究”早在十一年前就“告别知青”了，我尊重他的自由和权力，甚至理解他的忧虑情怀，但在十一年后的今天他却旧话重提，呼吁“告别知青”，就多此一举了。

最近，刘小萌在《不要美化“上山下乡”》一文中指出：一些“文革受益者们，包括当年知青中的个别风云人

物，”还在“为文革正名、为上山下乡运动正名”，并且还有很多人“给他们站台，无耻吹捧，大唱颂歌”。在这种形势下，我们为什么不大声说出我们的感受，反而要偃旗息鼓“告别知青”呢？我们实在不应自我“淡化”，自我“冷处理”，如果不继续抓紧抢救第一手资料，不深化认识这场“仍带着体温”的运动，我们就对不起自己逝去的青春，对不起我们的后代，更对不起历史。

固然，如今知青话题还受着种种限制，上山下乡仍是一个悲情话题，但我们岂容青史尽成灰？正如冷明说过的:“历史的风沙无情地要将知青岁月悄悄地掩埋,无论如何我们要说出来。”对知青这个既关乎历史，又关联当下，还关系未来的重大话题，我们怎能轻易说“告别”呢？我们凭什么不相信知青研究必将走向成熟，不相信“知青”这个词必将被再次“注入新的内容新的生机”、必将有所突破、必将“清理与思考这一代人在中国社会政治生活中的种种问题，特别是文革中的问题”“对自己一代人在中国当代史上地位、作用、失误的重新认识”呢？

博友习雅在《告别知青》一文后的评论说得多好啊：“告别的应该是已有的大有局限的叙事模式。我倒认为，知青作为一个历史现象，恰可从中直面“历史的真实、我们当下面临的窘境，以及未来的拷问与追究。”

2014-07-23

唐燕文集：http://www.hxzq.net/showcorpus.asp?id=247

华夏知青网不是赢利性的网站，所刊载作品只作网友交流之用
引用时请注明作者和出处，有版权问题请与版主联系
华夏知青网：http://www.hxzq.net/
华夏知青网络工作室

我为知青说点儿啥？

（前言：本人下乡插队当知青的过程比较曲折，就写了六篇连载博文讲这个故事。写完了，也就算了。谁知刚发完最后一篇。就有好多知青博友来围观，大家对我故事中一个娇滴滴知青MM在乡下上茅厕的糗事反响强烈，引发不少共鸣。有几个好友还约好时间，专程光临。本以为朋友们来借我寒舍，开个小派对，和战友们叙叙旧，聊聊当年乡下趣事，顺便发发牢骚。结果大家吐槽的吐槽，搞笑的搞笑，爆料的爆料。偏偏几个朋友又都是讲笑话的能手，近两个小时，博客上笑声不断。把我乐得人仰马翻。大家闹完了，笑完了，曲终人散。大侠们衣袂飘飘，翩然而去。留下我一人，傻傻坐在电脑前。欲罢不能，细细翻阅朋友们留下的帖子，依然忍俊不禁，一个人竟笑出了声。实在是意犹未尽，心中还有些话，不吐不快，只好再来续一篇，作为这段下乡故事的小结。最后，参加派对的这几位好友的芳名是：不败的金枝玉叶，兮杉forever，望林梅，五羊闲人。作为东道主，我要向他们公开鸣谢，感谢好朋友的到来，为大家奉献的精彩段子，让我们一起度过了一个充满欢乐的，无比凉爽的夏夜。）

我写博客本来就是为了码字玩儿。

要找点熟悉的写作素材，就想写写年轻时的趣事。

我们那一代人，年轻时最刻骨铭心的记忆，莫过于文革和知青经历了。想说文革的事儿呢，有句名言“宜粗不宜细”。意思是那里还有不少禁区，冒然涉及，恐有河蟹之忧。过段时间再写，或许会方便些。就先写知青吧。因为年代久远，有些时代背景记不太清，去看看其它知青写的东西，或许能唤起一些记忆。无意中发现，关于知青，还曾经爆发过一场不大不小的争论。

台湾中央大学王力坚教授在《有关知青文学话语质疑的思考——为知青文学一辩》文中，列举了几个大陆作家、学者对知青文学及知青群体的无端指责及恶毒污蔑。

一位颇有些知名度，获过神马文学大奖的作家（很不幸，我从来没拜读过他的大作），公开宣称：“我不喜欢‘知青情结’，甚至还有些反感”。他在小说中，借农民的口大骂知青：“那些家伙不是家伙！”又借农家小孩之口说：“我很小的时候，总听垸里的人在说知青没有一个好东西，好吃懒做，偷盗扒拿不说，还将垸里的年青人带坏。”“自从来了知青后，这儿的流氓就大胆多了，像是有人撑腰似的。”王力坚批评这位作家道：“这是以偏

概全、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地全盘否定知青、抹黑知青的做法”。

又有一学者撰文写道：“（知青）就像无恶不作的少爷、小姐，又象街头的泼皮，人见人厌，却自怜自爱。……无知与狂妄、自大与自卑、善于煽情又易于悲观、身处窘境又毫不知羞、敏于充当‘工具’而拙于‘旁观’、永远自我感觉良好而不知道德、良心、理性为何物。……‘知青情结’犹如烂漫的罂粟，娇艳、迷人而毒汁四射、遗害无穷。”他最后还振臂高呼，语重心长地号召大家：“目前整个世界都在考虑如何持续发展，如何与动物、植物和睦相处，探讨现代化对于人类的利与弊，人类的事情忙得做不完，我们却仍死守住知青情结，何以面向未来？只有放弃自我才能获得解放，不放弃知青情结将永远是它的囚徒。让死的死去吧，让过去的过去吧！”王力坚毫不客气地回击道：“一代知青的青春、一代知青的历史，就由那么一句洒脱的‘死去’、‘过去’便打发了？如此说来，‘死去’、‘过去’的还应该包括文革、大跃进、反右、南京大屠杀……”读到这里，我心跳有些加速，手足有些发凉。我为我那一千七百万知青兄弟姐妹们寒心，为他们抱不平（当然，也为我自己的知青情结委屈）。

王力坚说得好，一代知青的历史，一代人的青春，又岂是那么容易“死去”，“过去”得了的。近两千万老知青已经陆陆续续退出历史舞台。但是，大家都看见了，国家最高层领导集团的情况恰恰相反，新上的七常委中，有四个曾是知青！------也不知那个大骂“知青没有一个好东西”的人看见，会不会也有点后悔说过那句话？

不过，绝大多数老知青们真的是老了，有些已经成为古人，乘鹤西去了。但是，他们的知青情结不但没死去，反而越来越浓烈，大有传给子孙后代之势。这里便有一个铁证：两年前，CCTV推出一部万众瞩目的大戏，片名竟是赫然两个大字《知青》。如果没记错，这是知青运动近半个世纪以来，在国内影响最大乃至全世界注目的一个中国官方主流媒体上，第一次正式、隆重地推出，贯之以“知青”名字的大型电视剧吧？

听说亲爱的CCTV一频道将于黄金时间播出我们自己的故事，老知青们都欢欣鼓舞、奔走相告。编剧是谁呀？大名鼎鼎的知青作家梁晓声啊。他曾经写过《今夜有暴风雪》，《雪城》等颇受好评的知青小说，改编成电影、电视后反响热烈。我们对这部被宣传为“全景”展现当年，“史诗”般恢宏的《知青》十分期待，必欲先睹而后快。

《知青》开播那天，好多知青朋友都与老伴及儿孙们一起，围在荧屏边，备好一大包拭泪的纸巾，含着热泪，准备细细重温当年的辛酸往事，追忆那五味陈杂，永不复返的青春岁月。如果能让儿孙们对那不堪回首的年代有所了解，有一个公正的评价，让善良的人们为我们曾经遭受的苦难，一掬同情之泪。我们也会眼圈发红，倍感欣慰的。

谁知，才看第一集，大家就感觉有些不太对劲，越看，越觉得不靠谱------此“知青”实非彼知青也。

一石激起千层浪。尽管主流媒体给予极大赞扬和肯定，称《知青》是“对那个时代最有历史记录意义的作品，

再现了历史情感上关于知青的真实写照”。“弘扬了主旋律”云云，老知青们却似乎并不买账。他们主要的批评意见是：该剧歪曲历史、赞美苦难、歌颂罪恶。美化了知青岁月，美化了上山下乡运动，带给观众的是一种浪漫的激情，而不是深切的反思。误导了年轻一代，将他们忽悠得热血沸腾，心向往之。有人甚至激愤地说“我们老知青还没死光，历史岂容篡改”，强烈要求央视停播。

作为梁作家曾经的粉丝之一，我着实为他捏了把冷汗，担心他英名一世，因此剧而晚节不保。专程访问他的博客，发现此剧出笼后，作为编剧的他，已不幸成为众矢之的了。虽然几次在博客上撰文辩解，仍未获网友们原谅，板砖依然如狂风暴雨般飞来。他只好停了经营多年的博客，跟大家说声拜拜，不陪大家玩儿了。

在时下众多掺杂“戏说”、“穿越”、“八卦”元素的狗血电视剧充斥荧屏，对观众玩大忽悠的时候，人们的宽容度和忍耐力早已麻木不仁了。一部45集的电视剧，竟然会引起如此强烈的反响和争议，我颇感意外。又由此可见，对知青应该如何评价，仍然是热门话题，与“文革”一脉相承的知青运动，依然是社会关注的重大历史事件。

鲁迅先生说：“不在沉默中灭亡，就在沉默中爆发!”即使老知青们一直被称为“沉默的大多数”，只要他们不灭亡，也可能会爆发啦。作为当年一千七百万知青大军中之一员，我也觉得不该保持沉默了。

以什么形式来发言，表示自己尚未灭亡，还在苟延残喘呢？我既不是史学家，也不是作家。不能像潘鸣啸、王力坚、刘小萌等那样开展严谨、科学的历史学研究；也没能力像资深知青作家梁晓声、邓贤、王小波等那样，或“下笔千言，倚马可待”，或“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给后世留下可歌可泣的不朽著作。我能做的，其实还是很小儿科的东东------自说自话、在电脑上码字玩儿，聊一些自己的亲身经历，讲一些身边的知青战友的平凡故事。虽然人微言轻，好在专家们都说了：非专业作家的知青个人回忆，也是对知青专业作家们所写知青历史“宏大叙述”的一种补白。“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沉吟至今。”或许一不小心，还能引来几个气味相投的知音围观，大家惺惺相惜呢，也未可知。

朋友问我，“知青文学”早热过头了，你现在才来讲几十年前的陈年旧事儿，是不是太晚了些？其实，我还是带有一点私心滴。

十多年前，在纪念知青运动三十周年之际，一些知青争先恐后忙于写回忆文章和发表观点的时候，我在干嘛呢？就如前面那位劝告“放弃知青情结”的学者所说，我正在“忙人类的大事儿”呢。为落实联合国人类千年发展目标，我作为中方专家，承担了世界银行卫生扶贫项目。我们要唤起民众，向人类两大杀手之一的艾滋病宣战；为了降低多年来高居不下的母婴死亡率，还要常年奔走于老少边贫地区。当然，也还在为家庭的温饱而挣扎。那时自己刚从国外回来，也曾面临下岗，“海龟变海带”的威胁。所以，真是忙得天昏地暗，早已忘记自己也是知青出身，错过了与亲爱的知青战友们一起，共同回忆当年的极好机会。

这两年没那么忙了，埋在心底的一些话儿又时不时冒出来，如鲠在喉，总想一吐为快。看来，“知青情结”已经深入骨髓，融化在血液中，或者真是中了那“烂漫罂粟”的毒汁，病入膏肓，不可救药了？好在面临退休，人类的大事儿已经轮不到我去掺合，有大量空闲时间了，就来补上这个心愿，也来冒个泡，为俺知青说几句吧。

2014-07-24

海若文集：http://www.hxzq.net/showcorpus.asp?id=251

华夏知青网不是赢利性的网站，所刊载作品只作网友交流之用
引用时请注明作者和出处，有版权问题请与版主联系
华夏知青网：http://www.hxzq.net/
华夏知青网络工作室

快乐人生，反思人生

----读《周公正》的博客点滴体会

在我们上海知青中，周公正的名字仿佛就是我们云南东风农场知青的代名词。《知青?上海》杂志、《知青风采》报、《上海知青网》以及我们自己的《勐龙在线》等都有他的身影。主编、副主编、编委，这些没有任何报酬的“职务”是广大知青们对于周公正的最大认同！一句话：德高望重。

为什么怎样说？自2007年6月他在新浪网上开启了博客。两年半的时间里，总共写了五十多篇文章。这些文章被全国和本市的知青刊物转载的频率之高是少见的。多年来对于知青问题的思考和探索，使他在这些领域里享有较高的声誉。我一直认真地拜读他的每一篇文章，经常在自己的文章里引用他文章里的观点，时常向朋友们推荐他的一些精彩的文章。我在读他的文章时有这样一些体会：

解读上山下乡的历史，还原知青大返城的原貌，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是他的文章里一个重要的主旋律。

在周公正的博客上刊登的《云南知青终结上山下乡运动探析》、《云南知青大返城风潮解析》等一系列的文章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深入解析了发生在云南农场大返城的过程、原因、教训。在中国的知青史上，发生在1978年底的云南知青大返城事件，开启了知青大返城的先河。周公正认为，之所以发生这样的事件，而且是发生在云南，主要有这样一些原因：一是云南是“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祸害的重灾区之一，农垦系统更是深受其害；二是云南知青生活的聚居地分布在边疆沿线的深山老林，云南农场知青所受到的思想上的禁锢最紧，生理体质上所遭受的苦痛最深，精神上所经历压抑的时间最长；三是云南农场集居的京、沪、渝、蓉、昆知青，其形成的“农场小社会”实际上汇聚了当时中国社会最活跃的思想交锋和最勇武刚毅的社会活力；四是云南知青返城风潮的兴起还得益于农场这种准军事式的屯垦体制和当时特定时期最宽松的社会环境。据我多年对于云南知青大返城问题的关注，实事求是地详尽分析这一事件的原因，理性地思考大返城兴起的客观缘由，周公正的这些文章是第一个。我们在看见这些资料和一些回忆的文章，包括一些纪实文学作品中，记录事件的过程多于这样理性的思考。这就是周公正这些探索的可贵之处。对此他是这样做的结论：

今天当我们审视这一段历史，感到庆幸的是云南知青“闹事”前后历时半年，虽有种种曲折、非议和遭难，但

作为身历其境的当事者们都能在“人民内部矛盾”这个大框架下对话、商谈并步涉中国人民思想解放进程发展脉络，艰难地冲破两个“凡是”的束缚，在一些知青义无返顾地以命相博、争取返城权利及广大知青团结守望、集体抗争不公正境遇的悲壮中，在以邓小平为代表的老一辈革命家身有同感的大智大慧决断下，上下沟通，左右兼顾，特事特办，由此及彼，全面解决。果断调整了有关“知青问题”的政策，终于长痛不如短痛，使中国一代知青人的命运发生了逆转，千百万家庭得以团聚，彻底搬开了一块压在中国人民、特别是普通老百姓心头的沉重石头——知青回家！

为什么说周公正对于云南知青大返城的研究是有他的独到之处。重要的是他在分析这个事件的时候不是就事论事地讲述云南知青开创大返城先河，而是从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的角度提出了令人思考的一系列问题。他充分肯定云南知青的历史贡献，这是“中国知青史中唯一一次知青把握住了自己命运的走向的亮点，是值得向世人展示，留真于史的光荣。”同时，他又敏锐地提出了正视知青群体的现实问题。希望全社会都来关注这个特殊的群体。周公正说：“纵观他（她）们今天的生活是平淡、真实而坦然，无奈的弱势群体却有一颗可爱的心——好聚好散，来去自由，平等和谐，自娱自乐，珍视友情，安于清贫，记真往事，快乐未来。在提倡建设和谐社会的今天，这是一群不该遗忘的人。”历史的已经过去了，关键的还是今天。以一种积极向上的心态来看待我们的昨天，珍惜今天，展望未来，将是我们这一代人应追求的目标。周公正在谈论这些历史问题时所表现出来的眼光是值得我们好好借鉴的。

从思考云南知青大返城出发，周公正的视角不是停留在云南的知青上，他经过认真的研究和思考，写出了一系列关于知青问题的思考文章。如《知青祭》、《知青乎、悲壮乎？！》、《人性光芒的绽放》等。他认为，知青问题时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需要我们努力地去研究和探索。在《知青祭》一文中，他对于知青进行了解读，提出了“知青精神”的问题，以及知青应有的历史地位。而在《知青乎、悲壮乎？！》一文中，周公正提出了悲壮是知青道路最生动的写照，是知青人生的主旋律，是一代人的尴尬荣耀！用“悲壮”这两个字来解读我们知青，用的是恰如其分，恰到好处。所以他说----

今天来回顾、反思我们的知青人生，以“悲壮”自誉是当之无愧的。从我们当今虽身处卑微，但一旦聊起当年的知青生涯，不相知的人们也会虽带怜悯，却也不无尊重地赞许“知青”对我们国家和民族的特殊奉献。人们是不会忘记知青的，只要你曾挺着腰杆为我们的人民，为我们苦难的祖国付出过，那么不管我们走过的道路多么悲风萧萧，那种壮怀激烈，不尽长江滚滚流的豪情，永远是我们这一代人的荣耀。

这样的“悲壮”蕴含着一种精神，这就是知青精神。周公正是在各种有关于知青问题研究里比较早提出“知青精神”的。在毛泽东的知青上山下乡“12?21”指示发表将近40年之际，周公正写了《人性光芒的绽放----12?21沉思录》，详尽地阐述了对于“知青精神”的看法。他认为：“知青精神——新中国青年学生的理想主义和乐观主义

在中国农村艰苦环境中聚凝起來的人性光芒的绽放。”可贵的是，周公正在文章里还分析了这个精神产生的历史背景和局限性。全文从人性的高度来解读这个引起广泛争议的问题，给了我们许多有益的启示。对于这些理论问题，周公正以自己的亲身实践和较高的理论涵养进行解读，至少在目前是较为全面的、系统的一种观点。值得我们好好拜读！

我每次在读他的博客里发表的这些文章的时候，都会为这位老大哥的刻苦专研精神而感动。知青问题是一个复杂的、涉及到千万人的话题。到了今天，我们更多的是需要一些理性的思考和分析。如何对待历史、怎样走好今天的每一步路都是我们这些曾经的知青所需要认真对待的。在这方面我们要好好向周公正学习。

讴歌一些涉及知青上山下乡的人物精彩、坎坷的人生经历和不屈的奋斗精神，弘扬时代精神是他的文章系列里的主要标志。

最早在他的博客里是记载了云南知青都很熟悉的赵凡同志。是他在云南知青大返城中的正确果断的处理，使得我们可以回家。“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在《南疆缘情说赵老——拜访赵凡前辈》一文里，周公正向我们讲述他到北京看望这位老干部、老领导的事情。这使我们想起了当年这位带有传奇色彩的部长看到跪在他面前的知青们动情地说：他一生碰到两次有人跪在他面前，一次是他当红军长征时、经过云南，有老百姓跪在他们面前，要求红军去解救。想不到革命几十年后，还有人跪在面前，要求解救，我一定把你们的要求带到中央。

往事历历在目，能够在这篇文章里看见今天还健在的赵凡老人，我们的内心也很激动。周公正说的好：“我们知青中一部分人返城后能有所作为，除了这些同志的自身努力，勤勉拼搏外，79年的返城从时机上说是踩到了一块跨越的阶石，这些知青的今天应该感谢那难忘的1979年，感谢创造了那段岁月的当事者们。”“赵老是个好人，一个好干部，是一个和我们知青特有缘的好前辈。”周公正更多的笔墨是放在写我们知青中的一些鲜为人知的人物。最早是写了《中国茶宴第一人-----刘秋萍》。这位当年在云南东风农场的一位普通的上海知青，如今成为一位“上海滩茶宴界的第一把交椅。”周公正告诉我们，刘秋萍是受她的父亲影响干上这一行的。大返城回到上海，她和大多数的知青一样，从饮食店做起，服务员到经理，几经沉浮，却对“餐饮”两字痴心不改终于成为上海餐饮业公认的独树一帜的茶宴馆。在《烟雨嘉兴话创业》里，周公正向我们介绍了知青企业家胡巧根的创业史；在《与时俱进，天道酬勤》里讲述了我们原云南东风农场的上海知青丁家义创业的故事；《紫气东来，绽放浦江——记上海工程技术大学艺术设计学院院长马新宇教授》等。周公正在讲述这些知青成功者的故事的时候，有着他自己的思考。在《与时俱进，天道酬勤》里，他认为：“一个人的事业成功要主、客观的种种因素、条件。但我还是要为丁家义叫好，要为丁家义的‘一步一个脚印’与时俱进的精神叫好。从某种意义上说，与时俱进对我们知青说來是更可贵。我们知青不应仅是一个只知埋头苦干、艰苦奋斗的‘憨干’形象，在我们笑谈新世纪的行进中，应该有从我们知青行列走出來的企业家，那才不枉为当年建设边疆、改变祖国‘一穷二白’面貌的‘青春骚动’。”

在我们庞大的回城知青当中，所谓的“成功者”毕竟是少数。况且这种“成功者”的标准是什么，很难说的清楚。

但是，作为这样一个特殊的群体，在从农村回到城市以后，确实有相当部分的知青在不懈地奋斗。他们不愿意被时代抛弃，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兢兢业业地继续为“四化”大业贡献者自己微薄的力量。而周公正在写这些人物的时候，很注意介绍他们的这种奋斗不息的精神。这正是我们广大知青所需要的。所以，在这样的主流里，绝大多数的知青都是成功者。我们有责任和义务来歌颂这些成功者。

周公正的笔不仅在写有为知青返城立下汗马功劳的赵凡，也有知青中的创业人物，还有我们知青所怀念的农场老领导、老工人。这些在艰苦岁月里与我们知青有着深厚感情的老领导、老工人十我们无法忘怀的。一篇《老杨，他走了》记载了原东风农场一位长年生活在连队里的指导员老杨生前的许多往事。读后催人泪下。周公正在这篇文章里说：“想想这些老工人，我们社会的弱者，可以说是当今社会文明的遗忘者。当看到那一片片茂密、翠碧的橡胶园，我不由得想起他们可是这些橡胶园的真正拓建者，是我们社会现代物质文明的奠基者之一，可为什么现在是如此的悲微，就因为他们是那片土地的原生民，是因为……，或因为是‘命’。想到这点，我只能默默地祈祷了。”在看了这篇文章以后，我才真正懂得了公正大哥为什么会如此伤感。不仅是因为老杨是他的入党介绍人、一个合作共事过的好同事、知青的贴心人，重要的是公正大哥对于那片土地和人民的一种深厚的情感。这是没有在那里生活过的人很难体会的。所以，在周公正笔下的这些带有云南红土地气息的人物总是在吸引着我们的情感，使我们在感动里思考很多很多。

凭着对“第二故乡”那种难以割舍的情结，他激情满怀地写下了一系列的文章，展示了一位老知青的情怀。

就像我在上面所说的，对于那片红土地的深情，在周公正的文章里还有很多。回城以后，那些留在记忆深处的一草一木、山山水水始终在他的心里回荡。我们能够在他的博客里看见这样的一篇篇描写红土地的文章。如开篇的《大勐龙纪事》，周公正就是这样说的：“大勐龙，西双版纳最南端的一个边疆小镇，在中国地图上只是中缅边界线上的一个小圆点。当写下《大勐龙纪事》这个题名时，我离开大勐龙已整整27年了，不知道什么原因，随着时间的流逝，十年知青生涯的大勐龙岁月却越来越强烈感召我提起笔来写写这片土地。”在强烈的感召、强烈的愿望中写下的文章是那么的充满激情。于是我们看到了他撰写的《大佛爷、小和尚及其他》、《永恒的记忆》、《大山的民族---阿佤人》等等。

在这些文章里，我很喜欢他写的《遥远的红九连》。这篇文章记载的是周公正和他的战友们创建一个新的连队的故事。当年的知青豪情满怀、激情万丈的情景又一次展现在我们的面前：原始密林、推土机、大山老林、菁沟竹海、砍來竹子做竹笆、挖沟引水、垒起土灶等等。还有那“划线站队”、“打落水狗”的遭遇。这些陈年往事如今再次讲起真的是感慨万千。九队的领导老杨的木讷、知青“小宁波”的调皮、“小日本”的趣事、“小懂经”的天真有趣等等，都在讲述那个难忘的岁月的点点滴滴。周公正说：“当年我们梦寐以求的为祖国种橡胶、就是盼着这么一滴一滴的胶乳。说是我们的一点一滴心血，一点也不过份。”今天当周公正和他的知青伙伴再次来到九连的时

候："现在已是眼前的九队。唯一遗憾的一点是把我当时力争保存下的一株高达二三十米高的攀枝花树砍掉了。这是我当时出于一个年轻学生的浪漫情怀，要保留这棵在连队球场边的高大英雄花树（攀枝花树的别称），象征着我们知青屯垦戍边的形象、精神和气质。历史是严谨的，人走了、树倒了、精神散了。这次回农场，唯一的感觉：农场物质条件好了，但我们当年那种'穷欢乐'的生气没有了，一片死气沉沉。俱往矣，人生苍桑，长林一碧。千秋功罪，任人评说。……"现在，这样的激情似乎在消失。而对于曾经创造这些激情的人在怀念中多少有些伤感、有些失落。时代在前进，社会在发展，周公正说："我作为当年九队的拓垦者之一，祝祖国的橡胶事业蒸蒸日上，兴旺发达。祝东风人富裕、安康。"

类似这样的文章在他的博客里还有不少。如《年夜饭风波----1969年》、《云南痛打"落水狗"见闻》。在回忆中将这些历史的往事告诉给我们的后人，不要忘记这些。那些在红土地上发生的事情是整个中国历史进程中的缩影。为了我们的国家再也不重复这样的悲剧，思考、分析、汲取是必须的。周公正做了大量的工作，值得我们学习。

深入研究历史的重要史实，实事求是评介事件和人物，是周公正的文章鲜明的特色之一。

对于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研究和关注也是周公正文章的特色之一。尤其是对于云南这篇土地上的这些历史事件和人物的研究，有着他独到的心得。一篇《谭辅仁之死迷解》告诉了我们这样的结论："1978年6月，经过前后两套专案班子反反复复，曲曲折折，长达七年之久的侦查、复查、认定谭辅仁夫妇被害系王自正一人所为，既没有林彪反党集团插手，也没有同伙配合。"而造成这样悲剧的原因是这位"封疆大使"过"度"一步的可悲、过度突出政治所付出的代价等。这件事情是我们所有到云南农场的知青都很关注的。当时闹得沸沸扬扬。是非曲折似乎在云里雾里。周公正经过大量的研究，撰写的这篇文章为我们解读了这一历史的谜团。阅后有一种恍然大悟之感。历史的沧桑在这一瞬间停止、窒息，后人为它解开了谜团。而解开谜团的人需要的是勇气和真实。周公正做到了。

他研究军队的历史，撰写的《铁血滇缅照汗青》、《一支英雄部队的传奇》、《悲哉，中国远征军》等，讴歌了这一支支战功卓绝的英雄部队的传奇故事。

他在研究历史的过程中反思历史，写下了《踏访重庆红卫兵墓地》一文。重庆的"红卫兵墓地"已成为一个时代的缩影，成为全国唯一仅存的文革遗址。他感慨地说道："生命是宝贵的，更是应该得到尊重的，我想远去的亡灵也应该得到尊重。是那个年代使他们不明不白或者说是说得清、却道不明的走上了不归路或者说是'英勇献身'。……时过四十年已凝结成一段被遗忘或被掩盖的历史，这是中国人的可悲、中华民族的可悲。……我们及我们的后辈不应该忘记这儿。"

我赞叹公正的这种精神，尊重历史、反思历史！

快乐人生、反思人生，以自己的心得和思考在启迪我们要正确对待生活、享受人生，是周公正的文章给我们的精神养料。

在周公正的文章里，我看见的还有他那种快乐人生、反思人生的精神境界。这是我们需要好好学习的。

一篇《滨海感恩》，使他写下了《登洋山岛》一诗：“东临洋山，壮观沧海。岛礁悬峙，水天一色。浪涌平台，塔吊云耸。长龙北去，巨舸竞渡。镇澜有人，笑唱华章。壮哉英豪，世纪大港，伟哉华夏，人间沧桑。”诗咏志。

一篇《五十九岁遐想》，作为开博客的“宣言”发出了这样的感慨：“人生第一步，去云南西双版纳屯垦南疆，只是母亲眼泪的无奈，同学挥手送行的迷茫。1979年回归上海，只是农场老工人默默相送的悲哀和知青朋友们催着快跑的纷乱。今天说起我的第三次人生节点，退休后，清茶一杯，晨练夜读，想想该想的事，写写该写的事，偶尔走走青山碧水，看看民俗风情，回归自然。引来的是年轻同事的羡慕和对我的遐想的赞许，看来，这个预案是天随人愿，该这么定。”享受快乐的人生。

一篇《快乐人生、反思人生》笑谈人生：“人就这么瞎忙着走到了60岁，不出意外的话，下半辈子应该还有20年。站在今天的立埸，这是对我一生极其珍贵的时间。享受生活，丰富生命，这又将是一个人生的新天地。应该是自己对自己负责，对生命负责。所以，对今后的20年定了一个宗旨：快乐人生，反思人生。”

一篇《站好最后一班岗》里以《足跡》封底箴言作为他自己工作生涯的告别语：昨天的收获，已化作他们的坚定；昨天的情怀，温暖着他们的心扉；梦想，在今天继读。这一刻，他们畅想的是未来的辉煌！

走过了40年，经历了风风雨雨，周公正在抒发自己的情怀。在这种情怀里，我们分明看见了一位老知青壮心不已的心怀。这些话在激励我们，正确地对待人生，认真过好“后知青时代”的每一天。

所以，我感谢周公正，因为他给了我们许多的精神养料。当然，对于他这些文章，我还刚刚读懂了一些皮毛，还需要好好学习！

周公正的博客：http://blog.sina.com.cn/yushizhai

写于2009年11月5 日

余 杰文集：http://www.hxzq.net/showcorpus.asp?id=213

神殿与心灵之随想

不独憩息这个“知青符号”精神家园

回想自己，我曾是知青，与一批被称为知青的人在时间的长河中，在不同的地域间，游走，至今无法止步，我佩服一些知青坚守“知青符号”的精神理念，也感叹其由于执着而走不出“知青符号”的困境而过分地流连由知青情结所筑构的的精神家园，整理着知青的理想和过程，使这些文字构成某种已然遥远的、需要一次次重新反思又需要一次次反复回忆的割舍不掉的精神遗产，对此我对他们也充满敬意。我也羡慕他们，这种羡慕是由衷地，毫无半点揶揄,因为人的本质是精神，他们在他们的精神家园里感到是如此的充实，羡慕之余，也生出丝丝妒意，因为，我很难找到我的精神家园，我不知道我该走向哪里，已有的各种哲学思想在这方面并不能让人满意。究其原因，是因为哲学是一个时代的产物，是一个时代人们生产、生活实践的体现，而当今这个时代与以往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困境并没有摆脱，路标并未出现，准确地说，是个精神流浪汉，哪里可以憩息，几十年来，一直在寻找……。

有时在想，传说中的中世纪是个黑暗的时代，教会统治非常严厉，要求人们将一切献给上帝才能死后上天堂，但是，子民们那种对信仰虔诚和对上帝的笃信，不正是我们现在最缺少的吗？现在有考证提出，中世纪一点也不黑暗，那时的社会和环境的和谐，人们扎根于大自然生活，是由于科学与文艺复兴以及随后的资本与利润使中世纪成为了遥远的历史，我羡慕那种有信仰的人。科学抑或就是罪恶，它给人以知识和理性，它揭示上帝之虚无，它使人失去了信仰的基础。（同时耳边又有另一个声音响起：你在厌恶科学的同时，又在安逸地享受着科学带来的成果）。

什么是我们存在的最高凭藉，有谁来启示我们？他凭什么启示我们？眼望未来，我们进入了一个无物之阵。

正是由于这种原因，霍金，这个最具现代物理成就的人在其划时代的一本不厚的著作中，才会几十次的提到“上帝”这个字眼。把无限的不可知和无限的未来交给上帝，把绝对交给上帝，把我们存在的最高凭藉交给上帝。上帝在人造的另一个世界中，存在于人对上天的诘问中，

“信心难起”，说的是不是象我一样依旧一无所知的人呢？

很多哲人都说，神为人造，人们将自己的心灵进行一番“形而上”的改造之后，按人的理想和愿望造出了神，神反过来又给人某种启示和约定。事物是变化的，神或许会随着人们的愿望和要求发生变化，人不需要神的压迫和过多的约束，人需要神给与更多的启示和信心，不是吗，在改革的年代，宗教届的很多清规戒律也在慢慢的发生变化，一些菩萨也跟着时代的步伐在变换着形象与功能，先前的和尚终生面对青灯黄卷和法器，过着如法如律的清苦刻板的生活，现在的和尚可以带手表、看电视、读新闻、甚至“下海”做生意，善男信女，心血来潮，拈上一支香，无须繁杂排场、投体大礼，闭目默默神，也可算是敬了一次神，一切都无妨，只需“佛祖心中留”就行了。

世间有太多关于“生”的学问，只有宗教才是关于死的学问吗？天地悠悠，人生苦短，人在“方生未死”之时怎样觉悟生、了解死，这不是一个小问题，这是一个有实际社会价值的大问题，对有些人来说，死后能在上帝身边安坐，总比临终之时仅留绝望要好一些，恍惚之间也觉得，如果真如《聊斋志异》中一般，那也是很好的，毕竟死后还可以变鬼，还没有真死，可饮烧酒，可以谈情说爱，还可以投胎，岂不妙哉。而且，有十八层地狱的威慑，也可叫当今恶人收敛许多。一部《聊斋》反映了人的心灵并不是纯理性的它充满了感情和想像，所以，自古很多明达人士，对于理性与非理性，采取分而治之的办法，上讲坛，用理性思辨，上神殿，就暂时别开理性，用崇敬之心对待菩萨。

如果身体还行，前方还有二三十年时间，还有更广阔的人文精神园地可以开拓。还有很多知青的话题以及知青以外的话题，而不独憩息这个“知青符号”精神家园，虽然它是我们的“精神娘家”。我们将要展开我们的第二春，我们将要面对衰老，病痛和死亡，我们不可避免将要与宇观、时空乃至另一世界对话交流，平衡和调整人生的知识结构，完成此生话题，以平静的心走入绝对中。

我终于明白，不信鬼神的人，为何也会流连于神殿之间：流连于神殿实则是流连我们的心灵，当步入神殿时即步入了我们的心灵。

是呵，纷杂万象的人世间，如无神殿、金佛和僧侣，岂不少了许多情调与色彩。

子曰：“祭神如神在”，这“如神在”的内涵实为“神不在”，既然“神不在”，又为何要“祭神”呢?（这个“神”，或许不仅仅是神灵之神，它甚至暗指包含世间一切人造的礼仪和规范，这个老奸巨滑又无比智慧的孔夫子2000年以前已将什么都想到了：通过“祭神如神在”来训导人们应怎样使人之身、心彻底的伪善化，它成为儒文化的核心说辞之一，以至更好的把控人们的思想与行为）。由人去问吧，由人去想吧……

哦，钟声阵阵，古意萧萧，神殿随着历史风云的磨砺，遗留下来的已不是很多，科学的力量在逐渐增加，神的力量在逐渐减少，五百年后，还会有神殿吗？我想，有心灵在，便有神殿在。

知青与农民

——跟王彬彬聊聊

看了虫哥转贴王彬彬的《岂好辩哉：一个乡下人对“知青”的记忆》，很有感触，也很有些想法，似有不吐不快之感，随意记下，权当跟彬彬、也跟知青伙伴们交换个意见吧。

彬彬强调知青与农民的互动关系，这是十分正确的；彬彬也强调“农民对‘知青’的感受、认识，‘知青’给农村带来了什么，也应该是构成这一历史运动的一部分”，并且建议“让他们(指农民)谈谈对‘知青’的感受、认识，让他们谈谈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看法，那谈得肯定与‘知青’们大不一样”，这也无疑是十分有价值有意义的认识。以往人们对知青运动的认识、理解、讨论，确实无不是从“知青”角度出发而忽视了“农民”的角度。如果今后能从“农民”角度加以探讨，当是很有意义的事情。就实际操作而言，知青运动(包括知青历史与文学)的研究人员，当更多注意发动当年的农民(及其后人)，以文字或口头(录音)的形式，记录下他们对知青、知青运动的看法与认识。而当年知青回返旧地(包括农村、农场、林场等)，也不仅仅是“重游”、“回味”，也应跟当地人(尤其是当年的老乡)交流，若能将彼此间的看法意见记录下来，便就是宝贵的一手资料了。

然而，读彬彬大作，令我隐隐不安的是，文中流露的那一种强烈的跟知青对立的情绪(其实，前些时在华知网也出现过类似现象)。彬彬说：“站在城市这一面，人们可以说，这场运动的实质是三千万城市人被迫‘下放’到农村——实际上，人们也一直是这样概括这场运动的。但站在农村这一面，却不得不说，这场运动的实质，是农村被迫接受三千万非亲非故、素不相识的城市人。”彬彬所说的两个“被迫”都没错，但彬彬似乎将二者对立起来了。在文中，更是处处显示知青与农民的紧张对立现象，虽然彬彬说“有些‘知青’与农村人建立了很和善的关系，但也有人成了农村人的欺凌者，成了地方上的一霸，令当地人望而生畏”，但文中所列举众多的例子，皆是“揭露”知青戏弄、欺凌农民的情形。若不知情者读了，还真以为知青与农民的关系就是“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呢！事实是怎样的呢？首先，就从“被迫”(这里只是就一般而言，并不排除当时现实中有“自愿”“积极”的表现)层面看，知青与农民都是这一运动的受害者。当年，我们向老乡们抱怨被迫下乡的无奈时，老乡们也就向我们抱怨我们下来“摊薄”了他们的口粮，真有点同病相怜一根藤结两个苦瓜的感觉。但也正是这个“被迫”的基础，使知青与农民的关系总有点不那么和谐，再加上其他个人的因素(品质、修养、情绪、性格等)，知青与农民之间的冲突便时有发生了。我们那里就曾经发生知青集体携带刀棍，蹬自行车冲到邻省墟场寻找欺负女知青的当地

人“报仇”的事件。虽然因找不着犯案人而不了了之，但知青那股凶狠劲，确实令当地人紧张了好一阵。而俺老例本人，也曾参与偷杀老乡的鸡两只、瓜菜花生甘蔗若干(在此再次道歉)。然而，难道这些就代表知青的整体表现与形象了吗？事实上我们跟当地农民的关系大体还是和谐的，相互之间关心帮助的事例不胜枚举，就是离开农村后，相互的联系也并没有完全断绝，我就跟我的房东保持相当长时间的信件往来，我读研究生时，他还托人带一大麻袋的花生及沙虫等海味到广州给我。此类事情在网上网下众多的知青回忆文章中比比皆是。可见，不能因为知青中有丑恶的人与事就决然否定知青整体，同理，农民中也确实出现过对知青“不好”的人与事，但我们能因此认为农民就是知青的“天敌”而决然否定农民整体吗？所谓“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罪”就是由于知青确实受了害之后才出台的法令，其本意当是保护知青的人身安全，至于在实施过程中成为知青与农民之间的“鸿沟”，我想恐怕不是普遍的现象，而且，也不宜因此简单否定这一法令，就好像我们提倡人人平等，但并不妨碍要制定保护妇女与儿童法令一样，毕竟知青在当时社会还是属於弱势群体(即使跟农民相比较——尤其是在数量上)。

至于彬彬“知青话语霸权”的说法，我也实在难以苟同。我不想用什么“归谬”法来作学理探讨，只想就事论事来聊聊。不论是否乐意，我们也不得不承认以下事实：一，虽然不能否定知青与农民的互动关系，但知青无疑是这一运动的主体或主角，他们(无论是整体还是个体)是全程、全身心地投入参与这一运动的，而农民(尤其是个体)则多少有些游离状态，因此，知青对这一运动的回顾、探讨的关注与参与的热诚态度，是不可能出现在农民身上的。二，农民不拥有“话语权”，除了缺乏知青那种“主角意识”外，还确实有文化程度相对低下的原因，而相反，知青的文化程度普遍较高(跟农民比较)，这也是他们能拥有“话语权”的一个外在因素。这里我们并没有(也没必要有)歧视、埋怨农民的意思，只是表明一个事实。三，知青在使用他们的“话语权”之际，并没有将之“垄断”、“独霸”，因此，确实不能无端冠一“霸”字而称之为“知青话语霸权”。换个角度说，如果农民不行使其“话语权”，难道知青也应该噤声不语，以示“平等”吗？

虽然我们当年上山下乡大都出于被迫、无奈，而我们也因此遭受了难以言喻的苦难，我们跟农民之间也曾发生过不愉快的事情，但是，我们无疑也因此有机会对农村与农民有较切身的了解、并与农村与农民结下了颇为深挚的情感关系，由老知青“草原恋合唱团”的活动、海宽“反哺计划”的推行便可见一斑。话说回来，我们欢迎农民老乡参与对知青运动的回顾与讨论，不同的视角肯定有不同的观感，但二者并非是(也不应该是)相互对立相互排斥的，而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

随便聊聊，不知彬彬以为然否？

华夏知青网不是赢利性的网站，所刊载作品只作网友交流之用
引用时请注明作者和出处，有版权问题请与版主联系
华夏知青网：http://www.hxzq.net/
华夏知青网络工作室

把知青的悲剧当作启蒙者的悲剧是极大无知

山村人民教师张仲银的形象最先出现在李锐的中篇小说《北京有个金太阳》（初刊《收获》1993年第2期）中，后来又在其长篇小说《万里无云》（1997年）中得到进一步的扩展书写（但是基本情节具有明显的连贯性乃至有相当部分重复）。通过这个形象，李锐进一步推进了自己对于知识分子-革命者-农民/民间三者关系的思考。

张仲银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非常罕见的知识分子形象，他既不是典型的革命知识分子（如《青春之歌》中的卢家川），也不是典型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或启蒙知识分子（如《伤逝》中的子君和涓生），更不是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转化为革命知识分子的典型（如《青春之歌》中的林道静）。

从情感的角度划分，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的革命知识分子（特指无产阶级的革命知识分子，下同）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根本区别之一，是前者有知识但并不孤独。至少在真正成为革命者的那一刻，他已化身为群众，与劳动阶级打成一片，彻底融入了集体主义，因此是不存在孤独的。孤独以及自以为是的骄傲（不同于革命知识分子的那种融入集体后的自豪感），是典型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情感，是革命者必须加以彻底铲除的“幼稚病”，铲除之后方能成为革命知识分子（林道静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成长为革命知识分子乃至革命英雄的过程，就是这去除幼稚病的过程）。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孤独、孤芳自赏，根本缘于他还不革命或者还不够革命，因此瞧不起人民群众，自以为是，不能融入革命洪流，把“小我”变成“大我”。[1]一旦革命了，这个原先孤独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当然也就不再孤独了。他的“小我”升华为“大我”，和“人民大众”打成一片了，还怎么可能孤独呢？

但张仲银的情况却有些特殊。张仲银有文化，是五人坪这个偏僻山村唯一一个大学生、中学教师，会唱歌，擅口琴，当然属于知识分子。中师毕业后，他学习回乡青年邢燕子，到农村从事教育事业；同时他又积极革命，满嘴毛主席诗词，口口声声要在五人坪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典型的革命知识分子。但与文学史上的革命知识分子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不同，张仲银这个村里唯一的文化人的情感结构极为特殊：既革命又孤独，既豪情满怀又寂寞难耐。“自豪又孤独”是他到了五人坪后最强烈的双重感受。

显然，不能把张仲银和乡亲们的隔阂简单理解为农民和文化人的隔阂，理解为农民没有文化。要知道张仲银不

只是、而且主要不是来传授知识的，他首先是一位热心的革命者，是文化大革命的积极鼓动者。他感兴趣的与其说是传播知识，不如说是鼓动革命（破四旧、斗地主、写大字报、抓阶级斗争，等等）。虽然知识传播是张仲银接受的革命话语结构的一部分，却不是最重要的部分。他更能找到生命存在感的是煽动革命而不是传播知识。只有革命才能极大满足他的成就感、在场感和中心/广场情结——在小说中表现为渴望被人注目、一呼百应，也就是说，渴望自己成为榜样和偶像（这恐怕是革命之所以鼓舞人心的潜在秘密之一）。用小说中反复出现、张仲银经常使用的一个词来表达，这种感受就是“自豪”。[2]遗憾的是，张仲银的自豪感因为不被村民和学生理解而伴以深刻的孤独。尽管乡亲们对仲银极度敬畏，对他的知识、文化，他的歌和他的口琴，崇拜有加，却唯独不懂他自己最最看重、引以为自豪的革命理论和革命热情。小说一开始就写到张仲银领着一帮学生唱革命歌曲《北京有个金太阳》，学生们欣喜又激动，扯着嗓子狂吼，但实际上他们根本不懂歌词的意思。他在五人坪豪情满怀地传达中央文件，张贴各种各样的批判刘、邓、陶的大字报和大批判文章，但所有这些革命举动无不石沉大海，毫无回应。张仲银给每个学生一人戴一个红袖章，结果“学生们纷纷把红卫兵袖章装进兜里，做了擦鼻涕的手绢。”于是“深深落空”的张仲银只好一再重复那句话“唉，全部没文化，没有共同语言。”[3]回到自己的自豪与孤独。

值得注意的是，张仲银每次发出“都没有文化，没有共同语言”的感叹都是在他的革命宣传失败而不是传授知识遇阻的时候。这是颇堪玩味的，因为这些农民虽然没有文化却极度尊重和崇拜文化和文化人（当张仲银准备离开五人坪去北京闹革命的时候，他们为了挽留他不惜拿出最最珍贵的鸡蛋和面粉）。也就是说，张仲银的孤独与其说因为他的知识传播不出去，还不如说因为他的革命搞不起来。他越革命就越孤独。村民们欣赏他的文化知识和艺术修养，但对他的革命理想和革命行为却始终不能理解，遑论积极响应。于是，由于革命和群众的隔阂，革命知识分子也有了孤独问题。

那么，张仲银的孤独是源于启蒙吗？张仲银的孤独是否属于启蒙知识分子的孤独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首先回答：到底什么是启蒙？张仲银是启蒙者么？由于作者李锐自己和不少评论家都认定《万里无云》表现的就是启蒙和启蒙者的悲剧，张仲银的孤独就是启蒙者的孤独，因此，这个问题应该在这里重点加以讨论。

李锐的一篇题为《毁灭之痛》的文章提供了他自己对于张仲银形象的解释。李锐说：“《无风之树》写的是巨人和矮人之间发生的悲剧，《万里无云》写的是启蒙者与被启蒙者之间的悲剧。带着知识和真理来到穷乡僻壤的小学教师张仲银，是一个忘我献身的启蒙者，那只金光闪闪的铃铛在地老天荒之中发出的是真理的召唤。可神圣最终导致的是彻底的悲剧。这样的故事和悲剧不止发生在中国，不止发生在以前，它们在人类历史中一次又一次地上演，它们就发生在此时此刻，就发生在我们身边。张仲银是以古往今来一切读书人的身份自居的人，是一个古往今来的启蒙者。”[4]可见，李锐明确把张仲银定位为“神圣真理”的“启蒙者”，把张仲银的悲剧看作一个启蒙者的悲剧，他的失败源于群众的愚昧无知。作者没有对“真理”“神圣”词汇等做具体的历史分析。这样，李锐就把中国式特殊语境——准确说是“文化大革命”——中革命者（其原型是知青）的孤独抽象化、普遍化为“古往今来

的启蒙者”的悲剧，甚至是“一切读书人”的悲剧。这貌似提升了小说主题的哲学高度和普遍意义，实际上却失去了对具体的中国革命和中国知识分钟问题的诊断力。

我以为，李锐创作的张仲银形象是深刻而有丰富含义的，但他对于这个形象的上述解释却是似是而非的。换言之，他并不了解自己创造的这个形象。这里面的根本原因在于：他把狂热、盲目地投身文化大革命的张仲银当作了启蒙知识分子，把“文革”时期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当成了启蒙“真理”，最后则是合乎逻辑地把“文化大革命”的悲剧、把“文化大革命”的积极响应者（包括张仲银，也包括类似张仲银的一代知青）的悲剧，当成了启蒙和启蒙者的悲剧。

在中国的特殊语境中，启蒙知识分子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五四”时期两者基本上是重合的。启蒙知识分子的标志是受到现代资产阶级启蒙思想的影响，崇尚民主、自由、个性解放、人民主权等文化价值与政治理念。在现代中国作家的笔下，这些知识阶层常常与大众之间存在深刻隔阂，不能得到大众的理解，因此是孤独是其基本的情感体验。[5]但张仲银显然不是启蒙知识分子，他的孤独不但不是因为他的知识，更不是因为他怀抱什么“启蒙”理想而不能实现。无论是在《北京有个金太阳》中，还是在《万里无云》中，张仲银都没有表现出任何自由、民主、个性解放的思想意识，也不是因为这些思想意识得不到村民和学生的理解而陷入孤独。

李锐创造了张仲银，却不理解张仲银。这是一个值得我们思考的文学理论问题。

遗憾的是，这个似是而非的“启蒙者悲剧”说被很多人重复，以至于批评界一致把张仲银的悲剧理解为启蒙/者的悲剧，把这部小说的主题理解为对启蒙（现代性）的批判反思。比如王德威说：“《万里无云》最值得注意的，是李锐对于启蒙理念及教育方法的省思”[6]，“‘启蒙’（enlightenment）是中国现代化的要项之一：自清末以来，开发民智一直是革命论述的重点，而以普及教育为首要之务。”[7]在这里，“启蒙”、“革命”、“现代化”以及“普及教育”这几个现代性的关键词连成一串，它们在王德威的笔下即使不是同义的，至少也是同类的。至于它们在中国现代史语境中发生的微妙语义变化则被忽视。更有进者，王德威一方面指出了张仲银与毛泽东之间的精神联系（他说“张仲银独白的部分大量援引毛泽东诗词，革命口号及政党文学，他俨然成了‘毛语’的传声筒”）；另一方面却又把他联系于“五四”以降通过教育与知识救国的启蒙话语系谱和启蒙者形象（从鲁迅到叶绍钧），仿佛张仲银的悲剧就是鲁迅等的悲剧。[8]不得不指出，这种解读是对《北京有个金太阳》《万里无云》所塑造的张仲银形象的严重误读。张仲银怎么可能是一个“五四”反封建式的启蒙者？他的那套拷贝了毛语录的所谓“革命”理论，与以民主、自由和个人解放、人民主权为诉求的启蒙话语有什么联系？这里关键的问题是：不能因为张仲银有知识有文化从事教育鼓吹革命，就认定他是启蒙者，“启蒙”这个词除了有传授知识和普及教育之外，更有一层内涵是秉持自由民主、个性解放、人民主权的文化价值和政治理念，而张仲银信奉的恰恰是反自由、民主和个性解放的“文革”版“革命”理论，他的那点文化知识全部被用来传达中央文件和毛主席指示，写

大字报，从来没有向乡亲们或学生们灌输过一丁点儿自由、民主和个性解放的思想。的确，同样源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在很长一段时间继承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自由民主和个性解放思想，但“文革”时期的“革命”理论却完全走向了自由民主和个性解放的反面，越来越回归到中国式的封建专制文化。“五四”反封建的启蒙者，无论是鲁迅还是叶绍钧或他们笔下知识分子，以及柔石笔下的萧涧秋，都是信奉民主自由和个性解放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而张仲银不是。一个狂热的革命分子高喊着毛泽东的“最高指示”，到了一个穷乡僻壤不择手段地发动群众搞革命，批斗“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和“启蒙”挨得上边吗？

当然，张仲银的知识结构中除了意识形态话语、毛泽东诗词（也是意识形态话语的一部分），还有传统诗词。举一个知识上的小例子，张仲银知道司马迁和陆游。但他知道的司马迁只是毛泽东文章中“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的司马迁，他不了解像他一样困厄过但最终奋发独自撰史并在史书中“粪土万户侯”的司马迁。所以，张仲银喝大了的时候想到的“重于泰山”的死，自然是“人民勤务员张思德”的死，而非司马迁的死，更不可能是遇罗克、张志新等自由民主卫士的死。

实际上，如果我们从现代性反思的角度解读《万里无云》《北京有个金太阳》中的张仲银形象，那么，他的悲剧只能说是在中国非常具体特殊的语境中发生的现代性悲剧，是违背了启蒙承诺的那个所谓的“反现代的现代性”（姑且借用汪晖的术语）的悲剧，而不是什么一般意义上的现代性悲剧，更不是启蒙现代性的悲剧。如果把“文革”悲剧泛化为现代性的悲剧，把张仲银的悲剧被泛化为启蒙者的悲剧，那么其结论必然是：启蒙和现代性本身导致了张仲银及其置身的五人坪的悲剧。这样的思考路径不仅不能诊断和解决中国具体的现代性问题，而且必然导致悲观主义和虚无主义：既然现代性本身不可救药，那么，除了倒退到前现代（这个出路显然被李锐否定），剩下的就只能是绝望和悲叹。而如果张仲银的悲剧不是什么启蒙者的悲剧，更不是现代性的悲剧，而恰恰是违背了启蒙的中国式“现代性”的悲剧（李锐的小说客观上写出了这点，但李锐自己却并没有意识到这点而且误解了这点），那么，为了避免张仲银式悲剧（同时也是中国式的所谓“反现代的现代性”的悲剧）的再次发生，就是只能进一步的启蒙。

本文即将发表于《中国图书评论》今年第八期

2014-07-24

注释：

[1]“文革”时期有一部阿尔巴尼亚电影叫《创伤》，塑造了一个孤独无用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诗人形象，他不能融入劳动大众，一天到晚只会吟诵“快乐的小松树啊，大雪染白了你的睫毛”此类文绉绉的诗句，影片对他极尽讽刺挖苦。

[2]“自豪”是1950-1970年代最常见的抒情词汇之一，是那个时代所形塑“情感结构”（威廉斯语）——一个空洞的、被滥用的、也轻易而举产生认同奇效的词语。

[3]《北京有个金太阳》，花城出版社，2013年，第5页。

[4]《北京有个金太阳》，花城出版社，2013年，第192页。

[5]这种隔阂和孤独在崇尚启蒙的八十年代被表述为“文明和野蛮的冲突”，古华小说《爬满青藤的木屋》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之一。

[6]王德威：《吕梁山色有无间》，见《北京有个金太阳》，第222页。

[7]王德威：《吕梁山色有无间》，见《北京有个金太阳》，第222页。

[8]王德威：《吕梁山色有无间》，见《北京有个金太阳》，第224页

陶东风文集：http://www.hxzq.net/showcorpus.asp?id=229

华夏知青网不是赢利性的网站，所刊载作品只作网友交流之用
引用时请注明作者和出处，有版权问题请与版主联系
华夏知青网：http://www.hxzq.net/
华夏知青网络工作室

贫下中农始终认为知青在农村“待不长远”

当我们下乡之初高喊"扎根农村一辈子"时，贫下中农就未曾相信过我们这真诚的誓言；当我们的理想幻灭，天天想返城却因没有门路而绝望时，他们仍说我们在农村待不长远。正如后来的事实证明的那样，贫下中农具有远见卓识，而我们知青则狂热和短视。

实际上，上山下乡对出身不好的知青有着很好的疗伤功效。在农村，我们不再像在城里那样，是饱受歧视和侮辱的贱民，而是得到平等对待、受到起码尊重的"人"。贫下中农看我们不是凭出身，而真正是"重在表现"。当年，我们在被政治厌弃、社会遗弃、城市抛弃时，正是他们以博大的胸怀收留了我们，并给我们以极大的呵护和温暖，尽管我们是被强加给他们的，与他们争了口粮。

可是，贫下中农何以不仅比我们知青，甚至比那些有决策权的高官们都更有这样的政治远见呢？

下乡不久我们就发现，那些大字不识的农民对政治并非不感兴趣，他们谈起政治来，往往生动形象，言简意赅。

他们说，毛、刘好比生产队长和副队长，意见不合了就会吵架，总是要一个压倒另一个。

他们说，只需看对毛的吹捧和长相，林彪就是个奸臣。

他们对把那些精明能干，因而有了些财富并颇有威望的族人划为地主富农并打倒批斗很不以为然，对他们照样客气、尊重、信任，每遇技术活儿，必请他们干，虚心向他们讨教，还给他们评高工分。

他们认为上面对农民克扣的太过分，每年的口粮至少被强行剥夺一半，农民只能糠菜半年粮，便不声不响私分瞒产，却又不过分，以刚刚能填饱肚子为准。

他们认为农业学大寨没有顾及他们的实际情况。

他们对上面的各种指令和会议不胜其烦，他们说农村的事不如按千百年来他们自己的传统方式办。

他们对出身非红五类的我们从不歧视，从不说我们出身"不好"，而代之以"家里成份高"。他们认为上面把历次运动中的失势者下放到农村同古时发配一样，是流放犯人式的政治打压，只要失势者重新得势，或掌权者良心发

现，我们自会苦尽甘来。

他们认为政治上的翻来覆去各朝代都有，不足为怪。至于农村历来被作为解决城市各种社会问题的出路和流放地，他们无可奈何却也习以为常。

下乡不久，当我们虽然身处解放了二十年的中国农村，却往往忘记自己是生活在哪个世纪时；当我们发现农村的农业生产方式跟历史书上描述的两千年前几乎不相上下时；当我们亲耳听到贫下中农怀念集体化之前、甚至解放前的日子时；当我们想到不久前我们还在北京高喊打倒刘少奇，批判他的"三自一包"时；我们如梦初醒，开始怀疑毛的农村发展道路，奇怪他真的了解农村和农民吗？既然他说要"向农民群众不断地灌输社会主义思想"、"重要的问题是教育农民"，为什么还让我们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呢？

当我们在农村没有任何书报、没有及时的新闻信息，没有精神文化娱乐生活，心灵空虚得快要崩溃时；当我们为了填饱肚子，越来越斤斤计较于蝇头小利时；当我们尝到在广阔天地里没有来自上面的严格管束的甜头时；我们开始对那些通过阶级分析贬低农民并被冠之以"小农意识"的什么保守落后、自私狭隘、思想封闭、目光短浅、组织纪律性差、散漫等等渐生反感。

千百年来，农民就生活在封闭落后的环境里，他们怎么可能目光远大？他们每天面朝黄土背朝天地在地里刨食，生产、生活水平极低，怎么可能不自私狭隘？更何况有时候，虽处江湖之远的他们却比某些居庙堂之高的学者、专家们在政治上更敏锐呢！

固然，他们具有的"小富即安"、"乡土观念"等思想意识未免鼠目寸光，可这就是他们被强行纳入到城乡二元体制，和城里人的生活有"九天九地之别"，失去自由迁徙的权力，并通过工农业产品的"剪刀差"被盘剥的理由吗？消灭工农差别、城乡差别为什么不从解决这些方面入手呢？

自私狭隘、保守落后这些人性的弱点谁个没有？存在决定意识，程度不同而已。既然工人阶级目光远大、组织纪律性强、最有阶级觉悟最革命，为什么不让我们接受工人阶级的再教育呢？

自文革发动以来，"人民领袖"的皇权思想越来越暴露无遗，当我们山呼"万岁！万万岁！万寿无疆！永远健康！"时，当我们千百次地高唱《东方红》，向红太阳顶礼膜拜时，当我们天天早请示、晚汇报、跳忠字舞、表忠心时，我们到底身在一个什么社会？当那些"保皇派、大救星、犯上作乱、乱臣贼子、忠臣、奸臣、官宦、乌纱帽、效忠、奉旨造反"等等在封建社会才频繁使用的词汇不绝于耳时，我们究竟处于一个什么语境？

显而易见，这一切无不污染着我们这代人那时的纯洁心灵，酿就了我们早期的价值观和思想意识。这些才是应该批判和摒弃的产生于封建社会的地地道道的"小农意识"呢。我们天天喊要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其实封建主义复辟才是我们更应该严加防范的。

其它如血统论、王侯将相论、忠君论等"小农意识"也曾作为文革的伴生物沉渣泛起。当时，一些自视血统高贵，是天生、可靠接班人的龙子龙孙们把"解放全人类"的口号喊得震天响，却极力推崇"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对联，施行红色恐怖。他们从登上历史舞台的第一天起，就充满了浓厚的封建特权思想。其他因出身非红五类没有资格加入红卫兵，遭到歧视甚至迫害者也急忙承认自己的原罪，与家庭划清界限，努力无限忠于毛主席。我们这一代就这样从青少年起即处于红卫兵运动时期的语言、文化和意识形态之中，而这一切影响并决定着我们当时及以后的思维方式、思想道德和行为准则。亚当.麦克尼说："长期的专制会产生一种特殊的文化和相应的行为准则，它使人们不再爱好自由和真理，完全丧失人类的尊严并毫无自治能力。"在这些封建思想意识形态的浸润下，两年后，"丧失了人的尊严而又毫无自治能力"的我们像当初突然被卷入红卫兵运动一样，根本没有，也不可能对封建血统论肆虐其间的上山下乡运动有选择的权力，更丧失了独立思考的能力，就被裹挟到广阔天地去了。

实际上，当时上山下乡运动的决策者既有政治上的追求，也有经济上的考虑。上山下乡运动在政治上是文革的组成部分，是实现毛乌托邦理想和培养接班人的"伟大实践"；经济上，是把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失败的人口政策和文革停工停产停学合力酿成的苦果---数千万的失业大军一股脑儿抛向了农村，给本来就十分贫困的农民增加了负担；思想上，是僵化盲从、个人迷信盛行；文化上，则充满了中世纪的反智气味，是"知识越多越反动"思潮的产物。上山下乡运动与广大人民的利益相抵触，与历史发展潮流相违背，与民主自由法制毫不相融，因而它无可避免地以失败而告终。

改革开放后，全社会在"不争论"、"闷声发大财"的思想支配下，全神贯注于物质财富，结果，今日之中国已经变成了物欲横流、暴富阶层与底层贫民截然对立的、除了GDP什么都没有的中国，没有信仰，没有灵魂，没有思想、没有理论，宪政民主还只是一个梦，意识形态领域一片混乱。

在经历了空前的文革劫难后，现在倒是不喊"万寿无疆"、不跳忠字舞了，但王立军在逃往美领馆前对薄熙来式的"忠诚"、重官权轻民权以及门第、等级观念等等的封建思想仍无处不在，人们在精神上甚至语言上都极其贫乏和苍白。

在主流媒体和网络上，"朝廷、明主、臣民、子民、草民、登基、诸侯、封疆大吏、太子党、王储、衙内、夺嫡、家丁、家奴、帝王师、谋反"等等充满封建意识涵义的字眼取代了"党中央、政府、领导人、公民"等等的现代词汇而大行其道。"官二代、富二代、演二代、红二代"甚至"红三代"等等的称谓充斥舆论，实实在在反映着我们这个社会散发着封建世袭思想的遗毒和阶层逐渐固化的危险。

荧屏上，形形色色的以封建宫廷秘史、艳史、戏说为内容，美化暴君、掩盖暴政、宗室争权、后宫谋杀的影视剧绵延不绝，帝王将相们被演绎成英明神武、清正廉明、仁慈爱民的明君、贤相、清官，而太监、皇后、妃子们极力揣摩天子的心思，尔虞我诈，笑里藏刀，伤人于无声无息。这些庸俗不堪的作品从头至尾宣扬着封建专制的文化

思想和奴性意识，潜移默化地毒害着广大观众特别是青少年。

在官场、职场里，第一把手大搞绝对权力，成了说一不二的小皇帝，对他们的"圣旨"下属只有听喝的份，毫无平等对话民主自由可言。

在各大小单位，只有在封建社会和集权社会里才有的血统论、姻亲关系、宗族关系、地方主义、宗派主义、老乡观念、任人唯亲等等的封建糟粕仍在作祟。

长期以来，封建的思想意识形态一直是我国历史转型期的严重阻碍，而危害最大的是那些满脑子封建意识，负责引导和诠释语言并掌握着决策权的政府官员和公知们，绝不是那些底层的仍有着"小农意识"的"沉默的大多数"。

先进的与时俱进的思想意识形态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巨大动力，可是在推翻封建帝制的辛亥革命已经超过一百年，文革也已结束近四十年后的今天，从意识形态的层面研究剖析文革十分欠缺，各种封建思想意识的余毒仍未被清算，仍污染着我们的社会，仍在我们中间徘徊，甚至有时还被推波助澜。我们要想建立一个真正民主自由法制的现代社会，要想不重蹈文革覆辙，必须坚决摒弃各种封建思想意识，用先进的思想占领我们的意识形态领域。

（*原发共识网*）

唐燕文集：http://www.hxzq.net/showcorpus.asp?id=247

华夏知青网不是赢利性的网站，所刊载作品只作网友交流之用
引用时请注明作者和出处，有版权问题请与版主联系
华夏知青网：http://www.hxzq.net/
华夏知青网络工作室

重读当年上山下乡“献忠书”

此次“上山下乡插队落户、上海千人离沪赴赣”45周年活动中，时隔45年一睹当年为上山下乡“造势”的真容——有幸看到了1968-11-19离开上海那天的解放日报。在一篇关于离沪赴赣的中学生聚会“献忠心、表决心”的“新闻报道”（详见《细读1968-11-19的“新闻报道”》）的下方，还有一篇大约一千字的文章，题目是“毛主席挥手我前进井冈山举旗闹革命”，署名是“上海赴井冈山插队落户的一千余名红卫兵”。现在有人把此“千言文”称为“宣言”，其实更妥帖更确切的称谓应该是“千人千言献忠书”，简称“献忠书”。我作为当年赴赣千人中的一份子，对那份“献忠书”一无所知，当年一定是有人代表了一干众人，起草和发表了这份杰作。用现在的流行语就是我们曾经“被代表”了一次。其内容如下：

井冈扬青举红旗，浦江奔腾来报喜，赴赣战士上征途，捷报飞向毛主席。

今天，我们一千余名革命红卫兵，打起背包，迈开大步，手捧宝书，告别英雄的上海城，向着毛主席亲手创造的第一个革命圣地井冈山出发了！

【点评】

号称“一千余名革命红卫兵”，实属虚伪作假。我至今不会忘记，最初摊派到每个区100名指标，是何等的“神圣”“严肃”“慎重”，声称首批插队的“政审要求”比较高，与去黑龙江兵团差不多（参见《亲历“自愿报名”插队落户》），可是，到出发前4天还有四分之一的名额没有落实，卢湾区革会就连夜召开紧急会议，要求各校紧急动员，凡报名者均可批准。我和一个同班同学由于曾经“自愿报名”但“政审”不合格而“名落孙山”，此时此刻就成了“优先”招募对象；还有两个尚未正式进入毕业分配阶段的68届初中生也被“光荣批准”了。他们两人按照66、67届实行的“四个面向”，确定属于“外农”档子，晚走不如早走，所以就决定“应募”。由于他们是正宗的的资产阶级家庭出身，一直没有资格加入红卫兵，但是，获准赴赣插队以后就摇身一变成了“革命红卫兵”。诸如此类的翻云覆雨，令人啼笑皆非，这算什么“阶级路线”“阶级政策”啊？！

毛主席啊，毛主席！在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大好形势下，在举国欢庆党的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胜利闭幕的幸福时刻，在我们踏上新的征途时，我们有多少贴心的话要对您讲，我们有多少热情的歌儿要对您

唱。井冈山的翠竹当笔，表达不尽我们心中要为您献身的战斗豪情，赣江之水为墨，描绘不完我们对您的无限热爱，无限信仰，无限崇拜，无限忠诚！千言万语，千歌万曲，凝结成一句最美好的祝愿：祝愿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毛主席教导我们："看一个青年是不是革命的，拿什么做标准呢？拿什么去辨别他呢？只有一个标准，这就是看他愿意不愿意、并且实行不实行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在一块。"毛主席的伟大教导，给我国青年运动指出了唯一正确的方向。"五四"运动以来，千百万革命青年，在毛泽东思想光辉指引下，冲破重重阻力，到延安去，到抗日根据地去，坚定地走上和工农相结合的光明大道；今天，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又为我国革命青年和工农兵相结合开辟了无限广阔的道路。

毛主席又教导我们："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我们遵循毛主席的伟大教导，上山下乡，走插队落户的道路，以实际行动批判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我们深深懂得，插队落户意味着一辈子为人民艰苦奋斗，插队落户意味着将经受农村阶级斗争的最长期最艰苦最激烈的大风大浪考验，插队落户意味着把自己的一切献给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我们"想到人民的利益，想到大多数人民的痛苦"，想到世界上三分之二的人民还在水深火热之中，我们浑身热血沸腾。革命先烈为着人民的解放，舍得家庭，舍得父母，舍得生命，紧跟毛主席闹革命，我们有什么私心杂念不能抛弃，有什么个人利益不能牺牲？为了保卫社会主义祖国永不变色，为了全人类的解放，插队落户的路我们走定了。

【点评】

上述套话在当年是最时尚最激动人心的豪言壮语，风靡一时，不绝于耳，确实让天真幼稚的中学生燃烧起青春的激情，当真感觉自己肩负着解放全人类的伟大使命，并且会在我们这代人手里实现全球一片红。此等"理想梦"固然是客观环境使然，但是在时过境迁之后还是应该认真深入地反思，不能只顾自己"怀念青春"而抽象和美化那个荒唐年代，不能忘记那些虚妄的乌托邦南柯梦对个人对民族对社稷产生的巨大破坏。

我们一定要牢记毛主席的教导：对知识分子，要由工农兵给他们以再教育，使他们与工农结合起来。我们决心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下，老老实实地接受贫下中农对我们的再教育，"彻底改变旧思想"，把自己锻炼成为坚强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

站在井冈山，眼望全世界，我们誓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为了让井冈山的红旗在赣江两岸祖国山河飘扬万代，为了把井冈山的红旗插遍五洲四海，我们要永远紧跟毛主席，一辈子艰苦奋斗！

【点评】

如果说，当年解放日报上刊发的“千人千言献忠书”还有御用文人把关润色，那么，当年在母校欢送大会的发言也即“献忠书”，可以说是更多更真实更完全彻底地表达了极左路线下天真幼稚的初中生的“肺腑之言”，详见《留给后代的教材》。当时12-21指示尚未出台，“知识青年”一词还未普及，所以到处可见把中学生捧为知识分子的无稽之谈，其目的在于和“对知识分子进行再教育”的最高指示挂上钩。这一历史细节提醒人们，不要忘记那场上山下乡运动的“基础理论”就是鼓噪了十来年的“再教育”。如今那个“基础理论”已经被否定，不再有人炒作，可是它的系列孳生物却没有得到认真的清理，相反还受到热捧。上述“献忠书”就是一例。尽管它充斥着虚伪之词、狂妄之语，如今却被醒目地置于文集的卷首，不加任何说明，更无点滴反思，难道它们就值得如此炫耀！？

重读当年那些上山下乡“献忠书”，又一次看清了那场运动是怎样鼓动起来的，它的“原动力”并不是正常的理智的“青春梦”，而是效仿专制帝王时代的“献忠心”，所以，由此生发的“追梦”只能是失去理智的狂热，因而不是值得肯定和颂扬的正能量。如今选择性地忘记“献忠心”之类逆时代而动的的历史闹剧，回避历史背景而抽象空洞地奢谈激情奋斗、顽强拼搏、奉献青春等等所谓的“追梦情怀”，只会又一次化为历史笑柄。

2013-11-30

网中人文集：http://www.hxzq.net/showcorpus.asp?id=162

华夏知青网不是赢利性的网站，所刊载作品只作网友交流之用
引用时请注明作者和出处，有版权问题请与版主联系
华夏知青网：http://www.hxzq.net/
华夏知青网络工作室

关于知青命运的几个“如果”

前两天我饶有兴致地阅读了知青网友滴水湖发布了一半的12万字鸿篇博文《渐渐消失的上山下乡》，我在文后的评论中写道：“《渐渐消失的上山下乡》系列博文逐篇看到这儿，写得真好。材料详实、分析到位、观点鲜明、配图精到。不能不点赞！谢谢你！我会跟读，并从中受益。”滴水湖的文章启发我思考了关于知青命运的几个“如果...”。人们常说“历史没有‘如果’”，可是如果以史为鉴，我们的反思难道不是往往建立在若干个“如果”之上吗？

1、如果没有文革，我们这一代乃至后代中的大多数同样要上山下乡，根本无可选择。

固然，毛的民粹主义和乌托邦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的强行实施是我们注定上山下乡的政治原因，绝对不可轻视。然而，尽管建国之初，我们曾雄心勃勃致力于工业化建设，甚至不惜用剪刀差等方式大肆以牺牲农民利益为代价，但由于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更由于历次政治运动特别是大跃进的瞎折腾，六十年代的中国工业化程度很低；加上文革前大肆批判马寅初的人口论，使人口急剧增长。结果我们根本无法解决一年比一年多的大批青年学生升学和就业问题，这些人唯一的出路只能是上山下乡，扎根农村一辈子。

事实上，从1956年起国家就把上山下乡和解决失业问题结合起来了；自1962年到文革前，全国已组织了130万知青奔赴农村和边疆；1963年国务院曾计划在18年内动员3500万知青下乡；及至1968年底，由于文革导致的大学、高中停办，三届积压的大中专毕业生嗷嗷待岗，毛便一声令下，结果延续到1979年共有1700万知青上山下乡。

上山下乡运动实际上是借助红色意识形态把失学失业的巨大包袱抛给了农村。即使没有文革，当时的政治形势和经济形势也势必使我国一代代城市青年中的大多数上山下乡成为常态。

2、如果推迟一年，我们在1969年而非1968年下乡，就会同父母一起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遭受到进一步伤害。

1968年下半年起全国陆续开展了“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对所谓“地、富、反、坏、右、特务、叛徒、走资派、漏网右派、国民党残渣余孽”等等进行大清理。当时不仅知识分子成堆的大专院校和科研单位是清队的重点，

而且因为有毛的指示"文革是国共两党斗争的继续"和他亲自抓的北京二·七机车车辆厂的清队"样板"，结果连国民党时期参加工作的全国各厂矿的老工人都成了清理对象。清队中全国共有3000万人被斗，50万人死亡，冤假错案无算。

我们在此之前下乡，避开了作为文革主要组成部分的“清队”运动，终结了我们在城里的狂热和迷乱，在极度贫困落后的农村沉静下来，开始了务实和独立思考。

3、如果李庆霖没给毛“告御状”或毛没收到他的信，就没有后来知青政策的调整。

大规模的“再教育”仅进行了四年暴露出来的问题就极其严重，知青家长李庆霖给毛的信说出了知青生活很艰苦，老百姓的日子很艰难，官场很腐败的真话。从毛的回信“全国此类事甚多”表明他很清楚知青的实际状况，他当然不能容忍他的“再教育”光辉思想受到亵渎，不能允许上山下乡运动失败从而否定了文革，所以承诺“容当统筹解决”。

在随后召开的长达两个月之久的《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其基调以“调整”取代了“再教育”。此后知青的处境有所改善；老知青回城的政策有所放松，部分知青因此改变了命运；新知青则在城郊插队，并有专人管理。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日益尖锐的各类矛盾。

我们实在应该感谢李庆霖的非凡勇气。

4、如果当年云南兵团知青大返城的请愿活动不是与对越“自卫反击战”备战时间恰好同步，即便他们拼死抗争，即便中央派往云南兵团“救火”的是后来被誉为“建设兵团知青之父”、对知青充满同情的全国农垦局局长赵凡，全国范围的知青“胜利大逃亡”能那么快地随之而来吗？

自1978年11月云南兵团知青就开始了“我们要回家”，“不回城，毋宁死”的强烈诉求，经过两个多月愈演愈烈的抬尸游行、集体卧轨、北上情愿、罢工绝食等等的抗争，时任云南省委书记的安平生终于在1979年2月17日对越自卫反击战打响前的一个月，1979年1月15日发表了“知青不愿留下的，都可以回去”的讲话，接踵而至的是赵凡以知青办名义上报的解决知青问题的“六条”得到国务院批准，从而开启了知青大返城洪流的闸门。当时西双版纳的很多知青是搭乘运往越战前线的军用物资的返程军车回城的。

随后，五万云南知青返城风潮迅速波及全国，仅仅几个月，上千万知青返回城市，历时十年的上山下乡运动就此终结。

5、如果毛对周不那么绝情，不乏知青参与的天安门“四五”运动还会发生吗？

当时虽然我们并不知道毛说过这样的话：“为什么要我参加总理的追悼会？我还有不参加的权利嘛！伟大的马

克思主义者，是谁送给总理的？我和这个马克思主义的总理，就斗争过不少于十次”，“总理是反对我搞文化大革命的，有一批，不是小批，还是老的，都听他的。拥护我，高呼我万岁，是无奈的，这点我和总理的鸿沟是没法弥补的。”但我们看到的是：在周去世前八天还能接见尼克松的女儿和女婿，畅谈近一小时后在人搀扶下起身把两位宾客送出门的毛，却没有一次去看望病中的周恩来。

听说的是：在医疗专家们判断他的身体状况“可以参加追悼会”，只是建议时间要控制在一个小时左右，并且中央政治局已为毛参加追悼会做了周密安排的情况下，毛却拒绝参加周的追悼会。

实际上，引发天安门事件的导火索---追悼周的活动被严格限制---是毛远新向政治局传达的“主席指示：总理的丧事要坚持节约的原则，各地不开追悼会，不设灵堂，不提倡戴黑纱、做花圈”。

无疑，“四五”运动是日后粉粹四人帮的强有力的群众基础。

6、如果毛再多活5年即活到1981年（他多么“还想再活500年”！），那时老三届中的高三生已经35周岁，老初一生也29周岁了，老三届绝大多数都已过了上大学的年龄。69届及其以后的七届毕业生，再外加五届76届到80届，他们中的大多数无疑都是名为中学生实则小学生水平的知青，那么即使在第二年的1982年同样恢复高考，这一共积累的15届知青能参加高考的会是哪个年龄段的？高考考题得多简单，考生的考分得多低就能上大学啊！

而广大中小学在校生必将按毛的指示“工人宣传队要在学校中长期留下去，参加学校中全部斗、批、改任务，并且永远领导学校”、“阶级斗争是你们的主课”，终日学毛著、批判资产阶级、学军、学工、学农，还得备战备荒挖防空洞。

在法国TGV列车以每小时380.4公里打破世界纪录，成为当时最快的轮轨客运列车；美国发射了第一架可重复使用的航天飞机；IBM推出首部个人电脑；F-117隐形飞机首次实验升空的1981年，如果我们的教育还处在如此荒谬的状态，我们的教育科技事业和发达国家的距离还要再拉大多少，何时才能赶上迅速发展的世界科技潮流？

7、如果粉碎四人帮后没有那场真理大讨论，仍奉行“两个凡是”，毛的上山下乡运动绝不会被否定，那么我们乃至我们的后代就会至今还在广阔天地里自生自灭。

1978年5月18日《光明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而同年12月10日闭幕的持续了四十多天的第二届全国上山下乡工作会议，仍然“肯定了文革以来上山下乡工作取得了伟大成就，并强调今后仍然有计划地动员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与工农相结合。”会议期间，刚刚复刊的《中国青年报》在11月23日还发表了《正确认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问题》。直到1980年，国务院知青办才明确宣布“能够做到不下乡的，可以不下”，成了在全国范围内宣告上山下乡即将终止的信号。1981年底，国务院知青办并入国家劳动总局，至此，历经20余年的上山下乡运动告结束。

然而，正如滴水湖所说，迄今为止官方从来“没有任何直截了当否定上山下乡的文件和指示，只有陈述事实的抽象肯定、具体否定。”因此“我感到继续形成新的上山下乡是有可能的，只需要变换一下形势而已。有这样的土壤，有这样的基因，有这样的人物、有这样的气候，有这样的机制，在没有真正的政治改革前，都有可能发生。在没有真正实施宪政，切实保障民主、自由的其它下，都有可能发生。”滴水湖的担心不无道理，就
在2013年7月23日，《人民日报》还转载了网友之声《上山下乡不容否定》的文章；由知青参与、官方主办的某个正在巡展的知青展览对上山下乡运动甚至没有守住“基本否定”的底线...凡此种种，值得警惕！

8、如果没有改革开放，不大力发展经济，即使我们否定了“两个凡是”，摒弃了“再教育”理论，也还是无力解决大量青年人口的升学和就业问题。

大力发展经济，走工业化城市化道路是解决失学失业问题的唯一途径。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实践证明，我们不仅解决了历届城市青年的升学就业问题，还使2.6亿农民进城务工。即使在当年，如果没有及时从经济上想办法把每年用于安置知青上山下乡的经费转向扶助城镇待业青年就业，也不可能解决回城知青的就业问题，知青大返城也就不会顺利实现。

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即实现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的过程，改革开放之前我们实行的却是把大规模的人口迁往农村的“反城市化”战略，这种逆历史潮流的作法当然行不通，失败是必然的。

9、如果没有尼克松和毛泽东开启的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进程，我们的国门不知何时才能打开，至少外派、允许出国留学不知还要推迟多少年？

早在1967年尼克松准备竞选美国总统期间他就发文说：“从长远来看，我们简直经不起永远让中国留在国际大家庭之外，来助长她的狂热，增进她的仇恨，威胁她的邻国。在这个小小的星球上，容不得使十亿最有才华的人民生活在愤怒的孤立状态之中。”1960年代中苏关系恶化，中苏边界武装冲突频仍。苏联入侵阿富汗、支持越南出兵柬埔寨，严重影响了中国的周边安全。那时中国同样面临着重新考虑与美国的关系问题。1970年12月毛终于通过斯诺向尼克松伸出了橄榄枝：″如果尼克松愿意来，我愿意和他谈″。

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正式访华，并与中方在上海了签署了《中美联合公报》，中美交往的大门终于打开了，从而为1978年中美建交奠定了基础，为中国建设和改革开放创造了有利的国际环境，也促成了我国日后的全方位对外开放和现代化建设。

2014-06-01

告别知青

按：赴欧前夕，《今晚报》约稿，我给了这篇十一年前的旧文。此文除了当年在《华夏知青》、《老三届》等知青网站上贴出，从未公开发表。我知道，“知青”这两个字对许多人来说，意味着什么。我不忍撕下这块温柔面纱，让人看到背后的冷硬与残酷。今天大家终于看见，同为知青，有的是压迫者，有的是受难者的现实。媒体做了一些删节，去掉了一些敏感文字，现将完整稿发在这里。

发表稿网址：http://news.163.com/14/0717/14/A1C5CQOM00014AED.html

2014-07-18

知青——这样一个极左年代留下来的，给数千万青少年及其家庭带来不幸、痛苦与灾难的巨大怪胎，一个无数青少年日夜渴望摆脱，甚至不惜割舍一切以死相拼的社会身份，一段让无数人刻骨铭心不忍回目，身心受到巨大摧残的生活经历，后来是如何成为一个让人怀念，让人动情的温馨词儿的呢？

其实，知青从来就不是一个有共同理念，共同利益的共同体。它只是纪元意义上的一代人，甚至只是这一代人中的很大的一部分而已。这个社会有多复杂，它也同样有多复杂，这个社会有多少利益冲突，它的内部也有多少利益冲突。只要看看“知青”的前史——文革前及文革中的中学生——他们各自的背景，思想，社会地位与社会利益就可以知道了。他们当中有的是左派学生干部，有的是背着沉重家庭包袱的黑五类，有的是可以拿皮鞭抽人的，有的只有认罪的份；他们有的造过另一部分同学父母的反，有的后来又翻过身来将对方打成各种另类，有的锦衣玉食，小车接送，有的小小年纪就去卖冰棍拖板车……再来看看“知青”后史——有的通过自己的努力，进入主流社会，有的倚仗家族背景，掌握各种权利，有的下岗，沦落社会最低层，有的下海，摸爬滚打或招摇撞骗之后成为高尚人士，有的成为有各种职称头衔的国家精英，有的永远停留在小学毕业的学历上，有的已经香车华屋，有的一日三餐无着，而那些早已做了高官巨贾的知青，向来是不会将自己当成天下知青的一员的，他们中的许多人，除非做秀需要，从来不会张扬自己的知青身份，一个国企或私企的老板，如何会与他手下打工的老知青“天下一家”？……至于真正做知青的那一段岁月，这个群体中也是五颜六色的，有提干的，进厂的，“推荐”上大学的，也有在人走屋空的山乡苦苦等待，等待返城与家人团聚，也有终于将一把年轻的白骨扔在异乡了的。相互间的倾

轧，构陷，龃龉，打斗也是家常便饭，特别是面临一些利益冲突的时候。而这些，在还没有来得及清理反思的时候，就被日后的时代变动掩盖，直到另一个温情怀旧的时代到来。

在一篇文章中我曾说过，当年的红军长征演化成后来的《万水千山》、《长征组歌》之后，它就不是原来的长征了。那种非人的物质性苦难，已经再生产为精神性、甚至是意识形态的新产品。对于当事人，可以把它当作肉体苦难淡忘之后的心理抚慰，也可以当作后来政治身份的一块标记。对于后来人，它只是一种审美化了的浪漫情怀，是一些壮美的画面和动听的旋律。

对“知青”的回顾与怀念，在某种程度上和上面的例子是同质的。当年的肉体之苦，转化成战天斗地的英雄主义豪情。当年的心灵之苦，成为个人磨砺的精神财富，当年的单纯，热情，成为今天世风日下尔虞我诈的比照。当年的温情，更是成为青春岁月中永远闪烁的星光，返照着今天日益或落寞或喧嚣的内心……

“知青”这个多少人多少年来唯恐甩之不脱的社会身份，在七十年代后期终于从中国社会舞台上逐步淡出，其后很多年间，除了一些知青作家将它作为文学素材，大多数原知青早已忙着奔向眼花缭乱或百废待兴的新生活。知青生活往事，只是偶尔成为个人的一丝怀想，而没有发酵成社会生活中的一只大酒缸。这就是为什么许多老同学老插友最后的见面都间隔了十数年甚至数十年。

“知青”这个词重新在社会上活跃起来，始于九十年代初期，九十年代中后期达到高潮。注意这样的一个时代背景：8/9风波中止了一场长达十年的全民参与的社会改革，沉寂数年后，邓公南巡，开始了单腿的全面走向市场经济的变革。在这场大震荡中，立足未稳的广大原知青，由于年龄，学历，知识结构，思想观念，家庭拖累，及政策上的种种局限，大批的、迅速地滑落为弱势阶层。年轻时代的宏大理想，插队期间的革命豪情及返城之后跟上时代步伐的艰苦努力，很快变为虚幻。他们中的许多人，已经再没有力量与这个巨大的变革较量。种种的社会不公，让其中有些人回过头去，怀念那个艰难贫困但比较平等的年代，怀念那个年代里多少还保留着纯洁，热情，豪迈，坚韧的道德情操。由于迅速的边缘化，这些过惯了社会集体生活的老知青，渴望寻求社会认同。另有一部分努力改变了自己命运的成功人士，从另一种心理需求出发，与前一部分人汇合，形成了长达数年的知青文化热潮。

但是，在这数年的知青文化热潮和知青社会交往中，由于种种主观和客观的局限，存在着很大的空洞与断裂——那就是没有认真清理与思考这一代人在中国社会政治生活中的种种问题，特别是文革中的问题，只将主题限定于相对单纯的插队时期，失去了对自己一代人在中国当代史上地位、作用、失误的重新认识。也失去了一个反思与提升的机会。这既是十多年来意识形态管制使然，也是这一代人自身局限使然。直到今天他们中的一些人还希望用往日的浪漫主义情怀，来温暖自己苍凉的心。还残留着旧时代虚幻但是已经无力的理念，如乌托邦式的社会平等，义和团式的反智主义，以及对于阶级斗争时代的隐隐怀念并从这样的立场出发反对今日的种种腐败与堕落。即失去了旧的政治历史资源，又无法吸纳当代世界文明主流的思想理念，即被传统政治力量所抛弃，又不为当今的利

益集团所青睐，这一切，已经明确显示出原来知青一代正在集体从历史舞台退场。

所以我说了，“知青”这个词儿，如今只承担着一点脆弱的道德情怀，它更多只是一种心灵抚慰剂，一处无所寄托的灵魂的避难所。在这次的论争中，一些意见依持的也常常是这种道德情怀，或对社会发展中必须建立的社会差序的本能的反应。实际上，一个在这样虚拟的民主训练中，持守强硬立场的人，在现实生活中，可能恰恰是一个逆来顺受，一切认命的人，这就是一个真正的悲剧。

如果不给这个词再次注入新的内容新的生机，那么它最后的作用，只能用于我们这一代人的临终关怀院。那时，让我们为那些即将离世的老知青们唱一首知青喜爱的老歌，讲一些插队落户的忧伤又温暖的故事。让离去的人，在一种温暖梦幻中，告别这个梦魂萦绕的名字。

我们所有经历过上山下乡的人，只有通过我们每一个个体的重新确认，才能让这一代人共有的这个历史名称，以另外一种方式，另外一种形象，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历史上站立起来，让别人说，这些人原来当过知青。而不是相反，在这样一个历史大词下面，数千万人却消失了，只剩下那个旁人与后人都不再感兴趣的两个汉字，进入很久之后的辞典。

写下这些，我终于把我数年来想说的话说了出来，这是非常艰难的。十多年来，我曾为这样一个词付出过许多，但是我现在必须向它告别，为了我自己的思考，也为了不再在这个大词下逃避历史的真实，逃避我们当下面临的窘境，逃避未来的拷问与追究。

2003年8月31日

胡发云文集：http://www.hxzq.net/showcorpus.asp?id=13

华夏知青网不是赢利性的网站，所刊载作品只作网友交流之用
引用时请注明作者和出处，有版权问题请与版主联系
华夏知青网：http://www.hxzq.net/
华夏知青网络工作室

知青的回忆与当年的语境

在那个“激情燃烧”的“火红的年代”里，是很少用到“梦”这个词的，就是用到了，也多用于负面含义，如“恶梦”“噩梦”“梦魇”“白日做梦”“黄粱美梦”，它们所含的贬义从字面上就可以一目了然。不过，并不存在“逆否命题”，即，看上去是褒义词，未必可以用于正面含义。典型的例子就是“美梦”。虽然“美梦”与“恶梦”从字面上来说是一对反义词，但在实际使用中，“美梦”是一个与“恶梦”相差无几的贬义词，例如“帝国主义者‘和平演变’的美梦”、“走资派复辟资本主义的美梦”等等。

单词“梦”的上述处境又株连到“梦想”一词。它也充满了贬义，常常与“和平演变”“复辟资本主义”等等“反动”“反革命”言行联系在一起。

与“梦想”相近的贬义词还有“空想”。接近中性的有“幻想”。

于是，要描述对未来事物的美好想象和希望，就非“理想”莫属了，它绝对是用于正面含义的，并且配上“革命”“伟大”“美好”等等正面的褒义的前置修饰词。至今在我的脑海里还回响着六十年代初期在小学的唱歌课上学过的一首歌：“我有一个理想，一个美好的理想，等我长大了，要把农民当，要把农民当。……”因此，不难想见，在那个年代那样的语境下，“追梦情怀”之类的美词妙语是不可能出现的。

二十多年以后，九十年代初期，有一本《中国知青梦》在我脑海里留下深刻印象，尤其是其中描述的给上山下乡运动致命一击的云南兵团知青集体下跪、要求回家的惊人场面。在信息封闭的年代里，我和周围的亲友同事对该事件几乎无人知晓，时隔十多年才第一次知道，深为震惊。与此同时，也是第一次看到把“知青”与“梦”联系在一起。真是情何以堪！当年数以千万计的中学“毕业生”被赋以“知识青年”的桂冠，被遣送到“广阔天地”接受“再教育”，无期限，无学制，无文凭，无学历，即使是同年“入学”的“学员”也不是“同届”同时“结业”。轰轰烈烈开始的上山下乡运动，十余年后无声无息地结束，它不是以花团锦簇的“大凯旋”宣告终止，而是以溃不成军的“大逃亡”惨淡收场。

所以，不难想象，那样的“知青梦”是何种滋味！？作者的题记如是说——谨以此书，祭奠所有在辉煌的噩梦中悄然死灭的青春。

时光再一次过去二十多年。又出现一本书名中包含“知青”“梦”的书籍。那是1968年上海首批千名中学生赴

赣插队45周年的时候面世的知青回忆录。这本非正式出版物的全名是“忆青春——五百知青一个梦”。不过，扉页上是正副倒置，副题在上，正题在下；封面上，更是“喧宾夺主”：正题“忆青春”以无色凹凸印刷给出，隐隐约约难以认读；而副题“五百知青一个梦”则是硕大而醒目的红色字体。

显而易见，封面设计是极力凸显红色的“梦”。

打开该书目录，除了“刻苦成才”“风景独好”“艰难创业”等等常见词汇外，“追梦青春”赫然跃入眼帘！更有——“为了追梦：一个特殊年代的特殊群体”！

我不禁愕然。当年上山下乡运动也是“青春追梦”之举？回忆过去，怀念青春，怎能如此远离当年的语境？恰恰就是在那本书的起始部分有一份1968年11月19日的解放日报扫描件，其中就有上山下乡“献忠书”！那里面何来“追梦情怀”？！（详见《重读当年上山下乡“献忠书”》）

对于当年的“献忠”活动，不必怀疑当时的想法、信念、情感，但也不要刻意回避或者否认那些曾经有过的至诚、虔诚、忠诚，更应该进行认真的反思：那样的忠心到底是崇高、可贵，还是愚昧、悲哀？当然，这样的反思已经越出回忆录的范畴。但是，即使如此，当年的“献忠书”所表达的“三忠于四无限”“革命豪情”，怎么可以与现今语境中的青春追梦等量齐观、同日而语？

在当今的语境里，“幻想”“空想”的含义没有大变，而“美梦”“梦想”已经“脱贬入褒”，很少使用它们的负面含义了。而且，好像还从一个极端走到了另一个极端——大凡说到梦，就美好而浪漫，甚至激动人心……。但是，只要正视现时生活，就不能不深思，嫦娥奔月与井底蜗居何曾是“一个梦”？那么，四十多年前的“知青”又何以同筑“一个梦”？

在人生的最后一程中，在回顾青春岁月时，需要保持轻松欢愉乐观，但是也不能任意抽去历史背景，把逆时代而动的“敬献忠心”之类闹剧演绎成“追梦情怀”。

我们曾经听过太多的故事，现在希望知道更多的事实，也要留给后人更多的真实。

2014-02-12

网中人文集：http://www.hxzq.net/showcorpus.asp?id=162

知青是一个什么样的共同体？

对“上山下乡”的否定，对兵团生活和兵团集体的阴暗面（比如兵团领导的以权谋私，利用职权奸污女知青，以及知青之间相互勾心斗角、相互利用、相互拆台等等）的描写、揭露，是老鬼《血色黄昏》的主体。对照所谓的“青春无悔”叙事（比如梁晓声，他的知青作品把知青共同体虚假地描写成由“共同革命理想”维系的超功利的结合体），这点体现的尤其明显。作品中虽然也偶尔出现对兵团劳动生活、对兵团某些人的正面描写（比如主人公林胡被打成“反革命”后仍然有个别人对自己表示同情，天津知青张伟当着指导员的面给自己一个月饼，食堂的杨素芬“偷偷给自己两个馒头”。参见林胡1970年9年24日的日记，第225-226页，）但是比例很少。直到1975林胡获得了平凡，兵团的四个女知青考上大学即将离开的那个时候（已经接近小说结尾），小说中才出现了对兵团知青共同体的怀念。

这部分集中在第七章“漆黑的夜晚”的“分别”这节。一方面是马上要离开的女知青李晓华等非常依依不舍，伤心欲绝，另一方面是留在兵团的人依依惜别，痛哭流涕（作者并不属于特别依依不舍或痛哭流涕的那种，但是在描写女知青离别场景时显然带有极大同情）。

那么，这种感情是什么性质的呢？它昭示了知青这个共同体的伟大坚固的友谊吗？回答恐怕是否定的。

第一、李晓华等的“不舍”感的前提是自己马上要离开了，用她自己的话说：“平常天天盼着走，真的要离开了，心里由特别舍不得”（第496页）。“我们从全国各地、四面八方汇拢来的知识青年，相聚在茫茫草原，同甘共苦了七年，离别时才发现这点点滴滴的友谊竟是那样美好难忘。”（第496页）好一个“离别时才发现”——只有离别时才能发现，离别是发现的前提。在离别这个特殊时刻，知青之间的功利关系已经暂时悬置（尽管昨天他们还为了上大学的名额打得你死我活）。如果这些人不走、继续留下来，那么，可以肯定，他们之间仍然会是一种你争我斗的关系。

第二，留下来的这些人的痛哭流涕、伤心欲绝与其说是舍不得那些要离开的人，不如说是因为自己仍然要留下来，她们是为自己的命运而哭。“她们觉得被社会抛弃了，被不公平的命运抛弃了，急得尖叫、跺脚、嚎啕、用拳头砸连部房屋的土墙。”（第499页）。“怎么办呢？别人一个个上了大学，调转，病退，招工……自己却没路子，走不了。这辈子的最后归宿在哪里呢？……不敢想了，她们只好放声大哭。她们哭离别，哭自己，哭命运。”（第499页）。可见，这种哭仍然带有极大的自私性和功利性。很遗憾的是，他们不能理性反思自己这

种“命运”的制度根源，不能通过共同的政治信念把自己组织成自觉的政治共同体，不能发出集体的抗议、做出集体的行动，他们至多是一个前政治的生活共同体，命运共同体，一个眼泪共同体，擦干了眼泪以后依然是一盘散沙。

可见，知青分别时的这种情感性质，是与知青共同体的组织性质紧密相关的。知青是一个什么样的共同体组织？是基于血缘关系的共同体（比如犹太人）吗？不是；是基于政治见解、政治信念的共同体（比如东欧国家的异见分子）吗？更不是。知青是一个基于一种自己无法操控、也无力真正理解的政治制度和政治权力安排而被驱赶到一起的命运共同体。但知青自己并不清楚地知道这点，因此不能对自己的命运进行理性反思，也不会形成自觉的对抗这个政治权力的共同体组织。对他们而言，这种“命运”是外力强加的、被动的甚至是神秘的（尽管当时有些人参加兵团好像是“主动”的，比如林胡和他战友就是写了血书才到了内蒙古草原；但是，支撑他们这种行动的那个“理想”是被灌输的，而且在现实中很快幻灭）。这样，这个所谓的命运共同体的维系物只是一些物质性的东西：共同的身体受苦经历、共同生活的地方：“小小连队抬头不见低头见，打完了架，吵完了嘴还得睡一条炕，挤一个蒙古包，…….共同受累受苦。顿觉一股寒意。”（第497页）这里突出的是知青们相互依赖关系中的身体维度和生理维度，说得难听一点，这是否有点类似羊群中少了几只羊？“不同的…….分不清你的我的。”（第496页）。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所列举“一个蒙古包”“一口井”“一锅饭”等等都是日常生活中的共享生活器具，正是这些日常生活的物质用品把他们维系在一起。这不是一个政治性、宗教性的共同体，成员之间没有共同的政治和宗教信仰，他们的聚合也不是自由选择的结果，缺少精神维度，它是前政治的、非理性的。

这样的共同体因此也就具有了如下特点：1、它只是维系于特定的时间（兵团时期）和地点（内蒙古兵团），一旦这种时间和空间关系变化了，就会解体，因此是非常短暂的；2、它具有突出的功利性，无论是相互帮助、相濡以沫，还是相互拆台、相互攻击，生存是他们的第一原则。前者如“大冬天，当你干一天活回到屋，生病的兄弟早把饭打回，放到火炉上，滋滋冒着热气…….当你在东河牧区生病了，会有人连夜套上勒勒车，一步步牵着牛，穿过荒原，把你送到连部卫生室。”（第496页），后者的例子就更多了。3、原始性和情感化，它是为了身体生存而维系在一起的。作品中有一段与动物的对比非常说明问题，“1969年初来草原，深夜几十头牛聚在一起，为被杀的同伴哭泣、哽咽、喘气、蹄子刨地的场面又重现了。不同的是几十头牛换成了五十多个年轻姑娘。它们也为失去同伴哭得上气不接下气，用力跺脚，以拳击墙，披头散发，拼力惨叫。”（第498页）。这个也许是不经意的对比真是神来之笔，它说明知青共同体也和动物“共同体”一样，乃是基于一种生存需要的聚合（他们的相互反目也是出于生存需要），这种共同体感情的存在前提是对自己的生存有利，很少有精神性因素。

这些都决定了这个共同体的脆弱和短暂，也决定了在这个共同体面临瓦解时的那种依依不舍和慷慨赠物，是短暂的、一次性的和非理性的。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收获了什么？

中国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主体是指1947-1960年出生于城镇、并于1967年至1979年上山下乡的1700万人。在1967年末至1972年的第一次上山下乡高潮中，近800万知青去了农村，包括大部分老三届初、高中生和69-72届的初中生。在1973至1977年的第二次高潮中，全国有900万人去了农村，以文革中的高中生为主体。整个中国的上山下乡运动到1978年接近尾声，1979年结束（同时值得关注的是，与下乡知青同龄的、相当数量生长于农村的回乡知青。当年对下乡知青来说，城市生活是他们理所当然预期的生活方式，下放使他们失去了原有的人生；但对于回乡知青，城市生活是他们可望而不可及的梦想，回乡知青与上山下乡的知青相比，有着更多的艰辛与愤懑。在二元社会里，务农则是回乡知青别无选择的命运）。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发生的。“文革”爆发后，从1966年下半年开始到1968年，各地学校基本停课，大学不招生，工厂基本不招工。仅这三年积压的初、高中毕业生（“老三届”）全国约有1000多万人。1971年，仅有16万人口、穷乡僻壤的南丹县也是如此。1971年南丹中学高中部的高9、10、11、12四个班的学生来自1969年前的初中毕业生；初中部的初44、45、46、47、48班的学生来自1968年前的小学毕业生；初49、50、51、52、53班的学生，由于小学实行了五年制，实际是1969年5、6年级的小学生同期升初中。大家于1971年7月同时毕业。在这样的背景下，南丹山口林场1971年8月迎来了187名高、初中毕业。1974年8月，南丹山口林场又迎来第二批知青。他们和全国的知识青年一样，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面对升学和就业压力，怀着对祖国、对党的无限忠诚、舍小家为国家、远离父母，奔赴艰苦的农村、草原、农林场，把青春、把生命无私奉献给中华大地。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在完成了一个大的社会变革转变时，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是思想观念的转变。转变过程伴随着痛苦。知青们有过蹉跎迷茫，但同时更多的有了收获；知青获得的是生活真谛，获得的是与苦难抗争的意志和那种不避艰难，勇于开拓，无私奉献的精神。

一、学会生存（劳作技能等方面的）

1、学会了劳动。作为人，一是生存，二是温饱，三是发展。生存为人之第一要义。不论是何种家庭背景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学会干活劳动。从五谷难分到自食其力，学会了干活也就掌握了生存的技能。这项技能的获取让知青们受益终身！

2、学会了吃苦。要学会劳动首先就是要学会吃苦。一年四季日晒雨淋的摸爬滚打，锻炼了体能更磨练了意志，并切身体察劳动人民的艰辛，在感受到什么是真正的累和苦的同时明白了吃苦的意义。

3、学会了自立。上山下乡的知青们离开了父母的呵护，学会自己洗衣服，学会吃当地的饭，学会自己做饭菜，自主独立处置各种人际关系和各类事情，不依赖别人也能打理好自己的生活。

4、学会了勤劳。在与大自然的交往中知晓了“人懒地生草、人勤地生宝”的真谛。明白永远不能懒惰，懒惰只会换来挨饿，勤劳让你有收获。从而获得了一生受用的宝贵习惯，5、学会了节俭。浪费可耻，以俭为荣；学会“一分钱掰成两瓣花”，将有限的收入拿来做有意义的事。

6、学会了积极。在成长的过程中学会了积极地过好每一天，积极地面对每一次挑战；让积极成为一种生活状态。

7、学会了细心。学会从每个细节体察实质，展开工作。从细节关心他人，养成注重细节，细心处事的习惯。

8、学会了合作。知青中的合作尤其多，当一个人不行的时候四面八方伸出真诚热情的手。学会站在对方的角度思考问题，懂得了“合作会双赢”的道理，形成团结友爱互相帮助的合作精神。

<u>二、学会生活（思想意识方面：敬业、务实、忍耐、拚搏）</u>

1、学会了敬业。对生活不挑三捡四，懂得只有干好工作才得到别人的认可，才能胜任其他工作，才能称为是有事业心的人。

2、学会了务实。劳动干活的过程培养了务实精神。脚踏实地从身边的事做起，从眼前的事做起，不要幻想，痛恶虚伪、空洞。从内心明白实事求是永远是摆脱种种羁绊的伟大法宝。

3、学会了自律。管得住自己，不该干的绝不能干，不放纵自己，即使没人看见和知道，能自觉坚持。

4、学会了宽容。知道拿得起放得下，对许多人生大事都比较看得开，不斤斤计较，能理解别人，所有不快和忧愁都可一笑了之。

5、学会了忍耐。面对社会无端的指责，同志之间的摩擦，以及各种不公平的待遇都需忍耐，知道不能义气用

事，知道去寻求机会。

6、学会了沉默。知道出言应谨慎，言多必失；学会在沉默中积蓄力量，在沉默中冷静观察，在沉默中迎头赶上，在沉默中爆发。7、学会了从容。经历了太多的选择与放弃之后学会了从容；从容的面对利益和荣誉，从容的面对困难和危险。

8、学会了拼搏。在与大自然相处中学会了奋斗，懂得了为自己的理想拼命，学会了为证明自己而开拓更美好的未来。

三、学会尊重生命（学习、责任、努力等精神方面）

1、学会了担当。对工作负责，对自己的言行负责，对信任你的人负责；敢担当，对自己犯的错误负责任，对自己的将来负责任。

2、学会了努力。永远都不指望天上掉馅饼，知道靠自己努力换回成功，努力向上，永不放弃，将努力变成为一种习惯。

3、学会了思考。知青们经历太曲折了，在反复变幻中学会了思考，不再盲从；看清了真伪，区分出黑白，辨别了忠奸，也萌生了最初的反思，学会了用自己的头脑和眼睛来评判世界。思考需要分析利弊，独立思考同样需要勇气。

4、学会了求知。每日每刻都要学习，丰富自己的内涵，提高自己的素质，知识永远都是力量，相信英雄总会有用武之地。养成的求知品格在日后获得学习机会时充分表现无遗，受益终身。

5、学会了自信。自信的前提是你有能力自信，知青们是在经受过磨难和挫折中坚挺下来后获得的自信。

6、学会了执着。不抛弃，不放弃；执着有时让我们这些知青显得很傻，但是执着让我们无比坚定。

7、学会了如何去爱。善待亲情、友情、爱情，珍惜一切真挚的感情；虽然远离家人学会了一个人过日子，但我们从没失去爱，反而更渴望爱，更懂得爱的珍贵，更会加倍呵护爱。

8、学会了奉献。经历了社会底层的生活，学会了不计较回报，不逃避现实，勇敢地面对挑战，在与底层劳动人民共患难同命运的过程中铸就坚毅品格和顽强精神，学会了奉献。知青的生存命运其实与整个国家是息息相关的。大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在为国家减轻了人口、就业和升学压力的同时又将科学、知识、文化和都市文明带向广大农村和边疆，从而促进了当地的社会经济与文化的发展。尤其是在改革开放大潮中，知识青年默默承受自谋就业、下岗分流、牺牲个人利益顾全改革大局，为稳定社会、促进经济改革与社会发展、使国家走向复兴和强盛做出

了巨大贡献。为什么一个无书可读的时代，一个在上学的年龄集体被取缔了学习机会的时代，恰恰产生了最无怨无悔的一代人？那是因为这些被“压缩”到中国社会最基层的“城市娃”、“学生仔”看到了一个最真实的中国：严重的贫困、极度的落后，以及生活在这种物质与精神状况中的亿万父老乡亲。与此同时，无论这些知识青年有什么样的家庭背景，他们当年都置身于社会边缘，茫然不知前路。此时中国普通老百姓的怜悯、宽厚、朴实与善良就成了他们唯一可以仰赖与寄托的精神家园。知识青年和最任劳任怨、养活中国的劳动人民同舟共济、抱团取暖，形成了一种同样忍受着物质匮乏与精神饥渴的共振。对这份弥足珍贵的感情，所有知青都会没齿不忘。基于此，不管之后的生活如何变化，广大的知识青年均把当年上山下乡生活之地视为自己的第二故乡。笔者有理由相信，由这些事、这些经历、这些情感的产生使知青们得到“学会生存、学会生活、学会尊重生命”的切身收获，以及由这些收获形成的品德、思想和精神，不但依然存在于并影响于今天的中国，而且还将会影响到中国的未来。

知识青年陪伴祖国共度艰难历程，谱写了悲壮感人、可歌可泣的生命之歌和历史诗篇。广大知识青年（包括回乡知青）为中华民族的腾飞、为祖国繁荣复兴，无愧历史和后人的付出与贡献将永载中华民族史册！

2014年2月5日于南宁

后记：

拙作应南丹县政协文史委约稿而写。由于知青上山下乡是个重大题材，或许是自己的经历太多曲折，故在动笔之时犹感沉重，虽然当年经历脑海里历历在目，但更多的是这些经历后的思考，而思考的结果成就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收获些什么？”我于1985年在北京就读中央民族学院，有幸与当年的各地知青们有过较广、较多的接触。大多数的“老插”内心很阳光，很充实。没有埋怨，没有愤懑，更多的是努力，勤奋！想着把失去的时光追回。务实、拚搏、刻苦而又团结、互助、友爱，折射出上山下乡经历中磨练出来的精华。回想到我的身边，南丹的插友们莫不如此？陈日华、玉时阶、陈利丹、麦仲山、何文丹、于一飞、莫光辉、吴应生、黄盛乾、马丹葵、罗海明……等等，一串串闪亮的名单，其背后无不闪烁着智慧、思想和精神？

如是斯，写出我的拙作。请斧正。

作者简介：

张吉才，原南丹中学初53班学生，1971年8月南丹山口林场长湾站知青。原中国教师研修网执行总裁。

手机：18007808923　qq：1987786645

知青的理想主义和反省

理想主义曾经是我们知青一代鲜明的历史风貌。當我們还戴着红领巾高呼“時刻準備著”的時候，我們就真誠地胸怀了“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的远大理想；當我們积极投身文革時，我們曾真誠地以为自己是在从事着打倒帝修反解放全人類的壮麗事業；當我們奔赴廣闊天地時，我們真誠奉行着縮小三大差别、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执着信念。

一些知青非常珍惜并肯定自己是在逆境中高揚理想主義的旗幟度過難忘的青春歲月的，他们至今坚持认为“这种理想无论属于哪种意识形态，虔诚度如何，只要不伤害别人，就极为可贵，就都很有意义”。“一味讥笑与厌恶‘理想’是很浅薄的，即便对于‘错误的’理想也是如此”。

我們不否认当年我們對自己青春奉獻與理想追求的真实存在和真誠付出，但理想的追求应该具有个人自由选择的主体性，更应该符合人性需求和客观实际以及人类文明的发展方向。否则，理想越虔诚就越具悲剧性。

当年一些知青的确是自愿下乡的，有的还为此写了血书；也有一部分是被逼无奈的；更多的是在毛最高指示的感召下没有太多抗拒，怀着对广阔天地的美好憧憬欢欢喜喜上路的，但当他们看到农村极度贫穷落后的残酷现实与自己被灌输的理想强烈反差时，有的甚至第一天就失望后悔了；绝大多数特别是69届以后的知青，则已经没有多少激情和幻想，而是身不由己随波逐流了。实际上在上山下乡运动的大潮汹涌而至之时，除了像蔡立坚那样极个别者，自愿下乡的知青只是较为主动而已，和被裹挟者并没有本质区别。

知青上山下乡作为一场政治运动是在全球向工业化、都市化潮流中出现的反动逆流，它一开始就偏离了人类文明发展的正常轨道，与人类社会应有的运行模式背道而驰。这场运动使知青们经历了精神和肉体的双重荒蛮流放，导致了整整一代青年人信仰以及价值观的崩溃，它的悲剧性后果需要几代人才能偿还。

一些知青中的成功人士把过去的苦难当作了财富，可是对于那些众多非成功者，苦难就是苦难，他们的苦难是整整一代人的青春被浪费和吞噬，他们被剥夺了宪法赋予的平等受教育、平等就业、自由选择居住地的权力，先为毛乌托邦式的理想付出了青春甚至生命的代价，又为邓的改革开放承担了巨大的社会和经济成本，成了数十年受双重损害的一大群体。

尼采说“人生充满苦难，但最苦的是这些苦难没有意义。”当年金训华仅仅为了两根电线杆便献出了他19岁的宝贵生命，内蒙兵团只是为了扑灭每年都会发生几次的草原大火就牺牲了从未经过任何灭火训练的69个之多、年龄最小的才15岁的花季知青。这些殉难者正是怀着那虚无缥缈的理想慷慨献身的。之后，这个重大事故的责任没有得到应有的追究，我们见不到深刻反思的文字，见到的却是对这种无谓牺牲的一味浓墨重彩地渲染和弘扬，结果只能是鼓动更多的年轻人延续这种只重政治挂帅、不以人为本、极度轻视生命的荒谬，从而继续成为各种灾难的殉葬者。事实上，当时全国各兵团、农场以及广大农村这类无谓牺牲的知青绝不在少数。

历史告诉我们，凡是理想主义必然选择和制造实现它的楷模。有的知青至今以当年自己胸怀革命理想，表现积极，成了先进、模范为傲；对今人嘲笑、厌恶他们当年的“极左”持批评否定的态度，认为他们“想用表现‘积极’来改善自己的处境，只要不伤害别人，就无可非议”。

然而，“先进、模范”的树立是为了号召大众学习效仿的，一个时代主张什么样的榜样就是指明什么样的前进方向。那种出于谋个人出路的动机，没有“破罐子破摔”好学向上的人生态度固然无可指摘，但谈不上什么理想主义，而众多因出身不好前途一片黑暗、不得温饱、没有尊严地苟活着的知青不可能以此为榜样。如果知青们都对倒行逆施的上山下乡运动逆来顺受，都学成了这样的模式，无异于让整整一代人为文革错误买单，掩盖时代的败笔。如果历史成了这些榜样折射的镜像，历史就被幻化了。在这个意义上，是“榜样”就不可能“不伤害别人”，在我们反思那段不堪回首的历史时，“榜样”也就难免不被“非议”。

实践表明，靠这种虚无缥缈的理想所树立的榜样不会持久，“向知青英雄金训华学习”的活动当时就未能像预想的那样很好地扩展和延续，正如后来向为救火而牺牲的少年赖宁的学习被迫停止一样。如今知青邢燕子、朱克家们的“先进事迹”也早已失去了其典范意义，现在的青年已对其人其事闻所未闻。

当知青从最初的亢奋到最后的理想幻灭，再加上招工招生无望时，病退、困退、离婚、造假、贿赂、献身等等便成了包括当年为下乡而写过血书在内的知青们五花八门的回城手段，直至最后“胜利大逃亡”。这种用脚投票的方式绝对无可鄙薄，结果绝对值得庆幸，但显而易见的是,那时知青们的理想主义已经荡然无存。

可是有些知青至今不去探究产生当初那种“理想主义”的时代背景和政治动因，更不愿正视那时的所谓“理想”只不过是在那扭曲的时代荒诞政治中煽动起来的畸形政治狂热。因为他们一味强调“理想”的抽象精神品性，结果不仅不认真反省，反而产生出堂·吉诃德式的悲壮，继续用自欺欺人的“崇高理想”掩盖他们灵魂的迷茫和彷徨，将自己的人生意义建立在他们“理想”的空壳上，规避了对自身经历的“抉心自食”，自然也无法完成自己灵魂的救赎。

梁晓声的电视剧《知青》之所以遭到不少知青的批评，我以为原因之一是：他用浪漫主义的风格过分表达了知

青理想主义的色彩，而不是像叶辛的作品那样体现了批判现实主义的精神。那些作出“青春无悔”结论的知青也是源于担心如果脱离了精神层面的理想主义，就失去了他们当时的生活意义并因此迷失了自己。

一般来说，每个曾经服从或哪怕是被迫迎合了那个时代潮流的个体，其实都是那个时代自觉不自觉的合作者，这也正是文革发生并得以延续的土壤和原因。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每个知青都应对上山下乡运动和我们当时的“理想主义”有所反省。

无疑，知青的坎坷经历为我们后来的学业、事业、生活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实践基础，对中国底层的了解和阅历也成了我们的优势。但是无可否认，由于当初理想的破灭，使我们变得不仅现实、功利、讨厌被约束，而且程度不同地世故甚至投机，正如钱理群先生所担心的“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的观念，以及由此产生的帝王气与流氓气”。当今，我们知青一代在此历史转型期能否真正具有环球视野和人文情怀，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对上山下乡运动反省的深度和广度。

（发表于2013 08 22共识网）

唐燕文集：http://www.hxzq.net/showcorpus.asp?id=247

华夏知青网不是赢利性的网站，所刊载作品只作网友交流之用
引用时请注明作者和出处，有版权问题请与版主联系
华夏知青网：http://www.hxzq.net/
华夏知青网络工作室

老知青聚会观感

“命运”：知青聚会永恒的话题

近日，参加两次规模不一、形式不同的“黑土地”知青聚会，回想一下，从各人谈吐之中，有一个词语总会从各人的谈吐之中、不时地不经意地出现。这个词语就是“命运”（或者说法换个样，叫“运道”、叫“机缘”）。再回想一下，其实长期以来，主导我们知青思想脉络的习惯思维，就是认同历史命运。

这个历史命运是我们知青集体共同拥有的。

我们曾经乘坐同一列火车，离开故乡，年轻稚嫩，毫无社会阅历与处世经验可言，但又那样的胆大、豪气冲天、无所畏惧、不怕苦与累、即使经受再大再多的痛苦也不向故乡的双亲诉说、甚至视死如归。我听到一位插队在新鄂公社的知青说：当时到了地方，一看此地距离黑龙江（国境边界）有百十里，个个都向领队干部提出申请，要到沿江公社去插队，因为那是“反修第一线”。这个历史记忆有着典型意义：当年指引知青思想的“毛主席语录”有着绝对的权威，“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是当年知青实实在在的的思想情绪，是那一代人所拥有的历史命运。

我们也曾经在插队的地方，启动谋生的本能、学会处世的技巧、领略成长的烦恼、经受受挫的折磨。知青刚到农村的时候，在当地老乡眼里，不过是一群来自大城市的男女娃娃，不几年之间，知青不仅仅成为种田能手、还有的是电工、木匠、拖拉机手、乡医、教师、村干。我听聚会时坐在左手边的“插兄”讲：当年他曾参与一次“山林灭火”，担任“火头侦查”工作，从新鄂公社所在地一直顺火势跑到伊春地区；来回骑马，去时，走走停停不知几日；返回时，穿越山林费时四昼夜。这个历史回忆也具备典型意义：当年知青经过数年锻炼之后，已经成为当地各行各业的骨干资源，在抗击特大灾害或处理紧急事务方面，知青已能独当一面。假如把这一些看作是知青的成就的话，排除个人的主观因素，要谈客观条件的话，就是时势与环境的促成作用。当年帮助知青成长的不仅仅是“毛主席语录”，还有边疆人民群众的言传身教，尤其是在新鄂公社插队的知青，还得到鄂伦春族以及蒙古族、达呼尔族、鄂温克族群众的指授（诸如骑马、打猎、野外生存的技能以及豪放豁达的性格）。知青——这批城市娃娃，能够很早“断奶”，离开双亲与相对舒适的家庭环境、离开物质条件优越的家乡，到边远地区农村山林经受苦和累的

锻炼，不能不是一种历史命运。这个命运，不是当年哪一个个人可以回避的，而是几乎人人必须被动或主动接受的。我们把这种命运叫做集体命运，是否恰当呢？

正因为我们知青承领了这一份集体的历史的命运，所以在“后知青岁月”里，继续在各地各行各业，挥发各自的“知青气息”，一步一个脚印地走到现在。我们不可能清除自身固有的知青品格、不希望轻易地放弃长期形成的“知青梦”、也没有理由不把这一份感受留给下一代。让我们说出来，写出来，告诸同命运的人与关心我们的人。

“童趣”：知青聚会的时代印记

一代知青绝大多数已过花甲之年，此次新鄂知青聚会，按惯例为生肖属马的知青（本命之年）颁发纪念品，上台的仅有俩人，也是知青当中年龄最小的俩位。大家几乎从公职当中退休，回到家庭事务中当“三全”（全职、全天、全气候）服务员。

但在聚会中，相视年老的模样，感受得到的是欢快愉悦的气氛，甚至不乏“童趣”。大多数知青有着安度晚年的物质条件，也有温馨的家庭生活。所以，老友团圆，言行举止，不用套话俗话，也不计长幼尊卑。兴之所至，茶杯一端，愉快的话说出来，高兴的事让同伴分享。酒杯一端，或者略露绝技，稍显身手、或者载歌载舞，惊艳压场。（我很佩服新鄂知青中的“星光”。这些“歌手”与“舞者”似乎可踏上央视“大道”。）所以，聚会找乐子，喝的是茶酒，消费的是精神盛宴。“笑一笑，十年少。”难得一聚，何乐而不为？

固然还有一些知青，晚年生活还有一些不如意的地方，但是想一想当年经历的各种各样的困难，眼前的问题或许大可不必过于烦恼，就可以自我调整心态，淡化一些精神上的压力。在聚会中，找老友倾吐为快，也是一种卫生的精神疗法。（近两次知青聚会中，都观察到了。）

再想到在我身上发生的一个惯性作用：每一次参加知青聚会活动之后，我都会产生一次历史记忆的小高潮。回味同伴讲的某一小段忆旧的话语，就会促发自己的回忆，促使沉睡在某一些脑细胞中的浅记忆活跃起来，就会想起多少年不曾回想过一些细节；还有观察到同伴的某一些特定举止，我仿佛又看到当年他（或她）当年的身影，又帮助我回想起曾经有过的青春的气息。心头不由自主地滋生一些感恩的情绪、友谊的呼唤、关注的愿望。

所以，我要说：让我们通过不同方式（聚餐、茶会、网谈等），踱步在知青的“大院”里，从而有助于继续保持对晚年生活的乐观心态、善于调整各自的生活习惯。人说我花甲，我当朝阳红。使年尚不老的知青群体，保持固有的活力。

体温：知青聚会的人文关怀

世上古老民族，历来多灾多难。中华民族在外族入侵之后，更是倍受摧残，挫伤民族自信性。国人丑陋的议题，时时泛起，反映出近现代社会一股情绪，其中合理因素不可忽视，但也不必深陷其中，过度悲观以至于藐视人间的良性。

人间处处有大爱，稍微睁眼即可发现。在知青聚会当中，更能品味其中的真挚情感。去年夏季，部分新鄂知青返回第二故乡看望老乡，恰值数十年不遇的洪水泛滥，他们立即慷慨解囊，鼎力襄助。在此次聚会中，他们又如数家珍，通过去年新鄂知青之间以及知青与老乡之间的往来日志，列举了很多起已知的互助或自助的事迹；同时在言谈之中，还说出多起鲜为人知的好人好事。（东发一位老知青患病期间，也得到众插友的关心与帮助。）

老知青几乎个个是平凡的人，言行常年不见报端。弘扬人间正气、表彰善行良性，不得不靠我们知青自我传递与群内流传。这是必须的！

我在想：知青为什么要聚会？是不是知青的气味相投。我们曾是同一类人，至今还保存着这一类人的气息，自助与互助，理所应当，义不容辞。关注我们之中的每一个同伴，也是每一次聚会的不二话题。自我鼓励与互相鼓励，既是一种精神力量的来源，也是物质生存的必要条件。多一点精神关怀，容易做到，不可不为；来一点物质帮助，也可尽力而为，尽心为之。我也想：知青可以怎样聚会？设当以重情为主，平淡易行，君子之交淡如水，小道常行。

当然，最为重要的是：愿同伴都有一个好的身体，才是回报群体与反馈群体的必须的本钱。（体健有多法；健身少不了。健身有多法，各人有各招。听新鄂丁君讲至今仍然每周要打一次全场篮球。令人羡慕！）新春在即，去奢华，弃富丽，着工农装，充粗食肚，放开双脚，走入大自然，是不是知青应有之意呢？

“五味”:知青聚会的味道

大年初四，曾经插队于逊克县的上海知青，在上海绍兴饭店旗舰店聚会啦！好大的场面，好喜庆的气氛，好热闹的人群——据说有300多人。

我的观感，可以总结为“五味俱全”。

水味，聚会大厅的一张张桌子上，放着一瓶瓶纯净水，人手一瓶，体现的是简朴的会风。与会知青绝大多数是退休员工，认同简约化、平民化的聚会，唯有去奢华，才能靠拢知青的大多数。

烟味，大厅中有一股股烟雾缭绕，似乎在衬托着忆旧的思绪。烟民见面先递烟，那是多年养成的习惯。我看知

青间的递烟，手伸出去的是过滤烟，眼中闪烁着的是一小片旧报纸加一小撮土烟叶形成的手卷烟。看到“烟民插友”的满足与快乐，身为“厌烟族”的我也感受到一份亲切与温暖，不由自主地收敛起严峻的目光。

酒味，近年来老知青聚餐开始流行慢品美酒的新酒风，（毕竟年龄都较大了，拼酒的风气已不盛行。）就餐时，大多数人只是小饮一盅，细腻之至；但是，一经酒友挑起，不服输的劲头也会陡然冒起。一位得“幸运大奖”的插友发表“获奖感言”之后，一口闷下多半杯酒，令看客回忆起豪爽的东北味儿。

色味，男人爱看美女，秀色可餐，讲的就是色味。此次聚会，众插友表演了许多相当精彩的文艺节目，尤其是几个艳舞——着装艳丽的“达坂城的姑娘”与“莫斯科郊外的夜晚”表演时，插友们从不远处望着台上曼歌妙舞的女郎，不免浮想联翩。几个表现唱腔的节目，也令人叹为观止。有位获得满堂喝彩的“阿庆嫂”，唱功与做功不减当年。

菜味，该酒馆的菜肴，色香味俱全，享誉北上海。但是，有过年因素、再加上思想活跃，极大地影响了食欲。就餐者舌尖发麻，味蕾迟钝，面对自费买单的满桌菜肴，只“开工”不“用功”。无论整条肥美的大鱼，还是整碗红烧肉，十双筷子也撬不动，稍沾一脔而罢。散席后，个个整理着装，穿戴打扮，不顾“光盘”新风，扬长而去，于此略见铺张陋习。

五味毕至，综合起来却是一股“和气味”。喜庆和睦，其乐融融，贯穿长达四个小时聚会（聚餐）的始终。

<u>眺望：知青聚会的焦距</u>

忆旧，是知青聚会的永恒话题，但是随着岁月的流逝、绝大多数知青分别退出工作岗位之后，也逐渐增加一些新的话题，我把这一些新话题归之为：“眺望”。

不论知青返城之后曾经做过什么样的工作，一旦退休了，都有一个共同的身份：“退休人员”。近年来，又都逐渐步入花甲人群之中，聚会中出现频率最多、也是呼应最广泛的三句话是：“身体健康，什么都有了。”“子女好，是最大的幸福。”“吃喝不愁，自我满足。”

三句话，反映出知青群体向前看的集体心态。

眺望，既可以是一种正确的姿态回顾过去，也可以全方位展望未来。聚会中，一位不知名的插友（我过去不认识）讲起他当年刚动手术不久、不顾家长反对，“偷出”户口本，报名到逊克插队。讲的过程中，眉宇间洋溢着激动的神色。现在，他退休了，退休工资很低。桌上有人故意问：你后悔（插队）吗？他说：有什么后悔的？一生中唯有此事，最值得骄傲。另一位插友在桌上介绍本队一些老乡的近况，不免唏嘘再三。第二故乡仍然没有彻底摆脱落后贫困的现状。出生在边疆农村的同龄人，远不如知青幸运；更何况老一辈人，吃的苦头，更比知青多，比之当

自足。

是的，我们当自足。在聚会中，很少听到牢骚话；更多的攀谈是在相互宽慰，或者关注熟知的前辈老乡以及其他未参与聚会插友的境遇；也有的交流敬老的做法，冀望吃苦受难的老人在晚年过得好一点；最受欢迎的话题是健身防病的心得、以及治疗治愈疾病的手段。谈孩子的事情也很多，无奈目前都市青年结婚的高龄化或单身化，妨碍此类话题的畅通。但不妨不少插友眺望儿孙满堂的未来。

对知青群体未来走向的眺望，也成为知青成员必须关心与思考的话题。我希望走大众化的路线，具备低成本、自觉性、松散型、高品位的特质。

2014-02-04

劳作坊文集：http://www.hxzq.net/showcorpus.asp?id=225

华夏知青网不是赢利性的网站，所刊载作品只作网友交流之用
引用时请注明作者和出处，有版权问题请与版主联系
华夏知青网：http://www.hxzq.net/
华夏知青网络工作室

从山海关到嘉峪关

从山海关到嘉峪关从山海关到嘉峪关，我用了整整45年。

小学读历史，就知道了长城，知道了万里长城有许多关隘，如居庸关、雁门关、娘子关等。其中规模最大的是西端的嘉峪关（始建于明洪武五年，即1372年），与东端的山海关（始建于明洪武十四年，即公元1381年）。进入中学后看的书多了，更因众多关于长城关隘的故事而平添了对它们的向往。只是，我从来没有想象过，能于何时、在何种情境下亲眼看到它们。

1969年，为时代大潮所席卷，我与许多老三届同龄人一起离开首都，远赴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乘坐的知青专列是必经山海关的。虽然，一路上，充盈内心的是对故土的不舍与对未来的迷惘；但在路过山海关的那一刻，对于它的向往，仍让我抓住仅有的瞬间，透过行进列车的窗口，向其投去远远的一瞥。尽管只是一瞥，不甚清晰，但它高耸的城楼仍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之后，每隔两年，回京探亲一次，每次火车都会途径山海关。依旧是遥遥注目、仍然是一闪而过，但心情却大不一样。返京时归心似箭，看到山海关，仿佛已能望见紫禁城——我的家，就在太庙（劳动人民文化宫）东侧、高墙之外的南池子——心中顿生暖意。离京时却充满纠结：车过山海关，就意味着远行，意味着与父母家人的别离又将间隔两年，所以不舍；却又无奈，因为现实必须面对，前路还在召唤。不过，到了七十年代中后期，山海关还是见证了我和我的众多荒友的返城。那一刻，我曾于心中默想：将来，一定要找个机会：不是路过，而是直抵关城，向其倾诉那些年里，对于它的复杂情怀。

然而，返城只是知青时代的结束；随之而来的，便是更为漫长的后知青时代的开始。一切都需要重新起步，面临的是不一样的艰辛。何况，旅游在温饱尚未实现之前，乃是奢侈的想象。所以，时光在一年年的忙乱中度过。直到1987年，改革开放带来的经济繁荣初步显现，这才有机会去北戴河、秦皇岛避暑，其间特意去了趟山海关。

原来，山海关形如一座小城。关城周长约4公里，高14米，厚7米，东西南北各有一座城门。其中，书有“天下第一关”五个大字的巨幅匾额就悬挂在东门城楼上。它高13.7米，分上下两层，上覆灰瓦单檐歇山顶，北、东、南三面开箭窗六十八个，平日关闭，战时开启。

也许是时过境迁的缘故，当我真的登临城楼时，回忆的断片只是瞬间闪过。眺目远望，关山重重，震撼之余，心中涌动的竟是要去长城最西头——嘉峪关的念头。看来，人的欲望是没有止境的。可是话说回来，社会的发展，不正是靠着人类的这种永无止境的欲望在推动吗？

只是，这一愿望的实现一拖就拖了27年。其间，由中年转为老年，从在职耗到退休。总想着，闲时再去，将来定会有机会的。待到如今，退休后的时间可以自由支配，却发现腿脚已不似当年灵便。这才顿悟，若不马上行动，恐怕今后想去都难以成行。于是，就有了今年九月初的西部之旅。

游青海湖，过祁连山，观莫高窟，都是我心向往之的；而于9月9日登临嘉峪关，更是了却了一桩由来已久的心事。

关城高6米（现约10米），由外城、内城和瓮城组合而成。其中内城东西开“光化门”和“柔远门”，门外各筑有瓮城。城楼对称，三层三檐五间式，周围有廊，单檐歇山顶，高17米。城四隅有角楼，南北墙中段有敌楼，一层三间式带前廊。

比较起来，嘉峪关不似居庸关、雁门关、娘子关等处在两山之间，以险要著称。但它矗立于茫茫戈壁的边缘，更显雄壮，不同凡响。

站立在关城之上，一时思绪万千：从山海关到嘉峪关，绵延不绝的长城何止万里。而从当年远去北大荒路过山海关，到如今畅游大西北登临嘉峪关，屈指算来已有45年。万里关山、四十五年——几乎涵盖了一代知青的前后两个时段。细想，颇具象征意义。可谓：“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如果说，文革中断了一代人正常的求学深造梦，那么上山下乡则是让这代人在进入社会化的一开始，就经历了磨砺与考验。从“接受再教育”的战天斗地，到返城、求学、成家、立业，其间面临的种种关卡，岂止是一个两个！当然，只要有足够的坚韧与坚持，就没有过不去的关口。待到退休、离职、临近奔七的年龄，回望人生，才发现：什么叫命运，命运只是回望时自己走过的人生轨迹。

长城有起点、起点就是雄踞大漠的嘉峪关。长城有终点，终点便是濒临大海的山海关。一如长城从荒漠延伸向大海，人生亦是如此，从愚騃逐渐地走向顿悟。

历史上，嘉峪关见证了古代丝绸之路的兴衰，山海关更是经历了明清以降金戈铁马的考验。而今，都成为了和平时期中外旅人观赏的景点。

近半个世纪里，一代知青曾在不同的时段里，产生过不小的动静，比如60年代末的大下乡，70年代末的大返城。进入新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又有大接班——不过，那只是极少数精英的上位；而对于绝大部分知青来说，则是

退出社会的主系列，步入休闲养老的生活圈。

或许，在将来的史书上，作为整体的知青一代，仅仅是某个大时代、大事件的一个注脚。但生活在当下的老知青们并不气馁，反而更为活跃。他们在居室内弄孙、社区里晨练、餐馆中聚会、舞台上放歌；时不时地，还结伴出游国内海外、回访曾经插队落户的山乡边陲；甚至撰文、出书，在追忆中反思；与时俱进，借助网络、博客、微信抒怀。

是要追回曾被耽误的青春吗？似乎并不尽然。但让当下——即使已进入人生的秋天，也要让这晚霞更灿烂，无疑是肯定的。

因为，这是知青一代的本色。

2014-10-05

震亚文集：http://www.hxzq.net/showcorpus.asp?id=167

华夏知青网不是赢利性的网站，所刊载作品只作网友交流之用
引用时请注明作者和出处，有版权问题请与版主联系
华夏知青网：http://www.hxzq.net/
华夏知青网络工作室

云南知青大返城不是否定上山下乡吗？

——致一位知青朋友之一

今年春节前（1月17日），我在博客里刊登了一篇文章《不否定，你回来干啥？》。没有想到引起了一些反响。短短几天就被转载了一百多次，有将近500人阅读了此文，大多数来访的朋友对此留言表示赞同,这说明关于上山下乡的话题依旧是我们这代人所关心的。

当然，也有一些不同的意见。这是很正常的。

有一位朋友的一些意见较有代表性。据他自己的留言介绍，他是一位当年曾经作为云南知青代表参加过上访。他说：“我当年作为云南农场知青参加上访请愿的时候，就明确说过我们不否定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只是利用宪法明文允许罢工的权利，争取自己回城的平等与选择的自由。”

他进一步指出：“赞美红军长征的壮举，一定不是想要再去进行一次‘长征’。同理，肯定知青上山下乡，只是肯定知识青年当年艰苦奋斗建设自己的国家这一基本历史事实和这个运动的本来面目。用要他们将自己的子女再送去‘上山下乡’之类的话来堵那些肯定者们的嘴，不是在讲道理。中国大多数人曾经是任人欺凌、任人羞辱的‘乌合之众’，但自从有了共产党、有了毛泽东教会他们‘组织起来’，他们就开始成为能够掌握自己命运、能够为共同的理想而坚持奋斗的人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历史证明过这些，今后中国的历史一定还会继续给出这样的证明。”

这段留言提出来了几个值得我们需要探讨的问题：

第一，当年云南知青大返城的时候，知青是不是明确提出过不否定上山下乡？

第二，知青争取回城，试图离开云南是不是对上山下乡的一种否定？

第三，例举红军长征的例子来说明赞美不一定是重复或者效仿，由此得出的结论是，上山下乡的本来面目是值得肯定的。

第四，知青的上山下乡的历史证明了有了毛泽东的“组织起来”，知青们才掌握了自己的命运。

这样的归纳对不对，是不是这位朋友的原意，请大家鉴别分析一下。

当时，我给予了简单的回答：“如果你还记得当年云南知青的三封信的内容，难道这不是在否定上山下乡。”我不赞同他的看法，只是想就否定问题做一个善意的提醒。既然都是当年为了返城的知青朋友，一定会记得那时的三封信。这三封信都是上海知青丁惠民起草的。即1978年10月16日给邓小平副总理的公开信、1978年11月18日给邓小平副总理的联名公开信、1978年12月3日的请愿书。

信的作者丁惠民在《在激流与漩涡的中心》一文的回忆中说过这样的话：“11月18日，第二封联名信公布了。如果说第一封信只限于诉苦，第二封信则有所不同，信的锋芒对上山下乡政策提出了质疑。我的用意主要是想促使知青群体中那部分思想认识比较先进的知青行动起来，他们是我预期中的最终能支撑起这场运动的基层骨干力量，也是运动成败的一个重要部份。”那么第三封的请愿书是云南知青北上请愿时递交给中央领导的基本上是反映知青民意和要求的集成。

请注意，丁惠民用了“对上山下乡政策提出了质疑”字样。什么是质疑，其实就是否定的一种表现形式！

第二封信的主要内容是对于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种种弊端、政策的缺陷等一系列问题进行分析和批判。如果以现在的眼光来看待这些内容，确实还有许多不足。但是，这些内容已经涉及到了上山下乡问题的核心问题。有系统地全面地大胆质疑上山下乡，起到了唤醒知青重新认识上山下乡、重新审视自己的命运的作用。事实说明，这些信中的文字就是在否定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绝非“只是利用宪法明文允许罢工的权利，争取自己回城的平等与选择的自由。”

这是基本事实。

特别是在《请愿书》（第三封信）里的那段话至今令人震撼——

“八年了，父母的泪快要流尽了，我们肉体的青春即将衰老，再这样下去，我们实在受不了。我们请求，不求金，不求银，只求让我们回到父母的身边吧！我们可以干最脏的最累的活，领取最低的工资，但只要回到父母身边，再苦也是甜的。恳求中央早日决策！”

一句话，知青要回家。

在这份《请愿书》里既陈述了上山下乡运动的种种不是，又提出了知青问题解决的唯一办法就是让知青回城。

假如发生在“文革”期间的上山下乡是值得肯定的话，还会发出如此惨烈的呼声吗？知青上山下乡如果是“开始成为能够掌握自己命运、能够为共同的理想而坚持奋斗的人们”，那么还会做出如此激烈的写信、罢工、请愿、

上访、示威、绝食的行动吗？

这位朋友在回复我的留言是强调："我一直记得当年云南知青三封信的内容。那里面没有否定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词句，更没有要求中央政府中止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只有对我们在这个运动中遭受的不公正待遇的申诉，以及我们要求回家、要求回城学知识干四化的呼吁。"

那么再来让我们看看当年这些信里对于上山下乡的否定之词。

在第二封公开信里，作者反映知青的上山下乡"往往用各种变相的强制手段。""名曰说服，实为强逼。父母兄弟也收到株连。""重庆的青年大多数是被骗来的。"关于如何看待知青上山下乡利弊，信中认为："实践已表明，城乡、工农、脑力与体力的这三种差别丝毫没有因为我们大批知青来到农村而得到缩小。"、"知青上山下乡给国家带来了沉重负担。"、"目前在各地农村的知青所处的思想和经济状况，都是极不稳定的。"为此，信的作者问道："把数量如此众多的青年放在农村，究竟对国家有何好处？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应该用什么方法来表现呢？是看农业人口多少吗？是喊上几句漂亮的口号吗？"

作者在信中明确提出："上山下乡同样是得不偿失的，不可取的。""拿我们农场来讲，国家用于我们的各项费用，超过了我们的实际创造。十年来，国家为知识青年不知化了多少钱，尚能将这笔钱用于工业建设，想必利非薄也！可是为什么有利而不图，偏偏要干人们不欢迎、经济上年年亏损的事呢？"结论是上山下乡是不可取的一场运动，给整个国家和社会都带来了灾难。

关于农村群众对上山下乡态度，信中举例说，有个地方的农民问起当地的知青："当年我们是带着土地、耕牛入社的，你们现在带来什么？"且不谈这个传说是否真假，但从中可以看出些问题来。"我们农场，大批青年的到来，虽然都有一双手，但也有一张嘴。由于各种原因，农场生活长期搞不上去，老职工生活比以前明显下降，当地经济也被打乱。农林副产品价格飞涨，附近村镇居民的实际购买力大幅度下降，引起了普遍的不满情绪。少数青年侵犯民族利益，影响社会秩序，损害民族团结，给当地人民造成不良的影响。农场生产规模的扩大发生了与当地群众或集体生产队争自然资源的各种纠纷。"

因此，信的作者认为："上山下乡到底给国家带来了什么好处？知青到底愿不愿意？人民到底拥不拥护？这些问题我们心里很清楚，有自己的看法。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我们认为，由于林彪、四人帮的破坏，上山下乡出现和积累起来的问题已经不少了，现在是解决这些问题的时候了。何去何从，我们听中央的！"

这不是在否定上山下乡还能是什么呢？

我的朋友李勉先生对这位朋友的留言回复说——

你说的很对，“赞美红军‘长征’的壮举，一定不是想要再去进行一次长征”，当年“反右”并不是惩罚迫害，而是想教育这些对本党说三道四者让他们走正路；嗣后的大跃进亩产万斤放卫星，并不是想饿死人，只是想让大家吃的更饱；至于文革嘛，那是为了红色江山永不变色呀？锻炼了人民，破灭了帝修反想在中国复辟的迷梦，何错之有呢？而“上山下乡”实在是领袖的恩眷呐！那些学校里的封资修玩意有必要学吗？一旦学了如何滚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呢？岂不成了资产阶级的狗崽子了？所以，真不该放你等回城呢！你看如今不都成万恶的资本主义代言人啦！

今天，我们再次就否定的话题谈及上山下乡，首先是要尊重当时的历史，不忘当时知青们为了回家所作出的壮烈的举动。

还是那句老话，不否定，你回来干啥？

余 杰文集：http://www.hxzq.net/showcorpus.asp?id=213

华夏知青网不是赢利性的网站，所刊载作品只作网友交流之用
引用时请注明作者和出处，有版权问题请与版主联系
华夏知青网：http://www.hxzq.net/
华夏知青网络工作室

绝大多数知青不是青春无悔

本文原刊：《南方人物周刊》2014年第2期，作者：杜强，原题：米鹤都记录红卫兵一代

核心提示：现实中往往是这样的。上山下乡这代人中，今天讲青春无悔的，往往是因为他能够把那个苦难转化成财富，但是绝大多数知青恐怕是没有这个能力的。

“在当代中国，没有哪一代人比他们更具传奇色彩、更加难以把握和予以恰如其分的评价了。”

——在外观深红的专著《心路——透视共和国同龄人》背面，写着这样一句话。

作者米鹤都称这代人为“第三代人”，在一些语境里，他们是“红卫兵一代”、“老三届”、“知青一代”。米鹤都指的是上世纪60年代处在读书年龄的所有人，他们“形成具有共同社会经历、共同思想体验、共同行为特征和共同历史性格的一代人群体”。

这群人独特的人生体验在于，他们的命运是新政权前30年政治秩序与趋势的集中显现，身为青少年的他们爆发式地参与政治，强烈的理想主义夹杂着权威人格，陷入狂热的个人崇拜，历经红卫兵运动、上山下乡、改革开放，次次落在历史的凹陷处，被裹挟、被决定、被颠覆，形成了米鹤都所说的“历史性格”，怀疑、求实、圆滑、理想主义，复杂而鲜明。

这一群体在当下的重要性，学者徐友渔曾转述过一项数据：中央委员里31.8%是知青，政治局里是20.8%，此外还有许多“知青高干”不是中央委员。“现在是知青掌权的时代。”米鹤都对第三代人的关注始于1985年，当时他正在中央机关从事政策研究，中共中央决心整党，清除“三种人”（即追随林彪、江青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如何甄别红卫兵中的“三种人”成为了一项课题，由中组部委托社科院青少所进行调查，米鹤都参与其中，调查结果发表在《青年研究》上。

文革开始时，米鹤都14岁，“跟高中学生基本不来往，人家不带我们玩。文革开始我们一帮同学跑到清华看大字报，到那儿一看人多挤不进去，就跑河边玩钓鱼去了”。文革中逍遥派的身份，家世及教育背景，加上亲历红卫兵运动的清晰记忆，使他有了很好的从事红卫兵研究的条件。

（今天讲青春无悔的，往往是因为他能够把那个苦难转化成财富，但是绝大多数知青恐怕是没有这个能力的。）

由于是历史科班出身，米鹤都试图从宏观层面更加准确地把握历史，而非单纯的纪录。比如在访谈蒯大富时，蒯谈到八届十一中全会前，周恩来到清华大学找他谈话，“按照他说的话整理出来，容易给人误解是周恩来在套蒯大富的话，给毛泽东提供炮弹打倒刘少奇。实际上对话中他没这意思。”米鹤都整理后补充了一句，“这两次谈话当中，他（周恩来）都没有任何倾向性的诱导，可以说是很公正地听我们的陈述”，然后问蒯大富是否准确。“我说这算你的话，他认可，这样就避免了误读。”

1993年，米鹤都根据对李三友、秦晓、卜大华、董良翮等二十多位早期红卫兵领袖的访谈，写出《红卫兵这一代》一书，在香港出版。2009年，在一些老知青支持下，他重拾红卫兵研究，开始口述史写作。目前《回忆与反思》口述历史丛书已经出版了5册。

米鹤都坦承，文革中有污点、有争议的人往往不愿意抛头露面，劝说他们很吃力。五大学生领袖之一的蒯大富曾拒绝了众多约访者，米鹤都劝说他：“你蒯大富曾经是在中国历史上、特别在文革史上占据了重要地位的人，你应当对历史有一个交代，这是你的历史责任。”

米鹤都的口述史工作现在已没了外部支持，全凭一己之力，最令他遗憾的是，很多人至今仍选择沉默，加上文革档案没有开放，研究与反思的深度不够。“一个不能正视自己过去的民族，是永远无法真正崛起的。”

受迫害者反而沉默

人物周刊：1985年那次研究你们对第三代人、对红卫兵群体，有什么样的结论和思考？

米鹤都：这代人被灌输了一种所谓的革命理想，他的人格、个性从形式上看是理想主义的，内核是实现共产主义、反对封资修，做帝国主义的掘墓人。他们有着理想主义的外在，内在的是阶级斗争和解放全人类。

这代人原来的理想主义，经巨大蜕变、异化后，掺杂了很多新东西进去，但理想主义依然保留在身上，你看我现在搞这个事情，什么驱使呢？利益吗？我想不是。内心还是觉得应对历史、对这个社会做点什么，有那么一点责任感而已。你看在网上大声疾呼的知识分子、业界精英、意见领袖，很多是这一代人。另外像陈小鲁，像任志强，你让他不关心政治都不可能。关心政治是为了什么？还想着再当个什么官？出个名？显然不是。

金观涛有句名言：我们是一些残存的，然而是不死的理想主义者。共产主义、解放全人类这些其实已经变了，但相当多的这代人中还保留着那种追求精神。很多六十来岁的人早被边缘化了，但对政治仍然很有热情，五十岁以

下的反而不大关心了。包括红二代这些人，有几个不关心政治？甭管左中右，这点上是共通的。当然，执著、不宽容往往是其另一方面的伴随物。

人物周刊：从你的作品来看，似乎每个访谈对象都觉得，文革中自己是迫于形势、是被裹挟进去的？

米鹤都：也不尽然。你想想，在那样一个年龄段，正好处在叛逆期，而且一直接受阶级斗争、反修防修的灌输，仇恨意识很强。他们的教育背景、阶级斗争观念，以及那种理想主义、社会责任感，决定他们一定会过早进入本属于成年人的政治领域。但这些东西被引到什么方向，那一定是成年人的事了。一旦伟大领袖指出，学校领导执行的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他们仇恨的“阶级敌人”抽象概念马上变成了具体对象。他们被引导到学校老师身上，他们就打老师。他们被引导到走资派身上，他们就会冲击走资派。只要是成年人放任，孩子们一定翻天，这是必然的一幕。所以我的观点是，反思文革不应当首先追究未成年人的责任。

但要说青年学生完全都是被动的，也不完全符合历史事实，总有第一个贴大字报的人，这些人都完全是被裹挟？也不是。他接受的教育就决定了他要走到历史的交叉点上，被引导和主动的结合。

人物周刊：在你的访谈对象里面，对当时的污点，或者不光彩的行为，进行掩盖、掩饰的多吗？

米鹤都：在我的访谈对象里不是很多，真正有污点的人他不愿跟你谈，跟你谈的往往是能够正视历史的。比如说王冀豫，武斗打死了人，他有很深的反思。他谈得很真诚，不遮掩，分析原因。从小时候讲起，他是一个什么性格的人，怎么成长起来的，部队大院文化的那种尚武精神，文革初期打流氓、打阶级敌人，最后发展到狂妄，在派别武斗中把人打死了。他的忏悔，我个人认为很深刻。这是编辑中的第六册中的一篇。

人物周刊：有污点的人一般不会谈，是否会造成你在视角上的缺陷？

米鹤都：你说这个也对，不过我在采访受迫害者的时候，他可能就谈到了迫害者的一些行为和心态。

人物周刊：那会不会变成纯粹是被迫害者控诉的局面？

米鹤都：目前我反而缺少被迫害者的访谈，被迫害的很少有人愿意跟我谈他们的经历。

人物周刊：为什么？

米鹤都：可能是我身边不认识这类人，也不可能发广告去找。我希望章立凡介绍一些类似的人谈谈，因为他说我的几册口述史中大多都是红卫兵、高干子弟，代表性不全面。海外也有人批评我给老红卫兵说好话。问题是我的接触面有限，一些“四四派”和“四三派”的头面人物往往不愿意谈。而老红卫兵也好、红二代也好，反而愿意谈得更多一些。

人物周刊：为什么会有这种差别？里面的心态是怎样的？

米鹤都：有一位当年的部队干部子弟说过一句话，“你们对我们来说，你们始终是弱势”。他的意思是：“你们”（他指的是当年文革当中那些对立面，“四三派”、“四四派”），对他们这些老红卫兵或者干部子弟来说，当时是弱势，而且到今天都是弱势。某种意义上，我觉得他说的有道理。

人物周刊：这种弱势是指什么？

米鹤都：心理上的弱势。什么叫红二代？我们父辈打下的江山，而我们就是国家之子，正统、嫡出。他们这些青年人在成长过程中没有心理障碍和社会压力，从社会学角度，这是一个人健康性格奠定的基础。反过来看当年的“黑五类”子女，包括一些知识分子和平民子弟，文革中就不谈了，到今天即使有钱了，腰杆都不硬。不信，你去做做社会调查。当年受迫害的今天没几个敢指名道姓说当年谁打我了；而打了人的反而有些却敢说我当年打谁谁了。这很怪诞，但现实可能还就是这样。这是一种心理状态，心理的强势和弱势。

知青经历如何塑造政治人物

人物周刊：知青对当年的看法也五花八门，有怀旧和审美的，也有沉痛反思的，是什么造成这种差异？

米鹤都：我们这个年纪的人，很多已淡忘了那时候到底怎么过来的，很多当事人的思想自己就没理清过，甚至连一些历史事实都忘了。我们聚会或聊天时，很多人不光记错事实，连当时那个色调都记错了，本来是灰暗色调，给记成阳光明媚的色调，浪漫化了，记起来的都是些小溪边抓个小鱼什么的田园风光，把偷老乡自留地的玉米等当作乐趣，忘了生活的艰辛、劳动的艰苦，特别是“接受再教育”中的精神磨难。

人物周刊：因为每个人经历不同？

米鹤都：不是，有相同经历的人、在一个队生活的人，都会有不同的记忆。为什么版本不一样？我分析有几点，首先行业不同，比如搞社会科学的跟搞自然科学的，对上山下乡的看法就不一样。那段时间对搞社会科学的人来说，简直是社会素材的积累过程，反过来，不讲博导、院士这些虚名，这代人有几个做出突出贡献的自然科学家？有吗？至少我孤陋寡闻。今天当官的跟搞学问的又不一样，文化界更特殊。这代人的星光灿烂几乎都集中在文化艺术界。这代人出了些什么名人？写知青文学的作家，画家，艺术家，第五代导演，诗人等等。没上山下乡，他们可能还真出不了名，为什么？没特异环境的挤压，没那种特殊的精神感受和生活体验，可能就难以激发出他们创作的才能和激情。

另外，和人们今天的社会地位、经济状况关系更密切。下岗的跟在职的又不一样。有些人吃饱喝足，想起原先拍婆子（北京土话，指街头搭讪异性或性骚扰）、上山下乡吃点苦，都是茶余饭后的谈资，是乐趣。要是当年在农

村中受苦，后来回城当临时工，好不容易转正了，90年代初就下岗，现在一个月八百块钱退休费，你让他回忆上山下乡，对他的人生有什么价值？

人物周刊：对现在条件好的人来说，那是一种美好回忆。

米鹤都：现实中往往是这样的。上山下乡这代人中，今天讲青春无悔的，往往是因为他能够把那个苦难转化成财富，但是绝大多数知青恐怕是没有这个能力的。我不赞成青春无悔的说法。特别重要的一点是，有能力把苦难和磨练转化成财富的人，或许你有资格这样讲，但切忌不要代表沉默的大多数，也就是那些没有能力转化而且今天还在苦难之中的人说这种话，那就太残酷了。

再说当官，知识青年在特定情况下大起大落、大上大下，从城市下农村，特别是身居高位的干部子弟，一下摔到地上，成了黑五类，或者还在监狱里蹲过，父亲又平反了，然后又慢慢爬起来，走入仕途。对他们而言，这也是难得的经历。

还有一个，就是那种在社会生活当中的算计、圆滑，这代城市青年原来不具备，在跟老乡捏把子中（指在袖子里进行秘密交易），身体力行中，练就了为人处事的圆滑。这也是书本中学不到的财富。

人物周刊：能详细解释下吗？

米鹤都：苦难和成才一直是个悖论，对知青中的精英而言，上山下乡就是一笔精神财富。知青中的一些先觉分子，看到农村真实情况后，这些人对原本理想主义的内核，阶级斗争、解放全人类等，产生了否定之否定。他们不再迷信，而更注重实践的结果，怀疑精神出现了。另一方面，因为理想主义，很多人逐渐把改变中国的贫穷落后作为自己的责任。

对中国农民本性的东西，知青全学会了，又有城市知识分子或者干部阶层的品性，他们的文化心理是这两种东西的结合体。艰苦生活和劳动磨练出他们坚毅的品格，承受能力和担当精神也高于一般人，他们是接了地气的一代城市青年。

还有一点，是对中国国情的把握，崇尚求实而鄙夷虚套子。比如对政策打擦边球，那时的农村，经常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一边喊着农业学大寨、限制发展自留经济的口号，一边想方设法少交公购粮，瞒产私分，多弄点自留地、自留畜。老百姓、乡村干部的那种狡黠，知青全学会了，很多当过社队干部的知青也是这么做的。那么改革开放是什么？就是摸着石头过河，又要遵守条条框框，又要有所创新，而且还不能左了、不能右了。实际上，我们改革中的每一步前进往往都是打擦边球的结果，慢慢积累才改变了条条框框。有过这段在农村经历的人和没有这段经历的人，这中间的差别就大了。所以改革开放的环境，对于有上山下乡经历的干部来说应当是如鱼得水，这

套“曲线救国”在改革开放中全用上了。

人物周刊：是说这段经历极大地影响了他们日后的行事方式？

米鹤都：因为上山下乡经历，知青们变得更自立，有农民的那种求实，有修理地球时得来的吃苦耐劳，当他们回城的时候深知，世界上没有什么救世主，等待别人来救不如自己救自己。全国一千多万知青的返城，对社会来说当时是个沉重的包袱，但是知青们没有成为社会的负担和不安定因素，很快自己消化了自己，做小生意、卖大碗茶、打零工，他们不由自主地成了改革开放的先锋。

甚至说有些知青还沾染了些“流氓”习气，下乡时候的那个社会环境，你没点流氓那两下子，你只有吃亏。比如我们那个县，总共几百个知识青年，流氓能有十几帮，不是你抢我，就是我抢你。

人物周刊：抢什么东西？

米鹤都：抢钱、抢衣服，我还让人抢过衣服。首先是知青之间抢，然后才抢老百姓，一般流氓还不抢老百姓，因为老百姓没钱，抢他们还容易产生严重后果。农民到公社告状，被会被抓起来，而抢知青公社一般不管。我们后来把抢我们衣服的流氓抓住了，送到县公安局，结果也没咋，第二天就放回去了。所以在那个环境你要生存，你自己不是流氓，都得知道怎么对付流氓，而对付流氓的有效方法往往就是用流氓的方法。

当时延安是北京知青下乡中最乱的，打架成风。1968年前后，北京办了一个流氓小偷学习班，有流氓打架行为的都被抓起来，关了好像几千人还是上万人。后来“为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只要你报名上山下乡，马上就放，所以这一大批人中很多就报名去了陕北。这倒也不是有意安排，正赶上这一批去延安的趟了。所以它本身就乱，再加上延安又苦，那一年又大旱，没粮食，知青也吃不饱，安置工作也不好。我在《心路》里描写过这一段。

人物周刊：总体怎么评价这代人？

米鹤都：我1989年写的《红卫兵这一代》里，认为这代人的历史作用，是中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中的桥梁。他们一头连着传统，一头通向现代。可他既不是原来意义上的传统，也不是完整意义上的现代。

米鹤都文集：http://www.hxzq.net/showcorpus.asp?id=152

华夏知青网不是赢利性的网站，所刊载作品只作网友交流之用
引用时请注明作者和出处，有版权问题请与版主联系
华夏知青网：http://www.hxzq.net/

青春的躁動與掙扎

新學期我仍然開設知青文學課，這個星期四便要上頭一次課。昨晚備課時，為了尋找「當年的感覺」，我再次翻開保存了近四十年的插隊日記。在1974年的日記本封套中，翻出一幀《柳堡的故事》電影插曲「九九豔陽天」的歌曲照片（見下），應是在黑白的基礎上加以染色的。照片顯然曾被撕揉過，右下角約四分之一的部分完全撕離開了，剩下部分也被撕裂一個長口子，明顯的折痕還有兩三道。但是，這張被「蹂躪」得不成形的歌曲照片，卻被我精心收藏在日記本封皮中。其中顯然很有故事。雖然日記中沒有具體的記述，但從當時的時代背景，仍可作出八九不離十的揣測。

「九九豔陽天」是一首愛情歌曲（儘管被雜糅進某些意識形態），而在文革中，愛情卻是一個罪惡的代名詞，知青（以及任何年輕人）是不允許談戀愛的。我插隊四年，到我離開時，我那個大隊前後待過的知青大約有一二百吧，公開戀愛關係的只有一對知青。這對知青就成了批判的對象了。然而，知青正處於青春成長發育期，性意識的萌生與騷動、對性／愛的激動與嚮往，是青春發育期最明顯的生理／心理表徵。於是，革命的禁令與人性的本能就形成矛盾衝突。當知青地下歌曲流行時，愛情類的歌曲就特別受到歡迎，而官方對此也就尤其嚴厲禁止。前述「九九豔陽天」的歌曲照片的遭遇，顯然正是反映了在這麼一個時代的特殊背景中，知青青春躁動與掙扎的故事。

可以想像：這張歌曲照片，在流傳過程中被官方（某位幹部或知青積極分子）發現，嚴令銷毀。持有人（我或某位不安分的知青）被迫當面將之撕揉，過後卻被我偷偷收藏起來。事實上，這首歌確實深受知青歡迎，至少我們那一帶的知青都十分喜歡唱。到今天，在知青文學課中，講到知青流行歌曲的情形是知青地下文學的重要背景，我也會隨口唱上幾句：

九九那個豔陽天來喲，十八歲的哥哥呀坐在河邊……

——

2013-09-23

老例文集：http://www.hxzq.net/showcorpus.asp?id=19

华夏知青网不是赢利性的网站，所刊载作品只作网友交流之用
引用时请注明作者和出处，有版权问题请与版主联系
华夏知青网：http://www.hxzq.net/
华夏知青网络工作室

忍辱负重命运多艰的老三届不容否定

——兼评《丑陋的老三届》一文

读了刘双《丑陋的老三届》，心中愤懑之气难平。多年来，对文革、红卫兵、上山下乡知青、老三届的研讨评论连续不断，不同观点并存于世，理所当然。但是如此公然将棍子打到作为一个整体的老三届身上，却还前所未见。

论辩既开，我辈老三届自不能保持沉默，而要用历史事实和理性讨论，还真理于天下，还公道于自身，理直气壮地回应那些肤浅的否定和武断的骂杀。

《丑陋》一文逻辑混乱，论点失据，读者应已有领教。对于此文的基本观点，即彻底否定老三届，我坚决反对。不过我认为此文涉及了若干不容忽视的重要问题，比如：(1)对红卫兵运动的基本评价；(2)谁要对红卫兵运动负责；(3)如何评价“上山下乡”运动；(4)如何从整体上评价老三届等。这是我们作为历史亲历者和见证者不可回避、必须回答的问题。我个人的感觉是，自从我们从文革十年浩劫走出来以后，伴随着对这段历史的反思，这些问题就一直缠绕在我们的周围；而且时间越久，就越能感受到它的沉重。

以往，在我的潜意识里，总以为有朝一日会有历史学家社会学家政治领袖来为我们“作主”，做出某种历史评判的公论。现在忽然意识到，没有人会来给我们作主，我们必须自己来作评判。尽管我们老三届中，对这些问题也各有不同的观点，但认真的讨论总会给我们更多思考的空间，取得相对准确的答案。

对于上面提到的前三个问题，我想同一些知青朋友们一起，多作一些探讨研究，以后再作论述，至少可以对到目前为止各界所研究的成果作一番整理和归纳。

这里先就整体评价老三届，即《丑陋》一文的第一部分内容，作一初步评论。

（一）

“老三届”的概念实际上与“红卫兵”是截然不同的。人们比较经常把“老三届”同“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更

多地联系起来。在广义上，“老三届”甚至就是“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代名词，包括了六八年以后上山下乡的历届知青，因为老三届知青的命运同其后历届知青是完全相同息息相关的。

尽管按照《丑陋》的观点，红卫兵和知青都出自于老三届，老三届也因此必须承受挞伐，不过从历史事实出发，也从讨论问题的实际需要，把红卫兵同知青分开，并把“红卫兵”同“老三届”分开，都更有利于探讨和分析。

简而言之，不论红卫兵还是上山下乡，基本上都是领导人和当时路线政策的错误，作为参与者的绝大部分老三届，实际上是受害者。这方面暂按下不表，留待以后再谈。

老三届，(我指的是广义概念)是当今社会的中坚力量。他们(我们)命运多艰，如同一歌谣所唱：该长身体时----挨饿；该上学时----停课；该上班时----下乡；该养家时----下岗！我们因文革被迫中断了正常的教育，历经上山下乡的磨炼，政治运动风雨吹打，理想主义幻灭，在社会底层挣扎。当改革春风吹来的时候我们中的许多人已经永远失去了青春的活力。但是，如同中道兄几天前在其驳<丑陋>文中所说，老三届没有被接二连三的厄运压倒，反而顽强拼搏，努力学习，不少人成了中国各行各业的中流砥柱。中国当今所取得的每一项成就，几乎都是建立在以他们为主要牺牲对象的社会试验基础上。[注一]然而，老三届却不得不忍辱负重，继续他们的事业追求、家庭重担以及社会责任。

说忍辱负重，是因为一则政府不能提供足够的就业福利等保障，以至下岗等种种危机必须面对；二则社会舆论的不宽容，<丑陋>便是一例----他们不去批判造成老三届悲剧命运的根源，反而对整个老三届(实际上是对全体知青)横加指责；这是完全罔顾事实的，也是非常不公平的！

（二）

在《丑陋》的第一部分中，作者借“一位有着四十年教龄的中学教师”之口，称在其教过的所有学生中，老三届的孩子的综合素质是最差的，作者并进而推论这是因为老三届的整体素质最差。老三届中很多人没有上过大学，甚至连完整的中学教育也没能得到，这是事实，但仅仅因此就断言老三届的整体素质低下，“既低于他们的父辈，也不如他们的孩子们”，则完全不符合实际，也是根本经不起推敲的。首先作者自己的论述就是自相矛盾的，他先说老三届的孩子综合素质“最差”，又说老三届还“不如他们的孩子们”，那么到底谁比谁差呢？这位所谓的中学教师是在谈论什么话题下在什么样的前言后语中讲出此一“最差”之论，意欲何指，并不须追究。在我们自身，我们周围的社会中，即我们同辈人的子女中，根本没有看到没有发现这种“最差”。也就是说近十几年的社会现实中并没有什么事实或数据能证实这种“最差论”。如果“最差论”属实的话，那岂不是说此前十几年以及今后若干年

的大学生中学生都是不合格的了？事实并非如此，“最差论”差矣！我记得前几年社会上有过对“独生子女”素质分析的报道，但那与我们这里谈的是完全不同的范畴。完全有理由相信，<丑陋>的作者是借用了教育届人士对“独生子女”的分析性评价，自由发挥，匠心独运地推出他的“最差论”，以行否定老三届之私。

（三）

再看《丑陋》作者使用的数据。他说在1500万老三届中，七七、七八两年上了大学的只有10万人，比值为“1500比1”。这里他犯了一个简单的计算错误，这个比值应为150比1。我要进一步说明的是，这150比1，正是命运对老三届的无情打击；而我们的众多的老三届以及弟妹知青们，在因年龄、家庭等等不可抗违的缘故而无奈失去上大学机会以后，又在后来的各类业余高等教育中，顽强地争取机会获取知识，弥补命运给我们造成的缺失，数以百万计的老知青获得大专以上文凭，与那些上了正式大学的知青战友们一起，成为各行各业具有真才实学的工作业务骨干。这中间有多少是老三届，虽无具体数据，但几十万的估计数字应是合理的。接下去，<丑陋>作者用这个“1500比1”的比值，说这极少数的幸运儿感恩戴德，“国家欠下的中断文化教育的孽债被名正言顺地一笔勾销”；而这些幸运儿“对知识的渴求已不再是学习的第一目的”，“表现出来的是对获得一纸文凭的满足和对可以名正言顺地混入知识分子行列的窃窃之喜”。

如果说前边指出的是他的计算错误，那么这里他的叙述已经是完全不顾事实的胡说八道了。我们可以回顾七十年代末以来的历史，所谓“一笔勾销”是完全的无中生有；而老三届进入大学以后的刻苦用功，他们如饥似渴探求知识的出色表现早已被人们特别是大学教授们所津津乐道了。至于说《丑陋》作者抨击老三届因文化低，年龄大，“在各个领域里竞争无力”，而被社会淘汰，下岗，那简直是无异于栽赃。天有病，人知否？

（四）

我认为，关于老三届的综合素质，高新先生的分析是合乎实际，比较中肯的。他说，在长达十一年的时间里被强制剥夺了接受正常教育的权利，老三届这一代从整体上失去了在科技领域做出顶尖成绩的可能。但是由于在动乱中饱经社会底层生活的磨难和特殊经历锤炼，老三届在其它领域往往最见功力。老三届为文，最见生活功底；老三届经商，最懂处变不惊；老三届从政，最具竞争能力。[注二]

《丑陋》作者对老三届回顾青春年代的“青春无悔”颇有微词。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青春梦，即使是干过错事傻事的红卫兵们，也都有不同程度的痛悔和反醒。作为一个群体，老三届曾有过满腔的热情；如今回顾当年，青春无悔，何错之有？即使是对“青春无悔”的说法持反对态度的著名知青作家梁晓声，也还是很冷静地承认“艰难岁月使人坚强，这话是有一定道理的。而这一种坚强，对一个人的精神是有些益处的”，同时他也表示对上山下乡完全

是苦难的说法不表赞同。[注三]请问《丑陋》作者，难道一定要我们跪倒在某些居心叵测的人们面前，去污染和蹂躏那残存在我们内心深处的青春梦，去承受本不该由我们承受的历史重责吗？如果真是那样的话，天理何在？！

（五）

不是结束的结语。《丑陋》作者以一女孩的“丑陋”评语开始，移花接木到老三届的“丑陋”，每个读者都可看出其指鹿为马的用意。而在“结束语”部分，该作者重施故伎，称他将其稿念给刚上高中的儿子听(顺注：不知其子“综合素质”优劣？)，其子评说：“是挺丑陋的。”该作者没有注意到，他的这一得意之笔恰恰露出了破绽-----到底是什么“是挺丑陋的”呢？是他的这篇大作吗？

2000。8。31于洛杉矶

丑陋的老三届

作者：刘双

来源：新浪网 文化历史论坛 原载《黄河》1999年第二期

去年的夏天，一群“老三届”在某歌厅聚会。一好事者将聚会录影。之后，这盘录影带就在与会者中间流传。某女士和她的女儿在家中一起看这盘录影带。没看几分钟，女儿就发表了结论性的评论：“这群人怎么一个儿一个儿的都那么丑陋呀。”此话传入笔者耳中，沉思多日，故写此文。

一．“老三届”的基本评价

“老三届”是指1966年“文革”爆发时在校的三届高中学生和三届初中学生。其中年龄最大的是66届的高三毕业生，俗称“老高三”。“文革”风雨袭来之时，他们正逢高考即将来临之际。如果那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晚三个月发动，“老高三”中的佼佼者将会跨入高等院校的大门。一场风雨，十年光阴，人生的道路由此转向。“老三届”中年纪最小的是68届初中毕业生。他们于1965年跨入中学校门，1966年6月停课时年仅14岁，尚未读完初中一年级的全部课程。“文革”中，他们在荒废了两年的学业之后，也头戴“知识青年”的桂冠被送上了南下北上的列车。

“文化大革命”至今已有32年。“老三届”中大的已年过半百，小的也有四十六七。在当今少男少女的眼中焉能不老，焉能不丑呢？其实，“老三届”们自己在相互审视时也会有同感。几年前，一男“老三届”曾约会一女“老三届”，想重温一次少年时代的同桌梦。男人留给女人的印象如何不得而知，而那女人衰老的容颜着实让那男人伤感了许久。

世间万物由鲜活走向衰败是一件再自然不过的事了。保尔．柯察金【1】的那段名言曾经激励过多少“老三届”。一个人在回首往事的时候，只要自觉没有碌碌无为，虚度年华就不会懊悔。作为一个普通人，在回首花季之时，能够在记忆的长河中采到一朵浪花，让它闪现出往日的明媚和鲜艳就可以自慰平生了。而“老三届”却真的难说曾经拥有过真正意义上的，属于自己的，浪漫无邪的青春时代。“老三届”的青春时代是在红卫兵运动和“上山下乡”运动中度过的。“胡为”、“无为”、“虚度”、“懊悔”应该成为“老三届”人生回忆录中的关键词。

80年代初，“老三届”陆续从农村返城之后，作为一个共命运的社会群体已不复存在。他们消融在社会的各个阶层和社会的各行各业之中。二十年又过去了，“老三届”已经成为一种历史现象。“老三届”的故事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文学作品和影视节目中。“老三届”自己的回忆文章也一年比一年多。艺术的再创作，失真的回忆和人为的粉饰把历史上的“老三届”搞得面目全非。不断深化的对“文革”的否定的认识应该导致对“老三届”历史形象的重新复位。

一位有着四十年教龄的中学老教师曾经在一次家长会上说过，在她教过的所有学生中，“老三届”孩子的综合素质是最差的。这位老师谈的是她的学生，但她无意中涉及了孩子们的家长——“老三届”的整体素质的评价这样一个敏感的话题。直率地讲，就整体而言，“老三届”是一个不但没有接受过高等教育，其大多数也没有接受过完整的中等教育的一个群体。这一代人的群体素质低于他们的父辈，也不如他们的孩子们。在“文革”中，虽然有一些人也去上过三两年“工农兵”大学【2】，可是，那种被“四人帮”推崇的“革命化”大学在文化教育方面的“含金量”之低是众所周知的。在1977年，1978年类似安慰赛的高考中，“老三届”中的一些幸运儿也曾金榜提名得到深造的机会，他们激动的心情不亚于农民土改期间分到土地时的感激之情，是可以理解的。有数字统计77级、78级入学新生为67万人。而这67万人中有多少“老三届”呢？最乐观的估计不会超过10万人。而“老三届”的总人数大约为一千五百万人。这1500比1的比值说明，77、78年的高考确实改变了极少数幸运儿的命运，也将国家的教育体制引入正轨。但是，正是在这种所谓的“平等竞争”的考试游戏中，在中榜举子的感恩戴德声中，国家欠下的中断文化教育的孽债被名正言顺地一笔勾销了。而在那些为数可怜的幸运儿中，对知识的渴求已不再是学习的第一目的，人数不乏地表现出来的是对获得一纸文凭的满足和对可以名正言顺地混入知识分子行列的窃窃之喜。而那些浪迹江湖十年之久，把上学读书作为进入官场的敲门砖的人确也不在少数。即使有个别人经过个人努力，事有所成，但绝对改变不了“老三届”作为一代人由于文化水平偏低，而年龄又相对偏大，在各个领域里竞争无力，即将过早地被社会淘汰的必然命运。在最近几年的下岗大潮中，“老三届”已是首当其冲。

二．丑陋的“上山下乡”运动

丑陋的青春多年以前，有一群“老三届”在北京搞过一个以“上山下乡”为背景，以北大荒农垦生活为素材的摄影展。影展好象唤做“魂系黑土地”，主题辞是“青春无悔”之类字眼。（注意：计算机只能从硬盘字库中调出“芜秽”“污秽”“误会”等词组。“无”“悔”两字只能分别输入）但是，一个思维健全，心态正常的人看过影展后都不会留下美好、健康的印象。照片上的人多是蓬头垢面，龟头鼠脸，神情和目光都很呆滞。要么做傻笑相，不知其所笑何谓；要么做英雄相，不知其意欲何为。他们的服饰也无款式可言，男女皆宜，中性的很。照片上作为背景的景和物多是一些驴棚，马圈，土坯房和高粱地什么的。不知影展的举办人想向来观者展示和说明些什么？这两年，这类照片又被汇集成册，以《老照片》的形式炫耀于世。那样的生活值得炫耀吗？1969年夏天，人类的使者在全人类的目光的注视下登上了月球【3】。他缓缓地转过身来，用惊异的目光眺望人类的故乡———太阳系中一个唯一的，蔚蓝色的星球。它浮动在冥冥的黑暗之中，向漫漫的，寒冷的宇宙发出挚爱的光和热。在这全世界都意识到“科技凌驾于一切的时刻”，中国的“老三届”们被剥夺了学习科学文化知识的权利，正在把自己可贵的，属于自己只有一次的青春无奈地抛洒在荒原和山坳之中。今天，还会有人去崇尚和再现这种丑陋的青春模式吗？

别人如何评价“上山下乡”运动是一个旁观者的权利。“老三届”自己对“上山下乡”运动给自己和国家带来的无可弥补的损失应该有一个清醒的认识了。

“上山下乡”运动是应该全盘否定，彻底否定的！这并不是一个具有多么高深的理论而需要研讨的命题。“四人帮”倒台之后，国家默许千百万以“老三届”为主体的“知识青年”以高考、病退，困退等各种借口倒流城市，并停止强迫初中和高中毕业生去“上山下乡”的做法，以及在改革开放以后开始的，持续了20年的，恰恰是与“上山下乡”逆向的“打工潮”都从实践上否定了“上山下乡”运动。

有一点常识的人都知道，工业人口与农业人口的比值，城市人口和乡村人口的比值是标志一个国家工业化程度和现代化程度的一个重要的参数。如果一个国家的农村人口绝对地大于城市人口时，这个国家是无现代文明可言的。“上山下乡”运动人为地将本来在全民总数中就占少数的城市居民驱赶到农村，将发展工业所必须具备的预备人员强制性地转为务农人员。这种国策是与社会发展的大趋势是相违抗的。是一种倒退。

“消灭三大差别！”是“上山下乡”运动中被喊得最响的口号。以“上山下乡”为手段去减少城市人口以消灭城乡差别；以减少脑力劳动人员的数量去消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差别的做法是农业乌托邦主义在20世纪最荒诞的实践，其后果只能是社会的蜕变。拉大与世界先进国家的差距。

“与工农相结合！”也是一个被喊得震天价响的口号。纯粹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认为工人阶级是代表最先进的生产力的一个阶级。而农民落后，自私，目光短浅。为什么不留在城市里去和工人阶级相结合或者干脆让自己就成为工人阶级的一员，而要去农村和一个相对落后的阶级相结合呢？实践和理论是自相矛盾的，它只能用来骗人，根本不能自圆其说的。

20多年以前，有人写过一首歌颂“文革”，赞美“上山下乡”运动的无耻长诗《理想之歌》【4】。1976年1月它作为回击“右倾翻案风”的炮弹，被刊登在《人民日报》上，想是得到了姚文元的赏识和认同。据说此诗也是出自“老三届”之手。受到了一点贺敬之诗歌风格的影响，诗人的创作更象是在模仿。虽同属奉命文学，但它却少了些《雷锋之歌》的神韵，也不如《三门峡梳妆台》【5】来得流畅。红卫兵文字的影响更是流露在字里行间，可又缺了点儿红卫兵文字中固有的傲气与霸气。总之很蹩脚，不伦不类的，象个四不象。诗中赞美理想的声音就象是痴人说梦，在当时就为很多人所不齿。它和后来成为一位精神病患者的另一位“老三届”当年写下的朦胧诗的开山之作《相信未来》【6】相比，显得那么冗长，那么做作，那么另人厌恶。

有人说“上山下乡”运动是毛泽东“这位气质浪漫的领袖在中南海的书房里构思了称之为‘再教育’的革命性创举”。但是，认真考察“上山下乡”运动发生的时代背景，其决策的动因中到底有多少理想主义的成份是十分值得商榷的。

丑陋的动因在“文革”中，因党内政治斗争的需要，无理中断国民文化教育和开展“上山下乡”运动是一件事情的互为因果的两个阶段。

1949年以后，政治运动不断。而全国范围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且和学生有牵涉的只有两次：一次是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一次就是“文化大革命”。五七年的反右斗争中有55万人被打成右派，但运动没有在中学生中进行，那实在是不幸中的一件幸事。而“文革”到来之时，中学生就在劫难逃了，千百万“老三届”成为这场斗争的殉葬品。

“文化大革命”的冲击波一开始就波及到中学。失控的校园再也听不到朗朗的读书声。在即的1966年夏季的初考、中考和高考一律被取消。此恶端一开，中学的停课状态持续了多年，全国高等院校被关闭达11年之久。（如果以招收“工农兵”大学生为限，高等院校被关闭的时间也有七年之久）荒废学业的中学生何止千百万。

废科举，办学校是中国人在本世纪初作出的全民族的选择。从梁启超、严复倡办京师大学堂为起点，无论天灾人祸如何惨烈，作为立国之本的国民文化教育就从来没有中断过。就是在决定民族存亡的八年抗日战争时期，国民的文化教育也没有间断。以西南联大为代表的流亡大学为中华民族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栋梁之材。“文革”在这个层面上的确名副其实地成为民国以来最黑暗的年代。子不教，父之过。民不教，谁之罪？今天，“文革”中断教育的后果早已显现出来了。除了官场和商场，几乎各种行业都存在着人才的断层现象，其中，科技、教育领域的这种

危机尤为明显。当“文革”前毕业的大学生开始逐年成批地退休，离开科研，教育第一线的时候，作为一代人，“老三届”不能挑起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历史重担。历史也不得不无情地跨过“老三届”，把希望的目光投向更年轻的一代。在全民高唱“科教兴国”的今天，应该清一清这没有偿还的历史的旧帐。

文化教育停止了。但中国人的生育没有停止，婴儿们仍在出生，孩子们还在长大。“文革”搞了两年，形势虽然“不是小好而是大好”，但是一个极为严峻的社会问题日益紧迫地摆在中国领导人的面前：1966年“文革”开始时，五、六、七岁的孩子已经长到七、八、九岁，还迟迟不能跨入小学的校门。而“文革”开始时的在校的六届小学生也停课两年，仍被滞留在小学校园内。其中后来被称为69届、70届和71届初中毕业生的孩子们也由于国家教育体系的崩溃一直无法完成小学的全部学业和正常地升入初中。让三届，上千万适龄和超龄儿童同时进入小学校园的前提是：必须保证滞留在小学的三届高年级学生要同时离开校园。理由很简单：小学的校园和校舍是有限的，不可能容纳如此之多的学生。同样的问题也存在于中学。而“老三届”的运气就没有那么好了。当69届，70届和71届的小弟弟和小妹妹们向潮水般地涌进中学校门的时候，“老三届”的学生却不能按照上述模式处理，顺理成章地升入高中和大学。当时的大学正在进行“斗，批，改”，伟大领袖还没有下“理工科大学还是要办的”决心。而取缔文科大学好象势在必行。既然是这样，“老三届”便处在一个下端挤压，上端封盖的尴尬境地。他们就象多余的环节注定要从社会的链条中被摘除去了。带着一颗精神世界一贫如洗的头脑和一个没有完全发育成熟而显单薄的身体，过早地离开校园，被抛向社会。如何处置“老三届”呢？让他们在城里就业上班吗？正在进行着的“文化大革命”扰得各行各业不能正常运作，很多企业都处在开工不足和停工状态，根本不可能“消化”如此之多的初，高中毕业生。可供“老三届”走的路只有一条：离开城市。

当“老三届”响应“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号召，放下书本，离开书桌，走出教室时候，他们是义无返顾、责无旁贷的。甚至他们中的很多人到今天也解释不清楚当年他们投入那么巨大的热情去承担的义务和责任到底是什么东西。历史没有嘉奖他们的无私，而是冷漠地嘲讽了他们的无知。他们的无知甚至使他们无从察觉自己已经被淘汰出局。与以往的右派下乡劳动改造不同：右派们在运动后期被赶向农村的时候，头上都带着刻有A字的政治帽子，而“老三届”被送往农村的时候却身披“知识青年”的圣袍如同皇帝的新装。当他们象废弃物一样被扔到垃圾堆里去的时候，他们还坚信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丑陋的“自觉者”“老三届”不愧是共和国的同龄人。他们中的杰出人物总能够在历史的关键时刻自觉地涌现出来，想党之所想，急领袖之所急。只用“哗众取宠”四个字来解释他们的所作所为也不尽然。这是教育的结果。说得玄乎一点，这也可以算作是政治上的心灵感应吧。用正统语言来描述，这是有党性的表现。

1966年6月初，“文革”热浪已经波及到了平静的中学校园。“老三届”被滚烫的政治气候熏烤得坐立不安。参与意识，表现意识已经成为一种自觉意识。6月13日党中央和国务院发出通知，说为了彻底搞好文化大革命、彻

底改革教育制度，决定当年的高校招生工作推迟半年进行，因为需要有一定的时间来研究和制订新的招生办法。6月18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刊登中央和国务院的通知的同时转发北京女一中高三（四）班的同学以班集体的名义给党中央毛主席写的信【7】，她们在信中强烈要求停课闹革命，并自愿放弃已经迫近的高考。她们将高考与封建社会的科举制度相提并论，高呼要砸烂旧的升学制度。北京四中高三（五）班同学致毛主席的信和写给全北京市师生的倡议书也同时被刊登在那一天的《人民日报》上，他们用更狂热的语言表达了“立即废除高等学校入学考试制度”的愿望，并发誓：“誓作社会主义的工农兵，决不当资产阶级的大学生”。几乎与此同时，全国各地的“老高三”中都出现了类似的言行。上海61中高三（三）班的同学贴出大字报，长沙一中高三（三）班团支部致信团中央，他们都在控诉旧升学制度的罪恶，都要求取缔旧的升学考试制度。取消高考，中断国民教育这样伤天害理的事情是不便由国家出面直接倡导的。打民意牌，可以把少数高中生由于头脑发昏表达出的非理性的愿望强加在几十万“老高三”毕业生的头上。本文作者并不想过多地指责当年写信的同学，他们也负不起误人子弟，危害国家的责任。他们舍弃了自己桃李芬芳，欢歌一堂的时光，就以为担负起了天下的兴亡；他们过早地、盲目地进行了选择，可扑面而来的却是不断增长着的民族内耗的滔天浊浪。实际上，有没有这样一些信出现，“老三届”的结局都是一样的，一场摧枝落蕾的桃李劫是注定要降临的。应该反省的是：“老三届”作为一代人，在被剥夺学习文化知识的基本权利的历史性时刻，表现出来的是一种整体性的麻木。虽然个别人有一些反应，也不过是不健全的政治神经的抽搐而已。这是社会的文化虚无主义在“老三届”身上结出的，必须由“老三届”自己来吞咽的恶果。

教育停止了，学而优则仕的道路被堵死了。混混噩噩噩的初中生整天陶醉于革命和造反，废寝忘食地忙碌着。而高中生，尤其是年龄已过20岁的“老高三”的学生已经开始考虑人生的走向。选择的余地很小，绝大多数人对未来感到渺茫。但是，也有极少数“冷静者”在那昏热的年代，凭借青年人不应有的社会经验和政治敏感为自己找到了一条曲线迁升的道路。

1967年的秋天，中学的“文革”还在轰轰烈烈地进行着。“老三届”的去留问题尚未提到日程上来。北京的“老三届”中有“十男十女”（“老高三”的居多）【8】不知是因为想逃离政治斗争的旋涡还是想寻找新的兴奋点，在天安门广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前庄严誓师，然后奔赴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内蒙古大草原扎根落户。这“十男十女”颇具浪漫主义的举动如同前文提到的女一中高三（4）班的那封信一样，引起国家的高层的注意，舆论工具广为宣传，一时风头出劲出尽。他们的举动为高层处置“老三届”提供了一条新思路。一年以后，1968年12月22日伟大领袖终于发出了“上山下乡”的号令。与那先知先觉的“十男十女”自愿去草原的情况不同，“上山下乡”从此成为一项强制性的政策。

当年火车站送别的歌声、喊声和哭声早已飘散。落户农村的千千万万的“知识青年”也早已作鸟兽散。那“十男十女”可能是最先卷铺盖卷返城的一伙人。当年的“模范带头”作用早已成为他们仕途上的一块垫脚石。“坚决同贫下中农相结合，永远扎根农村边疆！”的誓言象一声响亮的臭屁，放过之后就无声无味了。和许多“模范知

青”（比如蔡立坚）相比,他们的誓言要廉价的多。70年代末期，“老三届”的返城大潮逆不可转，历经十年的“上山下乡”运动终于落潮了。却有近百名有全国影响的“知青”联名发出了“坚决扎根农村六十年”的最后一声狂吠，理念之迷乱，时务之不识，冥顽之不化已达到丧心病狂的程度。中国是一个无神论占统治地位的国度。发誓很随便，背叛自己的誓言也很随便。谁也不会因不遵守自己的誓言而遭报应。但是，有一点却是肯定的，在这种善于政治投机的人的灵魂深处总有一块阴暗的地方，阳光照射不到，只好一直糜烂下去了。

丑陋的实践1965年9月25日的《中国青年报》说，从1955年到1965年的十年间，全国有一百万知识青年落户农村。十年以后，1975年12月23日的《人民日报》头版头条，以“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辉煌胜利文化大革命的丰硕成果”为标题，向世人宣布：自1968年毛主席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伟大号召以来，七年的时间里已有“一千二百万知识青年光荣务农”。“文革”前后，全国平均每年下乡的“知识青年”人数从十万激增到一百七十万。在造成这种大规模地将城市青年驱赶到农村去的诸多原因中有三条是起决定性作用的：教育事业的停滞甚至倒退；工业发展的相对缓慢；解放以后无节制地被生育出来的人即“老三届”及其弟妹进入了被迫就业的年龄段。

“上山下乡”运动起源于50年代中期。作为一种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它兴起在60年代初期。“文革”前夕“上山下乡”政策带来的社会弊病已经显露出来。老一代的“知青”为了自己的生存权向社会作出过强烈的反应。“文化大革命”的极左思潮的影响和“老三届”在“上山下乡”运动面前表现出来的愚昧，尤其是国家制定的铁打的“上山下乡”政策使得“老知青”用青春和血汗换来的教训和全部争取人权的努力付之东流。

然而，在“上山下乡”运动的十年中，“知识青年”始终是社会的一个不安定因素。而这种不安定首先来自“知识青年”的内心。许多“知青”的回忆录中连这一个最基本的事实都不敢承认。虚伪是“老三届”群体品格中最显著的品德之一，由此可见。正象“文革”以前，很多“老三届”背上粪桶去掏粪，恶心的回家后连饭都吃不下去，可是却在入党，入团申请书上大谈特谈自己的心灵是怎样被屎尿之液洗净了一样。

虽然“知识青年”的文化程度和广大的农民极其子弟相差无几，可是，一种因为自己是来自城市而产生的优越感使他们的绝大多数从内心深处看不起农民，也看不起农民的孩子们。就是那些挣扎在贫困线上的城市贫民的子弟在农民面前也有一种莫名其妙的优越感。这种优越感在三十年后“老三届”撰写的“上山下乡”回忆录中随处可见，虽然他们也承认得到过来自农民的厚爱。“老三届”和更老一代的回乡“知识青年”例如邢燕子，董加耕相比，缺少的是朴实与忠厚以及对乡亲对土地的那种梦牵魂绕的乡情。异化了的革命理想使他们的情感漂浮在半空中，无法升华又不甘沉落。春天，他们虽然和农民一起在田间播种，秋天，却不能在和农民一道收获时同时收获喜悦。秋天是他们返回城市的季节。他们将在无聊和空虚中度过一个漫长的，城市的冬天。把自己失落的脚印留在城市阴冷的街道上，把自己迷茫的身影留在城市人怜悯的目光中。当春天再一次降临的时候，他们只好又无奈地回到农村。年复一年，他们象“边缘人”一样游荡在城市和乡间。那种心不守舍，身魂两地的精神状态曾经那么痛苦地

折磨过千千万万的“知识青年”。那种感觉应该是刻骨铭心的。但是，在许多“老三届”写的“上山下乡”回忆录中，这种落魄的感觉没有被记录下来。

想方设法离开农村，改变自己“知青”身份的活动是和“上山下乡”运动几乎同步进行着的。每一个有“知青”成员的家庭都在利用各种社会关系把自己的孩子调离农村。如果有人愿意考证一下“走后门”【9】一词产生的时代背景，就会发现它与“上山下乡”运动是密不可分的。权利对于看似平等的“知青”大军的瓦解作用从来就没有停止过。

在十年“上山下乡”运动中，千千万万“知识青年”自发和自觉作的一件共同的事情就是抗拒被农民的同化和不惜一切代价返回城市。每逢升学，农转工，调干的机会，他们就会不择手段：女的不惜出卖色相，男的不惜以死相要挟。他们希望离开农村和农场不仅仅是因为那里有着太多的贫困和太多的愚昧，基层的恶势力无时无刻不在啃噬着他们的青春。邓贤的长篇报告文学《中国知青梦》【10】向人们再现了中国知青族被欺骗、被强奸、被虐待的生活场景，还原了一个绝望、混噩、丑陋的群体形象。而在更多的“知青”回忆录中，这丑陋的一切被掩饰的无影无踪。这种少数人的掩饰比起大多数人的沉默要可恶的多！是从肯定的意义上，把历史悲剧幻化为正剧；还是在否定的意义上，把历史的真相化为一场人生的悲剧，这是必须正视的。

发生在1973年的“张铁生事件”【11】已逐渐被世人淡忘。但是，在几乎每一本“老三届”编写的以歌颂“上山下乡”运动为主题思想的“知青”回忆录中都可以找到指责张铁生的文字，内容也如出一辙，说，要不是张铁生，自己就可以上大学了。云云。今天，回首往事，应该为张铁生说句公道话：他何罪之有？为什么不去谴责无理中断全民文化教育的决策者，而要嘲笑张铁生是“白卷先生”？为什么不去控诉将整整一代应该在学校读书的青年人驱赶到农村边疆的作法，而要指责张铁生是一个“大学迷”？张铁生是“老初三”的学生，他没有上过高中，初中毕业后，搞了两年“革命”就去农村劳动，一干就是五年，文化考试考成那个德性是再正常不过的了（物理和化学两门只得了6分，数学61分，语文38分）。如果用那套卷子在1973年对67届、68届、69届和70届的初中毕业生进行全国同试，多数人还考不到张铁生这个水平，“白卷”大军不会少于一千万！几乎所有的“老三届”都读过高玉宝的《我要读书》。但是，当他们被剥夺了读书的权利的时候，却没有人站出来为自己，为自己所属的一代人进行抗争，绝大多数人都保持沉默。倒是张铁生以他特殊的方式，用他的“答卷”向社会，向统治者发出了“我要读书”的乞求声。其相虽丑，其声也悲呀。

纪念丑陋前两天从报纸上看到一则新闻：为了纪念“上山下乡”运动30周年，某公司准备发行金卡，数量三万枚。虽然没有消息证明有“老三届”参与了这件事情。可除了“老三届”还有谁会如此热衷与这件事情呢。

凡是发生在历史上的，值得后人纪念的事情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因为它的出现推动了社会的进步；一种是因为它的出现阻碍了社会的进步。

“五．四”运动对科学和民主的呼唤是本世纪中国青年最值得骄傲和最值得纪念的创为。而“上山下乡”运动虽然涉及的人有上千万，持续的时间达十年之久，但是，它背离了“五·四”精神，没有给中国带来丝毫的社会进步。有些自己感觉混得不错的“老三届”总是在不同的场合，用不同的方式粉饰“上山下乡”运动，以证明自己的青春没有虚度。他们有意或无意地虚构了一个可以欺骗自己孩子们的神话，一个中国拓荒者的神话。但是，从黑龙江的北大荒到云南的西双版纳；从陕北的黄土高原到内蒙古的大草原，“老三届”没有开发出一处“辉煌的西部”，他们留下的只是一片片枯萎的橡胶林和因过份砍伐树木形成的一座座光秃的山岭，和被他们遗弃的，已经长大成人并和当地人没有任何区别的亲骨肉，还有那至今都难以启齿的羞辱和痛苦。“上山下乡”运动是十年浩劫的副产品。是“文革”这部反文化，反文明的大合唱中的一个不可分割的一个声部。“文革”是国耻。国家之耻，国人之耻。“上山下乡”运动则是中国青年的耻辱。如果一定要纪念的话，那就应该只是为了这曾经发生在共和国青年人身上的悲丑剧永不重演。

三．丑陋的红卫兵运动

“文化大革命”被否定了。几乎所有的人都在控诉文革的罪恶。好象在那场持续了十年的浩劫中只有四个人在作坏事，而其余十亿减四的人都是受害者，都是无辜的，清白的。于是历史上的“文革”失去了载体。但是，如果这个载体确实不曾存在的话，“文革”就根本不可能发生和发展。对“文革”的反省应该是全民族的。即包括执政党也包括老百姓。“老三届”是共和国的同龄人，历史却没有善待他们，他们也没有善待历史。“老三届”在“文革”中有被欺骗和利用的一面，但是，主动迎合，积极参与却是一个基本的历史事实。

看过电影《淮海战役》的人都会记得毛泽东有这样一段台词：“60万比80万（解放军和‘国军’人数之比）……这是在赌国家的命运，赌民族的命运。‘啪’的一下押上去，就是那么一回事。”在解放战争中，他老人家是胜利者，是赢家。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手中的“赌资”是什么？最大的“赌资”当然是他在老百姓心中早已形成的，如日中天的崇高威望。但是，仅此一注是不够的。无论输赢，在各类码子中，有一注是注定要输进去的，这就是“老三届”——他们的青春和前程。

丑陋的革命“文化大革命”的毒焰首先是在大学校园被点燃的。但是，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打压下，“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12】发表后形成的轰轰烈烈的局面，很快变得冷冷清清。于是，毛泽东走出滴水洞，在畅游了长江，回到北京之后，他作了两件一反常态，惊骇全党的事情。一是写下了《炮打司令部》【13】的大字报，向全党公开了他要打倒刘少奇的决心。一是亲笔给清华附中红卫兵【14】写回信，表明他老人家已经找到了一种让政敌和同盟者都意想不到的社会力量。这种力量可以由他任意号令，招之即来，挥之则去，功无不克，战无不胜。将中学生推向政治斗争的最前沿确实有着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的效用。

中学生的年龄是从13岁到19岁。这是一个从身体发育到心理发育都尚未达到成熟的年龄段。青春的躁动、是非的无断、理念的易变，再加上抖擞的精神和旺盛的精力都表明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年龄段。教育学和心理学都认为，中学生是需要特别加以引导和训教的一群。英文中有一个特指处在这样年龄段的人的专用名词：teenager。它是由teen和age复合而成。可是，它决不是一个简单的复合名词，只在表怔处在该年龄段的青年的年龄特征。更深层的内容在于涵指这个年龄段的人在教唆和误导的情况下，他们的行为往往具有一种反复无常、丧失理性的倾向，因而是极端危险的。文革中的“老三届”正是这样一个群体。

历史对“老三届”的选择看似偶然，但也有其历史的必然性。

建国十七年以来，以革命传统和阶级斗争为大背景的社会教育培育了“老三届”以仇恨为底色的社会情感，“文化大革命”中，为了这种情感的宣泄中国人付出了血的代价。五七年以后，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批判和斗争愈演愈烈，全社会形成了一种对文化虚无主义的普遍认同。这种反文化的倾向对“老三届”影响是极为可怕的：中国的传统文化是封建主义的；西方的文化无论是古典的还是现代的都是资产阶级的；五十年代还可以接受的前苏联和东欧的文化到了六十年代也成了修正主义的东西。“老三届”的精神世界近乎一片荒漠。“文革”前夕“老三届”只能接受以《收租院》【15】为代表的控诉艺术和以《红岩》【16】为代表的烈士文学。前者对“老三届”的影响是将不同社会制度的比较转变成对人的仇恨，后者是把信仰的追求转变为对复仇的渴望。在不断地、反复地对“人性论”进行批判的同时，“老三届”接受了日益深化的个人崇拜教育。其中，学习雷锋的运动【17】将个人崇拜的方式进行了推陈出新，学习毛主席著作也由此走上实用主义的道路，对毛泽东的神话莫过于在“老三届”的心中。

从七千人大会以后，毛泽东开始全面抨击党在文化教育领域的方针政策。文化部被说成是“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中宣部被喻为“阎王殿”；评价最低的是教育界——“庙小妖风大，池浅王八多”。“文革”前，“毛泽东和毛远新的谈话”、“毛泽东和王海容的谈话”给“老三届”的思想造成了极大的混乱。这些以抨击现行教育体制的讲话一经流传，不尊敬老师，不崇尚知识之风即刻成为一种时尚。“文革”前的《中国青年报》曾刊出过一篇嬉笑之文《获取5分的“秘诀”》【18】，它的作者就是“文革”中的“老三届”。这篇文章比黄帅小姑娘的日记要早了将近十年。把它算作是“老三届”泼向自己老师的第一盆污水可能是不会有误的。北京市东城区某校初一的学生在1966年初曾写出一文，题目在当时就非常吓人——《现在的学校培养不出共产主义的接班人》，其矛头还是对准了教育体制和老师。无论是对杨献珍的“合二而一”的哲学观点的批判，还是对田汉的“有鬼无害”的戏剧理论的批判，“老三届”都积极参与，表现出了极大的“革命热情”。“文革”风雨未到，“老三届”已经跃跃欲试。政治思想的“热身”运动已经完成于无形之中。

“文革”中的“老三届”是红色的“teenager”。以红卫兵为代表，以“八一八”为起点，“老三届”呼啸着

登上了中国的政治舞台。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首次检阅红卫兵。在以后的四个月中，有一千万以“老三届”为主体的红卫兵和造反派在这里接受过他的检阅。“八一八”是“文化大革命”这出中华民族的悲丑剧拉开大幕的时刻。那红色的古城楼就是一座历史的舞台。无论以后如何，或寿终正寝、或横尸荒野、或腊炬成灰、或面壁囚笼，剧中的主角都从幕后走向台前。刘少奇的尴尬，周恩来的矜持、江青的傲慢、康生的阴冷，尤其是林彪那白骨般的面容和他嘶声力竭的呼喊，对中国人，对中华民族来说充满着险象和凶兆。毛泽东在震耳欲聋的“万岁”声中举起手，挥动着他手中的绿军帽，而他的目光却没有投向在他脚下的芸芸众生。端详那张由摄影师留下的，记载着那历史瞬间的照片,人们会发现：毛泽东微昂着他硕大的头颅，把他冷漠的目光投向无际的苍穹。与这神情形成巨大反差的是红卫兵的狂热，他们欢呼着、呐喊着走过天安门城楼，个人崇拜的狂涛巨浪席卷了天安门广场。这种场面与1933年1月30日柏林的火炬之夜【19】何其相似。

红卫兵不分男女，都身穿黄色的旧军装。不知是天太热的缘故，还是故意要摆出这副样子，每个人都捋胳膊挽袖子，刁蛮之像让人兵痞难辩。男的是清一色的小平头，女的多是超短发，也有的女红卫兵将自己剃成一个秃子以示革命。不知她们是怎样将革命和消灭女性特征联系在一起的。封建意识形态中男尊女卑的思想和带有宗教色彩的禁欲主义倾向那么自发地而又自然地毒害着少女的心身。如果当时可以做变性手术，这些女娃子们会毫不犹豫地躺到手术台上去的。站立时双手插腰。说话时国骂不离口，本来没有骂人习惯的人为了显示自己已经不再温良恭俭让，也要在讲话时生硬地带出几句“他妈的”来。走起路来乍着胳膊，象一只只横行霸道的螃蟹。而远远望去又更象一片专门啃噬绿叶的蝗虫。这是一股真正黄祸。它的肆虐虽然时间短暂，却在中华民族的近代史上写下了极其丑陋的一页。

红卫兵这个短命的怪胎一降生到这个世间就发出了两声惊世的怪叫：一声是“造反有理”；一声是“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

丑陋的口号

其实，第一个讲“造反有理”的是毛泽东本人。四十年代，毛泽东在延安各界庆祝斯大林寿辰的大会上发言，其中说道：“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对科学共产主义的这种抽象是否科学、严谨是值得推敲的,即使是面对陕北的庄稼汉。二十年以后，在清华附中红卫兵语无伦次，逻辑混乱的三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大字报中，“造反有理”四个字被重新诠释。今天重读三论《造反》，其立论之荒谬，论据之牵强，论述之无理当不必说。值得探讨的是：文章的作者小小年纪，吃了十八九年的粮食，书只读到中学，事还没有作成一件，那里来的如此了得的傲慢与嚣张。他们贵为金枝玉叶，即没有人压迫他们，也没有人剥削他们，到底有何反可造？

解放初期，有人曾告戒干部子弟要以史为鉴，不要重蹈满清八旗子弟【20】的覆辙。这种告戒固然用心良苦。希望干部子弟不要堕落当无可指责。但这种期望是以认定干部子弟应当享有特权为前提的。事实上，这种特权从共和国建国的那一天起就一直存在着。在如何对待下一代的问题上，超越历史的局限性，摆脱几千年封建社会形成的帝业子承的世袭观念，代之以天赋人权、平等竞争的思想，在那个年代是一种奢望。干部子弟从小就意识到自己不同于平常百姓家的孩子。和八旗子弟一样，他们是特权阶层，是精神衙内。傲慢与偏见简直就是与生俱来。没有人敢于无视和怠慢这种骄狂。但是，“文革”的实践证明，这种骄狂导致的行为比起他们的沉沦和颓废给社会给国家所造成的后果要严重的多！干部子弟是共和国的同龄人中生活条件最优越，政治待遇最特殊的一个群体。社会对他们的娇惯养成了他们感情用事，为所欲为的性格。当“文革”来临之时，他们本来有条件凭借自己特殊的社会地位所获得的便利去准确地揣摸领袖的用心所在，去理解“这场运动的重点是整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句话浅显的内涵，从而避免在这场以打倒自己父辈为第一目的的“革命”中的充当冲当冲锋队的角色。然而他们只是凭借自己想象去理解甚至企图左右这场“史无前例的大革命”。他们带上红卫兵的红袖标，高喊“造反有理”的全部意图就是要借“文革”之机，向社会向人民索取更大更多的特权，使自己不但可以享有凌驾于同龄人而且享有凌驾于全体人民之上的权利和地位。毛泽东最大限度地利用了干部子弟的这种骄狂。因为这种以无知和任性为特征的桀骜不逊不可能逃出忠君思想和个人崇拜的阴影。

毛泽东发动文革的最大的阻力来自一个社会正常运作所必须具备的秩序和法统。按照党章和宪法所规定的领导人产生和废黜的程序，就无法打倒刘少奇和一大批党和国家的领导人。用贫民造反的模式可以置一切法规于不顾。但是在的天下谁敢举旗造发呢？地富反坏右不敢，知识分子不敢，工人农民也不敢。历史选择了红卫兵。在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回信中，毛泽东肯定了“造反有理”的口号，使之成为“文革”中喊得最多，喊得最响的纲领性的口号。党纪国法，伦理道德在这个口号面前都显得苍白无力。从此，造反的祸水流遍全国，运动也从“有序”走向“无序”。

但是，中学红卫兵的失宠来得之快是连他们自己也意想不到的。《红旗》杂志十二期的评论员文章《红卫兵赞》中曾高喊“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红卫兵万岁！”，可是，从“八一八”到《红旗》杂志第十三期社论【21】发表不足100天的时间,“小将们”就从辉煌的颠峰上滚落下来。少爷小姐们也曾为此闹得乌烟瘴气，鸡飞狗跳，可是“造反有理”的接力棒还是不得不交给贫民出身的，与“走资派”没有太多血缘关系的蒯大富和王大宾【22】之辈。然而，属于“老三届”的红卫兵在“文化大革命”中首喊“造反有理”的口号，自觉地为这场浩劫推波助澜的历史“功勋”，堪称丑陋之最，是应该被写入史书的。

丑陋的对联

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是现代血统论的代表作。虽然谭力夫【23】极力兜售此货，但是它

的主要市场不是在大学，而是在中学校园。身为儿女，人皆有父母。对联的咄咄逼人在于没有人可以逃避，也没有人可以选择。

现在还无从考证是谁，也没有人出来表示自己应该享有对对联的发明权。但它是“老三届”的专利是不会有问题的。辛亥革命55年之后，如此荒唐的玩意儿在当时北京的每一所中学的校园里随处可见。封建主义的破烂货能够堂而皇之地登上社会主义正统思想的殿堂，究其根源，与中国没有经历过一个完整的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有关，与以“自来红”自称的干部子弟们在民主革命时期入党的爷娘头脑中还没有得到改造的农民意识有关。

解放以后，渗入社会生活每一个角落的阶级路线和以阶级斗争为大背景的社会教育深刻地影响了“老三届”。“文革”前夕，中学生之间已经没有友谊可言，人性的失落已见端倪。在很多学校已经出现“出身好”的同学自觉地，有组织地排斥、打击“出身不好”的同学的倾向。人为地挖掘阶级的鸿沟，人为地制造阶级斗争的对象。“文革”的到来，“对联”的出现，使上述情况恶性发展，最终演变成一场新种姓歧视的丑剧。

面对高悬的对联，非“红五类”（红五类是指革命干部，革命烈士，革命军人，工人和贫下中农）子弟的人格和尊严丧失殆尽。革命的诱惑与血统的卑贱在扭曲他们的人性。有一个女孩把社会对她的歧视转变成对母亲的仇恨，在对母亲拳打脚踢之后，勒令母亲跪在地上，用剪刀剪去了她的全部头发。笔者的一位“出身不好”的同学为了表明自己决心脱胎换骨的决心，不止一次地在对联的辩论会上狂喊：“我就是一个混蛋！”行文至此，他那张无血色的小脸，不知所措的眼神又浮现在我的面前。我不敢想象他是如何缝合这精神的创伤的。耻辱莫过于精神的自残。“文革”的丑恶可见一斑。

对联的出现使青年人本应五光十色的理想被抽象为对革命的图腾崇拜，而本应以解放全人类为最高境界的革命被转变为对家庭出身的攀比和计较。有的学校高干子弟云集，红卫兵组织将革命干部的标准定为：行政级别13级以上，入党时间在38年以前的人。于是，有一大批本来可以在人前显贵的干部子弟硬是被推入“职员子弟”的行列被搞得灰头土脸。而那些根正苗红，将别人斥责为“狗崽子”的“自来红”们的好景也不长。最大的讽刺莫过于这些“自来红”们的迟钝使他们根本没有意识到，这场运动的矛头所向正是他们日夜引以为自豪的老爹。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才发现自己正在完成一个被自己的逻辑所认定的，由“好汉”向“混蛋”的转变。

“对联”问世不久，“老三届”中不是“混蛋”的人已廖若晨星，还真有点“池浅王八多”的味道。直到1966年10月，才因“对联”的荒谬实在是显而易见，才由当时的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24】出面讲了几句无关痛痒的话。但是，血统论一天也没有停止过毒化人们的生活。

遇罗克烈士【25】因反对“对联”，撰写《出身论》而惨遭杀害。他倒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枪口下，他的血溅在“老三届”的身上、手上。遇罗克是中国20世纪后50年中出现的最勇敢，最杰出的思想者。他的绝笔“乾坤持重我头轻”一定会流传下去。但是他和他的诗不属于“老三届”。

今年是11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三中全会的深远意义随着时间的推移日益地为世人所认识。在纪念它的日子里，人们似乎忽略了三中全会作出的一个很重要的决定：摘去全部地主、富农份子的帽子，称他们为社会主义的劳动者。对与他们的子女来说，作一个不太恰当的比喻，这个决定犹如“解放黑奴”的宣言。他们终于可以挺起胸、抬起头和其他人一样在共和国的同一片蓝天下自由地呼吸。勒在上千万“剥削阶级”子女及其亲属头上出身不好的“紧箍咒”被摘掉了。以“出身”界定人的优与劣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

丑陋的作品

红卫兵不但有自己的口号也有自己的作品以表达自己的好恶。

32年前，红卫兵自己创作的以宣传造反精神为主题的歌曲简直多如牛毛。随着岁月的流逝，这些强音悍调也渐渐地被人遗忘。可是，有一首歌笨拙的旋律还经常出现在影视节目中。《造反歌》是“老三届”给历史留下的又一“杰作”。它的词曲作者不详，但它的“诞生地”应该是北大附中。

“拿起笔作刀枪，集中火力打黑帮。谁要敢说党不好，马上叫他见阎王！”所谓“黑帮”是1966年四，五月期间的《人民日报》对“三家村”【26】的称谓。后来被用来泛指所有被认为有必要被打倒的人。所谓“见阎王”就是夺人性命。不管“说党不好”的人讲得是否有道理，也不管是说党在某一个方面或是在某一个时期作过不好的事情还是说党在全局性的问题上有过不好的决策，总之，都要夺其性命。后来的事实证明，歌词中的誓言并不只是一种意愿的夸张表述，而是实际行动的写照。其实，这种危言耸听的提法并不是“老三届”的发明。“老三届”只不过是受到了林彪“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这种讲法的诱导，鹦鹉学舌罢了。在“老三届”长大成人的岁月里，法制教育是一个盲区。杀人夺命之事无需法律条文的认定，也不需要司法部门的核准，“文革”中他们就是这样作的。诗言志，歌也言志。无论艺术性还是思想性同父辈的《毕业歌》相比，《造反歌》是败笔。

中学红卫兵的思维走向和他们的价值取向多是通过大字报和自己办的报纸来表达的。他们贴出的大字报的数量是不可计数的，但是没有留下记录除了少数极端作品,如《三论造反》之类。而红卫兵办的报纸刊物虽然屈指可数，但保存下来的数量却很可观。一张大字报的出现往往与作者的个人在写作时的情绪有关而带有随机性，而报刊上的文章却要经过一群人的讨论比较能够反映一个群体的意志。出现在北京的红卫兵报纸有《湘江评论》《火星报》《莱茵报》【27】等。这些报纸除了顽固地、不厌其繁地贩卖“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的狗皮膏药之外，还有一个起喋喋不休的宣传主题，就是“镇压流氓”。红卫兵对流氓的关注始于红八月，而到了他们失势以后，向人民群众高喊一声“镇压流氓”也可以使自己心态趋于平衡。任何一位政治家，任何一个有理念的政治派别都不会把镇压流氓看作是政治斗争中的一件什么要紧的事情。更何况毛泽东。把“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镇压流氓”扯在一起实在是风马牛不相及。实际上，红卫兵心目中的所谓流氓是指那些家境贫困，上不起

学而又没有固定工作的社会青年。红卫兵对这些本应得到社会救助和同情的同龄人倾注了极大的仇恨看似难以理解，其实也很正常。说到底还是血统论——那个社会的新种姓歧视在作怪。

提到红卫兵的刊物应该提一下1968年初出现在北京中学校园的油印刊物《准备》。《准备》与人大附中的红卫兵极端分子有关。北京红卫兵与“中央文革小组”的矛盾早在一年以前就显露出水火不相容的态势，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简称“联动”）是“文革”中出现的第一支反江青的的政治派别。但是，在读过《准备》的全部文字之后，就会感觉到这份与“联动”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的刊物的指导思想是混乱的。《准备》在它的创刊号上刊登了一篇记实性政治小说，它被放在首篇的位置，小说的标题也是《准备》。小说以康生等待毛泽东批准发表聂元梓的大字报，准备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背景素材。小说的作者以细腻的笔调描述了中央文革所在地——钓鱼台的景致,表明了作者的身份非同一般干部子弟，作者在小说中借康生的头脑所进行的思维和当时官方对搞“文革”的必要性的解释没有任何不同。小说用尽美好的辞藻把康生——“中央文革小组顾问”描绘成一位忧国忧民的，与领袖肝胆相照的旷世之才。小说是这样结束的：通向主席办公室的红色电话响了，他（小说一直没有说出康生的名字）大步跨了过去，拿起电话说：“我是康生”。康生在“文革”初期通过他的老婆曹轶欧组织北大哲学系师生给校党委贴大字报以捞取政治资本的勾当在当时也不是什么新闻。康生，被外国人称为龙爪的人，在红卫兵的刊物上被喷涂，被神话恰恰说明红卫兵与“中央文革小组”的决裂只是利益集团之间的争斗，而不象有些人自吹的那样，是两种思想体系之间的对峙。

在“极右”的红卫兵思潮之后，“老三届”中浮现出来的“极左”思潮也同样没有挣脱“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的罗网。《一切为了“九大”》（上海）、《中国向何出去？》（湖南）、《论新思潮》（北京）、《今日向何方》（广西）等文章的出现表明，“老三届”中已经崭露出现国家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思想倾向，这个倾向的尽头就是无遮掩的法西斯主义。它的疯狂和歇斯底里使“中央文革”都感到恐惧。这种疯狂也被有些“老三届”自吹为反“文革”的先知先觉是没有一点道理的。这种自吹自擂尤其表现在最近国内外出现的一股研究“文革”异端思潮的热浪中，其作浪者的多数还是文革中的“老三届”。

丑陋的行为

红卫兵思潮的出现是一代人思想混乱的总爆发。而思想的混乱一定导致行为的疯狂。

“八一八”之夜，躁动的红卫兵为了报答领袖的召见之恩，为了实现建立功勋的梦想，他们迫不及待地向“旧世界”宣战了。数不清的事例证明，所谓“破四旧”【28】的锋芒所向是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化遗产。多少古迹被破坏，多少文物被焚毁。不肖子孙进行了一场名副其实的文化革命。这种行为不只是丑恶而是一种罪恶了。

在八月的红色恐怖中，人们闻到了浓浓的血腥味。残杀地富反坏右人员及其家属的事件每天都在发生。

北京六中位于中南海东侧、天安门西侧、人民大会堂南侧。在“红八月”中，六中红卫兵在校园里设立的“刑讯室”曾恶名远扬。对“阶级敌人”捆绑吊打是家常便饭。甚至将滚烫的开水倒在一位76岁的老工人的身上，在老人的残叫声中红卫兵们和以魔鬼一样的嚎笑。

北京东安市场内的吉祥戏院也是历史的见证：鲜血染红了舞台，鲜血染红了幕布。舞台上上演杀人的活剧，舞台下爆发出嗜血者的欢呼。

首都红卫兵在大兴县向地富份子及其子弟举起了屠刀。被杀死的人，最年长的80岁高龄，最年幼的仅出生38天。被满门抄斩的有22户人家。

这种杀人的游戏，以“红八月”为始端，在不断升级的阶级斗争的大背景下愈演愈烈。广西省出现的“贫下中农最高法庭”公然提出“斩草除根一扫光”的口号，肆意杀戳“四类份子”和他们的后代；湖南省道县、邵阳县等地在光天化日之下集体屠杀地富及其子女。

打、砸、抢、抄家之风刮遍全国。中国社会的基本人权指数已接近零。住在在协和医院宿舍的一青年孕妇在“红八月”被抄家时同时被强奸，施暴者是革军子弟，年仅14岁。如果“文革”博物馆真的建立，应为“红八月”独辟一个展室，让后人不要忘记这即丑恶又凶恶的一幕。

如果说制造“红色恐怖”是少数极端分子的行为，那么对教师的人身和人格的侵犯则是“老三届”的群体行为。“老三届”在“文革”中最先攻击的对象就是曾在他们身上倾注了大量心血和厚爱的老师。学生对老师的侵犯是全方位的。辱骂，批斗，殴打几乎成了家常便饭。有些学校的“老三届”甚至将老师活活打死。例如，原北京师大女附中（现在的实验中学）的校长卞仲芸女士【29】就是在本校的操场上被一群十六七岁的女中学生活活打死的。这种学生将老师打死，逼死的现象在当时是很普遍的事情。许多经历过“文革”的老教师提起往事仍然不寒而颤。有人说“老三届”是用狼奶喂大的，这种比喻并不过份。十七年的阶级斗争教育，不断进行的对“人性论”的批判使“老三届”缺少爱心，崇尚兽性。一旦土壤适合，就会开出血淋淋的恶之花。遗憾的是，“文革”过去32年了，“老三届”中没有人出来认领和忏悔这一份罪恶，向老师们，向死者的家属，向全社会说一声对不起。这在道义上是讲不过去的！

1998年夏天，原师大女附中的一位“老三届”从美国斯坦福大学再次回到北京。和前几次一样，她是为在“文革”中被打死的中学老师而来。早在20年前，她曾去探望被她的同学打死的老校长的家属。她是唯一一位来探望死者家属的师大女附中的学生。10多年前，她在《女性的野蛮》【30】一文中再次重提往事，作为围观者“我站在操场上，看着这一切。我什么也没有做。如果一个人对自己身边发生的罪过未加制止，那么就是罪恶的同谋——但是我在十年之后才学会了这句话”,这是来自老三届的第一声忏悔，只是声音太微弱了。卞校长的死和她没有任何关系，是什么东西驱使着她对自己发出如此强烈的自责呢？是一个人的没有泯灭的良知。说“老三届”是丑陋的，是

因为在“老三届”中象这样良知未泯的人实在是太少了。

“老三届”是共和国的同龄人，历史却让他们遭遇了“文化大革命”。在回忆和共和国共同成长的经历时，往往使他们的内心产生阵阵的疼痛。他们不能忘却那如烟的往事，但在公开的场合却要回避使自己陷入窘境的话题。历史是不好随意涂抹的。“文革”中展现出来的也并不只是某些个人言和行的丑陋，而是全民族的弱势和劣根性。消灭这种弱势，铲除这种劣根性必须从每一个人作起。文过饰非不能根治民族的顽症。

四.请做如是说

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代表人物。“老三届”也不例外。探寻这些代表人物的足迹可以窥见和理顺“老三届”思想的脉络。这些年来，偶尔也能读到一些他们回忆往事的文字。但是其中流露出来的忏悔之意不多，炫耀之意不少。最近，我曾从朋友手中得到陈永康（笔名：咏慷）先生的自传体小说《青春殇》。我抱着极大的兴趣，用十个小时，一口气读完全书。掩卷之时已是深夜。陈永康先生当年与刘少奇的女儿刘平平同为北京师大附中的学生，因反对工作组名震京城，有“中学蒯大富”之美称（反工作组的蒯大富与刘少奇的大女儿刘涛同为清华大学的同学）。作者是当年政治旋涡中的人物，他曾因与“中国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女儿为政敌而中得“大彩”，今天他却没有采用回忆录的形式，直述当年的往事和今天对那段历史的在认识，而是采用了小说的形式，真真假假，虚虚实实，也许有他的难言之隐。而整部小说的文字，以《后记》中的表述最能概括作者对自己，对红卫兵运动和“老三届”的评价：

“他们虔诚地在信仰的祭坛前奋斗牺牲，坚韧地在灵魂的炼狱中忍受熬煎，向往献身，期待着历史的承认。他们火热的革命热情，对祖国前途，对人类命运‘舍我其谁’的高度责任感，恐怕会永远载入史册，另人感奋。”“没有悲剧就没有悲壮，没有悲壮就没有崇高。”应该坦率地承认，读到这样的文字，我失望了，深深地。

“文革”过去三十年了，写出这种的文字，能向历史交代吗？

不知陈永康先生当年的“战友”、现居美国的何芳芳女士对“文革”的认识停留在什么样的水平上？

我在猜测。

也许，再过一些年，能够看到以下曾经有着全国影响的“老三届”或者是他们的亲属写出的，有着较高境界的文字，一定会感到“非常有趣”（“老三届”，作家王小波的习惯用语）。而另一方面，又很有一些人，一以“成功者”最为典型，无视这些“代表人物”的历史存在，不承认这些“代表人物”的典型性思维和言行集中反映了那个年代“老三届”的世界观的基本轮廓，以证明自己在那场浩劫中做到了洁身无垢。这种辩白实在是多余。

这些代表人物是：

1965年撰写《获取5分的“秘诀”》，北大附中“老初三”的学生宫小吉；1966年6月给党中央写信主动要求停课闹革命并自愿放弃高考的北京四中和北京女一中的部分“老高三”的学生；1966年六月在清华附中贴出三论《无产阶级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大字报的卜大华，骆小海和王铭；1966年8月18日代表北京红卫兵在天安门上讲话的，北大附中“老高一”学生彭小蒙（女）；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将其名字“彬彬”改为“要武”的，原师大女附中“老高三”学生宋彬彬（女）【31】

1966年9月组织起来的首都红卫兵西城纠察队首领，北京四中“老高三”学生孔丹；1966年“八一八”之夜起草《向旧世界宣战的最后通牒》的，也曾代表首都红卫兵在天安门上讲话的，北京二中“老高三”学生冯晓新；1967年春天，由“中央文革小组”批准成立的“北京中学生红卫兵代表大会”（简称“中学红代会”）领导成员：北京25中“老高三”学生李冬民，北京二中“老高三”学生刘龙江，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老高三”学生陈永康，清华附中“老高三”学生刘刚（女）；1967年在《四.三战报》创刊号上撰文《论新思潮》的作者（原良乡电校学生）

1967年秋天去内蒙牧区插队的“十男十女”；1968年在湖南因撰写《中国向何出去》一文被判有期徒刑10年，原长沙一中“老初一”学生，现在居住在澳洲的杨曦光（现名杨小凯）；“上山下乡”运动中的全国性标兵：孙立哲（北京），董良鬲（北京），丁爱迪（北京），朱克家（上海、中国第十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蔡立坚（北京，女,已故）；柴春泽（辽宁）【32】

1973年在招收“工农兵”大学生的考试中“交白卷”并力呈“知青”现状的张铁生（辽宁），精神病患者，朦胧诗开山之作《相信未来》的作者，北京某中学学生郭路生；原北京四中“老高三”学生，朦胧派诗人，现居住在美国的赵振开（笔名北岛）

1976年1月在《人民日报》发表长诗《理想之歌》的作者（北京大学中文系部分“工农兵”大学生）；还有：

1966年在广州参加红卫兵，现居住在美国的王希哲；196 6年在“人民大学附中”参加红卫兵，现居住在美国的魏京生；等等，等等。

五．结束语

有人曾用“青春方程式”【33】这种时髦的提法来涵盖“老三届”复杂的青年时代。如果一定要用数学语言来描述“老三届”心路历程的话，就应该这样来描述：

这个以时间为自变量，表征人生价值取向的函数不是一条连续曲线。它有着如此多的间断点而显得那样支离破

碎。它有着那么多的拐点，表明它的走向盲目多变，前后不一致，尽显其价值观的浅薄和世俗。在它的全部定义域内，只出现过一个绝对值看似辉煌的极大值，遗憾的是它却落在了负值区间，随之而来的是一个又一个的低谷。它不是一条递增曲线，随着岁月的流逝可以构造起一个另后人羡慕的人生，积累起比物质财富更具诱惑力的精神财富。在这个人生的坐标系中，彻悟是一条无形的渐近线。逼近它需要时间更需要勇气：时间用于思考和反省，勇气用于直面那不堪回首的过去。【34】

“老三届”这三个字本身散发出来的历史气息，已不需要在使用它的时候再对其进行任何修饰。这一代人的历史形象应该定格了。诸多已经被经过反复推敲后使用的定性句语，例如：“独特的一代”（乐黛云）【35】、“最具悲剧色彩，也最为尴尬的一代”（李辉）【36】、“在从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的进程中不可避免地成为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一代”（丁东）【37】、“在那邪恶与崇高交织时代中所成长起来的‘老三届’只有他们才在理想境界与创造魄力上与20年代知识分子相匹敌”【38】等等，都没有准确地定位历史上的老三届。选择“丑陋的老三届”这样一种清晰而简捷的提法是比较客观、比较恰如其份的，道理很简单，因为那个时代是丑陋的。

我曾将本文的初稿念给我刚上高中的儿子听。念罢，我问儿子作何感想。他沉思片刻，说：“是挺丑陋的。”低调评价“老三届”就是要具体地，一点一滴地否定和批判“文化大革命”，为了使这民族的悲丑剧不要再重演。

1998年12月13日初稿 1999年1月1日终稿

注释：

【1】保尔·柯察金：前苏联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的主人翁。

【2】“工农兵”大学生：从1970年到1976年入学的大学生。他们入学是由基层推荐而不比经过试。

【3】1969年7月21日美国“阿波罗”号在月球登陆。美国宇航员阿姆斯特朗等登上月球。

【4】《理想之歌》：刊登在197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诗集《理想之歌》上。“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时期又被1976年1月25日的《人民日报》转载，作为回击“翻案风”的有力武器，并加“编者按”全文如下：

“《理想之歌》是北京大学中文系部分工农兵学员一九七四年集体创作的政治抒情诗。它反映了广大知识青年在上山下乡和教育革命中锻炼成长的精神风貌。在当前教育战线大辩论中，清华、北大等院校的同志一再朗诵、阅读这首朝气蓬勃、激情洋溢的诗。这说明，它符合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教育革命胜利成果这一斗争需要。本报刊登这首诗，以供更多同志阅读，并用以回击教育界右倾翻案风，批驳那种攻击工农兵学员‘质量低’之

类的奇谈怪论。”【5】《雷峰之歌》：贺敬之的长诗，发表与1964年。

《三门峡梳桩台》：贺敬之的诗。发表与50年代后期。

【6】《相信未来》：创作于1967年，作者郭路生。这首诗被认为“朦胧诗”的开山之作。

【7】女一中高三（四）班的信刊登在1966年6月18日的《人民日报》上。

【8】“十男十女”去内蒙牧区插队的消息刊登在1967年10月11日的《人民日报》第一版上，标题是：“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走同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道路——北京一些革命小将自愿到内蒙当普通社员”。

【9】“走后门”：社会常用语。用于形容做事不经过正当渠道去办，而是通过人情关系去完成。

【10】《中国知青梦》：是四川知青邓贤以云南知青生活为素材的长篇报告文学。

【11】“张铁生”事件：在1973年招收第一届“工农兵”大学生的考场上，辽宁省“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张铁生在考卷上写下了一段乞求上学的文字。这一事件被“四人帮”大肆渲染。刊登在1973年7月19日的《辽宁日报》上，后又被《人民日报》转载。

【12】“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是指北京大学哲学系教师聂元梓1966年5月25日在北大校园贴出的攻击校党委的大字报。6月2日有毛泽东批准刊登在《人民日报》上。后来，毛泽东将其称为“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

【13】“炮打司令部”是毛泽东1966年8月5日写下的一段文字。题目是《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其中例数刘少奇的所谓“罪状”，打倒刘少奇的决心尽显其中。全文如下：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啊！请同志们重读一遍这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可是，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威风，灭无产阶级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到1962年的反右倾和1964年的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省的吗？”【14】北京清华附中红卫兵：1966年5月29日清华附中的若干干部子弟在圆明园集会成立第一个红卫兵组织。他们写的三论《造反》的文章和毛泽东写给他们的回信都被刊登在1966年第11期《红旗》杂志上。

【15】《收租院》：一组大型泥塑。以解放前四川大邑县地主刘文采的庄园内的收租院向农民收租的情景为素材，塑造了一群受压迫受剥削的穷苦农民的形象。

【16】《红岩》：罗广彬、杨益言的长篇小说，1962年出版。描写国民党特工人员残害、屠杀共产党犯人的故事。

【17】“学习雷锋”运动：1963年3月5号毛泽东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由此开始了学习雷锋的运动。在这个运动中有两种潮流。一是倡导一种公而忘私、舍己为人的社会风气；而另一种潮流是以林彪为代表的，提倡用实用主义的方法去学习毛泽东的著作。

【18】《获取五分的秘诀》：刊登在1965年六月的《中国青年》杂志上。

【19】“火炬之夜”：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当选德国总理。纳粹青年在柏林举行火炬游行。

【20】“八旗子弟”：满清皇族分为八旗。正黄旗、正蓝旗、正红旗、正白旗、镶黄旗、镶蓝旗、镶红旗和镶白旗。他们的子弟统称“八旗子弟”。“八旗子弟”在建立满清王朝的过程中冲锋陷阵，功勋卓著。入关后，吃喝玩乐，沉溺酒色，一蹶不振。

【21】“红旗”杂志第十三期社论：1966年第十三期《红旗》杂志发表社论，提出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表明刘少奇的地位已经岌岌可危。

【22】蒯大富、王大宾：均为“文革”中北京的“五大学生领袖”之一。

【23】谭力夫“文革”中北京工业大学学生。曾发表过鼓吹血统论的讲话。

【24】陈伯达讲话：1966年10月在中央召开的工作会议上所做的《对两个月来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总结》。其中有谴责“对联”的言辞。

【25】遇罗克：“文革”前毕业的高中毕业生。“文革”中撰写多篇反对“对联”的文章，最著名的是《出身论》。1970年3月5日被北京公安局军事管制委员会判处死刑。

【26】“三家村”：“四人帮”对邓拓、吴晗、廖沫沙的称谓。“文革”就是以对这三个人的迫害而开始的。

【27】《湘江评论》《火星报》《莱茵报》：北京红卫兵的铅印报纸。《湘江评论》出版于海淀区，《火星报》和《莱茵报》出版于西城区和东城区。

【28】“破四旧”：1966年8月18日北京二中红卫兵向社会散发、张贴《向旧世界宣战》的最后通牒的传单，开始了席卷全国的“破四旧”运动。1966年8月26日的《人民日报》转载这份传单。转载时，将原文中过分激烈的言辞删去了。“破四旧”是“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和旧习惯”的简称。

【29】卞仲芸：抗日战争时期在成都“燕京大学”读书时加入外围组织。后奔赴解放区。“文革”中以北京师大女附中校长的身份被本校学生野蛮毒打至死。其骨灰现存放八宝山革命公墓的骨灰堂中。

【30】《女性的野蛮》：散文集《女博士生手记》中的一篇，文章记述了卞仲芸校长被残害的经过。作者王友

琴，“文革”中是北京师大女附中的初中学生。

【31】宋彬彬：1966年时，是师大女附中“老高三”的学生。“八一八”那天以首都红卫兵代表的身份给毛泽东戴上“红卫兵”的袖标。并在1966年8月20日的《光明日报》撰文《我给毛主席戴上了红袖章》（《人民日报》第二天全文转载）。全文见附录。

【32】孙立哲、董良鬲、丁爱迪、朱克家、蔡立坚、柴春泽：均为“上山下乡”运动中的全国性标兵。他们的“事迹”均在《人民日报》上进行过宣传。

【33】《青春方程式》：1995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知青回忆录。其中收录了50位北京女知青的回忆文章。

【34】“间断点”、“拐点”、“极大值”、“递增曲线”、“渐近线”属于一元微积分“函数”一章中的基本概念。

【35】摘自乐黛云为《青春方程式》所写的“序”。

【36】摘自李辉的《残缺的窗栏板》。

【37】摘自丁冬的《与李辉书——对红卫兵、老三届的一些反思》。

【38】摘自尤西林的《文革境况片段》。

华夏知青网不是赢利性的网站，所刊载作品只作网友交流之用
引用时请注明作者和出处，有版权问题请与版主联系
华夏知青网：http://www.hxzq.net/
华夏知青网络工作室

点亮知青思想之烛的人们

我的纪实性小说《随记光阴》出版后，有媒体记者采访，问，知青从城市到农村，经过几年生活、劳动，最大的变化是什么？是不是更现实，更务实了？我回答，我觉得知青最深刻、最有价值的变化，是思维方式的转变，抛弃了原来教育、宣传所教授的思维，在亲身经历中形成自己的一套思维方式，使他能够比较真实的看待现实，思考现实，用一种务实的态度做人、做事。

人们可能不会想到，在那个年代，那些点亮知青思想之烛的人，可能并非教人以“思想”、“主义”者，而是另外一些人。

我们下乡后，公社专门发文规定：知青每个月政治学习一次，脱产、全天、集中学习，工分照记。

不干活还记工分。于是，我们大队的知青每个月集中学习一次，雷打不动。大家凑到一块，热热闹闹过一天。

学习地点设在大队部。有时候学习，生产队长老砖头就溜过来视察，笑眯眯的看着一群不干活光闲聊还能拿工分的学生，感慨“你们这是共产主义嘛，不干活光吃饭，和五八年差不多。”我们就请他讲什么是共产主义。

老砖头说，五八年就说共产主义实现了，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叫我说，那不是共产主义。

我们一听，觉得他可能有更高的境界，也未可知。便请他谈自己的看法。

老砖头吸口烟，说，五八年那时候，说已经到共产主义了，食堂吃饭不要钱，一天三顿吃干的，吃了个屌蛋净光，第二年就开始饿死人，咱代营算死人少的，也有百十口子，死绝的也有十几户，咱队承贺他兄弟，饿得爬到场边，大把大把吃豌豆，吃了一肚子干豌豆，又爬到场边的水沟喝水，没有起来，撑死在沟边……这叫共产主义？我们听得目瞪口呆，心惊肉跳。屋子里一片沉寂。

上小学时，我家隔壁邻居是新华社记者，我曾隐约听他讲过自然灾害期间在信阳乡下采访，路上、沟边，到处是饿死的人，汽车堵得走不动。我还将信将疑，现在是共产党领导，是社会主义，怎么会死那么多人？而且还是饿死？

现在听老砖头讲，而且有名有姓，还是我们队的人，始信灾荒期间饿死人，确有其事。

我们虽是知青，却都知道“三年自然灾害”，经历过低标准、瓜菜代的学生生活，也听说过一些事实。但是，老砖头对我们讲的不仅是事实，使我们心惊的，是他对那个年代毫不留情的否定和批判，他把三年自然灾害作为诉苦的年代，公开的、明目张胆讲出来，完全不给“主义”、“成就”一点面子，完全不把“专政”、“阶级斗争”放在眼里。我们从未听过这样直白的语言。尽管老砖头无比热爱毛主席，“红宝书”随身带，张口就是“毛主席说”，但是在吃饭问题上，他从不含糊。那是他饿肚皮得出的教训。

有一次学习，赶上大队支部书记海宽过来，自报奋勇和我们一块儿学。只见他念语录，讲形势，忆苦思甜，虽滔滔不绝，却无多少新意。

讲完大道理，海宽说，我总在想一个问题，却不得解。

他说，闹土改时，把地主的土地分给农民，过了几年，又把土地从农民手里收回来，走合作化道路。

他问我们，毛主席要是早知道以后合作化，为啥费事先分地单干，干几年再收上来？

我们非常吃惊，一个农民，尽管他是大队支书，但毕竟还是农民，世代乡村，头顶一片天，脚下一块地，居然有这样的想法，而且还要把这想法与毛主席的思想搭起来，对毛主席质疑！大家面面相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当时，我们也不理解海宽提这个问题的意思（估计他自己也不知道），只知道这是个政治话题，隐隐有些害怕。但是，他以后几次提到这个问题，遂成为我们经常讨论的话题。有意思的是，这个话题成了我们讨论社会、政治话题的引子，带出一些比较深入的讨论和思索。

为管理知青，公社成立了知青办。第一任知青办主任是个女的，据说原是妇女干事，姓王，三十多岁。王主任经常跑乡下，到各知青点视察。估计她要按月写报告给她的上级，不得不往下跑。

王主任第一次视察我们大队知青的政治学习时，绷着脸，抿着嘴，很严肃的样子。我们嬉笑，说闲话，她就念语录，闹得厉害了，就拉着脸批评，也不留情面。她长得不漂亮，干瘦，脸黑，又穿一身黑衣黑裤，农村妇女一般，我们都不喜欢她。

但是，在一起混的次数多了，彼此也有了解，她也知道我们谁叫什么，也就不再板着脸了。我们也愿意和她说话。

有一次学习，我们念自己接受“再教育”的思想汇报。我拿着写好的稿子，念到“刚下乡时，连韭菜和麦苗都分不清”时，王主任居然呵呵笑起来。她笑的声音好听，刚刚的，像铁勺子敲锅边（不是刮锅底）。

她一面笑一面指着我说，笑死人了，你说韭菜、麦苗分不清，一看就是瞎编。

大家便七嘴八舌说，我们在学校听报告，看书，都是这么说的，知识分子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学生下乡认不得韭菜和麦苗。

王主任收起笑，很正经说，韭菜长在菜地里，麦苗长在大田里，咋分不清？保不准你到地里干活，看见大片麦苗，说这是韭菜，你傻啦？到了菜地看见一畦两畦韭菜，你说这是麦苗？你们这些学生，是精还是傻啊？怪不得毛主席把你们送到乡下来！听人家说？人家说煤球是白的你也信？

王主任的话，连讽刺带挖苦，却像轰雷一样隆隆响，把大家震呆了。

原来，教育我们多年，使我们自惭、自卑的“韭菜麦苗分不清论”根本不存在，是道伪证。这个问题在现实中既然不会发生，也就没有了意义。即使叫你去地里专门识别这两样东西，一个在菜地里栽着，一个在大田里种着，即使没有到过农村的人，也能分出哪个是哪个。

王主任有时候把全公社的知青集中起来学习，还请领导讲话。有一次，一位县革委副主任在公社参加大小队三级干部会，王主任便请他给知青讲形势。副主任谦虚一小会儿，说，我给大家讲讲国际形势吧。就讲起来。他说，刚才我在三级干部会上讲亚洲的国际形势，我说，南朝鲜佐藤政权（当时的南朝鲜总统是朴正熙，佐藤是日本首相）……知青们听得哈哈大笑，从此见面称主任“佐藤”。

还有一次，王主任请公社革委会主任给知青讲话，主任讲起本公社远大前景，兴奋起来，褪了鞋，稳稳的蹲在一根条凳上，说，过不了几年，咱们就到了共产主义，早上喝牛奶，晌午吃饺子，喝汤（晚饭）时候吃肉，那时候都不吃馍了，吃面包。

知青们听到如此生动描述，都笑起来。一旁的王主任看见知青们笑，以为主任讲得好，知青们高兴，马上过来给主任续水。主任看见知青们笑，也以为自己讲的好，王主任又来续水，他便一副乐不可支的摸样。

写到这里，王主任笑眯眯的样子浮现在我眼前。她是好心，事先也不知道领导讲什么内容，更不知道领导的讲话对知青有什么影响。一切都在不经意之间，影响就产生了。我们大队的知青说起她，都真心感谢她，她使我们知道了什么是真实，什么叫实话。

1970年春节后，我在本地一个水利工地当民工，挖河渠。

县里把民工组成民兵团，县革委会主任亲自充任团长。公社成立民兵营，我们公社带队的营长姓陈。陈营长是志愿军出身，善打硬仗。

挖河是项大工程，河床越挖越深，每天的活儿就是把河床的泥土用架子车运到河岸，再送到远处堆积。河坡几

十米长，30度的斜坡，人力拉车上坡已经非常艰难了。这时候，一种叫“爬坡器”的设备出现了。爬坡器是一个金属架子，有几个大小齿轮，带动一根钢索。爬坡器安置在坡顶，钢索一头固定在坡底，上坡的架子车将一个铁钩挂在爬坡器的钢索上，爬坡器转动，钢索将车子慢慢拉到坡顶。

但是，爬坡器数量有限，大家都抢，竞争激烈。最后，我们营没有抢到。

陈营长觉得很没有面子，便召集能工巧匠开会，献计献策，自己挑灯夜战，画图纸，左比划右比划，设计出一台木制爬坡器，几个木轮子套上皮带传动，手扶拖拉机做动力，拉着一根粗麻绳。实验结果，能把一辆满载泥土的架子车拉到河岸上。

此事马上轰动全团。团部领导来视察。还没走到跟前，远远看了一眼就赞不绝口，说，这是文化大革命的丰硕成果，是我县50万革命群众响应毛主席“三线建设要抓紧，就是要同帝修反抢时间”号召的生动体现，要向党中央、毛主席报喜！领导当即决定，在我们营开现场会，大力宣传、推广。

陈营长听领导说要向毛主席报喜，激动的心“砰砰”跳；转耳朵又听说要在本营开现场会，马上心跳停止，傻呆了。他心里清楚，那个木头爬坡器是个摆设，实验一两次可以，实用根本不行！

一辆满载泥土的架子车一千多斤重，一台爬坡器少说也要挂七八辆车，从河床爬到河岸，且不说木头架子、麻绳能否经得起这上万斤的重量，就是一台9匹马力的手扶拖拉机，动力也不够啊！

本来，陈营长做木制爬坡器的目的，想倒逼团部，早点分到一台金属爬坡器，现在可好，弄假成真。

眼看要出大事！陈营长思量再三，又与几位心腹合计得失，万般无奈之际，只好亲自去团部自首，自陈欺君之罪，但求免死。

团领导听陈营长说完真相，呵呵冷笑，说，你骗得了谁？那个木头架子，我老远一看就知道是个摆设。又训斥陈营长，不好好干活，不想下死力气，尽想花哨糊弄人！

团领导训斥完，又好生安抚陈营长，说，成绩是主要的，这个木制爬坡器也算新生事物，所以现场会还是要开，要给大家鼓干劲，抓革命，促生产，革命是第一位嘛，现场会主要是讲成绩，演示是次要的。

只要有一辆架子车爬到坡顶，就是成绩，就是胜利！团领导说。

现场会那天，陈营长专门选中我和另外一个民工搭伴“表演”，我驾辕，他曳梢。开始表演时，在河床下摆着几辆满载泥土的架子车，依次排队。我排第一名。爬坡器启动后，我的车挂上绳索，慢慢向上爬，后面几辆车，跃跃欲试的样子，但没人敢挂；爬坡器开一会，我的车在坡上走几米，爬坡器便挂“空挡”，车在坡上停下，我按规

定向参加现场会的人群招手；河岸上，陈营长给大家讲怎么发明，怎么创新，挑灯夜战，老中青三结合，还有知青在广阔天地练红心积极贡献聪明才智；团部多方帮助，领导下基层指导工作，与广大民兵一起学唱样板戏；他嘴能说，手也能比划，绘声绘色，加油添醋，中间穿插着几段“骚侃子”（黄笑话），现场会开得生动活泼。

手扶拖拉机又蹦又跳，喷着大股浓烟，爬坡器咯吱吱响，左右摇晃。我的一辆车慢慢被拉到坡顶。团领导带头鼓掌，周围响起掌声和胜利的欢呼。

我站在河岸上，看着下面宽阔的河床，远处的青山、田野，蓝天和白云，心里无比感慨，对毛主席“农村是一个广阔天地”的教导有了全新认识。

2012-11-13

作者博客：http://blog.sina.com.cn/u/1824470527

乔海燕文集：http://www.hxzq.net/showcorpus.asp?id=230

华夏知青网不是赢利性的网站，所刊载作品只作网友交流之用
引用时请注明作者和出处，有版权问题请与版主联系
华夏知青网：http://www.hxzq.net/
华夏知青网络工作室

老三届是新中国历史上传奇的一代（2013修改本）

历史的长河容易淹没人们的记忆，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老三届却以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的气势，为历史留下可供评说，且有自己丰富传奇的独有经历。

老三届是指中国"文化大革命"爆发时，在校的1966级、1967级、1968级三届初、高中学生。老三届大都出生在共和国创立前后，他们的成长经历了反右、大跃进、庐山会议、三年自然灾害、中苏论战和文化大革命。老三届的青少年阶段处在中国社会矛盾突出，党内斗争异常的历史阶段，也是新中国20世纪罕见的阶级斗争暴风骤雨年代。

老三届在历史的风浪中磨练成熟，特别是经历"文化大革命"巨变和苦难漫长的"知青上山下乡"。在命运的抗争中，在生活的风风雨雨中，许多人成为了社会中的中坚，绝大多数人在平凡的岗位上以他们特有的责任感支撑起共和国的蓝天。在中国结束"文革"动乱浩劫的抗争中，在举世瞩目的中国三十年改革开放的伟大巨变中，老三届这一代人，为自己的祖国和民族做出过历史性的积极贡献。

一、英雄主义的情怀

老三届大都是新中国创立后第一代儿女，他们诞生在共和国的礼炮声中，成长过程中大都受到英雄主义的熏陶。教科书和接触的文艺作品中也多是英雄主义的题材。董存瑞、赵一曼、江姐、欧阳海是他们学习的楷模。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长征组歌、黄河大合唱是他们生命交响曲。《南征北战》《渡江侦察记》《英雄儿女》《铁道游击队》等电影中的英雄成了他们理想的追求。英雄主义的激情,既造就了"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盲从冲动，也成就了他们负有国家责任感的牺牲精神。由此出发就不难理解，上海知青金训华大河中抢捞木材牺牲，天津知青张勇为救落水羊群而献身，内蒙古花季年华女知青们，为救一场无碍大局的荒火血染黄沙。从珍宝岛中苏之战到中越自卫反击战，处处可见老三届的军人和知青英勇杀敌，为国捐躯的故事。英雄主义情怀是老三届的一大特征。

二、跌宕起伏的人生

和平年代何曾有过那一代人有老三届这样大起大落的人生。1966年8月18日，多少穿着父辈军装的中学生在天安门城楼上，他们戴着红卫兵袖章，亲密簇拥在共和国开国领袖们的身旁，欢呼雀跃指点江山，为"文革"鸣锣开道。但是他们何曾想到，他们中大多数人的父母,随后也成为"文革"迫害的对象。5个月后，他们中的联动成员悲壮的在北京西直门古城楼，赫然贴出大标语，"中央文革将我们逼上梁山，我们不得不反"。一夜间根正苗红,被中央文革称之为"小太阳"的老红卫兵的骨干成为了阶下囚。

公安部门前，两派中学生剑拔弩张的抗争，长安街上,数以千计穿着各式军装男女红卫兵的自行车队呼啸而过。北京展览馆两派中学生,激烈辩论的场面愈演愈烈，"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竟是十几岁的孩子们争论的焦点。1967年取而代之的中学造反派红卫兵，他们也是血气方刚的中学生，为了反抗昔日同学压迫揭竿而起，他们反血统论要求生存平等。其代表人物成为文革领导者们,在人民大会堂经常召见的座上宾，纵论国事推动文革，他们中的一些人，也很快为文革中当权者利用，沦为所谓炮打资产阶级司令部的过河卒。而一年之后伴随着工宣队、军宣队开进清华大学，从大学的五大领袖,到中学各派红卫兵头目，霎时间成为追捕"五一六"分子的对象。曾经少年壮志、自信满满的老三届，从天上回到人间，顷刻间,成为被逐出城市上山下乡知青的主力。

三、苦难悲壮的经历

多数老三届都经历过苦难，三年自然灾害时忍饥挨饿是多数人的记忆。"文化大革命"风暴无情的冲毁了老三届求学的校园。除少数幸运者能去当兵或进工矿外，多数人都被卷进上山下乡的洪流。在遥远的边疆、在贫困的山村、在艰苦的农场、在荒凉的草原、在许多缺少现代文明基本生存条件的地方。1700万知青，包括老三届和他们之后的多届毕业生（许多人只能勉强算小学毕业），将青春永远留在那里。在生存权利无法选择的年代，许多人面临着不仅仅是劳作和生活的艰辛，他们更多背负着父辈们在政治斗争中的冤屈，被作为政治异类变相劳改，其离乡背井的痛苦和返城的艰辛是后人难以想象的。著名知青作家肖复兴所著《绝唱老三届》中说，1987年秋统计表明，到北大荒知青有40万，陆续返城的36万，还有3.7万星星点点落在北大荒辽阔的黑土地。这个数字大而化之，在全国范围就更可想而知了。新中国建国后，有哪一代人经受过这么多苦难，除了老三届和有过知青经历的人们外，恐怕是少之甚少。包括老三届在内的中国知青一代人，用自己的青春热血，垦荒种地、修路建房、教书育人、治病扶困。他们为农村带去了先进文化和现代文明，为偏远农村和城市架起了沟通的人文桥梁。虽然，这种贡献各地情况不尽相同，但大多数的农民对知青在农村中的贡献至今念念不忘。这是知青经历中苦难与辉煌并存的一章。

四、"文革"动乱的责任

老三届是"文化大革命"时期红卫兵的主力人群。1966年5月29日，清华大学附中部分学生，在圆明园成立了红

卫兵，在伟大领袖和中央文革支持下，以干部子弟为核心的红卫兵运动席卷全国。造反有理，革命无罪成为冲击党政机关，揪斗所谓走资派的上方宝剑。国人中所谓的地富反坏右和广大知识分子成为革命对象，为创建新中国建立过功勋的各级干部，也大都成为这场革命的对象。善良的中国人被打成牛鬼蛇神，许多人含冤而死。而除了少数没有人性的肇事者，良心该受到拷问外，更多的责任不该归咎当时只是十几岁孩子的红卫兵，这是国家制度和时任领导者该承担的历史责任。我欣赏我的同龄人中有人反思"文革"时，能承担责任，勇于向历史道歉。我反感那些至今还用"文革"思维，"文革"语言，自持一贯正确，贬低别人，抬高自己的人们。

"文革"的发动者和领导者在不同历史阶段，利用不同学生组织，推进他们的政治目标。按照他们政治目标去做的，他们称之为革命组织，不按照他们政治目标去做的，他们称之为反革命组织。对于异己者，马上动用军队、警察、监狱、国家专制机器进行镇压。"文化大革命"是领袖左右群众运动，还是群众运动绑架了领袖，经历者都该清楚，"文革"中的群众运动的挑起都是领导者所为。"文革"中的群众组织，老红卫兵也好，造反派红卫兵也好，不过都是"文革"领导者手中的工具。因此，将"文化大革命"的罪责，加在当时还是中学生的老三届身上是不公平的。当然少数"八旗子弟"凶残成性，丧失人格的法西斯行为也为世人唾弃，一些打手后来暴死他乡或精神分裂，也应该是一种报应。

五、先天不足的缺失

老三届和地球上任何一代人一样，都有这一代人的优点，也有他们的缺失和历史局限。他们中即会产生社会的精英，也会出现社会的败类。我们对老三届这个集合概念评说，老三届成长在新中国初创的年代，那是一个政治运动频繁，阶级斗争风声鹤唳，空想社会主义和极左思潮泛滥的年代。而这种政治环境下成长起来的人，人生道路和心理历程，都会有这段历史造成的烙印。阶级斗争非黑即白的形而上学思维，包容心差，道德修养欠缺，认识问题偏激易走极端，普遍文化教育水准低，成为许多老三届人的先天不足。文革是封建专制思想泛滥的年代，想想腐朽的满清王朝后期，一些八旗子弟，自恃血统高贵，已经沦落的提笼架鸟了，还招摇过市，炫耀祖辈马背上的功德。封建特权思想，官本位观念、形而上学认识论，深深影响着老三届一代。文化大革命造成正值中学生的老三届，以及接踵而来的多届学生失学，使他们中很多人丧失了系统学习文化知识的机会。加之国家政治路线走偏，政治教育另类，封建帝王思想回潮，这些都对老三届中的许多人，产生了很大影响。造成相当多的一些人知识断层，乃至影响到道德修养、思维方式、行为准则和文明传承。在虔诚的个人崇拜和现代迷信破灭后，增加了几分失落和彷徨。但这种先天不足的缺失，有些人通过后来勤奋加以补救，而有些人却带着这种缺失，在社会上碰壁抱憾终生。文化大革命影响着几代人，中华民族的理想情操，文明水准重塑仍需艰巨的拨乱反正。

六、浴火重生的机遇

对于老三届来说，上世纪70年代中国许多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使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得以突出重围、浴火重生。首先是国家领导者之间矛盾再次白热化。1971年9月13日，林彪一家仓皇出走，在蒙古境内的温都尔汗，三叉戟256号专机爆炸，机毁人亡。这一事件惊醒了狂热投入文化大革命人们的思维，特别是在上山下乡中的老三届和广大知青，宣布中国现代迷信神话的破产。其二是1976年清明，首都百万群众在北京天门广场纪念周总理，老三届文革中不同派别的人站到一起，反对"四人帮"。老三届又成了积极参与者，这场运动本身就是一次思想解放。同年10月"四人帮"下台，"文化大革命"结束。1977年、1978年大批知青落实政策返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历史性改变，为建国后的各种冤假错案平反，废除阶级出身考量，恢复平等高考。为多数已近而立之年的老三届的人生，带来了伟大的转折，许多人抓住了这些机会，勤奋学习努力，最终成为国家的有用之才。试想文化大革命再耗几年，试想我们再不纠正阶级斗争年月的错误，包括老三届在内的整个国家民族，恐怕就会被带到万劫难复的深渊。

七、千差万别的道路

老三届是一个集合概念，应该说经历文化大革命、经历上山下乡知青命运，那个年代的同龄人，都应该是一代人。他们有共同的经历和共同的苦难。但人生道路差别却很大，即便相同物种也会在不相同的气候、土壤、水分条件下，表现出成长的差异。人也是这样，不要说老三届成长过程有很大差异，就是一个班同学，几十年后也会千差万别。但就多数人而言，包括老三届在内的中国人，多数还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受益者。老三届中的多数人，也都是中国三十年改革开放的积极推动者。老三届大都进入退休，或将要退休年龄，在全国各大中城市众多知青网站、知青合唱团、公园社区文体活动中都能看到他们的身影。许多不同经历，不同工作岗位，不同社会地位，却有着老三届或知青共同的经历者，又由于青少年时代相同命运，退休后走到了一起，这是一个令人称道的庞大社会群体。当然，这个群体也都无处不展现老三届的特征。一个知青网站分裂成三个知青网站。一个合唱团分裂成两个势不两立的合唱团。为了争夺控制权，明争暗斗，无不打上当年红卫兵的烙印。近年京城也有老三届为主体，包括部分文革前大学生，以父辈关系聚集，他们在一起，为推进民主法治建设，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进言献策，若能有积极所为，也不失为好事。中国现实生活中还存在许多问题和矛盾，如吏治腐败的蔓延，施政成本居高不下，社会财富分配不公，环境矛盾突出，道德底线失守等社会问题日趋显现。老三届、特别有知青经历的，还有不少人工作在各级领导岗位上，他们由于经历过新中国许多重大历史进程，理应运用历史正反两方面教训，努力推进社会改革、社会进步、社会民主。

八、岁月如歌的自信

我于1977年7月结束了长达9年的知青生涯从东北返回北京，同年12月进入新组建的北京羊绒衫厂，上千人的企

业中许多科室骨干、生产一线的工人都是老三届。我1981年至1990年在团中央机关工作，当年二百多机关干部中，有五人进入政治局，近四十人在省部级岗位，他们中很多人也都是老三届，许多人也都有上山下乡的知青经历。我也曾从1990年至2003年在中央国企，招商局集团旗下公司工作过13年，也见识机遇有时比能力更重要。我更喜欢那些不怨天尤天的人，随遇而安，顺其自然。人生的道路千差万别，有的人有能力、又有机遇，还要有舞台，就脱颖而出，有的人平凡，却快乐知足，也生活得无忧无虑。此外，现代社会成功与否，不应该与封建社会官本位并论。老三届在中国现代生活的各界，都有成绩斐然的代表人物。知青作家史铁生大半生与病魔搏斗，他的人品和成就告诉我们，人生的价值如何评估。有过知青经历的李三友，善良待人，倾心报国。中国的老三届成为一个跨越国界和时空的话题。成功人士也好，平民百姓也罢，我们经历过悲壮，我们见识过辉煌。我的老三届的朋友们只要自己觉得快乐，一切就都好。

九、包容宽厚的心态

光阴荏苒，斗转星移，转眼间老三届中的大部分人将退出工作岗位，有关老三届、有关文革、有关红卫兵运动、有关知青、有关上山下乡的话题多了起来。怀旧颂扬也好，反思批判也好，既然是一段历史，谁都有评判的话语权利。但讲述和评价历史，起码要真实客观。但愿我们能将真实的历史告诉后人。老三届就是老三届，老三届及所有有上山下乡知青经历的人们经历丰富，颇具传奇，承载一代人的求索。毕竟是"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关于红卫兵运动等同于老三届，关于血统论、打砸抢也混同于所有老三届，这都是缺少历史常识的评论。"文革"中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应该彻底否定。但1700万知青们在农村屯垦拓荒，辛勤耕作，修桥筑路，教书育人，医疗济困，将城市文明、文化带入农村的功绩将载入历史。从新疆建设兵团的铸铁为犁、屯垦戍边，到三江平原将北大荒变成北大仓，这些"开荒种地"都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知青们对农村、农民所做出的贡献是尽人皆知的，我们下乡的东北黑土地，许多在职的干部都是当年知青们的学生。当地的干部群众，对知青当年的辛勤劳作、传播知识、扶贫济困、造福一方至今赞誉有加。

近年来各地老三届、知青纷纷办起了知青网站、知青联谊会、知青文艺团体。这本来是人们退休后自娱自乐、安度晚年的一些行为，无可厚非。可一些人却说三道四，把它说成是"歌颂文革"、"宣扬青春无悔"等。对于活动内容见仁见智，每个人都有生活娱乐选择的权利，更不该偏执的评论，给人扣帽子，打棍子，那岂不是风声鹤唳的阶级斗争和"文革"思维重演？但愿我们的社会多一些宽厚、包容，多一些善意、良知，多一些客观、美好，多一些理解、尊重。

2013年春节我填了首散曲《2013年春节贺友人》：

神州斜阳里，春晚送，北归秋雁，长安柳絮。笑看荒唐宫廷戏，却见席散酒醉，天下事，古今同异。纵有稼轩平戎策，谁人听，弦断军情急。豪放词，江南忆。

复兴大业风和雨，中国梦，重整朝纲，再除时弊。太平岁月不太平，左右难尽人意，念英雄，跃马千骑。期许朋辈补天裂，铸辉煌，碧水东流去。桃花源，，泛涟漪。

我们这一代人，有人称老三届一代，有人称红卫兵一代，有人称知青一代。我们是新中国历史上传奇的一代，我们经历了新中国初创的暴风骤雨年代，我们全程经历了十年"文化大革命"，我们经历了1700万人艰辛的上山下乡，我们经历了30年中国改革开放。我们经历过挫折与希望，我们经历过苦难与辉煌，我们有责任将老三届人和知青一代的传奇历史的真相告诉世人，让中华民族改革奋进，再创辉煌。

2013-8-16

林小仲文集：http://www.hxzq.net/showcorpus.asp?id=63

华夏知青网不是赢利性的网站，所刊载作品只作网友交流之用
引用时请注明作者和出处，有版权问题请与版主联系
华夏知青网：http://www.hxzq.net/
华夏知青网络工作室

45年前，我们下乡插队……

按：2013年7月30日，《华夏知青时代》杂志首发式在解放军军乐厅隆重举行。首发式上，老知青们发表了激情澎湃的演说，表演了精彩纷呈、高潮迭起的文艺节目。这些当年的知青宣传队的骨干们，又一次大展身手，再现了当年激情燃烧的知青生活。

《华夏知青时代》是一本有正式刊号的杂志，向海内外公开发行。这是刊载于创刊号“返城之后”栏目中的博主的一篇文字。这是编者给博主布置的作业。

2012年11月16日，在北京的“蒙古人美食村”，近百名当年曾到内蒙古草原下乡的老知青与我们在京工作的蒙古族朋友们一道，身穿节日盛装，载歌载舞，纪念我们下乡45周年的日子。1967年11月16日，我们从天安门广场出发，走进内蒙古锡林郭勒盟的乌珠穆沁草原深处，开始了我们插队落户的生活。45年来，作为知青，“青年”的名号伴随我们一路走来，并将伴随我们继续向前走去。

2012年11月16日，知青们盛装纪念下乡45周年。

聚会中，像我们这批知青的每一次聚会一样，在学苑出版社社长余均的带领下，大家又一次唱起《任重而道远》：

今后的几十年，对祖国的前途和人类的命运，是多么宝贵而重要的时间啊。现在二十多来岁的青年，再过二三十年正是四五十岁的人，我们这一代青年人将亲手把我们一穷二白的祖国建设成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将亲手参加埋葬帝国主义的战斗，任重而道远。有志气，有抱负的中国青年，一定要为完成我们伟大的历史使命而奋斗终身。为完成我们伟大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要下决心一辈子艰苦奋斗。

歌词作者是毛泽东，作曲者是曾在中央音乐学院附中读书的金苹、陆明和胡晓。那天，我们在天安门广场与送行的亲人们告别，乘大轿车离开北京，当晚住在宣化军分区招待所。金苹等兴奋不已，三人连夜共同为歌词谱曲。11月17日晚，在张家口军区礼堂由金苹首唱。金苹当时在北京中学生中被称为“小马玉涛”。金苹的演唱轰动全场，把晚会的气氛推向高潮。

《任重而道远》很快在知青中传唱开，成为这批知青的“队歌”，歌声伴随着他们走向草原的深处，伴随着他们度过了许多个盛夏酷暑，隆冬严寒，迷人黄昏，肃杀黎明。

这首歌唱了45年，至今唱起，我心中仍有几分波澜，几分感慨。

我1991年调入北京语言大学从事面对外国汉语学习者的“汉语水平考试（HSK）”。1991年全年，全世界参加HSK考试的不过千余人。2012年，234275人参加了HSK的收费考试，42356人参加了国家汉办主持的“中小学生汉语水平考试（YCT）”的收费考试。此外，还有很大数量的汉语学习者在世界各地参加了国家汉办提供的免费考试。截止到2012年底，已经有400多所孔子学院和500多个孔子课堂在108个国家建立。今天，还有来自76个国家的400多所大学正在向国家汉办申办孔子学院。

从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不知多少中国青年为了参加英语考试向主办“托福”和“雅思”考试的国外机构交了不知多少考试费。今天，已经开始有数以是十万计的外国人在交费参加中国人主持的汉语水平考试。

回首自己45年走过的路，已经不再年轻的“我们这一代青年人”，确实已经初步地改变了中国“一穷二白”的面貌，确实已经使中国开始走上了繁荣富强的道路。唱到此，想到此，想到我们有幸参与了这一发展过程，想到我们曾为之作出了自己的一份贡献，内心深处，确实有几分欣慰，几分自豪。

我也想到，在通往“强国”的路上，我们尚“任重而道远”。我想到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在她2002年出版的《治国之道》（Statecraft，Harper Collins出版）一书中的断言：中国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不会成为世界上的“强国（super power）”。她说，原因是“中国不具有影响世界的思想，不具有可以增强他们自己的力量并足以挑战我们的思想（because China has no internationally contagious doctrine which it can use in order to advance its power and undermine ours）”。她说，中国今天出口的是电视机而不是电视机中播放的内容。她说，中国人在进口我们先进技术的时候，他们看重的是某些西方人给的“回扣（venality）”而不是他们自己口头上宣讲的空洞的理想主义。（见该书178—179页）

具体操办了大英帝国将香港归还中国事务的撒切尔夫人的话，或许有些刻薄，但她的话也可以引起我们的深思。日前，香港出台了奶粉限购令，限制每位大陆旅客只能携带两罐奶粉出境。香港的奶粉限购令可以被视为撒切尔夫人言说的一个注脚。限购令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吗？奶粉限购折射出中国在民族文化建设方面存在的问题，折射出中华民族文化建设的紧迫性。

2013年1月，严重的雾霾侵袭了中国的许多地方。雾霾也提示我们，在通往“强国”的路上，我们尚“任重而道远”。“强国”不仅仅意味着豪宅，名车，大厦摩天，都市繁华。“强国”更意味着干净的空气，清洁的饮水，安全的食品，健康成长的婴儿。为了呼吸干净的空气，为了食用安全的食品，为了儿童健康地成长，我们确实需要

重新思考我们的发展目标，我们确实需要重新梳理我们的价值体系。

当我为香港的奶粉限购令而感到羞愧的时候，当我为连日的雾霾而感到焦虑的时候，我自然会想到像我自己一样的数以千万计的中国知青，想到他们，我心中就多少会感到一些安慰，心中就多少增加了一些信心。我想，那些像我一样曾经在煤油灯下阅读曹雪芹、莎士比亚、雨果、托尔斯泰和普列汉诺夫的老知青们，或许能为中国带来好运。今天，这批人中的一些人尚在一些重要的岗位上发挥着作用，尚可以对中国的进步产生重要的影响，尚可以影响包括自己的子女和自己的学生在内的许多年轻人。这批人的血液中，流淌着从童年到青年成长过程中积淀而成的社会责任感。这批人，了解中国的国情，了解中国的底层。“居庙堂之高而忧其民，处江湖之远而忧其君”，是这批人深入骨髓的共同特征。我期待着，不论是偏好社会主义的知青，还是偏好自由主义的知青，不论是“居庙堂之高”的知青，还是“处江湖之远”的知青，都能够时而想起自己当年的志气和抱负。

说到知青，我常常想到苏东坡对韩愈的评论：“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潮州韩文公庙碑》）我想，只要数以千万计的中国知青“为完成我们伟大的历史使命”而“下决心一辈子艰苦奋斗”，鞠躬尽瘁，死而后已，那么，中华文化纵然有一时之衰，也一定会有人文再起，纵然有一时之溺，也一定会有天道重济。

2013-07-31 （已发《华夏知青时代》杂志首刊）

相关图片欣赏请移步作者博客：

http://blog.163.com/xiexq_1951@126/blog/static/16165854320136314321656 4/

海宽文集：http://www.hxzq.net/showcorpus.asp?id=10

华夏知青网不是赢利性的网站，所刊载作品只作网友交流之用
引用时请注明作者和出处，有版权问题请与版主联系
华夏知青网：http://www.hxzq.net/
华夏知青网络工作室

《岁月甘泉》定位的困窘

当时金虹老师告诉我，香港的讲座，由苏炜、黎服兵和我主讲，苏炜就主要谈那几天要在深圳与香港上演的《岁月甘泉》。我很惊讶，也很期待。以为会有一个大家当面交换意见的极好机会了。可惜，最后苏炜缺席了，换了另一位主讲人。

在此前，看过苏炜的《岁月甘泉》，看过黎服兵的《“岁月甘泉”批判》，我自己也曾有《理想主义的缅怀与礼赞——《我们曾经年轻》观后感》。相比之下，《岁月甘泉》比《我们曾经年轻》更具理想主义色彩，而《“岁月甘泉”批判》的批判锋芒比《理想主义的缅怀与礼赞——《我们曾经年轻》观后感》尖锐犀利得多。

记得当初偶然间看到《岁月甘泉》，还以为是文革期间的作品，原因无它，太像了！从基调、精神，到语言、形式。那年代，我就在知青文艺宣传队混过，曾“主创”过两个组歌（歌词），跟《岁月甘泉》太像了，从基调、精神，到语言、形式。

显然，苏炜是十分抗拒人们有这种联想的，他一再强调，他是企图“在苦难中掘一口深井”，并屡屡以“山苍苍，夜茫茫，人生的路啊，走向何方”，“那一场暴风雨铺天盖地，把多少年轻的花季粉碎”等，来辩解“没有刻意回避生命中的灰暗”。其实，《岁月甘泉》反映了“苦难”，反映了“生命中的灰暗”吗？显然没有。

“山苍苍，夜茫茫，人生的路啊，走向何方”的句子，出自《岁月甘泉》第五段“一封家书——夜校归来”。这一段是《岁月甘泉》最具悲凉之情的部分：“远方的妈妈啊，女儿想你，三言两语，道不尽万千思绪。／我想眺望星空啊，思绪被云雾遮挡；我要飞翔啊找不到翅膀。／早起的寒露，西下的夕阳，和着我的汗水，带走我的悲伤。／啊……／山苍苍，夜茫茫，人生的路，走向何方？／山苍苍，夜茫茫，人生的路，走向何方？／妈妈啊，女儿想你，想你，想你！”紧接着，则是相当温馨浪漫且积极乐观的铺述：“满满的，夜校坐着阿叔阿婶，一字一句我教他们学文化。／汗水和心思啊，都在笔画里；多少话儿，连着乡亲和土地。／白天烈日下啊，阿叔教我学割胶；／夜晚风雨狂啊，阿婶端来热姜汤。／山泉的流淌，山花的芳香，／带给我亲情，带给我希望，带给我希望。”这一转折，多少令我觉得突兀。或许，可以解释为后者的温馨浪漫且积极乐观，化解了前者的悲凉之情。然而，接下去却又是一个回马枪式的情绪反转：“啊……／山苍苍，夜茫茫，人生的路，走向何方？／山苍苍，夜茫

茫，人生的路，走向何方？ / 妈妈啊，女儿想你，想你，想你！ / 我想你，我想你，我想你！”我无语了。到底作者要反映怎样的一种情绪？我无法判断。作者也表示这一段“写得最艰难”（包括谱曲）。为何，没详说。我想，恐怕跟情绪的定位模糊暧昧有关。

“那一场暴风雨铺天盖地，把多少年轻的花季粉碎”的句子，则出现在第六段“山的壮想”：“山的壮想，山的壮想，啊…… / 大山里静静地站立的墓碑，荒草里掩埋着沉默的土堆。 / 那一场暴风雨铺天盖地，把多少年轻的花季粉碎，把多少花季粉碎。 / 啊……噢呀喂，噢呀喂！ / 山风轻轻吹，青山高巍巍。不要问我青春悔不悔？ / 山风轻轻吹，青山高巍巍。没有什么比生命更可贵。 / 雨后的彩虹，对苍山无愧，对大地无愧。啊，无愧！无愧！”作者坦承，在这里有意引进有悔无悔的争论，并将之“大而化之”。如何“化”？化为何？不详。但“无愧！无愧！”无疑是十分激昂慷慨的态度。

其实，《岁月甘泉》的情绪定位应该是可以很明确的，作者在《“我”和“我们”，“当下”与“当时”——关于知青组歌《岁月甘泉》的创作思考》中便表示：“我们是以一种乐观、积极、正面的情绪取向，去主导这次知青下乡四十周年的纪念演出和组歌的创作的，不然，整个演出和创作，都失去了意义前提。我们不是要歌唱苦难，但我们歌唱（不是歌颂）的是苦难中的青春岁月——我们的劳动，我们的爱情，我们的彷徨，我们的牺牲奉献，等等。我们无意回避灰暗，但组歌却无须以灰暗作底色。”这就对了。这样一个情绪定位，其实就是《岁月甘泉》的基调。基于此，苏炜的“汽笛一声海天阔”才取代了麦莳龙的“汽笛一声揪人心”；基于此，“垦荒曲”中反思“由于盲目的砍伐，带来了对热带雨林和自然环境的破坏”的“大山累了，我们也累了……”一类调子相应压抑的歌词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我们是开路先锋，我们是垦荒战士。 / 看我们劈开顽石，赶走蛮荒，把移山重任担在肩上……把青春热血洒遍边疆，让理想歌声四处飞扬！”其实，这就是作者的书写视角：“要让‘今天’和‘当下’退出，回到四十年前的‘当时’的‘现在进行时’，才能写出和唱出当时的气氛来。”要求的就是“当年的激情、气氛”，“处处、时时充满了当年当时的时代气氛和往日氛围”。（确切说是当年官方宣传所营造的激情、气氛、氛围）。于是，我们才能从《岁月甘泉》中看到那么多曾经如此熟悉的澎湃激情，豪言壮语，乃至化用自领袖诗词的“千里怅寥廓”，“壮歌一曲从天落”。

由是，作者何不将《岁月甘泉》的情绪定位为歌唱“理想浪漫中的青春”？勉为其难说是歌唱“苦难中的青春”，不仅自己别扭，读者（观众）也茫然。

虽然我自己不认同，但却坚定认为：对上山下乡歌功颂德又何妨？坚持青春无悔又何妨？在《各说各话未必不可》博文中，我曾表示：“历史，在不同时空不同角度，以及不同思维不同话语中，便有不同的面貌呈现。知青历史亦然。”“同一年代，甚至同一时空，也大可有不同的叙述策略乃至结论。”倘若从学术角度考虑，我倒是有如下思考：中国历史上就有隔代修史的传统。其理由大概就是获得时间的沉淀与空间的疏离，从而争取更大可能的思考、视野、客观、公允。基于此，我对当代史、当代文学史的论著，总是心存疑虑的。所谓当局者迷、感情用事、

主观偏执、选择性记忆（失忆），往往是防不胜防的陷阱。然而，当事人从不同角度、立场留下的各种文字，却又是不可或缺的历史资料。这，或许就是我们需要努力的地方。

老例文集：http://www.hxzq.net/showcorpus.asp?id=19

华夏知青网不是赢利性的网站，所刊载作品只作网友交流之用
引用时请注明作者和出处，有版权问题请与版主联系
华夏知青网：http://www.hxzq.net/
华夏知青网络工作室

旧题新说，漫话知青

昨天俺建议鲜宁转载一篇风清流的文章，风哥和几个同学在1967年退学，自谋出路，避开了上山下乡洪流，小熊觉得这另类选择必须是在1967而不是1968、在远离北京的广西才有可能。作为广西成功企业家，功成身退后全家移民美国，同样明智，在红二代官二代为主流的社会里，草根风哥，他就是一位高瞻的人物。但是文章转过去没啥反响，那边正黑天昏地骂罗将军呢。看来知青问题是个丢落在路边没人搭理的弃婴，干脆俺抱起来拍拍哄哄吧。

（1）一九六五年以前的知青

1965年以前（包括1965）的知青上山下乡，是一个单纯的就业问题，其中60%是没有取得城镇户口的回乡中学毕业生，这是由于国家的建设重视重工业，忽视轻工业，限制了城市提供就业岗位的能力，也是经济失败造成就业资源稀缺的结果。那时在宣传上说什么我们国家还是“一穷二白”、“农村需要有文化的建设人才”，“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等等，现在看来都是虚假之辞，实际上，一是缓解就业压力，二是把不被信任的人驱赶下乡，同时达到“净化”城市的目的。如果没有文革，按照国务院一九六五的规划文件，每年也要安排100万到200万的中学毕业生下乡，这些被要求下乡的中学毕业生，必定都是出身不好的，这里还包括由派出所强制下乡的社会闲散无业人员和劣迹青年，那是出于城市安全的考虑。

（2）一九六八年以后的知青

1968年以后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是否同样出于经济目的、解决就业问题呢？国内外的研究者众口一辞肯定，是滴。刘小萌是这个观点。但是法国学者潘鸣啸推翻了这个假设，他说，有充足的数据显示，从1968年开始，截止到1976年，农村大约有800万知青，1977年接近900万，而截止到1980年初以来的所有数据都表明，在这同一时期，至少有800万到900万农民在城市就业并转为城市户口。潘鸣啸说，在大规模上山下乡的1968-1976期间，知青外迁的成果，与农民工的永久性迁入相抵消了。

老潘认为，从1955年开始到1965年的知青下乡，期间还发生了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出发点是经济，为解决城

市就业和吃饭问题，但是1968年以后有很大的不同，1968年以后知青的上山下乡，就完全是政治运动了，文革时期的“上山下乡”有很强的意识形态特征。1956毛泽东的批示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1968年的批示则是，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防止政权变色的接班人问题是毛泽东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文革就是从接班人搞起来的，毛泽东培养接班人的思想就包含了知识青年的上山下乡，他在文革前关于教育革命的思路就是鼓励青年学生到基层到农村去，包括对自己的儿子和侄女。所以1968年以后的知青上山下乡是文化大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经济原因不是主要的，根本还是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的需要。潘鸣啸将这一颠覆性的论断写在了他的新著《失落的一代》（香港中文大学2008版）里。

当然，毛泽东完全失败了！首先是农村不需要知青，对农民来说，知青是负担，是政治任务，贫穷的农村遍地都是剩余劳动力，农民需要的是老婆。因此绝大多数知青很难融入农村社会。实际的结果，一代人在农村变成革命事业接班人了吗？适得其反。小熊想起李银河对这个问题有精准的论述，她说，结果是什么呢？结果是，毛的理想主义造就了一代人的务实主义，毛的教条主义造就了一代人的自由主义，毛的大公无私造就了一代人的个人主义。本来我们每个人都可以为了理想而牺牲，可是这个理想应该是我们自己的。

（3）知青的“失”与“得”

大部分知青被剥夺了正当的受教育的权利，他们年轻时的价值观今天已经失去了价值，他们将自己曾经的人生理想遗落在农村。但是知青一代对遍布中国穷乡僻壤、少数民族边塞地区底层老百姓的民生疾苦，有了个人亲历的深切体会，这是一般城市青年最难得到的经验。

（4）知青下岗与知青治国

有人说知青们的境遇存在着极大的反差：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不但已经退休，而且饱尝经济改革的苦果，曾经下岗失业，丧失社会地位，颠沛流离，至今只有很低的养老金，相形之下，他们中只有极少数的脑力劳动者爬上了事业的山顶，当上了高级干部、企业领导、高级工程师、大学教授、作家艺术家，更有这一代人中的政治精英进入了国家政权的最高领导层。

也有人反对说，“饱尝经济改革苦果”的说法有点绝对化了，平心而论，知青之中大富大贵者确实不多，但多数人还是分享到经济改革带来的蛋糕，退休后的大部分知青，晚年基本过上了小康的安稳生活，即使没有小康的也都准小康了。

（5）知青岁月值得怀念吗？

有很多知青说“青春无悔”，对知青生活选择性记忆，他们喜欢聚会在一起回忆过去的知青岁月。他们喜欢强调自己的知青经历，似乎这是一种象征性的资本，当知青们在一起的时候，他们喜欢以“都是知青”来认同。

难道他们真的怀念知青岁月吗？

法国人潘鸣啸说，太多的中国人说的和做的完全不同。如果让他们再回到那个年代、回到他们下乡的地方去，他们一定不愿意。我研究了大量的知青运动结束阶段的资料，成百上千的知青罢工、下跪、绝食，卧轨，要求回城，这些事实说明了什么？他们千方百计回城，很多人回城后没有好工作，这些年或者下岗、或者退休，逐渐被边缘化，显然他们年轻时的价值观已经没有价值了，但他们仍然希望找回自己的人生价值，所以强调这个经历。也有少数的成功者习惯于从知青的经历中找因果关系。

（小熊认为既然1968年后的上山下乡具有强大的意识形态特征，那么今天的这些怀念就是还没有完全脱离开毛的意识形态的怀旧情绪。）

潘鸣啸认为上山下乡运动是负面的，是巨大的失败，也是错误的。人到了一定年龄就会怀念青春，知青个人不应该因为怀念青春而美化那段历史、那场运动，这是一种思维的混乱。

（6）知青研究

虽然中国知青的历史跨度有二、三十年，涉及到将近2000万人，但是长期以来，研究者寥寥无几。知青们自己写的文章都是回忆性的，有很大的个人经验和个人情绪的成分，至今能找到的学界正式出版的知青历史专著只有两部：刘小萌的《中国知青史》和潘鸣啸的《失落的一代》。

2013-02-28

（注：小熊即作者本人。）

风清流的文章链接：http://hxzq05.d68.zgsj.net/aspshow/showarticle.asp?id=7736

田小野文集：http://hxzq05.d68.zgsj.net/showcorpus.asp?id=151

尘封的记忆

——走另一条路的老三届

二、

1966年8月26日，我们从远离北京的南国小城——桂林，来到了心中向往的圣城北京。我们是桂林当时尚未被打倒的市长签字，让我们到北京学习文化大革命和红卫兵先进经验的一批高三的高中生。到了北京后，我们一下火车，就看见几个红卫兵押着一家六口人，站在月台上，那六个被押之人，个个的头都剃成了阴阳头，挂着大大的牌子，低着头，尤其其中那四个未成年的孩子，可怜凄凄的站在他们的父母身边。这一幕让我终生难忘。当我从这几个孩子身边走过时，我心想他们的父母真不该将他们生出来，如果人真有来生，我真希望他们不要再做人。后来我们在团中央的大楼前，亲眼目睹了对胡耀帮的批斗，在中国文联的大楼前，也看到了对田汉、贺敬之等知名作家的批斗。还亲眼目睹了很多北京红卫兵抄家、打人的场面。也听说老舍、邓拓等文化人都自杀了。8.月30日晚江青在北大接见红卫兵，我们亲眼见到了江青。8月31日毛主席接见红卫兵时，我们就站在金水桥边。这年我们已经十八、九岁了，都是能承担独立民事和刑事责任的人，十二年所受的教育，即使是愚民式的教育，做为一个成年人，独立思考的能力已经具备了。眼前的北京让我们大失所望。九月初，我们这批同学，陆续回到了桂林。北京之行让我们失去了激情，大部份的同学都未参加红卫兵，成了逍遥派。D我有两个好同学，一个姓曹，一个姓周，他们两人的家庭出身都是工人，而且是纯得不能再纯的工人，他们的爷爷都是贫农。我的家庭出身不好，虽然我的爷爷是贫农，我的父亲在1947年借朋友的钱去跟人合股办了个小工厂，用现在的官方理论——是民营企业家，用四九年十月至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的官方理论——是资本家。但这两个同学护着我，尤其曹同学，是我们班最魁梧的同学，他又是我们班的民兵排长，而且他还是个共青团员，有他护着我，其他同学也就不敢对我怎样了。文革初起之时，出身不好的学生都被打入了另类，只能小心翼翼的做人。我自知出身不好，早早的就自觉夹起尾巴做人。可是我这两个同学，就是不和我划清界线，而且保护着我。有他们在我身边，我也就不必夹起尾巴做人了。我以一个狗崽子的身份，能在八.一八毛接见红卫兵后没几天，就斗胆去北京，这是很多狗崽子的同学想都不敢想的。

到北京后，有一天我们在团中央看完批斗胡耀帮，在回住地的路上，曹同学很感慨的对我说：“这些老革命也太不值得了，干革命就是为了今天挨批斗，当初老子就不革命。北京这帮红卫兵都是些粪蛋加蠢卵。今天你斗别

人，就算明天给你当了官，也会有人来斗你的。”听了曹同学这话，我当时差点吓得要晕倒了，幸好当时没有外人。

八月三一日那天，毛要第二次接见红卫兵，当时我们正在北大，出发前，北大的高音喇叭不断的在播放着注意事项，其中有一条就是不许狗崽子去天安门，否则铡烂狗头。我真有点不敢去了。曹同学说：“怕什么，你脸上又没有贴着字，那个晓得？”于是我也就有幸到了天安门，并见到了毛主席。

二、

大串联结束了，学校还是无法恢复上课。同学们分成了三派，一派是“誓死保卫毛主席、保卫韦国清【广西当时的省委书记】”的XXX派，一派是“誓死保卫毛主席、打倒韦国清”的XXX派。第三派是消遥派。我和曹、周同学都是消遥派。我们这一派的同学，家庭出身好的坏的都有。我们这些逍遥派，没有谁要在同学中称大头，人人都平等，谁也不欺谁，我们整天不是打牌就是下棋，吹牛讲故事。学校的两栋楼，一栋成了我们这些逍遥派的乐园。一栋成了那两派争斗的战场。另外的那两派同学之间等级深严，有当官的，有当兵的。我们瞧不起他们，他们也瞧不起我们，他们暗暗的在等着秋后好算我们的帐。但我们这些逍遥派心中有数，我们未做过违法的事，毛的语录我们背得滚瓜烂熟，而且说的头头是道，所以我们根本不怕那两派，即使文革秋后要算帐，也轮不到我们。他们两派不可能都正确，总有一派对，一派错，最后他们肯定要狗咬狗，我们乐得看热闹。因此我们这些逍遥派从未有一个人去投奔那两派，倒是那两派的人中，不时有人因受了欺负而来投奔我们。我们这些逍遥派虽然人数比那两派少些，但几乎全是男生，那两派人数多，但多数是女生，所以他们根本不敢惹我们。他们斗他们的，我们玩我们的，大家相安无事。

有一天，不知是哪个同学，带了本书给我们几个同学看。我是看过这本书的一个。这本书的书名是《兰德公司国情咨文》，是兰德公司1958年为美国总统和国务院做的未来十年世界发展分析。兰德公司每年都要做一份这样的分析报告。现在兰德公司的报告，在网上都能查得到。可文革时，老百姓看这样的书，不杀头，也是要坐牢的。这本兰德公司写于1958年的分析报告，其中论述中国的部分，详细的论述了毛和刘少奇在经济建设问题上的矛盾，报告认为十年内毛和刘必将由此产生斗争，由于刘的性格软弱，刘无法战胜毛，必为毛所打倒，除非*站在刘的这一边。

看过这本书的同学都惊呆了，文革啊文革，为什么会在中国要发动这么一场文化大革命，我们终于明白了。而更让我们目瞪口呆的是报告里对我们这些学生前途的分析。报告认为由于中国的工业发展与中国的人口生育不平衡，未来的十年，中国将不能解决大批适龄青年的就业问题，唯一的出路就是将这些青年安置到农村去。。。。。。我们由此也十分清楚我们的命运将会是怎么样了。当时文革还看不到有结束的迹象，我们已经清楚

大学肯定是上不成了，不知还要再浪费多久的光阴。即使等到文革的结束，我们也只有上山下乡路一条。不如早点自救、自强、自立。要想做到自救、自强、自立，就不能再留在学校了，走向社会，自己去谋生，才是我们唯一的出路。私下里我们这些逍遥派的同学就开始议论怎么走向社会的问题了。

1967年的秋天来临了，当北京城里那十男十女的高中学生给*写信，表示要“扎根农村一辈子，献了青春献子孙”时，远离北京的我们这些高中生，也有二、三十个同学，自动退学，走上了自救、自强、自立的谋生之路。

曹同学、周同学和我一起退的学。周同学半年后进了一家国营大工厂工作。我和曹同学一直在社会上拼搏。我们曾经在一起办过工厂，大家都成家后才分手。

我们这批退学的同学中，恢复高考后，有几个上了大学，有一个去了美国留学。我们当年走的这条路，也就是今天的知识青年都在走的路——自救、自强、自立的谋生之路。而当年近二千万的知识青年们走过的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路，今天除了少数的志愿者外，已无人再走了。

2013-02-20

风清流文集：http://hxzq05.d68.zgsj.net/showcorpus.asp?id=46

华夏知青网不是赢利性的网站，所刊载作品只作网友交流之用
引用时请注明作者和出处，有版权问题请与版主联系
华夏知青网：http://www.hxzq.net/
华夏知青网络工作室

“青春无悔”的悖论

中国几十年靠口号活着，例如“大分无私”，例如“永远革命”，例如“学习雷锋”，例如“十五年实现共产主义”。口号这东西是社会主义的专利，我觉得很有用。因为人与动物重要的区别在于人活着很大程度要靠精神，我们能抓住人的这一特质利用之，确乎是聪明之举。像朝鲜，一天一人四两粮，又没有油和肉，若无口号，怎么活？所谓“望梅止渴”，就是口号的始作俑者。你渴了，没水，跟你讲梅；梅酸，吃了有唾液，把唾液咽下去，就解渴。其实梅也是没有的，只是讲梅如何如何好呀，酸呀，酸得不得了呀，你吃一颗又一颗呀，你就跟真吃到差不多。这是科学，真的，科学家巴甫洛夫先生用狗实验证明过，叫条件反射，人也是动物呀。我们祖先老子先生虽不懂科学，但懂哲学，按他的说法，越叫喊什么起劲儿，说明什么越不行。这真是颠扑不破：喊学习雷锋，说明社会上没有雷锋；喊大公无私，说明无公而有私；喊十五年实现共产主义，说明共产主义在爪哇国呢！老子没往下深说，我想，至少还有两点：一，喊得起劲的多是不可能实现的，例如十五年实现共产主义，例如大公无私；二，起劲儿喊的，动机值得怀疑，例如“谎言重复一千次就成了真理”那位叫喊者喊的口号，动机你不明白吗？

我有个同事，钱多，不到五十岁就告诉我说已立遗嘱，放在只他一人知道的地方，真有那一天就交他三儿子。那一天意外提前了，他躺在抢救室要咽气，可三儿还在往回赶的路上，他咿咿呀呀喊三儿。大夫就让亲属不停地告诉他三儿十分钟就到，他真的就不咽气。一小时半三儿才到，他眼瞪着三儿，嘴嗫嚅着说不出，不到半分钟就呜呼哀哉了，遗嘱成了千古之谜。同事毕竟不是皇上，可以把遗嘱放“正大光明”匾后，驾崩后有人替他取出执行。同事虽未交出遗嘱，但比“望梅止渴”强，因为他有梅，而且梅也真的出现在他面前。可其实这与“望梅止渴”性质是一样的。过去有一部话剧《万水千山》，演到红军过雪山草地死人无数时，编导懂得艺术这东西要“源于生活高于生活”，搞一幕草地宿营之夜：蓝色夜空缀满星星，篝火映着绿色草原和灰色红军服；老战士怕小战士失去信心，讲渡过难关就是胜利，胜利之后就是共产主义。我想，小战士没文化，马克思他肯定搞不懂，大概跟阿Q差不多，只知道共产主义时穷人富了，随便吃随便喝了，再不必过这要命的草地了。于是一群战士被这愿景感染，唱起“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戏剧达到唯美效果。

抱歉，我磨叨这事的意思就是，剧的这一幕跟我们欺骗同事说他三儿十分钟就到是一个原理，就是“望梅止渴”。红军过草地就是现在的旅游胜地阿坝那地方，去九寨沟就路过。我去过两次，草地看上去很美，实际很恐

怖，踩上去就会往下陷，越挣扎越深，直到把人吞没。我在那里想起《万水千山》那一幕，再无美感，“望梅止渴”也解决不了我的恐惧。这是别人拿没有的事骗你说有，让你相信，你就跟他干。这还不如自慰，自慰虽是自己骗自己，不过可以达到释放的目的，而“望梅止渴”不行，你喝不到水，只能短时间拖延，不久还是要死掉。

深研究会发现，有些骗人，例如曹孟德以鞭遥止指说前面有梅林，主观是好的，是让兵士们维持住信心摆脱暂时的困境；有些是坏的，例如……例就不举了吧。坏的就叫骗人，跟跳大神或赵本山演的《卖拐》那位没区别。

现在换个话题。“青春无悔”这命题原是知青们颇感自豪的口号。当年让几千万学生放弃学业下乡，你以为容易吗？不容易。靠什么让学生像饿虎扑食一样跑下乡呢？理论。这理论是：学生学的是资产阶级的东西，好比人染上烈性病，必须抢救。到哪儿抢救呢？农村。为什么呢？因为农村有贫下中农。贫下中农为什么能救学生呢？因为他们从事体力劳动。为什么体力劳动能救学生呢？因为体力劳动者最无私最革命。领袖暗自附带的副产品是：增加农村劳力能创造出更多吃穿用产品，真可谓一举而两得。全国都变成革命者，共产主义不就实现了吗？这推理天衣无缝，你反对吗？你就是反革命。学生们当然不当反革命，于是就下乡；下乡既为国家做贡献，自己又能治愈烈性病，摊上这样的好事还“有悔”，那除非傻子，所以当然就“青春无悔”。

可矛盾出现了。体力劳动这样好，为什么让坏人，例如右派、反革命、走资派、地主们和判刑的流氓抢劫犯们到农村劳动呢？不是说农村需要最革命的学生吗？为什么知青抽回城要挑选表现好的呢？显然，让坏人去农村，是拿劳动惩罚他，这是古今中外的做法，并无新意；让好人回城，是拿结束劳动奖励他，这是陈士美中状元招驸马，也并无新意。这说明什么？说明体力劳动不是好事。为什么体力劳动会成为惩罚手段呢？脱离体力劳动（或体力劳动由重变轻）会成为奖励手段呢？秘密在于人生来就不喜欢干活儿，这是人的本性，上帝也没办法。我小时家里烧煤，得把煤和黄土从楼下用筐抬上五层楼，一般是由父亲来做这活儿。可我或者哥哥跟同学打了架，父亲就让我俩抬六筐煤四筐黄土，末了还警告说：再打架就让你俩抬十五筐！我俩不敢不抬，但又不满意，边抬边气喘吁吁分析，认为父亲是一箭双雕，既惩罚了我俩，他自己又逃避了劳动。因为很明显，父亲知道我俩不爱劳动，就拿劳动来惩罚我俩，企图以此来杜绝我俩给他闯祸；父亲不爱劳动，但又不能不劳动，以教育儿子为由逃避劳动既冠冕堂皇又不必愧疚。

顺着话继续说家务劳动吧。我记事起，奶奶就整天手不闲着，除家务几乎没别的事儿。我一直以为她老人家乐此不疲，拿干活儿当乐子，就跟我拿玩儿当乐子一样。所以我从不抢她的乐子，免得老人家不高兴。后来有一次奶奶为什么事竟破天荒顶了爷爷几句，其中说到：“我一天到晚干活儿干活儿，伺候完老的伺候小的，我够了，明儿我不干了，我也清闲清闲！”我才明白，原来奶奶并不愿意干活儿，不过没办法就是了，因为按她的“理论”，女人就得伺候男人。

说到知青下乡，除开头那届算是热血沸腾为“保卫毛主席”而去外，其余就免强了，为什么呢？主要因为恐怖

体力劳动。我也下过乡，非常恐怖下地干活儿，锄禾日当午那滋味儿比阴曹地府受罪差不到哪去。起初想到贫下中农喜欢劳动而我却不喜欢，心理很惭愧。可很快发现，贫下中农也不爱劳动，不过没办法，跟我奶奶做家务一个样。农村最脏最累的活计交给地主富农干，贫下中农干相对轻些的活儿，就是证据。朱元璋是贫下中农，当皇上以后，若他喜欢干活儿，那天下的活儿还不随他挑着干，谁敢跟他抢？可他却再不劳动，躲在宫里享清福了。北京先农坛是皇帝每年率大臣种地的地方，可那是糊弄傻子的把戏，皇上假摸假样扶一下犁就算耕种。有人说我说皇上不是不爱劳动，是因为日理万机没时间。我说扯蛋，皇上那么忙，游山玩水逛窑子怎么有时间？西方资产阶级倒是比我们坦率，承认体力劳动不是好事，他们的田里只有聊聊无几的人种地，而且还用机器，我们批判人家几十年，现在也学习人家用机器种地，有人说中国变质了，说的没错。

再看知青们，喊破天要扎根农村一辈子，却脑袋削个尖抽回城，说到底是不愿意劳动。所以，“青春无悔”就是“望梅止渴”的现代版。奇的是现在还有些人喊“无悔”，就令人怀疑了。若你至今还呆在农村，沉在“望梅止渴”里，且动员你娃儿也去农村劳动，这种堂吉诃德精神还值得佩服。可你照样猴儿急跑回城享受城市生活，还叫喊这口号，往好里说是自慰，往坏里说是骗人。遗憾的是一些知青大哥大姐现在还在骗人，说实话，开始我觉得好笑，现在觉得恶心。因为这好比从良妓女，明明跳出火坑，却扭捏做态喊当妓女无悔。有人觉得这比喻不当，其实没什么不当的，几千万人被强迫或被欺骗赶到农村，不是被强奸是什么？林彪都说，下乡是变相劳改和失业。这些话不妨挑明了说，因为骗人的人在骗人是事实，你若不承认他骗人，那也是“望梅止渴”。

现在，“青春无悔”派的声音越来越小，他们自己也有些耻于这样说了。不过有些朋友很天真，认认真真从语法和逻辑上寻“无悔”的破绽。例如认为不存在有悔无悔，因为下乡不是被迫就是被骗，难道一个人被迫被骗还存在悔与不悔吗？这些朋友没搞懂，现在的“无悔”派们其实并非在意字面的悔与不悔，甚至心里也未必不悔；他们喊“无悔”其实是为那黑暗的社会、导致那社会的体制、制造那体制和社会的独裁者寻求“正确”的依据。所以，人家醉翁之意不在酒，你又何必非盯住酒不放呢？

2013-02-22

笨人文集：http://hxzq05.d68.zgsj.net/showcorpus.asp?id=169

华夏知青网不是赢利性的网站，所刊载作品只作网友交流之用
引用时请注明作者和出处，有版权问题请与版主联系
华夏知青网：http://www.hxzq.net/
华夏知青网络工作室

如此赞歌

若论赞歌，胡松华唱的最好，当年一曲《赞歌》龙颜大悦，风靡一时，全国人民邯郸学步鹦鹉学舌，啊哈嘿伊，也让成百上千的热血青年从天安门走向了草原。老当益壮的胡松华还在舞台上啊哈嘿伊，不过这人挺没劲的，赞歌的曲调本来就是套用草原上的一首蒙古长调，最后一句好像是祝福毛主席万寿无疆，毛一死，他的歌词也改了。改不改词有什么关系，万寿无疆本来就是蒙傻子的，无非博现代皇帝开心一笑，以为真会长命百岁。

此君的赞歌洋洋洒洒数千言，并且来自大洋彼岸，说来话长，简单介绍一下来龙去脉。留美才子大有人在，卢笛、马悲鸣等人的大作宏论不绝于耳。在草原插过队的马悲鸣不辞辛苦，每星期群发一份电子书《周末文刊》，尽管里面的观点我们不敢全部苟合，但不得不说其中充满新意，有许多是我们这些生活在社会主义强国的人无法看到听到的。马老兄对草原一往情深，对插队念念不忘，前些日子在论坛里征集老知青们当初插队是否自愿，生产队的分值是多少，并声称：插队我有自愿。

插队的苦不必多说，奇怪的是许多知青好了伤疤忘了痛，有一哥们说他们大队有六万头牲畜，吓了我一跳，我们大队干部曾声称全内蒙牲畜数第一，最多时也没超过三万。如此说来草原富甲天下，知青们应是共产主义了，我急忙传去我的博文《化蝶》，与其我是凑趣，不如说是表达我的愤怒，因文中几位知青悲惨的命运不但是真的，而且就发生在我的身边。我们队一天十分工值1.5元，但五个知青放羊，一天一夜二十分，平均每人每天只能挣四分。我没有现如今知青们的豪言壮语，感觉没有任何一个知青能较长期放羊。另一哥们，用现代人的说法大概有点二儿，他说在东乌插队时他们队每天分值2.7元，我想这可能真是全国第一！悲催的是，你在天堂草原不好好呆着，不过三年，想方设法去了河北农村，干活累得吐血，工分少得可怜。

《周末文刊》第四十二期有一篇文章，《话说精彩人生与衷心感谢文化大革命》。看过大约十几天了，总觉得如鲠在喉不吐不快。作者似乎是在知青网上连载过长文《永远的大草原》，我是认真拜读过的，她笔下的草原真实亲切自然，充满了原生态，唯一让我不解的是，你把草原歌颂的美轮美奂，为什么生活了七年后不顾一切地逃之夭夭？如果说前一篇文章是歌颂草原，后一篇为文革唱赞歌真是让我刮目相看。作者虽与我是同龄人，人家是博士大教授美籍华人，不敢怠慢，权且唤作此君又何妨。

此君把她的成功记在了文化大革命身上，她说：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那么我仍然是一条书虫子……甚至高呼：文化大革命好啊，实在是好！文化大革命万岁！

此君能成为工农兵大学生确实是文革的幸运儿，但她怎么会不知道，她的成功和幸福是与另一个国度密切相关的，这个国家有着科学民主的制度，整个社会富有激情和创造力，人民和平友善正义，空气环境食品，安全清洁无害。此君感到幸福无比，如果我没记错，最重要的是她找到了一个志同道合的美国老公。

我曾向资深学者请教，为什么拿着美国绿卡的专家教授，当年的知青们乐于为文革、为老毛、为极权制度唱赞歌？答曰：因为他们进入不了美国的主流社会。网上有人形象地描述这种行为，犯贱。有人建议设立文革村是个好办法，文革的鼓噪者拥护者此君二哥们不用犯骚，进去就好。穿衣发布票，买粮要粮票，一个月二两油，半斤糖，早请示晚汇报，书只有毛选，娱乐除了样板戏就是红歌，插秧种稻，记工分，荒凉偏僻，如果有幸住进蒙古包，不能洗澡，身上爬满了虱子虮子，满屋是跳骚臭虫，冬天零下三四十度，骑马放羊……实在熬不住了，想走，想出国，没门！村有村支书，革委会主任，或指导员政委，有钱吗有关系吗，没有得脱裤子贡献……当然受领袖领导的恩宠不一般啊，享受一天是一天。

流氓如王朔者，我拿着绿卡，我怕谁……教授如此君者，怀揣绿卡，状如男老道（建议补点雌激素）……享受一天是一天……

此君，恕我不敬，您经历过文革插队，虽然身居美国，手拿绿卡，衣食无忧，优哉游哉，请不要忘记被批被斗上吊自杀成百上千万的冤魂，请不要忘锡盟草原留下的近百座知青坟冢，中国人让文革折腾怕了，好像从没人敢发自内心地赞美它。您成功地打入了美利坚，那就请宣传伟大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吧，您在美国建立个文革试验村，以您的威望人才口才，让那些美国青年自愿入瓮，果真如此，毛泽东三生有幸，没白让您上大学，他欣慰地看到，一个红彤彤的新世界就要在您的手下诞生了。拜托！

2012-11-04

附文：

《话说精彩人生与衷心感谢文化大革命》

这篇里我举例介绍美国人的思考方式，即现代化的、生活在发达市场经济社会里的公民的正常思考方式。我发现众多的崇美媚美人士们，崇了媚了这么多年美国西方，居然还是不得美国西方文化之要领和精华。真是没有办法。我来到美国，与美国人民在同一个现代市场经济的大锅里一块儿烩了、炖了这么久，当然也就窜味儿、入乡随俗了，我很是领略学会了美国老百姓的思考方式：一事当前，自然要首先替自己打算。美国人很明白人生苦短的道

理，所以大家伙都在使劲地追求带响冒泡的不一般的精彩人生。人人为自己，这可是天经地义明摆着的现代化真理，美国人民从来不没有目标地引用乱侃什么伟大辉煌的神圣话语、光彩照人的革命词句，美国老百姓那可是绝对实在地实话实说，别忘了实用主义的版权专利可是属于美国的，而且上帝总是保佑为自己的利益周到地打算盘（应该与时俱进改为：玩计算器）、并且努力实践着的人们的。

现在我就用我领会学来的美国人的思维方式来讨论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也就是说，从我个人既得利益的角度来说说文化大革命。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那么我仍然是一条书虫子，很有可能会是某一个挺高级的象牙塔里啃书的虫子，当然也会做一些大都是可有可无的科学研究。人类社会最先进最现代化的代表——美国人民可是不喜欢书虫子，因为书虫子们的生活一点儿也不精彩没有响声不冒泡。美国的老少百姓们竟然把中国人民历来敬仰佩服无比、聪明智慧的书虫子们统统贬称、戏称为nerd（这个词儿在英汉词典上还是查不着。这是一个老百姓的口头语，是指不会跟随潮流、笨拙、呆板、机械的书呆子，正好是酷（cool）的反面）。人活一辈子，当了一生的被现代人类讥笑讽刺、极为看不起瞧不上的nerd书呆子，实在是背兴、丧气、那还真是白活了——这是我来到美国後认识感受到的伟大的现代化真理之一。我这宝贵的一生本来眼见着几乎就要白活了，没想到就在这时候爆发了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举双手使劲衷心地感谢上帝鼓捣出来的这个文化大革命（西方人把一切功劳归于上帝），把我及时救出了虫子坑，使我有机会见到、并且经历了相当动人精彩的人生。文化大革命好啊，实在是好！文化大革命万岁！中国人比较规矩，做事有板有眼，尊重写在书本上的知识，历代多年的实践使中国社会形成了一种选拔人才、下层老百姓爬进社会上层的科举制度，加上孔老夫子“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这样的封建等级思想的影响，更重要的是千百年来能够识字读书的中国人是全中国人民中的皎皎者很少数，物以稀为贵吗，于是中国社会形成了这种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全社会仰慕鞠躬于这些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只会啃书的呆子虫子们的风气。

正是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颠倒了孔老夫子倡导了两千多年的“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封建等级传统、落後习惯意识：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劳动人民最高尚。学校停了课，我们这些小书虫子、候补大书虫子们有机会逃出三味书屋，来到百草园，跳进跑入书本之外的广阔天地。

毛泽东早就说了：知识分子不与工人农民相结合，则将一事无成。这就是教导劝说书虫子们：要想获得动人带响有意思的精彩人生，那就去与工人农民相结合吧。美国人民比中国的知识精英们要现代化、聪明得多，他们就非常理解赞同毛泽东的这一非常超前、极为现代化的见解：在美国住了这么多年，我就从来没有听到过任何一个美国人说知识青年下乡插队当农民是浪费时间和生命。右派媚美人士们就爱拿美国人做後盾，说美国人反对文化大革命、不喜欢上山下乡，其实这是一种有意的曲解：美国人不喜欢的只是被迫下乡。但是！（敬请想钻空子的媚美人士们特别注意这个“但是”），但是，若把美国学生们放到一九六八年的中国，面对着继续留在城市里读书做书虫子，还是插队到农村去当农民的选择，我敢说（凭我对我的美国学生们的了解）百分之八十以上的美国学生会自愿

选择上山下乡当农民。注意：这里的“自愿”二字！并不是美国学生的革命觉悟高，而是美国学生们的现代化意识强烈：农村的天地更为广阔，更加热闹。右派们说：农村太艰苦。这样的观点真是非常陈旧、相当笨蛋、极为落後、太不西方化现代化了：艰难困苦和逆境磨难，才是一个人能够发挥施展自己才华、能力、本事的好机会、大舞台、辽阔战场，是产生制作精彩辉煌人生的地方！毛泽东早就说过了：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咳，右派精英们批判毛泽东，其实毛泽东的意识可是比右派精英们超前、现代化多太多了！

这么说吧，让右派崇美人士们站在一边，毛泽东站在另一边，你认为极为具有现代化意识的美国人民会喜欢、选择哪一边？别忘了当年美国人民的大头儿领袖尼克松总统专门飞到北京来朝见毛泽东，事後将这一经过写书做报告，自己多年感慨激动不已呢。正是由于文化大革命，我有机会不上学不读书，在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内蒙古辽阔的大草原上生活了七年，过了七年传奇探险般的精彩日子。这七年的经历大大开阔了我的眼界，造就了我现在的乐观、坚韧、独立、潇洒的性格。

什么是传奇呢？传奇就是不一般，不按照通常的规矩、一般人的思想方法办事行动，于是就有了不常见新奇的故事和经历。“物以稀为贵”，这一定是一个普遍的真理。人们都喜欢传奇故事、探险经历。不同的是，中国人一般喜欢坐在热炕头上听别人讲传奇故事；而西方美国人一般更喜欢自己去折腾、制造传奇故事、经历探险，他们更喜欢热血一下子沸腾、心脏一下子跳动二百次一分钟的激动震撼感受。我跟我的美国学生们谈起文化大革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我的学生们听得兴高采烈擦拳磨掌，不住地点头称道：那多来劲。我在美国跟鬼子们吹牛显摆的最大资本，就是我在内蒙古大草原上整天操着蒙古话，与蒙古族牧民和羊牛马骆驼狗狼共同生活七年的经历和故事。这传奇的经历和动听吸引人的故事，博得了我周围美国人民的赞不绝口、羡慕不已，这真是令我得意万分呢。

文化大革命後期，我当上了一名工农兵学员。这又是一个不平常，就是说，不按部就班的经历：我从初中二年级一下子跳进大学，而且这之间有九年没摸书本的间断。怎么样，这够捣乱传奇的了吧？当工农兵学员，使我有了揠苗助长、硬是要在沙滩上建造大楼（当然同时加固地基）的挺艰苦、很是富有人生奋斗意义的经历。这样的经历你有吗？

工农兵学员毕业後（这居然不算大学毕业）不久，我就插队美国大学当起了争取博士学位（理科）的研究生（这就更邪乎了吧？而且居然没考托福和GRE）。不管怎么着，接着艰苦揠苗助长、玩命在沙滩上造大楼，几年扑腾奋斗下来，我也弄到一个博士学位。而且我的导师是这一领域中世界范围的领头人，这意思就是说，我的博士论文也不能全是无所谓的随便乱扯。对于初二水平就做博士论文这一点，美国人并不特别佩服和在意；佩服在意的是中国人。一次我回中学母校与学生们座谈，说起这段初中二年级——工农兵学员——博士研究生的经历，学生们甚是惊奇地问：“就凭初中二年级的底，你怎么能够得到博士学位呢？”博士学位是有了，但是科学研究最需要的灵感、灵机却是不多。这是由于中间九年的间断，基础知识和基本训练不扎实，于是缺乏科研灵感的依据和来源。我自知不是搞科研的好材料（这也是为什么我没有回国的根本原因：实在是没有能力去填补祖国建设发展所缺乏需要

的空白，深感不好意思和无能为力）。于是我来到美国南方的一所普通学校里开始教书。开始我还感觉挺丧气，後来意识到：嘿，这正是我的福气，柳暗花明又一村，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啊！在美国南方教书的这十几年，我与美国的普通老百姓混做一团，一个大锅里连烩带炖，还是真正地了解熟悉了美国老百姓、美国文化和美国社会呢。美国是西方文明的当代领袖，而西方文明又领导着全世界人民奔向现代化、後现代化。所以深刻了解美国，对中国的现代化是有很有指导和借鉴意义的。这也是我写《美国社会与文化，观察与思考》这个系列的目的。若没有这十几年在西方文明铁扇公主肚皮里打滚儿翻跟头的经历，我是写不出这个系列来的。假如没有文化大革命，我现在大概正在一个什么研究机构里啃书做科研，但是绝对成不了爱因斯坦。估计也能写出若干篇几乎谁也看不懂的论文，几年时间一过，埋进故纸堆里无人过问了。六七十岁退休，即使混上一个院士的头衔，也是占着茅坑拉不出屎的老家伙了。看看现在某些科学家、院士们自我自大到了老年，一心只顾着建筑自己的牌坊，完全忘记了国家的利益和自己的责任，更加糊涂得不可收拾，让人们指着脊梁骨讥讽摇头。我还真是庆幸没有混到那一步。衷心感谢文化大革命，使我有了机会经历了不一般和精彩，兴奋和激动地在人生的道路上走过了一大段。最後成为一个普通老百姓，能够坦然、潇洒地面对着繁华喧嚣的现代化大千世界与人生，在山里平静地做着老道。

冷明文集：http://hxzq05.d68.zgsj.net/showcorpus.asp?id=92

华夏知青网不是赢利性的网站，所刊载作品只作网友交流之用
引用时请注明作者和出处，有版权问题请与版主联系
华夏知青网：http://www.hxzq.net/
华夏知青网络工作室

闲扯知青的群体

知青是一个庞大的群体，据初步统计全国约有两千四百多万。仅仅到黑龙江兵团的就有五十四万之多。如何看待知青群体，了解知青群体，以至安抚知青群体，本人斗胆想从一下几个方面和对此话题有兴趣的朋友们扯扯。

（一）“下乡”知青群体的组成状况

从知青来到黑龙江兵团的情况来讲，每个人的状况是不一样的。据我个人的观察，大致可分为三种类型：

第一种，“理想激进派”：这部分人多数为根红苗壮，长期接受党的革命传统教育，在文革前或在文革中多为学校的骨干；他们坚信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正确，只要党中央和毛主席一声号令就毫不犹豫地响应，属于“毛主席挥手我前进”的有理想、有激情的热血青年。在文革“极左”思潮的影响下，这些青年也不同程度的受到了“感染”。但这部分人在兵团仍得到了政治上的重用。

第二种，“随波逐流派”：这部分人属于多数。这些青年在学校时也多为不显山不露水之列；或因家庭政治背景、生活条件、个人性格等因素，在学校及社会运动中，处于中庸状态；对前途较为迷茫，对追求亦是朦胧。别人咋干咱就咋干，随着走就是了。因此，也就随着社会的潮流下乡了。

第三种，“被动清理派”：（不一定准确）这部分人也为数不少。他们没有主动提出下乡申请，希望留在城市里父母的身旁谋一份工作。可是，被一刀切的政策“赶”下了乡。这些青年对“上山下乡运动”有着刻骨铭心的痛楚，至今仍积怨甚深。

（二）“下乡”知青群体的文化状况

下乡知青大多数属于“老三届”的在校生，也有后来称之为“小六九”的知青。其中，66届老高三和66届老初三的，前者，面临考大学，却失去了深造的机会。后者，同样也失去了升学的机会。但是，这两个66届毕竟学完了高中和初中的课程，是名副其实的高中生和初中生。最可怜的是称为“小六九”的小弟弟、小妹妹们，虽然名义上

升到了初中，但文革中又碰上了停课闹革命，连学校的老师们都被打倒了，还能学到什么知识？其文化程度大都停留在小学的层面上。由于文化知识上、个人成熟度的差异，这些知青在兵团的境遇也是不同的。

66届的（包括67、68届）的高中生，也有66届的初中生，由于文化程度、年龄成熟的优势，经过一段磨练，多被提拔为干部、技术工种、或者当上了老师。在无奈的人生选择中得到了一丝的安慰和满足。而“小六九”的知青们，或知识有限、或年纪小不成熟，大多停留在农工的岗位上。生活条件艰苦，工作又苦又累。大多数人思想波动，返城的愿望最为强烈。当然，“小六九”的知青们，也不乏一些经过艰苦的历练和个人努力做出一些成绩的佼佼者。

（三）知青群体返城后的境遇和发展

随着文革后的“拨乱反正”，大批的知青开始返回了城市。不外乎有这样几个途径：1、当兵、招工、保送上大学；（当然，这是有门路的）2、回复高考时，努力拼搏的；3、想法办“病退”回来的。

知青回到城里后，每个人的境遇都是不一样的。除了上面第一、第二种，多数知青面临着更加严峻的抉择和考验。首先是没有工作，或者说没有理想的工作；其次是居无定所、食无依靠；“少小离家老大回”，有的还携妻领子归来，在没有找到工作的日子里，还要挤在本来就拥挤的屋子里，还要老父老母的周济。受尽了社会上的白眼以及兄弟姐妹们的冷言冷语，这无疑又给饱受风雨的知青们的心里压上了一块冰冷的石头。

好在知青们经受过风雨，吃过苦受过累，没有被这些艰难困苦所压倒。不少知青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了社会的中坚力量。有的当上了领导干部、有的成为了企业家，有的当上了名作家、名演员，引起了全社会的关注和崇敬。但是，更多的知青是在过着平淡的日子。他们或因能力，或因机遇未能达到理想的目标。即使在改革开放后的今天，依然过着艰苦贫困的生活。

（四）知青群体对知青生活的回顾和情感

知青群体对知青生活的那段历史回顾和情感也不尽相同。有成就的知青把那段历史，看作人生的宝贵经验。他们认为：没有那时的艰苦磨练，就没有今天的成功和成就；而另一部分人，特别是在北大荒就吃苦、回来仍受苦的知青们，他们不堪回首往事，认为那是“噩梦开始的地方”。正是由于下乡才害了他的一辈子。这两种情感的存在，在知青中才有了“有悔”和“无悔”的争论。

不管是抱着“有悔”或者“无悔”信念的知青们，但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都爱对知青生活的的回顾。即使是认为那是“噩梦开始的地方”的人，对那段历史回顾的心情也是十分矛盾的。对那段经历是又恨又爱。就是自己

对这种情感也说不清楚。

还有一点也是相同的，也是令人欣慰的。那就是知青之间的情感。在艰苦的环境下，我们知青用我们微弱的体温相拥取暖，抵御着严寒；我们用柔弱的躯体相互支撑，抵御着风雨；从相拥取暖和相互支撑中，我们获得了真诚的感动。而这份感动已经刻在了骨子里，融化在血液中，永世不能磨灭！因而，知青间的友谊是真诚的。

（五）知青群体中仍存的心结和渴望

知青历史已经过去四十多年了，经过历史的沉淀，这段历史也该有个明确的定位了。遗憾的是，我们国家在面对这段历史时，依旧是遮遮掩掩、羞羞答答。人们还是在“雾里看花”、不明不白。

就“上山下乡运动”而言，虽然，违背了人民的意愿，但是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党和国家为了扭转文革的颓势，不得已牺牲知青一代人而换取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只不过我自己猜测而已）对此也没什么可遮掩的，照直说我也是可以理解的。回想起二战时期的苏联卫国战争，法西斯德国已打到莫斯科城下，在民族存亡的国家利益面前，斯大林也曾强权让所有人拿起枪奔赴战场。当时也不管你愿意还是不愿意都得上战场。苏联正是牺牲了数千万人才获得了最后的胜利。

既然是牺牲，那就要死得其所。苏联卫国战争的无名烈士墓就立在克里姆林宫旁的红场上，以让后人铭记他们的历史。虽然知青们的历史没有那么壮烈，但我和一些知青朋友依然认为，我们知青这一代在国家关键时刻，还是为国家的利益作出了奉献和牺牲的。为了国家的稳定和发展，数以千万的知青们，舍出了安逸、舍出了亲情、舍出了青春，舍去了再学习的机会、乃至舍去了年轻的生命。现实让我不解的是：我们知青舍去的和牺牲的就那么没有价值吗？以至那么无声无息。

有人戏说：“我们国家有三老：老革命、老干部、老知青。老革命因为是功臣人们供奉着；老干部打倒了又扶起来了；还有称之“臭老九”的也给正名了；只有老知青没着没落”。

任何国家、任何民族都不会忘记为之奉献和牺牲的人们，这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良心所在。我多么希望有一天，我们的国家和民族用公正和良心打开知青们的心结啊。现在，知青群体的大多数仍然是弱势群体，国家应该多关注和关心他们。让他们在心灵上感受到党和国家没有忘记他们的奉献。

又闲扯了一通，有的知青朋友说：“咱们这一代就这么交代了，说也没用，何苦费口舌呢”？唉！我也知道没有用。可和朋友们唠叨唠叨心里舒服些。咱们都到了花甲之年了，也许“盖棺也定不了论”呢。也就是闲扯，能扯到什么时候，就算什么时候吧。

2011-07-05

有感于知青理想主义

近日，给国内某大学文学院研究生讲课时，讨论到“在缅怀、礼赞当年知青的青春奉献与理想追求之际，是否要思考其历史及现实的合理性”的问题。于是，就有了如下的感触：

理想——是对事物的合理想像或希望。是人们心中美好的愿望，是力量的源泉，是前进的动力，是活着的希望。

理想主义——基于信仰的一种追求，理想主义跟信仰紧密相连。脱离了精神层面的理想主义，人们也就失去了信仰，迷失了自己。

可见，无论是“理想”还是“理想主义”，都应该是俱有正面、积极意义的概念，其前提应该是，这里所说的“人”、“信仰”、“精神”，是有充分自由多元发展的主体性（即人的自主、主动、能动、自由、有目的地活动的地位和特性）意义。如果“理想”、“理想主义”只能服从于某一种意识形态而疏离了这种自由多元发展的主体性意义，那么其正面。积极的意义便会受到质疑甚至扭曲。

于是可以说，所谓理想，应该是不可排斥个人的主体性（追求者必须具有个人自由选择的主体性），必须符合人性的需求，客观的实际，与人类文明发展的方向。

否则，越虔诚，越具悲剧性。一如邓贤“轰轰烈烈进行了一场违反社会和自然规律的空想乌托邦运动”，与高伐林“晶莹清澈的一滴滴水汇集成狂澜恶浪”的谴责。

根植现实的理想与攀附“主义”“事业”的理想要有所区别。或者说，理想追求的行为，与对此行为进行解读要有所区别。

不能排除，即使在文革中，也应有具体个案的理想主义追求与实践具有合理性——这些理想，当是符合人性发展、客观实际、现实需求；然而，一旦理想攀附于“主义”“事业”（被“主义”“事业”所挟持），往往陷于虚妄而呈现出不合理性。比如梁晓声《今夜有暴风雪》的结尾，曹铁强及其伙伴志愿留在北大荒，如果是为了稳定当时动荡的局面，稳定军心，（权宜之计，最后才返城），其行为不仅受到推崇，也应具有现实合理性；如果说是为了“完成知青们未竟的事业（上山下乡运动的伟大事业）”，虽然将英雄主义理想主义推到了一个高峰，但却陷于

虚妄而缺乏说服力。

有两个概念，在文革时期（甚至今天）是得到大力提倡的——奉献精神与牺牲精神。文革时的知青就常常被提倡这两种精神。对于前者，我是有条件地持肯定态度；对于后者，我相当持怀疑态度的。

经过理性思考，自觉亦自由选择上山下乡改变乡村落后面貌作为自己的理想，无疑是基于主体性的奉献精神。这是在任何时代，任何社会形态都会存在的行为与精神，都是值得肯定与推崇的。如果窄化为（挟持为）某种“主义”“事业”的附属品，往往会受到扭曲与不合理利用。在后者，奉献精神往往被“升华”为牺牲精神。为了“主义”“事业”贡献一切——包括个人的青春、幸福、理想乃至生命。

知青时代，不乏有抗洪灭火的事例。在常态社会中，抗洪灭火都会要求基于安全措施的考量，但知青时代，这种灾难事件往往就凸显为牺牲精神的最佳表现时机——为理想献身，为“主义”“事业”奉献了完完全全的一切。黄山茶林场11知青抗洪而死，黑龙江尾山农场7知青灭山火而亡，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5师43团四连69名知青葬身火海……这些殉难者或许正是怀着这么一种为理想献身的牺牲精神而赴死：“那些血气方刚的战友们啊，正值青春花季的少男少女们啊，怀着对祖国的热爱！对党的忠心！毅然决然冲向了那熊熊的火海！……六十九个鲜活的生灵，顷刻之间，被燃烧的火焰瞬间所吞噬。他们都还是涉世不深的孩子啊

更令人发指的是，事后对这些悲剧的解读——为主义献身精神的渲染与弘扬取代了事故责任的追究；而献身精神的渲染与弘扬，又鼓动更多的年轻人成为各种灾难的（准）殉难者。于是，我总觉得，此类“牺牲精神”的号召，有蔑视生命、唆使杀人之嫌。

2012-11-04

漫谈重庆、上海两地知青的性格与文化

漫谈重庆.上海两地知青的性格与文化很早的时候，在一次知青聚会时，原连队的老领导转达，说原东风农场七营的领导干部来上海，愿意提供方便，证明当年知青从事野外高温的工作八年以上，并接触如橡胶汁等有毒有害气体，搞得好，可以享受提前5年退休的待遇。

其实当场就有两种态度与意见，我与铁哥们黄裕茂等几人，目前工作量不太重，尚有余热可用，工作环境也较好，都觉得如果提前退休，反而闲得慌，万一节外生枝，说不定容易滋生事端，不如干脆放弃；另一种意见认为提前退休很好，立刻就做出响应。

后来我还是问了人事部门，因为彼此关系较熟，回答得也很坦率：只要符合上海市政府部门的有关文件规定，就是绿灯放行。其后再聚会，似乎从无人提及过，大家态度明朗，够格的，该我享受我就上；不够标准，我也不会去硬争，颇有‘‘胜固可喜，败亦欣然’’的大将风度。

最近偶然看到重庆知青荷塘博客，才知道同样身为当年的版纳农场职工，重庆一方知青就十分认真，一直没有放弃努力，据理力争。重庆市政府已明确答复不属享受政策范围，仍然坚持己方意见，甚至网站都差点被封，本人也极喜欢重庆版纳知青网的主题歌曲‘‘青春的岁月象条河’’，着急的北京.上海两地知青朋友也发了好多善意的留言。

我在猜想，可能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重庆与上海的地域不同，文化观念乃至性格也不尽相同吧。我觉得当年在西双版纳时，重庆知青普遍比上海知青能干，适应性强，更富有吃苦精神，搞梯田的水平测量时，很陡的山坡，一手拿标杆，一手拿竹签，搭档的重庆女知青走得飞快，不停地被砍倒的竹子绊倒，腾不出手来抓固定物，身子一扭，弯曲的腿脚立刻站直，象‘‘封神榜’’里的土行孙一般。换了上海知青，就是胆子奇大的老班长孙良民，也只能是双手撑着斜坡，小心翼翼移动脚步。想象铁哥黄裕茂在台湾碰上‘‘莫拉克’’台风，肯定也够呛的吧。碰上上海的千金小姐，不定会狼狈成什么样子，肯定不能与‘‘山城’’重庆姑娘相比。

其后我还与连队的另一名重庆女知青搭档养过猪，她手脚极为麻利，还能将做饲料的卷心菜老叶腌成咸菜，很下饭；有次到外连队还吃过也是重庆知青做的拌木瓜，那丝丝切得极细，拌得又香又辣又咸，只能吃掉一点，一大

碗饭就下肚了，不似我平常自做的拌木瓜，每顿要吃掉好多；象邵国良先生笔下的辣椒炒腊肉，一碗饭最多只能吃掉两片肉，辣得你牙关要打哆嗦。怪不得四川有句话叫‘‘菜不够，辣椒凑’’。

记得在‘‘四人帮’’时期，有段时间重庆市内吃粮困难，有重庆市民投亲靠友竟闯到版纳农场来。一次我在伙房煮饭时，有两位重庆市内的中年妇女，用很标准的普通话问我到九营的道路，我很吃惊，说怕有好几十里地了吧，拖拉机都要开好长时间，我说怕到天黑你们都走不到，而且路不熟，你们又不认识穿山小路，走公路线路更长，反正我从没进去过。她们一边啃着随身带着的甘蔗，其中一个还做出一个满不在乎.不屑一顾的表情。在农场球队长跑训练时，我的耐力是出名的，虽为乒乓队，但足.篮.排球队中，全部主力轮流叫板过，却没人能撼动我的‘‘霸主’’地位，虽然我的爆发力极差。现在没想到在这两个重庆女子面前，会有一种英雄气短的感觉。

我觉得重庆知青的团队意识比较强，听他们谈‘‘武斗’’场面，甚至动坦克，动军舰，我记忆很深，几地知青中，好象上海知青团队意识最差,，大概是长年生活于南方富庶之地的缘故吧，总觉得比较偏重于‘‘个人奋斗’’。

唯一可以比拼的，是上海知青的忍耐力，无论怎样的艰难困苦，自己做家具，似乎总能玩出点具有特色的‘‘小资’’味道。以前我很佩服‘‘二战’’后日本人的忍耐精神，后来我觉得上海人其实也不错。拥挤的空间，地铁里，公车上，挤不上了，很多乘客会自觉地等下一班车，在车上的乘客大多会互相谦让。

这几天再看‘‘重庆版纳知青网’’时，那优美动情的音乐声重又响起，如果我没猜错，应该是已经比较妥善地解决问题了吧。其实我一直相信，重庆老知青有能力处理好很多问题的，凭他们的智慧，以及他们在版纳农场磨炼出来的精神与实力。

2009.8.29

版纳荒草文集：http://hxzq05.d68.zgsj.net/showcorpus.asp?id=185

华夏知青网不是赢利性的网站，所刊载作品只作网友交流之用
引用时请注明作者和出处，有版权问题请与版主联系
华夏知青网：http://www.hxzq.net/
华夏知青网络工作室

长调·知青

长调是蒙古族牧民特有的演唱方式，拖腔悠长婉转动听，或如高山入云令人仰止，或如山谷中溪水潺潺沁人心脾。又如草原上九曲十八弯的河水，忽上忽下忽左忽右，忽高忽低如泣如诉，就如汉人听不懂京剧一样，说会蒙古话的人不见得能听明白长调的词义。长调唯蒙古族牧民唱的好，汉人堆里喜欢长调的不在少数，但无论业余还是专业，无论演唱得多么神形兼备惟妙惟肖，都难入我的法眼。

说实在的，我对长调不过是叶公好龙，喜欢听，不会唱，歌词一句也不懂，除非翻看别人译过来的汉语。草原知青里面实在有些人对长调爱的深，我听过东乌知青“草原727”抱着歌本一首一首的用蒙语唱，一板一眼锱铢必较；听过好友锦达兄用蒙语唱原版的《牧歌》，原来《牧歌》并不是什么“蓝蓝的天上飘着白云”，而是两个情人在一道山梁上偷偷约会；听过草原恋合唱团精彩的演唱会，听过马晓力低沉悦耳的呼麦。东乌知青谢小庆把知青创作的歌颂草原的歌词蒙汉来回转换翻译，并谱上曲，让我大吃一惊，谢教授不但学问好知识丰富且多才多艺，他把知青对草原的爱推向了一个无可比拟的高度。

蒙古族歌曲中除了长调还有短调，那些不带长长的拖腔的想来就是短调了，如《森吉德玛》之类。

对于知青，知青们的经历，我忽然觉得就像是一首蒙古长调，错落有致，悠远绵长，或高亢嘹亮，或低沉悲哀。一百名知青有一百种不同，有大喜就有大悲，有杰出就有平庸。可是，一首长调也许把所有人都纳入其中了。

你听，脸上布满蛛网般皱纹的老牧民，用沙哑的嗓音，悲凉的腔调，唱出了一代人的苦与痛：许多人插队不是一年二年、三年五载，而是十年、二十年，孤独寂寞穷困潦倒一无所有。你可知道，有多少18岁的少男少女把身体留在了草原、荒山、大海。侥幸逃离的年轻人，你的花季青春也无可奈何地永远留在了那里。

你听，甜美高亢的女高音的拖腔里，歌颂的正是美好靓丽的青春，你在草原受过苦，在乡下挨过饿，却成了享用不尽的财富，你成了专家学者教授官员，漂洋过海，功成名就，出人头地，你说草原、乡亲是你生命中永远的眷恋。

闲暇时胡吣得几句歌词，试着用各种曲调吟唱出来，但心头却无时不萦绕着蒙古长调的弦律。

《知青》难成气势磅礴的交响乐，与清新明亮的小夜曲也不搭边，用美声嫌太庄重，用民歌流行是否有些俗气。

就让腾格尔用他那略带沙哑饱经沧桑的音色，夸张的抑扬顿挫，伴着长调来演绎出一代人的跌宕起伏吧，就让行吟歌手们轻松随意的吟唱出来吧，即便是用崔健汪峰疯狂的近乎歇斯底里的摇滚也未尝不可，但开头、结尾一定要有草原长调，那一声声令人叫绝令人心碎意蕴深远的……啊哈嗬伊……

我对音乐一窍不通，看蝌蚪似的五线谱就是一个个小蝌蚪。多么想让人把这首《长调·知青》谱成曲，传唱下来。

想对没在草原插过队的朋友解释一下，词中“乌尔汀哆”即蒙古长调的意思。

牧民姑娘的长调响起来了，她是老喇嘛的经文，是寺庙里的道场，是教堂的钟声，抚慰着失落的灵魂。壮怀激烈，初恋失恋，洪水海潮荒火，书记政委贫协主席，彪形大汉撕毁了处女的纯真，无数慈母的眼泪，遥不可及回家的路，失业下岗，晚来的爱情，早来的死亡。一切都归于平静，在牧民姑娘甜美的歌声里，一切的一切都化为美丽的传说。

《长调·知青》

（男高音）……啊哈嗬伊……

（童声朗诵：）草原上来过一群人，他们的名字叫知青，草原上来过一群人，他们的名字叫知青。

……啊哈嗬伊……

花儿开了，
花儿落了；
春草绿了，
秋草黄了；
年轻人来了，
年轻人走了；
欢乐与悲伤，
永难释怀。

追逐梦想，是血与火的洗礼；

寸步不离，是我剽悍的坐骑；

指引迷途，是忠诚的牧民兄弟；

赐予母爱，是白发苍苍的额吉。

爱情是转瞬即逝的尘埃，

痛苦是天上不散的阴霾，

给人间些许慈善与阴德，

是生命悟出的永恒真谛。

马蹄化为呜咽的号角，

额吉与草原溶为一体，

乌尔汀哆蜿蜒曲折，

诉说着一个不老的传奇。

（女高音）……啊哈嗬伊……啊哈嗬伊……

2013-01-01

冷明文集：http://hxzq05.d68.zgsj.net/showcorpus.asp?id=92

华夏知青网不是赢利性的网站，所刊载作品只作网友交流之用
引用时请注明作者和出处，有版权问题请与版主联系
华夏知青网：http://www.hxzq.net/
华夏知青网络工作室

从培英中学老三届调查看——

惊心动魄的南中国海知青偷渡潮

前言：

广州培英中学，前身是美国基督教长老会委派那夏礼博士于1879年于广州沙基创办的一间书院“安和堂”，其后不久改名“培英书院”，并于1890年发展为正规中学，是中国开始现代教育的第一批学校之一（该教会同期先后在广州香港等地创办的中学还有真光、培道、培正、圣心、青年会、协和、圣三一、兴华、美华、中德、真中、明德等校）。1953年培英中学改名广州第八中学，文革后1984年恢复培英中学原名。

一九六六年文革开始之前，培英中学是广州市排名前十的优秀中学。这间百年名校师资力量雄厚，学校有科学馆、图书馆、大礼堂、大型足球运动场，还有全市中学独一无二的江边游泳场。当时全校共有初高中二十九个班（初中17，高中12），总共一千四百学生。学校规模是有史以来最鼎盛的时期。

一九六八年底，文革暴风骤雨式群众运动阶段渐渐结束，中小学重新开课，全国城乡几乎所有中学的六届中学生同时“毕业”，其中绝大部分人被分配安置到农村或国营农场。培英中学当时“留城”和其他原因没下乡的学生约有三、四百人（初中平均每班约10人留校当临时辅导员或继续升学，高中每班平均约2人留校当辅导员，总数约200多，再加上因病或其他原因留城、迁移外地及参军的，约100多）其余将近百分之八十的初高中学生共约一千人都不得不上山下乡。培英和当年广州市绝大多数中学一样，下乡安排主要分去海南（或湛江）国营农场和在省内农村这样两大方向：其中去海南的将近三分之一；投亲靠友回乡或到其他地方农村插队的也有约三分之一，地点多在广州周边地区；余下略多于的三分之一的400人左右，大部分第一批被定向安排在珠江三角洲，位于广州和香港之间珠江航道旁的番禺县六个公社，其余的第二、第三批被分到东莞或博罗县农村。

一九七一年，整个广东农村的广州老三届知青，在下乡两年以后，主要以珠江三角洲中山、番禺、宝安及惠阳等地区为跳板，开始了大规模的知青逃港潮，一直持续到七四年十一月香港政府改变政策实行反解，国内政策也开始调整，知青陆续被召工返城，这才渐渐消退。偷渡高潮是七二、七三、七四年。笔者认为，这是中国建国以来第三次大偷渡潮——“知青偷渡潮”。（根据陈秉安《大逃港》一书，前两次分别为：“五七大逃亡”和“六二大逃亡”）（注1）

培英知青成了这次大潮的其中一股潮头，下乡番禺的知青将近一半人卷入偷渡，该校更有两位数字的男女生不幸葬身波涛……

关于这次背景特殊规模浩荡情状惨烈影响深远的知青偷渡潮，无论官方还是民间，至今没见任何文字专门记载研究。

第一部分、培英中学老三届知青偷渡调查

一、偷渡人数统计

自一九七一年至七四年，培英老三届知青共有两百多人偷渡香港（注一），他们主要是分配番禺、东莞及博罗等地的同学，也有少部分是原来投亲靠友在其他地方下乡插队（至今没发现一个留城或分配海南（湛江）农场的同学参与偷渡）。他们中大部分人在历尽千难万险，经多次失败以后，终于登陆香港岛。其余除少数失败折回最终放弃偷渡以外，还有不少人不幸葬身鱼腹。

根据笔者随机对十个班（初三全部四个班和初二一个班及高三全部五个班）专门调查，据不完全统计，这十个班曾参与偷渡人数加起来，共有71人，已经确认偷渡成功的有54人（80%），中途死亡6人（8.6%），其余除了失败退回原地的，几乎每个班都还有下乡同学长期失联失踪，是否因为偷渡？生死如何？皆无法确认。

如果以此类推，全校29个班平均每班应该有7.1人曾偷渡，全校偷渡总人数应该就是200人左右，成功到达香港的应该是150人左右（全校学生的十分之一强），这个数字也从另一途径得到证实：

七十年代中期，在香港的培英和真光（偷渡）校友来往密切，经常聚会活动。每聚必有饭局，由是就要数人订位、收款、交款。据当时的热心组织者真光校友欧国樑回忆：两校参与聚会的人头常在二百到二百二十之间，加上一些没出席的，在港的两校偷渡学生应有三百人上下。两校总人数接近，分配同一范围，偷渡的情况也相似，以此推算，培英有约200人偷渡，其中150人左右成功的估计应是可信的。

这个数字意味：

全校老三届毕业生起码百分之十偷渡到了香港。

下农村插队同学参加偷渡比例约百分之二十。其中主要是邻近水道，邻近港澳的珠江三角洲地区知青卷入偷渡，接近下乡该地区人数的一半。

要统计出准确的偷渡数字几不可能，不要说事隔40年，即便是事发当年也很难，原因是偷渡总在暗中进行，有

些人失败后悄悄返回并无人知晓。几乎所有失踪者都是“生不见人死不见尸”，其中只有部分能够通过家人基本判断为死亡，另一些恐怕永远无法确认。但这从另一个角度也证明笔者的调查数字还是比较保守的，实际偷渡及死亡人数应该更多。

二、知青偷渡原因

广州中学生逃港在文革高潮的67、68年就已零星出现，68年底下乡以后逐渐增多，但大规模外逃，基本还是在71年以后才开始的。时间点之所以发生在下乡两年以后，除了熟悉环境和准备偷渡需要一定时间，共同的主要原因对留在农村的个人发展前途悲观绝望。

1、经济上翻身之日无期

培英同学主要被分配在番禺县的南沙，榄核，灵山，大岗,黄阁和万顷沙等六个公社（真光中学也被安排在同一地区）。珠江三角洲是一代代人围海造田开垦出来的一块富饶美丽的土地。

知青第一次可以放开肚皮吃香喷喷“新米”，比城里限量供应的压仓陈年米不知道好多少倍；蔬菜都是自留地种的，不用花钱且新鲜；每逢生产队刮鱼塘，杀猪宰牛时还可以打打牙祭；下乡第一年，政府下拨每人二百三十元的安置费。由于改造空置房或搭建简易住房（草寮）花费不多，不少地方将余款作为生活补助发给知青，一般都有（每月）10元上下。那时的物价低，油盐酱醋花不了几个钱，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保障；少管束，较自由，距离广州又那么近——当天都可以来回……相对于全国各地大部分下到穷乡僻壤的知青而言，应该说他们已经是得天独厚，非常幸运的了。但即便是这样，知青在经济上也普遍是捉襟见肘的。

当时南沙公社最富裕的生产队一个工分的分值最多也就是一毛多钱，但大多数生产队分值只是七八分钱的水平，差的二、三分钱也有。假定分值一毛钱，一个强劳力一天满分十分，值一元，全年可有三百多元。知青一般不属强劳力，评个七、八分就不错了，一年出满勤，好的情况下也就分两百块钱左右，生产队扣去全年粮食和鱼肉油糖账等，辛苦一年，发到手已所剩无几，如果所在生产队分配水平低，或者自己回城多出勤少，年底不但没钱分，还倒欠生产队。特别是第二年停发津贴以后，一半以上的知青经济上不得不靠家人接济。不管报纸上如何宣传，广州人对省港两地生活水平的巨大差异都是心知肚明的，知青又普遍收听香港电台的广播，两相对比，希望改变处境，向往富裕的生活的愿望也是人之常情。下乡第二、第三年，在严酷的现实面前，学生时代的理想主义已经荡然无存，部分知青决心铤而走险寻找自己的幸福。

2、政治上被歧视难以改变

68年老三届的分配方案基本是三个地点：留城、去海南和下农村。初中每班大约都有20%的名额留校留城，这

些人都要求是出身好的“红五类”。高中留下当辅导员或参军的，也多是军干子弟；去海南国营农场要经过一定的政审，出身不好的人即使到了那里，在严密的组织体制内，也难有好的发展；许多家庭背景政治条件差一些的同学选择下农村，其中的因素也包括乡下相对自由一些，管得不那么严。但其实农村一样也是讲阶级路线的。302班张X恕，因为出身不大好，文革中又卷进过武斗，分配时哭着要求去海南被工宣队拒绝，下乡头两年劳动很拼命，下面生产队推选为知青积极分子，上面一查档案就压住不批，后来他选择蹈海（见附件：张X恕口述历史记录）。605班梁X中，和弟弟在同一个队，出工满勤，副业也搞得好，生活还不错，但考虑到自己出身不好，将来有什么机会也轮不到自己，最后还是跑了（见附件：陈X成、梁X中口述历史记录）。205的蔡X梅,文革前是班长，文革开始以后当工程师的父亲成了牛鬼蛇神，她被同班同学批斗，下乡以后也跑了。

同样是下乡，同等的经济条件下，有的人留，有的人跑，原因当然很多也很复杂，要看香港那边有没有亲戚接应落脚，要衡量自己身体条件在路上吃不吃得消，要自问有没有冒险的胆量……等等，但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从自身的政治条件估量自己留下来可能发展前途。学校分配已经把学生人为地分成“留城”和“下乡”两个等级，下乡后又再分为“可信任”和“不信任”两个层次。知青底层多逃港就不足为奇了。

3、个人所长得不到施展

有的知青所在的生产队分红不错，自己也被信任培养，最后还是跑了，这又是什么原因？

602班陈X成，下乡后劳动积极，加上身体强壮，领悟快，不久就成了农活好手，和农民强劳力一样拿10个工分，他凭自己扎实的物理知识基础，在抗洪抢收的关键时刻修好了队里抽水机，后有又画图设计备料亲手帮助生产队装起了碾米机，从此农民不用再辛苦撑船到公社圩镇碾米厂碾米。当地农民对他很信任，让他当上基干民兵，在主要是防偷渡的边防哨所值班，长达两年都没偷渡，最后还是突然不辞而别，当时农民都觉得不可思议。

40年后的今天，笔者就这个问题请教陈X成。陈答：我的一个哥哥是北大毕业，在香港的哥哥也是高级工程师，“周身执照”（全身都是通过各种专业技能考核的不同证书）。自己本来66年一心是要考大学的，现在放我到农村，我能做的最多也就是这样了，一辈子，怎么心甘？（见附件：陈X成口述历史记录）

和陈X成同样想法的高中学生不在少数。培英高三级五个班，共有34人以上参加过偷渡，可能是全校六个年级中相对人数比例最高的。据当年高三的班主任饶成葆和余柏茂老师回忆：文革前高三级已考过毕业试，成绩相当不错，当时经过摸底，估计这届毕业生的大学升学率将超过以往历届。可见这批学生的整体文化素质比较高，自然每个人对自己的期望值也高。不愿意屈就农村一辈子。

4、身处有利偷渡的环境

其实知青面临的困境不论南北全国皆然，为什么唯独广州的知青会偷渡，且成潮流？原因很简单：第一是南方

相对开放，一般市民长期向往香港生活方式。广州人多有亲戚朋友在港澳，因此普遍对香港这个有更高生活水平的社会有一个基本认知，这不是任何强势的宣传可以抹去的；第二是广东毗邻港澳，水陆两通，五十年代初封关以后偷渡就没停过。有这样的历史渊源，广州知青偷渡就是顺理成章了。

培英中学偷渡比例高于当时大多数其他中学，还有两个特殊有利条件：

分配的下乡点主要集中在番禺六个公社，是平常人不可以随便进出的边防地区，因为临近通往香港的珠江航道（见附件：珠江三角洲地图），依靠平时农耕使用的交通工具小艇就可能逃到香港；第二是学校原本就有自己的游泳场，绝大多数学生都会游泳，因此即使因为投亲靠友等原因下乡其他地方，也有相当数量的知青从陆路到宝安后海湾（深圳湾）或经惠州泅渡过香港。

三、一条千难万险的不归路

当年偷渡香港有多难？说难也不难——笔者同班同学陈X津最近在电话中对笔者说：别人以为过香港有几难，其实好易，一路上航标灯，顺着棹艇（划船），天光就到啦！

确实，一次成功，有惊无险的幸运者也是有的，但毕竟只是少数。就像这位陈同学，他本人也是第二次偷渡才成功的(见附件：陈x津口述历史记录)，而且中间有一次摆在面前的机会他放弃了，原因是刚从监仓放回来，体力不济，结果他幸运逃过一劫——那船人当晚就在这条航道上全军覆没！

和大多数偷渡者大同小异，培英知青的逃港之路无非也多是：熟悉情况，筹划准备，闯关上路，经历失败……

熟悉情况——

对于主要分配在珠江三角洲的培英人，因为多是乘船走水路，首要掌握的就是水文知识。每年只有九月到来年三月的半年“水期”可以上路，根据潮汐变化，每月也只有几天是顺风顺水的——否则谁也不够体力划船过去。但这几天里会不会遇到台风？能不能避开民兵的哨卡？都是未知数。所以刚开始落脚未定的知青，就是有心要走，也不敢轻易上路。

至于在边防区以外一般走陆路，最后要游水过去的知青，难度就更大了，能不能进入防区都是一个问题，所以首先要到处找过来人“教路”（可能要付报酬，至少“请饮茶”），摸清沿途哨卡位置，山头路径，水流情况及海面巡逻规律等。

筹划准备——

为什么前述培英高三的五个班比初中的五个班成功率要高得多，死亡率则低得多？年龄是很主要一个原因——高年级的比较成熟冷静，通常计划周密，另外更高的知识水准也有助成功。

远在毕业分配以前，68年夏天，培英有高三学生胡X雄等在武斗混乱中进入广州外贸大楼，无意中发现墙上有珠江三角洲的高倍放大地图，有人用手比划一下，原来番禺、宝安等好些地方和香港只是一水之隔，一码之遥，去香港比往广州还近！当即就用半透明的信笺纸覆盖在地图（局部）上，用笔描摹复印下来。之后这张地图在高三部分同学中辗转传抄。不久得知本校分配地点正在地图范围，一些人大喜过望，原来不愿下乡的也改变主意争取下去。

下去以后，他们还做了长期的准备工作，如观察潮汐变化，计算水流风向等（绝不会像一些初中生那样未摸清情况就莽莽撞撞下水最后导致失败）。

一般决定行期后，就要找偷渡工具。

水路靠船，有经济能力的凑钱悄悄买一条，不然就偷。偷还不能打“窝边草”——偷本队的艇犯会众怒，万一失败回来无法面对，多数偷邻队的，或到圩镇码头趁乱解一条。

陆路可能要弄一辆自行车和干粮准备长途跋涉。当时进入边防区都得要证明。或涂或改，各显神通。笔者住在广州豪贤路的一个表亲，自已没有偷渡，却利用照相显影晒相的原理仿造出几可乱真的假证明，帮助好几个朋友偷渡成功（见附件：虾哥口述历史记录）

闯关上路——

每一个偷渡者的故事都是惊心动魄的传奇。（详见本文附后笔者历年所做的部分口述历史记录）

经历失败——

大多数偷渡者都不是一次成功的，“落格”（坐牢）两三次很普遍。笔者的同学黄X汉在电话里说：我都记不清走过几多次了，十次八次恐怕都不止。据另一位老同学张X恕回忆，第一次他和黄X汉一起偷渡，半途舢板入水不得不登岛，被边防军的狼狗发现，抓住后捆在树林里打了一夜雾水，后来关押时黄又被臭虫咬得生殖器发炎，结果发高烧大病一场……幸亏这位黄同学不是每次失败都被抓住，他只给关了两次，后来终于成功了。培英偷渡者最高纪录是失败六次，“落格”六次，最后是看守边防的民兵同情他，把他送上船……

关押期间恶劣的环境和揪心的饥饿令每一个经历者终身难忘。还好每次关押的时间都不太长，一般不超过一个月就通知大队派人来领回去了，于是养好身体恢复元气又“再接再厉”。最为可怕的是有的地方私设土牢惩罚偷渡者，八中高三吴X光曾因偷渡在顺德坐过“竹牢”，他曾向同学描述:“竹牢”——一种竹编的长方形的笼子，宽窄

仅可容一人直立，如果腿软想蹲下，四面锋利如刀片的竹篾就会割到，关一次就遍体鳞伤。

顺德还有“水牢”——水中立一桩，顶部仅一尺宽。坐其上，双腿必垂入水中，只好站或蹲，时间长不免困乏，跌落水中，落汤鸡，重新爬上桩……如此往复。原牢为日本人所建，当时用来关偷渡者等。

在偷渡中最容易受到伤害的是女性，有的人被狼狗呲咬以后终生生活在恐惧的梦魇中；有的人因为月经期间长时间浸泡在冰冷的海中导致终生不育；有的人被民兵抓住以后羞辱强奸呼天不应入地无门……

大多数人失败了都会再来，直至成功，但也有为数不少的失败者，永远不可能再有下一次了……

四、葬身伶仃洋的培英人

培英老三届学生68年毕业分配以后从此四散各方，直到近年生活安定，大部退休以后，才逐渐恢复联系，越来越频繁聚会。于是原来不大为人所知的某某同学当年在偷渡中死亡或失踪的消息才渐传开来为人所知，但一般知道的也仅限于本班、本年级或同一下乡地点的同学，多半以为是个别的偶发意外事件。培英中学有漂亮的校史馆，但校史上对当年老三届的偷渡和死亡不著一字。

1、已经调查发现八名死者

笔者至今还没有能力完成对全校29个班的全面调查，但就是前述最近抽查的十个班，也已经证实有六人死亡，加上笔者了解到的其他班两人，总共在十二个班发现八名死者，他们是：

沈南武（105）——培英数学老师沈文武之子。下乡偷渡死亡资料阙如。

彭树淦（201）——下乡偷渡死亡资料阙如。

蔡静雯（201）——女生，文革前是班长，因为工程师父亲文革中被揪斗，蔡静雯也被同班同学批斗，还逼其改名。下乡后数次偷渡都不成功，最后一次失踪。

何荣祖（604）——根据同班同学黄天源纪实文学《魂飘大海》，归纳如下：插队博罗，条件很差，连没油水的大白菜都不容易吃上。经济拮据，不是靠家里寄钱就是向生产队预支分红。1973年春节前，第一个寒流将至的夜晚，瞒着母亲和家人，第三次“起锚”（偷渡）。送行的朋友劝他：起风了，今晚是不是不走？他豪气地回答：风高夜黑，正是好时机，那能放弃！一个月后，同行的朋友已经被反解押回生产队批斗，他杳无音讯……

傅瑞生（304）、梁城根（304）、梁启光（304）、梁启成（107）——傅瑞生、梁城根和梁启光三人是同班同学，梁启成是梁启光弟弟。四人都插队在南沙公社。传说一九七二年年初海上偷渡遇风翻船死亡。由于这是目前已

知是培英人在偷渡潮中最大的集体死亡事件，笔者专门做了追踪调查，以下是三段材料拼接。

2、追踪梁成根之死

同班同学岑X绵回忆：我和梁启光住一个“寮”（茅草房），那天他们四个都来了，在我这里吃饭。梁城根不是我们队的，在东瓜宇大队。我隐隐约约知道他们是商量“督卒”（偷渡）。吃过饭后他们就动身了，当时不知道他们是上路。大约过了十几二十日，年尾，快过年了，梁启光的姐姐到我这里来找弟弟，说她家在香港没亲戚，应该不会是……我回答，那天你两个弟弟在我这里吃完饭就走了，其余我什么都不知道。送她姐姐一出门，她就大哭，说现在没有一点音讯……

第二天我回到广州，约了几个同学去芳村梁城根家——他们是水上居民，大概因为相信他懂水，他们才约了一起走。结果梁城根的母亲一点都不知道他儿子走了（以为他还在农村）

以后听说是台风翻船死的了，都没有办法证实，不过我记得他们走的那天晚上是起风了……（“岑X绵口述历史”摘录）

302班陈X津回忆：“那天晚上，他们来到我这里，槽船大队。我知道他们要走，我刚刚放出来，浑身散了，没有力气跟他们走。我瘫在床上，是江X给他们做的饭。他们吃过饭走了，以后就听说翻船死了，到底是怎么死的，只有他们自己知道。”（“陈X津口述历史”摘录）

302班江X回忆：“我不记得给他们做过饭，不过后来是听说他们被拦网挂住才死的。”（江X口述历史摘录）

304班赵X琦回忆：“1973年的7月中，我碰到‘沙螺湾’大队的民兵营长刘金喜先生，他笑嘻嘻地问我是否知道谁叫梁成根，我如实对他说了。刘又问我是否知道梁如今在何处，我因不知道也向他表明。原来，一年多前，刘曾接到‘宝安县’来的通报，说在一具知青的尸体上找到一张‘南沙公社东瓜宇大队’的证明，尸体被宝安渔民的拖网船所捞到的，然后就扔到宝安让沙堆埋葬了。我想不会是他吧！……1973年10月，我到了香港，向同学打听他们的下落，但没有任何人知道。可是在人们口中相传，他们几人，和梁启光的弟弟，在他们出海的当晚就被台风卷没了。快40年了，他们几位从此就由人间消失掉”……录自赵X琦博客）

第二部分：对南中国海知青偷渡潮的观察与思考

当年广州上百间中学老三届下乡知青的偷渡情况如何？这是从来没有人关心，也不可能查得清的一段历史。笔者之所以将之定位为“第三次偷渡潮”，原因一是因其规模，二是因其影响。

培英中学的偷渡只是整个广州知青偷渡潮的一个缩影。

一、广州老三届知青偷渡的规模

范围：全市每间中学都有知青卷入。

培英中学老三届偷渡调查是不是特例？有没有代表性？笔者可以肯定回答，当时的偷渡是全市规模的，可以说百分之百涉及到每间中学，差别只是由于下乡分配地点或其他因素，各校偷渡人数多少才有所分别，估计按一千人一间学校平均计算算，每校逃港几十人是很平常的。虽然不可能有全市中学的偷渡数据可以查证，但相信各校的老三届人都能证实这一点。笔者也随机抽样调查过几个学校班级：

九中302班55人，下乡37人，大部分分在宝安和花县，偷渡6人，成功6人。

二十二中304班54人，大部分下乡番禺等地，偷渡6人，成功5人，死亡1人。

二十二中305班42人，大部分下乡番禺等地，偷渡7人，成功6人，死亡1人。

华师附中303班51人，大部分下乡到东莞等地，已知偷渡并成功1人。

三中初三某班约60人，大部分下乡高要等地，偷渡的主要是投亲靠友等原因下乡宝安等地的同学，大约5、6人。

一中高三共四个班，每个班有大约一半的人被分配下乡增城新塘公社，除了一个（以军干、高干和高级知识分子子女为主的）班没发现有人偷渡，其余三个班证实已偷渡过港的就有20多人。

十中初二某班30多人，已知偷渡海外3、4人地域：遍及全省，以毗邻港澳地区居多前述培英和真光中学偷渡人数，保守估计平均每班大约6、7人，大部分是下乡番禺县，已经身处边防，邻近港澳，有地利之便的。当年老三届分配中，凡学校分配地区主要是：宝安、番禺、东莞、中山、新会、博罗、增城、惠阳等县的，情况应该是大同小异。不光是这些地区知青偷渡的比例高，同时下乡其他地区的兄弟姐妹、同学朋友通过他们作为跳板逃港的也不少。当时广州老三届分配是面向全省农村的，大部分学校的分配下乡地点远离边防，不具备直接偷渡的条件，但下乡第二、第三年以后知青普遍逐渐越来越不安心留在农村劳动，纷纷返城。滞留城市期间，接触到各种偷渡信息，同学朋友相互影响下，许多人开始“练水”，偷渡不仅成了知青中半公开的话题，而且成了一种相当普遍的行动。全省各地农村，知青不管来自广州那个学校，都或多或少有人偷渡，即使下海南或湛江国营农场的知青经济有一定保障，环境相对封闭，管理比较严格，知青利用回广州探亲机会偷渡，也间有发生。（见附件郑X伟口述历史记录）

路线：“五箭齐发”

中线：据历史记载，早年的“五七大逃亡”和“六二大逃亡”，大批的农民、城市居民几乎都是沿广深铁路中线直下，闯关越过和香港接壤的深圳河，直达香港，特点是持续时间短，骤起骤落，偷渡越境主要是通过陆路，地点也比较集中。七十年代初的知青偷渡潮不同以往，从陆路越过深圳河只占极少数，大部分人主要先通过陆路到达海边然后泅渡或顺航道乘船而下等其途径。

东线：陆路经过惠阳到大鹏湾下水，泅渡到最近的平洲岛等香港管辖的岛屿。

西线：陆路经过宝安到深圳湾（后海湾）下水，泅渡过香港岛。

中山、斗门线：陆路到达近澳门海边下水，泅渡到澳门，再设法转到香港。

主航道线：沿珠江主航道乘船直达大屿山。

二、开始与结束

始于文革初，高潮于下乡，结束于74年底。

从广州文革群众运动兴起，中学以致整个社会相继进入“无政府主义”状态的1966年夏末开始，一年又一年，直到70年代中期，广州市珠江游泳场、海阁红楼游泳场、越秀山游泳场、大金钟水库、中大码头、二沙头、白沙河……等地点，一直是当时中学生最活跃的地方，人人都心知肚明，在这里练习游泳的十有八九准备“较脚”（偷渡）。笔者在天津念高三的表姐，六八年夏天到广州来探亲，街上常常看见青少年肩挎汽车内胎，开始不明所以，后来才知道是去游泳，可能和偷渡有关。

笔者目前调查所知老三届最早准备偷渡的第一个案例就发生在66年夏天。

根据真光305班曾X萍回忆，她最早练习游泳准备日后偷渡，是文革大串联开始后，学校没人管的时候。据此推断，这个时间点应该是66年夏天9、10月份。从这时间直到70年9月实施偷渡，她常常在白沙河练习游泳，她说：当时江面上游泳的青少年很多，大家互不来往，其实彼此都心知肚明。曾本人之所以早于大多数人在下乡前就已经计划偷渡，皆因家庭出身不好，从小生活在阴影中，知道在这个社会制度下自己没前途，文革期间管制约束一旦放松，这个16岁体弱多病原来不会游泳的女孩子，就以惊人的毅力开始了漫长的自我拯救之旅……（见附件：曾X萍口述历史记录）

笔者目前调查所知老三届最早实施偷渡的案例发生在67年4月。

真光中学304班的罗X超，在本人还没有思想准备的情况下，67年4月由香港的母亲为他搭线安排船只成功偷渡香港。其父因为历史问题受到管制，早在六十年代初就已只身偷渡香港。他母亲则是大半年前通过蛇头乘船偷渡的。至此全家人得以团聚。（见附件：罗X超口述历史记录）

笔者目前调查所知老三届中文革期间最活跃的造反红卫兵个别人在68年夏天毕业分配前已尝试偷渡。

偷渡者并非都和家庭出身问题有关，培英603班胡X雄，家庭出身工人，是早期选上北京天安门接受毛检阅的红五类红卫兵之一，后来成了造反派头头。68年夏天，武斗硝烟未散，下乡动员还没开始，他就神不知鬼不觉悄悄偷渡一次，虽然失败回来，但也无人知晓。后来，下乡三年以后，他终于成功。笔者对胡某进行过多次访谈，了解到他的偷渡动力是直接来自于广州普通市民家庭对有更高生活水平的香港社会的本能向往，同时文革运动也锻炼出青少年弄潮儿不怕死的胆量。

74年底老三届的偷渡潮嘎然而止，主要原因是港方和中方的的政策同时改变。

香港政府以往拘捕的偷渡客，只要能证明是大陆来的，就作为难民接受并给予合法身份。七四年十一月以后，这一条取消了，开始实行“即捕即解”——偷渡客上岸后被拘捕，一律反解大陆。这意味着偷渡客千辛万苦登岸还可能功败垂成，偷渡的难度更大了。

中国政府对知青政策，自73年4月“李庆霖事件”（注2）开始出现松动，同年6月召开“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以后，不再强调知青“扎根农村一辈子”，而是实行“有放有收”，允许下乡早的知青陆续“通过招生、招工及病退、困退等途径，加快回收步伐，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一系列政策的转变，实际上已使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从高潮走向终点”。（注3）

偷渡者中不乏多年申请希望通过正常渠道出境探亲或移民不被批准的侨生或有特殊海外关系者，73年6月中央发了一个文件推广上海经验，允许这类人通过正常途径申请出国。（注4）他们自然额首称庆。这个政策落实到广东还经过相当长的时间，笔者调查中，下乡番禺的培英603班邬X芬多年申请赴香港和父兄团聚都不获批准，74年秋天，绝望下正准备偷渡前一刻，申请终于批下来了。

偷渡者大多数是因为回不了城，又不愿在农村呆一辈子，被迫无奈才铤而走险的，74、75年后老三届知青开始陆续被招生（主要是中专）招工回城，当时虽然上山下乡的政策还在继续，但基层动员应届毕业生下乡的口号已变成“早去早回”，老三届成了是优先安排“早回”的对象，人人有了指望，自然放弃冒险。75年直至八十年代初期，内地各类人逃港还是持续不断，但已基本和老三届知青无关。

三、关于偷渡潮的另类思考

中国上山下乡运动中独一无二的广州“老三届知青偷渡潮”，既是一段不可以回避的痛史，也是一个可歌可泣的壮举，更蕴含了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的历史契因。

1、反映了中国知青运动中被深深掩埋的最浩大最沉重最悲惨的一段痛史

当年全广州老三届知青共有多少人卷入这次偷渡潮？又有多少人葬身鱼腹？笔者只是一个身居海外的业余研究者，惭愧自己没有能力调查出确实的数字，只能提供：

至今为止随机询查过的三十多位不同学校或同校不同班级的广州老三届知青中，几乎是百分之百的班级都有人卷入偷渡，每个班少则几人，多则十几人（唯一一个军干、高干和知识分子子女为主的班级-----一中高三某班，“没发现”有人偷渡）。以此类推，全广州一百多间中学，历尽千辛万险，屡试屡败，屡败屡试，百折不挠，前赴后继冒死“投奔自由”的知青——老三届知青和前后不同届的知青，该有几千几万人？试问全国上山下乡运动中任何地方可曾发生过如此长期，如此规模，如此激烈的抵制和反抗？

成千上万的知青“投奔怒海”，其中的准确死亡数字永远不可能统计出来，但可以推断一定是非常惊人的。前述笔者仅随机调查培英一间学校29个班中的12个班，确认死亡8人（相对而言，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的老师二人，两派学生都卷入广州几乎所有大型武斗没死一人）。该校老三届主要分配地点已属边防区内，偷渡者多使用较为安全的农艇，无需泅水，尚且如此，可以想象其他大多数学校偷渡者的命运有多凶险。下面这一段口述历史调查，是对死亡数字问题最形象的回答：

“1974年8月，第五次偷渡终于成功。游水五个钟头之后，我们三人在平洲岛上岸，到警署再解过香港——我们好幸运，三个月之后，11月香港（接收大陆难民）政策就改变了，上岸后被拘捕的偷渡客一律反解回大陆。警察将我们一共十七、八个偷渡客送上船，从平洲岛到香港岛要走三四钟头，中途所见，成世都记得，如果之前见过，我一定不敢偷渡。

当时成海都是死尸，船走一段就见几件，好多好多，不是一下子好多，是这边几件，那边几件，在水抱（注：粤语指救生圈）圆圈中间，剩得个上半身，头在水抱上，下半身已经被鱼吃了。周围海水‘红扑扑’。我们那条船船员说捞一件看是怎样死的，捞上来，膝盖以下已经断了，还吊着皮……同船还有几个女的，说原来和她们一起有男的已被鲨鱼吃了，有的是咬断脚后流血死的……”（见附件：邬X芝口述历史记录）

试问全国上山下乡运动中，任何地方可曾发生过有比这一幕更惨烈的天地恸鬼神泣的悲剧？历史已经翻过这一页，但知青运动中被掩埋的最大最沉重的一段痛史，难道不应给我们某种教训和启示？明白这一点，一代人青春生命的才不会白白付出。

2、代表了十年文革暴政浩劫中人民奋起争取人权的伟大壮举

在关于知青上山下乡的讨论中，有一种观点，认为当时大多数人还是自愿选择这条道路的。（注5）这真是滑稽可笑！如果羊群别无选择被赶进羊圈，驱入屠宰场，你能说它们是“自愿”的吗？68年的老三届人毕业分配，没有任何个人置啄、选择的余地，“根正苗红”的少部分学生被照顾留城、参军，从没听说有谁会“革命”地表示主动放弃，这本身就是对上山下乡光荣的一种讽刺。不公正地被安排下乡的大部分学生，之所以对命运沉默顺从，绝大多数人其实是逼自无奈，多年灌输教育下的理想主义在逆境下确实起了一定的精神支撑作用，当时也喊出一些豪言壮语，但这不能代表下乡知青的真实思想。所谓“消灭三大差别”，其中和每个人最有切身利害关系的是“城乡差别”，涉世未深的学生不一定明白注销城市户口对自己将来一生的严重后果，但父母是一定心知肚明的。不管口号喊得多么冠冕堂皇，无论毛本人的理想蓝图多么远大，上山下乡运动从实际操作的第一步开始——剥夺这些城市人的户籍，特别是其中一半还是未满十八岁的男女青少年，就已经是专制制度下对人权的粗暴践踏。从这个角度重新审视南中国知青偷渡潮——被驱离城市又在农村无法扎根生存的社会边缘人，用最激烈的方式反抗上山下乡运动，奋起冒死追求自己个人自由迁徙，自由生存的基本权利，这正是十年文革暴政浩劫中人民奋起争取人权的伟大壮举，对中国历史向前发展起到了非常积极的正面推动作用。

3、体现了中国历史的正确进步方向

给这段历史定位，把千千万万知青付出青春和生命代价的抗争看做仅止于个人幸福意义上的可以理解的追求，是远远不够的，因为这一批当年叛离“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康庄大道”，选择走个人发展的“资本主义邪路”的青少年，正是最勇敢的历史先行者。

本文开头所言，当年分配到番禺南沙的培英中学老三届知青，因为边防“前线”的特殊地理位置，成了珠江三角洲汹涌澎拜的偷渡大潮的潮头。无独有偶，二十年后，震惊世界的波澜壮阔的中国改革开放大潮也是在同一地区卷起，南沙成了五大开放城市的交汇点，（注6）这不只是一种偶然的历史巧合，两者之间更有一种内在的联系。

偷渡，是人民对一种社会制度的义无返顾的否定和扬弃。是对西方民主制度的出自本能认同和追求。

开放，是执政党对自身制度的检讨和部分否定，是对西方社会制度的部分认同和学习吸收。

七十年代前期的老三届人知青偷渡潮只是前后持续三十多年的百万广东人民大偷渡历史中的一个片段。（注7）正是人民前赴后继用生命抗争，才最终迫使执政党内的改革派作出让步，顺应时代潮流，打开国门，使文革浩劫中被折腾得奄奄一息，一穷二白，民不聊生的国家重新焕发生机。

据说当年蛇口开发区最早开始破土动工时，在沙滩上曾挖出不少白骨。一座举世瞩目的现代化新城，就是这样耸立在无数偷渡者的白骨之上。

今天，南海之滨除了“开荒牛”和“珠海渔女”的城徽，是不是还应该为那无足轻重的小人物，梁城根和他的三位知青同伴们，安置另一座塑像？

——他们也是历史的缔造者，谁也没有权利将他们遗忘！

后记：美丽的新世界

重读英国作家阿道司·赫胥黎（Aldous Huxley）写于1931年的反乌托邦小说《美丽新世界》（Brave New World），对赫胥黎的历史预见叹为观止！

赫胥黎笔下的“美丽新世界”是一个分工严密的社会，人人各安其位，没有冻馁之虞，也没有选择之权，每个人从生到死都受控制，任何人都没有个性，习惯于服从，视恶劣的生活环境和艰苦的劳动为幸福。因此这是一个快乐的社会。如果你怀疑这种快乐，国家会帮助你用催眠术校正异端的思维；如果你感到不愉快，国家就提供一种叫唆麻的精神麻醉药物让你忘掉不愉快。人们失去了思考的权利，失去了创造力，把它们全都交给了统治者，甚至连家庭、爱情和父母也不需要，因为国家的箴言是：“共有、统一、安定”，——国家利益才是至高无上的！

五八年建立的农村人民公社是中国特色“美丽新世界”雏形，六六年开始的“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推而广之把整个中国“公社化”，就是要打造“史无前例”的“红彤彤”的“美丽新世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只是“美丽新世界”实验中的一环。我们现在还有许多老知青对那段历史情不断，理还乱，对当年的理想主义深深怀念，依旧陷在“美丽新世界”的迷思中不能自拔。南中国偷渡潮中的知青大部分不是红五类，不是学生干部，不是党团积极分子……红色历史对他们几乎不著一字，因为他们是异类，是走“邪路”的人，和现在热播的电视剧《知青》里面极力塑造的那位胸怀大志带领老百姓走“共同富裕”道路的陕北知青赵某，是“两股道上跑的车，走的不是一条路”，他们只是上山下乡运动中的逃兵……但是，但是只有他们，才是真正的清醒者！

“血沃中原肥劲草，寒凝大地发春华”。三十多年前老三届人中的一批精英曾不惜生命前赴后继勇敢追求的那个真真正正的“美丽新世界”——民主自由的世界，才代表中国人民的幸福未来！

万家墨面没蒿莱，敢有歌吟动地哀。

心事浩茫连广宇，于无声处听惊雷。（鲁迅）

——谨以本文纪念在大时代中为追求幸福理想葬身南海波涛的同学：梁城根、傅瑞生、梁启光、梁启成、沈南武、彭树淦、蔡静雯、何荣祖、王汉杰……

2012年11月21日三稿于洛杉矶

附件目录——

欧XX口述历史记录：为了生存

陈XX口述历史记录：出埃及记

何XX口述历史记录：“上地”

张XX口述历史记录：麻风坑

虾哥口述历史记录：我是策划者

曾XX口述历史记录：美丽的新世界

罗XX口述历史记录：67年4月上船

陈XX口述历史记录：偷渡其实很容易

郑XX口述历史记录：从海南岛到香港岛

邬XX口述历史记录：永生难忘的一幕珠江三角洲地图

附注：

注1：陈秉安《大逃港》广东人民出版社2010年

注2：根据百度百科——李庆霖（1936-2004）福建莆田人。1952年任福建莆田县某中学校长，1957年被划为右派，受到降职降薪处分，被分配到莆田县城郊公社下林村小学任教。1972年冒险写信给毛泽东“告御状”。成为中央高层调整知识青年政策、补助生活困难、改善供应，对迫害知青的地方干部严厉整肃的一个契机。不久被誉为反潮流英雄；1979年被莆田地区中级人民法院以“反革命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1988年减为10年有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5年。1994年8月提前出狱。2004年2月逝世。

注3：见蔡天新“李庆霖上书毛泽东与知青政策调整”，转录自《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文集》（http://www.hljzqg.com/lsyj/ShowArticle.asp?ArticleID=244

注4：转自潘鸣啸《失落的一代》香港中文大学2008年版第170页

注5：定宜庄《中国知青史.初澜》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

注6：黎服兵《构思南沙》：“南沙，挽珠江，面南海，背负南国重镇广州，怀抱特别行政区香港、澳门，左深圳，右珠海，独得风流！在这历尽世界潮流，雄踞改革前哨的五个大城市中心划一个半径70公里的圆，它们的交汇点都落在南沙。按物理学的规律，这里就是重心；按社会学的标准，南中国的重心，也将落在这里。这就是南沙。”

注7：关于广东省30年偷渡情况和总人数，有以下资料：据中国作家网介绍，“在许多学者看来，《大逃港》填补了一个历史研究的空白，即完整再现了1950年到1979年间发生在深圳河边历时30年的百万人‘大逃港’事件，它是冷战时期时间最长、人数最多的群体性逃亡事件，其历史价值和反思价值极大”。

——转录自《真实性是纪实文学的生命---谈<大逃港>的几处硬伤》http://blog.people.com.cn/article/1345980852464.html2012-08-26

根据广东省委边防口岸办公室1979年的《反偷渡外逃汇报提纲》，从1954年到1978年，广东全省共发生偷渡外逃56万多人次，逃出14万多人。

根据《1978年9月5日广东省公安厅关于当前我省偷渡外逃严重的情况报告》显示，当年8月，广东全省就发现外逃6709人，逃出1814人　　根据宝安县委《关于偷渡外逃情况的报告》，1952年后的25年间，宝安县有40598人逃港，约占全县总人口的五分之一。

——转录自http://www.sina.com.cn 2008年12月08日11:42新华社-瞭望东方周刊

注8:阿道司·赫胥黎（Aldous Huxley，1894—1963），一位多产的英国作家，共写作了50多部小说、诗歌、哲学著作和游记，其中最著名的作品是长篇小说《美丽新世界》。作为生物学家的儿子，他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先后毕业于伊顿公学和牛津大学。他对人类生活中的矛盾具有超人的预见力。尽管一次眼疾几乎让他视力全失，但在学习了盲文后，他逐步开始写作，先后创作了许多胎炙人口的小说，并在20年代成为一个明星人物，其中，1931年创作的《美丽新世界》让他名留青史。——引自百度百科

（本论文正式提交将于12月6-7日在香港中文大学主办的的知青问题国际研讨会）

*来自作者博客：*http://blog.sina.com.cn/u/2388286230

阿陀文集：http://hxzq05.d68.zgsj.net/showcorpus.asp?id=210

闲扯知青上山下乡的话题

一天晚上我作了个奇怪的梦，梦见几个荒友在议论知青这一代人的命运。有人说：“咱们这一代人是最倒霉的了，啥‘好事’都碰上了。长身体的时候，却遇到了三年自然灾害；想学习的时候，却遇到了停课闹革命；想干事的时候，却统统被赶下乡；想回到亲人身边的时候，偏偏没有工作；有了工作的时候，又碰上了下岗待业；唉，太亏了.....”。这时，我的一个病逝在北大荒的荒友走来，说：“其实，最亏的是我。你们起码还活着，而我.....”我们顿时无语了。当时梦醒，再不能寐。

说到“亏”，它是“失”的同义词。自然也就想到“得失”二字。现在不少人常把“舍得”和“得失”挂在嘴边，也不乏对“舍得”、“得失”的真实感悟。他们说：“有舍才会有得”，“如果光想得，失就会紧随其后”。我同意这样的观点，但回头一想，我们知青这代人舍的是什么？得的又是什么？我想，我们这一代舍的最多，得的最少；国家舍的最少，而得的最多。

其一，从国家层面来讲；当时“上山下乡运动”是在文革的后期，经过轰轰烈烈的闹腾后，国家机制基本停摆了。大批知青上山下乡无疑为国家混乱的局面得到了缓解，从这个意义来讲，知青们为国家的政治安定做出了贡献。（不管知青本人是有意还是无意，主动还是被动。）

其二，从发展层面来讲；大批知青上山下乡无疑为国家从无序走向有序创造了发展的空间和条件。

其三，从建设层面来讲；大批知青上山下乡无疑为缩小城乡差别、传播知识和文明做出了贡献，为偏僻落后的地区今后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其四，从知青个体层面来讲；不管知青本人主动还是被动、愿意还是不愿意的下乡，毕竟经历了艰苦环境的历练；从盲从中学会了审视，从苦难中练就了坚强，从幼稚走向了成熟。这对于社会及人生的认识都有了较清晰的分辨能力。

分析上宗所述，国家从知青上山下乡中获得的是稳定和发展，而这一代知青舍掉的又是何其多啊。一个个稚嫩的心灵舍去了安逸的城市奔向了艰苦的乡村；舍去了难以割舍的亲情只身远走他乡；舍去了学习机会和个人追求而

去承受着艰难的苦力；舍去了生命化成了粪土以肥沃万亩良田.....知青们该舍的都舍了，而他们在心灵上、情感上、物质上得到的却实与他们的付出不成比例。这也是这一代知青们的心结所在。

“上山下乡运动”是文革后期的产物，确切地说，应该是文革运动后期的“处理品”。虽然已过去多年，至今仍存在对这段史实认识含混不清的状态，我觉得有必要对此进行客观、理性的分析和解读。这是国家的政治家、史学家的责任，也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历史责任。一个民族不敢面对历史是一个没有前途的民族；一个政党不敢正视历史则是一个缺乏远见卓识的政党；一个不敢反省自己错误的人是一个糊涂而懦弱的人。人类要发展，社会要进步，任何历史都是不可回避的，也是绕不过去的。

就“上山下乡”而言并非错误。为了改变我国一穷二白的面貌，缩小城乡差别，不乏一些有识之士的热血青年，他们怀着“天将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投入到火热的农村生活中去，立志在那里干出一番事业，当年的董家耕、邢燕子就是其例。我的一些中学同学在63年也志愿报名下乡了。这样的事例并非发生在文化大革命时期，从这个事实来讲，“上山下乡”与文革并未必然联系。

就是现代社会“上山下乡”不也是提倡的吗？只不过名称不一样。为了国家不同地区均衡发展，不也提出了号召大学生到西部去发展，不也提出来号召大学生到农村当村官吗？名称和形式不一样，其实本质意义是一样的。

“上山下乡”之所以给人一种恶名，错就错在加上了“运动”两个字。一场运动强加给了所有的人，人们失去了主观意愿和选择的权利，因而，也是不得人心的。好在我们党没有再次把“大学生到西部去”“大学生当村官”搞成全民的运动，否则，不又重蹈知青们的覆辙吗？这也说明我们的社会是进步了，也许是知青历史为鉴的作用吧。

澄清历史，审视历史是一种责任。客观真实地分析知青的历史，让人们认清哪些是对的，哪些是错的；对的如何弘扬，错的如何去防范，这是有利于社会文明进步的。一句话就是：“以史为鉴，以警后人”。

对于知青那段历史要冷静客观地审视，我以为，不能把对的错的、好的坏的、积极的和消极的混为一谈；不能把“上山下乡”和“上山下乡运动”混为一谈；不能把知青积极向上、服从国家需要和与错误路线同流合污混为一谈。“上山下乡运动”是错误的，知青们只是错误路线的“被运动者”，何罪之有？历史上也曾出现过张国焘分裂党中央的错误路线，难道他手下数以万人的红军战士都是不革命的吗？都是有罪的吗？荷出于污泥，难道它开出的的花朵也就不美丽了吗？

至今，国家和社会依然没有对知青这段历史做出明显的界定，知青这代人为祖国做出的付出和贡献，也没得到应有的认可。以至我们知青中有人也在抱怨：“我们是文革的牺牲品”。其实，牺牲就是一种最大的奉献！我们知青不能妄自菲薄，我们就是应当理直气壮地讲出我们的奉献；理直气壮地告诉后代我们曾为祖国的命运忍辱负重

过；理直气壮地宣传我们知青身上一些积极的、可贵的精神。历史上，无数的英雄先烈，为了人民的幸福，敢于舍去自己的生命，没有计较个人的得失。为什么人们对他们无比的崇尚和缅怀，就是人类在发展进步中，他们把这种精神和价值观当成了共识。人们需要这种精神。我无意为知青脸上贴金，更无把知青与英烈相提并论之意。客观上讲，我们知青的那种真诚、吃苦耐劳、以大局为重、坚韧不拔的精神是值得弘扬的，这是知青群体的主流。我们就像孔雀一样本身就有着美丽的羽毛，我们应当向人们展示开屏时的绚丽，这才是孔雀的主流，而不是展现屁股那边的丑陋。诚然，我们知青一代人吃了不少苦，但我们不能总是停留在“祥林嫂”的层面上，像怨妇一样喋喋不休地述说着自己的苦难，以博得人们的同情，其实这是无济于事的。

一个民族、一个政党、一个团体乃至一个人在谈到其历史价值和作用的时候，往往看他为国家和人民做了哪些有意义的事情。我们知青要想得到历史和人民的认可，必须是在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层面上看问题，从知青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的地位和作用看问题。本人无意夸大知青的历史形象，只求党和国家正视历史，对知青的历史和境遇作出客观公正的评价。这样做有利于国家，有利于人民，有利于未来。当然，这是政治家和史学家的事情。本人布衣一个，只能闲扯。

既然是闲扯，也就不在乎别人是反对还是赞成，观点是对还是错了。总之，闲扯就是闲扯。

2011-07-03

永远的白桦林文集：http://hxzq05.d68.zgsj.net/showcorpus.asp?id=207

华夏知青网不是赢利性的网站，所刊载作品只作网友交流之用
引用时请注明作者和出处，有版权问题请与版主联系
华夏知青网：http://www.hxzq.net/
华夏知青网络工作室

上山下乡运动与分田运动

梁晓声担任编剧的电视片《知青》，引来人们关于当年上山下乡是否自愿的激烈争吵。让人欣慰，一些人坦然地说出了历史的真实。“九段学者”秦晖说：我“是自己要求下乡的”。海外网上知名写手马悲鸣说：“我有自愿”。另一方面，更多的人大声说：“我没有自愿”其实，这没有什么好争论的。一千多万知青，肯定有人是自愿的，有人是“被自愿”的，甚至有人是被迫的。

我1967年11月16日离开北京到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东乌珠穆沁旗额仁高比公社额仁高比大队插队。当时，中央的号召是“复课闹革命”。刚刚进校不久的军训解放军，曾真诚地动员我留下来响应中央号召“复课闹革命”。说我们这些1967年下乡的人是被强制，是无稽之谈。

1968年7月又有一大批北京知青到内蒙插队。我估计，1968年上半年国家的基本政策仍然是“复课闹革命”。1968年7月下乡的这一批人中，多数是自愿的。

这一阶段，一些中学生想“到工农中去”的冲动，得到了学校教育部门的默许，得到了劳动部门的鼓励和推动。总体讲，属于“自发”阶段。

毛号召上山下乡的指示是1968年12月22日在《人民日报》刊出的。估计1969年3月以前下乡的人中，相当比例是自愿的。否则，他和他的家长可以观望一段再做出选择。1969年3月以后，就很难说，越往后，自愿的比例会越小，“被自愿”的比例会越大。也有一些人，顶住了，没有下乡。

1978年开始的分田运动与1967年开始的上山下乡运动一样，有的是自愿的，如小岗；有的是被迫的，如华西、南街、大寨。有的当了“老泡”，扛住了强大的压力，顶住了，如河南刘庄、广东崖口、河北周家庄。

上山下乡和分田一样，开始都是基层群众自发的行为，后来得到上面的默许，再后来得到上面的鼓励，最后成为自上而下的强制。

压力之下，有人服从了，有人扛住了。有的软扛了，如华西。有的硬扛了，如刘庄。有人暂时服从了，后来又悄悄地改了回去。1980年分田后，1985年河南南街重走共同富裕路，大寨1991年，河南北徐庄1998年，也先后重新走上“共富”路。今天，这些坚持“共富”的村庄都在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方面取得了骄人的成绩。2004年，在沈

浩同志的带领下，小岗也开始尝试重走“共富”路。

总结建国60余年的经验，凡属“群众运动”，最终效果都是不好的。效果不好的原因就是忽视了人的个别差异，忽视了人的不同偏好，忽视了人多种多样的不同需求。效果不好的原因，就是侵害了人的自由，尤其是侵害了人的“消极自由（不损害他人的自由）”。效果不好的原因，就是强制。

不同的人存在不同的偏好。由于多年吃惯了，我至今喜欢吃一种酸的奶豆腐。对于没有吃惯的人，这种酸奶豆腐是难以下咽的。我看了一场于魁智、李胜素的京剧演出以后，可以兴奋好几天，另一些人则可能无动于衷。我听阿拉坦琪琪格唱长调，如醉如痴，我发现身边有的年轻人睡着了。至今，我对川剧、秦腔、意大利歌剧等，都尚未进入欣赏状态，都尚未找到感觉。

“群从运动”忽视了人的个别差异和不同偏好，违背人的自愿原则，侵害人的自由。这是需要记取的沉痛教训。

2012-08-03

知青的有些事情，别人怎么也不理解

可讲的故事太多。随便讲几件身边的事。都是真实的。

一个与我同生产队的插友，父母都是高级知识分子。现在作为国家基本建设的甲方代表，一年签字上亿元。整天跟着包工头吃喝玩乐，但绝不受贿。象他这种身分的人，谁银行里不存几十万？这位哥们虽然吃得脑满肠肥，至今还是无产者，遇见用钱的时候一万两万还得跟我借。

另一位搞专业的插友，靠夫妇两人的专业知识和技术转让，近几年中向教育事业至少捐了50万。

可是自己风里雨里冬天夏天，天天骑车上班。问他为什么不买车。他说：“跟别人咱懒得说，跟你咱说实话，一辆车保险、汽油、银行利息加在一起一年至少上万元，不知多少穷孩子为几百元就得失学。咱没有那份心理承受能力。”我今天最好朋友之一是一位当年从北京到东北的知青。前几年为朋友受难，不仅上千万元资产损失殆尽，还坐了3年大牢。出来后，一位成功的房地产商真心敬重他的忠义，许以重权、高薪、股份、高级别墅、奔驰车，三顾四顾请他加盟，他毫不动心，婉言谢绝。因为双方都是我的朋友，我也劝他接受邀请。他说：咱不愿坐享其成。结果，到现在还在辛辛苦苦找项目，找贷款，准备白手起家，从头干起。

他坐牢时，我到监狱去看他，送东西。什么关系都不托，手上就拿张判决书，各级监管人员一路绿灯放行。稍有法律常识，一看判决书就知道是冤案。我真感谢那位法官，在判决书中把案情写得那么详细、清楚。

号子别误解，上面说的不是你听说过那位。你知道那位也是知青，是湖北的插队知青。也恰好坐了三年牢。虽然坐牢之前也是个一总经理，但是国营公司，基本没有什么个人资产。与北京这位朋友不同。武汉这位朋友三年牢坐得有声有色，整个一个《王若飞在狱中》的90年代版本。这位在武汉坐牢的朋友现在在北京，主持广东一家大企业的华北地区营销工作。正式职务是“华北战区司令”——不是开玩笑。

丢了上千万的资产，坐几年的大牢。眉头都不皱一下。为什么？就为一个朋友交情。男人之间的交情。

打字打到这儿，又想起另一位为信念赔掉几乎全部家当的朋友。人家当时可是武汉市手屈一指的民办高科技公司的老总。

还有……还有……太多了，打住吧。

知青的有些事情，别人怎么也不能理解。

国家补偿

陈意新在发表于《21世纪》杂志总63期的《1968-1998——从下放到下岗》一文的结尾处，建议对在上山下乡中受到损害的知青进行国家补偿：“从下放到下岗，知青一代人的生活充满了不幸……知青一代应该得到补偿，不仅因为国家的政策对他们一直不公，还因为他们不成比例地承担了革命与改革的社会和经济成本。而补偿也变得越来越是个严肃的问题。”作为一个老知青，博主如果能够得到“国家补偿”，当然好。

如果补偿，是否应该根据下乡的时间长短有所不同呢？

博主16岁下乡，27岁离开牧区，挣了11年的工分。我是我们队倒数第二个回城的。我们队最后一个回城的北京知青，在牧区生活了25年，1992年才回到北京。我们队的北京知青中，在牧区下乡时间最短的不到2个月，恰好与我分在一个蒙古包。还有一个北京知青是部队的高干子弟，下乡不到一年，其父亲所在部队机关就派专人来将其接走了。

周恩来的侄子周秉和和侄女周秉建，都曾在短暂下乡后，在“热心人”的安排下成为光荣的解放军战士。后来，走周总理的干预下，二人又离开部队，第二次下乡。

如果提供国家补偿，下乡25年的与下乡不到2个月的知青，应该有所区别。补偿似乎应与下乡时间长短挂钩。

在农村生活25年的知青是极其个别的。像博主这样在农村生活11年的，也并不算多。我们队的知青，平均在农村生活时间不过4、5年。

如果对在农村生活了4、5年的知青进行国家补偿，那么，对那些在农村生活了一辈子的人们，是否也应该进行国家补偿呢？

2012-03-06

海宽文集：http://hxzq05.d68.zgsj.net/showcorpus.asp?id=10

华夏知青网不是赢利性的网站，所刊载作品只作网友交流之用
引用时请注明作者和出处，有版权问题请与版主联系
华夏知青网：http://www.hxzq.net/
华夏知青网络工作室

【知青问题探讨】：

精神和物质 接班人和劳动力

“文革”中知识青年为什么会大规模地上山下乡？怎样评价这场轰轰烈烈的上山下乡运动？怎么看待高大全、李想们当初豪情万丈，最后也落荒而逃的行为？为什么现在很多当年知青回忆起那段生活，更多的是苦涩？事过境迁，有些问题还困扰着当年的知青。

知识青年在“文革”中大规模地上山下乡，就像大潮起，风起云涌。“文革”结束，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又像大潮退去，满目疮痍。

“文革”中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和“文革”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可以说，当年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就是“文革”的副产品。

“文革”的理论基础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就是认定党内存在着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所以就要动员千百万青少年学生起来“造反”、夺权。权夺到手以后，还有个“继续革命”的问题，还要“造就千百万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于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就很有必要。当然，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更有必要，因为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思想肯定比小农先进，可是，当时中国经济状况不容乐观，所以，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避过不谈。然后呢，从工农兵中招收大学生，基础知识不重要，“大学就是大家来学”，从学校毕业以后，“再回到生产实践中去”。这就是老人家给我们画出的“反修、防修”，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路线图。再加上计划经济因素（必须包分配），就业安排因素，（1967年和1968年社会生产总值较上年分别下降了9.9%和4.7%，国民收入较上年分别下降了7.2%和6.5%。工矿企业因搞运动，处于停产、半停产状态，恢复起来尚需时日，无力吸纳这么多新生劳动力。大学停招新生。升学渠道关闭）再加上社会安定因素（当时社会上有几百万初、高中毕业生，在社会上逛荡，“革委会”成立以后，再逮谁就造谁反就成了一种破坏力量）合力促成了这一安排。

问题是，绝大多数知识青年下乡后发现，自己根本不可能成为什么“接班人”。尽管他们也曾像高大全们一样辛苦劳作，他们只能是，而且永远只能是个农村劳动力。上大学的机会几乎没有，脱颖而出的可能性几乎为零。单单就生存、生活来讲，农村、农场远远比不上他们从小就在那里生活的城市。人有向往美好生活的天性，他们从切

身体验中厌恶了这种强加在他们身上的选择，他们甚至不惜牺牲生命来抗争，要求返城。他们的要求是正当的。

贫穷不代表社会主义。在农村呆一辈子并不代表革命。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城市化。这一道理，人们已从这30年中国经济的发展中达成共识。可是，在当时“左”的错误的理论的指引下，一部分激进青年把谬误当成了真理。“四人帮”之流，其实欣赏的并不是吃苦，而是能够为他所用。每一个人都是历史这个棋盘上的棋子。

人的第一需求是生存，是物质需求。享受，是更高的物质需求。当人长期生活在艰难困苦中，要求人们从精神上认同这种生活，大多数知青是不认可的。他们本来可以有更好的选择。是动员、号召、一个运动把他们弄到这里来的。精神上他们就不认为这是自己唯一的最佳的选择。他们对加在他们身上（当然，有些青年当初是主动要求加在自己身上的）的这一物质生活条件感到反感。当初，有些青年热血沸腾，精神曲线达到峰顶。精神在数年的和物质的较量中慢慢消磨，已经感到力不从心，精神曲线从峰顶逐年下滑；想到可能要和物质鏖战一辈子，精神终于支撑不住，精神曲线就成了瀑布。

精神力量支撑着一个人或人一群人，这些人可以不计较生活条件的艰苦，顽强地生活和工作下去，以苦为乐，以苦为荣。这样的例子有没有呢？有。比如两弹一星、比如驻守边疆、比如苦行僧。他们非常清楚地知道自己这种艰苦生活的意义。他们看到他们工作所取得的成果。他们精神上愉悦，可以不计较物质生活的匮乏。可是知青们则不同。绝大多数知青精神上是贫乏的。他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下乡受苦。在农村或边疆艰苦地生存和生活下去，就成了他们此行的唯一目的。为受苦而受苦成了实质。为革命、为防修、为成接班人而受苦，这些灌输进他们脑子里的思想可能支撑他们一时，却支撑不了一世。他们从自己的亲身实践中体会到了这些说教的空洞和无力。

当年有些知青的精神支撑的力量要强一些，比如高大全、比如李想。他们以为他们真的是在为革命理想而吃苦，而且，随着地位的提升，他们也看到了成为接班人的希望。一将封侯万骨枯。他们成为“接班人”是以十倍、百倍他们的同龄人永远做他们的分母为条件而同时存在的。当这些做分母的小草们兵败如山倒地溃逃时，他们这些理想主义者也像那些战败的将军一样，换上了便装，混进了逃兵中。他们第一次发现，他们所谓的“革命理想”在现实面前竟也这样脆弱得不堪一击。

知青返城是社会的进步。知青返城是社会与那种“左”的理想主义思潮的决裂，是拨乱反正，是人心所向，是历史的必然选择。在若冰们看来，与其去纪念下乡多少多少周年，不如去讴歌知青返城多少多少周年。这才是绝大多数知青不掺假的心声。

若水文集：http://hxzq05.d68.zgsj.net/showcorpus.asp?id=176

1968年——1970年,知识青年在农村

（一）

1968年11月13日，大卡车把我们这些知青送到了寿县堰口区，区“革命委员会”主任致了欢迎词，随后把大家分成许多股，我们这一股被分配到“陶家小店公社”。步行18里到了“陶家小店”，公社的“革命委员会”主任又致了欢迎词，又把大家分成许多股，然后由应邀而来的各个生产大队的书记带到农村去。我们这一股被分配到王墙大队，走了七、八里到了大队部。接下来，各个生产队队长应邀而来，大队书记对他们宣布了一个队可以认领两名知青的原则。生产队队长们开始挑选我们，他们就象买牲口，毫无避讳地说肥道瘦，直面评论对我们这些知青的第一印象。直到天黑，最后的分配才算了结。

一个比我大两岁、姓王的知青始终跟我在一起，我们被一个名叫王西山的中年汉子认领下来，他是柴拐队队长。那天没有月亮，我们跟着王西山，磕磕绊绊又走了两、三里黑路，好不容易才到了他家。我们放下背了一天的铺盖卷，坐在煤油灯下等着吃饭。门里门外，全村的男男女女都来了，大家简直就象在看耍猴的，感到希奇而有意思。

继这种新鲜感之后是刨根摸底。插队之后，第二天我们就开始与村民一起劳动。村民们不分任何场合直接打听我们多大了？有对象没有？父母在城里是干什么的？一个月拿多少钱？在城里住什么房子？在城里吃什么、穿什么？

小王的父亲新当上某个煤矿的“革命委员会”副主任，而我的父亲却因为“反动军官”的历史刚刚遭到“无产阶级专政”。在某些个场合下，他把这一切泄露无余，而且他还对村民们解释说：所谓“反动军官”，跟你们农村的“地、富、反、坏”——“四类分子”是一样的。我在村民的心目中的价值因此而一落千丈，一个说我长的英俊、死活要认我作弟弟的少妇不再用正眼看我，一个弱智的地主的儿子直接对我说：“什么鸟家伙‘下放学生’？原来是跟我一样的坏蛋！”国家给我们的安置费是250元，早先已被各个关口，一层层以各种理由扣去了65元。村里利用旧房基给我们搭建了两间稻草房，加上置办生活用物、农具，偿付村民劳务费等等、等等，这些钱便被迅速扣光。

1969年春天，下放知青缺钱缺粮，进入了第一个青黄不接的年头。我们淮南市的知青比较老实、规矩，江苏、上海来的则不是这样。有人开始偷盗生产队的粮食，继而偷盗农户家里的鸡鸭、小狗、小猫。先是少数人，后来大家传授“经验”，互相鼓动，逐渐形成了恶劣、无耻的风气，让极度贫困的农村老百姓深恶痛绝。不仅如此，区域不同的知青还相互打架，淮南人最能战斗，打击的目标多是上海“小瘪三”。并没有什么原因，只是大家总是看对方不顺眼。

有人写了一首<知青之歌>被判重刑.有人秘密建立了“反动组织”，破获以后，两个首领被枪毙在寿县窑口集大桥下。

女知青较之当时的农村女性显得细皮嫩肉，农村里的一些青皮流氓开始打他们的主意。有一男一女两知青，本来是同学加恋人，相约下放在一个村。村里有人为占有这个女的，竟杀害了男知青。更甚者，淮南市东部淮丰公社的一个“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利用权力，拿女知青当妓女，做无偿嫖宿，有案可查的达二十多人。案发后，淮南市的知青家庭群情激愤，此人被游街示众，然后枪毙。

父亲是“革命委员会”大官的招牌只闪光不管饿。小王身体很瘦弱，手无缚鸡之力，很多劳动他都无法从事。村里人讥笑他，每天都有人传诵他如何无能、如何窝囊的事例，还按他习惯耸背的形象给他起了一个“老虾”的绰号。“老虾”家里兄弟姐妹六七个，母亲无业，所以家境也不是太好。“老虾”找我，要求我陪他到上面诉苦、讨救济。我与他跑到公社，跑到堰口区，听那些混账的土包子干部说了许多的混账话，最终还是两手空空。没有别的办法，“老虾”哭了一场又一场，几次说要自杀。

我是当过煤矿临时工的人，不怕劳动。在1969年至1970年的两年时间里，割麦、插秧、挑担子、耕地耘田、推独轮车，全都学会了。由于少年时期爱好武术，一直练功，体格比农村青年优越，因此有的力气活儿比他们做的还好。生产队给了每个知青半厘土地，人家的长荒草，我的却种了蔬菜。在农村，我用不着象“老虾”那样经常哭哭啼啼，因为我基本上可以自食其力，能够勉强维持下去。我与本村的小青年们很能玩到一块。玩文的，和他们一起唱歌、讲《西游记》、《水浒传》、《三国演义》、《封神榜》；玩武的，打拳、摔跤、翻石磙、到大湾里撵野兔。我的“文治武功”征服了人心，换取了尊重。村里的人，渐渐忘记了我的“反动军官”的家庭出身，把我当成了他们之中的一员。大队搞评选活动，我被推选到堰口区，给予了“优秀知青”、“学大寨红旗手”的称号。

有的知青比我混得更好。到1970年年末，有男知青被当地人招为女婿，有女知青做了农村人的媳妇。有的人则入了党，当上了农村干部。

（二）

知识青年到农村以后，类似小王那样没做过工、什么都干不了的人有的是，类似我这样没有别的指望，只好拼命干的人也有的是。

还有一种人更加有的是：平时不干农活，冬天穿件小破袄（当时农村人穿的棉袄很大，知青与之形成反差，凡见到穿小破袄的，农民离半里路远都可断定此人是知青），夏天穿件煤矿工人的工作服（多是从父亲那里要来的）。三五成群，今天到这个村子找知青吃一顿，明天到那个村子找知青吃一顿，都吃遍了，回淮南吃老爸老妈的。家里口粮定量，父母受不了，弟弟妹妹忍无可忍了，再回到农村，再找着吃。

有的甚至偷鸡摸狗，让农村人不厌其烦。农村老太太养几只母鸡，是为了卖鸡蛋买油盐、换针头线脑，被“下放学生”偷去吃掉了，等于断了财路，当然气不过，有的就在知青门口骂，骂的嘴角都是白沫。

在1959、1960、1961年饱尝过“共产风”滋味的农村群众最善于斤斤两两的计较。“上山下乡”时节，生产队坚决实行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不得制，对任何人都不客气。大家劳动，平时按个人劳动能力制定工分待遇，一个劳动日最高给十个工分，以下九分、八分、七分不等，最低三分。最低分一般是针对十一、二岁的小孩。

生产队给我九分八厘的待遇，没给满分的理由是我不会撒种子——在粮食紧缺的年月，这是农村最过硬的技术活儿。小王给七分五厘，队里还说照顾他了，否则，按实际能力算，只能给他三分。有的知青分数比他还要低，我们邻村只给那里的两个知青每人六分。1969年年底结账，我挣了2100分，小王挣了800分（别的知青最高的挣了2200分，最低的甚至连100分没有）。

按劳分配制度的原则当然是按工分分红。类如我这样的工分等级，分到了近400斤稻子，总计100多斤其他杂粮，还有200多斤山芋和20多元钱。一般来说，如果不浪费，平时计划好一些，在以后的1970年一年间我不会挨饿。然而，小王就不行了，他得到的粮食不及我的一半，有的知青比他更少。邻大队有个知青总共只分了小半口袋粮食，当时扛在肩上很轻松地一蹦一跳地在路上走，大家一起哄笑，顺便给他起了个外号叫“半口袋”，好心的人则为之担忧道：以后这一年的日子怎么过呀！

1970年，是我们这些下放到寿县地区的淮南知青最艰难的一年。缺粮是最为普遍、最为严重的问题。家境好的可以依靠父母接济，不好的叫天天不应，呼地地无声。到了这时候大家才明白，所谓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其实就是离开了父母的翼护、被剥夺了享受市民定量口粮的一帮人，现在必须劳动，必须自己来挣口粮养活自己了。有的境况过于艰难的女知青只好选择了嫁给当地人的这条路，可是男知青却没人肯要。愁苦、郁闷的气息笼罩着大多数人，有的情绪低落，有的归咎于当政者，开始“思想反动”。

对于知青们的窘境，农村群众有人同情也有人讥笑。我们这个村有个乡痞叫薛宜芳，出去见过世面，方圆几十里很有名气，他最早在农村群众中散布说：“什么‘下放学生’、毛主席派他们来的？还不是因为前两年他们造共

产党的反、在城里闹事，现在共产党找他们算账了，罚他们到农村来受罪，饿饿他们。这帮家伙，不知死的鬼！”假如说地狱有十八层，我当时可能处在最底一层。虽然我努力劳动，可以自食其力，但是家里已经难以维持。父亲仍被“专政”，他已经六十多岁，成天在河堤上和一些“走资派”、“牛鬼蛇神”抬土垫堤，被传染了肝炎病，且被扣减了工资。家里钱少，甚至买不起口粮，母亲、弟弟、妹妹在饥饿、绝望中挣扎。

因为“九大”闭幕，刘少奇终于被彻底整垮，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取得了“决定性的、最最伟大的胜利”，淮南市要放焰火庆祝。这是破天荒的第一次，下放中的知青们欢呼雀跃，纷纷相约返城。我被几个朋友挟裹着回到淮南，到了家里一看情况，脑袋当时就麻木了。我只好拿出了自己身上的二十元钱交给母亲，叫她赶快去买口粮。这钱，我一直宝贝似地藏在身上，准备买几件衣服、鞋子的。

有一个好心的“走资派”把父亲生病的事反映给了有关方面，有关方面下了“特赦令”，于是“专政队”放回了父亲。父亲对我说：“‘九大’开过了，问题解决了，下一步可能就要好一点了。”我家的世交马士友前来看望父亲，给我传达了一个好消息：下一步，下放知青都要返城参加“抓革命、促生产”。

我根本不相信天底下会有这样的好事，我只希望不要再把好好的人分成“走资派”、“地富反坏右”、“牛鬼蛇神”，希望这个时代由某种人特意制造的人与人之间的残酷迫害、无情压榨早早结束，给劳苦大众一个太平世界。

回到农村以后，不久果然传出了招工的消息。这次招工的名额比例是15%，由大队推荐。条件是：只要家庭成分、个人出身全优就行。实际上，这次招工目标全是“红五类”，根本不论下放期间的表现，只要父母现在是“革命委员会”的成员，或是其他吃得开的人群就行。“一石激起千层浪”，所有家庭条件好的知青与其父母都兴奋起来，城里跑，农村跑，能跑到的一定跑，一时间乡里城里都在轰动这次招工的事情。

一向以无能著称的小王却有一个正在吃香的爸爸。他的父母来到农村，上上下下打点了一番，于是他被招走了。至于我，当然是想都不要想，因为我的父亲是“反动军官”，小王早已帮助公开，大队没有办法在名额有限的情况下为我考虑。待到九月份，第二次招工又开始了，这次是60%，条件依然与第一次相同。这一次，生产队以我的插队以后的杰出表现百分九十以上的村民推荐了我，大队又积极地向公社推荐了我。

体检，我每一项都合格，政审，我规规矩矩地填下了父亲的“问题”。十月份，通知下来，我被刷掉了，理由是：政治条件不够。

在我来说，当时的感觉除了极度黑暗，别的什么都没有。我在黑暗中离开农村，在黑暗中步行七十华里，在黑暗中敲开家门。我对于光明已经绝望，准备看一看生我养我的父母，然后决然地离开这黑暗的世界。我不想如此耻辱地活下来，继续做黑暗的点缀，做它的陪衬，被它愚弄了。

就在这时，父亲的“问题”有了转机。“工人毛泽东宣传队”进驻单位，对我父亲进行调查。结果证实，我的父亲是个抗日英雄、爱国军人。他曾经和自己的部队血战古北口、激战太原，与日本强盗拼过大刀片；在内战刚刚兴起的时候，为了民族大义，毅然随部起义，避免了伤亡。工宣队给了一个结论，把父亲定性为“旧军官”，“人民内部矛盾”。

这个结论拯救了已经决意自杀的我。单位出了一纸证明，证明我不属于“黑五类”子弟。我拿着这份证明找到招工组，招工组立即把我补上了应招名额。当时还有另外八个人，情况与我一样，也一一补上了。冬天，我们打点好行装，怀着有生以来最最欢悦的心情踏上了返城之路。

农村还留下了近30 %的同期下放的知青，他们大都是因为“黑五类”家庭牵连。1975年，我到省会精神病医院去看望一个女知青，她因为父亲是“右派”而一直没能返城。她疯了，天天哭呀、骂呀，骂歧视她的人、欺负她的人，也骂她自己的父亲。她父亲除了流泪，别无他策。当我离开她的时候，她突然指着天骂道：“我日你十八代祖宗，当初动员下放的时候，为什么不强调家庭成份！”

楚樵文集：http://hxzq05.d68.zgsj.net/showcorpus.asp?id=190

undefined

华夏知青网不是赢利性的网站，所刊载作品只作网友交流之用
引用时请注明作者和出处，有版权问题请与版主联系
华夏知青网：http://www.hxzq.net/
华夏知青网络工作室

关于“知青文化”的探讨

不久前，曾有关于‘‘知青精神”的提法与争论，有很多知青网友与网民，都发表了各自不同的意见与看法，虽然至今没有一个论断，也许最后还得以官方说了算；但‘‘知青情结”可以说是人所公认的，介乎两者之间，我想应该就是‘‘知青文化”了，如果‘‘知青文化”能得到共识与肯定，那么‘‘知青精神”就有了基石。我想，如果有了‘‘知青文化”这碗酒垫底，那么‘‘知青精神”的口号也会随之响亮起来。

看到电视台近期关于‘‘知青印象”的马路随机采访，年青人多认为，知青群体随着大返城以后已经消失，只记得他们当年很苦的；好一点的有亲戚朋友的家人曾当过知青，会有一些关于知青的印象。对于历史上的知青仍抱有好奇心，进而开始认真地研究知青问题的，几乎都是一些有思想有进取精神的高学历的年青人。

这使人联想到抗战初期的八路军时代，整个部队化整为零，融合于广大人民群众之中；大返城之后，知青却是为生存为生活各自为战，其间约隔了二十年左右的时间，住进动迁房之后，才开始有聚会。我参加的第一次聚会，是在联络员高正伟的家里，一屋子坐满了人，烟雾腾腾，搞得两老无法睡觉。二十年了，社会上人们当然很少有印象，不似当年的‘‘土八路”，无孔不入地出现在人民中间，或搞锄奸，或打冷枪，或搞宣传，更有时组织人们搞大规模转移，即使牺牲生命也在所不惜，是战争年代根据地人民的依靠，知青显然是没得比的。迅速地零化后，再也整不起来，各改各的行，各走各的路了。

那么为什么‘‘知青情结”会迅速得到公认呢？我认为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从家庭式的知青聚会转到饭店后，一开始并未钻进包间，大庭广众面前，一见相隔数十年的知青战友，相拥号啕大哭，之后再哈哈大笑，有知青为赶聚会，不惧山高路远，有的还专门请假。除非铁石心肠，谁人会见后不为之动容？加上知青人数众多，聚会不断，自然会广为流传。

随着一批有影响力的描写知青的电视剧出现，如‘‘孽债”的家喻户晓，以及知青文学著作的出版，使人们重新恢复了对知青的记忆，超过了很多历史事件，诸如抗美援朝，中印战争，中苏之战与中越战争之后，人们对于那批退伍军人的关注，我想，很大程度在于昔日的知青们顺势吹起了‘‘集结号”，吸引了整个社会的眼球。

网络业的出现无疑为知青提供了更大的空间，我们云南东风农场的知青利用‘‘勐龙在线”网站，冲破了原先

以连，营为单位的限制，知青们以回忆农场往事为主线，能写的则写，不能写的则看，知青影响一下子扩大，加上本身开博人数增多，更扩展到让非上海本地.非知青人士.包括一部分社会精英与有识之士所注目；她不同于‘‘伤痕文学”，更不同于‘‘愤青”情绪，后两者重于破而轻于立，破大于立；‘‘知青文化”则回忆当年，珍惜今天，对明天持乐观向上的态度。她又以知青群体拥有的真实.善良.待人真诚与实干精神，弥补了自身的许多不足之处。

今天，有过知青经历的社会精英们有的进入领导阶层，有的进入如电视.报纸和杂志等新闻媒体行业，回忆知青时期的文章与电视节目，也渐渐多了起来，老知青柏万青的‘‘老娘舅”节目，更是家喻户晓。

鲁迅先生说过，‘‘这世界本没有路的，走的人多了，也就成了路。”也许，对‘‘知青文化”的肯定与确立，也是这样的吧。

再回到当年的版纳农场。因为有名的‘‘朱梅华失踪案”，团级干部中上海籍知青如蔡家顺.金家林.孙向荣与季寿银等都来我们三连蹲点过，与我们清一色69届‘‘小上海”不同，当时的感觉，‘‘老上海”的文化素质明显要高，与当年连队里热衷于搞‘‘阶级斗争”，某些近乎痞子式的文革遗风，反差相当大。

这次的国庆.中秋双节长假，第一次超出本连队的知青聚会范围，与季寿银及‘‘老水牛”等老上海网友联欢，见到了久闻其名的‘‘橡胶树”.‘‘亭子间”‘‘2009林毅”及‘‘山那边来’’与‘‘萧瑟”，好象聊不完的话题，‘‘上至天文地理，下至鸡毛蒜皮”，一见如故，那个热闹劲就别提了！喻家霖夫妇还偷偷带进几个‘‘伊利莎白”瓜，为切瓜又跑出去买了一把刀，大伙争着点歌唱歌，‘‘橡胶树”不停地忙碌，一会儿站在桌上，一会儿半跪在地上忙着拍照。令人感动的是‘‘亭子间”‘‘林毅”与‘‘山那边来”以及甘单，自己不唱，一直认真地在欣赏，在鼓掌；‘‘萧瑟”与‘‘没米山岗”歌喉极好，引得满堂喝采；‘‘老水牛”的前苏联老歌，季寿银的长征组歌，唱出了‘‘爷们”气概；黄裕茂的童安格风格，刘静芬的伤感老歌曲，也各有千秋。忽然间，‘‘老水牛”蹦跳着抓起桌上长长的水果刀，左劈右晃，嘴里还敖敖乱叫，满屋子人.特别是女同胞们先是一阵惊悚，随后又开怀大笑起来。

唯一非知青出身的是喻家霖夫人小顾，惦着家里的宝贝女儿，见请假不成，半道上偷偷溜出去，想干脆来个不辞而别。不料团保卫干部出身的季老二料事如神，用他‘‘铁塔般的身影”(黄裕茂语)挡住出口，可怜喻家霖夫妇，只得顺原路返回。

饭桌上，大伙还一直惦着生病的网友‘‘吉言言”。紧接着好戏又来了，由‘‘山那边来”起头，‘‘老水牛”接龙，串起一出‘‘版纳小景”：

山上层层梯田上‘‘橡胶树”在‘‘萧瑟”的风中摇曳，‘‘老水牛”正在悠闲地啃食着‘‘版纳荒草”，一

群知青从‘‘山那边来”，其中有个叫‘‘林毅”的男青年，回到他住的‘‘亭子间”，饥肠辘辘地感叹：金嚎‘‘没米山岗”哦(吃饭，没有菜啊)。

‘‘老水牛”说完之后，猛地双手一扬，好似阿Q唱完‘‘我手持钢鞭将你打”后的招牌动作，把一桌人笑得个前仰后翻。

临别前，远居宝山的季寿银动了感情，老大哥一样与好几个知青相拥互道珍重，依依惜别，握手转了一圈之后，只少了‘‘橡胶树”一个人，原来他急赶着上传照片发博文去了。我听得‘‘萧瑟”小声地感叹：‘‘真是相见时难别亦难啊！”我想起‘‘勐龙在线”编委吴鹤翔说过：‘‘我们东风农场有8000名上海知青，作为人数不多的网友，今天能够聚在一起，确实是很幸运的。”太幸运了！为当年在版纳农场一起洒下的汗水，一起付出的艰辛，和一同度过那难忘的青春岁月一一干杯！

写于2009年10月12日

版纳荒草文集：http://hxzq05.d68.zgsj.net/showcorpus.asp?id=185

华夏知青网不是赢利性的网站，所刊载作品只作网友交流之用
引用时请注明作者和出处，有版权问题请与版主联系
华夏知青网：http://www.hxzq.net/
华夏知青网络工作室

王小波的孤独与战友们的鼓噪

人老时爱忆旧，思到极处便容易发痴颠狂。许多当年的“知青”近年忽发觉头童齿豁了，于是借立志扎根农村而终未扎根的四十周年之际鼓噪起来，其声宛若古琴余韵，至今绕梁不绝。

所谓“知青”，大抵经历过这样的心路：热血沸腾立志扎根、彷徨失落痛苦愤懑、绞尽脑汁脱离苦海。家兄是完整经历过这三个历程的，到我这一辈则简化得只剩后两个了。按说遭此大难，总该刻骨铭心并挖出根源发誓莫重蹈覆辙的吧，可实事不然，二千多万“知青”中如此做的不说凤毛麟角也差不多。这颇有些象牙疼，疼时发誓根治，可疼痛稍减则讳疾忌医了。个中原因并不如某些人搅混水称此事“复杂”，“复杂”到几十年上百年内说不清的地步。除却某些“文革”中受益且坚持老调者外，还有大量当年陷入迷信至今不能自拔者。这后者颇类似某些曾经自以为受了神的嘱托，救人于苦难的巫婆神汉们，现在虽然不再装神弄鬼，却依然存留对神的敬畏而并不自知。

除以上两类外，更多的是讳言否定自己的一类。往事即便是痛苦的，回忆起来也甜蜜。所以狄更斯和简爱的自传小说里苦难的童年也浪漫有趣；现在有谁还认为伊里亚·列宾那幅油画《意外的归来》充满悲苦呢？只觉得艺术的美罢了。其实这三位本意是揭破那痛苦以警世人的，后人读来感觉浪漫则是人的本能了。人不愿意回忆曾经的错误、痛苦、无聊、上当、蹉跎，并且由不愿意到回避，再到自欺欺人，于是扮自己为光荣、壮烈、有趣、大有作为。譬如未抵挡住奸商的花言巧语，买下假货，就很不愿意承认，只好吹嘘此乃货真价实。久而久之，这虚拟的幻境使人颇为自得了。中国人的这种劣根性古已有之，阿Q就是缩影，鲁迅先生下笔确乎既准且狠，剥了可怜者的面皮。

说起“知青”下乡，本非独立于彼时中国乱世的桃园，它本是领袖发动“文革”的举措之一。其理论是：读过书的人很坏，要通过体力劳动来变好，至于误了国家教育科技，违背了人权，那领袖是不管的。其实下乡不独“知青”，还有现在几乎被遗忘了的专家教授“走资派”们，即所谓走“五七”道路。这些人对“文革”，包括对自己的反思之深，是足以让“知青”们脸红的。例如文革结束，臧克家先生发表歌颂“五七干校”的所谓诗歌，当即遭到几乎所有同伴们的痛责，搞得老先生满而羞惭。读韦君宜的《思痛录》，年已八旬的老革命，对党和自己错误的反思让人感动。

反观“知青”们，至今多数仍在直接或间接歌颂那运动，真如鲁迅先生感叹的：我一向以为青年必胜于老年，后来见青年们的所为，颇为失望了。现在，“知青”们又担负起向后代话当年的责任，按他们所写所说，后代们觉得“知青运动”苦是苦，但好处更多，很有必要，而且小桥流水温馨浪漫呢。“知青”们回避了，为什么那时经济面临崩溃？为什么教育科技越来越落后？为什么百姓穷得一塌糊涂？似乎这些与“知青运动”毫无干系；至于与他们本人，不但无干系，他们还忍辱负重地做了许多有益的事哩。所以他们是无愧于时代、无愧于后人的。若问“知青运动”与“文革”的关系，他们则或否认或王顾左右而言它；问起他们当红卫兵时的所为，那是会满脸委屈或勃然大怒的。看来，所谓“知青”，恰因为知识少得可怜才糊涂，把他们算“知识分子”，委实冤枉。

造成中国永远无法追回的损失的“文革”，是中国的耻辱，其根源和真相至今得不到披露，这也是中国不能快速发展的原因。我真佩服，当年投身“文革”一部分的“知青运动”的“知青”们，现在却坦然载歌载舞大献颂诗，公然对后人说谎而面不改色心不跳。有诗曰：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尤唱后庭花。商女倒可以理解，她们是生活所迫不唱不行，况且她们都是无资格当“知青”的文盲，而受益于改革过得很滋润的“知青”们却甘当商女，真也算得上无聊了。

揭露耻辱是为了不再发生那历史。人有健忘性，例如黄河几十年不溃堤，人们就忘记了曾经的洪患，耻笑防洪固坝是小题大作。中国的悲剧几乎皆因忘记历史而来。不得不再提德国人，他们耻于“二战”的罪恶，为免重蹈罪恶，德国总理下跪忏悔；他们立下永久建筑让世人参观和监督，这相当于自己往脸上铸犯罪的金印。中国人是绝无这勇气的，因为中国人爱遮羞，所以巴金倡议建立“文革”博物馆就无人理睬。“文革”时逼得老舍先生自杀、打断彭大将军肋骨的红卫兵们，后来都当了“知青”，四十年过去了，可曾见他们有一人出来忏悔？相反此时正在回顾曾经的“光荣”呢。

回应一下标题吧。由上文可知，置身当前“知青”们“怀念”的鼓噪，“知青”中少数思想前驱者注定是孤独的。黑龙江和云南“知青”人数多、环境苦、悲喜剧也就多且热闹，颇有代表性。王小波是云南“知青”，是“知青”中最具深刻思想者；他对“文革”和“知青运动”深刻的分析与鞭挞，无有出其右者。而他的“知青”战友们却对他视而不见，那是以他为耻吧，因为他揭了大家不愿揭的伤疤，让大家在孩子面前的形象不那么“光荣、壮烈、有趣、大有作为”，他有点万人恨。由此可见，王小波的孤独与他的战友们的鼓噪都是历史的必然。

2009-11-25

青春不再话“无悔”

同事妻子患了绝症，大家安慰，我也想安慰，可想不出说什么。忽想起辩证法这法宝，想说：患绝症也好，患者可以感受不平凡的人生，亲人可以学得坚强。但我不想挨嘴巴，就没说。其实有这样说的：当年北京女师大校长

许寿裳先生的妻子去世，鲁迅去信说，失去妈妈的孩子由此可以变得坚强。不过鲁迅先生是在人死后的安慰，人死前这样说怕是不行，所以我不说还是对的。为什么呢？因为患绝症是件坏事，我非说是好事，那就只能解释为找挨揍。鲁迅事后这样说，并非认为许夫人去世是好事，而是面对无奈给生者的安慰罢了。同理，有一年我的钱让人掏了，损失二千元，虽然我不大在意，但也笑不起来。办公室王姐对我说：丢丢了吧，钱是八王蛋，有了会学坏。王姐平时对我不错，我不能打她嘴巴，又不能急眼，就说：王姐，把您这月开的王八蛋给我吧，省得它让你学坏。王姐却冒着学坏的危险，未把王八蛋给我。

这两个例说明，事情好就是好，坏就是坏，非倒过来说是不行的。这看着是人之常理，却并不一定人人掌握。对事物，我觉得首先要判定其性质，说白了，事有好坏之分。比如助人为乐是好事，杀人放火是坏事；知书达理是好事，文盲粗野是坏事；温饱舒适是好事，受冻挨饿是坏事。往大说，民主富国是好事，专制贫穷是坏事；开放搞活是好事，闭关锁国是坏事；民族独立好事，丧权辱国是坏事。依此来说，火烧园明圆的洋鬼子，及那位不肖的龚自珍的汉奸儿子是坏人，抗日救国的民族英雄是好人；为民造福的孙中山先生是好人，专制独裁的袁世凯是坏人。

拿不远以前的事说，文化大革命是坏事，因为它扼杀民主，扼杀人权，经济倒退，人人自危；附属于文革的知青运动是坏事，因为在农村土地不够农民吃的情况下抢农民的饭吃，只能促退生产力，因为它剥夺了人的选择职业权，因为它是乌托邦的实施（许多人至今还迷在空想中），因为它剥夺了一代人的文化提高，从而影响了中国的科技文化发展。

单说知青运动，有人觉得此事不大好，但也有好的一面。这好的一面有说建设了社会主义的，有说锻炼了意志的，总之是“无悔”。对前者，我在以前的文章中说了，就经济学角度分析当年的国民经济，总体讲是破坏，使农民的大锅饭越来越坏，此正所谓南辕北辙，帮倒忙，越帮越忙也。接下来看“无悔”。

主席教导我们，事物的性质由事物的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我觉得这理论有道理。比如抗日战争主要矛盾是中华民族与日本侵略者的矛盾，主要方面是中华民族，是正义战争，故而此战争是正义的。依此理论，知青运动既无民主又无民生，无疑是坏的，如果是好的，为什么知青运动结束时，连现在歌颂它的人都连夜跑回城了呢？为什么不把孩子送农村去劳动呢？为什么那时七亿农民加几千万知青种那么丁点地还吃不饱，现在扣除进城务工的农民，仅四亿农民种地，却吃得饱了呢？

麻烦出在还有个理论，就是一分为二。这理论从产生起，就有哲学家质疑，杨献珍先生就因此进了监狱，我在《哲学研究》中常见反对这观点的文章。理论咱不管，咱就百姓的认识谈谈。一分为二正不正确我不清楚，但几十年来，我们一直用它来混淆事物的性质，可算得庸俗哲学。本来依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性质的理论，简单说：好就是好，坏就是坏。可有时办坏了事不愿承认，怎么办呢？便用一分为二来遮羞。比如人口多到了国力承受不起的程度，就说人多力量大干劲足；比如文革搞垮了经济，就说乱是乱了，但乱了敌人，锻炼了人民。这理论传到今

天，便有人说：不科学的决策是交了学费，就有人说：知青在农村锻炼了意志。

我原来对领袖的话深信不疑，后来事实使我有了疑，最后看了王小波的杂文坚定了信念，他与我观点一模一样。顺便说一下，我觉得王小波是老三届知青中思想最深刻的学者和作家，那些认不清左的路线者应当好好读一读。他在驳知青运动锻炼了意志的说法时说，事情好就是好，坏就是坏，至于坏事产生了某些好的后果那是另一回事，不能颠倒事物的性质。他举例说，若依“锻炼了意志”的观点，想当史学家，就得学司马迁去掉自己的男根，想当音乐家，就得学贝多芬把耳朵搞聋，想当画家，就得学凡高割掉耳朵。（见《我看老三届》，载《王小波文存》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版）。

我也曾抬扛说，要想把中国军队锻炼成铁军，就要进行长征。有人说，现在真有人沿长征路线走呀。我说那不算，真长征得饿肚子，穿破衣，翻行草地雪山时天上有飞机轰炸，地上有枪炮扫射，十人之中得死九人，剩余的一人才能锻炼出来。我想，这种锻炼没人会同意，所以现在谁也不愿意把孩子送农村去吃不饱穿不暖。

据我看，认为“无悔”者有二种。一是被动型，好比某人文革写了大字报说知识越多越反动，现在自我安慰说写大字报固然不是好事，但由此我学会了书法，这不是事物的一分为二吗？这不客气说简直是污辱了主席的理论。二是主动型，这不包括明知坏事而故意做的，是指把坏事当好事做的。许多知青满腔热情去建设农村，实际是帮着继续着倒退生产力的大锅饭，这好比帮着把拉圾从一个马路扫到另一个马路，更增加了环卫工人的劳动。还有什么好的一面？有人说不管怎么说，那热血青春值得怀念呀。这有点像痴情女子死去活来爱一个男子，海誓山盟、以身相许若干年后，却发现男子另有所爱，不过是玩弄自己而已。知道真相后女子还对假爱无悔，那可真是傻到家了。

知青本是被人利用的工具，弃之无用而放之农村，与那女子并无两样。所以还是别做傻女子了。

2007-06-06

笨人文集：http://hxzq05.d68.zgsj.net/showcorpus.asp?id=169

华夏知青网不是赢利性的网站，所刊载作品只作网友交流之用
引用时请注明作者和出处，有版权问题请与版主联系
华夏知青网：http://www.hxzq.net/
华夏知青网络工作室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再教育很没必要

有人说，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

当今，很多曾经的知青对这句话提出质疑。他们认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没必要。

为什么说很没必要呢？因为文化大革命中的上山下乡运动与社会发展的大方向是背道而驰的。社会发展的大方向是城市化。把这么多人的城市户口注销，把这么多城市青年赶到乡下去，是社会发展的反方向运动。

于四个现代化不利。我们知道，工业的现代化，需要大批技术人才，这些学生，中断了学业，说是“有知识”的青年。其实有不少人才上到初中，有的才小学毕业。只凭这些知识，建设四个现代化是远远不够的，我们都知道，上岗前要培训，如果国家真是为了实现农业的现代化把这批青年学生下放到农村去，最起码应该对他们进行农业技术方面的培训，可是没有。他们用最原始的劳动工具从事笨重的农业劳动，这就是很少听说知识青年在农业科技和农业机械化方面有所建树的根本原因。要说有利于国防现代化那就更可笑。绝大多数到边疆兵团的知识青年日常工作就是种地，连枪都没摸过，有的甚至没见过。即便是摸过枪的，也不是什么尖端武器，凭他们那点儿文化也操作不了尖端武器更甭提为发展国防工业做贡献了。

于人才的培养和科技的发展很无必要。大家都知道，知识有个连贯性问题。上山下乡运动，造成了我国科技人才的断层。这10年，正是亚洲四小龙腾飞的时候，世界经济在飞速发展，我们国家却因为人为的谬误耽误了科技人才的培养。后来意识到了，重新提出“科教兴国”“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却耽误了时间。

于农村很无必要。我国农村的整体情况是地少人多。知青到农村去，大多数是种地。和农民争工分、争口粮，成为农民的负担。

对农村青年是不公平的。有选调、招工、上学的机会，当地农村都先济着知识青年了，这是不公平的。如果没有这些知识青年，农村本地青年本可能有更多机会。

对基础教育很无必要。小学生、初中生，看到上学的结果就是被轰到农村去种地。他们缺乏好好学习的动力，

看不到前途。

于无数城市家庭很无必要。很多知青到农村以后，基本生活不能得到保障。在城市里的他们的家长牵肠挂肚，无心本职工作。有的家长年老体衰，得不到子女的照顾。他们为子女的前途担忧，整天以泪洗面。这一心理活动，从青年学生们下乡时那惊天动地的哭声中就可见一斑。

于知青本人很无必要。如果没有后来的拨乱反正，这些人中的绝大部分将成为贫下中农新的一代。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这一句话无论是在青年学生的去向问题上还是在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关系问题上以及知青和农民的关系问题上所做的阐述都是片面的、形而上学的。

青年学生，不仅需要上山下乡，而且需要到工厂去，到部队这座大熔炉去。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走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单提和农民结合是片面的。

中学生继续升学也很有必要。上出学来，与工农兵相结合，在学习阶段多参加社会实践。老人家说过“学生以学为主，兼学别样”。这句话把学生的主要任务说得很清楚。打断学习进程，硬说他们已经“毕业”了。把他们赶到乡下去。就是否定“学生以学为主”，是不能自圆其说的。

有的知青被推荐上了大学，当上了“工农兵大学生”。他们不明白，为什么昨天自己还是“再教育”的对象，怎么今天的任务就变成了“上大学、管大学、改造大学”了呢？这种矛盾现象是怎么产生的？事情很简单，这两句话都是片面的。知青上大学的主要任务是学习而不是改造别人。他们不过是延续他们的学习历程，只是中间这一段本应该上高中的却都下了乡，造成了基础知识的缺乏和不连贯，这就为他们的继续学习带来了困难。

“很有必要”强调了改造主观世界。而我们一贯主张的是在改造主观世界的同时改造客观世界。

人和人之间是互动的，人群和人群的思维方式、生活习惯等是互相影响的。片面强调知青上山下乡的任务就是“接受再教育”和“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农村是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相矛盾。造成这一矛盾的根本原因是“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这句话的片面性。

我们所说的“很没必要”不是说改造主观世界不重要，不是说走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不必要。而是要强调说明这句话作为“文革”中上山下乡“运动”的理论依据于国，于民都是不利的，是片面的、站不住脚的。

说很有必要，肯定对有些人是很有必要滴。对谁？就是对提出了“很有必要”的人。始役之，终弃之。而且可以掩盖发动内乱，导致工业发展停滞，城市容纳不了这些新生劳动力的诸多问题。

时至今日，还有的人为“很有必要”涂脂抹粉。他们的理由之一就是“行”和“知”的关系。行，所以知。到农村去了。了解了农村，进而了解了社会，为以后干一番大事业奠定了坚实基础。我们想要说的是，我们并不反对

到农村去，我们并不反对了解农村，我们不赞成的是以一个永远受“再教育”，永远被改造的身份到农村去。而且扎根，永无出头之日。这些人，他们今天是“事业有成者”。可他们偏偏忘记了是改革开放的国策给他们提供了这样一个机会。他们自吹自擂，不懂得感恩，不知道事情的来龙去脉，企图歪曲和掩盖事实真相，把那一段旅程描绘成人间天堂。我们说，你也就是回来了，才会有此高论，如果强制（说好听点儿，叫“号召”“动员”）你在那里呆一辈子，苦兮兮的，此时，你也许正想着怎么到城里打工挣两个钱盖房子呢，那有什么心思讴歌你的光辉经历？

也有的说，我在那里当了老师，促进了城乡文化交流。我们说，看一个问题要从整体上看。1700万知青下乡，有多少当老师的？1977年恢复高考，中国570万考生走进了高考考场，各大专院校录取了27．3万人。不到5%。那95%的知青为什么落榜？最主要原因就是系统知识的缺乏。你当老师，站在讲台上，说明你还有些知识，你那些知识是怎么得来的？是“17年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培养的你，不是受“再教育”得来的吧，所以，你还应该感谢“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呐。你不知感恩，反在那里喋喋不休沾沾自喜，如果只让你上到小学毕业，如69届、70届，你可能站在中学的讲台上吗？

还有的说，如今的青年一代。吃苦太少。不懂得珍惜现在的幸福生活，所以把他们赶到乡下去很有必要。我们并不是认为吃些苦对一个人的成长没有好处。但当时是怎么一个情况？大多数青年学生是怎么下的乡？当时是告诉你下乡吃些苦然后回来委你以重任吗？否。当时就是让你去接受改造，说全面点儿叫改造世界观，说艺术点儿叫“接受再教育”，而且是扎根，就是永远，就是一生。这一要求，对所有曾经的知青，包扩那些至今还唱着高调的人们，你们真的能接受，而且发自内心的拥护吗？否。假的就是假的。伪装应当剥去。返城才是千百万知青不搀假的心声。他们把他们的心声化为了实际行动。这才是历史的真实。千百万知青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否决了“很有必要”。另外，我们要说明的是，吃苦，不是青年成长必需的历史阶段。美国、日本、澳大利亚，欧洲，他们的国家没有搞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国家不也发展了？而且不比我们这10年慢。一些老人也不必多虑，70后、80后、90后，正在或将撑起共和国大厦。我们完全可以相信他们。我们相信，一代更比一代强。

让“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论见鬼去吧。

乐观的被耍的猴子的妙言

主角：一只脖子上栓着链子的被耍的猴子。

配角：人人：你从来没想过，你这样被耍猴人耍很可悲吗？

猴子？可悲吗？我怎么不觉得。我很快乐。

人：你天天翻跟头，不累吗？

猴子：现在挣口饭吃容易吗？我只当锻炼身体了。

人：你这么下去，有什么前途？

猴子：谁说没有前途？如果马戏团招演员，是会看上我呢还是会看上那些山里的野猴子？我有实践经验。

人：听说要带你上山上去演出？

猴子：上山好啊，我正想到处去走走，这不是免费旅游嘛。

人：听说还要下乡？

猴子：下乡好啊。乡下的桃子新鲜。我最爱吃了。

人：那么多人围着你看，你不觉得他们的笑对你是一种嘲讽吗？

猴子：他们看我，我也看他们。他们觉得我可笑，我觉得他们可笑。我可笑的不就是翻跟头吗？他们可笑的事我要告诉你，你得笑三天三夜。

人：你从不后悔吗？

猴子：你们人最虚伪！你们把我捉了来，给我套上了这根链子，你们想过没想过要征求一下我的意见？要说后悔不后悔，那是指自己的决定被后来的实践检验，对了还是错了，走没走弯路，事后对自己选择的反思。可是当时我能主宰自己的命运吗？我能有自己的决定吗？我真不明白我们猴为什么变来变去，竟然变成了人。你知道我如果变成了人，我最想做什么吗？我最想给你也套上一根链子，问问你这个问题。

人：真没想到，一只被人耍的猴子竟然学会了思考！

值此五·一国际劳动节之际，以此短文敬献给尊敬的为祖国建设贡献了美好青春的知青们。过去的知青，现在已经年近花甲。40年弹指一挥间，沧海已经变成桑田。我真诚的祝愿前辈们快乐健康！祝愿博友们快乐健康！祝愿所有的劳动者快乐健康！

每一个人都是被耍的猴子——解读《乐观的被耍的猴子的妙言》文/若水每一个人都是被耍的猴子。

有些人自以为自己是耍猴人，其实也不过是一只被耍的猴子。

是猴子，就免不了有它的思维局限性、历史局限性、社会局限性。

那根链子，就是时代的印记。

猴子中本事最大的要算是孙悟空了。他曾阴曹天宫一通折腾，最终还是戴上了紧箍咒。

那紧箍咒是他自己给自己带上的。

一名外国女教师在给她的学生讲解《西游记》时说，一只猴子，还有一头猪，跟着一个和尚去取经，半路上打碎了一堆骨头，打死了一只蝎子，打跑了一只兔子和一条小金鱼。

国人津津乐道于《西游记》《西游记后传》《西游记后后传》，只有这名外国女教师道出了真相。毕竟是旁观者清。

读《乐观的被耍的猴子的妙言》，有人读出了乐观的心态是决定一切的，有人回忆起了凄苦的往事，有人读出了讽刺，有人读出了自嘲……

当年的知青就像这些猴子，被人在脖子上套上链子，牵到山上或乡下去演出去了。

当然，也不排除有些猴子是自愿在脖子上套上链子到山上或乡下去演出的。

但这样的猴子毕竟是极少数。

猴子有追求快乐生活的天性。

猴子们都希望自己的生活过得好一些。人要建设小康社会，和谐社会，就是为了都生活得好一些，更何况一群猴子。

偏偏有人问猴子：你们对当年的上山下乡悔不悔？

猴子们的回答大致有以下三种：1无悔。2有悔。3有怨无悔。

一只脖子上套着链子的被耍的猴子向提问人表达了它的愤怒和无奈：它当初是被人硬套上链子牵着走的，现在倒要问它悔不悔！

它看透了人的虚伪。

后来呢？

后来这只猴子老了。它退休了。

因为它年轻力壮时做出过贡献，为耍猴人；所以耍猴人给了它一份安稳。

这只猴子有时写写博客。它写的是自己的演出回忆录，它不知道，它在写历史。

它不是司马迁。

它听说数学上有这么一个符号——∑，对了，就是它。这是求和符号。

千千万万个像它一样的猴子写的东东加在一起，胜过一本《史记》。

那天，它读了若水博客中的一首名叫《过好每一天》的诗，把其中几句抄了下来：愁眉苦脸也是一天，/高高兴兴也是一天，/我们何不/快快乐乐每一天。/年轻时，/我们也曾做些贡献。/退休了，/国家给我们这么多钱。/我们何不/乐乐呵呵每一天？

它以为然。

这只猴子是个乐观主义者。

若水文集：http://hxzq05.d68.zgsj.net/showcorpus.asp?id=176

华夏知青网不是赢利性的网站，所刊载作品只作网友交流之用
引用时请注明作者和出处，有版权问题请与版主联系
华夏知青网：http://www.hxzq.net/
华夏知青网络工作室

另类再教育概要（一）

常言道：种豆得豆，种瓜得瓜。现实中多的却是事与愿违：有心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

1968年末伟大领袖发出“最高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此举虽有不得已之处，但未尝没有培育一代革命新人的良苦用心。然而他老人家真的就自信到这种程度，竟然毫无觉察农村和农民的穷困落后状况可能对狂热而无知的城市青年知识分子产生何种震惊和镇静作用，从而出现他绝不愿意看到的反思么？一代人思想解放的萌芽和最初的社会批判精神，难道不会由此产生吗？

所以，就有了“另类再教育”一说。

以下记忆犹新的往事，就算“另类再教育”的要点吧。

要点一：

1969年春耕前，下乡不久的我歇工时到附近农家讨开水喝。我完全不知道在当时的四川农村中，保温瓶是罕见的奢侈品。绝大多数农民都喝生水，家中是没有什么“开水”的。主人略一犹豫，让我到灶头上缸钵里去舀——那是一钵青灰色的“汤”，比米汤稠不了多少，其中有些说不出颜色的淀粉颗粒，还漂浮着小片的菜叶。我顿时反应过来：这是“饭”！从此我知道了什么是“春荒”（1），知道了粮食生产者们是在以什么东西充饥。

夏天的黄昏，农民会在河滩上撒一些米汤之类的东西，盖上石头。第二天早上搬开石头，馊臭味之中会聚集一种昆虫——象斑蝥但不是绿色而是灰褐色，当地称“屁蛋虫”。收集起来将其放到烧烫的铁锅里干爆一阵让其“放屁”，炒熟后就成为一种食物。

注：

1、每年阴历二、三月，四川农村中正是大春作物（水稻为主）已经消费将尽而小春作物（小麦为主）尚在田

间的时候，青黄不接，是农民最缺粮、生活最困苦的时候，也是黑市粮价最高的时候。当时成都市民凭定量粮票买大米一斤是一角四分二厘。黑市米价最高大概每斤五角。

要点二：

1969年年终决算，我所在的生产大队每个劳动日价值是三角。也就是说，一个全劳力每天天亮出工天黑收工（1）、一天不休息地干上一整年，产值不到一百一十元。这个劳动价值在川西一带应属中等水平。有的地方劳动日价值甚至是负值，即劳动成本（如农机、化肥、农药、种子等支出）高于劳动收入。

当年一个全劳力大约应负担三至五人的生活，也就是说当年中等收入的农民人均年收入约二十到四十元。所以，很多农户都是“倒补户”，即分了口粮后还倒欠生产队的钱。农民的其他收入唯有很可怜的一点家庭副业，如养一、两头猪、喂三、五只鸡等，还有极少的“自留地”（2）可收获些粮食、蔬菜等。经营这些“私有经济”，农民战战兢兢。因为稍有政治运动就可能“割”这些“资本主义尾巴”（3）。

注：

1、当年四川农村的作息制度一般是：天亮出早工，工作约两个小时后回家吃早饭。约一小时后再出工至下午两点钟左右，回家吃午饭。一个多小时后再出工一直干到天黑。

2、自留地：上世纪五十年代初，中共在中国大陆农村实施“土地改革”，农民分得土地，实现了祖祖辈辈的宿愿。（至今在雅安市上里古镇的石岩上还完整保留有上世纪三十年代中国工农红军刻写的标语：“自愿参加红军，分好田好地。”很有喜剧意味。）但在几年后的农业合作化运动中，所有土地归农业合作社集体所有。农民个体只能拥有不超过当地人均耕地面积5％的土地的“使用权”，作为“自留地”经营。在人民公社化运动中，一些地方将自留地也收归集体，1960年以后才逐步归还农民。

“70后”学者熊培云先生在《普天之下，莫非国土》一文中精辟地指出：二十世纪的中国革命，是以承诺土地私有“打天下”始，以土地收归国有“坐天下”终。

3、马列主义理论认为小农经济是产生资本主义的温床。所以，必须限制甚至打击农民的私有经济即家庭副业，这就是“割资本主义尾巴”。例如，农民养鸡数量不能多，多养并出售就是搞资本主义，可以处罚甚至没收。改革开放初期，曾有文章称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差别就在于农民养鸡的多少：养两只鸡是社会主义，养三只鸡就是资本主义，以此嘲讽当年的农村政策。据说有人还真在马列原著中找到依据：雇工八人以上就是剥削，就是资本家。

要点三：

秋收后，最重要的大事就是“交公粮卖余粮”。“公粮”相当于农业税，“余粮”即国家定价收购粮食，二者均带有强制性。当时川西农村每斤稻谷的收购价大约是八、九分，相当于大米价每斤一角三、四分。而大米黑市价每斤至少三角，年成不好或“春荒”时期可高达五角。由于农业生产水平低下，农民本身就吃不饱饭，“余粮”并非就是农民手中“多余的粮食”。所以“瞒产”在当时农村中不是个别现象。

瞒产就是向上级低报粮食产量，以减少交公粮卖余粮数量。由于一个生产队的人往往沾亲带故且利益一致，瞒产一般不为外人所知。一位知青朋友离开农村时，生产队从上到下千叮咛万嘱咐:“（瞒产的事情）千万说不得啊！”不止一户平时相熟的村民还送来小礼物如蔬菜、鸡蛋等，祈望他保守秘密；甚至很小的孩子都来他住处说“千万说不得啊！”

参考资料：

1991年，我又到了当年务农的地方。农民说：现在能吃饱饭了，就是缺钱。年轻点的人都外出打工，光靠庄稼挣不了几个钱，老天爷不给脸就要赔本。

2006年，国家终于取消了农业税，农民不用无偿交公粮了。

2010年电视曾报道说，夏粮收购困难，收购价一般每斤九角，农民不愿意卖。采访几个农民，都说化肥农药种子劳动力价格都在涨，今年灾害也多，想再等一等卖。专家出来说道：国际粮价上涨对我国影响不大。国家收购粮食部门的负责人出马正色道：粮价涨到一元就不收了。

我略算一笔账：四十多年前每斤八、九分的国家粮食收购价，现在涨了十倍。当时四川城市职工月工资一般不到四十元。2010年四川城市职工平均年工资约二万七千元，合月工资二千二百多元，大约涨了五十六倍。

2010年中国GDP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国内外媒体议论纷纷。中国官方声明：我国人均年收入一千三百元以下的绝对贫困人口有四千万；按联合国每天每人一美元的贫困救助标准，我国还有一亿五千万人的收入在此之下。（这些贫困者绝大多数都是农民，主要分布在边远地区、自然条件恶劣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

诚哉斯言。

要点四：

1969年夏收秋收之后，有了粮食亩产量的直观概念：小麦最多四、五百斤，水稻也多不过七、八百斤（1）。

然而我却在农民家中看到了1958年的半张旧报纸（记得是《四川日报》），上面白纸黑字赫然写着“小麦亩产七千斤，水稻亩产十万斤”（2）！从此我才知道当年的“浮夸风”（3）是多么令人恐怖！

注：

1、目前由袁隆平先生培育成功的超级杂交水稻亩产一千八百多斤。据说还有超过两千斤的。这些大概是世界之最了。

2、当年吹牛之冠大概要数广西环江县红旗人民公社：水稻亩产130434斤！是正常产量的一百好几十倍。消息出自1958年9月18日《人民日报》，且至今未作更正。

3、在1958年的“大跃进”（“三面红旗”之一）运动中，各地对粮食产量的虚报浮夸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其中尤以河南、湖北、安徽、四川等省最为猖狂，不仅成千上万地上报亩产量，甚至多处发生把若干亩成熟的水稻搬到一亩田里让记者照相，并刊登在各大报纸上加以广泛宣传的史无前例的荒唐事。当时最蛊惑人心的口号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这些话都出自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喝过“洋墨水”的大名鼎鼎的物理学家钱学森居然在1958年6月16日的《中国青年报》上撰文说只要农作物能吸收太阳能量的30%，“稻麦每年的亩产量就不仅仅是现在的两千多斤或三千多斤，而是两千多斤的二十多倍！”他还断言道：“这不是空想。”这一切的直接恶果就是国家征购的粮食数量大大超过农民所能负担的极限，再加上农村大刮“共产风”、搞“一平二调”（平均主义和无偿调用）等，致使农村出现饿死人的可怕状况。而毛泽东本人在1958年9月召开的第十五次最高国务会议上讲了很多精彩纷呈的话（引自《晶牛毛泽东思想网》）：“（粮食产量）今年大概可以差不多增产一倍，即有可能从去年的三千七百亿斤，增到七千几百亿斤。”“粮食，苦战三年，今年可能是七千到八千亿斤，明年翻一番，就可能是一万五千亿斤。后年就要放低步调了。因为粮食还要找出路。”据《中国“左”祸》一书，1958年各地上报的粮食产量超过一万亿斤，实际不到四千亿斤。直到三十年后的1998年，中国粮食产量才超过一万亿斤（主要原因是农村推行了经济体制改革和推广了超级杂交水稻），此后一直在一万亿斤上下小幅波动。

要点五：

知青在当地无亲无故，往往被安排“瞄山”（1）之类得罪人的活路。

山坡上，手臂粗细的松树两、三米远才有一颗。农民说：（19）58年以前，这儿的树子茂密得“钻都钻不进去”（2）。后来都砍光了，运到峨眉山下炼钢（3）去了。从此我才开始了解“大炼钢铁”（4）造成了多么严重的生态破坏。

注：

1、瞄山：即护林。守护山上植被制止盗伐林木、偷砍树枝等。

2、这一带的森林曾经是成都的“能源基地”。直到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后期，通过岷江船运至九眼桥码头的“火把柴”（劈开捆好、长约一尺许的松、青杠等木柴）仍是成都市民做饭烧水的主要燃料。

3、1958年那里成立了“乐山钢铁公司”。十多年后我到现场，还看见残留的十字路口和断垣颓壁。

4、“大炼钢铁”：“大跃进”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当时全国城乡各行各业以至中小学校、街道居民都纷纷大造“土高炉”炼铁炼钢，甚至愚蠢疯狂到没有焦炭就用木柴、没有矿石就把家庭中的铁制品包括铁锅铁铲砸碎扔进“土高炉”中去“炼”所谓的钢铁，其结果当然是什么也没有炼成，却对森林造成毁灭性破坏。“大炼钢铁”的另一个恶果是占用了农村大量劳动力，极大地破坏了农业生产。当时大约动员了九千万人“为钢帅服务”。我下乡那地方的村民告诉我，当年的红苕就烂在地里无人收。

在上文提到的最高国务会议上，毛泽东说：“今年要争取产钢一千一百万吨，比去年翻一番。明年增加两千万，争取三千万吨。……到六二年，可能出八千万到一亿，接近美国（美国因为它经济恐慌，那个时候也许只有一亿吨）。第二个五年计划就要接近或赶上美国。再加两年，七年，搞一亿五千万吨，超过美国，变成天下第一。”实际上中国大陆直到1962年的钢产量也只有六百多万吨，直到改革开放后的1996年才达到一亿吨。

2012-02-20

为之60文集：http://hxzq05.d68.zgsj.net/showcorpus.asp?id=147

华夏知青网不是赢利性的网站，所刊载作品只作网友交流之用
引用时请注明作者和出处，有版权问题请与版主联系
华夏知青网：http://www.hxzq.net/
华夏知青网络工作室

另类再教育概要（二）

要点六：

岷江渡口（虎渡溪）有一颗大榕树。农民说：（19）60年，这颗树下死了好多人，都是些等过河船的，想坐下歇口气，就再也起不来了。从此我才知道“三年大饥荒”（1）农村大量饿死人的事，极为震惊（2）。

不止一个生产队都有名称为“屋基地”的耕地，往往在一条小山沟的尽头。农民说：以前那里是有一家人住的，（19）60年都饿死了。

附近生产队一个农民娶的媳妇又瘦又矮（不到一米四），脸色青白有灰黑斑，据说反应迟钝，干农活也不行。后来知道此人来自邻县一个孤儿院，其父母都在（19）60年前后死了。

注：

1、“三年大饥荒”指1959、1960、1961三年，即官方所称的“三年困难时期”或“三年自然灾害”。在此期间中国人“非正常死亡”（绝大多数是饿死的农民）数字，各说不一。最新的《中国共产党党史》第二卷采用了1991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的数据：“1960年全国总人口比上年减少1000万”。而一些专家和民间学者通过各种调查研究得来的“三年大饥荒”时期中国人“非正常死亡”数字大概在两千万到四千万之间。比较详细的专著当推新华社前高级记者、《炎黄春秋》杂志社副社长杨继绳先生的《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香港出版），他的调研结果认为这个数字大约是三千六百万。2006年第一期《龙门阵》杂志登载了廖伯康先生的文章《我向中央讲实情》，作者以当年亲历者的身份第一次公开了四川省在“三年大饥荒”期间“非正常死亡”人数至少是一千万！廖先生当年是共青团重庆市委书记，改革开放之后先后担任过中共重庆市委书记、四川省政协主席等职。

有学者通过气象资料分析，那三年全国灾情有限（这样大的国家哪年没有旱涝？），即使不算风调雨顺，也肯定不属大灾之年。将灾难归咎于老天爷完全是推脱罪责。惨死于“文革”中的刘少奇曾不得不承认出现饥荒的原因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人祸”应当指的是1958年“大跃进”中的“浮夸风”、“大炼钢铁”、“共产

风”等极其疯狂和愚昧的运动。“非正常死亡”人数最多的省，恰恰也就是“人祸”最凶的省，如四川、河南、安徽等。

尤其令人发指的是，当饥荒已经开始时，很多地方的干部不仅没有去救济灾民，反而到基层去“反瞒产反私分（粮食）”，造成极其严重的后果。且1959年竟然是1952年至1963年间我国净出口粮食最多的一年！

2、我回家探亲曾问过父亲：（19）60年农村饿死人你晓得不？父亲沉默了一下：晓得。我：咋个不给我们说喃？父亲蹙额道：咋个给你们说嘛？

咋个：四川方言。前一个是“为什么”的意思。后一个是“怎么”、“如何”的意思。

要点七：

我们几个知青给一个摔伤的农妇治好了伤口。她特地在小溪中弄了几条小鱼煮熟后相赠。有农民告诉我们：她的东西你们都敢吃？她吃过人的！原来“三年大饥荒”时她的小女儿（婴儿）饿死，她白天埋葬了女儿晚上又挖出来吃了！从此我开始知道“三年大饥荒”中竟发生过如此人间惨剧！

“三年大饥荒”时附近生产队还发生过另一起杀人吃人事件。受害者是一个饿得半死、晕倒在山坡上的老头，杀人吃人的是一个也饿得半死的老太婆。公社干部及公安人员闻讯到来时，后者也已经死了。

参考资料：

“三年大饥荒”期间发生恐怖的吃人惨剧并非只此一处，四川泸州、甘肃临夏、定西、河南商城等地也有“人相食”的记录。思想跨越时代的经济学家顾准先生在1959年7月22日的日记中写道：“除民间大批肿、死而外，商城发生人相食的事二起……一是丈夫杀妻子，一是姑母吃侄女。”曾担任水利部副部长并一度担任毛泽东秘书的李锐先生在《大跃进亲历记》一书中也提到安徽凤阳人吃人的事。香港凤凰卫视有一个曾子墨采访当年在甘肃夹边沟劳改的“右派分子”的专题节目，被采访的幸存者详细讲述了饿极了的活人吃饿死人的尸体的惨剧。1962年夏，刘少奇曾对毛泽东直言：“人相食，你我是要上史书的。”(见《刘源（刘少奇之子），何家栋淡刘少奇与四清运动》，《南方周末》，1995年11月20日)。可见这类事件的极端严重性。

要点八：

农谚道：立夏小满正栽秧。不违农时抢种，事关收成好坏。这是农民最劳累、也是劳动力最紧俏的时候。

栽秧时，一个老贫农（1）直起腰来叹一口气，捶着背说：“唉，是那两年，主人家（2）该端汤圆儿出来吃

了。”从此我开始知道“地主”并不如教科书（3）上写的或“忆苦思甜报告会”（4）上讲的或革命教育影片（5）里演的那样狰狞可怖，逐渐有了最起码的实事求是精神。

我所在的生产大队只有一个地主（记得好象叫徐政文，而当地其他农民大多姓吴或姓邓），四年多时间里我从未见过此人。其他地方常常出现的斗争地主大会更是闻所未闻。一天，田坎上出现一个城市人打扮的中年妇女，旁边还有一个穿戴整洁的小男孩，看上去应当是母子二人。邻居告诉我说，那是徐政文的二女子。解放那年，她和她姐姐都在县中学读书，一起跟解放军走了。现在她丈夫是团长，她姐夫官更大，常常坐飞机到北京开会。身兼革命军官老丈人和地主双重身份，徐某人的日子想来过得还算不错吧。

注：

1、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农村搞“土改”，按拥有土地和家庭财产多寡而给农民“划成份”如下：雇农、贫农、下中农、中农、上中农（富裕中农）、富农、地主。后两者是阶级敌人，在五大阶级敌人“地、富、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中名列前茅，属于“专政”对象。前三者是革命阶级，是依靠对象。而中农、上中农则是团结、教育、改造对象。其依据可追溯到毛泽东早期著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

2、旧时对雇主的称谓，类似当今的“老板”、“业主”。在农村，一般就是指土地所有者即后来定义的地主。

3、如高玉宝先生所写的著名“荒诞派”作品《半夜鸡叫》就曾编入小学教材，蒙骗了不止一代少年儿童。4、农村里的“忆苦思甜报告会”不象城市里那样精彩，因为乡下的农民比较淳朴，政治训练不够，讲出来的往往是自己亲身经历的事，“忆苦思甜”就完全走了调。他们讲起“解放前”就象在干巴巴地背书，内容大多老生常谈；讲起“（19）60年饿死人”却声情并茂。当然，他们很愤怒地谴责“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是罪魁祸首。

5、延安时期的歌剧、后来的同名电影《白毛女》是当之无愧的代表作。2009年第二期《随笔》有文《一个革命话语的产生》，文中追述了歌剧《白毛女》源自河北、山西一带古已有之的民间神怪传说“白毛仙姑”。最初的作者只从传说中发掘出“发动群众破除迷信”的积极意义，而时任延安鲁迅艺术学院院长的周扬却政治嗅觉敏锐，感觉到此事大有文章可做。在他的策划下原作者出局，贺敬之等新人参与修改创新，新作“抓取了它更积极的意义——表现两个不同社会的对照，表现人民的翻身”，这才编出了我们现在耳熟能详的众多人物与故事。如此《白毛女》，方才成为激励革命斗争意志、诠释革命合理性的典范文艺。“文革”前夕，《白毛女》改编为芭蕾舞剧，后成首批“革命样板戏”之一。

参考资料：

在“以阶级斗争为纲”时期，四川大邑县安仁镇有个全国闻名的“地主庄园陈列馆”，还有一个依托于它

的“收租院泥塑群像”，反映出“解放前”农民所受到的残酷剥削与压迫。庄园主人刘文彩青面獠牙、无恶不作，是中国地主阶级的“形象代表”。当年还有个名叫冷月英的“受害幸存者”现身说法，对年轻一代进行“阶级教育”。她讲的“鬼故事”听得中小学生（本人也是其中之一）毛骨悚然。“文革”结束后，刘文彩其人其事的真相渐渐被披露。刘是大地主无疑，早年为胞弟刘文辉在四川争地盘打天下而大肆揽财也无疑。但后来此人却吃斋念佛，还出巨资在安仁镇创办“文彩中学”（即今天的安仁中学），其规模和教学条件在当年全国民办学校中首屈一指。学校建成之日，刘即宣布刘家不得占有学校的产权。当年“阶级教育”的内容大多无中生有，比如冷女士大讲特讲自己所坐过的“水牢”不过是一个装过鸦片烟土的库房，而剩下的也言过其实。反正刘某人早已死去，他的后人也绝无为之辩诬的“狗胆”——哪怕其胞弟刘文辉曾以起义将领的身份担任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林业部部长，也只能说一句“刘文彩的所作所为该我负责”而已。

如今“地主庄园”成了“刘氏庄园”，好象又叫“川西民俗博物馆”，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也是当地旅游开发的热点，也是当地GDP立竿见影的增长点。依托保存完好的大片民国时期的中西式建筑和刘氏“金字招牌”，当地政府正在精心打造“中国博物馆小镇”。那些摩肩接踵的旅游者在安仁镇“星廷剧院”看民俗表演时，可知刘文彩本人字“星廷”？

有刘氏后人陪外地朋友去刘氏庄园参观。买门票时那些朋友半开玩笑地说：这是刘家的后人，进自家祖屋还要买门票？管理人员回了一下神，很人性化地说可以去县里开一个证明，就自由进出。不然我们怎知谁是刘家后人？

要点九：

下乡没几天，我们几个知青正坐在山岗上好奇地打量四周新环境，却迎来一个不那么象农民的当地人。他似乎很想与我们交谈。谈话间不知怎么说到“四清”运动（1），他愤懑道：“……龟儿子工作队把我的猪儿都牵起走了……”。我心中一怔：这肯定是个“四清”下台干部！阶级斗争啊，要警惕！后来知道他曾当过大队会计，是我们房东（生产队副队长）的亲哥。“四清”运动中不知哪里没弄“清”就罢了官。交往一段时间后，我们放松了“警惕”：这家人上上下下都对我们关照，他的儿子更与我们亲近。而他本人肯定是当地最有文化也见过世面的人，群众关系也不错。

生产队有位名“凤香”的有夫之妇，人们一说起她就语焉不详、面露暧昧。后来方知其“作风不好”，“偷人”众多，是“官茅司（2）”。还有一男子吴某，很有点天不怕地不怕的样子，造反精神十足，常为一些小事与人争执，似乎也要与我们这些知青争个高低。后来他偷了生产队的什么东西，也不了了之。令我大出意外的是，这二人竟然都是“四清”运动中加入中共的党员（3）！

注：

1、“四清”运动：1963年至1966年，中共在全国城乡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也是毛泽东在“文革”前发动的最后一次大规模政治运动。毛意中的斗争对象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各级干部，且认为刘少奇在此次运动中执行了一条形左而实右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从此二人矛盾深沉。接下去的“文革”运动中，刘即成为“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最终死于非命。

2、茅司：四川俗语，即厕所。官茅司即公共厕所。

3、在农村各次政治运动中“火线入党”的，不少是“流氓无产者”。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提到的“游民无产者”，与这种人十分相近。他评价道：“这一批人很能勇敢奋斗，但有破坏性。如引导得法，可以变成一种革命力量”。

为之60文集：http://hxzq05.d68.zgsj.net/showcorpus.asp?id=147

华夏知青网不是赢利性的网站，所刊载作品只作网友交流之用
引用时请注明作者和出处，有版权问题请与版主联系
华夏知青网：http://www.hxzq.net/
华夏知青网络工作室

另类再教育概要（三）

要点十：

“文革”是精神禁锢的时代，“八亿人看八个样板戏”是后来对那个时代文化生活的嘲讽式概括，而“八亿人只准用一个大脑思考”则是那个时代的基本特征。这种倒行逆施是与人的本性根本相悖的。在当时的农村，精神生活的贫乏更是令人无法容忍。知青们总是饥不择食地搜寻各种书籍一睹为快。

山高皇帝远，天地如此广阔。知青们在无约束的环境中接触到了很多文学精品（那时叫“封资修”即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文化），受到“多元文化”熏陶，开阔了视野，解放了思想。回过头来读“文革”时期及之前中国大陆的一些“文学作品”，则味同嚼蜡了——如浩然先生的《艳阳天》、《金光大道》之类。

有时为了一本书可以走几十里路；有时为了迅速读完归还一本书可以熬通宵；有时聚会就听某人叙述某一本书的内容；有时还手抄珍品书籍——我就见过一小本手抄《基度山恩仇记》。我对唐宋诗词的记忆，很多都依赖乡下的阅读与背诵。特别是“瞄山”时“荡胸生层云”，气定神闲之下读起那些美言佳句真是过目不忘，现在也还能背个几十首吧。

因为无人能“指导”，只能“自己教育自己”，有时就会随心所欲地得出些意外的结论。如恩格斯所著《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有下面一段话：

“凡在人类历史领域中是现实的，随着时间的推移，都会成为不合理性的，就是说，注定是不合理性的，一开始就包含着不合理性。凡在人们头脑中是合乎理性的，都注定要成为现实的，不管它同现存的、表面的现实多么矛盾。按照黑格尔的思维方法的一切规则，凡是现实的都是合乎理性的这个命题，就变为另一个命题：凡是现存的，都一定要灭亡。

……这种辨证哲学推翻了一切关于最终的绝对真理和与之相应的绝对的人类状态的观念。在它面前，不存在任何最终的东西、绝对的、神圣的东西。它指出所有一切事物的暂时性。”读后就总觉得这些道理也同样适用于“文化大革命”。这个伟大领袖引以为傲的东西也不是“最终的东西、绝对的、神圣的东西”，是“一定要灭亡”的。

农家是几乎找不到书的。即使有，要么是小孩的课本，要么是历书。干部家中会有些上级发下的毛泽东著作单行本和政治宣传材料。城市里人手数册数种的语录本，乡下也少有看见。还有些有趣的小插曲。一个村民借了一本书给我，叮嘱绝不能外传。那本书显然是“旧社会”的东西，甚至有可能是前清遗物，单面刻印折叠本，书名好像是《七子十三孙》，纯属色情读物。后来看到茅盾先生早年文章（记得刊载在民国时期的《小说月报》上），称中国传统文学中极其露骨的性描写是西方文学完全不能望其项背的，很以为然。

参考资料：

“另类再教育”阅读书目：

这是我回忆起的1969年至1976年读过的书。我在乡下务农的时间是1969年1月至1973年9月。但我离开农村时，时代并未改变，我也记不清有的书是在这个时间节点之前还是之后读过的。所以，大致就以官方定义“文革”结束的那个秋天作为读书告一段落的时刻吧。其中的“内部发行”书籍大多是当时为“反修防修”而翻译的一批国外出版的书籍，限一定级别以上的干部阅读。

苏联小说：

柯切托夫：《你到底要什么》（内部发行）、《州委书记》、《茹尔宾一家》沙米亚金：《多雪的冬天》（内部发行）

利帕托夫：《普隆卡托夫经理》（内部发行）

巴巴耶夫斯基：《人世间》（内部发行）

波列伏伊：《真正的人》、《我们是苏维埃人》（短篇小说集）

奥斯特洛夫斯基：《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暴风雨所诞生的》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他们为祖国而战》阿扎耶夫：《远离莫斯科的地方》俄国小说：

刚察洛夫：《奥勃洛莫夫》、《悬崖》莱蒙托夫：《当代英雄》屠格涅夫：《贵族之家》车尔尼雪夫斯基：《怎么办》契诃夫：短篇小说集包括《一个小公务员之死》、《普里希别叶夫中士》、《套中人》、《第六病室》、《带阁楼的房子》等陀思妥耶夫斯基：《穷人》列夫·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尼娜》、《复活》普希金：短篇小说集包括《驿站长》、《村姑小姐》等梅勒什可夫斯基：《诸神复活》（即《雷翁那图·达·芬奇》，民国时期版本）

法国小说：

巴尔扎克：《贝姨》、《邦斯舅舅》莫泊桑：短篇小说集包括《羊脂球》、《项链》等梅里美：《嘉尔曼》左拉：《娜娜》博马舍：《塞尔维亚的理发师》、《费加罗的婚礼》（剧本）

英国小说：

狄更斯：《老古玩店》莎士比亚：《无事生非》（剧本）

柯南道尔：福尔摩斯探案集包括《四角签名》、《血字研究》等笛福：《鲁滨逊漂流记》（民国时期版本）

爱尔兰：

伏尼契：《牛氓》美国小说：

欧·亨利：短篇小说集包括《麦琪的礼物》、《警察与赞美诗》、《红酋长的赎金》等杰克·伦敦：《毒日头》、《雪虎》、《海狼》、《铁蹄》、《马丁·伊登》、短篇小说集包括《一块牛排》、《热爱生命》、《墨西哥人》等马克·吐温：短篇小说集包括《百万英镑》、《败坏了赫德莱堡的人》等辛克莱：《屠场》海明威：《永别了武器》赫尔曼·沃克：《战争风云》匈牙利小说：

米克沙特：《奇婚记》、《圣彼得的伞》捷克小说：

哈谢克：《好兵帅克》中国小说：

柳青：《创业史》姚雪垠：《李自成》（第一卷）

浩然：《金光大道》克非：《春潮急》艾芜：《南行记》罗贯中（明）：《三国演义》冯梦龙（明）：《醒世恒言》非小说类：

国外：

马克思（德国）：《雇佣劳动与资本》恩格斯（德国）：《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反杜林论》普列汉诺夫（俄国）：《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威廉·夏伊勒（美国）：《第三帝国的兴亡——纳粹德国史》（内部发行）

古纳瓦达纳（锡兰）：《赫鲁晓夫主义》（内部发行）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美国）：《斯大林时代》（内部发行）

埃德加·斯诺（美国）：《西行漫记》（内部发行）

泽曼（捷克斯洛伐克）：《布拉格之春》（内部发行）

户川猪佐武（日本）：《党人山脉》（内部发行）、《田中角荣传》（内部发行）

欧文·斯通（美国）：《马背上的水手——杰克·伦敦传》萨拉比雅诺夫（俄国）：《列平（即俄罗斯画家列宾）》达尔文（英国）：《物种起源》国内：

艾思奇：《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鲁迅全集》中部分杂文人民出版社内部发行：《各国概况》峻青：《欧行书简》郭沫若：《李白与杜甫》贺敬之：《放歌集》（诗）

内部发行：《四川文史资料》（某几册）

《绝妙好词笺》（民国时期版本）

《南唐二主词笺》《唐诗一百首》《宋诗一百首》《唐宋词一百首》

结语：

一、1968年前后，整个国家在“文革”动乱中面临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危机，灾难深重，难以为继。我们这批不谙世事的中学生首先作为“红卫兵”被政治运动所利用，此后别无选择：既没有上学读书的机会又不能正常就业，成为城市的沉重负担。于是当政者便把这个包袱甩给了农村。这种政治性强制措施既是对知识分子的歧视，也是对农民的歧视。当时中国农村人多地少的矛盾已非常尖锐（比如我所在生产大队人均耕地面积就只有一亩稍多），加之各种政治运动极大地打击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业生产效率低下，农民的生活十分困苦。说城市青年到乡下去和农民抢饭吃是一点也不过分的。我插队落户的公社是“学大寨先进集体”，也就是全县最贫穷最艰苦的山区公社（条件好的公社学大寨较少吹牛的“先进事迹”）。区区五千人的小社，竟一气要了一百好几十个“知识青年”，堪称大手笔。半年后“小春”结算，才发现粮食未见多收，却多了一百好几十张要吃饭的嘴。公社领导焦头烂额，县领导也觉得问题严重。于是决定将一半知青调到另一尚未接纳知青的公社，才算缓解了矛盾。

从总体来看，农民绝对不欢迎知青来抢他们的饭碗。同样僵化的经济政策同样大小的土地同样落后的耕作条件，哪里会因这帮城市小青年的到来就提高了粮食产量或生产效率呢？知青们的体力劳动多半连自己的口粮都生产不出来。后来的历史发展证明，中国所需要的绝不是城市中学生被迫下乡，而是千百万农民自由进城。正是这些“农民工”的辛勤工作，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同时也提高了自身的生活水平。当今农村劳动力大量外出务工且城市发展（包括交通）又不断占用农村土地而粮食产量仍稳定在高位的事实，更证实了上述论断。

二、离开农村，返回城市，是每一个知青的不懈追求。除个别特例外，知青绝对不愿意象农民那样生活，这应该没有疑问吧。不管一些当事者后来如何有意无意地自我粉饰，那十年中下乡的知青几乎全都返回城市就证明了这

一点。因为农村的贫穷落后和农民的“二等公民”地位，都让知青无法接受。更何况那些有特权家庭背景的“知青”，根本就没有踏入农村一步；即使下了乡也以“参军”、“内招”的名义早早返回城市。此处当然并不是对他们指责，而是想说明最主张“党叫干啥就干啥”因而也就最应该响应下乡号召的“红二代”也用脚对知青运动投了反对票。1970年末，当得知即将在知青中招收工人的消息后知青们的极度兴奋与期待，相信人人都深有体会。此后知青们各显神通为离开农村所做的种种努力，也是人人心知肚明的事。到知青运动末期，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的知青（他们已经是拿工资的国营农场职工了）甚至不惜罢工、绝食、大张旗鼓上京告状（比现在“上访”风光多了）也要离开“第二故乡”。这更是知青运动中无法回避的大事件。

三、当年中国农村的贫穷落后绝对不是知青下乡运动所能改变的。

首先，虽然“头衔”上冠以“知识”二字，实际上只读了几年中学的这帮城市小青年们并不具备农业生产技能和起码的科研能力，他们本该接受进一步的文化科技知识教育或技能培训。然而在当时的农村中，他们却只能从事最原始的农业劳动，并且能力一般都不及土生土长的当地农民。知青中出了不少作家诗人，因为这与学校的专业教育关系不大。难道知青中还会出袁隆平不成？我在乡下也参加过一阵“920农药”（即赤霉素）生产推广，先在县里参加培训，又从多年不招生的成都市工业学校无偿获得试管、烧瓶等“支农物资”，结果什么也没做成，也没听说别人做出了什么。因为这些本应由工业化生产的东西却依靠外行搞运动式的“土法上马”，是注定要失败的。

其次，当年阻碍农村发展的是体制和政策，思想意识还沉浸在“文革”中的知青们怎么可能觉悟到这一点？当然更不可能动其一分一毫。知青能改变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管理体制吗？知青能反对“农业学大寨”运动吗？知青能“长途贩运”搞私营经济吗？知青能搞“联产承包责任制”多少多少年不变吗？1978年，安徽小岗村十八位农民冒着极大的风险，立下生死状，在土地承包责任书上按下了红手印，拉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这也不是知青能做出来的事。

最后，当年所实施的大政方针制约农村发展，其根源在于下述不便公之于众的历史原因：要在落后的农业国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并证明其比资本主义制度更具优越性，只有迅速工业化以增强国力这一条路可走。然而资金从何而来？又只有从农民身上索取这一条路可走。好在农村人口众多，虽然贫穷不堪，却可以集腋成裘。几十年来，中国农民为国家发展付出了沉重代价。据2003年《南风窗》杂志载《中国土地忧思录》一文：建国后为实现工业化原始积累而推行的城乡二元化战略，主要通过粮食价格的“剪刀差”，30年左右时间城市从农村“积累”走至少8千亿元人民币。而最近十多年间，通过“廉价征地”这一把“金铰剪”，城市从农村也就是从农民手里“积累”了2万亿元人民币。一言以蔽之，农村发展首先需要“减负”，包括几十年后才实施的取消农业税的重大举措。当年知青下乡只会增加农村负担，难道还能改变上述资金流向？而今“城乡一体化”，终极目标应该是让农民与城市居民一样平等地享受作为公民所应有的权利。这才是解决农村问题的方向。

作为一个当年知青运动的亲历者，我把记忆深刻的接受“再教育”的经历与见识留在这里。这些个人化的东西或许不具“代表”性，但它也是反映那段历史的真实细节。《战国策》有言：前事之不忘，后事之师。法国学者托克维尔道：当过去不能照亮未来时，人心将在黑暗中徘徊。已年近或年过花甲的当年知青不应该忘记这两句话。

为之60文集：http://hxzq05.d68.zgsj.net/showcorpus.asp?id=147

华夏知青网不是赢利性的网站，所刊载作品只作网友交流之用
引用时请注明作者和出处，有版权问题请与版主联系
华夏知青网：http://www.hxzq.net/
华夏知青网络工作室

见微知著话当年

（1）知青如何进村落户

有一位知青新近上网，在BBS上叙说当年是如何进村的，引发了曾经在不同省份插队落户的知青的共鸣，各自摆出当年的进村情形，不禁相互比较起来，话题聚焦到一点——“插队”的知青在下乡前有没有被具体落实到“落户”的村子。

楼主“峡江映山红”回忆自己1969-3到江西峡江插队时第一次进村的情形——

雨在不停的下着，大队部座落在山脚下一个村庄上，知青们下车后被安排在大队部大会堂内，然后由大队民兵干部分配到各老表家睡觉，我有幸被分到小学老师的寝室，就这样和衣躺下了，因为一路太累的原因，很快就睡着了。谁知一觉醒来天已大亮，突然发觉鞋不见了，只见满地的水位高达一尺，真是哭笑不得。安排在老表家吃完早饭，知青们集中到大会堂等候自愿分配。这天来了好多上海老知青，他们是68年底首批来插队的66.67届，同仁们的到来给我们增添了一时安全感。我们互相交谈开了，问这问哪，比如哪个村离大队部近呀?哪个村有电灯呀?哪个村富裕呀?七嘴八舌。。。

网友“康康”是1969-1到安徽南部的东至县插队的，他说——

看着看着就想起当年的情景来。不过楼主说“集中到大会堂等候自愿分配”就看不懂了，难道离开上海前没有定好“落户”的生产队吗？

插段我那时遇到的趣事：

69年1月18日，闸北区千多人上了“东方红6号轮”沿长江上溯。我的一个邻居正巧和我一条船上，我去东至，她去青阳。我们全都明确有落户生产队的，如何安排的也不清楚，一个生产队的不少还是上了这船才互相认识的。船上我邻居告诉了我这样件事：青阳杜村公社的一个女生，上船后“认识”了与她同一个生产队的男生，却因为那男生带了顶“鲁松帽”而产生反感,很有个性的她不慌不忙的找到跟随知青的学校“工宣队”，提出要调换生产队，理由很简单，不愿与“鲁松帽”在一个队里。工宣队很惊讶，在那“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绝对权威时代，居

然有以此“不上台面”理由来挑衅“领导作主”的女生？于是一本正经的说教开始了，谁知被那女生淡淡的打断：“你说换不换？不换我马上跳下去。”微微翘起的兰花指分明是对着船舷、甲板.....工人阶级到底没有臭老九那套酸腐，立马就答应了换。

网友“井冈山下人”把自己1969-3到江西永丰的经历与上述两人两地的经历进行比较——

康康1969年1月去安徽插队，你们下去前连生产队都已经落实好了。我们是同年3月去江西插队，下去前只落实到生产大队。到大队后“再分配”到生产队。不知是否属于“改进”的措施？

楼主“峡江映山红”作了补充，以说明江西与安徽的做法有所不同——

井冈山下人说的对，插队到江西直分配到大队为止，去生产队是个人自选的。

网友“小沁”是1968-11到江西插队，比楼主略早，地点是在与楼主相邻的新干县，她说——

这一说，我也想起来了：我们当时12人分到一个大队，之后就由自己选去哪个生产队的。（我是在江西新干县）

网友“曾是陇南人”是中专生，曾经在甘肃省天水西和县插队。他回忆说——

我们下乡插队只知道到天水地区，到了天水火车站后住了二天，然后分到西和县，到了县城又住了二天，再分到下面的卢河公社卢河大队，事先都不知道具体在哪插队。

网友“南望”曾经在江西金溪插队。他的经历与前面几位“老俵”不一样——

老三届里，我怕是“赖”到最后一批去插队的了。我们满满一列火车12节车厢的“社会”青年在自己去插队的行李标签布条上都是明明白白的写上XXX大队XXX生产队的，至于哪个县就不用写了，因为全都是一个县的。也就是说咱那上海户口簿还没有被盖上红色的“迁出”章时就已“私定”终身了。

网友“野歌”当年在内蒙古插队，他的回忆是——

我们也是到了县都不知道去哪里插队，一切听安排，结果，办了几天学习班后，是自愿组合，是怎么组合的，怎么会这几位到石嘴子的，至今没有概念。大概是四位中的一位岁数比我们大，火车一路过来，他脑袋里想的比我们多一点，一听是自愿组合，就把我们凑在一起了。当时我们还没有主意或主见，随波而行。16岁，稀里糊涂，连当时的自愿组合都是这些年联谊活动中才知道的。

我（网中人）也加入了同一话题的回忆——

看到小沁朋友的回忆，很有感慨。

小沁朋友与我是同一批同一天到达新干的。即使如此，进村之路也是不一致的。

我在另一个公社（鸡峰公社），分到每个大队的知青都比较集中，差不多是“12人分到一个生产队”的水平。（不是“12人分到一个大队”）

那时候知青离开上海的时候是“班排编制”，但每个人对自己的落脚点都被“蒙在鼓里”，实际上均已被指定到大队。在到达新干县城以后，才宣布各人去什么公社什么大队。在这个时候，个别“脑子活络”的知青立即打听要去的大队及其所属各个村子是什么情况。

尔后在前往目的地的路上，“护送团”与公社、大队的有关“接收大员”讨论如何按知青班分到生产队（自然村）的具体方案。有个别“脑子活络”的知青在此时机提出换班的要求，也获得允许。

这样看来，当时即使是在同一个县里，各个公社的做法也不尽相同。

从八个人叙说的情况来看，涉及内蒙古、甘肃、安徽、江西四个省区，其中江西一省涉及峡江、新干、永丰、金溪四个县，而江西新干的又分属两个公社。

虽然都是寥寥数语，就已经显示出当年那么多人下乡进村的过程是各有千秋的。在以往十数年的传统教育下，估计不仅仅是我一个人，一直以为对知青的安排有统一的做法的。现在在网络上一交流，才恍然大悟，即使是一个县里也是各不相同。

想想这也不奇怪，六十年代末开始的上山下乡是一个史无前例的大规模运动，所以，不可能从一开始就有成熟的模式，也不会有可靠的操作方案，更不会有统一的规定了。

再进一步回头看看历史，五六十年代在小范围内有过试点性质的上山下乡。这样的说法使我又一次想到了借鉴工业技术开发过程的概念与术语。具体而言，早在五六十年代，工业技术开发领域中已经形成了必须执行的规范，其中有一个关键就是，开发新技术必须经过逐级放大的过程，首先要在试验室进行小试（小规模试验），成功之后，必须形成和提交“小试报告”，总结成功的经验，更要提出改进的措施，并为进一步中试（中间试验）提出具有可操作性的方案。诸如此类的小试、中试等步骤，每一步都有相应的报告和严格审查。只有一步一步获得成功，才有可能最终建设工业生产装置。某一步通不过，就不能跃进到下一步。这是国外数十上百年经验的积累，五六十年代传入我国。

然而五十年代以来国内流行把科学技术与社会科学截然割裂的做法，加上把活生生的人视为“驯服工具”“螺丝钉”的“革命化”发展思路，把涉及千百万人身家性命的大迁徙看成是一件只要巨手一挥就能万马奔腾的简单事

情。

现在看到的历史资料中，六十年代初确实有中央文件要求组织中学毕业生上山下乡，且明确以插队落户为主要形式，但是，高层领导中津津乐道的是只要中央发出号召，广大群众就会热烈响应，而对五六十年代试点插队落户，并没有全面总结，更没有“逐级放大”的概念，当然就没有详尽的实施细则，而只是停留在原则性号召上。到了文革那个极端化的年代，更是“一言九鼎”，由伟人发出寥寥数语的12-21最新指示之后，“掀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高潮。这个运动被宣传为具有‘反修防修’、‘缩小三大差别’的重大政治意义。各地在很短的时间里，不顾具体条件把大批知识青年下放到农村、生产建设兵团或农场。”（党史二卷语）如果说，兵团农场实行军事化管理，尚有可能对知青如何“落户”在一定范围内作出相对统一的规定，那么，在知青插队的广袤农村就难以比拟了。上述BBS的交流显现了这样的历史现象。这也提示我们，不要以偏概全，把自己的经历与感受推而广之，认为就是普遍现象，轻易地作出什么结论。厘清历史真相的知青研究任重道远。

如今纵然有一些人不屑于这样的回顾分析，而致力于从动机角度来解释那场政治运动的伟大意义，但终究无法避开具体过程与实际效果。无论当年的知青，还是以后的研究者，回顾和面对知青走进“第二故乡”时各地出现的那些毫无章法的现象，不难对那种大规模强制性的做法作出应有的评价。

（2）知青如何鸠占鹊巢说

在一个知青论坛上，看到这样的帖子，楼主“银铧”回忆当年——

农历十二月初一，这天恰好是腊月的第一天，就在这天我出发去安徽插队。一声长笛伴着一片哭声，凄厉的黄浦江风无情地刮擦着同学们眼泪汪汪的面颊。一艘满载着1800名上海学生的“东六”江轮，缓缓地离开上海日晖港驶向皖南池州。

几天以后，我和两位同学被安顿到深山冷坳，汪姓地主家的土屋里。听说为腾间屋来安置知青，队里头天刚把他们赶走。这是一间颓垣断壁的破屋，土墙四壁千孔百疮，上截塌墙上稀朗地遮拦着巴茅草垛。

屋子里空空落落的，左边有道竹条篱笆墙，分隔出灶台前后，墙角里竖堆着几捆地主家扔下的松毛柴禾。右边也有一道席篱隔墙，席墙把堂屋和房间一分两半。北风肆虐地从土墙洞里钻了进来，发出呼呼响声在篱笆隙中来回穿梭，又打着旋在屋子里呼啸而过。……

网友“顽石”跟帖——

大部分插队落户的知青确实生活得很苦，大家的记忆也都差不多。只是看了银铧的日记，心里竟然产生了一种异样的感觉：我怎么觉得那汪姓地主一家比那杨白劳还冤呢？那么破烂的屋子都住不安稳。寒冬腊月平白无故就被

人赶了出来？其实自己在农村时也曾经见过类似的场景，那时觉得理所当然，对待“阶级敌人”就是要像严冬一样冷酷无情嘛！可几十年后再看到这样的记录，突然有了一种很震惊的感觉。这是不是就是所谓的人权意识有所苏醒呢？这种变化让我自己都吓了一跳。

楼主补充道——

顽石：你的目光和思维很敏锐，你竟然把我看似一笔带过的随意文字，给一把揪了出来。我是有意将内心的愤愤不平隐藏在笔触中的；几十年来，我一直无法忘记汪姓子女那种凄凉的眼神。

为了安置知青，地主一家老小被迫扫地出门，他们被赶到别家的天井檐下，寒冬腊月，北风呼啸，就连破屋也不给他们安身，天理何在？他的两个光棍儿子，天天上破屋来呆坐，坐到半夜都不肯走。现在我明白他们当时的心情了。

再看我们的大队书记，他问：你们学生子里，哪几个成分高的？他又问：资本家有吗？放到我家里加强再教育。如果他真安好心，为何不把地主安排到他家呢？却独独寻找资本家成份的知青？

那年代哪有什么人权可言？！天高皇帝远，但即使皇帝咫尺天涯，他也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

那一年大雪封山，我们却走进了雪山，要说我们可怜，其实他们比知青更可怜。毛主席派来的学生仔，哪敢反抗？他的两个儿子家谕和家仪，每晚到我们这儿来，坐到深夜也不肯走，看起来好像十分友好，其实是他们内心愤恨的宣泄，要是放到现在，说不定我们性命难保。那时地富反坏右被剥夺了起码的尊严，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可没人有杀人放火复仇的行迹。

几十年过去了，我回到那里，很想了解他们当年的状况，很想对他们说声对不起。我去找家谕，家谕死活不认识，避开了我；我又去找家仪，家仪死活不说话，呆如木鸡地看着我。我只是个知青，一辈子没伤害过人，可那年，我却伤天害理犯下了不可饶恕之罪过。当年知青的到来，给他们带来灾害，在他们心里划上了一道永世不愈的伤痕，他们恨知青，至今还恨着……。

网友“顽石”又有下列感言——“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是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历史使命的一个重要原理，这一思想构成《共产党宣言》基本原理的一部分。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1888年英文版序言中指出：“现在已经达到这样一个阶段，即被剥削被压迫的阶级（无产阶级），如果不同时使整个社会一劳永逸地摆脱任何剥削、压迫以及阶级划分和阶级斗争，就不能使自己从进行剥削和统治的那个阶级（资产阶

级）的控制下解放出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37页）对比这一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原理，原来实行的坚持阶级斗争，以新的阶级压迫代替旧的阶级压迫的做法就很耐人寻味了。那场革命只能说是一般意义的改朝换代，而不是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说严重点，那只是一场打着“无产阶级革命”的旗号所进行的一般意义的改朝换代。

网友“闲云野鹤”如是说——

我们常常会忿忿不平，因为我们觉得没有得到客观公正地对待。我不忍否定我们的热血青春，我们单纯、充满革命激情的青春。为了党和毛主席，为了祖国和人民，我们刀山敢上火海敢闯，不怕任何艰难险阻。可是我们单纯和激情却被别人利用，成为文化大革命的急先锋，只要说是“四旧”，再珍贵的东西我们敢砸。只要说是“反革命”，不管是谁我们会打，往死里打，甚至于自己的生身父母。别说我没有，是轮不上你。

我们不懂什么法律，我们只有“最高指示”，我们不知什么是人权，我们只知道有阶级兄弟和阶级敌人，对敌人就要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当时的我们真的很可悲，当然那也不是我们的错，是时代的悲剧，谁也不能幸免。我们的思想犹如流水线的冲压件整齐划一，无不深深地打着那时代的烙印。站在被批斗的老师，扫地出门地“地主”的角度。我们真的不怎么光彩，我们让他们胆战心惊惶惶不可终日。我们心安理得地住在“地主”的茅屋里，抱怨着漫天的风雪给我们带来的种种不便。

这就是我的反思，这样的反思并不轻松，很疼很不情愿。可是惟有这样才能客观公正，才能成熟。

看到这里，我感慨万千，百感交集，不禁回想起当年我们到江西的云庄插队落户，知青住的房子也是把一家富农全家老小赶到堆放杂物的柴间而腾空的房子！我当时就觉得很难跨进那个门槛。因为我自己在上海的时候就是全家被扫地出门的——文革初期所谓“打击阶级敌人”“实行群众专政”而采取的“革命行动”。万万没有想到，到农村“插队落户干革命”来了一个“颠倒”——被赶出家门的我竟然又把人家赶出家门！这是怎么一回事啊。所以，在云庄的那些年，我尽可能避免与被扫地出门的那一家人“狭路相逢”，我不愿意与他们正面相视。在知青“喧宾夺主”、“鸠占鹊巢”了五年多以后，知青房建成了，被占用的富农房子得以“物归原主”。我再也没有回那里去，也不愿意经过那里，仍然怯于见到曾经有家不能归的那一家人。三十多年后，2005年，我重返云庄，由于时间太仓促，只是远远地看到那栋富农屋早已翻造一新，抢拍了一张照片，但来不及寻访那家主人。

前不久，在网上巧遇云庄的一位“80后”，在QQ聊天中得知他恰巧是那家主人的侄孙！他说，他的祖辈父辈都不太愿意谈起那些过去的事情，正因为这样，那位“80后”对那段历史是既陌生又好奇——虽然对祖辈父辈的遭遇略有耳闻，但是对地主、富农、地富子女这类名称不甚了了，到底是什么意思啊？对当年把地富全家扫地出门之类的做法觉得无法理解，不明白究竟为什么要那么做？……

在网聊中得知，那位曾经被扫地出门的主人于前两年刚刚离世。我再一次对那些年知青“鸠占鹊巢”给他祖辈父辈带来的痛苦深表不安。这位“80后”连连表示可以理解，并且认为这也不是知青的错。我不禁热泪盈眶，无言以对……。

凑巧的是，看到论坛上网友对类似往事的议论，感同身受，不再赘述。网络上不同人物从不同角度展开的对话交流很有意义。回忆那些日子，反思那段历史，的确会有不少自己感觉吃惊的想法，甚至需要否定自我。但这是正常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人类就是在自我否定中发展起来的。如今确实有一种思维方式——执着于以往“良好动机”，而无意于把它与实际结果联系起来，甚至屡屡质问：原来是怎么说、怎么做的，为什么现在怎么就变了呢？此等思维方式，沉迷于逝去的辉煌，拘泥于曾经的教条，而痴迷于走老路以解决新问题，看上去似乎简单易行，实际上有可能是重蹈覆辙的危险先兆。

2011-07-18

网中人文集：http://hxzq05.d68.zgsj.net/showcorpus.asp?id=162

华夏知青网不是赢利性的网站，所刊载作品只作网友交流之用
引用时请注明作者和出处，有版权问题请与版主联系
华夏知青网：http://www.hxzq.net/
华夏知青网络工作室

知青杂感

（1）

六十年代末，我们曾走上街头，慷慨激昂地宣传"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殊不知那正是为自己唱的挽歌。随之竟然身体力行，只不过有主动与被动之分。

七十年代初，感到有些不对劲儿：我怎么落到了这步田地？难道真的要在农村呆上一辈子吗？一些先知先觉开始蠢蠢欲动，力图改变命运。八十年代初，反思文革历程，加上几个振聋发聩的事件，终于明白：所谓"上山下乡"原来是一场大骗局，大批知青纷纷逃离。九十年代，大部分回城知青挣扎在城市的最底层，抚老养小，背上了重重的包袱。二十一世纪初，步入老龄，万念俱灰，唯时时不忘教育儿孙--万不可相信国家。如今，大家纷纷回忆当年知青生活，成自慰情结。殊不知这正是一个人走向衰亡的征兆，不过是嗜痂成癖。

（2）

中国的等级制度比比皆是，连下乡插队也不能幸免：一兵团，二内蒙，三山西，四陕北；按出身分批放逐。当年的军训团说，再不走，比这还差。这使我想起了皇权下的充军发配。

（3）

知青们读得最熟的就是《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因为出身要对号入座，马虎不得，只恨分得还不够细。他们总在琢磨："城市贫民"与"贫下中农"有什么相同之处，"小业主"和"资本家"有什么区别。填出身时煞费苦心：宁愿填"商人"也不填"资本家"，不得不填"资本家"的，也要填为"民族资本家"，因为伟大领袖曾说过民族资本家是团结对象，究其实，在当时也就是九十九步与一百步之别。估计如今还要填出身的话，情况恰恰相反。真不明白"出身"在当时为何那样重要？"资本家"的概念和划分标准又是什么？如果当初真有那么多资本家的话，中国还用得着改革开放吗？

（4）

那个年代"户口"很可怕，"粮食关系"更可怕。它使所有知青都明白了一个道理：什么事最大？吃饭的事最大。

（5）

当年的知识青年安置办公室是文革带给各级官员们的一个良好机遇。他们吃知青、喝知青、玩知青，堪称新中国最早的腐败机构！搁今天，不知要枪毙多少人呢。

（6）

知青返城后成了"多余的人"。据说一个烧锅炉的位置就排了五十多人等待录用。本以为返城就能改变命运了，回来后才知远不是那么回事。

（7）

1977年恢复高考，裙带风，拉关系，走后门，弄虚作假……随之产生。神圣的教育事业从一开始恢复便被污染，真不明白，为什么中国的每件好事都伴随着一批蠹虫产生。

（8）

文革闹剧之后，"好汉"和"混蛋"们又处在了同一起跑线上，只不过各自又背上了新的思想包袱。终于，有些"好汉"变成了"混蛋"，有些"混蛋"也成了"好汉"。大家方才明白：原来世事是不断变幻的，所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是也。况且还用不了三十年。

（9）

唯一感谢下乡插队的，是造就了一副好身体。如今提倡的低油、低脂、绿色、无污染、吃粗粮、多运动等，我们早在四十多年前就践行了。

（10）

知青与火车有着不解之缘，从革命串联，到插队下乡，再到探亲、回城。至今还没听说有哪个知青返城探亲坐飞机的。所以其间便生出不少"火车的故事"。记得当时超载串联师生的火车停在安亭站三十多小时，进不了上海。如今想来，从那里走路进上海也用不了几个小时。当时的革命师生确实傻的可以。

（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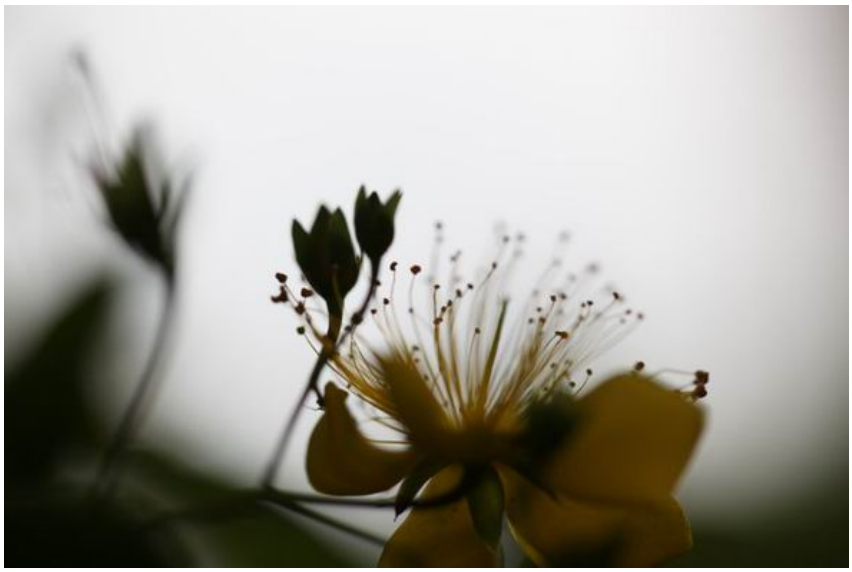
文革留下的唯一财富，就是红宝书、像章、小报、邮票等在旧货地摊上不断升值。

（12）

单纯的思想往往能产生优秀的音乐作品。当我们唱起四五十年前那些好听的歌曲时，我们会感谢那个年代。能经得起时间考验的歌曲，如今还有吗？

咣啷文集：http://hxzq05.d68.zgsj.net/showcorpus.asp?id=186

华夏知青网不是赢利性的网站，所刊载作品只作网友交流之用
引用时请注明作者和出处，有版权问题请与版主联系
华夏知青网：http://www.hxzq.net/
华夏知青网络工作室



我们现在怎样研究知青

在网上看到“50团知青论坛”有这样的帖子——

http://bbs.50tzq.net/showtopic.aspx?topicid=59990&forumpage=1&onlyauthor=1&posterid=1831#

最新出版的中共党史对文革中知青上山下乡的论述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著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 - 1978）于2011年1月由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分上下两册。

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 - 1978）下册的第三编（“文化大革命”的内乱和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覆灭1966年5月- 1976年10月）的第二十二章（“斗、批、改”运动与70年代初的国民经济）的第818 -819页共三小节对文化大革命中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作了论述。

在上册前部分收集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和重大历史事件及人物的照片共46幅，其中有一幅是1968年北京青年告别亲友赴陕北农村插队落户的照片。

在“和讯博客”上有网友把上述照片中的文字整理成文，便于阅读。引用于下：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由于大学不招生，工厂基本上不招工，商业和服务行业处于停滞状态，城市初、高中毕业生既不能升学，也无法分配工作。仅1968年,积压在校的1966、1967、1968届初中和高中毕业生达400多万人。如此众多的毕业生的分配成为刻不容缓的严重社会问题。1968年12月，毛泽东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号召，全国立即掀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高潮。这个运动被宣传为具有“反修防修”、“缩小三大差别”的重大政治意义。各地在很短的时间里，不顾具体条件把大批知识青年下放到农村、生产建设兵团或农场。

知识青年到农村等地后，向农民学习各种生产知识,参加各种艰苦的农业劳动,传播文化知识，担任生产队干部以及小学教员、“赤脚医生”一类的初级技术工作。他们希望在广阔的天地里大有作为。但由于生产劳动过重、分配收入低、文化生活贫乏、缺乏组织管理而遇到一系列困难。1970年大学、工厂开始招生、招工后，不少家长利用各种形式“走后门”使子女回城，某些主持其事的干部则依仗权力进行勒索。后来毛泽东了解到“全国此类事甚

多”，并表示“容当统筹解决”。1973年6月至8月召开的全国知青上山下乡工作会议，交流、总结了几年来的情况，对知识青年下乡、管理、返城等政策做出若干调整。

上千万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和边疆，经受了锻炼，接触了生产实践，增长了才干，为开发、振兴祖国的不发达地区作出了贡献。后来，他们中间也出现了一批国家建设人才。但是，在青春年华失去接受学校教育的机会，造成人才生成的断层，给国家的现代化建设带来了长远的危害。在此期间，国家和企事业单位为安置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所支出的经费达300多亿元,千百万知识青年的家长和部分地区的农民也因此加重了负担。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得不到妥善安排，引发了一些社会问题。

这七百多字的三段话，没有对上山下乡给出“一锤定音”，而是吸收、容纳了正反两方面的评价。每段都包含了否定的内容。第一段里有两个重要的贬义词，一是“被宣传”，二是“不顾具体条件”。后两段里都有“但书”，在“但”之后的内容明显超过“但”之前的内容。也许，这样的表述大体上反映了大多数人能够接受的“公约数”。

事实上，对历史的关注与研究从来不会满足于“公约数”。就在看到上述权威说法后不久，我在网上看到三月廿六日“上海市知识青年历史文化研究会成立大会”及“知青历史文化研的现状与展望座谈会”的视频。来自浙江的一位学者蓝蔚青有这样的一段发言。

摘自http://zhiqingwang.shzq.org/studyDes.aspx?id=3690。

知青历史是我们国家历史尤其是文革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现象，不能一言以概之，是值得我们深入研究的，否则很难得出科学的结论。当然研究的难度也比较大，我们浙江有一个学者写了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四卷本，一直到他死，写文革的第三卷还是没法出版。我也帮他做了很多努力，包括与中宣部沟通，但是谁也不签这个字，这本书就出不来。好在现在中央党史的二卷已经出来了，就可以以这个为依据来审稿，我们浙江党史的二卷今年也马上能出来了。这二卷中央党史以科学的态度来对待历史，有些话比较敏感，宁愿不讲不提，也不讲假话。这样研究这段历史就有一个很好的依据，有一个明确的指导思想，搞知青历史文化研究就具备了条件，到了一个很好的时候。当然也确实需要把握好政治导向，要按照中央定的党史基调来进行研究，有些问题在近期内还是宜粗不宜细。但是我们首先要把史料积累起来，现在有些问题还要暂时回避一下，使将来研究有材料，而且这一代人也到了抢救史料的时候了，我们的同龄人我们的同事、战友已经有些人去世了，有些东西再不抢救，将来要找就找不到了，所以现在做这个工作还是很有价值的。

这位学者先是婉转地批评了把知青研究定位于“知青精神”的观点，进而从自己的经历引出了现今研究知青历史的方法，一方面宜粗不宜细，另一方面为将来积累史料。

会上研究会介绍的一些具体思路和做法，已经明显超越了“煽情”或“诉苦”的层次。在多元化包容的大环境下，“舆论一律”已经渐行渐远，上述见仁见智是很值得深思的。

2011-04-15

相关图片请移步作者博客：http://wangzongren1952.blog.163.com/blog/static/995959012011315114530372/

为什么会认为上山下乡没有被否定

（一）追根寻源

许久以来，一直在我心头疑惑不解的是，某些知青强烈反感对上山下乡的否定，他们除了振振有词的说法（典型的说法之一是：“过分的强调运动的政治性，实质就是否定知青，就是否定我们自己的历史和贡献，这是很愚蠢的”）之外，还有没有别的原因呢？近日终于恍然大悟，原来他们找到了过硬的支撑依据——

1981年10月，国务院知识青年领导小组办公室起草了一份《二十五年来知青工作的回顾与总结》，对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起因、发展、失误、教训等若干重大问题，提出了基本看法:第一，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50年代根据我国人口多、底子薄、就业难的国情提出来的，是我们党解决就业问题的一次大试验。它不是“文化大革命”的产物。第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本来是一个就业问题，但是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中，当成政治运动去搞，指导思想偏了，工作上有严重失误，造成劳民伤财，人民不满，也损坏了上山下乡的声誉。年底，随着上山下乡问题的有效解决，国务院知青办的职责已经消失，为了加强城镇劳动就业的统筹管理，国务院知青办并入国家劳动总局，各省市自治区也仿照办理。至此，历时20多年的城镇知青上山下乡在无声无息中画上了句号。以后，各地政府本着实事求是、负责到底的精神，较圆满地解决了知青子女上学、已婚知青的安排、插队知青的工龄计算等其他遗留问题。

对于某些知青来说，其中最重要的一句话就是“上山下乡不是文革产物”，于是就有了不能否定上山下乡的说法。那么，这种说法究竟源于何处？语焉不详，出典不明，更没有见到文件全文。在网上几经查找，上述文字一字不差地出自《党史纵览》2004年12期《邓小平终结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一文，其末段正是上述文字。在凤凰网上可以读到该文的全文，http://news.ifeng.com/history/special/zhiqing/200901/0121_5419_979942.shtml，长达9000余字，作者是罗军生。其实，纵观该文，作者恰恰是对上山下乡持否定意见的。

（二）“定性”之说

在网上又查到，http://www.ndcnc.gov.cn/datalib/qikan/2005/2005_07/qikan.2005-06-24.6133128278，《数百万知青大返城始末》（作者：林蓉、章志红。来源：雨花·月刊·ISSN 1005-9059·—2004-7，第469期，P27-29）一文，3000多字，全文这样结尾——

国务院知青办定性知青运动1981年10月，国务院知识青年领导小组办公室起草了一份《二十五年来知青工作的回顾与总结》，对这场运动的起因、发展、失误、教训等若干重大问题，提出了基本看法：第一，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50年代，根据我国人口多、底子薄、就业难的国情提出来的，是我们党解决就业问题的一次大试验，它不是文化大革命的产物。第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本来是一个就业问题，但是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中，当成政治运动去搞，指导思想偏了，工作上有严重失误，造成劳民伤财，人民不满，也损坏了上山下乡的声誉。

就《回顾与总结》那个文件的内容而言，与前述说法无异，但多了一个小标题（我加了下划线）。该文出现于2004-7。

（三）“高层传阅”

在网上继续搜索，有进一步的收获，在http://blog.sina.com.cn/s/blog_508c21130100g0xw.html《邯郸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大事记（三）》中有这样的“备忘录之一”，全文如下——

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作出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彻底否定文革的同时，该决议没有对建国以来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给予总结和评价。

1981年10月，国务院知青领导小组办公室起草了一份《二十五年来知青工作的回顾与总结》。对这场运动的起因、发展、失误、教训等若干重大问题提出了基本看法：

1、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是五十年代，根据我国人口多、底子薄、就业难的国情提出来的，是我们党解决就业问题的一次大实验。它不是“文化大革命”的产物。

2、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本来是一个就业问题，但是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中，当成政治运动去搞，指导思想偏了，工作上有严重失误，造成劳民伤财，人民不满，也损坏了上山下乡的声誉。

由于国内有关高层领导、地方政府、基层知青机构，历史、经济、政治、人口等专家学者和知青本人及家长等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不同认识，因此该“基本看法”没有正式行文，只作为全国知青管理部门的一个看法，在内部高层传阅。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最后一段（我加了下划线）。2009-11出现在新浪博客的《邯郸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大事记（三）》，可以继续追踪到它的全文，得知其全名为《邯郸知青纪事——邯郸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大事记》，分为（一）运动初澜（1955—1965）、（二）十年狂潮（1966—1976）、（三）最后的尾声（1977—1980）。而在网络搜索得知，据http://press.idoican.com.cn/detail/articles/2009061521216/ 邯郸晚报2009-06-15报道，“邯郸知青苑宝钢和唐健全耗时两年多，编成《邯郸知青纪事》。”如果此事确凿，那么上述该大事记“备忘录之一”中提出的《回顾与总结》仅限于“内部高层传阅”一说应该是有依据的。当然，从1981-10该文件完成起草，到2004年出现在媒体上，经过了漫长的二十余年，当初再怎么限于“内部高层传阅”，此时也已经流散到民间、社会、网络了，可是不见全文。

附注：

查阅十一届六中全会在1981-6-27通过的决议，的确没有提到上山下乡，只是提到过一次知识青年。

（２３）……正是由于全党和广大工人、农民、解放军指战员、知识分子、知识青年和干部的共同斗争，使“文化大革命”的破坏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限制。……

（四）又见“增容”在网上继续搜索浏览，又发现《回顾与总结》的内容增加了！

http://www.zgbwg.com/comment_detail.php?commentid=211981年10月国务院知识青年领导小组办公室起草了一份《二十五年来知青工作的回顾与总结》，在这份文件中指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早在50年代，根据我国人口多、底子薄、就业难的国情提出来的，是我们党解决就业问题的一次大试验。它不是“文化大革命”的产物；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本来是一个就业问题，但是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中，当成政治运动去搞，指导思想偏了，工作上有严重失误，造成劳民伤财，人民不满，也损坏了上山下乡的声誉；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不能作为解决城镇知识青年就业的主要途径，但是这条渠道也不宜堵死。至于今后城镇青年去农村和边疆的具体形式与办法，应该根据历史的经验和形势的发展，把它搞活，讲究实效。

显而易见，对《回顾与总结》内容的介绍有所增加，我用下划线标出。这样的说法于2009-5出现在（昆明）“知青博物馆”网站。

至此可以发现，《回顾与总结》至少是从2004年开始流传、到2009年已经五年有余，因其全文始终没有公布，所以对它内容的引用长短不一，理解上更难免见仁见智。但是这种众说纷纭的现象倒是佐证了《回顾与总结》一文最初只在“内部高层传阅”的说法。

（五）意外收获

在我收集查询上述信息即将告一段落、提笔梳理之际，竟然又在无意之中看到了一个与《回顾与总结》极有可能相关的信息。我看到网上不少文章引用来自《党史博览》2004年第二期上许人俊的一篇文章《20世纪70年代末的知青返城浪潮》，在“党史博览”的网页上查实确有此人此文。在“中华网社区”上有人贴出了这篇长达13000余字的文章。http://club.china.com/data/thread/5688138/2711/80/61/3_1.html通读该文，可以了解70年代末在云南、新疆、黑龙江等地发生的知青回城潮，其中不乏涉及高层领导的言论与行动。我忽然发现，该文在结束时说到，1980年年中中央书记处决定从1980年暑假起应届毕业生不再上山下乡。紧接着写道——

不久，国务院知青领导小组遵照中央指示，就如何正确看待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作了认真总结和探讨，实事求是指出：

一、知青上山下乡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发生、发展起来的，它是时代的产物，也是复杂的社会问题。它是五十年代，根据我国底子薄、就业难的国情提出来的政策措施，也是我党解决青年就业问题的重大试验，不能把它视为“文革”的产物。

二、知青上山下乡本来是就业问题，而“文革”期间却把它当作政治运动去搞，指导思想偏了，工作严重失误，造成劳民伤财，群众不满，也损害了上山下乡的声誉。

三、广大知青在建设农村、建设边疆的事业中所作出的贡献和受到的锻炼，应充分给予肯定，对他们那种志在四方，勇于承担国家困难，艰苦创业的精神，应继续给予鼓励和宣传。

四、知青上山下乡不能作为解决城镇知青就业的主要途径，但渠道也不宜堵死。今后，城镇青年去农村和边疆的具体形式和办法，应根据历史经验和形势的发展，把它搞活，讲求实效。

这里虽然没有出现《回顾与总结》等字眼，但是“国务院知青领导小组”、“总结”等用语以及“一二三”等等，已经不陌生了！从时间上来说，它是在1980年年中以后不久，从文字语句上可以推断，这四条是1981-10《回顾与总结》的内容！只不过又多了一条而已！除了“三”是刚刚看到的以外，“一”、“二”、“四”都已经见过了，而且文字上几乎完全一致。

所以，这篇2004-2发表的长文很可能是最早透露《回顾与总结》一文内容的。

（六）一点想法

仔细品味那段文字，无论两条还是三条甚或四条，确实有点暧昧，怎么解释都可以，也许正因为如此，成为一些知青反对否定上山下乡的重要依据。

其实，从政府管理社会的角度而言，《回顾与总结》已经把上山下乡的做法予以否定了——作为五十年代解决就业问题的一种“试验”，并没有取得预想的效果，所以有“上山下乡不能作为解决城镇知青就业的主要途径”的说法；文革期间把上山下乡“升格”为大规模的强制性政治运动，这种做法显然已经遭到唾弃与否定；而对这条“渠道也不宜堵死”又“应根据历史经验和形势的发展，把它搞活，讲求实效”的实际结果，正是不会采用文革前的办法，更不会采用文革时期的办法来解决就业问题，“上山下乡”这条渠道最终只会成为一个徒有虚名的空架子。上述早在1981年形成的那些观念，至今已经三十年了，三十年来的事实已经证明，在解决就业问题上政府并没有走回头路。“上山下乡”的“理论”与实践则越来越显现出它的空想谬误而不可取。

在上山下乡寿终正寝三十年的时候，新的就业问题又成为关注的热点。如今的“大学生当村官”与当年的“中学生当农民”，相同之处是解决就业，但其思路与做法已经大相径庭，与六七十年代大规模强制性的政治运动不可同日而语，为什么偏偏要把二者关联起来？难道还要重蹈覆辙把解决就业困难再一次演变成一场声势浩大的政治运动？硬要套上“新知青”“新上山下乡”的桂冠，有什么意义呢？倒是有可能把拨乱反正已经搞清楚的事情又搞浑了，增加出现折腾、产生反复的可能性与危险性。

至于一些知青从自己的感受出发，希冀肯定自己的青春、进而要求肯定上山下乡，则是另一回事了。当然也不乏有文革的遗老遗少借此话题为文革为极左歌功颂德、摇旗呐喊，这是值得警惕的。

2011-01-15

网中人文集：http://www.hxzq.net/showcorpus.asp?id=162

华夏知青网不是赢利性的网站，所刊载作品只作网友交流之用
引用时请注明作者和出处，有版权问题请与版主联系
华夏知青网：http://www.hxzq.net/
华夏知青网络工作室

城里的就业机会哪里去了

有时候你不想纠缠往事，可是，往事偏偏要纠缠你。

那次在一家名叫怀旧的餐馆里，满桌子都是曾经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他们商议着搞个活动，纪念上山下乡四十周年。当然，按照与世界接轨的说法，那些知识青年，不过是失学失业青年，中学结束以后，没有大学可读，没有工作可做，被国家大手一挥，统统到偏僻的农村去了。

空着的酒瓶子，在墙边站立一排，像一只只耳朵，听他们说起当年在农村的痛苦经历。他们渐渐分成了对立的两派，对上山下乡的否定派和肯定派。有位在私人企业当老板的，说那是个万恶的年代，很多事情都不可理喻，把城市里的学生驱赶到农村，就是其中的一件。说完这句话，他的面孔有些扭曲，一口气喝干了面前的酒杯。接着有位在国有企业当厂长的，反驳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件好事，磨练了那一代人的意志，增长了那一代人的才干，现在各市各省以至国家一级的领导，里面都有从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成长起来的。反驳之后，他也有些激动，点上一支烟，一口气就吸去了半截儿。

其实什么时代什么国度，人的看法都不能完全一致。但是在我浏览网页时，还是觉得惊讶，当代的中国大众，几乎对于所有重要的历史事件，如何看待，如何评价，都有完全对立的冲突，而且各自形成了浩大的声势。比如失学失业青年迁往农村这件事，前面私企老板和国企厂长的观点，网络上早已经争论得沸沸扬扬，铺天盖地。

我面向那位国企厂长，宽容地笑了笑，没有指出他观点里的逻辑错误。从文化大革命开始，城里的有将近十年间毕业的中学生，全部失学失业，除了少数的人参军，一概迁往农村。从那前后十年的年龄段中间，浩浩荡荡的几千万人里面，必然出现后来的各种社会精英，这与他们是否在农村磨练意志增长才干，没有充分和必要的条件关系。就像有人把一到十岁的孩子统统砍掉一只手和一只脚，将来也还会有独手独脚的人担任各级领导干部，我们如果说当初不砍掉手和脚，他们肯定不会担任重要职务，说出来就会觉得逻辑上的荒谬，还不是一般的荒谬。为什么一涉及重要的历史事件，荒谬的东西就不觉得荒谬了呢？这很让人怀疑，难道有什么更荒谬的东西在控制着我们？

怀旧餐馆的墙上有一个电视机，正在播放一部黑白电影，这让我想起一部反映知识青年农村生活的老电影，戏曲艺术片《朝阳沟》。我大致记得其中的内容，一位高中毕业生到未婚夫的家乡朝阳沟落户以后，思想上发生动

摇。但是在党的基层干部和乡亲们的帮助下，她终于认识到农村也是知识青年贡献力量的广阔天地，终于在农村扎下根来。

那部在1963年拍摄的电影，在漫长的片名字幕后，一位姑娘出现在山清水秀的风景之中。她看着一份国家级的报纸，从第四版看回到第一版，上面的革命宣传让她露出了笑容。接下来她用咿咿呀呀、轧面条一样挤出来的细长音调，唱了一段地方戏曲："祖国的大建设一日千里，年轻人多理想展翅高飞。农村是我们的广阔天地，千条路我不走选定山区。毕业后升大学我没争取，剧团里来通知没把信回。要做个新型的知识农民，为建设新农村我百倍努力。"

电影与电视剧不完全等于生活，但是可以完全背叛生活，这在那个年月可不是稀罕事。朝阳沟所在的那个省份，在大炼钢铁时几乎砍光了山上的树木，哪里还有山清水秀的景色？纵然山清水秀，哪里还有欣赏风景的心情？我看到的一份资料，说的是那个省份饿死人最多的信阳地区，从1959年庐山会议后到1960年4月，700多万人口中饿死了100万以上，还有8万农民饿得无法忍受，偷地里未熟的庄稼，被农村的基层干部打死。

我感兴趣的，还有那位姑娘的个人境遇，如果真是她唱的那样，也就好了。"毕业后上大学我没争取，剧团里来通知没把信回"，是人有多种选择后的自觉选择，应当尊重。可是在大跃进之中一拥而上开办的大学，在大跃进以后又纷纷关闭，城里提供的用工岗位，因为国民经济的衰退而锐减。比如我所在的城市，曾经是中央的直辖市，是国家最重要的钢铁工业基地，但是在大跃进以后，三所大学之中关闭了两所，找工作也变得特别困难。我大哥1962年中学毕业，无法上大学去读了一年技工学校，等到1963年毕业后，技工的岗位也找不到了，只剩下下乡和当兵两种选择。

你可能不会询问我现在想问的问题：城市里的工作岗位，都到哪里去了？

在漫长的岁月里，人类渐渐发展，于是有了城邦。对于国家而言，城市可能是发展和繁荣的标志；对于个人来说，城市只是可以工作和生活的地方。在人口自由流动的国家和时代，城市更像一个自然形成的、人来人往的集市，如果它不能提供更多的工作和生活条件，自由流动而来的人，也会流动而去。一般来说，在顺其自然的时候，不会产生太大的人口问题。

最先遇到这个问题的是苏联。作为一种新的实验，它们开创了社会主义的国家模式，国家集中权力，掌握财富，制定计划，控制发展。斯大林暴政时期，没有能力为城市原有的居民提供足够的工作岗位，但在那几十年里，在饥荒和战争以外，还有他的大肃反、大清洗、大流放政策，让城市里的人口大量减少，形成一种意外的、血腥的均衡。他去世的第二年，也就是1954年，苏联为千百万冤案平反，让无辜流放的人返回故乡。城市里的人突然增多了，他们开始动员城市青年下乡垦地，利用荒地增产粮食，又减少了城市青年的就业压力。

按照粗略的计算，国家投放同样的资金，在轻工业和服务业可以安排一千万人就业的，在重工业只能安排四五百万人。1950年代，改朝换代的中国，一番工商业改造之后，城市里的上千万个工作岗位，像股票市场上的资金一样蒸发了，再加上大部分资金投入重工业建设，还要加上动员家庭妇女参加工作，差不多失去了解决城市青年就业的能力。1955年中国一个代表团访问苏联，学到了安排城市青年下乡垦荒的招数，回来以后汇报给上面。这个解决城市青年就业的不是办法的办法，中国很快就要效仿了。国家只要给一些下乡初期的安置费用，以后他们就能养活自己了。同样是苏联发明的下乡垦荒，在1970年代红色高棉的波尔布特那里，得到了更为彻底的解决。他们实行大规模的强制性人口迁移，将全部城市人口强制遣散出城，武装押送到农村。由於这项工作完全缺乏相应的物质准备，甚至最终目的地都没有确定，大量的年老体弱者和妇孺死於饥饿、疾病和疲劳。

1963年，中国大饥荒结束了，看起来，很多创痛都在恢复。同往年相比，城市失学失业的中学生更多。除了电影《朝阳沟》之外，还有《人民日报》发表的报告文学《特殊的姑娘》，《新华日报》发表的社论《走革命的道路，当革命的接班人》，相继树立了几位下乡垦荒的先进青年典型，强调这些青年榜样“所走的道路，正是毛泽东时代知识青年所应该走的革命道路。成千上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参加农业生产是有最广阔前途的革命行动。”

那一年，我大哥最后选择了当兵，没有下乡。他在我妈的涟涟泪水映照之下，去了遥远的黑龙江。在几年之后他结束兵役回到故乡时，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正在进行，国家发起了更大更猛烈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我三哥和我，正赶上那个时期中学毕业，下乡务农似乎是唯一的选择 。

董学仁文集：http://www.hxzq.net/showcorpus.asp?id=172

华夏知青网不是赢利性的网站，所刊载作品只作网友交流之用
引用时请注明作者和出处，有版权问题请与版主联系
华夏知青网：http://www.hxzq.net/
华夏知青网络工作室

知青为什么写不出伟大的知青作品

知青文学是新时期的重要成果，曾经并仍在感动和启迪着无数人。梁晓声、史铁生、张抗抗、叶辛、阿城等注定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不过几十年过去了，知青文学迄今未出现伟大作品，或者说世界经典，不能如《战争与和平》、《高老头》甚至短篇的《变色龙》那样伟大而不朽。学者们认为这是由于西方对中国文化的隔阂而影响了中国作品在世界的流行，我以为这不是主因。鲁迅、老舍是土著，却得到世界公认。中国十亿读者，占世界诺大比重，国人对作品的评价心中有数，例如前述世界名著，中国人也是奉为经典的。况且中国人也未必一定要以西方为准，《红楼梦》未在西方流行，中国人照样誉之为世界经典。

知青文学这种现状，是不应当的。上世纪中国的巨变影响了世界，十亿人所经历的惊心动魄远甚于西方。而知青及它的前身红卫兵，对巨变起到不可代替甚至唯一的作用。红卫兵出乎意料地改写了中国历史，给中国带来的影响迄今未绝；而后蛹化蛾的知青，继续创造了中国乃至世界罕见的历史。这种沧海桑田的演化仿佛东汉三国，时光虽短却远比千百年胜朝精彩绝伦，对此史家是没有争议的。那么，反映这种巨变和巨变参与者的伟大作品问世，是理所应当的。中国人并不缺乏才气，在我看来，知青作家的哲思能力和写作技艺并不亚于世界大师。可为什么没能写出伟大作品呢？我以为最重要的原因是，知青作品缺乏具有普世情怀的深刻的忏悔和反思精神，由此不能深刻反映特定历史中的人性，而不能充分反映人性的作品是不真实的，这又恰恰是伟大作品最重要的。由此，知青作品无法实现质的一跃。

伟大作品对人性的揭示和体验是感动读者最重要东西，具有巨大的启蒙作用，它超越国家和民族。历史的巨变，都是人性的搏击和挣扎，单纯描写场景而没有人性的搏击与挣扎是废纸；即或有人性的博击与挣扎而不充分，也会因其不真实而不会成为伟大作品。巨变中的民族和个人，都扮演着自己的角色，起到不同的作用，历史过后会发现，我们都需要忏悔和反思。托尔斯泰、罗曼罗兰、卢梭、巴尔扎克、鲁迅的作品，充满着对个人、民族、国家和人类的忏悔和反思，由此被读者铸成不朽的丰碑。知青作品似乎不乏忏悔与反思，但却是戴着手铐的舞蹈，且更多自恋自爱，所以人性的描写不能不杂以虚假，成为作品的致命伤。就作家自身说，忏悔与反思的缺乏不包括外部压力下的无奈，仅指作家自己就自觉不自觉戴上思想枷锁。所以，知青作品的缺乏忏悔与反思来源于知青作家缺乏忏悔与反思意识，许多知青作家根本没有这种意识。作家思想决定作品内涵，作品失去真实，当然不会伟大和不

朽。读者尽管文学素养不如作家，但对作品的感悟和评判上，却是聪明的。

知青作家的这种情形是整个知青群体缺乏忏悔与反思意识的反映。不必回顾历史，每一位知青都心知肚明，不过是不愿说并遮蔽罢了。知青作品起码有两点不真实。一是知青宛若从天而降，仅仅几年前的红卫兵不见了，即或见也饰以假面，模糊一晃就下场，转到可歌可泣的知青一幕了。二是知青的描写，有劳苦，有苦难，有磨炼，有觉醒，有思索，有反抗，有奉献，唯独不再现并忏悔与反思自身曾经的错和罪。历史被割裂，被歪曲，被抽空，人性的复杂曲折变成单纯直线，还谈什么真实！谁都偷着抹掉自己曾经的戏份，例如文革大戏，红卫兵的戏份没有了，只剩下一个人的独舞，历史成了童话。试问，没有红卫兵的那段历史，知青的思想变迁如何解释？如何能挖掘特定的人性内涵，并如何阐释由这种人性搏击和挣扎而导致的民族创伤？所以，从根本上讲，知青作品大都是苍白而寡味的，即或优秀作品，放在历史中，也压不住枰。歪曲人性的作品是假冒伪劣的东西。

放大说，知青作品虚假或不深刻，是中国几十年的通病，抗日战争，比欧洲反法西斯战争惨烈得多，可欧洲出现了描写二战的伟大作品，我们迄今未有，原因也是不真实。大跃进，反右，文革，都是中国历史上影响巨大的事件，迄今无伟大作品。当事者迄今不忏悔，作家们也缺乏这种意识。所以我们民族缺乏忏悔意识是我们的作品不能列于世界伟大作品之林的原因。德国总理跪着忏悔当年法西斯的罪行，若按我们知青的说法，那只是希特勒一人的事，其他人都是上当，不必忏悔。知青们不懂或装不懂，这是民族的忏悔，一个人是不可能进行战争的。有忏悔意识的民族才能产生伟大作品，我们不能，所以我们没有伟大作品；知青们不能，所以写不出伟大的知青作品。

这很难，批评当权者可以，批评普通人不易；批评一个或少数人行，批评全体或大多数人必招痛骂。不单法不责众，在中国，理也是不能责众的。许多彻底的文革和知青运动的“否定”者，也不肯否定自己，德国总理下跪忏悔，在中国就是大逆不道。不信你试着在网上提及红卫兵须为自己的错误和罪过忏悔，则数不清的红卫兵定会“强者必怒于言，懦者必怒于色矣。”

忏悔不单单是灵魂的救赎，更是一种道义，你再温文尔雅，再宽容善良，再理性智慧，没有道义，将坠入低级无聊的泥坑，你这个民族将陷入没有希望的黑暗，你对后人、对人类是一种犯罪。侃侃而谈和大义凛然的知青群体几乎代表了一代人，难道将放弃这种道义而留下民族道义的断层吗？知青作家应当拿出勇气创作真实反映人性的，具有忏悔和反思意识的作品，因为他们有不可替代的宝贵经历。当然前提是他们应当先拿出勇气忏悔自己和群体的错误和罪过。像史铁生，善良、坚强、极具哲思，文笔一流，但却未能写出伟大的知青作品，铁凝称他是伟大作家，是经不起历史检验的妄语。再有十几年，知青们渐入残年，写也来不及了。我对此悲观，因为可以操笔的诸君，思想距此还远。而作为文学基础的群众性文字，比如网上舞文弄墨的知青们，除了“无悔”，就是“上当受骗无责任”，还有温文尔雅对罪过要“宽容”，“让后人评价”云云。只要看某些“座谈会”、“研讨会”、“博物馆”、“纪念演出”，以及种种言论就昭然了。

伟大的知青作品大概要由非知青的后人来创作了，假如真是如此，那实在是知青作家的大遗憾甚至羞耻。

2011-04-03

华夏知青网不是赢利性的网站，所刊载作品只作网友交流之用
引用时请注明作者和出处，有版权问题请与版主联系
华夏知青网：http://www.hxzq.net/
华夏知青网络工作室

感悟：《山楂树之恋》·草原恋合唱团·草原知青

（一）

电影《山楂树之恋》由张艺谋执导。该片导演组为了找到一个清纯的女主角，几乎跑遍了全国所有艺术院校，但收获寥寥。在面试了数以万计的试镜者之后，张艺谋最后选中了石家庄第十二中学的高中学生周冬雨。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特点。在博主下乡插队的那个时代，"清纯的女孩子"可以说是俯拾即来，比比皆是。

北京"草原恋合唱团"于1999年成立。11年来，博主一直是"草原恋"最忠实的"铁托"和"粉丝"。博主经常会从草原恋团员们的身上，从一些年届花甲的老知青身上，惊喜地发现尚未褪去的"清纯"。

（二）

当年知青的感情生活，也很有特色，与知青的忧国恤民情怀，形成两条齐头并进的平行线。

爱，往往包含着对部分自我的放弃。由于知青崇尚奉献的特点，他们的爱往往格外真挚，格外投入，格外狂热，往往很少功利的考虑。而且，他们生活在一个浪漫主义远远压倒现实主义的时代。

在知青的男欢女爱中，金钱很少成为一个考虑因素。

小说《山楂树之恋》比较真实地描写了当年年轻人的感情生活。对于张艺谋的电影，我心怀期待。

（三）

在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资深记者、原东乌珠穆沁旗北京女知青张娜依的回忆录中有这样一段：

我和凤起把水车的辕子横过来架在粪车的一个车轱辘上，上面蒙上两层毡子，搭了个小"窝棚"。毡子没有那么宽，一头盖到地面，另一头敞着口。不到一米宽，只有两米来长的空间，怎么装下两个人呢？凤起看我迟迟疑疑地

不往里钻，就说："你坐在这边，我坐那边，咱们把穿着雨靴的脚伸到外面，不就行了？"……夜深了，我很困，想睡，可身边有个男生，怎么睡呢？凤起轻轻说："你睡吧，我不困，我看一夜书。"不知什么时候，我沉沉地睡着了。一直到第二天清晨，我睁开眼一看不禁心里突突地跳，凤起把我挡在毡子不敞口的里边，他小半个后背露在敞口的毡子外面，身上披着雨衣，睡得十分香甜，我们挨得很近。我赶紧爬起来，钻出窝棚……

这是那时"青春清纯男女"的真实写照。博主知道，那时的许多知青都是这样的。这一点，让牧民们很难理解，也让今天的人很难相信。

（四）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特点。在博主年轻的时候，女孩子们也有不"清纯"的一面。

在我们大队的北京知青中，女生中年龄最大的一位比我大4岁，是一个对我非常关心的大姐。近几年，她多次与我谈到，当年她曾经循循善诱地劝阻那些对我有好感的女知青。她曾经对她们说："谢小庆这个人是不错，但他的家庭出身太可怕了。跟了他，不仅毁了自己的前途，将来子女都跟着倒霉。"感悟557当年的女孩子，首选是工人和贫农的子弟。今天的女孩子，首选是豪门和老板的子弟。

（五）

不久前，博主与一位女诗人之间有过这样几句对话：

博主：当年我们的草原生活是一种"声色犬马酒"的生活，唱唱歌，养养狗，赛赛马，喝喝酒。可惜当时太单纯，否则，在"色"的方面也可以很丰富。

女诗人：还是不够单纯，不像牧民那么单纯。

（六）

上世纪60年代，数以千计的北京、天津的中学生作为"知青"进入草原深处，融入了游牧生活。城市的孩子得到锻炼，城乡文化得到交流，促进了牧区的现代化进程，融洽了蒙汉民族的感情，这一事件具有多方面积极的意义。但是，如果放到历史的长河中去看，或许，与这些意义相比，这件事更重要的意义是通过知青们的笔记录下了人类历史上曾经有过的这样一种"人人和谐、人天和谐"的游牧生活方式。

今天，已经有数以百计的牧区插队知青在用自己的笔书写着、记录着这种特殊的生活方式，如我的西邻公社北

京知青张承志写的《黑骏马》，我的东邻公社（今天已经与我的公社合并为一个"镇"）北京知青姜戎写的《狼图腾》等。借助于书籍和网络，这些文字将被保存，被传播。

或许，这种记录对于人类的生存和延续具有异乎寻常的重要意义，可能成为未来人类化险为夷、转危为安的生存密码。未来的人类可能会从中获得启发，找到人与人和睦相处的方式，找到人与自然和睦相处的方式。

海宽文集：http://hxzq05.d68.zgsj.net/showcorpus.asp?id=10

华夏知青网不是赢利性的网站，所刊载作品只作网友交流之用
引用时请注明作者和出处，有版权问题请与版主联系
华夏知青网：http://www.hxzq.net/
华夏知青网络工作室

红肿似桃花

有下过乡的朋友递过来一个消息，说是《人民日报》要出知青下乡40周年大庆纪念册，正征稿。按照他的指点，上新华网查得此告示，内中明言："在新中国的历史中，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作为史无前例的壮举，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数以千万计的知识青年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上山下乡，在广阔天地里同广大农民群众一道，战天斗地，用热血和忠诚谱写了一曲曲可歌可泣的青春之歌……"

读到此，脑子里忽然想起鲁迅先生说过的一句话："红肿之处，艳若桃花；溃烂之时，美如乳酪"。循着记忆，找出《鲁迅全集》来翻，知道此乃《随感录三十九》里说的，写作时间当在1918年冬。搭上前言后语，那句话是："即使无名肿毒，倘若生在中国人身上，也便'红肿之处，艳若桃花；溃烂之时，美如乳酪'。国粹所在，妙不可言。"你不能不佩服这老夫子的睿智与尖刻，说完此语三十多年，中国大地上此风便刮得昏天黑地，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义和拳"，这个杨梅大疮不但"艳若桃花、美如乳酪"，而且还"异香扑鼻、提神益气"哩！

时过境迁，又是几十年过去了，朝风依旧。前些时，曾经作为"文艺恐怖主义"符号的"革命样板戏"，既不"红肿"也不"溃烂"，编入中小学教材里去给孩子们当"乳酪"了。眼前又看见《人民日报》这份征稿公告，"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作为史无前例的壮举，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何止"艳若桃花"，又何止"美如乳酪"，居然威风成"史无前例的壮举"！

照此逻辑，当年李庆霖先生那封"诉苦信"，还有成千上万"知青大逃亡"事件、东北、云南"知青返城运动"是否该算破坏此"壮举"的逆流？有报道称邓小平发话："我们花了三百亿，买了三个不满意：知青不满意，家长不满意，农民也不满意。"这"三个不满意"是否也该算贬损了"史无前例的壮举"？

知识青年大规模上山下乡，分明就是人类历史上空前绝后的反动，是一个狂人玩弄历史的悲剧！教育学校化、生活城镇化是人类近代文明的成果，它的完善与发展又反过来促进了人类文明的发展。老毛废止学校教育，把数以千万计城市知识青年驱赶到原始农耕社会里去，借用马克思在抨击太平天国的《中国纪事》里的一句话来描述："只有在中国才能有这类魔鬼，这类魔鬼是停滞的社会生活的产物。"我倒是想问问《人民日报》的编辑先生们，数以千万计知识青年以及他们的家长们的痛苦、烦恼、荒废；还有众多被把持公权力者迫害甚至奸污的知青

们，是否都算作“可歌可泣的青春之歌”？你们是否也准备把那些悲惨的经历也编辑入册？倘若真如此，也算还有勇气与良知，缺点仅仅在于分不清哪是杨梅大疮哪是“桃花、乳酪”而已。

鲁迅先生还说过：“中国的人民，是常用自己的血，去洗权力者的手，使他们又变成洁净人物的。”（《我要骗人》，六卷，P395）这论点，大约鲁老夫子有误，此话似乎可以这样说：“中国的御用文人，是常用人民的血和泪，去洗权力者的手，使他们又变成洁净人物的。”捎带着，他们自己也挣些荣华富贵回来以资消遣。

知青、文革及其他

说起知青，一些人哀怨，一些人怀念，一些人赞美，还有一些人愤懑。

这原本就不奇怪。共和国的整一个时代，基本上属于这一批人，当然不能一概而论。任何一个十年，都会有一代青年，却没有一个专门的称谓。恰如抗日战争几乎与知青存在时间同样长，却没有一个被称为“抗青”的人群。因为他们不具有基本雷同的命运。

知青是文革的产物，是一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特定人群。他们整齐划一地遭遇大学停止招生，企业不得招工，几乎无一例外地“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结果成了非工、非农、非商、非学、非兵这样一个不伦不类的群体。

这一个群体恰恰是文革的主体之一，可以这样说，没有这个群体的行动，文革是热闹不起来的。至少不会像实际发生的那样。可悲的是，他们并非文革的始作俑者，甚至连主力都算不上，只不过是一群被利用的角色，利用完便被一脚踢开了。其实在文革进行之中就已经明确了：革命小将打先锋，工农兵当主力。恰如我儿子上初二时说的：“冲啊！冲在前边当烈士，冲在后边当英雄。”当时，他正在看电视，播放的是一部关于解放战争的片子。文革中，革命小将恰好是冲在前边的。

问题在于，这些人连烈士都算不上。整个就是一群替罪羊！“红卫兵”已经臭不可闻，似乎文革的全部灾难都是他们制造的，全部都是江青的打手。没错，当年这些个“小将”确实傻乎乎地尊崇过她，但除了瞎子，谁都知道那崇敬是冲着谁来的。“红卫兵”没有娶她做老婆；“红卫兵”没有任命她当文革副组长；“红卫兵”没有提拔她进政治局。恰好相反，最先喊出：“打倒江青！”的，正是这些“红卫兵”。最先召开“炮打张春桥誓师大会”的，还是这些“红卫兵”。那些“久经考验”的老战士们，何以不见露面？

历史总是被打扮的小丫头，后来的屎盆子，全都扣在“红卫兵”头上了。我并不想说这些“红卫兵”就没干坏事，其实真正干坏事的，多是那些“八旗子弟”！又是谁指使他们干的？早在1968年本人就有言：“利用涉世未深的青少年搞政治斗争，其险恶与卑鄙并不亚于强奸幼女！”假如被强奸之后再被诬为娼妓，那悲哀就更不可言谕

了。

但历史毕竟已经流过去快四十年了，当年风华正茂的青少年，如今已经进入老年的行列。那天，当我在公共汽车上，被人尊敬地招呼：“老人家，请坐。”的时候，我终于无可奈何地接受了现实。“廉颇老矣，尚能饭否？”那么“知天命”之年自己如何看待？没必要看见批评就无法忍受，该反思的不含糊，说过头了也别计较，想反驳的便开口就是了。

被许多文章批评了的“伤痕文学”，始作俑者，知青是也。伤痕并非不该写，问题只是缺了深度。如同祥林嫂的唠叨，不用说别人，我们自己烦不烦？于是又有人高呼“忏悔”，那呼声不是冲着自己，而是冲着别人来的。我不会去“忏悔”，因为我并没有值得忏悔的理由；也不反对忏悔，因为那是任何人自己选择的权利。

“一样饭养百样人”，任何群体都有数不清的个体，也同样有数不清的差异。在同一个被称作“知青”的人群中，就有为数不多的“红五类”，也有为数同样不多的“黑五类”，更多的是不伦不类的“灰五类”或者“红战友”。最奇妙的是，在“红五类”的队伍里，昨天还是“根正苗红”的最彻底的革命接班人；夜里回家，发现老爹已经成了“黑帮”，第二天就变成“狗崽子”，就必须“脱胎换骨”，力争成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

荒唐并非这些乳臭未干的娃娃们自作聪明，而是权力在支配的。有人指责道：“红卫兵打倒一切。”即使是老红卫兵们，他们谁也打不倒，只有权力需要打倒的才会被打倒。举个例子吧：我们早在1967年“三支两军”开始时，就喊出“打倒黄永胜”的口号，无他，只因为他派出来的军管会下车伊始就对我们发难。我们甚至把自己养的狗也取名“黄永胜”，但并不妨碍他青云直上。直到“9.13”以后，权力需要他倒了。有人后来夸道：你们真行，那么早就打对了。我笑道：“死猫碰上了瞎老鼠！不是我们打对了，而是他自己眼瞎，钻进死猫嘴里去了。不过死猫终究是死猫，钻进嘴里的也与它无关，更没有什么功劳。”整个文革，我们早在1968年春便认定它是“堂.吉柯德向风车宣战”，所有后来的举动，完全是为了自卫，以免被杀掉。口号便是“求生存！”权力是无情的，更何况它还“以革命的名义”。你向权力发动挑衅，尽管这种挑衅是权力指使的，你却挑衅到它头上！找死！至于打倒，恰如如今买彩票，除非你作弊，有人把中奖号码先告诉你。即使那样，最终倒霉的还是你，作弊者是不会负责任的。

指责“伤痕”的人们，却看不见：那些蹲过牛棚的“老干部”更“伤痕”。他们哪个不在声泪俱下地、喋喋不休地控诉受到“迫害”的惨痛，可又有谁不是迫害过更多人的老手？难道胡风集团、右派……，也是红卫兵或者革命小将们整的？何以这些“思痛”者们不敢要他们“忏悔”呢？

把整个一代人看成一个人，原来就很荒唐。知青们为自己遭受的不公正呼唤，本来就无可厚非；也有不呼唤的，本人即其中之一。但并不意味着装哑巴。恰恰相反，我强烈地希望每一个过来人，都应该把自己的经历与感

受，告诉下一代，以免谬误流传，继续让人家任意涂抹历史丫头。

并非没有人犯罪，比如我的同班同学，就有两位“根正苗红”的、在工宣队的纵容下，用军用皮带打死了一个“地主婆”，而且啥事没有。象征性地插队不久便招工了，有一个当了中学教师。后来过了许久，我见了这位教师。刚开始有点尴尬，他是整我的那一派的，而更早时他还是我的“培养对象”，我奉命要帮助他入团的。谈话没多久，我就问到那个“地主婆”的事情，他矢口否认，而班上其他在场的同学都告诉我确有其事。

我的不忏悔自有理由。从文革开始，本人即风云人物。在“篡权”的日子里，严禁任何虐待行为，更别提打人了。本人并不认为这有什么“功劳”，这只不过是做人的基本要求，尽管我的老师们至今还感激不尽。这是否中国传统的悲哀？你没让他受本不该受的罪，他还要感激你！然后“破四旧”，领着全校走一通大街、喊一阵口号、撒一路传单便“凯旋”回来睡觉！很快就被上级党组织发觉这里的革命领导权被“灰五类”篡夺了，于是挨整。人家奉命再去“补充”破“四旧”，于是抄了一些属于人民行列的人，主要是资本家的家。还强收了商店里的香水之类商品，砸了一些招牌、改了一些路名。

说这些，目的并非摆谱，而是试图说明，至少在我们这个城市里，那些“过火”行动是被指使的，而不是这些“红卫兵”的发明创造！本人挨整后便溜之乎也，出去串联，回来又煽动全体学生、老师都去大串联。大串联过后就被选举为“总勤务员”，那时我还在昆明，赖在“闻一多遇难处”旁边的接待站里。

回来掌权后也严禁虐待或者打人，即使是在武斗最激烈的时候。后来工宣队和军宣队费尽气力，甚至不乏“非常手段”，也没有查出我们打过谁甚至碰过谁。因此，以某些地方的某些人来一概而论，显然不符合历史真实。即使在那些有行动的地方，也只是少数人在违法罢了，决不可能是大多数。而且，在最严重的地方，例如北京，也是官方指使的行为多的地方。像大兴的惨案。

当然我们也有错误，连党和毛主席都犯错误的时候，难道叫我们“英明”？我对于错误的最深刻认识，就是不该参加文革。既然身不由己卷了进去，那只能怪自己瞎了眼。那么反过来用辩证的观念看问题，坏事变好事就自我安慰说是长了见识受到了锻炼。

记得我还被关在黑屋子里，偷偷从专案组厕所的便纸篓里，拿回房间沾着大便的“参考消息”，看见上边有杨振宁教授的回国观感。其中说，停止高校招生的严重后果，将在十年内显现出来。这就是说知青的命运并非只是知青的命运，它同样也是国家和人民的命运。知青的存在本身就是祖国的灾难！知青们应该略感欣慰的是：当祖国蒙难的时候，我们和祖国一起蒙难！更应该忏悔的是那些当祖国蒙难时飞黄腾达的人！遗憾的是他们中并不乏至今还在训导老百姓的角色。

如果给自己撰写墓志铭，我也许会写：这家伙没发国难财。

我的知青研究與教學

應金虹老師之邀，出席香港作家聯會與香港知青協會在香港作家聯會會所為上海知青更的的創作的知青長篇小說《魚掛到臭 貓叫到瘦》而合辦知青文學講座，香港知青網負責人老三對《魚掛到臭 貓叫到瘦》出版前後作介紹。並對該書給予極高的評價。我則與廣東作家黎服兵、廣東作協雜文創作委員會副主任黃濟群分別介紹各自在知青創作、出版、研究與教學等方面進行介紹。我的發言稿如下：

我的專業領域是古典詩學，卻涉足知青研究與教學，人們通常會理解為，這是我知青情結起作用。這話說得對，也不對。

文革中我當過幾年知青，之後進工廠，上大學，教書，出國留學，再在海外任教……知青那幾年經歷，沉澱在我的人生記憶中，一直到某個契機來了，才被喚醒，也才促使我在不同時間點，先後涉足到知青研究與教學。

【契機一】

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我已經取得博士學位留在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教書。新加坡《聯合早報》記者聯絡我，要求我為讀者推薦一本值得讀的書。這本書不宜太專業太學術，應是比較通俗化的，要適合廣大讀者閱讀。我幾乎是不假思索就推薦了鄧賢的《中國知青夢》（大概就是知青情結發酵了）。當然，也就配合著對此書發了些議論。這算是我首次對知青問題發表議論了。過了不久，鄧賢到訪新加坡，我的朋友將他帶到我的辦公室。大家一見如故。這時，發生了一個小插曲：鄧賢《中國知青夢》第一幅插圖照片，是重慶知青列隊下鄉。隊伍前頭那個小男生正在我隔壁辦公室，是我的同事周建渝博士（現為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教授）。我把周博士請過來跟鄧賢見面，著實令鄧賢大吃一驚。過後，鄧賢給我寄來一本反映知青回城後經歷的長篇小說《天堂之門》，附信告訴我他要到金三角尋找當年外逃的知青，後來，也就有了長篇紀實小說《流浪金三角》。

從此後，我就有意識關注知青問題，也開始有意識引導、指導學生撰寫有關知青的論文，直到今天，已指導過

十幾位研究生撰寫知青專題論文或跟知青有關的論文。有的論文是以知青為專題進行討論。比如在新加坡，我指導過文革前知青史的研究、梁曉聲小說理想主義的研究、王安憶小說女性主義的研究，現在也指導臺灣的研究生撰寫有關王小波《黃金時代》性描寫的研究，以及梁曉聲《雪城》反映回城知青命運的研究。有的論文雖然不是以知青議題為主，但也涉及到知青的問題。比如我在新加坡指導過一位博士生，計畫探討王安憶後期的城市書寫，我就提示她要跟王安憶早期的鄉村書寫（包括知青書寫）相聯繫相比較。但我後來應聘去臺灣，換了導師，不知她是否按照這個設想進行。我現在指導的一位臺灣碩士生，研究郭路生（食指）後期詩，我也要求她要與郭路生早年文革（知青）年代的詩進行聯繫比較。

上世紀九十年代後期，我的學生上網找資料，發現"華夏知青"等知青網站，介紹給我。於是，我也就上網成為知青網站的網友，陸陸續續在跟網友的交流中，對一些知青歷史與現狀的問題進行了討論。2001年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主辦了一次現代文學學術研討會，作為主辦單位的老師，我便將在知青網站討論過的一些看法，整理成為一篇論文《有關知青文學話語質疑的思考--為知青文學一辯》。

我開設知青文學的課程，也是為了從其他途徑推展知青研究。我的知青教學開始比較晚。在新加坡的時候，我只指導學生寫知青研究的論文，沒考慮過開課，主要是覺得不是很有必要（從兩國的歷史淵源及當代聯繫來看）。到了臺灣後，發現臺灣的大學，幾乎沒有介紹1949年後大陸的專門課程，而大陸的大學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初起便普遍開設有關臺灣問題的課程，對此不平衡的現狀，我只是感慨，但還沒有動起開設知青文學課程的念頭。冥冥中，我在等待一個契機。

【契機二】

應該是2007年上半年，復旦大學的陳思和教授到訪臺灣，在政治大學進行了一場演講，講有關"潛在寫作"的議題。我去聽了，並由此聯想到文革中的地下文學（包括知青的地下詩歌與自創歌曲），以及當下流行的知青網路紀實性文學。過後，跟陳思和教授就這些問題交換意見，陳思和教授覺得很有意思。在回學校的交通車上，偶遇系上一位臺灣本地老師，她也表示這些問題很有意思，而她以前對這些問題都不瞭解。當時在車上，我就覺得有必要開設一門知青文學課程，內容應包括文革中知青中流傳的詩歌及自創歌曲，還有當下流行的知青網路紀實性文學。很快，我就向系裡提交了知青文學課程大綱，並決定在2007年下半年的新學期開課。後來因人為因素，延後到2008年上半年才正式開課。並且，很快就將課程講義整理為《回眸青春--中國知青文學》一書作為知青文學課的教材；同時，也將自己在知青網路上討論知青問題的文章及回憶性的文章結集為《天地間的影子--記憶與省思》，作為知青文學課的參考書。二書都在2008年12月出版。無意中，也就趕上了毛澤東"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指示發表四十週年的"紀念日子"。

在《回眸青春--中國知青文學》後記中，我強調文革後新時期的知青文學，事實上就是當年的知青對自己青春歷程的回眸。其中自然有眷戀與回味，也有感傷與憤慨，還有自責與懺悔。該書的撰寫，事實上亦是一個當年的知青對有關知青記憶文本的回眸。其中固然有動情的推崇與渲染，也有平和的介紹與陳述，還有冷靜的剖析與批判。因此，該書的編撰，既遵循一般文學史的模式，又突破固有的模式而體現出頗具個性化的獨特之處，採取了各有側重點的處理方式：第一章緒論，對一些基本概念進行釐析，申明知青文學選題的意義，並對知青歷史演變發展進行概要敘述；文革前的知青題材文學創作，以臚列重點篇目概括介紹（第二章）；文革中的官方主流創作仍以重點篇目臚列介紹（第三章），地下文學創作則以體裁分類進行介紹（第四章）；文革後的新時期創作則以主題（第五至第八章）、風格（第九章）、體裁（第十章）等不同的類型歸類介紹，以及問題討論（第十一章與第十二章）。所舉作家作品，亦有兩難：一方面，無論對作家還是作品如何擇取，都有挂一漏萬之虞；另一方面，倘若只專注於"著名作家"，又無疑會墮入"名家創作史"的迷思。為此，該書在選取作家作品時，更注意的是"代表性"而非僅是"名家名作"；在介紹了文革前的幾部代表作之後，專列一節"作品的社會效果"介紹讀者（主要是知青）的反應；此外，在"文革中的知青地下文學"與"新時期的知青紀實文學"兩部分，則著意介紹更多"無名之輩"及其作品--尤其是知青網路文學。相比較名家名作而言，這顯然是更具有原生態的史料與民間化的敍述。這一切，都以期能彌補、平衡長久以來備受質疑的知青文學（及史學）話語權與話語體系。

該書對相關問題也進行一定的分析、探討及研究，尤其是第十一章重點分析了知青文學"移民"、"成長"、"記憶"等特殊屬性；在第十二章則集中探討了有關知青文學中的若干重要問題，如"知青理想主義的質疑與爭議"、"知青懺悔意識的質疑與爭議"、"知青話語權的質疑與爭議"，這樣的處理方式，跟一般文學史體例大不相同。

這門課開始是為研究生開的，也開放給大學部高年級同學外校研究生修讀。我第一次開課，就有臺灣清華大學、交通大學、淡江大學的博士生與碩士生去旁聽。後來，我也將這門課放到學校的通識中心，開放給其他院系的大學生修讀，這樣，修讀的學生人數逾百。

由於臺灣的研究生與大學生對大陸當代的歷史與文學接觸很少（有的甚至是空白），我上課的內容安排儘量有條理，簡潔明了；上課時，也更多利用歷史照片、圖畫、影片（紀錄片與故事片）、歌曲等聲像資料。比如介紹知青前後思想變化，我就利用官方知青歌曲與知青自創歌曲進行比較。對大學生，我更多利用分組討論的方式；對研究生，則更多引導他們對有關問題進行深入探討。總的目的，就是讓他們更多瞭解知青的歷史、文學與文化，由此，也更進一步瞭解、關注大陸的歷史、現狀及未來。

老例文集：http://hxzq05.d68.zgsj.net/showcorpus.asp?id=19

从集体下乡到集体下跪

在网上看到一组照片，据说是三十年前的真实照片，使我又一次震撼了、震惊了。

以上是1979-1发生的在云南的知青游行请愿。这样的事情在拨乱反正时并非罕见。但是，下面一组镜头就不一样了。

这些镜头是知青集体向中央调查组下跪要求回城！

集体下跪！发生在1979-1的云南！恕我孤陋寡闻，我直到十年后的1990年才听说。大概是1990年夏天，我从《文汇读书周报》上看到一则书摘，是花城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知青部落》（郭小东著），第一次透露了1979年在云南发生的“集体下跪”“北上请愿”的一些细节。实在是怵目惊心啊！禁不住的热泪盈眶！一遍又一遍看那篇书摘，实在不敢相信啊，上山下乡的狂潮是以这种方式结束的！？

游行请愿的行为在那个年代并不稀罕，可是，集体下跪，就实在难以置信了。我曾经以为《中国知青部落》一书是纯粹的小说，虚构了这样的情节。为此，我还在工作单位里辗转相托，向当年上山下乡去云南的知青或家长求证“集体下跪”的真实性、可靠性。答案是，确有其事，发生在兵团农场！我无语了。

如今在网络上可以看到这本曾经震撼我的心灵的《中国知青部落第一部1979知青大逃亡》，仍然可以读到那些刺痛我的肺腑的章节即第十二章的第225~234页。http://www.docin.com/p-32967720.html。最近在新浪博客看到一位曾经在云南兵团的上海知青“滴水湖畔”的系列博文，详述了1979大逃亡的前后经过http://blog.sina.com.cn/s/articlelist_1299533775_15_1.html，并提供了上述珍贵的照片。

我自己也是知青，1968-11去了江西，1973-5因工伤骨折，经过两年多的折腾，1975-9病退回城，1978春有幸进入校园，但对于1978年以后“知青大逃亡”，我只是大体上知道政策放宽了，许多插友回来了，我所在大队的知青，除了少数与当地人结婚成家或上调到工厂的以外，都回家了。虽然不时听说“人民广场又有知青游行了”这样的传言，但无暇到现场一睹实况。

至于云南发生的事情，则是一无所知。直到1990看到那张报纸上的书摘。随后，又三天两头跑书店，寻觅那本

书！1990-12，《文汇读书周报》的“一句话书评”征稿题目是“这本书，让我触目惊心”，我有感而发，旋即发去应征稿，对《中国知青部落》作了如是评论——“历史上这沉重的一页是遮掩不了的，因为它饱含着几百万知识青年的鲜血、汗水、眼泪。”我在致编辑的简短附言中说：我曾是知青部落的一员，回首往事，依旧触目惊心，不忍卒读，但又不忍释手。

我的“一句话”于1991-01-12发表。眨眼之间，二十年过去了！知青“集体下跪”的记忆挥之不去。近年来在网上偶尔见到过一些文章言及此事，但这么多的照片还是第一次看到。二十年前读到书摘的震骇之感再次喷涌而出。

回想当初，巨手一挥千百万人集体下乡，是何等的“辉煌”“激昂”。潮起潮落，就像1968年开始的如潮水一般席卷全国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一样，十年后1978年开始的大规模知青返城浪潮风起云涌，然而，出现的竟然是集体下跪！而且是千百个血气方刚的青年人啊！正如一位网友说的：“男儿膝下有黄金，在不得已的时候，谁会跪下？”在传统教育中，封建社会的终结也就终结了民见官必下跪的历史。然而一场“破旧立新”“灭资兴无”“培养一代革命新人”的大革命，竟至于让青年人成片成片跪下双膝！那个年代到底是一场什么革命啊！

2010-04-05

相关图片请移步作者博客：http://wangzongren1952.blog.163.com/blog/static/99595901201035844572 33/

知青误读知青？

去年三月，我在新浪博客看到“滴水湖畔”一组图文并茂的博文《回家的故事》，展示了七十年代末知青大返城中极为震撼人心的一幕——云南兵团农场的知青集体下跪请愿回家！为此，我在网易博客以《从集体下乡到集体下跪》为题，介绍和转发了相关的一系列照片。

有一位亲历其事的网友“马儿”有这样的留言——

您此篇文章中引用的图片中的第5、7、8三张图片是我们十四营当时开会的真实情况，那个跪在地下，双手举着请愿书的是某连队的文书，因为人长得比较瘦小，我们都叫他“小文书”，他为我们保存下了许多最珍贵的历史资料，在后来出版的《我们要回家》那本书中也有。他现在早已回到上海，在某中学任教。那位侧面对着大家去搀扶的是北京调查组的老干部，他真是个好人，我真心地祝愿他平安健康长寿。

这样的留言进一步加深了我对那些珍贵照片的印象。与此同时，我也注意到，诸多知青网友对当年的这一幕并不知情，看到那些照片甚为震惊。

网友“阿木林”说：太震撼了。我认为，反思上山下乡是整个民族的责任！

网友“凯凯119120”说：男儿膝下有黄金，悲壮。

网友“南郭先生”说：很悲壮的场景。

网友“酷苦兔”说：我见过上海人民广场“我们要饭吃”“我们要返城”“我们要工作”“……”的游行，请愿的实事。但是今天见到当年云南知青集体下跪请愿的相片，心灵再次受到震撼：我们这一代人实在悲哀……

网友“新生”说：男儿膝下有黄金，在不得已的时候，谁会跪下？很悲壮的场景。谢谢云南知青撕开了回城的帷幕。

网友“月光步甲”说：苦难历史，值得深思。

网友“蔚岚”说：《中国知青梦》（邓贤著）是纪实作品。上述照片中的部份及其真实情节在该书中有记述。中央作出终止知青运动的决定实属不易。要不是人亡政息，中国知青的命运还不知会如何！？

网友“月月”说：云南知青一事，我等小民何以知情，官方深恐事态扩大蔓延，也一直是秘而不宣。我本人也是在九十年代才得以知晓。

网友“兔子”说：震撼！苦难、压抑的年代，都是顺民啊。

网友“小草”说：往事再现，真实写照。

网友“快乐的老马”说：看到这些照片真的很震撼。由此可见，上山下乡的结束，是人心所向，是历史的必然。

网友“赤豆亲泥”说：知青先躯。

网友“忠蕙”说：第一次知道这么详细的信息。

网友“hailongwang”说：我是69年3月赴黑龙江插队，74年底因“特困”回沪的。78年知青大规模返城时虽也听说当时不少插友返城的不易，可这集体下跪的事还是第一次听说。震惊！！！

……

由此可见，许多知青和网友限于那个时代的信息闭塞，时隔三十多年后得知事实真相时，对知青集体下跪请愿都深感震惊，但是，他们也都能理解照片上那些场景的含义。

时间又流逝了一年多。最近，我在某知青网站上见到了一张熟悉的照片——

使我深为震惊的是，那张照片竟然被冠以“真情下乡为人民”！有一个跟帖甚至进一步说——宣誓：扎根农村干革命，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太感人了！见http://gongheguozhiqing.5d6d.com/thread-5558-1-1.html。

居然有这样的解读！如此“真情下乡”？如此“感人”场面？显而易见，这是一种难以置信、不可思议的误读！

在那个年代里，需要下跪宣誓上山下乡干革命？有谁经历过下跪宣誓接受再教育的？看看照片上知青的神态，谁能相信是在宣誓扎根农村？当年有许多唾手可得的“斗志昂扬、意气风发、走上山下乡革命道路”的摆拍照片里，有垂头丧气、双腿下跪的“斗志昂扬”吗？有低着头、苦着脸的“意气风发”吗？

我实在想象不出那个知青网站的网友怎么会如此解读老照片。如果把这样的解读留给我们的后代，当年曾经亲历其境的知青们真要欲哭无泪了。

如今，不乏“弘扬知青精神”“知青自己写知青史”之类的说辞，倘若基本的出发点都偏离了基本的事实真相，那么再高昂的重燃青春热情都会成为无知无聊之举，早晚要被扔进垃圾堆。

一代知青早已不青，如此误读实属无知。为了让后人了解和理解那段渐行渐远的历史，我再一次呼吁知青朋友，让我们留下真正有用的历史资料吧！

2011-08-06

网中人文集：http://hxzq05.d68.zgsj.net/showcorpus.asp?id=162

华夏知青网不是赢利性的网站，所刊载作品只作网友交流之用
引用时请注明作者和出处，有版权问题请与版主联系
华夏知青网：http://www.hxzq.net/
华夏知青网络工作室

老三届的悲剧

半百生涯就象经历了好几次轮回我们这代人的生命画卷竟是如此的支离破碎

一、老三届的生活轨迹

我是老三届的人，最近和几位同样是老三届的朋友聊天，谈起老三届这一代人的遭遇，大家都非常感慨，也非常愤怒。

老三届这代人，也就是在文化革命爆发那一年——1966年——正在中学读书那一代人，如今，年轻的也已经四十七、八岁，年长的都已经五十二、三岁了。最近几年，国内下岗的人数急剧增加，其中老三届占了一大半。这当然不是老三届人遇到的第一件倒霉事。回顾这几十年，什么倒霉事都让这代人遇上了。

在我们正该长身体的时候，我们遇上了人类历史上空前的大饥荒，整整挨了三年饿。在我们正该读书学习的时候，我们遇上了文化大革命其实是大革文化命，停了整整十年学。等到恢复高考，绝大部分老三届同学对于要考的东西，不是缺得太多补不上，就是忘得太多荒废了，到头来，老三届人考上大学或研究生院的比例非常低，后来能在专业上作出成就的就更少更少。

文化革命、上山下乡，不但耽误了老三届的学业和教育，而且也耽误了老三届的青春，耽误了老三届的正常的恋爱、婚姻、家庭和生育。由于革命的禁欲主义，有时候干脆就是领导的粗暴干预，再加上生活条件的艰苦，前途的渺茫、不确定，大多数老三届人没能及时的恋爱、结婚。等到毛泽东去世、四人帮垮台，下乡知青返回城市，社会上有了一大批超过政府规定的晚婚年龄的所谓大男大女。那些比较早就结婚成家的老三届人，情况大多也不妙，因为其中大部分婚姻都只是特定条件下的产物，缺少稳固的基础，八十年代初期中国的离婚潮，主角就是老三届人。

到了八十年代，老三届人基本上都有了一分正式的工作，虽然大部分都只是简单的兰领工作，社会地位很低，但在当时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总还算有某种保障。就在这时，经济改革深入进行，自由竞争引入经济生活，老三届人由于饱受颠簸流离之苦，好不容易才有了比较稳定的工作，所以很少有人愿意轻易冒险扔下铁饭碗去下海，这样，

他们又错过了重新创业的机会。九十年代以来，一方面是经济改革的迅速推进，一方面是经济不景气，失业下岗的问题越来越成为社会上的普遍问题。老三届人，由于教育程度低，专业技能差，再加上年龄不上不下，于是就成了下岗政策的首当其冲的牺牲品。

与此同时，老三届人在生活的其他方面也面临一系列严峻的困难。由于少年时代营养不良，青年时代备尝艰苦，人到中年，身体状况出问题的很多，恰巧在这时社会上又没有了保险医疗，医药费用猛涨。过去上学不要钱，现在干什么都收费，初中高中要收费，大学收费更高，老三届人因为自己失学，格外望子成龙，为子女教育不惜血本，经济上压力之大，可想而知。几乎与老三届人结婚成家同时，政府开始实行严格的一胎化政策。现在这个政策好象开始松动了，而老三届人——此处主要指女性——已经过了生育期。

二、“祖国的花朵”是最倒霉的一代

说来实在是莫大的讽刺。

老三届人出生在1947年到1952年之间，正是中共建国前后，称得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同龄人。曾经一度，他们被认为是祖国的花朵，是最幸福的一代。然而事实证明，他们其实是最倒霉的一代，是最不幸的一代。我们的父兄辈，有不少人的遭遇也极其悲惨，例如地主、富农、右派，但是他们只是他们那一代人中的一部分，而老三届人的苦难却属于整整一代人。

就在几年之前，国人兴起一股怀旧风，老三届人也不例外，许多老三届人频频地举行座谈会、办回顾展，有些人喊出“青春无悔”的口号，好象还很有几分为自己的过去而骄傲的劲头。当时就有一些老三届人提出抗议，到了今天，恐怕没有几个老三届人还能大唱青春无悔的高调了。尽管在现代，人们的预期寿命大幅度提高，五十岁上下还不能算老，但是那也毕竟不是年轻。对于大部分老三届人来说，能够有所作为的年代已经一去不返，人生已经无情地关闭了希望之门。

不是因为他们格外愚蠢，更不是因为他们格外懒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代同龄人却有着最悲惨的命运，这本身就证明了中共的滔天罪恶。

记得在十几二十年前，不少人对老三届这一代还寄予很高的希望，象刘宾雁、李泽厚都对老三届这一代评价很高，期待很高。他们认为老三届这一代阅历丰富，吃过苦，经受过各种磨炼，在社会底层生活过，熟悉中国国情，善于独立思考，势必会对中国的历史进程发挥重大的积极作用。古人说“艰难玉成”也是这个意思。

不过这种说法不一定靠得住。要说艰难困苦才最有利于人的成长发展，那么我们干什么还要努力建设，为子孙后代创造幸福的环境呢?所谓给后代造福岂不成了给后代造孽?我承认，艰难困苦对某一些人可能有好处，清代学者

赵翼写过两句诗:“国家不幸诗人幸，话到沧桑句便工。”饱经风霜、历经磨难可能会造就大诗人、大文学家、大思想家。但是，在任何一代人中，绝大部分都只是普通的人，平凡的人，他们只要求普通的生活，只要求平凡的幸福。沉重的苦难粉碎了他们平庸的幸福之梦，对他们一点好处都没有。

沉重的苦难对其他许多类型的人才也没有好处，比如对科学家就没有好处，对运动员也没有好处。说来说去，苦难的经历大概只有利于产生大诗人、大文学家和大思想家。事实上，老三届中确实涌现出不少优秀的诗人、作家和思想家。但是，从后来的情况看，他们的整体成就并不象人们当初预期得那么高，大部分人好比程咬金，只有三板斧的本事，一出手不同凡响，接下去就显出后劲不足，不容易更上层楼。

这有什么可奇怪的呢?文化革命之苦，上山下乡之苦，不但是在物质上，更是在精神上。在我们精神发育成长的年代，文化传统遭到史无前例的破坏和中断，外部世界的文化影响遭到严厉的封锁，我们所能获得的精神资源极度贫乏，超过中外历史上任何一个黑暗的时期。在这样的不毛之地上，居然还能长出思想之花、艺术之花，这本身就算是奇迹了，你怎么还能指望它们长得茂盛、开得鲜艳呢?

三、不要忘掉农村

老三届现在一般人谈起老三届，其实往往是指城市里的老三届，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农村的老三届。一般人对下乡知青讲得很多，对回乡知青却讲得很少。这个缺憾应当引起我们的充分注意。

不错，农村老三届回乡务农，是和自己的父母家人在一起，不象城里来的下乡知青被迫与父母家人分离。再说，回乡知青本来就是乡里生乡里长，对农村的生活和农业劳动都比较习惯，因此，他们的命运不象城市知青那样有巨大的反差。然而，和城里来的下乡知青相比，他们的生活更缺少希望。招工一般是轮不到他们的。七十年代末，全国各地的知青都掀起回城风，城里来的知青几乎全数回到城市，而回乡知青则依旧留在乡下，好象那是天经地义，理所当然一样。

四、否则，我们甚至对不起自己

不久前，原大陆留学生、现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威明顿校区任教的陈意新博士写了一篇很出色的论文《从下乡到下岗》，专门讲到老三届一代、知青一代人的命运，在叙述了这一代人充满不幸的生活之后，陈意新教授提出，这一代人应当得到补偿，“不仅因为国家的政策对他们一直不公，还因为他们不成比例地承担了革命与改革的社会与经济成本。”陈意新认为:“对这代人，国家至少应该以津贴为他们组织以现代化知识为主的成人教育，使他们当中愿意深造的人在退出中年前还可以攀得上改革带来的新机遇，以津贴为他们建立社会保障基金，使他们在

市场经济中失去竞争力后仍可过得上小康。”

我当然赞成陈意新教授提出的这一主张，但问题是，中共当局会采纳这一主张吗?另外，被共产党亏待虐待的岂只是老三届，岂只是知青?我们不要忘记，所谓老三届一代人、所谓知青一代人，虽然有着大体一样的共同经历，其实中间也有着不容忽略的差别。例如中共特权阶层子女，有些人早在上山下乡运动之初就开后门入伍当兵，后来又有许多人以所谓“工农兵学员”的名义上了大学。在共产专制下当官，不靠选举不靠民意，靠关系靠血缘，于是又有许多特权子女成了“第三梯队”。经济改革以来，他们又凭借权势，近水楼台，化公为私，转眼之间就成了所谓“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对他们这一小部分人来说，已经不是要不要补偿的问题，而是“补偿”过度的问题。事实上，对他们的这些“补偿”，就是对其他广大老三届人的又一次剥夺。

华夏知青网不是赢利性的网站，所刊载作品只作网友交流之用
引用时请注明作者和出处，有版权问题请与版主联系
华夏知青网：http://www.hxzq.net/
华夏知青网络工作室

从集体下乡到集体下跪

在网上看到一组照片，据说是三十年前的真实照片，使我又一次震撼了、震惊了。

以上是1979-1发生的在云南的知青游行请愿。这样的事情在拨乱反正时并非罕见。但是，下面一组镜头就不一样了。

这些镜头是知青集体向中央调查组下跪要求回城！

集体下跪！发生在1979-1的云南！恕我孤陋寡闻，我直到十年后的1990年才听说。大概是1990年夏天，我从《文汇读书周报》上看到一则书摘，是花城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知青部落》（郭小东著），第一次透露了1979年在云南发生的“集体下跪”“北上请愿”的一些细节。实在是怵目惊心啊！禁不住的热泪盈眶！一遍又一遍看那篇书摘，实在不敢相信啊，上山下乡的狂潮是以这种方式结束的！？

游行请愿的行为在那个年代并不稀罕，可是，集体下跪，就实在难以置信了。我曾经以为《中国知青部落》一书是纯粹的小说，虚构了这样的情节。为此，我还在工作单位里辗转相托，向当年上山下乡去云南的知青或家长求证“集体下跪”的真实性、可靠性。答案是，确有其事，发生在兵团农场！我无语了。

如今在网络上可以看到这本曾经震撼我的心灵的《中国知青部落第一部1979知青大逃亡》，仍然可以读到那些刺痛我的肺腑的章节即第十二章的第225~234页。http://www.docin.com/p-32967720.html。最近在新浪博客看到一位曾经在云南兵团的上海知青“滴水湖畔”的系列博文，详述了1979大逃亡的前后经过http://blog.sina.com.cn/s/articlelist_1299533775_15_1.html，并提供了上述珍贵的照片。

我自己也是知青，1968-11去了江西，1973-5因工伤骨折，经过两年多的折腾，1975-9病退回城，1978春有幸进入校园，但对于1978年以后“知青大逃亡”，我只是大体上知道政策放宽了，许多插友回来了，我所在大队的知青，除了少数与当地人结婚成家或上调到工厂的以外，都回家了。虽然不时听说“人民广场又有知青游行了”这样的传言，但无暇到现场一睹实况。

至于云南发生的事情，则是一无所知。直到1990看到那张报纸上的书摘。随后，又三天两头跑书店，寻觅那本书！1990-12，《文汇读书周报》的“一句话书评”征稿题目是“这本书，让我触目惊心”，我有感而发，旋即发

去应征稿，对《中国知青部落》作了如是评论——“历史上这沉重的一页是遮掩不了的，因为它饱含着几百万知识青年的鲜血、汗水、眼泪。”我在致编辑的简短附言中说：我曾是知青部落的一员，回首往事，依旧触目惊心，不忍卒读，但又不忍释手。

我的“一句话”于1991-01-12发表。眨眼之间，二十年过去了！知青“集体下跪”的记忆挥之不去。近年来在网上偶尔见到过一些文章言及此事，但这么多的照片还是第一次看到。二十年前读到书摘的震骇之感再次喷涌而出。

回想当初，巨手一挥千百万人集体下乡，是何等的“辉煌”“激昂”。潮起潮落，就像1968年开始的如潮水一般席卷全国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一样，十年后1978年开始的大规模知青返城浪潮风起云涌，然而，出现的竟然是集体下跪！而且是千百个血气方刚的青年人啊！正如一位网友说的：“男儿膝下有黄金，在不得已的时候，谁会跪下？”在传统教育中，封建社会的终结也就终结了民见官必下跪的历史。然而一场“破旧立新”“灭资兴无”“培养一代革命新人”的大革命，竟至于让青年人成片成片跪下双膝！那个年代到底是一场什么革命啊！

2010-04-05

相关图片请移步作者博客：http://wangzongren1952.blog.163.com/blog/static/9959590120103584457233/

知青误读知青？

去年三月，我在新浪博客看到“滴水湖畔”一组图文并茂的博文《回家的故事》，展示了七十年代末知青大返城中极为震撼人心的一幕——云南兵团农场的知青集体下跪请愿回家！为此，我在网易博客以《从集体下乡到集体下跪》为题，介绍和转发了相关的一系列照片。

有一位亲历其事的网友“马儿”有这样的留言——

您此篇文章中引用的图片中的第5、7、8三张图片是我们十四营当时开会的真实情况，那个跪在地下，双手举着请愿书的是某连队的文书，因为人长得比较瘦小，我们都叫他“小文书”，他为我们保存下了许多最珍贵的历史资料，在后来出版的《我们要回家》那本书中也有。他现在早已回到上海，在某中学任教。那位侧面对着大家去搀扶的是北京调查组的老干部，他真是个好人，我真心地祝愿他平安健康长寿。

这样的留言进一步加深了我对那些珍贵照片的印象。与此同时，我也注意到，诸多知青网友对当年的这一幕并不知情，看到那些照片甚为震惊。

网友“阿木林”说：太震撼了。我认为，反思上山下乡是整个民族的责任！

网友“凯凯119120”说：男儿膝下有黄金，悲壮。

网友“南郭先生”说：很悲壮的场景。

网友“酷苦兔”说：我见过上海人民广场“我们要饭吃”“我们要返城”“我们要工作”“……”的游行，请愿的实事。但是今天见到当年云南知青集体下跪请愿的相片，心灵再次受到震撼：我们这一代人实在悲哀……

网友“新生”说：男儿膝下有黄金，在不得已的时候，谁会跪下？很悲壮的场景。谢谢云南知青撕开了回城的帷幕。

网友“月光步甲”说：苦难历史，值得深思。

网友“蔚岚”说：《中国知青梦》（邓贤著）是纪实作品。上述照片中的部份及其真实情节在该书中有记述。中央作出终止知青运动的决定实属不易。要不是人亡政息，中国知青的命运还不知会如何！？

网友“月月”说：云南知青一事，我等小民何以知情，官方深恐事态扩大蔓延，也一直是秘而不宣。我本人也是在九十年代才得以知晓。

网友“兔子”说：震撼！苦难、压抑的年代，都是顺民啊。

网友“小草”说：往事再现，真实写照。

网友“快乐的老马”说：看到这些照片真的很震撼。由此可见，上山下乡的结束，是人心所向，是历史的必然。

网友“赤豆亲泥”说：知青先躯。

网友“忠蕙”说：第一次知道这么详细的信息。

网友“hailongwang”说：我是69年3月赴黑龙江插队，74年底因“特困”回沪的。78年知青大规模返城时虽也听说当时不少插友返城的不易，可这集体下跪的事还是第一次听说。震惊！！！

……

由此可见，许多知青和网友限于那个时代的信息闭塞，时隔三十多年后得知事实真相时，对知青集体下跪请愿都深感震惊，但是，他们也都能理解照片上那些场景的含义。

时间又流逝了一年多。最近，我在某知青网站上见到了一张熟悉的照片——

使我深为震惊的是，那张照片竟然被冠以“真情下乡为人民”！有一个跟帖甚至进一步说——宣誓：扎根农村干革命，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太感人了！见http://gongheguozhiqing.5d6d.com/thread-5558-1-1.html。

居然有这样的解读！如此“真情下乡”？如此“感人”场面？显而易见，这是一种难以置信、不可思议的误读！

在那个年代里，需要下跪宣誓上山下乡干革命？有谁经历过下跪宣誓接受再教育的？看看照片上知青的神态，谁能相信是在宣誓扎根农村？当年有许多唾手可得的“斗志昂扬、意气风发、走上山下乡革命道路”的摆拍照片里，有垂头丧气、双腿下跪的“斗志昂扬”吗？有低着头、苦着脸的“意气风发”吗？

我实在想象不出那个知青网站的网友怎么会如此解读老照片。如果把这样的解读留给我们的后代，当年曾经亲历其境的知青们真要欲哭无泪了。

如今，不乏“弘扬知青精神”“知青自己写知青史”之类的说辞，倘若基本的出发点都偏离了基本的事实真相，那么再高昂的重燃青春热情都会成为无知无聊之举，早晚要被扔进垃圾堆。

一代知青早已不青，如此误读实属无知。为了让后人了解和理解那段渐行渐远的历史，我再一次呼吁知青朋友，让我们留下真正有用的历史资料吧！

2011-08-06

尊重生命

我坦言，我不能接受一些知青网站的朋友“不同意红河谷的思想观点但是肯定他的精神”的笼统说法。我们当初帮助红河谷，今天怀念红河谷，并不需要用他的精神或者优点来做理由。红河谷是我们的同龄人，帮助他是在帮助一个生命，尊重他就是尊重所有的生命。而且我也并不想掩饰自己对境遇不太好的同龄人有一种聂赫留朵夫式的赎罪情结，红河谷为我提供了一个机会。

莎士比亚在《哈姆雷特》中有句亘古不朽的台词："活着，还是死去，这是个问题"。在这里他提出了若干条理由，说明为什么死亡对人类具有吸引力。他也提出了为什么死亡也许并不那么吸引人的一些理由。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更加原始的命题，即生命是可以而且只能由生命的载体-生命的拥有人自己而不是生命本体以外的其他人来进行处置的。这个命题尽管原始，但是人类直到法国大革命才开始意识到。这场革命所举起的自由、平等、博爱三面旗帜，奠定了西方国家现代文明的基础，并成为全人类奋斗的目标。

1948年12月10日，联合国大会通过并颁布《世界人权宣言》。第一条规定人人生而自由,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他们赋有理性和良心,并应以兄弟关系的精神相对待。第二条规定人人有资格享有本宣言所载的一切权利和自由,不分种族、肤色、性别、语言、宗教、政治或其他见解、国籍或社会出身、财产、出生或其他身分等任何区别。第三条规定人人有权享有生命、自由和人身安全。读着这些条款让我深深地感动。这些内容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所未予明文规定的，大概立法人认为这些应该是文中自有之义吧。是的，红河谷的政治见解和我有着泾渭之分，但是，他曾经是一个生命，他的生命权与我的完全平等，他的生命权应当受到尊重。

当年在北大法学院读研时，有一次法社会学的朱苏力教授在课堂上提问，要求从法理学的角度谈中国应不应该废除死刑。同学中好几位各部委的司局长，还有政法系统的资深人员，他们在发言中都认为中国必须保留死刑，否则不足以震慑犯罪，改善治安。老师说他们的发言角度是政治学或者社会学，而不是法理学。后来老师看着学生名册叫“人大毕业的XXX”发言，我只好站起来，边想边说。我说凭直觉我认为应该保留死刑。我的理由是中国有这么多人，好人都嫌多，再留着那些坏人作甚？但是如果讲法理学，那就先要看生命的法律本质。于是我说起了前面所提到的那个原始命题，最后得出了一个连我自己都感到惊异的结论：从法理学的角度讲，生命权应该是一种特殊的所有权。它只属于权利人自己所有，由权利人自己来处分。从这个意义上讲，死刑是不合“法”的，而安乐死则是合“法”的。

手边正好有一份资料，其中一组数字载明1966-1977年的城镇下乡知青总数是16,560,600人（源于国务院知青办和国务院安置办的历年原始档案文件），在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的城镇下乡知青中，红河谷所在的辽宁省比例最高（具体数字暂付阙如）；另一组数字是对1974-1979六年中全国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在落户地死亡人数的统计：死亡25,690人；其中非正常死亡15,899人；非正常死亡人数占死亡人数的61.9%。备注中说明非正常死亡人数，主要由自杀致死、在政治运动中被迫害致死、被刑事犯罪伤害致死、在救灾或减灾中因公牺牲或因工殉职、劳动事故伤害致死，以及在落户地发生的意外事故致死等原因构成。在死亡人数的地域统计中，人数最多的是云南省，其次是辽宁，再次是广东。但是云南的死亡人数中包括了逃缅后被“宣告死亡”的人数，所以在实际死亡的知青中，辽宁籍仍占首位。

在非正常死亡的数字中，有一位我的朋友，原上海向明中学的陆华。她和她的10位同学到黄山茶场插队，在一次山洪暴发的时候，为了抢救仓库里的存粮（一说是上海市革委会存在那里的人事档案副本），全部牺牲。那些年轻的生命就这样消失了。如此众多的莘莘学子正值求学的好年华被迫中断了学业，如此众多的年轻生命"非正常死亡"，这恰恰反映出上山下乡运动本身就是对人的生命权的践踏。

同绝大多数下乡知青的命运相比，红河谷算是幸运的。他于一九六八年九月下乡，未几当上了大队电工，后来又先后到公社和县广播站工作，一九七一年九月回城。他在他的“回忆录”里详细地记述了这些过程。他对“红卫兵运动”的感受是：“中国五千年的历史中，你能有机会高举"造反有理、革命无罪"的旗帜当上红卫兵，感到幸运吗？”他对上山下乡的评价是：“最有意义的是，党中央和毛主席把一千八百万老三届学生以"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为名，立即送到了农村。假如，中苏之间真的开战，把枪发给这些藏在深山老林中的热血沸腾的年轻人，发给这些无限忠于毛主席的红卫兵们，那么，他们必定是敢于冲锋陷阵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第二梯队。他们必定是敢于把青春献给党和人民的好儿男。他们必定会为保卫共和国而不惜牺牲自己年轻的生命。”写这些话的时候他一定忘记了知青们上山下乡的主要地点并不是中苏边境。“回忆录”里也有不那么慷慨激昂的地方：“七一年的夏天，解放军的一个通讯兵学校来法库县招收新兵。这是一个特种兵不是公开地大规模的征兵，军队的代表在县城里内查外调直到面对面的了解，相中我与法库县电厂的一个小伙子。当我们填完征兵登记表，准备穿上军装跟他们回部队的学校，学习通讯技术的时候，广播站的领导安排我到外地出差，当时真不想去可是没有办法，等我硬着头皮出差回来的时候，发现部队领兵的解放军干部已经走了。当时我那心情真是又急又恨，恨不得骂娘，真想立即卷起铺盖卷回三尖泡当我的知青去。后来冷静下来一想还是不能蛮干，这里再不好也比青年点强，这里再累也比青年点轻巧，有多少知青羡慕我的工作啊！……”红河谷到底是一个真实而具体的人。后来的史学家一定会感谢他的这句真话：一个把上山下乡当成是“反修防修的伟大战略部署”的人，同样不喜欢从事农业劳动。

红河谷对那些年的历史作了他自己的解读，他的解读会给后人带来误导，但是这不能怪他。他所经历的年代是

中国历史上最特殊的一个阶段，而文革和上山下乡应该说是特殊之尤。中国政治所特有的神秘色彩象一层烟雾挡在多数人的眼前，不仅给后人留下了许多无解之谜，就连我们这些亲历者也往往从不同的视角在揣测，然后争论不休。从另一个角度讲，时代的变迁一下子打碎了在过去被奉为神明的东西，而理论解释不了令人眩目的变迁，理论显得浅薄而苍白，于是有的人回过头去向“毛泽东思想”寻求答案。这也许就是“毛泽东热”重新泛起的原因？

悲也红河谷，喜也红河谷。悲的是他壮年早逝，留下了尚未成功立业的孩子和无助的妻子；喜的是他在思想上终于“从一而终”了，不必去经历我们这些人所经历过的那种铭心刻骨的涅磐般的痛楚。因为涅不涅磐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生命的权利。正是出于对一个生命的尊重，华知和老三届两个知青论坛上没有对红河谷发表的文章展开批评或者讨论，即使有个别批评的贴子也都被管理者及时删除了。对一个垂危的生命来说，没有什么比让他含着微笑离去更让人欣慰了。

（原文载于南加州中国知青协会第 6 期《知青》杂志）

作者简介：北京师大女附中67届初中生，下乡插队到内蒙古。现在北京从事法律服务工作。

宝嘉文集：http://www.hxzq.net/showcorpus.asp?id=27

华夏知青网不是赢利性的网站，所刊载作品只作网友交流之用
引用时请注明作者和出处，有版权问题请与版主联系
华夏知青网：http://www.hxzq.net/
华夏知青网络工作室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六十年之回顾与小结

我是幸运的。

我们这群兔子出生于新中国建立后的1951年。1981年，在三十岁的而立之年，我飞越太平洋从中国来到了美国；今年是2011年，我在河西学习、工作、生活了正好三十年了。真巧啊，居然是应了“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这句老话了。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难得，而又有意思的巧合，就凭这个难得劲儿，咱们也得写篇文章欢呼、跳跃、纪念一下啦。

本人出生成长在中国，与中国的老百姓共同起早贪黑摸爬滚打了三十年；然后漂洋过海，攻读博士学位教大学生娶个洋鬼子与美国人民沆瀣一气混做一团又是三十年。这三十年河东又三十年河西，六十年一个花甲五花八门的经历，使我积攒了大把大把的有关中国社会与美国社会之活生生第一手实践经历，伴随着而来的是大堆大堆新鲜的体会与感想。

注意了：这个先中国再美国的时间顺序非常重要，要是三十年美国，三十年中国，先美国再中国，那么随之而来的体会与感受将是面目全非，内容根本不是一回事了。

三十年河东，这是基础：中华文明传统的集体主义价值观念，加上解放全人类的共产主义人生信念的熏陶；经过了人定胜天的豪壮激动，最终建立起了天人合一的坦然世界观；奠定了传统中华文明注重全局与联系的整体辩证的认知思维方式。人生价值观念、世界观，以及认知思维方式，这些是决定人的一生行动活动之根本。三十年河西，对西式分解分析认知思维方式的深入学习与实践应用，在以个人利益个人欲望为中心的西方生活方式与美国文化之海洋中的浸泡与翻滚，大大地丰富、扩大、深化了我的人生经历；注重全局和整体的思维倾向统领下的我的脑袋，自动将中式整体辩证认知思维方式和西式分解分析认知思维方式，有机地融合结合在了一起，形成了我头脑中认知思维的新软件，颇为具有洞察与分析之能力。使我经过了四十岁时的不惑，在五十岁之前，将知天命与耳顺，与随心所欲不逾矩融合在了一起，比孔老夫子的“七十随心所欲不逾矩”楞是提前了二十多年（不愧是孟子之曾曾

曾孙吗）。

中为本，西为辅。本是说：世界观、人生价值观、主要的认知思维方式；辅是说：手段、方法、工具。当然，本与辅不是截然分离的，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相关联互相影响的一个有机整体。传统中华文化与西方文化之精华：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整体辩证思维，系统平衡，分解分析形式逻辑，严谨推理，理性合理，不守常规，胡思乱想，白天做梦，独立自信，坚韧顽强，乐观潇洒，中庸之道，大度宽容，幽默诙谐，进取积极，知足常乐，得过且过（看起来是一锅什锦大杂烩，实际是有条不紊的有机相结合：哪个好用，信手拈来就用哪个）。于是呢，那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日子过的当然是如鱼下水，如猴上树了，活得实在是自在得意的很。

先说河东的三十年。

1、金色的童年

什么是金色？我认为，金色就是无忧无虑；而不是要什么有什么的享受物质极大丰富，以及自我放纵的西式自由（市场经济赖以生存兴旺的现代自由）。以个人欲望为中心的西式自由带给人的不是轻松无忧，却是随之而来的更多的新的忧虑，现代自由的背后是巨大的精神和心理压力。成长于简单向上的毛泽东时代，我的童年是金色的。至今回想起童年来，涌入我脑海中的是捉蛐蛐、逮蜻蜓、粘知了、砍包、跳间、跳皮筋、剁刀、拔根、打雪仗；是蓝天白云、树林城墙、土堆土坑、野花野草、洋拉子吊死鬼；是欢叫乱跑、连蹦带跳。好一个天真活泼，无忧无虑。这真是今天生活在作业、考试的沉重压力之下，物质极大丰富要什么有什么的现代幸福儿童们无法比的。

2、绿色的青年时代（内蒙古大草原吗）

我从小喜欢天文。小学三年级时，我就非常自信地设计好了我的未来：高中毕业后进南京大学的天文系，学习天文，做一个天文学家。一进中学，我就参加了北京少年科技馆的天文小组。1966年六月，我们正上初中二年级，爆发了文化大革命。正是文化大革命打破了我的天文学家的梦想，我们在城里闹了两年革命，来到了内蒙古大草原上。

?天高地广，辽阔无边，太阳格外地明亮，月亮格外地遥远：人的心胸顿时开阔了起来，相比于大自然，个人是如此微不足道的渺小；

?人烟稀少，自然游牧，无自来水无电，住蒙古包，骑马赶牛车，原始简单艰苦，生产生活方式与现代化丝毫不沾边：造就了草原人心态性格的潇洒、大度、坚韧与乐观，大大培养了我们的适应能力和独立生存的能力；

?真诚直爽，淳朴豪放，天人合一，知足常乐：生活在集体经济中的大草原上的蒙古族牧民们，展示着人性中的善与真，永远地温暖着我们的心。

开始的时候，我在思想中抱怨文化大革命中断了我的正常学习，打翻了我信心十足的未来蓝图，使天文学家成了泡影。经过了这些年河西文化的熏陶和影响，我的思想认识产生了一个现代化的大飞跃：我衷心感谢文化大革命一下子打断了我终生书虫子的呆板人生道路，使我有机会走出三味书屋的象牙塔，跑进百草园的大自然，深入社会下层，感受五彩丰富的人生，绝对没有白活这一辈子。人生真是非常的短暂，如果一辈子就是一个书虫子书呆子，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是怎样的丰富有趣美好，那该是多么没有劲啊。

大草原给予了我简单、乐观、大度、真诚、坚韧的性格。大草原是我心中永远的乐园。

3、工农兵学员（承上启下的人生阶段，奠定了今后系统地学习和实践西式认知思维推理方式的基础）

1975年秋天，在内蒙古大草原上浪漫潇洒了七年后，我进入了北京师范大学数学系，成为了一名光荣的工农兵学员（当然很快就不光荣了，而且工农兵学员连大学学位都不算）。忽略基础书本知识掌握的背景，从工农兵中直接选拔大学生，是特殊历史时期的一项特殊社会实践。正是由于这个特殊性，工农兵学员的社会实践不具有普遍性，但是其重视学生们的社会实践和实际工作能力的特点，却是具有着人材培养的现代性的，非常值得借鉴。

大学三年的时间，我们下乡，下厂，去部队，与工农兵相结合，再加上小会大会的各种大批判运动，我们确实没有足够时间学习本来就缺乏的书本知识，只是重点补习了中学数学和物理，然后学习了微积分高等代数等基础的大学数学课程。三年工农兵学员的学习，使我从初中二年级水平，一跃高中毕了业（只是数学），又学习了一些大学一年级的数学课程，很是不错的了。更为重要的是，这三年的学习恢复巩固了我的学习习惯，为今后我在河西攻读数学博士学位奠定了必要的基础。1977年大学恢复了正规招生，一年后开始招收研究生。1978年工农兵学员毕业后，我留在系里做助教，同时跟着研究生们上课。从此开始了硬着头皮攻读天书，定是要在沙滩上造大楼的没有常规可循的Adventure。

非常有意思的是：我根本没有想到，这远离常规，与按部就班不沾边的三年工农兵学员的学习经历，居然与大部分美国大学生的学习经历颇有类似相同之处（美国的一般大学生兴趣广泛，与书虫子绝对无关，他们的基础书本知识水平并不比工农兵学员们高多少，而且大多数学生没有学习书本知识的兴趣），这使我超前地具有了现代教育实践的经历，破除了我头脑中传统精英教育的种种观念，使我很快地溶入了现代大众高等教育的新潮流，领略了现代高等教育的市场经济猫腻，坦然潇洒地糊弄对付着不可一世的现代教育官僚们，颇能理解我的美国学生，与他们一块在这挂着精英教育的羊头，炖着现代大众教育狗肉的大锅里，嚼着狗肉，一块潇洒地翻跟头拿大顶。

再说三十年的河西。

1、幸遇导师（上帝送我来做他的学生）：心有灵犀一点通

在师范大学数学系，我被分配在代数教研组。所以来到美国攻读研究生，系里希望我主攻与代表着代数组强项的环论群论相关的方向。但是这所大学数学系的代数方向只有范畴论，而且水平是世界领先的。别无出路，我也就上了这范畴论的贼船了，跟着范畴论世界级的领袖劳维尔教授做研究生。

劳维尔的知识面和学习兴趣非常广泛。他是一个非常少见的将唯物辩证法化作了自己活的灵魂的人。范畴论是从整体的角度研究不同数学结构的性质，以及不同数学结构之间的相互转换关系。范畴论中充满了辩证法的思想。不是从数学家们熟悉的逻辑推导和数学计算出发，而是通过洞察不同数学结构之间一般抽象的共性与不同，以及相互转化的条件，劳维尔提出了很多关于数学与物理的杰出命题，和极具启发性的想法；这些命题和想法后来都被其他数学家们经过严格推导证明了其正确性。在伦敦的一个关于数学基础的研讨会议上，一位教授感慨地对劳维尔说："你脑子里有一种特殊的软件，而我们没有。"这个软件就是唯物辩证法。

劳维尔相信人人平等，是坚定的共产主义者。特别，劳维尔相信人的能力是同样平等的，人人都是象他一样的天才，问题只是不良的环境限制了人的能力的发挥。劳维尔上大学时，基本不去课堂上课，而是自己在图书馆里学习，有了问题才去找教授讨论。他认为教授的工作就是为学生们创造良好的独立自学环境，发掘启发学生们提纲挈领地认识问题和分析理解问题的能力，以及相应的自学能力，和进一步提出问题进行科研的能力。劳维尔是系里最为liberal的教授。他的教学原则是撒手放羊，促使学生们以自学为主地独立思考学习。劳维尔的好朋友杉牛教授说："在让学生们下水之前，我要先教他们一些关于游泳的知识。但是Bill（劳维尔的名字）一上来就把学生们赶下水：'Learn it yourself！（自己去学）'"劳维尔固执地从心底里相信，人人都是象他一样的天才，只是还没有被发掘出来。只要环境合适，人的潜在的独立思考能力和自学能力都能被发掘出来。这正是劳维尔认为必须推翻资产阶级的的统治的原因之一。他一直在通过自己的教学实践，努力地创造营造一种促使启发学生们独立思考，激励学生们独立学习的环境，和指导人们如何提纲挈领地学习数学，应用数学知识和方法，去认识问题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

言传身教，耳濡目染，潜移默化。跟着劳维尔做学生，在学习具体数学知识的同时，我沐浴在真诚、平等、理性、理想的阳光之下，感受着他那极具魅力的整体辩证认知思维方式方法的强大吸引力，体会着心有灵犀一点通的心灵共振。能够碰上这样一位学业和人生的导师，实在是我一生中的特大幸事。我把功劳归于无上光荣的上帝。

2、如猴上树，进了世外桃源（出世做神仙）

先回答一个问题：取得博士学位后，我为什么没有回国？在回忆纪念师范大学数学系主任张禾瑞先生的文章里，我回答了这个问题。

"记得一次回国去看望张先生，我问他：'那时候你为什么要回国呢？'他用奇怪的眼光看着我：'为什么不回国呢？'（张先生早年留学德国，娶有一位德国夫人）

那么，我为什么没有回国呢？原因很简单：无论我如何玩命拼搏，实在是没有本事实现张先生和师大数学系对我的期望：成为一个方面的科研带头人，带起一支科研队伍。人贵有自知之明吗，既然不是一个有本事的萝卜，最好就不要占那个萝卜坑。好在中国的天才能人前赴后继大把大把的实在是多得很，这不，师大数学系的萝卜坑儿们很快就被有本事有能力的萝卜们占满了。昔日的数学系摇身一变，变成了今天的庞然大物数学研究院。张先生的在天之灵一定会是很满意的，天堂里回响起洪亮的笑声：‘哈-哈-哈’。”

美国东部的阿巴拉契山脉是一条东北-西南走向的大山脉，但是没有西部落基山脉那么高。山区没有大农业，所以没有黑人奴隶；由于交通不便，所以也没有制造工业。西弗吉尼亚州的煤矿就在阿巴拉契山脉的中部。山里有一些旅游的景点，有钱人避暑的别墅区都建在风景秀丽的旅游景点附近。山区人口稀少，远离现代繁华，相对贫穷落后，很是世外桃源。得益于一个偶然的机会，我来到阿巴拉契南部山区的一所学院教书。从此，远离了现代繁华与喧嚣，宁静淡泊，有了极为幸运的机会走进世外桃源，潇洒于书本与山野田园之间。

顺便说几句关于现代高等教育的话。教师曾经是相当真诚纯洁，充满理想与理性的很是吸引人的职业。但那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在席卷着全球的现代化市场经济大潮中，美国的高等教育当然全面地市场化了：学校成为了教育官僚们拼搏当胜者奋争更好生存的赢利企业，于是学校一切活动的目的和动力，就是想方设法争夺市场，绞尽脑汁不断扩大市场；再加上现代教育官僚们完全脱离实际，政治上绝对正确的，根本忽视学生们的实际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掌握的“人人都是爱因斯坦”教育方针指导下，层出不穷花样接连不断翻新的教学改革，教了二十多年的大学生，我最终认识到：现代市场经济中的教师工作就是一个挣钱吃饭的饭碗，不但与理想理性丝毫不沾边，还要说一套做另一套，糊弄奉承根本不懂教育的官僚，虚伪讨好根本没有心思学习的顾客（学生）。于是教书对于我来说，就是潇洒挣钱糊口的手段了。

3、狼狈为奸

进山后不久，中国的狼和美国的狈碰到了一起，不但气味相投，还是一见倾心呢，真是不容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吗，狼与狈是属于同一类楞是不入现代化的恐龙，化石，怪物，Odd Ball。

狼仍然信仰共产主义。虽然知道人类的共产主义社会是不可能的，但是共产党人追求的人人平等、社会公正、和谐友善、愉快无忧，尤其是对必然之认识的自由（人的内在自由，与孔夫子“随心所欲不逾矩”的自由观基本是一回事），却是仍然值得人类追求的。狈仍然是一个热爱大自然的理性环境保护主义者。他认为人权的最根本的内容，就是人人都能有机会生活在一片贴近大自然的土地上；现代人没有了这样的机会，这是因为地球上的人口太多了，不得不拥挤着住在一起。所以，环境保护的首要任务是计划生育，要大大减小地球上的人口密度，于是人人都能有自己的一片田园，贴近大自然，简单生活。

狈是一位极为理性，非要顺理思维，照理办事的人。但是呢，现代化社会推崇和追求的是金钱和利益，与理和理性丝毫无关（实用主义吗），所以狈自然是到处碰钉子了。这家伙的毛病就是，碰了钉子也不好好张望一下，总结经验，下次看见钉子就别往上碰了。结果是，下次见了同样的钉子，哥们还是睁眼闭眼地照样往上撞，同时大声抱怨着：这儿根本不应该有一个钉子吗。这狼呢，就比较聪明一些，碰到了钉子之后，总是要胡乱琢磨半天：是什么原因使得这儿有一个钉子，拔了行不行，可能不可能；若是不能拔的话，下次绕着走就是了。碰了一堆钉子之后，狼琢磨明白了：这与理性无关的现代化社会是时代的大潮，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趋向，还是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谁也阻挡不了的呢。

既然惹不起，还是想法找辙躲着走吧。好在是美国地方大，人口还不是那么多，狼和狈在山里买了一座四十年代盖的小房子和房子周围的一大片山林。满眼山石树林蓝天，充耳鸟语风鸣流水声，溶入了大自然。没有电视没有互联网，眼不见现代繁华，则心不烦现代人的自私贪婪无理。种菜种树种花修房子，爬山钻树林观看野花野生动物，读书喝茶，探讨琢磨上下纵横宇宙自然人类社会之进化规律。又加上一条自己跑来入伙，根本没有就业机会的牧羊犬，狼狈狗为奸，哥仨一块儿潇洒做恐龙。

回顾这三十年的河东，回味这三十年的河西，最后说说积这六十年的观察、感受和思考，我对人生的感想和对人类社会的感慨。

一个人很难活两个六十年。走过了人生之路的一大半后，我对人生的感想是：人的一生确实不容易，而且实在是非常的短暂，所谓人生苦短吗。所以呢，一个乐观向上的人生态度就是有必要的了，因为乐观向上可以使人活得坦然轻松一些。美国的明白说了：Enjoy life（享受生活的乐趣）。我很欣赏明远和尚提倡的三无的人生态度：无悔、无怨、无忧。

河东三十年，河西三十年。作为人类社会的一员，我对人类的最大感慨和感叹是：人类普遍的不能抑制和无法加以限制的不知何为满足的贪婪欲望。几千年来的人类社会，由于生产力水平的低下，贪婪的不知足只能是少数统治阶级上层有钱人所拥有的特权，与绝大多数为着基本生存的温饱而疲劳奔命的老百姓无关。存在决定意识是真理。当人类社会的生产力大发展大飞跃，进入了现代市场经济社会之后，发达国家的老百姓们率先贪婪不知足了起来。发达国家中的各种严重社会问题，以及人民老百姓普遍的老子天下第一的蛮横人生态度，正是源于此。非常有意思的是（幸运啊），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大飞跃，我们这代人亲眼目睹了，并且亲身经历着这不知满足的贪婪欲望，由小部分社会上层的特权，迅速地感染扩展到了中国社会的每一个角落，贪婪不知满足成为了，正在成为着，全民老百姓生命生存的根本动力，和中国社会前进的巨大推动力。

生存和种群繁衍，是动物种群发展进化的动力。人类是动物，所以生存和繁衍也是人类这个动物种群发展进化

的动力。但是呢，人有意识，能够思维，具有主观能动性，人类不同于其它动物的一个根本性特点是不知满足的贪婪。不知满足的贪婪是人类社会发展进化的巨大动力，正是这个人类独具的发展动力，使人类迅速占领了地球生物链的最上端。不知满足是人类社会前进发展的动力；不知满足同时也是人类社会不平等、不公正、嫉妒、虚伪、残酷、剥削、压榨、战争等各种丑陋现象的根源。（脱离了个人利益和欲望的理性思维，确实是人类的一个特点。但是呢，人类社会的历史和现实实践有力地证明了说明着：个体、局部的短期暂时的理性管理（例如，公司内部管理、社会主义社会的实践）是可能的，而人类社会整体的和长期的理性管理却是不可能的）

中国人的祖先们早就认识到了不知足对于人类社会的危害，所以传统的中华文明是知足的人类文明：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老百姓读书人知足常乐，向往太平，全都不求进取。几千年来改朝换代的战争也有，但是中国人小农经济的日子基本是过得悠哉悠哉的，直到十九世纪碰上了张牙舞爪咄咄逼人的西方人。

西方文明西方文化的最大特点就是以个人利益和个人欲望为中心的不知满足，于是西方人进取、进攻、扩张、侵略、占领、掠夺，自然界和其他人类文明都是西方文明进取掠夺，用以满足西方人各种欲望的使用利用对象；科学技术则是西方文明发明创造出来以达目的的有效工具和武器。地球上的人类社会发展到了现代，西方文明当然地占据了地球生物链最上端的统治控制地位，全球经济一体化、普世价值就是西方文明现代化了的掠夺和控制手段。现代化就是赢家胜者夺取获得一切的现代西方丛林化。

知足常乐，悠然自得，不求进取，使得近代的中国大大落后于西方。落后了就要挨打，被占领，被掠夺，被瓜分，被欺侮。这正是中国一百多年来的近代史和现代史。为了求生存，中国人被迫学习西方，学习积极进取进攻的精神和不满足的心态。七十年代末至今三十多年的大举向西方学习的改革开放相当成功，使中国的经济腾飞，造就了大批贪官知识精英暴发户有钱有势的社会上层，中国人民正在步入现代小康的新生活，中国成为了西方人不能轻视的正在崛起的西式世界强国。但是随之而来的是中国社会从上到下普遍的永远不知满足的狂热燥动，全民奋勇捞钱，屡禁不止的政府官员贪污腐化，严重的社会贫富两极分化，吸毒卖淫重返中国社会，暴力犯罪普遍，民心发散。西方国家的根本无法解决的各种严重现代社会问题，也成为了中国现代社会所面临着的严重社会问题了。

在幼儿园的时候，我们就知道《金鱼和渔夫的故事》（我记得是看幻灯）。一旦有了可能实现自己欲望的机会，那个贪婪的老太婆，从想要一个新的洗衣盆，一座新房子，到做女皇，当海上的女霸王，野心是越来越大，贪婪无止境。现代人类的不知满足的贪婪野心，与这个故事中的老太婆是何等的相象啊。

人类社会有光明的前途吗？我的看法是，没有。现代科学技术和普世价值，将人类贪婪野心的魔鬼放出了瓶子，收不回去了。

2011-4-20

我看知青情结

——兼论“青春无悔”

难以评估的评估

知识青年的返城风与文化大革命的结束是相交织的，可以说前者敲响了后者的丧钟，或者说后者又加速了前者的进程。总之，伴随着十年“文革”的破产，大部分知识青年重新回到了城市。一场浩大、劳而无功的社会迁徙运动终于停止了。

这场运动给社会和历史留下了无法统计也难以估量的后果。

在经济上，它一方面给社会造成了重大的损失，每个曾产生过知青的家庭都曾背上沉重的包袱，而国家则为每个知青付出路费、一年的伙食费、工具炊具费和建房费等许多无法收回的投资，这笔数字据说超过100亿。(1)另一方面，它的确缓解了那一时期的就业压力，至少将这一大批人的生计问题由全民所有制的财政支出中转到了集体所有制的名下，使已陷入窘境的经济机器还能够维持。同时，这批人在建设农村中毕竟以血汗创造了财富，尤其那些偏远落后的地区，各种机械的使用，技术的更新，科技的开发，均得益于上山下乡运动。

在政治上，它一方面在“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旗帜下，使相当一些知青受到各种政治运动的损害，另外不少人则在放任中虚度年华以致染上恶习，同时也增加了社会的不安定因素；另一方面，它以独特的逆境方式使这批人经受了实践的磨砺，加快了他们的社会化进程。

在文化上，它本身就是对文化的一种反动。它以片面强调实践知识的形式，否定了书本知识和抽象知识的意义。在摧残文化的前提下使这批人深受“读书无用论”之害，成为“被耽误的一代”。(2)另一方面，它又促进了城乡之间大规模的、广泛的文化交流，为广大农村举办了一次长时间的城市生活方式的展览会，提高了农村的文化水平，并刺激了农村青年们对现代文化和都市生活的向往。在某种意义上，它为而后农村的改革和发展做了一定的精神准备。

上山下乡运动造成了整个社会传续的十年断层。它表现在文化上、科技上，以及人材上的断层。断层的真正涵

义，在于一代人丧失了他们的青春。上山下乡这十年，在一般情况下这是人们提高文化水平、熟悉专业技术、工作小有成就的十年，而这代人却将这宝贵的时间消耗在重复简单的体力劳动和思想改造上。在一个平均文化水平极低的国度，这是严重的社会资源的浪费；对于这代人来说，则是青春和生命的耽误，使他们一定程度上丧失了日后在社会中竞争的潜在能力。

断层的涵义还在于，社会出现了错位。在一定发展时期，社会所能提供的空间位置是有限的。而上山下乡将社会对这些位置的有序继承变成无序，出现后代人超越前代人的越位继承。第三代人首先在升学上出现极大的困难，在恢复高考制度后，这代人曾在77、78、79三届大学生中占据优势(这里指的当然不只是老三届这个群体)，然而随着年龄的超标、家庭的拖累以及知识的落伍，他们的绝大多数只能是被拒在大学的门外。这代人受过正规大学教育的，包括那些重新回炉和自己摘掉帽子的工农兵学员，充其量不过百余万人，相对于上山下乡的2000万人实在少得可怜。当然不是说人材一定要通过大学才能培养出来，况且还有大批的各种函授、成人教育、自学高考、大专补习班等等。但无论如何，这是一个衡量的指数。在就业方面，待业是伴随他们返城的新名词，他们中的幸运者以不相称的年纪从学徒工、临时工做起，在专业技术上的熟练程度并不优于比他们年轻得多的后代人。而还有相当多的返城知青长期找不到正式工作。当改革更加深入一步的时候，这代人的年纪使他们在中国国营企业的体制改革中首当其冲，下岗这个新名词又责无旁贷地落到了这代人的肩上。

值得特别指出的是，上山下乡对这代人的自身成长过程也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

通过上山下乡的实践，他们的政治观念彻底改变。许多知识青年目睹了阶级斗争、实质是其扩大化的种种表现，非但没有得出它在社会生活中具有必然性的结论，反而感觉到其中具有大量的执行政策者的主观因素，往往成为整人的工具。于是，知识青年在上山下乡之后，头脑中原来绷得很紧的阶级斗争的弦松懈了，看问题的出发点也比较实际了，不再把任何事情都先上到阶级斗争的纲上去看了。通过“林彪事件”，更多地是从自身的社会落差和实践中，这代人体味到指导社会运转的思想体系的问题，而成为中国社会最早觉醒，并向四人帮发出呐喊的社会群体。由于这代人与改革的命运息息相关，他们实际是中国改革开放政策最积极的社会力量之一。

对旧体制和社会其他弊端的切身感受，又使他们为迎接伟大的改革事业做好了思想准备。

他们的觉醒还表现在他们从当年的个人迷信，从虚幻的集体主义中找回了自我。自我意识的回归是这代人进行历史思索的结果，也是他们极为痛苦的自我否定的结果。“为天地立心，为斯人立命，为去圣继绝学，为万世添太平”，固然体现了一种人生意义，但并非一般人能做到的。而且也不可排除另一种人生意义，生活并不是教条。即在与社会利益发展的同一方向上，最大限度去追求个人能力的发挥，去追求人生的丰富多彩和种种乐趣。同时他们也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明白了自己到底是谁！你只是你自己，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众多普通劳动者中的一员。

这代人在上山下乡的变异状态中，认识了真理，认识了社会，认识了人民。他们能够准确地把握“人

民”、“群众”这个概念的本质，从而逐渐植根于黑色的土地中。人民不尚空谈，人民真正需要的是生活的改善，社会的改革，需要的是脚踏实地。

另外，这代人在上山下乡过程中经受了许许多多过去未曾体验的艰苦，从生活上和劳动上受到磨砺。他们不仅成为自食其力的合格劳动者，而且培养了坚强的意志。

这样看，这代人失去的主要是和物质有关的，获得的几乎全部体现在精神上。在一个物欲横流的社会，这似乎有点滑稽。

青春无悔

“青春无悔”的提出，源于成都的知青搞的一次“青春无悔”的展览极其出版的图书。据其发起者之一的王晓梅说：“我觉得青春无悔的含义我是这样理解的：从大的方面来说，我是绝对不赞成上山下乡运动，像这样一场运动是对民族和国家的毁灭。而对我们自己来说呢，因为我们在这种环境中间，没有办法的时候，被迫走的一条路中间，不管在什么地方，在任何生活情况下，在艰难困苦之中，都能得到一种生活的体验，这个对我们来说是一种财富了。”（3）这一理解和立意应该说是对的，但是使用“青春无悔”一词为题，却是含混不清的概念或者说词不达意，从而引发了知青们、以至下一代参与的大规模争论。

笔者前些年参加过几次关于红卫兵、老三届和知识青年问题的座谈会或讨论会，其中有两次是在国内，有两次是在海外。涉及到怎样看待上山下乡和如何评价自身的这段经历上，每次会上，不同的与会者们无形中都出现了两种不同的看法，无一例外。这是一种很有意思的现象，可以大致把它们归类概括为认为“青春无悔”还是“青春有悔”的问题。这里做一简单归纳。

一部分人认为：在经历过那么一段令人不可忘怀的岁月后，今天回首往事，依然青春无悔。下面简称之为“无悔”，需要说明的是，即使都使用同一词汇，大家对无悔的理解也不完全相同。

无悔的涵义是什么？

有人说，上山下乡曾给知识青年造成了伤害，也带来了收获，有失有得，因此两相抵消，没有什么可后悔的；

有人认为，过去上山下乡可能带给我们个人一些伤痛，但时至今日已经没有留下什么心理上的伤痕，因为无伤可疗，也就没有悔恨了。

有人认为，“我并不认为自己不行，并不觉得我们那一代人就生不逢时，因为，人无法选择生活本身，但可以选择生活态度。我的青春诚然是在内蒙古的沙漠里度过的，但我年轻的心没有那一天不是认真的、诚实的，我没有

辜负自己的生命。”（4）

有人从理想追求的精神境界或历史使命的角度来谈无悔，一位作家这样说：“我就提出了这样一个观点，就是说一代知青下乡去追求人生价值，追求共产主义的理想是值得肯定的。每一代人都有每一代人的理想，不管他这个理想你后人看起来怎么样评价，但他完成了自己的使命，这是应该值得肯定的，我现在还是一直这样的想法。”

有人从人生经历的丰富多采并转化为财富的角度来谈无悔，譬如一位画家回答“客观不幸，主观无悔”时谈到：“主观是否无悔不可能只有一个答案，我可以谈一谈怎么判断你提出的那个‘客观’。现在一些回忆录总是在说‘被耽误的一代’和‘夭折的一代’，我很不赞成。从某种意义上，我们是最幸福的一代人，因为中国当代史以来，我们所经历过的很多，在人类历史上都算是大风大浪、是罕见的、荒诞的了，可能以后再不会有同样的事情发生了。从人生体验这个角度，这一切对于我们是大大的财富……”（5）

有人甚至从自己脱离了“很普通的老百姓”的角度认识问题：“‘文革’也好，上山下乡也好，都是千载难逢的机会，一种千载难逢的锻炼。如果要没有这种机会，可能我们就是很普通的老百姓，不要说做大事，连见大事也见不到。这种对政治眼光的开拓和对中国国情的切身体会，从这个角度上来讲，都是千载难逢的，实在是很幸运，应该说是一代幸运人。”　（6）

另一部分人则持不同的观点，他们认为，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民族灾难，上山下乡运动是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必须予以否定，这是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一部分。当然，在否定上山下乡运动的同时，并不否定这场运动的一些伴随物，它们对红卫兵这代人的成长具有一些正面的影响。但它只是一种坏事变好事，毕竟是从属的，而坏事变好事本身就首先明确了其性质是坏事。因此，我们对在上山下乡中那样地虚度青春当然是悔恨的。

一位学者指出：当年对于个体而言的“下乡”意义也正是整个上山下乡原初所宣传的意义——战天斗地、把自己锻炼成为革命接班人等。当整个上山下乡的意义被否定后，知青也不再从这个角度观照自己行动的意义了。……这样看来，悖论似乎不复存在：即整个上山下乡运动被否定，而知青却执着于“青春无悔”，这两者之间的张力仅仅存在于表面。知青的“无悔”已经是另外一种意涵。今天知青的述说，很明显是简单化的甚至于已忽略掉当年的意义，而去把持另外一套意义系统。事实上，这种行为对上山下乡运动的意义也是一种否定。（7）

严格地说，这位学者的定义是正确的。青春无悔是针对上山下乡而言的，但是多数人则转换为对自己的经历而言，这在逻辑上是一种偷换概念。

有悔的涵义又是什么呢？认识也不尽相同。

有人认为上山下乡是对文化的反动，是对知识的反动，是对一代人青春的扼杀，它本身就是一场罪恶；

有人认为上山下乡耽误了一代人的青春，至今还有着大量的后遗症，许多人受到在正常人生过程中不应有的伤害，有许多问题需要反思。反思就是对历史的悔悟。

有人从这代人对社会生产力的作用的角度来谈有悔。一位教授这样说："有悔无悔要以是否有益于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发展为衡量依据，在这个意义上，当别人突飞猛进地发展生产力，进入爆炸的知识领域，我们却在接受知识无用的再教育，去学习自秦汉以来几乎未加改进的农业生产技术。而且这不是体验生活，而是被要求扎根的十年呀！说得尖锐一点，这是反生产力方向的。即使在精神方面，除了极少数既得利益者，整个一代人在上山下乡过程中是受到摧残的。如果按照国际上的心理健康标准，这代人的多数在当年多少都会有点心理问题。如果还有人对这两方面的负面作用视而不见，仅仅对在摧残下获取的悟性、砥砺的性格而不悔，我就没有更多可说的了。"有人从这代人的整体和个体关系，体认历史的角度来谈有悔与无悔。美国著名学者汤本对笔者说："从整体看，这代人的青春应当有悔。在这场逆境中站起来的成材者毕竟是少数，而虚度年华的、因辍学导致今天丧失竞争能力的、遭到毁灭的是多数。而从体认历史必然的角度，这是已然发生而无可挽回的事情，它产生了经过熬炼的一代青年，又是无悔的。他们的经历都是难得的终身受用的财富。"再一种意见是，所谓悔与不悔，都是相对于自己的主观而言的，上山下乡对这代人大多数来说是一种没有选择的选择，也就没有悔与不悔的问题了。不过，这只是从个人的主观选择上看，而作为一代人十年之久的社会活动，毕竟还有一个反思与否的问题。

知青情结

这场争论的本质，除个别人外，双方并不在于一方对上山下乡充分肯定，另一方完全否定。而在于双方看问题的角度的差异。对于上山下乡的得与失，笔者认为，也许可以把它分成政治运动和实践锻炼两个层次来看待，这样会更贴近历史和人们的感受。

上山下乡作为一场政治运动是必须要否定的，可以说它基本上没有什么可取之处。它的性质是反动的，是在全球人类向国际化、工业化、都市化迅速发展中的一场反历史进化方向的社会大迁徙。它的目的是错误的，是在阶级斗争理论下的反修防修，是以城乡人口对流来消灭城乡差别，是以农民教育知识分子以培养接班人，是以行政手段的迁徙而不是以发展经济来消灭失业，这些目的性没有一条值得肯定。它的客观效果是灾难性的，使国家承受了一定的损失，更使广大人民承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人为造成了不必要的骨肉分离，耗损掉整整一代城市青年的青春。如果说它还有历史意义的话也是可怜的，如我们在社会发展史中所看到的，人类的文明发展和社会的传承进步，是必然要走一些弯路的。上山下乡这段弯路的最大社会功效，就是这代人成为了社会发展的活化石，这种化石效应就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仅仅在于它宣示在当代社会的条件下"此路不通"，从而杜绝了人类社会实验中的这条"理想之路"，足以警示后人不再犯同样的错误。对这一层面的认识上，应当说是罕有"青春无悔"的情结，万一今天还有这样的痴迷者，我们也只能无语了。

而作为这代人的上山下乡实践活动，它使知青们在一种特殊的变异状态下，或者说在人生逆境中走向了成熟，并塑造了这代青年一些特殊的品格。就是单单从其正面效应看，它并不足以改变这场运动破坏性的本质。道理在于，不能因为吃苦可以锻炼人们的坚毅性格，就去吃没有什么社会效益的苦，更不要说还强行要整整一代人去吃苦。

部分人的无悔情结是建立在对自己逝去青春的留恋上。他们对曾使自己激动不已的那种革命理想至上的社会氛围，对当年那种解放全人类的胸怀和历史使命感，对所经历的种种苦难和磨练，对自己曾做出的自我牺牲，表现出了一种难以斩断的留恋。总之，这可以说是一种自我感动的自恋情结。有人形象地比喻："我们的上一代可以拍胸脯自豪地说，老子扛过枪；我们这一代也可以拍胸脯自豪地说，老子下过乡。"这样的比拟实在不敢恭维，如果说扛枪的一代自豪，是因为他们在抗击法西斯和争取独立解放的战争中，于历史、于社会、于民族有功。而下乡的一代给社会带来了些什么呢？

多数人的无悔情结则建立在对自己曾经生活和成长的第二故乡的留恋上。他们对那段与父老乡亲朝夕相处的淳朴情感，对曾经付出青春和汗水的土地，对自己在那段经历中养成的一些受用终身的良好品格，以及由虚妄的责任感被扬弃而转化出的、对那块土地和父老乡亲的承诺，所表现出的深切留恋。或许可以把它称之为乡土情结。总之，这是人们心灵深处善良本性的表露和理想主义在这代人血脉中的升华。即使在海外，还经常见到一些老插们在谈到父老乡亲的苦难时而热泪盈眶的场景。而许多老插们今天带着子女回到当年上山下乡的地方，有些人还为当地捐献投资帮助发展教育和经济，都是这种知青情结的使然。这是一种正常和有价值的人生情结，而由于第三代人的特殊发展条件，这种情结成为他们主要的代意识之一。

笔者认为，众多知青的"青春无悔"，其实是自恋和乡土两种情结交织相伴。这两种情结中，前者是不健康的，后者是健康的。如果一个人的"青春无悔"是建立在历史无法改变而具有浓厚的乡土情结之上，无可厚非。但是作为更多的"青春无悔"者，具体到一个人身上，可能往往二者是融合在一起，难以区分的。这样的"青春无悔"还不能称为"自为"，严格意义上，这代人的知青情结中，其自恋情结所占的成份越多，说明其反思的程度越浅。而且，很多人的这段自恋情结还是与其红卫兵的经历紧密联系的，是对当年那种理想主义的感动和眷恋不舍。这是一种更不健康的自恋情结。本书开篇曾引用了金观涛的一段名言："我们是一些残存的，然而却是不死的理想主义者"。笔者将它改为"我们是一群残存的、却是不死的，而且是失去了"理想"的理想主义者。"这意味着如果不能对当年理想主义的内核进行扬弃，不能对那个时代的自我进行痛苦的否定之否定，也就无法重建适应于今日社会的新的自我。受"文革"浩劫之害最深的第三代，如果自己还没活明白，何谈国家和民族的反思。

另外，如果把吃苦作为骄傲的资本，而不是以社会效果衡量功过，就会产生不健康的情绪和不利于社会进步的标准。"吃苦必须有收益，牺牲一定有价值"，王小波的这两句话是正确的衡量标准，否则不仅不能作为拍胸脯的

本钱，反而是负面的作用了。作为已经跨入知天命和耳顺之年的一代人，道理应当是不言自明的。

与此相关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人们对上述问题的种种不同评价，特别在有悔和无悔认识上的分歧，不仅反映了人们认识水平的差异，很大程度上它取决于人们在今天社会中所得到的地位和利益上的差异。

可以说，上山下乡对这代人的不同群体具有不同的影响。

例如以行业论，今天从事于自然科学工作的老插们，几乎没有人不扼腕叹息那段光阴耽误了自己出成果的机会，相对于下一代人，他们几乎不存在什么在知识积累和专业经验方面的优势，而知识结构、年龄、精力等等使他们已经失去了夺取诺贝尔桂冠的时间。但对于从事人文社会科学工作或走上仕途的人来说，这段经历却使他们获益匪浅，为他们今天的工作奠定了一个坚实的社会实践的基础，对国情的洞悉和丰富的阅历就成为他们相对于下一代的优势。恰逢中国正在处于一个向现代化转折的历史时期，对于前所未有的摸着石头过河，他们的经验是如此地游刃有余，而他们在重新找回自我的过程中打开的眼界、创新的精神又如此地为社会所需要。对于从事艺术工作的人们，那么这段经历更可贵了。无论是早期的朦胧派诗人，伤痕文学或知青文学的作家，电影界的第某代导演，画坛的某某流派等，其多数都是从他们的知青生活开始其艺术生涯的，甚至可以说，他们若缺乏这样的磨难和体验就成为不了艺术家。但是像上面引述某作家、画家和非“普通老百姓”的那几段话，如果作为自己或个人的一点感触也许还能成立，但是放之四海，称“我们”是“最幸福的一代人”、“应该说是一代幸运人”则会谬误泛滥。

这里涉及一个原则，对于一个有能力把昔日的苦难变成今日财富的人，他有理由认为自己的青春无悔。他的主观感受可以通过那些大风大浪、痛苦、荒诞的经历得到升华，以丰富人生。但是，对于这代人当中绝大多数凭体力讨生活的老插们，这段经历除了成为茶余饭后的谈资，在他们与其他人的竞争中却是那么的苍白无力，甚至起到的是负作用。如果他们的人生意义和需求，都已经远超出了解决生存和温饱的层次，他们就会主要从追求自身经历和体验的丰富多彩等精神层面去检讨人生了。因此，那些有本事把灾难变为享受的人们，那些专注于精神享受的人们，切忌去为那些缺乏这种能力的大多数说出“青春无悔”！因为对于芸芸众生而言，最重要的是物质生活的水准，灾难只能就是灾难，它无法转化。

另外，人们今天的经济条件也决定着人们对此问题的态度。

比如说，现在生活条件、经济状况较好的人们，大多不会再计较那段经历蒙受的损失，而容易用宽容的眼光浏览过去。但对于一些至今尚未脱贫的人们，因为工龄或本单位工龄的限制，与那些比自己几乎小一轮的弟妹们拿着相差无几的工资，不能分到按情理来说应当享受的住房，面对着下一代青年纷纷进入大学校门而自己却只能在下班后攻读着各种文凭或补习班，或者完全与现今的各种文凭无缘，他们回首上山下乡的往事时，又怎能不把现状中的这些叹息归咎于斯呢？至于那些在这一过程中遭受离异之苦、伤残之痛、变态婚姻的折磨，以及因此受限终身失去

遇到知音机会的男女们，上山下乡简直是一场噩梦。

伴随着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上山下乡的政治运动无疑是要被彻底否定的。但它作为第三代的一次整体实践活动，毕竟给这个社会、给他们自身留下了些东西，其褒贬毁誉自然应当是历史学家的事情。不过有一点是清楚的，即这些不同认识注定要通过这代人强烈地表现出来，不管它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是符合于时代发展潮流的抑或不利于社会进步的，因为它留给这代人的痕迹太深了。

大约是1995年夏天，笔者曾经应邀参加一个由《光明日报》和《北京青年报》举办的关于老三届的座谈会，恰好与已故作家王小波同席。英年早逝的王小波是一位很有潜力成为文豪级的小说家和杂文家，当然也是一位第三代人，有幸还是比笔者晚一届的校友。因为对他不熟悉，也许是他的口头表达远逊于他的笔头，总之他在那次会上的发言并没有引起笔者过多的注意。而开始熟悉他，是他故去后出版的系列作品，特别是其颇有思想深度的杂文。其中就有几篇论及了这里谈论的主题——青春无悔还是有悔的问题，这里摘引几段，也表示对他的一点追思。

王小波的文章指出：

“上山下乡是件大坏事，对我们全体老三届来说，它还是一场飞来的横祸。当然，有个别人可能会从横祸中得益，举例来说，这种特殊的经历可能会有益于写作，但整个事件的性质却不可因此混淆。我们知道，有些盲人眼睛并没有坏，是脑子里的病，假如脑袋受到重击就可能复明。假设有这样一位盲人扶杖爬上楼梯，有个不良少年为了满足自己无聊的幽默感，把他一脚踢了下去，这位盲人因此复了明，但盲人滚下楼梯依然是件惨痛的事。尤其是踢盲人下楼者当然是个下流胚子，绝不能因为该盲人复明就被看成是好人。……那种坏事可以变好事，好事也可以变坏事的说法，它来源于伟人，在伟大的头脑里是好的，但到了寻常人的头脑里就不起好作用，又是弄得人好赖不知，香臭不知。”（8）

……很多中年人因为“文革”中上山下乡虚耗了青春，这本是种巨大的痛苦；但他们却觉得很幸福，还说：“青春无悔”。

我认为七十年代是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这个看法和一些同龄人是一样的。七十年代的青年和现在的青年很不一样，更热情、更单纯、更守纪律、对生活的要求更低，而且更加倒霉。成为这些人中的一员，是一种极难得的际遇，这些感受和别人是一样的。有些人认为这种经历是一种崇高的感受，我就断然反对，而且认为这种想法是病态的。让我们像奥威尔一样，想想什么是一加一等于二，七十年代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是个极痛苦的年代。很多年轻人做出了巨大的自我牺牲，而且这种牺牲毫无价值。想清楚了这些事，我们再来谈谈崇高的问题。就七十年代这个例子来说，我认为崇高有两种：一种是当时的崇高，领导上号召我们到农村去吃苦，说这是一种光荣。还有一种崇高是现在的崇高，忍受了这些痛苦、做出了自我牺牲之后，我们自己觉得这是崇高的。我觉得这后一种崇高比较容易讲清楚。弗洛伊德对受虐狂有如下的解释：假如人生活在一种无力改变的痛苦之中，就会转而爱上这种痛

苦，把它视为一种快乐，以便自己好过一些。对这个道理稍加推广，就会想到：人是一种会自己骗自己的动物。我们吃了很多无益的苦，虚掷了不少年华，所以有人就想说，这种经历是崇高的。这种想法可以使他自己好过一些，所以它有些好作用。很不幸的是它还有些坏作用：有些人就据此认为，人必须吃一些无益的苦、虚掷一些年华，用这种方法来达到崇高。这种想法不仅有害，而且是有病。（9）

王小波的观点或许可以这样归纳一下：一、要彻底否定上山下乡，反对青春无悔的提法；二、这代知青从上山下乡的特殊经历获取的收益，是从属的，次要的，不能改变整个事件的性质；三、把吃了很多无益的苦，虚掷了不少年华当成崇高的感受，是一种自欺欺人的表现。希望没有理解错他的意思。

另一位同代人这样看：对于“青春无悔”我有些格格不入，同时又感到它是值得理解的。这可能是一种自然流露出来的“找齐”心理：像老红军回忆长征，老八路回忆抗日战争，老志愿军回想抗美援朝。可是我们的青春却没有办法和他们任何一代人“找齐”，我们只有上山下乡。找的意义，实际是更大的失落，是无情地显示了自己的“老”和“过气”，所以这个模式里隐藏了一个悖论。和老红军们不一样，我们的价值在于是否对环境进行了抗争？最有价值的青春应当是这样的：别人和环境一样，你不一样；同样的环境，会出不同样的人。如果你成功了，不要感谢苦难，而要感谢你自己以及曾经帮助你战胜逆境的人，悔与不悔的分界线在于你当时有没有顽强地抗争愚昧与沉沦？你今天是不是清醒地确定了自我认识与外界评价的关系？（10）

笔者以为，青春有悔还是青春无悔，归根结底是一个自我反思的命题，而且是一个概念并不明晰的命题，在这个问题上过多的争议并没有实质性的意义。问题的实质并不在于有悔还是无悔，而在于是否做到了无愧。

注释：

（1）顾洪章主编：《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第244页，人民日报出版社，2009年。说句题外话，这笔钱账是算在知青身上，但钱绝不是都花在知青身上的，类似于历来统计中的扶贫款。

（2）据统计，1965年全国在校各类学生13125万人，由于"文革"全部停课失学。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实录：文献与研究》，第5卷，第276-279页，吉林人民出版社，1994年。

（3）晓剑、郭小东：《老三届——与共和国同行》，第43页，中国文联出版社，1999。

（4）晓剑、郭小东：《老三届——与共和国同行》，第51页，中国文联出版社，1999。

（5）钟岩：《中国的新三级学人》，第234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

（6）晓剑、郭小东：《老三届——与共和国同行》，第39页，中国文联出版社，1999。

（7）刘亚秋："青春无悔--一个社会记忆的建构过程"。

（8）王小波："我看老三届"，《王小波文存》，第326-327页，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

（9）王小波："人性的逆转"，同上，第295-296页。

（10）钟岩：《中国新三级学人》，第157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

（本文是作者《心路——透视共和国同龄人》一书的其中一节，发表于此，先行奉献给老插们。）

米鹤都文集：http://www.hxzq.net/showcorpus.asp?id=152

华夏知青网不是赢利性的网站，所刊载作品只作网友交流之用
引用时请注明作者和出处，有版权问题请与版主联系
华夏知青网：http://www.hxzq.net/
华夏知青网络工作室

"老三届"是新中国历史上最具传奇的一代

历史的长河容易淹没人们的记忆，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老三届却以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的气势，为历史留下可供评说，且有自己丰富传奇的独有经历。

老三届是指中国文化大革命爆发时，在校的1966级、1967级、1968级三届初、高中学生。老三届大都出生在共和国创立前后，他们的成长经历了反右、大跃进、庐山会议、三年自然灾害、中苏论战和文化大革命。这是共和国历史上发展与挫折并存，光明与黑暗并存，进步与专制并存的特殊时期。老三届的青少年阶段处在中国社会矛盾突出，党内斗争异常的历史阶段，也是新中国二十世纪罕见的阶级斗争暴风骤雨年代。

我们这些被人们称之为中国老三届的一代人，有现代生活中大起大落，独一无二的人生经历。我们出生在红色人民共和国初创的年代；中国大跃进的浪潮席卷着我们不懂事的童年；三年自然灾害，天灾人祸，忍饥挨饿的滋味对后人来讲似乎是天方夜谭；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把一代幼稚的孩子拉上了与政治的不解之缘；震撼世界的中国文化大革命，将我们这些中学生卷入了历史的狂澜；首都中学红卫兵风起云涌的历史留下可悲的忠诚和被愚弄的光环。1968年前后，一千七百万知青的上山下乡，书写着老三届和他们的弟妹们知青岁月的青春荒原。

老三届在历史的风浪中磨练成熟，特别是经历文化大革命巨变和苦难漫长的"知青上山下乡"，在命运的抗争中，在生活的风风雨雨中，许多人成为了社会中的中坚，绝大多数人在平凡的岗位上以他们特有的责任感支撑起共和国的蓝天。在中国结束文革动乱浩劫的抗争中，在举世瞩目的中国三十年改革开放的伟大巨变中，老三届这一代人为自己的祖国和民族做出过历史性的积极贡献。

老三届的经历连接着中国十年文化大革命和中国三十年改革开放。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做为老三届人，我是他们中间一员，我对老三届充满感情，老夫聊发少年狂，我不妨也谈谈我对老三届的评论和随感。

一、英雄主义的情怀

老三届大都是新中国创立后第一代儿女，他们诞生在共和国的礼炮声中，成长过程中大都受到英雄主义的熏陶。教科书和接触的文艺作品中也多是英雄主义的题材。董存瑞、赵一曼、江姐、欧阳海是他们学习的楷模。音乐

舞蹈史诗东方红、长征组歌、黄河大合唱是他们生命交响曲。《南征北战》、《渡江侦察记》、《英雄儿女》、《铁道游击队》这些电影中的英雄成了他们理想的追求。英雄主义的激情既造就了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盲从冲动，也成就了他们负有国家责任感的牺牲精神。由此出发就不难理解，上海知青金训华大河中抢捞木材牺牲，天津知青张勇为救落水羊群而献身，内蒙古花季年华女知青们为救一场无碣大局的荒火血染黄沙，从珍宝岛中苏之战到中越自卫反击战，处处可见老三届的军人和知青英勇杀敌，为国捐躯。英雄主义情怀是老三届的一大特征。

二、跌宕起伏的人生

和平年代何曾有过那一代人有老三届这种大起大落的人生。1966年8月18日，多少穿着父辈军装的中学生在天安门城楼上，他们带着红卫兵袖章，亲密簇拥在共和国开国领袖们的身旁，欢呼雀跃指点江山，挥斥方遒，为文革鸣锣开道。但是他们何曾想到，他们中大多数人的父母也随后成为文革迫害的对象。五个月后，他们中的联动成员悲壮的在北京西直门古城楼赫然贴出大标语，"中央文革将我们逼上梁山，我们不得不反"。一夜间根正苗红被中央文革称之为"小太阳"的老红卫兵中的骨干成为了阶下囚。

公安部门前两派中学生剑拔弩张的抗争，长安街上数以千计穿着各式军装男女红卫兵的自行车队呼啸而过，北京展览馆两派中学生激烈辩论的场面愈演愈烈，"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竟是十几岁的孩子们争论的焦点。1967年取而代之的造反派红卫兵，他们反血统论要求生存平等，他们也是血气方刚的中学生，为了反抗昔日同学压迫揭竿而起。其代表人物成为国家领导者们在人民大会堂经常召见的座上宾，纵论国事导演文革，他们中的一些人也很快如老红卫兵一样为文革助纣为虐。而一年之后伴随着工宣队、军宣队开进清华大学，从大学的五大领袖到中学造反派头目，霎间成为追捕"五一六"分子的对象。曾经少年壮志、自信满满的老三届，从天上回到人间，顷刻间成为被逐出城市上山下乡知青的主力。

三、苦难悲壮的经历

多数老三届都经历过苦难，三年自然灾害时忍饥挨饿是多数人的记忆。文化大革命风暴无情的冲毁了老三届求学的校园。除少数幸运者能去当兵或进工矿外，多数人都被卷进上山下乡的洪流。在遥远的边疆、在贫困的山村、在艰苦的农场、在荒凉的草原、在许多缺少现代文明基本生存条件的地方。一千七百万知青，包括老三届和他们之后的多届毕业生，许多人只能勉强算小学毕业，将青春永远留在那里。在生存权利无法选择的年代，许多人面临着不仅仅是劳作和生活的艰辛，他们更多背负着父辈们在政治斗争中的冤屈，被作为政治异类变相劳改，离乡背井的痛苦和返城的艰辛是后人难以想象的。著名知青作家肖复兴所著《绝唱老三届》中说，1987年秋统计表明，到北大荒知青有40万，陆续返城的36万，还有3. 7万星星点点撒落在北大荒辽阔的黑土地。这个数字大而化之，在全国范

围就更可想而知了。新中国建国后有那一代人经受过这么多苦难，除了老三届和有过知青经历的人们外，恐怕是少之甚少。

四、文革动乱的责任

老三届是文化大革命时期红卫兵的主力人群。1966年5月29日，清华大学附中部分学生在圆明园成立了红卫兵，在伟大领袖和中央文革支持下，以干部子弟为核心的红卫兵运动席卷全国。造反有理，革命无罪成为冲击党政机关，揪斗所谓走资派的上方宝剑。国人中所谓的地富反坏右和广大知识分子成为革命对象，为创建新中国建立过功勋的各级干部也大都成为这场革命的对象。善良的中国人被打成牛鬼蛇神，许多人含冤而死。而除了少数没有人性的肇事者良心该受到拷问外，更多的责任不该归咎当时只是十几岁孩子的红卫兵，这是国家制度和时任领导者该承担的历史责任。我欣赏我的同龄人中有人反思文革时，能承担责任，勇于向历史道歉。我反感那些至今还用文革思维，文革语言，自持一贯正确，贬低别人，抬高自己的人们。

文革的发动者和领导者在不同历史阶段，利用不同学生组织，推进他们的政治目标。按照他们政治目标去做的，他们称之为革命组织，不按照他们政治目标去做的，他们称之为反革命组织，马上动用军队、警察、监狱、国家专制机器进行镇压。文化大革命是领袖左右群众运动，还是群众运动绑架了领袖，经历者都该清楚，文革中的群众运动的挑起都是领导者所为。文革中的群众组织，老红卫兵也好，造反派也好，不过都是文革领导者手中的工具。因此，将文化大革命的罪责加在当时还是中学生的老三届身上是不公平的。当然少数"八旗子弟"凶残成性，丧失人格的法西斯行为也为世人唾弃，一些打手后来暴死他乡或精神分裂，也应该是一种报应。

五、先天不足的缺失

老三届和地球上任何一代人一样，都有这一代人的优点，也有他们的缺失和历史局限。他们中即会有社会的精英，也会有社会的败类。我们对老三届这个集合概念评说，老三届成长在新中国初创的年代，那是一个政治运动频繁，阶级斗争风声鹤唳，空想社会主义和极左思潮泛滥的年代。而这种政治环境下成长起来的人，人生道路和心理历程都会有这段历史造成的烙印。文化大革命造成正值中学生的老三届和接踵而来的多届学生失学，使他们中很多人丧失了系统学习文化知识的机会。加之国家政治路线走偏，政治教育另类，封建帝王思想回潮，都对老三届中的许多人产生了很大影响。造成相当多的一些人知识断层，乃至影响到道德修养、思维方式、行为准则和文明传承。在虔诚的个人崇拜和现代迷信破灭后，增加了几分失落和彷徨。但这种先天不足的缺失，有些人通过后来勤奋加以补救，而有些人却带着这种缺失在社会上碰壁抱憾终生。文化大革命影响着几代人，中华民族的理想情操，文明水准重塑仍需艰巨的拨乱反正。

六、浴火重生的机遇

对于老三届来说，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国许多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使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得以突出重围、浴火重生。首先是国家领导者之间矛盾再次白炽热化，1971年9月13日，林彪一家仓皇出逃，在蒙古境内的温都尔汗，三叉戟256号专机爆炸，机毁人亡。这一事件惊醒了狂热投入文化大革命人们的思维，特别是在上山下乡中的老三届和广大知青，宣布中国现代迷信神话的破产。其二是1976年清明首都百万群众在北京天门广场纪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老三届又成了积极参与者，这场运动本身就是一次思想解放。同年十月"四人帮"下台，文化大革命结束，1977年、1978年大批知青落实政策返城。其间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历史性改变，为建国后的各种冤假错案平反，废除阶级出身考量，恢复平等高考。为多数已近而立之年的老三届的人生带来了伟大的转折，许多人抓住了这些机会，勤奋学习努力，最终成为国家的有用之才。试想文化大革命再耗几年，试想我们再不纠正阶级斗争年月的错误，包括老三届在内的整个国家民族恐怕就会被带到万劫难复的深渊。

七、千差万别的道路

老三届是一个集合概念，应该说经历文化大革命、经历上山下乡知青命运那个年代的同龄人，都应该是一代人。他们有共同的经历和共同的苦难。但人生道路差别却很大的。有道是往来千里路常在，聚散十年人不同。地里的庄稼、山上的树林，也会在相同的气候、土壤、水分条件下表现出成长的差异。人也是这样，不要说老三届成长过程有很大差异，就是一个班同学，几十年后也会千差万别。但就多数人而言，包括老三届在内的中国人多数还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受益者。老三届中的多数人也都是中国三十年改革开放的积极推动者。老三届大都进入退休或将要退休年龄，在全国各大中城市众多知青网站、知青合唱团、公园社区文体活动中都能看到他们的身影。许多不同经历，不同工作岗位，不同社会地位，却有着老三届或知青共同的经历者，又由于青少年时代相同命运，退休后走到了一，这是一个令人称道的庞大社会群体。中国现实生活中还存在许多问题和矛盾，如吏治腐败的蔓延，施政成本居高不下，社会财富分配不公，环境矛盾突出，道德底线失守等社会问题日趋显现。老三届、特别有知青经历的还有不少人工作在各级领导岗位上，他们由于经历过新中国许多重大历史进程，理应运用历史正反两方面教训，努力推进社会改革、社会进步、社会民主。

八、岁月如歌的自信

我于1977年7月结束了长达九年的知青生涯从东北返回北京，同年12月进入新组建的北京羊绒衫厂，上千人的企业中许多科室骨干、生产一线的工人都是老三届。我1981年至1990年在团中央机关工作，当年二百多机关干部

中，现有五人在政治局，近四十人在省部级岗位，他们中很多人也都是老三届，许多人也都有上山下乡的知青经历。我也曾从1990年至2003年在中央国企招商局集团旗下公司工作过13年，也见识机遇有时比能力更重要。我更喜欢那些不怨天尤天的人，随遇而安，顺其自然。人生的道路千差万别，有的人有能力、又有机遇，还要有舞台，就脱颖而出，有的人平凡，却快乐知足，也生活得无忧无虑。此外，现代社会成功与否，不应该与封建社会官本位并论。老三届在中国现代生活的各界则都有成绩斐然的代表人物。知青作家史铁生大半生与病魔搏斗，他的人品、他的成就告诉我们，人生的价值如何评估。中国的老三届成为一个跨越国界和时空的话题。成功人士也好，平民百姓也罢，我们经历过悲壮，我们见识过辉煌。我的老三届的朋友们只要自己觉得快乐，一切就都好。

在老三届中的大部分人将退出工作岗位，有关老三届、有关文革、有关红卫兵运动、有关知青、有关上山下乡的话题多了起来。怀旧颂扬也好，反思批判也好，既然是一段历史，谁都有评判的话语权利。但愿我们能将真实的历史告诉后人。老三届就是老三届，老三届及所有有上山下乡知青经历的人们经历丰富，颇具传奇，承载一代人的求索。毕竟是"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2011年春节我填了首散曲赠友人："人生何事辛苦，常被虚名误。壮岁踏遍神州路。昔日朋辈居庙堂，忙碌，江山仕途，中兴担荣辱，烽火烟花，家国如雾。悠闲出江湖，草原晨曲赋，豪气仍当年，兴安岭曾住。九十九顶毡房欢聚，马头琴，长调内蒙古。祝酒歌，佳人舞，春风自有归处。"我曾经回首过我的前半生，北大荒爬满虱子的炕席我们滚过，中南海、人民大会堂的红地毯我们走过。从社会最底层到中央机关，从中央机关到中央国有企业，从国有企业到民营企业，人生的酸甜苦辣，功名利禄，是非荣辱，悟来悟去还是觉得宋词里说得好："众里寻她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2011年4月15日于北京

林小仲文集：http://www.hxzq.net/showcorpus.asp?id=63

华夏知青网不是赢利性的网站，所刊载作品只作网友交流之用
引用时请注明作者和出处，有版权问题请与版主联系
华夏知青网：http://www.hxzq.net/
华夏知青网络工作室

下乡留给我的体悟

轻

何谓“无”？我不懂佛，不懂禅，没法从那样的深度和境界去理解。但对“轻”我倒略有体会——来自一段极其难得的经历。

那是七十年代初的一个夏天，我刚二十岁出头，在中国东北呼伦贝尔大草原上牧羊。别以为是高级度假中的探奇揽胜；说句不好听的话，那是挺“低级”辛苦的干活儿：脸晒得黝黑，身流着臭汗，天天从日出到日落赶着千多只羊出去吃草，还有不小心从马背上摔下的时候……

在一起的，还有两位老大爷。一位晚上守着羊群，另一位包了其他所有劳动和生活的后勤。一个小小的蒙古包，就是我们三个人的家。

别以为是今天草原民俗风情游为您专门准备的豪华住宿蒙古包，有什么太阳能淋浴器、卫星接收器等等。三十多年前，恐怕就如三百年前，连食水都要套牛车去远处的河里拉来，沉淀大半天才由浊变“清”；“电”嘛，就只待雷公发火才闪见两三道了。用火哪有什么煤气天然气，晒干的马粪牛粪羊粪用火柴加几滴煤油点吧。

游牧，就是说每两三个星期得把蒙古包搬到一块新的草场去。“家”里的东西，当然是简到不能再简，少到不能再少了。记得好像是一人只有一个碗，吃饭，喝汤，饮水（茶，奶）都是它。衣服每人好像也只有刚刚够穿够换的那么几件；每件是穿来穿去，真是到不行了才换一次。（我当然不是在提倡这种不卫生的习惯。）

总之，当时的劳动和生存要求轻装上阵。劳动需要的工具一件不能少，也只能有一件；生存无需的物质半件不可多，还宁可缺半件。精神上可拥有的却是无穷的：大自然的赐予，每个日出日落，每夜星空，每阵风，每片云，每只羔羊，每朵野花，更有那纯朴的人情。

七十年代中期我回到了天津，一场大地震毁掉了家里不少的东西。八十年代我在美国，当过好一阵近乎流浪汉的穷学生。都是靠草原上“轻”的经历和体会，从容（甚至愉快）地度过了。

眼前的经济不景气，希望大家也有“轻”“松”的心理准备哦！

（原载新加坡联合早报副刊《四方八面》2008-12-27）

怜惜

一天下午在国大校园里碰到了几位淳朴热情、来自中国顶尖学府的交换学生。她们一听见有人把我介绍为文革中曾经在内蒙古草原放牧的“知识青年”，就禁不住对我产生了同情怜惜之心。

有一位说，“您一定受了很多的苦……”，声调微湿。其他几位顿时的肃默听起来也隐约含悲。

我说不出半句话来。这些可爱的十八九岁的姑娘确实是真情的：眼前的我，在她们看来，是她们出生前二十年中国那段黑暗历史的牺牲者之一。对在阳光下成长的一代来说，当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饱受劳累饥寒的；想象中所受的苦甚至可能跟劳改差不多（劳改，指犯了罪或“政治错误”被强迫送去接受严酷的劳动改造）。

是的。中国走过很长的一段弯路错路。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中国青年，从小就在世界两大阵营的冷战冲突和国内的政治专制与意识形态洗脑中长大，文革中当红卫兵、上山下乡等经历和命运都是非正常的，但也是基本无法逃脱的。

我以微笑感谢她们的同情与怜惜。想跟她们说，却又不知道怎么说，从何说起：文革中的知识青年也跟您们一样，热情活泼，淳朴善良；在国家和大众都在贫苦中挣扎奋斗的那个年代里，吃苦正是一种理想；还有，天高地阔叫人心驰意爽，风狂雪暴更添浪漫豪壮，兄弟乡亲一起共苦同甘……我还是说不出半句话来。

当晚，在一个组屋区的乘凉处，我遇到了几位衣着简旧、满脸沧桑的老人。当时没有人说话。我却想象听到这无声的一句：“我们当年为新加坡的发展卖命，心甘情愿。”

啊，我们更应该向他们致敬和致谢！

（原载新加坡联合早报副刊《四方八面》2010/1/30）

真情

我是个很不实际的人，不懂得如何从经济、政治、人口、国策这样的角度来分析思考当前大家所忧虑和争辩的“移民问题”。但自己毕竟被命运移过了好几回，还是在重要历史时刻，世界“敌对”阵营之间；留在记忆里的，却是美好浪漫。

二战日本侵华，父母逃难移到这南洋的星洲；后来在这里生下了我。六十年代中期，他们选择落叶归根；我也就随着移回唐山去了。当时有几个人看得清中国迈入的是一段什么样的历史？

十七岁的我，一开始是在篮球场上结交朋友的。那时寄住在天津一个大学校园，每日黄昏有几个小伙子爬墙进来打球；投投篮，传传球，出出汗，就建立了感情。他们谁是红卫兵？誰是牛鬼蛇神的孩子？我是华侨资本家的儿子？会不会是外国特务？一个篮球就打掉了所有这些问题。

两年后，我还跟一帮中学生一起移到了东北边疆大草原。当地淳朴的乡亲，老的把我们当孩子，吃穿贴心关照；少的视我们如手足，大地共同挥汗。文革把人赶进恶性的政治、思想争斗；大家还是靠着心底的善良和真情，相扶走出这历史的灾难。

中国改革开放，命运把我又移到了美国，带着一身土味，和那被洗过的脑。追随过国民党的亲姨丈一见面就开了一句叫我冒冷汗的政治玩笑：欢迎你来，我们家也是“共产”的！除了这次，在那个世界里我基本不觉得被贴上什么标签，看作什么颜色。也许可以这样理解吧：美国人已够五花八门，外来人更添五光十色；不同正是存在的本色，前进的动力。

在个人与个人之间，那个世界给我的体会是一样的淳朴：朋友间的甘苦掏心，家庭般的温暖怀抱。举个小例子吧，我的一个美国好友早我两年毕业，到别国去了，我毕业离开美国之前，他的母亲竟开了一个多小时的车来看我……

把话题拉回到现在这里，“我们”“他们”之间，一声真切的招呼，一个由衷的微笑？

（原载新加坡联合早报副刊《四方八面》2010/10/9）

知青话题的思考

文革期间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已经是一段渐行渐远的历史了，由于近年来老三届知青们年届花甲，越来越多的人已经从工作岗位上退了下来，有了充裕的时间，也有了一定的生活和思想积累，于是就写文章发表各自的看法，这些看法五花八门，形形色色，有时候相互还发生碰撞。

本来，我觉得知青上山下乡这段历史是该肯定还是该否定已经是个不言自明的问题，但是听来听去，还真不那么简单。至今有许多知青在这个问题上仍然有着完全不同的认识。平心静气地想想，这既是一种奇怪，也是一种正常。毕竟，生活太丰富了，人们太复杂了，何况每个人都是站在自己的角度去看待这个问题的。有一万个人就会有一万个角度，就这个意义而言，看法完全一致反而不正常了。

其实，对当年的知青上山下乡，站在各自的角度说好说坏，都可以理解，也都无关宏旨。我个人觉得需要澄清和严肃对待的只是对当年这场牵涉到千百万人命运的事件（或称运动）的整体看法。所谓整体看法，是指从社会这个大层面大角度去看，而不考虑具体的局部和个别，比如，当政者为什么要发动这场所谓轰轰烈烈的运动？这场运动对社会进步和人类进步（无论是精神进步还是物质进步）都产生过什么样的作用？是好作用还是坏作用？换句通俗的话说，我们需要从宏观去看问题。如果明确了这一点，那么知青上山下乡是对是错，该肯定还是该否定，其实是非常容易辨清楚的。

举个例子，如果今天国家突然宣布让所有正在上学的学生们停止学习，一律去偏远落后的地方去劳动，去接受农民们的教育，进而将这样一种社会举措升格为广大学生们锻炼红心，改造思想的一个必经之途。我们会怎么想怎么看？

不仅如此，所谓锻炼红心，改造思想，都锻炼的什么红心？改造的什么思想呢？如果换成彼时最流行的语言来说，锻炼的是忠于伟大领袖的一颗红心，改造的是非无产阶级思想——当历史走过几十年的风风雨雨，我们突然发现，在今天，世界范围内还有一个国家会发生这样的事情，那就是朝鲜。朝鲜的伟大领袖一招手，千百万学生们可以立即不读书，去到农村去锻炼忠于领袖的一颗红心。并且完全可以相信，这千百万学生中的许多人是眼含热泪，胸怀激情，高唱着革命歌曲，斗志昂扬地去上山下乡的。他们完全可以做到和四十年前我们老三届知青上山下乡时一样的规模，一样的境界，一样的宗旨，一样的口号，甚至一样的途径，一样的目标。

问题在于，这样一种规模、境界、宗旨、途径和目标的运动，究竟是否能够代表一种社会的进步？究竟是在向落后和愚昧迈进，还是向民主和文明靠拢？

应当说，老三届知青都已经是年届六十的人了，我们经历了不少的人生，已经可以比较清醒和比较客观地谈论问题了。当我们置身事外，让中国再演出一场这样戏剧，恢复这样一段历史时，我们会怎么想？是觉得它太好了吗？

不排除极个别的人会这样认为，但是绝大多数人都不会这样想，而我们评价一个大事件一场大运动时，恰恰需要排除的是特殊和个别，真理是在一般意义上和普遍价值中存在的。

冷静想想，当初我们下乡是在一种什么样的社会背景下呢？是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国家都在大踏步地前进，科技和文化水平都在以空前的速度提高和进步之际，彼时我们面临的现实是科技文化教育——几乎所有的方面都全面落后，在这种情况下，竟然要求所有的知青去边远山区参加体力劳动，去锻炼红心和改造思想，对社会，也包括对每个下乡的个体，究竟有什么好处呢？

有人说，参加体力劳动锻炼了身体，这就是好处！如果用这种个别的、局部的好处来为知青运动辩护，那至少太苍白也太无力了。锻炼身体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如果我们换一种方式去锻炼身体，完全能够做到比上山下乡锻炼得更好。不仅如此，锻炼身体完全可以任人去选择一种适合自己的方式，为什么非要采取一种极端的、强迫的、以废弃其他许多有益的追求和获取为前提的方式呢！什么叫因噎废食？如果为了锻炼身体而不要上学，不要对其他科技文化知识的学习，这样的锻炼值得肯定和倡导吗？

进一步说，如果我们愿意冷静和深入地想问题，我们一定会发现，当年动员知青上山下乡决非报纸上广播上喊出的口号那样崇高和神圣，究其本质，它是文革破坏了社会生产力，越来越多的毕业生无法安置，于是编造出一个崇高的口实，进而把聚积在城市里的知识青年们群体性“赶”下乡的。有些人说，他下乡是自觉自愿的，我完全相信这一点，并且我自己也并不是别人强迫着才去下乡的。但这又能说明什么？如果我当初不抓紧自己报名下乡，就能够不去下乡吗？如果不能，那这种下乡能称作自愿吗？更重要的是，更多的人是自觉和自愿的吗？如果真的是自觉和自愿的，就应当有一个前提，既一个人能够自愿选择下去，也就允许他自愿地选择上来。事实上，你不下去行吗？你下去以后想自由地上来行吗？

还可以继续提出问题：知青下乡改造思想，改造的是非无产阶级思想。在那个年代，抬举到最神圣也最不容怀疑的就是无产阶级思想，具体一些说，在身边所有的人中，最纯洁最崇高最靠得住也最需要向之学习的是工人阶级！偏偏工人阶级就在城市里，就在我们身边，可以说向工人阶级学习比劳民伤财地追到农村去向农民们学习方便得多，快捷得多，直奔无产阶级领域有效得多，为什么要舍近求远呢？

何况，就在千百万知青被赶下乡去向贫下中农学习的不久前，最高指示还教导我们说：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

最可笑的是有些人至今认为，通过下乡，不仅锻炼了他的身体，而且锻炼了他的思想。前面已经说过，当时要求知青们锻炼的是什么思想？是忠于毛主席的思想。是誓死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思想！时代已经进入到二十世纪了，五四运动早已经提出了科学和民主的呼声，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一定要忠于毛主席？为什么一定要誓死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我们敢思索一下吗？敢问个为什么吗？敢怀疑一下吗？如果不允许你思索，不允许你提问，更不允许你怀疑，这种所谓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思想和路线的真理性在哪里？放在一个追求真理的环境中，这正常吗？

坦率地说，如果顺着这条思路认真地追索下去，我们最终会发现，二十世纪最荒唐的事件之一，就是如此庞大的一个学生群体都自觉不自觉地充当了一个可悲的、不仅被人愚弄，折损自己，而且毫不自知、甘为鱼肉的角色。如果不是后来文革结束，不是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不是我们终于知道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后许许多多事件的真相——比如反右倾，大跃进，大饥荒等等等等，进而从一种绝对的蒙昧状态中走了出来。我们今天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状况？社会又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状况？有些信奉极端的人说，文革时代有什么不好？问题在于，在今天这个已经相对自由了的社会环境中说这句话，完全可以轻飘飘的。因为许多具体和现实的文革生存状态已经不复存在了。如果真的能够复原，那么请他去那样一种环境中继续生存半辈子，他又会得出什么样的结论呢？让他每天早请示晚汇报，跳忠字舞，再加上无休无止的政治学习。尤其是当他无意中说错了一句话，或者偶然中做错了一件事，从此被扣上政治帽子，被穷追猛打地猛批猛斗并永世不得翻身时，他或许才能够稍微理智和清醒一些。

什么叫可悲？可悲并不抽象，对我们一些当年的知青们来说，可悲就在于，明明糊涂透顶却自以为聪明绝顶。明明在干着最糊涂最愚昧最损害人民大众的事情，却还以为红心揣胸真理在手，以为自己干的是一桩造福于民功莫大焉的崇高伟业——前些天我看到一个迷上了传销的年轻姑娘，当他的父亲千里迢迢地赶来、苦口婆心地动员她回家时，她理直气壮也义正词严地坚决不走回头路，认定传销是一桩她必须从事的神圣事业，这真是让人哭笑不得了！

从本质上说，我们知青走过的就是这样一段弯路，也实实在在地充当过这样一种角色！尽管有些人至今认识不到！但我坚信，绝大多数人一定会认识得到。我们今天有许多历史的档案还不能够解密，这是出于一种稳定社会的需要，但是历史的真相或迟或早一定会披露出来的。当历史越来越接近真实时，我们的思想认识水准也一定会随之提高。

还需要客观地说，同样是上山下乡，不同阶段的知青也有着不同的境遇。比如文革前的知青下乡，固然同样是

出于安置城市青年的需要，但它提出和提倡的目标还相对实事求是一些——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知识青年到那里去是大有作为的——它至少是鼓励知青到农村去发展自己。尽管把历史真实的面目揭开，除过一些幸运的时代弄潮儿在农村中多少发展了自己，绝大多数当时下去的知青都属于出身不好或者家有其他问题的，是被强迫下去的，他们的遭遇远比老三届知青可悲和可怕得多。历经几十年风雨之后再回头去看，他们在农村作为了些什么？发展了些什么？如果认真倾听一下他们群体的呼号，我们还能得出昂扬振奋的结论吗？

本来，有知识的人去农村生活和发展，这并不是坏事。即使在今天，如果有知识的人（不管是青年、中年还是老年）愿意下乡，甚至使之成为一种常态，成为一种人们能够接受的生活和生存方式，这都是好事。而且我相信，随着社会的进步，这样的情况尽管不会普遍，却一定会有的。但这种上山下乡却与文革中我们老三届知青的上山下乡有着本质的不同。它是一种个人生活和事业的自由选择。

可以肯定地说，如果没有后来的拨乱反正，没有后来对左倾路线的批评（我个人认为，批评得还远远不够）我们今天吃饭还要凭粮票，穿衣还要凭布票！应当说，过着那样一种物质极度匮乏的生活本身已经可悲了，但更可悲的是，明明过着那样一种贫穷到让他人为之惊诧的生活，我们还口口声声满怀自豪地认为自己生活在“最最幸福”之中，还念念不忘要解放“全世界三分之二受苦受难的人民！”这就让人不知该怎样继续朝下说了！

有一个现象，这几年，围绕着知青这段历史，已经编了许多书。这些书收集的大多是知青们回忆当年生活和感受的文章。

应当说，这些文章大都是客观和真实地反映当年知青的生活和遭遇的。比如宝鸡市委史志办编了一本《知青岁月》，全书完全没有对知青生活和知青历史做思想上政治上的褒贬，只是由一些当事人非常朴素因而也非常真实地记录了当初那段生活，但这已经足以令人深思了。我想，这样的书籍对我们真的是非常好！无论对那段生活说好说坏，也无论对那段生活说是说非，都是一种真实，也都有必要。

但是也有一些知青们编的书，让我读来不安。

最近我看了一本西安知青编撰的书（为了不造成对个人的伤害，请原谅我不写书名及作者的姓名），坦率地说，读这本书的第一篇文章，就让我大失所望。在这篇文章中，作者讲到了当年插队时他如何搞阶级斗争，村子里的地富反坏是如何夺了贫下中农的大权，他作为知青又如何去英勇地夺了回来——整个文章中反映出来的内容，如同文革就在眼前。

说实话，我在自己下乡的生产队里也看到过所谓的地主富农，但是与这位作者所写的完全不同的是，他笔下的地主富农仍然是当年报纸上广播上极力丑化的那类形象。而我在真实生活中所接触到的这些人，却都是活生生的

人，尽管不完美，但作为一个人，他们和所谓的贫下中农并没有本质的不同。而且在当时非常残酷的极左统治下，他们往往比所谓的贫下中农规矩得多。而绝不敢张牙舞爪。也正因此，我想这位当年在农村大抓阶级斗争的知青，恐怕今天应当好好地深思一下，自己当年狠抓阶级斗争时究竟做对了哪些做错了哪些？——非常滑稽的是，就在这本书其后的第二篇第三篇文章中，马上有同队的知青写到，当年她的家庭成了“黑”的，她是如何的悲伤和无奈，如何不被别人理解和信任，以致招工一再地出不去，给她留下了铭心刻骨的疮伤——我想，那位当年大抓阶级斗争的知青实在应当想一想，假若他不慎坠入了“黑七类”的深坑（如果极左路线没有被否定，还是当年那样一种社会环境，这是完全可能也随时会发生的事情），他还会不会如此舒坦，如此轻率，如此振奋和昂扬地大抓阶级斗争？

还需要说的是，我之所以对这样一篇文章感到反感，是因为就在看到这篇文章之前，我刚刚接触了交大附中的一位老三届同学——有一天，我接到一个电话，他说他叫黄小培,是原交大附中老三届的学生，他从加拿大回来，想和我见一下。

此前，我读过黄小培的文章，多少知道他下乡时由于出身问题曾经饱受凌辱。但从来没有见过他本人。那天头一回见到，发现他满头白发，岁月的沧桑已经深深地镌刻在他的脸上。也就是那天，黄小培流着泪给我讲了他一家人的遭遇，文革中，他父亲作为阶级敌人被揪出来，最后只好自杀。他母亲承受不了这样的打击，也割破动脉血管自杀了，为了担心割破动脉血管后死不了，她是在血流如注的情况下又继续跳了楼。不仅如此，他的哥哥——一个平时温厚善良的知青，由于家庭问题的牵累，也跳楼自杀了。再后来，他的弟弟，也自杀了。全家五口人，只剩下他一个。

问题在于，在左倾路线的统治下，有黄小培这样遭遇的家庭何止一个两个，而是千百万个，千百万家呀！

如果我们给后代们讲“文革”的恐怖，他们一定会觉得不理解。但这是我们曾经经历过的现实。毫不夸张地说，这种“黑七类”的帽子是随时可以降临到每一个中国公民身上的。且不说无权无势更无背景的普通公民，就说共和国的主席，今天还是老一辈革命家，明天竟然成了“叛徒、特务、内奸、工贼”。那无数顶可以随时置人于死地的大帽子始终悬在每一个正直的人头顶，只要需要，可以随时给你戴上。不信吗？请看共和国的开国元帅彭德怀不是戴着反党的帽子被整死的吗？同样的开国元帅贺龙不是戴着大军阀、大野心家的帽子被整死的吗？还有共产党遵义会议时选出的总书记张闻天，还有共产党早期领袖瞿秋白的夫人杨之华，还有共和国公安部长、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他们哪一个不是戴着反革命的帽子被整死整残的？要知道这些人都是经过两万五千里长征的，是从枪林弹雨中摸爬滚打出来的呀！如果你自认为比他们更“红”也“更革命”，或许你还多少能够有一丝丝安全感。否则，你的安全感从何而来？你的所谓“根红苗壮”的自豪，岂不是一个自欺欺人的幻觉吗？从本质上说，只是那根轮流朝大家打的大棒子还没有来得及打到你头上而已！

我常常感到惶惑，为什么许多最基本的生活理念都会被我们一些知青混淆？为什么连中国共产党自己都庄严承

认“文革”是一次祸国殃民的大灾难，而我们有些知青却还念念不忘地赞美那样一个时代呢？难道，极左那一套真的那么可爱吗？想想看，那么多优秀的思想家艺术家，从思想家顾准被整死、作家老舍跳河自杀、翻译家傅雷夫妇双双吊死在铁窗，到电影演员上官云珠患癌症后仍然被猛批猛斗，最终不得不哭着跳楼，还有黄梅戏名角严凤英，被整得吃安眠药自杀后，仍然不被放过，抬到医院去开膛验尸——如果我们一一历数，可以数出成千上万——他们被整到这种程度，不都是因为他们是“阶级敌人”吗？他们都是用自己超众的才华为歌颂党歌颂毛主席歌颂新中国做出过杰出贡献的人物呀，如果他们能够被轻而易举地被打成“阶级敌人”，我们又有什么理由断定自己能够安保自身？进一步说，难道那么多有丰富阅历有深邃思想的大学问家，诸如巴金、季羡林等等，他们对文革的深恶痛绝都很荒唐？他们对文革的反思都很浮浅？他们对文革的批判都很错误吗？

绝对不是这样！

我们都是从文革中走过来的人。只要回过头想一想，那年头哪一所学校哪一个单位哪一个生产队没有被剃了黑帮头的，戴着黑袖章的，低头弯腰接受批斗的！哪一所学校哪一个单位没有被逼得自杀的——可以说，用最极端的方式去凌辱别人是那个年代太普通也太普遍的事情。难道这样一种生活还值得我们留恋，值得我们肯定吗？

话扯远了，还是来说知青这个话题。

静下心来想，也许这位作者根本没有认真对历史作过研究和思考，甚至谈不上有回想，更不用说反省反思。在这种情况下，他只是抓住了一点自己生活中最感得意也最感兴趣的内容，随手便写了一些让我十分反感的观点——这些观点是如此偏颇，如此可怕，但是仍然允许它发表和存在，我想，如果比较，那么改革开放后的今天远比三十年前好得多，这就是最有力的佐证。

有时候我还会想，如果让各地的知青们自发地去编一百本书，会出现一种什么样的状况呢？很可能，其中五十本书中的作者们都会用一种几乎相同的语言来描述那一段生活，比如“战天斗地”，“广阔天地炼红心”，比如“满怀豪情”“青春无悔”——之所以如此，原因太复杂了。首先，千百万城市学生自转换成知青身份以后，就进入到一个此前从来没有进入过的环境，承受着此前从来没有承受过的劳动，经历着此前从来无法想象的心理和生理意义上的双重体验……所有这一切，在人生中都是稀缺甚至是唯一的。正是这种稀缺和唯一，决定了它的难忘程度。而在所有这一切理由中，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理由：我们是在十七八岁的年龄下乡的，在这个年岁下乡，无论土壤多么贫瘠，条件多么恶劣，都无法阻挡青春的热血和生命的蓬勃，都注定这段生活必将在我们的人生中烙下灿烂飞花的色彩，使得我们每当回忆起它时总是充满了美好的情愫和青春的激动。

除此而外，造成这种状况的是几十年如一日地灌输给我们的思维和语言模式，已经深入到我们的骨髓中去了。

就这个意义而言，不少知青编撰的书呈现着非常奇怪的现象，前边刚充满豪情地肯定着当年的知青生活，后边又情不自禁地变成一种对当年生活的痛诉。这种矛盾着的表述，也恰恰表达出我们理性和情感的交错。

当然我相信，有个别人从形式到内容，从宏观到微观，都会觉得上山下乡就是好，就是伟大英明和正确——非常遗憾的是，生活不能够假设，个人的命运也不能够假设——如果能够假设，那么让每个人按照两种不同的版本往前走，看究竟是哪一种更好？那时候要考衡的不仅是对个人是否更好，不仅是对小群体是否更好，更是对整个社会，整个人类的进步和发展是否更好？应当说结论不仅会得出来，而且会非常公允。舍此，去说什么英明伟大，真的就太没有意义了。把话说透，作为那个岁月中的一代知青，我们各自的生活和自己在生活中的位置早已经定格。我们根本无从判断如果不下乡，自己会是一种什么样的人生。当了大人物的人说不悔，是因为他们取得了成功。而那些尚在为衣食奔小康而努力的人如果喊不悔，则是想反悔也来不及了。偏偏据我所知，喊不悔的人竟然以这样一种层面上的人居多。这真的是让人欲哭无泪也欲喊无声了！

2010年8月30日星期一匆匆

2010年9月25日星期六改定

（莫伸，陕西作家协会副主席，陕西社科院文学艺术研究所所长，著名作家和编剧。）

华夏知青网不是赢利性的网站，所刊载作品只作网友交流之用
引用时请注明作者和出处，有版权问题请与版主联系
华夏知青网：http://www.hxzq.net/
华夏知青网络工作室

“庆”与“祭”

——农场五十周年庆前的思考

明年，是我当年下乡的云南东风农场建场50周年。农场领导早已运筹惟幄，准备兴师动众的大庆一番。“场庆筹备组”的成员也是北上东去，邀张三请李四，还要录像、拍照，准备材料，够他们忙乎的。

明年，也是知青去农场40周年。自68年首批北京55人及随后的老上海1000人，共有13522名知青在东风农场前后干了十年。这是农场最大规模砍伐森林改种橡胶的十年，也是劳动艰辛、生活困苦的十年。从时间上看，这十年占了农场建场50年时间的20%；从人流上来看，知青投入的人力超过了农场50年总的人力资源的1/3，约占37%，（根据《勐龙记忆》提供资料推算）；如果再从付出的劳动量来看，恐怕这比例还要高。因此，无论怎么看，知青在农场的历史上确实留下了重重的一笔。农场没忘记那年头的这些人，于是派人联系，知青里的头面人物立马“呼应”，大有“互动”的味道。

农场要“庆”。50年了，走过来确实也不容易。最早是一批退伍兵在搞，接着来了一批湖南人，文化革命开始后湖南人借机崛起掌权。之后知青大批涌入，现役军人也随着横插一杆子进来，搞了一阵后既与地方权利发生矛盾，激化后军人悄然退场，大权依旧归湖南人。随着“四人帮”垮台，湖南人又纷纷落马，最终还是一方地主云南人说了算。真可谓“城头变换大王旗”。不过这也算不得什么，农场的国有性质未变，谁起头还不一样。总之，“发展是硬道理”。想当年可是“白手起家”，从无到有。现如今，大片大片的胶林，各种各样副业，一大块的资产明摆着。每年生产干胶上万吨，又换回大把的银子，难道不值得骄傲和自豪吗。有钱又有了资本，说话当然就硬气，办事也就潇洒。于是呼朋唤友地要庆贺一番，显赫一下也是应该的。

知青要什么？我想到二篇云南知青写的文章，一篇是《庚戌三十年祭》（作者董浩）；另一篇是《知青祭》（作者周公正）。二篇文章的题目都不约而同地用了一个“祭”字。可见在回首知青历史这个问题上，“祭”是比较能包含云南知青情绪的一个字。它既含有一种悲凉；又有一种沧桑和失落感，同时也是一种无奈。因此，如果说知青想要什么的话，我认为“祭”是比较合适的。为什么？因为大片大片胶林的产权知青没有一丁点的份。大把的银子也流不进知青口袋里一分一厘。而十年艰苦的付出，十年青春的岁月，知青又得到了什么呢？“有锻炼无作为，有苦难无了结，有奉献无回报。”（摘自《知青祭》）知青虽有工资，但那点低微的工资在当时国家控制的物

价下，只能简单维持自身最低水平的生活需求，每次探亲还要依靠父母及亲人的帮助。十年后回城，除了疲惫的身心外基本上是一无所有。可以这么说，知青十年就是当劳工，就是做苦力，相当于为农场白干了十年。而且这是“在政治口号逼迫下的“移民”运动。”所产生的（摘自《知青祭》）。是一种带有半强制性的劳动。知青去“庆”什么呢？知青只能是“祭”，祭扫我们苦难的青春。当然会有知青不同意这个“祭”字，在那段岁月里有他们的理想，有他们的信念，有他们为之而自豪的奉献。其中的不少人是在那里入的党、提的干，并在那里锻炼了才干。有人被推荐上大学、有人收获了珍贵的爱情。而这些又都为他们回城后的奋斗打下了基础。这是他们精神上的一处依托，家庭和事业成功的一块基石，怎么会是“祭”呢？他们要说：难道那时的奋斗精神不值得弘扬吗？难道在红土地上得到了锻炼不也是一种财富吗？说的也没错。当我们把历史再一次拉回到78年底，79年初的日子：应该记得那时知青闹回城的场景吧，那是怎样的一种不顾一切呵！人一旦到了横下心来的时候，那一定是伤透了心。如果没有太多的苦难和压抑，太久的不满和悲愤，怎么会爆发出如此的能量呢？最后，又有谁留在了那里？不都是心急火燎地往家赶。想到这些，我认为，“祭”是符合大多数云南知青情绪的，能够被大多数云南知青所认可。

农场要“庆”，庆什么呢？庆祝他们把一大片原始的热带雨林搞成了现在的橡胶林？这话要放在以前一定是落地有声，豪迈而又自豪。现在恐怕说起来底气就不那么足了，毕竟毁掉的热带雨林同样珍贵无比，甚至是无法弥补的损失。要不就是庆祝他们为国家做了多少贡献，不信的话还能拿出一串串的统计数据来。如这样，想想也有问题？贡献贡献，是“上贡”和“献出”。你农场本来就是国营的，产权归国家所有。农场只不过是帮国家代为管理，通俗地说，国家把这块山林包给了你们，每年交多少银子就相当于交“租金”了，这也谈不上贡献。另外，国家当时的投资以及利息有多少？是否还了？如果都还了，“租金”也交了，再“上贡”才谈的上贡献。前面的帐好算，后面这个帐算起来就有点麻烦了，单说当年1万3千多知青十年的劳动付出就是对你农场最大一笔的人力投资！他值多少？农场又曾付给他们多少？有欠帐吗？它的利息又该是多少？不是说这个帐不好算，而是现在没算。不是说提起它就是知青来算帐的，作为问题应该认识它的存在。不算不等于没有，从道义上要讲明白。既然当时农场以国有的名义使用了知青，那么这些存在依旧是国有农场无法推卸的历史责任。

知青要“祭”，“祭”什么呢？祭扫被我们砍掉的，那曾经是如此繁茂的热带雨林；祭扫一下“龙泉公墓”里死去的，那曾经是如此年轻美丽的知青生命；祭扫一下那残存的，那曾经留下我们愉快或悲哀的青春印迹。除此，我们可以还能祭什么呢？对我们青春的祭扫更多的是在心灵层面上的，难以表达。

“庆”和“祭”正在“互动”，“庆”和“祭”明年将会同演一台戏，想想都觉得有点怪怪的。但事实就是这样，大幕总将拉开。“庆”和“祭”能够走到一起说明总还有共同点的。农场或许想感谢一下当年知青的付出，能够想到也不错了。其实这种没有付出的感谢是很轻飘的，何况农场真正想要的是知青现在可能的能力和关系，他们想利用这种“知青资源”来为农场下一步的发展出点力。这点从他们邀请人的标尺已经明白无误地显现了，当然其

心情和目的是可以理解的。知青去“祭”，除了“祭”以外，知青还有“情”在呵！美丽的西双版纳毕竟还是咱曾经的故乡吗，农场里还有我们真诚的朋友，有我们珍贵的情谊，还有美丽的记忆，这些都是无法割舍的。历史上那一摊子事，农场也是身不由己呵。

农场场“庆”是喜事呵！说什么知青“祭”不吉利。来个知青“颂”吧。“颂”好呵，热热闹闹、喜喜庆庆、大碗喝酒、大唱颂歌、互相捧场、皆大欢喜。让青春的热血再沸腾一次，让青春的激情再荡漾一次。不过在酒酣耳热以及激情燃烧之时，最好还是保持几分冷静：别忘了，说到底，咱又算啥呢？啥都不算。

2007-08-04

华夏知青网不是赢利性的网站，所刊载作品只作网友交流之用
引用时请注明作者和出处，有版权问题请与版主联系
华夏知青网：http://www.hxzq.net/
华夏知青网络工作室

“老三届”遭遇历史

“老三届”和“红卫兵”、“知青”，曾经是一代人的代称，在今天已是历史名词。历史对这个具有特定时代内涵的特定名词，除了已知的一般注释外，还有没有更多的阐述。尤其对这个名词所函容的整整一代人曾经有过的人生际遇，最终又当如何着墨....等问题，似乎都还在某种未知中。然而、关于这一人，以及这代人在那个特殊年代所经历了的种种往事，却已有许许多多世俗的、或者经典式的评说，这些评说有毁有誉，而且毁誉俱烈，有时好像已是定论，不期然中又往往随着时世的变幻而毁誉互换。或谓之“丑陋”，或谓之“崇高”，褒贬如斯，常常令人不可猝接。更有意思的是，在这种褒贬互换中俨然以“评委”自居，又很在乎一定“立场”的，除了一些确曾是那段历史的过来者外，却不乏并不拥有（或无法拥有）那一经历的人。而最有发言权的“老三届”们自己对纷纷纭纭的诸般毁誉，却反而都待之以一种异乎寻常的平静、宽容和沉默。这倒底是因为他们都抱定“历史应让后人评说”并相信所谓“沉默是金”的表现？还是出于“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的超然，没人说得清楚。不过、对一些太离谱的臆评或是非难，偶尔也要用冷峻的目光去加以检视，如果需要也许还会表现出他们当年有过、如今似乎仍未消减的锋芒。也只有在这种情势时，才依稀流露出他们还未全然消逝的、在那个已成过去时代中曾经有过的颇不一般的激情。也只有在这种情势时，才最清楚地表明：有过“昔日浪漫与辉煌”的这一代人的修炼，还未炉火纯青到真正超然物外的程度。

正是所经历的历史风暴和时代洪流，造就了“老三届”一代。对此、大概不会有太多异议。检视“老三届”一代人已有的心路历程，除去早年哪些只会用稚气目光，去遥望共和国为大炼钢铁的炉火而映红的夜空，并为之神思飘逸联想浮篇的年岁。在他们已有的人生记录中便唯有跌宕的轨迹可寻：从被誉为“天兵天将”的红卫兵闯将，到统而概之被称为“老三届”，再到只用含混其词的“知青”两字便可简单包装，这就是一度誓言并决心以“解放全人类”为己任的这一代人一步步走过来的历程。如果说历史就是人史，那么“老三届”一代人的人生际遇或许就是解读那一段历史的钥匙之一。尽管古今中外已有的历史记叙，不时表现出对某些个人存在的漠视。有时，这种漠视似乎还并不影响历史的完整性。然而、要漠视某段特定历史的特定人物，或要漠视整整一代人在历史上的存在并非易事，因为历史要是容忍这种漠视，就会因此而缺少一些不可或缺的篇页，变得不可信和不连续。“老三届”是亲

历了“文革”的一代人，其经历本身就是那个历史时代的组成部分，毫无疑义地含有研究那个特殊时代不可或缺的信息。说是他们遭遇了那个时代亦好，或是说那个时代遭遇了他们亦好，总之，有这样一代人从那样一个不寻常的时代中经历了过来，不论幸或是不幸它都已然发生，并且融入了时代和历史中，成为了史实。这一代人的经历，也许在今天看来十分荒唐，不可思议，但却是当年的事实：正是他们一代，本该是在安静校园里读书的时候，被要求去社会“经风雨、见世面”，去“破四旧、立四新”；进而是为国家民族的“命运和前途”奔走呼号，为“防修反修”勇当闯将，要知道那个时候，他们中的大多人还是稚气、童声未脱，连生活也不知为何物的青少年。正当激情、狂热和辉煌还没完全从他们身上消退时，又被要求去“广阔天地”里战天斗地，在披星戴月的劳作中受教育、炼红心。他们的整个青春岁月，就这样在政治斗争的狂风暴雨和边乡僻野的凄风冷月中销蚀殆尽。如此一段不堪回首、酸楚而无奈往事，被当作新一代的“光荣回忆史”或是另一种意义的“丑陋过去史”来书写，都将有悖于历史的真实。这或许就是一些不可能拥有“老三届”经历的人（包括“老三届”们自己的子女），怀疑当年的“老三届”们是智商不高的一代。并且认为“老三届”所受的单一教育，是使他们甚至唱不来流行歌曲而只会唱样板戏；不知下海经商可捞大钱而只知上山下乡修地球的原因所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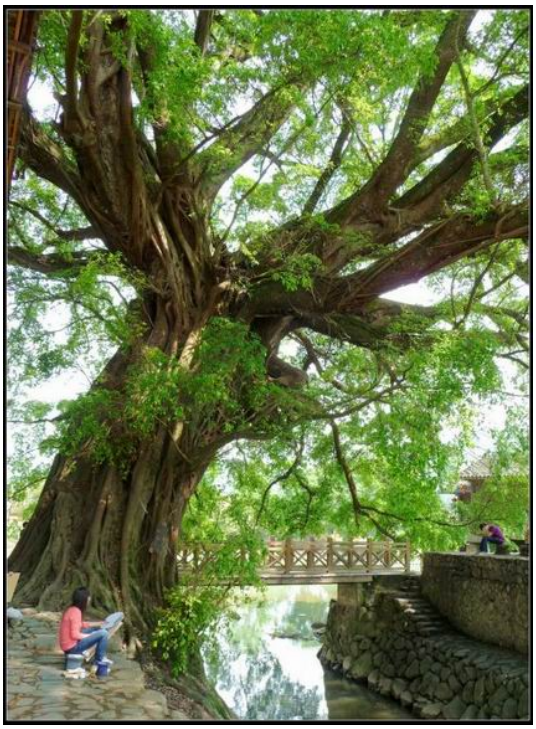
三十多年前的今天，“老三届”们几乎是在一夜之间，摘掉头上的“红卫兵”闯将闪亮金冠，被简单地赋予“知青”称号，开始了从其人生历史的“浪漫与辉煌”，走向长达十年之久的“迷惘与困惑”。昨天还是“文化革命”的闯将尖兵，先觉在工农之前的他们，立即成了需要去山乡僻野接受农民“再教育”的知识青年。这就是当年“老三届”们经遇了的青春人生，没有选择，也用不着他们选择。他们的义务是按划好的路线开步走、大胆走，一如要他们走出课堂去关心国家大事时一样。几十年后他们中有人对此段人生经遇喊出了“青春无悔”，相信这不仅仅是对已成过去的青春生命的自我抚慰，更多的是一种底蕴深沉情绪的表达。

任何人来到这个世界，不可能选择出生的年代。从这一点上讲，“老三届”们经历了一个怎样的时代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为那样一个史无前例的时代付出了他们所能付出的一切。尤其是在史无前例的“文革”岁月中，磋跎了对任何人来说都仅有一次的青春年华，他们自身也因此成为了史无前例的一代。这牺牲不谓不大，为此留在每一个“老三届”心底间的苦痛，不是过来人和亲历者极难知晓内中的深沉。至于这种牺牲值与不值，历史对此最终又将如何评说，尽可放心让后来者去着墨。时间的流水曾经浪涤去许许多多人世间的是是非非，它也必将继续这种浪涤，这是历史发展不可缺少的重要功能，至今还未有任何伟大或卑微的意志可以左右。清楚了这一点，就清楚了为什么说“对历史加工的所有试图都必然是徒劳的”这个哲理。

“老三届”已成为历史名词，内中那些可堪回首和不堪回首的一切都已是历史镜中的影象。在历史这面镜子

中，当然不应该只看到已成为过去的昨日云烟，而是要去洞悉还未发生的未来。因为研究历史的目的不仅是要了解历史曾经发生了什么，而是要弄清楚它是怎样发生的，为什么会在那样一个时代发生。巴金老人呼吁要认真研究“文革”史，就既有文学家的善思，也有社会学家的敏锐和历史学家睿智。

华夏知青网不是赢利性的网站，所刊载作品只作网友交流之用
引用时请注明作者和出处，有版权问题请与版主联系
华夏知青网：http://www.hxzq.net/
华夏知青网络工作室



不要为苦难加冕

发生在文革期间的大规模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是一种改变整整一代人命运的丰富复杂的社会历史现象，是一种以响亮的革命口号，以政治运动方式来解决千百万城镇知识青年就业困境的一次失败的社会实验。它不仅对中国社会造成极大震动和深刻影响，而且在世界当代史上也是一个极不寻常的事件，国外许多学者和政治家称它为“使人震惊而又是世界史上独一无二的运动”。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无论哪一个国家，随着经济的发展，特别是伴随农业现代化和工业现代化的进程，必然导致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转移和农业人口的城镇化，这是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而上山下乡运动却反其道而行之，试图将大批有文化的城镇知识青年退化到农耕时代，这场非理性、逆历史潮流的青年移民运动是文化大革命的伴生物必须彻底否定。“上山下乡”以牺牲整整一代人的青春为代价，这一代人的坎坷经历可以这样描述：“这是在天安门广场的红海洋中，流着热泪接受伟大领袖检阅的一代人。这是在黄土地、黑土地、红土地上终年耕耘而吃不饱的一代人。这是在接受再教育多年，怅然返城而寻不到自己位置的一代人。这是人到中年又一次品尝变革的酸甜苦辣但不屈不饶向前的一代人”。

有位哲人说，苦难是一座学校，不能否认上山下乡的苦难经历磨炼和造就了他们中的不少人，这是一种“种豆得瓜”的历史反刍现象，但决不能因此而美化苦难，为苦难加冕，社会发展的进程难道非得以整整一代人青春的丧失为前提吗?当年的知青们都已近知天命之年,昨天的创伤早已结痂,回顾往事，竟有不少人颂扬起“青春无悔”来，一句浪漫的口号是无法掩盖无情事实，整整一代人被埋葬的青春，他们的心灵创伤，他们所经受的人生苦难，他们被剥夺的种种机会，怎一句“青春无悔”了得?

历史要求沉痛的反思，“青春无悔”不过是一种不敢面对历史真实，逃避深刻反思和真诚忏悔的盾牌，是在巨大的社会变革面前缺乏自我批判勇气，心灵苍白的表现。“青春无悔”这种对苦难的自我崇拜意识，也恰恰反映了在处于社会转型期的这一代人的分化和认识上的错位。

不能否认在当年的知青中，不少人已成为社会的栋梁，在许多领域力擎大任，便成为精英的毕竟是少数，今天，大多数知青仍在为生存而奔波，面临诸多的困惑与艰难。这一代人“一只脚踏在昨天，一只脚伸向未来”，承载着历史与现实的双重负荷。在今天商品化意识和世俗物欲观念日益盛炽，生存竞争激烈，他们的年龄正处于临界点,人到中年,对社会的适应能力正在减弱，体力和精力正在走“下波路”，在技术和专业知识上也正被新一代人取

代，很多人提前退休下岗,面临着再一次择业的尴尬,在再就业的下岗职工中，有多少我们知青的兄弟姊妹们，30年前，他们无法选择，上山下乡，为国分忧，今天，他们将再一次为国分忧，以双肩扛起命运的沉重闸门。他们急需要社会的关怀，知青岁月的经历给予他们的将是一种面对艰难的勇气信心，使他们冷静直面人生，克服自卑与失落，重新进行社会角色定位，迎接人生新的挑战，从这种意义而言，一句苍白的“青春无悔”不啻是阿Q的自慰，是一种怯懦的逃避。

华夏知青网不是赢利性的网站，所刊载作品只作网友交流之用
引用时请注明作者和出处，有版权问题请与版主联系
华夏知青网：http://www.hxzq.net/
华夏知青网络工作室

老三届狂想曲

“弹指一挥间”，几十年很快就过去了，我们这些人都到知天命上下。可还没想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我想，既然是私生子，说丑陋也罢，说亮丽也罢，那都是别人的事。咱自己看不见，法律规定私生子与婚生子是平等的。只要你不去照镜子，自然眼不见心不烦，何苦要折磨自己呢？倒的霉够多了。可这是一个巨大的群体，新华社1973年12月21日宣布，五年就有八百多万城市知识青年下乡。

忽然想起了一首歌：“小弟弟呀小妹妹，大家来开故事会……”我妻子也是“老三届”，新初一的。前年她们同班同学聚会，当初几位根正苗红的、不用下乡就招到纺织厂的竟哭了起来。原来那厂子破产了，除了一位会计有人要，其他全失业了。人老珠黄，一无所长，他们拿这点生活费，日子自不必说。可大多数下乡的，现在都有了大学文凭，有教授、检查官、工程师、经理等等；只除了我妻子，她虽有文凭、职称却早办了病退，到澳大利亚“陪太子读书”去了。

我又想起当年，一位早就顶职上班的好友对我说：你们属于被抛弃的一代，穿过的破鞋，破罐子破摔吧。可我不这样想，我记住了托尔斯泰的一句话：“不要欣羡，不要焦急。人类的未来和你自己的命运，是你不应该知道的。但你得这样地生活：那就是要对一切有所准备。”这句话比我原先奉为座右铭的、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那句傻话有用得多，更别说雷锋那个做永不生锈的螺丝钉之类了。人，永远是人，而不是工具，统治者的工具。我不能一条道走到黑，于是就读书，就思考，这就是最好的准备。读到42岁才拿到本科文凭。

一个人是可能被抛弃的，一代人是谁也抛弃不了的。“老三届”不下千万人，他们是最富想象力的一代。君不见当年，这些十几岁的青年，“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的激情；无论做了多少傻事，但最先反思和否定文革的恰是这些人。后来，多少人又成为行行业业的栋梁？“我们是共产主义的接班人”就是他们唱红的，凭什么这个国家能够跨越这一代人？而这一代人又凭什么甘心被跨越？反思不等于全盘否定，当然是说的一代人。一竹竿打倒一船人是不可能的，千千万万的“老三届”并没有把他们的梦都托付给下一代。他们中大多数人过去、现在和不会很久远的将来，脚踏实地，为国家和民族的发展尽力。

无论哪一代人都不可能没有佼佼者，“老三届”更不例外。现在五十上下的人，不可能个个都向往“夕阳红”；特别是对于那些从政的朋友们，按中国国情来说，不过是学前班罢了。再过十年八年，我不信这代人中没有

一两个成功的“野心家、阴谋家”，不能“篡夺”一回党和国家的领导权来玩玩；政治改革的美梦，大约只能靠“老三届”的哥们实现。

重抄1988年插友们为纪念下乡20周年邀诗时所作《江城子》：

蹉跎岁月已茫茫，若思量，尚断肠；一片痴情，委与负心郎。撒在荒郊多少泪，流水绿，落花黄。

莫圆旧梦到天光，把悲凉，付黄汤；人届中年，难有少时狂。权揽青天舒大笔，着浓色，抹斜阳。

华夏知青网不是赢利性的网站，所刊载作品只作网友交流之用
引用时请注明作者和出处，有版权问题请与版主联系
华夏知青网：http://www.hxzq.net/
华夏知青网络工作室

“记忆”与经历

——关于《勐龙记忆》作者群的调查报告

一、基本情况：

记实文学《勐龙记忆》汇集了知青文章104篇，除去4篇以前留下的日记、信件及诗歌外，作为现阶段写的回忆文章刚好100篇，涉及作者92人（有人写二篇），涉及地域有上海、北京、重庆、昆明四地。

将92名知青作者在农场的身份地位作一简单分类如下：

场级干部---正负书记、场长，科室干部，组织、人事、宣传干事等。

队级干部---正负指导员（支书）、队长。

较好岗位---总场或分场一般工作人员，教师，医生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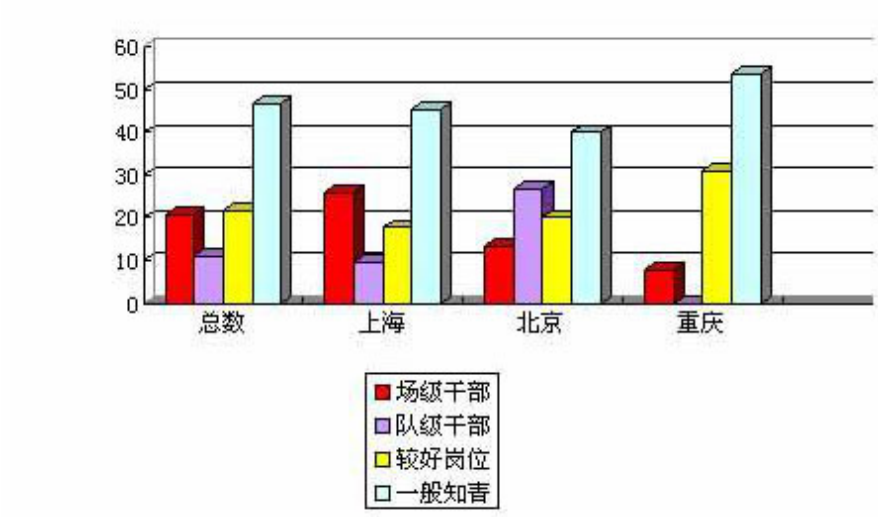
一般知青---卫生员、事务长、文书、班排长及一般职工。

具体调查列表如下：

《勐龙记忆》知青作者调查表一

	选定文章	占选定%	选定作者人数	占选定人数%	场级干部	占选定人数%	队级干部	占选定人数%	较好岗位	占选定人数%	一般知青	占选定人数%
上海	68	68%	62	67.4%	16	25.8%	6	9.68%	11	17.7%	28	45.2%
北京	16	16%	15	16.3%	2	13.3%	4	26.7%	3	20.0%	6	40.0%
重庆	14	14%	13	14.1%	1	7.69%	0	0.0%	4	30.8%	7	53.8%
昆明	2	2%	2	2.17%	0	0.0%	0	0.0%	2	100%	0	0.0%
总数	100		92		19	20.6%	10	10.87%	20	21.47%	43	46.74%

作者代表性柱状图一



二、 观点：

虽说这是知青在30多年后重新写下对往事的记忆，然通阅全书，我们可明显地发现，有约34.78%的作者在文中展示和阐明了自己对那段人生的观点和看法，有些还很强烈。另有20.65%的文章虽未明确阐明观点，但有明显的倾向性。有45%的作者未作表态，仅抒发对旧人往事的眷念之情。

如将他们各之不同的观点作一个归纳、比较，我发觉尽管叙说各有不同，但总可以分为明显的几类，主要分类及叙述如下：

1，青春无悔：

“虽然他长瞑勐龙，但是他无悔无怨”（孙宁《怀念凌瑜》）

“我至今无怨无悔，因为我心中拥有着无数颗纯洁的心、他们让我感到幸福快乐满足和成功”（许佳眉《教师-我无悔的》）

“但我并不后悔。农场三十几年的生活磨练了我，使我变得更加坚强和自信”（王龙英《留守农场三十载》）

“尽管我曾经历过无数的磨难，但是，我仍会无怨无悔”（钱雅模《难忘啊！勐龙岁月》）

“我终身无悔！”（张兆田《我的三次上山下乡》）

“我们无愧于这片土地，我们无悔于跋涉的足迹”。“失去的已永远失去了，无需悔恨懊恼，该拥有的，也实在的拥有了，应当爱惜珍重”（周公正《跋涉与回归》）

“我自豪我们的生活是丰富的，我们的人生是多彩的”（陈蘅华《永远的知青情结》）

2，苦难是一种财富：

“人世间再有什么苦都不会超过它，再有什么艰难也没有那么难。正是有了这11个月的经历垫底，还有什么样的困难不能克服，不能战胜？”（金家林《踏上勐龙二三事》）

“有了这碗“酒”垫底，以后人生道路上出现的坎坷和挫折，我也能从容面对了”（赵风巧《蹉跎岁月二三事》）

“热带雨林无情地掠夺了我们的青春年华，我们则毫不客气地从那段酸甜苦辣、喜怒哀乐的经历中，提取出令我们一辈子享用不尽的人生财富”（曾旭《遭遇雷霆》）

“不管今人如何评价，遭遇昨天版纳，无悔风雨征程；经历过那个年代血与火的洗礼，对生命真谛的感悟则更透彻，更灵异！”（谭建中《金鸡纳，不了情》）

“正是那艰难困苦中练就的胆量和气魄，成为我们一生享用的最大精神财富”（胡逸萍《斜拉桥、竹索桥》）

“在经历了这段坎坷、崎岖、艰苦的磨练之后变的更加艰韧”（章夏萍《云南追忆》）

“我所遭受到的艰难困苦恰恰成了我的财富，他教会我在人生的瓶颈处用不怕困难，艰忍不拔的力量支撑我勇往直前”（李建国《西双版纳哎，我的家乡》）

3，否定和怨恨：

“而当年的知青没有这个自由，在这点上，知青生涯同劳改又相差多少呢？”（王强《回家梦》）

“共同见证共和国历史上那一段充满辛酸苦难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历史的始末”（陈叔强〈我与《勐龙印迹》〉）

“我还是被震惊住了，-----心底阵阵发冷，止不住的泪水顺着脸颊直淌-----”。“往事的阴影象勐龙山上茅草那尖利的边齿，割据着伤缺的心”（王爱平《一场不该发生的殴斗》）

“近十年如同炼狱般的知青生活历史，充满了知识青年们的眼泪和鲜血。一部知青下乡运动史就是一部辛酸史、血泪史，还有什么地方值得“无悔”的呢？”（夏得宪《记录历史》）

“愿中华民族不再重蹈那无法无天的动乱年代，让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不断健全和完善，蔡xx命案成为历史”（张忆《一个知青的命案》）

“每个人的生命都不应该被浪费，每个人都应该有权利设计自己成功的一生”。“上山下乡运动是以整整一代人的青春理想作为代价，扼杀了一代人中潜在的人才”（哈夷《青春无悔吗》）

4，承受苦难，但有收获：

“没有必要苛求过去的人们包括自己和时代，荒唐年代荒唐事嘛。------在接受再教育的生涯中，我们每个人都从中获得了不少有益的有些堪称是相当宝贵的东西，这些东西已成为我们精神财富的一部分。”（汤学泉《轶事小思》）

“在西双版纳胶园的那些磋砣岁月，为我们这些跋涉过生活泥淖、而如今已迈向生命深秋的一代人，打下了厚实的基础。”（朱言敏《情系胶园》）

“我们失去了很多，但经过了血与火的洗礼，我们在逆境中变的勇敢、坚强、自信。”吴恒娥《由一份班长名单所联想的------》）

“我们付出青春、汗水、但最大收获是得到知己、收获爱情。”（赵建荣《白塔为证》）

5，怀念和思念：

“与云南农场纯朴的父老乡亲们之间的那份浓浓的、挥之不去且终身相随的情缘。”（刘建新《中南海的一壶水》）

“天不老，地不荒，版纳之情不泯，师生之情不息。”（唐林娣《永远的回忆》）

“特别想回去看看这片粘粘的红土”阮丹娣《魂牵梦萦红土地》）

“感谢“政治边防”，让我在坎坷人生中有此瞬间而美好的回忆”（杜若莹《最忆傣家情》）

“勤劳、和谐、美丽的寨子永远令人难忘”（沈霞萍《难以忘却的岁月》）

“那激情燃烧的年代所铸就的战友情、知青情、兄弟情永远最难忘怀和留念。” （郑龙《云南之行忆亡友》）

“难忘那段自己走过的经历，难忘那些淳朴真诚的学生，难忘那些给予我帮助的领导和战友，而深感愧疚的是我也许会误人子弟”（吕奇娟《我的执教经历》）

“感谢拉牯山为我营造了这一切，使我人生增加了特别的一页”（叶铁淳《红土地的回声》）

“回想共同生活的日子，眷念之情仍从心底油然而生”陈筱萍《南疆追忆》）“想到在那些困厄的日子里，祖

国和人民对我的不弃和关爱，不由得热血涌动，泪眼迷离”（余德庄《我的圆梦之地》）

“寻觅我们这一代人曾有过的梦；寻觅那失去再也找不回来的青春，寻觅那“割不断，理还乱”的情结，寻觅那曾经拥有的友谊、感情。”（刘晓山《重返勐龙》）

“深深爱上了这块美丽的红土地”（刘保青《红土地的情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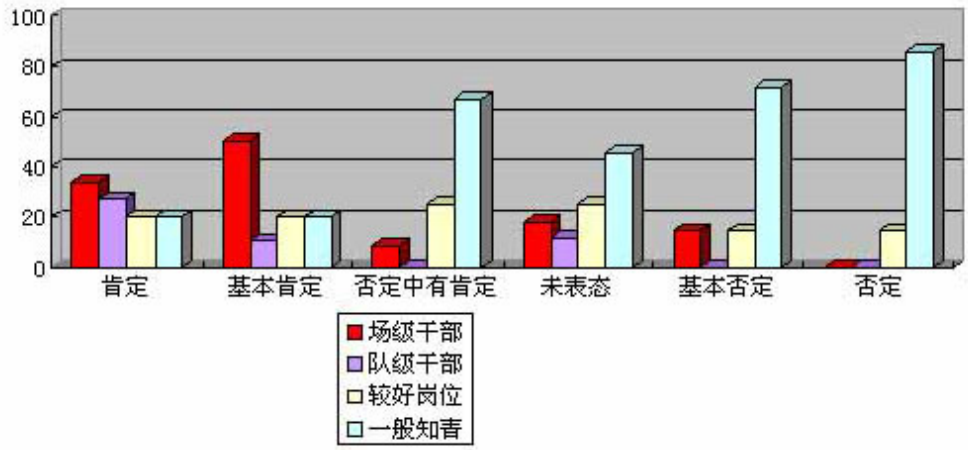
三、倾向性

以上摘录，各种观点跃然纸上。粗分一下，大致有肯定，未表态和否定几种。其实知青们对过去的认知在以往的谈话或处事中经常反映，只不过在书中他们各自表述的更加直接和明确，这就给了我这次调查以完整而明确的依据。言为心声，文如其人。同在那片红土地上生活和工作过的同命运的知青，是什么造成了他们认识上的差异？这同他们各自的知青经历又有什么关系？“记忆”和经历是否存在必然的联系？这是我想探究的问题。请看调查汇总表：

《勐龙记忆》作者调查表二

态度分类	对上山下乡人生的基本看法	文章总数	占作者总人数的%	其中场级干部	占该类作者%	其中队级干部	占该类作者%	其中较好工作岗位%	占该类作者%	其中一般知青	占该类作者%
肯定	青春无悔	8	8.69%	2	25%	3	37.5%	2	25%	1	12.5%
	苦难是一种财富	7	7.61%	3	42.8%	1	14.3%	1	14.3%	2	28.6%
基本肯定	基本持肯定态度	10	10.87%	5	50%	1	10%	2	20%	2	20%
既否定又有肯定	岁月艰苦，有得有失	12	13.04%	1	8.33%	0	0.0%	3	25%	8	66.7%
未表态	怀念友情，红土地及往事	31	29.34%	6	20.7%	3	10.3%	9	31%	11	37.9%
	未提及	18	16.3%	2	13.3%	2	13.3%	2	13.3%	9	60%
基本否定	基本持否定态度	7	7.61%	1	14.2%	0	0%	1	14.2%	5	71.4%
否定	持反对和批判态度	7	7.61%	0	0%	0	0%	1	14.2%	6	85.7%

观点与群体的柱状图二



四、分析

1，作者的代表性：

图表一显示了一般知青的作者不到作者总数的一半。在农场里，一般知青所占比例约为知青总数的85 %左右。如按人数比例的话，一般知青作者的人数明显少的多。这种情况应该说是符合目前知青现状的。因为在任何年代里，行使话语权的总是一些相对强势的那部分人群（当然有些人不喜欢写或不善于写）。由于存在这种状况，观点的倾向会偏向于相对强势群体的一方。

2，作者的类分：

表二展示了群体对各种观点的趋向性。总体呈二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形。大部分作者处在未表态状况。这并不是说大部分作者对过去的那段人生没有想法。除了文章形式的限制外，这里还有二种情况：一种是对政治感到厌倦，感到无聊，所以不再想谈这些东西。这可能是因为我们曾经被那些“崇高”的理想耍弄过，被那些卑鄙的“政治”欺骗过。另一种是一些身处敏感工作岗位或有一点地位的知青，由于现行的政治体制并不是他们自己心里有什么就可以说什么的。他们权衡厉害关系，觉得还是避开为好。

3，观点与群体：

图表二可以看到持肯定观点的一多半是原农场的干部，一般知青仅占20%。而在否定和基本否定观点中，一般知青占到71~85%，远远大于其他知青人群。干部在否定观点中的比例为零，基本否定也仅占14.2%。知青群体的二端很明显地站在了观点的二端上。产生这种形态的原因何在呢？我分析如下：

a) 精神生活方面，干部们有更多的文化信息和活动的空间，有多的多的个人发展机遇（包括被推荐上大学或被提拔）；有一定的成就感，更多的被重视和尊重。一般知青是缺乏这些的。

b) 物质生活方面，场部干部基本上已脱离了枯糙繁重的体力劳动，队部干部要参加劳动，甚至要带头，但他们有支配的主动性和机动性。在生活的改善方面他们相对要好一点或者有更方便一些的条件。一般知青要差的多。

c)由于干部们条件相对较好，因此有更多的资本和机遇在爱情方面获得满足，从而对贫乏的精神生活起到一些调节作用。

d) 知青干部中的大部分人在回到城市后，经过自己的一番努力后重又争得了高于一般知青的社会和经济地位，至少也处于一般水平。（这同他们在农场的经历和锻炼有很大关系，也和共产党在用人和政治体制方面的一贯连续性有关）。相对来说一般知青大部分混的较差。因此从各自成长的轨迹及他们从社会上的获取来看，群体的倾向性也就不奇怪了。

五、“共性”和“局限性”

虽然知青群体由于各自所处位置的不同，在观点上存在着差异。但同时我又确切地感受到他们思想观点、思维方式又存在着许多相同的“共性”。

其一、有一种不甘沉落的东西存在。

知青们虽然都经历了磨难，但不管以上那一种观点，都未呈现那种沮丧、悲观、怨天尤人的情绪。反而能够感受到一种“向上”的精神存在。这也许就是人们说起的“知青精神”。这种精神更多的是一种“吃苦耐劳、奉献、奋进”，而很少指后期的那种造反精神。这主要是由于知青这一群体在当时社会里处于底层，境况很差。所以不管他们处在知青中的那一个层面，都有一种要改变自身生存状况的要求，不甘心就此过下去，于是总在努力、挣扎和奋斗。

其二、是一种面对和承认现实的态度。

虽然他们有不甘沉落的精神，但他们的奋斗却总是在面对和承认现实的前提下，对制度的本身很少怀疑，未有冲击。虽然也有文章谈及后期知青的罢工造反行为，但其实那是一种知青在极端无望情况下发生的反抗行为，就好比一群饥饿的孩子吵闹着向母亲讨饭吃，母亲给了一点，于是不再吵闹，重归太平。并未去探寻母亲：我为什么会挨饿？你是怎么做母亲的？是什么原因造成了我们挨饿？你又干了一些什么？在知青作者的“记忆”里，我们感受多的是一种“理解、认可、感谢、无悔”。这是善良的一代人，忍辱负重的一代人，也是无奈的一代人。他们的血液里流淌着我们这个民族善良的因子。同时，这也与我们几十年来所受到的思想教育从而形成的思想局限性有关。在我们思想形成的时候，社会上只容许一种思想存在。我们的知识过于贫乏，我们的思维被局限在一个框子里。失去比较和判别的能力，缺少独立思考的社会环境。因此也只能无奈地面对和接受，或者被愚弄。在今天这个竭力淡化“记忆”时代里，我们的思想依旧未能飞翔。

其三，是缺少对“人”的关注。

我们的文章里还残留着太多那个时代的语言和气势，如：“青春、热血、事业、奋斗、理想、坚强、勇敢、磨练”，虽然对此的认识已经不同于往年，但依旧对它投入很多的关注，而对“人性”的关注却显得太少。我们不应忘记：我们曾在理想的旗帜下被愚弄；在事业、奉献的口号下被无情的掠夺；在无私的号召下被抛弃。因此，当这些时代的语言又现的时候，我想我们应该更多的对“人性”投以关注。而我们的文章对此的描述、探求总是远远的不够。我想，这主要是我们这一代人成长在一个扼杀个性的时代里，我们的“个性”从未张扬过，我们拥有太多的“共性”却缺少各自丰满的“个性”。

六、结论：

我们的国家经历了一段荒唐的年代，但国家的“记忆”却是有选择的，态度是低调的。远远不能起到“以史为戒”的目的。我们的民族经历了苦难的岁月，但民族的“记忆”却是零散的，不完整的，有些还是片面的。同民族承受的苦难相比是不相符的。我们这一代人共同经历了那段人生，但我们整体的“记忆”却是贫乏的，缺少思想深度的，甚至于依旧有点扭曲。我们个人由于经历的不同，各自的“记忆”也是不同的。不管是“青春无悔”还是“青春有悔”，多少都还带着那个时代的痕迹。如果换位思考的话，都有其道理。因此，在今后很长的时间里，知青对那段人生的观点是不可能一致的。各种观点也将一直共存下去。如果拥有话语权的强势群体自以为是的要将其观点强加于全体知青头上，那是不明智的。“经历”说到底也就是个人或阶层在整个社会的利益分配位置中的活动，它影响和左右了我们的“记忆”。同时我们的“记忆”还同我们的认知有关，思维浅薄的人其“记忆”有可能会被误导。

七、几点说明

1，关于知青身份地位的确认问题

首先要说的是地位本身就处在一个变化之中，而每一个得到提拔的知青基本上都在最基层的连队劳动生活过。但我认为这并不妨碍对他们进行区分，应该说知青在农场的中后期，其身份地位是相对稳定的。这主要是短期在连队艰苦劳动生活同长期一直在基层连队，人的感受是不一样的。对于个别长期在底层劳作，却在知青大返城前后做了短暂干部的知青，我还是将起归在一般知青一栏里。

2，关于对文章观点的分类问题：

知青群体对上山下乡运动在整体上持否定的态度，这是无疑的。但否定的程度和方面却大有不同。本文所罗列的观点是在这大前提之下的分类。由于文章形式的限制以及个别知青有意避开这个敏感的话题，造成不少观点和看法被隐藏起来，这也就是造成有近一半的作者归在“未表态”一栏里，另外有些文章作者的观点是互相交叉的，各有涉及，我根据其主要倾向作了归类。

总之，当我们通观全文，每个人的思想脉路还是很清晰的。用粗线条来概括一下的话，本文的统计调查应该说是大致相符的。

感谢林绿依、孙向荣、钱亚模、郭善祥、葛美琴等对知青在农场情况调查提供的帮助。

（本文原发在上海知青网——云南频道）

知青话题算不算“敏感话题”

在如何看待中国的知青问题上，我发现有很大的差异，分为以下几类：

第一类：青春无悔，知青上山下乡是必要的，得到了很好的锻炼。这是以公开发表的如梁晓声、张抗抗的小说为典型的。看上去官方比较赞同这种说法。它避免了进一步的追根寻源。

第二类：知青下乡受到不公正的待遇，是一场悲剧。这是很多电视剧从侧面反映的，如“孽债”。但还很少有敢于全面地描述知青悲剧的作品，如同描述文革悲剧的“芙蓉镇”那样的作品。

第三类：知青是为红卫兵犯下的罪行的惩罚，活该。知青们首先应该忏悔自己在文革中的错误，把知青与红卫兵等同起来。尤其是老三届。持这种看法的人不在少数，当然他们自己不是知青，他们多数是现在的年轻人，是从报纸上了解文革史的。对这些看法极需澄清。

第四类：是没有任何结论。到目前为止，官方没有对知青问题一个全面的看法。一直是避开这个问题。毛泽东在给李庆霖三百元时，只是说：聊补无米之炊。说很有必要，说扎根农村一辈子，说广阔天地大有作为。而现在只是不说了。但没有说那时是错的还是对的。

所以有时我感觉：知青话题算不算个“敏感话题”？要深究起来，恐怕有些话不好说。“欲言又止”。

有一次我在聊天时，说了一句：知青的血泪帐，马上有朋友说：言重了吧！

究竟如何看待这世界上“史无前例”知青潮，“谁人曾与评说？”这也许是永远也说不清道不明了。

说不清的话题

由于官方始终没有一个说法，社会上对知青的认识的确十分混乱。以为知青就是造反派，干尽坏事，下乡受苦，自作自受。这是一种误解。这正是需要我们这一批人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来澄清的。要是我们自己也澄清不了，那下一代就更说不清楚了。

不过，就是在知青本身也是认识混乱。有不少人还认为是“青春无悔”，是“经风雨见世面”，而没有看到上山下乡对人性的摧残，对中国教育事业的巨大破坏，如果要一分为二，也只能是三七开。正如战争锻炼了人民，但

不能说战争是一件好事，人民喜欢战争。

知青总是不幸的吗

知青是不幸的。正当青春的花季年华，被发配去脚踏黄泥背朝天，没完没了地修理地球。返城后，又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大多数知青就这么被耽误了。现在又面临下岗，生活困难。

但是，这里面，除了外部因素，还是有主观因素可总结教训的。

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以来，给人民开辟了广阔的致富路子，也给了返城知青无数的机会。生活在贫困中的农民，紧紧地抓住了这个机会，他们大做小生意，走南闯北，把生意做到了西藏，全国到处可见农民小商贩的身影。他们富了。

更有头脑的，办工厂，开公司，成为中国第一代农民企业家。

这段时间，广大的知青在干什么呢？除了少数的人以外，多数人在工厂勤勤恳恳地上班下班，根本不敢想辞职下海。因为上山下乡也是算工龄的。一般都有了近十年的工龄。年龄也三十左右了，拖家带口的，也不想再折腾了。担心以后的退休金与所谓的“劳保”。有一种安于现状的思想。还有一些老实人，只是听说别人下海发财，不敢搞第二职业，一心把工厂的工作做好。直到工厂倒闭，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这里面是不是有一种传统教育的思想束缚。那时，对经商，对个体户是瞧不起的，连对象都不好找。作为一代知青，曾经在文革中，敢想敢干，但到改革开放，束手束脚，患得患失。远远地落后于时代了。

如果说，知青总是不幸，除了当时的环境因素，正是不幸在没有解放思想，没有跟上时代的步伐。

以上是突然想到。并没有指责知青朋友的意思。只是想探究一下，为什么知青的境况老是不好？是“哀其不幸，恕其不争”也。

华夏知青网不是赢利性的网站，所刊载作品只作网友交流之用
引用时请注明作者和出处，有版权问题请与版主联系
华夏知青网：http://www.hxzq.net/
华夏知青网络工作室

让悲剧不要重演

草原恋网上发布了北京知青纪敦睦病逝的消息。纪敦睦与他的儿子前些年双双到美国落了脚，他是大数学家，是否事业有成不得而知，按说也应功成名就。纪不幸患病早逝，骨灰运回了北京，落叶归根人之常情。惨就惨在这样一位大知识分子，那些年偏偏与一位草原上的蒙古族姑娘结了婚，请看熟悉他的G.阿拉坦其其格的叙述：

“纪敦睦是我们公社唯一一个与当地牧民的女儿结婚的北京知青。记得当年在知青中对于如何扎根草原有过许多议论，大家的分歧在于是应该住进牧民的家中还是应该知青自立门户，唯独他慷慨激扬，觉得要扎根草原，最好的形式是应该在草原安家，找个牧民的姑娘或者小伙与她（他）结婚。他这样说了，就这样做了，和他们队一位善良的牧民女儿结了婚。……他将草原妻子和孩子都带回北京，并未如许多人那样，回城时“抛妻弃子”。后来因草原妻子在北京生活不习惯，加之语言不通，她的父亲将其带回草原……就这样两地分居多年后才办了离婚手续。大女儿和母亲留在草原，小儿子与父亲生活，后来双双去了美国。

去年我们回草原，得知她们已经迁到满都宝力格，孩子的母亲已经双目失明，身体也不太好，他的女儿想托北京知青，希望能找到父亲，和父亲相见。我们知道这个消息后，通过在日本的同学和在美国的同学终于将这个消息带到他那里，可惜在消息到达的时候，他的脑癌已经到了晚期，人已经糊涂了……

……知青与知青的后代为什么总是在上演着悲剧呢？

听北京的同学说，开追悼会的事情已经通知了草原女儿，而且在花圈的落款处也写上了孩子的名字。

真希望草原女儿能赶上29日的追悼会，不能与生父相见，能亲自送送父亲，或许能得到些许慰藉？或许还可以在追悼会上与同胞弟弟相见相认，这姐弟的重逢不知道是否可以多少弥补些不能与生父相见的遗憾？愿他们姐弟永远幸福和睦，让悲剧到此为止！”干枝梅团长留言道:“英才早逝,痛惜!痛惜!他的女儿仍在草原,这是我们知青留在草原的根,一定要设法帮助她。”

看完这则消息，真是让人欲哭无泪。我也不想发表太多的感慨，免得网管们再一次发威，将我的文章客客气气地“删除”，还得道一声歉。就把我2009年9月27日在草原恋网上写的这篇短文作为我对素不相识的北京知识青年纪敦睦的纪念吧。

“看了《我爱你，中国》第六集令人感慨万千，北京电视台能在祖国六十周年大庆期间播出当年插队的事，有胆有谋，可谓用心良苦。

看到老知青们为张凤起扫墓，真是催人泪下，其实老咩内心的苦有谁能知？

东乌旗素来比西乌旗牲畜多些，富裕些，当年知青们在那里可能生活的就会好一点。但是其中的甘苦只有我们经历过的人才知道。

在电视上看到了马晓力、张娜依的风采。原来张娜依当过北京电台的播音员，难怪那样有口才。还不知哪位是干枝梅-请大家不要见笑，谁让我是新人呢。

我在一家书店打听老鬼的新书《烈火中的青春》，年轻的售货员听说这书是文革、插队时候的事，差点笑掉大牙，轻蔑地看着我说：“文革对我们来说简直就是天方夜谭，现在没人爱看这样的书，我们也不经营。”不错，文革、插队像一个噩梦似地过去了，有人不愿提起，有人不让提起。我们何尝愿意时时咀嚼刻骨铭心的苦难，还不是为了祖国的未来：再也不要发生这样的悲剧！”

2009-11-30

说不尽的风流事流不尽的伤心泪

北京知青纪敦睦病逝的消息在网上一露面，跟贴不断。有人介绍他的生平，说他的才情，他当年的革命理想与爱情故事。同情者有之，探问虚实者有之，要帮助的有之。一位普普通通的老知青病逝，何以引起大家的关注？

其实这件事在我心中也掀起了不大不小的波澜。

无独有偶，拙作《为了你走遍草原》中的男主人公与纪的经历何其相似。

都是北京知青，一个在东乌旗，一个在西乌旗；同是黑五类，一个娶了牧民的姑娘，一个与农民的丫头结了婚。

真是应了那句话：不幸的人各有各的不幸。纪的遭遇更悲惨，结局更悲哀。

纪是老高中生，父母都是高级知识分子，书香门第，恢复高考后上了大学，后来回到了北京。

我的男主人公儿女情长，英雄气短，文革后与那糟糠之妻在草原上又奋斗了十数年。

难以想像，一个戴着瓶子盖般厚的眼镜，呆呆木木的知识分子，怎样用满腹经纶用数理化用外语用方程式来放羊、剪羊毛、打石头、垛泥墙；我书中刻划的人物，有知识没能耐，浑身上下破破烂烂长满了虱子虮子，几次在暴风雪中险些丧命。

纪与其说是扎根草原干革命，走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的典范，其实与我书中的主人公如出一辙，不如说是性欲所逼。

纪回京后英雄有了用武之地，只可怜那牧民女儿没文化没工作没有一技之长，一儿一女，四口之家，要吃要穿要住要上学，以纪一人之力在京何以谋生。无奈之下，媳妇领着女儿回了草原，纪领着儿子在北京蜗居。两地分居，时间长了，是不是把爱情真的丢了无从考察，总之离婚后，两个人再也不相往来，音信全无。

纪在101中学是名列前茅的高材生，在文革中被同学用板砖铁块打的满脑袋大包，这文革的恶果多年后在美国终于爆发，纪虽然已是身价不菲的博士、专家，无情的脑癌却让他英年早逝，只不知这早亡人终究要情归何处。

纪的骨灰送回了他魂牵梦萦的故乡北京，有好心的插友就想联系他多年未曾谋面的女儿与弟弟相见，最后送父亲一程。

有消息说，他草原上的老伴也于最近去世，女儿早已嫁人。几经辗转终于传来了确定的消息，草原母亲还活着，只不过双目失明；她的女儿也有了一双儿女，丈夫却在一次车祸中丧生。这年迈的望穿双眼无以再盼的母亲与霜居的女儿真成了孤儿寡母，在草原上相依为命度日如年。

再看拙作，装腔作势假装正经，什么爱情啊，生活啊，又臭又长的行文和貌似凄惨的悲欢离合，与纪的故事相比，真是相形见绌。

草原地大物博，在牧区有粮食吃，只要勤俭些，混个日子是不成问题的。牧民们心地善良忠厚老实，高大健壮的蒙古族壮汉从没有人强奸过女知识青年，草原母亲对我们的怜悯关爱，让我们终生难忘。

在农村在山区在农场在兵团，在汉人堆里的知青们呢？这些年耳闻目睹的一些真实的插队故事，更凄惨更悲哀，许多让人无法述说。

我们认识的一位北京知识青年，今年已经把他的骨灰抛撒到了他插过队的荒草凄凄的锡盟草原。为了尊重他与家人的隐私，恕不说出他的姓名。他的经历让人不可思议，他的惨状让我们唏嘘不止。

这样凄惨的知青生涯和爱情的悲喜剧，仿佛在影视作品里才能一见。

难怪张艺谋改弦更张，拍些商业片娱乐片得过且过呢，他的《活着》至今不能公演，也让我们多少理解原谅了一点他的无奈。其实看过《活着》视频的都知道，电影《活着》已经被改编得面目全非，比起小说《活着》，主人公的苦难被缩小了许多倍。

说起知青的故事，总是一个比一个惨。当然那段苦难锤炼了意志，为以后的一些人成长为大款高官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也就难怪有人一直高举青春无悔的大旗。可那毕竟是凤毛麟角，如果让说让写让演，恐怕部部都会夺人耳目催人泪下。

2009-12-20

华夏知青网不是赢利性的网站，所刊载作品只作网友交流之用
引用时请注明作者和出处，有版权问题请与版主联系
华夏知青网：http://www.hxzq.net/
华夏知青网络工作室

“知青情结”----知青返乡探源

近年来有关知青的文学作品和研究著作不断出现。今年适逢毛泽东“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号召发表30周年，也是“文革”期间老三届(1)大规模下乡插队30周年。30年来，知青作为社会一个特定时期产生的特殊的社会阶层，给中国社会带来巨大的影响。他们下乡，曾卷起一股巨大城市青年下乡的浪潮，引起无数家长亲人的牵肠挂肚，也给农村带来种种问题和影响；他们返城，又给城市的就业、住房等带来一系列问题。当初在返城问题上多数知青绝无反顾。近几年却又出现不少当年知青结伴不远千里、甚至携妻带子返回当年插队的地方探访。他们少则十数人，多则就包上几节列车，像当年他们集体插队一样浩浩荡荡返乡探访，以致一批批络绎不绝，引起那些当年知青插队集中的地方不小的反响。一些地方专门抽调人员接待这些当年的知青，甚至派人或写信到那些大城市联络当年知青，欢迎他们返乡探访。精明的生意人则在当年知青集中的地方办起饭店、开办旅游点等抓紧时机赚这些老插的钱。知青返乡探访，又成为“知青话题”中的一个新内容，以致为知青文学提供了新的题材。(2)其动机效果，议论纷纭。笔者作为当年知青，又曾与当年插友返乡探访，愿意就此谈谈看法。

一

在文革期间插队的“老三届”，现在大的已经50出头，小的也有40大几。50岁虽然尚属壮年，但老年的阴影已经迫近。返乡探访的知青多数人都认为趁现在还能跑，应该回去看一看，因为毕竟许多知青当年插队的地方仍属偏远，交通不变。一位关注知青返乡探访的年轻人对笔者说，你们这些人返乡是为了满足衣锦归乡的心理，看看能够返乡探访的人中，几乎没有那些下岗的人就可以知道。事实的确如此。在返乡探访的知青人群中，多是那些事业有成或至少过得去的，而绝少下岗的人。当年使尽各种办法回城、好容易才找到工作的知青，如今不少人又为下岗所困扰。他们正在为自己人生新的一轮生存而奋斗(这次是拖家带口)，确实没有精力、财力踏上返乡探访之路。苦涩的生活将伴随他们许多人的后半生。这本身正是现实社会中知青阶层分化的真实反映。那些能够踏上返乡探访之路的知青，也是有许多原因的。

首先，知青返乡探访，参加者完全是一种自愿的行为。十数甚至几十上百人自愿采取的同一行为，与知青这一

社会群体在形成后并长期聚而不散的特点有重要关系。

1968年正是“文革”的高潮。自1966年“文革”爆发后，老三届的学生已经两年没有正式上课。在这两年中，他们经历了学校出现的“罢课”、各类“战斗队”蜂涌而出以及军宣队、工宣队进校后的“大联合”、“复课闹革命”等等过程。这使本来已经是同学的他们更是朝夕相处，形影不离。他们正处在纯真的少年时代，交往中重视真诚和信任，彼此间有了仅是一般同学关系所不能达到的那种充分了解并建立起亲密的伙伴关系。他们结成的群体基本上以原同班或同年级的同学为基础，间或有其他年级或者其他学校的人加入。群体少则几人，多则十数人，遍布校园，甚至同一派别的组织内，这类群体的也活动十分明显。(3)学校内部的派性斗争，更使群体内部关系固结。1968年，老三届学生响应号召上山下乡的时候，同一群体的人多采取集中报名到某一地插队的方式。这就造成了当年插队的农村集体户或兵团连队里内部关系重要特征之一。在插队的集体户中虽然有的后来因经济、选调回城等问题上四分五裂，但也有不少的集体户并未出现这样的情况。这与他们插队前就建立起的亲密情感有重要关系。知青十几岁孤身离父母远行，能够在那种艰苦的生活环境生存下来，集体户内知青间互相帮助、鼓励以及团结一致对恶势力的抗争等无疑是一决定性因素。这些都更加深了他们感情上的认同及对彼此间友情的珍视。以后他们又陆续离开插队的地方，多数人仍回到他们的原籍城市。在回城以后的岁月里，尽管他们职业有区别、事业有成败、社会地位分化剧烈(4)，但当年同甘共苦的经历成为感情上很强的纽带，使他们之间依然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他们经常聚会在一起，总是要谈起当年插队的往事；彼此间仍保持着一人有困难、众人援手相助的淳朴情义。这在当今人际关系淡漠、讲求实惠的社会中，无疑是很难得的。一般说来，青少年时代由同学而结成亲密伙伴关系的初级群体，往往因其成员步入社会后星流云散难于继续长期保持密切的联系。知青群体的最初形成，虽然同样与同学关系有关，但是这一关系中却有“文革”初期学校那一段及插队艰苦磨难的共同经历。正是由于这一共同的经历使他们结成的亲密伙伴关系而历经几十年而不散。如今社会上形形色色的社会群体中，普遍存在于知青群体内部的认同感和凝聚力远非其他群体所能比拟，其原因主要就在于此。他们曾有过共同的经历，又长期保持密切关系，尽管都已年届半百，各自工作繁忙，群体的氛围仍能使他们象当年年轻时那样结伴远行，返乡探访。

其次，知青返乡探访，是为了满足他们怀旧情绪。30年前下乡的知青，多是十几岁至多不过二十岁左右。如果不是在“文革”时代，他们应该读书完成学业并能实现希望和向往的生活。然而“文革”剥夺了他们这一自由选择的权力。尽管当年的很多人是“自愿”上山下乡接受“再教育”，可当时极“左”笼罩下的中国，他们不可能有其它的选择。这使他们在充满了无限美好憧憬的年代，只有一条上山下乡的道路可以走。也就是说，他们一生中应该读书学习的最宝贵时光，是在农村插队中渡过的。当年作为城市中涉世未深的青少年，他们第一次走上社会，就一下子从繁华的城市走到社会的最底层，和当地的农民一样备尝生活的艰辛。老三届的学生报名下乡插队时，许多人都是真诚地响应毛主席的号召，走与贫下中农相结合道路的。然而农村的现实，使他们在体尝艰辛生活中除了在与淳朴的农民交往中给他们以慰藉外，更多是感到精神上的失落和痛苦。几年的生活中，他们就经历了最初怀着“与贫下中农结合”、战天斗地的自豪感到受尽挫折磨难、甚至遭受百般摧残的种种生活体验。(5)他们无不经历了从

满怀憧憬和希望到失望以致绝望的心理变化。甚至最初他们战天斗地企图用自己青春的汗水改变农村落后面貌的行动，也变成对大自然的严重破坏。(6)这些经历刻骨铭心，他们始终无法忘怀。(7)几十年过去了，当年的知青早已在城市的生活中找到了位置，一些人还有所成就。回想起来，他们都深深感到尽管农村插队消磨了青春年华，失去了许多本应该得到的东西，但他们也毕竟得到实际生活能力的锻炼，从对社会毫无了解的城市学生，成为对中国农村和现实社会有了深刻体验的人。这一艰苦生活的磨练成为他们以后走出农村从事各种工作、经受各种新的生活考验的一个坚实基础。当年的知青后来在各行各业的表现，说明了在经历过农村艰苦生活磨难的他们身上，有着其他城市人所不能比拟的征服困境、挑战压力的勇气和力量。所以，当知青们坐在一起追忆他们在农村度过时光的时候，很少有人诅咒当年的上山下乡，而是更关切的是那些熟识的老乡现在生活的怎么样、农村有否变化；知青插队当年还没有可能实现他们改变农村面貌的初衷，如今他们或许可以为自己曾经挥撒过汗水的贫瘠土地提供一些帮助。他们无不希望自己生活过的农村、那些和自己曾经朝夕相处淳朴的老乡也能过上富裕的日子。还有，城市中喧嚣、紧张的生活以及人际关系的淡漠，都使他们感到当年虽然生活艰苦但彼此间互相信任和友谊的可贵。故地重游，重温当年的体验是他们一直的期望。这种感情随着他们离开农村越久，就越强烈。

还有，知青返乡探访，也是为了使子女了解父母的当年，让子女也从中受到一些教育。知青一代中断了应该接受的教育，许多人无法圆自己上大学的梦想。因此他们多将希望寄托在子女的身上。知青以前的上一代人，对子女教育在精力和金钱的投入程度上根本无法和知青这一代相比。此外，知青在成长的五、六十年代，社会上重视传统教育。这种教育方式对他们影响至深，也使他们与自己的父母之间在生活方式和情感上差异不大。知青的子女多出生在改革开放以后，社会转型及整个社会观念的转变，造成他们与子女之间的代沟比他们与上一代之间要大的多。知青一代生活中还能崇尚俭扑，他们的子女却因在这方面经常与他们发生矛盾。他们很希望子女象他们一样对待生活。他们过去所接受的教育方式，很自然地使他们选择对自己一生影响最大的插队经历来对子女进行教育。现在社会很难提供这样的条件，学校中更没有这种氛围。到农村探访，让子女对他们经历过的艰苦生活有所了解，也就成为返乡探访的动机之一。

再有，知青能够返乡探访，与当地干部的重视与欢迎态度有重要关系。知青当年下乡插队，非但不能给农村带来什么帮助，反而增加了当地的负担。这是许多地方知青插队时与当地干部和农民关系紧张的一个重要原因。如今几十年过去了，当年的恩恩怨怨已成过眼云烟。过去曾管理过知青的基层干部或已不在人世，或已垂垂老矣。新一代的农村干部都在为促进自己管区经济发展寻找各种机会。回城的知青许多已今非昔比，他们可能成为给农村发展带来信息和财富的一种社会资源。那些脑子灵活的乡村干部早已带上当地的农产品，拉上和知青熟识的村民到城里联络，希望当年的知青社员为家乡的发展想想办法。一时无法和知青联系上的乡村干部，得知知青返乡，更把它看作是与知青联络感情、建立联系的难得机会，给予特别的重视。笔者与插友返回原插队的牧区探访时，虽然事先并未通知当地，但苏木(即乡)的干部听说是当年知青返乡，立刻热情接待，并一连几天全程陪同。杀羊款待不说，还将当年与我们熟识的老乡都找来畅叙，以增加融洽的气氛。与熟识的老乡相会，使我们追忆起许多往事，仿佛又回

到了当年。而这些当年可以作为知青顶头上司、能够决定知青命运的干部，交谈中还一再表示是向我们汇报家乡的工作，似乎我们是上级部门派来的检查团。此情此景，不禁让我们这些当年接受“再教育”的子民受宠若惊，顿生物换星移，恍如隔世之感。当我们将这些情况告诉其他的知青时，立刻激起了他们一定要返乡探访的愿望。

总之，知青返乡探访，最终还是与知青这一代人年轻时插队这一特殊的经历有关。知青群体的构成、共同的情感需要、对下一代的期望以及能够与农村干部和社员建立关系等等，无不与他们的这段特殊的经历有直接关系。知青一代人在青少年成长时期，插队的特殊经历会给他们在精神上和心理上都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造成十分凸显的“知青情结”。这个情结，成为他们共同心理和集体行为的根源。知青集体返乡探访行为的出现，“知青情结”是主要的内驱力。

二

知青能够实现返乡探访的，可能仅占当年几千万知青中很小的一部分。作为知青的类似旅游探亲的一种自发行为，它本身不可能带来多大的社会影响。但还是有一定的社会意义。

知青下乡插队的许多地区，至今仍属贫穷落后地区。不但缺人才、资金，也更缺乏信息。前面提到，许多知青都希望自己生活过的农村、那些和自己曾经朝夕相处淳朴的老乡也能过上富裕的日子，他们认为应该尽所能对那些父老乡亲们提供帮助。特别是那些已成为社会各单位各部门的各级领导干部和负责人的知青，在返乡探访之前，就事先进行策划如何能够提供一些具体的帮助。据笔者的所知，这种帮助有的是捐赠钱物给当地的希望小学支持教育的；有的是为一些项目牵线搭桥能够发展当地经济的；有的是帮助建立提供信息和销售渠道，以使农民在出售农畜产品时减少中间商的盘剥；甚至带一些当地还缺乏的物品送给老乡，等等。这些帮助尽管还形不成规模，但毕竟也显示了这些知青对插队乡村的一片情意。在帮助落后地区摆脱贫困的过程中，不但国家要给予大力的支持，还应积极动员民间的力量。那些与当年插队农村结下不了情知青们，如果国家和地方有关部门加以引导和关注，积极创造一些条件，对这些落后地区的发展还是能够提供一些有益的帮助。几千万知青中如果仅能动员其中的一部分，对那些贫困和边远地区的来说也是一支不小的力量。

知青返乡探访，对于密切偏远落后地区与城市的关系，有一定作用。知青多来自大中城市，他们插队的乡村，多在偏远地区。尽管改革开放以后农村和城市的关系日益密切，但对偏远地区来说，还远不如与城市交通近便的乡村那样容易从城市中得到信息、资金和技术。知青的返乡，无疑给那些乡村与城市建立稳定联系的机会。一些乡村的干部和社员就利用这个机会进城找知青寻求支持和帮助。由于知青本身在城市中的群体网络的覆盖面大且广，他们的要求总能或多或少地得到满足。这对于那些难于得到城市帮助的偏远乡村，也是十分难得的机会。

知青返乡探访，会引起人们再次对知青一代人关注，从一代人的坎坷经历中去探讨历史的教训。“文化大革

命”给我们国家和民族带来深重灾难，教育的破坏最为严重。那种以与“贫下中农相结合”为名义使一代人被迫中断学业，不但给他们的人生带来许多意料不到的困难，(8)也给我们国家和社会的发展带来重大的负面影响。例如，我们国家现在许多行业特别是教育和科技部门出现的人才断层，就与“文革”中大学停止招生、这一代人上山下乡有重要的关系。这种沉痛的教训，我们民族应该永远记取。所以，知青返乡探访，从根本上说，决非是肯定过去的上山下乡运动，他们每一个人都决不会赞成这样的历史重演。他们插队经历本身就是我们国家和民族那一段灾难的见证。反思“文革”，使我们民族永远记住历史的教训，知青无疑是一个大的题材。很可惜，有关知青问题除了文艺界有较多的作品外，学术界的研究是远远不够的。

知青一代涉及到几千万人。(9)他们是共和国时期成长起来的几代人中，遭遇最为不幸、经历最为坎坷的一代人。当他们正处在青春年华时，不但中断学业，还从城市插队到农村。以后虽然他们大部分又返回到城市，但为了在城市生存，他们不得不一切从头开始，许多人就因此无法或错过了继续学习的机会。知青中能够接受完高等教育、能够有所成就的只是他们其中很小的一部分。他们之中的大多数人还是在城市中干着那些稍加训练就能从事的简单、笨重劳动。他们所承受的生活、工作的压力，远非城市中其他社会阶层所能比拟。但是他们没有抱怨，没有自暴自弃，只是默默地承受着这历史的不公，顽强而艰难的生活着。那些如今在生活上稍不如意，即抱怨社会不公的人来说，他们今天遇到的困难，实在是无法和当年知青们相比的。知青返乡探访，与当今人们活动讲求个人效益、好处相比，实在算不上什么。但对知青来说，这是了却他们心中多年愿望的唯一举动。他们踏上返乡探访道路后的心理感受，他们的诉求，远不是任何人都能理解。只要知青存在，就不断有新的知青话题，知青们就不断演绎出新的故事。

注释

(1)指1966届、1967届、1968届的初、高中毕业生。

(2)刘醒龙：《大树还小》，载《上海文学》1998年第1期。

(3)“文革”初期，许多中学生参加的红卫兵组织，不断地分化组合。某一组织成立几天，就分裂为若干各不同观点的组织；几天后某组织和另一组织又联合起来的情况十分常见。这种分化组合，与这类群体活动有关，或者促进了这类群体的产生。

(4)近十几年，回城知青的社会地位分化较比其他时代出生的人更为剧烈。他们当中有的成为政府、大型企业的高级管理人员，有的成为下岗分流人员。参见彭希哲、任远著《从“知青一代”的职业流动看社会变迁》，载《社会学研究》1998年第1期。

(5)刘小萌著《中国知青史----大潮》(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5章“陷入困境的运动”、第11章“政

治冤案”中列举了许多具体的实例。当时的知青几乎人人都可以举出自己或身边这样的例子。

(6)《血色黄昏》(老鬼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中描写的知青在内蒙兵团的组织下大规模的垦殖草原，造成了草原的大片沙化，结果又不得不退垦还牧。有的在东北兵团的插队的知青回忆说，当年兵团盲目学大寨，因大寨在山区建梯田，一些地方竟模仿在平坦的黑土地上用人工堆梯田。

(7)知青在一起最常谈的话题就是他们当年插队的往事。1990年11月在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展出的《魂系黑土地----北大荒知青回顾展》的展出期间吸引了北京及外地甚至国外的当年北大荒知青前去观看，一时在当年的知青中引起强烈的反响。

(8)据上海的调查，知青这一代人相比其它年龄组来说，整体文化水平和职业技能偏低，他们在上海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的劳动力市场竞争中处于最不利和最脆弱的地位。见彭希哲、任远著《从“知青一代”的职业流动看社会变迁》，载《社会学研究》1998年第1期。

(9)据统计从1962年到到70年代末，共有1700万城镇知青到农村插队落户，农村学生在城镇读书后返回农村的人数更多。参见杜鸿林著《风潮荡落》(海天出版社1993年版)，刘小萌著《中国知青史----大潮》(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

1998年10月

华夏知青网不是赢利性的网站，所刊载作品只作网友交流之用
引用时请注明作者和出处，有版权问题请与版主联系
华夏知青网：http://www.hxzq.net/
华夏知青网络工作室

“青春”与“热血”

——知青问题思考之一

回顾知青岁月，常有人提到“青春和热血”这个词。曾在云南农场的上海知青编辑的《勐龙记忆》书里，赵凡题的：“青春和热血谱写的篇章”这几个字被放在了最前面且占据整整的一页。事实上它已不单单是一个词组了，它体现出的是对知青历史的一种观点和看法，具有明显的倾向性。

“青春”很容易理解，对于知青来说，那就是当年下乡的那段岁月，对底层知青来说，同时又是漫长的十年辛苦劳作的一段生命。“热血”是什么？我的理解是激情燃烧；头脑发热；热血沸腾；无所畏惧；奋不顾身。它具有一种狂热性。

那么知青是否有过“热血”？产生热血的原因是什么？知青的“青春”和“热血”又是处于一种什么关系呢？

根据本人对十年云南农场岁月的感受，我把知青生涯分为三个阶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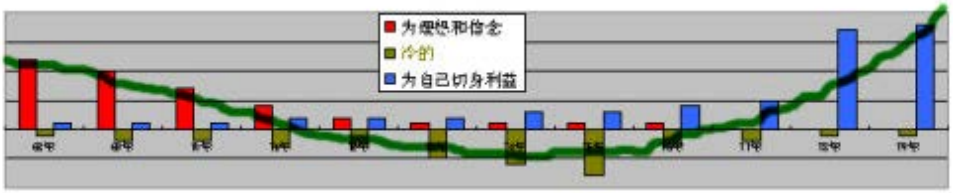
第一段是68年到71年9月林彪事件发生。68年最早下乡的一批知青基本上是在没有其它出路的情况下自己报名来的。大部是66、67届初、高中毕业生，经历文革初期的运动，多少还带有那个年代的理想和信念。在当时的政治气氛和一部分人的带动下，加之年轻人刚下乡时的新鲜感及互相竞争表现，“青春”确实和“热血”相伴热过一阵。接下去知青大批下乡“一片红”。绝大部分人是被“裹挟”而去。大多是68、69、70届初中毕业生，少有理想的束缚，较现实。他们没有把热维持下去，处于不稳定的微热状态。到71年9月林彪事件发生，知青群体已经是由一开始的热慢慢地冷下去了。产生原因我认为有二条：第一是林彪事件发生使得许多知青对理想和信念产生了怀疑和动摇，大脑冷静了许多。第二，此间许多知青都经历了探亲回城，城乡的巨大反差使他们逐渐现实起来。大部分人付出没有回报也使他们心冷，加上家长的规劝（家长不会头脑发热），因此，再热下去的基础已经没有多少了。

第二阶段是从71年9月到76年10月“四人帮”倒台。这段时间是什么状态呢？我觉得是不冷不热到冷的过程。曾经开始最热的一部分人有的提干，有的读大学，获得了一定的回报。读大学的走了，提干的一部分人还会热一阵。随着一大批老干部的解放，有权人的子女也各显神通地离开了农场。每一个人的离去都动摇着知青的信念。加之劳动生活丝毫未有改善。这时已不是热不热的问题，而是人心不稳的问题。还记得知青家长李庆霖72年底给老毛写的那封信吗？那是在向老人家诉苦的信，也是向国家诉苦。那年头可以说是知青苦，家长也苦。不到熬不下去

时，谁敢写？在新闻严格控制的国家里，73年4月把它和老毛的回信一起公之于众，这已经说明了知青问题已经发展成了一个日趋严重的社会问题了。老毛也只能寄点钱“聊补”一下。可见此时人心是冷的，何来的热血？

第三阶段是76年10月到79年知青大返城。自四人帮倒台后，知青残存的热血又慢慢地燃烧起来，到了78年底至79年达到高潮。这时的“热”已远远超过了68年开始时的“热”。他们罢工、卧轨、请愿、游行、绝食、下跪。虽然“热”的形式反映同前面的“热”相同，既：激情冲动；头脑发热；热血沸腾；无所畏惧；奋不顾身并带有一种狂热性，但性质却是完全不同。前面的“热”是以理想和信念为主体，也掺杂着部分个人私念和愚昧的成分。而后面的“热”却是完全为自己，为知青这个阶层的利益。让我们比较二者的口号就能体会到二种热的成分了，前面热的口号是：“为共产主义事业而献身”；“消灭帝修反，解放全人类”；“革命加拼命”；“为了祖国的橡胶事业”；后面热的口号是：“我们要回家！”归结以上叙说，可见知青的“热血”是出现在知青岁月的二头，而二头的“热血”的本质却又大不相同。中间部位是以冷为主的，下面是我根据以上叙说和个人的感受将“热血”指数做成图表。我将其连起来,可见图形呈倒抛物线状。

知青"热血"指数图：



从上图可看出，知青群体经历了一个一开始还存有为理想事业奋斗的热情，到中间的迷茫，无奈，压抑,万马齐喑的状态,再到最后由自己来为自己的利益而奋斗的曲折变化过程。其中林彪事件和四人帮倒台这二件事情的发生又是知青转变的拐点。这既是知青冷热转变的过程，同时又是知青群体公民权利意识觉醒的过程。这些过程反映可从云南知青出的二本书里得到反映。前面的热可从《勐龙记忆》中看出，后面的热可从《飓风刮过亚热带雨林》得到较为完整的反映。

我暂将前面热的那部分人称之谓“理想派”。后面热的那部分人称之谓“现实派”。

“理想派”那部分人的“热血”因为同国家的政治要求合拍，他们中的许多人或多或少都得到了回报。因此他们中的部分人总喜欢强调“青春和热血”这个词，并有将此代替知青青春的全过程的意图。

“现实派”那部分人的“热血”由于同政府的方针不合拍，总体的日子不太好过。他们基本上不提这个词组。这个词带着热情和自豪，有一种粉饰“上山下乡运动”的意思在里面。他们不说“热血”，只说“抗争”。

因此，“青春和热血”这个词组是不能替代知青所走过的全部下乡岁月。个别人从开始一直“热”到最后，至

今依旧热情不减，那也仅为极少部分人。这样的人任何时代都会有，说明不了什么问题。有人喜欢把“青春和热血”作为标签贴在自己下乡的历史上，那完全是个人的自由。但如果总想往知青这个群体上贴，就有点讨嫌了。

木瓜文集：http://hxzq.net/showcorpus.asp?id=66

华夏知青网不是赢利性的网站，所刊载作品只作网友交流之用
引用时请注明作者和出处，有版权问题请与版主联系
华夏知青网：http://www.hxzq.net/
华夏知青网络工作室

谈"奉献"

——知青问题思考之二

把“奉献”提升到精神的层面上，称之为“奉献精神”，这在知青群体里已是屡见不怪了。下面这句话比较典型：“什么是知青精神？……知青精神就是：知青身上体现出来的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奉献精神。”(中国知青论坛《知青精神是什么》)什么事一旦上升到了精神的高度，感觉就神圣了许多，事情也好象给定了性似的。接下来就是如何去继存、发扬和光大了。

既然知青具有了“奉献精神”，而且是“强烈的”，那一定是奉献了很多很多。如果仅奉献了一点，偶而献那么了一次爱心，是不敢说什么精神的。只有奉献的量到了一定程度，并产生了质的飞跃，“精神”才会闪亮登场。

那么，知青到底有没有“奉献”？“奉献”了些什么？“奉献”了多少？为什么去“奉献”？……

我把自己十年下乡岁月仔细回顾了一下，极力想搜索“奉献”存在的事实依据，结果发现似乎难以定性。既然好多知青都说是“奉献”，下面就权当是“奉献”先来探求一下。

为了将知青的“奉献”阐述的更清楚，我将它和现在人的“奉献”放在一起，通过比较，看看知青的“奉献”有什么特别所在。

第一，关于奉献的时间：

现在人的奉献是不存在时间段的问题，任何时候都可发生。一年里或几年里有过一次或几次。（个别除外）

知青讲的奉献主要是指下乡十年左右的一段时间，（不谈经济转型期间知青群体下岗、失业也算奉献的话题），知青的奉献没有次数，是一个连续存在的过程。

第二，关于奉献的动机和目的：

现在人的奉献出发点是人性善良的一面，出于同情心为多。

知青奉献的出发点借用上面那句话是“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在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少有人性的成分。

第三，关于奉献的对象：

现在人奉献的对象是具体的，实在的。如某一次自然灾害引起的受灾群体或者是某个困难家庭的成员，还有穷困地区的教育等等。

知青奉献的对象是一种大而漂浮的东西，难以描述它的具体形态。如“革命”、“理想”、“祖国”、“事业”等。

第四，关于奉献的东西：

现在人的奉献是具体的，比如一个人或家庭的收入是1000元，他在某一次献了100元的爱心。这100元就是奉献的货币价值。有人放弃了自己半天休息时间去做义工了，这个人的休息时间和付出的劳动也是实在的奉献。

知青的奉献是无形的，讲不出具体是什么，我个人理解为知青的劳动和青春。劳动还可估算一个大概的价值（遗憾的是这个价值未被社会认可），青春怎么个算法？

第五，关于奉献的形式现在人的奉献是完全自愿的行动，没人强迫，最多有时单位里会提一个数字要求，这时你也可以拒绝履行。

知青的奉献带有强制性的，既你的青春就是下乡，其它没有选择。你必须奉献出你的青春。有知青说：“我是自愿的。”我们假定当时可以选择继续读书，或者留在城里的企事业单位里，还有几个人会自愿报名。如果国家不搞“文化大革命”而是象现在一样开放，知青可以去外资、集体企业，可以去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去谋职或打工，可以自己做小生意谋生，还有几个人会自愿报名。既然国家把知青的这些出路都断了，知青不报名又有什么办法呢？就是想当“啃老族”也是不允许的。另外知青的劳动报酬也是没有选择的，农场里国家给多少是多少，插队的是分多少是多少。这收入仅能维持或者难以维持个人最低的生活要求。是不是知青劳动的报酬有部分已被强制奉献了呢？

第六，关于奉献者的情况：

现在人的奉献是个体或者是一个单位，这种奉献对奉献者的来说并不影响他或他们的基本生活。往往奉献者的生活状况要相对优越一点。

知青的奉献是整整一个阶层，一个群体的奉献。这个群体处于社会的底层，这种奉献已经严重影响到他们的基本生活。

第七，关于奉献的认知：

现在人的奉献基本上是一种不图个人回报、心甘情愿的；无怨无悔的行为。

知青群体中对这种奉献的认可度是不一样的。有人自豪，有人无奈，有人并不认可。

我将上面所说归拢一下得出：知青的奉献是一种在外力或“信仰”的驱使下，带有强制性的，付出也是讲不清楚、缺少社会认可的，本身认同也不一致的奉献。

世界上有这样的“奉献”吗？

鉴定是不是奉献，我觉得实质的问题只有二条，一是看它自愿的还是强制的。二是看它是否奉献出东西并确实给社会和别人以帮助。

第一条前面已经阐述过了，我们来看看第二条：假定知青的青春和劳动作为奉献存在，奉献给谁了？你说奉献给国家？国家想想也怨呵！我付出三百个亿，又给谁了？没人说好还要怨声一片。你说奉献给农村了？农民想想我好人做不得，你们插队落户来了多张嘴吃饭，怎么变得我就象欠你们什么似的。你说奉献给祖国？祖国有知的话也会说：你们把我的热带雨林砍光了，你们破坏了我的植被，使我的生态得不到平衡。

这还是奉献吗？

再来看知青为什么“奉献”。前面我归结为：“革命”、“理想”、“国家”、“事业”……。先谈“革命”。那时所说的革命有二种，一种叫“世界革命”；另一种是毛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什么是“世界革命”？通俗地讲就是跑到人家家里去捣乱。这明显违反周总理在万隆会议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难道是我们应该的奉献？“世界革命”不谈，谈毛的“革命”。毛的“继续革命”直接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发生。那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穷折腾，是脱离现实的乌托邦。它严重地破坏了生产力的发展，是导致我们上山下乡的主要原因。这难道也是我们要做的奉献？再谈“理想”。理想本来就依托在革命的包装袋里，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剩下的只有“国家”还叫得响。为国家做奉献又怎么样呢？国家就是国家的，个人分得什么好处呢？中国电信是国家的企业，电力也是国家企业，铁路也是国家的……。垄断的国有企业赚你的钱还少啊。国家占有越多，产生专制的经济基础就越厚实。只有一点是大家共享的，既国有企业曾经大面积的亏损，银行里坏掉多少帐，最后都由谁来承担了？

为这“奉献”还值吗？

我认为这是一个既不值得，也不符合常理的奉献。它更符合“剥夺”的含义。任何强制性的，把他人青春强行纳入一种苦难的轨道，或者强行占用别人的劳动，仅付给极少报酬的行为，都是一种“剥夺”。

国家谈奉献，那是国家政治的需要，是为了从精神上“安抚”我们这些被扔出去的“包袱”。对我们来说，我觉得不是什么奉献不奉献的事，而是“权益”是否受到了侵害。

华夏知青网不是赢利性的网站，所刊载作品只作网友交流之用
引用时请注明作者和出处，有版权问题请与版主联系
华夏知青网：http://www.hxzq.net/
华夏知青网络工作室

谈“苦难”

——知青问题思考之三

1、

一晃，从云南农场回来快三十年了。但离开前那一幕幕依旧清晰地留在我的记忆里。

每当谈起它总会想到一个字：“逃”。有人说是“逃亡”（或胜利大逃亡）。何谓“逃亡”呢？一种解释是出逃在外流浪，另一种解释是逃命，逃离死亡。我倾向于后一种解释，这种死亡不是身体的消亡，而是精神上的：既如果不出来，这一辈子人生基本完了。

还有人说是“逃离”。逃离是对那个地方产生害怕或厌恶情绪，逃也似的离开。它往往是人们面对灾难本能的一种反映。拼命逃离是为了求生。对知青来说就是去追求新的人生。

我认为这个“逃”字既形象又恰当，它反映了当时的场面和知青的心态，同时也是几万知青在最后阶段用行动给上山下乡运动做的一个注释：灾难。

这灾难给我们带来生活和劳动的苦。虽然我们的生活也有笑，有唱，有穷开心，但当夜深人静时，想到前程茫茫，不禁黯然伤悲。每每看到别人用各种方式离开农场，我们心里更有一种酸苦的感觉。这感觉与远方父母的思念和担忧是相通的。这已不是一般的苦了，它是生活和精神双重的苦，是渗透到心中的苦。苦到心里去的苦叫什么？叫“痛苦”。

又是痛苦又是灾难在词典里称作“苦难”。

于是有了知青写的书：《苦难与风流—老三届人的道路》（1994年上海人民出版社）于是有了知青的话语：“苦难是一种财富”。

于是……

2、

既是苦难，那么这苦难具体是哪些呢？由于知青各自境遇不同，感受也会不一样，我仅依据个人的感受和对底层知青的观察整理了一下，有以下几条：

1，向往和愿望同现实存在着太大的差距，自己又无力去改变，时时被一种无望和失落感笼罩着。

2，城乡的巨大差距使得知青感受到了地位的卑微和屈辱。

3，单调、闭塞、艰辛、困苦的生活使知青深感日子过的无味。

4，失去了自己支配自己生活愿望的权利和自由，（想回家不能回家，想读书也不可能，生病了想辞职回家也不行）有一种被强制的压抑感。

5，生活苦，劳动苦，精神生活枯糙。

6，吃苦没有回报，也看不到出头的日子，感到无助、无奈和悲哀。

从以上归结可看出，知青的苦难更多属精神层面上的，如果单是物质上的苦，知青完全能够承受。事实上知青群体是不怕苦的，他们也吃的起苦，之所以他们最后纷纷逃离并不仅是因为苦。而是承受不起上面所说的那“苦难”。

这就能够解释为什么知青总要忆苦，而同样的生活和劳动环境，当地人或原农场职工没感到有那么多苦。在79年知青离开农场时，又有大批农村的人挤着要进农场。

这样，我们也能理解为什么那些洋插队的人，他们当时在国外也苦过，但他们很少谈苦，他们往往很自豪。

那些做老板的人，他们承认创业的苦，但不会说是苦难。

那些民工，他们承认挣钱的苦，挣到钱，他们很高兴，认为苦的值。只有那些受骗的民工，苦了拿不到钱，才是苦难。

3、

苦难伴随着愚昧，同时也产生愚昧。它使我们知识贫乏，对我们民族的文明进程是一种倒退。

苦难浪费了我们最富有创造力的青春时光，改变了我们人生的轨迹，对我们一生的损伤是无法估量的。由于是整整一代人，因此对国家民族的损伤同样是无法估量的。

苦难不同程度地摧残了我们一代人的身心健康。

苦难也是一种财富，但这财富同个人或国家所受到的巨大损失都是无法相比的。

4、

人类从本质上来说是追求舒适而拒绝苦难。人们喜欢追逐财富，因为财富能够带来舒适和美好。只要是在一个相对公正的社会竞争环境里，这种追求本质上是推动社会向文明和富裕发展的动力。没有人喜欢苦难，苦难带给人们的是痛苦，没人喜欢痛苦的感觉。社会强行将一代人推向苦难，其做法是违背人性的，是对人性的摧残，是历史的倒退，也是上山下乡不得人心的根本原因。

5、

我们经历了苦难。其实那年头大部分老百姓都与苦难相连，只不过知青的苦难以及对苦难的感受更深重一点。这是整个国家大政方针造成的问题。因此，当我追寻苦难根源的时候，发觉我们民族的苦难是一连串的，造成苦难的根本因素往往又是一脉相承的。

57年的那场反右，55万右派近二十年屈辱的日子，承受的苦难远在我们之上；大跃进后期农村饿死上千万人，他们又何至是苦难呢？命都没了；胡风以及牵连到的一大批文人，也是近二十年，关的关，死的死，疯的疯。这都是怎样的苦难啊；还有那些地主富农及他们的子女们，多少年一直过着被侮辱，被排挤的日子……。

谁造就了这些苦难？为什么要这样做？难道“革命”的结果就是造成这些苦难？难道以“革命”的名义就可以将另一部分人推向苦难吗？我不禁要问：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造反是否有理？

严格来说，任何以“革命”的名义将另一部分人推向苦难都是一种极不道德的行为。

虽然我们经历了苦难。但对苦难的追问和探求还是太少。对苦难的美化却时时可见。

苦难再一次降临到我们这个民族的头上，这是有可能的。

写于 2007-09-14

木瓜文集：http://hxzq05.d68.zgsj.net/showcorpus.asp?id=66

谈“知青精神”

——知青问题思考之四

只要稍加留意，在知青群体的活动里，总可见到或听到“知青精神”这样的话语。记得一次看知青演出，舞台右侧悬挂着一条醒目的红色标语就提到：“弘扬知青精神奉献创业奋斗进步”（见下图）至于知青文章里提及它可说是成千上万。我在网上打下“知青精神”四个字搜索一下，竟然有二百多万个信息。真有一种铺天盖地的感觉。

既然有那么多知青提到它，那么，这“知青精神”到底是什么呢？

上面标语是一种说法。我在网上大致游览了一下，发觉虽然对此解说不计其数，但细看一下其实很多是雷同的。我摘录如下：自强不息、奉献自我、艰苦奋斗、永不言败、永不放弃、团结顽强、乐观向上、坚忍不拔、无怨无悔、不畏艰难、勇往直前、勇于奉献、不屈不饶、任劳任怨、吃苦耐劳。有意思的是，他们的归纳都是朗朗上口的四个字。也有知青看问题深了一步，将以上说法归纳了一下：如(老哥的影视部落)侯隽说：“知青精神的灵魂是责任和奉献。……”再如（中国知青论坛）知青精神就是：知青身上体现出来的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奉献精神。我觉得他们的归纳点中了问题的要害。说了那么多话，其实，灵魂就是奉献。

在无数的文章观点中，我听到了另外一种声音。这声音显得太微弱，因为仅看到一篇，属“独养儿子”。我摘录如下：什么是知青精神？…对命运不屈抗争，…对所谓真理和偶像大胆质疑发问，对人类文明追寻探求，……产生救国救民的悲悯，…（黎服兵的博客）

看的出以上解析有二种观点。前面“精神”的灵魂是“奉献”。后面明显可看出是“怀疑”和“抗争”了。

有趣的现象是，谈前面“精神”的人从不提及后面的“精神”，后者也同样。什么原因呢？稍微想一下就可知道，原来二者是不相容的。一个要弘杨“奉献”的人怎么会去提倡怀疑和抗争呢？要抗争的人跟你谈什么奉献？

虽然二者不相容，但我认为这不影响他们曾经共存过。他们都属于知青的“精神”一部分。不但在知青群体里共存，就是在知青个体身上也会出现共存现象：如有人倾向于奉献，但他身上也会有怀疑，有抗争的东西存在。同样，抗争的人，他的身上同样会存有为国为民奉献的意识。

除了共存，这些知青的“精神”不是固定不变的。它们应该是动态，是变量。在知青十年左右的生涯里，它会随社会环境和个人思想认识的变化而变化。拿我个人来说：开始阶段，前面所提“奉献”的精神在我身上存在有，中期是苦闷、悲哀、怀疑，而后期反抗精神的成分多了起来。我想知青群体精神的反映也应该是一种变化的发展态势。我分析是：奉献精神开始处于一定的位置，但很快地就滑向低谷，而怀疑和反抗却是由低向高发展。

除了上述这些精神外，我觉得在知青群体中还存有一种精神状态：即“中庸”。他们既不积极奉献，也不怀疑抗争。严格来说，他们许多人处于“半糊涂”状态。这里有真糊涂和假糊涂以及难得糊涂。当然许多是被“灌”糊涂的。我想，当年的我总体上也应划归这糊涂一类。他们在知青群体里占有了很大的成分。少了他们，知青的“精神”含括是不完全的。但这又算什么精神呢？就暂称它为“中庸精神”吧。

把以上这些都加起来，知青的“精神”所含盖的内容就基本全了。

但同时，“知青精神”的提法又值得怀疑？哪有一种叫精神的东西又包罗了这许多的精神呢？知青是一个群体，如同“工人”、农民“一样。我们有没有听说“工人精神”、“农民精神”的呢？没有，从没听说。那么是不是知青属于历史上的一个特殊群体就可称之为“精神”呢？好象也不是。拿“红卫兵”来说吧，他们该算是一个历史上的特殊群体了。有“红卫兵精神”吗？没有。只有“红卫兵的造反精神”。再说右派，见没见说“右派精神”的，没有。侵华日军有“武士道精神”，但不会说“皇军精神”。

精神是什么？是人的意识、思维、神志。知青群体有一千几百万人。这么多人，各色不同的人生经历，思维方式不尽一样，至今观点不一。怎么就可以知青的名义概括出一个“精神”来呢？！

别说是群体了，就是个人也很少见。有谁说“毛泽东精神”的？没有。只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历史上有“雷锋精神”的提法，但那已是“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代名词了。包括鲁迅笔下的阿Q。“阿Q精神”已经替代为“精神胜利法”的代名词了。

知青群体不具备被替代为某种精神的事实。因此，“知青精神”的提法是值得商榷的。

而事实是，历史到了90年代，如一股思潮涌起，借助于知青的活动，以“奉献”为主的“知青精神”就堂而皇之地到处展示着。这说明什么问题呢？

我觉得应从哪些人去极力倡导“知青精神”来分析。我留意一下主要有二类人：

第一、这些人往往当年在农村就比较“上进”，而且是“奉献”精神的有所回报者。具体表现为入党、提干、被推荐招生等等。到了90年代，这部分人凭借着党票、农村提干的锻炼以及文化知识上的竞争优势等。往往“混”的还不错。于是在总结自己“成功”经验时，追根溯源，必然地要强调“奉献”为主的“知青精神”了。

第二、同样是以上那部分人，有人回城后由于各种原因“混”的并不如意。由于社会财富分配存在着许多不公正的现象。对此，他们对现行改革的许多东西看不惯。有自己的看法，也很自然地留念过去，强调曾使他“辉煌”过一阵的精神。

其实总的说来，这种现象显示了我们这一代人的通病。既总喜欢活在别人给的一种什么精神里。当社会变革失去了这些精神时，人们就觉得不太习惯了，活的不自在了。于是总想去搞一个什么精神之类的东西出来，还极力要去“弘杨、继承、光大”它。

想想又何苦呢？累不累呀！大家自由地思想多好。管它什么精神！如果一定要有一种什么精神的话，那就弘杨一下“自由精神”吧。

本文得到知青朋友肖忘的指教以及在观点阐述上给予的启示。特此说明。

华夏知青网不是赢利性的网站，所刊载作品只作网友交流之用
引用时请注明作者和出处，有版权问题请与版主联系
华夏知青网：http://www.hxzq.net/
华夏知青网络工作室

知青失去了什么

知青失去了什么，这是个沉重的话题。

一部分知青失去的是生命

人的生命是宝贵的，生命对于人只有一次。年轻的、鲜活的生命尤为宝贵。然而，有多少顽强而又脆弱的生命消失在上山下乡的岁月？

1970年发生在云南兵团三师十三团二营四连因碰翻煤油灯引燃茅草屋的一场大火，无情地吞噬了平均年龄不到17岁的十名女知青。持续了几个小时的大火过后，人们在废墟中赫然看见，十个女知青跪在地上，彼此紧紧搂抱在一起，被大火筑成一座焦黑的雕像。她们曾经生机勃勃富有弹性的肌体已经变成一堆焦炭和一碰即碎的断肢残骸。

1970年广东兵团围海造田，遇台风袭击。为保卫拦海大堤，兵团战士手挽手跳下海水筑成人墙。台风和大潮过后，海面上漂浮起数百具男女知青肿胀的尸体……。

1970年黑龙江兵团一师独立三团二连打渔排织网班的七名天津、北京、哈尔滨女知青，乘小船收工回连队，突遇江上起风，小船翻沉。除一人获救外，如花似玉的六个少女从此消失在滔滔黑龙江。

1970年黑龙江兵团三十五团二连战士赤手空拳扑救紧靠中苏边界的一场荒火，来自北京、上海、哈尔滨的十三名女知青和一名男知青被大火夺走了生命。

1971年黑龙江兵团二十七团三十四连一女知青把水桶掉到井里，一名北京男知青下井捞水桶再没上来；又有两名天津、北京知青前赴后继下井救人也没上来；连同后来一名排长下井救人，四人皆因井下缺氧窒息而死。

1972年内蒙古兵团五师四十三团奉命扑救西乌珠穆沁旗草原荒火，人们义无反顾地向熊熊大火扑去。天亮之后，荒火烧到河滩自动熄灭，该团男女知青因救火壮烈牺牲达六十九人。半个连队的知青们随烈火而去，西乌珠穆

沁火场尸横遍野。

当年云南兵团各师团每年非法越境出逃和投奔M国人民军的知青达数百人，最多一年达六百人。其中一部分永远消失在异国陌生的土地上和热带丛林中，至今下落不明。

我下乡的新疆兵团农场，一名19岁的天津男知青在文革中被活活打死；另一名19岁的天津女知青被庸医——连队卫生员一针注射下去再没活过来；一名上海女知青在严寒的冬夜操作拖拉机牵引的农具开垦荒地，不慎跌落在犁铧之下，连同腹中孕育的婴儿，母子同归天国。

……

统计数字表明：仅在1978年一至十月，云南垦区知青非正常死亡人数就高达153人，另外失踪34人。其中自杀39人，位居各种非正常死亡人数之首。（邓贤《中国知青梦》）据刘小萌所著《中国知青史•大潮》的统计，仅1974至1979年全国知青死亡人数25690人，其中非正常死亡人数为15899人。

我不掌握1968年至1978年这十年间有多少知青失去生命的数字，只能说失去生命的是一部分知青。但我相信，如果不是被卷进这股上山下乡的洪流中，那些早逝知青的生命之树今天依然苍翠，而今我们只能向长眠于萋萋荒草下的他（她）们遥寄哀思。

很多知青失去的是爱情

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但失去的爱情是很多知青毕生的难言之痛。上山下乡年代最初知青要克服“资产阶级思想”，公然谈恋爱要遭到强烈非议，这在兵团曾经是纪律。到了婚恋年龄的知青一方面身处偏僻的乡村、山区、遥远的边疆，相对狭窄的人际活动范围造成择偶的局限；另一方面服从组织、考虑政治影响及生存条件，又给知青的爱情和婚恋深深地打上时代烙印。这种特殊年代非正常因素的影响，使很多知青失去了真正的爱情，产生无数爱情悲剧和婚姻孽债。双方同为知青之间的爱情由于“同是天涯沦落人”，一般来说感情基础比较坚实，婚姻持久，但在大返城的冲击下，也造成不少劳燕分飞、留下孽债的悲剧。而知青与农民的结合，由于婚前缺少一致性，婚后矛盾凸显，结下的苦果最多。难以称为爱情的婚姻或许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种类型：

为了生存型——只要有一个窝，能满足基本吃喝睡就结婚，无所谓爱情；突出政治型——一定要嫁给转业军人、共产党员、贫下中农（三块钢板）或者革命干部的子女，婚姻要突出政治，要革命化；改换门庭型——知青出身“黑五类”，为改变政治处境，找贫农为配偶，屈尊嫁娶；领导撮合型——基层干部乘人之危，威逼利诱，许诺为知青改变境况，强迫撮合成婚；解困草率型——未婚先孕，为了卸包袱，草草结婚，包袱卸完，婚姻终结。

云南兵团某团一对上海男女知青，在学校时青梅竹马，来兵团后相亲相爱，来往密切。连队领导在大会上批评

这是“资产阶级思想自由泛滥”，并采取组织措施强行隔开二人。一天深夜这一对情人在橡胶林里幽会被连长“捉奸拿双”，连长令连队紧急集合，把被扒得一丝不挂的二人捆绑在一起，批判示众。在宣布给二人行政记大过处分决定的当天，两个忠贞不渝的青年男女自缢殉情。

我所在新疆兵团农场某连，一个容貌姣好的上海女知青与一个原籍浙江的大学生、农业技术员在“文革”中热恋并偷尝禁果至怀孕。大学生被抓进“牛棚”，女知青面临生产。连队领导软硬兼施，逼迫女知青嫁给一个面目狰狞猥琐、年龄可以给女知青做父亲的老农。为了有一落脚之地生下无辜的婴儿，女知青暂时屈服，事后携孩子逃离。而令人遗憾的是她与技术员的恋情终究未能破镜重圆，实在是一场爱情悲剧。

白启娴的爱情和婚姻悲剧堪称突出政治的典型。河北师范大学毕业的白启娴到农村插队落户，与小学文化水平的农民仓促成婚。她努力适应向农妇角色转变却还要无故挨丈夫的打，并不惜美化自己并不如意的婚事，是“决心扎根农村干一辈子革命”的自觉举动。她收获的是“反潮流”典型的政治资本，失去的是弥足珍贵的爱情，她是那个时代的悲剧人物。

特殊年代、特殊环境下知青的爱情婚恋是畸形的。在云南兵团，当年未婚同居、先孕后婚、私生子现象惊人。有的农场未婚同居率高达百分之七十，连队为百分之九十以上；原一团1978年一至五月统计，非婚怀孕232人，生下婴儿108名；原五团同期有私生子51人。电视剧《孽债》绝非虚构。大返城时，黎明农场未婚同居104名知青全部各奔前程；勐捧农场9000多知青中未婚同居7000多人，非婚生子200多个；勐腊农场知青离婚1000多对，弃（送）婴儿达数百个。当年那个说不清的年代，丢弃儿女、两情割断是怎样一种撕心裂肺之痛？岁月的风尘掩埋了多少知青爱情婚恋的悲怆往事？

大多数知青失去的是受教育的最佳时机和公平的就业机会

十年废学，1700万知青被堵在大学、高中校门之外。除去六六届高中毕业生，大部分知青并没有读完高中、初中的课程，其中不乏从没进过中学校门的小学生。以现在的《义务教育法》衡量，很多知青至今没有享受到完整的九年义务教育的基本权利。那点儿可怜的受教育程度和贫乏的知识积累被称为“知识青年”，令人赧颜。知青基本上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从小接受传统教育，满怀伟大理想和抱负，本应成为共和国栋梁之才，在各领域发挥聪明才智。在我们之前，总书记和总理那一代人，在国家教育事业发展的鼎盛时期接受了正规的高等教育；在我们之后，高中毕业生直升大学，学士硕士博士出国留学一批又一批，以至我们的孩子都成了硕士博士。而知青中仅一小部分人于1977年复活了大学梦，大多数人则一生断送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并由此造成了人生命运被改写的结局。

伴随着改革开放，知青返城了。“我已是满怀疲惫……，归来却空空的行囊。”没有学历，没有专业技能，没有工作，没有自己的住房，没有处于同一个起跑线，也就无法参与公平竞争。知青成为受冷落的社会群体，曾经生我养我的城市变得那样陌生。尽管知青曾经辛劳、磨难、坚韧、顽强，但在激烈的社会竞争中已处于下风。新闻媒体不时报道陷入困境“老知青”的遭遇和诉求，表明这一群人已处于社会底层。

一代知青失去的是青春

“蹉跎”一词是指时光白白过去，虚度光阴。电视剧《蹉跎岁月》上映之后，“蹉跎岁月”四个字已成为那个特定年代知青们经历的代名词。难道我们希望蹉跎、愿意蹉跎？处在那个特定的年代，历史不依我们的意志为转移。著名学者余秋雨说：“在没有战争和灾荒的情况下，老三届可以说是20世纪有文化的年轻人中遭受最多磨难和折腾的群体之一。”著名知青作家蒋巍说：“只有我们的青春——中国知青一代的青春，在人类全部进化史和文明史上是独一无二、绝无仅有、空前绝后的。”我以为这“独一无二、绝无仅有、空前绝后”之处，是因为一代知青的青春不同于其他时代的青春，它缺少壮丽和美好，鲜花和音符，希望和憧憬；却充满了汗水和眼泪，苦难和艰辛，鲜血和伤痛。一代知青青春流逝之痛，应是祖国母亲之痛。

当华夏中国从三年自然灾害的饥馑中挺起来，“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使国家蓄势待发急需有文化有知识有体魄的建设者之时，当世界经济飞速发展、亚洲四小龙腾飞之际，我们却在白桦林里、大草原上、黄土坡下、芦苇丛中无度地垦殖，又不断地丢弃，事实上破坏着生态环境，白白耗费着青春……。想至此，当年的知青已近暮年的我，又怎能喊出“青春无悔”？

岁月之河匆匆流去，带走了一部分知青的生命，很多知青的爱情，大多数知青读书受教育和公平就业的机会，带走了一代知青的青春，一去不复返。

2009，7.10

华夏知青网不是赢利性的网站，所刊载作品只作网友交流之用
引用时请注明作者和出处，有版权问题请与版主联系
华夏知青网：http://www.hxzq.net/
华夏知青网络工作室

回望“老三届”

往事降临了，记忆回到近四十年前。

1966年夏季，随着毛泽东“炮打司令部”一声令下，“文化大革命”这只“潘多拉的盒子”被一下子打开,文化教育，工农业生产和其他各行各业，都受到了猛烈的冲击。

一个严峻问题很快就在学校突现出来：“文革”爆发不久，所有大专院校就停止了招生，全国中学积压的1966，1967年两届初，高中毕业生已达400多万人。进入1968年，解决中学毕业生的问题已经刻不容缓，积压在校的毕业生除1966，1967两届，加之1968届的598万人，三届毕业生（以后就习惯称为“老三届”）共达1000多万人。

如此众多的学生积压在校，出路何在？那时的“老三届”毕业生实际上已经成为城市的包袱，是城市的剩余劳动力。水到渠成，不久，一场声势浩大，旷日持久的上山下乡运动开始崭露它的头角。

细细想来，“文革”十年中，与“老三届”中学生息息相关的有两场运动，那就是红卫兵运动和上山下乡运动。而这两场运动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红卫兵运动如石破天惊，如摧枯拉朽的飓风扫荡全国，震惊全世界。它把这样一批年轻气盛，富于革命激情的学生推上政治舞台。1967年8月18日，当毛泽东身穿绿军装，佩戴红卫兵袖章，向欣喜若狂的革命小将高呼“我支持你们”时，年轻的红卫兵们天真地认为，自己似乎已成为决定中国前途乃至世界命运的主宰。

早在1966年6月“文革”爆发初，在全国每一所大，中学里，大字报大标语，铺天盖地；声讨会批判会，通宵达旦。6月6日，北京女一中高三年级的几十名学生率先提出：“彻底砸烂整个旧教育制度”，其中包括废除旧的高考制度。她们认为，旧的高考制度“突出业务，突出分数，贬低政治标准”，“排斥工农子女”，“扩大三大差别，和封建社会考状元没什么两样”。最严厉的批判莫过于“它助长个人奋斗的资产阶级思想，引诱青年走白专道路，实际上是为复辟资本主义服务”！义愤填膺的女学生们决定给毛主席写信，请求废除旧的高考制度。信中写

道：

“高中毕业生应该到工农兵中去，和工农相结合，在三大革命运动的风浪中锻炼成长。……这是一条新路，是一条通向共产主义的新路。我们一定要，并且一定能走出这条无产阶级自己的路。

亲爱的党啊，敬爱的毛主席，最艰苦的地方，要派毛主席身边的青年去。我们整装待发，就等您一声令下。……”

1966年下半年，红卫兵运动正如火如荼时，已然有一些“老三届”学生，在意识到考大学当专家的理想被否定之后，就开始真诚的脚踏实地地探索新的人生道路。由于“文革”前学校教育的大量灌输，这条新的，革命化的道路对我们并不陌生，那就是“与工农相结合”。我们从一踏入中学校门起就经常被组织到农村，农场去参加生产劳动，大约1965年以后，许多中学在每学期都要组织一次下乡劳动，时间一般在1周至10天不等。那时对以往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举动的宣传也大张旗鼓，那部表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战天斗地的纪录片电影《军垦战歌》，曾使我们大开眼界，倍受鼓舞。也许很多人对那首插曲至今还记忆犹新：

“迎着晨风，迎着阳光，跨山过水到边疆。伟大祖国天高地广，中华儿女志在四方。

哪里有荒原，就让哪里盛产棉粮，哪里有高山，就让哪里献出宝藏。

红在边疆，专在边疆，在斗争中茁壮成长，……的伟大理想。”

另外，还有电影《生命的火花》以及邢燕子，侯隽，董加耕等知青先进典型，这些都给予“老三届”学生们以深刻的印象，也为促使他们之中的一部分人自愿上山下乡增添动力。

1966年底，北京市的一些红卫兵就自发组织了红卫兵农垦战斗团，这最初的有规模的上山下乡的雏形，并不是政府动员的结果。而后是发轫于1967年初的，由北京雄心勃勃的“造反派”红卫兵率先组织起来的上山下乡，这时的他们认为，自己在发动一场继续革命的“新长征”。这以后，几批北京红卫兵自发前往云南，河南，东北等地的农场和农村，到边僻的西双版纳安家落户，到艰苦的内蒙古牧区插队等，他们被称为“边疆的火种”，“飞向草原的雄鹰”。

“老三届”学生上山下乡热潮的序幕就此拉开了。从这时起到1969年“老三届”学生下乡，这场运动大致可以分为几个段落，从1966年7月到1968年春，是带有自发形式的上山下乡，这是一；从1968年夏到当年12月，是各省，市，开始有组织地动员毕业生上山下乡，这是二；从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传达了毛泽东“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以后到1969年春，至此“老三届”剩余的毕业生大部分已被送

到农村去了，这是三。

从一大批毕业生自愿上山下乡开始，到由各地革命委员会进行组织安置之际，一场方兴未艾的上山下乡运动已经镀上了鲜明的官方色彩。在最初阶段，从“文革”中脱颖而出的“造反派”们的确先声夺人。1968年《红卫兵报》报道了首批赴滇的红卫兵小将的消息，他们向初，高中“老三届”发出倡议：“立下革命志愿，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乐在天涯战恶风’。”我当年摘抄的赴滇知青的一首诗《赠战友》：

挥手豪情别红城，跨步河江万里行。

统帅扬笔雄文赤，小兵执行毕生忠。

滇边种胶歌声起，塞外迎春曲更兴。

斜眸向西笑禁锢，尽染东方一片红。

在这儿，你还能想象出他们是怎样的英姿飒爽吗？

在前面二，三阶段中，多数人不甘心放弃学习，不甘心离开学校，更不甘心告别家乡。他们对政府动员的逆反，一直影响着他们对所在的农村，农场，牧区的生活态度。理想与现实的反差，失落，随即蜕变为一种盲目，狭隘，偏激和玩世不恭。从领袖的“革命小将”到后来被山里人乡下人称为的“喝狼奶长大的一代”；从“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到“去西伯利亚充军的‘替罪羔羊’”，单纯的他们走过了一条多么无奈多么艰辛的道路。“当蜘蛛网无情地查封了我的炉台，当灰烬叹息着贫困的悲哀”时，对他们的惆怅，失望，和被动员去上山下乡的不情愿，父老乡亲们曾给与深深的同情和理解。北京知青诗人郭路生（食指）的诗《我的最后的北京》，这样写道：

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一片手的海浪翻动；

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一声尖利的汽笛长鸣。

北京车站高大的建筑，突然一阵剧烈的晃动；

我吃惊的望着车窗外面，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的心骤然一阵疼，一定是妈妈缀扣子的针线穿透我的心胸；

这时，我的心变成了红色的风筝，风筝的线就在妈妈的手中。

线绳绷得太紧了，就要扯断啦！我不得不将身子探出车厢的窗棂；

这时，直到这时，我才明白了刚才车站上发生了什么事情；

一阵阵告别的声浪，就要卷走车站，

北京在我的脚下 已经缓缓移动。

我再次向北京挥动手臂，想一把抓住她的衣领，

然后向她大声的叫喊：“听见吗，记着我，妈妈，北京！”

终于抓住了什么东西，管他是谁的手，不能松；

因为这是我的北京，这是我的最后的北京。

这首诗写于1968年，我们仿佛还能听见那遥远的历史的声音。

那些上山下乡的先行者，都是“老三届”的高中毕业生，他们从叱咤风云的红卫兵闯将到勇往直前的知识青年带头人，这非同凡响的人生足迹，可以反映出“老三届”一代人的成长道路。

“老三届”学生是新中国的同龄人，也曾被称为新中国教育出来的最成功的一代。他们对上山下乡运动所倾注的狂热，至少在初期，丝毫不亚于对红卫兵运动的参与。这在后来的无论什么运动中都是十分罕见；这也使他们与历届中学生形成鲜明的对照。推本溯源，这与他们所受的系统教育和“文革”初的特殊经历是分不开的。

这一代人集中体现了从建国到“文革”这17年教育的成败得失。在我们身上，这种教育中积极的，进取的一面，与盲从，狭隘等消极的一面，都表现得非常鲜明。据说，研究中国“文革”问题的国内外学者，大多认为“文革”期间红卫兵的种种异乎寻常的表现与17年的教育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认为这种教育是引发“文革”动乱的重要原因。

无论对17年教育中的政治灌输和道德培养持肯定还是否定，有一点是为我们所公认的，那就是它曾经成功地塑造了一代甘愿为革命理想奋斗，而献身的青年。这种理想，当然首先基于对共产党和毛主席的深厚感情。“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他是人民大救星。”他们从呱呱落地时起，耳畔回旋的便是对领袖的颂歌。入学时学写的第一句话就是“毛主席万岁”。几近胎教的灌输，对他们的成长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这种理想的形成，还归功于日臻完备，系统的政治教育。当我们跨出家门迈进校门，不仅是走向社会的第一

步，同时也是政治化的开始。

回想一下，很容易记得，那时的学校除了传授系统的文化科学知识，还包括经常的，大量的政治学习，包括多种多样的诸如听报告，讲时事，上团课，下乡下厂劳动，参加军训，忆苦思甜等活动形式，包括英雄事迹的感染和熏陶。刘文学，向秀丽，雷锋，王杰……，哪一个不令人无限崇敬。英雄业绩的感召，为我们的思想打下了鲜明的理想主义烙印。像英雄那样生活，为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而献身，是那个时代的最强音。在浓烈的政治气氛中，他们普遍具有神圣的使命感和强烈的政治参与意识。

在以阶级教育，革命教育为主的前提下，17年教育还注重培养了青年们的集体主义精神，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品德，和勤奋，刻苦，勇敢，向上的素质。这也是“老三届”中很多人在经历“文革”以及以后上山下乡的种种人生困厄和磨难时，依然能够以坚韧的意志和互相扶助的精神与命运抗争，而不甘沉沦。这与我们受到的教育有很大的关系。

可是，17年教育的两重性也使整个国家乃至受教育的“老三”们尝到了苦果。首先是对雷锋等英雄人物献身精神的宣传是与对领袖的盲目崇拜联系在一起的；随后是对领袖的尊重和忠诚绝对化，以致到了狂热扭曲的地步。再者是关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教育同“反修防修”，“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紧密结合起来，这样看，一些学生的政治热情是被引上歧途了的。60年代思想极为封闭，政治观点偏激，在“解放世界上三分之二受苦受难的人民”之类豪言壮语的背后，恰恰是对社会发展进程，对人类文化价值的极端无知了。这当然是后话。

所以在“老三届”上山下乡时，我们有谁没读过就这样的誓词：“为了毛泽东思想赤遍全球的伟大事业，上刀山，下火海，我们心甘情愿”。在书信中，这样的话也比比皆是：“战争爆发之后，我们就是插向修正主义的尖刀。战争不打，二十年内我们会改变祖国农村的全貌。”下乡伊始夸下如此海口，立下如此壮志，现在看来固然滑稽可笑，可又何尝不是我们当年自命不凡，雄心勃勃神态的真实写照呢？

“老三届”的名字是和“红卫兵”，和“上山下乡”连在一起的，是光荣榜，是耻辱柱？“千秋功罪，谁人曾与评说”？这一代弄潮儿当年诵读毛泽东的那段著名语录；“我们这一代青年，将亲手把我们‘一穷二白’的祖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将亲自参加埋葬帝国主义的战斗，任重而道远。有志气有抱负的中国青年，一定为完成我们伟大历史使命而奋斗终生”时，却无不热血沸腾，壮怀激烈。

当年以搏击长空的雄鹰自比，以划破暴风骤雨的海燕自励的我们，曾天真地认为，在长江后浪推前浪的革命洪流中，自己已经勇敢地站在了最前列。

岁月是无尽的长河，这道滚滚流淌的长河，能够沉积在我们记忆中的，无疑是岁月的金子。只要你把它留下来，它一定在熠熠发光。

——写于2005.11

八千里路云和月

2009年对我的人生来说是个重要的年份，2009年11月21日我将跨越60年的人生界碑。与此同时，对于我们这些1949年出生的属牛的共和国同龄人来说，2009年10月1日也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年大庆的日子，我们的生日与共和国同庆。

人生如梦，这是我国宋代伟大的文学家苏东坡的人生哲理，这也是他“一蓑烟雨任平生”的豪放豁达气度。我18岁到27岁，曾在大兴安岭群山中，在美丽的呼伦贝尔草原，在遥远的额尔古纳河，在东北一望无垠的黑土地，度过九年的知青岁月。苏东坡的著名诗句“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曾激励我度过那段艰辛的日日夜夜。

在内蒙古阿荣旗，那座建在小山坡上的村落，那个有百十来户人家的生产队，春季满草甸子盛开的野花，夏季满山遍野的大豆玉米，秋季场院里高高的谷垛，冬季零下三十多度的严寒和皑皑白雪，大兴安岭的红松、落叶松和柞树林，呼伦贝尔大草原的蓝天白云和数以万计的马群、牛群、羊群，东北乡亲的纯朴、热情，如今都化作远去的往事。

2008年是中国知青上山下乡四十周年，我与当年下乡的伙伴相邀，在国庆节期间又一次回到我下乡的阿荣旗，承蒙同是北京知青的原呼盟政协副主席纪志国的帮助，在阿荣旗受到旗委、旗政府的热情接待。原阿荣旗旗委书记谭宏宇和原旗委组织部长林景章等人，五天里全程陪同。我下乡那个小山村熟悉的乡亲们更是涌到村头，热情的场面让陪同前往的梁文秋副旗长等人深深感动。

2008年围绕着知青上山下乡四十周年，各种纪念会、研讨会、演唱会，接踵而至。而这一切多是民间活动，我也参加一些此类的聚会。“同是天涯沦落人”的知青们，四十年后差别的确很大。有的人还是那么意气风发，有的人却垂垂老矣，有的人疾世愤俗，有的人高谈阔论，有的人虚拟领袖状十足，有的人灰暗自卑。多数同龄人由于知青的经历将彼此真诚相连。在这方面许多知青网站、知青合唱团为此做出了贡献。这里包括我熟悉的《华夏知青网》、《北京知青网论坛》、《牧人合唱团》、《草原恋合唱团》、《卡林卡合唱团》的朋友们。我觉得和那些唱

草原歌曲的知青伙伴聚会是件快乐的事情，悠扬的蒙古长调，动情的草原歌曲，古老的马头琴，将我们带回成吉思汗曾经驰骋的草原，带回敖包相会的蓝色蒙古高原，带回青春的知青年代。

即便对知青运动的评价，老知青们也大相径庭，经历不同，感悟不同，视觉角度不同，看问题的立场和结论往往也不同，有道是存在决定意识。我的三年文革生涯和九年知青岁月告诉我，文化大革命是中国现代史上最黑暗的一页。而发生在文革中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也只不过是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的一部分。十年浩劫中，有1700万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他们绝大多数是中学生，小小年纪远离亲人，在贫瘠的农村，在遥远的边疆，在黄土高坡，在白山黑水，在农田耕耘，在草原放牧，在军垦拓荒，在雨林割胶，那里有知青们的汗水和热血，那里留下了我们那一代人忘我献身的青春和理想。我们这些四十年后还能聚在一起点评知青历史的人，比起那些在上山下乡中丧生的知青伙伴们已经是幸运者了。

通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伴随着经济腾飞，国力迅猛增长，人们的思想视野也开阔了许多。但在座谈中我对有些人将文革中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说成“有计划培养革命接班人的战略决策”，不但不能苟同，且感觉可悲。文革中党章规定的接班人都飞到温都尔汗去了，将上千万只能称为大孩子的中学生赶出城市，赶到乡村，将国家的社会责任又一次转嫁给农村和农民，何来培养革命接班人？至于我们中的许多人由此了解农村，了解农民，与之患难与共，增强了做人的能力，则是另外一个问题了。其实知青这个群体经过几十年不同人生道路，差别已经很大了，他们中很多人结束辛勤奉献下岗退休，他们中也不乏仍在一线的企业界、文化界、科教界、法律界的出类拔萃之辈，就是中国高层现任政治精英中许多人都是当年的知青，习近平、李克强、李源潮、王岐山年轻时都上山下乡当过知青。但不能用个体知青的命运界定那场知青上山下乡运动。

我家的几千本藏书中，有五、六十本关于知青的书，《北大荒风云录》、《草原启示录》、《情系黄土地》、《咱们老三届》、《中国知青梦》等许多知青回忆录。我觉得叶辛那本描写知青的小说《蹉跎岁月》，书名就很好地定位了当年1700万知青中大多数人的境遇，而最近刘晓航一本描写在云南边疆要求返城大规模知青抗争纪实报告文学，书名叫做《我们要回家》，“我们要回家”这五个字真实反映了绝大多数知青当时的诉求。

我已经从插队的地方回城三十多年了，但有时还会在梦里，梦到青年点人去屋空，我们苦苦等待能否返回北京的窘迫场景。应该说即便是当知青，我们当年也是佼佼者，我感到自豪的是，我二十几岁，在阿荣旗图布新公社当过三年生产队长，1975年、1976年我的生产队每天日值社员分3.15元，一个普通劳动力一年分一千多元，这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中国农村也是一个小康的数目。我珍惜那段经历，在磨难中教会了我许多，但九年时间太长了，且那是一段政治迫害年代，我们不可能有其他职业或求学选择。

我热爱我留下青春汗水的呼伦贝尔草原，我依恋那块曾在阶级斗争暴风骤雨中庇护过我的东北黑土地的人民。即便我离开那里很久，只要我能为那里做些什么，我都会尽我所能。知青中许多人都是这样做的，他们将自己留下

青春的那块土地，视作自己的第二故乡。

“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古往今来多少人感叹人生如梦，光阴似箭。在现时生活中，且不说80后、90后的孩子们，即便是年长一些的人，能有我们这代人这么丰富人生经历的也不是很多。从北京故宫角楼阳光普照的金色学生时代，到文革中风起云涌的战火硝烟；从少年时代湘江边大串联足迹，到插队内蒙古九年的知青岁月；从北京语言学院返城待业的临时工，到活跃在羊绒衫厂的科室骨干；从十年团中央机关的高层历练，到十余年招商局集团旗下公司掌门人的奉献；从中国化工集团大舞台的诱惑，到鬼使神差民企职业经理人的事业了断。六十年的风风雨雨，“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我也多少能找回点“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的沙场征战归来的感觉。

2009年6月初，应山西省政协常务副主席郭良孝之邀，我陪我在团中央机关的老部长勾德元夫妇、原国家监察部部长李志伦的夫人王树梅老师、中国青少年发展服务中心主任艾玲，去了一趟山西广灵和灵丘，这两个县都在太行山上。良孝曾是我1981年就相识的山西团省委青工部长，一行人都在年轻时与共青团有缘，大家见面很亲。我们在灵丘县委书记张小立和广灵县委书记刘振国等人陪同下，参观了抗日战争平型关大捷的纪念馆。纪念馆的广场上有一排青铜雕塑，英姿勃发屹立着平型关大捷的主要参战将领，他们中间有林彪、聂荣臻、陈光、徐海东、李天佑、杨勇、杨成武、杨得志、肖华等。这些人都是共和国著名的开国将帅，1937年9月为了挽救民族危亡，他们在这里浴血奋战时，大都是二、三十岁的热血青年，林彪师长那年30岁，林彪40岁时统帅130多万人的东北野战军，指挥辽沈、平津两大战役。林彪被授元帅时也才48岁。平型关大捷日军被歼灭1000余人，而由中央红军改编的115师也有600多人牺牲，他们中很多人是爬雪山过草地经过长征的红军将士，而且很多烈士没有留下名字。我想一个尊重英雄的民族才是有希望的民族。尽管这些参战将帅们后来命运不尽相同，但他们当时为国家民族英勇献身的历史，应该得到永远的尊重。

2008年6月，应山东临沂常务副市长杜德昌之邀，我也参观过孟良崮战役旧址，我曾在陈毅和粟裕雕塑下久久驻留。粟裕1947年5月在这里指挥华东野战军，纵横鲁西南，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歼灭国民党军队的精锐王牌军整编74师，击毙中将师长张灵甫，令蒋介石落泪，国民党军队胆寒，而粟裕那年年仅40岁，参战将领中有许世友、谭启龙、叶飞、陶勇、王建安、王必成、陈士渠、皮定均等一批开国名将。粟裕指挥的苏中战役七战七捷，歼灭数倍于已的强敌。特别在1948年底至1949年初的淮海战役当中，粟裕指挥60万人民解放军，击败了国民党80万大军，创造了中外战史上的奇迹，为全国解放奠定了胜利的基础。在1949年的一次谈话中，毛泽东深有感慨的说：“淮海战役，粟裕同志立了第一功。”而这位当之无愧元帅的中国第一大将，建国后政治命运却十分坎坷，当然比起许多开国将帅文革中的悲惨结局还算幸运。

我们的一生中经历了太多的故事。历史是人民创造的，历史也是英雄创造的。我们这些共和国同龄人，曾与共和国的风风雨雨同命运。在历史的岁月中，我走遍了祖国三十多个省、市、自治区的许多地方，也去过亚洲、欧

洲、北美洲的近二十多个国家。我为中国三十年改革开放取得的伟大成就感到骄傲，这也应该感谢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他们那一代人，他们改变了中国。但在现实生活中，吏制腐败的蔓延，施政成本居高不下，社会财富分配不公，环境矛盾突出，道德底线失守等社会问题也日趋显现。有些是市场经济发展中必然要遇到的问题，有些是不同社会制度都会遇到的问题，有些则是现行体制和机制的问题。中国的许多问题也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历史关头。我觉得问题的解决还是要靠我们党的自身力量，现在没有其他任何一种政治力量能取代这种领导，也没有其他外力能作为主要推手解决这些问题。我相信吴仪副总理退休时说的那句话，担任这么大国家的当家人不容易。在这几年我们国家大水灾、大疫情、大地震的危难关头，人民也看到胡锦涛总书记、温家宝总理的辛劳和压力，看到集中统一的国家力量。我对有些人评论时事以形而上学和偏激的方式评头评足大不以为然，常想换这些政客上台，国将不国。我很欣赏招商局集团前任领导人袁庚的那句话“实干兴邦，空谈误国”。国家稳定是民族的大事，人民的大事。驾驭中国这条大船是件很不容易的事，在振兴经济，改进民生的同时，积极有成效的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是唯一的进步之路。我也有幸接触到许多不同立场的看法，见识过所谓的“新左派”和“新右派”思潮，有些政治立场近乎南辕北辙。但是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社会稳定，民主法制确立，应该是绝大多数正直的中国人的共识和选择。

我从苏东坡想到宋代的另一位伟大的杰出人物辛弃疾，他不仅在词坛上与苏轼并驾齐驱，共为宋词中豪放派代表，且在民族危难，强敌入侵之时投笔从戎，少年英雄，曾任封疆大吏，更有被冷落得长年闲退生涯。辛弃疾的《破阵子》：“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人生有许多无奈，历史上的伟人尚且如此，更何况我辈。从英雄主义的壮怀激烈，到务实兴邦的实业报国，从世态炎凉的酸甜苦辣，到养家糊口的柴米油盐。我很仰慕我们民族一代又一代为国为民的伟人和英雄们，我曾戏言不能靠低俗文化来支撑民族的精神，我们更多的需要巍巍昆仑、太行，滔滔长江、黄河，要实现中华民族精神和文化的伟大崛起，用制度创新支撑我们这个13亿人民的泱泱大国。

在众多开国元勋中，我十分敬佩彭德怀元帅，这位在战场上曾被毛泽东赞誉为“谁敢横刀立马？惟我彭大将军”的开国元勋，在国家和人民处于危难的关头，1959年庐山会议上挺身而出，为民请愿。在那个皇权思想泛滥、现代迷信猖獗的年代，需要何等的勇气和牺牲精神。但可惜的是，不正常的政治生活使得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封住敢于谏言的知识分子的言路。1959年庐山会议对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的错误批判封住敢于谏言的党内干部的言路。而在庐山会议上那些跟着批判彭老总的人，哪里知道这将为国家和民族带来十年动乱的深重灾难，这种灾难也带给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我读刚直不阿的开国上将张爱萍儿子张胜的回忆录，《从战争中走来，两代军人的对话》，张爱萍将军曾身有感触的说：“做事要学周恩来，做人要学彭德怀”。这是一位从江西苏区红小鬼到共和国国防部长的老将军的感言。从大跃进年代到文化大革命，我们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在磨难逆境中苦撑危局，内心有多少矛盾和痛苦，是后人难以想象的回首六十年，遗憾的是我没做过什么大事，但却幸运的经历过共和国发生

的许多大事。我想作为一个平常人来说，我六十年的经历也算丰富多彩。2008年8月，我曾与友人去了一趟西藏，受到团中央机关时的同事张庆黎书记和尹德铭部长热情款待。被誉为神仙居住的地方拉萨，蓝天白云下的布达拉宫，绿树鲜花映衬的罗布林卡，游人如织的八廓街，神圣的大昭寺，宽阔奔腾的雅鲁藏布江，所到之处都使人心旷神怡。最让人难忘的是被称为天湖的纳木错，我们翻越5000多米高山后，到达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大湖，湖面海拔4718米，人的心灵也得到一种升华，许多功利烦恼和世俗缠绕随风而去，壮丽的雪域高原，湛蓝如梦的湖水，纳木错周边是连绵的雪山，置身其中犹如进入了天堂一般。

我今年五月还去了一趟辽宁省朝阳市，我的好友朝阳市委书记陈铁新告诉我，朝阳是一片神奇的土地，朝阳市博物馆内鱼、鸟、生物、动植物的古化石，将我们带回到1.4亿年前的地球。我站在朝阳古生物化石前，想着世界上第一只鸟从这里飞起，第一朵鲜花在这里绽开，真觉得自己六十年的人生实在是短得微不足道。我们在这颗蓝色的地球上不过才生存了六十年，而六十年的人生只是历史长河的一霎间，但我们也有过鲜花盛开的时候，也有过鹰击长空的理想。我们即便到了六十年回首的时候，也没有“廉颇老矣，尚能饭否”的顾影自怜的状态。六十岁对于现代人来说，有的人已经老了，有的人却还能跃马奔驰，我和我许多属牛的伙伴属于后者。苏东坡词《浣溪沙》：“山下兰芽短浸溪，松间沙路净无泥。潇潇暮雨子规啼。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2009年开启了我们人生新的一页，祝愿地球和我的祖国，一切都更加美好。

2009年6月28日于北京

（此文为《林小仲杂感集》2009年第三版后记）

华夏知青网不是赢利性的网站，所刊载作品只作网友交流之用
引用时请注明作者和出处，有版权问题请与版主联系
华夏知青网：http://www.hxzq.net/
华夏知青网络工作室

我们没有自愿

——“上山下乡”运动四十周年祭之一

四十年前，１９６８年１０月１８日，我们，江南一所著名中学的一千多个学生，被学校的邻居，江苏省军区教导大队的军人们用几十辆军用卡车，送到农村去插队。那一天万里无云，秋高气爽，黄叶满地。我们的心情却和秋色相反，阴云密布，沉重、阴郁、惶恐：我们青春的梦想在这一天破灭，我们感觉到自己正在滑向一个无底的深渊。

我在农村插队总计八年半又四天。八年半的插队生涯把我从一个曾经是“少年壮志，海阔天空”的少年折磨成浑身伤痛，身心俱疲，不敢有梦的青年。学生的时代，我们曾经怜悯那些为谋生整天奔忙的芸芸众生是“做稳了的奴隶”，八年半在农村的生活，却使我们羡慕那些“做稳了的奴隶”，反而痛惜自己“想做奴隶而不可得”了。我们一千多同学的青春还没来得及闪光，就葬送在黄土中；一千多同学的梦想从未有实现的机会，就被无情地扼杀——我们同学的父母每一天锥心刺骨的挂念，这一千多个家庭经受着长期的煎熬。而全国像我们一样的青年有一千多万，“知青”家庭有一千多万户！从东北的北大荒到云南边疆的橡胶园，从陕甘的黄土高原到东海的崇明岛，全国的农村、农场，到处留下了“知青”的血泪。

历史上的这一段，无论如何逃不过“史笔”的。那么，历史将会如何评价这场运动呢？

不同的经历、不同时代的人，自会有不同的评判标准。但是，历史事件评判的最终标准是人，是人的生存与发展，是具体历史事件对人的生存和发展所起的作用。评判这场运动的标准也只会是“上山下乡”对我们这代人的生存与发展所起的影响。四十年过去了，当年的二十岁左右的“插友”，如今都已六十岁上下了，时间已经完全可以对“上山下乡”运动作出的评判：

我们中的绝大多数，一辈子没有接受过高等教育，一辈子没有有过理想的职业，一辈子没有有过稍稍富足的日子，许多人一辈子没有有过爱情，有人一辈子生活在“上山下乡”的阴影中，还有人因病或自杀过早地离开了人世。在同日下乡的一千多人中，后来能够通过７７，７８年高考进入大学的竟然不足四十人，能够出国留学的只有

五、六个。我们那可是一所高考入学率曾有过近１００％记录的中学啊！１９９２年，我回国和同班同学聚会，发现他们中的多数已经下岗、退休，无所事事地在麻将和电视剧中打发余生。当年的正值青春年华的少男少女们，生命中从未有过闪光的日子，就已经满头华发，被社会遗忘。我们在相对唏嘘之外，还能说些什么！如果没有那场运动，他们怎会潦倒至此！

我们是被牺牲、被蹂躏的一代。和祖辈、父辈相比，我们和他们一样经历过三年大饥荒的饥饿，多数人却没有享受过他们曾经有过的受教育、求职、迁徙的自由；和我的后辈相比，我们中的多数没有像他们那样能够享受物质的丰富。国家历史上所犯的错误，不公正地、过多的由这一代人来承担了。

我知道，这不可能成为大家的共识：当年政策的制定者、执行者及其后来的继承者，为了维护意识形态上的连续性，不会对我们说一声“对不起”。当年的受害者也往往怕揭开创伤，有意无意地要在创口刷上一层色彩，使鲜血显出玫瑰色来。

今天，有人或许会说，当时你们不也曾经向党表忠心，要到农村去战天斗地、改造自己吗？不也曾经发誓要把壮丽的青春献给祖国的农村，立志做革命大业的接班人吗？

是，当初是有一些人这么做了。那是由于他们太年轻，对现状缺乏了解，对统治者无条件的信任，确实想过到农村去干一番事业。记得北京还有人到天安门去宣誓，决心去延安插队，走老革命的路，等等。

但是，我相信怀有那种浪漫豪情的人只是少数，而且他们是在真实信息被封锁的情况下做出的错误判断，是受到了愚弄。在和我一起插队的一千多位同学中间，我从没有见过这种“豪情”，哪怕是装出来的。因为农村的实际情况无法被完全封锁，我们还是了解一些；因为我们知道自己不是什么“接班人”；因为我们知道，有资格成为“接班人”的少数同学，根本就不在我们之间，他们早已经由父辈安排参军就业，和我们分道扬镳了。

是，当年我们都是“自愿”。但我们有可能不“自愿”吗？

很难。当时动员的手法，就是非让你“自愿”不可。最简单、最客气的办法是所谓“车轮战”，三班“工宣队”一天二十四小时守在你家里动员，不让你和家人睡觉，直到你“自愿”为止。两三天下来，钢铁的人也受不了，何况是血肉之躯？不“自愿”就发疯。邻居家的孩子因为数天“车轮战”而神经失常，操起把菜刀来要和工宣队拼命，结果被捕判刑。我们学校有一个被大家称为“聪明美丽而又最大气的”女同学，不过在给叔叔的信中说了句“不知命运的小舟，将把我们带向何方”，竟然被套上“破坏和对抗上山下乡运动”的罪名而在全校批判，——你说我们有什么办法不“自愿”？

后来读到张正隆的《雪白血红》才知道，这是统治者几十年行之有效的手法：当年在东北招兵买马，也就是用这套“车轮战”而让农民“自愿”参军的。甚至会在大热天烧一热炕，让农民坐在炕上烘烤，直到“自愿”参军为

止。当年斯大林统治下，布哈林、季托维也夫们，不仅“心甘情愿”地承认自己是国际帝国主义间谍，还恳请法庭判处他们死刑。连冤死都能让你“自愿”。

那些真的曾经豪情满怀的下乡的“知青”们，在信息被封锁、被歪曲、被捏造的情况下做出的选择，也算是“自愿”？即使退一步承认那是“自愿”，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只是我不愿意把话说绝，才没有讲百分之百？？很快就发现自己上当受骗，很“自愿”回到城市来。那时，有人考虑过他们的意见吗？

或许有人会说，农村严酷的环境锻炼了我们，使得我们更懂得社会，更懂得生活，生存能力更强。

是，这些都没有错。我自己经受过那场血泪生活的磨练，到海外来遇到一些挫折，就真看成“小菜一碟”，用美国人的说法，是“蛋糕一块”（a piece of cake）了。有一年母校的人事处长到美国来交流访问？？她本人也曾是插队知青？？看到我这么个书生竟然能自己装修房屋，踢天弄井，就曾说过，“还是‘上山下乡’锻炼人啊”这样的话。

但是，磨练了意志，学得了谋生能力，都无法补偿我八年的青春时光，无法补偿那八年多在绝望中所受的煎熬，无法补偿消失了的梦想、失去的爱、损害了的健康；更重要的，运用暴力强制我的意志、限制我的自由，对我人格的污损和造成的精神创伤更是永远无法补偿。如果在自由、青春、教育、理想的自主追求和生活经验的被动获得两者之间让我选择，我当然毫不犹豫地选择前者，我想大多数同辈人也会做同样的选择。

或许有人会说，我们的青春时代有过人生一场非常特殊，前无古人，大概也后无来者的经验，值得珍视。

是，对我们来说，这是人生非常特殊的经验。但，“特殊”本身就意味着不是人的全面发展的自然需要！而越是惨烈的经验越特殊：“劳改”，“古拉格”的经验够特殊吧？有人喜欢吗？杀头、抄家特殊吧？除了金圣叹以外，会有人说“杀头，至痛也；籍家，至惨也，而圣叹于无意中得之，岂不快哉”？

现在或许还有人会说，当年让我们“上山下乡”，本来是出于好意，是让我们经风雨见世面。证据是毛太子当年不也是被送到农村去锻炼的吗？

是，有些太子、公主们是去过。那真是出于他们父辈的苦心，那是为了让他们将来接班的时候不致像阿斗、晋惠帝那样轻易丢掉政权。他们去，有明确的目标和既定的程序——下农村，进工厂，去部队，进学校，学成文武艺以继承他们的事业。因此对他们不需要强迫、欺骗，他们自然也不会不自愿。对我们则从插队的第一天起就明白无误、板上钉钉地说清楚了：我们将在那里一辈子，那培养接班人“程序”的第一步对我们来说永远不会结束！如果不是人亡政息、天下巨变，这程序的第一步也确实没有终结之日。这两种“下乡”还有什么可比之处？

或许说，我们这一代人的牺牲，是为了解决当时国家的在经济、政治上的困境，因此也为国家、民族作出了贡

献。

是，我们是为国家、民族，也为统治者的错误作了牺牲。但我们的牺牲不是出于自己的意志。当年谭嗣同拒绝逃亡，喊出“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而毅然走向死亡，为变法牺牲，是求仁得仁，自愿如此，因此了无遗憾。而我们和他毫无共同之处，因为我们是被迫牺牲的。

因此，不管现在，还是将来，如果有人试图从这场血泪斑斑的运动中寻找什么“积极因素”，什么“闪亮点”，都是毫无作用的：一场以强迫为手段而戕害了一千多万青年的运动既不合理，也不合法，更不人道，在历史上当然不会得到正面的评价。手段的卑鄙从来都只反映目的的卑鄙。《赫鲁晓夫回忆录》中有个故事。当年他还是苏共第一书记的时候，去访问一个集体农庄。一个农民对他说，“赫鲁晓夫同志，你们是想用棍子把我们赶进天堂。”改革者赫鲁晓夫闻之大受震撼，因为他懂得“棍子”本身就是对“天堂”的嘲弄。强迫婚姻不合法、不合理、不人道并不在于婚姻的双方不般配，而在于不是出于当事人自己的意愿。即使是一个天堂，人们也不愿意自己被棍子赶进去，人也应当有选择进去还是不进去的自由。何况当年赶我们去的地方，连面目狰狞、手操刀棒，心如蛇蝎的人，也不好意思说是天堂。

今天，拿一千条冠冕堂皇的理由，一万种所谓积极的因素，想为那场运动辩护都是徒耗心力：判定那场运动是国家耻辱、青年灾难的性质，只需一句话：“我们没有自愿”。

华夏知青网不是赢利性的网站，所刊载作品只作网友交流之用
引用时请注明作者和出处，有版权问题请与版主联系
华夏知青网：http://www.hxzq.net/
华夏知青网络工作室

作为一个知青，我也算是“资深”了：从１９６８年秋到１９７７年春，我曾经插队过八年半多一些，总共３，１０４个日日夜夜，比抗日战争还多出１７３天！四十年过去，当年插队的一切已经从记忆中渐渐淡去，那些人和事渐渐模糊，那段经历对生活的影响渐渐退后。但是，每当看到有关“上山下乡”运动的回忆、讨论、研究等等，还是忍不住要关注；碰到当年的“知青”，无论是相识还是不相识的，总有一种亲切和信任感。我知道，那段生活给我的阴影会淡下去，却一辈子无法消除掉。

然而，在与知青有关的活动之中，有一种我却从不参加，那就是知青组织的聚会。这类聚会在海外常有，在我居住的地区的知青就举行过几次纪念活动。

为什么呢？只有一个理由：我怕看到那些聚会打出的口号“青春无悔”。

所谓“青春无悔”，说的无非是，对我们青年时代的那一段生活，对我们的遭遇，我们当时对人生、社会的思考以及在思考基础上所作的选择，我们面对苦难态度，等等，都没有什么值得或需要后悔、反思的。

然而，我们当真无悔吗？当真？

否，我自己就有许多需要后悔、反思的地方。因为，当时在逆境之中，如果能够正确面对的话，我过去和现在都要快乐得多，对自己的命运的把握将会坚实一些，对我个人、家人或社会也能做得多一些，好一些。有许多事情我有可能做到，应该做，但是我就是没有做。

我无法不悔。

比如，如果当时对社会现状有较为深入的考察和思考，对历史能够有较为清晰的理解，对世界潮流有较为坚强的信心的话，我当年就不会长期处于焦虑、悲观之中而轻易放弃自己的理想和追求。我就应该明白，那种企图将十亿人民统一在一个人的思想之下、由少数人用暴力和欺骗进行统治、而且尽力把中国从一个曾经努力融入世界潮流的国家拉回孤立状态和自然经济方向、排斥古今中外一切优秀文化的政治，无论如何是维持不久的，“人亡政息”将不可避免。我就应当认识到，那不过是中国现代化道路上的一次逆流；是继那拉氏、义和团之后愚昧、没落势力的一次垂死哀鸣、回光返照；是那些恐惧自己在现代化世界将被无情淘汰的人群的一次最后挣扎。我就应当深切理解孙中山所说的“世界潮流”的走向，而为必将到来的巨变做好准备。

或许说，对我这样一个只上过两年初中，既无足够的知识也无社会阅历的孩子来说，要求我从那厚厚的黑暗中，依靠对历史的思考和现状的分析来预见必然到来的光明，那要求是太高了。

这话当然有道理，但也并不说明我们当时就无可作为。虽然那时的中国象一个铁桶样被密封：书籍被烧毁、封存，大学被关闭，以致思想资源极为贫乏；新闻、消息被封锁，我们整天接受的是官方宣传机器的谎言，而传播事实、真相要冒生命危险，等等。但铁桶仍然有漏缝：我们仍然能够通过偷听国外、海外的电台广播来得到有限的信息，我们仍然能够从流传的“灰皮书”、“黄皮书”和漏烧、漏封的书籍中获知一些被看成是“离经叛道”的学说，我们也了解当时社会各阶层的生活状况和思想状态。思考、探究的空间非常狭小，但仍然存在。

更重要的是，我们周围还有很多经历、学识极为丰富的老一辈人存在，他们当时大都受到迫害，满腹经纶无所用处。我们中学老师中就有好几位。我们完全没有想到应当向他们求教，不仅求教学问，更要向他们求教人生、历史、民族的经验和教训，以拓宽自己的眼界。我们本可以从他们那儿得到生活的力量和睿智，使自己看得远一些，却由于自己的无知而浪费了那些可贵的资源。

当时，我一位好友的父亲，一位被打成“历史反革命”、“反动学术权威”的老一辈留学生，在举国“反现代化”的潮流中就说过一句，“一个民族是经不起这样忽视教育和科技的。”这句话今天看来是普普通通，一个中学生都知道。可在当时那种由一个人来代替十亿人思考的时代，在举国疯狂向蒙昧社会大倒退的时候，能说出这样的话就需要对历史有深刻的理解！

我的朋友出于对我的信任，冒着家庭可能遭受更多迫害的风险，告诉了我他父亲的话。他父亲的话引起了我的思考，但我却没有从中得出应有的结论，不敢相信人类生存、发展的需要一定会压倒阻碍前进的政治力量。我仍然在尽力追求一种“坐稳了的奴隶”的生活，焦虑自己“想做奴隶而不可得”的处境，而不是去扎扎实实补好自己的文化，冷静地等待变化的一天。１９７８年后我虽然一步步入大学、进研究院、留校教书、“洋插队”、取得“洋博士”，似乎一帆风顺，不完整的中学教育似乎没有成为自己发展的障碍。但只有自己知道自己的知识结构是千疮百孔，补不胜补。如果不浪费那八年半的时光而能早早意识到应当发展自己的话，就不会是这样。

如果我真懂得人生、懂得生活的话，我就应当大胆、热烈地去追求爱情。

说来真让今天的青年们难以置信，当年我们那班正值青春年华的少男少女，“爱情”二字竟然是我们的禁忌语。一方面，当局鼓吹禁欲主义，“不许你们乱（恋）爱！”－－－这是已故知青作家陆星儿一篇小说的第一句话，小说的情节甚至题目都忘了，这句话忘不掉，－－－－仿佛青年男女一有感情，就是江山崩溃之始。另一方面，当局的政策也直接为这种思想服务：当时有少量去工厂、矿山工作的机会，有明文规定已婚者不予考虑；女生还要查是否处女，不是处女就没有招工的资格！那就不仅连奴隶都做不成，还要经受一场羞辱了。

就这样，我们男女知青生活在一起，却不敢有亲密的接触，甚至不敢有爱的表示；我们的家长也常常敲我们警钟：不要因为男女之情而失去“坐稳了奴隶的”机会。

有许多年，我一个人生活在一个水塘中的一个孤岛上。多少个无眠的漫漫长夜，从茅屋的窗口望去，那是无边的黑暗，看不到一星灯火；除了二十里外铁道上火车驰过的声音和偶尔的犬吠之外，听不到一点人声。在那种苍凉孤寂之中，我不禁怀疑，我和这个世界的联系究竟在哪儿？我多希望有异性的温暖来给我生活的力量；我也知道，周围也有许多青春少女，也希望得到异性的安慰和爱抚。如果我们当时能大胆追求爱、表达爱、显示爱的话，我们的插队生涯固然不会因此而变得幸福起来，起码爱情会给奄奄一息的生命之树浇上一瓢水，使之不致枯萎。

但是，我们宁愿压抑自己的生命冲动，就是不敢迈出一步，为的就是有朝一日能够“坐稳了奴隶”。待我们终于“做稳了奴隶”的时候，才恍然发现，爱情的追求、精神的升华已经化约为“成家过日子”的需要。有人甚至连这一点需要也没有满足的机会。我们邻村有两个气质很好的南京女知青，就错过了花样年华，不甘心降格以求而至今独身。

有这么多的“如果”，你说，我能“无悔”吗？

或许说，你这是自己的个人经验，没有普遍性。

这当然是我的个人经验，但却未必没有普遍性。事实上，知青中类似我自己的经历是太多太多了。他们是不是自己反思了，我不敢说。但午夜梦觉，扪心自问，相信没有几个知青真的敢说“无悔”。

我知道，人有一种通过进化获得的，因此也是完全正常的心理机制，即将自己惨痛的经验隐藏起来，将流血的伤口掩盖起来。有一种尽量在负面经验中寻找积极因素的倾向，以从心理上肯定自己。这是人类的自我心理保护机制，对人的生存有益。一个循逻辑追根到底的人，容易象近代大逻辑学家弗雷格、哥德尔、波斯特那样最终心理崩溃而发疯。人或多或少都是阿Q，恐怕无法在每一件事上都诚实面对自己，也不需要总是诚实地面对自己。因此“青春无悔”自有其存在的价值。如果我能够做到的话，我也宁愿接受它。“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象我那种老是向往“坐稳了奴隶”的人，哪是什么“猛士”？有何资格敢言“直面”、“正视”？

但是，我自己已经做不到了。这不是我对自己过苛，或者如当代人常说的，不会“善待自己”。这是我境界太低，“插队”的经历已经使我修炼不到阿Q君那种大师的水平，虽然我很想，很想。

我所能做到的只是不止于“悔”，而要从“悔”过渡到反思，通过反思将那段惨痛的经历化为人生的教训。留下这段教训，或许能使我们的后代将来少一些“悔”，——当然也只是“或许”而已。至于具体可以怎么做，我会在“‘上山下乡’运动四十周年祭”之三中讨论。

“瞎子摸象”新说

“瞎子摸象”典出《大般涅磐经》卷三二。说的是一群瞎子想知道大象是什么模样，他们围着象摸。摸到鼻子的说大象像一根管子，摸到耳朵的说像一把扇子，摸到牙的说像一根萝卜，摸到象身的说像一堵墙，摸到腿的说像一根柱子，摸到尾巴的说像一条绳子。于是，“瞎子摸象”成为一则成语，用来讽刺那些观察事物片面,只见局部不见整体的人。

长久以来，瞎子摸象给我们的印象一直是负面的。看问题狭隘片面，瞎子摸象。

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瞎子摸象。没弄通理论就去实践，瞎子摸象。面对迷宫盲目试验，瞎子摸象。更有理论家断言，瞎子摸象的方法会把我们引入误区。

其实，瞎子摸象之所以可笑，是因为大部分人不是瞎子。如果每个人都是瞎子，谁也不知道大象的真正模样是什么，恐怕没有人会耻笑那群摸象的瞎子。

很少有人注意到，瞎子摸象的方法也有其积极的一面。在不少场合下，瞎子摸象是必不可少的，甚至是唯一的认识事物的方法。

自然科学研究中，瞎子摸象其实是相当常见的一种方法。

人们世世代代生活在地球表面，地球内部是什么模样，谁也看不到。儒勒.凡尔纳笔下的《地心游记》，其实是办不到的。唯一能穿透地球内部的是地震波，于是科学家就用地震波作为瞎子的手，去摸地球内部这只象。全球地震台站网记录了成千上万次从不同角度，不同深度摸象的结果，科学家们再综合这些记录塑造出地球内部模型。这中间有争吵，有分歧，也有差错。慢慢地，大家的看法趋于统一，接受地球内部有一个滚烫的液核，液核里面还有个固体内核的模型。虽然现在的地球模型还不见得和真正的地球内部模样完全吻合，但是，我们的地球模型正在一步一步逼近真实的地球内部。谁说瞎子摸象不管用呢？

社会科学领域中，也要用到瞎子摸象。

中国历代王朝，流传下来官方的正史和民间的野史。正史应当是全面的，权威的。但是为了满足统治阶层的需要，正史中有的史实被抹掉了，有的被歪曲了，有的甚至被颠倒了。野史是局部的，零碎的，常常是片面的。但野史在民间流传，携带着老百姓眼中看到的真实记录信息，有时恰恰能弥补正史的不足。

统计理论中有一个名词“各态历经”。说的是一个随机过程，它的每一个样本的值都是不确定的，但是所有样本总体的统计特性却是确定的。要想知道这个随机过程的统计特性，一种方法是对这个随机过程不停地采样（瞎子摸象）。只要你采样的时间足够长，就可以摸到这个随机过程的各个态（各态历经），就能得到它的统计特性。在一定的假设下（比如平稳过程），可以用另一种方法得到这个随机过程的统计特性。那就是让许许多多人同时对这个随机过程采样。只要摸象的人足够多，也可以摸到这个随机过程的各个态（各态历经），从而能得到它的统计特性。

文化大革命，上山下乡从某种角度看也正是一种随机过程。形形色色的人们被卷入了这场运动，但是每个人的境遇，经历，结局，以及他们的回思是各不相同的。个体的境遇往往是由各种偶然因素促成的，整体统计上的境遇却包含着必然的因素。

很不幸，我们这一代人虽然从各个不同的角度摸过了这只象，谁也没办法说清这只象究竟是什么样的。其根本原因就是我们的正史是残缺的，有的地方甚至是扭曲的。我们的统治者出于利益的衡量，敏感，还有恐惧，把许许多多重要的史实捂得严严实实，不让老百姓知道，甚至把它们划为禁区，不允许老百姓讨论这些事。比如策划这场运动的核心人物，他们当时在有关会议的发言，表态，私下的联系和交易，不对外宣扬的决议和行动，秘密关押和处决的持异见者，我们到底知道多少呢？没有掌握完整的史实，谁也不敢说自己知道大象的全貌。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这一代正是瞎子摸象的一代。

在我们有生之年是不是能等到当局公开真实的史料那一天，我不表乐观。但是我们可以把自己摸象的真实感受写下来留给后人。如果大家都把自己的摸象感受写下来，应该可以摸到这个随机过程的各个态，我们的后代就可以从这些民间野史中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得到它的统计特征。

这就是我们瞎子摸象一代的历史责任。

红河谷是对历史负责的。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想到的是要把自己在文革中的亲身经历写下来留给后人，这种精神是我敬佩的。

我不想隐瞒自己的观点。红河谷对文化大革命，对红太阳，对上山下乡的评价和反思，我是不赞同的，因为我所摸到的和他所描绘的完全对不上。但我不会对他有什么指责，我甚至很赞赏他，因为他写出了自己摸到的真实感

受，哪怕他的真实想法是不正确的，甚至是可悲的。也许，他摸到的是一条象腿，而我摸到的恰恰是一堆象屎，如此而已。留下真实的记录，要比一声不吭离开人世，仅仅把骨灰撒在什么大寨的虎头山上，更对得起历史和后人。

我们是绝无仅有的摸过这只象的一代，让我们把自己的真实感受写出来留下吧。

不要耽心自己的认识是否正确，是否片面，是否有偏见，只要写出的是真实的经历和感受，那就对得起后人。因为我们都是.....瞎子摸象。

注：

红河谷是东北知青王世新在网络上发表文章时用的网名。他在身患癌症即将离开人世之前，用最后的精力写下了回忆自己文革前后真实经历和感受的文章《追随红太阳》。

这是我在美国南加州知青协会组织的阅读《追随红太阳》座谈会上的发言稿。

华夏知青网不是赢利性的网站，所刊载作品只作网友交流之用
引用时请注明作者和出处，有版权问题请与版主联系
华夏知青网：http://www.hxzq.net/
华夏知青网络工作室

——谨以此文纪念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四十周年

知青返城三十周年

新中国历史上的知识青年，特指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到“文化大革命”结束这段时期，自愿或被迫从城市上山下乡插队或到农场从事农业劳动的初中，高中毕业生。重点特指在“文革”时期被大规模组织上山下乡的这些人。

1968年12月21日，毛泽东发表“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它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的“最高指示”。因此，上山下乡在全国达到了高潮，并一直延续了12年，全国一共大约有1660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约定俗成，12月21日这一天就成为了上山下乡纪念日，今年恰逢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四十周年。明年年初又是知青大返城三十周年，国人惯例，遇五逢十，都要做些纪念，发些感慨，遇上我们知青自己的纪念日，不能免俗，故谨以此文纪念知青上山下乡四十周年及知青返城三十周年。

1．上山下乡的由来经过

文章开头提到，上山下乡运动其实源于一九五三年。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不久，全国百业待兴。针对中小学毕业生升学难和城市就业难的问题，党中央向家住农村的青年发出回乡参加生产的号召。1953年《人民日报》就发表社论《组织高小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劳动》旨在改变农村生产，生活面貌，解决城市就业问题。从50年代中期开始，就有组织地将年轻人移居到农村（其中很大一部分为回乡，返乡青年）。树立起全国早期的知青典型邢燕子；董加耕等。在后来大规模上山下乡运动中最著名的口号“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也是毛泽东早在一九五五年就提出来的。共青团组织积极配合开始组建农场，组织并鼓励年轻人参加垦荒运动。如江西的共青林场等，到1964年，中共中央还为青年下乡专门设立了一个领导小组。

1955年9月4日，由60名青年组成的北京市青年志愿垦荒队抵达黑龙江省，建立起中国第一个垦荒点。随后，二十多个省、市组成了青年远征垦荒队，到北大荒垦荒。报纸上都曾以醒目位置予以刊登宣传。

从1955年到1966年，中国大约有150万青年到农村落户。1955年8月11日的《人民日报》社论说：“新中国成立的时间很短，还不可能马上就完全解决城市中的就业问题。.....家在城市的中、小学毕业生中有一部份人目前的

就业是有一定的困难的。农业生产对于中、小学毕业生的容纳量是十分巨大的，现在需要量很大，以后的需要量更大。”

一个月以后，毛泽东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文的按语中说：“全国合作化，需要几百万人当会计，到哪里去找呢？其实人是有的，可以动员大批高小毕业生和中学毕业生去做这个工作。”

1955年12月，毛泽东谈到中学生和高小毕业生参加农业合作化的工作。他说：“一切可能到农村中去工作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去。”随后，在1956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决定：“城市的中、小学毕业的青年，除了能够在城市升学、就业的以外，应当.....下乡上山去参加农业生产，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事业。”

1957年4月8日，刘少奇主持撰写的《人民日报》社论《关于中小学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问题》也指出：“最能容纳人的地方是农村，容纳人最多的方面是农业。所以，从事农业是今后安排中学毕业生的主要方向，也是他们今后就业的主要途径。”

1962年5月27日，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精简职工和减少城镇人口的决定》指出：“城市中一般不能升学或就业的青年，有条件的可以下乡或者安置到农场劳动。”

1964年1月16日，中共中央印发《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动员和组织城市知识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草案）》，同时成立了中央安置城市上山下乡青年领导小组，由副总理谭震林担任组长。根据周恩来的指示，谭震林在1965年提出一个15年计划，准备在1965到1980年之间下放1100万到1200万知青。上海等大城市不断动员因未能升学；闲散人员等当时被称为“社会青年”的年轻人到地域广阔，人烟稀少的新疆去，扩展生产建设兵团。

1965年12月，当时的四川省重庆市组织动员1500余名应届初中生和少量的高中生远赴云南农场垦荒。这么大规模的组织刚毕业的学生赴外省农村，这在重庆市还是第一次。这其中的500余名学生被分配到了云南东风农场（1969年转为云南生产建设兵团，1974年又复转为农场）他们是文革前的初中毕业生，受教育质量高，后来普遍成为农场内学校，医务，文体等骨干，为农场作出很大贡献，这就是曾经是原云南东风农场知青都知道的重庆65支边青年。

这一切都充份显示，早在文革开始以前，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就已经成为中国的既定经济政策。

五十年代，知青下乡多少还有一点自愿的成份。在官方的公开口径上，知识青年是去支援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但在1962年以后，在毛泽东“与工农相结合，加强思想改造”等左倾思想的推动下，上山下乡越来越带有政治色彩，已经开始带有强迫的色彩。在1962年到1966年间下乡的129万知青中，多数人是由于家庭出身不好而无法升学和就业的中学毕业生，上山下乡成为他们唯一的选择。

应该说至1966年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前，上山下乡还仅是小规模地把城市里的剩余劳动力推向农村的一种手段。

文革初期，毛泽东为了达到争权夺利的目的，利用以初；高中生为主的红卫兵，在全国各地造反、串联、夺权、武斗、抄家、甚至杀人。各级党政组织都名存实亡。大、中、小学停课多时。所有大专院校都停止了招生。整个国民经济亦已走到崩溃的边缘，工矿企业严重超员，无法招收新工人。一千万失业的“老三届（1966；1967；1968）”毕业生，成了社会，特别是政局动荡的隐患。

文革全面开展以后，1966、1967和1968三届的高中和初中毕业生大量积压在城里，约有1000多万人。此时，党中央再次动用上山下乡的既定政策。1967年7月9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题为《坚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正确方向》。

1967年12月22日，教育部向中共中央报告说：“毕业生不分配出去，新的学生进不来。”毛泽东随后在1968年4月批示黑龙江省革委会《关于大专院校毕业分配工作的报告》时说：“不仅大学，且有中小学”，要面向农村、边疆、工矿、基层分配。这是四个面向的由来，那时的学生毕业后根据家庭内独子，多子女，长子长女等不同情况，区别处理，还有留城的希望。

但是当时，工矿生产规模比文革前还小，根本无法容纳更多的工人，四个面向的分配方案越来越难实施，只能一再降低条件，最后只有农村和边疆可去了。

这时，政府借助文革的极左思潮，顺势给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加上浓厚的政治色彩，大力宣传鼓吹说知青上山下乡是“一场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对于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必将产生深远影响。”是有其深远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的，每一位下乡得知青是非常光荣的。知青上山下乡关乎中国革命的前景了。

在此宣传鼓动下，1967年到1968年初，北京来自不同学校的中学红卫兵，自愿到内蒙古、东北建设兵团、云南等地插队落户干革命。政府受此启发，利用年轻人献身祖国建设，投身革命的热情，把他们分散到农村去，这样于无形之中既解除了红卫兵组织，又分散转移了大批等待工作的城市年轻人，稳定了政局。

文革中对毛泽东狂热的个人崇拜更是被用来推行上山下乡政策。1968年12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公布了毛泽东在12月11日发出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最新最高指示”，成为了上山下乡在理论上和现实中的法定依据，成了把解决国家经济问题的政治化政策，使上山下乡变成了一场政治运动。

人们一直在猜测，毛泽东让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即使要让城市里的学生接受“在教育”，毛

泽东为什么不让学生在工厂里接受最先进的工人阶级的再教育，而一定要让贫下中农承担重任呢？其实现在看来是为了用政治美名掩盖其因文革而引起的经济失败和为了解决千百万城市学生的就业问题。

毛泽东的一声令下“知识青年到农村去”，顿使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高潮迅速地、轰轰烈烈地兴起。知青上山下乡的目的变成接受“再教育”。上山下乡成为各级政府强制性的任务。一时间，家里有毕业生的，里弄到家里动员，家长被工作单位施加压力，有些地方更是采取注销城市户口，停发父母甚至兄弟姐妹的工资，手段不一而足。一些地方的口号是：“下乡光荣，不下不行”。

到我们69届知青毕业时，上海市更是走了极端，没有工矿，没有征兵，没有其他选择，一律上山下乡。毛泽东的“最高指示”引发强烈反应。仅1969年一年包括上海全国就有267万城镇知青上山下乡。我们都是在1970年到了云南生产建设兵团（1974年改为农场）。

1976年，历史翻过了沉重的一页，“四人帮”被粉碎，“文化大革命”结束。人们开始理智地审视过去走过的历史道路,包括重新认识上山下乡运动。但“知青问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1977年召开的中共十一大受“两个凡是”影响，仍然强调：“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工作，必须坚决贯彻执行。”1977年和1978年仍然有大约220万知青下乡。并且计划在1979年下放80万知青。

从1968年掀起上山下乡高潮开始到1979底知青大返城结束，上山下乡运动总共将近有1700万人流放到农村。一代人失去了升学、工作、恋爱、成家的正常机会。国内科技和学术人员发生断层，国民经济严重停滞不前。

2．被边缘化复杂化了的上山下乡运动

毛泽东平息了红卫兵运动，解决了城市人口问题，也就不再考虑这些知青的前途和命运了。可以说在他1968年12月11日发表了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指示直至他1976年逝世他就再也没有对知青问题发表过任何具体指示。所以我认为毛泽东对在1968年以后响应他号召的一千多万知青是不负责任的，至少是在知青问题上不作为。

在著名的毛泽东给李庆霖的复信上显示，他十分清楚上山下乡问题重重。他只是寄出三百元，模糊地说要“统筹解决”。对解决下乡知青问题既没有成熟的想法，也拿不出具体有力措施；具体建议或者指示，也不想改变上山下乡其大方向。更不会承认大规模上山下乡政策错了，1976年2月，继李庆霖事件后毛泽东再次在一份反映知青问题的信上批示：“知青问题，宜专题研究，先作准备，然后开一次会，给予解决。”但是，直到他逝世，也未“解决”。毛泽东更没有说过“再教育”需要多久才算完成。上山下乡运动被边缘化了。

知青们的热情在农村现实面前如冰山雪融。起初知青们由于政府的宣传把上山下乡过分的理想化了，以为是毛泽东统一战略部署，下乡是光荣的，农村会很热情的欢迎知青去。在那里可以干一番事业。知青们当初是胸戴大红花，唱着《革命知识青年之歌》《兵团战士之歌》等革命歌曲下乡的，怀着“广阔的天地是我们最好的课堂，贫下

中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我们革命的知识青年，在三大革命中百炼成钢”的革命豪情下乡的。在现实面前，当热情消退，幻觉破灭时，发觉贫下中农；农场老工人并不能给他们以再教育。农民和农场里的那些干部老工人本身受的教育很少，农村又相对闭塞落后。如果说贫下中农和农场老工人觉悟高，知青要接受他们的再教育。但是知青们发现，那些人的私心很重，觉悟还没有自己高，这也是知青们犹豫动摇的重要原因之一，感觉到被愚弄了。

现实很快使梦想破灭，当年在知识青年插队的地方，其实很多村落是被自上而下硬性接受摊派下的任务。很多乡村地少人多，土地贫瘠，产的粮食当地人都不够吃。形成了知识青年与当地农民争抢口粮的恶果。致使知识青年体验到身心交瘁、艰难困苦的生活。虽然许多知青为农村带去城市的先进生活工作理念；讯息文化并作出了不同程度的贡献，但农民们从根本上并不欢迎这些“四体不勤；五谷不分”来争工分，夺口粮的城里人。再加上少数知青调皮捣蛋，桀骜不驯，当地人和农民们私下认为，知青是来接受改造的，尤其是作为出身不好的知青来说，更要脱胎换骨，要以自己的行动来背叛自己家庭出身和自己父母所处的那些社会阶层或者阶级。农村干部则利用职权对初到农村不久孤单无援的，尚还年幼的知青敲诈勒索。以调回城或按排好工作等其他种种好处威逼利诱女知青，导致女知青堕胎、生子、甚至自杀的案例，屡见不鲜。

在兵团农场，尽管知青们过集体生活，有少量的工资，国家定量向他们供应粮食，但在极左思潮干扰下，农场领导简单粗暴的管理，对知青动辄捆绑吊打，繁重的超负荷的体力劳动，严重缺乏的副食品，恶劣的生存环境，使干群关系紧张，知青极度不安心于在农场，导致各类矛盾增加，社会不稳定。

1971年林彪自我爆炸，在他的政变计划“571工程”中说到知青上山下乡是变相劳改。从反面提醒了知青，知青们认为那句话有点道理，上山下乡确实成了变相的无期徒刑，随着知青岁数日益增长，面临许多实际问题，当知青们认识到自己被游离于社会之外，1972年以后，“一片红”的上山下乡政策又有所松动，城市农村的巨大反差，使知青们思想波动加大。一时间，大多数知青均不再安心农村，都想尽办法回城，中学毕业生也各显神通留城。与此同时没有权势后门的、家庭背景有问题的毕业生，仍然继续被迫纷纷“自愿”下乡。而对知青的因病因伤独子等照顾返城手续，各地农村农场都拼命卡压，或要付出沉重经济代价，要回城谈何容易，使年岁渐大的知青对前途日益绝望。

那时家里无论是有插队或是在农场工作的知青子女，经济上都受其拖累，前债未清，只要子女回城一次，后债又起，如果家里有两位子女下乡，那家庭经济更是濒临崩溃。

知青问题几乎与共和国同步成长，由于其时间跨度大，涉及人数多，各地都深感头痛，局部地区闹事上访不断，一直是个悬而未决的老大难问题。在1973年6月到8月期间，国务院召开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讨论解决知青问题。

会议期间，一份新华社《情况反映》揭露云南、黑龙江和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数百名现役军官强奸数百名女知

青的情况。周恩来指示公安部马上派人查处，“不要手软”。李先念说：“这些人不是共产党，是国民党，至少是国民党行为”。结果，数百军官因强奸女知青被枪毙

与此同时，国务院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领导小组在1976年5月给国务院的报告中也不得不承认，一些地方迫害下乡青年，特别是奸污女青年的案件又有增加；部份地区对下乡青年的生活安置和培养教育工作仍然做得很差。国务院直接分管知青工作的副总理陈永贵说：“知青工作很复杂，我们几个副总理一提起这事就头疼。”

知青问题成为国家当时的“烫手山芋”。也必然决定了知青上山下乡运动不能善始善终。

3.众望所归的知青大返城

1978年3月，重新执政的元老派官员已经意识到知青问题的严重性。复出中国政坛不久的中共中央副主席邓小平在内部谈话时表示，国家花了大笔资金，（先后花了60多亿元，加上企事业单位支付的费用超过100亿元)却买了四个不满意：知青不满意，家长不满意，农民不满意，政府也不满意。

1978年3月，在同胡乔木、邓力群谈话时邓小平指出，要研究如何使城镇容纳更多劳动力的问题。现在是搞上山下乡。这种办法不是长期办法，农民不欢迎。四川1亿人，平均1人不到1亩地。城市人下去实际上形成同农民抢饭吃。我们第一步应做到城市青年不下乡，然后再解决从农村吸收人的问题。归纳起来，就是要开辟新的经济领域，做到容纳更多的劳动力，其他领域也要这样做。

邓小平说：“现在搞上山下乡，这种办法不是长期办法，农民不欢迎.....城市人下去实际上形成同农民抢饭吃的局面。我们的第一步应做到城市青年不下乡。”

1978年7月3日，胡耀邦在和国务院知青办负责人谈话时说：上山下乡这条路走不通了。

1978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和通过了两个文件。它标志着我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重大历史转折。同日，中央批发了这两个文件：《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纪要》和《国务院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若干问题的试行规定》（即《知青工作四十条》）。文件指出：逐步缩小上山下乡范围。矿山、林区、小集镇和一般县城的非农业户口的中学毕业生，不再列入上山下乡范围。有安置条件的城市，也可以不动员下乡。今后下乡人数将逐年减少，以至做到不搞现在这样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积极妥善地解决好在乡知青的问题，对1972年底以前下乡的，优先安排，两年内基本解决。做好下乡青年的培养教育，切实加强对知青的保护工作。

虽然认识到知青上山下乡是劳民伤财，此次会议提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人数将逐步减少”，对城市学生毕业安排上原则上确立了“城市安排”这一条。但仍坚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毛主席、党中央的号召，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占主导地位，成绩是主要的”的观点，并提出“今后若干年内，还要继续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知

青工作四十条》向全国转发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虽然名义上还在继续着，实质上已经没有任何积极意义了。

但对已经下乡的知青政策则没有任何松动的迹像，这就意味着千百万已下乡的知青农村是他们永远的出路了。此举让千百万万在农村的知青人心不稳。再加上粉碎“四人帮”后。不少军队干部和老干部复出，他们的子女都是知青中争着回城的急先锋，当时，所有高级干部的子女，都先后以当兵、招工、提干或者成为工农兵大学生的方式离开了农村，连邓小平的子女在他还没有复出的时候就被送进大学。国务院当时也承认，干部“走后门”安排子女的不正之风相当严重。

作为人数众多的平民百姓子女的知青们，实在忍耐不下去了。普遍感觉失落，迷惘，有绝望感。从1978年开始，中国局部地区出现知青游行、请愿等活动，要求回城。1978年冬，云南西双版纳景洪农场上海知青丁惠民率先发起了“我们要回家”的返城浪潮。云南几个农场的5万知青随即响应，他们以罢工，游行，上京请愿，直至集体绝食的形式表达他们的诉求。此事惊动了北京。近百人在昆明火车站集体卧轨抗议。使当时的中央领导上层感到震惊，随即派出以国家农垦部部长，文革中遭受迫害复出不久的老革命赵凡为首的中央调查组。

1979年1月，云南临沧耿马孟定农场上万名知青罢工，发出“不回城，毋宁死”的口号，200余名知青展开绝食抗争。身后是成千上万的知青全力支持.中央调查组赶到那里，有知青竟然当众割腕自杀以明志，知青们黑压压地跪在地上，齐声高喊：“我们要回家”！其场面震撼人心，调查组组长赵凡等和一些调查组成员都不禁为之动容落泪。

1979年2月，在各方努力下，知青问题引起邓小平高度关注，中央终于顺应民意，云南“知青问题”得以解决，中央承认在云南的知青有资格回城。同时也改变了全国知青的命运。众望所归，知青返城成了1979年除对越自卫反击战以外全国最大一件事，深得千百万知青和其身后众多家庭乃至整个社会都衷心拥护的事。不到三个月，十几万知青呼啸如潮水消退离开云南。全国各地纷纷跟进。

1980年5月8日，胡耀邦总书记提出不再搞知青上山下乡。10月1日中央决定过去下乡的知青可以返回故乡城市。轰轰烈烈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成为历史。到1981年，已经有600多万知青回城。云南的知青的抗争促使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停摆。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知青最后都返回了城市，用行动否定了这场运动。

4.上山下乡运动浅析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仅从1968年算起，历时12年。先后有1660万知青上山下乡，占当时中国城镇人口的十分之一以上，波及当时中国城镇大约一半的家庭。绝大多数知青耽误了学业和事业，失去了最佳竞争年华。上山下乡运动毁了他们的一生。与此同时，中国在二十世纪后期曾经出现科技和学术人员断代，也是知青上山下乡的恶果之一。人失学业国失人才。

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涉及了整整一代人，上千万知青，数百万家庭，牵连着上亿人的情感。这些人的学习，成长，工作，生活，思想感情的变化，几乎贯穿了整个新中国至今的历史。“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知青文化”作为新中国历史中的一个重要部分，作为“文革”的一部分，必将载入新中国的史册。“知青史”必将成为新中国历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有一些知青认为，那段艰辛的经历磨炼了自己，是人生中难得的财富。有些知青当时也是苦中有乐，乡情难舍。确实，人是有感情的，尤其是在那个极左时代，艰苦岁月，恶劣的生存环境下，人间的真情和结下的情谊就显得尤为珍贵，知青岁月里，确实发生了很多知青与知青之间，知青和当地农民，老工人，或恋人之间可歌可泣的动人故事，让人永世难忘，这是人的良知，是人性的本能。因而也是让知青在回城历经三十年后仍对自己当年献出美好青春的地方魂牵梦萦的真实原因。他们不是留恋那段知青岁月，也不留恋那个年代，如果你重新再给知青们一次选择机会，当年可以下乡或留在城市，我想大多数知青绝对不会选择下乡的。尽管知青们现在对曾经留下他们青春的地方念念不忘，因为他们的经历中有了这么一段刻骨铭心的经历。

当年知青们是响应国家号召下乡的，大量城市人口下乡，缓解了城市就业压力，自己及家庭背负了沉重的负担，为国家作出了巨大贡献，但当他们伤痕累累回到城市，国家从来没有向当年的知青或者他们的家庭道歉或者提供任何赔偿。1981年10月，国务院知识青年领导小组办公室起草了一份《25年来知青工作的回顾与总结》，对这场运动的起因、发展、失误、教训等若干最大问题，提出了基本看法：第一，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50年代，根据我国人口多、底子薄、就业难的国情提出来的，是我们党解决就业问题的一次大试验，它不是文化大革命的产物。第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本来是一个就业问题，但是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中，当成政治运动去搞，指导思想偏了，工作上有严重失误，造成劳民伤财，人民不满，也损坏了上山下乡的声誉。这其实是以国务院名义为知青运动的一个定性。后果则由知青和他们的家庭自行承担了。

知青上山下乡，国家每年补贴大量资金，知青感到没出路，农民感觉自己吃了亏，知青家庭也深受其害。实在是一件不得人心的事。

5. 知青是共和国历史上大写的人

回城后的知青，在城市里一切从头开始，虽然他们中有不少与命运抗争获得成功的范例，有不到百分之五的知青在高考恢复后成为“新三届（1977；1978；1979）”大学生，其中还有不少人后来出国深造。有一部分知青因为在做知青时入了党，当了干部，回城后的高起点使他们回城后有了不错的工作和生活，少数知青通过努力，在经济大潮中搏弈，成了富人，但这在千万知青中所占比例不是很多。

大部分当年的知青因为当年是知青这一重要原因成为了今天仍然挣扎在贫困线上的贫困人群。这一代知青，他们承受的太多。他们大多是五十年代初期生人，经历了共和国的各项“运动”，并承载了所有运动所造成的后果。

百姓中对知青经历有一个概括，说知青是“长身体时闹饥荒，应念书时下了乡，该结婚时没有房，已壮年时下了岗，要看病时自己扛……”知青的一生，苦难多于欢乐，磋砣多于机遇。回城后的知青受文化，经济，年龄的限制，和城市里同时代的人相比处于劣势。大多数人返城后，虽然年岁已大，还要从头开始，从零起步。是标准的弱势群体，都经历了待业，住房困难，结婚生子，补习功课，学习技术，供养父母培育子女承上启下，面对多重压力，复杂的人际关系，拼博透支。又赶上社会发展的阵痛，下岗，再就业，协保，创业，医改，房改等等磨难。能平安的走到现在，实属不易。

很多的专家，学者（很大一部分人也是当年的知青）和关心知青的朋友正在研究“知青史”“知青文化”，在探讨“知青精神”。当年的“早期知青”已是古稀之年，很多人已作古。当年的“老知青”（老三届）已步入晚年，“小知青”（新三届）也已步入中老年之列。

由于这群人的存在，由于他们的精神永存，他们的经历，注定会被反复回忆，反复讲述。

值得欣慰的是，随着岁月的流逝，社会发展，国家兴旺发达，人们务真求实，换位思考，大家认识到当年知青对国家所作出的巨大牺牲，对他们奉献了青春的农村；农场所带来的巨大人文物质变化，了解了他们当年的艰辛和无奈，对知青的评价正在回归历史本来面目。认识到“知青史”是共和国历史上重要的一页。

今年深秋初冬之交，上海；北京及各地电视台都在黄金时间相继精心制作播出了有关知青题材的纪实片，直接让知青倾情讲述，深情回忆当年。回顾了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总结了那段令人难忘的历史，千百万知青和他们的家庭在电视机前重温了当年那激情燃烧的岁月。

更值得让人欣慰的是，我们知青的后代大多数已经长大成人，走上了工作岗位。和他们的知青父辈不同，他们赶上了好时光，尽管在他们的儿时，可能因条件关系，在就学或生活物质方面逊于别人，但他们的知青父母，在教育和培育他们时丝毫没有马虎，精心尽力，他们大多数人将自己曾经没能实现的理想，寄托在孩子的身上。在这个人尽其才的社会，充分展示了知青后代的风采。给了他们的父母很大安慰。如这次在上视纪实频道“眼界”栏目主持讲述知青岁月往事系列片的夏磊就是一名知青子女，所以夏磊的主持带着情感，由一名知青子女主持讲述知青往事的纪实节目，我觉得很有纪念意义。

知青是特殊年代的特殊产物，他们本不应该是苦难，血泪，冤屈的承载体，也不应该是谁的牺牲品。他们只是普通的人！他们本应该按正常的人生轨迹生活。

当年的知青风华正茂。是以怀着报效祖国为己任朝气蓬勃的年轻人。是对未来充满自信的年轻人。是懵懵懂懂盲目狂热的年轻人。自以为可以移山填海改造地球解放全人类。当初，他们怀揣红宝书满怀豪情上山下乡，最后，大失所望，一无所获，又如同大海退潮般返城回家重现回到起点，剑断戟折，遍体鳞伤，空使年岁增长。

艰苦的环境锻炼了知青，锤炼了筋骨和意志，他们学会了技能和做人，不怕苦，不怕死，不信邪，不信天，不畏逆境，不畏艰险，新时代的发展正需要这样坚韧不拔的精神。

现在看来，知青还是为国家为人民作出巨大奉献的人。他们当年响应国家号召贡献了自己的青春，缓解了社会矛盾和经济矛盾。在与天与地与人的奋斗中，他们付出了伤残代价，有的甚至牺牲了。为了国家财产人民利益，甚至仅为了一根电杆，他们也会挺身而出，不惜献出自己年轻的生命！时至今日，他们虽然尽管心中仍有着当年的酸痛，甚至有些后遗症现在仍然影响着他们的生活，但他们在一起依然笑谈当年。

知青的心胸宽阔，他们曾经在亚热带被砍伐了的原始森林，滚滚红尘中种下一排排橡胶树苗新绿，他们曾经骑马挎枪纵横驰骋在千里草原上，曾经扬鞭纵犬放牛牧羊在天山雪麓下。曾经撒汗挥镰收割在稻田里，曾经轰鸣油锯伐木在林海中。他们是雄鹰的翅膀是拖拉机的履带。他们习惯了吃苦，练就了豪迈。他们的心胸如大海宽广。

知青虽然是普普通通的人。但他们和共和国的军人，工人，科学家……和共和国的所有成员一样.作出了自己的奉献！甚至付出了更多！他们为文革的失误付出了自己的青春，以自己心灵上的伤痛换来国家的稳定，他们同样是共和国的脊梁，是共和国历史上大写的人。

值此知青上山下乡四十周年和知青大返城三十周年纪念日即将来临，写下此文，是作为纪念！

2008.12.15

勐龙情深的BLOG　http://blog.sina.com.cn/sgl53

华夏知青网不是赢利性的网站，所刊载作品只作网友交流之用
引用时请注明作者和出处，有版权问题请与版主联系
华夏知青网：http://www.hxzq.net/
华夏知青网络工作室

上山下乡运动四十周年祭

今年，是文革中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四十年的祭日。之所以说四十年，是从一九六八年算起。又因为我是九月二十二号下去的，所以拿这一天算祭日。

为什么说上山下乡是个运动？因为这是一项带有明显政治目的活动，对施者和受者而言，无论出于何种目的，都有一条很明显的思想轨迹，而不是象有些文章所说，是政策性的权宜之计，是为解决城市就业、经济危机等问题。换句话说，一九六八年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是文化大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思想的重要内容。它决非*的即兴之作，而是他深思熟虑的结果。联想到文革前*与王海容关于教育的谈话，联想到在这之后的“五七指示”，就更能理解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在他的思想中所占的分量。

一九六八年，经历了三年文化大革命的城市初中、高中学生，被分配到农村“广阔天地”，或插队落户，或新建农场，或屯边垦荒。在我上中学的郑州市，第一批分配的初中毕业生，六六、六七两届，按照“三分之一下乡、三分之一进工厂、三分之一升学”的分配原则，还有不少同学喜气洋洋成了工人阶级，拿工资去了。等到那年年底，*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号召后，留在学校为分配吵得一塌糊涂的六八届的小弟弟、小妹妹们，就一锅端，一个不剩的统统踹到农村去了。

这就是所谓的“老三届”，六六、六七、六八届毕业生，加上高中，一共六届。全国大概有三百万人。

谁能说清楚，*的这个政策，究竟是毁掉了一代青年？还是为中国储备了一批人才？

作家王兆军在《是谁杀死了林彪》一书中，写到知青时说，中国的历史，在一次歪打正着的错误中，造就了一片树林。

是这样吗？还是歪打歪着，造成一片荒芜？

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政策，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就有。作为一项国家政策，为了解决经济危机，解决城市就业困难而提出来的。当农村无法为城市居民提供足够的口粮时，当城市无法为青年提供就业机会时，政府就动员、组织一批城市居民和青年学生到农村去安家，或者到边疆垦荒，无论说教的多好听，其实就是种地打粮食，让那些留在城里的人吃。这是一个解决经济困难的政策。*著名的“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语录，就是五十年代末提出来的。但是，我之所以说一九六八年是知青上山下乡的纪念日，是指这个年代所产

生的“知青”有其特殊含义。不是经济上的，而是政治上的含义。

“老三届”知青是作为红卫兵的延续而产生的，这是一个常识。这些知青与红卫兵之间有无法割断的血缘关系，他们不是在城市的待业青年。他们下乡，并不是在城市找不到工作，没有出路，或者没有饭吃，家里养活不起，而是有其他原因，政治原因。

“老三届”，初中学生多是在一九四九年以后出生，高中生大部分也都在一九四七年以后出生。这批学生，可以说是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从小学到中学、高中，这是一批基本上按照*自己传统的世界观、价值观、道德观，在自己建立起来的的教育体系中，按照*“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指导思想培养出来的青年。

这三届学生之后，也就是从一九六八年以后，*再也没有，也不可能完全按照自己的要求培养青年了。

在文革初期，是这批学生首先成立了“红卫兵”组织，得宠于*和中央文革，得势于年少气盛和“造反有理”的马克思主义道理，杀向社会，杀向机关、学校、居民区、农村，所到之处，天翻地覆，风声鹤唳，闻着莫不股战、色变。

红卫兵，是*亲自培养，亲自指挥的一支造反大军，是一支实现他的战略目标的突击队。

到了一九六八年，文化大革命已经从狂飙突进发展到路线斗争（权力斗争），意识到这一点并积极参与权力斗争的工人、干部、大学生的作用越来越明显，并且进入舞台中心，红卫兵的作用被逐渐淡化。

但是，因为红卫兵是从文革初期就参与其中的，到这个时候，已经深深陷进文革的泥潭不能自拔。一些思想的先行者渐渐清醒，开始思索文革的实质，思索社会的意义，思索中国的未来；另有一些人则怒火万丈，用“痞子”的办法发泄心中的怨气。

我在“八一八祭”的博文里曾经说过，红卫兵不是一支被培养来夺权的队伍，他们自己也没有权力意识，这支队伍在组织结构、思想路线、政策策略上，都没有做好进入国家权力机构的准备。他们虽然有改变现状的勇气和冲动，有闯出一片新天地的决心，也能看到当时的官僚体制的种种弊端，但是，就是没有权力意识，没有夺权、掌权的意识，更没有掌权的准备。因此，在文化大革命的进程中，当一个阶段结束，开始另一个新阶段时，他们的失势就是必然的。

不用这些人了，就要给他们找出路。*大概就想到了“到农村去”的办法。其实，对于任何青年，包括他自己的孩子，*都希望他们能有机会到基层去，尤其到农村去，接受锻炼，改造自己。这是他一贯的思想。

或许，*对处理这批红卫兵确实有他自己的考虑。但是，事情到了下面，到了执行层面，到了接受这个现实的“老三届”身上，就完全不一样了。

得宠——鼎盛——失势——抛弃，这就是一九六八年红卫兵的结局。用的时候，全国都说好，从最高统帅到“五类分子”，人人赞赏有加，所有的人唯恐拿不出更多的赞誉之词，报纸、广播、电视说的天花乱坠，地涌金莲，江青们的形喜于色，使这批十几岁的孩子忘乎所以。“天下者，我们的天下！”“要把胜利的红旗，插上白宫

之顶！”一旦被抛弃，原来赞赏者又众口一词的谴责，似乎那时候所有的社会问题都是红卫兵造成的，就该把这些无法无天的暴徒抛弃。

抛到哪里？农村。自一九四九年以后，把受到惩罚的知识分子发配到农村去“劳动”（劳改），是*的一个主要做法。

我下乡那天，当火车缓缓开动时。突然，几乎所有车厢都传出《三套车》的歌声。“你看这匹可怜的老马，它随我走遍天涯，可恨那财主要将它卖了去，今后苦难在等着它。”悲怆的歌声低沉、愤怒，又惊心动魄。我们知道自己被人家用完了，抛弃了，却又无以言表，只能用歌声来表达心绪。

这就是一九六八年知青下乡的背景。并不是象有些人所说，是为了解决城镇青年就业问题。其实，当时的“老三届”，完全不存在就业问题，继续上学就能解决全部问题，国家也不是真拿不出这三百万人的商品口粮，大部分人的家庭也不是养活不了这些孩子。但是，政治需要，就要抛弃。用时甜言蜜语，弃时如同敝徒。这就是政治，就是当时的现实。

当“老三届”们在一夜之间完成从红卫兵到知青的转变，从繁华的城市被送到偏远的农村以后，他们中的一些人才逐渐发现，真正叫他们触目惊心的，首先不是劳动的艰辛和生活的无所适从，而是农村极度的贫穷、落后，是那些淳朴、善良的贫下中农依然过着穷困的生活，在苍白、无望的日子里打法着苍白的时光。这些知青们第一次发现，他们在学校的课本中学到的“社会主义新农村”、“贫下中农当家作主”、“麦浪滚滚闪金光”的描述，统统都是假的！

我下乡所在的生产队，秋季分配，全队二百五十六口人，分配的现金总共不到一千五百块钱，平均每人不到六块，支撑的时间从当年九月到来年五月，九个月；夏季分配，现金只有不到八百块，平均每人三块钱多一点，时间是六月到九月，三个月。队里最强壮的单身男劳力，每年现金分配也到不了一百块钱！有三分之一的家庭，扣除口粮钱，基本没有现金分配。

口粮，夏季分配（小麦），三个月口粮最高不超过九十斤；秋季，加上一半红薯（五斤顶一斤原粮），每人最多不超过三百斤（主要是玉米和高粱）。这些，还都是原粮。

除此之外，还有文化生活的贫瘠。

这对于从城市来的知识青年，简直是不可想象的、无法忍受的生活。然而，这就是当时中国农村的现实。

当谎言被揭穿，当真实赤裸裸的呈现在你面前时，最能教育人。现实非常残酷，它把几百万天真、单纯的心灵放在太阳下暴晒，放在贫穷中锤炼，放在愚昧中煎熬……它逼着我们思考，我们才发现，原来我们不是当红卫兵才受骗，我们一直在受骗！

我以为，这就是一九六八年“老三届”知青上山下乡的意义，这就是“歪打正着”的意义。大概，连*都没有想到，他把“老三届”送到的不是农村，而是送进了炼狱。他希望他们完成“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体力锻炼，而他们却开始了突破思想牢笼的探索；他希望他们认识到“脚上有牛屎的农民最光荣”，他们看到的却是愚昧和落

后；他希望他们看到真实，他们却用这真实戳穿了谎言。当几百万曾经高喊着“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的知青，他们的思想开始发生分化、裂变，开始新生时，那是怎样一种惊心动魄的情景啊！只不过这样的过程，不是发生在学校的课堂上，也不是发生在所谓“阶级斗争的风口浪尖”，而是发生在风雪弥漫的漫漫长夜，发生在风雨凄迷的泥泞路途，经历九十九座刀山的切割，九十九

次冰河的浸泡，完全靠着自己内心的煎熬、挣扎、思索，才得以完成。

虽然大多数知青都看到了农村的现实，也都感受到这个现实的意义（我记得，我们大队的知青从农村回城探亲时，看到城市普遍使用的票证，再与农村的贫穷相比较，才真正理解国家经济的现状），但并非每个人都能把现实作为自己前进（其实，用“挣扎”这个词倒比较确切）的动力。认识的变化，并不一定能使他们的思维方式出现变化。因为他们所受的教育，是为了别人的理想，为了别人的主义，为了别人的幸福而贡献自己的一切。

思维方式的因循和突破，造成知青队伍的分化。尤其在知青回城以后，一些“希望寄托在自己身上”的人，努力寻找个人道路上的起点、路途和突破口。还有一些人，则把自己的希望交给了党和国家，自己或者等待，或者任劳任怨，或者安于现状。

这才是知青“上山下乡”的悲剧所在，不是在下乡时，而是在回城后。当不该为别人的时候，他们全心全意为别人；当该为自己的时候，他们却不会为自己了。只有当悲剧一幕幕出现在我们面前时，我们或许能从正面理解*“上山下乡”的考虑，或许能理解他告诉王海容，叫她的同学“九点到学校还早点，可以十点再去”的意义。

当然，说知青上山下乡是为了解决城市就业难，也不无不可。但现在说这个，有什么现实意义呢？虽然现在城市就业难普遍存在，可是，有那一个领导，有那一届政府，敢再提出“上山下乡”来解决就业难题呢？

因为我们已经用亲身经历告诉了后来人，这条路，代价太大，经历太惨痛了！

乔海燕文集：http://www.hxzq.net/showcorpus.asp?id=230

作者博客：http://blog.sina.com.cn/u/1824470527

华夏知青网不是赢利性的网站，所刊载作品只作网友交流之用
引用时请注明作者和出处，有版权问题请与版主联系
华夏知青网：http://www.hxzq.net/
华夏知青网络工作室

有关“知青”概念的厘析及分类

所谓“知青”即“知识青年”，确切说称“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如今社会乃至学界，对有关知青及其相关概念的定义与关系常有混淆，须进行必要的厘析。

（一）知青与老三届、红卫兵

（1）知青——是在中国大陆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一个特殊的世代。它不是一般意义上所谓有文化的青年，而是专指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初直至八十年代初的几达三十年时间中，曾在学校受过教育，然后在“上山下乡”的特殊政策之下，由政府所组织到农村或边疆从事农、林、渔业生产的城镇户籍青年人（事实上是青少年）。虽然名义上称“知识青年”，其实往往是既欠知识，亦尚未成青年：按照规定（*的说法），下乡者是初中与高中的毕业生，但是那个年代，在学校学不到多少知识，即使高中毕业，知识程度也十分有限，初中毕业就更不用说了，到后来，小学毕业生升不了学的也都要下乡了。因此，无知识的情形可想而知（通过坚持自学获得知识者另当别论）；而其中初中毕业以及未毕业或只有小学毕业者，年龄就只有十四五岁，事实上，未足十八岁下乡者占相当的比例。

免下乡者有几类：（1）直接分配工作，一般到工厂、服务行业。（2）当兵。这就需要有特殊背景，如父母辈是军人、高干等。（3）家庭困难、兄弟姊妹已经有人下乡。但这个条件最不保险，一旦“政治需要”（如出身不够红、遇上运动风口及高潮等）还是得下乡。（4）因病免下乡。后来也有人钻这个空子，装病逃避下乡。（5）具有优异的文艺体育才能，获对口单位招收；但这种安排并不普遍，不少有优异文体才能的人才是下乡后才获机会招选进对口单位的。如当代中国围棋界有“棋圣”之称的聂卫平（1952-），1969年插队北大荒[i]军垦农场，到1973年春，国家围棋队重新组建。聂卫平才入选由三十多名全国各地的高手组成的集训队，由此开创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聂卫平时代——横扫中国棋坛，且创造了四届中日围棋擂台赛连胜十一场的惊人纪录。

知青是个体称谓亦是集体称谓，即可以指称曾经上山下乡的某个人，亦可指称上山下乡的这一世代人。换言之，知青不仅可以界定一个个体的特质，亦可界定一个世代的特质。事实上，后者的涵括性与凝聚力更强，前者往

往不由自主依附于或趋归于后者，否则难以理解那些下乡才一二年的知青（如知青作家朱晓平与李杭育[ii]等）能有那么强烈的知青情结。这个特性应是来自于长年累月集体主义教育的影响，是根深蒂固的集体主义认同，群体意识潜移默化地统摄着个体意识。此外，“知青”本是个历史概念，但时至今日，人们仍然习以为常地用此概念称呼有知青经历的人（照理说应称为“前知青”）。故此，本书亦“入乡随俗”地称这些“前知青”为“知青”。“知青作家”之类的称谓，也正是这种“误读”的结果。

（2）老三届——指1966-1968年三年的初、高中毕业生。在大陆，入学那年称“级”、毕业那年称“届”。1966年5月，“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下简称“文革”或“文化大革命”）开始，学校就“停课闹革命”，后来虽号召“复课闹革命”，但无课可复。1966-1967年，正是文革最为紧张热闹的时期，六六、六七届根本没机会分配就业或升学，小学毕业生进不了中学。到了1968年，连着三年的初高中毕业生压积在一起，小学、初、高中就校舍而言，也难以维持正常升学系列，大学已经停止招生，高中毕业生根本无升学机会，各行各业的生产也近乎停顿，初高中的毕业生就连分配工作的机会也没多少了。于是，基本上只剩下上山下乡一条路可以走。“老三届”也就别无选择地成了1968-1969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高峰期的主力军。

（3）红卫兵——文革初期，各种学生组织蜂起，名称纷杂。1966年5月29日，清华大学附中的张承志与骆小海、卜大华、邝桃生、王铭、张晓宾、熊刚、宫小吉、陶正、高洪旭、宋柏林、袁东平等十七名学生在北京圆明园遗址讨论时局商量对策，由张承志提倡用“红卫兵”作为自己组织的名称，意即*的红色卫兵，大家一致赞成。“红卫兵”的名号打出后，反应奇佳，仿效者日众，迅速成为各地学生组织最为“吃香”的名称。从1966年8月18日起，*连续八次在天安门检阅来自全国各地超过一千万的红卫兵。就在1966年8月18日，*第一次检阅红卫兵时，北京师大女附中学生宋彬彬在天安门城楼上为*戴上“红卫兵”袖章。于是就有了大时代中的一个小插曲——

毛问：“叫什么名字？”宋答：“我叫宋彬彬。”毛问：“是不是文质彬彬的彬？”宋答：“是。”毛说：“要武嘛！”

于是宋彬彬改名宋要武，“红卫兵”也就名正言顺成为*的青年冲锋队。尽管如此，红卫兵毕竟只是自发组成的学生团体，始终没有统一组织，每个学校都有数量不等、名称不同的红卫兵组织。进入七十年代，红卫兵风光不再，但仍作为学生组织保留在初/高中，并曾一度欲取代共青团（共产主义青年团）[iii]。1978年8月19日，中共中央转发共青团十大筹备委员会《关于红卫兵问题的请示报告》，宣布取消各地的红卫兵组织。[iv]由上可见，并非全部老三届都是红卫兵，在同一时间段（1966-1968年），老三届的概念大于红卫兵；红卫兵组织到1978年方取消，在此之前，在校初高中学生大多隶属红卫兵组织（黑五类[v]子女及本人政治表现不佳者除外），因此，在整个文革时期，红卫兵的概念又大于知青。

（二）知青的分类及知青经费补贴“上山下乡”只是一个笼统地说法，事实上，知青的去向有好几种，按照大

的去向也就可划分为如下几种不同类型的知青。

（1）下乡插队知青——即散布各地农村，插队落户的知青。这是知青世代中人数最多者。下乡插队知青虽然文革前就有，如侯隽[vi]，1964-65年间各地也有小规模下乡插队，但大规模下乡插队还是在文革。总的来说，下乡插队知青一般是以小组（几人到十几二十多人）为单位到生产队，组成知青集体户；也有几十个人一起到一个村子，组成类似青年队的集体大户。在集体户中，知青干活挣的工分所得归自己，口粮等实物收入则归集体户，共同生活，轮流做家务（包括照料集体户的自留菜地与家禽牲畜）。也有少数分散住到农民家庭，特别是早期下乡者或者同一集体户的知青同伴多数离开后所剩余者。

由于中国农村大多贫穷落后，所以下乡插队知青的生活一般都比较艰难困苦，问题也比较多，如打架、盗窃、抽烟、酗酒等。跟当地农民的关系有好的也有很不好的，有欺负农民的，也有被当地人（尤其是干部）欺负的；如在争取离开农村的问题上，下乡插队知青往往又被当地人所操控，女知青也往往因此而受凌辱。

出身自下乡插队知青的作家，虽然没有出身兵团知青的作家那么突出，但由于跟乡村、农民的关系更为密切，因此有机会接触、浸濡、探索更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文革后新时期寻根文学的产生与发展大多就是下乡插队知青作家所引领。具有颠覆性的后知青文学也大多出自下乡插队（尤其是后期下乡插队）的知青作家。

（2）兵团知青——兵团即各地生产建设兵团（及农建师），以农垦戍边为主要职责，属于准军事单位。有较为严格的征选标准[vii]，虽然没有徽章却能分发军服装备，少数人还能配备武器，在崇尚集体主义、英雄主义的年代，这对年轻人无疑是致命的诱惑力。1960年代初，上海等城市已组织青年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但到了文革，才有大规模城市知青奔赴各地生产建设兵团。

兵团的集体化管理（包括生产、生活与思想）以及薪酬津贴、口粮配给、公费医疗等福利制度，使兵团知青的生活比插队知青优越许多。但在个人人身自由上，却远不及插队知青，如不能随时离开兵团外出，没有招工机会，基本上属于被动扎根势态。因此，到了后期，特别是某些地方（如云南）兵团转农场（准军事的光环消失）后，原本就长期存在的各种矛盾进一步恶化，如打群架、与地方农民的冲突、知青中的生活贫困或颓废、干部欺负凌辱知青（尤其是女知青）等问题丛生。

或许是兵团群体生活的戏剧性及冲突性使然，有轰动效应的知青作品与有成就的知青作家（尤其是早期）大多出自兵团知青，如梁晓声的《今夜有暴风雪》、邓贤的《中国知青梦》等。

（3）农林场知青——政府有组织地将初高中毕业生整批地安排到国营农林场，这样的知青则可称为农林场知青；有的农林业部门则将本系统学校的毕业生安置在本系统的农林场，亦可视为特殊的农林场知青。除了没有准军事的色彩与光环，农林场知青与兵团知青大体相同；不同的是，兵团所在地大多在边疆，自然环境条件较为艰苦，一般的农林场分散在内地，自然环境条件相对要好些。然而，没有准军事的色彩与光环，在当时以及后来，却也往往使农林场知青不像兵团知青那么具有较为强烈的荣誉感及凝聚力。或许是如此，反映农林场（不包括由兵团转农林场）知青生活的作品并不多见。

（4）回乡插队知青——指城镇户籍的初高中毕业生，返回农村原籍插队落户，但不包括农业户籍的农村回乡知青[viii]。在招工、招生、征兵机会方面，回乡插队知青跟下乡插队知青相同。早年的知青典型之一邢燕子[ix]就是回乡插队知青（另两位典型侯隽是插队知青，董加耕[x]则是农村回乡知青），文革时期，回乡插队知青人数大大少于前述三类知青，主要原因是“集体主义”观念使然。然而，由于地缘及人缘关系，他们在招工、招生、征兵方面的机会，却相对比下乡插队知青要多些。

回乡插队知青基本上是落户到原籍农村的亲戚家中，或者是单独成户（除非同时几人一起回乡），因此就没有下乡插队知青集体户的生活体验，相对来说，他们的生活显得比较单调平淡。或许也正因如此，日后知青文学创作中，极少看到回乡插队知青的身影。如散文家赵丽宏（1951-）是知青作家群中少见的回乡插队知青，但其大量的作品中，反映知青生活的却也不多。

（5）“干校知青”——一些中央及地方机关的干部子女，被安置到父母所属的五七干校[xi]，被称为“干校知青”，似乎不属于国家政策统一规划，而是有关单位自行规划；后来有的“干校知青”转到生产建设兵团，也有招工离开的；在干校时期，不象其他知青那样有安置费等补贴，但文革后经过争取也获算工龄。

（6）“随户知青”——文革前至六十年代末，不少地方动员城镇居民全户一起下放插队（包括回原籍），即所谓“成户下乡”[xii]。这些随家庭下乡青少年或可称为“随户知青”。这些青少年有原迁城镇和所在学校证明，经接收县知青办公室批准后，按下乡知识青年对待；但除了安置费少于下乡插队知青外（见下），招工、招生等，也往往被排挤在外。然文革后经落实政策，还是获得承认工龄。如下乡时不满十六周岁，在其农村自然成长满十六岁后，参加农业劳动，后经落实政策返城参加工作的，其工龄可从满十六周岁后参加农业劳动的时间算起，与参加工作后的工龄合并计算。倘若是黑五类子女，在安置补贴以及招工、招生、征兵方面就无法获得与下乡知青同等待遇，不过文革后回城参加工作的工龄倒是按政策改正从回乡起计算的。

（7）关于知青经费补贴——下乡插队知青，国家规定拨给安置费，主要用于修建住房，购置必要的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具，以及下乡青年的单程路费、行李运费和第一年的生活困难补助。具体的费用，各地有所出入，大体情况如下：1973年前，单身下乡插队者平均安置费二百三十元至二百五十元（人民币，下同），成户下乡者一百三十元至一百五十元；1973年调整为单身下乡插队者平均四百八十元至五百元（1973年调整不见提成户下乡，大概那时成户下乡政策不再执行[xiii]），到内蒙古、新疆等牧区的，每人七百元。回乡插队知青投亲靠友者安置费平均五十元，独立成户者按照下乡插队知青计（平均四百八十元至五百元）。

安置费的开支范围（按五百元计）大致是：建房补助费二百三十元，生活补助费一百七十元，农具、家具、炊具补助费五十元，学习材料费十元，医药费十元，动员费三十元。到生产建设兵团和林农场插队安置费一般为四百元。插队（包括下乡与回乡）知青的口粮，在下乡第一季度由当地粮管部门供应，第二季度开始，由生产队按社员口粮标准供应。食油，当季按居民标准供应，第二季度开始按农村标准供应。吃菜，由当地社、队分给每人自留地一至二分，供知青种菜。生产建设兵团和国营农、林、牧、渔场等单位的知识青年，享受所在单位职工的粮油标准

待遇。大多数知青（尤其是插队知青）在经济上是无法自立的，必须不同程度地依靠家人的支持。

----------[i]指黑龙江省北部在三江平原、黑龙江沿河平原及嫩江流域广大荒芜地区。上世纪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大批复员转业军人、农民以及知识青年汇集于此进行了大规模的垦殖，创建了一大批国营农场与军垦农场（即生产建设兵团的基地）。

[ii]朱晓平（1952-），1968年12月下乡，1969年9月参军；李杭育（1957-），1974年下乡，1976年回城。二人下乡的时间很短，后来却写了大量知青小说，前者有“桑树坪”系列，后者有“葛川江”系列。

[iii]1975年，在共青团“十大”筹备组第一次全体会议上，中共中央副主席王洪文提议，把共青团和红卫兵两个组织合并，定名为“红卫兵”。然而当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78年10月16日召开时，文革已经结束，王洪文亦已成为阶下囚，共青团和红卫兵的合并的提议自然未能实现。

[iv]这里仅仅是就以红卫兵为名义的组织而言。事实上，文革初期学生自发组织的红卫兵、中央文革支持的红卫兵，乃至文革后期（七十年代后）的红卫兵，都有很大的不同。而在自发组织的红卫兵中，又有“老”红卫兵和后来的红卫兵之分，在后来的红卫兵里还有造反派和保守派之分。造反派红卫兵从开始到后来很长一段时间里受到中央文革的支持,但是最后也被镇压。

[v]黑五类：在中共阶级划分政策下，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统称为黑五类，在历次政治运动都是被镇压、斗争的对象，平时则被监督改造与管制。黑五类的子女则长期备受排挤、歧视与打击。

[vi]侯隽（1943-），女，原籍北京，1962年高中毕业后放弃高考，只身从北京来到天津宝坻县窦家村安家落户，成为文革前知青的先进典型人物。

[vii]当时生产建设兵团招收城市知识青年必须经过政审，政治审查的标准一般为“本人作风正派，家庭和本人历史清楚，无限忠于毛主席，无限忠于*思想，无限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有下列情况的中学毕业生，兵团不予接收：（1）出身剥削阶级家庭的子女，本人表现不好者；（2）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反革命、坏分子、右派子女；（3）直系亲属被镇压者；（4）有海外关系或社会关系复杂而不清楚者；（5）本人道德品质败坏或思想反动者。然而，具体执行时有所出入。如“华夏知青网”网友DDN称，在文革初期（1966年），他作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征招工作组成员到上海征招支边青年，当时的情形与文革中生产建设兵团的招收标准不太相同。当时对家庭出身没有限制，什么出身都收。对本人表现基本没有限制，只要不是服刑人员就收。不符合招生要求的主要在以下几方面：（1）身体残缺或有严重疾病；（2）不是上海户口的；（3）年龄不属于青年的；（4）有正式工作的。还有个特别的情况是，当时要求招收的男女比例是50%对50%，以防将来找结婚对象比例失调。不过，征招工作组尽量多招点男的，因男女工资待遇一样，而男的较能干活，将来不易离开。然而上海方面拼命要多塞给女的，可能上海社会青年中的男女比例已经失调，女性多于男性。

[viii]按照社会及学界惯例，回乡知青不在“知青”讨论范围，因此本书在论述知青历史、尤其是文学史，亦

基本上不涉及回乡知青如贾平凹、路遥、莫言等。

[ix]邢燕子（1940-）女，原名邢秀英，天津市宝坻县人，从小跟爷爷在农村老家长大，父亲是天津市一家工厂的副厂长。1958年，邢高小毕业后没有回父母所在的天津市区，而是回到家乡宝坻县大中庄乡司家庄村务农，成为文革前最著名的知青先进典型。

[x]董加耕（1940-），原名董家庚，江苏省盐城县葛武乡人。1961年高中毕业，放弃获保送进北京大学哲学系的机会而立志回乡务农，同时将名字改为董加耕。被誉为“新式农民”，成为文革前回乡知青先进典型。

[xi] 1966年5月7日，*看了解放军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的报告》后，给林彪写了一封信。在这封后来被称为《五七指示》的信中，*要求全国各行业都要办成“一个大学校”，这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又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根据毛这个指示，自1968年起，全国各地办起大批干部学校，简称五七干校，以安排各级干部下放劳动。

[xii]事实上，*著名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指示，就是出现在一篇有关城镇居民“成户下乡”报导的编者按语中。详见后文。

[xiii]如山东淄博市志（http://www.zibo.gov.cn/article_show2.asp?ArticleID=1392）载称，淄博市于1970年停止动员成户下乡。

华夏知青网不是赢利性的网站，所刊载作品只作网友交流之用
引用时请注明作者和出处，有版权问题请与版主联系
华夏知青网：http://www.hxzq.net/
华夏知青网络工作室

知青上山下乡的经济学说明

文革中大规模的知青上山下乡,其动因众说纷纭。主流说法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共同建设新农村”，这是“主流说”；还有是“战备说”，那时中国腹背受敌，北部西部遭苏联威胁，南部东部受美国包围，战争不可避免，大量知青下乡，可以疏散城市人口，又可以充实边境抵御入侵之敌的力量；也有“经济说”，文革使经济趋于崩溃，无法安置大量知青在城市就业，于是来一个城市知青向农村的人口大转移，大迁徙；也有“人口说”，即解放以来中国人口增长太快，超过了经济增长速度，只好向农村安排就业。我的初中同学黄宗敏在得知我68年8月上山下乡去北大荒后给，于69年1月的来信中，她就对大规模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提出疑问，认为是“马尔萨斯人口过剩的幽灵在作祟”。（见《17岁“反/革/命”女生（文革杂碎 之十三） 》一文）。我当时回信以红卫兵的革命精神激烈批驳了她一通，她回信说“把她禁锢了好长时间的思想大门敲得咚咚直响”。 文革中大规模的知青上山下乡牵动了太多的人了，各说各的，各有一番道理，莫衷一是。

恢复高考后进了大学，在学校里上《资本论》的课。老师讲到资本的有机构成一章，说从物质形式上看，资本由一定数量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力构成，两者的比例由生产的技术水平决定。这种由生产技术水平决定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力之间的量的比例，叫做资本的技术构成，因此，农轻重产业资本的技术构成是不一样的。老师举例说，根据我国的统计资料，现阶段我国的农轻重产业的技术构成大约是，重工业一个劳动力需要有14000元的装备相匹配，轻工业一个劳动力需要有4000元的装备，而农业一个劳动力则需要400元的装备。老师指着我们学生说，你们中有不少是上山下乡的知青吧。那时班里不少是三十岁左右的老三届知青，似乎比二十来岁的应届生还多。老师说，为什么让大批知青上山下乡？就是文革把经济搞得一团糟，国家没有多少钱投资重工业和轻工业，自然安置不了多数劳动力，而安置一个农业劳动力只需400元钱，可以少花钱而大量安置劳动力。

联想到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的重要文章《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就是这篇文章公开了毛主席的批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来一个动员”。城市青年为什么在城里吃闲饭？不就是城市里工业停滞，没有岗位可安置大批青年学生就业吗。然后赋以知青下乡可以改造世界观、大有可为的崇高目标，再次举起革命英雄主义、革命浪漫主义的大旗，于是我们知青下乡大潮卷起。

老师说，据他知道，农场或公社生产队每安置一个知青，就可以得到政府拨给400元的人头安置费，跟理论值一样。400元钱在当时不算少，所以知青大量下去，农村里边接受的大都很痛快。

确实，400元钱在当时不算少。那时一个大学毕业生工作后月薪是56元，一个普通工人工资36元，我们农场的农工才32元，当时上海吃救济金的居民一月给12元，而在农村插队落户，干一天农活争十个工分，才合1毛钱，女劳力更少，才给六七分钱，一个月也就3元钱。所以400元钱在当时农村是一笔大钱了。怪不得1969年后知青安置干脆搞“一片红”，统统的下乡，除了领导人要把1968年掀起的上山下乡运动进一步推向高潮,有因势利导、推波助澜的用意，从农村这边看，还有明显的经济诱因在里边呢。

知青上山下乡到了农场，到了生产队，农村当地就可以得到政府拨给400元的人头安置费，还跟理论值一样，很有意思。因此，我比较相信因文革中经济困难、进而就业困难，而后有知青大规模上山下乡的“经济说”，把它列在各种成因的首位。

华夏知青网不是赢利性的网站，所刊载作品只作网友交流之用
引用时请注明作者和出处，有版权问题请与版主联系
华夏知青网：http://www.hxzq.net/
华夏知青网络工作室

上山下乡是革命英雄主义浪潮的尾声

这不是一篇论文，只是一点个人的感受。这里说的是文革时期的上山下乡。

那些年里，北大荒严酷的气候条件、多发的自然灾害，和繁重的劳动，让知青们吃了不少苦头，但我们大都挺过来了。后来看到描写俄国十二月党人被沙皇流放到西伯利亚的故事，沙皇警察并不直接监管他们，在那个地方进出只有一条道,就是有人接应也逃不出来，十二月党人就在冰天雪地里自己劳动生存。我发现他们吃的苦头也不过如此。区别在于十二月党人是被迫的，我们知青是在“广阔天地，大有作为”、“接受再教育”、“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号召下许多人是自愿的，尤其是前期上山下乡的那几批知青。

知青能够熬过艰难的日子，相信是有各种信念在轮番起作用：一是领袖的号召是革命青年的指路明灯，要大有作为，干一番事业;二是革命激情支撑，“枪一响，上战场，老子今天就死在这战场上了”（据说是林彪的话）！不能当狗熊，撑也得撑到底；三是集体抱团相互影响，大家都在吃苦，别人能干，我也一定能干；四是刘郎已恨蓬山远，更隔蓬山一万重(爱情诗变成乡愁诗了)，家乡已经遥远，没有退路了,如今只有在此好好干啦。这最后一个因素非常现实，拿现在时髦的话讲，就是城乡二元结构问题决定的。记得1968年8月初我到派出所办户口迁出手续，女民警很郑重地问：你是要把户口迁到黑龙江？迁出去就进不来啦！我点头肯定，她才办理。确实,一旦城市户口变成了农村户口，你就很难再变回去。沮丧地讲，是一失足成千古恨，豪迈地讲，叫坚定不移向前进，没有退路，只有直面困难，直面艰苦。

格言说“苦难是金”，这在当时是体会不到的，俗人在当时都是感到艰苦难熬的。后来读大学时哲学老师跟我们讲黑格尔,说马克思讲到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法里也包含唯物主义，举了个例子,黑格尔说,同样一句格言,一个老人的理解与一个年轻人的理解是不太一样的，意思是说，老人的理解中包含了他的实践和经历。当时对马克思举的这个例子理解并不深，不甚了了。现在有所体悟，上山下乡中的艰难岁月确实让知青们学会了坚韧，许多人一辈子受益。社会上还有对知青上山下乡更积极的评价：经风雨、见世面，献青春，洒汗水，认识社会，磨砺意志，学习实践，增长才干，给广大农村发展注入了青春活力和勃勃生机，带来了城市文明和先进文化。这当然都是令知青们宽慰的。

但实事求是地说，文革时期的上山下乡对领导者来讲是一场匆忙的运动。据刘小萌所著《中国知青口述史》中北京知青曲折本人亲述，他们是文革中第一批上山下乡的北京知青，1967年10月9日从北京出发到内蒙古插队落

户，10日就被时任中央文革副组长的陈伯达获知此事，11日就在《人民日报》头版登出了消息。曲折说："这一广播、一登报，影响就大了……中央明确表态支持。所以，很快就有了第二批，他们的方向有两个，一是东北，一是内蒙古。"曲折等人的行动助推中央的决心。此后一年多时间，又有北京、上海等大城市许多批知青，分赴内蒙古、北大荒等边疆农村垦区落户扎根。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重要文章《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文中首次引用了毛主席的一段批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最高指示"要"来一个动员"，自此以后，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高潮。

文革把中国经济搞的千疮百孔，民生凋敝，哪来许多工作岗位安置积压已久的历届初高中毕业生，于是再次以崇高的革命名义作为号召，才有蔚为壮观的几千万知青上山下乡，波及几乎所有几千万个城镇家庭。然而它从根本上讲是违背了社会发展的工业化、城市化的规律。没有能力合理解决大量社会新增劳动力的教育、培养和安排使用，把成千百万的知青从城乡二元结构的一极急促地转移到了另一极，产生了一系列社会问题。一是由于农村发展水平低下，对劳动者必要的保护，必要的避险措施很是缺乏，以致一些知青工伤致残，一些知青落下病根，甚至发生不少工伤死亡，过劳死亡，造成许多负面的社会影响。二是随着上山下乡时间的推移，因病退、困退、征兵、招工、工农兵学员招生而返城的人越来越多，这实际上是城乡二元结构矛盾的一个反弹，相应的走后门、拉关系、女知青被潜规则等问题越演越烈，（与改革30年里如影随形的腐败问题,实际上是前世今生的关系）形成社会的关注点、忧虑点。三是千百万知青每年春节返城探亲，形成返城高峰，铁路公路运输拥挤不堪，火车票需要连夜排队，一票难求，成为当时的一个社会问题，跟现在农民工每年春节返乡高峰相类似，当然不同的是方向正好相反，以及农民工每年大规模返乡涉及到不光是城乡二元结构问题，还有更复杂的中国土地制度问题。我们当年经常乘坐上海到哈尔滨的56次列车，被称为"强盗车"，极其拥挤，秩序极乱，打架斗殴，行李丢失，甚至有人被挤下车，被火车压伤、压死时有发生。万千知青们从农村探亲回城，带回来的信息往往是农村生活的艰辛和劳动的繁重，使得千千万万城市的亲人充满越来越多的忧虑和担心。

如此，使得社会积怨越来越多，于是才有1979年沸反盈天的知青大返城。这是时代躲不过的悲剧场景吧。

我认为，文革时期的上山下乡，是二十世纪中国社会持续不衰的革命英雄主义浪潮终于到了最后的尾声演奏，或者说绝响，对知青们来讲是他们用青春化为一个个蝌蚪似的音符，对时代来讲是一出悲壮凌乱的过场，对那时领导人来讲是强弩之末、无奈之笔，勉强之举。毋庸置疑，宏大的革命英雄主义浪潮，在开创新中国、建设新中国的伟大事业中建立了不朽功勋，然而一而再，再而三，三而竭，随着文革的终结而渐渐退潮，在市场经济的务实的中国，它一去不返，很难想像它在今后还会重演。

思考上山下乡运动四十年

——谨以此文纪念上山下乡运动40周年

思考上山下乡运动四十年，我忽然发现了知青定律

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从此，轰轰烈烈的上山下乡运动迅速在全国范围内展开，遍及城镇的每一个角落。到1977年止，全国共有1700万城市青年下乡。当时全国总人口近8亿，城市人口近两亿，约三千多万个家庭，1700万知青按每家一个计算，意味着城市的半数家庭都有子女下乡。历时十年的上山下乡运动范围之广，影响之深，使其它运动望尘莫及。时至今日，“知青”这个特殊的名词，对现在的年轻人来说，它的含义可能只是一段历史；但对于那些经历者来说，它代表的却是一段刻骨铭心的记忆。

笔者从下乡的第一天起，就努力从正面去思考上山下乡运动的必要性与合理性，但适得其反，竟然悟出了相反的道理。在随后的几十年时间，凡是接触到当年的知青，我都要与之攀谈，交流彼此对农村岁月的感受。在众说纷纭的意见中，我发现知青当事人对农村的亲身感受不尽相同，大致可分为感觉良好型、温和评介型及坚决反对型三种感受。为什么同一群体的当事人对同一事物竟然存在着三种不同的态度呢？经过长期的分析与思考，我忽然从中发现了知青定律。

知青定律一：知青对农村岁月的感受与下乡时间成反比

史无前例的文化革命进行了十年之后，被彻底否定了！但贯穿于文革中的上山下乡运动却被人遗忘，当局即不肯定也不否定，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文革这个大运动中套有许多小运动，这是现在许多青年不知道的。经笔者粗略的不完全的回忆，就有：批判“三家村”、大串联、破四旧、清查516分子、文攻武卫、上山下乡、一打三反、清理阶级队伍、批林批孔、整党和吐故纳新、批陈整风、反击右倾翻案风等十多个运动，这些运动长的有一两年，短的仅数月。但是上山下乡运动则长达十年之久（1968——1977，如果加上知青大返城的安置时间，则要计算

到1979年），几乎贯穿于文革始终。

由于家庭背境、个人能力与机遇的不同，知青在农村插队的时间也不尽相同。就我接触的知青来看，短的一年多，大多数是2至6年，最长的老三届知青和兵团知青竟然长达十年。我发现，知青对农村感受的不同，正是来源于他们下乡时间的长短。一般来说，下乡时间越短，对农村感觉越好；反之，下乡时间越长，对农村的感觉越糟。我在交谈中发现，大多数感觉良好型的知青在农村呆的时间不长，一般为1至2年，有的连国家供应粮都未吃完便离开农村，在以后几十年的个人生活中，留下的多是新鲜和有趣的回忆。另外，知青所在生产队的富裕程度、离家的远近、是否有人照应都会影响到他们对农村的评判。比如，在城郊落户的，或是投亲靠友的知青由于生活条件较好，对农村的感觉就好很多；反之，落户在边远山区，生活条件艰苦，时间又长达数年乃至于十年的知青，精神和身体的煎熬都达到了极限（个别女知青还受到基层流氓干部的凌辱），对上山下乡运动产生极大的反感就在情理之中。就我接触的知青来看，明确否定上山下乡运动的占了绝大多数，道理很简单，荒废了学业，毁掉了青春，老来一事无成！1978年2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先念在谈到知青工作时说："社会上议论很多，四不满意是我讲的。青年不满意，家长不满意，社队不满意，国家也不满意嘛"。

<u>知青定律二：</u>知青日后的事业成功与否与评判上山下乡运动成正比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极大地改变了共和国第一代青年的命运：他们在渴望知识的时候中断了学业；在身体发育的青少年时代却遭受饥饿和繁重的体力劳动。农村严酷的现实粉碎了他们的青春理想，为了国家他们不得不作出重大牺牲，把自己最美好的青春岁月留在了农村，从而成为文革的牺牲品。许多知青的人生轨迹可以概括为：60年代吃过糠、70年代下过乡、80年代返回城、90年代又下岗。许多人历尽磨难，到头来却面对下岗，靠低保度日的艰难岁月，成为衣食不保的贫困弱势群体，这就是那场运动的后遗症。可以说，大多数知青日后的事业是不成功的，他们否定上山下乡运动是必然的。但个别知青日后事业的成功影响了他们对上山下乡运动的主观评判，他们产生了错觉，出现了逻辑混乱，认为人生事业的成功一定要经过农村的磨练。这些人以富商巨贾和党政官员为主，他们认为，只有经过农村艰苦的磨练，才能吃苦耐劳，取得今天的成就。有的还喊出"青春无悔"的口号，对上山下乡运动给予充分的肯定。那么，他们真的愿意"扎根"农村一辈子，"青春无悔"真是他们发自肺腑的心声吗？请看知青定律三。

<u>知青定律三：</u>即便是力挺上山下乡运动的知青也不愿"扎根"农村一辈子。

与上两条定律相比，这更是一条人人自觉遵守的铁律。文革中，当局树立了许多优秀知识青年的典型人物（恕我不在此处点名），但到头来都是远走高飞，有的头天还信誓旦旦要"扎根"农村一辈子，第二天就进了工厂。另一方面，知青在农村的处境牵动着亿万父母和亲属的心。为了孩子早日跳出"农门"，家长们使出了各种招数，拉关系，走后门，不正之风由此产生。由于每年招工名额实在太少，其拥挤程度不亚于当今的公务员考试。基层掌有

实权官员的子女到农村犹如蜻蜓点水，很快就因招工、参军或是读工农兵大学而离开；一些文革中未倒台的中高级干部，直接把子女安排进部队当兵而躲过上山下乡，这种事在文革中屡见不鲜。影视剧《血色浪漫》就有真实而又精彩的描写，此处不作赘述。只有普通老百姓子女“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只能在农村苦熬。如果家庭出生不好，或是直系亲属有历史问题，那就只能等到1979年的知青大返城了。迄今为止，尚未发现一例志愿留在农村而不返城的知青（倒是有极个别知青因与社员结婚，按政策不能返城），由此可见知青定律三的正确性。

2008年

华夏知青网不是赢利性的网站，所刊载作品只作网友交流之用
引用时请注明作者和出处，有版权问题请与版主联系
华夏知青网：http://www.hxzq.net/
华夏知青网络工作室

论近期知青文学的冷落

知青文学曾在八十年代红火了一段时间，但以后逐渐冷却。到了1998年正逢中国知青上山下乡运动30周年，知青文学再度涨潮，仅这一年内全国各地出版的知青文学与知青纪实作品不下五十余部，再度掀起一股知青怀旧潮，但热浪奔泻后再冷静地审视与沉思，这么多作品中除了邓贤的《天堂之门》，李晶的《沉雪》和牛伯成的《最后一个知青》等几部作品外，大多系出版社和书商的炒作。平庸与矫饰者居多，令人失望，大多数作品缺少历史反思精神，仍沉溺在昨天的知青一代人理想主义与英雄主义的"自恋"状态中，从而在当年便引发了关于知青文学价值观的大争论。最具代表性的是张抗抗的《无法抚慰的岁月》一文的观点是："我们这一代人曾经历的苦难，已被我们反复的倾诉与宣泄，我们这一代人内心的伤痛和愤满，已激起了世人的广泛关注；我们这一代人对于历史和社会的质问，已一次次公诸于众；然而临近20世纪末，我们这一代人，是不是能低头回首，审视我们自身，也对我们自己说几句真话呢？"，另一位作家谢泳的观点更袒露："我们已经讲了不少青春无悔的故事，如果每个人的过错都可以归之于时代的话，那我们这个世界里就没有什么罪人了。"他认为，知青是那场灾难的参与者，要是没有个人的反省，对一个民族的进步是有害的。他们的观点在当年的知青群体中引起了震动，有赞同的，更多的是责难，认为这是一种自我否定，在感情上难以接受。

与此同时还出现了另一种现象，一些出身于60年代，并无知青生活经历的青年作家们也开始涉足知青文学。如刘醒龙的《大树还小》，李洱的《鬼子进村》，韩东的《下放地》。他们的作品多半从农民的角度或隔代人的眼光来写知青生活，将那场浩劫写成农民是被伤害者，并抨击知青们独揽了话语霸权。对此有人叫好，认为这些"局外人"为知青文学融进了新意，但在更广大知青读者层面中感觉是心理上被"蛰伤"了，怒斥他们是对历史真实的亵渎。

这场大争论已经过去三年了，惯常的那种大争辩引发的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的繁荣不仅没有出现，令人不解的是近几年知青文学的创作与相关的文学批评陷入一片沉寂冷落。那些一度活跃于文坛上的"群星灿烂"的知青作家们，近年很难能听到他们的声音，在花花绿绿，偌大的书市或书摊上很难找到几本近年出版的知青文学作品，这是一种值得深思的文化现象。笔者认为造成近几年知青文学冷落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是与进入90年代以来整个文学创作处于社会边缘化有关。处于社会转型期嬗变中的文学，由于受到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全社会浮躁心态的影响，整个文化事业日趋功利化，具有时代反思色彩的严肃文学创作不再成为全社会的关注中心，而趋于边缘化而受到冷落。而作为反映一代人生命历程为使命的知青文学在整个文学事业中一直处于非主流的地位，那么在这种社会大环境中，知青文学更处于社会的边缘化，陷入沉寂是理所当然的。

二是任何一种类型的文学创作都具有其内在的规律性，有高潮也必有低潮，不可能呈直线发展提升。80年代知青文学从当时的伤痕文学中脱颖而出，20年来经历了一个三部曲的过程。早期的知青文学的共同主题是呼唤人性，出现了像叶辛的《蹉跎岁月》，梁晓声的《今夜有暴风雪》，以后又沉寂了几年。进入90年代初期再度升温的知青文学侧重于反思历史，出现了邓贤的《中国知青梦》，老鬼的《血色黄昏》，叶辛的《蘖债》这类震撼人心的力作，到了90年代后期，随着社会生活的演进，知青文学则致力于重塑"知青精神"，反映他们的后知青时期的足迹，表达他们这一代人在社会转型期的困惑与希冀及其生存状态，如邓贤的《天堂之门》描写一群从《中国知青梦》里走出来的老知青的人生际遇，以一个知青领袖的毁灭，来深刻揭示这一代人在商品经济大潮中已经分化，甚至由于这种个人命运的巨大差异，才构成群体命运的波澜壮阔及曲折走向，同时也是对知青"自恋"情结的深刻反省。邓贤的这部小说可以称为进入新世纪的知青文学的一个标高，要超过这个标高是有难度的，这正是理论界与广大读者所瞩目的，这使得许多知青作家的步履难艰。因此近年知青文学陷入低潮也是正常的，合乎文学创作的规律，低潮也正预示着历史深度与思想力度的知青文学的"高潮"即将到来。

三是与知青作家群体们现实心态有关。对近年知青文学的冷落，有人指责一些曾大红大紫的知青作家们，随着社会地位的改变，受世风的影响，放弃了"为一代人宣言"的社会责任与历史使命，趋炎附势，热衷于商业化的文化，这种"空穴来风"的责难，虽说非理性的批评，但也表露了广大读者对知青作家们近期创作乏力的失望。实际上许多知青作家对如何深化知青文学题材的开掘陷入痛苦的思索，如果按照以前的老套路写下去，吃力不讨好。有一些自我感觉力不从心者觉得无法超越自我，再也写不出先前作品深度的，便退却放弃了。一些历史责任感较强的作家，认识到只有将知青文学置于文化大革命和社会转型期这两大时代背景下审视，对失前观念重新梳理，如知青这一代人与时代的关系，不仅仅为时代造成他们命运的坎坷曲折的灾难因而是债权人，同时他们中的不少人也是历史的参与者，因此他们也是债务人，更要有一种自我批判的精神，才具有思想的深度，经得起历史的检验，这使得他们必须重新调整心态，对素材的积累和题材的选择也须要一段时间的磨合，目前处于创作的酝酿阶段。同时也不能否认一批知青作家们对社会的批判从知青群体而转向对整体社会的批评。知青作家们感到深度不够，80年代知青文学主将梁晓声转向了社会批判，克制地剖析中国社会各阶层，张承志依然迎风独立，但一部《心灵史》，使他成为一个百年来倍遭蹂躏的荒原部落发言人，而史铁生则以平和的心态叙写一种超然的人生状态。人们相信，在历史惯性的驱动下，在新世记以人为本的人文关怀精神的召唤下，这些当年知青文学的主将决不会逃避历史。

四是与知青这一代人现处的生存状态与心理需求有关。知青这一代人是当初从城市向农村整体移民社会实验的牺牲品，在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他们中的多数又成为社会转型改革开放成本的承担者，随着年龄的增长，大部分已

下岗退休，即将整体退出中国社会的主舞台，他们中的许多人还在为生存而奋斗，对往昔的历史他们已不愿回顾，展望未来，他们感受到更多的是困惑与失落，与衣食饱暖，子女教育相比，文学作品的阅读与欣赏毕竟是奢侈的，但这并不意味他们对文学的全盘拒绝与漠然，相反他们对知青文学的发展的要求是苛刻的，再倒几十年的苦水使他们腻烦，但粉饰他们的现状或无视这一代人存在更使他们愤慨，这使作家们在创作中又面临着新的挑战。

笔者认为知青文学已走过30多年，它已构成反映当代中国社会变迁，一代人心路历程的特殊窗口，形成当代文学史上的独特景观。老知青们的生活轨迹仍在延伸，追踪他们的知青文学必将延续发展，知青文学是一个跨世纪的话题，是中国当代文学的丰富资源。知青文学的读者是一个巨大的社会层面，不仅包括当年的近2000万知青，还有他们的父母兄妹及子女，这个人数接近1亿人，知青题材尤其是反映后知青生活的作品仍是社会公众关注的焦点，如近两年放映这类题材的电视剧：《突围》、《遭遇昨天》、《重返石库门》、《梦醒何方》的收视率很高就是一个例子。

今年由工人出版社推出具有历史宏量和还原知青真本灵魂深度的《中国知青民间备忘文本》的上市，便引起社会各界的强烈反映，这套作品拒绝拜金与权力，张扬自尊与个性与血性，这是知青文学的一次超越与突破，显示了它不衰的生命活力。文学批评界预测，随着知青文学创作的一个周期的演进，到2003年，中国知青上山下乡35周年那一年，知青文学将再度涨潮升温。

作者简介：

安徽省芜湖市第三中学66届高中毕业生，1968年12月去安徽省南陵县弋江公社插队，长达7年，1975年招工返城，1977年参加文革后恢复的第一次高考，毕业于安徽师大中文系，现任湖北审计干部学校高级审计师，民盟省委委员，湖北省作家协会会员，自1994年以来致力于中国知青文化事业，曾先后参与策划武汉知青回忆录《我们曾经年轻》、主编《沧桑人生》（中国特殊群体写真）和《我们曾经歌唱》。是全国大型知青文化丛书《知青人生感悟录》（远方出版社）和《中国知青岁月》（广东旅游出版社）的编委，发表知青题材的小说、散文、文学评论达百篇。

华夏知青网不是赢利性的网站，所刊载作品只作网友交流之用
引用时请注明作者和出处，有版权问题请与版主联系
华夏知青网：http://www.hxzq.net/
华夏知青网络工作室

文革前的知青题材文学及其社会效果

（一）文革前的知青题材文学

农村青年回乡与城镇青年到农村落户参加生产劳动的做法，可追溯到上世纪五十年代初；1954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成立后，大批支边青年奔赴新疆；到五十年代后期及六十年代前期，城镇青年上山下乡的浪潮不断；在这种形势下，反映下乡知青的农村生活、劳动场景的文学作品应运而生。在当时来讲，并没有严格意义上的“知青文学”，相关的作品只是充分肯定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重点描写知青接受农民（贫下中农）教育以及知识青年“在阶级斗争风浪里成长”的事迹，显然，这是一种鼓励广大青年上山下乡、带有政治宣传性质的文学作品（这里所指的是公开发表的作品）。

事实上，这时期反映农村青年及转业军人投入农业生产的作品大大多于描述下乡城镇青年生活的作品，如短篇小说有王汶石的〈沙滩上〉、〈夏夜〉，马烽的〈结婚〉、〈韩梅梅〉，李准的〈耕云记〉、〈清明雨〉等，中篇小说有康濯的〈春种秋收〉，长篇小说有柳青的《军队的女儿》、《雁飞塞北》、《创业史》等，电影有《夏天的故事》、《金铃传》、《我们村里的年轻人》、《老兵新传》、《草原雄鹰》、《青山恋》等。虽然这些作品的主角只是有文化知识的农村青年或转业军人，但积极鼓励有文化知识的青年与无/少文化知识的农民结合，鼓吹扎根农村与边疆大有作为，讴歌无私忘我的精神世界，具有浓烈的革命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的色彩，为后来大规模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树立了榜样，具有一定的号召力与诱惑力。这些作品所形成的叙事模式，也为同时期描写城镇知青下乡及赴边的文学作品提供了行之有效的范本。

这时期反映城镇知识青年下乡务农以及奔赴边疆军垦农场（生产建设兵团）的代表作品，当属《朝阳沟》、〈西去列车的窗口〉、《年青的一代》以及《边疆晓歌》等；此外，《军队的女儿》与《雁飞塞北》作为反映军垦农场的小说，对后来知青奔赴边疆亦起到了极大的激励作用。

《朝阳沟》（豫剧）为编剧杨兰春（1921-）创作于大跃进时期的1957年，1963年由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成电影。故事内容为：从小生长在城市的银环，和同学栓保在高中毕业后，表示了决心，要坚决到农业生产第一线，做一个社会主义的新型农民。由于银环和拴保有爱情关系，他们一同来到拴保的家乡——一个偏僻的山村朝阳沟，决心为建设山区贡献力量。可是当银环下到农村，实际参加了农业生产后，碰到一些困难，思想又动摇了：她认为农

业劳动既劳累受苦，农村的生活又单调乏味，觉得在农村干一辈子是屈了她的才；加上妈妈旧思想的影响，银环便要离开农村，回返城市。在党支部和社员们的耐心帮助下，经过种种思想斗争和实际锻炼，银环终于认清了农业生产的广阔前途，坚定了做一个新型农民、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志愿。《朝阳沟》被视为是第一部写城镇青年下乡务农的作品（戏剧与剧本）。

〈西去列车的窗口〉是一首长篇政治抒情诗。1963年春夏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到上海吸收了一大批支边青年。诗人贺敬之（1924-）到上海亲自参加了这次征招活动，并与上海支边青年一起乘火车从上海奔赴新疆。〈西去列车的窗口〉就是以此为题材写成的一首长篇政治抒情诗，对集体主义、英雄主义、理想主义进行了热情的讴歌："……呵，在这样的路上，这样的时候，/在这一节车厢，这一个窗口……/你可曾看见：那些年轻人闪亮的眼睛，/在遥望六盘山高耸的峰头？/你可曾想见：那些年青人火热的胸口，/在渴念人生路上第一个战斗？/你可曾听到呵，在车厢里：/仿佛响起井冈山拂晓攻击的怒吼？/你可曾望到呵，灯光下：/好象举起南泥湾披荆斩棘的镢头？/呵，大西北这个平静的夏夜，/呵，西去列车这不平静的窗口……"《年青的一代》（话剧），编剧陈耘、徐景贤（1933-2007），1963年6月由上海戏剧学院教师艺术团首演。剧本发表于《剧本》1963年第8期，经修改后于1964年出版单行本。《年青的一代》通过几个青年对生活、劳动、升学、工作分配等问题的不同看法，反映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种幸福观及世界观的斗争。剧中勘探队员萧继业和林育生同是地质学院毕业生，却走上了截然不同的人生道路。萧继业不畏寒风烈日，登山探矿，甚至当他的腿因救人受伤需要截肢的时候，仍然顽强地坚持工作。而林育生一心追求安逸舒适的个人幸福生活，为了达到长期留在大城市的目的，竟至伪造病情证明。养父林坚是工人出身的老干部，当他发现林育生已经走入歧途时，深为痛惜，拿出了林育生亲生父母的遗书，告诉他原是烈士的后代，在事实教育下，林育生决心痛改前非，继承父母的遗志，于是与女友夏倩如随萧继业赴青海。林育生的妹妹林岚也与社会青年李荣生等赴江西井冈山农村插队务农。剧本除萧继业外，还塑造了林坚、萧奶奶、林岚等先进人物，以及夏倩如、李荣生等"中间人物"的形象。《年青的一代》曾获文化部授予的1963年以来优秀话剧创作奖。1965年，被改编、摄制成同名故事片。

《边疆晓歌》（长篇小说），作者黄天明（1930-），作家出版社1965年3月出版。这是一部反映一批知识青年响应政府的号召，组织志愿垦荒队，到云南孔雀坝垦荒戍边的长篇小说。这些知识青年义无反顾地离开城市，奔赴遥远的边疆，在那里，他们战胜了炎热、疾病等重重困难，艰苦奋斗，白手起家，终于建成了亚热带经济作物农场。小说处处可见政治宣传口号式的语句，他们唱的歌是："我们青年不能让荒地长野草，我们青年不能让荒地睡大觉，青年们到祖国伟大的边疆去！垦荒队员们向困难进军！"女主角苏婕夜访心仪的男主角林志高，心中想的是："这是一个新的开始啊！茫茫黑夜永远地过去了，一个从未受过正式教育的青年，为了党的事业，踢翻了重重障碍，开始跨到广阔的知识天地里来。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之间的千年冰峰，在新时代的曙光中崩坍了。历史的创造者，终要成为文化知识矿藏的真正主人！"俨然国家政策、意识形态的代言。当然，小说也用颇为艺术化的笔触，对垦荒生活进行了浪漫的描述，在西双版纳美丽神秘的大自然中，垦荒队员捕捉孔雀、饱吃香蕉、白天开荒，

晚上围着篝火跳舞，畅谈理想，过着集体主义、军事共产主义的生活。这对于充满革命激情、浪漫理想的年轻人来说，又无疑是一个具有强烈诱惑力的、田园诗般的世界。

《军队的女儿》（长篇小说），作者邓普（1924-1982），中国青年出版社1963年出版。该小说故事的生活原型为：1952年，不满十四岁的少女王孟筠（1941-）虚报岁数从湖南参军到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她性格倔强，重活、累活抢着干，过重的劳动和艰苦的环境，使她患了严重的风湿病，双耳失聪。她以惊人的毅力，顽强地与疾病进行抗争，同时，以日记的形式写下了《病床上的歌》。病情稍有好转，她又坚持工作，看别人口形与对方交流。1956年，作家王玉胡（1924-）发表了介绍王孟筠事迹的报告文学〈生命的火花〉，国内各大报纸相继刊载。1962年，王孟筠所在农场的宣传干部邓普根据报告文学编写了同名电影剧本，由西安电影制片厂搬上银幕。1963年邓普的中篇小说《军队的女儿》出版。小说讲述，女主人公刘海英十五岁报名参加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成为一个拖拉机手，因为救落水小孩与抗洪接连遭受两次严重疾病的打击，变得又聋又瘫。在老场长的关怀教育下，她以坚强的意志和乐观的精神与疾病抗争，表现了生命的极限和奇迹，最终战胜了中耳炎与瘫痪，健康成长起来，重新驾起拖拉机。

《雁飞塞北》（长篇小说），作者林予（1930-1992），作家出版社出版1962年出版。该小说具有真实的历史背景：1958年1月24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出《关于动员十万转业官兵参加生产建设》的指示，于是全国各地八万多转业官兵（加上随军家属及流放的右派共约十万人），汇集北大荒，其中包括一批军校毕业生以及不少参军前就是清华、北大、复旦、同济等著名院校的毕业生，还有军队的文化教员、作家与艺文工作者。短短两三个月时间，号称十万的移民队伍迅速进入荒原腹地，开垦出大量荒地，建起一大批农场。林予1958年转业来垦区，在负责八五三农场四分场（雁窝岛）的场史撰写工作的同时，以1956年铁道兵和1958年转业官兵开发荒原上的雁窝岛、建设农场的生活为原形，创作了这部“反映了北大荒人艰苦创业的英雄气概和献身精神”的长篇小说。这部小说不仅描写了北大荒人开荒种地，艰苦创业的真实情景，还描绘了天广地阔、野草茫茫，以及“棒打麅子、瓢舀鱼，野鸡飞到饭锅里”富有诗意的奇特景象，对表现“北大荒题材”的小说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文革前知青题材作品的社会效果

文革前的知青题材作品，对当时以及后来尤其是文革中的知青，都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从当时的报导、当事人的日记、文革后的回忆文章，尤其是知青网路文章，便可看出这些影响所在——

有关《朝阳沟》的读者反映：

一，当年可真是激情澎湃，受《朝阳沟》影响。还打算扎根农村一辈子呢。我是1970年当兵，在农村只干了两

年。（白凡〈回千里〉）

二，当时正是豫剧《朝阳沟》唱遍全中国的时候，那时的年轻人，男的个个都想当栓保，女的人人都想做银环，青年人到新村这种年轻人成堆的地方去，应该还算是一件很浪漫的事。（xiangpiyazhi〈文革忆旧系列之三——新村〉）

三，……这便是我最初的美妙想像，其实它正是豫剧《朝阳沟》中一个充满诗情画意的场面，也是我下乡后最喜欢回味的一些电影镜头。之所以常出现这种联想，是因它与我眼前的生活有关，也与我眼前的生活类似。镜头中那一男一女便是剧中的男女主人公栓保（回乡知青）和银环（下乡知青），他们正是一对恋人。他们所干的锄草，正是我下乡这地方工期最长的一种农活。只可惜我们的锄草场面没有一点诗情画意，那大约是因为眼前这些手握锄头的农人们无一例外都穿着肮脏破旧的衣裤，我的身边也没有一个操着锄头指导我干活的“栓保”。（流水潺潺〈好想有个“栓保”〉）

四，电影《朝阳沟》把农村描绘得美如天堂，其实，我们插队后的第五天便开始丢农具，一年共丢了一百二十多件，偷盗者百分之百的贫下中农成份。集体户杀的第一口猪，刚开膛大队会计就等着要肉了，愚蠢的我竟没给，这使得他记了我四年的仇。1973年推荐我上大学，这位会计管公章，当着生产队长的面在推荐表上写了“立场不稳”四个字，狠狠报了一箭之仇。（马镇〈沉重的奉献〉）

老例按：《朝阳沟》主人公银环的生活原型赵银环并不是上山下乡的知青，而是一个土生土长的乡下人，也没念过中学，充其量也就是具备高小文化。作者将她塑造成城镇知青，似乎是为了突出“知识青年与劳动人民相结合”的政治教化作用，以及强化该作品对城镇知青的号召力与影响力。《朝阳沟》虽然主要是围绕着一对恋人两个家庭，没有像其他几部作品那种浓烈的集体主义、英雄主义、浪漫主义及理想主义的色彩，但毕竟是第一部描写城镇知青下乡的作品，因此在后来的知青中还是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有关〈西去列车的窗口〉的读者反映：

一，姚进在同学会那天深情地背诵着郭小川（应是贺敬之）先生的〈西去列车的窗口〉，此情此景让人感动……朗朗诗句，把我们带回到了那个红色的年代，想想虽然当时自己家庭的政治背景差，几乎差一点就被学军中学高中拒之门外。但那个年代却反而造成了自己一心想证明自己的赤子之心，总是追随着完美的理想主义色彩而不断努力着。（fujing〈由高中三十年同学会所想到的〉）

二，因了贺敬之的诗，“西去列车的窗口”曾成为理想主义的同位语。我就在这个窗口旁坐立过。……无论在四年的插队生涯里，还是告别陕北后的二十多年来，我一直对构成我们群体中坚的西城和海淀的同学们心存不变的感激。事实上，是他们将我引到了西去列车的窗口，引上了黄土高原，引进了既贴近土地又超越平俗家常的高远畅爽之境，温润着我的生活，也温润着我的生命。（田丰〈西去列车的窗口〉）

三，（〈西去列车的窗口〉）那些烫人心扉的语句，又把我带回到了我的生命的前端，带回到了那热血沸腾的

年代。就是这些我和同学们争相传抄的诗文，在我们当时稚嫩的心灵上产生了强烈的共鸣，从而整理行装，毅然决然登上了北去边疆的列车，要为了祖国母亲去献出自己的美好青春。（佚名〈影响我生命历程的诗文〉）

四，我们是北京市委敲锣打鼓欢送出去的最后一批北京知青。还记得1977年4月的那天，我们一行二十八人手捧“红宝书”，接过市里送给我们每人一件的风衣，在锣鼓喧天的热烈欢送中踏上了西去的列车。那年我十八岁，挥别了亲人、同学，义无反顾地离开了北京，一种要扎根农村的壮志豪情激励着我们去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在西去的列车上，我们捧读毛选五卷，大声朗诵贺敬之那首著名的诗歌〈西去列车的窗口〉，帮着打扫车厢，一种对新生活的向往鼓舞着我们。这种热情一直保持到了延安市。一下火车，延安市几千人打着鼓夹道欢迎我们。可是，在往县里走的路上我们的心越走越凉。看着两边光秃秃的山脉，没想到这地方这么贫瘠，不通车，交通工具就是毛驴。本来一路上都是高歌着的我们，这时情绪一下子跌落下来，一想到我将一辈子在这么穷的地方生活，心里充满了矛盾。……我们几个男生相依为命就这样捱了一年。这一年我觉得所有的苦都吃过了，我特感谢迈向人生第一步时给我的这个机会，它炼就了我吃苦的毅力、忍耐力和坦诚的个性，我的团队意识也是在那时形成的。十八九岁，在人生观的形成期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是我一生的财富。那些品质我想我现在大部分还保留着。（白云涛〈磨难——我职业生涯的一笔财富〉）

老例按：诗词国度的悠久传统，理想主义的宣传与教育，加上革命年代的浪漫情怀，《西去列车的窗口》的诱惑力无疑是十分强烈且致命的。事实上，《西去列车的窗口》本身也就是理想主义宣传与教育的最佳教材。作者贺敬之是声名显赫的延安老革命诗人（官至文化部副部长、代部长，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革命加浪漫是其炉火纯青的创作手段。不可否认，在那个年代，〈西去列车的窗口〉对读者的影响是十分深刻且牢固的。亦不可否认，理想与浪漫自有其超越性——超越时空与阶级，故即使时至今日，人们对《西去列车的窗口》仍是宠爱多于批评。浪漫散去激情未减，即使下乡后经历苦难仍对其影响更多持肯定态度。

有关《年青的一代》的读者/观众反应：

一，正在上海演出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楚剧团的一些青年演员看了《年青的一代》以后感动得流了泪。他们表示，看了这个戏，更加热爱边疆，愿在新疆干一辈子。（新华社1964年1月21日稿〈反映新人新事新思想的戏强烈感人，华东话剧观摩演出充满时代气息，戏剧工作者决心多写多演社会主义的现代剧〉）

二，今天我们年级全体同学来到一宫，参加市委组织的欢送张勇烈士的弟弟张健到呼伦贝尔大草原插队落户大会。会后放映了彩色电影《年青的一代》。我感到，张健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他参军服役期满，不留大城市，主动要求到他姐姐张勇烈士战斗过的地方插队落户，这种精神多么可贵啊！电影《年青的一代》是一部好影片，已经看过多次了。可每看完一次都让我激动一次。（孙浴尘1976年3月20日星期六日记〈电影《年青的一代》观后〉）

三，上午去找纪北鸣，他到厂里去了，没遇上，吃过中饭去看了一场电影《年青的一代》。看的时候，我是多么地受着感动啊！那种年青人的思想、工作、生活，单纯而理想。他们是那样的年轻而富有朝气，怀着一颗火热的

心，投身到艰苦而有意义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去，对资产阶级思想进行了坚决的斗争，看着这银幕上的年轻的一代是多么的使人钦佩和羡慕啊。理想，前途，幸福，青春……可诅咒的时代呀！你却连这么一点发挥的机会都不给予。五四时代学生还可以上街游行示威，演讲宣传，现在就连“大字报”这种宪法规定的权力才贴上墙几天，就被冲洗的干干净净，还要“追查”、“严惩”、……完了！“躲进小楼成一统，管它冬夏与春秋”。（1976年4月9日日记，作者佚名，引自白鹿书院网站载《七十年代青春日记》）

四，后来看了电影《年青的一代》，一部反映地质学院学生在毕业前夕，是上艰苦地区为祖国找矿，还是留恋大城市生活，展开了思想交锋的影片。主人公萧继业的形象，深深震撼了我。我萌发了将来考地质学院，毕业后当一名地质工作者，一辈子跟石头打交道的美好理想。（庄大伟〈石头记〉）

老例按：舞台与电影的直观形象感染力，使《年青的一代》的影响更为广泛地深入人心。因此也往往成为动员、组织知识青年下乡最有力也最有效的文宣工具。标题“年青的一代”直接了当昭示了其所欲号召与动员的对象。献身事业、报效祖国，成为一代青年的共同理想。个人小我的利益无条件地消溶于国家集体主义的需要之中。两组男女主人公“革命加爱情”的剧情调配，给激情年代注入了几许浪漫；激情高调但手段高超的包装，也使人因其道德感召而历尽沧桑后仍不忍对其过多责难。

有关《边疆晓歌》的读者反映：

一，记得是在初中三年级读书时……我看到了这本《边疆晓歌》，首先是书的封面一下子吸引了我。当我读了第一页时，便觉得放不下手了。……书中知识青年那种英勇豪迈的革命热情和创业精神，使我深受感动；书中知识青年战天斗地，不怕困难的一段段故事，深深地映在我的脑海。从那时起，我就立誓长大了要像他们一样，做一个优秀的知识青年，到广阔天地里去，经受革命的暴风雨的锻炼和考验。有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沉浸在《边疆晓歌》封面那幅画里，沉浸在它的一段段故事里，朦朦胧胧地做着我的“知青梦”，甜甜美美地做着我的“青春梦”。那时，我并不知道知青生活的艰苦，农村生活的艰辛……两年多后，我的“知青梦”仿佛在一夜之间成真了。1974年12月，我也像《边疆晓歌》里的知识青年一样离开安乐窝似的城市，到完全是农村生活方式的国营林场插场了，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知识青年。在那里，我才真正懂得了什么是生活，它不是烂漫，不是幻想，而是历尽艰辛，跋涉前行；什么是人生，它不是享乐，不是逍遥，而是风雨历程，坎坷长途。（佚名〈《边疆晓歌》>让我做起“知青梦”〉）

二，我想起，正是《军队的女儿》、《边疆晓歌》……这些书鼓舞着我们上山下乡“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我们这群青年是唱着“宝贵的生命属于人民，让生命的火花放射光芒……”这首歌离开北京的。（郭晨〈这么办？〉）

三，兵团干部们的动员报告还未完我就已经决定了自己的命运:到云南,一定要去!使我如此坚定的还有《边疆晓歌》这本书。书中对西双版纳的描写,使我着迷,也使我执着地想去开垦那片神奇的土地……我们被带到一位老乡

的阁楼上。一上去,一阵霉臭和农药味扑鼻而来。房梁上,蜘蛛结了无数的网；楼板上，堆着老乡还未搬完的粮食等杂物。我完全呆住了,不相信地问自己:这就是我将要开始的兵团的生活么？（田太慧〈十七岁的梦〉）

四，鲁豫：“当时为什么会去北大荒呢？”姜昆：“那个时候我们初三毕业以后，说实在的有两个原因，一个呢就等于是当是来讲也是没有出路了，大家都走了，如果能够有机会跟大家一起走的话，也是一个非常高兴的事情；第二个就是当时说实在的还有一点积极的东西，就是我看了一本小说，那个时候我们这一代，好像知青都看过这本小说，叫做《边疆晓歌》，写的是在云南西双版纳，一群上海知识青年他们就来到了西双版纳，在一片原始的没有被开垦的土地上，怎么样就是跟当时的自然环境，跟当时还有这个社会环境，做了一些斗争吧。看得人心情激昂，热血澎湃，特想到广阔天地作一番事业。”（香港凤凰电视2008年4月24日“鲁豫有约”《知青四十年．爱在北大荒》）

老例按：热带风光、异族风情，给浪漫主义及理想主义加上了一层迷人的外纱，对充满理想与浪漫情怀的少男少女更具诱惑力与杀伤力。开荒垦边、农场生活，又给集体主义与英雄主义戴上一圈耀眼的光晕，对“在红旗下成长”“时刻准备着”的一代人更具感召力与动员力。但其美丽外纱与光晕消失后所袒露的丑陋真实却也令人更加难以容忍。因此，相对而言，文革后人们对《边疆晓歌》虽然仍有几许温情，但批评的力度却超过对其他作品。

有关《军队的女儿》的读者反映：

一，当有机会从晚上到凌晨一气读完这本感人至深的小说时，我十四岁。回首或深或浅的半百人生，脚印里竟然有着许多“刘海英”的痕迹，方知书中自信、自立、自强的精神已经潜移默化到我的灵魂和一生当中去了。七一年建设兵团来淄博招人的时候我刚满十六岁，因男女比例，女孩要的很少，我便学著书中刘海英样子整天跟着带队首长软磨硬逼，连哭带闹的最终踏上了去孤岛建设兵团一师一团的客车，成为一名穿军装种米粮的军垦战士。（冷秋寒月〈《军队的女儿》－－影响我一生的一本书〉）

二，1971年9月我告别了从小一起“捡”书，看书的好朋友红红和星星，行囊里装着红红和星星送给我的《军队的女儿》和《欧阳海之歌》到那遥远的祖国边疆，开始了我的兵团生涯。（无恙〈看“闲”书〉）

三，我喜欢美丽的女人和美丽的生活。也在那里看了《军队的女儿》，于是也想到军垦农场去，去过那种不上学的快乐的生活。在那里有那么多的水果可以吃，真让我心驰神往。（吴萍〈读书的历史〉）

四，呵呵，感谢楼主的妙笔，我喜欢这文章。还记得在我十四五岁的时候，看了《冰凌花》那本书，特别向往北大荒，非常想去那里当农垦工人。入林海，渔镜泊，割大豆，猎百兽……呀，恰同学少年不知愁，后来我又迷恋上了《军队的女儿》里描写的新疆建设兵团生活，终于去了内蒙兵团，事稼镬，建工厂，写檄文，演百戏，一去六年，归去来兮……今思之，恍若隔世矣……唯见兄弟们文章，岂不黯然神往，又见青春年少翩翩也……呜呼！（Narcisus[158352688]〈Re:老兵不言[之六]〉）

五，在那特殊的年代，我初中尚未毕业就来到内蒙古这块亘古的荒原里“屯垦戍边”，而且是到了兵团以后才

过的十六周岁生日。完全是受了两本书的影响：一本是《边疆晓歌》讲的是云南兵团的军垦生活，另一本是《军队的女儿》讲的是新疆兵团的军垦生活。当我在小学五年级时读了这两本书后，就对遥远的边疆产生了奇特的幻想。尤其羡慕《军队的女儿》中的主人翁刘海英的形象，立志长大后向刘海英一样到边疆去，用自己的双手开垦边疆，建设边疆，过那令人向往的军垦生活。可以说我正是读了这两本书，自己的命运就由此而发生彻底改变。尽管如此，我至今都无怨无悔！可以说是八年的兵团生活，砺炼了我们的意志、开阔了我们的胸怀、练就了我们吃苦耐劳的坚强品质。在这块奉献出我们最美好的青春年华的土地上，至今还深深地留着我们生命的足迹。（巴盟农垦局乌兰布和/二师十六团——储莲珍〈感言〉）

老例按：尽管作品主人公不算是“真正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却是军垦农场——即若干年后大量知识青年蜂拥而至的生产建设兵团的先驱者。而且以真人真事为蓝本，从报导、报告文学、电影再到小说，一系列的文宣造势，更使主人公刘海英的形象已近乎神化；其所在地——大西北、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更为其神化的形象撑开了一个颇具英雄主义与浪漫色彩的背景。因此，对城市青年奔赴边疆起到十分强烈且有效的号召力与榜样作用。时至今日的回忆，依然残留几许青春浪漫的缅怀之情。

有关《雁飞塞北》的读者反映：

一、35年前的中秋之夜，天幕上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浙江严州中学大操场，说是大操场，其实就是一个200多平方米的大圆圈。来自不同年级的四个同学，就这么一圈又一圈的“压”操场。明天我们就将各奔东西，下乡插队落户。当时，我满脑做着文学梦：描写十万官兵开垦北大荒的长篇小说《雁飞塞北》……所有这些文学作品，曾使我斗志昂扬，热血沸腾。下农村有什么可怕的？那时的歌声就是这么唱的：“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团圆之夜，没有分手的凄凉之感。于是，我脱口而出：“新安江也是靠双手建设起来的！”（吴育华〈新安在天上〉，《浙江日报》电子版2004-6-25）

二、那时候的知青，大多看过反映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的《军队的女儿》，描写转业军人开发北大荒的《雁飞塞北》，记叙昆明青年开拓西双版纳的《边疆晓歌》，以及讴歌上海知青奔赴新疆的朗诵诗（西去列车的窗口〉等等，作品里主人公高大的形象和火热的生活极大地感染了我们这一代人，我的理想之一就是当个军垦战士。这不，美梦成真了。（冬东〈“九大”、兵团和“二百七”〉）

三、初中时读过《雁飞塞北》这本小说，书中描写了五十年代一大批转业官兵开进北大荒，在那里开荒种地，艰苦创业的情景。三十多年过去，故事内容已淡忘，但是书中“棒打麅子、瓢舀鱼，野鸡飞到饭锅里”，这富有诗意的词语却永远锁定在我的脑海里。美丽、富饶而又神秘的北大荒深深地吸引了我，一九六九年三月，我来到了这片黑土地。但是，现实情况让我失望，至今还“耿耿于怀”。（兴安岭〈北大荒——我难忘的梦〉）

四、我未经父母的同意，就偷偷报了名。这么积极的态度在当时确实少见，我的热情来源于一部长篇纪事小说《雁飞塞北》。书中介绍的是1958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十万转业官兵奔赴黑龙江的北大荒，开发雁窝岛的真实故事。

我被书中所描绘的广阔天地、野草茫茫、用棒子就能打到麅子、野鸡自己飞到锅里、用瓢就能舀到鱼的美好神话，深深吸引了。（张家炎〈满怀热情要下乡〉，《秦楚网－十堰晚报》2007-3-29）

五、在熟读了《军队的女儿》、《雁飞塞北》、《边疆晓歌》那些书籍（当然还有挺英雄主义的丹柯故事，还有《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红色经典）以后，上山下乡时竟没有一丝一毫的犹豫了。当然不能说这里面有必然的因果关系，但也不能否认这些书籍潜移默化的影响。（王爱英〈读书，从废品站开始〉，《天津日报》2006/10/24）

老例按：该小说虽然也没有正面反映知识青年，但由于有“十万转业官兵开发北大荒”的真实历史背景，《雁飞塞北》所体现的集体主义与英雄主义色彩－－军人的天然色彩－－更为浓郁，“棒打麅子、瓢舀鱼，野鸡飞到饭锅里”的传奇性则增添了作品的浪漫主义色彩，而由北大荒变成北大仓的远景规划，又无疑提供了理想主义的想象空间。于是，《雁飞塞北》对城镇青少年的诱惑力与吸引力是十分强烈的，文革期间上山下乡运动中，北京、天津、上海、杭州等大城市的知识青年最向往的就是北大荒。文革后，知青文学中最具理想主义与英雄主义色彩的作品，也多出自北大荒知青作家的创作。而“青春无悔”的旗帜亦首先是矗立于北大荒的黑土地。

总而言之，上述几部作品确实给当时读者（主要是年轻人）提供了集体主义、英雄主义、浪漫主义及理想主义的教化，不过这些教化，是透过对农村、边疆生活的美化、牧歌化、田园诗化的描写来实现的。因此也就给了成千上万年轻人展现了一个彩虹般的幻境与理想，在日后大规模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中，不少年轻人就是带着美丽的幻想奔赴边疆与农村的。

彩虹的诱惑，美丽却也致命。

2008年夏

华夏知青网不是赢利性的网站，所刊载作品只作网友交流之用
引用时请注明作者和出处，有版权问题请与版主联系
华夏知青网：http://www.hxzq.net/
华夏知青网络工作室

文革知青中的读书风气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大陆一般城镇里学校的读书风气就比较好，六十年代初读毛选（*选集）、中苏论战等政治因素进一步助长了这种风气。文革初期，更是因应大批判与派性斗争，以及对文革乱象困惑而进行的思考，到六十年代末期，以老三届学生为主的（地下）读书自学风气达到高潮，尔后这些老红卫兵自然也将读书风气带到乡村及边疆。另一方面，客观来说，无论是老三届知青还是七十年代下乡的知青，在学校接受的教育确实有限；然而，或许正是意识到这个缺憾，当时不少知青都坚持了阅读、自学的良好习惯，读书风气在各地知青中十分盛行。甚至可以说，几乎是伴随着上山下乡行程的开始，知青们的读书生活也就开始了。

到黑龙江插队的上海知青刘琪（1954-）回忆说："刚满十六岁的我去黑龙江呼玛插队时，行李中最重的一个木板箱里装满了我的主要藏书。……外国文学类有狄更斯的《大卫．科伯菲尔》和《双城记》、勃朗特的《简爱》、巴尔扎克的《高老头》和《欧也妮．葛朗台》、雨果的《九三年》和《悲惨世界》、司汤达的《红与黑》、左拉的《娜娜》、莫泊桑的《漂亮朋友》及载有〈羊脂球〉在内的中短篇小说集……中国文学类有四大古典《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西游记》和《唐诗三百首》……因为书少而想看的人又多，只好按朋友的先亲后疏、宿舍的先近后远原则，大家挨个排队交换看了。我的竖排本《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和《牛虻》等在生产队里也算是稀有的好书，这样我便有了和别人交换或者优先阅读其他好书的资本。"当年的回乡插队知青，北京大学教授陈平原（1954-）在接受访谈时也表示："我的好处是，出生于教师之家，家里有不少藏书，可以自己读。父母都教语文，'文革'中被打倒，但藏书没有多少损失，先是被封存，后跟着我们到了乡下。……我的惟一优势，就是不太受现有学科边界的限制，也不理会什么古代、现代的隔阂，或者文学、史学的分野。当年求知若渴，拿到什么读什么，好书坏书我都能消化，这种阅读趣味，自然不同于科班训练出来的。"知青网友"在创辉煌"则在知青论坛着文道："艰苦劳动之余，知青们孜孜苦读着一本本卷了边的名著。交流读过的好书，常常成了这个知青楼特有的风景，十分赏心悦目。我们曾严肃讨论《复活》，为卡佳．马丝洛娃的不幸而叹息，也为聂黑纽道夫的人性的复活而感动，我们读了高尔基的《人间》，发现书中所有人都有善良的一面。"北大荒知青leini在自己的部落格记述："北大荒贫困的物质生活和繁重的劳动我都觉得可以忍受，精神生活的贫乏却是最难熬的。当时公开出版的文艺书也就是《欧阳海之歌》、《金光大道》等几本，我只好买了好多政治、哲学、历史类的书籍。记得比较清楚的有范文澜的《中国通史》、《中国近代史》和周一良的《世界通史》。反正是饥不择食，随便什么书都看得津

津有味的。”曾为红卫兵领袖的知青网友Wenjunq在〈读书杂谈〉中回忆：“我回到乡下便开始读书，特地找同学寻来樊映川的《高等数学》，还有《结构力学》、《材料力学》。全然忘记了对蜘蛛的研究。那时我戴着‘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帽子，绝对没机会招工，更别提考大学了。冬天点着煤油炉子暖脚，尼龙袜粘在炉子上，破个洞再补上。大队那些干部们说笑话，但我未必在乎。因为我已经被又耽误了宝贵的四年，生命是我自己的，未来也是我自己的，我必须把这个生命的小窝，构筑得漂亮一点。”武汉大学哲学系教授邓晓芒（1948-）着文回忆在插队时的读书生涯：“我的涉猎面很广，古今中外的哲学、自然科学、经济学、历史学、文学、艺术、美学、逻辑学等等，只要是字、是书，几乎没有界限……在老家农村的三年中，我彻底静下心来读了一些哲学书，包括西方哲学原着。”当然，在条件简陋的农村，要坚持自学理工科与艰深的哲学毕竟不易，更多知青自学读书的范围是集中在文史一类。如早年随母亲下放（即“成户下乡”），高中毕业后再次回乡插队的福建知青张胜友（1948-），原本志在考进清华大学，然而，“一到农村，我觉得自己的大学梦彻底破灭了。我把所有的高中课本，以及考入清华大学的老乡送的一套数理化参考书，集中起来，在自家的天井里一把火烧了个干干净净。在农村这样的环境里，想搞理工科根本不具备什么条件，但搞文学还是有希望的。……于是，我就在家里自修大学中文系的课程，读《文学概论》啦、《写作教程》啦……”最终，张胜友走上了文学创作之路，并于1977年考进复旦大学中文系。

香港凤凰卫视国际问题专家何亮亮（1951-）当年在福建北部山区插队时，携带了上百册各种书籍，其中一册上世纪三十年代的英国《政治家年鉴》，成为他经常翻阅的工具书，得以从中学习英文、世界地理和二战前的世界形势。这种自学习惯打下的基础，使何亮亮在文革后能成功考进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新闻系。何亮亮的香港凤凰卫视同事，著名时事评论员曹景行（1947-）回忆起在皖南山区插队十年期间，做工之余，就会找书来读，尤其是放年假的时候，大家都走了，他主动留下来，一个年假便可以读很多书。那时候曹景行不仅通读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与列宁的《哲学笔记》，以及《世界史纲要》、《哲学史》、《政治经济学》等，还重读了《红楼梦》、《水浒传》、《聊斋》、《二十四史》等，并偷读了雨果的《九三年》、《巴黎圣母院》、大仲马的《三个火*》、《基督山恩仇记》等禁书。正是有了这个丰厚的底子，1978年，曹景行以上海市文科第二名的成绩考进了复旦大学历史系。

在民间思想史学者丁东（1951-）采写的〈没有空白——文革时期的读书生活〉中，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魏光奇（1950-）口述道：“插队后我们的读书活动达到了一个新的高潮。我和杨志拴等朋友带着两大箱书来到沁县，还不断通过各种管道找到其他书籍。在村与村之间的知青串联中，又结识了你、卢叔宁、赵国楠等师大附中的朋友，大家当时真有点‘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的味道，不时地聚在一起，‘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会餐联欢，登山击水。与此同时，与在内蒙等地插队和在东北生产建设兵团的同校同学以及‘二流社’时期的外校同学也保持着频繁的通信联系，互相交流学习心得，交流参加‘三大革命实践’的情况和知青集体建设情况。那一时期，白天出工，晚上趴在小油灯下读书，往往直到深夜。我当时写过一组诗歌，反映我们知青集

体的生活，其中有一首叫〈夜读〉，说‘茫茫夜，四周星，村东侧，点点灯。正襟危坐南窗下，夜读会神又聚精。赶走一天劳和累，忘却冬寒雪与风……’是当时读书情景的真实写照。”当代散文家赵丽宏（1951-）在〈读书之乐〉一文中记述道：“记得当年乡下‘插队’时，最美好的时光，是一个人在草屋里读书，窗外蝉鸣萤飞，绿风潇潇，书中美景和身边天籁融合为一体，这时，便忘却了生活的艰辛和前途的渺茫。”日后成为作家的北京知青郑义（1947-）陈述在乡村读书的情景说：“我们从北京带去的书很少，县里有个图书馆，被封存了。我们跟那个图书馆的人关系不错，每次到县里去，总用大麻袋装书回来。从一九六八年到一九七一年这几年，我狂热的大量的看马列，包括北京在文革前出的内部的书，能借到的都看了。”下乡六年，记满了六本读书笔记的湖北知青作家刘晓航（1947-）回忆：“我几十年的读书生涯中，最令人难忘的是在农村当知青时，在漫长的冬夜，在一盏煤油灯下，如饥似渴地捧读一本本‘禁书’，就像饿汉扑向面包……1968年冬天，我去皖南山乡插队，仅有的一只旧藤箱，除了几件衣裳，其余的都是书。”最执着于知青题材创作的作家叶辛在接受报刊采访时说：“我到贵州去插队落户时，两只木箱子里的书中，也选了巴尔扎克的两本小说《高老头》和《贝姨》。戴思杰用《巴尔扎克和小裁缝》这么个书名，是有其代表性和意味的。我本人在插队期间的精神生活，我已在其他文章中提到过，大多数时间是翻来覆去地看带下乡去的两箱子书。无奈中的‘炒冷饭’还是有收获的，我从反复的阅读中获益匪浅。”知青作家韩少功的回忆，更将知青当年的读书风气跟他们（中间的一部分人）日后在文坛及其它领域有所作为联系起来：“知青下放农村那一段，因为社会阅历的增加，因为农村里的政治控制较松，思想是比较活跃的。那时候读“禁书”是普遍现象。漫长的夜晚，没有什么事做，读书就成了最大的享乐。你（按：指王尧）刚才提到的黄皮书和灰皮书，虽然名义上是“反面材料”，但在一些知青圈子里广为流传。……八十年代以来一批活跃的知青作家，有几个是读了大学的？他们都是在乡下读“禁书”成长起来的，黄皮书和灰皮书功不可没，所以后来出现了史铁生、张承志、李锐、张炜、王安忆、北岛、贾平凹、阿城、梁晓生、张抗抗、郑万隆等等。还有一些人进入了哲学和社会科学领域，温铁军、刘禾、陈嘉映、朱学勤、黄子平等等，也是一个可以开列得很长的名单。”这么一种联系或许过于直接简单，但不可否认，知青的读书风气，或许是由于承续以往养成的阅读习惯与兴趣，亦或许是为了填补、打发空虚无聊的生活，但客观上毕竟充实了知青们的思想与生活。而更重要的是，知青读书的风气也确实是影响到文学创作——尤其是自发性的文学创作风气形成。与生产建设兵团由官方操控下组织知青进行创作不同，散布在广大农村的插队知青（当然也有相当一部分兵团知青）自发性的文学创作，不但难有发表出版的机会，反而会无端遭受围剿镇压的命运，因此基本上处于“地下”状态。尽管这样，各地知青中还是涌现了不少在诗歌、小说等方面勤奋创作并卓有成绩的群体与个人。从而也确实为文革之后真正的知青文学崛起——从人才、题材到作品——进行了颇为充分的酝酿与准备。

2008年夏

知青地下诗歌创作

中国本来就是一个诗歌的国度，古典诗词的影响源远流长。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西方新诗的影响又使诗歌创作在中国另辟了更广阔的天地。中共建政后，五十年代的“中苏蜜月”时期，随着苏俄政治文化体制全面“移植”大陆，苏俄文学中的诗歌传统也以“置入性”的方式输进大陆文坛，广泛影响了大陆五六十年代热爱文学的青少年。文革时期，在一切“封资修”旧文学被全面扫荡之后，取而代之的红卫兵文学（以及稍后的工农兵文学），便主要是各式各样的诗歌创作。正是在这么一个历史背景之下，诗歌创作在知青中也是十分普遍的现象，几乎可说是凡有知青群体的地方，都可发现有进行诗歌创作的知青。

知青诗歌第一人——郭路生

知青诗歌创作领风气之先者当属郭路生，笔名食指，1948出生在行军途中，故名路生。郭路生自幼深受苏俄诗人马雅可夫斯基、普希金、莱蒙托夫等人诗歌的影响。1967年，正当文革如火如荼进行中，郭路生拜访了已被“打倒”的著名诗人何其芳（1912-1977）并开始向何其芳请教作诗。在此期间，郭路生写下了被广为传诵的诗作〈海洋三部曲〉、〈鱼儿三部曲〉等。〈海洋三部曲〉在写作技巧上受到莱蒙托夫影响，内容却是表达了对红卫兵运动失败的悲观情怀。郭路生还参加北京青年的地下文学沙龙活动，和张郎郎、王东白等朋友聚会，一起聊天、唱歌、听音乐、讲故事，尤其朗诵诗歌。郭路生可说是由红卫兵诗歌向知青诗歌转变的关键人物。1967年秋，属于当时受打压的老红卫兵郭路生与朋友在离京逃难之际，他的朋友张郎郎在友人日记本的扉页上写下四个字：相信未来。为此，郭路生次年就创作出其成名之作〈相信未来〉：

当蛛网无情地查封了我的炉台，

当灰烬的余烟叹息着贫困的悲哀，

我顽固地铺平失望的灰烬，

用美丽的雪花写下：相信未来！

当我的紫葡萄化为深秋的泪水，

当我的鲜花依偎在别人的情怀，

我仍然固执地望着凝露的枯藤，

在凄凉的大地上写下：相信未来！

……

这首〈相信未来〉曾被江青点名批判，但却使郭路生声名大噪。〈相信未来〉的出现，激励了许许多多在文化专制下倍觉苦闷失望的年轻人，也唤醒了一代青年诗群，其影响被及文革后新时期七八十年代的诗坛。

1968年12月20日下午4点零8分，一列载满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专列火车缓缓驶离了北京站。被派赴山西插队的郭路生也正是在这列火车上，写下了那首著名的〈四点零八分的北京〉：

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一片手的海洋翻动；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一声雄伟的汽笛长鸣。

北京车站高大的建筑，突然一阵剧烈的抖动。我双眼吃惊地望着窗外，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的心骤然一阵疼痛，一定是妈妈缀扣子的针线穿透了心胸。

这时，我的心变成了一只风筝，风筝的线绳就在妈妈手中。

线绳绷得太紧了，就要扯断了，我不得不把头探出车厢的窗棂。直到这时，直到这时候，我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

——一阵阵告别的声浪，就要卷走车站；北京在我的脚下，已经缓缓地移动。

我再次向北京挥动手臂，想一把抓住他的衣领，然后对她大声地叫喊：永远记着我，妈妈啊，北京！

终于抓住了什么东西，管他是谁的手，不能松，因为这是我的北京，这是我的最后的北京。

1969年3月从北京赴河北白洋淀插队的宋海泉（1947-）曾记述了当时火车站送行的情景：“当火车开动的一刹那，车站车厢，突然爆发出一阵揪动人心的声响。这声响，激越而又凄厉，这是由哭泣和叫喊交织成的撕心裂肺的声音。”郭路生只不过是用诗歌的形式真实地描述了这么一段具有共同特色的历史画面：知青们要离开亲人远赴他乡。这里没有高亢的口号，没有昂扬的激情，只有刻骨铭心的亲情牵绊，只有依依不舍离乡情怀。当他将这首诗念给一同下乡的知青朋友听时，朋友们都哭了。

到山西插队期间，郭路生依然不停地创作诗歌。他的诗，知青们争相传抄诵读，从邻近山西的陕西、内蒙古、

河北等地，到遥远的黑龙江兵团和云南兵团，广泛流行于全国，影响深远。

当年的白洋淀知青诗人宋海泉记述说："1969年的夏天，我第一次读到郭路生〈相信未来〉。……〈相信未来〉使我看到一个新的世界。那些'失望的灰烬'、'余烟叹息'、'凝霜的枯藤'、'孩子的笔体'……朴素的词语编织的一种与心灵相共鸣的律动，鲜明的诗的形象表达了一种对现实的反叛与抗争。"

赴内蒙古插队的知青诗人史保嘉（齐简）则着文回忆当时读郭路生诗的情景："郭路生的出现极大地震撼了诗友们。他对于个人真实心态的表达唤醒了我，使我第一次了解到可以用诗的语言将自己的思想感情表达出来。记得那晚停电，屋里又没有蜡烛，情急之中把煤油灯的罩子取下来，点着油捻权当火把。第二天天亮一照镜子，满脸的油烟和泪痕。当时读到的诗大致有：〈相信未来〉、〈烟〉、〈酒〉、〈命运〉、〈还是干脆忘记她吧〉、〈鱼群三部曲〉等。郭路生的诗在更大范围的知青中不胫而走，用不同字体不同纸张被传抄着。世界上不会有第二个诗人数不清自己诗集的版本，郭路生独领这一风骚。"

郭路生于1970年离开农村进工厂当工人，次年参军，两年后复员，曾在北京光电技术研究所工作。因在军队中曾遭受强烈刺激，导致精神分裂，文革后长期住在精神病院。其〈相信未来〉刊于《文友》杂志1998年1月号，获颁该年度"文友文学奖"。同年8月14日下午，郭路生在北京第三福利院接受了这一荣誉。没有任何颁奖仪式，只有文友副主编伊莎和一群诗友相伴。《文友》的授奖词是：

"他在他的时代里，独力承担了一位大诗人所应承担的。——谨以1998年度文友文学奖授予《相信未来》的作者、中国现代诗的一代先驱食指先生。"

宋海泉将郭路生誉为"文革诗歌第一人"，并评曰："他使诗歌开始了一个回归：一个以阶级性、党性为主体的诗歌开始转变为一个以个体性为主体的诗歌，恢复了个体的人的尊严，恢复了诗的尊严。"这样一个评价，应该说是恰如其分；这样一个称誉对郭路生而言，亦无疑是实至名归的。

知青诗人的盟友——北岛

北岛并不是知青，他1949年出生于北京，1969年在北京当建筑工人，但他跟知青如姜世伟（芒克）、甘铁生、史保嘉等关系非常密切，在文学创作上也与知青们有非常深刻的互动影响，北岛的诗歌创作就是受到知青第一诗人郭路生的影响。

郭路生〈命运〉诗句"我的一生是辗转飘零的枯叶/我的未来是抽不出锋芒的青稞"的那种迷惘与苦闷深深触动了北岛，后者不由慨叹："那正是我和我的朋友们，以至一代人的心境！"1978年北岛油印了自己的第一本诗集后，在送给郭路生那本的扉页上，恭恭敬敬地写下："送给郭路生：你是我的启蒙老师。"

北岛也正是在跟知青们的交往中写下了一系列优秀诗篇，开始奠定了自己在（地下）诗坛上的地位。如1975年

写的〈结局或开始〉：

必须承认

在死亡白色的寒光中

我，颤栗了

谁愿意做陨石

或受难者冰冷的塑像

看着不熄的青春之火

在别人手中传递

……

我，站在这里

代替另一个被杀害的人

没有别的选择

在我倒下的地方

将会有另一个人站起

我的肩上是风

风上是闪烁的星群

……

北岛作于1976年清明前后的〈回答〉更可视为他的代表作：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

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

看吧，那镀金的天空中，

漂满了死者弯曲的倒影。

……

告诉你吧，世界！

我－不－相－信！

纵使你脚下有一千名挑战者，

那就把我当作第一千零一个吧。

……

倘若比较一下郭路生的〈相信未来〉："当我的紫葡萄化为深秋的泪水，/当我的鲜花依偎在别人的情怀，/我仍然固执地望着凝露的枯藤，/在凄凉的大地上写下：相信未来！"我们会发现，郭路生其实是坚韧地高张着一种"理想主义"，而北岛的〈回答〉却固执地秉承着一种"英雄主义"。在此，"理想主义"与"英雄主义"分别体现了这两首诗的精神实质，事实上就是从官方主流意识形态的理想主义与英雄主义蜕变/嬗变而来的。只不过官方主流意识形态基于革命/国家/民族的共名立场，郭路生与北岛则基于知青群体/叛逆一代的共名立场。具体而言，郭路生之所以能坚韧地呼唤"相信未来"，是从张郎郎等老红卫兵群体的相互勉励与支持中获得力量；而北岛之所以能固执地宣称"我－不－相－信"，是从之前的"一千名挑战者"以及之后的N万名挑战者中获得道德勇气。二者依然体现着一种对集体主义（尽管叛逆了主流意识形态）强烈且根深蒂固的依归与认同。多年之后，北岛在《失败之书》（汕头大学出版社，2004）的〈附录〉中即声称："现在如果有人向我提起〈回答〉，我会觉得惭愧，我对那类的诗基本持否定态度。在某种意义上，它是官方话语的一种回声。那时候我们的写作和革命诗歌关系密切，多是高音调的，用很大的词，带有语言的暴力倾向。我们是从那个时代过来的，没法不受影响，这些年来，我一直在写作中反省，设法摆脱那种话语的影响。对于我们这代人来说，是一辈子的事。"由此可见，郭路生与北岛只不过是用知青群体/世代的共名立场取代了革命/国家/民族的共名立场，他们诗歌"理想主义"与"英雄主义"的精神实质，是在新的语境/情境下的异质同构－－主流意识形态被颠覆/消解后的重构。

北岛的〈一切〉，似乎是〈回答〉的姊妹篇，提出了同样强烈的质疑一切、否定一切的思想。不同的是，〈一切〉少了〈回答〉的那种英雄挑战意识，而更多了几分小我的虚无悲观情绪：

一切都是命运

一切都是烟云

一切都是没有结局的开始

一切都是稍纵即逝的追寻

一切欢乐都没有微笑

一切苦难都没有泪痕

一切语言都是重复

一切交往都是初逢

一切爱情都在心里

一切往事都在梦中

一切希望都带着注释

一切信仰都带着呻吟

一切爆发都有片刻的宁静

一切死亡都有冗长的回声

尽管如此，诗中清醒而明晰的思辨，具有高度概括力的悖论式警句，显示出其独有的振聋发聩的艺术力量。福建知青女诗人舒婷在七十年代后期结识了北岛，双方不仅通信往来，还用诗歌进行交流与对话。舒婷的〈这也是一切〉，就是以反讽的方式，对北岛〈一切〉的怀疑与否定进行交流与对话，以期从中体会更为深刻的人生意义和价值：

……

不是一切大树都被暴风折断

不是一切种子都找不到生根的土壤

不是一切真情都消失在人心的沙漠里

不是一切梦想都甘愿被折掉翅膀

不，不是一切都像你说的那样

不是一切火焰都只燃烧自己而不把别人照亮

不是一切星星都仅指示黑夜而不报告曙光

不是一切歌声都掠过耳旁而不留在心上

……

无论如何，北岛的出现，标志着文革地下诗歌创作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北岛的诗广泛影响了各地的年轻诗人，当然也包括了知青诗人在内。

成都知青诗群——陈自强、杜九森、吴阿宁等

成都知青诗群源自成都地下文学沙龙。该沙龙的文学活动从文革前夕开始，在文革中仍持续坚持活动。其成员有邓垦、陈自强、杜九森、吴阿宁、蔡楚、殷明辉、苟乐嘉、吴鸿、罗鹤、谢庄、徐拯、何归、冯里、白水、野鸣、樵夫、兰成、一了、无慧等二三十人，大多为“黑五类”家庭出身。

1971年，在陈自强的鼓动下，邓垦着手将诗友们的诗作编辑了一本《空山诗选》，后来因为文字狱，他的夫人恐连累众诗友，遂将这本手抄孤本付之一炬。1976年，吴鸿又编了一本《空山诗选》，也因为文字狱之故，被迫将这本手抄孤本烧掉了。

邓垦（1944-），笔名雪梦，1963年高中毕业后，在成都当工人。他创作的长篇叙事诗《春波梦》，对血统论进行了严厉地抨击，如其诗第四十九节写到："黑五类的子女，/正是革命的对象，/白燕已被揪斗了几十次，/被折磨得失去了人样，/最近又被红卫兵/半夜抓去审问，/脱光了她的衣服，/她终于不堪凌辱，/跳楼身亡……/这是人的世界吗？！"邓垦虽然没有下乡，但《春波梦》诗在四川、云南、湖南等地的知青中广泛流传，还被越境参加缅甸*游击队的知青带到境外。

成都文学沙龙的多数成员在1968年后相继下乡插队。他们下乡后坚持作诗并相互传抄诗作。其中，陈自强、杜九森与吴阿宁的表现尤为突出。

陈自强（1945-），笔名陈墨；父亲是一名国民党军官，五岁那年母亲改嫁，即离开了父亲，由外婆带大；在1964年，陈自强就自编诗集《残萤集》、《灯花集》、《落叶集》、《乌夜集》，1965年高中毕业后当过临时工；文革武斗期间（1968年），陈自强编纂了《中国新诗大概选》，试图全面否定臧克家的《中国新诗选》，全面否定独裁专制下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史观（《中国新诗大概选．前言》）；1970年陈自强到四川西昌盐源彝族自治县插队，1975年底因病回城。早在1962年，陈自强作的〈蚯蚓〉诗，就表达了强烈的渴望、追求自由的心愿：

……

出来吧，

小小的灵魂。

为着自由的驰骋，

为着自由的呻吟。

那些蠕动在雨泥中的，

容易滚满污泥的沉昏；

你最先爬出，

将最先受到暴风雨的冲淋。

……

陈自强插队农村所创作的诗歌，则更鲜明地反映了其独立人格，如他在1970年4月至1971年4月写作的〈独白〉之五：

我要在我的秋天里沉默，

人海的风雨又飘下多少红叶？

热泪和冷笑不能使它变成桑田，

做一个渔父钓一柱人格的独白。

做一个渔父钓一柱人格的独白，

像一棵麻木消磨我残剩的岁月。

希望已落尽还怕什么风风雨雨，

我要在我的秋天里沉默。

1970年下乡期间，陈自强在一首〈永遇乐．隐意〉词中即写道："离意千觞，青袍穷野，几回热梦空谷。长铗在握，挑灯听夜，且把兵书读。黎明风来，推窗成醉，天外晓星亦出。——认碧血，深山久埋，化为美璞！"（下阕）受革命风云冲击，被文革红潮淹没，诗人仍然热梦空谷，执着挑灯夜读，坚信尽管深山久埋，也总有一天会化为美璞。他自始至终认为："在独裁和极权统治的话语霸权时代，是没有真正的人的文学的，只有隐性的地下创作（不只文学），才具独立精神、尊严、品格与风采。"

杜九森（1949-），笔名九九。其父杜均衡（1910-1983）于1949年随国民政府赴台，曾任东吴大学教授、国民政府财政部次长。杜九森在父亲赴台时，尚在繈褓之中，噩运却从此开始。文革中，1970年至1974年和陈自强一起在四川西昌盐源彝族自治县插队。杜九森在农村写的诗作，很有民歌俗谣的风格，如其创作于1972年的一系列诗作：

……要抢水/莫后悔/知哥你爷本是鬼/想当年/敢拿横/耍了机枪耍"吊盘"（注：转盘机枪）/脑壳昏/下农村/这盘老子要当真/哪个上/不得让/一刀一个当解放/想吞饭/就要干/再来拉响手榴弹……（〈抢水谣〉）

走走走/喝闷酒/胡豆豌豆都没有/只有嘴啃手//来来来/敞开怀/一醉方休胜活埋/土地是棺材//唱唱唱/自晃荡/知哥知妹/浪打浪/句句扎心上//哭哭哭/八阵图/不见爹娘不见屋/泪水大扫除……（〈醉酒歌〉）

破墙破门破窗破得凶/人寒人苦人霉腰带松/想人想物想钱想得疯/打米打油打盐算得空/怨天怨地怨命怨祖宗/倒汤倒水倒饭倒栽葱。（〈乡下〉）

这些诗很有元明俗曲的风味，雅俗共赏、兼具深厚的社会内涵和鲜明的批判意识；可谓淋漓尽致展现了农村贫穷落后的环境乃至文革黑暗污浊的时代，以及知青在这种极度恶劣的环境与黑暗污浊的时代中所扭曲的人性；同时，字里行间也体现了诗人对造成这个恶劣环境与污浊时代的体制的严厉谴责与抨击。

吴阿宁（1950-），小学毕业后受父母右派问题株连，回原籍四川荥经农村插队务农。作为黑五类子女，诗人

在长年累月的政治运动中备受迫害，尽管早年失学，却爱好写作，自学成才。他的人生遭遇在其诗歌创作中得到形象的表现，如：

……

对甜蜜的回忆，莫要问一句“曾记否”，

对苦恨的深渊，莫要叹一声“全怪我”，

对沸腾，冻结的人血莫要大惊小怪，

不这样，谱不出生命的挽歌。

向四壁宣布我的“坠落”，

屈恨无须向苍天诉说，

让行尸走肉塞满新的岔道，

困死我呵，不随下流又不能超脱。

（〈困兽〉，1974年）

面对苦难人生，诗人冷静而又淡然，坚韧却也无奈。

……

呵，崩蹋吧，云端里的巨岩！

暴涨吧，让一切都重来，都重来！

看，来了，那漫天的洪水，

要浮起地球，翻转整个旧世界！

（〈鹰嘴岩〉，1973年）

诗人愤怒了，他借助山间怪石，倾泻了满腔的悲愤。

一个积满死水的泥坑。

除了青苔，孑孓和恶臭，

里面还泡着一个活人！

一个人，

一个捆扎着手脚的男人！

除了希望和绝望的交替折磨，

他有时也作些徒劳的翻滚。

（〈坑和人〉，1976年）

他描述坑和人，也是诉说自己和命运，更是展现一个民族和一个时代。

由上引诗例可见，在怀疑现实、叛逆体制方面，成都知青诗群跟与白洋淀知青诗群颇为一致；然而相比之下，成都知青诗群当是更为直面及关注现实社会，历史责任感也似乎更为强烈而执着。

南国知青女诗人——舒婷

在今天回顾文革中的杰出知青诗人，“北有食指，南有舒婷”的说法，基本上已得到读者及学界的普遍认同。

舒婷，本名龚佩瑜，1952年生于福建漳州。1957年父亲被打成右派，发配山区劳动改造。因父母离异，舒婷长期寄养在厦门外婆家，因此厦门可说是舒婷的故乡。文革中，舒婷躲在家里阅读了大量中外名著，1969年到闽西上杭县太拔公社插队时开始写诗，并先后得到厦门诗人黄碧沛以及当时被流放到闽西北山区的印尼归侨诗人蔡其矫（1918-2008）的指导。舒婷的诗作在知青中流传开来。她在其文革后，1982年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第一本诗集《双桅船》中，回忆知青生活说：“我凝视着远山的轮廓，心想，十二月革命党人在走向流放地时一定不哭的。我要在那里上完高尔基的‘大学’。生活不断教训我的天真。然而这人间大学给予我的知识远远胜过任何挂匾的学院。……我曾经发誓要写一部艾芜的《南行记》那样的东西，为被牺牲的整整一代人作证。”于是，舒婷在插队期间认真地记日记，摘抄各种中外诗人的作品，有意识地去寻找各种各样的书来读。

1971年，舒婷与一位学政治经济学的大学生有过一次关于诗的政治的长谈，这次长谈让舒婷认识到，文学是有思想的，是承担着社会使命的。这种思想对舒婷日后的诗歌创作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为这次长谈，舒婷写了“第一首成形的小诗”〈致杭城〉：

如果有一个晴和的夜晚

也是那样的风，吹得脸发烫

也是那样的月，照得人心欢

呵，友人，请走出你的书房

谁说公路枯寂没有风光

只要你还记得那沙沙的足响

那草尖上留存的露珠儿

是否已在空气中消散

江水一定还是那么湛蓝湛蓝

杭城的倒影在涟漪中摇荡

那江边默默的小亭子哟

可还记得我们的心愿和向往

榕树下，大桥旁

是谁还坐在那个老地方

他的心是否同渔火一起

漂泊在茫茫的天上……

1975年前后，已回城工作的舒婷创作了一批洋溢着清纯浪漫情调却也不乏深沉哲思的诗作，如〈致大海〉、〈海滨晨曲〉、〈珠贝——大海的眼泪〉、〈船〉、〈赠〉等一批作品，表达了困境中的青年诗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

大海的日出

引起多少英雄由衷的赞叹

大海的夕阳

招惹多少诗人温柔的怀想

多少支在峭壁上唱出的歌曲

还由海风日夜

日夜地呢喃

多少行在沙滩上留下的足迹

多少次向天边扬起的风帆

都被海涛秘密

秘密地埋葬

……

“自由的元素”呵

任你是佯装的咆哮

任你是虚伪的平静

任你掠走过去的一切

一切的过去——

这个世界

有沉沦的痛苦

也有苏醒的欢欣

（〈致大海〉1973年）

一只小船

不知什么缘故

倾斜地搁浅在

荒凉的礁岸上

油漆还没褪尽

风帆已经折断

既没有绿树垂荫

连青草也不肯生长

满潮的海面

只在离它几米的地方

波浪喘息着

水鸟焦灼地扑打翅膀

无垠的大海

纵有辽远的疆域

咫尺之内

却丧失了最后的力量

隔着永恒的距离

他们怅然相望

爱情穿过生死的界限

世纪的空间

交织着万古常新的目光

难道真挚的爱

将随着船板一起腐烂

难道飞翔的灵魂

将终身监禁在自由的门槛

（〈船〉1975年）

舒婷的诗意象明丽隽美，思维缜密流畅，善于通过复杂细致的情感体验来表现出女性独有的敏感，并从中发掘出深刻的诗化哲思，从而使她的诗歌散发出特有的感染人激励人的魅力。

经蔡其矫介绍，1977年舒婷开始与北岛书信往来。1979年10月，舒婷北上，蔡其矫带着北岛到北京火车站迎接。由此，舒婷与北岛、芒克、杨炼、顾城等北京诗人密切联系，并通过北岛等在《今天》先后发表了〈致橡树〉、〈中秋夜〉、〈四月的黄昏〉、〈呵，母亲〉等诗作。舒婷从此登上了中国新时期的诗坛，进而成为朦胧诗派的领军人物。

知青旧体诗创作

由于中共领导人、陈毅等喜用旧体诗（包括古体、律体与词体——下同）进行创作，因此，旧体诗创作在中共建政后的文坛上依然得到微妙的保存与发展；即使在大破四旧的文革中，旧体诗非但没被禁止，反而得到异乎寻常地保护与应用。也正是在这个背景下，用旧体诗词来进行创作的风气也流行于知青之中。

郝海彦主编的《中国知青诗抄》（中国文学出版社，1998）收录了三百多首作品，其中就有一百七十多首是旧体诗创作。如前述陈自强（陈墨）七十年代初所作的四首词〈永遇乐．隐意〉、〈八声甘州．雨后夕窗写怀〉、〈何满子．国庆〉、〈玉蝴蝶．重阳影里〉就收录其中。陈自强的词，格律工整、笔力沉雄、意蕴浓郁，显示了深厚的文史国学功底。

其他众多作品，有反映知青生活的：“既事耕耘又纫炊，雪崖樵径每惊危。身孤落日穿钩棘，肠断啼鸦栖老枝。”（刘立山〈七律．采薪〉）“野路盘旋向老林，挥斤伐木汗沾襟。樵夫不尽辛勤力，多少良才弃山阴。”（王晞〈七绝．采伐〉）“昨日始学耕，欲速不能。惶惶只道牛欺生。精疲力乏扶犁叹，大汗如蒸。”（秦晖〈浪淘沙．学耕〉下阕）“茂草流萤明灭，幽林树鸟惊飞。腰挎胶篓入山去，一路琼华踏碎。”（黄燕生〈西江月．夜半割胶〉上阕）

有描写乡村风光的：“风吹波碎月成花，满池鱼影四声蛙。山暗水深深深处，映出灯火是人家。”（王克明〈七绝．无题〉）“五月春来姗姗，六月春又归去。东风扫尽千里雪，唤醒生灵无数。我欲唤春长住，却得潇潇细雨。白草褪尽嫩芽出，漫山遍野碧绿。”（施晓明〈西江月．春来草原〉）

有叙志抒怀的：“大浪淘沙波未平，一代风流辞北京。星河明灭关山路，步履高低相携行。”（叶坦〈七律．

感怀〉）“百里孤雁鸣秋，望云愁。千古大江东流，不回头。二百年，弹指间，何时休？血染桃花一枝，立寒秋。”（顾卫华〈相见欢〉）

有思乡怀人的：“夜班梦中醒，漏屋筛寒风。冰花窗上冻，冷月天外明。忽复忆友人，怅惘心难平。去岁同衾语，今宵却西东。”（常箴〈五律．夜怀友人〉）“桃花红，杏花红，风落红蕊雨蒙蒙，难舍难相逢。思家乡，忆家乡，念时时已麦花香，薄酒酹何方？”（王新华〈长相思〉）

有赠答辞别的：“聚散匆匆过古城，衣单不耐早春寒。危中尚念山河碎，梦里尤闻父老声。”（魏光奇〈七律．赠友人〉）“十年深交，一旦重逢，好不相投。恰汾阳酒洌，添君快意；芜湖鱼美，释我闲愁。何所重哉？哥们意气，此外人情不必求。儿女事，有兴趣谈谈，无也罢休。”（孙恒志〈沁园春〉上阕）

早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内蒙古阿巴嘎旗的北京知青刘小阳就已将知青创作的旧体诗八十首，编成《扎洛集》（扎洛：蒙语为“青年”），这些诗词作品用旧体诗词体裁反映了知青在内蒙古草原的插队生活、劳动与情感，如北京知青邢奇（1948-）的组诗〈虹〉，将草原上雨后彩虹的美景与知青的青春梦幻融为一体：

白日追虹触手空，梦乡再遇却成功。

莫怪青春多异梦，青春色彩有如虹。（其一）

半天细雨半天晴，雨后青青草色新。

彩虹一架平空出，虹脚落于马脚前。（其二）

与邢奇同样来自北京二中的施小明（1950-）则似乎更喜欢用词体进行创作，其〈清平乐．冬牧〉词，便颇为形象生动地描绘冬季草原苍茫寒荒的景象：

羊归何处？漫漫牛车路。茫茫雪原西去，不知搬家几度。落日余晖尽收，寒凝大地生愁。遥望毡包新立，恰似海上孤舟。

同样是以〈冬牧〉为题，施小明用“沁园春”调所填的词，更是着意从草原的苍莽萧瑟寒荒中显示知青的粗犷、雄浑与豪迈之情:

草原冬色，莽莽苍苍，遍地皆白。风撼乾坤，撕肤割面，雪掩旷野，满目皑皑，惨惨白白，瑟瑟羊群，阵阵狼嚎阵阵哀。朝天啸荡，深山幽谷，壮我胸怀。（上阙）

这些作品，既有古诗词的底蕴，亦显见新的意象与思想，古典雅致之间透现清新质朴之气。

白洋淀诗群女诗人潘婧在从北京下放到白洋淀插队落户的当年，即1969年的12月就写下了〈行香子．和戎雪兰〉送给同在当地插队的好友戎雪兰：

渺渺故园，隐隐西山，锁重烟，芦荡漫漫。萋萋堤柳，门雾霏然。悠悠碧水，沉野鹜，暗云天。京华结交，常话铭禅。伥何年，天涯行帆？海角逢春，天示神忏。今事蹉跎，婵娟素，渔火寒。

这首词在凄冷萧索的背景上抒写了诗人对故乡的怀念、内心的彷徨失落以及对未来的一丝期望。

而戎雪兰也与1968年到内蒙古哲里木盟扎鲁特旗香山公社插队的北京女知青史保嘉（齐简）保持着诗词往来。1970年史保嘉曾致诗戎雪兰，其中有“笔伐四月识君志，戈枕三载赖师尊”句，表达了对戎雪兰的思念和敬重之情；戎雪兰则回诗曰：“芳凄草迷归路断，绿绮久损恐难弹。绻纸虽感暖君意，无奈岁月易温寒。灵旗空扬赤子絷，朱帘待秀正辛酸。去载玉关一掊土，胜似秋山枫叶丹。”

史保嘉（1951-），文革时是北京师范大学女子附中学生，与郭路生、孙恒志（1947-）被视为红卫兵运动终结时期的三位代表诗人。史、郭、孙三人后来都下乡成为插队知青。史保嘉认为郭路生的诗作仍属于格律诗的传统，并非现代诗的开端而是古典诗的终结。史保嘉自己与孙恒志的创作则更以旧体诗词见长，不同的是，孙恒志多作律诗，史保嘉喜用词体，其处女作〈临江仙．记康宁的四条热带鱼〉表达了对文革的幻灭心态及人生喟叹，在北京中学生中广为流传。此后，其北师大女附中同学潘婧与戎雪兰，以及北京师院附中、二十八中、北大附中、清华附中的旧体诗词爱好者都与史保嘉有诗词交流，这种关系一直保持到下乡插队之后。

1968年冬季，史保嘉到了内蒙农村，恰经历了一次感情上的挫折，又对艰苦的农村生活丝毫没有思想准备，还生了一场肺炎，尽管如此，精神却并没有被击垮，因作〈满江红．答友人〉词以明志：

茫途疲旅，此去岂必重披挂。忆流年，三度昙花，往事烟霞。一别小园春秋梦，画中塞外今是家。欲浪迹三江寻故事，遍天涯。断血戟，谱胡笳，弃长缨，赴蛮鞑。却人情依旧，足下难乏。兰草经年伴忠骨，诗魂几醉付黄沙。何须顾当年曾临海，雄关下。

虽然〈满江红．答友人〉创作的背景有较为具体的个人因素，但该词的内容毕竟颇为真实地反映了知青在艰苦恶劣的环境中，仍然执着追求青春理想的心境。因此，该词一出，和者踊跃，前后约有和作三十余阕。有和者赞曰：“待来年再看史、青、兰，在谁家？”由此可见，史保嘉及其同学好友潘婧、戎雪兰隐然已成北京地下诗群的聚焦点。次年（1969）下半年起，史保嘉大病初愈，从内蒙古启程经河南、甘肃、山西各地知青点辗转漂零了五个月，终于回到北京，回京后作〈满江红．答友人〉以酬答一路与朋友们的思想情感交流：

别来一载。晋中会，又值年残。喜重读，华章秀藻，韵简毫寒。无能信笔任沉浮，有劳俯拾责与赞。看志得意满文横溢，曾何难。春秋史，付笑谈，血珠字，任千般。多才莫诧我，无意苦攀。躬耕未感天伦乐，凡心宁弃孺子冠。已秋风隔断归时路，是群山。

字里行间，显见对自我才情的自得与谦逊，对严酷现实的抗争与无奈。

旧体诗词体裁的运用，不仅表现知青们有较深厚的国学基础，还透露了知青们对传统文化割舍不断的情愫。

知青流行歌曲（歌词）创作

从总体上看，知青运动是从激情、高昂向消沉、悲观以及觉醒的趋势转变发展的。具体说是从七十年代初起招工、招生（工农兵学员），尤其是林彪事件后，知青们对现实产生困惑、怀疑乃至思考、叛逆，这样的转变迅速产生并蔓延开来。体现在知青的日常生活及思想情绪中，就是原先被否定的所谓封、资、修的东西如小说、音乐、绘画等重新得到知青们精神上的普遍认同。在知青中流传、影响都更为广泛且另类的“地下诗歌”——即所谓“知青流行歌曲”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

在文革期间大陆文坛一片萧条的情形下，知青流行歌曲的产生与流传，既是对文化专制的反弹，也极大弥补了知青们空虚荒芜的精神生活；当然，更为直接的就是反映了知青的生存状态与精神面貌。

文革期间知青中的流行歌曲，不外乎三类：一是外国（主要是苏俄）歌曲；二是文革前的一些民歌味道较浓的老歌，三是知青自创的。这三类皆从不同侧面反映了当时知青的精神情感世界。这些歌曲虽然“流行”，却不能公开，甚至遭受当局的打压，摧残，其作者甚至被逮捕、判刑坐牢。

在这里要介绍的，是“自创”一类。所谓“自创”，包括词曲皆自创，但不少是自己填词，套用其他原有的曲。无论何者，我们需要关注的只是知青自己所填的歌词——诗歌的一种类型。

这些知青歌曲（歌词）的基本特征可归类为以下四点：

一、“反主流”格调

也就是跟当时社会（官方）主流歌曲的高昂格调不同，知青流行歌曲（歌词）颇有拒绝崇高、拒绝雄壮、远离政治、远离理想的意味，大多倾向于软性抒情、感伤沉郁的类型。比如：

望断蓉城，不见妈妈的慈颜；

更残漏尽，难耐衣食寒。

往日的欢乐，方映出眼前的孤单。

梦魂何处去，空有泪涟涟。

几时才能回成都，妈妈呀！

几时才能回到故乡的家园……

（〈望断蓉城〉）

这首歌的歌词显然是成都（俗称蓉城）知青所创作，其曲却是套用了1937年电影《古塔奇案》的插曲〈秋水伊人〉（贺绿汀词曲）。虽然时间相隔三十多年，但那哀怨、迷茫、忧郁的格调与心境全无二致。又如：

晚霞散去满天的星星，

整个大地月照明。

一位青年独自徘徊，

走在那宁静的小路上。

他在凝思，他在向往，

对着远方歌唱；

他在向往，他在歌唱，

快来信吧好姑娘……

（〈向往〉）

这首〈向往〉歌词的情调跟当时同样流行于知青中的苏俄的歌曲〈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山楂树〉、〈小路〉等颇为相似。或许是知青那代人大多经历过所谓“中苏友好蜜月”（五十年代前中期），当时传入的苏俄歌曲十分盛行，而且苏俄歌曲又天然有苍茫、感伤、忧郁、黯淡、深沉、悠扬的情韵，这跟知青当时普遍的心态甚为契合，因此，包括〈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山楂树〉与〈小路〉在内的不少苏俄歌曲便自然而然地被知青们在各种场合中“移唱”了，知青们自己创作的歌曲也自然而然秉承了苏俄歌曲的情调。这首歌的意境还体现了知青歌曲的一个特点：晚上（或黄昏）的昏暗背景。这大概是更能契合上面所说的苍茫、感伤、忧郁、黯淡等气氛与情调，同时也似乎恰好能配合知青唱歌时的背景氛围——知青白天要干农活，唱歌的时间，基本上就是在傍晚和晚上。傍晚收工后，知青们就常常三三两两聚在一起（当然也有自己一个人的），或清唱，或用各种乐器（如二胡、小提琴、手风琴、笛子等）伴奏，在暮色中，在月光下，唱这些感伤、忧郁的歌，那气氛是很能感染人的。

二、爱情主题

事实上，前面所引的〈向往〉就有这么个的特点，这也正是当时所谓反主流意识的具体表现之一。在那个时代，爱情几乎是罪恶的代名词，知青（以及任何年轻人）中是不允许谈恋爱的；当时主流的革命文学与艺术也是排斥爱情的，尤其是所谓革命样板戏，无一例外，都没有任何爱情、甚至家庭的描写——任何主要正面人物都是孤男寡女，即使是有家庭表现，也是残缺的（如阿庆嫂）或假的（如李玉和）。因此，说是反主流也好，补偿心理也好，知青流行歌曲中最显著的主题就是爱情。如〈重庆知青之歌〉从下乡知青的角度抒发与情侣离别相思的情怀：

盼不到彩云归，

留不住南飞燕，

秦岭大巴山，

一山高一山，

你让我们天各一方。

啊，亲爱的姑娘莫为我悲伤；

啊，亲爱的姑娘莫为我悲伤。

〈小小油灯〉则以男女对唱及合唱方式表达同样的相思苦恋之情：

（男）

长夜难眠想姑娘，

你和我天各一方。

不知何时才能见面，

共诉说心中的梦想。

（女）

心上的哥哥在何方，

可知我无限的惆怅？

只盼早日再见情郎，

同回到可爱的故乡。

（合）

心上的哥哥[妹妹]在何方，

可知我无限的惆怅？

只盼早日再见情郎[情妹]，

同回到可爱的故乡。

当然，表达爱情的知青流行歌曲也并非全是悲伤痛苦的，也有欢快情调的歌曲，比如一首在广西河池地区流行的〈龙江大桥〉亦以男女对唱的方式，表达知青跟女友相思重逢的喜悦：

（男）

龙江的江水清又清，

龙江的大桥多美丽，

我赶马车回城咯，

阿妹在桥头等着我。

（女）

龙江的江水清又清，

龙江的大桥多美丽，

我在桥头等阿哥，

阿哥今天回城咯。

河池地区境内有壮族、汉族、瑶族、仫佬族、毛南族、苗族、侗族、水族等八个世居民族，龙江是当地的一条主要河流，民风淳朴、景色优美。知青生活在这种环境，或许所感受的会更多些远离尘世的和平与宁静。这首〈龙江大桥〉旋律轻快、语言素朴、情感率真，很有民歌风味，也很能体现年轻人的浪漫纯真情怀。在那一个年代，这样一种风格情调的知青歌曲并不多见。

然而，无论何种情调的爱情歌曲，爱情主题本身就很令当局反感，认为是腐蚀知青思想的靡靡之音，知青歌曲受到当局的查禁也与此有关。

三、思乡主题

知青情绪的低落消极，不仅仅是理想信仰的失落，更直接体现了知青生存状态的困境，这表明知青们是“无根的”，没有农民那样的归宿感和安全感。知青在少小年龄远离亲人远离家乡独自在外，精神上情感上的被损害被压抑，这也正是知青思乡情绪特别强烈也特别普遍的重要原因。

对家乡的思念，往往结合着对前途的茫然与对命运的悲观，浑然而成为知青歌曲中最为突出的主题，这在知青自己创作（填词）的歌曲中表现得特别明显，如〈昆明知青之歌〉、〈重庆知青之歌〉、〈我的故乡在沈阳〉、〈年轻的朋友你来自何方〉、〈告别南京〉、〈望断蓉城〉、〈山西知青〉、〈告别广州〉、〈邕江之歌〉、〈相逢在北京〉、〈松花江水〉、〈妈妈别流泪〉、〈望家乡〉、〈人生旅途〉、〈火车慢些走〉、〈小小油灯〉、〈在遥远的地方〉、〈从地角到天边〉、〈小路弯弯〉、〈伤感牛车〉、〈精神病患者〉、〈梦团圆〉、〈四季流浪〉、〈流浪之歌〉、〈流浪的人归来〉、〈知青恋歌〉、〈囚歌〉、〈眼波流〉、〈菜花黄〉……这些知青自己创作的歌曲（大多佚名），基本上是知青思乡怀亲的心情流露。因有切身体验，往往特别能感染人。

比如有一首流行于云南知青中的歌，歌名就叫〈望家乡〉：

站在高黎贡山望家乡，
滚滚的滇池水就流进我胸膛。
自从那天离开昆明，
我就告别了我的爹娘。

站在高黎贡山望家乡，
可爱的春城哟在遥远的地方。
来到这里一年又一年，
不知家乡可变了样？

坐在盈江边思故乡，
美丽的姑娘哟不知在何方。
好久不曾收到家中来信，
我的妈妈身体怎么样。

这是一首云南昆明知青创作的歌曲。高黎贡山位于怒江西岸，中缅边界的云南省腾冲、保山、泸水三县交界处。盈江发源于腾冲县东北部高黎贡山，流经盈江县出缅甸。腾冲县属保山地区，盈江县属德宏州，均在云南西部，离云南中部的昆明有六百多公里。那一带汇集了相当多的昆明知青。作者用插队地方的高黎贡山与盈江，遥接代表家乡的滇池、昆明、春城，思乡之外亦增添怀人——尤其是父母与女友。思乡怀人——尤其是怀念父母与女友——似乎成了知青思乡歌曲的一个模式，流行于广西的〈邕江之歌〉便是如此。

〈邕江之歌〉相信是南宁知青原创的歌词，曲谱套用了五十年代初根据新疆舞曲改编的〈送我一枝玫瑰花〉。

虽然原歌谱是欢快愉悦的，但知青移唱时却转换为哀伤迟缓，跟知青原创歌词的情感抒发非常相配，能深刻真实地反映了知青远离家乡思念亲人的悲苦心境：

我站在邕江边，

俯瞰着邕江水，

邕江的江水后浪推着前浪，

奔向那远方。

忘不了那一天，

妈妈她安慰我：

不要想那家乡，

不要想那爹娘，

不要想那心上的姑娘。

啊……我怎能不想我衰老的爹娘？

啊……我怎能不想我心上的姑娘？

满脸的泪水，

满腔的悲伤，

我离开家乡。

这首歌的抒情方式颇具匠心：由邕江带入。邕江是流经广西首府南宁的主要河流（故南宁有“邕城”之称），自然就引出了南宁知青的家乡所在地——南宁市，由此便点出了思乡主题。江水滔滔似思乡之情延绵不尽，再以流向远方的江水转进对往事的回忆——下乡当日与亲人话别的场景。亲人话别千言万语，只凸现妈妈不要想家乡与亲人的话，此乃以退为进、欲扬先抑之法，很自然就引发知青“怎能不想”的悲苦反问。最后以知青满脸泪水满腔悲伤离开家乡的特写镜头结束，由此亦交代并强化了思乡情的缘由。

四、地域性特点

所谓地域性特点，就是不同地方的知青创作的流行歌曲，基本上都能体现出那个地方的地域色彩，如前引〈邕江之歌〉就是体现了广西知青的地域性特点。此外，上面所介绍的〈昆明知青之歌〉、〈重庆知青之歌〉、〈我的故乡在沈阳〉、〈告别南京〉、〈望断蓉城〉、〈山西知青〉、〈告别广州〉、〈相逢在北京〉、〈松花江水〉

等，从题目就可以看出其地域性的特色。有的歌曲从内容、风格上显示出的与特色（如〈龙江大桥〉），有的歌曲在语言运用上就体现出其地域性特征。例如，有这么一首用粤语演唱的〈命运之歌〉（用广东音乐“彩云追月”配曲），流行于广西粤语地区的知青之中：

含泪仰望上天，

天啊，我问你是否注定了

今生（我）该受此一灾祸？

恨岁月无情，

恨青春虚度过，

恨苍天摆布愚弄我！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

前程难估量，岂能待？

天不会将福降落，

总系靠自己双手创造

总之有日幸福属于我。

愁见花常开，

使心空惆怅，不知佢去向，

天天等待令我失望。

那年花开时，

相约在今日，

可是却不见你到来。

发、啦啦啦

多、唆唆唆

愁见花落花再开，

花丛中不见你所在，

仰望翠楼外，细心等待

等到几时一（啊）样空。

广东音乐“彩云追月”的曲调本是抒情、悠扬的，配上这些歌词，却凸显为哀怨惆怅；第二段“那年花开时，

相约在今日，可是却不见你到来”几句，反而是用国语唱的，不过转换颇为自然，似乎也更受当地粤语不太灵光的知青欢迎。

这些地域性强的歌曲，基本上都只在某一区域流传。不过例外的是，有一首〈南京知青之歌〉，是在全国范围内广为流传的，各地知青都唱，影响也就最大，作者因此还被逮捕判刑。在流行过程中，其歌词屡被改写，但以下两段歌词基本得到一致保留：

蓝蓝的天上，
白云在飞翔，
美丽的扬子江畔是可爱的南京古城，
我的家乡。

啊……啊……
彩虹般的大桥，
直上云霄，横断了长江，
雄伟的钟山脚下是我可爱的家乡。

告别了妈妈，
再见吧家乡，
金色的学生时代已转入了青春史册，
一去不复返。
啊……啊……
未来的道路，
多么艰难，曲折又漫长，
生活的脚印深浅在偏僻的异乡。

此歌原名〈我的家乡〉，又名〈南京知青之歌〉或〈知青之歌〉。知青自创的歌曲（歌词）一般上是佚名的，但是这首〈南京知青之歌〉却是例外。这首歌的作者任毅，男，生于1947年，南京市五中六六届高中毕业生，1968年12月26日到江苏省江浦县插队。1969年5月的一个晚上，任毅谱写出〈我的家乡〉。此歌以惊人的速度在全国知青中流传开来，并被命名为〈知青之歌〉。1969年8月，莫斯科广播电台以〈中国知青之歌〉为名播放了这首歌。过后不久，批判这首歌的文章就出笼了。任毅预感大难即将临头，为了免除日夜生活在恐惧之

中，1969年10月的一天，任毅干脆自己带上洗漱用具，前去南京市娃娃桥监狱“自首”，却被拒绝，说要等待上级指示。1970年2月19日（阴历正月十五夜），任毅在知青点终于被捕，罪名是“创作反动歌曲，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干扰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战略部署”。同年8月13日作为“现行反革命犯”被判处十年有期徒刑，1979年获平反出狱。

事实上，这首歌在知青中的影响也是相当大的。湖南知青罗啸回忆道：“流传在南京知青中的一首创作歌曲，不胫而走，飞快地在我们当中流行起来。词、曲都不错，歌咏了故乡、爱情、命运和理想，引起了我们强烈的共鸣。”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则曾有人唱此歌，引起女生宿舍哭声一片，事后被召开批判会进行批判斗争。

王国维在《宋元戏曲史．自序》中说过：“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套用此语，则可称“一代有一代之歌曲”。即某一个时期/某一种群体的流行歌曲，便反映那个时期/那个群体的生活、文化与心态。通过当年知青这些流行歌曲，确实可以用比较直接的方式，了解当年知青的生活状况、文化形态与心理状态。总体上来说，知青歌曲（歌词）虽然在语言艺术上还不甚成熟，但的确是体现了知青一代人的生活与感情，寄寓了知青一代人共同的历史与记忆。

2008年夏

华夏知青网不是赢利性的网站，所刊载作品只作网友交流之用
引用时请注明作者和出处，有版权问题请与版主联系
华夏知青网：http://www.hxzq.net/
华夏知青网络工作室

随着对知青理想主义、尤其是对“青春无悔”的质疑与非议同时，批评者的矛头很自然就进一步指向知青文学思想的更深层面——忏悔意识。文坛老前辈韦君宜（1917-2002）毫不留情地指出：“有些人把自己的苦写成小说，如梁晓声、阿城、张抗抗、史铁生、叶辛……但是他们的小说里，都写了自己如何受苦，却没见一个老实写出当年自己十六七岁时究竟是怎样响应‘文化大革命’的号召，自己的思想究竟是怎样变成反对一切，仇恨文化，以打砸抢为光荣的？一代青年是怎样自愿变做无知的？”海外知青文学研究专家梁丽芳则感慨：“知青文学大多写个人苦难，太少反思自己、反思历史和自己参与的那段历史的角色。……写知青经历的多，写红卫兵经历的少。这一代人可能不愿面对自己以前做过的丑事，形成对历史的割断，把同样的人分割开，变成两种不同的人，造成一种空白……找不到从红卫兵转化到知青的过程，不想回忆，也许是不想写红卫兵的心理在作怪，影响到知青文学的深度。”“我希望知青文学有自我忏悔，用历史眼光来分析自己有什么责任，不只是把受苦受难的生活一写再写，更不要神圣化理想化。”而曾被韦君宜指责的知青作家张抗抗也不无沉痛地说道：“临近二十世纪末，我们这一代人，是不是能够低头回首，审视我们的自身，也对我们自己说几句真话呢？……红卫兵的法西斯罪行和血淋淋的犯罪事实，已是昨天的噩梦，但有多少人真诚地忏悔过，用心灵去追问我们当年为什么受骗上当，为什么如此愚昧无知？”

这些批评有个特点：“反思”与“忏悔”两个概念交混使用，焦点却是在“忏悔”；而“反思”之意，也往往就是“忏悔”，即要求知青（作家）对自己以往的历史进行“忏悔”。

“忏悔”的汉语一词，来自佛教梵语ksama，意谓发露以往之罪以求宽恕并戒惕将来。也就是说，对自己以往的罪行、错误“供认不讳”以求宽恕，是“忏悔”一语的狭义理解。

而在对知青、知青文学批评时所出现的“忏悔”一语，无论是批评者还是被批评者，恰恰都是从狭义上来理解与运用的，如前面批评者所强调的“反对一切，仇恨文化，以打砸抢为光荣”，“自己以前做过的丑事”，“法西斯罪行和血淋淋的犯罪事实”；被批评者的抵触情绪亦基于此，如梁晓声就辩解道：“当年很凶恶的红卫兵，只是极少数。大多数红卫兵……没打过人，没凌辱过人，没抄过别人的家。……我们可以毫不躲闪地、坦率地、心中无鬼地迎住他们的目光回答：‘我们大多数的本性一点儿也不凶恶。我们的心肠和你们今天的心肠毫无二致。我们这一代无法抗拒当年每一个中国人都无法抗拒的事。我们也不可能代替全中国人忏悔。“上山下乡”只不过是我们的命运，我们从未将此命运当成报应承受过！’”

那么，要忏悔什么？如何忏悔？著名老作家巴金（1904-2005）可称是最清醒的一位先行者。巴金虽然在整个文革中都遭受迫害，未做过任何对不起人的事情，但他最为强烈地主张忏悔，因为他清醒地意识到，他在文革中为

了自我保护而放弃斗争原则、自愿作践的行为，是“奴在心者”，是“死心塌地的精神奴隶”。他从历史的根源上，从文革前的历次政治运动中自己的怯懦表现，反思知识分子如何在权力的压迫下一步步丧失了五四新文化的传统精神，导致了人文精神的最后底线的大崩溃。

巴金无疑是揭示了罪恶、灾难产生的根源，指出了忏悔的根本原因与意义。但问题在于，巴金的忏悔有实质意义吗？有任何实质性的影响吗？很难说有。为什么？就因为这种忏悔的前提首先就触及到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对政治体制/制度——亦即巴金说的“权力”——的质疑与反思。即便是对“从文革前的历次政治运动”到文革期间这个“权力”及其最高掌控者——*，至今仍为尊者讳地“不（敢）予置评”，还有什么理由、有什么说服力去要求大众忏悔？一切罪恶、灾难得以合逻辑以及合理化产生的总根源就是这个“权力”体制（及由此衍生的一切思维、意识、观念、准则）；换言之，忏悔的总根子就在这个“权力”，漫长艰辛的忏悔历程要从对这个“权力”的质疑与反思开始。否则，大众再如何诚心“忏悔”，也只能是“无的放矢”，对这个“权力”本身也不会有任何实质性的影响，“人文精神底线大崩溃”的历史仍会不可避免地一再重演。

可见，对“忏悔意识”狭义的理解显然是不合适的——尤其是在倡导“全民忏悔”时。对“全民”——包括罪魁祸首、作恶者、胁从者甚至受害者提出同样的狭义“忏悔”诉求，显然是难有说服力的。而且，在当下中国“为尊者讳”的政治语境之中，人们被要求“忏悔”——尤其是“全民忏悔”时，往往会产生一种遭受“不公平诉求”的感觉——当文革悲剧的真正原因、制造文革悲剧的罪魁祸首至今仍然受庇护于“为尊者讳”的帷幕下，还有什么诚信与理由要求小民百姓忏悔呢？甚至可以说，在这么种狭义的“忏悔”诉求中，其受益者只能是真正的罪犯乃至制造悲剧的罪魁祸首，文革的策划者、执行者、害人者将在全民忏悔的“汪洋大海”中阴笑隐遁。狭义的“忏悔”，还往往被心智异常者所利用，将忏悔的省思诉求，置换为行为学意义的指控，如黎学文即由于当年知青所谓的“种种恶行”，要求知青作《知青偷盗史》、《知青械斗史》、《知青犯罪史》以表示“良心的忏悔”，这种以偏概全的作派，在逻辑上也是荒谬的。彭中杰更信口责难：“曾在一夜之间将人类邪恶本能全部释放出来的老三届人，从法律的角度来追究，无疑很多人有着犯罪的经历；可以拍着胸堂自诩清白的人，百分之百是因家庭成份或家长历史的原因被取消了打、砸、抢的神圣权利。”如此轻率地使用全称判断，令人叹为观止。

这种狭义的“忏悔”诉求，在中国知青世代中颇受抵触，“我不忏悔”的声音此起彼落。当然，“忏悔”诉求之所以受抵触，除了其过于狭仄的含义外，还或许跟中国传统文化中人性本善的观念有关。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就是一个崇尚善良与和平的民族，“人之初性本善”的教诲从小就深入人心，以善为美、向善斥恶的观念根植社会。在这么一种民族传统、社会心理浸淫之下，似乎人人都（自以为）具备善良本性而甚少罪恶感，更无西方基督社会那种“原罪”感。因而人们探寻自己在历史悲剧中的定位时，所注目的往往就是自身之“善”受欺的哀悯，而相对忽视了自身之“恶”作祟的戒惕；凸显“善”的动机，而淡化“恶”的后果。于是，以“认罪”为（狭义）内涵的“忏悔”意识在这一片善良的大地似乎就失去了其存在的合理性与必然性。然而，我们这个崇尚善良和平的民族，实际上却是长期浸泡于一个百毒俱生的大酱缸。在这么个大酱缸打滚出来的我们，有谁敢于坦然宣称自己“出

于污泥而不染”呢？毕竟，“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老祖宗早就心有戚戚焉地给我们留下了这么个古训。

事实上，知青作家群体中最具自省意识的张抗抗，在是否需要全民忏悔的问题上，也是颇为踟蹰的。九十年代初，张抗抗在接受采访时，虽然也认为在文革中每个人都是有罪的，却是反对“全民忏悔”，认为忏悔是没有用的，只需要对所犯错误有所认识。即使在九十年代后期高调主张忏悔（见前），仍然语带保留地作此解说：“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硬说‘忏悔’似乎有些虚情假意、强加于人。忏悔的前提是觉悟是自我认识；忏悔的作用是改错是超越自我－－如果‘忏悔’真的不符合中国国情，那么，就让我们先来自我审视一番行不行呢？就让我们对自己扪心自问、从头梳理一遍行不行呢？”事实上，诸多主张忏悔、甚至主张全民忏悔者，至今仍未能写出可称典范的忏悔文本。

因此，我们在使用“忏悔”一词时，虽不必完全承袭其词源“认罪”的狭义，但也须以道德自律、责己自审为出发点，同时也须更多加入“省思”——即反省历史、反思自我、呼唤良知、承担道德责任等更广博而丰富的内涵。换言之，忏悔的焦点应超逾行为学意义的“认罪”转向更具理性思辨意义的层面——自己在“文革”那场全民性悲剧中的历史定位的自我审视、自我审判，以及道德责任的自我承担。有人认为，“忏悔”的诉求是为了避免将个人的责任推给社会与历史。此话固然有理，但倘若只着眼于个人责任而忽视社会、历史、体制乃至文化的因素，也必然是失之偏颇的。（狭义的）忏悔固然需要勇气，但省思显然益见深刻；忏悔立足于个人，亦观照于个人的具体言行；省思则将焦点从个人言行的忏悔引向深层因果的思考，以及对社会、历史、体制乃至文化的反省。可见，忏悔当是省思的有机组成部分，忏悔是初步的表层性的，省思才是深刻的实质性的。省思者在省思中对自己在悲剧中的历史定位进行自我审判并承担道德责任（知其然），并以此为基础，进一步省思其更为广泛深刻的社会、历史、体制及文化原因（知其所以然）。当然，省思的意识终究还是只产生、存在于省思者主体，省思的动机、行为及效果亦终究决定于省思者的自发、自动、自觉与自主。从个人的角度说，狭义的“忏悔”，只适用于以前做过坏事错事者身上，而“省思”可适用于更大、以致“全民”——包括盲从、驯顺、逍遥、随大流、明哲保身者乃至受害者甚至是反抗者——的范围。狭义的“忏悔”，须立足于否定，导向不无消极的自我救赎及独善其身；“省思”虽然也立足于否定，却是导向颇具积极意义的“扬弃”，在扬弃中获得人性的净化及人格的升华。

作为知青作家（及非专业作家），其红卫兵（及之前）的经历，固然影响了其思想、性格、思维及行为方式的形成，而后者也固然影响、体现于知青文学创作之中，但是，如果因此就要求在知青文学中不仅要写知青经历还要写红卫兵经历，那却是大不适宜的。无论如何，毕竟还要考虑到“名”与“实”相符——“知青”文学无须总拖着一条“红卫兵”的尾巴。由此可说，知青身份（经历）与红卫兵身份（经历）是有必要区分的，是属于虽有联系却也有区别的两个范畴与语境。同理，文革与知青运动、红卫兵与非红卫兵（如黑五类）、前红卫兵与后红卫兵（1969年后）、红卫兵集体与个体、老三届与红卫兵、老三届与知青等等，实际上也都是既有联系又有所区别的，在知青文学讨论中、尤其是知青文学“忏悔”问题的讨论中，不宜将这些概念随意混淆，笼统一概而论。

如果我们不拘泥于“忏悔”的狭义来理解，知青文学中其实一直不乏对历史及对自身的深刻省思。就从“诉说

苦难”的作品来说，其实也正是体现了知青直面苦难重重的人生现实的深刻反思。或者说这也就是知青省思中国现实历史的起步——不少知青当年正是有了对中国底层农村（以及农、林、牧场和生产建设兵团）苦难的了解、体验与认识，才从被长期扭曲的“革命人生观”中醒悟过来，开始了迈出现实中反思的第一步。早期卢新华的〈伤痕〉、孔捷生的〈在小河那边〉、叶辛的《蹉跎岁月》及陆天明的《桑那高地的太阳》等便是这类“诉说苦难”的反思之作；后期老鬼的《血色黄昏》、白描的《苍凉青春》、王小波的《黄金时代》及芒克的〈野事〉等，以或激烈或平和或戏谑的笔触，在揭露现实残酷的社会悲剧之际，还无情剖析了个人荒谬的人生悲剧。孔捷生的〈大林莽〉、王安忆的〈本次列车终点〉、张抗抗的〈隐性伴侣〉及陆星儿的〈流逝〉等，尽管题材风格各异，但也不同程度地表现了作者对历史的反省、对人生的思考，以及对传统（革命）人生观的质疑。邓贤的《中国知青梦》、郭小东的《中国知青部落》、费边的《热血冷泪》以及大批非知青作家撰写的《知青档案》、《北大荒启示录》、《草原启示录》等知青纪实文学作品“从整体上体现出了这样的主题特征：站在人类历史的制高点上，重新反省、审视知青现象，以更加深邃、成熟、理性的现代目光，去反思以前走过的道路，从而折射出知青岁月在人生长河中的深刻影响”。即使是知青专业作家的回忆录，也大都能突破一己之体验，具有更大的超越性、涵盖面以及省思力，基本上能做到“没有沉溺于三十年个人的得与失，而更多的是历史的反思、人生的体味、对共和国苦难经历之根源的揭橥，对民族未来的关怀鉴照”。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张承志在〈北方的河〉开篇便感慨道：

我相信，会有一个公正而深刻的认识来为我们总结的：那时，我们这一代独有的奋斗、思索、烙印和选择才会显露其意义。但那时我们也将会感慨自己曾有的幼稚、错误和局限而后悔……

当然，知青文学的省思仍须不断的深化及拓展，尤其是在省思自己在知青历史中的角色定位、作用及责任时，仍须更为积极坦率地面对、解剖及揭示。然而，也不应忽视知青文学以往在省思历史省思自我上所作的努力与成绩，更不应轻率地将之全盘否定。同时，在讨论知青文学的思想表述问题时，不应陷于狭义的“忏悔”诉求，以致造成不必要的自虐、自伤，从而削弱我们所期望的更具深刻意义的省思力量。

华夏知青网不是赢利性的网站，所刊载作品只作网友交流之用
引用时请注明作者和出处，有版权问题请与版主联系
华夏知青网：http://www.hxzq.net/
华夏知青网络工作室

“理想主义”，是知青研究——包括文学与历史研究——所首当其冲要注意的问题。“理想主义”，事实上包括集体主义、英雄主义甚至浪漫主义在内。因为，这里的“理想”不是仅指个人的理想，而更是植根于集体（国家、社会、民族）意识形态基础之上，是与这些集体主义的概念密切相关的理想；并具有英雄主义的色彩——追求理想、为理想而奋斗与献身是英雄主义的行为；同时，革命（斗争、牺牲、献身精神、艰苦奋斗之类）又往往是激情浪漫的事情——所谓革命浪漫主义。因此，我们所讨论的“理想主义”，实质上是基于集体主义而又涵括了英雄主义与浪漫主义。

换言之，在革命话语体系中，“理想”只能是一个共名状态———一切无名理想皆服膺于革命共名理想之下。在这样一个共名之下，必须放弃、牺牲任何个人的自由选择。于是，以革命的名义，理想高于人性，主义重于生命，“共名”之下无“无名”。亦于是，无论在现实生活中还是文学作品中，才会出现许许多多个体的人为了群体（革命）理想而献身/牺牲——事实上也就是罔顾人性、蔑视生命——的事例。

自上世纪五十年代初起，因应中共建政的现实政治需要，这样一种“以革命名义”的国家意识形态就主导与操控着大陆的主流文学；或者说，以国家意识形态为主导与操控的主流文学，就一直都处于革命“共名”的状态之下。在这么一种宏大历史话语体系中，理想主义更以其理性与激情结合，立足于集体主义又统摄着英雄主义以及浪漫主义多重指涉的优势，驰骋于大陆文坛。具体而言，文革前与文革中的知青文学就充斥着浓烈的“理想主义”，文革后的知青文学创作依然如此，张承志、梁晓声等人早期的作品表现尤为突出，如张承志的〈黑骏马〉、〈歌手为什么歌颂母亲〉、〈北方的河〉，梁晓声的〈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今夜有暴风雪〉、〈雪城〉、〈年轮〉等，都是在知青世代共名大纛下，张扬着理想主义并交织着英雄主义与浪漫主义的作品。1998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三十周年之际，梁晓声满怀激情地写下一段献辞：“如果我是雕塑家，我将为当年的我们———代知青锻铸这样一尊雕像———一条腿屹立在大地上，另一条腿长跪不起，一只手托着改天换地的豪情高举过头顶，另一只手攥着‘脱胎换骨’的虔诚扪于胸前。”虽然梁晓声所形容的这尊雕像比例怪异（“一腿屹立”与“一腿长跪”的形状不能并存于一人身上），却颇能彰显出其心目中充满着理想主义光辉的知青英雄形象。

这些知青文学所体现的理想主义，一方面颇为自觉地立足于知青世代的共名立场，一方面却也“责无旁贷”地肩负起“拨乱反正”、“继往开来”等主流意识形态的重任。因此，对理想主义的坚持、维护，远胜于质疑、批判。

虽然也有论者对这种理想主义给予肯定：“她们真诚过，她们付出了，她们对得起属于自己的时代。无论后人如何评价她们，无论历史对她们怎样述说，她们是无悔的一代——青春无悔！”但质疑与争议的声音显然更引人注

意。

知青作家群内部的反对声音就一直不断，如梁晓声对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的推崇，就受到孔捷生、王安忆、陈村的非议。孔捷生直言不讳地指责梁晓声说："完全是抽象地把这种行为来歌颂，是忘记了那个时代的背景，越是这样越是加深了时代的错误。……上山下乡从一开始就是一个错误的政策，无论你怎样描写它，它也是一个悲剧。"王安忆则借用别人的话来批评梁晓声"不应该以千万人的牺牲，用个人的情调去缅怀这段生活"。陈村更尖锐地指出："上山下乡注定是要失败的。梁晓声只用自己的感情主观地来写这个悲剧，没有从更广阔的历史角度来写，因此，尽管他的知青英雄勇敢地热情地把精神与生命献给北大荒，最后，他们只做了愚昧的牺牲。"

张承志所推崇的理想主义亦受到批评家的严厉抨击："当一种为理想而献身的行为被作为生命的最高意义而被提倡时，人、生命往往成为一种手段而存在。在这样的一种追求理想的过程中，每个个体自身却没有价值和意义。""'虚构的集体'所构建的精神世界、价值指向，虽然常常以国家、民族、群体等名义出现，显得很神圣，但却与人的解放相去甚远。……他对精神的追求是执着的，但他所执着地追求的精神却是'虚构的集体'所构建的精神世界、价值指向。"

毋庸置疑，张承志、梁晓声等人的这些作品贯串、融注着知青浓浓的理想主义情意结，表达了知青中的一种萦绕于心挥之不去的情意结——对早已远逝的理想主义的温情缅怀与激情礼赞。虽然不管是处于"历史在场"抑或"当下在场"的角度，都无法否认理想主义是知青一代历史的真实面貌及真实情感——尽管这一切不免带有幼稚、假像乃至虚伪的成份。根据梁晓声知青小说所摄制的电影《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今夜有暴风雪》、《雪城》以及《年轮》受到层层阻挠，原因却是：调子太低暗，未表现理想，咀嚼苦难，玩味失落的崇高。梁晓声为此认为："唯一自我安慰的，乃当时写得真诚写的激情。即使浅薄，即使幼稚，那一份儿创作的真诚和激情也是值得自己永远保持的啊！"但问题在于，知青们不无纯真的理想主义却是产生、实践于荒谬的年代，因此也就义不容辞（主动）/别无选择（被动）服膺于革命共名理想之下。

梁晓声曾颇为小心地申诉："我写〈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白桦林作证〉、〈今夜有暴风雪〉，正是为了歌颂一代知青。歌颂一场'荒谬的运动'中的一批值得赞颂和讴歌的知青。"在此，梁晓声显然试图将知青的理想主义与"荒谬运动"作切割。某些批评家也都表现出类似的心态，如张闳在回应报刊记者有关"大批'知青小说'，表现一代知识青年在那场荒谬的历史运动中所显示出的理想追求和人格精神"这个问题时，说：

新时期的社会理想虽然在理论上高唱的是"实现四化"，但公众的日常生活却越来越务实，越来越物质化。而对"红卫兵""知青"运动的否定，同时也包含着对一代人青春的否定。……所以才会有梁晓声这样的作家，他们试图通过文学重新在"知青"生活中发掘激情和理想辉光。让那些在新时代并没有得到多少利益的普通人，在对昔日时光的回忆中重拾青春理想，以赢得自我肯定。这是一个善意的动机，是一个浪漫主义的旧梦，一个"一无所有者"的精神鸦片。

张闳肯定了知青的理想主义而否定了哪一个时代背景，而且还进一步将知青小说之所以张扬理想主义的动因作了不无善意的解释。由是，我们就有必要对这三者的关系进行作如下思考：

知青一代，在革命且“荒谬”的年代，满怀理想奔赴农村广阔天地。然而，贫困落后的农村，污浊黑暗的政治，使知青们的理想陷入了悖谬的现实窘境——他们遵循“接受再教育”的教导，但置身穷乡僻壤落后贫困的现实，难免不质疑这种“再教育”是对文明进化的嘲弄；他们响应“扎根农村”的号召，但置身托关系走后门看出身的现实，难免不质疑这种“扎根”是对心灵真诚的扭曲；他们恪守“奉献青春”的信条，但置身革命事业党的利益凌驾一切的现实，难免不质疑这种“奉献”是对人文关怀的蔑视。倘若说，九十年代是一个理想主义沉沦的年代，知青固有的使命感责任感促使他们自觉地重新高扬理想主义旗帜；而为了尊重历史、还原历史，知青作家更有理由缅怀、礼赞远逝的理想；那么，同样是为了尊重历史、还原历史，是否也应该直面理想被扭曲的事实，还应该省思理想何以落空的缘故，而且，更应该揭露、谴责扼杀理想的刽子手？否则，该如何面对一代青春的无谓牺牲，一代人生的无奈延误，一代生命的无言留白，还有那一代——整整一代知青的理想与真诚被无情亵渎？

1986年，在纪念文革爆发二十周年之际，知青诗人高伐林（1950-）在《诗刊》8月号发表〈关于设立文化大革命国耻日的建议〉的诗作中慨然指斥：“亿万人浑圆的信念与激情怎么裂了缝，让苍蝇玩弄于毛茸茸的股掌？……不都是晶莹清澈的一滴滴水吗，怎么汇集起来成了狂澜恶浪？”此番宏论今日聆听依然发聋振聩，亦依然发人深省。人们无疑依然需要深刻地省思：晶莹清澈的一滴滴水何以会汇集成狂澜恶浪？信念与激情何以会被苍蝇玩弄于股掌之中？

上述观点在如何对待知青青春时代的理想主义追求这一问题上，是肯定但也持保留态度的。即认为尽管知青的青春奉献与理想追求曾经受到扭曲、利用、亵渎乃至伤害，并没有否定对知青青春奉献与理想追求的真诚付出，也没有怀疑知青青春奉献与理想追求的真实存在；而是需要将这一切历史还原——包括真诚与激情，同时也进一步省思、探究真诚的青春奉献与理想追求何以会受到扭曲、利用、亵渎与伤害。问题在于，无论是在知青的历史过程中，还是在知青文学的书写文本中，青春的缅怀与理想的礼赞，往往会自觉或不自觉被令人扼腕长叹地规范到（新/旧时期）权力语境之中。因此，我们也更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既然知青当年那些真诚的青春奉献与理想追求之中，已经隐潜了其日后最终走向失败的命运；而知青当下在文学创作中所彰显的青春奉献与理想追求，又何以能独善其身？这一问题，正是我们需要深刻省思的。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问题曾以一个具有独特魅力的面目——“青春无悔”——展现在新时期的知青文化以及知青文学之中。

“青春无悔”作为一个明确的概念，首先是出现在现实生活中：1990年，北京北大荒支边知青在《魂系黑土地——北大荒知青回顾展》和北大荒知青回忆录《北大荒风云录》（中国青年出版社，1990）中，首次提出了“青春无悔”的口号。1991年，原云南生产建设兵团部分四川知青在成都举办了《青春无悔——成都知青赴滇支边廿周年回顾展》，引起轰动。“青春无悔”就是这次回顾展的主题。在这次展览的“青春无悔”总标题下，还有一段注释

性的题记："一位俄罗斯诗人说过，一切痛苦都将过去，而过去了的，就会变成美好的回忆。"随后还出版了《青春无悔——云南支边生活纪实》（四川文艺出版社，1991）。

上述活动与出版物的意图是很明显的：荒谬的时代是要否定的，但知青青春理想的追求与实践是无悔的、是有价值的。这样一种思路，显然贯彻在新时期的知青文学创作中，因此"青春无悔"的概念很快就被运用到对知青文学的讨论之中，而且往往与知青的理想主义等同视之。如叶虎就将彰显知青理想主义的作品归类为"青春无悔"模式，认为这类小说的创作：

超越了单纯的暴露批判和怀念追忆，转向主体精神的歌颂，即颂扬了知青一代建设荒原、献身荒原的英雄主义的理想主义精神，充分肯定了他们的人生价值。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一模式的知青小说往往缺乏理性的追问，自我审视被搁置一边，有把整个运动过程加以合理化的倾向。

知青群体中对"青春无悔"这个口号的质疑声音不断，知青作家张抗抗的态度最为强烈："我一次次地反问自己——一个人、一代人所牺牲和浪费的青春、时间和生命， 真的是能用'青春无悔'这般空洞而虚假的豪言壮语， 强颜欢笑地一笔抹去的么？"

1998年，上海崇明岛东平森林公园树起了一座"青春无悔"的碑，以纪念1968年上海市二十二万知青到崇明。此事引发广大知青的极大反弹，老知青张愚若、张谷若为此作诗〈青春无悔——写在知青碑前〉云："……岁月将过去的一切/无情地抹去，/当年的火红年华，/只化作这'青春无悔'？/……三十年呵，面对着石碑上/一排排姓名，/我们该大声发问：/真个是青春无悔？历史无悔？/……亲爱的朋友，你回忆往事的时候，/也说问心无愧？/……呵，谁说青春无悔、岁月无悔、/人生无悔、历史无悔？/碑上一个个姓名中/分明有血、有肉、有情、有泪！/对一个民族，这段空白怎么能/熟视无睹，/对一段历史，这段时代肯定是/停滞倒退！/……历史当然有悔，/这是一个民族不应有的一页，/岁月当然有悔，/因为长江不会倒流、/时光不会倒退！……"

可以说，"青春无悔"这个口号虽然在九十年代一再被部分知青所坚持，然而，从根本上说，"青春无悔"其实是个假议题。有悔无悔首先得看是否自愿。知青下乡，基本上是无从选择的，无论是否自愿都得下乡；其次，有悔无悔，也得看是否乐意。知青下乡，基本上也不是乐意的（尤其是后期），是无奈而为之。既不自愿又不乐意，何以奢言有悔无悔？或许就是由于其语意的含混性与逻辑的脆弱性，无论在社会还是文坛都没有得到知青世代大多数（包括知青作家）的认同，质疑声音不断却未见有力的反击，因此并没有在理论上引发多大的争议。反而是由"青春无悔"衍生的另一议题"忏悔意识"，却掀起了不大不小且至今未能平息的波澜。

华夏知青网不是赢利性的网站，所刊载作品只作网友交流之用
引用时请注明作者和出处，有版权问题请与版主联系
华夏知青网：http://www.hxzq.net/
华夏知青网络工作室

回望知青

2008年是个值得纪念的年份?

这一年真是多难的一年，按日期有雪灾，拉萨事件，安徽手足口病，四川地震，山东火车相撞，山西溃坝，3鹿毒奶粉，广东疑似禽流感疫情，杭州地铁塌陷……那些往年都觉得是大灾如洪灾，风灾都成了不值得一提的小意思了。

这不，各种回顾都纷纷扬扬起来，大的至少有2个，一是改革三十年的回顾，一是知青下乡四十年的回顾。这两个回顾都是国家级或者官方级的。

前一个不用说了，电视上每天都在鼓吹着化腐朽为神奇、以神奇遮盖腐朽，好象中国人民从来就是昂首阔步地行进在社会主义的大路似的。

没改革是金光大道，有改革是康庄大道。

是啊，翻手为云。

后一个虽然不是官方发起的，可官方却试图把它列入可控的范围，于是人民日报发出《中国知青上山下乡大型画册》征稿启事：

“为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40周年，贯彻党的十七大关于“三个永远铭记”和“坚持科学发展构建和谐社会”的精神，记录那段难忘的历史，人民日报出版社决定向全国征集知青老照片及美术作品，编辑出版《中国知青上山下乡大型画册》（暂定书名），并视情况在北京举办展览。

……

此活动为公益性活动，不以盈利为目的，故所有摄影作者均不支付稿费，敬请见谅。”这一启事传达出官方既试图介入这种本是民间自发的活动使这种“纪念”有着一定可控性，又把价格一定不菲的画册买给知青，最后再挣一笔知青的钱，多好的策划。而“贯彻党的十七大关于“三个永远铭记”和“坚持科学发展构建和谐社会”的精神”倒是实实在在地昭示了他们的根本用意，没错，既纳入了主旋律，又顺便挣钱，可谓名利双收。

可以预料的是，能上画册的照片一大半是“与天斗，其乐无穷”的赳赳状，起作用都是起着误导现在青年的内

容，让这些年轻人觉得他们的父母当初是多么豪迈浪漫，意气奋发。这种策划的用意实在是昭然若揭：使一代苦难歪曲成后代可以效仿的行为准则。可这些策划者怎么就忘了他们自己的孩子是不是会受到同样的误导？

如果某策划者的孩子也想仿效怎么办？那这策划者会不会跟他的孩子说，那是假的，你千万别信？如果他这么回答了，那么孩子问，那你怎么可以欺骗别人家的孩子？我看这策划者怎么回答？

突然想去鲁迅的名问：今天我们怎么做父亲？

那么喉舌会不会登那些知青苦难或者抗争的照片?比如《飓风……》里那些？于是有人就会笑我，你是做梦的吧，人民日报不是定下“和谐”的调子了吗？

于是，至少我在鄙夷，鄙夷这种包藏不住的小人之心。

于是，覆手未必成雨。

回望知青，回望什么？有人说，知青们自发纪念，不过是找个借口聚会而已。是这样吗？那么怎么看那些热衷于唱歌跳舞的纪念？有人说，是为了青春的祭奠，是一种怀念和追求：怀念我们逝去的青春，追求未来美好的生活。

真是梦呓，梦呓到自欺欺人的地步。如果还可以有追求那又何必怀念？

回望知青，怎么回望？有一本书，《飓风刮过亚热带丛林》。前言是这么说的：

“……前事不忘，后世之师。历史是一面镜子，它反射的光芒必将照亮人类的未来；但我们如果不敢去正视，那这照亮未来的光芒，也极有可能成为导致重演历史悲剧、加剧危害后世的可怕辐射。

《国际歌》的伟大和永恒之处，在于它昭示了人类有史以来苦苦求索的绝对真理：‘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我们的纯真梦想、七情六欲和切肤之痛，只有我自己才拥有最具权威性和真实性的发言权：我们用自己的灵与肉，来书写我们自己的历史……”在许多时候，我们会感到知道真相其实也是一种痛苦。就如一些被奉为神圣的人和事，当我们看到其本来的狰狞和丑陋时，当事实无情地摧毁了那种神圣和亲切时，我们总是痛苦的。并不仅仅为我们的眼睛被欺骗，更为我们的真诚被出卖和我们的信任被愚弄。

红卫兵，在完成了“历史使命”之后，在一个“上山下乡”的指示下，就被尽数流放！剥夺求学的权力，强迫到老少边穷地区的从事苦役，既是流放，却还要知青们怀有荣誉感！

“这一招真是精彩。”有人这么说。

这些尚未成年的人在“广阔”的炼狱里，用汗水、鲜血以至生命去洗刷自己莫名其妙的原罪。它深远的历史作用是，现在的我们，还在为此不断付出代价。

问题是假如回到当年，会不会想到在接近或者已经退休的今天去把苦难当味精呢？当年在云南的知青们的共识是撒尿都不朝云南。现在事过境迁了，于是相逢一笑泯恩仇了？设想一下，如果谁在当年提出要在以后的12.20那天开展纪念活动，并且纪念形式是拉场子载歌栽舞且歌舞的内容全是“我们年轻人有颗火热的心”之类，嘿嘿，提这种倡议的人一定挨捶。所以，所以把不幸当幸事唱，把不幸当味精来点缀如今百无聊赖的生活我觉得实在是一种

无聊，无论如何总不是一件好事。

知青无疑是弱势群体，但决不是弱势群体的全部，如果把眼睛死死的盯在知青上，如祥林嫂那样喋喋不休，何苦？所以我一直记得有个知青说过的话——回望知青。也许说这话是经过深刻乃至痛苦的思考，也许是不经意的随口说出，也许他自己也已经忘记这话了，但对我而言，却如黑夜中的一道惨冷的闪电，撕开了我一直以来试图突破的境界，使我启发，使我恍然。

回望知青，短短的4个字，却包含了一种悟，把知青的命运融入全体被侮辱被损害的群体之中，那么知青的全部遭遇就变得可以理解和有着必然性的了。所以我们应该把眼光投向更深邃处。那些至今仍喋喋不休地扯着嗓子叫“知青”的人在我看来，要么是可怜的要么是可悲的，然而，今上正是需要这种喋喋不休。所以就有人民日报也来轧上一脚。

所以，回望知青，实在是没什么可回望的，知青犹如那头在屁股上打上印记的驴。所不同的是有人竭力要掩盖这个印记；有人竭力要张扬这个印记；有人则如同没有这个印记，照样嬉笑怒骂，比如我就是。

曾经在一篇文章中我这样写：

将来有一天，我们坐在冬日的暖阳下打盹或在夏日的傍晚坐在弄堂里摇着蒲扇注视着斜阳时一定会的。也许在我们想留住最后的余辉？用心去温暖渐趋渐冷的心？人只有到了这个时候才知道珍惜什么，可到了这个时候，能珍惜什么呢？我们有值得珍惜的吗？因为，我不知道我应该怎样回望知青。

2008年11月19日

华夏知青网不是赢利性的网站，所刊载作品只作网友交流之用
引用时请注明作者和出处，有版权问题请与版主联系
华夏知青网：http://www.hxzq.net/
华夏知青网络工作室

——《我们曾经年轻》观后感

【壹】一场精彩的理想主义演出

我们曾经年轻，

我们曾经年轻，

像蓝天，

像白云，

像山涧小溪水盈盈；

我们曾经年轻，

我们曾经年轻，

像花朵，

像小鸟，

像春风田野草青青……

深情舒扬、令人浮想联翩的歌声，将我们带进了武汉知青之友艺术团在纪念知青上山下乡30周年而推出的大型歌舞晚会《我们曾经年轻》。

实在令人佩服，武汉的老知青中竟然有那么多才华出众的歌唱家、舞蹈家、表演家，而更令人佩服也令人感动的是老知青们那认真虔诚的演出态度，无论是领唱、独唱、伴唱、合唱、领舞、独舞、伴舞、群舞，以及朗诵、小品的表演，都是那么的专业、精湛而且全情投入，在展现老知青的出色才华之时，更体现了他们那为事业为理想的奉献精神与真诚态度。观看演出的无论是老知青还是年轻人，亦同样是全情投入，精彩处掌声雷动，动情时泪水涟涟。真情的演出，理所当然赢得了真情的回应。

然而，更令我深有感触的是，透过这场高水准的表演，体现了编导者、或许也就是代表了老知青中的一种萦绕于心挥之不去的情意结——对早已远逝的理想主义的温情缅怀与激情礼赞！无论是〈我们曾经年轻〉、〈少年先锋队队歌〉、〈让我们荡起双桨〉、〈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小池塘〉的演唱，还是〈拓荒者之歌〉、〈思念与离别〉

的舞蹈，抑或〈小路〉的诗朗诵及〈招聘〉的小品，都贯串、融注着这种浓浓的理想主义情意结。甚至，从观众那轰鸣的掌声、肃穆的神情、濡湿的泪眼，我们亦可体会到这种情意结的呼应与共鸣。

呵呵，我们那难忘的青春！我们那远逝的理想呵……

【贰】理想主义的双重在场透视

理想、理想主义——那曾经是多么令人激动、令人神往的字眼，如今却似乎已成为讥讽、甚至是抨击的对象！然而，这公平吗？呵，不！讥讽、抨击当年的理想主义绝非面对历史的公平做法！

不管是处于“历史在场”抑或“当下在场”的角度，都无法否认——理想主义是我们这一代人历史的真实面貌，是我们这一代知青的真实情感。

当我们右掌并拢高举过头稚声宣誓“时刻准备着”时，我们是真实地踏入洋溢着理想主义的童年时代，我们是真诚地憧憬着建设祖国的美好远景；当我们手拿笔作刀枪投身“文化大革命”时，我们是真实地步上弥漫着理想主义的造反征途，我们是真诚地渴望着解放全人类的壮丽事业；当我们头顶青天脚踏大地“广阔天地练红心”时，我们是真实地渡过笼罩着理想主义的知青生涯，我们是真诚地固守着缩小“三大差别”的信念……

这一切不免带有幼稚、假像乃至虚伪的成份，但我们能绝然否认这一切抹煞这一切么？我们能若无其事地将历史阉割将历史留白么？

既然不能，我们有什么理由对当年的理想主义进行随性率意的讥讽、抨击——脱离历史背景的泛道德批判？

于是，作为“当下在场”的我们，只能将“历史在场”的理想主义时代如实地表现出来，也同样将我们那曾经“历史在场”的理想主义情怀如实地剖露出来——无须亦不应夹杂“原罪”的心态与“救赎”的动机。

于是，诗朗诵〈小路〉的作者武汉老知青董宏猷坦然宣称：

> 我的责任，是把它（指其“幼稚的诗”）原封不动地披露出来，作为真实的历史，供读者及研究者评说。对于我自己，我是非常珍惜自己在逆境中高扬理想主义的旗帜度过难忘的青春岁月的。……这就是我当时的真实风貌。我尊重当今青年对琼瑶三毛及港台歌星的热爱，对摇滚乐、皮尔．卡丹、施瓦辛格的热爱，对萨特、佛洛依德、福克纳、马尔克斯的热爱，对股票、房地产、名牌轿车、宠物狗的热爱；但是，我也希望他们尊重我们当时的热爱，包括风行一时的藏族歌舞〈北京的金山上〉，包括手抄本上的俄罗斯民歌〈三套车〉，以及三十年代的电影插曲〈夜半歌声〉与〈秋水伊人〉，包括从豪言壮语中流露出来的青春朝气和稚气。（〈茅棚诗篇〉）

于是，当武汉知青之友艺术团的老知青们在〈少年先锋队队歌〉最后一个音符迸发之际齐刷刷举手行队礼，全场掌声雷动，而我的心头也顿时涌上一股抑制不住的热流。当诗朗诵〈小路〉、舞蹈〈思念与离别〉触发观众伤感流泪时，我也同样泪眼婆娑。甚至，那脱胎于〈东方红〉、〈长征组歌〉的演唱模式，那深情激昂的抒情朗

诵，那刚劲流畅的舞蹈动作，虽然无不带着深刻的理想主义时代痕迹，我们却也依然是感到那么亲切融洽。

因为，我们都真诚地相信，那是我们真实的过去、真实的历史，那是我们真实的感受、真实的情怀，那是我们真诚渡过的青春、我们真诚执着的理想……

【叁】现实的杂音与理想的悖谬

然而，当年理想主义的时代曲绝非是激越的小号或清澈的长笛独奏，相反，现实生活中是时时轰鸣着不协调的杂音——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毛主席发出了进军号令！百川归海呵万马奔腾，决心书下签名排成一列长龙，接待站前同学少年待命出征！”（〈理想之歌〉）当北大工农兵学员在热血沸腾地高歌时，北京赴山西知青郭路生却在神情黯然地低吟：“我的心骤然一阵疼痛，一定是妈妈缀扣子的针线穿透了心胸，这时，我的心变成了一只风筝，风筝的线绳就在妈妈的手中……”（〈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尽管公社广播站的高音喇叭在天天播放：“走革命的金光大道，向广阔的天地进军，农村需要我们，我们更需要农村。拜工农为师，担革命重任，开一代新风，做一辈新人。”（〈向广阔的天地进军〉）知青们私底下却广泛传唱：“跟着太阳出，伴着月亮归，沉重地修理地球，是我们神圣的天职我的命运啊……”（〈知青之歌〉）

神圣理想与污浊政治的纠缠与反差，往往使我们“认真庄严地干过许多神圣而荒唐的事”，亦更“从红色乌托邦的云端被狠狠摔到冰凉坚硬的现实中”；我们的知青生活中，固然有“相互间温暖的关照、豪爽的招待、油灯下的苦读、田塍上的放歌、收获的欢乐”，也还更有“劳累、困倦、饥饿，包括穷乡僻壤也不可逃避的政治斗争与倾轧，以及为生存而生出的算计、龃龉与纷争……”（胡发云〈难忘知青岁月〉）

贫困落后的农村，污浊黑暗的政治，使我们的理想陷入了悖谬的现实窘境——我们遵循“接受再教育”的教导，但置身穷乡僻壤落后贫困的现实，难免不质疑这种“再教育”是对文明进化的嘲弄；我们响应“扎根农村”的号召，但置身托关系走后门看出身的现实，难免不质疑这种“扎根”是对心灵真诚的扭曲；我们恪守“奉献青春”的信条，但置身革命事业党的利益凌驾一切的现实，难免不质疑这种“奉献”是对人文关怀的蔑视。

信念的支柱在动摇，理想的天平在倾斜……

【肆】令人扼腕的历史缺席

以上种种，都在《我们曾经年轻》中得到反映了吗？没有！很遗憾地几乎没有！

之所以说“几乎”，那是因为，虽然在《我们曾经年轻》解说词中有“那不是幸福，不是富足，也不是成功与

辉煌”，“我们曾从红色乌托邦的云端被狠狠摔到冰凉坚硬的现实中，我们曾认真庄严地干过许多神圣而荒唐的事”的省思，然而，在对理想主义温情缅怀与激情礼赞的主题下，《我们曾经年轻》的节目莫不洋溢着或激昂、或深情、或欢快、或温馨的气氛。轻快欢欣的〈拓荒者之歌〉不由令人联想起当年千锤百炼的丰收舞，但也更令我想起葬身于北大荒别拉红河的知青拓荒队员（见武殿生〈生离死别——记别拉红河惨案〉）。温馨亲情的〈小池塘〉不由令人恍若进入田园牧歌的境界，但从知青网路文学作品中，我们实在难以寻获有如此温馨境界的回忆。〈思念与离别〉旨在反映当年招工对知青心灵的冲击，由于编导似乎是立足于歌颂知青的“战友情深”，该节目便被演绎成了一幕知青战友难舍难分的感人正剧。尽管这是全场演出最催人泪下的节目，但我很难从中品味出当年送别插友吟唱〈红河谷〉时的心情，也更难从中透见当年招工“使‘扎根’迅速成为荒诞”（董宏猷〈茅棚诗篇〉）的震撼力。诗朗诵〈小路〉无疑是一首感人肺腑的作品，深情地赞颂了那在“苦难与艰辛中萌生出的惆怅又温馨的初恋”（胡发云〈难忘知青岁月〉）。然而，在当年知青们的爱情路上，“更多的是情感的畸形，浑浊，错乱与苦涩，在这里爱情世界遍布孤独、失落、迷茫、焦虑、恐惧、无奈、惨烈和悲凉。”（刘晓航〈爱情的放逐与忏悔——读《中国知青情恋报告》〉）如此畸形苦涩的爱情，确实是这么一条“路旁有水田种着江南的新月，月儿发芽月儿开花月儿像瓜一样浑圆”的小路所难以负载的。

至此，我不由又想起当年知青的一个“优良传统”——报喜不报忧。那是知青为了不让亲人担忧而采取的良心策略——着意描绘农村的田园牧歌般生活而淡化自己所遭受的苦难。《我们曾经年轻》的编导们是不自觉地采取这么个策略吗？不好说。但却似乎可以从中窥见这么一个理想主义的审美准则——趋美避丑。善良的老知青们或许就是不忍心在缅怀与礼赞自己所经历过的理想之“美”的同时，也解剖与袒露自己所遭受过的种种人生之“丑”：劳累、困倦、饥饿、倾轧、算计、龃龉、纷争、污秽、昏暗、畸形、浑浊、错乱、苦涩、孤独、失落、迷茫、焦虑、恐惧、无奈、惨烈、悲凉……

于是，老知青们的历史审视，便令人扼腕地蜕变为历史缺席——理想主义潜移默化地惯性滑行，绽放出极耀眼亮丽的一抹夕晖。

“历史缺席”或许是无心之过，而令我担心的则更是“历史缺席”的另一种诠释——“历史作伪”！

倘若说，为了尊重历史、还原历史，我们有理由缅怀、礼赞远逝的理想，那么，同样是为了尊重历史、还原历史，我们也应该直面理想被扭曲的事实，还应该省思理想何以落空的缘故，而且，更应该揭露、谴责扼杀理想的刽子手！否则，我们该如何面对一代青春的无谓牺牲，一代人生的无奈延误，一代生命的无言留白，还有那一代——整整一代知青的理想与真诚被无情亵渎！

【伍】“30周年纪念”的后续思考

从节目安排上看，大型歌舞《我们曾经年轻》有一个十分显明的“遗忘”——没有一首知青当年的原创歌曲。

云南知青孙伟编的知青歌曲集《青春咏叹》便收录了40首各地知青的原创歌曲，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南京知青任毅创作的〈南京知青之歌〉。这首歌在全国各地的知青中广泛流传，并常常被各地知青作适当的移植或改编，武汉地区的知青就将之改编为〈武汉知青之歌〉："蓝蓝的天上，白云在飞翔，美丽的扬子江畔，有我可爱的武汉江城，我的故乡……"知青在歌中不无艾怨地唱道："金色的学生时代已载入了青春的史册，一去不复返……"当年正处花季年华的知青已经为自己的青春唱挽歌，为何如今的老知青们还在为早已远逝的青春理想一味歌颂？难道真的如诗人所说的，随着时间的推移，遥远的苦难都将成为甜蜜的回忆？作为个体的人之常情，这种感性的甜蜜回忆无可厚非；但面对整整一代人的历史，我们是否更需要理性的深刻省思？

武汉老知青胡发云、刘晓航和董宏猷等历来是我甚为敬重的知青兄长，在他们的作品中，深刻的省思力透纸背（见前）。武汉知青网站《老知青之家》最近推出一辑知青回忆录，总名亦为《我们曾经年轻》，其中不乏深刻反思之作，如胡发云的〈难忘知青岁月〉、廖世昌的〈失却恐惧〉、黄道坤的〈第二故乡的悲欢〉、郭齐勇的〈永远的悔与无尽的念〉、董宏猷的〈茅棚诗篇〉、刘晓航的〈青弋江在诉说〉、彭晓源〈无奈的选择〉、方明的〈只能使其颠簸，不能使其沉没〉等。为什么这一切都未能充分地体现在大型歌舞《我们曾经年轻》的节目之中？

我游移的目光落在"纪念上山下乡30周年"的字样上。1968年12月22日，伟大领袖发出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最高指示，由是被后人视为文革知青上山下乡的正式开始。30年后的1998年，便理所当然被视为知青上山下乡30周年纪念。全国各大城市都展开各种纪念活动，如文艺晚会、主题展览、出版书籍、重返"第二故乡"等，熙熙攘攘、沸沸扬扬，煞是热闹。虽然当年的纪念活动，没有像1988年纪念上山下乡20周年那样宣示"青春无悔"，但却也俨然是以张扬理想主义为号召。

在省思文革的呼声一直得不到应有重视的情形下，为什么唯独知青上山下乡周年纪念活动反而一再得到官方的鼓励支持而大张旗鼓地进行？从现实层面看，90年代是一个理想主义沉沦的年代，知青固有的使命感责任感促使他们自觉地重新高扬理想主义旗帜，而这一点或许在官方的因势利导下便自然而然成为纪念活动的主导思维。同时，亦或许由于90年代又是一个回避沉重的年代，编导们的省思，唯能迂回掩映于解说词中，主题节目所能突出的便亦只能是那最具迷人光环的理想主义了。

从历史层面看，或许就是由于知青上山下乡是被视为"立"的范型（开一代新风做一辈新人），与红卫兵以"破"为标识的范型迥然不同。但实际上，知青与红卫兵的遭遇有一个非常本质的相同之处，那就是激情一样被利用，真诚一样被玷污，信念一样被扭曲，青春一样被虚掷，理想一样被亵渎。

1986年，在纪念"文革"爆发20周年之际，诗人高伐林在其〈关于设立文化大革命国耻日的建议〉的诗作中慨然指斥："亿万人浑圆的信念与激情怎么裂了缝，让苍蝇玩弄于毛茸茸的股掌？……不都是晶莹清澈的一滴滴水吗，怎么汇集起来成了狂澜恶浪？"今日聆听依然发聋振聩，亦依然发人深省！

是呵，难道省思只能存留于民间文本，一旦进入官方话语体系就只能歌颂？难道青春的缅怀理想的礼赞，要再一次规范到曾使我们扼腕长叹的权力语境之中？

是呵，我们缅怀的应该是那晶莹清澈的一滴滴水，而不是狂澜恶浪；我们礼赞的应该是那浑圆的信念与激情，而不是让苍蝇玩弄于股掌的伤害与耻辱！

然而，我们无疑更需要深刻地省思：晶莹清澈的一滴滴水何以会汇集成狂澜恶浪？信念与激情何以会被苍蝇玩弄于股掌之中？还有那——曾经令我们向往、令我们为之奋斗的理想何以会黯然远逝……

〖附记〗武汉知青之友艺术团创建于1997年，在1998年纪念知青上山下乡30周年之际，隆重推出大型歌舞晚会《我们曾经年轻》。《我们曾经年轻》荣获第十四届全国电视文艺《星光奖》综合节目二等奖。

华夏知青网不是赢利性的网站，所刊载作品只作网友交流之用
引用时请注明作者和出处，有版权问题请与版主联系
华夏知青网：http://www.hxzq.net/
华夏知青网络工作室

下乡41年感言

文革后大规模上山下乡始于1968年，到今年正好是40周年。北京、广州、西安、昆明，相继组织了一些纪念活动。在这各地纷纷举行纪念下乡40周年活动的时候，作为一个曾经挣了11年工分的老知青，我禁不住会产生许多心绪，禁不住会思考知青一代人的命运和责任。

近些天以来，我的心情非常复杂，非常矛盾。

一方面，我的心情是兴奋的。在国际金融海啸的冲击下，我国的经济发展将减速。在经济减速的过程中，许多社会矛盾将激化，许多被长期压制的声音会发出，许多被压迫、被侮辱和被损害的人们的积怨将越来越难以压制。当中国的大门在鸦片战争中被列强的炮舰打开以后，一个半世纪的时间中，一代一代多少人期盼着建立一个民主、宪政的新中国，一代一代多少人为之前仆后继、前捕后继，流血牺牲。今天，志士仁人、先贤先烈们的梦想，正在成为实实在在的希望。

在世界已经进入知识经济时代的今天，创造就是财富，创造就是优势，创造力就是最宝贵的资源。今天，与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都不同，一个民族的兴旺发达必须依赖于全民族的创造性发挥。今天，借助于现代科技的发展，尤其是借助互联网的发展，某些利益集团压制人民创造性的图谋变得越来越困难。尽管他们不断地开发出新的网络封锁技术，尽管他们仍在努力借助权力压制人民的创造性思维，但他们已经日渐捉襟见肘，穷于应付，防不胜防。

毛主席1945年在中共“七大”所做的题为《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说“没有几万万人民个性的解放和个性的发展……要想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废墟上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来，那只是完全的空想”。我已经感到，亿万人民个性解放和个性发展的时代正在走近我们，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空想”正在逐渐变为现实。

另一方面，我也为现存权力失控以后可能出现的社会动乱和混乱局面而感到深深忧虑。我知道，前南斯拉夫解体以后的战乱，前苏联解体后车臣的悲剧，完全可能在中国发生。发生在别斯兰儿童身上的惨剧，发生在莫斯科剧院的人质惨剧，也完全可能在中国人身边发生，甚至更加惨烈。这时，我想到17年前我最敬重的一位知青朋友在被法庭宣判有期徒刑13年后的第二天，写给律师的那封著名的信。信中说：“这个国家稍有波动，在社会的底层，在上流社会看不到的地方，会有成千上万的人倾家荡产，饿死病死，我脚下这片土地，早就超负荷了，当我们追求自己的正义时，一定要考虑老百姓”。

当我深感忧虑的时候，我就想到像我自己一样数以千万计的中国知青。想到他们，我心中就感到安慰，心中就增加了许多信心。今天，这批人中的许多人尚在各行各业发挥着骨干的作用，尚可以对中国的进步产生重要的影响，尚可以影响包括自己子女在内的许多青年人。这批人的血液中，流淌着从童年到青年的成长过程中积淀而成的社会责任感。这批人，了解中国的国情，了解中国的底层。“居庙堂之高而忧其民，处江湖之远而忧其君”，是这批人深入骨髓的共同特征。

如何以和平渐进的方式在中国实现民主宪政？如何在这一过程中避免大的震荡和动乱？是今天摆在13亿中国人面前的挑战。在今天纪念知识青年上山下乡40周年的时候，我们或许应该想到，经历过种种人生历练和磨难的知青一代，将在推动中国进步的同时，帮助中国避免动乱。我们或许应该想到，民主宪政是社会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实现人生价值和实现人生理想的共同舞台。我希望，不论是偏好社会主义的知青，还是偏好自由主义的知青，不论是“居庙堂之高”的知青，还是“处江湖之远”的知青，能够携手并肩，共同帮助中国平稳地度过世界金融海啸和经济停滞的艰难时期，共同帮助中国平稳地实现从集权专制向民主宪政的和平演变。

2008年10月26日晚，我在欢迎2008年新研究生时发言的结束语：

在昨晚的读书会上，一位同学曾经谈到，对中国的未来很悲观，看不到中国的希望。这里有一个基本的思想方法问题。我认为，我们需要回答的问题不应是“中国是否有希望”，而应是“我能否使中国有希望”。前两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聘请你们的L师姐去教书。行前，我曾对她说：“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一个人可以通过努力来改变自己的命运，一个人几乎可能通过努力改变任何事情，但有一件事情是你永远无法改变的，那就是你生在中国，生为华人，这是你的宿命。”关于中国的希望，我们不应以一个观众的眼光去客观地判断，我们应以一个演员的身份去主观地选择。“中国将因我，因我们，而有希望。”

相关讨论

宇雨：海宽兄的理想主义，令人佩服。不过，我也是悲观论者——几乎看不到中国的将来，至少在我有生之年。

当然了，我还有一丝幻想：或者，中国的将来，就在现在的独生子女身上。

何解？

谁都知道，他们是小皇帝，集中父母、祖父母、外祖父母的宠爱于一身，养成娇惯的脾气，完全不象我们从小养成的驯服。

显然，如果“国家”对他们有任何不利，就一定有六人（父母、祖父母、外祖父母）立刻成为反对派。

设想一下，如果十九年前的事情发生在他们身上，中国社会还会“稳定压倒一切”么？

想到时下争论得很多的“民主”概念上，我只给它下定义如下：民能主之，方为民主。其他的，诸如素质论、东西方论、特色论、代表论等等等，无论这论那论，都是“民不能主之”之论。

而我对中国的将来感到悲观的基本判断就是：迄今为止，中国的“民”还不能“主”任何东东。几千年了，中国社会发展的缓慢根本就在于——一般民众无法参加到社会事务中去——换言之，民众对任何社会事务无法施加任何影响力。

海宽：民-主萌芽……

虎照终被揭穿。

《炎黄春秋》未受惩处。

山西娄烦矿难终被披露。

三具晴按终被披露。

薄希来与出租车司机对话。

……

此外，川渝教师的“自习课”也已经被《南方周末》报道。

(2008年11月)

知识青年——这是中国现代史的一个特定的词汇，在其他的国家里是不是也有这样的词汇呢？恐怕未必能有。

在中国，大约能有两千万以上的人曾经能与这个特定的词汇相连相关过，在50岁以上的年龄段上，将有连续好几年的城市居民都曾经有过知识青年的人生经历。

正在参加第28届哈尔滨之夏音乐会的京、津、沪、浙、哈以及宁波、厦门、湖南、河南等地的数百名知识青年这些天来相聚哈尔滨之夏，共勉难以忘怀的岁月。《我们曾经年轻》、《生命如此美丽》成为了演唱的主题，那一首首发自肺腑的歌声，又把人们带回到了那段令人难忘的激情澎湃的年代。

在第28届哈尔滨之夏音乐会的大舞台上，今年上演着一出又一出的大剧，国内外有众多著名团体参加演出，包括世界著名的俄罗斯芭蕾舞剧团演出的经典剧目《天鹅湖》。而知识青年们的演出无疑是最具特色、最有人气、最感人，最有吸引力的，每一场的演出都具有极强的吸引力，很多人都站在过道上看着整场的演出，很多演员都多次加演，反复谢幕，组委会最后决定加演的二场也都爆满。

如果仅仅从演技上看，这些平均年龄都已达55岁的“知识青年”们，客观地说是很难同哈夏其他演出团体相比较的。但是，这些来自京、津、沪、浙、哈的知青演员们却具有着其他任何国内外演出团体都不可能具备的特殊的优势，这就是他们都有着共同的人生经历，他们都有着相似的命运，他们都在用真心来唱，在为纯情而唱，在为他们曾经有过的经历感情和思想在唱，在为生命焕发出的激情和壮美而唱。他们所唱出的每一个音符都具有从生命的深处迸发出来的火山般的巨大力量，都具有从心灵发出的强大的震撼力。这些声音具有非常特殊的美感，没有同样经历的人未必都能够领会其中的奥妙，而具有相同人生经历的人，从听到第一声的呐喊时，就能够立刻唤起灵魂深处的记忆，就能够很快飞回到曾经难忘的岁月，就会随着歌声而歌、而唱、而哭、而泣、而喊、而笑，就能够立即引发内心深处的强烈共鸣。

在人生最具活力的青春年华、青年时代里，五年、八年、十年的共同艰苦的生活和劳动，这些、这一切，这所有凝聚起来的一切合起来的就是——知识青年。

如今，这些人都统统地早已经不再是青年了！

38年过去了！又岂能只是弹指一挥间？

38年前，这些人也都曾经年轻过、风华正茂过、充满激情过，甚至还都曾经叱咤风云过。

知识青年——这是中国现代史上最具有特殊转折意义的一代！

这一代人，基本上都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出生长大的，也可以说在这些人的身上最能够完整地体现出中国现代的发展、命运和情结，他们和共和国同呼吸、共命运。他们的兴衰荣辱、酸甜苦辣比其他任何一个年龄段的人都更集中、更准确、更深刻、更全面地反映了一个国家、一个时代。如果能够通过具体的人生来深刻地反映出一个时代，那么，最能够深刻地反映中国建国后现代史的就一定是知识青年。

如果这些人曾经激情，那也曾经是我们时代的激情，如果这些人曾经坎坷，那也曾经是我们国家的坎坷，如果这些人比其他年龄段的人都经历了更多的磨难，那么，这些磨难也正是我们民族所经历的磨难。

知识青年——这不是哪一个人、哪一部分人，而是整整好几岁年龄段的几乎所有的人！这些人都有同泥土打过交道的经历，都经历过中国农民式的艰苦生活，从城市到农村，又从农村走回到城市，这几乎使他们所有的人全部付出了人一生最宝贵的青春的代价。这样的经历使他们在今后的生活经历中无论承受什么样的艰难困苦都已经无所畏惧。

知识青年——与他们之前的年龄段的人不同，也与他们之后的年龄段人也不同。比他们年龄更大的人一般都留有更多的旧时代的色彩，而比他们年龄小的人却几乎都更具有新时代的色彩。如果进行社会历史分析的话，可以说，最具典型意义、最能够反映出时代特征的当属知识青年。在其他的年龄段的人们都很难具有这么突出的普遍性。

知识青年们处于一个特殊的中国社会历史发展阶段，这样的阶段并不是他们个人造成的，也不是他们自己所能够决定的。这是社会历史发展的选择，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所出现的特殊的社会历史现象。

知识青年们的生活经历也曾经成为一个时代，而到了他们的下一代，则已经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时代——独生子女的时代。这些人几乎都痛苦的发现这些孩子们与他们那个时代的人是存在着那么巨大的差距，有些人把这叫做代沟，而代沟又是怎么形成的，为什么会与他们的那个时代会有那么多的不同，他们几乎都茫然不知。

无论他们是否愿意，时代已经完全变了。当知识青年们用他们的经历来教育他们的下一代的时候，就象在文革中曾经普遍流行的忆苦思甜一样，并没有能够收到解放初期农民们打土豪分田地的效果。孩子们几乎没有从内心里接受他们的说教，反而都会以唇相讥：“你们那是什么时代？”“你们那样是你们那个时代的命运，我们这样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偏得！”多少已经为人父母的知识青年们，他们无论如何也想不明白，他们用一生的复杂而艰难的经历所总结出来的经验在他们的孩子们面前，却基本上没有起到什么样的指导作用，现在的孩子们似乎都按照另外的逻辑在进行着新的生活，很少会以知识青年的行为模式处理生活中的事情，他们的孩子们也常常讥讽父母们都已经

成为了时代的落伍者。

这个时代的发展和变化无疑是飞快的，仅仅几十年的时间，知识青年们的那一代的经历就似乎都已经成为了遥远的过去，或者是变成了已经尘封的历史。知识青年们似乎也都早已经不再是社会大舞台的主角了，知识青年们特殊经历所凝结成的特殊品格正在同他们的下一代形成着越来越明显的差异。

而这样的差异，实质上正是不同的历史时代的反映。知识青年们所接受的教育是在文化大革命前的完全正统的革命理想主义的教育，这样的教育使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成为冲锋陷阵的主力，而他们则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如果说有从思想上到行动上都走到最极端的那一代人，那么，这一代人就正是知识青年这一代人。

无论现在人们是怎样看那个时代和那个时代的人们，而实际上，在中国的现代发展史上曾经整整有一代人走的最远、最极端的，正是知识青年这个年龄段的人。

如果全面分析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结果，那肯定可以形成一本专门的论著。我相信，曾经有这样经历的人也一定会从多方面多角度进行着这些方面的研究，也一定会形成很多非常有意义的成果。

知识青年满怀豪情壮志地来到了北大荒、来到了农村这个广阔的天地，把生命中最宝贵的青春都奉献给了中国农村的土地。

他们的经历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发生了变化。而随着时代变化的不仅仅是他们这一代人，改革开放的年代来到了，中国发展的历史又揭开了新的一页，新的历史时期、新的一代又一代人又在他们之后占领了历史的舞台。从整体上看，知识青年这一代人正是中国走到极端之后而又经过多年之后才发生改革开放历史大转变的那一代，如果用坐标图示的话，他们恰恰处于发生历史转折时期的那部分人。

因此，在他们身上，也只有在他们身上最能集中体现中国现代发展史的全部特点，他们的经历几乎就是在折射着中国近五十年来的经历，他们的命运就是现代中国的命运，他们的坎坷就是我们国家和民族的坎坷。

你如果能够读懂知识青年，你也就能够真正地读懂中国现代的发展史，你如果不能够真正的理解知识青年，那么，可以说你对于中国现代的发展的认识还真的实在是不够。

例如：中国现代人的道德观就曾经有过“狠斗私字一闪念”、“赤胆忠心干革命”、“全心全意为人民”的历史阶段，这在当时，绝对不仅仅是什么口号，而且是很多人完全自觉的行动，那个时代的很多人的思想和世界观比起现在的很多先锋战士还要先进的多，在为公还是为私的选择上绝大多数人都是毫不犹豫地以实际行动选择了一心为公。至于象贪污腐败这样的情况，在那个时代简直是不可想象的，如果有谁敢于拿生产队的一根针、一根线、一粒米，那也是极大的罪过，自己的内心都无法通过，在斗私批修的会上也要进行自我批判。如果没有火一样的激

情，再想一想，能够有几百万的人在听到伟大领袖的一声号召后就会立即毫不犹豫地一起跑到北大荒吗？

一心为公——这样的思想观念和道德观念在过去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都从来就没有这样出现过、普及过，在他们之后的任何一个年龄段也没有如此出现过，这是一个极其特殊的社会历史现象。这样的现象只有在中国出现过，更确切的说，只有在中国的知识青年这一代人曾经普及过。无论你现在怎样看这样的社会历史现象，这种社会道德、社会文明、社会意识确实是真实地存在过。这是中国人曾经走过的最极端的时代，而在这个阶段、这个时代的主体就是知识青年那个年龄段的人们。

如果现在再组织青年们上山下乡，试问能够使所有的同年龄的人们都去吗？恐怕即使有十分之一的人做出这样的选择也是相当困难的。为什么？最重要的原因是：那个时代的人们的思想和现在的人们的思想已经完全是不一样的。

现在的人们更多的都是考虑个人的利益，这和那个时代的人们有着最重要的根本性的区别。现在的人们看那个时代的人，觉得他们实在是太傻了，可是，那个时代的人们就是那样——不是哪一个人那样，而几乎是所有的人都那样！他们是一个特殊的历史时代的人，知识青年们正是充分地集中的反映了他们所属的哪个时代。

这个时代并不是哪个人无中生有的编造出来的，而是实实在在的存在过的。现在，这些人中的绝大多数的人们都仍然健在，并没有有谁在故意编造他们的历史。

中国曾经走过那样的路，曾经发生过那样的事情，曾经有一部分人走到了最极端，而这部分人、这个时代的人，他们就是——知识青年。

这一切，都已经过去了。

但人们并没有都忘记已经过去的一切，也不应该忘记曾经发生过的一切。

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经历了太多的磨难。我们不应该把这一切都轻轻地就都翻了过去，中国现代发展史有太多的事情需要人们认真地进行反思和深思，中国同现代世界上发达国家的差距是多方面的原因造成的，要变成世界上的强国还需要做很多扎扎实实的工作。如果一个民族不能够深刻地反思曾经犯过的错误，不能够从中吸取深刻的教训，这无疑是十分可悲的。

知识青年们的经历沉淀了太多的现代中国的沧桑。我相信，在这一代人中间理应能够产生描写知识青年经历的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艺术家，中国现代史应该留下他们浓重的一笔。

[2006-08-10 23:57:00 |

华夏知青网不是赢利性的网站，所刊载作品只作网友交流之用

我第一次打开这篇文章(″丑陋的老三届”)，才读了几小节就觉得气愤，说我们丑陋，老了就丑陋？没有受过完整的文化教育、下岗了、被跨越了就是丑陋？难道是我们愿意的吗？是我们自己选择吗？今天，每当看到朝气蓬勃的年轻学生，我总会有一种表达不清的苦涩感，总觉得自己不曾有过青春。我还不知道跟谁去算这笔帐呢！还说我们丑陋，不看了！　　以后几天陆续有几篇评论文章贴出来，我想单看评论文章没用，还是应该了解原文的内容。星期天抽点时间把它打印下来静下心来读，才知道不是我原先想的那样。这是一篇好文章，它让我把原来零碎的想法梳理了一遍；读了它才比较理解了虫二所说‘应该留下什么样的知青文学’以及阿Q正传式的悲剧的含义。

党内政治斗争的需要，伟大领袖将这一代人的青春、前途作为赌注押上，用完后又象废弃物一样被扔掉，但此时，一代人表现出来的是一种整体性的麻木。这是为什么？十七年来，全封闭、愚民式地灌输给我们的是：学习雷锋、个人崇拜、阶级斗争，是对‘人性论’的批判，我们从来没有学会过用自己的头脑去思考；‘缺少爱心，崇尚兽性’又使我们作出了抄家、辱骂、批斗、殴打、杀人的疯狂举动……。然后被一脚踢开。文革是国耻，上山下乡是文革的一个篇章，如果再由老三届来歌颂上山下乡、粉饰这段历史，那可真的很悲哀、很丑陋。　　‘丑陋的老三届’，‘丑陋的中国人’！直面丑陋是为了不让丑陋重演，要铲除的是产生丑陋的根源，几千年周而复始，总是把命运交给某个人掌管。

华夏知青网不是赢利性的网站，所刊载作品只作网友交流之用
引用时请注明作者和出处，有版权问题请与版主联系
华夏知青网：http://www.hxzq.net/
华夏知青网络工作室

老三届人不喜欢说“我”，总是说“我们”“我们的”，因为那个时代没有“我”只有“我们”。我们缺少个性崇尚集体精神。这种老三届人固有的群体意识，是长期高度集权国家遗留下来的文化心理。

既然是“我们”，那么我们的过失甚至罪孽，都让“我们”一起承担吧！

我们这一代人经历的苦难，已被我们反复倾诉和宣泄；我们这一代人内心的伤痛和愤懑，已激起世人的广泛关注；我们这一代对于历史的质问，已一次次公之于众；然而，临近20世纪末，我们这一代人，是不是能够低头回首，审视我们的自身，也对我们自己说几句真话呢？

不要再用“知识青年”这样自欺欺人的词语了吧。能不能平心静气地抚心自问：我们这一代中的大多数人，可曾真正拥有过文化和知识？

如果我们敢于正视自己，我们应当承认，老三届这代人中高中生的比重只占很少的一部分，大都是初中文化程度，而文革前的初中教材，过分强调意识形态的灌输，在知识结构上具有极大有缺陷。我们知识沉淀最“厚”、烙印最深的那部分，并非人类优秀的经典文化，而是“阶级斗争”、“知识无用”、“革命的螺丝钉”等教条主义，是红宝书的语录，是样板戏的歌词，是大串联中抄写的大批文章。有人说这一代人是喝“狼奶”长大的，其实还应加上泡饭和咸菜——蛋白质含量太低。

我们的大部分知识，都是在“文革”结束后，依靠顽强的自学，支离破碎地拼凑起来的。所以也可以说，这是严重贫血的一代人。

不要再仅仅说我们这一代人是“文革”的牺牲品，是政治的殉葬物。不要忘记“文革”中抄家、破坏文物的红卫兵是这一代人；不要忘记“文革”中打死老师的革命小将是这一代人；不要忘记疯狂地鼓吹并推行血统论的也是这一代人。红卫兵的法西斯暴行和血淋淋的犯罪事实，已是昨天的噩梦，但有多少人真诚地忏悔过，用心灵去追问我们当年为什么受骗上当，为什么如此愚昧无知？

老三届是曾受极左意识形态毒害最深的一代，然而许多老三届人至今还不敢正视自己曾误入的歧途，而把所有的责任都推给了社会，便轻易让自己解脱。就象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有的人永远无法原谅自己，并用后半生的善行去赎罪和赔偿；但是有的人，只是怪罪于领袖的鼓噪使他们暂时失去了理性。

不要再仅仅说我们这一代人曾无私奉献、改天换地；不要再仅仅说我们那年代的人与人之间是多么真诚和纯洁。如果你真诚，你应该承认在那个年代里，我们老三届人中也有出卖和告密——为了入党、升学、招工、提干的极其有限的名额，为了渺茫的前途，我们被人伤害也伤害别人——那所谓的纯真掺杂了多少虚伪和丑陋。我们一腔热血战天斗地，为了那些美好而可笑的宏伟目标，大肆砍树烧荒打猎，那时候我们义无反顾地破坏着自然环境，却面不改色心不跳。还有多少在我们的严厉批斗和打击下丧生的“落后分子”和“地富反坏右”分子……

不要再仅仅说我们这一代人吃苦耐劳、克己奉公，是中国各个社会阶层中的支柱力量，是最“优秀的一代”了吧。尽管老三届中涌现出了许多人才，从车间主任到经理到学者到市长，各界都能幸会我们的同学和“战友”。但老三届中，从事高科技、高级经贸活动的人才和高级管理人员，比例极小。那是一个人才的断层，是老三届难以攀登的高峰。这一代人几乎都有未能熟练地掌握一门外语，本人即是一例。大多数人只能从事普通的熟练劳动，成为这个社会金字塔的底座，如今已面临着下岗和退休。

由于共和国十七年教育和“文革”十年的经历局限，我们这一代人正在不知不觉地退出社会，离社会的主动脉越来越远。我们的知识结构和意识形态在本质上同市场经济难以相容；我们已经习惯了计划经济的思维模式，适应了“大锅饭”的劳动报酬和生活方式，于是同今天的自由竞争原则产生了剧烈的抵触和冲突。我们已经或即将被有知识有文化的一代年轻人从头顶上无情地跨越，正在一天天陷入被淘汰的尴尬处境。我们是一只蚕蛹，被困于黑暗中，但我们已无力咬破茧子。我们失落，我们抱怨，而我们却无可奈何，因而我们的痛苦是双重的。

所以，不要再仅仅说我们这一代人是“最后的理想主义者”，我们已担负不起这样崇高而光荣的使命，况且那只是一顶虚妄的桂冠。我们曾经有过的革命理想，早就崩溃坍塌了，可惜那仅仅是出于对个人前途和命运的绝望，而不是出于对世界的整体认识。自从失去信仰，我们便从此变成了一个迫不得已的现实主义者。

事实上，我们这一代中的大多数人，在这颠沛流离、动荡不安的几十年间，当务之急是吃饭，是工作，是住房，是病痛，是养育子女，是侍奉父母——我们始终在为生存而拼搏，我们早已丧失了选择职业和爱好的自由、机会和能力。“理想”成为一种遥不可及的幻影，所谓的“精神”寄托，只能寄托于我们的子女……

说什么“青春无悔”——一个、一代人所牺牲和浪费的整整一生的时间和生命，竟然能用如此空洞而虚假的豪言壮语，强颜欢笑地一笔抹去的吗？

这才真是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悲哀。

老三届人的老三届化，这一代人固执的“老三届情结”，是近年来深深困扰着我的一种忧虑。我写下这些也许触痛老三届人伤痕的文字，正是因为许多人尚在违心地用“无怨无悔”的结语，逃避对自身的清理和整合。我惟愿我们这一代人能走出老三届的阴影，在“五十而知天命”的人生中年，融入改革进步的大潮，从容地迈向二十一世

纪。

我们还能为社会做些什么？我们怎样才能对得起剩下的岁月？

我们不再是“我们”，我们将是每一个独立的个体。

我将与老三届一生同行。

华夏知青网不是赢利性的网站，所刊载作品只作网友交流之用
引用时请注明作者和出处，有版权问题请与版主联系
华夏知青网：http://www.hxzq.net/
华夏知青网络工作室

一．“老三届”的基本评价

二．丑陋的“上山下乡”运动

丑陋的青春

丑陋的动因

丑陋的“自觉者”

丑陋的实践

纪念丑陋

三．丑陋的红卫兵运动

丑陋的革命

丑陋的口号

丑陋的对联

丑陋的作品

丑陋的行为

四．请做如是说

五．结束语

正文：

去年的夏天，一群“老三届”在某歌厅聚会。一好事者将聚会录影。之后，这盘录影带就在与会者中间流传。某女士和她的女儿在家中一起看这盘录影带。没看几分钟，女儿就发表了结论性的评论：“这群人怎么一个儿一个儿的都那么丑陋呀。”此话传入笔者耳中，沉思多日，故写此文。

一．“老三届”的基本评价

“老三届”是指1966年“文革”爆发时在校的三届高中学生和三届初中学生。其中年龄最大的是66届的高三毕业生，俗称“老高三”。“文革”风雨袭来之时，他们正逢高考即将来临之际。如果那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晚三个月发动，“老高三”中的佼佼者将会跨入高等院校的大门。一场风雨，十年光阴，人生的道路由此转向。“老三届”中年纪最小的是68届初中毕业生。他们于1965年跨入中学校门，1966年6月停课时年仅14岁，尚未读完初中一年级的全部课程。“文革”中，他们在荒废了两年的学业之后，也头戴“知识青年”的桂冠被送上了南下北上的列车。

“文化大革命”至今已有32年。“老三届”中大的已年过半百，小的也有四十六七。在当今少男少女的眼中焉能不老，焉能不丑呢？其实，“老三届”们自己在相互审视时也会有同感。几年前，一男“老三届”曾约会一女“老三届”，想重温一次少年时代的同桌梦。男人留给女人的印象如何不得而知，而那女人衰老的容颜着实让那男人伤感了许久。

世间万物由鲜活走向衰败是一件再自然不过的事了。保尔．柯察金【1】的那段名言曾经激励过多少“老三届”。一个人在回首往事的时候，只要自觉没有碌碌无为，虚度年华就不会懊悔。作为一个普通人，在回首花季之时，能够在记忆的长河中采到一朵浪花，让它闪现出往日的明媚和鲜艳就可以自慰平生了。而“老三届”却真的难说曾经拥有过真正意义上的，属于自己的，浪漫无邪的青春时代。“老三届”的青春时代是在红卫兵运动和“上山下乡”运动中度过的。“胡为”、“无为”、“虚度”、“懊悔”应该成为“老三届”人生回忆录中的关键词。

80年代初，“老三届”陆续从农村返城之后，作为一个共命运的社会群体已不复存在。他们消融在社会的各个阶层和社会的各行各业之中。二十年又过去了，“老三届”已经成为一种历史现象。“老三届”的故事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文学作品和影视节目中。“老三届”自己的回忆文章也一年比一年多。艺术的再创作，失真的回忆和人为的粉饰把历史上的“老三届”搞得面目全非。不断深化的对“文革”的否定的认识应该导致对“老三届”历史形象的重新复位。

一位有着四十年教龄的中学老教师曾经在一次家长会上说过，在她教过的所有学生中，“老三届”孩子的综合素质是最差的。这位老师谈的是她的学生，但她无意中涉及了孩子们的家长——“老三届”的整体素质的评价这样一个敏感的话题。直率地讲，就整体而言，“老三届”是一个不但没有接受过高等教育，其大多数也没有接受过完整的中等教育的一个群体。这一代人的群体素质低于他们的父辈，也不如他们的孩子们。在“文革”中，虽然有一些人也去上过三两年“工农兵”大学【2】，可是，那种被“四人帮”推崇的“革命化”大学在文化教育方面的“含金量”之低是众所周知的。在1977年，1978年类似安慰赛的高考中，“老三届”中的一些幸运儿也曾金榜提名得到深造的机会，他们激动的心情不亚于农民土改期间分到土地时的感激之情，是可以理解的。有数字统

计77级、78级入学新生为67万人。而这67万人中有多少“老三届”呢？最乐观的估计不会超过10万人。而“老三届”的总人数大约为一千五百万人。这1500比1的比值说明，77、78年的高考确实改变了极少数幸运儿的命运，也将国家的教育体制引入正轨。但是，正是在这种所谓的“平等竞争”的考试游戏中，在中榜举子的感恩戴德声中，国家欠下的中断文化教育的孽债被名正言顺地一笔勾销了。而在那些为数可怜的幸运儿中，对知识的渴求已不再是学习的第一目的，人数不乏地表现出来的是对获得一纸文凭的满足和对可以名正言顺地混入知识分子行列的窃窃之喜。而那些浪迹江湖十年之久，把上学读书作为进入官场的敲门砖的人确也不在少数。即使有个别人经过个人努力，事有所成，但绝对改变不了“老三届” 作为一代人由于文化水平偏低，而年龄又相对偏大，在各个领域里竞争无力，即将过早地被社会淘汰的必然命运。在最近几年的下岗大潮中，“老三届”已是首当其冲。

二．丑陋的“上山下乡”运动

丑陋的青春

多年以前，有一群“老三届”在北京搞过一个以“上山下乡”为背景，以北大荒农垦生活为素材的摄影展。影展好象唤做“魂系黑土地”，主题辞是“青春无悔”之类字眼。（注意：计算机只能从硬盘字库中调出“芜秽”“污秽”“误会”等词组。“无”“悔”两字只能分别输入）但是，一个思维健全，心态正常的人看过影展后都不会留下美好、健康的印象。照片上的人多是蓬头垢面，龟头鼠脸，神情和目光都很呆滞。要么做傻笑相，不知其所笑何谓；要么做英雄相，不知其意欲何为。他们的服饰也无款式可言，男女皆宜，中性的很。照片上作为背景的景和物多是一些驴棚，马圈，土坯房和高粱地什么的。不知影展的举办人想向来观者展示和说明些什么？这两年，这类照片又被汇集成册，以《老照片》的形式炫耀于世。那样的生活值得炫耀吗？1969年夏天，人类的使者在全人类的目光的注视下登上了月球【3】。他缓缓地转过身来，用惊异的目光眺望人类的故乡———太阳系中一个唯一的，蔚蓝色的星球。它浮动在冥冥的黑暗之中，向漫漫的，寒冷的宇宙发出挚爱的光和热。在这全世界都意识到“科技凌驾于一切的时刻”，中国的“老三届”们被剥夺了学习科学文化知识的权利，正在把自己可贵的，属于自己只有一次的青春无奈地抛洒在荒原和山坳之中。今天，还会有人去崇尚和再现这种丑陋的青春模式吗？

别人如何评价“上山下乡”运动是一个旁观者的权利。“老三届”自己对“上山下乡”运动给自己和国家带来的无可弥补的损失应该有一个清醒的认识了。

“上山下乡”运动是应该全盘否定，彻底否定的！这并不是一个具有多么高深的理论而需要研讨的命题。“四人帮”倒台之后，国家默许千百万以“老三届”为主体的“知识青年”以高考、病退，困退等各种借口倒流城市，并停止强迫初中和高中毕业生去“上山下乡”的做法，以及在改革开放以后开始的，持续了20年的，恰恰是与“上山下乡”逆向的“打工潮”都从实践上否定了“上山下乡”运动。

有一点常识的人都知道，工业人口与农业人口的比值，城市人口和乡村人口的比值是标志一个国家工业化程度

和现代化程度的一个重要的参数。如果一个国家的农村人口绝对地大于城市人口时，这个国家是无现代文明可言的。“上山下乡”运动人为地将本来在全民总数中就占少数的城市居民驱赶到农村，将发展工业所必须具备的预备人员强制性地转为务农人员。这种国策是与社会发展的大趋势是相违抗的。是一种倒退。

“消灭三大差别！”是“上山下乡”运动中被喊得最响的口号。以“上山下乡”为手段去减少城市人口以消灭城乡差别；以减少脑力劳动人员的数量去消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差别的做法是农业乌托邦主义在20世纪最荒诞的实践，其后果只能是社会的蜕变。拉大与世界先进国家的差距。

“与工农相结合！”也是一个被喊得震天价响的口号。纯粹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认为工人阶级是代表最先进的生产力的一个阶级。而农民落后，自私，目光短浅。为什么不留在城市里去和工人阶级相结合或者干脆让自己就成为工人阶级的一员，而要去农村和一个相对落后的阶级相结合呢？实践和理论是自相矛盾的，它只能用来骗人，根本不能自圆其说的。

20多年以前，有人写过一首歌颂“文革”，赞美“上山下乡”运动的无耻长诗《理想之歌》【4】。1976年1月它作为回击“右倾翻案风”的炮弹，被刊登在《人民日报》上，想是得到了姚文元的赏识和认同。据说此诗也是出自“老三届”之手。受到了一点贺敬之诗歌风格的影响，诗人的创作更象是在模仿。虽同属奉命文学，但它却少了些《雷锋之歌》的神韵，也不如《三门峡梳妆台》【5】来得流畅。红卫兵文字的影响更是流露在字里行间，可又缺了点儿红卫兵文字中固有的傲气与霸气。总之很蹩脚，不伦不类的，象个四不象。诗中赞美理想的声音就象是痴人说梦，在当时就为很多人所不齿。它和后来成为一位精神病患者的另一位“老三届”当年写下的朦胧诗的开山之作《相信未来》【6】相比，显得那么冗长，那么做作，那么另人厌恶。

有人说“上山下乡”运动是毛泽东“这位气质浪漫的领袖在中南海的书房里构思了称之为‘再教育’的革命性创举”。但是，认真考察“上山下乡”运动发生的时代背景，其决策的动因中到底有多少理想主义的成份是十分值得商榷的。

丑陋的动因

在“文革”中，因党内政治斗争的需要，无理中断国民文化教育和开展“上山下乡”运动是一件事情的互为因果的两个阶段。

1949年以后，政治运动不断。而全国范围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且和学生有牵涉的只有两次：一次是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一次就是“文化大革命”。五七年的反右斗争中有55万人被打成右派，但运动没有在中学生中进行，那实在是不幸中的一件幸事。而“文革”到来之时，中学生就在劫难逃了，千百万“老三届”成为这场斗争的殉葬品。

“文化大革命”的冲击波一开始就波及到中学。失控的校园再也听不到朗朗的读书声。在即的1966年夏季的初考、中考和高考一律被取消。此恶端一开，中学的停课状态持续了多年，全国高等院校被关闭达11年之久。（如果以招收“工农兵”大学生为限，高等院校被关闭的时间也有七年之久）荒废学业的中学生何止千百万。

废科举，办学校是中国人在本世纪初作出的全民族的选择。从梁启超、严复倡办京师大学堂为起点，无论天灾人祸如何惨烈，作为立国之本的国民文化教育就从来没有中断过。就是在决定民族存亡的八年抗日战争时期，国民的文化教育也没有间断。以西南联大为代表的流亡大学为中华民族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栋梁之材。“文革”在这个层面上的确名副其实地成为民国以来最黑暗的年代。子不教，父之过。民不教，谁之罪？今天，“文革”中断教育的后果早已显现出来了。除了官场和商场，几乎各种行业都存在着人才的断层现象，其中，科技、教育领域的这种危机尤为明显。当“文革”前毕业的大学生开始逐年成批地退休，离开科研，教育第一线的时候，作为一代人，“老三届”不能挑起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历史重担。历史也不得不无情地跨过“老三届”，把希望的目光投向更年轻的一代。在全民高唱“科教兴国”的今天，应该清一清这没有偿还的历史的旧帐。

文化教育停止了。但中国人的生育没有停止，婴儿们仍在出生，孩子们还在长大。“文革”搞了两年，形势虽然“不是小好而是大好”，但是一个极为严峻的社会问题日益紧迫地摆在中国领导人的面前：1966年“文革”开始时，五、六、七岁的孩子已经长到七、八、九岁，还迟迟不能跨入小学的校门。而“文革”开始时的在校的六届小学生也停课两年，仍被滞留在小学校园内。其中后来被称为69届、70届和71届初中毕业生的孩子们也由于国家教育体系的崩溃一直无法完成小学的全部学业和正常地升入初中。让三届，上千万适龄和超龄儿童同时进入小学校园的前提是：必须保证滞留在小学的三届高年级学生要同时离开校园。理由很简单：小学的校园和校舍是有限的，不可能容纳如此之多的学生。同样的问题也存在于中学。而“老三届”的运气就没有那么好了。当69届，70届和71届的小弟弟和小妹妹们向潮水般地涌进中学校门的时候，“老三届”的学生却不能按照上述模式处理，顺理成章地升入高中和大学。当时的大学正在进行“斗，批，改”，伟大领袖还没有下“理工科大学还是要办的”决心。而取缔文科大学好象势在必行。既然是这样，“老三届”便处在一个下端挤压，上端封盖的尴尬境地。他们就象多余的环节注定要从社会的链条中被摘除去了。带着一颗精神世界一贫如洗的头脑和一个没有完全发育成熟而显单薄的身体，过早地离开校园，被抛向社会。如何处置“老三届”呢？让他们在城里就业上班吗？正在进行着的“文化大革命”扰得各行各业不能正常运作，很多企业都处在开工不足和停工状态，根本不可能“消化”如此之多的初，高中毕业生。可供“老三届”走的路只有一条：离开城市。

当“老三届”响应“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号召，放下书本，离开书桌，走出教室时候，他们是义无返顾、责无旁贷的。甚至他们中的很多人到今天也解释不清楚当年他们投入那么巨大的热情去承担的义务和责任到底是什么东西。历史没有嘉奖他们的无私，而是冷漠地嘲讽了他们的无知。他们的

无知甚至使他们无从察觉自己已经被淘汰出局。与以往的右派下乡劳动改造不同：右派们在运动后期被赶向农村的时候，头上都带着刻有A字的政治帽子，而“老三届”被送往农村的时候却身披“知识青年”的圣袍如同皇帝的新装。当他们象废弃物一样被扔到垃圾堆里去的时候，他们还坚信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丑陋的“自觉者”

“老三届”不愧是共和国的同龄人。他们中的杰出人物总能够在历史的关键时刻自觉地涌现出来，想党之所想，急领袖之所急。只用“哗众取宠”四个字来解释他们的所作所为也不尽然。这是教育的结果。说得玄乎一点，这也可以算作是政治上的心灵感应吧。用正统语言来描述，这是有党性的表现。

1966年6月初，“文革”热浪已经波及到了平静的中学校园。“老三届”被滚烫的政治气候熏烤得坐立不安。参与意识，表现意识已经成为一种自觉意识。6月13日党中央和国务院发出通知，说为了彻底搞好文化大革命、彻底改革教育制度，决定当年的高校招生工作推迟半年进行，因为需要有一定的时间来研究和制订新的招生办法。6月18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刊登中央和国务院的通知的同时转发北京女一中高三（四）班的同学以班集体的名义给党中央毛主席写的信【7】，她们在信中强烈要求停课闹革命，并自愿放弃已经迫近的高考。她们将高考与封建社会的科举制度相提并论，高唿要砸烂旧的升学制度。北京四中高三（五）班同学致毛主席的信和写给全北京市师生的倡议书也同时被刊登在那一天的《人民日报》上，他们用更狂热的语言表达了“立即废除高等学校入学考试制度”的愿望，并发誓：“誓作社会主义的工农兵，决不当资产阶级的大学生”。几乎与此同时，全国各地的“老高三”中都出现了类似的言行。上海61中高三（三）班的同学贴出大字报，长沙一中高三（三）班团支部致信团中央，他们都在控诉旧升学制度的罪恶，都要求取缔旧的升学考试制度。取消高考，中断国民教育这样伤天害理的事情是不便由国家出面直接倡导的。打民意牌，可以把少数高中生由于头脑发昏表达出的非理性的愿望强加在几十万“老高三”毕业生的头上。本文作者并不想过多地指责当年写信的同学，他们也负不起误人子弟，危害国家的责任。他们舍弃了自己桃李芬芳，欢歌一堂的时光，就以为担负起了天下的兴亡；他们过早地、盲目地进行了选择，可扑面而来的却是不断增长着的民族内耗的滔天浊浪。实际上，有没有这样一些信出现，“老三届”的结局都是一样的，一场摧枝落蕾的桃李劫是注定要降临的。应该反省的是：“老三届”作为一代人，在被剥夺学习文化知识的基本权利的历史性时刻，表现出来的是一种整体性的麻木。虽然个别人有一些反应，也不过是不健全的政治神经的抽搐而已。这是社会的文化虚无主义在“老三届”身上结出的，必须由“老三届”自己来吞咽的恶果。

教育停止了，学而优则仕的道路被堵死了。混混噩噩噩的初中生整天陶醉于革命和造反，废寝忘食地忙碌着。而高中生，尤其是年龄已过20岁的“老高三”的学生已经开始考虑人生的走向。选择的余地很小，绝大多数人对未来感到渺茫。但是，也有极少数“冷静者”在那昏热的年代，凭借青年人不应有的社会经验和政治敏感为自己找到了一条曲线迁升的道路。

1967年的秋天，中学的“文革”还在轰轰烈烈地进行着。“老三届”的去留问题尚未提到日程上来。北京的“老三届”中有“十男十女”（“老高三”的居多）【8】不知是因为想逃离政治斗争的旋涡还是想寻找新的兴奋点，在天安门广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前庄严誓师，然后奔赴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内蒙古大草原扎根落户。这“十男十女”颇具浪漫主义的举动如同前文提到的女一中高三（4）班的那封信一样，引起国家的高层的注意，舆论工具广为宣传，一时风头出劲出尽。他们的举动为高层处置“老三届”提供了一条新思路。一年以后，1968年12月22日伟大领袖终于发出了“上山下乡”的号令。与那先知先觉的“十男十女”自愿去草原的情况不同，“上山下乡”从此成为一项强制性的政策。

当年火车站送别的歌声、喊声和哭声早已飘散。落户农村的千千万万的“知识青年”也早已作鸟兽散。那“十男十女”可能是最先卷铺盖卷返城的一伙人。当年的“模范带头”作用早已成为他们仕途上的一块垫脚石。“坚决同贫下中农相结合，永远扎根农村边疆！”的誓言象一声响亮的臭屁，放过之后就无声无味了。和许多“模范知青”（比如蔡立坚）相比,他们的誓言要廉价的多。70年代末期，“老三届”的返城大潮逆不可转，历经十年的“上山下乡”运动终于落潮了。却有近百名有全国影响的“知青”联名发出了“坚决扎根农村六十年”的最后一声狂吠，理念之迷乱，时务之不识，冥顽之不化已达到丧心病狂的程度。中国是一个无神论占统治地位的国度。发誓很随便，背叛自己的誓言也很随便。谁也不会因不遵守自己的誓言而遭报应。但是，有一点却是肯定的，在这种善于政治投机的人的灵魂深处总有一块阴暗的地方，阳光照射不到，只好一直糜烂下去了。

丑陋的实践

1965年9月25日的《中国青年报》说，从1955年到1965年的十年间，全国有一百万知识青年落户农村。十年以后，1975年12月23日的《人民日报》头版头条，以“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辉煌胜利 文化大革命的丰硕成果”为标题，向世人宣布：自1968年毛主席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伟大号召以来，七年的时间里已有“一千二百万知识青年光荣务农”。“文革”前后，全国平均每年下乡的“知识青年”人数从十万激增到一百七十万。在造成这种大规模地将城市青年驱赶到农村去的诸多原因中有三条是起决定性作用的：教育事业的停滞甚至倒退；工业发展的相对缓慢；解放以后无节制地被生育出来的人即“老三届”及其弟妹进入了被迫就业的年龄段。

“上山下乡”运动起源于50年代中期。作为一种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它兴起在60年代初期。“文革”前夕“上山下乡”政策带来的社会弊病已经显露出来。老一代的“知青”为了自己的生存权向社会作出过强烈的反应。“文化大革命”的极左思潮的影响和“老三届”在“上山下乡”运动面前表现出来的愚昧，尤其是国家制定的铁打的“上山下乡”政策使得“老知青”用青春和血汗换来的教训和全部争取人权的努力付之东流。

然而，在“上山下乡”运动的十年中，“知识青年”始终是社会的一个不安定因素。而这种不安定首先来自“知识青年”的内心。许多“知青”的回忆录中连这一个最基本的事实都不敢承认。虚伪是“老三届”群体品格

中最显着的品德之一，由此可见。正象“文革”以前，很多“老三届”背上粪桶去掏粪，恶心的回家后连饭都吃不下去，可是却在入党，入团申请书上大谈特谈自己的心灵是怎样被屎尿之液洗净了一样。

虽然“知识青年”的文化程度和广大的农民极其子弟相差无几，可是，一种因为自己是来自城市而产生的优越感使他们的绝大多数从内心深处看不起农民，也看不起农民的孩子们。就是那些挣扎在贫困线上的城市贫民的子弟在农民面前也有一种莫名其妙的优越感。这种优越感在三十年后“老三届”撰写的“上山下乡”回忆录中随处可见，虽然他们也承认得到过来自农民的厚爱。“老三届”和更老一代的回乡“知识青年”例如邢燕子，董加耕相比，缺少的是朴实与忠厚以及对乡亲对土地的那种梦牵魂绕的乡情。异化了的革命理想使他们的情感漂浮在半空中，无法升华又不甘沉落。春天，他们虽然和农民一起在田间播种，秋天，却不能在和农民一道收获时同时收获喜悦。秋天是他们返回城市的季节。他们将在无聊和空虚中度过一个漫长的，城市的冬天。把自己失落的脚印留在城市阴冷的街道上，把自己迷茫的身影留在城市人怜悯的目光中。当春天再一次降临的时候，他们只好又无奈地回到农村。年复一年，他们象“边缘人”一样游荡在城市和乡间。那种心不守舍，身魂两地的精神状态曾经那么痛苦地折磨过千千万万的“知识青年”。那种感觉应该是刻骨铭心的。但是，在许多“老三届”写的“上山下乡”回忆录中，这种落魄的感觉没有被记录下来。

想方设法离开农村，改变自己“知青”身份的活动是和“上山下乡”运动几乎同步进行着的。每一个有“知青”成员的家庭都在利用各种社会关系把自己的孩子调离农村。如果有人愿意考证一下“走后门”【9】一词产生的时代背景，就会发现它与“上山下乡”运动是密不可分的。权利对于看似平等的“知青”大军的瓦解作用从来就没有停止过。

在十年“上山下乡”运动中，千千万万“知识青年”自发和自觉作的一件共同的事情就是抗拒被农民的同化和不惜一切代价返回城市。每逢升学，农转工，调干的机会，他们就会不择手段：女的不惜出卖色相，男的不惜以死相要挟。他们希望离开农村和农场不仅仅是因为那里有着太多的贫困和太多的愚昧，基层的恶势力无时无刻不在啃噬着他们的青春。邓贤的长篇报告文学《中国知青梦》【10】向人们再现了中国知青族被欺骗、被强奸、被虐待的生活场景，还原了一个绝望、混噩、丑陋的群体形象。而在更多的“知青”回忆录中，这丑陋的一切被掩饰的无影无踪。这种少数人的掩饰比起大多数人的沉默要可恶的多！是从肯定的意义上，把历史悲剧幻化为正剧；还是在否定的意义上，把历史的真相化为一场人生的悲剧，这是必须正视的。

发生在1973年的“张铁生事件”【11】已逐渐被世人淡忘。但是，在几乎每一本“老三届”编写的以歌颂“上山下乡”运动为主题思想的“知青”回忆录中都可以找到指责张铁生的文字，内容也如出一辙，说，要不是张铁生，自己就可以上大学了。云云。今天，回首往事，应该为张铁生说句公道话：他何罪之有？为什么不去谴责无理中断全民文化教育的决策者，而要嘲笑张铁生是“白卷先生”？为什么不去控诉将整整一代应该在学校读书的青年人驱赶到农村边疆的作法，而要指责张铁生是一个“大学迷”？张铁生是“老初三”的学生，他没有上过高中，初

中毕业后，搞了两年“革命”就去农村劳动，一干就是五年，文化考试考成那个德性是再正常不过的了（物理和化学两门只得了6分，数学61分，语文38分）。如果用那套卷子在1973年对67届、68届、69届和70届的初中毕业生进行全国同试，多数人还考不到张铁生这个水平，“白卷”大军不会少于一千万！几乎所有的“老三届”都读过高玉宝的《我要读书》。但是，当他们被剥夺了读书的权利的时候，却没有人站出来为自己，为自己所属的一代人进行抗争，绝大多数人都保持沉默。倒是张铁生以他特殊的方式，用他的“答卷”向社会，向统治者发出了“我要读书”的乞求声。其相虽丑，其声也悲呀。

纪念丑陋

前两天从报纸上看到一则新闻：为了纪念“上山下乡”运动30周年，某公司准备发行金卡，数量三万枚。虽然没有消息证明有“老三届”参与了这件事情。可除了“老三届”还有谁会如此热衷与这件事情呢。

凡是发生在历史上的，值得后人纪念的事情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因为它的出现推动了社会的进步；一种是因为它的出现阻碍了社会的进步。

“五．四”运动对科学和民主的唿唤是本世纪中国青年最值得骄傲和最值得纪念的创为。而“上山下乡”运动虽然涉及的人有上千万，持续的时间达十年之久，但是，它背离了“五·四”精神，没有给中国带来丝毫的社会进步。有些自己感觉混得不错的“老三届”总是在不同的场合，用不同的方式粉饰“上山下乡”运动，以证明自己的青春没有虚度。他们有意或无意地虚构了一个可以欺骗自己孩子们的神话，一个中国拓荒者的神话。但是，从黑龙江的北大荒到云南的西双版纳；从陕北的黄土高原到内蒙古的大草原，“老三届”没有开发出一处“辉煌的西部”，他们留下的只是一片片枯萎的橡胶林和因过份砍伐树木形成的一座座光秃的山岭，和被他们遗弃的，已经长大成人并和当地人没有任何区别的亲骨肉，还有那至今都难以启齿的羞辱和痛苦。“上山下乡”运动是十年浩劫的副产品。是“文革”这部反文化，反文明的大合唱中的一个不可分割的一个声部。“文革”是国耻。国家之耻，国人之耻。“上山下乡”运动则是中国青年的耻辱。如果一定要纪念的话，那就应该只是为了这曾经发生在共和国青年人身上的悲丑剧永不重演。

三．丑陋的红卫兵运动

“文化大革命”被否定了。几乎所有的人都在控诉文革的罪恶。好象在那场持续了十年的浩劫中只有四个人在作坏事，而其余十亿减四的人都是受害者，都是无辜的，清白的。于是历史上的“文革”失去了载体。但是，如果这个载体确实不曾存在的话，“文革”就根本不可能发生和发展。对“文革”的反省应该是全民族的。即包括执政党也包括老百姓。“老三届”是共和国的同龄人，历史却没有善待他们，他们也没有善待历史。“老三届”在“文革”中有被欺骗和利用的一面，但是，主动迎合，积极参与却是一个基本的历史事实。

看过电影《淮海战役》的人都会记得毛泽东有这样一段台词："60万比80万（解放军和'国军'人数之比）……这是在赌国家的命运，赌民族的命运。'啪'的一下押上去，就是那么一回事。"在解放战争中，他老人家是胜利者，是赢家。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手中的"赌资"是什么？最大的"赌资"当然是他在老百姓心中早已形成的，如日中天的崇高威望。但是，仅此一注是不够的。无论输赢，在各类码子中，有一注是注定要输进去的，这就是"老三届"——他们的青春和前程。

丑陋的革命

"文化大革命"的毒焰首先是在大学校园被点燃的。但是，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打压下，"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12】发表后形成的轰轰烈烈的局面，很快变得冷冷清清。于是，毛泽东走出滴水洞，在畅游了长江，回到北京之后，他作了两件一反常态，惊骇全党的事情。一是写下了《炮打司令部》【13】的大字报，向全党公开了他要打倒刘少奇的决心。一是亲笔给清华附中红卫兵【14】写回信，表明他老人家已经找到了一种让政敌和同盟者都意想不到的社会力量。这种力量可以由他任意号令，招之即来，挥之则去，功无不克，战无不胜。将中学生推向政治斗争的最前沿确实有着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的效用。

中学生的年龄是从13岁到19岁。这是一个从身体发育到心理发育都尚未达到成熟的年龄段。青春的躁动、是非的无断、理念的易变，再加上抖擞的精神和旺盛的精力都表明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年龄段。教育学和心理学都认为，中学生是需要特别加以引导和训教的一群。英文中有一个特指处在这样年龄段的人的专用名词：teenager。它是由teen和age复合而成。可是，它决不是一个简单的复合名词，只在表怔处在该年龄段的青年的年龄特征。更深层的内容在于涵指这个年龄段的人在教唆和误导的情况下，他们的行为往往具有一种反复无常、丧失理性的倾向，因而是极端危险的。文革中的"老三届"正是这样一个群体。

历史对"老三届"的选择看似偶然，但也有其历史的必然性。

建国十七年以来，以革命传统和阶级斗争为大背景的社会教育培育了"老三届"以仇恨为底色的社会情感，"文化大革命"中，为了这种情感的宣泄中国人付出了血的代价。五七年以后，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批判和斗争愈演愈烈，全社会形成了一种对文化虚无主义的普遍认同。这种反文化的倾向对"老三届"影响是极为可怕的：中国的传统文化是封建主义的；西方的文化无论是古典的还是现代的都是资产阶级的；五十年代还可以接受的前苏联和东欧的文化到了六十年代也成了修正主义的东西。"老三届"的精神世界近乎一片荒漠。"文革"前夕"老三届"只能接受以《收租院》【15】为代表的控诉艺术和以《红岩》【16】为代表的烈士文学。前者对"老三届"的影响是将不同社会制度的比较转变成对人的仇恨，后者是把信仰的追求转变为对复仇的渴望。在不断地、反复地对"人性论"进行批判的同时，"老三届"接受了日益深化的个人崇拜教育。其中，学习雷锋的运动【17】将个人崇拜的方式进行了推陈出新，学习毛主席着作也由此走上实用主义的道路，对毛泽东的神话莫过于在"老三届"的

心中。

从七千人大会以后，毛泽东开始全面抨击党在文化教育领域的方针政策。文化部被说成是“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中宣部被喻为“阎王殿”；评价最低的是教育界——“庙小妖风大，池浅王八多”。“文革”前，“毛泽东和毛远新的谈话”、“毛泽东和王海容的谈话”给“老三届”的思想造成了极大的混乱。这些以抨击现行教育体制的讲话一经流传，不尊敬老师，不崇尚知识之风即刻成为一种时尚。“文革”前的《中国青年报》曾刊出过一篇嬉笑之文《获取5分的“秘诀”》【18】，它的作者就是“文革”中的“老三届”。这篇文章比黄帅小姑娘的日记要早了将近十年。把它算作是“老三届”泼向自己老师的第一盆污水可能是不会有误的。北京市东城区某校初一的学生在1966年初曾写出一文，题目在当时就非常吓人——《现在的学校培养不出共产主义的接班人》，其矛头还是对准了教育体制和老师。无论是对杨献珍的“合二而一”的哲学观点的批判，还是对田汉的“有鬼无害”的戏剧理论的批判，“老三届”都积极参与，表现出了极大的“革命热情”。“文革”风雨未到，“老三届”已经跃跃欲试。政治思想的“热身”运动已经完成于无形之中。

“文革”中的“老三届”是红色的“teenager”。以红卫兵为代表，以“八一八”为起点，“老三届”唿啸着登上了中国的政治舞台。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首次检阅红卫兵。在以后的四个月中，有一千万以“老三届”为主体的红卫兵和造反派在这里接受过他的检阅。“八一八”是“文化大革命”这出中华民族的悲丑剧拉开大幕的时刻。那红色的古城楼就是一座历史的舞台。无论以后如何，或寿终正寝、或横尸荒野、或腊炬成灰、或面壁囚笼，剧中的主角都从幕后走向台前。刘少奇的尴尬，周恩来的矜持、江青的傲慢、康生的阴冷，尤其是林彪那白骨般的面容和他嘶声力竭的唿喊，对中国人，对中华民族来说充满着险象和凶兆。毛泽东在震耳欲聋的“万岁”声中举起手，挥动着他手中的绿军帽，而他的目光却没有投向在他脚下的芸芸众生。端详那张由摄影师留下的，记载着那历史瞬间的照片,人们会发现：毛泽东微昂着他硕大的头颅，把他冷漠的目光投向无际的苍穹。与这神情形成巨大反差的是红卫兵的狂热，他们欢唿着、呐喊着走过天安门城楼，个人崇拜的狂涛巨浪席卷了天安门广场。这种场面与1933年1月30日柏林的火炬之夜【19】何其相似。

红卫兵不分男女，都身穿黄色的旧军装。不知是天太热的缘故，还是故意要摆出这副样子，每个人都捋胳膊挽袖子，刁蛮之像让人兵痞难辩。男的是清一色的小平头，女的多是超短发，也有的女红卫兵将自己剃成一个秃子以示革命。不知她们是怎样将革命和消灭女性特征联系在一起的。封建意识形态中男尊女卑的思想和带有宗教色彩的禁欲主义倾向那么自发地而又自然地毒害着少女的心身。如果当时可以做变性手术，这些女娃子们会毫不犹豫地躺到手术台上去的。站立时双手插腰。说话时国骂不离口，本来没有骂人习惯的人为了显示自己已经不再温良恭俭让，也要在讲话时生硬地带出几句“他妈的”来。走起路来乍着胳膊，象一只只横行霸道的螃蟹。而远远望去又更

象一片专门啃噬绿叶的蝗虫。这是一股真正黄祸。它的肆虐虽然时间短暂，却在中华民族的近代史上写下了极其丑陋的一页。

红卫兵这个短命的怪胎一降生到这个世间就发出了两声惊世的怪叫：一声是“造反有理”；一声是“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

丑陋的口号

其实，第一个讲“造反有理”的是毛泽东本人。四十年代，毛泽东在延安各界庆祝斯大林寿辰的大会上发言，其中说道：“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对科学共产主义的这种抽象是否科学、严谨是值得推敲的,即使是面对陕北的庄稼汉。 二十年以后，在清华附中红卫兵语无伦次，逻辑混乱的三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大字报中，“造反有理”四个字被重新诠释。今天重读三论《造反》，其立论之荒谬，论据之牵强，论述之无理当不必说。值得探讨的是：文章的作者小小年纪，吃了十八九年的粮食，书只读到中学，事还没有作成一件，那里来的如此了得的傲慢与嚣张。他们贵为金枝玉叶，即没有人压迫他们，也没有人剥削他们，到底有何反可造？

解放初期，有人曾告戒干部子弟要以史为鉴，不要重蹈满清八旗子弟【20】的覆辙。这种告戒固然用心良苦。希望干部子弟不要堕落当无可指责。但这种期望是以认定干部子弟应当享有特权为前提的。事实上，这种特权从共和国建国的那一天起就一直存在着。在如何对待下一代的问题上，超越历史的局限性，摆脱几千年封建社会形成的帝业子承的世袭观念，代之以天赋人权、平等竞争的思想，在那个年代是一种奢望。干部子弟从小就意识到自己不同于平常百姓家的孩子。和八旗子弟一样，他们是特权阶层，是精神衙内。傲慢与偏见简直就是与生俱来。没有人敢于无视和怠慢这种骄狂。但是，“文革”的实践证明，这种骄狂导致的行为比起他们的沉沦和颓废给社会给国家所造成的后果要严重的多！干部子弟是共和国的同龄人中生活条件最优越，政治待遇最特殊的一个群体。社会对他们的娇惯养成了他们感情用事，为所欲为的性格。当“文革”来临之时，他们本来有条件凭借自己特殊的社会地位所获得的便利去准确地揣摸领袖的用心所在，去理解“这场运动的重点是整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句话浅显的内涵，从而避免在这场以打倒自己父辈为第一目的的“革命”中的充当冲当冲锋队的角色。然而他们只是凭借自己想象去理解甚至企图左右这场“史无前例的大革命”。他们带上红卫兵的红袖标，高喊“造反有理”的全部意图就是要借“文革”之机，向社会向人民索取更大更多的特权，使自己不但可以享有凌驾于同龄人而且享有凌驾于全体人民之上的权利和地位。毛泽东最大限度地利用了干部子弟的这种骄狂。因为这种以无知和任性为特征的桀骜不逊不可能逃出忠君思想和个人崇拜的阴影。

毛泽东发动文革的最大的阻力来自一个社会正常运作所必须具备的秩序和法统。按照党章和宪法所规定的领导人产生和废黜的程序，就无法打倒刘少奇和一大批党和国家的领导人。用贫民造反的模式可以置一切法规于不顾。

但是在的天下谁敢举旗造发呢？地富反坏右不敢，知识分子不敢，工人农民也不敢。历史选择了红卫兵。在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回信中，毛泽东肯定了“造反有理”的口号，使之成为“文革”中喊得最多，喊得最响的纲领性的口号。党纪国法，伦理道德在这个口号面前都显得苍白无力。从此，造反的祸水流遍全国，运动也从“有序”走向“无序”。

但是，中学红卫兵的失宠来得之快是连他们自己也意想不到的。《红旗》杂志十二期的评论员文章《红卫兵赞》中曾高喊“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红卫兵万岁！”，可是，从“八一八” 到《红旗》杂志第十三期社论【21】发表不足100天的时间,“小将们”就从辉煌的颠峰上滚落下来。少爷小姐们也曾为此闹得乌烟瘴气，鸡飞狗跳，可是“造反有理”的接力棒还是不得不交给贫民出身的，与“走资派”没有太多血缘关系的蒯大富和王大宾【22】之辈。然而，属于“老三届”的红卫兵在“文化大革命”中首喊“造反有理”的口号，自觉地为这场浩劫推波助澜的历史“功勋”，堪称丑陋之最，是应该被写入史书的。

丑陋的对联

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是现代血统论的代表作。虽然谭力夫【23】极力兜售此货，但是它的主要市场不是在大学，而是在中学校园。身为儿女，人皆有父母。对联的咄咄逼人在于没有人可以逃避，也没有人可以选择。

现在还无从考证是谁，也没有人出来表示自己应该享有对对联的发明权。但它是“老三届”的专利是不会有问题的。辛亥革命55年之后，如此荒唐的玩意儿在当时北京的每一所中学的校园里随处可见。封建主义的破烂货能够堂而皇之地登上社会主义正统思想的殿堂，究其根源，与中国没有经历过一个完整的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有关，与以“自来红”自称的干部子弟们在民主革命时期入党的爷娘头脑中还没有得到改造的农民意识有关。

解放以后，渗入社会生活每一个角落的阶级路线和以阶级斗争为大背景的社会教育深刻地影响了“老三届”。“文革”前夕，中学生之间已经没有友谊可言，人性的失落已见端倪。在很多学校已经出现“出身好”的同学自觉地，有组织地排斥、打击“出身不好”的同学的倾向。人为地挖掘阶级的鸿沟，人为地制造阶级斗争的对象。“文革”的到来，“对联”的出现，使上述情况恶性发展，最终演变成一场新种姓歧视的丑剧。

面对高悬的对联，非“红五类”（红五类是指革命干部，革命烈士，革命军人，工人和贫下中农）子弟的人格和尊严丧失殆尽。革命的诱惑与血统的卑贱在扭曲他们的人性。有一个女孩把社会对她的歧视转变成对母亲的仇恨，在对母亲拳打脚踢之后，勒令母亲跪在地上，用剪刀剪去了她的全部头发。笔者的一位“出身不好”的同学为了表明自己决心脱胎换骨的决心，不止一次地在对联的辩论会上狂喊：“我就是一个混蛋！” 行文至此，他那张无血色的小脸，不知所措的眼神又浮现在我的面前。我不敢想象他是如何缝合这精神的创伤的。耻辱莫过于精神的自残。“文革”的丑恶可见一斑。

对联的出现使青年人本应五光十色的理想被抽象为对革命的图腾崇拜，而本应以解放全人类为最高境界的革命被转变为对家庭出身的攀比和计较。有的学校高干子弟云集，红卫兵组织将革命干部的标准定为：行政级别13级以上，入党时间在38年以前的人。于是，有一大批本来可以在人前显贵的干部子弟硬是被推入“职员子弟”的行列被搞得灰头土脸。而那些根正苗红，将别人斥责为“狗崽子”的“自来红”们的好景也不长。最大的讽刺莫过于这些“自来红”们的迟钝使他们根本没有意识到，这场运动的矛头所向正是他们日夜引以为自豪的老爹。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才发现自己正在完成一个被自己的逻辑所认定的，由“好汉”向“混蛋”的转变。

“对联”问世不久，“老三届”中不是“混蛋”的人已廖若晨星，还真有点“池浅王八多”的味道。直到1966年10月，才因“对联”的荒谬实在是显而易见，才由当时的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24】出面讲了几句无关痛痒的话。但是，血统论一天也没有停止过毒化人们的生活。

遇罗克烈士【25】因反对“对联”，撰写《出身论》而惨遭杀害。他倒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枪口下，他的血溅在“老三届”的身上、手上。遇罗克是中国20世纪后50年中出现的最勇敢，最杰出的思想者。他的绝笔“干坤持重我头轻”一定会流传下去。但是他和他的诗不属于“老三届”。

今年是11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三中全会的深远意义随着时间的推移日益地为世人所认识。在纪念它的日子里，人们似乎忽略了三中全会作出的一个很重要的决定：摘去全部地主、富农份子的帽子，称他们为社会主义的劳动者。对与他们的子女来说，作一个不太恰当的比喻，这个决定犹如“解放黑奴”的宣言。他们终于可以挺起胸、抬起头和其他人一样在共和国的同一片蓝天下自由地唿吸。勒在上千万“剥削阶级”子女及其亲属头上出身不好的“紧箍咒”被摘掉了。以“出身”界定人的优与劣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

丑陋的作品

红卫兵不但有自己的口号也有自己的作品以表达自己的好恶。

32年前，红卫兵自己创作的以宣传造反精神为主题的歌曲简直多如牛毛。随着岁月的流逝，这些强音悍调也渐渐地被人遗忘。可是，有一首歌笨拙的旋律还经常出现在影视节目中。《造反歌》是“老三届”给历史留下的又一“杰作”。它的词曲作者不详，但它的“诞生地”应该是北大附中。

“拿起笔作刀枪，

集中火力打黑帮。

谁要敢说党不好，

马上叫他见阎王！”

所谓“黑帮”是1966年四，五月期间的《人民日报》对“三家村”【26】的称谓。后来被用来泛指所有被认为有必要被打倒的人。所谓“见阎王”就是夺人性命。不管“说党不好”的人讲得是否有道理，也不管是说党在某一个方面或是在某一个时期作过不好的事情还是说党在全局性的问题上有过不好的决策，总之，都要夺其性命。后来的事实证明，歌词中的誓言并不只是一种意愿的夸张表述，而是实际行动的写照。其实，这种危言耸听的提法并不是“老三届”的发明。“老三届”只不过是受到了林彪“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这种讲法的诱导，鹦鹉学舌罢了。在“老三届”长大成人的岁月里，法制教育是一个盲区。杀人夺命之事无需法律条文的认定，也不需要司法部门的核准，“文革”中他们就是这样作的。诗言志，歌也言志。无论艺术性还是思想性同父辈的《毕业歌》相比，《造反歌》是败笔。

中学红卫兵的思维走向和他们的价值取向多是通过大字报和自己办的报纸来表达的。他们贴出的大字报的数量是不可计数的，但是没有留下记录除了少数极端作品,如《三论造反》之类。而红卫兵办的报纸刊物虽然屈指可数，但保存下来的数量却很可观。一张大字报的出现往往与作者的个人在写作时的情绪有关而带有随机性，而报刊上的文章却要经过一群人的讨论比较能够反映一个群体的意志。出现在北京的红卫兵报纸有《湘江评论》《火星报》《莱茵报》【27】等。这些报纸除了顽固地、不厌其繁地贩卖“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的狗皮膏药之外，还有一个起喋喋不休的宣传主题，就是“镇压流氓”。红卫兵对流氓的关注始于红八月，而到了他们失势以后，向人民群众高喊一声“镇压流氓”也可以使自己心态趋于平衡。任何一位政治家，任何一个有理念的政治派别都不会把镇压流氓看作是政治斗争中的一件什么要紧的事情。更何况毛泽东。把“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镇压流氓”扯在一起实在是风马牛不相及。实际上，红卫兵心目中的所谓流氓是指那些家境贫困，上不起学而又没有固定工作的社会青年。红卫兵对这些本应得到社会救助和同情的同龄人倾注了极大的仇恨看似难以理解，其实也很正常。说到底还是血统论——那个社会的新种姓歧视在作怪。

提到红卫兵的刊物应该提一下1968年初出现在北京中学校园的油印刊物《准备》。《准备》与人大附中的红卫兵极端分子有关。北京红卫兵与“中央文革小组”的矛盾早在一年以前就显露出水火不相容的态势，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简称“联动”）是“文革”中出现的第一支反江青的的政治派别。但是，在读过《准备》的全部文字之后，就会感觉到这份与“联动”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的刊物的指导思想是混乱的。《准备》在它的创刊号上刊登了一篇记实性政治小说，它被放在首篇的位置，小说的标题也是《准备》。小说以康生等待毛泽东批准发表聂元梓的大字报，准备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背景素材。小说的作者以细腻的笔调描述了中央文革所在地——钓鱼台的景致,表明了作者的身份非同一般干部子弟，作者在小说中借康生的头脑所进行的思维和当时官方对搞“文革”的必要性的解释没有任何不同。小说用尽美好的辞藻把康生——“中央文革小组顾问”描绘成一位忧国忧民的，与领袖肝胆相照的旷世之才。小说是这样结束的：通向主席办公室的红色电话响了，他（小说一直没有

说出康生的名字）大步跨了过去，拿起电话说：“我是康生”。康生在“文革”初期通过他的老婆曹轶欧组织北大哲学系师生给校党委贴大字报以捞取政治资本的勾当在当时也不是什么新闻。康生，被外国人称为龙爪的人，在红卫兵的刊物上被喷涂，被神话恰恰说明红卫兵与“中央文革小组”的决裂只是利益集团之间的争斗，而不象有些人自吹的那样，是两种思想体系之间的对峙。

在“极右”的红卫兵思潮之后，“老三届”中浮现出来的“极左”思潮也同样没有挣脱“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的罗网。《一切为了“九大”》（上海）、《中国向何出去？》（湖南）、《论新思潮》（北京）、《今日向何方》（广西）等文章的出现表明，“老三届”中已经崭露出现国家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思想倾向，这个倾向的尽头就是无遮掩的法西斯主义。它的疯狂和歇斯底里使“中央文革”都感到恐惧。这种疯狂也被有些“老三届”自吹为反“文革”的先知先觉是没有一点道理的。这种自吹自擂尤其表现在最近国内外出现的一股研究“文革”异端思潮的热浪中，其作浪者的多数还是文革中的“老三届”。

丑陋的行为

红卫兵思潮的出现是一代人思想混乱的总爆发。而思想的混乱一定导致行为的疯狂。

“八一八”之夜，躁动的红卫兵为了报答领袖的召见之恩，为了实现建立功勋的梦想，他们迫不及待地向“旧世界”宣战了。数不清的事例证明，所谓“破四旧”【28】的锋芒所向是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化遗产。多少古迹被破坏，多少文物被焚毁。不肖子孙进行了一场名副其实的文化革命。这种行为不只是丑恶而是一种罪恶了。

在八月的红色恐怖中，人们闻到了浓浓的血腥味。残杀地富反坏右人员及其家属的事件每天都在发生。

北京六中位于中南海东侧、天安门西侧、人民大会堂南侧。在“红八月”中，六中红卫兵在校园里设立的“刑讯室” 曾恶名远扬。对“阶级敌人”捆绑吊打是家常便饭。甚至将滚烫的开水倒在一位76岁的老工人的身上，在老人的残叫声中红卫兵们和以魔鬼一样的嚎笑。

北京东安市场内的吉祥戏院也是历史的见证：鲜血染红了舞台，鲜血染红了幕布。舞台上上演杀人的活剧，舞台下爆发出嗜血者的欢唿。

首都红卫兵在大兴县向地富份子及其子弟举起了屠刀。被杀死的人，最年长的80岁高龄，最年幼的仅出生38天。被满门抄斩的有22户人家。

这种杀人的游戏，以“红八月”为始端，在不断升级的阶级斗争的大背景下愈演愈烈。广西省出现的“贫下中农最高法庭”公然提出“斩草除根一扫光”的口号，肆意杀戳“四类份子”和他们的后代；湖南省道县、邵阳县等地在光天化日之下集体屠杀地富及其子女。

打、砸、抢、抄家之风刮遍全国。中国社会的基本人权指数已接近零。住在在协和医院宿舍的一青年孕妇在“红八月”被抄家时同时被强奸，施暴者是革军子弟，年仅14岁。如果“文革”博物馆真的建立，应为“红八月”独辟一个展室，让后人不要忘记这即丑恶又凶恶的一幕。

如果说制造“红色恐怖”是少数极端分子的行为，那么对教师的人身和人格的侵犯则是“老三届”的群体行为。“老三届”在“文革”中最先攻击的对象就是曾在他们身上倾注了大量心血和厚爱的老师。学生对老师的侵犯是全方位的。辱骂，批斗，殴打几乎成了家常便饭。有些学校的“老三届”甚至将老师活活打死。例如，原北京师大女附中（现在的实验中学）的校长卞仲芸女士【29】就是在本校的操场上被一群十六七岁的女中学生活活打死的。这种学生将老师打死，逼死的现象在当时是很普遍的事情。许多经历过“文革”的老教师提起往事仍然不寒而颤。有人说“老三届”是用狼奶喂大的，这种比喻并不过份。十七年的阶级斗争教育，不断进行的对“人性论”的批判使“老三届”缺少爱心，崇尚兽性。一旦土壤适合，就会开出血淋淋的恶之花。遗憾的是，“文革”过去32年了，“老三届”中没有人出来认领和忏悔这一份罪恶，向老师们，向死者的家属，向全社会说一声对不起。这在道义上是讲不过去的！

1998年夏天，原师大女附中的一位“老三届”从美国斯坦福大学再次回到北京。和前几次一样，她是为在“文革”中被打死的中学老师而来。早在20年前，她曾去探望被她的同学打死的老校长的家属。她是唯一一位来探望死者家属的师大女附中的学生。10 多年前，她在《女性的野蛮》【30】一文中再次重提往事，作为围观者“我站在操场上，看着这一切。我什么也没有做。如果一个人对自己身边发生的罪过未加制止，那么就是罪恶的同谋——但是我在十年之后才学会了这句话”,这是来自老三届的第一声忏悔，只是声音太微弱了。卞校长的死和她没有任何关系，是什么东西驱使着她对自己发出如此强烈的自责呢？是一个人的没有泯灭的良知。说“老三届”是丑陋的，是因为在“老三届”中象这样良知未泯的人实在是太少了。

“老三届”是共和国的同龄人，历史却让他们遭遇了“文化大革命”。在回忆和共和国共同成长的经历时，往往使他们的内心产生阵阵的疼痛。他们不能忘却那如烟的往事，但在公开的场合却要回避使自己陷入窘境的话题。历史是不好随意涂抹的。“文革”中展现出来的也并不只是某些个人言和行的丑陋，而是全民族的弱势和劣根性。消灭这种弱势，铲除这种劣根性必须从每一个人作起。文过饰非不能根治民族的顽症。

四. 请做如是说

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代表人物。“老三届”也不例外。探寻这些代表人物的足迹可以窥见和理顺“老三届”思想的脉络。这些年来，偶尔也能读到一些他们回忆往事的文字。但是其中流露出来的忏悔之意不多，炫耀之意不少。最近，我曾从朋友手中得到陈永康（笔名：咏慷）先生的自传体小说《青春殇》。我抱着极大的兴趣，用十个小时，一口气读完全书。掩卷之时已是深夜。陈永康先生当年与刘少奇的女儿刘平平同为北京师大附中的学生，因

反对工作组名震京城，有“中学蒯大富”之美称（反工作组的蒯大富与刘少奇的大女儿刘涛同为清华大学的同学）。作者是当年政治旋涡中的人物，他曾因与“中国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女儿为政敌而中得“大彩”，今天他却没有采用回忆录的形式，直述当年的往事和今天对那段历史的在认识，而是采用了小说的形式，真真假假，虚虚实实，也许有他的难言之隐。而整部小说的文字，以《后记》中的表述最能概括作者对自己，对红卫兵运动和“老三届”的评价：

“他们虔诚地在信仰的祭坛前奋斗牺牲，坚韧地在灵魂的炼狱中忍受熬煎，向往献身，期待着历史的承认。他们火热的革命热情，对祖国前途，对人类命运‘舍我其谁’的高度责任感，恐怕会永远载入史册，另人感奋。”

“没有悲剧就没有悲壮，没有悲壮就没有崇高。”

应该坦率地承认，读到这样的文字，我失望了，深深地。

“文革”过去三十年了，写出这种的文字，能向历史交代吗？

不知陈永康先生当年的“战友”、现居美国的何芳芳女士对“文革”的认识停留在什么样的水平上？

我在猜测。

也许，再过一些年，能够看到以下曾经有着全国影响的“老三届”或者是他们的亲属写出的，有着较高境界的文字，一定会感到“非常有趣”（“老三届”，作家王小波的习惯用语）。而另一方面，又很有一些人，一以“成功者”最为典型，无视这些“代表人物”的历史存在，不承认这些“代表人物”的典型性思维和言行集中反映了那个年代“老三届”的世界观的基本轮廓，以证明自己在那场浩劫中做到了洁身无垢。这种辩白实在是多余。

这些代表人物是：

1965年撰写《获取5分的“秘诀”》，北大附中“老初三”的学生宫小吉；

1966年6月给党中央写信主动要求停课闹革命并自愿放弃高考的北京四中和北京女一中的部分“老高三”的学生；

1966年六月在清华附中贴出三论《无产阶级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大字报的卜大华，骆小海和王铭；

1966年8月18日代表北京红卫兵在天安门上讲话的，北大附中“老高一”学生彭小蒙（女）；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将其名字“彬彬”改为“要武”的，原师大女附中“老高三”学生宋彬彬（女）【31】

1966年9月组织起来的首都红卫兵西城纠察队首领，北京四中“老高三”学生孔丹；

1966年“八一八”之夜起草《向旧世界宣战的最后通牒》的，也曾代表首都红卫兵在天安门上讲话的，北京二中“老高三”学生冯晓新；

1967年春天，由“中央文革小组”批准成立的“北京中学生红卫兵代表大会”（简称“中学红代会”）领导成员：北京25中“老高三”学生李冬民，北京二中“老高三”学生刘龙江，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老高三” 学生陈永康，清华附中“老高三”学生刘刚（女）；

1967年在《四.三战报》创刊号上撰文《论新思潮》的作者（原良乡电校学生）

1967年秋天去内蒙牧区插队的“十男十女”；

1968年在湖南因撰写《中国向何出去》一文被判有期徒刑10年，原长沙一中“老初一”学生，现在居住在澳洲的杨曦光（现名杨小凯）；

“上山下乡”运动中的全国性标兵：孙立哲（北京），董良鬲（北京），丁爱迪（北京），朱克家（上海、中国第十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蔡立坚（北京，女，已故）；柴春泽（辽宁）【32】

1973年在招收“工农兵”大学生的考试中“交白卷”并力呈“知青”现状的张铁生（辽宁），

精神病患者，朦胧诗开山之作《相信未来》的作者，北京某中学学生郭路生；

原北京四中“老高三”学生，朦胧派诗人，现居住在美国的赵振开（笔名北岛）

1976年1月在《人民日报》发表长诗《理想之歌》的作者（北京大学中文系部分“工农兵”大学生）；

还有：

1966年在广州参加红卫兵，现居住在美国的王希哲；

196 6 年在“人民大学附中”参加红卫兵，现居住在美国的魏京生；

等等，等等。

五．结束语

有人曾用“青春方程式”【33】这种时髦的提法来涵盖“老三届”复杂的青年时代。如果一定要用数学语言来描述“老三届”心路历程的话，就应该这样来描述：

这个以时间为自变量，表征人生价值取向的函数不是一条连续曲线。它有着如此多的间断点而显得那样支离破碎。它有着那么多的拐点，表明它的走向盲目多变，前后不一致，尽显其价值观的浅薄和世俗。在它的全部定义域

内，只出现过一个绝对值看似辉煌的极大值，遗憾的是它却落在了负值区间，随之而来的是一个又一个的低谷。它不是一条递增曲线，随着岁月的流逝可以构造起一个另后人羡慕的人生，积累起比物质财富更具诱惑力的精神财富。在这个人生的坐标系中，彻悟是一条无形的渐近线。逼近它需要时间更需要勇气：时间用于思考和反省，勇气用于直面那不堪回首的过去。【34】

“老三届”这三个字本身散发出来的历史气息，已不需要在使用它的时候再对其进行任何修饰。这一代人的历史形象应该定格了。诸多已经被经过反复推敲后使用的定性句语，例如：“独特的一代”（乐黛云）【35】、“最具悲剧色彩，也最为尴尬的一代”（李辉）【36】、“在从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的进程中不可避免地成为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一代”（丁东）【37】、“在那邪恶与崇高交织时代中所成长起来的‘老三届’只有他们才在理想境界与创造魄力上与20年代知识分子相匹敌”【38】等等，都没有准确地定位历史上的老三届。选择“丑陋的老三届”这样一种清晰而简捷的提法是比较客观、比较恰如其份的，道理很简单，因为那个时代是丑陋的。

我曾将本文的初稿念给我刚上高中的儿子听。念罢，我问儿子作何感想。他沉思片刻，说：“是挺丑陋的。”

低调评价“老三届”就是要具体地，一点一滴地否定和批判“文化大革命”，为了使这民族的悲丑剧不要再重演。

1998年12月13日初稿

1999年 1月1日终搞

原载《黄河》1999年第二期

注释：

【1】 保尔·柯察金：前苏联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的主人 翁。

【2】 “工农兵”大学生：从1970年到1976年入学的大学生。他 们入学是由基层推荐而不比经 过试。

【3】 1969年7月21日美国“阿波罗”号在月球登陆。美国宇航员阿姆斯特朗等登上月球。

【4】 《理想之歌》：刊登在197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诗集《理想之歌》上。“批邓反击右 倾翻案风”时期又被1976 年1月25日的《人民日报》转载，作为回击“翻案风”的有力 武器，并加“编者按”全文如下：

“《理想之歌》是北京大学中文系部分工农兵学员一九七四年集体创作的政治抒情诗。它反映了广大 知识青年在上山下乡和教育革命中锻炼成长的精神风貌。在当前教育战线大辩论中，清华、北大等 院校的同志一再朗

诵、阅读这首朝气蓬勃、激情洋溢的诗。这说明，它符合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 大革命和教育革命胜利成果这一斗争需要。本报刊登这首诗，以供更多同志阅读，并用以回击教育 界右倾翻案风，批驳那种攻击工农兵学员‘质量低’之类的奇谈怪论。”

【5】 《雷峰之歌》： 贺敬之的长诗，发表与1964年。

《三门峡梳桩台》： 贺敬之的诗。发表与50年代后期。

【6】 《相信未来》：创作于1967年，作者郭路生。这首诗被认为“朦胧诗”的开山之作。

【7】 女一中高三（四）班的信刊登在1966年6月18日的《人民日报》上。

【8】 “十男十女”去内蒙牧区插队的消息刊登在1967年10月11日的《人民日报》第一版上， 标题是：“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走同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道路——北京一些革命小将 自愿到内蒙当普通社员”。

【9】 “走后门”：社会常用语。用于形容做事不经过正当渠道去 办，而是通过人情关系去完 成。

【10】 《中国知青梦》：是四川知青邓贤以云南知青生活为素材的长篇报告文学。

【11】 “张铁生”事件：在1973年招收第一届“工农兵”大学生的考场上，辽宁省“上山下乡” 知识青年张铁生在考卷上写下了一段乞求上学的文字。这一事件被“四人帮”大肆渲染。 刊登在1973年7月19日的《辽宁日报》上，后又被《人民日报》转载。

【12】 “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是指北京大学哲学系教师聂元梓 1966年5月25日在北大校园贴 出的攻击校党委的大字报。6月2日有毛泽东批准刊登在《人民日报》上。后来，毛泽东将其称为“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

【13】 “炮打司令部”是毛泽东1966年8月5日写下的一段文字。题目是《炮打司令部——我的 一张大字报》。其中例数刘少奇的所谓“罪状”，打倒刘少奇的决心尽显其中。全文如下：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啊！请同志们重读一遍这张 大字报和这个评论。可是，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资 产阶级反动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威风，灭无产阶级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到1962年的反右倾和 1964年的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省的吗？”

【14】 北京清华附中红卫兵：1966年5月29日清华附中的若干干部子弟在圆明园集会成立第一个红卫兵组织。

他们写的三论《造反》的文章和毛泽东写给他们的回信都被刊登在1966年第 11期《红旗》杂志上。

【15】《收租院》： 一组大型泥塑。以解放前四川大邑县地主刘文采的庄园内的收租院向农民收租的情景为素材，塑造了一群受压迫受剥削的穷苦农民的形象。

【16】《红岩》：罗广彬、杨益言的长篇小说，1962年出版。描写国民党特工人员残害、屠杀共 产党犯人的故事。

【17】“学习雷锋”运动： 1963年3月5号毛泽东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由此开始了学习雷 锋的运动。在这个运动中有两种潮流。一是倡导一种公而忘私、舍己为人的社会风气；而 另一种潮流是以林彪为代表的，提倡用实用主义的方法去学习毛泽东的着作。

【18】《获取五分的秘诀》：刊登在1965年六月的《中国青年》杂志上。

【19】“火炬之夜”：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当选德国总理。纳粹青年在柏林举行火炬游行。

【20】“八旗子弟”：满清皇族分为八旗。正黄旗、正蓝旗、正红旗、正白旗、镶黄旗、镶蓝旗、 镶红旗和镶白旗。他们的子弟统称“八旗子弟”。“八旗子弟”在建立满清王朝的过程中冲锋陷阵，功勋卓着。入关后，吃喝玩乐，沉溺酒色，一蹶不振。

【21】“红旗”杂志第十三期社论：1966年第十三期《红旗》杂志发表社论，提出要“批判资产 阶级反动路线”。表明刘少奇的地位已经岌岌可危。

【22】 蒯大富、王大宾：均为“文革”中北京的“五大学生领袖” 之一。

【23】 谭力夫“文革”中北京工业大学学生。曾发表过鼓吹血统论的讲话。

【24】 陈伯达讲话：1966年10月在中央召开的工作会议上所做的 《对两个月来文化大革命运动 的总结》。其中有谴责“对联”的言辞。

【25】 遇罗克： “文革”前毕业的高中毕业生。“文革”中撰写多篇反对“对联”的文章，最着 名的是《出身论》。1970年3 月5日被北京公安局军事管制委员会判处死刑。

【26】“三家村”：“四人帮”对邓拓、吴晗、廖沫沙的称谓。“文革”就是以对这三个人的迫害 而开始的。

【27】《湘江评论》《火星报》《莱茵报》：北京红卫兵的铅印报 纸。《湘江评论》出版于海淀 区，《火星报》和《莱茵报》出版于西城区和东城区。

【28】 “破四旧”：1966年8月18日北京二中红卫兵向社会散发、张贴《向旧世界宣战》的最后 通牒的传单，开始了席卷全国的“破四旧”运动。1966年8月26日的《人民日报》转载 这份传单。转载时，将原文中过分激烈的言辞删去了。“破四旧”是“破除旧思想、旧文 化、旧风俗和旧习惯 ”的简称。

【29】 卞仲芸：抗日战争时期在成都“燕京大学”读书时加入 外围组织。后奔赴解放区。“文 革”中以北京师大女附中校长的身份被本校学生野蛮毒打至死。其骨灰现存放八宝山革 命公墓的骨灰堂中。

【30】 《女性的野蛮》：散文集《女博士生手记》中的一篇，文章 记述了卞仲芸校长被残害的经 过。作者王友琴，“文革”中 是北京师大女附中的初中学生。

【31】 宋彬彬：1966年时，是师大女附中“老高三”的学生。“八一八”那天以首都红卫兵代表 的身份给毛泽东戴上“红卫兵”的袖标。并在1966年8月20日的《光明日报》撰文《我 给毛主席戴上了红袖章》（《人民日报》第二天全文转载）。 全文见附录。

【32】 孙立哲、董良鬲、丁爱迪、朱克家、蔡立坚、柴春泽：均为“上山下乡”运动中的全国性 标兵。他们的“事迹”均在《人民日报》上进行过宣传。

【33】 《青春方程式》：1995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知青回忆录。其中收录了50位北京女知 青的回忆文章。

【34】 “间断点”、“拐点”、“极大值”、“递增曲线”、“渐近线” 属于一元微积分“函 数”一章中的基本概念。

【35】 摘自乐黛云为《青春方程式》所写的“序”。

【36】 摘自李辉的《残缺的窗栏板》。

【37】 摘自丁冬的《与李辉书——对红卫兵、老三届的一些反思》。

【38】 摘自尤西林的《文革境况片段》。

华夏知青网不是赢利性的网站，所刊载作品只作网友交流之用
引用时请注明作者和出处，有版权问题请与版主联系
华夏知青网：http://www.hxzq.net/
华夏知青网络工作室

忍辱负重命运多艰的老三届不容否定

——兼评《丑陋的老三届》一文

读了刘双《丑陋的老三届》，心中愤懑之气难平。多年来，对文革、红卫兵、上山下乡知青、老三届的研讨评论连续不断，不同观点并存于世，理所当然。但是如此公然将棍子打到作为一个整体的老三届身上，却还前所未见。

论辩既开，我辈老三届自不能保持沉默，而要用历史事实和理性讨论，还真理于天下，还公道于自身，理直气壮地回应那些肤浅的否定和武断的骂杀。

《丑陋》一文逻辑混乱，论点失据，读者应已有领教。对于此文的基本观点，即彻底否定老三届，我坚决反对。不过我认为此文涉及了若干不容忽视的重要问题，比如：(1)对红卫兵运动的基本评价；(2)谁要对红卫兵运动负责；(3)如何评价“上山下乡”运动；(4)如何从整体上评价老三届等。这是我们作为历史亲历者和见证者不可回避、必须回答的问题。我个人的感觉是，自从我们从文革十年浩劫走出来以后，伴随着对这段历史的反思，这些问题就一直缠绕在我们的周围；而且时间越久，就越能感受到它的沉重。

以往，在我的潜意识里，总以为有朝一日会有历史学家社会学家政治领袖来为我们“作主”，做出某种历史评判的公论。现在忽然意识到，没有人会来给我们作主，我们必须自己来作评判。尽管我们老三届中，对这些问题也各有不同的观点，但认真的讨论总会给我们更多思考的空间，取得相对准确的答案。

对于上面提到的前三个问题，我想同一些知青朋友们一起，多作一些探讨研究，以后再作论述，至少可以对到目前为止各界所研究的成果作一番整理和归纳。

这里先就整体评价老三届，即《丑陋》一文的第一部分内容，作一初步评论。

（一）

“老三届”的概念实际上与“红卫兵”是截然不同的。人们比较经常把“老三届”同“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更

多地联系起来。在广义上，“老三届”甚至就是“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代名词，包括了六八年以后上山下乡的历届知青，因为老三届知青的命运同其后历届知青是完全相同息息相关的。

尽管按照《丑陋》的观点，红卫兵和知青都出自于老三届，老三届也因此必须承受挞伐，不过从历史事实出发，也从讨论问题的实际需要，把红卫兵同知青分开，并把“红卫兵”同“老三届”分开，都更有利于探讨和分析。

简而言之，不论红卫兵还是上山下乡，基本上都是领导人和当时路线政策的错误，作为参与者的绝大部分老三届，实际上是受害者。这方面暂按下不表，留待以后再谈。

老三届，(我指的是广义概念)是当今社会的中坚力量。他们(我们)命运多艰，如同一歌谣所唱：该长身体时----挨饿；该上学时----停课；该上班时----下乡；该养家时----下岗！我们因文革被迫中断了正常的教育，历经上山下乡的磨炼，政治运动风雨吹打，理想主义幻灭，在社会底层挣扎。当改革春风吹来的时候我们中的许多人已经永远失去了青春的活力。但是，如同中道兄几天前在其驳<丑陋>文中所说，老三届没有被接二连三的厄运压倒，反而顽强拼搏，努力学习，不少人成了中国各行各业的中流砥柱。中国当今所取得的每一项成就，几乎都是建立在以他们为主要牺牲对象的社会试验基础上。[注一]然而，老三届却不得不忍辱负重，继续他们的事业追求、家庭重担以及社会责任。

说忍辱负重，是因为一则政府不能提供足够的就业福利等保障，以至下岗等种种危机必须面对；二则社会舆论的不宽容，<丑陋>便是一例----他们不去批判造成老三届悲剧命运的根源，反而对整个老三届(实际上是对全体知青)横加指责；这是完全罔顾事实的，也是非常不公平的！

（二）

在《丑陋》的第一部分中，作者借“一位有着四十年教龄的中学教师”之口，称在其教过的所有学生中，老三届的孩子的综合素质是最差的，作者并进而推论这是因为老三届的整体素质最差。老三届中很多人没有上过大学，甚至连完整的中学教育也没能得到，这是事实，但仅仅因此就断言老三届的整体素质低下，“既低于他们的父辈，也不如他们的孩子们”，则完全不符合实际，也是根本经不起推敲的。首先作者自己的论述就是自相矛盾的，他先说老三届的孩子综合素质“最差”，又说老三届还“不如他们的孩子们”，那么到底谁比谁差呢？这位所谓的中学教师是在谈论什么话题下在什么样的前言后语中讲出此一“最差”之论，意欲何指，并不须追究。在我们自身，我们周围的社会中，即我们同辈人的子女中，根本没有看到没有发现这种“最差”。也就是说近十几年的社会现实中并没有什么事实或数据能证实这种“最差论”。如果“最差论”属实的话，那岂不是说此前十几年以及今后若干年

的大学生中学生都是不合格的了？事实并非如此，“最差论”差矣！我记得前几年社会上有过对“独生子女”素质分析的报道，但那与我们这里谈的是完全不同的范畴。完全有理由相信，<丑陋>的作者是借用了教育届人士对“独生子女”的分析性评价，自由发挥，匠心独运地推出他的“最差论”，以行否定老三届之私。

（三）

再看《丑陋》作者使用的数据。他说在1500万老三届中，七七、七八两年上了大学的只有10万人，比值为“1500比1”。这里他犯了一个简单的计算错误，这个比值应为150比1。我要进一步说明的是，这150比1，正是命运对老三届的无情打击；而我们的众多的老三届以及弟妹知青们，在因年龄、家庭等等不可抗违的缘故而无奈失去上大学机会以后，又在后来的各类业余高等教育中，顽强地争取机会获取知识，弥补命运给我们造成的缺失，数以百万计的老知青获得大专以上文凭，与那些上了正式大学的知青战友们一起，成为各行各业具有真才实学的工作业务骨干。这中间有多少是老三届，虽无具体数据，但几十万的估计数字应是合理的。接下去，<丑陋>作者用这个“1500比1”的比值，说这极少数的幸运儿感恩戴德，“国家欠下的中断文化教育的孽债被名正言顺地一笔勾销”；而这些幸运儿“对知识的渴求已不再是学习的第一目的”，“表现出来的是对获得一纸文凭的满足和对可以名正言顺地混入知识分子行列的窃窃之喜”。

如果说前边指出的是他的计算错误，那么这里他的叙述已经是完全不顾事实的胡说八道了。我们可以回顾七十年代末以来的历史，所谓“一笔勾销”是完全的无中生有；而老三届进入大学以后的刻苦用功，他们如饥似渴探求知识的出色表现早已被人们特别是大学教授们所津津乐道了。至于说《丑陋》作者抨击老三届因文化低，年龄大，“在各个领域里竞争无力”，而被社会淘汰，下岗，那简直是无异于栽赃。天有病，人知否？

（四）

我认为，关于老三届的综合素质，高新先生的分析是合乎实际，比较中肯的。他说，在长达十一年的时间里被强制剥夺了接受正常教育的权利，老三届这一代从整体上失去了在科技领域做出顶尖成绩的可能。但是由于在动乱中饱经社会底层生活的磨难和特殊经历锤炼，老三届在其它领域往往最见功力。老三届为文，最见生活功底；老三届经商，最懂处变不惊；老三届从政，最具竞争能力。[注二]

《丑陋》作者对老三届回顾青春年代的“青春无悔”颇有微词。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青春梦，即使是干过错事傻事的红卫兵们，也都有不同程度的痛悔和反醒。作为一个群体，老三届曾有过满腔的热情；如今回顾当年，青春无悔，何错之有？即使是对“青春无悔”的说法持反对态度的著名知青作家梁晓声，也还是很冷静地承认“艰难岁月使人坚强，这话是有一定道理的。而这一种坚强，对一个人的精神是有些益处的”，同时他也表示对上山下乡完全

是苦难的说法不表赞同。[注三]请问《丑陋》作者，难道一定要我们跪倒在某些居心叵测的人们面前，去污染和蹂躏那残存在我们内心深处的青春梦，去承受本不该由我们承受的历史重责吗？如果真是那样的话，天理何在？！

（五）

不是结束的结语。《丑陋》作者以一女孩的“丑陋”评语开始，移花接木到老三届的“丑陋”，每个读者都可看出其指鹿为马的用意。而在“结束语”部分，该作者重施故伎，称他将其稿念给刚上高中的儿子听(顺注：不知其子“综合素质”优劣？)，其子评说：“是挺丑陋的。”该作者没有注意到，他的这一得意之笔恰恰露出了破绽-----到底是什么“是挺丑陋的”呢？是他的这篇大作吗？

2000。8。31于洛杉矶

丑陋的老三届

作者：刘双

来源：新浪网 文化历史论坛 原载《黄河》1999年第二期

去年的夏天，一群“老三届”在某歌厅聚会。一好事者将聚会录影。之后，这盘录影带就在与会者中间流传。某女士和她的女儿在家中一起看这盘录影带。没看几分钟，女儿就发表了结论性的评论：“这群人怎么一个儿一个儿的都那么丑陋呀。”此话传入笔者耳中，沉思多日，故写此文。

一．“老三届”的基本评价

“老三届”是指1966年“文革”爆发时在校的三届高中学生和三届初中学生。其中年龄最大的是66届的高三毕业生，俗称“老高三”。“文革”风雨袭来之时，他们正逢高考即将来临之际。如果那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晚三个月发动，“老高三”中的佼佼者将会跨入高等院校的大门。一场风雨，十年光阴，人生的道路由此转向。“老三届”中年纪最小的是68届初中毕业生。他们于1965年跨入中学校门，1966年6月停课时年仅14岁，尚未读完初中一年级的全部课程。“文革”中，他们在荒废了两年的学业之后，也头戴“知识青年”的桂冠被送上了南下北上的列车。

“文化大革命”至今已有32年。“老三届”中大的已年过半百，小的也有四十六七。在当今少男少女的眼中焉能不老，焉能不丑呢？其实，“老三届”们自己在相互审视时也会有同感。几年前，一男“老三届”曾约会一女“老三届”，想重温一次少年时代的同桌梦。男人留给女人的印象如何不得而知，而那女人衰老的容颜着实让那男人伤感了许久。

世间万物由鲜活走向衰败是一件再自然不过的事了。保尔．柯察金【1】的那段名言曾经激励过多少“老三届”。一个人在回首往事的时候，只要自觉没有碌碌无为，虚度年华就不会懊悔。作为一个普通人，在回首花季之时，能够在记忆的长河中采到一朵浪花，让它闪现出往日的明媚和鲜艳就可以自慰平生了。而“老三届”却真的难说曾经拥有过真正意义上的，属于自己的，浪漫无邪的青春时代。“老三届”的青春时代是在红卫兵运动和“上山下乡”运动中度过的。“胡为”、“无为”、“虚度”、“懊悔”应该成为“老三届”人生回忆录中的关键词。

80年代初，“老三届”陆续从农村返城之后，作为一个共命运的社会群体已不复存在。他们消融在社会的各个阶层和社会的各行各业之中。二十年又过去了，“老三届”已经成为一种历史现象。“老三届”的故事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文学作品和影视节目中。“老三届”自己的回忆文章也一年比一年多。艺术的再创作，失真的回忆和人为的粉饰把历史上的“老三届”搞得面目全非。不断深化的对“文革”的否定的认识应该导致对“老三届”历史形象的重新复位。

一位有着四十年教龄的中学老教师曾经在一次家长会上说过，在她教过的所有学生中，“老三届”孩子的综合素质是最差的。这位老师谈的是她的学生，但她无意中涉及了孩子们的家长——“老三届”的整体素质的评价这样一个敏感的话题。直率地讲，就整体而言，“老三届”是一个不但没有接受过高等教育，其大多数也没有接受过完整的中等教育的一个群体。这一代人的群体素质低于他们的父辈，也不如他们的孩子们。在“文革”中，虽然有一些人也去上过三两年“工农兵”大学【2】，可是，那种被“四人帮”推崇的“革命化”大学在文化教育方面的“含金量”之低是众所周知的。在1977年，1978年类似安慰赛的高考中，“老三届”中的一些幸运儿也曾金榜提名得到深造的机会，他们激动的心情不亚于农民土改期间分到土地时的感激之情，是可以理解的。有数字统计77级、78级入学新生为67万人。而这67万人中有多少“老三届”呢？最乐观的估计不会超过10万人。而“老三届”的总人数大约为一千五百万人。这1500比1的比值说明，77、78年的高考确实改变了极少数幸运儿的命运，也将国家的教育体制引入正轨。但是，正是在这种所谓的“平等竞争”的考试游戏中，在中榜举子的感恩戴德声中，国家欠下的中断文化教育的孽债被名正言顺地一笔勾销了。而在那些为数可怜的幸运儿中，对知识的渴求已不再是学习的第一目的，人数不乏地表现出来的是对获得一纸文凭的满足和对可以名正言顺地混入知识分子行列的窃窃之喜。而那些浪迹江湖十年之久，把上学读书作为进入官场的敲门砖的人确也不在少数。即使有个别人经过个人努力，事有所成，但绝对改变不了“老三届”作为一代人由于文化水平偏低，而年龄又相对偏大，在各个领域里竞争无力，即将过早地被社会淘汰的必然命运。在最近几年的下岗大潮中，“老三届”已是首当其冲。

二．丑陋的“上山下乡”运动

丑陋的青春多年以前，有一群“老三届”在北京搞过一个以“上山下乡”为背景，以北大荒农垦生活为素材的摄影展。影展好象唤做“魂系黑土地”，主题辞是“青春无悔”之类字眼。（注意：计算机只能从硬盘字库中调出“芜秽”“污秽”“误会”等词组。“无”“悔”两字只能分别输入）但是，一个思维健全，心态正常的人看过影展后都不会留下美好、健康的印象。照片上的人多是蓬头垢面，龟头鼠脸，神情和目光都很呆滞。要么做傻笑相，不知其所笑何谓；要么做英雄相，不知其意欲何为。他们的服饰也无款式可言，男女皆宜，中性的很。照片上作为背景的景和物多是一些驴棚，马圈，土坯房和高粱地什么的。不知影展的举办人想向来观者展示和说明些什么？这两年，这类照片又被汇集成册，以《老照片》的形式炫耀于世。那样的生活值得炫耀吗？1969年夏天，人类的使者在全人类的目光的注视下登上了月球【3】。他缓缓地转过身来，用惊异的目光眺望人类的故乡———太阳系中一个唯一的，蔚蓝色的星球。它浮动在冥冥的黑暗之中，向漫漫的，寒冷的宇宙发出挚爱的光和热。在这全世界都意识到“科技凌驾于一切的时刻”，中国的“老三届”们被剥夺了学习科学文化知识的权利，正在把自己可贵的，属于自己只有一次的青春无奈地抛洒在荒原和山坳之中。今天，还会有人去崇尚和再现这种丑陋的青春模式吗？

别人如何评价“上山下乡”运动是一个旁观者的权利。“老三届”自己对“上山下乡”运动给自己和国家带来的无可弥补的损失应该有一个清醒的认识了。

“上山下乡”运动是应该全盘否定，彻底否定的！这并不是一个具有多么高深的理论而需要研讨的命题。“四人帮”倒台之后，国家默许千百万以“老三届”为主体的“知识青年”以高考、病退，困退等各种借口倒流城市，并停止强迫初中和高中毕业生去“上山下乡”的做法，以及在改革开放以后开始的，持续了20年的，恰恰是与“上山下乡”逆向的“打工潮”都从实践上否定了“上山下乡”运动。

有一点常识的人都知道，工业人口与农业人口的比值，城市人口和乡村人口的比值是标志一个国家工业化程度和现代化程度的一个重要的参数。如果一个国家的农村人口绝对地大于城市人口时，这个国家是无现代文明可言的。“上山下乡”运动人为地将本来在全民总数中就占少数的城市居民驱赶到农村，将发展工业所必须具备的预备人员强制性地转为务农人员。这种国策是与社会发展的大趋势是相违抗的。是一种倒退。

“消灭三大差别！”是“上山下乡”运动中被喊得最响的口号。以“上山下乡”为手段去减少城市人口以消灭城乡差别；以减少脑力劳动人员的数量去消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差别的做法是农业乌托邦主义在20世纪最荒诞的实践，其后果只能是社会的蜕变。拉大与世界先进国家的差距。

“与工农相结合！”也是一个被喊得震天价响的口号。纯粹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认为工人阶级是代表最先进的生产力的一个阶级。而农民落后，自私，目光短浅。为什么不留在城市里去和工人阶级相结合或者干脆让自己就成为工人阶级的一员，而要去农村和一个相对落后的阶级相结合呢？实践和理论是自相矛盾的，它只能用来骗人，根本不能自圆其说的。

20多年以前，有人写过一首歌颂“文革”，赞美“上山下乡”运动的无耻长诗《理想之歌》【4】。1976年1月它作为回击“右倾翻案风”的炮弹，被刊登在《人民日报》上，想是得到了姚文元的赏识和认同。据说此诗也是出自“老三届”之手。受到了一点贺敬之诗歌风格的影响，诗人的创作更象是在模仿。虽同属奉命文学，但它却少了些《雷锋之歌》的神韵，也不如《三门峡梳妆台》【5】来得流畅。红卫兵文字的影响更是流露在字里行间，可又缺了点儿红卫兵文字中固有的傲气与霸气。总之很蹩脚，不伦不类的，象个四不象。诗中赞美理想的声音就象是痴人说梦，在当时就为很多人所不齿。它和后来成为一位精神病患者的另一位“老三届”当年写下的朦胧诗的开山之作《相信未来》【6】相比，显得那么冗长，那么做作，那么另人厌恶。

有人说“上山下乡”运动是毛泽东“这位气质浪漫的领袖在中南海的书房里构思了称之为‘再教育’的革命性创举”。但是，认真考察“上山下乡”运动发生的时代背景，其决策的动因中到底有多少理想主义的成份是十分值得商榷的。

丑陋的动因在“文革”中，因党内政治斗争的需要，无理中断国民文化教育和开展“上山下乡”运动是一件事情的互为因果的两个阶段。

1949年以后，政治运动不断。而全国范围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且和学生有牵涉的只有两次：一次是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一次就是“文化大革命”。五七年的反右斗争中有55万人被打成右派，但运动没有在中学生中进行，那实在是不幸中的一件幸事。而“文革”到来之时，中学生就在劫难逃了，千百万“老三届”成为这场斗争的殉葬品。

“文化大革命”的冲击波一开始就波及到中学。失控的校园再也听不到朗朗的读书声。在即的1966年夏季的初考、中考和高考一律被取消。此恶端一开，中学的停课状态持续了多年，全国高等院校被关闭达11年之久。（如果以招收“工农兵”大学生为限，高等院校被关闭的时间也有七年之久）荒废学业的中学生何止千百万。

废科举，办学校是中国人在本世纪初作出的全民族的选择。从梁启超、严复倡办京师大学堂为起点，无论天灾人祸如何惨烈，作为立国之本的国民文化教育就从来没有中断过。就是在决定民族存亡的八年抗日战争时期，国民的文化教育也没有间断。以西南联大为代表的流亡大学为中华民族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栋梁之材。“文革”在这个层面上的确名副其实地成为民国以来最黑暗的年代。子不教，父之过。民不教，谁之罪？今天，“文革”中断教育的后果早已显现出来了。除了官场和商场，几乎各种行业都存在着人才的断层现象，其中，科技、教育领域的这种

危机尤为明显。当“文革”前毕业的大学生开始逐年成批地退休，离开科研，教育第一线的时候，作为一代人，“老三届”不能挑起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历史重担。历史也不得不无情地跨过“老三届”，把希望的目光投向更年轻的一代。在全民高唱“科教兴国”的今天，应该清一清这没有偿还的历史的旧帐。

文化教育停止了。但中国人的生育没有停止，婴儿们仍在出生，孩子们还在长大。“文革”搞了两年，形势虽然“不是小好而是大好”，但是一个极为严峻的社会问题日益紧迫地摆在中国领导人的面前：1966年“文革”开始时，五、六、七岁的孩子已经长到七、八、九岁，还迟迟不能跨入小学的校门。而“文革”开始时的在校的六届小学生也停课两年，仍被滞留在小学校园内。其中后来被称为69届、70届和71届初中毕业生的孩子们也由于国家教育体系的崩溃一直无法完成小学的全部学业和正常地升入初中。让三届，上千万适龄和超龄儿童同时进入小学校园的前提是：必须保证滞留在小学的三届高年级学生要同时离开校园。理由很简单：小学的校园和校舍是有限的，不可能容纳如此之多的学生。同样的问题也存在于中学。而“老三届”的运气就没有那么好了。当69届，70届和71届的小弟弟和小妹妹们向潮水般地涌进中学校门的时候，“老三届”的学生却不能按照上述模式处理，顺理成章地升入高中和大学。当时的大学正在进行“斗，批，改”，伟大领袖还没有下“理工科大学还是要办的”决心。而取缔文科大学好象势在必行。既然是这样，“老三届”便处在一个下端挤压，上端封盖的尴尬境地。他们就象多余的环节注定要从社会的链条中被摘除去了。带着一颗精神世界一贫如洗的头脑和一个没有完全发育成熟而显单薄的身体，过早地离开校园，被抛向社会。如何处置“老三届”呢？让他们在城里就业上班吗？正在进行着的“文化大革命”扰得各行各业不能正常运作，很多企业都处在开工不足和停工状态，根本不可能“消化”如此之多的初，高中毕业生。可供“老三届”走的路只有一条：离开城市。

当“老三届”响应“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号召，放下书本，离开书桌，走出教室时候，他们是义无返顾、责无旁贷的。甚至他们中的很多人到今天也解释不清楚当年他们投入那么巨大的热情去承担的义务和责任到底是什么东西。历史没有嘉奖他们的无私，而是冷漠地嘲讽了他们的无知。他们的无知甚至使他们无从察觉自己已经被淘汰出局。与以往的右派下乡劳动改造不同：右派们在运动后期被赶向农村的时候，头上都带着刻有A字的政治帽子，而“老三届”被送往农村的时候却身披“知识青年”的圣袍如同皇帝的新装。当他们象废弃物一样被扔到垃圾堆里去的时候，他们还坚信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丑陋的“自觉者”“老三届”不愧是共和国的同龄人。他们中的杰出人物总能够在历史的关键时刻自觉地涌现出来，想党之所想，急领袖之所急。只用“哗众取宠”四个字来解释他们的所作所为也不尽然。这是教育的结果。说得玄乎一点，这也可以算作是政治上的心灵感应吧。用正统语言来描述，这是有党性的表现。

1966年6月初，“文革”热浪已经波及到了平静的中学校园。“老三届”被滚烫的政治气候熏烤得坐立不安。参与意识，表现意识已经成为一种自觉意识。6月13日党中央和国务院发出通知，说为了彻底搞好文化大革命、彻

底改革教育制度，决定当年的高校招生工作推迟半年进行，因为需要有一定的时间来研究和制订新的招生办法。6月18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刊登中央和国务院的通知的同时转发北京女一中高三（四）班的同学以班集体的名义给党中央毛主席写的信【7】，她们在信中强烈要求停课闹革命，并自愿放弃已经迫近的高考。她们将高考与封建社会的科举制度相提并论，高呼要砸烂旧的升学制度。北京四中高三（五）班同学致毛主席的信和写给全北京市师生的倡议书也同时被刊登在那一天的《人民日报》上，他们用更狂热的语言表达了“立即废除高等学校入学考试制度”的愿望，并发誓：“誓作社会主义的工农兵，决不当资产阶级的大学生”。几乎与此同时，全国各地的“老高三”中都出现了类似的言行。上海61中高三（三）班的同学贴出大字报，长沙一中高三（三）班团支部致信团中央，他们都在控诉旧升学制度的罪恶，都要求取缔旧的升学考试制度。取消高考，中断国民教育这样伤天害理的事情是不便由国家出面直接倡导的。打民意牌，可以把少数高中生由于头脑发昏表达出的非理性的愿望强加在几十万“老高三”毕业生的头上。本文作者并不想过多地指责当年写信的同学，他们也负不起误人子弟，危害国家的责任。他们舍弃了自己桃李芬芳，欢歌一堂的时光，就以为担负起了天下的兴亡；他们过早地、盲目地进行了选择，可扑面而来的却是不断增长着的民族内耗的滔天浊浪。实际上，有没有这样一些信出现，“老三届”的结局都是一样的，一场摧枝落蕾的桃李劫是注定要降临的。应该反省的是：“老三届”作为一代人，在被剥夺学习文化知识的基本权利的历史性时刻，表现出来的是一种整体性的麻木。虽然个别人有一些反应，也不过是不健全的政治神经的抽搐而已。这是社会的文化虚无主义在“老三届”身上结出的，必须由“老三届”自己来吞咽的恶果。

教育停止了，学而优则仕的道路被堵死了。混混噩噩噩的初中生整天陶醉于革命和造反，废寝忘食地忙碌着。而高中生，尤其是年龄已过20岁的“老高三”的学生已经开始考虑人生的走向。选择的余地很小，绝大多数人对未来感到渺茫。但是，也有极少数“冷静者”在那昏热的年代，凭借青年人不应有的社会经验和政治敏感为自己找到了一条曲线迁升的道路。

1967年的秋天，中学的“文革”还在轰轰烈烈地进行着。“老三届”的去留问题尚未提到日程上来。北京的“老三届”中有“十男十女”（“老高三”的居多）【8】不知是因为想逃离政治斗争的旋涡还是想寻找新的兴奋点，在天安门广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前庄严誓师，然后奔赴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内蒙古大草原扎根落户。这“十男十女”颇具浪漫主义的举动如同前文提到的女一中高三（4）班的那封信一样，引起国家的高层的注意，舆论工具广为宣传，一时风头出劲出尽。他们的举动为高层处置“老三届”提供了一条新思路。一年以后，1968年12月22日伟大领袖终于发出了“上山下乡”的号令。与那先知先觉的“十男十女”自愿去草原的情况不同，“上山下乡”从此成为一项强制性的政策。

当年火车站送别的歌声、喊声和哭声早已飘散。落户农村的千千万万的“知识青年”也早已作鸟兽散。那“十男十女”可能是最先卷铺盖卷返城的一伙人。当年的“模范带头”作用早已成为他们仕途上的一块垫脚石。“坚决同贫下中农相结合，永远扎根农村边疆！”的誓言象一声响亮的臭屁，放过之后就无声无味了。和许多“模范知

青”（比如蔡立坚）相比,他们的誓言要廉价的多。70年代末期，“老三届”的返城大潮逆不可转，历经十年的“上山下乡”运动终于落潮了。却有近百名有全国影响的“知青”联名发出了“坚决扎根农村六十年”的最后一声狂吠，理念之迷乱，时务之不识，冥顽之不化已达到丧心病狂的程度。中国是一个无神论占统治地位的国度。发誓很随便，背叛自己的誓言也很随便。谁也不会因不遵守自己的誓言而遭报应。但是，有一点却是肯定的，在这种善于政治投机的人的灵魂深处总有一块阴暗的地方，阳光照射不到，只好一直糜烂下去了。

丑陋的实践1965年9月25日的《中国青年报》说，从1955年到1965年的十年间，全国有一百万知识青年落户农村。十年以后，1975年12月23日的《人民日报》头版头条，以“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辉煌胜利文化大革命的丰硕成果”为标题，向世人宣布：自1968年毛主席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伟大号召以来，七年的时间里已有“一千二百万知识青年光荣务农”。“文革”前后，全国平均每年下乡的“知识青年”人数从十万激增到一百七十万。在造成这种大规模地将城市青年驱赶到农村去的诸多原因中有三条是起决定性作用的：教育事业的停滞甚至倒退；工业发展的相对缓慢；解放以后无节制地被生育出来的人即“老三届”及其弟妹进入了被迫就业的年龄段。

“上山下乡”运动起源于50年代中期。作为一种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它兴起在60年代初期。“文革”前夕“上山下乡”政策带来的社会弊病已经显露出来。老一代的“知青”为了自己的生存权向社会作出过强烈的反应。“文化大革命”的极左思潮的影响和“老三届”在“上山下乡”运动面前表现出来的愚昧，尤其是国家制定的铁打的“上山下乡”政策使得“老知青”用青春和血汗换来的教训和全部争取人权的努力付之东流。

然而，在“上山下乡”运动的十年中，“知识青年”始终是社会的一个不安定因素。而这种不安定首先来自“知识青年”的内心。许多“知青”的回忆录中连这一个最基本的事实都不敢承认。虚伪是“老三届”群体品格中最显著的品德之一，由此可见。正象“文革”以前，很多“老三届”背上粪桶去掏粪，恶心的回家后连饭都吃不下去，可是却在入党，入团申请书上大谈特谈自己的心灵是怎样被屎尿之液洗净了一样。

虽然“知识青年”的文化程度和广大的农民极其子弟相差无几，可是，一种因为自己是来自城市而产生的优越感使他们的绝大多数从内心深处看不起农民，也看不起农民的孩子们。就是那些挣扎在贫困线上的城市贫民的子弟在农民面前也有一种莫名其妙的优越感。这种优越感在三十年后“老三届”撰写的“上山下乡”回忆录中随处可见，虽然他们也承认得到过来自农民的厚爱。“老三届”和更老一代的回乡“知识青年”例如邢燕子，董加耕相比，缺少的是朴实与忠厚以及对乡亲对土地的那种梦牵魂绕的乡情。异化了的革命理想使他们的情感漂浮在半空中，无法升华又不甘沉落。春天，他们虽然和农民一起在田间播种，秋天，却不能在和农民一道收获时同时收获喜悦。秋天是他们返回城市的季节。他们将在无聊和空虚中度过一个漫长的，城市的冬天。把自己失落的脚印留在城市阴冷的街道上，把自己迷茫的身影留在城市人怜悯的目光中。当春天再一次降临的时候，他们只好又无奈地回到农村。年复一年，他们象“边缘人”一样游荡在城市和乡间。那种心不守舍，身魂两地的精神状态曾经那么痛苦地

折磨过千千万万的“知识青年”。那种感觉应该是刻骨铭心的。但是，在许多“老三届”写的“上山下乡”回忆录中，这种落魄的感觉没有被记录下来。

想方设法离开农村，改变自己“知青”身份的活动是和“上山下乡”运动几乎同步进行着的。每一个有“知青”成员的家庭都在利用各种社会关系把自己的孩子调离农村。如果有人愿意考证一下“走后门”【9】一词产生的时代背景，就会发现它与“上山下乡”运动是密不可分的。权利对于看似平等的“知青”大军的瓦解作用从来就没有停止过。

在十年“上山下乡”运动中，千千万万“知识青年”自发和自觉作的一件共同的事情就是抗拒被农民的同化和不惜一切代价返回城市。每逢升学，农转工，调干的机会，他们就会不择手段：女的不惜出卖色相，男的不惜以死相要挟。他们希望离开农村和农场不仅仅是因为那里有着太多的贫困和太多的愚昧，基层的恶势力无时无刻不在啃噬着他们的青春。邓贤的长篇报告文学《中国知青梦》【10】向人们再现了中国知青族被欺骗、被强奸、被虐待的生活场景，还原了一个绝望、混噩、丑陋的群体形象。而在更多的“知青”回忆录中，这丑陋的一切被掩饰的无影无踪。这种少数人的掩饰比起大多数人的沉默要可恶的多！是从肯定的意义上，把历史悲剧幻化为正剧；还是在否定的意义上，把历史的真相化为一场人生的悲剧，这是必须正视的。

发生在1973年的“张铁生事件”【11】已逐渐被世人淡忘。但是，在几乎每一本“老三届”编写的以歌颂“上山下乡”运动为主题思想的“知青”回忆录中都可以找到指责张铁生的文字，内容也如出一辙，说，要不是张铁生，自己就可以上大学了。云云。今天，回首往事，应该为张铁生说句公道话：他何罪之有？为什么不去谴责无理中断全民文化教育的决策者，而要嘲笑张铁生是“白卷先生”？为什么不去控诉将整整一代应该在学校读书的青年人驱赶到农村边疆的作法，而要指责张铁生是一个“大学迷”？张铁生是“老初三”的学生，他没有上过高中，初中毕业后，搞了两年“革命”就去农村劳动，一干就是五年，文化考试考成那个德性是再正常不过的了（物理和化学两门只得了6分，数学61分，语文38分）。如果用那套卷子在1973年对67届、68届、69届和70届的初中毕业生进行全国同试，多数人还考不到张铁生这个水平，“白卷”大军不会少于一千万！几乎所有的“老三届”都读过高玉宝的《我要读书》。但是，当他们被剥夺了读书的权利的时候，却没有人站出来为自己，为自己所属的一代人进行抗争，绝大多数人都保持沉默。倒是张铁生以他特殊的方式，用他的“答卷”向社会，向统治者发出了“我要读书”的乞求声。其相虽丑，其声也悲呀。

纪念丑陋前两天从报纸上看到一则新闻：为了纪念“上山下乡”运动30周年，某公司准备发行金卡，数量三万枚。虽然没有消息证明有“老三届”参与了这件事情。可除了“老三届”还有谁会如此热衷与这件事情呢。

凡是发生在历史上的，值得后人纪念的事情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因为它的出现推动了社会的进步；一种是因为它的出现阻碍了社会的进步。

“五．四”运动对科学和民主的呼唤是本世纪中国青年最值得骄傲和最值得纪念的创为。而“上山下乡”运动虽然涉及的人有上千万，持续的时间达十年之久，但是，它背离了“五·四”精神，没有给中国带来丝毫的社会进步。有些自己感觉混得不错的“老三届”总是在不同的场合，用不同的方式粉饰“上山下乡”运动，以证明自己的青春没有虚度。他们有意或无意地虚构了一个可以欺骗自己孩子们的神话，一个中国拓荒者的神话。但是，从黑龙江的北大荒到云南的西双版纳；从陕北的黄土高原到内蒙古的大草原，“老三届”没有开发出一处“辉煌的西部”，他们留下的只是一片片枯萎的橡胶林和因过份砍伐树木形成的一座座光秃的山岭，和被他们遗弃的，已经长大成人并和当地人没有任何区别的亲骨肉，还有那至今都难以启齿的羞辱和痛苦。“上山下乡”运动是十年浩劫的副产品。是“文革”这部反文化，反文明的大合唱中的一个不可分割的一个声部。“文革”是国耻。国家之耻，国人之耻。“上山下乡”运动则是中国青年的耻辱。如果一定要纪念的话，那就应该只是为了这曾经发生在共和国青年人身上的悲丑剧永不重演。

三．丑陋的红卫兵运动

“文化大革命”被否定了。几乎所有的人都在控诉文革的罪恶。好象在那场持续了十年的浩劫中只有四个人在作坏事，而其余十亿减四的人都是受害者，都是无辜的，清白的。于是历史上的“文革”失去了载体。但是，如果这个载体确实不曾存在的话，“文革”就根本不可能发生和发展。对“文革”的反省应该是全民族的。即包括执政党也包括老百姓。“老三届”是共和国的同龄人，历史却没有善待他们，他们也没有善待历史。“老三届”在“文革”中有被欺骗和利用的一面，但是，主动迎合，积极参与却是一个基本的历史事实。

看过电影《淮海战役》的人都会记得毛泽东有这样一段台词：“60万比80万（解放军和‘国军’人数之比）……这是在赌国家的命运，赌民族的命运。‘啪’的一下押上去，就是那么一回事。”在解放战争中，他老人家是胜利者，是赢家。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手中的“赌资”是什么？最大的“赌资”当然是他在老百姓心中早已形成的，如日中天的崇高威望。但是，仅此一注是不够的。无论输赢，在各类码子中，有一注是注定要输进去的，这就是“老三届”——他们的青春和前程。

丑陋的革命“文化大革命”的毒焰首先是在大学校园被点燃的。但是，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打压下，“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12】发表后形成的轰轰烈烈的局面，很快变得冷冷清清。于是，毛泽东走出滴水洞，在畅游了长江，回到北京之后，他作了两件一反常态，惊骇全党的事情。一是写下了《炮打司令部》【13】的大字报，向全党公开了他要打倒刘少奇的决心。一是亲笔给清华附中红卫兵【14】写回信，表明他老人家已经找到了一种让政敌和同盟者都意想不到的社会力量。这种力量可以由他任意号令，招之即来，挥之则去，功无不克，战无不胜。将中学生推向政治斗争的最前沿确实有着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的效用。

中学生的年龄是从13岁到19岁。这是一个从身体发育到心理发育都尚未达到成熟的年龄段。青春的躁动、是非的无断、理念的易变，再加上抖擞的精神和旺盛的精力都表明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年龄段。教育学和心理学都认为，中学生是需要特别加以引导和训教的一群。英文中有一个特指处在这样年龄段的人的专用名词：teenager。它是由teen和age复合而成。可是，它决不是一个简单的复合名词，只在表怔处在该年龄段的青年的年龄特征。更深层的内容在于涵指这个年龄段的人在教唆和误导的情况下，他们的行为往往具有一种反复无常、丧失理性的倾向，因而是极端危险的。文革中的“老三届”正是这样一个群体。

历史对“老三届”的选择看似偶然，但也有其历史的必然性。

建国十七年以来，以革命传统和阶级斗争为大背景的社会教育培育了“老三届”以仇恨为底色的社会情感，“文化大革命”中，为了这种情感的宣泄中国人付出了血的代价。五七年以后，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批判和斗争愈演愈烈，全社会形成了一种对文化虚无主义的普遍认同。这种反文化的倾向对“老三届”影响是极为可怕的：中国的传统文化是封建主义的；西方的文化无论是古典的还是现代的都是资产阶级的；五十年代还可以接受的前苏联和东欧的文化到了六十年代也成了修正主义的东西。“老三届”的精神世界近乎一片荒漠。“文革”前夕“老三届”只能接受以《收租院》【15】为代表的控诉艺术和以《红岩》【16】为代表的烈士文学。前者对“老三届”的影响是将不同社会制度的比较转变成对人的仇恨，后者是把信仰的追求转变为对复仇的渴望。在不断地、反复地对“人性论”进行批判的同时，“老三届”接受了日益深化的个人崇拜教育。其中，学习雷锋的运动【17】将个人崇拜的方式进行了推陈出新，学习毛主席著作也由此走上实用主义的道路，对毛泽东的神话莫过于在“老三届”的心中。

从七千人大会以后，毛泽东开始全面抨击党在文化教育领域的方针政策。文化部被说成是“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中宣部被喻为“阎王殿”；评价最低的是教育界——“庙小妖风大，池浅王八多”。“文革”前，“毛泽东和毛远新的谈话”、“毛泽东和王海容的谈话”给“老三届”的思想造成了极大的混乱。这些以抨击现行教育体制的讲话一经流传，不尊敬老师，不崇尚知识之风即刻成为一种时尚。“文革”前的《中国青年报》曾刊出过一篇嬉笑之文《获取5分的“秘诀”》【18】，它的作者就是“文革”中的“老三届”。这篇文章比黄帅小姑娘的日记要早了将近十年。把它算作是“老三届”泼向自己老师的第一盆污水可能是不会有误的。北京市东城区某校初一的学生在1966年初曾写出一文，题目在当时就非常吓人——《现在的学校培养不出共产主义的接班人》，其矛头还是对准了教育体制和老师。无论是对杨献珍的“合二而一”的哲学观点的批判，还是对田汉的“有鬼无害”的戏剧理论的批判，“老三届”都积极参与，表现出了极大的“革命热情”。“文革”风雨未到，“老三届”已经跃跃欲试。政治思想的“热身”运动已经完成于无形之中。

“文革”中的“老三届”是红色的“teenager”。以红卫兵为代表，以“八一八”为起点，“老三届”呼啸着

登上了中国的政治舞台。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首次检阅红卫兵。在以后的四个月中，有一千万以“老三届”为主体的红卫兵和造反派在这里接受过他的检阅。“八一八”是“文化大革命”这出中华民族的悲丑剧拉开大幕的时刻。那红色的古城楼就是一座历史的舞台。无论以后如何，或寿终正寝、或横尸荒野、或腊炬成灰、或面壁囚笼，剧中的主角都从幕后走向台前。刘少奇的尴尬，周恩来的矜持、江青的傲慢、康生的阴冷，尤其是林彪那白骨般的面容和他嘶声力竭的呼喊，对中国人，对中华民族来说充满着险象和凶兆。毛泽东在震耳欲聋的“万岁”声中举起手，挥动着他手中的绿军帽，而他的目光却没有投向在他脚下的芸芸众生。端详那张由摄影师留下的，记载着那历史瞬间的照片,人们会发现：毛泽东微昂着他硕大的头颅，把他冷漠的目光投向无际的苍穹。与这神情形成巨大反差的是红卫兵的狂热，他们欢呼着、呐喊着走过天安门城楼，个人崇拜的狂涛巨浪席卷了天安门广场。这种场面与1933年1月30日柏林的火炬之夜【19】何其相似。

红卫兵不分男女，都身穿黄色的旧军装。不知是天太热的缘故，还是故意要摆出这副样子，每个人都捋胳膊挽袖子，刁蛮之像让人兵痞难辩。男的是清一色的小平头，女的多是超短发，也有的女红卫兵将自己剃成一个秃子以示革命。不知她们是怎样将革命和消灭女性特征联系在一起的。封建意识形态中男尊女卑的思想和带有宗教色彩的禁欲主义倾向那么自发地而又自然地毒害着少女的心身。如果当时可以做变性手术，这些女娃子们会毫不犹豫地躺到手术台上去的。站立时双手插腰。说话时国骂不离口，本来没有骂人习惯的人为了显示自己已经不再温良恭俭让，也要在讲话时生硬地带出几句“他妈的”来。走起路来乍着胳膊，象一只只横行霸道的螃蟹。而远远望去又更象一片专门啃噬绿叶的蝗虫。这是一股真正黄祸。它的肆虐虽然时间短暂，却在中华民族的近代史上写下了极其丑陋的一页。

红卫兵这个短命的怪胎一降生到这个世间就发出了两声惊世的怪叫：一声是“造反有理”；一声是“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

丑陋的口号

其实，第一个讲“造反有理”的是毛泽东本人。四十年代，毛泽东在延安各界庆祝斯大林寿辰的大会上发言，其中说道：“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对科学共产主义的这种抽象是否科学、严谨是值得推敲的,即使是面对陕北的庄稼汉。二十年以后，在清华附中红卫兵语无伦次，逻辑混乱的三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大字报中，“造反有理”四个字被重新诠释。今天重读三论《造反》，其立论之荒谬，论据之牵强，论述之无理当不必说。值得探讨的是：文章的作者小小年纪，吃了十八九年的粮食，书只读到中学，事还没有作成一件，那里来的如此了得的傲慢与嚣张。他们贵为金枝玉叶，即没有人压迫他们，也没有人剥削他们，到底有何反可造？

解放初期，有人曾告戒干部子弟要以史为鉴，不要重蹈满清八旗子弟【20】的覆辙。这种告戒固然用心良苦。希望干部子弟不要堕落当无可指责。但这种期望是以认定干部子弟应当享有特权为前提的。事实上，这种特权从共和国建国的那一天起就一直存在着。在如何对待下一代的问题上，超越历史的局限性，摆脱几千年封建社会形成的帝业子承的世袭观念，代之以天赋人权、平等竞争的思想，在那个年代是一种奢望。干部子弟从小就意识到自己不同于平常百姓家的孩子。和八旗子弟一样，他们是特权阶层，是精神衙内。傲慢与偏见简直就是与生俱来。没有人敢于无视和怠慢这种骄狂。但是，“文革”的实践证明，这种骄狂导致的行为比起他们的沉沦和颓废给社会给国家所造成的后果要严重的多！干部子弟是共和国的同龄人中生活条件最优越，政治待遇最特殊的一个群体。社会对他们的娇惯养成了他们感情用事，为所欲为的性格。当“文革”来临之时，他们本来有条件凭借自己特殊的社会地位所获得的便利去准确地揣摸领袖的用心所在，去理解“这场运动的重点是整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句话浅显的内涵，从而避免在这场以打倒自己父辈为第一目的的“革命”中的充当冲当冲锋队的角色。然而他们只是凭借自己想象去理解甚至企图左右这场“史无前例的大革命”。他们带上红卫兵的红袖标，高喊“造反有理”的全部意图就是要借“文革”之机，向社会向人民索取更大更多的特权，使自己不但可以享有凌驾于同龄人而且享有凌驾于全体人民之上的权利和地位。毛泽东最大限度地利用了干部子弟的这种骄狂。因为这种以无知和任性为特征的桀骜不逊不可能逃出忠君思想和个人崇拜的阴影。

毛泽东发动文革的最大的阻力来自一个社会正常运作所必须具备的秩序和法统。按照党章和宪法所规定的领导人产生和废黜的程序，就无法打倒刘少奇和一大批党和国家的领导人。用贫民造反的模式可以置一切法规于不顾。但是在的天下谁敢举旗造发呢？地富反坏右不敢，知识分子不敢，工人农民也不敢。历史选择了红卫兵。在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回信中，毛泽东肯定了“造反有理”的口号，使之成为“文革”中喊得最多，喊得最响的纲领性的口号。党纪国法，伦理道德在这个口号面前都显得苍白无力。从此，造反的祸水流遍全国，运动也从“有序”走向“无序”。

但是，中学红卫兵的失宠来得之快是连他们自己也意想不到的。《红旗》杂志十二期的评论员文章《红卫兵赞》中曾高喊“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红卫兵万岁！”，可是，从“八一八”到《红旗》杂志第十三期社论【21】发表不足100天的时间,“小将们”就从辉煌的颠峰上滚落下来。少爷小姐们也曾为此闹得乌烟瘴气，鸡飞狗跳，可是“造反有理”的接力棒还是不得不交给贫民出身的，与“走资派”没有太多血缘关系的蒯大富和王大宾【22】之辈。然而，属于“老三届”的红卫兵在“文化大革命”中首喊“造反有理”的口号，自觉地为这场浩劫推波助澜的历史“功勋”，堪称丑陋之最，是应该被写入史书的。

丑陋的对联

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是现代血统论的代表作。虽然谭力夫【23】极力兜售此货，但是它

的主要市场不是在大学，而是在中学校园。身为儿女，人皆有父母。对联的咄咄逼人在于没有人可以逃避，也没有人可以选择。

现在还无从考证是谁，也没有人出来表示自己应该享有对对联的发明权。但它是“老三届”的专利是不会有问题的。辛亥革命55年之后，如此荒唐的玩意儿在当时北京的每一所中学的校园里随处可见。封建主义的破烂货能够堂而皇之地登上社会主义正统思想的殿堂，究其根源，与中国没有经历过一个完整的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有关，与以“自来红”自称的干部子弟们在民主革命时期入党的爷娘头脑中还没有得到改造的农民意识有关。

解放以后，渗入社会生活每一个角落的阶级路线和以阶级斗争为大背景的社会教育深刻地影响了“老三届”。“文革”前夕，中学生之间已经没有友谊可言，人性的失落已见端倪。在很多学校已经出现“出身好”的同学自觉地，有组织地排斥、打击“出身不好”的同学的倾向。人为地挖掘阶级的鸿沟，人为地制造阶级斗争的对象。“文革”的到来，“对联”的出现，使上述情况恶性发展，最终演变成一场新种姓歧视的丑剧。

面对高悬的对联，非“红五类”（红五类是指革命干部，革命烈士，革命军人，工人和贫下中农）子弟的人格和尊严丧失殆尽。革命的诱惑与血统的卑贱在扭曲他们的人性。有一个女孩把社会对她的歧视转变成对母亲的仇恨，在对母亲拳打脚踢之后，勒令母亲跪在地上，用剪刀剪去了她的全部头发。笔者的一位“出身不好”的同学为了表明自己决心脱胎换骨的决心，不止一次地在对联的辩论会上狂喊：“我就是一个混蛋！”行文至此，他那张无血色的小脸，不知所措的眼神又浮现在我的面前。我不敢想象他是如何缝合这精神的创伤的。耻辱莫过于精神的自残。“文革”的丑恶可见一斑。

对联的出现使青年人本应五光十色的理想被抽象为对革命的图腾崇拜，而本应以解放全人类为最高境界的革命被转变为对家庭出身的攀比和计较。有的学校高干子弟云集，红卫兵组织将革命干部的标准定为：行政级别13级以上，入党时间在38年以前的人。于是，有一大批本来可以在人前显贵的干部子弟硬是被推入“职员子弟”的行列被搞得灰头土脸。而那些根正苗红，将别人斥责为“狗崽子”的“自来红”们的好景也不长。最大的讽刺莫过于这些“自来红”们的迟钝使他们根本没有意识到，这场运动的矛头所向正是他们日夜引以为自豪的老爹。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才发现自己正在完成一个被自己的逻辑所认定的，由“好汉”向“混蛋”的转变。

“对联”问世不久，“老三届”中不是“混蛋”的人已廖若晨星，还真有点“池浅王八多”的味道。直到1966年10月，才因“对联”的荒谬实在是显而易见，才由当时的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24】出面讲了几句无关痛痒的话。但是，血统论一天也没有停止过毒化人们的生活。

遇罗克烈士【25】因反对“对联”，撰写《出身论》而惨遭杀害。他倒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枪口下，他的血溅在“老三届”的身上、手上。遇罗克是中国20世纪后50年中出现的最勇敢，最杰出的思想者。他的绝笔“乾坤持重我头轻”一定会流传下去。但是他和他的诗不属于“老三届”。

今年是11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三中全会的深远意义随着时间的推移日益地为世人所认识。在纪念它的日子里，人们似乎忽略了三中全会作出的一个很重要的决定：摘去全部地主、富农份子的帽子，称他们为社会主义的劳动者。对与他们的子女来说，作一个不太恰当的比喻，这个决定犹如“解放黑奴”的宣言。他们终于可以挺起胸、抬起头和其他人一样在共和国的同一片蓝天下自由地呼吸。勒在上千万“剥削阶级”子女及其亲属头上出身不好的“紧箍咒”被摘掉了。以“出身”界定人的优与劣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

丑陋的作品

红卫兵不但有自己的口号也有自己的作品以表达自己的好恶。

32年前，红卫兵自己创作的以宣传造反精神为主题的歌曲简直多如牛毛。随着岁月的流逝，这些强音悍调也渐渐地被人遗忘。可是，有一首歌笨拙的旋律还经常出现在影视节目中。《造反歌》是“老三届”给历史留下的又一“杰作”。它的词曲作者不详，但它的“诞生地”应该是北大附中。

“拿起笔作刀枪，集中火力打黑帮。谁要敢说党不好，马上叫他见阎王！”所谓“黑帮”是1966年四，五月期间的《人民日报》对“三家村”【26】的称谓。后来被用来泛指所有被认为有必要被打倒的人。所谓“见阎王”就是夺人性命。不管“说党不好”的人讲得是否有道理，也不管是说党在某一个方面或是在某一个时期作过不好的事情还是说党在全局性的问题上有过不好的决策，总之，都要夺其性命。后来的事实证明，歌词中的誓言并不只是一种意愿的夸张表述，而是实际行动的写照。其实，这种危言耸听的提法并不是“老三届”的发明。“老三届”只不过是受到了林彪“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这种讲法的诱导，鹦鹉学舌罢了。在“老三届”长大成人的岁月里，法制教育是一个盲区。杀人夺命之事无需法律条文的认定，也不需要司法部门的核准，“文革”中他们就是这样作的。诗言志，歌也言志。无论艺术性还是思想性同父辈的《毕业歌》相比，《造反歌》是败笔。

中学红卫兵的思维走向和他们的价值取向多是通过大字报和自己办的报纸来表达的。他们贴出的大字报的数量是不可计数的，但是没有留下记录除了少数极端作品,如《三论造反》之类。而红卫兵办的报纸刊物虽然屈指可数，但保存下来的数量却很可观。一张大字报的出现往往与作者的个人在写作时的情绪有关而带有随机性，而报刊上的文章却要经过一群人的讨论比较能够反映一个群体的意志。出现在北京的红卫兵报纸有《湘江评论》《火星报》《莱茵报》【27】等。这些报纸除了顽固地、不厌其繁地贩卖“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的狗皮膏药之外，还有一个起喋喋不休的宣传主题，就是“镇压流氓”。红卫兵对流氓的关注始于红八月，而到了他们失势以后，向人民群众高喊一声“镇压流氓”也可以使自己心态趋于平衡。任何一位政治家，任何一个有理念的政治派别都不会把镇压流氓看作是政治斗争中的一件什么要紧的事情。更何况毛泽东。把“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镇压流氓”扯在一起实在是风马牛不相及。实际上，红卫兵心目中的所谓流氓是指那些家境贫困，上不起

学而又没有固定工作的社会青年。红卫兵对这些本应得到社会救助和同情的同龄人倾注了极大的仇恨看似难以理解，其实也很正常。说到底还是血统论——那个社会的新种姓歧视在作怪。

提到红卫兵的刊物应该提一下1968年初出现在北京中学校园的油印刊物《准备》。《准备》与人大附中的红卫兵极端分子有关。北京红卫兵与“中央文革小组”的矛盾早在一年以前就显露出水火不相容的态势，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简称“联动”）是“文革”中出现的第一支反江青的的政治派别。但是，在读过《准备》的全部文字之后，就会感觉到这份与“联动”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的刊物的指导思想是混乱的。《准备》在它的创刊号上刊登了一篇记实性政治小说，它被放在首篇的位置，小说的标题也是《准备》。小说以康生等待毛泽东批准发表聂元梓的大字报，准备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背景素材。小说的作者以细腻的笔调描述了中央文革所在地——钓鱼台的景致,表明了作者的身份非同一般干部子弟，作者在小说中借康生的头脑所进行的思维和当时官方对搞“文革”的必要性的解释没有任何不同。小说用尽美好的辞藻把康生——“中央文革小组顾问”描绘成一位忧国忧民的，与领袖肝胆相照的旷世之才。小说是这样结束的：通向主席办公室的红色电话响了，他（小说一直没有说出康生的名字）大步跨了过去，拿起电话说：“我是康生”。康生在“文革”初期通过他的老婆曹轶欧组织北大哲学系师生给校党委贴大字报以捞取政治资本的勾当在当时也不是什么新闻。康生，被外国人称为龙爪的人，在红卫兵的刊物上被喷涂，被神话恰恰说明红卫兵与“中央文革小组”的决裂只是利益集团之间的争斗，而不象有些人自吹的那样，是两种思想体系之间的对峙。

在“极右”的红卫兵思潮之后，“老三届”中浮现出来的“极左”思潮也同样没有挣脱“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的罗网。《一切为了“九大”》（上海）、《中国向何出去？》（湖南）、《论新思潮》（北京）、《今日向何方》（广西）等文章的出现表明，“老三届”中已经崭露出现国家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思想倾向，这个倾向的尽头就是无遮掩的法西斯主义。它的疯狂和歇斯底里使“中央文革”都感到恐惧。这种疯狂也被有些“老三届”自吹为反“文革”的先知先觉是没有一点道理的。这种自吹自擂尤其表现在最近国内外出现的一股研究“文革”异端思潮的热浪中，其作浪者的多数还是文革中的“老三届”。

丑陋的行为

红卫兵思潮的出现是一代人思想混乱的总爆发。而思想的混乱一定导致行为的疯狂。

“八一八”之夜，躁动的红卫兵为了报答领袖的召见之恩，为了实现建立功勋的梦想，他们迫不及待地向“旧世界”宣战了。数不清的事例证明，所谓“破四旧”【28】的锋芒所向是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化遗产。多少古迹被破坏，多少文物被焚毁。不肖子孙进行了一场名副其实的文化革命。这种行为不只是丑恶而是一种罪恶了。

在八月的红色恐怖中，人们闻到了浓浓的血腥味。残杀地富反坏右人员及其家属的事件每天都在发生。

北京六中位于中南海东侧、天安门西侧、人民大会堂南侧。在“红八月”中，六中红卫兵在校园里设立的“刑讯室”曾恶名远扬。对“阶级敌人”捆绑吊打是家常便饭。甚至将滚烫的开水倒在一位76岁的老工人的身上，在老人的残叫声中红卫兵们和以魔鬼一样的嚎笑。

北京东安市场内的吉祥戏院也是历史的见证：鲜血染红了舞台，鲜血染红了幕布。舞台上上演杀人的活剧，舞台下爆发出嗜血者的欢呼。

首都红卫兵在大兴县向地富份子及其子弟举起了屠刀。被杀死的人，最年长的80岁高龄，最年幼的仅出生38天。被满门抄斩的有22户人家。

这种杀人的游戏，以“红八月”为始端，在不断升级的阶级斗争的大背景下愈演愈烈。广西省出现的“贫下中农最高法庭”公然提出“斩草除根一扫光”的口号，肆意杀戳“四类份子”和他们的后代；湖南省道县、邵阳县等地在光天化日之下集体屠杀地富及其子女。

打、砸、抢、抄家之风刮遍全国。中国社会的基本人权指数已接近零。住在在协和医院宿舍的一青年孕妇在“红八月”被抄家时同时被强奸，施暴者是革军子弟，年仅14岁。如果“文革”博物馆真的建立，应为“红八月”独辟一个展室，让后人不要忘记这即丑恶又凶恶的一幕。

如果说制造“红色恐怖”是少数极端分子的行为，那么对教师的人身和人格的侵犯则是“老三届”的群体行为。“老三届”在“文革”中最先攻击的对象就是曾在他们身上倾注了大量心血和厚爱的老师。学生对老师的侵犯是全方位的。辱骂，批斗，殴打几乎成了家常便饭。有些学校的“老三届”甚至将老师活活打死。例如，原北京师大女附中（现在的实验中学）的校长卞仲芸女士【29】就是在本校的操场上被一群十六七岁的女中学生活活打死的。这种学生将老师打死，逼死的现象在当时是很普遍的事情。许多经历过“文革”的老教师提起往事仍然不寒而颤。有人说“老三届”是用狼奶喂大的，这种比喻并不过份。十七年的阶级斗争教育，不断进行的对“人性论”的批判使“老三届”缺少爱心，崇尚兽性。一旦土壤适合，就会开出血淋淋的恶之花。遗憾的是，“文革”过去32年了，“老三届”中没有人出来认领和忏悔这一份罪恶，向老师们，向死者的家属，向全社会说一声对不起。这在道义上是讲不过去的！

1998年夏天，原师大女附中的一位“老三届”从美国斯坦福大学再次回到北京。和前几次一样，她是为在“文革”中被打死的中学老师而来。早在20年前，她曾去探望被她的同学打死的老校长的家属。她是唯一一位来探望死者家属的师大女附中的学生。10多年前，她在《女性的野蛮》【30】一文中再次重提往事，作为围观者“我站在操场上，看着这一切。我什么也没有做。如果一个人对自己身边发生的罪过未加制止，那么就是罪恶的同谋——但是我在十年之后才学会了这句话”,这是来自老三届的第一声忏悔，只是声音太微弱了。卞校长的死和她没有任何关系，是什么东西驱使着她对自己发出如此强烈的自责呢？是一个人的没有泯灭的良知。说“老三届”是丑陋的，是

因为在“老三届”中象这样良知未泯的人实在是太少了。

“老三届”是共和国的同龄人，历史却让他们遭遇了“文化大革命”。在回忆和共和国共同成长的经历时，往往使他们的内心产生阵阵的疼痛。他们不能忘却那如烟的往事，但在公开的场合却要回避使自己陷入窘境的话题。历史是不好随意涂抹的。“文革”中展现出来的也并不只是某些个人言和行的丑陋，而是全民族的弱势和劣根性。消灭这种弱势，铲除这种劣根性必须从每一个人作起。文过饰非不能根治民族的顽症。

四.请做如是说

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代表人物。“老三届”也不例外。探寻这些代表人物的足迹可以窥见和理顺“老三届”思想的脉络。这些年来，偶尔也能读到一些他们回忆往事的文字。但是其中流露出来的忏悔之意不多，炫耀之意不少。最近，我曾从朋友手中得到陈永康（笔名：咏慷）先生的自传体小说《青春殇》。我抱着极大的兴趣，用十个小时，一口气读完全书。掩卷之时已是深夜。陈永康先生当年与刘少奇的女儿刘平平同为北京师大附中的学生，因反对工作组名震京城，有“中学蒯大富”之美称（反工作组的蒯大富与刘少奇的大女儿刘涛同为清华大学的同学）。作者是当年政治旋涡中的人物，他曾因与“中国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女儿为政敌而中得“大彩”，今天他却没有采用回忆录的形式，直述当年的往事和今天对那段历史的在认识，而是采用了小说的形式，真真假假，虚虚实实，也许有他的难言之隐。而整部小说的文字，以《后记》中的表述最能概括作者对自己，对红卫兵运动和“老三届”的评价：

“他们虔诚地在信仰的祭坛前奋斗牺牲，坚韧地在灵魂的炼狱中忍受熬煎，向往献身，期待着历史的承认。他们火热的革命热情，对祖国前途，对人类命运‘舍我其谁’的高度责任感，恐怕会永远载入史册，另人感奋。”“没有悲剧就没有悲壮，没有悲壮就没有崇高。”应该坦率地承认，读到这样的文字，我失望了，深深地。

“文革”过去三十年了，写出这种的文字，能向历史交代吗？

不知陈永康先生当年的“战友”、现居美国的何芳芳女士对“文革”的认识停留在什么样的水平上？

我在猜测。

也许，再过一些年，能够看到以下曾经有着全国影响的“老三届”或者是他们的亲属写出的，有着较高境界的文字，一定会感到“非常有趣”（“老三届”，作家王小波的习惯用语）。而另一方面，又很有一些人，一以“成功者”最为典型，无视这些“代表人物”的历史存在，不承认这些“代表人物”的典型性思维和言行集中反映了那个年代“老三届”的世界观的基本轮廓，以证明自己在那场浩劫中做到了洁身无垢。这种辩白实在是多余。

这些代表人物是：

1965年撰写《获取5分的“秘诀”》，北大附中“老初三”的学生宫小吉；1966年6月给党中央写信主动要求停课闹革命并自愿放弃高考的北京四中和北京女一中的部分“老高三”的学生；1966年六月在清华附中贴出三论《无产阶级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大字报的卜大华，骆小海和王铭；1966年8月18日代表北京红卫兵在天安门上讲话的，北大附中“老高一”学生彭小蒙（女）；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将其名字“彬彬”改为“要武”的，原师大女附中“老高三”学生宋彬彬（女）【31】

1966年9月组织起来的首都红卫兵西城纠察队首领，北京四中“老高三”学生孔丹；1966年“八一八”之夜起草《向旧世界宣战的最后通牒》的，也曾代表首都红卫兵在天安门上讲话的，北京二中“老高三”学生冯晓新；1967年春天，由“中央文革小组”批准成立的“北京中学生红卫兵代表大会”（简称“中学红代会”）领导成员：北京25中“老高三”学生李冬民，北京二中“老高三”学生刘龙江，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老高三”学生陈永康，清华附中“老高三”学生刘刚（女）；1967年在《四.三战报》创刊号上撰文《论新思潮》的作者（原良乡电校学生）

1967年秋天去内蒙牧区插队的“十男十女”；1968年在湖南因撰写《中国向何出去》一文被判有期徒刑10年，原长沙一中“老初一”学生，现在居住在澳洲的杨曦光（现名杨小凯）；“上山下乡”运动中的全国性标兵：孙立哲（北京），董良鬲（北京），丁爱迪（北京），朱克家（上海、中国第十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蔡立坚（北京，女,已故）；柴春泽（辽宁）【32】

1973年在招收“工农兵”大学生的考试中“交白卷”并力呈“知青”现状的张铁生（辽宁），精神病患者，朦胧诗开山之作《相信未来》的作者，北京某中学学生郭路生；原北京四中“老高三”学生，朦胧派诗人，现居住在美国的赵振开（笔名北岛）

1976年1月在《人民日报》发表长诗《理想之歌》的作者（北京大学中文系部分“工农兵”大学生）；还有：

1966年在广州参加红卫兵，现居住在美国的王希哲；196 6年在“人民大学附中”参加红卫兵，现居住在美国的魏京生；等等，等等。

五．结束语

有人曾用“青春方程式”【33】这种时髦的提法来涵盖“老三届”复杂的青年时代。如果一定要用数学语言来描述“老三届”心路历程的话，就应该这样来描述：

这个以时间为自变量，表征人生价值取向的函数不是一条连续曲线。它有着如此多的间断点而显得那样支离破

碎。它有着那么多的拐点，表明它的走向盲目多变，前后不一致，尽显其价值观的浅薄和世俗。在它的全部定义域内，只出现过一个绝对值看似辉煌的极大值，遗憾的是它却落在了负值区间，随之而来的是一个又一个的低谷。它不是一条递增曲线，随着岁月的流逝可以构造起一个另后人羡慕的人生，积累起比物质财富更具诱惑力的精神财富。在这个人生的坐标系中，彻悟是一条无形的渐近线。逼近它需要时间更需要勇气：时间用于思考和反省，勇气用于直面那不堪回首的过去。【34】

“老三届”这三个字本身散发出来的历史气息，已不需要在使用它的时候再对其进行任何修饰。这一代人的历史形象应该定格了。诸多已经被经过反复推敲后使用的定性句语，例如：“独特的一代”（乐黛云）【35】、“最具悲剧色彩，也最为尴尬的一代”（李辉）【36】、“在从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的进程中不可避免地成为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一代”（丁东）【37】、“在那邪恶与崇高交织时代中所成长起来的‘老三届’只有他们才在理想境界与创造魄力上与20年代知识分子相匹敌”【38】等等，都没有准确地定位历史上的老三届。选择“丑陋的老三届”这样一种清晰而简捷的提法是比较客观、比较恰如其份的，道理很简单，因为那个时代是丑陋的。

我曾将本文的初稿念给我刚上高中的儿子听。念罢，我问儿子作何感想。他沉思片刻，说：“是挺丑陋的。”低调评价“老三届”就是要具体地，一点一滴地否定和批判“文化大革命”，为了使这民族的悲丑剧不要再重演。

1998年12月13日初稿 1999年1月1日终稿

注释：

【1】保尔·柯察金：前苏联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的主人翁。

【2】“工农兵”大学生：从1970年到1976年入学的大学生。他们入学是由基层推荐而不比经过试。

【3】1969年7月21日美国“阿波罗”号在月球登陆。美国宇航员阿姆斯特朗等登上月球。

【4】《理想之歌》：刊登在197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诗集《理想之歌》上。“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时期又被1976年1月25日的《人民日报》转载，作为回击“翻案风”的有力武器，并加“编者按”全文如下：

“《理想之歌》是北京大学中文系部分工农兵学员一九七四年集体创作的政治抒情诗。它反映了广大知识青年在上山下乡和教育革命中锻炼成长的精神风貌。在当前教育战线大辩论中，清华、北大等院校的同志一再朗诵、阅读这首朝气蓬勃、激情洋溢的诗。这说明，它符合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教育革命胜利成果这一斗争需要。本报刊登这首诗，以供更多同志阅读，并用以回击教育界右倾翻案风，批驳那种攻击工农兵学员‘质量低’之

类的奇谈怪论。”【5】《雷峰之歌》：贺敬之的长诗，发表与1964年。

《三门峡梳桩台》：贺敬之的诗。发表与50年代后期。

【6】《相信未来》：创作于1967年，作者郭路生。这首诗被认为“朦胧诗”的开山之作。

【7】女一中高三（四）班的信刊登在1966年6月18日的《人民日报》上。

【8】“十男十女”去内蒙牧区插队的消息刊登在1967年10月11日的《人民日报》第一版上，标题是：“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走同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道路——北京一些革命小将自愿到内蒙当普通社员”。

【9】“走后门”：社会常用语。用于形容做事不经过正当渠道去办，而是通过人情关系去完成。

【10】《中国知青梦》：是四川知青邓贤以云南知青生活为素材的长篇报告文学。

【11】“张铁生”事件：在1973年招收第一届“工农兵”大学生的考场上，辽宁省“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张铁生在考卷上写下了一段乞求上学的文字。这一事件被“四人帮”大肆渲染。刊登在1973年7月19日的《辽宁日报》上，后又被《人民日报》转载。

【12】“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是指北京大学哲学系教师聂元梓1966年5月25日在北大校园贴出的攻击校党委的大字报。6月2日有毛泽东批准刊登在《人民日报》上。后来，毛泽东将其称为“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

【13】“炮打司令部”是毛泽东1966年8月5日写下的一段文字。题目是《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其中例数刘少奇的所谓“罪状”，打倒刘少奇的决心尽显其中。全文如下：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啊！请同志们重读一遍这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可是，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威风，灭无产阶级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到1962年的反右倾和1964年的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省的吗？”【14】北京清华附中红卫兵：1966年5月29日清华附中的若干干部子弟在圆明园集会成立第一个红卫兵组织。他们写的三论《造反》的文章和毛泽东写给他们的回信都被刊登在1966年第11期《红旗》杂志上。

【15】《收租院》：一组大型泥塑。以解放前四川大邑县地主刘文采的庄园内的收租院向农民收租的情景为素材，塑造了一群受压迫受剥削的穷苦农民的形象。

【16】《红岩》：罗广彬、杨益言的长篇小说，1962年出版。描写国民党特工人员残害、屠杀共产党犯人的故事。

【17】“学习雷锋”运动：1963年3月5号毛泽东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由此开始了学习雷锋的运动。在这个运动中有两种潮流。一是倡导一种公而忘私、舍己为人的社会风气；而另一种潮流是以林彪为代表的，提倡用实用主义的方法去学习毛泽东的著作。

【18】《获取五分的秘诀》：刊登在1965年六月的《中国青年》杂志上。

【19】“火炬之夜”：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当选德国总理。纳粹青年在柏林举行火炬游行。

【20】“八旗子弟”：满清皇族分为八旗。正黄旗、正蓝旗、正红旗、正白旗、镶黄旗、镶蓝旗、镶红旗和镶白旗。他们的子弟统称“八旗子弟”。“八旗子弟”在建立满清王朝的过程中冲锋陷阵，功勋卓著。入关后，吃喝玩乐，沉溺酒色，一蹶不振。

【21】“红旗”杂志第十三期社论：1966年第十三期《红旗》杂志发表社论，提出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表明刘少奇的地位已经岌岌可危。

【22】蒯大富、王大宾：均为“文革”中北京的“五大学生领袖”之一。

【23】谭力夫“文革”中北京工业大学学生。曾发表过鼓吹血统论的讲话。

【24】陈伯达讲话：1966年10月在中央召开的工作会议上所做的《对两个月来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总结》。其中有谴责“对联”的言辞。

【25】遇罗克：“文革”前毕业的高中毕业生。“文革”中撰写多篇反对“对联”的文章，最著名的是《出身论》。1970年3月5日被北京公安局军事管制委员会判处死刑。

【26】“三家村”：“四人帮”对邓拓、吴晗、廖沫沙的称谓。“文革”就是以对这三个人的迫害而开始的。

【27】《湘江评论》《火星报》《莱茵报》：北京红卫兵的铅印报纸。《湘江评论》出版于海淀区，《火星报》和《莱茵报》出版于西城区和东城区。

【28】“破四旧”：1966年8月18日北京二中红卫兵向社会散发、张贴《向旧世界宣战》的最后通牒的传单，开始了席卷全国的“破四旧”运动。1966年8月26日的《人民日报》转载这份传单。转载时，将原文中过分激烈的言辞删去了。“破四旧”是“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和旧习惯”的简称。

【29】卞仲芸：抗日战争时期在成都“燕京大学”读书时加入外围组织。后奔赴解放区。“文革”中以北京师大女附中校长的身份被本校学生野蛮毒打至死。其骨灰现存放八宝山革命公墓的骨灰堂中。

【30】《女性的野蛮》：散文集《女博士生手记》中的一篇，文章记述了卞仲芸校长被残害的经过。作者王友

琴，“文革”中是北京师大女附中的初中学生。

【31】宋彬彬：1966年时，是师大女附中“老高三”的学生。“八一八”那天以首都红卫兵代表的身份给毛泽东戴上“红卫兵”的袖标。并在1966年8月20日的《光明日报》撰文《我给毛主席戴上了红袖章》（《人民日报》第二天全文转载）。全文见附录。

【32】孙立哲、董良鬲、丁爱迪、朱克家、蔡立坚、柴春泽：均为“上山下乡”运动中的全国性标兵。他们的“事迹”均在《人民日报》上进行过宣传。

【33】《青春方程式》：1995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知青回忆录。其中收录了50位北京女知青的回忆文章。

【34】“间断点”、“拐点”、“极大值”、“递增曲线”、“渐近线”属于一元微积分“函数”一章中的基本概念。

【35】摘自乐黛云为《青春方程式》所写的“序”。

【36】摘自李辉的《残缺的窗栏板》。

【37】摘自丁冬的《与李辉书——对红卫兵、老三届的一些反思》。

【38】摘自尤西林的《文革境况片段》。

华夏知青网不是赢利性的网站，所刊载作品只作网友交流之用
引用时请注明作者和出处，有版权问题请与版主联系
华夏知青网：http://www.hxzq.net/
华夏知青网络工作室

盯好不容易定下来的标题，我手中的笔异常沉重。三十年了，比我们老的人、小的人，中国人、外国人都在谈说“文化大革命”，只有我们自己，这段历史的主要当事者和见证人，一直保持着沉默，任人褒贬，有心理学常识的人都知道，只有在幼年或童年时期，心灵受过重创，伤口未曾愈合的人，才不能回顾过去。而且，受伤的程度和抗拒回忆的强度是成正比的，甚么是我们的心理伤痕？它给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后代，给整个社会什么样的影响？我们对过去、现在和未来负有甚么样的历史性责任？作为“老三届”的一员，我试图在回忆和思考中寻找答案。

◇ 谁是“老三届”

“老三届”，是指一九六六年的时候，六个年级的在校中学生，中国的中学是初中三年、高中三年，按照毕业的年头称呼。人们把当时正在初、高中的这三届即将毕业生，统称为“老三届”，按照规定，孩子七岁入小学，经过六年小学毕业后，进入初一的学生是十四岁，在高中三年级的是十九岁。恰恰是美国人最头痛的青春期的青少年（ｔｅｅｎａｇｅｒｓ）。这个年龄群体，身心与情智发育迅速，处在从儿童向成人的过渡时期。他们强烈要求“做大人”的权力，却不能承担成年人享有这些权力时需要负的责任。他们纯洁、敏感、热情、富于幻想，同时具有过多的能量，很少的生活经验，在特定的环境下，非常容易走向极端，甚至出现暴力行为，美国近十年来，青少年谋杀率增长了三倍。三十年前，中国的中学生则处在一个更加矛盾深重的社会现实里。

１９６６年的这批青少年，是在１９４９年前后出生，和新中国一起成长起来的，１９４９年以后的中国，结束了一百多年的战乱，也结束了外国列强对中国的欺压和凌辱。开国大典时，毛泽东在天安门上宣布的那句话：“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说到了每一个中国人的心里，此后农民分到了土地、工人是理论上的领导阶级，全国老百姓从心底里相信，自己是新中国的主人。在朝鲜战争中，中国人把美国佬从鸭绿江边一古脑儿的打回了“三八”线。之后，又和想要辖制中国的俄国佬翻了脸。连人家撤走所有的经济、技术援助也挡不住中国人要恢复民族自尊的决心。同时，中国又陷入了２００年前的闭关自守状态之中。

此时，中国的意识形态是一个自相矛盾的混杂体，虽然马列主义被确认为“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但是，几乎没有共产党员和干部读过那些从西方传来的艰深著作。人们盲目的相信：我们只要忠心耿耿的跟毛主席和共产党走，每天辛勤的劳作，终有一天会走入一个叫做“共产主义”的人间天堂去，至于这个天堂是什么样子？甚么时候会走到？为什么一定会走到？没有人问过，也没有人怀疑过，近似乎一种宗教性的虔诚。这种信仰的进一步发展是“世界革命”的理论，“文革”以前的中国人民相信，全世界三分之二的人民，都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等

我们去解救。我们肩负解放全人类的光荣、艰巨、神圣的历史重任。

“文革”以前，尽管有过“镇反”、“三反五反”和“反右”等运动，毕竟仅仅触动了少数人，绝大多数青少年所感受到的是学校和社会上的所谓“正面教育”。但是，除了数、理、化的知识性教育以外，学生受到的思想教育是极端矛盾的，一方面，在学校里，学生被学校中的官办组织“少先队”、“共青团”管理起来，教育孩子们“绝对服从组织”和“做党的驯服工具”。另一方面，在社会上，所有的文学、艺术舞台上，都歌颂着新中国缔造者的光荣历史，他们青年时代大无畏的造反精神和英雄主义行为，成为孩子们的榜样（Ｒｏｌｅ　Ｍｏｄｅｌ），这两种方向完全相反的思想教育，对于青少年的心智形成，造成一对可怕的精神冲突。导致了他们在即将来临的“文化大革命”的大动乱中，令人们（包括我们自己）至今难以理喻的行为——压抑与反压抑，暴力与破坏，你死我活的派系斗争、等等，等等。

“文革”以前，很少有孩子对当时的社会怀有仇恨。但是，根据孩子的家庭在社会中所处的不同地位，他们对于上述的矛盾性思想教育有很不同的反应。所谓“出身不好’的孩子们，即：地、富、反、坏、右的子女，有一类似西方的基督教徒们特有的原罪感。他们认为自己的“根子不正”，不得不同亲生父母“彻底划清界限”、皈依真理、净化灵魂，以便做一个被公众承认的好人。共产党毛主席都是抽象的概念，学校里的校长、老师、特别是党、团组织无形中，成了他们的“精神父母”和他们在社会上的合法保护人。因此，他们看到其他的孩子叛逆的时候，总是感到特别的不舒服。因为这种行为不仅威胁了他们精神上仅有的安全寓所，而且触动了埋藏在他们更深的下意识中的叛逆冲动，即：大声地对自己和别人说：“生我、养我、爱我的爸爸妈妈也是好人，我爱他们。”这是世界上所有孩子的天性和权力，但是在当时的环境中，这种愿望成了罪孽，是“划不清界限”的表现，绝对不利于他们的生存，自然也不可能浮现到意识中来。因此，这些孩子最容易趋向“驯服工具”的教育。在“文革”的开始阶段，“誓死保卫学校领导”，做了真心实意的“保皇派”。

所谓“出身好”的孩子，即：工，农，干部子女，因为他们的父母亲是“领导阶级”，这些孩子们从生下来那天起，就感到是这个国家的主人。毛主席说过：“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还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象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在这种充分被肯定、被信任、被期望的精神环境里长大的孩子，具有非常的自信和社会责任感，同时也伴随狂妄自大和过份的天真，特别是干部子女，从“造”了自己祖父母“反”的爸爸、妈妈身上，从小汲取“造反”的精神，恨自己怎么晚生了几年，没有赶上电影里面那种激动人心的战争年代，没有机会也做一次英雄，这些孩子更加容易接受“正面思想教育”的另一个侧面，即：他们父辈的“反叛”和被文学艺术诗意化了的“革命英雄主义”，对学校中“驯服工具”的教育则很反感，我自己就是其中的一名。

记得从小学开始，我虽然一直成绩优秀，是文艺、体育活动中的活跃分子，但是每次学校老师给我的操行评语

都少不了“骄傲自满，纪律散漫”的批评。上初中以后，看到有的同学，把自己的钱包交给老师，声称是路上捡的，而被老师作为“学雷峰运动”中的好人好事表彰。使我这个本来对这样的运动就不感兴趣的人，产生厌恶。在党的“重在表现”的感召之下，为了加入共青团，特别是“出身不好”的同学最愿意找“团组织”汇报，不单汇报他们自己的“坏思想”，还要捎上我那些不服从管教的“坏行为”，使我常常为此而挨批评，团组织追着要我克服“自来红思想”，连“出身好”也有了“原罪”，对于这种宗教式的压抑，我实在反感，作了父母亲的人都知道，青少年的逆反心理如同皮球，你越拍它，打它，皮球反而跳的越高。我当时的情况恰好如此。久而久之，这种压抑与反压抑的能量不断积蓄，同时与“小汇报”我的同学，形成越来越深的隔阂，这种现实，为后来“文革”的大火首先在中学里烧起来，学生之间大打派仗，埋下了基础。

◇　文革中的“老三届”

提起“文化大革命”，人们异口同声的把帐算到了毛泽东一个人头上，将十年的大动乱归咎于共产党内的政治斗争。为了解析“文革”的起因和社会后效，中、西学人花费了不少人力、财力。他们收集了大量的史料，研究毛泽东和“中南海”里的宫廷斗争，甚至细碎到了，某年某月某日，某某给某某打过一个电话，使了一个眼色，写了一个便条……使我不禁想起“红学家”们研究“红楼梦”的情景。人们似乎忘了，这段历史是我们五千年文明史的继续。其真正“史无前例”性，恰恰在于全国几亿人民统统发动起来折腾，最终“触及了所有人的灵魂”。

一九五八年，完全没有科学知识的毛泽东，凭着主观的想象和愿望，发起了一场经济生产的群众运动，名曰“大跃进”。饿死的几百万农民使得毛泽东感到罪过。虽然干掉了“为民请愿”的彭德怀，压住了党内的批评意见，毛却渐渐陷入一种日益严重的猜疑心态，特别是赫鲁晓夫把斯大林的遗体从公墓里拉出来烧掉以后，毛变得更加恐惧，生怕他死以后，遭到同样下场，一个人陷入这种恐惧症心理，他对世界上所有事物的感知（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都是扭曲的，看任何一个文艺作品，都会认为是在影射自己，听他人一句玩笑，都会猜疑人家“别有用心”，这是为什么“文革”以前，虽然在现实生活中看不到“阶级敌人”，但是中央文件和报刊中的宣传中“阶级斗争”的鼓点却越敲越紧，直至在“文革”中揪出一个又一个“中国的赫鲁晓夫”还不放心。通常的政治斗争，是以利益集团为单位，实际利害的争夺与平衡为内容的，参加斗争的各方势力，至少很清楚对手是谁，但是这种由于最高权威者心态失常而发起的讨伐，使得被讨伐者至死都不明白原由，刘少奇临死前，还书呆呆的争辩“这种把党外的力量弄进党内来解决问题的作法，是违犯党章的。”中国帝王和家长的话就是章法。再加上恐惧症，其思想与行为就更加无法无天、无常理可言了。这种封建礼教的遗产，与“文革”初期发展起来的类似宗教式的崇拜狂热搅和在一起，把中国推向一场难以避免的灾难，如果用行为心理学的方法将“文革”前后、上下彻底的分析，需要著书，在这里，还是回到我们自己——“老三届”这个群体来。

◇　红卫兵是“反革命组织”

提起红卫兵，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是一个毛泽东创造的“革命组织”，其实最初的红卫兵是一个中学生的自发组织，它短短的六个月历史，有四个月站在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对面，作为“现行反革命组织”。

一九六五年底开始批判“海瑞罢官”；一九六六年初批判北京市委的高级干部“三家村”，中国人有了“山雨欲来风满楼”的预感。成年人有了“反右斗争”的教训，提心吊胆地猜测这次“运动”的“方向”、防范自己不要昏头昏脑地变成了“革命对象”。可是中学里的这批不知事的娃娃们，早已不甘心天天坐在教室里“死读书”，嗅到了一股盼望已久的火药味，变得异常兴奋：可算等到他们要作英雄的时候了。要自己独立的人格，要象父母小时候一样，自己也创出条路来。一九六五年，《中学生》杂志上刊登了十四岁的宫小吉的短文《五分的秘诀》，向当时的教育制度挑战。北京第四、第六、第八中学已经闹过一次学潮，被党中央的“四清”小组勉强压下去。此时，中学生自发的个性解放情绪和行为，还没有同毛泽东的“阶级斗争”联系起来，所以“阶级斗争”的敌人是谁？在哪儿？谁也搞不清，也没有人去问。

一九六六年三月，北京清华附中的骆小海写了《造反精神万岁》的小字报。五月，十几个学生偷偷跑到圆明园的遗址，成立了一个自己的组织，名叫“红卫兵”，立刻就被打成了“现行反革命”，在一党专制的中国，绝对不允许任何人私下里成立什么组织，对共产党的孩子也不例外。“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六十年代初，以郭沫若的儿子郭世英和一个将军的儿子孙经武为首，一Ｏ一中学和北京大学的干部与知识分子的子女，偷偷组织了一个“Ｘ－社”，Ｘ这个数学中的未知数，象征他们开始对所有被灌输的“已知”观念的挑战，对于当时一些难以自圆其说的理论问题和社会现象，包括干部阶层的问题开始质疑。Ｘ－社被发现以后，干干脆脆地划为“反动结社”，其成员全部被打入牢狱，“文革”初期，郭世英因此被迫害致死，对于目前世面上盛行的说法：“红卫兵”的成立，是干部子女要求更多的特权，我实在难以苟同。古、今、中、外，那一个朝廷，是被自己的后代要求更多的权力而造了反，由此而演进向前的呢？

１９６６年，我是北京人大附中高一的学生，为了支持已经被打成“反革命”的清华附中学生们，我们十几个同学在自己的学校成立了红卫兵组织，立即也成了“反革命”。从６月初到８月初，两个月的时间里，每天的日子就是被其他同学围攻、辩论。“在共产党领导下造反，就是造共产党的反！”“红卫兵的目的是不是要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当时同我辩论最凶的学生之一，就是共青团的干部——魏京生。“工作组”找去谈话、强制解放，我们的父母亲更是急得不行。他们认定了自己的孩子要成为“右派分子”，强制“退出”的威胁甚至升级到要“脱离父－子、女关系”的地步。事实上，北京市和“团中央”的“黑名单”，已经将北京市的五千名造反的中学生列为“现行反革命”，准备在运动结束时发落。

对于十几岁的孩子来讲，受到整个家庭和社会的反对，还能挺得住，已经不单单是青少年的逆反心理能解释的了，回想当时，我最基本的概念从未动摇过，即：我是一个好人，我的红卫兵夥伴们也是好人，那么，将好人打成“反革命”的行为一定是错的，甚至是有人幕后谋划的，可能就是所谓的“阶级敌人”。我们还相信，如果毛主

席知道了他们这样搞法，肯定不会答应。此刻，革命英雄主义的教育起了作用，银幕上的革命先烈和我们的父母，都是经历了各种苦难还坚持革命的。所以，没有苦难，没有危险，没有压力，就不算是真正的革命，就锤炼不出真正的英雄。所有这些，从现在听起来极其荒唐可笑的信念和逻辑推理，却扎扎实实地支持了最初的红卫兵的造反的行为。

◇　红卫兵与红色恐怖

７月２６日，当我们在“水深火热”中抗高压，毛主席在长江里“胜似闲庭信步”下定了决心。他８月６日突然回到了北京，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让“中央文革小组”列席，并且宣布了自己的老婆——江青是小组副组长。从此，这个半疯的女人走上了朝思暮想的中国政治舞台，开始了她对自己坎坷人生的报仇雪恨。８月８日，中共机关党报——《人民日报》发表了“十六条”，第一次宣布了“文革”与过去所有“运动”的本质上的区别，是一场“自下而上”的“群众运动”。

８月初，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组”在天桥剧场接见了红卫兵。她用极其情感的声调说：“毛主席让我问你们好！你们是小太阳！”哇！果真他老人家和我们心连心，被压得喘不过气来的孩子们哭了、笑了，发疯了！这是他们有生以来，第一次做了一件被大人反对，被所有的人反对，但是被伟大领袖支持的正确的事情！《人民日报》登载了他们的文章、他们自己的组织变得全国到处都是。８月１８日，毛主席和所有的革命前辈在天安门上同他们握手，还戴上红卫兵袖章，所有画书、电影上的事情都变成了现实。只是，其中冲锋陷阵的不再是战斗英雄董存瑞和黄继光，变成了他们自己！到此为止，中学生自发的叛逆行为和毛泽东自“大跃进”之后的又一“创举”会合起来，开始了一场皇帝领导子民对其朝廷造反的“史无前例”的群众运动。记得“８・１８”那天，我的红卫兵战友们去见毛主席，我却躺在红卫兵指挥部里听广播，感到一种极度兴奋后的疲乏，眼前的世界一下子变得广阔无边，不再是一间小小教室中的书桌，不再是小学、中学、大学、工作的规范之路。革命将把我们带到哪里？我感到有些怅惘。

严酷的现实很快的把我拉回地面。“８・１８”以后，红卫兵走向社会，开始了一场暴力行为。我的小红卫兵战士解下腰间的皮带，劈劈啪啪的开始打校长、老师、工作组，甚至自己的同学，路上随便甚么人被指控为“流氓”，一群孩子就会拥上去打。我从小没挨过打也没见过家长和老师打人，偶然碰到男生欺负女生，我都给予坚决地反击。这种侮辱、虐待他人的行为，无论如何不是革命。为了反对打人，我被红卫兵会议批评“落后于群众运动”，应该好好读《湖南农民运动的考察报告》，“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作文章……”就是要将这些阶级敌人“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我的争辩是，毛主席制订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还算不算数？对待俘虏还不得打骂、虐待呢。当时任何人想要辩论、不引用毛主席语录就很难开口了，情况越来越严重，我和清华附中、北航附中红卫兵商量写了一个“三校红卫兵联合声明”。中心目的是制止乱打、乱抄的“转移斗争大方向的行为”。记

得那时一个湿热的夏夜我们坐吉普车去散发传单，车开到西单口上，突然看到一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骑车拼命追赶我们，手里拿一张传单。我以为我们的车子掉了什么东西。停下车来那人冲上前来握清华附中卜大华的手，激动地说："我是工人出身（说话先报出身）。你们写得太好了！这才是毛主席的红卫兵……"余下的话我已经听不进去了，只感到一种刺心的头疼。掠过我脑海的话，三十年一直跟我："红卫兵脱离人民了。"回想１９６６年８月的红色恐怖，出手打人的孩子有三个特点：女生多于男生，初中生多于高中生，平日里性情温和的人、８月以前作了"保皇派"的学生打得更凶，当时侥幸余生的女子中学校长，至今也想不通，为什么打她最厉害的，是她平时最心爱的学生，前年我回北京，碰到一个当年打人有名的姑娘，如今做了妈妈，自己的女儿恰恰是她６６年时的年龄，这位红卫兵妈妈恢复了"文革"以前的温文尔雅，把女儿管得特别严谨，好象生怕她去做什么不好的事情。

初中女孩子是１４至１６岁，正处在青春发育期。她们血液中的激素水平直线上升，加上每个月的周期性变化，是情绪最不稳定的群体。中国的法律当时已经提供了男、女平等的条件，女孩子们有强烈的自我意识要解放，但是几千年的习惯势力，使得社会上仍然用一些压抑她们天性的看法去规范她们的行为。例如，女孩子应该文静、贤慧、顺从。这种矛盾的社会条件在她们的心理上形成冲突。平时特别听老师话的女学生，往往是压抑她自身情感最严重的女孩子。"文革"初期，一般是"誓死保卫校领导"的人，８月以后，她们突然变成了"保皇派"，一下子觉得受了欺骗，平时积蓄的情绪能量突然爆发出来，发泄到过去她们特别敬爱的人身上。有的孩子在这个时期，甚至将亲生父母打死，留下了终生难以平复的心理伤痕。

一个记录片导演访问了头发斑白的老人——王晶尧，他的老伴——卞仲耘，是当年北京最好的女子中学——师大女附中的校长，６６年８月，惨死在自己学生手中，访问最后，老人痛不欲生的话是："这么多年了，我一直等，她们之中没有一个人走来，向我说一声：对不起。难道至今她们之中没有一个人知道那是错的吗？"王叔叔，她们知道那是一个罪过，但是，还没有力量回顾这段伤痛，我们的民族没有忏悔和宽恕的传统，她们只好将如此的重负压在最深的心底，不敢去看它。假如能使你心里稍稍好受一点，我现在站在你的面前，站在当年受过伤害的所有人面前，说："对不起。"我们虽然也是这段历史的受害者，但是应当有力量承担起自己的责任。

◇　大串联

"８·１８"以后，北京的中学生不单走上了社会，而且，走向全国。这就是"大串联"。大串联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走出北京城，大开眼界。过去，看着别人家干部的孩子跟父母在暑期去度假，我羡慕极了，很想也跑出去看看外面的大世界。但是我的父亲跟周恩来工作了几十年，自己从来不度假，当然更不允许孩子们享受这种"特殊化"待遇。所以，初二的暑假，我同另外两个女孩子到北京郊区的芦沟桥农场干了两个月的"义务劳动"，就那，也是高兴的。背上一个小黄挎包，带一套洗漱用具，几件洗换的衣服，从火车的窗户爬进车厢，（"大串联"时，为了防止拥挤伤人，索性开窗"减压"进人）领略祖国的大好河山去也。中国真美呀！厦门、青岛的海滨，桂林仙境般的山水，云南横断山脉中白链子般的山涧和红得象火一样的山茶花至今还历历在目。但是，真实世界的另一个

侧面，也在敲击我的心。中国的老百姓活得真苦呀！农民穷得连饭都吃不饱，到了湖南还遇到了讨饭的人。我们总说要去资本主义国家解救那里的劳苦大众，还去哪儿呀，他们不都在我们自己的家里吗？所有的革命理想与信奉，第一次在我心底动摇了。从此，开始用自己的眼睛重新审视面前的世界，开始质疑所有被灌输的思想，我脚下的地面开始龟裂。

我曾经为此非常的愤恨，认为我们的父辈有心欺骗我们和广大的人民，“文革”以后，我的父亲带领一个团体去加拿大作访问。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走出中国。我注意到他老人家回来后的两周内非常沉默。有一天，他突然对我说：“他们的人民生活得真好呀！”因为父亲的声调里充满了痛苦，使我不由得朝他望去。老人的眼里含有一种深深的歉疚和疑问。是在责备自己没有给中国人民带来同样的幸福生活，也不明白为什么他们为了这个目标，工作的如此辛苦，还是没有达到目的。此后，父亲工作得更加辛苦，直到病逝在医院的最后一息，我想邓小平伯伯第一次访问美国后也会有同样的感触。因为“文革”以前，共产党的干部很少出国。他们对西方社会的概念，还是停留在二十世纪初，他们“勤工俭学”的年代。那时候，欧洲工人生活的确很苦，而且没有保障。他们不明白那只是资本主义的初期阶段。在市场经济完整化以后，整个社会物质生活才可能提高到今天的水准，社会主义才能名副其实。如今，西欧实现的才是马克思当年预见的社会。中国、苏联和东欧国家，想跳跃社会的发展阶段，实际是欲速则不达，痛苦万分。

◇　中学的“派仗”

从１９６６年８月起，北京市的中学生分成三大派：按照出现的顺序，第一，是以最初自发形成的红卫兵为核心的“老红卫兵”，简称“老兵”；第二，是“家庭出身好”、但在６、７月份作了“保皇派”的学生，称作“四・四派”，人数最多；第三，是６６年１１月以后，“中央文革”为了打击“老兵”和他们的父母——老干部达到其篡权之目的，将“出身不好”的中学生扶起来“闹革命”，他们的组织称作“四・三派”。这批一直压在社会最底层的孩子们，才第一次得对了与其它孩子一样的“保卫毛主席”的权力。当然，他们开口的第一个声音，就是要求平等，留下的最有价值的代表性文章是遇罗克写的“出身论”，曾经给予我的思想解放很大启发。对于他因此而遭杀害，至今使我感到非常的悲痛。

根据“中央文革小组”不同时期的不同需要，支持或打击着北京中学生的三个不同的派别。致使他们此起彼伏，你上我下，自相残杀，全国的各种地方派别和派仗的情况，大同小异，可谓历史上最“波澜壮阔”的“挑动群众斗群众”，利用这些力量揪出了“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以后，三派学生都完成了其“历史使命”，１９６８年伟大统帅的一声令下，所有的中学生结束了派仗，统统开赴农村。

◇　上山下乡无论毛泽东当年把这批十几岁的娃娃赶到乡下去的目的是甚么，这几十万知识青年是在中国的黑、黄、红、白土地上开始成人的。大多数学生带革命的热情和决心，打算到“广阔天地去大有作为”，改变农村

的“一穷二白”面貌。结果，他们没有力量改变穷苦的乡村和农民，自己却扎扎实实地被改变了，同农民一起度过的艰辛岁月，使他们每一个人从群众运动的云端落回到地面，第一次开始思索人生与人世的真实含义。

我和另外的四个同学选择在河南辉县插队，背靠太行山，面对一望无际的华北大平原，开始了农民的生活，每天，顶繁星上工，披夜露回家，吃自己煮得夹生或烧焦的饭，点着小油灯读几行孟得斯鸠的《波斯人信札》。冬闲时，扒火车（没钱买票，偷坐车）回北京，看望别的地方农村回来的知识青年朋友，讨论会、辩论会、“中国向何处去？”“中国农村为什么这么穷？”“大寨是不是唯一正确的道路？”“中国的现实阶级应该怎么划分？”文学、艺术、音乐、哲学，无奇不有，海阔天空，这时社会上犹如欧洲的中世纪（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Ａｇｅ）一片黑暗，但是这些知识青年的地下讨论会，和被现代人称为“地下沙龙”的自发性文学艺术的学习和创作，犹如一线曙光，穿透“文革”初期对毛泽东的宗教式崇拜，开始了思想启蒙的征程，６９年我开始意识到，为了现代化，中国必须发展资本主义，但是，这种想法与当时绝大多数人的想法相距太远，在大型的讨论场合，只好用近似哲学推理的方式隐晦的表达。同知心的朋友谈起，也被扣上一顶托洛茨基的帽子，我只好回到文学、艺术的人性解放题目中去。

从农村回来的学生们，开始打破了“派仗”时期的界限，也打破了“文革”以前由于家庭出身不同而造成的隔阂，所有的人都是大自然的儿女，都是农民的孩子。一个锅里的小米粥把大家“煮”到一起去了．甚么“黑五类”、“黑帮”子女，统统被扔进历史的拉圾堆。想当初，《人民日报》天天叫喊“革命大联合”从来无人理睬。此时，共同的理想破灭共同的日晒雨淋，希望和失望的折磨，恋爱和失恋的痛苦，着着实实地把这批青年人连在一起，这种从思想到群体行为的进化，给文革之后的改革、开放，做好了准备。

◇　我当了两次“政治犯”

文化大革命十年，我被抓进监狱两次，做了两次“政治犯”。第一次是１９６７年，我是１８岁，主要罪名是６６年底写了一首大骂江青的诗。我听到江青竟敢组织大会，斗争我心目中的大英雄——陈毅伯伯，勃然大怒。陈毅从小就是一个有正义感的孩子，看到他当县官的舅舅打一个老百姓，忍不住大哭起来，他是沙场上威风凛凛的胜将元帅。外交部长当得腰杆又直又硬，给中国人民在全世界面前争了光荣，被这个靠同男人睡觉，爬进共产党来的坏女人欺负，是可忍，孰不可忍！我提笔写了一首“满江青”，抒发愤怒，“四十余年廉颇将，今日拜倒茶花女”的诗句表达了很多人自己不敢表达的情绪，被传得全国到处都是。１９６８年我同一大批“学生政治犯”经过“少管所”的“学习班”以后被释放。同期出来的还有“老兵”的董良翮和杨小阳，“５・１６”集团的主要干将等人。

第二次被捕是１９７６年，我正在河南医学院读书。据说，我在江青的黑名单上，北京方面又发难下来。“文革”十年里，我始终坚持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所以，“黑材料”被人又厚厚的攒了一大堆。被抓的时候，我正

在新乡市人民医院里实习。押解我回郑州的路上过黄河，我看到黄河的水少、沙多，很是难过。心想，不知我们苦难的中华民族，何时才能清除这些淤积的泥沙，痛痛快快地流向世界的大海。

我知道自己这次是很难活出狱了。索性在提审的时候，和预审员展开大辩论，我的预审员是一个很正直的老头，名叫张子冉，看得出他和大多数中国人一样，这时已经感到了“四人帮”的倒行逆施。因此，每次辩论他都输给我。有一次他气得拍桌子大喊：“到底是我审你，还是你审我！”我实在忍不住笑起来，逗他：“我真的不知道咱俩，谁该审谁。”四人帮”倒台后，我平反出狱。张老头到我父亲那里“告状”，说：“你那傻妞脾气真赖，进了监狱还大吵大闹，继续给自己增加黑材料。我想护她，都护不过来。”回想当时我脑子里经常浮现的是“抗日”英雄吉鸿昌烈士的形象和他那句诗“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我还以为自己已经和“十七年的教育”Ｂｙｅ－Ｂｙｅ了呢，连我出身的阶级都反掉了，马克思的毛病也找出来了，还不够彻底吗？谁知，在认知、意识层次里的变化并没有那么强大，童年被印下的英雄主义，至今在我潜意识的原始情感层次里，怕是永远也不会消失了。

◇　老三届在中国的今天和明天

中国保持人类历史中，群众运动纪录的绝对世界冠军。几千年来，几百次农民起义，曾经多次地推翻了朝廷，民不聊生就要造反。自己当了皇帝之后，又重复老朝廷的活法，循环往返。直到１９世纪，西方的洋人用洋枪洋炮打进来了，中国人才发现比人家落后了好多年。２０世纪以来，学生也开始造反。中国共产党的造反运动是“农运”和“学运”的大联合，打下来的天下，留有封建时代农民坐江山的味道，却是冠上了西方思想的帽子——马克思主义。这种东、西方文化的揉合，以及现实和理想的矛盾，导演了中国近代史的所有的悲剧和喜剧。在“文化大革命”的“全民运动”中，把这对矛盾推到了极端。粉碎了不实际的理想终于走上了现代化的道路。

今天，我的“老三届”的伙伴已经是四、五十岁进入不惑之年的成年人。他们有的在中国的党、政、军的机关里任要职，有的成为巨型财团的总裁，有的是海外的学者或巨富，有的成为挑大梁的新闻记者，成为校长、教授、老师，有的在最基层是普通的劳动者。但是，无论他们的职位高、低、人穷、人富，无论他们是在城市、乡村，还是远在大洋彼岸，这一代人，仍然具有基本的同感与共识。

有的人还在担心，生怕这个在６０年代震荡过中国的群体，有一天还会掀起更大的风暴。其实，作为个体的心理形成，接受环境影响的关键时期（Ｃｒｕｃｉａｌ　Ｐｅｒｉｏｒｄ）是人的一到十岁。“老三届”这段年龄，恰恰赶上了“新中国”成立以后，那段最平静、美好、充满了向上和建设精神的日子。在这个年代长大的孩子，无论此后他们经历了何种动荡与苦难，他们的认知、情感的基础，依然根植在建设性的土壤里。相反，最令人应该忧虑的是“文革”时出生的孩子们。他们的关键成长时间，是中国充满了扭曲、混乱、是非颠倒、尔虞我诈的年代。这些破坏性因素，渗透在他们的潜意识中，爆发在１９８９年的天安门事件里，“六・四”以后，中国政府进行了统计。调查结果表明，兴奋跳跃的多是３０岁以下，４５岁以上的人们。偏偏只有“老三届”结结实实地站在那

里，纹丝不动，他们从自己的经历中明白了，中国要想走向真正的自由、民主，最重要的是安定地发展。一次“文革”的教训还不够嘛？人要流多少次血才能学会这个简单的真理呢？真正的民主制度不是用流血换来的。民主社会的现实基础，只能建立在一个数目庞大的，有良好教育水准的中产阶级之上，要想造就这样一个中产阶级，唯一的路是稳定的市场经济的发展。所有所谓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悲剧恰恰在于：人们梦想在贫穷和无知的土壤里，种植民主之果。苏联正是还想做一个“民主政体”的跨越，才弄得国破人亡，流离失所。二百年来中国人民已经经历了太多的苦难，不会容忍任何人，拿十二亿人的身家性命再做一次实验了。

当二十一世纪来临之际，新中国的儿女——老三届肩负着承上启下的重任。和大家一样，我也在辛勤地努力。为了避免“文革”式的社会大灾难重演，为了使亿万受过伤害的心灵得到医治，我正在帮助中国建设一个自己特有的精神卫生系统。为此，成立了威灵基金会－ＷｏｒｌｄＬｉｎｋ　Ｆｕｎｄａｔｉｏｎ，给中、美两国的心理工作者架一座交流、互助的桥梁。另外，计划写一本书。把我们这一代人的心路历程记录下来。让世人对五十年来的中国，对我们，有一个更深刻地了解和理解。也让我们的孩子们知道，他们的父母是怎样和新中国一同经历了苦难，而成长起来的。

中国，即将在我们手里成为世界上最富足、强盛、和平的伟大国度。

１９９７．３．８　费城

华夏知青网不是赢利性的网站，所刊载作品只作网友交流之用
引用时请注明作者和出处，有版权问题请与版主联系
华夏知青网：http://www.hxzq.net/
华夏知青网络工作室

怀念张显扬

【作者授权田小野微信公众号“熊窝”发表】

清明时节怀故人。张显扬先生也是值得怀念的故人。他是2013年9月18日去世的，今年是他的五周年。

张显扬是一位有思想家气质的学者。他有许多学术成就。率先否定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就是他的重要贡献之一。流行的看法认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始于1978年底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十一届三中全会宣布，工作重点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阶级斗争为纲背后的指导思想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不否定这个理论，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政治运动不断，中国人就很难一心一意搞现代化建设。这个道理是很清楚的。

那么，张显扬是在怎样的情况下，率先否定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呢？十年前我和邢小群曾去他家采访，他向我们回忆了参加理论务虚会的经过。

他告诉我们，1979年春节前夕，理论界一百多人，其中包括长期在中共党内做思想理论工作的老人，在京的理论、新闻、宣传、出版、教育、文学、艺术、经济、国防、外交等各界人士，以及各省市来的联络员，济济一堂，在胡耀邦主持下，召开理论务虚会，就建国30年来理论宣传战线的基本经验，以及全党工作重心转移之后理论宣传工作的根本任务，各抒己见，畅所欲言。与会者心气很高，会议前一阶段气氛热烈而轻松。建国以来的历史、特别是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有关的事情，和毛主席的思想、理论、指示、决策有关的事情，只要你想说的，都可以说。至于怎么说，说到什么程度，全凭各人自己把握，没有人给你划框框，定调调。而且，说什么简报上登什么，无需审查，也不作删改。除非你自己认为什么地方需要改一下，那就改一下。会议主要以组为单位进行。各组开会，都有专人记录，那时没有录音设备，全靠人记。会议一结束，记录稿就送到手上，记录质量很高。人民日报的一些记者、编辑，像李泽兰大姐，都是工作人员。中宣部的干部郑仲兵他们，也在会上服务。上午的发言，拿去人民日报排印，晚上就送回来，下午的发言，第二天开会就能见到。各组交流主要靠简报。

张显扬当时是北京大学教师，北京大学开始想换别人参加，但会议是直接邀请，不是单位选派。他估计是于光远提名。因为他已经发表了批判全面专政的大块文章。他在会前就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和王贵秀一起给大会提供

了一份材料，叫做《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提出和演化》。这是从历史角度考证的。在会上，他做了一次长篇讲话，直接批判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当时连思想很解放的孙冶方、廖盖隆先生一时都接受不了。他们认为继续革命这个概念还要用。晚上休息的时候，他和王贵秀又举办专题沙龙。贴一张告示，感兴趣的人就来参加，没有组别界限。他和王贵秀请大家就“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进行研讨，讨论得非常热闹。关心这个问题的孙冶方也来了，廖盖隆当时是我们的副组长。我们跟他讲，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连理论带提法都是错误的，都不能用。大家达成了共识。以后，他们的观点为上层所采纳，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终于被中央放弃了。

张显扬还说，会议议程安排不紧，有点“白天出气，晚上看戏”的味道。我们住的吃的也很好。伙食标准有六毛，八毛，一块五三种，自己买票，买了票以后到不同的食堂去吃，非常自由。一块五的伙食不是副部级不敢去啊，六毛的伙食就非常好了，一天四餐，对我们这些穷小子来说已经很不错。里边有很便宜的高级烟，我当时还买点烟。晚上有电影看，《精武门》，李小龙的，大家说，还有这么好的电影啊。苏联电影《这里黎明静悄悄》、日本电影《幸福的黄手绢》，外面还没有放映，会上就放映了。我们坐的车是进口的空调大巴，那会儿根本见都没有见过，感觉非常高级。

张显扬说，与会者都是在党文化熏陶下成长起来的，从未见过、更没有参加过这样自由的会议。一些人不免心里打鼓。但是，年纪轻一点的，像严家其、王贵秀、郭罗基、牛欣方我们这些人，既无政治经验，又无心底城府，根本没有考虑会不会有什么后果，只觉得从未有过的痛快，说话口无遮拦。当时我们40刚出头，严家其还不到40。现在回想起来，那时候我们真可谓不知天高地厚。

张显扬后来调到于光远麾下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遭遇了很多坎坷。我们采访他时，他已经退休多年，和我们成为朋友，还曾一起同游怀柔的水长城。2013年夏天，他和夫人搬到昌平北京太阳城居住。当时，他的文集《历史决定论批判》刚刚出版，邀我们去他家取书。8月21日下午，我们驱车来到他家，并回赠他《精神的流浪》和《沧桑》两本近著，请他指正。他说去年心脏病突发大难不死。现在看上去精神很好。和我们聊了不少事，谈到于光远时，他说我从于光远那里学了一着。有一次要写一篇大文章，已经确定了题目和观点，但于光远布置，你要选三段马克思的话，两段恩格斯的话，再选一段列宁的话，放到文章里去。可见，于光远是六经注我，为我所用，在中国的政治环境下，不得不如此。他的新居离我们家不远，开车只需要十几分钟。见面畅谈后，便相约以后经常相聚。

8月26日他发来一信：

小群、丁东：

小群的《沧桑》拜读一过，丁东的自传正在阅读中。《沧桑》极好，5篇采访记录，我看得比较细的，是灰

娃、何老、杨乐3篇。读过灰娃，我有一种感悟：美和亲情、乡情是与生俱来的，一个人只要良心没有泯灭，没有被某种歪理邪说异化，就有这种感情；在日常生活中，这种人多半显得有点傻，实际是人性的自然流露，是本我的真实表现。灰娃就是这样，她傻得天真，傻得可爱。5篇文章中，这是最好的一篇。这种文章给人以美的享受，可以陶冶人的心智。何老的经历，我读过他的《延安一路走来的反思》，大体还记得。他对许多事情的看法，我都赞同。不过他这里关于（抗日）“救亡运动本身就是启蒙运动”的说法，恐怕不能成立。救亡运动，对于唤醒沉睡的中华民族有大作用，这是不争的事实，但这与启蒙运动不是一个概念。启蒙的意义是人的觉醒，确切地说，是作为个人的人的觉醒，而不是作为群体的民族的觉醒。民族觉醒了，个人仍然可以处于蒙昧状态，君不见，抗日战争胜利了，“民族独立了”；解放了，“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可中国人作为个人，什么时候享有过启蒙运动的成果：理性主义、民主主义和人本主义？何老是老辈人，国家、民族的观念非常强烈，总以为对国家民族好的事情，对民众个人也好。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如果你们有空，可以翻一翻我文集中关于“新启蒙”的那篇文章，那里对启蒙运动的意蕴大体上说清楚了。祝好！显扬收到这封信以后，我们打去电话，他表示愿将自己的新书送何方一阅，托我们转交。于是，9月7日我们又去太阳城看他。他谈到，中共党内主张政治革新的人，有不同的思想层次。他条分缕析出十二个层次，认为只有朱厚泽等少数大彻大悟者，跨过了所有十二道门槛，进入了彻底独立的思想境界。张显扬和许多老人私交很好，每个人思想上走到哪一步，他都有近距离观察。当然，这些老人的思想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我建议他把这十二道门槛写成系统的文字。他表示，和这些老人很熟悉，写出来恐怕他们对号入座伤感情，暂时还是不写的好。不料，这次见面11天后，他心脏病再次发作，魂归道山，年仅77岁！

熊窝文集：http://www.hxzq.net/showcorpus.asp?id=258

华夏知青网不是赢利性的网站，所刊载作品只作网友交流之用
引用时请注明作者和出处，有版权问题请与版主联系
华夏知青网：http://www.hxzq.net/
华夏知青网络工作室